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历史卷



凡 例

一、编排

1. 本书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
2. 本书条目按学科体系排列，各学科均列有本学科全部条目的分类目录，便于读者了解该学科的全貌。
3. 本书内容简介列于目录之前。
4. 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条目，有的在各卷设参见条；有的则在各卷分别设立，其释文内容分别按各学科要求有所侧重。

二、条目标题

5. 条目标题由规范的、通用的词或词组构成，能概括或代表所述的概念或知识主题。

6. 本书设有参见条，分为仅设标题的参见条和附有简短解释的参见条。

三、释文

7. 本书条目的释文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释文开始一般不重复条目标题。

8. 较长条目的释文，有的设有层次标题。

9. 释文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作品名等一般不附原文，有些不常见的或容易引起误译的则附有原文。

10. 释文中的注释和引文采用夹注和随文注明出处的方式。

四、插图

11. 本书在条目释文中配有必要的插图。

12. 彩色图汇编成插页，并在有关条目释文中注明“参见彩图插页第××页”。

五、索引

13. 本书各卷末均附有该卷全部条目的汉语拼音索引和相应的页码。

六、其他

14. 本书设有必要的附录和附表。

15. 本书所用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专用名词、成语和一些习惯用语用汉字。

16. 各学科的名词和术语以国家标准局公布的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为准，尚未审定的则根据本学科习惯，力求统一。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审定的为准，古地名一般加注今名。

前言

《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汇集中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大型专业百科全书；是为广大中学教师、中等教育研究者、管理者以及中学生及其家长提供的一个全面的知识库和信息库，案头的必备书；也是图书资料存贮机构应备的大型工具书。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指示编写中国的系列百科全书，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没能实现。1978年以后，国务院决定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同时设想编辑出版中小型百科全书和专业百科全书。1985年秋，北京师范大学交叉学科研究会的一些同志为填补专业百科全书的空白，开始酝酿编纂《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恰好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国家教委有关同志也要求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力量编写此书。上下各方不谋而合。我们在有关专家和领导的支持下，组织各系、所的教学、科研骨干40余名，着手拟定编纂计划和设计框架结构。沈阳出版社独具慧眼，出版此书。

本书由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教授任主编，成立了总编委会和分卷编委会。由在学术上有造诣、对中学教学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任各分卷的主编和副主编。同时设立了编纂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编委会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北京教育行政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体育学院以及北京市部分重点中学的教授、副教授、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和国内有中学教学经验的教育工作者，共计500余人进行全书的编写工作。

本书经过确定体例、辞目拣择、撰写释文、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等阶段，按时交稿。出版社对稿件进行了认真的编辑加工，使全书与读者见面。

本书共分10卷：《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语文》、《历史》、《教育》、《政治》、《体音美》。平均每卷约140万字。全书共计1400万字，收入辞目近3万条。本书力求科学性、准确性、稳定性的统一，立足于基础教育。条目力图涵盖全部中等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综合我国近半个世纪中等教育的经验和成就，以20世纪90年代的中学教学大纲为依据，又比大纲的范围稍广，内容稍深；同时参照世界各国中等教育的最新成就和进展，体现教育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思想，使本书具有前瞻性。本书除收入12个学科的基本内容外，还收入了中学教学法，高考、中考原则，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内容，国际中学生各种比赛的内容和方法等。

《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作为综合性中等教育工具书在我国出版，尚属首创。本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教委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关怀与鼓励，得到许多专家的指导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时间短促，经验不足，加之篇幅浩大、条目繁多、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编委会
1990年5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
(历史卷)

历史

(lishi) 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广义地说，包括自然界的发展过程即自然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即人类社会史。一般地说，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亦即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李大钊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7～19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凡人类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方面，如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学术、宗教、伦理等，均在其涵括之中。狭义地说，指一个具体事物的发展过程或一个人的经历。在习惯上，也指人们对于历史的记载和撰述。

（瞿林东）

历史学

(lishixue) 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表明,历史学渊源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而随着文字的发明和历史记载的出现才逐步形成为一门学问。人类社会的历史包含着极广泛的内容。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自亦有恢廓的领域和丰富的表现形式。中国古代,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的《隋书·经籍志》,分史部书为13类:1.正史;2.古史;3.杂史;4.霸史;5.起居注;6.旧事;7.职官;8.仪注;9.刑法;10.杂传;11.地理;12.谱系;13.簿录。它认为史官应是“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在中外史学上,有许多杰出的史学家和优秀的历史著作,记述了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提出了丰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于文献整理、史实考订方面亦有丰硕成果。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从整体上看,历史学始终未能摆脱唯心史观的羁绊和剥削阶级的偏见。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真正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揭示了它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百余年来,世界上还存在着种种历史学学派,也取得了一些值得肯定的成绩,但它们同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起来,总是相形见绌。马克思主义史学尊重以往史学中的优秀遗产,尊重其他历史学学派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创造性成果,并在对它们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吸收的基础上,用以丰富自己。中国历史学从本世纪20年代起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逐渐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参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前的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历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地方史、民族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国别史、区域史等等。

(瞿林东)

历史理论

(lishi lilun) 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哲学认识。古往今来的许多历史学家或历史学派，不论其自觉与否，都有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认识，以至建立了各自的历史理论。诸如历史是不是运动的、变化的，历史发展的趋向是什么，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何种作用，历史发展是否有规律性存在等，都有种种不同的见解和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列宁阐明了唯物史观在历史理论上的重大成就，认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性等，是历史理论中的几个根本问题。对于历史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一般应以这些基本理论为指导，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得到发展和丰富。中国史学界在80年代中讨论的历史问题主要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关于社会形态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等等（见蒋大椿《四十年来历史理论研究述略》，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在研究或讲授中，应注意到历史理论同史学理论的区别。近年国内学者出版的以阐述历史理论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有：葛懋春等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第3版），余树声著《历史哲学——关于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思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各有特色，均可参考。

（瞿林东）

史学理论

(shixue lilun) 关于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理论概括。以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 如关于历史学的特点, 历史学的功能(包括社会功能、科学功能、教育功能), 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认识的特点, 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历史文献和史学方法问题, 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式问题, 史学家的素养与时代使命问题等等, 均为史学理论研究的范围。史学理论同历史理论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参见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1986年12月3日《光明日报》), 同时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 史学工作也是一种历史活动, 它应当被包含在历史理论所概括的一切历史现象之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历史理论包含着史学理论; 从史学的观点来看, 史学工作者以及一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对历史的认识、研究、评论, 都是史学活动, 也都在史学理论所应当总结和概括的范围之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史学理论又包含着(至少是部分地包含着)历史理论。它们的这种关系, 要求史学工作者不应脱离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而仅限于对史学的研究, 同时也不应脱离对于史学的研究而仅限于对历史的研究; 恰当的做法是在有所侧重的前提下把二者结合起来(参见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 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近年国内学者出版的以阐述史学理论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有: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姜义华等著《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各有特色, 均可参考。参见“历史理论”条。

(瞿林东)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lishixue de shehui gongneng) 泛指历史学研究成果对社会的作用。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历史观点、历史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渊源于客观历史并最终为其所制约,这是历史发展对史学发展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这种反作用的一个方面。由于历史学所包含的内容异常丰富,故其社会功能亦具有十分广泛的含义。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一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历史学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主要是:1.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历史学的任务来说,人们不仅以解释过去、认识现在为限,还要着眼于未来,创造新的历史。这就必须了解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根据这种规律,人们能够对以往的历史作出科学的评价,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并对历史发展的前途作出科学的预见。2.人们通过历史学而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实;而认识现实的目的,往往又包含着对于未来的关注。历史学因具有反映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这个特点,能够比其他学科更多地满足人们在这方面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愈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那末愈是表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关注着自己的现实状况和未来的命运。3.人们可以通过认识历史而最终认识自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与历史主体的自觉性是辩证统一的。这是因为,正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才能认识历史规律、运用历史规律,自觉地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因此,人们通过认识历史而最终认识自己,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学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是对于国家统治者或领导者的重大决策的参与;2.是对于社会成员中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某一群体变革现实社会的要求的参与。这两条,在中外史学上都有极丰富的记载。3.是对于社会教育的参与(见“历史学的教育功能”)。

(瞿林东)

历史学的教育功能

(lishixue de jiaoyu gongneng) 指历史学在教育上的作用,亦称历史教育。这是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之最深厚的基础所在,社会愈是近代化和现代化,这一特点就愈益明显。历史教育,在中外史学上都有古老的传统。从中国史学来看,广义的历史教育,包括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启迪人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积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的使命感等等。中国史学在教育上的作用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自近代以来,史学成为宣传爱国图强、鼓吹改革和革命的舆论之一,史学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历史的命运紧密相连。李大钊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引导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创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4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这是历史教育在启发自觉的阶级意识上所起的作用,是历史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发展的新阶段。第二,中国史家层出不穷,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不绝如缕,对于中国成为世界上罕有的、文明不曾中断的伟大国家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是中华民族之深厚的民族意识的源泉之一。因此,广义的历史教育,是关于民族素质的教育;它的最高的目标,是历史主体在科学的历史观指导下真正认识到自身使命和价值的教育。这种教育,从横向看,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从纵向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人生道路看,具有一定的终身性。狭义的历史教育,指历史知识的教育,这是广义的历史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正确的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则广义的历史教育的目的无法实现。但是,狭义的历史教育和广义的历史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和历史教育工作者是可以在实践中把二者统一起来的。

(瞿林东)

历史规律

(lìshǐ guīlǜ) 即历史法则。它是那些相信人类社会及历史象自然界那样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人们所揭示的一个范畴。对他们来说，历史规律也是客观实在，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的、具有表象相似性或本质共同性的历史现象及其内部和外部的本质联系。揭示历史规律，是人们透过历史表象探讨其深层因果联系，揭示历史发展中普遍性、统一性、必然性的努力的表现；是人们不满于对历史的肤浅描述、并希望历史可以资鉴现实、预示未来的想法的表现。由于对历史规律的揭示是对无法感知的历史深层结构所做之抽象性认识，所以有可能投上更多的主体性影响，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历史规律是上述人对于上述历史现象及联系的主观抽象和归纳。这就是说，有些曾被认为是历史规律的东西，后来被历史证明并非规律；另有些曾被认为是偶然现象的东西后来则被历史证明是规律，因此历史规律又是历史规律性认识的产物，这种认识往往要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由此可见，历史规律一方面是人类社会中确曾存在过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因无法经验地求得和立即通过实验加以证明而具有主观色彩，因此是特殊的东西，它与自然规律既有相同处，又有不同处。这正表明历史科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

基于此，历史规律具有如下特性。第一，重复性。这是其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同于自然规律的一种属性，由此也表明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人们正是对历史现象的多次重复进行探索，抓住其内在联系，证明它是历史规律；一旦如此，它就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了——第二，预见性。如果没有一定程度上的预见性，就不成其为历史规律（如唐太宗等总结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规律，不仅适用于他以后的封建社会，也适用于现当代社会），这样，发现规律才有价值。第三，层次性。基于以上，某些历史规律适用于几种社会形态或整个人类社会，而更多的则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即所谓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如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由低向高不断演进等，都是适用于一切时间和空间（历史时期）的普遍规律，是最高层次的历史规律。相对它们而言，其他具有规律性的现象、事物都是特殊规律，都具有偶然的因素；而在它们各自的层次上，又都是必然的规律。第四，不确定性或开放性。由于人的主观限定，即使是被揭示出来的历史规律，也要经由长期历史发展进程的检验，看它是否确是历史规律，尤其是看它究竟在什么层次上，或在什么范围内是历史规律。也正因此，因为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规律的被认识有可能被修正、被限定范围，甚至被否定；同样，还有可能不断揭示出新的历史规律，并在更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加以验证。（赵世瑜）

历史时代·历史时期·历史阶段

(lishi shidai·lishi shiqi·lishi jieduan) 它们是历史研究者根据特定标准将历史按时间加以划分时所用的几个概念。在研究过程中,这几个概念往往是混通使用的,并无绝对严格的区别。从广义上说,历史时代、时期和阶段都可以指历史的一个较长的时间期,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综合指标,划分出一个个历史时代、时期和阶段。比如奴隶制时代,既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阶段。但是同时,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也可以用来指称历史的一个较短的时间期。

比如中国“文化大革命”的10年,既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期,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历史阶段,却不能称其为一个历史时代。这就是说,历史时代只是在较宏观的意义上,即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性质截然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如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一王朝,即使长达数百年之久,亦不可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时代。

将历史划分为时代、时期和阶段来考察,是人类认识进步的标志。一方面,人们发现历史中存在着特征明显不同的时间期,他们首先发现有古今之别,即古代和现代,甚至发现有神话时代或传说时代(这在中国的老子、屈原、司马迁那里,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等都有体现),后来则出现了蒙昧、野蛮、文明时代的划分。古代史学家的历史循环论,无论是西方的生、老、衰、亡说还是中国的五行终始说,都等于把人类历史划分出时期或阶段。因此就这些概念而言,古代史学家很早就开始运用了。另一方面,把人类历史总体划分为时代、时期或阶段来考察,是一种阶段论的观点,也即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这是历史认识日渐科学化的表现。这是说,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有其一致性、统一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期,又具有差异性、多样性。如果一视同仁地看待不同时期的人和事,或者不对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和事的特定历史环境加以分析,或者用此时的标准评判彼时的人和事,恐怕都不能获得较科学的历史认识。

必须指出,历史时代、历史时期还往往有另一层含义,即作为有史时代、有史时期的同义词,作为史前时代、史前时期的对应词出现。一般来说,它指的是文明时代开始之后,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中国而言,夏商之后至今,都属于历史时代或历史时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还与地质时代或地质时期相对应,后者指的是人类产生之前地球缓慢演化的过程,以及地球无机物、有机物乃至生命的逐渐演化过程,前者则指人类产生之后这一相对短暂的发展过程。

(赵世瑜)

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

(lishi yanjiu de zhuti yu keti) 或称史学的主体与客体。历史研究是一种历史认识，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是人，而客体是认识的对象，具体来说就是整个自然界和整个人类社会。而历史研究的主体则指历史学家及其他进行历史研究的人，历史研究的客体指的是通过各种历史资料所展示的确曾发生过的客观历史过程。

历史学家主体认识上的各种特征给历史研究带来了主体性问题。即，包括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在内的主体意识结构诸因素，对每个史学家来说都存在差异，因而造成对同一问题的历史研究出现不同面貌的可能性。譬如，封建史家可能会把农民起义诬为盗贼，而无产阶级史学家则把农民起义视为反剥削压迫的英雄。体现在历史研究的成果上，由于史学家主体性的渗入，使绝对如实地再现历史成为不可能的事。但这并不是说，承认史学主体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认识成果的差异，就否认史学主体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一致。由于科学家的求真态度、方法的日益科学，在特定范围内哲学观、政治观的一致、人为环境的一致等，历史认识的一致性是可能出现的，因此，史学主体既有差异的特性，又有一致的特性。

当然，不可能绝对如实地完全再现历史，不仅在于史学主体的特性，还在于史学客体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在于，客观历史的发展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即一去不复返的；而反映这一客观历史的史料往往是不完整的、表面化的，甚至掺杂了史料记载者的主体成份的，因而客观历史是不可复原的。但这并不是说历史研究的客体即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不是客观历史，而是什么“选择后的历史”，因为史学主体的目的就是要去伪存真，从掺杂记录者主体因素且不完整的史料中尽量获取历史真实，尽量从大量表面化资料中发掘历史规律，求得深层的历史因果，即不断向历史真实逼近。这样得出的历史研究成果虽仍可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选择后的历史”，但这已经是史学，而不是历史。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使史学（历史认识）更接近历史（客观史实），否则便会使史学日益远离历史。

历史研究是其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必然带有二者的痕迹。历史研究的主体使客体上升为科学知识，而客体则是主体获取这一科学知识的源泉。但是历史研究的主体无法直接实践于客体，必须借助史料作为二者发生关系的中介，因此史料是客体的某种表现形式，主体必须首先实践于史料，然后才能实践于客体本身。这样，史学主体的工作必然首先是寻求符合史实即客体的史料，这才能使主体力图如实反映客体的努力获得成功。

（赵世瑜）

历史观念

(lishi guannian) 亦可称之为历史观，是人类（包括个体人以及人类群体）对自身历史的一般看法。人类自产生伊始，就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当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就会对自己所经历的自然历史过程，特别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思考，由此产生的看法即为历史观念。而所谓一般看法，是说历史观念通常并不指那些片断的、支离破碎的、个别零星的对历史的看法，而往往是对历史的总进程，特别是对纷纭的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因果所进行的哲学分析，是对人类历史总体，而非某个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的总体看法。因此，在概念上，它不同于历史认识。一般来说，历史观念的产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体现，因此，文明的产生是其大背景。但是，历史观念一经产生，就绝非人人一致的，就是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利益集团的人可能会有迥然相异的历史观念，比如古希腊的史学家把历史看作是循环的，而中世纪的神学史学家把历史看作是上帝意旨的体现，是上帝精神表演的舞台，而在黑格尔那里，这个上帝变成了“绝对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则将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史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史，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无限丰富、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视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一般来说，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甚至神学家具有较为丰富、系统的历史观念，但这并不是说，其他人，甚至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没有历史观念，只是因为长时间以来，通过文字流传下来的大多是著名思想家的作品，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湮没不彰；而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历史观念则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深刻影响。总之，在迄今为止的思想史上，存在过唯心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有过二元论的或多元论的历史观，有静止的、循环的历史观，也有辩证的、发展的历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念，一般都要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历史发展的动力或决定因素是什么的问题、历史的创造者问题，都要对人类历史的发生、发展甚至衰亡的问题给予解释，都要探讨历史发展的道路及其发展趋势的问题，探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等。可以说，一种历史观念往往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赵世瑜）

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

(lishi sixiang yu shixue sixiang) 这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所谓历史思想，一方面是指人们对自身历史的一般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它等同于历史观念；另一方面则含有历史感的意思，如说某人具有历史思想，可能是指他具有历史感，或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就后一方面而言，历史思想指的是思想中常具备历史的尺度，常从时间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常常从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常常在分析问题重视其历史背景、历史环境。但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人人都主动自觉地具有历史思想，历史的思维方式、历史感，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是需要长期培养和锻炼的，是需要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加以引导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批评机械唯物主义就缺乏这种历史思想。但是这种历史思想又应该是人人必备的，它能使人们在分析问题更加全面和实事求是，是重要的科学思维方式之一。不过，就使用频度而言，历史思想常在前一方面的意义上使用（参见“历史观念”条）。

所谓史学思想，一般是指人们对历史学即历史研究编纂工作的看法，特别是指史学工作者对本领域的看法，因为史学工作者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但在具体应用时，有人往往把史学思想与历史思想即历史观念相混淆，认为对一切历史现象的看法，如对具体历史人物事件的看法，亦属史学思想。因此致使这一概念在应用时含义比较模糊，至少是将其广义化了。究其原因，由于无论对历史总体还是对历史具体的认识，都属于历史学或历史研究的范围，故广义说来，它们均可说是史学认识或史学思想。但严格地或狭义地说，史学思想只是对史学本身的看法，以示与历史思想之别。

史学思想的产生约略稍后于历史思想，它是历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有一定数量的历史著作产生之后的结果，是史学传统形成的标志，也是史学史肇始的标志。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史学思想就很丰富，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他把历史研究分为事、史、义三种成份，就是很了不起的史学思想。所以，所谓史学思想，当包括对历史学家如何撰写历史的看法，包括历史学家的主体局限、研究手段的种类及优劣、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历史学的对象和性质、历史学的功能、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史学成果的评估等各种围绕历史学本身的问题。无论是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全面概括的解答，还是对其中个别或某些问题的看法，都是史学思想，因而史学思想不必定是一种总体性认识。

（赵世瑜）

历史认识

(lishi renshi) 即指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包括历史思维和历史解释, 象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成果、各种历史观念或历史思想, 都是一定的历史认识。历史认识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 因而具有与哲学认识等其他认识过程的共性; 同时由于历史认识的对象是人类历史而非其他, 因此它又有特殊性, 相对哲学认识而言, 它又是一种特殊认识, 具有特殊的认识规律。一般说来, 造成历史认识不同于一般认识活动的原因, 主要并不在于主体方面, 而在于客体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在于历史认识的客体不能直接呈现在主体面前, 供后者直接观察、解剖、实验, 以获得对客体性质、特征的认识, 而只能通过对史料这一形式客体的认识去尽可能地接近原本客体即历史本体(参见“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条)。这个特殊性就导致历史认识只能是相对的, 即无法求得绝对的客观真实, 即使是科学的历史认识也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程度上获得比较准确的答案。这个特殊性还导致历史认识必须经由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价值性认识等阶段, 或说历史认识过程由上述部分构成, 即首先要对史料进行批判考证、去伪存真, 对所获得的相对正确的事实进行一般描述, 然后再深入前述历史表象, 探讨深层的因果关系即历史规律, 从特殊中抽象出一般, 最后给予揭示出来的历史现象及深层结构以评价, 这是一个由表及里, 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 它不仅是史学主体之历史认识的基本顺序, 也是人类历史认识史的几个顺序阶段。

历史认识与一般认识活动相同的是, 它们都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特殊测度, 由于多种主体因素的制约, 各种历史认识存在差异, 甚至截然对立的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既存在科学的历史认识, 也存在非科学的, 甚至反科学的历史认识; 既存在深入内质、把握全面的历史认识, 也存在肤浅的、局部的历史认识, 因此历史认识的表现形式是十分丰富多样的。但是, 检验历史认识的是非正误无法靠“历史实践”, 因为历史一去不复返, 我们无法找回那些逝去的历史事实为我们今天的历史认识作证。但我们可以通过历史长期不断的发展过程来不断对以前的历史认识、特别是规律性认识加以检验, 这是由于 1. 人类发展的某些共性不会因时间变化而变化。2. 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 以前藏而不露的因素逐渐得到揭示。3. 人们对某些共性或规律的把握, 是在较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因此, 任何历史认识的被检验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也都不是确定无疑的,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深化的。

(赵世瑜)

历史认识论

(lishi renshilun) 历史认识论是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它与历史本体论、历史方法论或史学方法论共同构成了历史哲学。具体说来，它是关于历史认识主体认识其客体的过程、特征、方法等等的理论，它主要涉及历史认识主体（人、特别是史学家）和历史认识客体（即客观历史）各自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历史认识过程的特点、历史认识正误的原因及其检验方法，还涉及历史认识如何对实践乃至对现实发展进程的影响。严格说来，历史本体论是关于历史本体即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论认识，也即历史理论，而史学方法论则涉及手段问题，因而历史认识论成为历史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正因此，它成为当代国内外史学理论界集中注意之点。

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人们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历史本体上，即通过各种手段对客观历史进行复原，辅之寻找某些事件的因果。但从那以后，心理科学、思维科学等等的发展刺激了哲学对认识论的重视，历史哲学也开始把研究重点从客体移到主体，他们不再问：历史是什么？而在问：历史学家是怎样认识历史的？他们能认识吗？或者问：历史学是什么？因为归根结底，历史科学也是一门认识科学。而历史认识论之所以受到重视，也在于以往人们过于忽视历史认识主体对认识过程的干预，过于强调认识客体的绝对“纯洁”，即绝对客观，而忽视了历史认识在主体与客体方面不同于一般认识过程的特殊性（参见“历史认识”条）。由此可见，对历史认识论研究的重视，是作为兰克学派（参见该条）及其观点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早期倡导者为德国的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后来意大利的克罗齐、美国的贝尔等人则更走向极端。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经典作家认为，人类认识对象是无限的，但其认识能力也是无限的，因此人的认识总是相对的。这样，尽管绝对如实地认识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客观地获得历史认识的；从总体而言，较新的历史认识总比较旧的认识更接近客观历史。在此基础上，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觉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81 页）而历史认识也正循着这同一个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一般原理对于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赵世瑜）

历史评价

(lishi pingjia) 通常指人们对历史人物、事件等一切历史现象从价值角度所做的认识。通常也指从属上述价值性认识中的一种评价角度，往往与“道德评价”相对应。由于人的主体意识结构诸因素的影响，对历史人物、事件等一切历史现象所做评价有可能出现差异，封建史家可能视某些帝王为绝代明君，但人民大众却有可能视其为剥削者、压榨者的总头目、总代表。在不涉及政治态度、阶级观点等等，都从科学、客观的立场出发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不同的历史评价，如有人认为明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如同西方文艺复兴以及启蒙思想，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伴生物；有人则坚决反对“启蒙说”。再如有人认为岳飞是民族英雄，有人则不认为是，即持前说者中亦有分歧意见。

但这并不是说历史评价就没有较为一致的标准和原则，但这种较为一致的准则一般比较概括和抽象。比如刘知几评价史学家及史学作品的准则是史才、史识、史德三者的统一，这一点我们至今仍可接受。不过史德究竟何指、史识究竟何谓，在不同的时代是有差别的。一般而言，历史评价首先应该恪守求真的原则，即该评价应客观如实，应符合对该人该事的总体描述。为达到这个目的，历史主义地看问题，即发展变化地看问题、设身处地地看问题是必需的。以此为前提，历史评价总体上说有历史评价尺度和道德评价尺度。历史评价或评价上的历史尺度，指的是把所评人或事放在较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其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大趋势，重在考察其较深远的影响和意义；道德评价或评价上的道德尺度，指的是用一般善恶标准来衡量所评人或事。比如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道德尺度出发，它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非命，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显然是一件坏事；从历史尺度出发，它破坏和平，逆历史潮流而动，致使历史发展出现停顿甚至倒退，因此应给予它否定性的历史评价。但是，评价上的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也会出现矛盾，如秦修长城和隋修运河，都造成数以十万计的人民死亡，并成为大起义的导火线，道德评价是不好的；但前者有利于国家疆域的稳定、农业生活有了保证，后者则成为沟通南北的经济命脉、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故于历史评价是好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虽应把上述两方面都一一指出，但二者间应尤重历史的评价，因为历史的评价是较为长期的、比较客观的，而道德尺度是因时因地而变的、主观性较强的。总之，历史评价作为对历史的价值性认识，重在给出对该人该事的历史作用、意义、局限等等的认识，是历史认识或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它不同于考察客观历史真伪的考实性认识和探索历史深层因果的抽象性认识，即比前者带有更多的主体性、个体性（比如对于林则徐、鸦片战争的生平经过、历史背景等意见都一致者，往往在最后的评价上出现不一致），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史学发展所必需的。

(赵世瑜)

史学史

(shixueshi) 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其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阐明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揭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批判地总结史学遗产（包括史学传统），为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成果和借鉴。中国史学史的主要内容包括：史家或史书所反映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历史文献的积累和发展，历史编纂和历史文学的发展，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修史工作和修史制度的发展等。历史观点，指的是关于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对社会经济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看法，对历史上得失成败的看法，对民族关系的看法，对朴素民主思想的看法，到了近代，还有对中外关系的看法，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等等。其中，最根本的是关于对历史的运动的看法和对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的看法。历史文献，指的是关于它的积累的情况，文献整理在各方面的成就，以及历史文献在史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历史编纂，指的是史书的体裁和不同体裁的互相补充与综合，史书的体例和对于体例的运用，以及史书的编和著的区别与要求。历史文学，这里不是指的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而是说的史学家对历史之表述上的艺术，如写人物、写战争、写历史场面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至于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一方面是指社会发展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指史学对社会的作用。修史工作和修史制度，主要是指史职的性质及其地位的变化，以及修史机构及其制度的发展等。外国史学史又可以分为东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而这二者都还可以再分为国别史学史。如果从时间上来考虑史学史学科内容的范围的话，则不论中国史学史或外国史学史（包括国别史学史），都可以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等若干个阶段；而中国古代史学史还可进一步按照某一个皇朝或某几个相连续的皇朝来划分，如秦汉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学、隋唐史学等等。

史学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从实质上说，是适当地运用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的有关知识，来提高或加深学生对于客观历史发展的认识，增强学生对于历史课的兴趣，有助于学生初步建立起对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从具体方面来说，这个作用主要表现在：1.通过对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的进步的历史观点的讲授和分析，丰富学生对于客观历史发展进程、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增益学生的历史智慧。2.通过对著名历史著作在历史文学上的代表性篇章、段落的讲授，烘托课堂气氛，增强学生对于历史的形象认识，促进学生对于历史课以至于历史学的兴趣。3.通过对于著名史学家和历史著作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的讲授，启迪学生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并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逐步建立起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积极促进历史前进的自觉意识。4.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适当地讲授一些必要的史学史知识，还可以帮助学生扩大课外历史阅读的范围，引导对历史课、历史知识以至于历史学有兴趣的学生阅读一点史学名著，提高他们在历史文献方面的素养，为进一步学习和深造打下初步的基础。

(瞿林东)

中国古代史学

(zhongguo gudai shixue) 先秦时期至鸦片战争(1840年)以前的中国史学。中国古代史学追本溯源,萌发于古代先民对于远古英雄人物的传说。黄帝、蚩尤之战是关于部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的传说,羿射九日、女娲补天是关于对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中的英雄人物的传说,禹善治水、稷善耕稼是关于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英雄人物的传说,还有许多关于创造发明、祖先崇拜、血统承传的传说。这是在文字出现以前先民的原始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传播的最初形式。殷、周时期出现了甲骨文和金文,有了简单的文字记载,为史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古代史学从最早的官文书《尚书》和史诗即《诗经》中的《雅》《颂》出现为萌芽起,历二千余年,经过5个发展时期,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就。1.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

《尚书》中的《盘庚》《牧誓》等篇记载了殷、周时期的一些重大史事,《雅》《颂》反映周室东迁前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情况和有关封国、征伐、农事等活动,它们与金文记载都表现出明确的历史意识。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国史”发展起来,称“春秋”、“柶机”、“乘”,均编年纪事。春秋末年孔子修《春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开私人撰史的先河。战国时期私人撰史逐渐增多,《左传》和《国语》是记述春秋史事的,《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是记述战国史事的,《竹书纪年》和《世本》是记述远古至当世史事的通史,政治形势走向统一的趋势在史书中多有反映。2.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确立。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历史巨著《史记》和《汉书》,前者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者为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西汉初年诸家史论和东汉末年荀悦撰写的第一部断代编年史《汉纪》,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史学成果。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史》、《北史》等13部“正史”的编撰,是这个时期史学的重大成就。它们占了《廿四史》的半数以上。刘知几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唐中宗景龙四年,即公元710年),杜佑写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典制体通史《通典》(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即公元801年),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地方史、民族史、宗教史、家史、家传、谱牒、域外史等,都有很大发展,史书的数量、种类和体裁也都明显的增加。4.五代宋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代表了编年、纪传、典制三种体裁的通史撰述的新成就;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杰作。《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等7部“正史”的编撰,以及对于当代历史文献的整理,也都反映出史学继续发展的势头。5.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李贽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是这个时期的史学名作。对于历史文献的考订、整理、校勘和对于古史的考信,王鸣盛、钱大昕、赵翼、阮元、崔述等,是为名家。封建正宗史学思想仍居统治地位,同时出现了批判和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思想。

(瞿林东)

中国近代史学

(zhongguo jindai shixue) 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史学。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夜,是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前期;自“五四”运动起,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其后期。前期,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兴起前。这个阶段的史学的特点,是史学家对民族危机的突出的时代感。龚自珍和魏源,作为史学家,首先表示出这种时代感。龚自珍主要着眼于国内封建统治的腐败,他的著作猛烈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魏源则不仅仅如此,还着眼于外侮的严重性,发愤撰写了当时中国和东方仅有的世界史地巨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二阶段,从太平天国兴起到戊戌变法。这个阶段史学的特点,是鼓吹变法和历史必变的思想。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倡言于前,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谭嗣同的《仁学》宣扬于后,并成为戊戌维新的理论根据。第三阶段,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五四”运动前夜。这个阶段史学的特点,是鲜明地致力于革命思想的宣传。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炳麟的史论和政论,以及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发表的论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后期,中国史学出现了近代化的发展趋势。其主要标志是:1.历史学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即从以研究统治阶级人物为重点转向以研究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为重点;2.一些传统的历史观点受到了批判,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跟对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有了初步的联系,扩大了历史学的视野;3.在史料运用方面也扩大了领域,古老的文化遗存、出土文献、佛道典籍、档案材料,以及域外材料和语言材料,极大地丰富了这个时期历史学的史料内涵;4.用新的有系统的形式写的中外交通史、各种专门史和专门性的史学刊物相继出现。在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参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新考据学派在史学上也取得相当的进展,顾颉刚、胡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皆一代名家,各有成就。

(瞿林东)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zhongguo Makesizhuyi shixue)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亦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学派。产生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参见“中国近代史学”),1919—1949年为建立时期,1949年以后为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时期。建立时期分四个阶段:1.1919—1927年是第一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李大钊是第一位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中国第一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结合起来的著作,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2.1927—1937年是第二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观察中国历史的进程并同当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这10年中,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论战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另一位奠基人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后,他连续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殷周金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这些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都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所得到的。吕振羽写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3.1937—1945年是第三阶段。4.1946—1949年是第四阶段。在这些艰难的战争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并在科学水平上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邓初民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在通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出版了《中国史纲》第1、2卷。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册),侯外庐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成为这一时期成就最突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同种种错误的或反动的学术思潮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时期。从50年代初开始,中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这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广泛传播和创造出新的成绩,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中国史学界至少有两三代人是努力按照唯物史观进行思考和研究,从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宏大队伍,成为继承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这个时期分为3个阶段:1.1949—1966年是广泛传播阶段。这个阶段的成就是巨大的。首先是历史学的教学体系、研究体系、专业性学术刊物都经历了根本性的改革;其次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社会历史调查,以及系列的历史资料的汇集;第三是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并出版了有关的论文集,推动了对于

问题的深入的认识和理论水平的提高；第四是老一代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推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范文澜修订了《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了《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侯外庐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5卷6册巨著，等等。其间，也存在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在理解和运用上不够全面和恰当的地方。2.1966—1976年是经受考验的阶段。“四人帮”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名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肆意践踏，“儒法斗争史”和“批儒评法”活动甚嚣尘上，败坏了历史科学的庄严声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艰难中经受着考验，而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表现出深刻的史识和高洁的史德，撰写或酝酿着新的著作。3.1976年以来是深入发展阶段。以“四人帮”的垮台和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为发端，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步入深入发展阶段。其主要成就是：第一，通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了，理论建设受到更多的重视，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第二是研究领域更扩大了，各种专史和外国史研究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第三是一些大型的系列史学撰述工程相继问世，有力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辉煌成就。第四是对历史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这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其根基却是不可动摇的，显示了它的坚韧的生命力。

（瞿林东）

中国史学的五次反省

(zhongguo shixue de wuci fanxing) 中国史学史上出现的5次影响较大的理论性总结活动。第1次反省出现在盛唐时期,以刘知几及其所著《史通》为标志。刘知几提出了史家“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的理论,《史通》的主要成就是从历史编纂学方面评论了前代和当代史家、史书的得失,是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第2次反省是在清朝前期,以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为标志,而开端可上溯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主要成就是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方面对以往的史学作了总结。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最高成就。第3次反省发生在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和他的《新史学》(1902年)为标志。一方面表现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传统史学进行清算的意向,一方面也初步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表明了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历史学理论体系的愿望。第4次反省是在本世纪20年代,以李大钊和他的《史学要论》(1924年)为标志。这同前3次反省有本质的区别,它的主要成就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道路。第5次反省以7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史学界提出许多理论问题并展开热烈讨论,如怎样正确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怎样正确看待外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怎样正确处理传统史学和当代史学的关系,怎样正确认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论体系。这次反省,问题多,历时久,影响大,对中国历史科学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瞿林东)

西方古代史学

(xi fang gudai shixue) 古希腊与古罗马史学，西方史学的发生和早期发展阶段。据考古发掘，早在公元前 2000 年代后半叶，古希腊的克里特、派罗斯等地王宫中便有用线型文字 B 记录的大事记，表明古希腊人已具备明晰的历史意识。多利斯人入侵，打断了这种原始历史记录向史学发展的正常进程，包括史学萌芽在内的迈锡尼文明成果被一扫而光。约公元前 8 世纪或稍早，古希腊人重新萌发的历史意识产生出著名的“荷马史诗”，藉以追念半人半神的祖先们的传奇经历。进入公元前 6 世纪，随着古希腊人对外部与自身世界的进一步认知，理性和批判精神的苏醒，诗歌创作从记述神事逐渐转化为描述人事，散文记事家应运而生，从而为史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某些散文记事家本身即可视为最初的历史家，但因其作品几乎散佚殆尽，故目前标志古代西方史学产生的里程碑人物仍是公元前 5 世纪生人希罗多德（见“希罗多德”）。他的著作《历史》用求实与批判的目光把记事家开创的历史记述完善化、定型化，为后世树立了记事本末体的正史编纂体例。恰恰在《历史》问世前后，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之女克丽奥具备了历史之神的属性。显然在这时的古希腊人眼里，对历史的记忆被看成是人的本能，史学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部门。继希罗多德之后，修昔底德（见“修昔底德”）把古希腊史学推向高峰。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提出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公正客观记述历史的史德，追求真实甚而拒绝任何超自然力量的科学探索精神。色诺芬（约前 430—前 354）的《希腊史》续修修昔底德的著作，记录了希腊城邦由盛转衰的过程。他的回忆录《万人军远征记》是西方历史文库中的佳作。他的《居鲁士的教育》和泰奥庞甫斯（约前 378—前？）的《腓力王传》则开传记体史著编写风气之先。求真求实是古希腊史学的主流，但在一些历史著述中也存在实用主义，有意歪曲史实为现实服务的现象。这两种对立的治史态度变为存续不断的传统，为后来古罗马人所继承。

古罗马进入文明较晚，其史学直到公元前 3 世纪才在古希腊文化直接影响下降生。最初的一批史家，如法比乌斯·皮克托、辛基乌斯·阿里曼图斯等人完全是希腊化的罗马人，用古希腊文和古希腊风格写作。首位拉丁史家是老加图（前 234—前 149）。随后陆续涌现许多杰出史家和史著，如恺撒（见“恺撒”）的回忆录《高卢战记》、《内战记》，萨鲁斯特（约前 86—前 34）的专史《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李维（见“李维”）的通史《自建城以来》，塔西陀（见“塔西陀”）的断代史《历史》和《编年史》，斯韦托尼乌斯（75—160）的传记集《十二恺撒传》。罗马时代的希腊籍史家波里比阿（见“波里比阿”）的《通史》，狄奥多洛斯（约前 1 世纪下半叶至 1 世纪初）的《历史集成》，狄奥尼修斯（约与狄奥多洛斯同代）的《罗马古代》，普鲁塔克（约 46—120）的《名人传》，阿庇安（约 95—165）的《罗马史》，均是传世名作。其中波里比阿的《通史》，集古希腊史学优秀传统之大成。

就古代西方史学的总体状况而言，历史记述和解释的范围还比较狭窄，主要限于政治史，包括军事、外交史，经济、社会、文化史往往处于视野之外。其历史观基本是唯心的，天命论、唯意志论、道德决定论、英雄史观占有优势地位。但在个别史家作品中，也能发现朴素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分，体现古代西方史学的最高成就。在方法论方面，古代西方史学的基调是形而上

学，今不如昔、崇古迷古意识浓厚，即便具有一定发展观点的杰出史家也没越出循环论的圈子。但从事物的联系中去考察历史则被一些优秀史家注意到了。古代西方史家意识到史学的经世致用，取鉴垂训作用，一般不是为历史而写历史。他们的编纂是描述性的，通过对事件过程的叙述探讨不同事件间的因果联系。他们创造出多种体例和文风，一些人对史料的考据、辨伪，运用都相当出色。

3 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全面危机造成古典史学的危机，为神学服务的基督教史学兴起，抽掉古代西方史学求真的精髓，使史学堕落为宗教的奴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史学确立了统治地位，古希腊、罗马的优秀史学传统中断，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恢复。

（郭小凌）

西方中世纪史学

(xi fang zhongshiji shixue) 大致以 13 世纪为界线，分为基督教史学和文艺复兴史学两个时期。

13 世纪以前，基督教史学占支配地位。那时，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被认为是基督教神学的分支。史学家不仅用神学观点解释历史，而且认为基督教史，甚至圣经本身就是一部世界史，用不着去研究别的什么历史。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塔西陀、普鲁塔克等人的名著，因为是世俗学而倍受鄙视，甚至惨遭破坏。

第一位基督教史学家是利比亚人阿非加努斯(约 180—250)，著有《编年史》5 卷，记从创世到 221 年间的历史。这样写历史是荒谬的，但开创了按基督纪年写史的先河。尤西比乌斯(约 260—340)是基督教史学的奠基人，生于巴勒斯坦，著有《编年史》、《教会史》和《巴勒斯坦殉道者行传》等，影响很大。北非主教奥古斯丁(354—430)是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大师。他在《上帝之城》里提出神创的以教会为代表的“上帝之城”是永恒的，人造的以世俗政权为代表的“世俗之城”是暂时的，最终必将为上帝之城取代，从而奠定了教权高于政权的理论基础，一直支配后来的基督教史学。

格雷戈里(约 539—594)是法兰克王国最著名的史学家，被誉为“蛮族的希罗多德”，代表作是《法兰克人史》(10 卷，有中译本)，记从创世到 591 年间事。他认为，写史的目的是使邪恶者和正直者之间的斗争留传后世，免得湮没无闻。在他看来，教会、国王、殉道士是正直者，人民大众、异端和异教徒是邪恶者，阶级立场昭然若揭。不过，他用的资料有早已散失的档案、编年史和亲身的经历，史料价值很高，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依据。爱因哈德(约 770—840)的《查理大帝传》(有中译本)以叙述确切见长，虽失之过简，仍是流传很广的一部传记作品。

此外，德国著名史家有：韦杜金德(约 925—973)，著有《萨克森大事记》，记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时事颇为详细；艾克哈德(?—约 1125)，著有《编年史》，重点记法兰克尼亚王朝事；主教奥托(约 1114—1158)，著有《编年史》和《腓特烈传》，不仅保存许多珍贵资料，而且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英国的著名史家有：比德(约 672—735)，被称为“英国史学之父”，著有《盎格鲁教会史》；亨廷顿的亨利(约 1084—1155)，著有《英国史》。

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后，史学进入一个新时代，涌现一批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家。他们崇拜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史学，广泛搜寻那时的手稿和抄本，批判基督教史学。他们认为历史的中心是人和人的事业，历史应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教育后人，所以特别注重研究政治史和军事史，开创一代史学新风。

在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意大利，涌现一批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家。布鲁尼(约 1370—1444)在他的《佛罗伦萨史》里，第一次论述人在历史上的活动，完全排除宗教迷信。比翁多(1388—1463)擅长考古，奠定西方考古学的基础，为史学发展做出贡献；他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后的历史》，第一次把中世纪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瓦拉(1406—1457)用考证方法证明教会宣扬的“君士坦丁赠札”是伪造的，动摇了奥古斯丁杜撰的教权高于政权的理论基础，沉重地打击基督教史学。马基雅维里(1469—1527)是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君主论》、《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卷》和《佛

罗伦萨史》。他写《佛罗伦萨史》目的是探求振兴祖国的道路，明确指出教皇是意大利衰落的罪魁祸首。

此外，法国的著名人文主义史家有：科曼（约 1447—1551），著有《回忆录》；布丹（1530—1596），著有《国家论六书》和《简明历史研究法》等。英国的著名人文主义史家有：莫尔（1478—1535），著《理查三世传》和《乌托邦》；霍林谢德（？—约 1580），著《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诺克斯（约 1513—1572），著《苏格兰宗教改革史》。德国的著名史家有：胡登（1488—1523），主编《鄙人书翰》，猛烈攻击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弗兰克（1499—1543），著有《世界史》、《德国史》等，恩格斯给他很高的评价。

（孔祥民）

西方当代史学流派

(xifang dangdai shixue liupai) 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各国因指导性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而形成的多种历史研究流派。实际上,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始,历史研究中兰克模式(参见“兰克学派”条)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然开始打破,但一方面由于对兰克模式的批判还只限于历史哲学界,而未深入到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另一方面两次大战的接连爆发造成和平的学术研究环境的丧失,使得针对兰克模式的史学流派百家争鸣的局面迟迟未能到来。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便出现了“新史学”思潮。如前所述,新史学的创始者如美国的弗·特纳、比尔德、鲁宾逊,法国的保·拉孔布、杜尔克姆、亨利·贝尔,德国的卡尔·兰普莱希特等,早在世纪之交便对兰克学派发起了挑战;而年鉴学派(参见该条)的创始者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只有到此时,特别是到60—70年代,广义的新史学派别才如雨后春笋,并站稳了脚跟。在这些派别中,最有影响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史学派、德国以及其他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的人们社会史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等。当然它们完全不是铁板一块,其中还存在理论和方法很不同的团体,但它们毕竟产生于同一个大背景。

总体来看,这些史学流派还有别的共性。在理论上,他们都反对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视同仁,不认为史学家能通过史料批判完全如实地再现历史,强调史学主体的作用。但正如杰·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新史学各派在实践中仍然把“摆事实”即实证研究放在第一步,只是在第二步强调史家的解释和评价。在方法论上,他们广泛与社会科学各学科联姻,借用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于是便出现了心理史学、社会史、口述史、结构主义史学、计量史学、新政治史等多种史学方法流派。在实践领域,他们都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强调史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得到不同角度的认同。而这些研究上的共性也导致了结果上的共性,历史研究的领域得到极大的扩展,比如人口、种族、地理、气候、书籍、婚姻、家庭、生育、死亡、巫术、(集体或个人)心态、选举、移民、节日、衣食住行等,由此也必然发现和运用了以前从未注意过的资料。由于方法的不断多样化和科学化,也使许多问题的解决接近于可能。这些,都促成历史学在70年代的欧美空前繁荣的景象。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新的流派也暴露出理论的困境和方法的局限(比如结构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并为世界史学界许多人所警惕。

(赵世瑜)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

(xi fang Makesizhuyi shixue) 或称史学研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首先是哲学流派，他们主张重新解释马克思，而不遵从列宁、斯大林的苏联解释模式。其早期代表可追溯至卢卡契和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时已经蔚然大观，其现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路易·阿尔萨塞、阿多尔诺、勒费弗尔等，他们主张回到青年马克思、人道的马克思等。但是，他们仍旧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因素决定论、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分析法等基本社会历史概念，只是更强调意识的巨大作用。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多涉及史学，从卢卡契、葛兰西直到阿尔萨塞，都有关于历史的著作。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理论的贫乏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逐渐得到证明，马克思主义对职业史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他们重视社会经济因素、人民群众的作用、阶段斗争、社会形态，以及历史规律。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在法国，稍晚近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群体。这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则不是；有的侧重马克思的这一部分学说，有的则利用另一部分，所以这些人当中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往往也有很大差异。其代表人物如法国的著名史学家饶勒斯、拉布鲁斯、勒费弗尔、皮埃尔·维拉尔、阿尔贝·索布尔（他们大都是运用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家），英国的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希尔、汤普逊等（他们也多研究英国革命、中世纪的农民、近代工人阶级等），此外还有象美国的尤金·吉诺维斯那样的研究黑人史、劳工史、移民史等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著作如索布尔的《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霍布斯鲍姆的《早期起义》等，都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近作，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报刊杂志作为阵地，发表为数颇多的论文，比如英国的《过去与现在》、《新左派评论》等即是。

尽管这些史学家在研究主题和方法上有许多共同点——比如都重视人民群众，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重大历史作用，尽管他们都高度赞扬马克思，但仍在不同程度上或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修正，比如他们都反对狭隘的“经济决定论”，有的如汤普逊强调阶级意识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先导作用，强调人本；有的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其中没有人的活动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力量。因此，虽然他们都声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但其中差别甚大，很难视为一个具有多方面一致性的学术流派。

（赵世瑜）

历史文学

(lishi wenxue) 历史撰述在文字表述上的艺术性，亦指以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前者属于史学，后者属于文学。此处所谓历史文学，系指前者，即历史撰述在文字表述上的审美要求。一是真实之美，这是通过史学家的文字表述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撰述的本质的美。史家历来重信史，历史撰述只有在反映了真实的（至少在史学家看来是尽力做到了真实的）历史面貌时，它才是美的。二是质朴之美，指历史撰述的文字表述在反映真实史实的基础上，写出事物的本色，说人如其人，论事如其事。三是简洁之美，“文笔简洁在任何时候都是优点，尤其是在内容丰富的场合；这个问题不仅是修辞的而且是本质的问题。”（卢奇安《论撰史》，见章安琪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刘知几《史通·叙事》）四是动态之美，历史是运动的，历史人物是运动的，历史事件也是在运动中发展的，历史撰述表现出这些运动形式，是为动态之美，此亦梁启超所谓应把历史写得“飞动”起来。五是含蓄之美，亦谓隐喻之美，或谓之“用晦”。“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史通·叙事》）寓论断于序事之中，是更高层次的含蓄之美，司马迁《史记》堪为典范。六是力量之美，这首先在于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及其给予人们的教育，如警诫，启迪，智慧，鼓舞。同时，历史撰述在文字表述上的生动、感人，亦是力量之美所不可或缺。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历史撰述，笔锋犀利，生动，有力，他和他的著作被称为“惩罚暴君的鞭子”，即体现出这种力量之美。七是形象之美，此指历史撰述借助于种种直观语言或形象语言如图片、画卷、文学艺术样式、现代化传播媒介等，而得到广泛、丰富和形象的表现。此种形象之美往往不是“纯历史的”，但若与严肃的历史态度相结合，仍具有史学的价值，是为史学走向社会的途径之一。

（瞿林东）

兰克学派

(Lanke xuepai) 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

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2.21—1886.5.23)，生于图林根的维厄，后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古典作品，从而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在 1824 年他写出并出版了他的首部著作《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的历史，1494—1514》之后，即入柏林大学任教，在那里担任了近 40 年的教授，并写出关于英国、法国、普鲁士历史的卷帙浩繁的多种著作。他在当时的史学界声名显赫，并有较高的政治声望，1865 年被封贵族，1882 年成为枢密院顾问。兰克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重现历史，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兰克的这种主张是在 19 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极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也希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对事物的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认识。因此兰克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史学家，他们正希望自己这门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正如后人所说：“19 世纪是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即‘据事直书’——引者）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的历史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象念咒文似地高唱这个有魔力的短句。”（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第 3 页）在这一学派中，涌现出大批硕果累累的著名史学家，使兰克模式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近一个世纪之久，而兰克本人则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

由于兰克的前述主张，使得这一派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因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等。此外，“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兰克学派的这些特点虽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绝对地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史家对史料及史著的渗入，研究范围较狭窄，方法较单一，故而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遭到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质疑，而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被彻底摒弃，取而代之者是缤彩纷呈的“新史学”诸流派（参见“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条）。

（赵世瑜）

年鉴学派

(Nianjian xuepai) 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年鉴派创始之前,其创始人的思想不过是倡导反对兰克模式的“新史学”思想的一部分,是反兰克模式的前驱、德国史学家兰普莱希特和法国史学家贝尔的思想的后继者和发扬光大者。尤其是贝尔和他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的历史,被认为是孕育了年鉴派。年鉴派的创始人被公认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而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

费弗尔和布洛赫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授时创办《年鉴》杂志的,正是在那里,他们在学术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鼓励,是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的重要原因。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些都为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的努力,布洛赫又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德军枪杀,但这一基本方向却在战后为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所遵循。其标志不仅是作为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心的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的建立和《年鉴》领导班子的改组,更重要的是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出版,提出了关于三种历史时段的设想,成为年鉴派在历史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心态史学和计量史学成为年鉴派的另两项突出成就,伏维尔、阿里埃斯、芒德鲁等是前者的专家,而菲雷、肖努等则是后者的代表人物。到1969年,《年鉴》杂志的领导班子再次改组,这标志着该学派进入第三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他们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不再象第一代那样排斥政治史、人物研究,轻视描述,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但却仍然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进入70年代,年鉴派已出现了第四代史学家,他们则倡导“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总之,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逐渐也从反模式的角色转变为一种模式,故亦有僵化停滞之危险。如果它真象自称的那样“学派性”不强,而只是一种倡导史学创新的“运动”,那么它的存在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赵世瑜)

新史学

(xinshixue) 一指 20 世纪初开始萌动、50—60 年代空前发展的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一指近一二十年来这种“新史学”的更新变化。反对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首倡于 19 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如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但真正从史学实践上倡导新史学的，有法国学者西米昂、亨利·贝尔、乔治·勒费弗尔，美国学者鲁宾逊、比尔德等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的合作，强调史学家的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的功能等。但在 30 年代之前，新史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该条）。1929 年《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就象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它表明新史学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布洛赫把《年鉴》的名字加上“社会”，正是因为这个词能包括历史的整体，“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蒙达犹》等，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比如探索规律），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

但是近 10 余年来，靠打破兰克教条而发展起来的新史学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学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正面临成为新教条的危险。一些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改弦更张，于是便出现了“新叙述史”：“历史学的主体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方法上是从群体计量化转向个体抽样；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劳伦斯·斯通，“叙述史的复兴”，转引自《史学理论》1989 年第 1 期第 33～34 页）由此来改变那种由于数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历史以及只注重远大结构而忽视活生生的个人的教条历史，这是一种“新的”旧史学。

（赵世瑜）

史学方法论

(shixue fangfalun) 或称历史科学方法论、历史研究方法论。它并不指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指关于史学方法的理论,或者说,它是一种可以用于历史研究的普遍方法理论,抑或可以说,拿一定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解决历史问题便是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方法学”(methodology)。也正因此,亦因为科学研究中为达到同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手段是多样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学派和不同个人那里,史学方法论是存在明显差别的,但它们不见得必定是尖锐对立的,往往是可以相互补充、兼容并蓄的,故史学方法论应是个开放的系统。当然,创立一门作为方法或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是比较晚近的事,是近代科学极大发展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古代史学就没有其方法论体系,只是缺乏系统的归纳整理。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辩证唯物论的史学方法论、实证主义史学方法论、结构主义史学方法论、解释学史学方法论、发生学史学方法论、符号学史学方法论、精神分析学史学方法论、证伪主义史学方法论等等多种。而诸如比较方法、数量方法等只作为具体研究方法,而不构成史学方法论。

从另一个角度说,史学方法论也可以理解为论史学方法。但这并不是论述一个个具体方法以及它们的简单排列组合,而是从比较抽象的角度、从理论思维的高度,阐明史学方法一般的内涵、外延、特征,它的层次结构、内部联系;论述它与历史观,与历史认识论的关系;论述它与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共性和差异性,以及它吸收其他科学方法的角度、程度及局限;最后还应具体描述和分析历史学所能应用的种种方法和手段,并从中抽象出一般,发现历史研究方法的内在一致性。总之,尽管国内外对史学方法论体系多有论述,但尚无统一意见,并多为对具体方法的介绍,因此,系统地研究科学的史学方法论,而非个别的方法或方法论仍是史学理论界迫在眉睫的任务。

(赵世瑜)

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

(hongguan shixue yu weiguan shixue) 指历史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这里是借用了自然科学中宇观、宏观、中观、微观、渺观等中的一些概念，以概括不同研究对象或不同观察角度的历史研究。所谓宏观史学常指史学理论及历史理论的研究，即对历史表象的抽象、综合研究或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分析。其研究对象往往是总体性的、综合的、跨越时空的，其表现形式往往是说理的、分析的而非描述的，其结论往往是规律性的。比如对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统一性与多样性、史学研究的主体与客体、史学功能、历史规律、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问题的研究均属此类。此外，对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甚至几个社会和几个时代的研究，对一种制度、一种跨时空历史现象的研究，而非拘泥于某一特定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也属历史的宏观研究。比如对五种社会形态的研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中国与西欧之封建社会的比较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比较研究、文明源地的研究、文化中心迁移的研究、近代化道路的研究等。这一类研究虽大量应用具体事实，但仍具有前述宏观史学的特点。其最显见的特点就是不叙述该历史事物的来龙去脉，并对其真伪详加考证，而只利用已知事实并对其加以抽象性认识。

微观史学是与宏观史学相对应的。多指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种组织或制度等等所做考证、排比、叙述性的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具体的、局部的和专门的。它在研究对象上与宏观史学的差别并不是主要的，二者有可能出现重叠；但主要差异在于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因为微观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阐述史实。如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如果是从背景到战争经过再到后果的事无巨细一概而论之的编年式研究，即属微观史学；而若从政治、经济、文化、中外关系的发展来看鸦片战争在整个近代历史的地位，则属宏观史学。一般说来，象“论明代内阁制度”、“论汉武帝削藩”或“论美国内战原因”这类题目，均属微观史学。但历史的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的区分，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学内部研究对象、方法、观察角度不同的产物，也是具有不同认知结构的史学家的要求。因此，尽管现代史学的发展要求二者的结合，要求历史认识不应只停留在考实性认识上，二者也不可能最终合二而一。这正好象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或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那样。

(赵世瑜)

比较史学

(bijiao shixue) 关于历史的比较研究。即通过对人类历史各方面或各角度的相互比较来探索历史发展同异,或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特殊性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已发展成为专门性的、具有特定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史学分支。杰·巴勒克拉夫将其定义为“按照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的规范和范畴——而不是按照国家的划分和人为的历史分期——对过去历史加以概括并进行研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第268页)。

尽管在历史研究中对异时或异地的情形加以比较古已有之,但比较史学或科学的史学比较法的出现,仍与现代西方新史学的出现有关。如法国年鉴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曾在1928年发表《论欧洲社会的比较》,被人高度赞誉。他认识到比较研究可以用来验证解释性假说。但热衷于比较史学的史学家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为多,不仅出现了布莱克《现代化动力》和穆尔《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均有中译本)之类的比较史学杰作,还出现了大批探讨比较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专题论文。比较史学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于人们已经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在时间和空间上历史既相联系,又有区别,通过比较才能更确切地了解整体,也才能更确切地了解本身的历史。

但比较史学必须遵循可比性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时间上相近或相同,在空间上以文化圈或特定文化区域为单位,在内容上是同类型或同性质的,在范围上必须把所比事物置于具体环境中,反之则是不可比的。除此前提之外,还要强调比较双方或几方的基本史实的确凿,强调深层的、本质的比较而非表象的、肤浅的比较。由此两点,则要求比较史学家必须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较扎实全面的历史基本知识的基础和较高的理论水平。在此情况下,可以进行符合可比性原则的历史人物、事件、集团、制度、观念、文明体系、历史进程等等之间的比较,以揭示宏观的历史运动和更准确地把握比较任何一方的历史个体。

必须说明,历史的比较研究法受到历史观、可比性原则、特定范围的制约,否则便容易导致牵强附会,造成反科学、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此外,比较研究法并不能取代其他科学的历史研究法,而应与后者结合运用于历史研究。基于此,有必要通过具体的比较史学研究实践摸索和确立一套比较史学的理论原则和技巧原则,并不断发展和完善它们,再用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实践。

(赵世瑜)

形态历史学

(xingtai lishixue) 或称历史形态学派或文化形态史观。是 20 世纪初由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等提出的一套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宏观分析理论，或被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1918 年，斯宾格勒出版了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迅即成为西方史学的一部现代经典。在书中，他提出世界历史上存在 8 种自成体系的伟大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希腊、罗马、玛雅、西欧及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文化。这些文化都经历了萌芽、生长、鼎盛和衰亡几个阶段或几种形态；到当时为止，除西欧文化外，其余 7 种已然衰亡，而西欧文化也已进入衰落期，其灭亡是上述规律的必然。依他之见，既没有世界史，也没有统一的历史发展线索，只有一系列互无联系的、单独的文化统一体，它们在上升和繁荣时期被称之为文化阶段，而衰落和瓦解时期为文明阶段；前者的动力是宗教和艺术，后者的动力则是科学技术，它带来了战争和侵略，因而势必带来衰亡。他之所以把自己的观点称为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态学观念，在于他认为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都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都可以按形态加以统一的分门别类。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于 1934 年出版了前 3 卷，到 1961 年才出版了最后一卷，共 12 卷，500 多万字。据他自己声称，斯宾格勒的某些主要观点与他自己的观点相符，但文明兴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文明经受着考验》中译本第 10~11 页）。因此在书中他提出，历史研究中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最小单位并非民族或国家，而是一个个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的基础是宗教，并由文化、政治、经济几方面组成。按此说法，历史共出现过 26 种（或说 22 种、28 种等等）文明，但也与斯氏所论一样，要经历兴衰的 4 个阶段。但经过这一循环之后，该文明并非回到原来起点，而是向前进步。他认为在当时，除已死亡者外，还有 10 种文明残留，其中两种在垂死挣扎，7 种面临消灭或同化的威胁，只有西方文明在“独自挣扎向前”。他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等值的，因为与所有人类历史（几百万年）相比，文明形态的历史只是一瞬；而与原始状态相比，所有文明的成就都是巨大的，与人类理想相比，它们又都是微不足道的。此外，他在历史发展动因的问题上，提出“挑战与应战”理论，认为文明正是人类在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度挑战给予成功应战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总之，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形态历史学是从非常宏观的视角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尽管人们对其多有非议，但打破国别史和民族史的狭隘眼界，致力于探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其破除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努力，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赵世瑜）

心理史学

(xinli shixue) 或称心态史学，是运用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乃至社会学中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的一种史学研究分支学科，在现代西方史学研究中颇为流行。有人认为在美国 50 年代后期开始盛行的心理历史学 (psychohistory) 与深受法国新史学家们推崇的心态史 (history of mentality) 并非一回事，实际上，由于二者都是在新史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由于它们都与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学说相结合，因而它们应同属心理历史学的范畴，只是二者在研究对象的侧重上略有不同。

心理历史学的产生是与现代历史哲学强调主体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偶然性、特殊性，主张个别论密切相关。而对人们头脑中的意识、特别是深层心理对历史的重要作用，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是不受重视的。但今天人们会问：如果没有某种宗教心态（即信仰、信徒的心理），会有十字军东征吗？封建帝王的赫赫威权与人们崇拜他们的神秘心理有何关系？这些都是心理史学的研究课题。无论如何，弗洛伊德学说对心理历史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刺激作用，因为他在探讨人格发展时往往溯自婴幼儿时代，这就促使史学家在探讨人物时要追溯童年经历和家庭影响对成人后心理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弗氏对意识和无意识（潜意识）的区分，并把后者视为人类行为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动力，这自然会引引起志在探索历史上人类各种行为动因的史学家们的兴趣。按法国著名的心态史专家阿里埃斯所说，无意识就是说有的东西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中译本第 195 页）。

于是，在美国，由威廉·兰格等人的大力号召和埃里克森等人的具体实践，心理史学已有显著成就，如对青年路德的研究、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对黑奴制与南方心态的研究、对希特勒、甘地的研究等。但是就所出成果而言，美国的心理史学偏重于个人心理的研究，即所谓“心理传记”。而法国的心态史学则侧重于集体心理，即集体无意识，比如布洛赫研究中世纪人相信国王之手的触摸便可治愈瘰疬的心理，费弗尔通过研究拉伯雷来了解 16 世纪的不信神问题，乔治·迪比把税收视为原始馈赠心理遗存的研究，芒德鲁关于巫术魔法的社会心理研究，以及对犯罪心理、节庆心理、大革命前的群众心理的研究等，成果更是蔚然大观。心理史学的研究显然为史学领域的开拓做出了贡献，但是它往往受制于心理学理论，比如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偏颇之处有可能导致应用它进行心理史研究的错误，因此如何判断和确定何种心理学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历史上的适用性便成为关键性问题。相反，对历史中心理因素的研究倒应该用来证实那些心理学理论，而不应用理论模式去套历史。

（赵世瑜）

结构史学

(jiegou shixue) 或称结构主义史学。是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历史研究方法论或深受该理论影响的一种历史研究角度。严格说来，它并未成为心态史学、数量史学或比较史学那样，成为一门新史学研究分支，而毋宁说只是体现了社会学或人类学对史学的理论影响。但无论是总体史、经济史、社会史（包括家庭史、人口史等），还是心态史，都可以是结构史。

结构主义的产生首先是在语言学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引起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生物学、医学，甚至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极大关注，连日常生活领域也可见其影响，最终作为一种主流思潮取代了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一般人认为结构主义进入史学领域与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有关，因为尽管莱维—斯特劳斯是位人类学家，但他所研究的原始思维及亲属关系亦属史学范畴，他又是西方公认的结构主义领袖，所以有此看法。实际上，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与对历史进行结构研究的史学家们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在前者那里，结构并不是可观察的经验事实，而是无意识的人类心理结构，是人们通过感官感觉，再由大脑思考、加工、解释，使观察对象具有了一定属性，而这种属性也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这种属性就是结构，它表示着事物的深层系统和内部联系的整体。在人类社会中，所有这种深层的心理结构都是跨越时空地共同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它本身是自足的或自律的，理解它不要求助于与它本性无关的因素；它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它可以形式化或公式化——即将分析观察到的现象中产生的抽象按一定的逻辑，如数理逻辑联系起来，便产生结构模式，这个结构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

但同样讲究结构的史学家，如年鉴派代表人物勃罗代尔却认为，结构不过是现实和大众之间存在的一种组织、一种相当稳定的联系，它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它们的磨损很小，对它们的推动也很缓慢。他的“长时段”，比如地理环境、心态、生产方式等就都是结构。这就是说他的所谓结构虽也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内部网状整体，但却是属于客体的、可经验的。因而所谓结构史研究基本上是循着这样的路子的。比如中世纪某地区的农业结构，500多年稳定不变；在这样的结构中，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土地上耕作；个人活动和群体活动具有重复性，并在宏观上规定了人口增长、经济情势变动的范围；这个结构就是一种长期的制约性网络。用法国史学家波米安的话说，各种结构都是“由一系列障碍、限制和局限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不允许其内部的可变因素超出一定的范围；而这可变因素的变动则构成了情势。……各种结构的内部几乎都是稳定的。但是当我们对先后相继的结构作一比较时，我们可以见到正是在结构的这一层次上才有着不可逆转的转变：即一系列使一种结构类型转为另一种结构类型的变动”（《新史学》中译本第280~281页）。这样的各种社会结构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这就是结构史学。

（赵世瑜）

解释学史学

(jieshixue shixue) 或称阐释学史学或释义学史学。是用解释学理论(hermeneutics)作为方法论研究历史的一种特殊研究角度,及由此形成的史学流派。它本指高度重视文字资料的解释、注疏以揭示历史真实的传统史学,后特指自威廉·狄尔泰之后把解释学视为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论后,用其理论揭示历史意蕴的历史研究。解释学本身是由对圣经的诠释而来的。正象古代中国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有多种解释注疏和训诂一样,西方中世纪神学对圣经也有多种诠释,各种版本的诠释也同样力争正统地位,由此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到近代之后,它逐渐变成一种通过文字阐释文献资料,或对史料进行批判考证以对往昔进行科学解释的系统方法论。19世纪的兰克学派忽视理论概括,但却十分重视文献资料,他们吸收了以往博学学派的语义学、古文书学等等的释义注疏技巧,用以进行史料的批判考证,成为解释学史学的又一代代表。不过同时强调解释的还有反兰克的德国史学家德罗伊森,他认为自然科学那种解说技术只足以研究自然界重复的因果关系,只有理解的方法才能把握人类精神独特的内在世界。这就成为与前述解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解释学的前驱。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始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首先站出来反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认为后者丝毫不考虑历史认识的主观因素,而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史学家只有靠理解和解释前代留下的各种痕迹,来弥补靠记录或记忆不能全部把握历史之不足。他把全部人类行为看作是人类精神的“外化”,具有一种意义,对这种内在意义是无法直接感知的,因此只有对那些外在的象征加以解释,而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有待理解和解释其内在意蕴的“文本”。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心理学上的所谓“移情”。此外,由于一切文化产物都是对人类意义的不同解释,它们之间就不应有高下优劣之分,这就有助于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破除。在狄尔泰之后,意大利哲学家贝蒂、美国文论家赫尔施、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及其弟子伽达默尔大大发展了释义学,但前两者与后两人之间却存在一个根本性转换。前者还认为历史的意义是客观存在,史家的主观性也不能抹杀这一客观性,而解释就是通过理解史家来把握历史这个文本的原意;后者却绝不是要解释什么文本或辞句,而是要解释古往今来的整个人生这个最初的本体,这样理解和解释活动便是主体认识的基本方式。后者认为,真正的理解和解释不是去克服因历史性造成的主观性,因为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根本无法消除的,所以理解和解释应是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时间间距),后者正是可以借助来发现意义的手段。比如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在时间间距消除了我们对对象现实的、功利的兴趣之后,排除掉研究者主观的渗入,导致发现对象的真正意义。因此历史是“效果历史”,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其中同时存在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这种释义学主张表明我们永远不能在“处境”(比如历史)之外对它加以理解,因此便永不会有绝对客观的认识。

解释学理论由于大量涉及历史解释,因而对史学冲击很大,如法国的利科尔就是较有影响的解释学史学家,其他如巴尔特、富科等人的研究也与此密切相关。在中国,除哲学解释学在哲学界、接受美学(解释学的派生学科)在文学界有所介绍之外,解释学史学对于史学界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赵世瑜)

计量史学

(jiliang shixue) 或称数量历史学。即将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而形成的一门史学方法分支学科。尽管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 统计学方法的发展和统计资料的日益完备, 已使历史研究引入了计算, 逐渐形成了历史统计学, 主要研究经济史和人口史, 但由于计算手法的初级, 研究的性质、对象与传统史学大同小异, 所以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计量史学。进入 20 世纪之后, 新史学家们对历史的定性研究感到日益不满足, 他们认为某种历史现象仅靠描述和定性往往是错误的, 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而通过定量研究有可能对特定主题产生较精确的、有说服力的认识。此外, 计量方法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 如社会学、经济学中的成功运用, 也使一些史学家有了信心, 他们开始把相关分析这类数理分析统计法运用于历史研究, 如法国的西米昂就是计量史学的早期代表。

计量史学的真正形成应从 20 世纪 50 年代算起。历史的计量研究不仅在法国, 尤其是在美国蓬勃展开, 计量方法不仅在传统的经济史、人口史上拓宽道路, 而且应用于社会史和政治史, 比如对于较长期内的婚姻、家庭、死亡及出生的研究, 可以借助于中世纪教会的登记簿和政府档案; 通过对选民选票的数量分析研究人民的政治态度; 对移民、对农民起义的广泛研究都借助了数量方法, 并出现了许多成果。但由此可见, 计量史学的研究主题关键地取决于有无适于定量分析的史料; 此外, 特别是在法国, 计量史学往往是与“系列史”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后者往往是要对对象的长系列考察以得出较完整的趋势性(或情势, conjuncture) 结论, 比如对 100 年中工资与物价的变动加以研究, 判断它们是否引起或在多大程度上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动荡。美国的富格尔、蒂利, 法国的拉布鲁斯、肖努等都是较著名的计量史学家, 比如蒂利及其学生就此利用电算机对中国明代的农民起义之时间、地点、频率、规模等进行研究, 以便得出一些有关其因果的规律性认识。

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全面搜集有关史料, 然后按一定方法分类, 再按不同方式加以整理, 最后运用次数分布、图表、概括、时间数列分析、相关分析、路径分析、对数曲线、建立模拟模型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特别在电脑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分类整理数据和统计运算变得更为快捷。由于有此优点, 计量史学不仅在欧美站稳了脚跟, 而且在苏联、日本等国获得极大发展, 近年来亦引入中国。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 80 年代初亦成立了“历史学应用计量方法国际委员会”, 计量史学并成为数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 各种数量历史的专业杂志和研究中心普遍于欧美建立。但尽管如此, 由于主题的确定、材料的搜集整理都离不开个人的考虑, 由于可用于计量研究的资料有限或科学化程度不高, 计量方法远未能成为取代其他方法的唯一科学的手段, 并不能完全排除主观因素。特别是其成果的枯燥, 使其日益远离普通读者, 失去了史学的社会功能, 这些都是计量史学亟需解决的大问题。

(赵世瑜)

口述史

(koushushi) 亦称口碑史学。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广义地说，它始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地说，口述史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口述史有了极大发展，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法、德诸国出现了大量口述史研究机构，出现了大批口述史研究成果。由于非洲的特定历史状况，口述史也引起了非洲各国史学家的重视。这期间不仅召开过多次关于口述史的国际学术会议，第 15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还对其进行了专题讨论。总之，口述史的发展正方兴未艾。

从某个角度说，口述史是重视下层民众历史的产物，因为后者的活动和心理很少见诸文献，为了研究他们，必须借助口头资料或口碑；从方法上说，口述史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注重田野工作即实地调查的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口述史学家必须通过调查采访等直接手段，从特定主题的当事人或相关人那里了解和收集口述资料，以其为依据写作历史。由于口述史料的直接性，使这些主题的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社会史，从时间上说是现当代史的研究更易接近真实，减少史学家的主观性。特别是口述史可以借助现代化的音像手段，大大简化了资料收集工作。所有这些，都吸引着史学家去从事这项工作。其中代表作如斯坦利·维斯塔尔描述印第安人领袖的《西亭·布尔》、西奥多·罗森加顿揭示黑人农民看待美国南部史的《上帝的全部危险》、脍炙人口的《根》，以及拉斐尔·萨缪尔的《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等。

口述史研究也碰到许多方法上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和区分口述材料里的真伪，如何整理口述材料，把它们变成著史的有用史料，甚至如何选择主题、制订调查计划、最后采用何种方法成书等等，都是口述史面对的一些特殊问题。但尽管如此，口述史的文字生动，以及音像效果的直观，都极其有利于历史学的普及，这在今天的中国，尤有引进发展的必要。

(赵世瑜)

叙述史

(xushushi) 指历史编纂中通常采用客观描述的方式,而非以分析为主的历史研究,它既不构成一种史学学科分支,也不能说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而是指那些采用叙述的文体写成的历史著作的集合,或说是一种由叙事风格史书结合而成的写史传统。一般说来,传统史学作品都是叙述史,比如中国古代的《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虽然各为编年体、纪传体、通鉴体,甚至还有纪事本末体,但都体现了纪事、记叙的特点;而西方从希罗多德的《历史》、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到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甚而到兰克的《教皇史》,无论写作时代如何不同,但也都是采用记叙的写法。直到今天史学界大力倡导研究的分析手法时,叙述史或记叙体历史作品仍在国内外史学界占据很大比重。

在近代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之前,史学主要记录下以前的各种事实,然后把它们叙述出来,或按时间顺序,或按特定分类,历史著述的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了。象司马迁那样通过“太史公曰”的形式对所叙史实略加评述的,在“二十四史”中并不多见,而这些评述与叙述部分相比也只占极小部分。这显然是与古代史家讲究“信史”、忠实记录、秉笔直书的原则有关的;史家不能在史书中对历史妄加品评,便促成了传统史学的叙述特征。但是,由于传统史学基本都是叙述史,也就没有单独区分出叙述史的必要。只是到近代之后,德国的兰克学派虽然力主史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但除了史料批判方法和职业史学家训练方法的科学化以外,由于他们仍倡导据事直书,所以仍恪守写史的描述手法,叙述史才成为兰克学派编史传统的同义语(参见“兰克学派”条)。

新史学家们对编史仅停留在客观描述,而不对历史表象的深层进行分析、不探讨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和规律、不对各种不同历史进行异同分析深表不满,于是社会史、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均作为叙述史的对立面应运而生,叙述史从此遭到冷落。对那些仍然拥有大量读者的叙事式历史著作,杰·巴勒克拉夫认为是一种向科学历史学变革的阻碍。但是,由于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以及数量方法等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历史学中有血有肉的人和事消失了,到处是干巴巴的公式和没有生命的结构,历史书只是给专家中的专家看的,大量读者被抛在了一边。特别是当史学家意识到史学研究中的主体因素无论如何不可避免之时,就更没有理由完全取消史著中的文学艺术性因素,况且以牺牲可读性为代价并不见得能换来更大的精确性、科学性。在这种情况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叙述史的复兴”。但这并不是向传统史学的简单回归,而是把叙事体、可读性与科学分析和理论概括相结合,这构成了近10余年来世界史学发展新方向的一个部分。

(赵世瑜)

妇女主义史学

(funüzhuyi shixue) 20 世纪 60 年代在英美诸国兴起的一门历史学新分支, 或称女权主义史学。它并非以妇女、特别是历史上著名妇女人物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历史研究, 而是以当时的女权运动为背景, 渗透着女权主义主张, 并以此为理论及方法指南的历史编纂学。

在妇女主义史学家看来, 以往的史学在本质上都是“父权制”的历史。由于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 无一不受时代的局限或者特定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限制, 因此从理论、方法论乃至遣词造句上都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大男子主义的观点。比如刘知几认为范晔的《后汉书》为蔡文姬立传而不为徐淑立传是取舍失当; 又如许多正史及地方志都列有节妇烈女传等; 又如对卖淫和不贞在史书中往往给予道德上的责难等, 这些史书显然体现的是男性史学家一方面的观点, 因此再客观如实的史书也是不客观的。在此思想指导下, 妇女主义史学倡导一种全新的史学, 这种史学虽以不同以往的笔墨再现历史上的妇女活动, 但仍然是连同男子的活动一同描写的。但是, 无论在描述男子的活动和女子的活动时, 还是在描述男女之间关系时, 都应立足于男女平等, 从内容比重、好恶褒贬, 到遣词造句等方面, 都不应片面地站在男子的立场上观察。这似乎是妇女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

但由于几千年来妇女实际地位的低下, 很少出现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象武则天、吕后、圣女贞德、唐赛儿、李清照这样的人很少, 而在今天也已大都给予了突出的评价), 主要是活动在默默无闻的日常生活中, 但这却正是历史的重要内容。这就决定了这种新型史学不应是事件史和人物史, 而应是社会史。就对象而言, 在婚姻史、家庭史、性史、人口史、生育史、娼妓史、妇女犯罪史、物质生活史、音乐舞蹈史(如中国的乐户史、教坊史等) 方面, 可以大量发现妇女的活动。就方法而言, 有的倡导者主张使用集体传记法和角色理论进行研究, 前者主要是对某一特定社会集团所进行的全面研究, 它可以是一个男女混杂的集团(比如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村落), 也可以是一个纯粹的女性群体(比如尼姑庵、女修院、女子学校等); 后者指一个人身上总具有多种角色(如职业角色、家庭角色等), 相互间可能出现不协调甚至冲突, 因此可以对妇女的角色矛盾加以研究。倡导者还认为, 妇女主义史学是跨学科的史学, 因而需要从各社会科学分支中吸取养料。

最后必须说明, 马克思主义史学已为这样一门新型史学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一门史学中, 尽管研究还不够深和广, 但妇女长期受歧视、受压迫的地位, 史学中封建伦理纲常的影响已被揭示, 象母系社会的重要性已被充分强调, 武则天以及许多女农民起义领袖被彻底“平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强调历史就是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再生产, 从根本上揭示了妇女的重要地位, 是欧美的女权主义者远逊不及的。

(赵世瑜)

社会史

(shehui shi) 即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整体及其运动、社会组织(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区、邻里、各种社会集团)及其运动、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的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简言之，它与社会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研究往昔的社会整体及其各个侧面，而后者研究现实的上述内容。它与历史研究其他分支相比，特点在于它把着眼点放在整体而非个体之上，因为社会本身体现了人类的整体关系；即便它偶尔涉及个体，也是将其视为社会现象或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来研究的。以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论，社会史研究的最小单元是家庭，或者是某个年龄集团或性别集团、职业集团，这些也都是群体，而且也很少有专门研究某一个家庭的。

尽管侧重点不同，但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几乎是与其母学科历史学的研究范围等宽的，这就表明它必与其他分支学科具有交叉的地方，比如阶级这个社会集团又是政治集团，既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又是政治史或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民间崇拜或巫术既是社会行为，体现特定的社会心理，但又是宗教行为，又是文化行为和文化心理，故又是宗教史或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不过前者着重从其社会联系入手，发掘其社会影响或在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虽然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社会史学的萌芽可以溯自古代，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是在近代社会学产生之后，并开始对史学产生影响之时。就西方而言，法国年鉴学派(参见该条)的出现是其产生的重要标志，是其倡导之“综合历史”及“总体历史”的伴生物和组成部分。新史学中成就较大的人口史、家庭史、日常生活史、地区史等无一不属社会史；它所倡导之新方法史学分支如心态史、结构史，也都因其主要研究集体心理和社会结构而成为社会史的重要角度；至于勃罗代尔极力主张的对长时段和中时段的研究，也属社会史研究范畴。更重要的是，新史学使社会史具有了与前不同的分析性和理论性，使得对家庭、婚姻、性乃至一个地区的研究必须落实到探讨家庭、婚姻及地区结构上，要通过上述研究确立某种模式或规律，并由此得出某些类型学概念(如韦伯的“理想类型”)来概括同类社会现象。而运用计量手段研究移民、种族、城市、人口等，造成了“新社会史”在美国的兴起。近年来，社会史研究也开始在中国展开，比如对妇女、家庭、家族、风俗、民间崇拜、人口迁移、农民及手工业者等等的研究，都有一些初步的成果，但还都停留在描述考据阶段，缺乏理论概括和新方法，这些都是中国的社会史学家们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赵世瑜)

文化史

(wenhuashi) 即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分支，它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就其狭义而言，文化史曾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如蔡尚思所著《中国文化史要论》。显然，这种界定过于狭窄，但从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看，一方面文化史研究或文化研究多集中于文化总体，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中西文化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问题的研讨；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即将文化视为狭义文化，这样的文化史研究虽比学术思想史的范围有了很大扩展，但仍没有明确文化史研究的全部范围，与文化学理论的要求相距甚远。

文化史研究范围的不确定是与人们对文化的定义千姿百态、文化学理论派别林立有关的。但就一般而论，文化史研究应该包括对物质文化、观念文化、社会关系态文化（各种组织、制度）乃至深层心理的研究。譬如原始文化，主要是物质文化，从制造各种工具、使用和发明火、采猎生活到动植物的驯化（植物之栽培耕作是西文“文化”之本意），占据了原始文化史的较大比重；其中如婚姻、家庭、部落组织等属社会关系态文化，离开这些，原始文化便无从谈起。实际上在文明时期，观念态文化也只占一小部分，特别是在大多数下层民众知识程度较低、观念形态的遗留较少的时代，这种文化多代表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而下层文化多呈物质形态，抛开后者也就没有了文化史。

但是文化史作为一门独特的史学分支，其研究内容在许多方面又与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史、思想史、科技史、语言学、心理学等相交叉，显然就应有独特的研究视角。把一种崇拜、一个家庭、一种婚姻作为文化现象加以研究，与宗教学及社会学研究它们迥然相别；而取火、动植物驯化作为一种文化成就，是文化进步的重要表现，对它们的文化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分支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对这类题目——即物质生活史的题目很少涉及）。这就是说，文化史研究把人类文化的各方面成就当作综合的文化概念的各个侧面，研究它们是为研究文化整体服务的。在此意义上，文化史首先要研究不同民族、国家在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及其影响，其次要研究各种文化传播、融合、受阻等等的原因、过程、途径、方式，第三要研究文化在历史中的各种功能。这些研究必然要借助对文化各因子的探索，比如研究文化传播，我们必须研究生产工具（如青铜器、铁器）、生产技术（如四大发明）、思想观念（如佛教）、语言（如某种方言）、艺术（如西洋画法）等各方面的传播扩散，其扩散方式、传播圈、传播效果、源地、有利因素及阻碍因素等，由此才能了解各文化因子在文化传播上的异同，最后对文化整体在传播问题上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以上各例说明，文化史的特点在于，把人类的各种文化创造当作文化现象而非其他来研究，研究各种文化因子的目的是宏观地把握文化整体。

（赵世瑜）

中国古代史

中国境内古人类群体

(zhongguo jingnei gurenlei qunti) 中国境内古人类按体质和智力的发展变化一般分为猿人、古人和新人三个阶段。

属于猿人阶段的主要有：1.元谋人。1965年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发现有属于一青年男性的两枚牙齿化石、17件打制石器和40多种哺乳类动物化石，距今约170万年左右。2.蓝田人。1963年在陕西蓝田县陈家窝村发现一个完好的猿人下颌骨化石，属老年女性，距今约50万年。1964年在蓝田县公王岭发现一个猿人头盖骨和1枚猿人牙齿，属于一个30多岁的女性，距今约110~115万年。3.郧县人。1975年在湖北郧县发现4枚猿人牙齿化石，次年又发现6枚猿人牙齿化石，其特征所表现的年代与蓝田猿人接近。4.北京人。发现于北京周口店。从1927年开始陆续发掘出猿人化石，迄今为止，共发现猿人头骨6个，头骨碎片9块，面骨碎片6块，下颌骨15个，股骨7段，肱骨3段，胫骨1段，锁骨和目骨各1块，牙齿152枚。这些化石分属于不同年龄和性别的46个人的个体。北京猿人的头骨最宽处在耳孔稍上处，前额低平，眉脊骨粗壮，颧骨突起，吻部前伸，脑壳较厚，平均脑容量为1059毫升。遗址还发现石器和石片10万余件，洞穴的文化堆积层里有四层面积较大并且较厚的灰烬层，最厚者可达6米。北京猿人的化石资料和遗址的文化堆积，是目前世界上原始人类化石最丰富而且比较完整的。北京猿人的时代距今约69万年。5.和县人。1980年在安徽省和县龙潭洞发现一个相当完整的头盖骨、1块左侧下颌骨碎片和3枚牙齿，距今约30~40万年。6.金牛山人。1984年在辽宁营口市金牛山发掘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猿人头骨，此外还有椎骨、肋骨、腕骨、掌骨、趾骨等比较罕见的猿人化石50余件，这些化石全部属于一个成年不久的男性个体。距今约20多万年。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20-1.bmp}

我国境内的古人化石资料和遗址比猿人的为多，说明在古人阶段人类活动的区域比以前广泛。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是：1.大荔人。1978年在陕西大荔县甜水沟的岩壁上发现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化石，还有180多件石器和10多种动物化石。其头骨化石特征介于猿人和古人之间，是由猿人向古人过渡的典型资料。距今约20~30万年。2.马坝人。1958年在广东韶关马坝墟西南的山洞里发现一个头骨化石，属中年男性，是古人的早期类型代表。3.丁村人。从1953年开始在山西襄汾县丁村陆续发现粗大石器和动物化石，次年发掘出14处化石地点，发现3枚人牙化石。1976年又发现1块约为2岁幼儿的右顶骨化石。距今约10万年。4.许家窑人。1976年至1977年间在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附近的断崖上发现大量化石，其中有人顶骨10块、枕骨2块、右下颌骨残片1块，臼齿2枚，还有1块附着4枚牙齿的小孩右上颌骨。这些化石分属于14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距今约10万年。5.长阳人。1956年在湖北长阳县下钟湾村的名叫堰龙洞的岩洞里发现人的上颌骨化石残片连同2枚牙齿，还有1枚前臼齿。长阳人的嘴部和颌部已经和现代人接近，是较晚时代的古人。

新人阶段的古代人类还有一些原始人的特征，但其体质形态的主要方面已经和现代人相差无几。这个阶段的古人类在我国境内分布更广，其中最主

要的有：1. 峙峪人。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村发现人的枕骨化石1块，石器15000多件。峙峪人的时代距今为28000年。2. 河套人。内蒙古和陕、甘、宁相连的河套地区，自1922年以来多次发现古人类遗址。1922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发现1枚小孩门齿化石。1956年和1960年又在这一带发现有人顶骨和股骨化石。河套人是由古人阶段向新人发展的过渡形态的典型。3. 资阳人。1951年在四川资阳县黄鳝溪发现一老年女性的头骨化石，另外还有1件骨椎化石。资阳人头骨最宽处在两侧顶结处，冠状缝和矢状缝的锯纹比较简单，人字点和枕骨外粗隆点基本上处于一条直线上。这些特征都和现代人接近。4. 柳江人。1958年在广西柳江的一个岩洞里发现头骨化石1个、下胸椎4个、肋骨5段及其他骨骼化石，属于一个40岁左右的男性。5. 麒麟山人。1965年在广西来宾县麒麟山发现属于一老年男性的部分颅骨化石，其时代和柳江人接近或稍晚。6. 山顶洞人。1933—1934年间在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顶部的洞穴里发现有较晚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堆积，定名为山顶洞人。其化石材料包括三个相当完整的头骨，还有头骨残片、下颌骨、脊椎骨、枕骨和牙齿等，分别代表着至少8个人的个体。山顶洞人的相貌已经和现代人没有什么明显区别，其脑容量已达1300~1500毫升。他们有方形的眼窠、高大的颧骨、广阔的下颌。古人类学家认为，“假若给他们穿戴上现代人的服饰和我们站在一起，谁也不会用奇异的眼光多看他们一眼。”（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第37页）山顶洞人的时代距今约18000年。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中国境内的辽阔土地上，就星罗棋布地居住着许多原始人类。在一二百万年的漫长年代里，他们经过猿人、古人和新人等发展阶段而接近于现代人类。

（晁福林）

母系氏族文化遗址

(muxi shizu wenhua yizhi) 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大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前后经历了几万年时间。距今约18000年的山顶洞人及其文化,是母系氏族早期的代表,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典型的文化遗存,因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被发现,1933—1934年由裴文中先生主持发掘。发现了三个相当完整的人类头骨,还出土了石器、骨角器、穿孔饰物及哺乳动物化石等。山顶洞的人类化石共代表8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山顶洞人的体质相貌已经与现代人没有明显区别,头骨最宽处在顶结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极为明显,下颏突出,脑量已达1300~1500毫升。男性身高1.74米,女性为1.59米。其中老年男性头骨形态是鼻骨较窄,颧骨突出,下颌宽阔,属于蒙古人种特征,这表明山顶洞人代表原始蒙古人种。山顶洞人的骨器和装饰品制作十分精美,骨角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枚骨针,长82毫米,针身圆锐,端部挖了眼,是已知最早的缝纫工具。装饰品非常丰富,有穿孔的兽牙、小石珠、骨管及海蚶壳等。山顶洞人掌握了钻孔技术,不仅会一面直钻,而且能两面对钻。他们掌握的磨制技术,虽然主要用于制造装饰品,但却为以后新石器时代磨制工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山顶洞人还懂得用赤铁矿粉末染色的方法,有了初步的审美观念。

距今约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代表了我国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分布于黄河中游一带,主要遗址中的西安半坡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1954—1957年多次发掘,揭露面积1万平方米左右,为复原中国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半坡遗址的中心,集中分布着房屋和大部分窖穴、家畜圈栏以及小孩瓮棺葬群,约占地3万平方米。居住区外,围绕有一条深5~6米、宽6~8米的防卫沟,沟外北边是氏族公共墓地,东边是烧陶的窑址。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工具,有石斧、石铲、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石、骨镞、骨鱼钩、鱼叉和石网坠等。陶器以红色、红褐色陶为主,常见的是粗砂陶罐,小口尖底瓶和钵组成的一套生活常用器。器表有多种纹饰及图案,如鱼、蛙、人面、植物等,以及象征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组成的几何图案。在圆底钵口沿的宽带纹上,发现有22种不同的刻划符号,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渊源之一。半坡遗址中的成人墓葬有174座,小孩盛行瓮棺葬,有73座。瓮棺葬是将尸骨放在陶瓮里,以钵、盆与瓮相扣合,常在器底凿一小孔作为灵魂的出入口,这表明了当时人对灵魂存在的信仰。

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代表了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曾进行了两期发掘。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具。骨制工具丰富,其发现总数量远远超过石、木、陶质工具的总和。有骨耜、骨镞、骨哨等,其中代表性的农具是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了上百件,主要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釜,骨质较薄的则无釜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釜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有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手把。河姆渡的木器精巧多样,有木耜、铲、矛、桨、槌、纺轮,

还有许多骨、石工具的把柄等。大批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的发现，标志着当时木构技术的突出成就。遗址中还普遍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河姆渡的稻谷实物，是世界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家畜方面，破碎的猪骨、牙齿和水牛角较多，除了猪、狗之外，可能水牛也已被驯养。

（孙彦贞）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21-1.bmp}

父系氏族文化遗址

(fuxi shizu wenhua yizhi) 父系氏族公社, 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1959年山东泰安县大汶口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同样类型的文化遗址在以山东、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地区也有发现, 通称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六千年前, 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 中晚期距今四五千年, 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大汶口文化以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 除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外, 中晚期灰陶、黑陶开始增多, 并有少量硬质白陶。农具以石器为主, 大量使用磨制精致的穿孔斧、刀、铲、镞、凿等石器, 还有骨镰、蚌镰, 中晚期出现了有肩石铲、大型有段石镞、石镐头和鹿角锄。家畜饲养较为发达。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中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禽的骨骼。墓葬盛行用猪随葬(整猪、半只猪、猪头或下颌骨)。大汶口墓地约82万平方米, 1959年第一次发掘, 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 发现了133座墓葬和1座横穴式陶窑。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 14座有木质葬具痕迹, 其中包括四壁叠放原木、顶部用原木铺排の木椁式葬具, 绝大多数死者头向朝东。合葬墓共8座, 其中双人合葬7座, 3人合葬1座。大多数墓有随葬品, 以陶器为最多, 代表性器类为鼎、豆、壶、罐、杯、鬶、盃、尊、瓶等。随葬石器磨制规整, 还有作为礼器的玉铲和玉质饰件。骨、角、蚌器中有精致的透雕象牙梳、筒、琮等。大多数死者指骨附近发现有獠牙钩形器, 或穿孔的龟甲, 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习俗。随葬品中还有一些动物骨骼, 应是祭食, 以猪骨最多。墓地中43座墓随葬猪头、猪下颌骨共96个, 最多的13号墓内有14个。有人认为, 猪头是私有财产的象征物, 随葬猪头说明私有制已出现。墓葬有大、中、小型之分。在墓葬的规模、葬具、随葬品方面极不均衡, 有的墓简陋狭小, 仅能容尸, 随葬品极少或空无一物。而有的墓却十分宽大, 如大汶口10号墓, 有结构复杂的葬具, 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 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陶器, 还有兽骨、猪头和可能是“鳄鱼皮鼓”残留下来成堆的鳄鱼鳞板。

龙山文化, 上承大汶口文化, 距今约四千多年前。以1928年最初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典型龙山文化(又名山东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淮北地区。以黑色陶器群为显著特征。陶器普遍采用轮制, 壁薄而均匀, 造型规整, 器表多素面磨光, 器形以袋足器、三足器、圈足器较多。典型器物除突出地存在着以鬶为代表的少量白陶外, 大量的磨光发亮的黑陶, 其中的蛋壳黑陶高柄杯, 有的器壁仅厚0.5毫米, 还加以镂孔和装饰纤细的划纹, 制作工艺达到了古代制陶史上的顶峰。有些黑陶器上刻划复杂的云雷纹、兽面纹等纹样, 这类精致的陶器, 绝非日常用具, 可能是一种显示尊贵身份的礼器。龙山文化遗址中, 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精美玉器, 如阴刻兽面纹玉钺、三牙璧及鸟形、鸟头形等各种玉饰, 其较高的工艺水平表明当时制玉工艺已专业化。这些都是在社会产生阶级分化后, 适应某种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龙山文化已发掘墓群约300多座, 半数以上的墓无随葬品, 有随葬品的一般数量也不多, 少数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在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发掘出一座典型龙山文化迄今规模最大的墓, 东西5.5米, 南北4.3米, 有棺有椁, 随葬有精致的成组陶器, 如白陶带盖鬶, 磨光黑陶带盖鼎、盆、壶、甗等, 还随葬了20余块狗的下颌骨, 以及估计为礼器残件的遗物, 如鳄鱼鳞板及陶质小部件。墓室内还有3个人头及少量的肢骨、

脊椎骨等。

1979—1982年,1983—1985年考古工作者陆续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牛河梁发现了距今五千多年的红山文化大型古建筑遗迹群(红山文化: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35年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包括祭坛、“女神庙”遗址及泥塑偶像群和群山上的“积石冢”。祭坛在喀左县东山嘴,建筑基址为长方形,占据了整个遗址。东西长11.8米,宽9.5米。遗址选在面向开阔河川和大山山口的梁顶,并且基址内有成组、成群立石组成的石堆,还有泥塑人像群出土。在5000年前,无论是兴修还是使用这样大型的祭祀场所,都不是一个氏族或一个部落所能承担和专用的,从规模看,这应是部落联盟的重要集合地。女神庙遗址,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顶盖、墙体采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表面压光或施彩绘。在遗址中还发现了专门供奉的泥塑偶像群,泥像雕塑极为逼真,其中有一尊接近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头部基本完好,出土时颜面呈鲜红色,眼眶、面颊尤显,唇部涂朱,双眼均嵌淡青色圆饼状玉片为睛。整个脸面对称规整,形象生动。从出土泥雕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这是人世间等级差别的反映。积石冢作为墓葬,其特点是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这批大型建筑遗迹,特别是祭祀遗迹,是迄今所发现时代最早的一处。坛、庙、冢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五千年前上层建筑范畴的等级关系、宗教祭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提供了珍贵资料,可说是当时社会的缩影。通过祭坛、神庙可看到国家出现的曙光,先民的脚步也正在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孙彦贞)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22-1.bmp}

旧石器时代

(jiushiqi shidai) 远古人类历史上采用打制办法制造石器的时代。旧石器时代是和新石器时代相对而言的。本世纪 60 年代初期在山西芮城的西侯度发现有经过加工的石核、石片以及刮削器、砍斫器等打制石器，其时代距今约 180 万年。元谋猿人遗址发现有以石英或砾石为原料采用锤击法制造的粗糙石器。这些石器极其原始，仅仅经过打制而不再加工修理。经过几十万年的发展，直到蓝田猿人时期，部分石器才有了第二步加工的迹象。北京猿人时期，石器数量增加，其遗址所发现的石器，据统计有 17091 件（张森水著《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10 页）。其中最多的是刮削器和砍砸器，大部分石器的边缘部分经过第二步加工修整。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的第二步加工已普遍进行，加工技术趋于精细，已经制造出大量的石球。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石器制造技术，能够采用两端打制和挖制的技术制造出不同类型的石器。山西的峙峪遗址和下川遗址发现了石箭头。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制造石器的固定场所，在内蒙呼和浩特市东郊发现有两处石器制造场，出土了大量的石核、砍砸器、尖状器和石球等石器。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能够制造骨器和用火。当时最重要的生产活动是通过采集和渔猎来攫取天然产品。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结构，据推测还处于原始人群以至血缘家庭阶段。当时的思想意识有所萌芽，人们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迷信观念，原始艺术表现形式已经萌发并不断进步。

(晁福林)

新石器时代

(xinshiqishidai) 远古人类历史上采用磨制方法制造石器的时代。距今约1万年左右,中国广大地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迄今所发现的我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多处,正式发掘的有100多处。磨制石器的大量涌现、陶器的制造以及农牧业的产生,是这个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标识。新石器时代在我国大约延续了5~6千年,到距今4千年左右的时间结束。新石器时代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早期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中期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晚期有龙山文化。其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北方各地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和高粱,南方则以栽培水稻为主。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以各种陶器的遗存最为丰富,也最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仰韶文化的陶器以红陶居多,常绘有几何形花纹、人面纹和动物花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制造普遍采用快轮制坯,使胎壁厚薄均匀。当时的陶窑温度达1000多度,可以烧制出胎质坚硬的灰陶和黑陶。山东龙山文化的一种黑陶,坚硬细腻,胎壁薄如蛋壳,漆黑光亮,被称为蛋壳陶,是当时陶器中的精品。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不再构木为巢或穴居野处了,各种类型的房屋被建造出来。这个时期的原始艺术,如绘画、雕塑、乐舞等,都普遍发展起来,有些还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晁福林)

新石器时代的农作物

(Xinshiqi shidai de nongzuowu) 中国是世界上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农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新石器时代的农业以粟和稻为其代表物，它们的地理分布大体以秦岭和淮河为界。粟，现在人们称它为谷子，脱壳后俗称小米。它是由一种野生的狗尾草培育而成，在中国至少从七八千年前已开始大量种植，远早于其他地区。粟耐旱，自生能力较强，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黄土地带的重要农作物之一。河北磁山、甘肃秦安、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山东胶县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墓葬中，都发现有碳化的粟粒或粟壳，其中磁山发现了 88 个储存粮食的窖穴，各窖中粟的现存厚度为 0.5 米左右，最厚的达 2.9 米，大略计算，全部窖穴中的粟约为 13 万多斤。黍，俗称大黄米。由于炭化或腐朽成粉末的缘故，容易同粟相混淆，它的时代、分布与粟相当，是华北地区与粟共存的一种谷物。稻，一般指水稻，俗称大米，是从野生稻经过人工栽培而成。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稻谷、稻壳、稻叶和稻秆。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栽培稻。稻在新石器时代的分布，主要限于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发现达 30 余处，而且有籼稻和粳稻的分化。长江中、下游一带野生稻分布很广泛，因而这里可能是栽培稻的起源中心。

{ewc MVIMAGE ,MVIMAGE, !99900320_0023-1.bmp}

此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有少量菜籽的发现。在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窖穴中，发现了油菜种子，西安半坡遗址仰韶文化的陶罐里储存有芥菜或白菜一类的种子，说明当时已从事蔬菜的栽培了。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薏苡和葫芦籽，把这两种植物的栽培或利用的历史，提前到距今六七千年前。

(孙彦贞)

新石器时代的建筑

(xinshiqi shidai de jianzhu)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建筑形式主要有半地穴式建筑、地面建筑和架空居住面的干栏式建筑。它们的渊源，可能分别来自最初两种主要的居住形式：穴居和巢居。现已发现的半地穴式建筑遗迹，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中、上游，例如西安半坡遗址中的居住区面积达 3 万平方米，其中主要是半地穴式建筑。这一带有广阔而丰厚的黄土层，既易于挖掘又能长期壁立而不塌陷，加之黄土高原地势高，距地下水位较远，穴内比较干燥，很适于半地穴的制作。半地穴式房屋有方、圆两种形式，地穴有深有浅。这种房子都是用坑壁作墙基或墙壁，有的四壁和室的中间立有木柱支撑屋顶，木柱上架设横梁和椽子，铺上柴草，用草泥涂敷屋顶。而有的深地穴四周没有柱子，把屋檐直接搭在墙基上。为防潮，使居屋经久耐用，居住面及四壁常用白灰或草拌泥涂抹，有些还用火烤，门道或为斜坡或为台阶。室内对着门口，有一灶坑，可做饭、取暖、照明及保存火种。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建于地面的大型房屋，而且有的有分室和连间。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24-1.bmp}

干栏式建筑，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一种原始的住宅。“干栏”是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可称为“栅居”。这种建筑是用竖立的木、竹桩构成高出地面的底架，再在底架上用竹木、茅草等建造住房。这种架空居住面的木结构建筑，通风和防潮都比较好，适于气候炎热和地势低下潮湿的地带居住。因此在南方得以长期存在。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密集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建筑主要使用木材，包括桩、柱、大梁、地板、席壁以及树皮屋面等，出土的木构件上带有榫卯，而且梁头榫上还有销钉孔，同时发现了企口板（即木板通过凸棱和凹槽相互拼接，无缝隙）。这说明整座建筑梁柱间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具有相当成熟的木构技术。从目前发掘现象看，它可能是一种有前廊过道的干栏式住房。

（孙彦贞）

陶器

(taoqi) 一种质地较粗,具有吸水性,且不透明的粘土制品。是人类创造的第一种新物质。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及其研究,我国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已有近万年的历史。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中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了 8 千多年的陶器。我国古代制陶工艺首先是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所需原料要选择含铁量高、粘性适度、可塑性强的粘土,一般还要在粘土中加羼和料(石英、长石、砂石粉末、草木灰、碎陶片末等),目的是增强陶土的成型性能和成品的耐热急变性能,提高成品率。原料配制以后,须进行粉碎,以减少其中的颗粒度,使坯泥细腻。捏练和陈腐是原料加工的最后工序,以增强坯泥的可塑性。二是坯体的成型和修饰。成型方法主要有手制法和轮制法两种,手制陶器最常见的是泥条盘筑法。先将泥坯搓捏成泥条,由底部螺旋向上盘绕,直至口沿,用手和木拍里外抹平,便制成了各种器型。小型陶器则可用手直接捏塑而成。某些特殊的器形(如鬲)往往采用局部模制的方法。轮制法是将泥料放在快速转动的陶车上,两手随着轮盘的转动,塑拉出器形。再经打磨修饰,便成为待烧的坯体。坯体晾干后,才能入窑焙烧。如制彩陶,需在焙烧前先上彩绘。入窑焙烧是制陶器的关键工序,烧成温度一般为 800~1000。最初人们可能在平地上堆放柴草,将坯体放在其上点火烧制,这种方法由于火力不集中达不到一定温度,致使所烧陶器质量差,成品率低。后来人们便发明了陶窑,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新石器时代的陶窑主要有横穴式窑和竖穴式窑两种。横穴式窑较典型,它由火口、火膛、火道、窑室和窑算组成,窑室呈圆形,底上有窑算,算上有许多火孔,由火膛进入的火焰,经火道和火孔到达窑室。竖穴式窑的窑室在火膛之上,火膛是口小底大的袋状坑,有多股垂直的火道通向窑室。横穴式窑和竖穴式窑在陕西半坡、河南陕县庙底沟、安阳范家庄、河北邯郸涧沟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25-1.bmp}

新石器时代陶器种类很多,有灰陶、红陶、彩陶、黑陶、白陶、釉陶等。陶器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主要是因制陶原料中含有呈色元素和烧窑后期人们能够改变、控制火焰的性质所致。灰陶是在烧窑后期,采用还原焰,使制陶原料中铁的氧化物大部分转化为二价铁,在这种情况下,烧成的陶器呈灰色或灰黑色。灰陶是人们日用陶器中最的一种,质地较疏松、粗糙。红陶是在氧化焰气氛中烧成的,质地较坚硬细致。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最精美的陶器,仰韶文化的彩陶堪称其代表作。彩陶花纹是陶坯未入窑焙烧前,用铁、锰等颜料在坯体上绘画纹饰,入窑后用氧化焰烧成。彩绘牢固地结合在器物表面,不易脱落。彩陶上的纹饰有变化多端的植物纹、形态各异的动物纹和几何形纹饰等。常见的器皿有饮食器、贮藏器和吸水器。如钵、碗、盆、盘、杯、罐、瓶等。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制作精美,纹饰带有浓厚的生活情趣。青海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生动地描绘了五人一组的集体舞场面,堪称彩陶精品。还有一种彩陶是在陶器烧成后进行彩绘的,称“烧后彩绘陶”,彩色易剥落。秦始皇陵兵马俑即为彩绘陶。黑陶是在焙烧时,前期采用氧化焰,烧窑快结束时用浓烟薰翳(这时火焰是还原焰),经短时间渗透,便呈现黑色。烧成温度在 1000 左右。有的黑陶表面乌黑发亮,胎体薄如蛋壳。白陶是用高岭土烧成的白色陶器,胎质细腻

坚硬，烧成温度在 1000 左右。在我国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还出土了独具特色的印纹硬陶。此后，人们还创烧了表面施釉的陶器，称釉陶。常见的有两种，一是胎呈灰色，胎质坚硬，器表带有灰色透明青釉，烧成温度达 1200 的釉陶。其物理性能已接近瓷器，原料为高岭土，吸水率很低，火候 1200 ，叩之有金属声。因此称这种釉陶为原始青瓷。另一种是胎呈红色，表面施绿、黄、黄褐色的低温釉，釉料中有铅作助熔剂，因之称铅釉陶器。在西汉晚期已经出现。唐三彩便是低温釉陶。

（刘桂英）

传说时代

(chuanshuo shidai) 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所描述的远古历史时代。在没有文字记载出现的时候，历史是靠世代的讲述而流传的。这些内容后来被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古代文献里有丰富的古史传说内容，从中可看出中国原始时代的大概的社会面貌。

战国时代的人对于我国原始时代的情况有许多思考。屈原在《天问》里开头就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后面又问，有位名叫女歧的神女，他没有匹配，为什么能有九个儿子？相传人是由女娲用黄土合泥捏出来的，那么女娲之身又是谁做的呢？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显然已经包括进了古史传说。

关于远古先民的生活情况，古史传说有一些正确的揣测。《韩非子·五蠹》篇提到的有巢氏、燧人氏的情况和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情况是吻合的。在古史传说系统里，关于农业耕作的起源往往要追溯到神农氏和烈山氏。神农氏创造了耒耜，教民耕作，种植各种谷物。烈山氏有一位很能干的子弟，名叫柱，“能殖百谷百蔬”（《国语·鲁语》上）。考古材料表明，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初期开始就普遍兴起了农作，神农氏和烈山氏可能是那个时代以善于农耕而著称的氏族。此外，还有一位包牺氏，据说他能够“作结绳而为罔罟，以田以渔”（《易经·系辞》），大概是以渔猎著称的氏族。

传说时代里最为显赫的两位伟人是黄帝和炎帝。据说黄、炎两族是从互通婚姻的少典氏和有氏繁衍出来的。黄炎两族最初居于今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后来逐渐东移。黄帝族的迁移路线偏北一些，东渡黄河以后，沿着中条山、太行山的山边地带，直到今河北省的北部。炎帝族的迁移路线则偏南，顺着渭水和黄河两岸发展到今河南以及冀南、鲁东北一带。炎帝族曾和蚩尤族激烈冲突。蚩尤族力量强悍，“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惧”（《逸周书·尝麦》）。炎帝族向黄帝族求救，於是黄、炎两族与蚩尤族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规模很大的原始部落战争，蚩尤族战败之后退居南方。此后，黄帝族又和炎帝族战于阪泉之野，黄帝族取胜。黄、炎两族相互联合，在我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以上这些大约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中、后期所发生的事情。我国古代文献，几乎是众口一辞地盛赞黄帝的巨大影响和功绩，很可能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了以黄帝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在黄帝族所繁衍出来的众多子族中，颛顼与帝喾是时代较早的最著名的两支。颛顼又称高阳氏，帝喾又称高辛氏。他们各有“才子八人”（《左传》文公十八年），即八个著名的氏族。颛顼和帝喾两族与共工族曾经有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延续很久，直到舜和禹的时代才告结束。

帝喾以后最著名的部落首领是尧。他名叫放勋，号陶唐。尧曾经命令羲氏、和氏“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又以家族为核心治理天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尧治理天下，获得了很大成功，受到了广泛爱戴，尧年老的时候，在“四岳”的推荐下，决定以舜为继承人。尧通过各种方式对舜进行考验和培养，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了解舜的品德，并且让舜担任各种官职，经过了3年之久的考验才将权位禅让给舜。

继尧而起的舜，号有虞氏，又称虞舜。《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舜族应当是一个既善于农耕渔猎，又善于制陶手工的著名氏族。舜的时候，部落联盟更加发展。高阳氏和高辛氏的许多首领都被舜任用。舜还任命禹为“司空”，主持治理洪水、平定水土的事情；命弃为“后稷”，主持谷物播种；命契为“司徒”，主持教化；命皋陶为“士”，主持刑罚。这些官职的任用虽然未必都实有其事，但却反映了舜与各部落的广泛联系和受到尊崇的情况。舜作为部落联盟首领，已经拥有很大权力。他曾经“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尚书·尧典》）可以对一些氏族或部落加以惩处。舜年老的时候，将权位禅让给禹，又过了17年才去世。我国的传说时代，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趋于结束。中国古代传说里尽管有后人不断加工的成分和神话的内容，有后人的臆想，但是在反映原始社会的某些特点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

（晁福林）

黄帝陵

(Huangdilǐng) 亦称桥陵，在陕西黄陵县北之桥山。据《史记》载，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生于山东寿丘，逝于河南荆山，葬于陕西桥山。相传我国养蚕、宫室、舟车、文字、音律、医术、算数等皆始于黄帝时期，为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故我们常自称为“黄帝子孙”。陵区约 4 平方公里，山水环绕，形如八卦，气势非凡。陵区古柏参天，老树荫径。据统计，山上有千年古柏 6 万余株。黄陵庙前的“黄帝手植柏”高 19 米，下围 10 米，为群柏之冠。古墓高 3.6 米，周长 48 米。据说墓中埋葬着黄帝的衣冠。墓前竖碑亭，镌刻“桥陵龙驭”四字。再向前有“古轩辕黄帝陵”石碑，系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书立。黄帝陵前还有相传是汉武帝刘彻祭陵的“汉武仙台”。台顶高过林表，可远眺四周之群峰。

（吕瑞珍）

大禹治水

(Dayu zhishui) 上古诸部落在大禹率领下治理洪水的斗争。继承舜的权位的禹是以治水著称的。上古时代，水患严重，滚滚而来的洪水给民众造成很大危害，浩浩荡荡的洪水包围了山岭，淹没了丘陵，民众在痛苦中嗟叹。尧选拔治水之人，一位名叫鯀的人被推选上来，但他领导大家治水，连续九年也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后来，舜在位的时候，巡狩各地，见到鯀治水无功，便“殛鯀於羽山以死”（《史记·夏本纪》），随即又选拔鯀子禹继续领导治水的事业。禹主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国语·周语》），“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滕文公》上），通过疏导将洪水排到大海和长江里去。然而，古代文献里还有禹用填塞的办法治理洪水的记载，如“禹湮洪水”（《山海经·大荒北经》）、“禹乃以息土填洪水”（《淮南子·地形》）、“禹堙洪水十三年”（《汉书·沟洫志》引《夏书》）等。由此看来，大禹治水应当是疏导和填塞两种办法兼而用之的。在治水过程中，禹不仅有杰出的组织才能，而且率先垂范，表现出坚韧卓绝、艰苦奋斗的精神。治水时，居外十三载，过家门而不入，身执耒耨，栉风沐雨，奔波劳累，终于率领民众取得了治水事业的辉煌胜利。洪水被治服以后，民众纷纷从高山丘陵，返回到平原地区发展生产，开辟出许多良田和桑土，“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史记·夏本纪》）。禹命令益让民众在卑湿之地广泛种植水稻，因地制宜发展农作。大禹治水的功绩和他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和景仰。《诗经·韩奕》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即梁山之野辟为良田，全是大禹治服了洪水的结果。后来，舜选拔禹为自己的继承人，将权位禅让给禹，禹受到各部落的普遍拥戴，这些都与大禹治水的业绩有密切关系。

(晁福林)

禅让

(shanrang) 上古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将权位让给别人的一种制度。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实行禅让的是帝尧。尧年老的时候，召集“四岳”——即四方部落酋长议事。他说自己在位七十载，现在需要选择一位继承人，是否可以从“四岳”之中选出一位呢？“四岳”都谦虚地说自己无此才能，不堪当此大任。尧又让大家推举自己的亲戚以及隐匿在远方的贤能之人，大家便一致推举一位名叫虞舜的人，并介绍了虞舜的情况，说他是民间的一位盲者之子。他的父亲很糊涂，母亲谈吐荒谬，其弟象傲慢无礼，然而舜却能够和谐地与他们相处，全心全意恪尽孝道，并以自己的高尚品德来感化那些邪恶的人。于是尧采取各种方法对舜进行考验，将两个女儿嫁给舜，让她们直接观察舜的言行，又让舜担任各种职务以考察其能力。舜果然不负众望，尧便让舜继承自己的位置。在尧年老的时候，舜便摄行管理各种事务，主持祭祀上帝、山川诸神的礼仪，会见诸侯，外出巡狩；赏赐有功之人，制定各种刑罚处理犯罪之人。尧避位让舜主持政事凡 28 年才去世。据《史记·五帝本纪》说，办理完尧的丧事之后，舜避让尧子丹朱于南河之南，但是诸侯朝觐者却不去拜见丹朱，而去拜见舜，狱讼者也不去请丹朱处理，而去让舜决断，天下之人皆讴歌舜，在这种情况下舜才正式继承了权位。舜年老的时候见到自己的儿子商均不肖，不能担当治理天下的重任，于是便选拔禹为继承人，并将这个选择祭告于天。此后，过了 17 年舜去世。禹让位于商均，但天下诸侯皆离去商均而朝拜禹。在这种情况下，禹才正式继位以号令天下。禹去世之前，原拟的继承人皋陶早逝，便又举益为继承人，然而禹死后，益让避禹之子启的时候，却和以前禅让的情况大不相同。这时，天下诸侯皆离于益而朝拜启，这样，启便继承了权位，称为夏后帝启，这种情况表明禅让制已告结束。禅让制的实质是上古时代的军事民主制，后世的封建帝王虽然也偶有行之者，但其背景和本质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晁福林)

夏

(Xia) 中国古史上存在于约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7 世纪的朝代。按照《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夏王朝共传十三世、十六王。古本《竹书纪年》说夏王朝共历 471 年，可能近于实际。

禹的儿子启是一位有卓越才能的人物，他对创建夏王朝立下了功勋。原先被禹选为继承人的益是东夷族首领，曾被舜任用，去管理草木鸟兽。虽然禹在位时益被“任之政”，禹死时又“以天下授益”（《史记·夏本纪》），但最后却由启继承了权位，于是益便率众向启进攻。启和益之间可能进行了复杂而尖锐的斗争。这场斗争最后是以启的胜利告终的，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谓“益干启位，启杀之”。启在位时的夏朝生机勃勃，充满朝气。

继承启王位的是太康，当时夷夏之间为争夺部落方国联盟领导权的矛盾很尖锐。东夷族以善射著称的羿率众从东方的鉏迁到夏的腹地——穷石（今河南洛阳市南），“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夺取了太康的权力。太康和其弟仲康出居于斟寻氏，不久死去。仲康子相投奔到斟灌氏。后来，羿被部下寒浞杀死。寒浞派其子浇讨伐斟寻氏和斟灌氏，杀夏后相。这时，相的妻子慌乱中从墙洞逃出，归其母家有仍氏，生下少康。少康长大后，召集夏遗民并联合各方势力，最后打败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经历了三代人的尖锐复杂斗争，夏王朝才得以巩固。

少康以后，夏王朝进入了平稳发展的阶段。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子杼(zhu)讨伐东夷，直到东海之滨的三寿国，获取作为祥瑞之物的九尾狐。杼将夏都从原（今河南济源）迁到老丘（今河南开封县北），以便于对东夷控制。杼被认为是能继承禹的事业的一代名王，“杼能帅禹者也，故夏后氏报焉”（《国语·鲁语》）。杼子槐即位以后，居住于今淮河和泗水流域的于夷、黄夷、风夷等 9 个东夷部落都纳贡祝贺。许多东夷部落已经接受了夏的封号，承认夏的统治。夏的东方由于夷夏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已经巩固，从而便向西用兵。

孔甲继位后，夏王朝走上了衰败的道路，而夏王朝的日暮途穷则是在最后一位夏王——桀的统治时期。夏桀讨伐喜姓之国有施、姚姓之国有缙，灭掉己姓的苏、顾、温、董等国，并将商的首领——汤囚禁于夏台。后来，汤获释，“诸侯皆归汤”（《史记·夏本纪》）。夏桀丧失了诸方国部落的支持，这是夏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而且，桀又十分暴虐和昏庸。西周初年的周公认为夏桀的败灭是由于，第一，用人失当；第二，贪图安逸，鱼肉百姓；第三，社会风气败坏。总之，桀的时候夏王朝已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连其太史令终古也都“出奔如商”（《吕氏春秋·先识》）。商汤先率众翦灭韦、顾、昆吾等夏的羽翼，然后与桀在有娥之墟和鸣条会战。夏桀大败，退于三。汤乘胜追击，遂伐三。《史记·律书》正义引《淮南子》说：“汤伐桀，放之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南巢之山在今湖北巢县，桀被放逐并死于此。夏是我国古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王朝，它对于后世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影响。

(晁福林)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27-1.bmp}

商

(shang) 中国历史上朝代名。存在于约前 17 世纪至前 11 世纪。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直接文字（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记载的朝代。商朝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成汤灭夏以前称为先商；成汤灭夏至盘庚迁殷以前称为早商；盘庚迁殷以后称为晚商。商族历史悠久。殷人讲述商族发祥史的时候总是从契开始，认为从契以后才有了正式的商族。契的时代约略与大禹同时，《史记·殷本纪》说契“佐禹治水有功”。相传契还被帝舜任命为“司徒”。相土是契以后商族的著名首领，相传“相土作乘马”（《世本·作篇》），是说他已经训练马作运输工具。商族发展到了王亥的时候，力量趋于强盛。王亥子上甲之时，商联合河伯部落打败了有易氏，再经过报乙、报丙、报丁和示壬、示癸等几代人的努力，商族已成为诸部落中的佼佼者。

成汤是示癸之子而继位为商王者，又称为“天（大）乙”。为了准备灭夏，成汤致力于方国部落间的联合。他对出身于有莘氏的伊尹非常重视，“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墨子·尚贤》上篇），使其“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中篇）。伊尹向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记·殷本纪》），总结历史经验，并亲自到夏朝察看情况，又协助成汤处理军政大事，为灭夏做出了贡献。大约在公元前 17 世纪的时候，成汤率众灭夏，建立商朝，以商为核心的方国联盟在广大中原地区占有了主导地位。成汤告诫诸侯，要他们象禹、皋陶、后稷那样“有功于民，勤力迺事”（《史记·殷本纪》），表明成汤已有了很高威望。

从成汤建立商朝算起，直至商纣王被周武王消灭，共历 17 世 31 王。在早商时期，殷都曾经屡次迁徙。《尚书·盘庚》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邑，于今五邦。”所谓“于今五邦”，指成汤至盘庚之时，其都邑有 5 次迁徙。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了等 9 位商王皆“居亳（bó）”。一般认为这个亳都即今郑州商城。这以后的五迁情况是，仲丁迁囂（或作囂）、河亶（d n），甲迁相，祖乙迁庇（或说迁于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盘庚迁殷。盘庚之后，其弟小辛、小乙相继为王。小乙之子武丁是商代鼎盛时期的王。武丁年轻时曾受过民间疾苦，经受过磨炼，所以继位之后能勤于政事。武丁在位 59 年，被尊为“高宗”（《尚书·无逸》），死后受到殷人的隆重祭祀。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28-1.bmp}

自盘庚迁殷之后所开始的晚商时期的商朝很快达到了兴盛阶段。除了武丁之外，在相继为商王的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商朝都有比较显著的文治武功。周公曾称赞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尚书·无逸》）武乙、文丁以及文丁子帝乙在位的时候商朝的军事力量颇强盛。商王文丁时期，周族势力崛起。为了遏止周的发展，文丁曾杀死周王季历。商王帝乙大规模对东方用兵。他在位的第十年九月曾率众和侯喜等从首都大邑商出发，经雇、商、亳、攸、杞等地到达今淮河下游一带征伐人方，直到翌年五月才返回。过了五年，帝乙再次征伐人方，此外还曾用几个月的时间征伐孟方（今河南睢县南）。这些都表明经营东方是当时商朝注目之所在。商代最末一位君主称为帝辛（《史记·殷本纪》说他名纣，《竹书纪年》、《尚书·牧誓》说他名受），是一位很有

天分的商王。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史记·殷本纪》），但是其统治暴虐，最后被周武王攻杀。帝辛死后，其子武庚禄父曾受封于周，“以续殷祀”，然而作为一个历史时代而言，帝辛之死则是商朝寿终正寝的标识。古本《竹书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所指商朝年数不知何所本，可能与事实相去不远。

在我国古代史上，商朝的地位十分重要。商的经济发展有了较高水平，其中尤以辉煌的青铜铸造最为著称。商的甲骨文字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独树一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甲骨文字所记载的商代史料非常丰富，使人们对商朝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古代文献记载的商朝历史以《史记·殷本纪》最为集中和可靠，很有参阅价值。

（晁福林）

殷墟

(Yinxu) 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横垮洹河两岸，总面积达 50 平方公里。整个都城以王室宫殿为中心，有比较严格的规划和布局。洹河南岸为宫殿、作坊区，分布有宫寝、宗庙、储藏粮食和其他物品的窖穴，以及生产铜器、陶器、骨器、玉器的手工作坊。宫殿区外，有一道保护宫室的壕沟。恒河北岸为墓区，分布有王陵、贵族墓地以及数以千计的杀殉坑、祭礼场。遗址的西北部为平民墓葬区。此遗址出土大量的甲骨刻辞，对研究商代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殷墟的发掘始于 192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殷墟又不断的进行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仅墓葬就发掘近 2000 座，出土了大量的重要只是个中型墓，可也有殉葬者 15 人。《墨子·节葬》篇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种说法和殷代的情况是符合的。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29-1.bmp}

把人作为牺牲用来祭祀神灵或祖先的人祭情况在殷代后期也很盛行。据统计，有关人祭的甲骨共 1350 片，卜辞 1992 条，全部杀人祭祀至少当用 14197 人。文物。这些资料充分说明，商代后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

(何本方)

人殉与人祭

(renxunyurenji) 用人殉葬和作为祭品的制度。这种制度起源较早，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也延续了很长时间，考古和文献资料表明，其典型发展时期是在商代。人殉制度在早商时期即已盛行，河南郑州、安阳，湖北黄陂，河北藁城等地的商代遗址中都发现有以人殉葬的墓葬。晚商时期的贵族和商王的大型墓葬的殉人可达百人之多。殷墟墓葬区的 1001 号大墓的殉人，多数都是青少年，其中有几个甚至是幼童。这坐大墓共殉葬 164 人。殷墟王陵东部的武官村大墓呈“中”形，其规模虽然小于 1001 号墓，但仍发现殉葬 79 人。近年在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妇好墓，尽管殷墟王陵区的公共祭祀场所早曾发现 1228 座祭祀坑，有近两千多个人牲。70 年代在王陵区又发现 250 座商代祭祀坑，其中的 191 座埋葬有被杀害者的骨架 1178 具。比较早期的坑 18 组，用人牲达千人之多，一次祭祀杀人最多的为 339 人，一般的 10 至 100 人不等。较晚的祭祀坑每组用人仅 10 至 20 人。从发展情况看，时代愈晚，用人牲的现象便愈益减少。这反映着商代社会情况正在逐渐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晁福林)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29-2.bmp}

武官村大墓

(Wuguanchun damu) 在安阳殷墟已发掘的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面积 340 平方米，容积 1615 立方米，此墓早年几经盗掘，但仍残留不少器物，1950 年进行了科学发掘，这是一座“中”字形墓，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长 15.6、宽 5.7~6.3 米，中间作“品”字形排列 3 个长条形马坑，各埋马 4 匹，此外还有 1 个跪葬人。此墓道长 15 米、宽 5.2 米，也呈“品”字形排列 3 个马坑。共杀埋了 16 匹马，在靠近西南侧马坑旁，还有 1 坑，埋了 2 个人。墓室为平面长方形，上口南北长 14 米，东西宽 12 米，自口至底深 7.2 米。墓室正中是椁室，棺椁和墓主人尸骨早已不存，椁室四周二层台上排列有大批殉葬人，东侧为 17 人，多为男性，西侧为 24 人，多为女性。她们都是全躯，有的还有木棺和随葬品，可能是墓主人的亲信、侍从和姬妾等人。椁室底部中央有一个长 1 米、宽 0.8 米的腰坑，坑内埋 1 名持铜戈的人，以上共计 45 人殉葬。在墓室上的填土中发现 34 个人头，总起来武官村大墓中殉葬人有 79 名之多。

(齐吉祥)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30-1.bmp}

甲骨文

(jiaguwen) 一般是指商周时代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面用作占卜的文字。主要是商代的文字。它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体系。发现商代甲骨文的地点主要在河南安阳附近的小屯村(殷墟),西周早期的甲骨文主要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但数量较少。目前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出土于西安郊区,距今有4000多年,仅是很少的几片。甲骨中的龟甲,大多用龟腹甲,因腹甲较背甲柔软,容易用刀刻字。骨多是牛的肩胛骨,也有极少数其他动物的骨头和个别人的头盖骨。甲骨上面的文字,一般是用铜刀刻写的,也有少数用“毛笔”写的。古代称刻为“契”,称书写为书,因此甲骨文也被称为“殷墟书契”。甲骨在使用前要经过多次加工整治,如锯开,刮削平整,在背面钻孔凿眼。占卜时,先用火在背面的钻孔上烧灼,火烧后,在正面就出现裂纹,称“卜兆”。甲骨上面的文字内容大多是根据卜兆所示吉凶祸福的简单记事,这就是“卜辞”。内容涉及征伐、祭祀、狩猎、天象、农业、疾病等方面。卜辞的修辞格式很简单,许多辞句是“某日(干支字记日)占卜,某人问某事吉或不吉”等。有时记录占卜的效验,个别有专记事而不占卜的。甲骨文在字形变化上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象形字的图形繁简不定,笔画可多可少;字形方向左右不定;直行书写第二行时,或向左提行或向右提行等。但甲骨文毕竟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从字体结构看,除了象形字外,还有形声字和假借字。目前,已发现的商代甲骨文大约在15万片以上。这些甲骨一般都是破碎的,只有极少部分是完整的。已经整理出来的甲骨文单字,除去重复的和异体的,约有4500个左右,其中能够准确认识的仅有1000多字,这些大多数是比较常用的字。此外,不能确认的约3500字,大多数是人名、地名等专用名字。

(孙彦贞)

青铜器

(qingtongqi) 铜和锡的合金，因有青灰色的光泽，故被称为青铜。青铜器是奴隶主阶级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冶炼青铜、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冶铸始于夏代，发展于商代，完善于西周春秋。甘肃东乡林家出土一柄距今 5000 多年的青铜刀，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青铜器。进入奴隶社会，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出现许多铸工精湛的艺术珍品。二里头文化遗存中的青铜器主要为工具、兵器、礼器、乐器和装饰品。生产工具有刀、铲、凿、鱼钩等。兵器有戈、戚、镞。乐器有铃。礼器有形制较复杂的青铜容器爵和斝。商代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繁荣、昌盛时期。以盘庚迁殷为界，前期以郑州商代遗址和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为代表，在铸造技术上有较大发展，铜器种类和数量都有很大增长，已有较精细的花纹。铜器按用途大致可分为工具、兵器、礼器和车马器等，其中最主要是礼器。礼器品种增加，有鼎、鬲、簋、觚、爵、斝、卣、罍、盘等，此期铜礼器胎质一般仍较薄，花纹仍较简单，大都是单线条的花带纹。商代后期以安阳殷墟为代表。这时是商代铜器发展的极盛时期，冶铸技术日趋成熟。青铜礼器发展更快，出现很多新器类。器型也有明显的变化，如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炊具）、偶方彝（盛酒器）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时期还盛行以鸟兽形象为器形的，如四羊尊、象尊、猪尊和鸮尊等。铜礼器一般都较厚重，花纹也较繁缛，并且出现了铭文。最著名的是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鼎。西周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重要阶段。铜器种类和数量均有较大增长，且多有长篇铭文。各诸侯国的铜器多有发现。西周早期铜器是商代铜器的继续和发展。常见的青铜礼器、食器有鼎（包括方鼎）、鬲、甗、簋、盂；酒器有觚、爵、角、斝、觥、觶、尊（包括动物形尊）、卣、方彝、罍、壶及陈器用的禁；水器有盘、盂等。少见的还有乐器铙和日用器铜镜。常见的兵器有戈、戟、短剑等。这时期铜器的花纹造型庄重典雅，仍属青铜器的鼎盛时期。西周中期的铜器有简朴的趋势，早期常见的方鼎、觚、爵、角、斝、觥、卣、方彝等，已减少甚至消失。列鼎（用大小有序的一组鼎表示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如祭祀时，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和编钟开始出现，簠、盨、匜等新器型出现。晚期铜器以简朴为主。常见的炊器有鼎、鬲、簋；酒器有尊、罍等；水器有盘、匜等。列鼎、编钟件数增多。铭文多长篇。如记述周宣王诰诫和褒赏其臣下毛公 事的毛公鼎铭文等。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转向规格化和朴素的作风。主要是礼品和乐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车器、马饰、兵器及工具等。当时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最多。这时期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常见的有罍、盂、壶等，日用铜器增多，如烹饪器有鼎、鬲，甗；盛食器有簋、簠、豆、敦；水器有盆、鉴、盘、匜等，鼎和簋均成组使用。最能代表当时工艺水平的是带钩和铜镜。由于冶铁术的发生和普及，我国的青铜器时代终于被早期铁器时代所取代。秦汉时期铜器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倾向，铜器多为素面，只有铜镜的花纹造型不断发展。

（冀莲芝）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31-1.bmp}

青铜器的纹饰

(qingtongqi de wenshi) 不仅是对青铜器的装饰，还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和古代社会文明、时代风貌的标志，也是现代进行青铜器研究断代的重要依据。青铜器纹饰大体可分为动物形、几何形和人物活动图形等三大类。不同时代或不同阶段都有各自的风格特点。动物形纹饰：包括饕餮纹、龙纹、鸟纹、虎纹、牛纹、象纹、鹿纹、蝉纹、蛇纹、鱼纹、贝纹和龟纹等。其中饕餮纹、龙纹和凤鸟纹等都属於幻想和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也称奇异动物。饕餮纹是宋代人们根据《吕氏春秋》一书而定，它象征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贪食凶兽的面形，也称兽面纹。其基本特征是动物头部正面的图像，通常以浮雕出扉棱为兽鼻，两边有对称的兽目，上有眉，侧有耳，獠牙，大咧嘴，额顶两侧大部有一对突出的犄角，兽面两侧大多有展开的躯干，下部往往有足。此种图案是动物纹构图中最原始的一种形式。常作为商周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31-2.bmp}

龙纹和鸟纹在青铜器上多作对称式排列。龙纹：躯干有的作卷曲状、有的几条互相缠绕、有的龙头居中躯干向两侧蜿蜒展开，也有的两龙头相背或呈回顾状的双头龙状。龙纹常作为器物的主要纹饰，多饰在鼎、盘、壶等器物上。鸟纹：鸟首作前视或回首状，其上大多有上翘或下垂的羽冠，多为圆眼、钩喙，尾有长短。长尾高冠的鸟称为凤鸟。虎纹：一种作虎头状，其额顶有一对环形竖耳，另一种为虎的侧视爬行纹饰，较为形象。牛纹：一种是牛头状兽面纹，有作主题纹饰，有在器肩或器盞上作为附饰的，也有牛的全躯侧视形象。象纹有长鼻上卷、牙齿外露，一般多饰在方彝、钟、铙和尊等器物上，也有个别象纹作为器物主题纹饰的，或仿象形状做成象尊的。鹿纹有长颈鹿角的兽面纹，也有鹿头状、卧鹿形状等。蝉纹的特征为大目，腹部有节状条纹，多数蝉体呈竖三角形，不带蝉足，也有长方形蝉体带蝉足的，四周皆填以云雷纹。作为主题纹饰，多横向排列成带状，或纵向排列连续式，但多数蝉纹处於附饰地位。蛇纹头部呈三角形或圆头三角形，双眼突出，蛇身弯曲，有鳞节，卷尾。多作单个带状排列，作为陪衬饰于器物口沿。蛇纹大多很细小，相互蟠旋，亦称蟠虺纹。鱼纹有的脊、腹各有两鳍，较为呆板，有的有一个脊鳍，鱼口多张开，形象生动。鱼纹多施於盘内，也常见于汉代铜洗和宋、元铜镜上。贝纹是一个个贝壳状纹连接起来组成图案，常作器物辅助装饰，饰在器身或器盖的口沿上。龟纹形似龟，多施於盘内，也有饰在器肩上的。几何形纹饰：点、线的集合体，是最原始的纹饰。在青铜器上几何形纹饰包括弦纹、乳丁纹、云雷纹、涡纹、绳纹、圈带纹、重环纹、波曲纹、鳞纹、窃曲纹和瓦纹等。弦纹为突起的横线，有作人字形的，一般为一道至三道，有时单独出现，有作为其他纹饰的衬托。乳丁纹为突起的乳突，排列成单行或方阵。有的作为器物的主要纹饰，布满全身，也有作为器物的辅助纹饰。云雷纹是基本的几何图案，也是青铜器上最常见的典型纹饰。其形状是以同一方向、相向或相背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案，有呈圆形、长方形或三角形的。常作为青铜器纹饰的地纹，用以衬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涡纹的图形近似水涡，中间的小圆圈似水隆起状，也有火纹或“冏”（读窘）纹之称。绳纹又称绠（音桃）纹。由两条、三条、四条或更多波线纹交织纽结成绳索状。圈带纹纹样为若干圆圈排列成带状，

多饰在器物主题纹饰的上下两栏、器肩上或器盖边缘等部位。排列的圆圈为实体的，称连珠纹。重环纹图形是由多个略呈椭圆的一重、二重、三重的环组成的环带，除单独以一种重环纹带装饰器物外，也还常配饰在它种纹饰内。鳞纹形似鱼鳞，是将大小相同或大小相间的鳞片横向或纵向排列饰在器物上。波曲纹形如波浪起伏，在波峰或波谷处常饰兽目或兽头等。窃曲纹由两端回钩的或“ ”形线条构成扁长图案，中间常填以兽目。瓦纹由平行的凹槽组成，形如一排排仰瓦，也称为沟纹，常饰在器物的腹部与颈上。人物活动图形是指春秋战国之际青铜器纹饰中开始出现的有关贵族社会生活和耕战景象的装饰画。内容以宴乐、舞蹈、狩猎、采桑、水陆攻战为题材。

商代人们对自然界现象不认识，不理解，而产生祭祀天地山川，崇拜鬼神。反映在青铜器纹饰上，多属抽象、幻想的动物，给人以神秘、庄严、肃穆之气氛。在商代前期青铜器纹饰较简单，大都饰以单线条的饕餮纹，夹以圈带纹、乳丁纹和涡纹等。商代后期，流行繁缛花纹，主要表现以云雷纹为地纹，主题纹饰除饕餮纹外，还有蝉纹、鸟纹、龟纹、蛇纹等动物纹和各种几何形纹饰。花纹往往遍布器物全身。商末周初，社会动乱，天命观动摇，是西周青铜器纹饰变化的重要因素。此时已不是狂热的崇拜鬼神，而是较多地注意对祖先的祭祀，作器铸铭文，以颂扬先人的功德，宣扬夺取政权符合天命，以巩固政权。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继承商代晚期的传统，西周中、晚期则多铸有长篇铭文。而青铜器纹饰则主要做为一种装饰趋向简化。饕餮纹逐渐失去主题纹饰地位，而下降为附饰。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清新、流畅的风格。带状花纹增多，最常见的纹饰有鸟纹、窃曲纹、重环纹、波曲纹、瓦纹等。春秋战国之际，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在摆脱奴隶主阶级旧观念束缚下，无论从青铜器纹饰的多样性和构图的灵活性，都表明青铜工艺发展进入新阶段。青铜纹饰较前有了较大变化。商和西周青铜器上以对称的饕餮等兽面纹为主繁缛纹样已被淘汰，代之以动物纹、几何纹与人物活动图形等。如窃曲纹、贝纹、蛇纹、重环纹、云雷纹以及描写当时社会生活的采桑、狩猎、宴饮、水陆攻战纹等。镶嵌、鎏金、金银错等新兴青铜工艺的出现，使春秋战国铜器的装饰花纹更加富丽豪华。

（冀莲芝）

青铜器的铸造

(qingtongqi de zhuzao)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已冶炼红铜和青铜等合金了。奴隶社会,我国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日趋成熟,设备不断改善,规模逐步扩大。距今4000年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中铸铜遗址出土有陶范、铜渣和坩埚残片等铸造遗物。从青铜容器的铸造痕迹看,当时已采用复合范铸造,反映当时青铜冶铸业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商周时期已出现有相当规模的青铜冶铸作坊。郑州、殷墟苗圃北地、洛阳东郊北瑶和侯马牛村等是已发掘的最重要的商周铸铜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发现大量陶范、坩埚、铜渣、木炭和熔铜炉残壁,还有烘范窑和炼铜人住的工房。坩埚多为大型陶器,外表涂草拌泥。炉壁成分经鉴定与陶范材料完全一致,由石英砂加粘土组成。根据炉壁残块的初步计算,熔炉直径约1米左右,最大的为1.8米,最小的为0.3米。用这样大型熔炉熔铜,与当时铸造大型铜器的情况是相适应的。在湖北铜绿山东周古矿冶遗址中发现炼铜竖炉,它分炉基、炉缸和炉身三部分。炉基内设防潮沟(风沟)。炉身设有鼓风口。内蒙林西大井东周冶炼遗址出土有马头形陶质鼓风管,表明当时已能用人工鼓风掌握炉温,具备较好的熔化能力。冶炼青铜,开始是用铜矿石加锡或铅矿石等冶炼而成,逐步发展到分别炼成铜和锡、铅等,然后按一定比例混合熔炼。熔炼须经过选矿、破碎、加熔剂木炭,再投入坩埚或炼炉中,燃木炭熔炼,迨火候成熟,取铜液精炼备铸。青铜器的铸造需经制模、翻范、烘烤、合范、浇注等一整套工序。即将准备铸造的器形先塑出泥模,在泥模上翻出外范,削出范芯,待阴干后放入烘范窑中烘烤,范经合成,方可进行熔铸。铸造青铜器的模具有陶范、石范和铜范三种,石范、铜范都是铸造刀、镞、货币等小件器物的。陶范耐火性能及透气度好,因而普遍使用。造型简单的工具、兵器等用单范或双合范铸造,一范可使用多次。青铜容器均采用复合范铸造,一套模具只能使用一次。铸造青铜器所需范的多少,则视器而定。如一件铜爵需16块陶范,曾侯乙墓中一件甬钟,则需要136块陶范。铸造大型器物需挖坑固定,用槽注法浇注。一次浇注完成的,称为浑铸法。比较复杂的器形则先铸附件,后铸器身或先铸器身,然后将附件铸接上去,称为分铸法。商代已经使用分铸法。如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鼎的器身和四足是整体铸造的,鼎耳则是采用分铸法,后铸上去的。东周时期分铸法的使用更加熟练。商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多在泥模上雕刻,或在外范上加工。东周时期有的采用花纹印版在模上捺印,提高了效率。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这种工艺是将易熔化的黄蜡制成蜡模,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铸模。烘烤后黄蜡熔化流出,形成型腔,用以浇注铜汁。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工艺随铁工具广泛使用,生产力的发展,还出现了金银错、鎏金、漆错(铜器上填以黑漆)等新工艺。所谓金银错,就是在铸造铜器上用金银丝或金银片镶嵌成各种华丽的纹饰或文字,用错石在器表磨错光平。其特征是用隐嵌的技法形成金银线图案或文字。改变了以前铜器模铸纹饰的呆板和拘束。显示出色彩的对比,线条更加鲜明,艺术形象更生动。春秋时期,人们在前人青铜铸造实践基础上逐步认识了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的关系,总结出青铜铸造的“六齐”规律,即青铜各组成元素的六种配比,详记在《考工记》中: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33-1.bmp}

“ 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

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

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

叁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

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

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青铜合金成分的“六齐”规律，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工艺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青铜铸造工艺等方面智慧的结晶。

（冀莲芝）

司母戊大鼎

(simuwu dading) 商代后期青铜礼器。1939 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长方形、立耳、柱足。鼎的四角各有突出的牙扉一道。器身以云雷纹为地纹，腹部的四面、四角及足部分别饰有饕餮纹。两耳外侧左右各饰一虎纹，两虎张口相向，作欲吞噬一人头状。腹内壁铸铭文“司母戊”三字，据此可知该鼎是商王文丁为祭祀其母而作。鼎身及足是浑铸的，鼎耳则是采用分铸法，后铸接上去的。鼎通高 133 厘米，器口长 112 厘米、宽 79 厘米，重 875 公斤。根据其体积和重量估计，当采用安阳小屯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所出直径约 60~70 厘米的较大的熔炉，以槽铸法浇注而成的。据测定，该鼎成分为含铜 84.77%、锡 11.64%，这一比例与《考工记》所载《六齐》中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的青铜配比规律大体相符。该鼎体造型庞大、浑厚，是我国已发现最重的青铜器，它集中地反映了商代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成就。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33-2.bmp}

(冀蓬芝)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33-3.bmp}

四羊尊

(siyangzun) 盛酒器，作于商代后期，1938年湖南宁乡月山铺转耳仑出土。尊呈方形侈口，通高 58.3、口径 52.4×52.4 厘米。该尊通体遍布精美细致的多种纹饰。颈部饰蕉叶形相对龙纹，尊四面肩部中央各有一突出带角的龙头，肩之四角各饰一突出的大角羊，羊头上有卷曲的巨大双角，耳甚小，向上竖起作静听状。两眼微微凸起。口、鼻悉备，蹄足分明。腿上部饰凤纹。尊之边缘处均饰有出戟的扉棱。古代的匠师们把装饰纹样、动物形象与整个器形的结合巧妙，和谐得体，不愧为光辉灿烂的商代青铜文化的杰作。

(冀莲芝)

周原

(Zhou yuan) 周族之祖古公亶父率众由豳地所迁居之处。周原包括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的一部分。古公亶父曾在此处营筑城郭、宫殿、宗庙、房屋，成为周人的早期都邑。后来，周文王、武王虽然迁都丰、镐，但周原一带仍是一处重要的政治中心。周原考古在 70 年代后期屡有重大发现。1976 年在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了一组大型西周建筑基址。它坐落在一个夯土台基之上。建筑物的布局以门道、前堂、过廊、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形成一个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式院落。1977 年秋，在清理西厢房南头第二间房屋时，在一个窖穴中发现大量卜甲和卜骨，共有 17000 多片。有刻辞的卜甲有 190 多片，共 600 多字。周原甲骨刻辞的内容记载商周关系和周初历史，是一批宝贵资料。在扶风县召陈村，与发现凤雏遗址同时，也发现了一处西周建筑基址群，共有十几处基址。其中一座夯土台基东西长约 22.5 米，南北宽约 10.4 米，台基周围还有半米多宽的用卵石铺筑的散水。台基上由南到北有四排柱础，间距 3 米，由东到西有八排柱础，间距大都是 3 米。台基上有两道南北向的宽 0.8 米的夯土墙。这些情况表明台基上原来的建筑应当是宽敞高大的建筑。除了凤雏和召陈的大型建筑基址以外，在扶风云塘还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骨器作坊遗址，扶风齐家村等地也发现有居住遗址。西周时期的墓葬在周原地区也多有发现。岐山贺家村于 1966 年发掘的一座墓中出土了鼎、簋、尊、角等 17 件铜器，还有兵器和车马器。贺家村的西周墓地还有不少小墓，随葬器物大都是一件陶鬲、一件铜戈和一件大铜泡。从陶鬲的形制可以推定贺家村西周墓地中有相当一部分墓葬可能属于灭商以前的先周时期。《诗经·绵》记载古公亶父率族迁于周原时的情况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堇荼如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史记·周本纪》说古公亶父迁到周原之后“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周原地区的考古资料证明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是可靠的。

(晁福林)

西周

(Xizhou) 从周武王至周幽王时期建都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的周王朝(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

周武王继位后的第十一年一月癸巳日,周军出发伐商。二月甲子日在商郊牧野和商纣王决战。在强大攻势面前,“纣师皆倒兵以战”(《史记·周本纪》)。殷纣王逃奔至鹿台自焚而死,武王以黄钺斩掉纣头,悬于大白之旗示众。次日,在商王宫殿里举行隆重仪式,宣告“革殷受天明命”(《逸周书·克殷》),周王朝代替了商,确立起统治地位。周王朝建立后两年,周武王病逝于镐京。由于武王子成王年幼,遂由武王弟周公当政。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和营建成周洛邑之后,还政成王,并在以后尽心尽意地辅佐成王。

西周初期,统治者实行大规模的分封以为藩屏,又以商王朝的覆灭为鉴戒,制定出各种有利于社会稳固的政策。周成王接受周公的谆谆告诫,在执政时以兢兢业业著称。周初统治者为了抑制奢侈之风而戒酒,《尚书·酒诰》就是一篇著名的戒酒诰令。直到周康王时,统治者还念念不忘此事。周康王说:“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田(甸)零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已。”(《大盂鼎》)成王、康王时期,周王朝继续分封诸侯,开拓疆土,国力强盛,所以《史记·周本纪》谓:“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成康之治确是周王朝统治的安定发展时期。

从武王开始,经周公东征直到成康时期,周王朝所开拓经营的重点是东方,其次是东南地区。到了昭王时期,凭借强盛的国力,周王朝便着重向南发展,而对北方的戎族采取守势。昭王虽然死在第二次南征途中,但周王朝向南方扩展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穆王时期,周王朝继续向外扩展,史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左传》昭公十二年)古本《竹书纪年》有穆王“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的说法,可见,穆王向西巡游已经到达了很远的地方。

穆王以后的共、懿、孝、夷四王在位的时期,周王朝已将注意力从对外征讨、巡游转向内部统治结构的巩固和贵族间等级秩序的稳定。继夷王之后的厉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开始衰落。周厉王虽然声称自己“亡康昼夜,经雍先王”,象先王一样勤于政事,但实际上却在损害许多社会阶层的利益。他任用的卿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国语·周语》上),加重了民众负担,以至造成“下民胥怨,财力单竭”(《逸周书·芮良夫》)的后果。国人暴动之后,“厉王出奔于彘”(《史记·周本纪》)。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邑,诸侯奉王子靖为周宣王。

由于宣王亲历了国人暴动的社会风暴,所以他对其父厉王的暴政及其恶果能有较深刻的反省,并由此出发而采取了一些明智的政策。宣王初期,周王朝北方和西北的獫狁势力日炽,并曾骚扰关中地区。宣王讨伐獫狁的战争获得很大胜利。此外,宣王还曾率军征伐徐方,凯旋而归。对江汉地区的征伐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为了对付西戎,周宣王曾命秦部落的首领秦仲为大夫。秦仲被西戎杀死后,宣王发援兵7000人助秦仲之子,终于打败了西戎(见《史记·秦本纪》)。这些对外战争的胜利虽然有一番中兴景象,但宣王后期,对外战争接连失败,“中兴”也成过眼烟云。

前781年,幽王继位,时天灾人祸频仍。他用人不当,宠幸褒姒,引起贵族阶层和民众普遍不满。周王朝和一些诸侯国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诸侯干

预王朝事务，使矛盾更复杂。前 771 年，幽王率军与申、缙、西戎等的兵众战于骊山，大败，幽王和伯服均被杀于戏。西周王朝至此寿终正寝。在我国古史上，西周是一个重要的朝代，它的政治和经济都有较快发展，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两大柱石的周代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既和原始氏族时代以及殷商时代的情况有别，又跟绵亘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的情况不同，它虽然继往开来，但却又自成体系，所以引起了历代史家对它的重视。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35-1.bmp}

周文王

(zhouwenwang) 周武王之父，姓姬名昌。文王继位时，周所控制的区域并不大，所以《孟子·公孙丑》上有“文王以百里”的说法。文王采取有力措施，使周的势力有了较大发展。他很重视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周原地区在文王时期得到进一步开发。文王还能够以照顾鳏、寡、孤、独等措施团结族众，“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尚书·无逸》）文王在远近方国部落中拥有很高威望，相传虞芮两国争讼，求周评判，见周人在文王率领下“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史记·周本纪》），虞芮之人自觉惭愧，遂相让而去，于是“天下闻之而归者 40 余国”（《诗经·绵》毛传）。为了抑制周的影响扩展，商纣王曾经囚文王于羑里。文王的谋臣闳夭等人献美女、文马等物于纣，文王才得获释。周在文王后期已经积极准备灭商。文王先讨伐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以求稳定后方，然后逐渐向东扩展。他讨伐商的与国——黎，给商王朝的震动很大。伐黎之后，文王又伐位于商王朝西南的田猎区的邠，直叩商都大邑商的门户。后文王将都邑迁到渭水南岸的丰（今陕西户县东）。不久，卒于毕郢。文王虽未能灭商，但却奠定灭商的基础，所以说他是先周历史发展中的一位有很大影响的重要人物。

（晁福林）

武王伐纣

(Wuwang fa zhou)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一场著名的战争。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学者根据不同的推算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影响较大的有根据三统历推算的前 1122 年说，按照大衍历推算的前 1111 年说，日本学者新城新藏推算的前 1066 年说，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的前 1027 年说，根据彗星等天象推算的前 1057 年说，根据天象和文献记载相印证而推算的前 1045 年说。武王伐纣时，除了主力军“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周本纪》）以外，还有庸、蜀、羌、濮、微、卢、彭、濮等方国和部族的人员。纣王的军队数量很多，“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诗经·大明》），然而周的军队却斗志旺盛，周武王“以虎贲、戎车驰商师”（《逸周书·克殷》），战斗十分激烈。在强大攻势下，“纣师皆倒兵以战”（《史记·周本纪》）。纣王逃奔鹿台自焚而死，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于大白之旗。牧野之战只用一天时间即告胜利。《利簋》铭文说：“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义谓武王征商的甲子日早晨，岁星当空，很快就赢得了胜利，仅一日之早晚即灭商而有之。次日，在商王宫殿里，由尹逸宣读祝文，告祭神灵，至此，武王伐纣的事业遂告取得了彻底胜利。

（晁福林）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35-2.bmp}

利簋

(ligui) 目前发现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青铜器。通高 28 厘米、口径 22 厘米，1976 年陕西临潼周代窖藏出土。簋身深腹，方座，双耳有珥。耳作兽头状。腹部及方座饰饕餮纹、龙纹，圈足也饰龙纹，皆以云雷纹为地纹，方座平面四角还饰有蝉纹。器内底有铭文四行三十二字：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贞）克闻，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锡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在甲子日早晨，出征前，贞问上帝，得了吉卜，从而使克商成了现实。到了第八天辛未，武王在阑师（地名）举行赏功，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右史利用来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关于武王伐纣的纪载，最早的文献是《尚书·牧誓》，记载了周武王在牧野同商纣王作战的誓辞。后《韩非子》记载“战，一日而破纣之国。”《史记》云“甲子日，纣兵败”。利簋铭文印证了《尚书·牧誓》等文献记载，为研究周武王灭商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西周铜器断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36-1.bmp}

（冀莲芝）

金文

(jinwen) 也称“钟鼎文”，即指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现已发现带铭文的铜器 4000 多件，金文单字 3500 个左右。内容多记奴隶主贵族祭典、征伐、赐命、契约等，涉及到礼仪、制度、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商代的金文是在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上才出现的，其字体和甲骨文相近。较早的铭文只有很少的几个字，大都是古代氏族的族徽、人名等，如妇好之类。商代末年始有较长的铭文，最长有三四十字的，内容大体是因受赏而为父辈做器的。如安阳后岗祭祀坑出土的戌嗣子鼎有铭文 30 字，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商代青铜器中铭文最长者。西周早期出现长篇铭文，如成王时代的《令彝》有 187 字，康王时代的《大盂鼎》有 291 字。西周初年的铜器铭文是因袭商代的字体，比较凝重。西周中期族氏铭文已罕见，长篇铭文更多，内容多格式化。铭文字体书写趋于疏散。西周晚期铭文多长篇，如《毛公鼎》有 497 字，是现存铜器中最长的一篇铭文。春秋战国时期铜器铭文，一般都很简短。字体向多样化发展，出现了鸟篆等艺术字体。其内容长篇记事铭文较少，一般以记载督造者、铸工、器名以及使用地点为主。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编钟计有篆书铭文约 2800 余字，是战国早期金文的一次重大发现，是已知我国最早的一部较完整的古代乐律学者作。青铜器铭文是研究我国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早期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汉字发展的珍贵资料。

(冀莲芝)

留鼎铭文

(huding mingwen) 西周懿王或孝王时期由名留者所作的铜鼎的铭文。这件鼎据《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所说，原为清朝人毕沅得之于西安，鼎高2尺，围4尺，深9寸，款足作牛首形。据推测这件鼎应该是在周原地区出土的。后来，这件鼎毁于兵火，仅有铭文拓本流传于世。该鼎铭文共24行，现存380个字。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周懿王或孝王的元年六月的乙亥日，周王在穆王大室册命作器者——留，命令他继承祖考的职司掌管周王朝的卜事，即铭文所谓的“更（赓）乃且（祖）考司卜事”，并且赏赐了作器者。邢侯后人在宗周为王臣者并叔还赏赐作器者以赤金（铜）一钧（30斤）。作器者感到荣耀，遂以赤金作鼎以为纪念。第二部分铭文记载同年四月了酉日，作器者派家臣代表自己到作为狱讼官的并叔那里控告效父及其家臣名限者。原来，作器者“既赎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意为已经用一匹马和一束丝从效父那里赎（贾）得五夫——即5名奴仆，然而名限者却背信弃约，并要另行订立交换条件，因此发生了这场诉讼。铭文的第三部分追述往昔饥荒之年，“匡众厥臣二十夫”——即名匡者的农夫和家臣20人，强抢作器者的禾给匡，作器者遂控告到东宫那里。东宫判处说让匡交出强抢禾的人，如果不交出来，匡就将被重罚。名匡者乃向作器者稽首，并且赔偿了损失。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36-2.bmp}

（晁福林）

西周分封制

(xizhou fenfengzhi) 西周时期分封诸侯的制度。分封制是西周王朝立国的基础。武王灭商以后，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此外，还封纣子武庚禄父。分封制的大规模实施是在周公摄政和成康时期，目的在于“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吕氏春秋·观世》谓“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荀子·儒效》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谓西周分封“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西周所分封的诸侯国，属于文王子辈的有管、蔡、邶、霍、鲁、卫、毛、聃、郟、雍、曹、滕、毕、原、酆、郕等，属于武王、周公子辈的有邰、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等。以上这些封国地望多在今关中地区和今黄河中下游一带，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此外姬姓诸侯国还有芮、息、随、贾、沈、密、郑、虢、滑、樊等。除了同姓诸侯国之外，西周时期还分封了不少异姓国，如姜姓的厉、吕、申、向、许；妫姓的陈；嬴姓的江、黄；偃姓的蓼、轸；姒姓的蓼；子姓的宋；曹姓的邾、郕；曼姓的邓等。异姓国里最强大的是齐国，有很大影响的是楚国。诸侯国的分封延续了很长时间，并不都在周初，例如郑国之封就晚至周宣王二十二年。

(晁福林)

宗法制

(zongfazhi) 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周代的事情。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制度。宗法制的—个关键内容是严嫡庶之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目的在于稳固贵族阶级的内部秩序。这一制度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从而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在宗法制度下，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传宗继统，并且世代均由嫡长子承继。这个系统称为大宗，嫡长子称为宗子，又称宗主，为族人共尊。宗子有祭祀祖先的权利。若宗子有故而不能致祭，那么庶子才可代为祭祀。和大宗相对应的是小宗。在一般情况下，周天子以嫡长子继统，众庶子封为诸侯，历代的周天子为大宗，这些诸侯就是小宗。诸侯亦以嫡长子继位，众庶子封为大夫，这些大夫为小宗，而诸侯则为其大宗。大夫也以嫡长子继位，为大宗；众庶子为士，即小宗。在宗法系统里，诸侯和大夫实具有大宗与小宗双重身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宗和小宗的区别与贵族等级里的层层封建是完全合拍的。如果说分封制从政治结构方面建立了贵族间的等级秩序，那么，宗法制则以注入了特定内容、贯彻了崭新原则的宗族传统观念使这个等级秩序得到稳固。文献和彝铭记载中屡有“宗周”的记载，《诗经·公刘》说：“食之饮之，君之宗之。”从宗法系统看，周天子乃是地位最高的宗子。周初，宗法制首先在周天子和诸侯间实施，以后逐渐及于中、小贵族，以至士与庶民之间，具有了普遍性质。

（晁福林）

周公东征

(Zhougong dongzheng) 周公为平定三监叛乱而进行的远讨东方的征伐。武王灭商之后，曾分商王畿地区为三部分，即“邶”(bèi)、“鄘”(yōng)、“卫”三区，设三监治理。三监即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三个对武庚监管的人，而叛乱的发动者却是管叔和蔡叔。他们在武王病逝、成王年幼而由周公摄政的情况下，散布流言蜚语，谓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縢》)，然后勾结武庚公然叛乱。三监叛乱对周王朝震动很大。在严峻的形势下，周公相当镇静和果断。他的东征之举，一是平定三监之乱，二是征服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诗经·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东征将士把斧斨都用残破了，可见战斗是相当激烈的。东征历时3年之久，“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尚书·大传》)。可见打击殷商残余势力的“践奄”之役已是东征的尾声。奄是殷的旧都，周公翦灭奄国是对殷商势力的重大打击。周公东征是商周两大势力的再次较量，并以周的胜利而告结束。周公东征使周的影响达到东海之滨，这对于周王朝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

(晁福林)

井田制

(jingtianzhi) 周代的主要土地制度。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划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就是周天子和各级贵族所掌握的土地，庶人在公田上劳作，其产品全部归周天子和各级贵族所有。公田又称为“大田”或“甫田”。贵族们提供给庶人耕种的小块土地称为私田，其收获归庶人私有。关于公田和私田的结构情况，孟子曾有这样的说法：“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按照这种划分方法所形成的土地疆界形状呈“井”字形，所以孟子称之为“井地”，后世又称为“井田”。《汉书·食货志》上：“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古代文献上的这些记载反映了在井田制度下土地分配的情况。对于这种土地分配制度的意义，孟子十分强调其对“仁政”的影响。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孟子的说法虽然带有一些空想性质，但他去古未远，其说法应当是基本上反映了周代社会基层单位的土地情况的。古代所谓的“耦耕”，大约是庶人耕种公田的一种形式。按照这种方式，一般是两个人结成一组进行耕作。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所以在井田上进行耦耕的规模往往很大，故《诗经·噫嘻》说“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经·载芟》说“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可见是成千上万的庶人一同耕作的。井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周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井田制是一种非私有性的土地制度，土地不能买卖。其衰退和瓦解一般认为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晁福林）

国人暴动

(guoren baodong) 发生于周厉王时期的以国人为主并有广泛社会阶层参加的大规模民众起义。继夷王之后的厉王时期，周王朝政治开始衰败，终于酿成国人暴动，使周王朝几遭灭顶之灾。周厉王的“暴虐侈傲”（《史记·周本纪》）固然是国人暴动的直接原因，但决定性的因素却在于新的社会势力的兴起。从共王、懿王时期开始，社会上的中、小贵族和平民的力量日益强大，他们就是古代文献中常常提到的国人阶层。这个阶层迫切要求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上的一定权力，然而厉王采取了暴虐压制措施。周厉王虽然声称自己象先王一样勤于政事，但实际上却在损害许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曾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即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并且加重对普通民众的剥削。“专利”的结果使“下民胥怨，财力单竭”（《逸周书·芮良夫》）。当民众指责厉王的暴虐行为时，“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当时，周王朝的有识之士，如芮良夫、召穆公、凡伯等，对局势忧心忡忡，并进谏厉王，但厉王却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规劝，使社会形势更加动荡。公元前842年，国人暴动，袭击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史记·周本纪》）。厉王太子静藏匿召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交出其子以代太子，才使太子幸免。这次暴动波及甚广，是一次有广泛社会阶层民众参加的行动，是对周厉王暴虐统治的致命打击。

（晁福林）

春秋

(Chunqiu 前 770—前 476) 我国古史上西周之后战国以前的一个历史时代。春秋之称由鲁史《春秋》而来。《春秋》一书所记史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 722),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前 479),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春秋起迄年代约略相同。

春秋时期的政治发展与西周时代的分封制有密切关系,是分封制的继续发展和必然结果。在分封制度下,按照“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原则,被分封的诸侯国有三个层次。一是姬姓诸侯国,约有 50 多个;二是姬姓之外与周王室有亲戚关系的异姓诸侯国;三是归服于周的异姓诸侯国。春秋初年,见于记载的有 100 多个国家,加上在分封范围之外的戎狄蛮夷诸小国,共约有 200 余国(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 4、卷 5)。春秋时期,这些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呈现着十分复杂的局面,特别是其中 10 多个大国更对政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东周王朝在春秋时期虽然还有天下“共主”的招牌,但是它已无力“授民授疆土”以分封新的诸侯,其实力已降至中等诸侯以下,商周王朝那样的权力中心已不复存在。春秋时期虽然每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权力中心,但是由于历史的、地理位置的原因,各国间形成了错综复杂关系,并且,可以划分出这样几个政治区域。一是周、郑、宋、卫区。这个区域地处黄河中游,保存了较多的传统政治,尽管经常受到其他区域政治的冲击和影响,但却能维持其守旧的格局。二是秦、晋区。这个区域地处黄河上游,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三是齐、鲁、燕区。这个区域地处黄河下游,政治上偏于保守,唯齐桓公和管仲的改革为其政治注入了活力。四是楚、蜀、吴、越区。这个区域地处长江流域,除楚之外的这个地区国家的发展都比较晚。楚和吴越以其雄厚实力先后与中原诸国抗衡。一般来说,每个区域内国家间政治联系和交往比较多,对于区域外诸国则多进行较大的征伐战争。区域政治是春秋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春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大国争霸的紧锣密鼓始终不断。据《春秋》所载,242 年间列国之间的战争共 483 次,朝聘会盟 450 次。春秋初年,郑国伐卫、侵周、败燕、攻宋、灭许、大败北戎,几成霸主。鲁国在春秋初年曾多次打败宋、齐、卫、燕等国,亦有称霸之势。然而,真正可以称为霸主的当首推齐桓公。经过争霸,至春秋战国之际,大国仅有七八个。终春秋之世,“弑君二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从而为战国七雄局面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春秋时期各项制度,如宗法、礼制、军制、刑法等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均或多或少地与政治上的权力下移现象有关。随着分封制的深入发展,诸侯之下的卿大夫阶层不可避免地膨胀起来。出现一批实力雄厚、影响很大的卿大夫,如鲁国的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郑国的七穆(罕氏、驷氏、国氏、良氏、游氏、丰氏、印氏),以及晋国的栾氏、郤氏、范氏、知氏、中行氏、韩氏、赵氏、魏氏,卫国的孙氏、宁氏,齐国的鲍氏、陈氏、国氏、高氏等。他们或为国君的子弟后裔,称为公族;或为与国君异姓的世卿世官,称为卿族。这些卿大夫往往“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国语·晋语》八),操持国柄,“政在家门”(《左传》昭公三年),甚至敢于“弑君”、“出君”。前 573 年晋栾书、中行偃弑晋厉公,前 559 年卫孙林父、宁殖等驱逐卫献公,前 548 年齐崔杼弑齐庄公,前 517 年鲁季孙氏驱逐鲁昭

公，前 481 年齐陈恒弑齐简公等等，这类事件屡有发生，以致使当时的人们有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观念。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春秋时期的政治也在不断变化，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思想家，这一切都预告着社会巨大变革时代的来临，标志着春秋时期对于古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晁福林）

春秋五霸

(Chunqiu wuba) 春秋时期五位称为霸主的诸侯。按《荀子·王霸》说，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即所谓的“五霸”。此外秦穆公、宋襄公、晋悼公、楚灵王、齐景公、吴王夫差等也或曾被称许为霸主。齐桓公为五霸之首。他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实行士、农、工、商分居，“士之子恒为士……”，职业世代相传，既保证社会生产，也避免人们因谋职业而使社会动荡不安。在齐国强大实力的影响下，齐桓公多次主持会盟，并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所有的会盟中，齐桓公只以诸侯之长的身份出现，对周天子在礼仪上毕恭毕敬。齐桓公攘夷主要表现在救邢、封卫、救燕、伐楚等方面。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可见，齐桓公称霸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可与齐桓公相提并论的霸主是晋文公。他在晋国争取各种办法发展生产，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君臣同心整顿内政。前632年，晋文公率晋、宋、齐、秦四国联军与楚、陈、蔡三国的军队在城濮大战，击败楚军，有力地遏制楚国北进的势头，晋文公遂成为华夏霸主。楚庄王时，由于晋的衰落，所以楚的势力相对强大起来。前608年，楚庄王攻陈、宋。晋则攻亲楚的郑国，楚军救郑，大败晋军。次年楚又伐宋获胜。前606年楚庄王率军到周王室边界炫耀力量，并询问象征王权的九鼎的大小轻重，显示出很强的称霸欲望。春秋后期，吴越日益强盛。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帮助下，继位后不久即灭掉徐国，并采取以逸待劳的办法骚扰楚国，使楚军疲于奔命。前506年，阖闾率吴、蔡、唐等国军队大举进攻楚国，接连获胜，长驱进入楚国的郢都。越王勾践曾被吴王夫差俘获，为吴臣三年。他卧薪尝胆，整饬内政，征集兵员，并采取结齐、亲楚、附晋的外交方针。前482年，趁吴王北上会盟之机，勾践率大军攻入吴都，迫使吴求和并于前473年灭掉吴国。

（晁福林）

华夏和夷狄

(huaxia he yidi)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族自称为“华”、为“夏”，并将诸少数民族称为“蛮夷戎狄”，简称之为“夷狄”。战国以前，戎狄蛮夷实际上没有区别，此后才把这些称呼分配到四个不同的方向，称为东夷、北狄、南蛮、西戎。春秋时期诸侯国所谓的“攘夷”，实际上包括了整个的戎狄蛮夷。华夏是以夏、商、周族为主干的中原诸族。华夏集团和夷狄集团在许多方面有重大区别。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华夏以农业经济为主，夷狄则多是迁徙无常的游牧部族。在日常生活服饰上，华夏族人多数是头著冠、发著笄，衣右衽；夷狄族人服饰样式则丰富多采，如发式，居于北方的戎狄是“被（披）发”，吴越地区的土著是“断发”，西南诸族是“盘发”或“编发”。诸族的服装样式也多不相同。在语言上，华夏与夷狄的差别更大，有些少数民族与华夏交往，必须“重译而至”（《淮南子·泰族训》）。在风俗习惯上两者也多不相同，如夷狄有火葬之俗，与华夏的土葬不同。一般来说，在春秋时代，华夏诸族往往和夷狄交错杂居。夷狄对华夏族的诸侯国构成过很大威胁。夷狄攻打周王朝，“伐京师，入王城”（《左传》僖公十一年），还曾攻灭邢、卫、温等国，甚至侵伐晋、郑、齐、鲁等较大的国家。春秋前期，为了消除夷狄给华夏诸侯国造成的很大影响，霸主们往往提出攘夷。齐桓公为救燕国，曾经起兵讨伐山戎，一直打到孤竹国。狄人攻灭卫国的时候，齐桓公曾派 300 辆兵车、3000 名甲士替新立的卫国守卫。狄人攻灭邢国，齐桓公出兵救邢，并将邢迁移到安全地带。经过长期的交往、斗争，夷狄逐渐和华夏融合。春秋中、后期，有些夷狄小国逐渐被华夏诸侯国兼并，加速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

（晁福林）

初税亩

(chushuimu) 春秋时期鲁国所进行的对于田税制度的改革。前 594 年，鲁国开始实行税亩制。自西周以来国君和贵族对民众的剥削主要采取“藉”法，即征发民力以耕种国君和贵族的土地。这是一种力役地租的剥削形式。鲁宣公十五年（前 594），鲁国实行“税亩”制，实际上是停止采用藉法，并按亩征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税亩制度的实行，标志着从力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变。这种转变应当说是土地制度变化的反映。井田制从周初发展到春秋中期，已经由于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衰落。这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民众用怠工的办法来对付贵族们的剥削。《诗经·甫田》说：公田上的草长得很茂盛。这证明农民不肯在公田上出力耘草。由此可见，这种力役地租的剥削方式对贵族已无多大好处，此时改为税亩制，实行实物地租形式的新的剥削方法，是势在必行的。

（晁福林）

五经

(Wujing) 儒家的五种经典，指《易》、《尚书》、《诗》、《礼》、《春秋》。汉武帝建元五年（前 136）设立五经博士，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易》又称《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 5000 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易》的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称“十翼”，是东周时人所写的对于《易》经部分的解释。《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其后分为夏、商、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书。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 28 篇，教授于齐鲁之间。这部《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此外，汉代还有《古文尚书》，据说比《今文尚书》多出 16 篇。《诗》，又称《诗经》。汉初传授《诗》的有齐、鲁、韩三家，都立于学官。毛公亦传，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因此《诗》又称《毛诗》。《诗》今存 305 篇，各篇时代早晚不一，早至周初，晚至春秋中期。《诗》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了解先秦社会风貌的珍贵材料。《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汉世所传有戴德本、戴圣本和刘向《别录》本。《礼记》是西汉时人所编定的儒家关于礼的阐释，分为《小戴礼》和《大戴礼》两种，戴圣所编 49 篇并由郑玄作注的为《小戴礼》，戴德所编 85 篇称为《大戴礼》。《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 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共记 242 年间史事。虽然文句简短，但对当时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后人为其作注解，流传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晁福林）

老子和《道德经》

(laozi he《daodejing》)老子是我国上古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担任过周守藏室的史官。相传他撰著《道德经》五千言，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关于礼的问题。《道德经》又称《老子》，分为道经和德经上下两篇。一般认为，《道德经》是战国时代成书的，和春秋时期的老子其人并不在同一个时代。《道德经》对于事物之间的矛盾对立有了广泛而深刻的认识，书中曾举出许多矛盾的对立面的事例，如有无、生死、祸福、巧拙、善恶、得失等。这些矛盾的对立面不仅相互依存，而且相生、相成并互相转化，如谓“有无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又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认识具有着朴素的辩证观点。《道德经》认为天下万物的本体是“道”。“道”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它没有意志、没有具体形状、无声无臭又无时无地而不存在。所以说，《道德经》的“道”是关于万物本体的学说。《道德经》的政治主张是回复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政治理想显然带有许多消极落后的成分。

(晁福林)

孔子

(Kongzi) 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名丘，字仲尼。为殷商苗裔，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贵族，无辜被华父督杀害。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出奔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即孔子之父。孔子自称“吾少也贱”（《论语·子罕》），曾任主管委积仓库的小吏，也作过管理畜牧牛羊的“乘田”。后作过鲁中都宰、司寇等官，因不得实行自己的远大志向而离开鲁国，率领弟子们周游卫、宋、郑、陈、蔡诸国。晚年返回鲁国，专心从事著述和教育事业，卒年73岁。

孔子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学问家。他对于古代文献和礼仪十分熟悉，能讲出夏代的礼，更能讲出殷代的礼。他整理过《诗经》的雅、颂部分。他反复研读《易》，以至韦编三绝。他对于同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也很了解。这些，对于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有很大作用。

“仁”的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中对仁有许多解释，他说“仁者爱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在对人评价时，他不轻许人以“仁”，对自己的弟子仅说过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然而，他盛赞管仲，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是因为管仲帮助齐桓公安定了天下，体现了忠君、报国、安民思想。在“仁”的思想影响之下，孔子主张国家政治应当实行德治，而实行德治的具体办法就是要做到礼让和正名。亲疏、尊卑、长幼、男女有别是礼让的根本内容。只有依据这些原则才可以制定出许多具体礼仪，用以区别人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确定个人应当受到的约束。齐景公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既是礼，又是正名的要求。孔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正常合理的社会秩序。孔子所说的“仁”尽管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但归根到底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所以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要做到“仁”，必须有爱和同情心。爱父母叫做孝，爱兄长为悌，爱君主为忠。所有的爱和同情心都要由礼约束，必须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的人生观是积极向上的，他对于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对于贫穷的生活不厌倦悲观，而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立志匡正天下，热心救世，要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孔子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尽管到处碰壁，但却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当时的人评论孔子，说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然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坚韧不拔的卓绝精神。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教育学生的时候总是诲人不倦，并对学生非常了解，实施因材施教。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此孔子的学生里有不少出身贫贱的人。他最得意的学生颜渊，居陋巷，过着箪食瓢饮的困苦生活。另一个弟子公西华被派到齐国为使者，家中贫困，还需要孔子周济粮食。樊迟曾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和菜蔬的知识……。孔子兴办了当时规模最大的私学，对于发展教育、普及文化知识于下层民众，起了极大的作用。他提倡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在教学内容、方法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后人称孔子为万世师表，表现了人们对他的景仰。

(晁福林)

曲阜孔庙

(Qufu kongmiao) 位于曲阜南城墙内，与孔府毗邻。原为孔子住宅，孔子死后第二年（前 480），鲁哀公为祭祀孔子，将其故宅改建庙院。以便“岁时奉祀”。自西汉以来，历代的封建帝王对孔庙不断重修和扩建，形成了一座宫殿式的庞大的古建筑群。孔庙南北长 1 公里多，占地 327 亩，前后九进院落，殿堂亭庑共有 466 间。孔庙的第一道大门为棂星门。相传棂星为天上文星，含有人才辈出，为国所用的意思。孔庙的第二门是圣时门。此门名称是取孟子称颂孔子为“圣之时者也”的语义。向前过壁水桥就到第三门为弘道门，取《论语·卫灵公》“人能弘道”之义。过弘道门向前为第四道门——大中门，原为孔庙的第一道门。过大中门是第五道门——同文门，该门为独立性建筑，两侧没有墙垣连属。再往前为奎文阁，原是藏书楼，为历代帝王赐书和孔庙藏书之地。接着是十三御碑亭，亭内存各种碑 53 座。碑亭之后为孔庙最后一道大门大成门，门名取孟子“孔子谓集大成也者”的语意。过此门是杏坛。相传是孔子晚年讲学的地方。此后是孔庙的主体建筑大成殿。

{ewc MVIMAGE, MVIMAGE, !99900320_0041-1.bmp}

大成殿是祭祀孔子的正殿，唐代称文宣王殿，宋以后尊孔信儒之风大盛，宋徽宗赵佶奉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更名大成殿，并御书匾额。经明清两代重修，大成殿已成现在之规模。大成殿共有 9 大开间，殿高 32 米，东西宽 54 米，进深 34 米，殿下筑有大型的须弥座石台基，该殿占地面积 1836 平方米。大殿重檐九脊，斗拱交错，黄瓦朱甍。大殿檐下四周均以石柱环绕，前檐的十根石柱上深浮雕二龙戏珠，下为江海波涛；两山及后檐有八棱形石柱十八根，并浅浮雕团龙祥云。全部石柱上共雕有一千二百多条龙，庄重雄伟，气势磅礴。殿内上方悬挂着“至圣先师”横匾，匾下为一雕龙贴金的巨龕，供奉孔子的塑像，两旁为四配、十二哲塑像。大殿东西两旁现已辟为汉魏六朝碑刻，《玉虹楼法帖》石刻和汉画像石刻陈列室。大成殿后面是寝殿、圣迹殿，是为了祭祀孔子夫人和保存《圣迹图》及历代画家所绘孔子像石刻所建。

（吕瑞珍）

战国

（Zhanguo 前 475—前 221）我国古代史上春秋之后至秦以前的一个历史时代。时魏、赵、韩、齐、楚、秦、燕为代表的诸大国之间进行着激烈、频繁的大规模战争，一直到前 221 年秦始皇兼并六国才告结束。

战国初期，除了魏、赵、韩、齐、楚、秦、燕所谓“七雄”之外，还有周、鲁、卫、宋、滕、邹、中山、越等国，四周还有匈奴、林胡、东胡、百越、巴、蜀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到了战国中、后期，这些中小国家纷纷为七雄兼并，并为今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七雄中的齐国东滨大海，南接泰山而与鲁、宋为邻，西邻赵，北邻燕，主要占有今山东省北部和河北省的东南部。楚国是七雄中地域最广的国家。它东到大海；南有苍梧而与百越为邻；西至巴、黔而与秦为邻；北达中原而与韩、魏、宋、齐相接。北方的燕国主要在今河北省北部、山西省东北部以及辽宁、吉林两省的部分地区。赵国东与齐为邻，南以漳河与魏为界，西以黄河与秦相望，北以易水与燕为界。它占有今冀、陕、晋、鲁、豫等省的部分地区。夹在魏与秦、楚之间的韩国，主要区域在晋东南和豫中、豫西一带。魏国与齐、楚、秦、韩等国为邻，主要在今晋南、豫北一带，也及于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秦国东以黄河为界与三晋相邻，南至巴蜀与楚相邻，西接西戎和匈奴诸部，主要在今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青海、宁夏等省的部分地区。

战国前期，各大国皆忙于内部的整顿与改革，所以相互之间出现了基本平衡和稳定的局面。魏、赵、韩三国于前 403 年正式被册封为诸侯，齐国的田氏贵族于前 391 年将姜姓的国君齐康公放逐到海上，只留下一城之地为其食邑。魏国在文侯时期任用李悝实行“尽地力之教”的政策，楚国任用吴起进行改革，秦国则实行著名的商鞅变法。这些情况都表明，各国均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形势，积极清除旧势力的影响，努力发展新兴势力的优势地位。各国的整顿和变革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诸大国之间进行频繁的外交、军事斗争以称雄，主要集中在战国中期。大批纵横家活跃在各国的政治舞台上，“合纵”与“连横”的斗争十分激烈而复杂。各国之间所进行的战争规模巨大，连月经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原来的中小国家先后被七雄吞并，而七雄当中有些国家又呈现出颓势，所以在后一个阶段只剩下秦、齐、楚、魏四国可以称雄。前 288 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表明只有西方的秦国和东方的齐国才能并峙称雄。

战国后期的五六十年间，秦国雄踞于历史舞台的中心。穰侯魏冉为秦定出“蚕食”六国之策，范雎则献“远交近攻”之计，在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之下，秦呈现出咄咄逼人之势。经过长平之战以后，秦吞并六国的速度加快，终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翦灭六国，完成了统一。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革并取得辉煌成绩的时期。战国时期群星璀璨，不仅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有许多杰出的哲学家、理论家、文学家进行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使我国古代文化呈现着空前的繁荣局面。

（晁福林）

战国的变法

(zhangguo de bianfa) 战国时期各国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

最早是魏文侯当政时任用李悝所进行的变法。李悝为魏相，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说苑·政理》）的原则，废除官爵世袭制。为发掘土地潜力，增加官府的田租收入，又推行“尽地力之教”，要求农民“治田勤谨”（《汉书·食货志》）以求增加粮食产量。魏官府实行“平余法”，以防止“余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由官府贮藏粮食以平稳粮价。李悝还作《法经》六篇，其中以“盗法”、“贼法”为首，目的在于防范对于私有财产的侵犯。魏文侯还曾派吴起改革魏国的军事制度，严格挑选、训练和考核士兵。这些变法措施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最强盛的国家。

楚悼王时，在魏国受到排挤而奔楚的吴起被任命为令尹，于前382年开始主持楚国的变法。吴起规定，凡是封君传到第三代的就收回爵禄，并把一些旧贵族迁移到边远荒凉地区。精简冗官并削减过高的俸禄，把节省的经费用于军队。又整顿吏治，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不计个人毁誉。吴起变法后，楚国力迅速强盛，但由于楚悼王死后吴起被旧贵族杀害，所以楚的变法没有能够进行到底。

赵烈侯在位时，赵国也进行改革。赵烈侯采纳牛畜的建议，倡导“仁义”，实行“王道”，又采纳徐越和荀欣的建议，实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的用人政策，在财政上则“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史记·赵世家》），以增强赵的国力。

前355年，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相，主持韩国的改革，建立“循功劳，视次第”（《战国策·韩策》）的制度，论功行赏，鼓励新兴势力。申不害特别强调“术”的作用。他主张国君“独断”，操纵最高权力以驾驭臣下。据说申不害相韩15年，“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史记·韩世家》）

齐威王的改革主要在整顿吏治方面。他赏赐有政绩的即墨大夫以万家食邑，并烹杀了贿赂饰非、政绩恶劣的阿大夫。后来，齐威王任命邹忌为相，谨修法律，督察奸吏，招抚流民，使得齐国大治。

前316年燕王哙实行禅让，把君位让给燕相子之，并把300石俸禄以上官员的官印全部收回，另由子之任命。燕王哙以“苦身以忧民”，“勤身而忧世”（《韩非子·说难》）著称，他行禅让的目的是为了赋予子之以全权，让子之改革燕国政治。但是，此举遭到旧贵族的强烈的反对，在齐的进攻下燕几乎亡国，只是在燕昭王继位以后，燕国才强盛起来。

战国变法的最成功的典型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从前359年至前350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推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变法。变法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有：1. “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重新设置田界，不许私自移动，在实际上废除了原有的井田制度。2. 建立军功爵制度以奖励军功。在战争中斩获敌人甲士首级1颗的赏爵1级、田1顷、宅地9亩、庶子1人。

杀敌越多，赏赐越丰厚。还规定国君的宗族若没有军功便不能列入公族属籍，不能享受特权。3. 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4. 推行县制和什伍连坐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各家若不告发

则都有罪），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系统管理和控制。5. 颁布标准的度量衡器以统一度量衡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商鞅时颁布的标准尺 1 尺约合今 0.23 米，标准量器 1 升约合今 0.2 公升。商鞅的这些变法措施适应当时秦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获得了很大成功。后来商鞅虽然被车裂而死，但“秦法未败”（《韩非子·定法》），变法成果还是得以保存下来。

（晁福林）

合纵连横

(hezong lianheng) 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与合纵政策针锋相对的是连横。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

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与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合纵的目的在于联合许多弱国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的目的在于事奉一个强国以为靠山从而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当时的最著名的纵横家除了苏秦、张仪之外，还有公孙衍。公孙衍曾于前 318 年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攻秦。时人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后来苏秦和赵的奉阳君李兑也曾于前 287 年联合五国攻秦，使秦被迫废除帝号，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张仪在秦推行的连横策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使秦惠王“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史记·李斯列传》），真正达到了通过连横政策的推行而兼并土地的目的。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国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历史作用应当引起人们重视。

（晁福林）

围魏救赵

(Wei wei jiu zhao) 战国时期魏齐两国在桂陵所进行的一场著名的战争。前 354 年，赵国攻打卫国，迫使卫不得不入朝于赵。卫原臣服于魏，魏自恃其为强国，不能容忍卫改换门庭，便起兵伐赵，率宋、卫联军包围赵都邯郸。前 353 年，赵求救于齐。齐以田忌为将，孙臆为军师，率齐军救援。孙臆分析形势后认为，魏攻赵，精锐必在外，所以内部空虚，如果齐军疾攻魏都大梁，则魏军必回救大梁，这样便可以“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史记·孙子列传》)。这个计划很受齐将田忌赞赏并被采纳。当时魏军主将庞涓率 8 万魏军将围邯郸，田忌也率 8 万齐军往救。依照孙臆的意见，齐军一方面向南进攻处于宋卫之间的战略要地平陵，另一方面准备直捣大梁。在行军途中，孙臆故意“示之寡”(《孙臆兵法·擒庞涓》)，给人以兵力单薄的感觉。这样，庞涓在孙臆的诱使下震怒而轻敌，率魏军放弃辎重，用急行军，日夜兼程返归大梁。途中，待庞涓率军到达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的时候，孙臆率齐军以逸待劳，加以邀击，擒获庞涓，取得大胜。这场战争中，齐军采取了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等正确的策略，大破魏军。尽管齐军进攻平陵的两个都大夫的军队在行军路上被打败，但齐军仍然按照既定的战略目标迅速往击魏都大梁，而不为一时一地的失利所动摇，所以还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创造了“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

(晁福林)

马陵之战

(Maling zhizhan) 战国时期魏、齐两国在马陵所进行的一场战争。前 342 年，魏攻韩，韩向齐求救。齐威王听从孙臧的建议，一方面对韩表示救援的意向，以坚定韩抗魏的决心而不致屈服投降，另一方面却不马上发齐军救援，意欲消耗魏、韩两国的实力。前 341 年，魏韩双方交战俱已精疲力尽，是时齐威王才派田忌、田婴为将军，孙臧为军师，率齐军伐魏救韩。魏惠王闻讯，遂派太子申和桂陵之战被俘而获释的庞涓为将军，率 10 万魏军前往迎击。途中，知齐军已过往而西，魏军遂奋力追赶。孙臧分析双方形势并献计策于田忌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史记·孙子列传》）通过逐日减少营地军灶数目的办法，制造齐军已经大量逃亡的假象。魏军中孙臧之计，庞涓乃放弃步兵，只率轻锐骑兵日夜猛追。孙臧计其追赶速度，知日暮时当追至马陵（今山东省范县东南），遂在狭窄险阻的马陵道旁埋伏重兵，并斫去大树之皮书写“庞涓死于此树下”字样。日暮时，庞涓果然率轻骑追至此处，遂举火观看树上文字，两旁埋伏的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奔逃，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而死。马陵之战的结果是魏军主力被全歼，魏太子申被俘获，主将庞涓自杀。这是魏国前所未有的惨败。施行减灶诱敌之计的孙臧“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晁福林）

长平之战

(Changping zhizhan) 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在长平所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前 262 年，攻取韩的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县），把韩的上党郡和韩的本土完全隔绝。韩国惧怕强秦，欲献上党郡以向秦求和，但上党郡守不肯服从，韩桓惠王遂派冯亭去上党接任为新的郡守。然而，冯亭到任以后也不愿降秦，反而自作主张把韩的上党郡 17 县献给邻近的赵国。赵封冯亭为华阳君，并派廉颇率大军驻守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防备秦军。秦派白起、王龁率大军进攻长平。廉颇审时度势，采取了筑垒固守、以逸待劳的正确策略，不与秦军正面交战。秦赵两军在长平相持三年，不分胜负。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的反间之计，听信谗言而起用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赵括是赵国名将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虽然善言兵法，但却只能空谈阔论而无实际才能，所以蔺相如说赵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前 260 年 7 月，赵括至长平前线，一改廉颇的策略而大举出兵攻秦。秦将白起纵奇兵，佯作败状，但却断绝了赵军粮道，分割赵军为两部，将其围困 40 余日。秦昭王听到消息，亲赴河内，赐民爵一级，悉发 15 岁以上的壮丁至长平。赵军饥饿乏食，赵括亲自带兵搏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40 多万人被俘。白起释放 240 个年幼的赵军战俘，余者全被坑杀。这场战争，赵军前后死亡 45 万人之巨，秦军损失也很重。长平之战使赵国一蹶不振，其他诸国闻风丧胆，是秦统一六国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胜利。

（晁福林）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43-1.bmp}

牛耕和铁农具

(niugeng he tienongju)早在商代已有牛耕，甲骨文中“犁”字。春秋时，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国语·晋语》说“夫范、中行氏……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当时有些人以牛或牛耕作名字，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晋国有个力士叫牛子耕。目前发现最早的铁犁具是战国时期的。河北易县、河南辉县及陕西等地均发现有V形战国铁犁铧。根据各地出土的大量汉代犁铧以及山西、山东、江苏、陕西、内蒙等地发现的汉代牛耕图可以知道汉代已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广牛耕，而且耕犁基本定型。犁由犁梢（犁柄）、犁床、犁辕、犁箭、犁铧和横杠（犁衡）六部分组成，总的讲还比较笨重，特别是直长辕，影响耕田时转向等动作，再者，虽可用犁箭上下移动，影响犁辕与犁床之间的夹角张大或缩小，调节耕地的深浅，但还不够简便和规范。这些缺陷待唐代出现曲辕犁后便得到解决。当时盛行二牛抬杠式的犁耕，即两头牛抬着犁衡，挽拉一张长辕犁，一人扶犁并驱赶耕牛。

除了犁以外，历史上主要的铁农具还有整地用的耜，农田中用它开排水沟，也可用于深耕。耨（镢），有的地方称犂，战国、秦汉使用普遍，适用于刨地翻土。铁搭（铁耙），唐、宋以后出现，长江下游最为普遍，用它翻地比牛耕更适于粘重的水稻田。中耕除草时的农具主要有铲，用来除草、松土，操作时两手向前推。锄，同铲一样，但操作时向后削，用锄松土、间苗、培土更适宜。古书上“耨”、“耨”等农具都属于锄一类，形制上和锄大同小异。在考古发掘中，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铁铲、铁锄。收割的主要农具有镰。在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已有石镰，最早的铁镰是战国时期的。钹镰，使用时需双手执之，可以说是一种大型镰刀，适用于收割撒播的麦子和牧草等。

（孙彦贞）

都江堰

(Dujiangyan) 都江堰位于今四川省灌县西北的岷江中游。历史上岷江上游因流经川北山区,水流湍急,挟带大量泥沙,到达灌县后,就进入了成都平原,水流突然变缓,泥沙在灌县地带壅积,河床垫高,极易泛滥成灾。为战胜水患,秦国蜀郡守李冰(前 256—前 251 在任)征发民工,主持兴修了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他们在灌县县城附近新建一条内江河道,把流入灌县附近的岷江江水分出部分流入内江,而岷江的原河道叫外江,当洪水泛滥时,内江的分流作用可减轻外江负担,免除外江水域的水患;同时,在外江新开辟灌溉河渠,兼具灌溉和排洪作用。内江系统也开辟许多河流渠道,既可灌溉也可通航。在这一大型工程中,有几项关键设施,一是修筑“百丈堤”。这是全部工程的起点,目的是保护河岸,不被上游带下来的石块冲毁。二是“鱼嘴”工程,这是都江堰中最重要的部分。在离百丈堤不远的岷江中心,用大竹笼装卵石,堆砌成鱼嘴形状的分水堤,把浩浩荡荡的岷江一劈为二,从这里开始江水分别流入内江和外江。三是沿内江河岸的金刚堤修建“飞沙堰”,它起堤岸作用,但并不很高,如果内江江水超过需要而可能引起水灾时,一部分水流可越过飞沙堰流入外江,起到确保内江灌溉系统安全作用。四是在灌县附近的离堆地方,凿开山道,而成“宝瓶口”,内江流经宝瓶口而下,分出大小干支渠,穿入成都平原。在治水中,人们还总结出一些经验性格言,如“深淘滩,低作堰”。即为防止沙砾卵石充填河底,每年利用冬春枯水季节进行淘挖。淘内江时,截断流入内江的水,使之全部流入外江,然后又以同样方法淘挖外江。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44-1.bmp}

都江堰工程经历了 2200 多年,经历代维修整治,灌溉面积最大时曾达 300 多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古今闻名的“天府之国”。虽然历代不断开辟新的干支渠,但它的基本规模和主要设施,当时就已具备。

(孙彦贞)

郑国渠

(Zhengguoqu) 前 246 年 (秦王政元年) 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 并由郑国主持兴修的大型灌溉渠, 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 长达 300 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 流至礼泉就进入关中平原。平原东西数百里, 南北数十里。平原地形特点是西北略高, 东南略低。郑国渠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 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 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 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地带, 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 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 可灌田四万余顷。郑国渠开凿以来, 由于泥沙淤积, 干渠首部逐渐填高, 水流不能入渠, 历代以来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处, 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

(孙彦贞)

麻纺织

(mafanzhi)我国最早采用的纺织原料是麻、葛纤维，这一历史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在古文献中称做“布”的并不是指现在的棉织品，而主要是指麻、苎、葛等植物纤维织品。《小尔雅》记：“麻纒葛曰布。”

1972年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了三块珍贵的葛布残片，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了几块苎麻布残片。经分析可看到四五千年前我国葛麻纺织技术已有了相当水平。战国时期精细的苎麻布已和丝绸比美，贵族常用它作为互相馈赠的贵重礼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精细麻布，已接近今天的白府绸。由于葛对气候和土质的要求较高，种植范围又只限于一些山区。苎麻的加工比较麻烦，细麻与丝绸价格昂贵，只有贵族享用，平民穿不起，因此在很长时期内，大麻粗衣一直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大众的主要衣着。宋元以来，随着棉花的广泛种植和利用，逐步取代了麻纤维作为大宗衣料的地位。但清光绪年间(1875年)美国还专门从我国浙江移植大麻到肯塔基州，成为麻纺织工业原料之一。而苎麻作为纺织原料，至今仍旧驰名中外，用它织成的夏布也远销世界各地。

(孙彦贞)

简牍

(jiandu) 战国以后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单个的竹片叫“简”(或称牒),单个的木片叫版,1尺长的长方形版叫牍,也叫尺牍。比较狭的版也叫木简。又小又薄的版叫“札”。将“简”编连而成的整体叫“策”或“编”,将版牍捆在一起的叫函。制作竹简要先用火烤去汁液,以防虫蛀。烤制过程称为“杀青”或“汗青”。后来汗青成了史册的代称。从西汉起视用途不同而对简的长度作了一些规定,如最大的简长24寸(汉尺),是抄写易经等重要著作的,即中国古代说的“典”。河南汲县、甘肃武威出土的《仪礼》等著作便是24寸长的简。皇帝封诸侯王的简长2尺,一般的著作用1尺长的简。考古发掘出土的汉简多长23~27厘米。制版多用柳树、杨树等比较软的木材。在通常情况下,著书立说,传抄经书典籍用竹简,因此简册成为书籍的代称,版牍多用于公文、信札之类。一般只在简的一面写文字,而且只写一行,1枚简多的写有100多字,少的仅有几个字。编连简的绳子叫“编”,多用麻绳,也有用丝的称丝编,熟牛皮绳的叫韦编。依简的长短,编捆的道数也不同,一般编上、下两道,也有上、中、下三道,个别长简还有用五道的。存放编连成策的简,往往以最后一枚竹简为轴心,将有字的一面向里,卷成捆状,把首简卷在最外面(现在书籍封面上印书名即由此演变而来),然后放在用布帛做的套子里,这种包书的套称“帙”,也叫“书衣”。因此后来“卷帙”也泛指书籍。简牍上的字大多用墨书写,也有用朱笔书写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有简牍出土,最早的是战国时期的,如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有楚简,内容似为论述《祭仪》,从已出土的简牍看,内容十分丰富,有经书、子书、历谱、公文、律令、帐簿、遗策等。东晋末年由于纸的推广使用,简牍逐渐被代替。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45-1.bmp}

(齐吉祥)

曾侯乙墓编钟

(zenghouyimubianzhong) 1978 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曾侯乙墓出土。共 64 件，其中钮钟 19 件，甬钟 45 件。此外另有楚惠王五十六年（前 433）制铸钟一件。最大一件甬钟通高 154.4 厘米，重 203.6 公斤。编钟以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排，分别悬挂在钟架上。钟架为铜木结构，分上、中、下三层，呈曲尺形。钮钟全部悬挂在上层，甬钟挂在中、下层，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45-2.bmp}

铸钟挂在下层右面甬钟中间。木质梁架上满饰黑漆彩绘花纹，两端都套有浮雕和透雕的青铜套，起着装饰和加固的作用。钟架十分坚固，承受重达 2500 余公斤的全套编钟，历时 2000 多年，出土时仍矗立如故。编钟上都有错金篆体铭文，其内容除甬钟正面钲部均为“曾侯乙”字样外，其余均为有关音乐方面的记载。钮钟的铭文为乐律名和阶名。甬钟正面隧、鼓部位（即钟口沿上部正中和两角部位）的铭文为阶名，如宫、商、角、徵、羽等，反面各部位铭文可以连续，记载了曾国与楚、晋、齐、周等地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每枚能发两音，即隧部和鼓部音，实测音响与铭文标记的音相符。全套编钟音域十分宽广，共有 5 个八度，而且有比较完备的变化音，因此，能演奏中外各种曲调，能进行独奏、合奏、伴奏。演奏时由 3 个乐工双手各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 3 个组的甬钟，另有 2 名乐工，各执一根大木棒，分别撞击下层低音甬钟，配以合声，起烘托气氛的作用。曾侯乙编钟，其枚数之多，钟体之大，乐律资料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实属空前，举世瞩目。

（冀莲芝）

嵌错攻战宴乐纹铜壶

(qiancuo gongzhan yanlewentonghu) 酒器，1965 年四川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通高 40、口径 13.4、腹径 26.5 厘米。壶通体嵌错有丰富多采的图象，以 3 条带纹分为四层画面。以壶肩两耳为左右，壶前后两面图象是对称的。第一、二、三层图象又分别分为左右两组，共有 6 种，包括竞射、采桑、宴乐、狩猎、攻城和水战等场面。第一层左面和第二层右面上部图象为竞射场面。在右边建筑物旁设箭靶，参加竞射者皆着长裳，其中一个正在瞄准，引弓待发，一个刚刚发弦，箭在空中飞过。后面一人，一手持弓，一手抽矢，作接射状。下面五人，有的回首召唤，有的持弓挟矢，作准备竞射状，姿态极为生动。第一层右面一组为采桑图象。上面有桑树两株，枝叶茂盛。树上有人用篮采桑，下边众人用篮运桑，另有一人歌舞助乐，再现了当时采桑的情景。第二层左边一组为宴乐场面。一高大宽阔建筑物内，上层人皆腰悬短剑，一人凭几而坐，身后有执长柄扇的侍者，面前有两人举觥进献。右面有四个佩剑者执矛作舞。下层有钟、磬、建鼓、笙、箫等演奏。第三层右面一组为水陆交战图象。人皆着齐膝战袍，有帟。分上、下两层。上层中间，左竖一旌旗，右竖一悬有羽旌的钩兵，表示两军阵式分明。武士分别持矛、盾、剑、戟等，左边一人跽坐于地，双手各持一桴，鸣金（丁宁）击鼓，相对步战。下层为舟战图象，双方均佩短剑，呈用力摇桨冲击对方，两舟对战。从上下两层图象看，可能是陆地、水上相互配合的水陆交战。壶上六组图象生动地再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变革时期，耕战和社会风貌。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46-1.bmp}

(冀莲芝)

诸子百家

(Zhuzibaijia)从春秋中期开始，“学在官府”的局面被逐渐打破，聚徒讲学和著书立说之风开始形成，到战国时期，此风蔚然，为诸子百家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春秋晚期，鲁国的孔子聚徒讲习六艺，后发展成为儒家学派。这个时期，郑国的邓析也聚徒讲授诉讼和法律，传播早期法家的学说。相传，道家学派的鼻祖——老子这时任周守藏室的史官，传播关于“道德”的学问，孔子还曾向他请教过关于礼的问题。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在聚徒讲学的基础上开始组织起一个墨家集团，他们有严密的纪律，都服从最高领袖钜子的指挥。由于有系统而严密的组织，所以墨子的学说得以广泛传播，以至“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墨家和儒家一样也是当时的“显学”。

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巨大变革，战国时代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便纷纷著书立说，阐述哲理、议论政治，并从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开展思想斗争，“百家争鸣”的局面遂由此而形成。西汉初期的司马谈曾把所谓“诸子百家”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曾经总括诸子为十家：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家。虽称十家，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司马谈所说的六家。

儒家发展迅速。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到了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儒学大师便是孟子和荀子。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他的学说主张效法先王和实行“王道”、“仁政”，其学说的出发点是性善论。荀子曾在稷下学宫讲学，并到过不少国家，还入秦考察了秦国的政治。荀子学说中虽然有某些法家思想因素，但其主要内容则属于儒家。荀子极力宣扬礼治，主张用仁义和王道来完成统一。《荀子·天论》篇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和“天行有常”的思想。其学说的出发点是性恶论。

道家鼻祖老子是春秋时人，但《老子》一书则是战国时编撰而成的。这部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对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派有很大影响。齐国稷下的学宫里有许多道家的著名人物，如宋钐、尹文、田骈、环渊、接子等。然而影响最大的战国时期的道家代表人物则是宋国的庄子。庄子倡导相对主义的理论，认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为了逃避现实，庄子还追求绝对的精神自己。他的理论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战国时期比较早的法家的代表和著作是商鞅及《商君书》，申不害及《申子》，慎到及《慎子》。法家集大成的人物则是韩非子。韩非子，“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秦王政非常赞赏韩非的著作，曾慨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韩非列传》）韩非的学说提倡法、术、势兼用，鼓吹加强君主集权、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这些实际上是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的理论基础。

战国时期名家的主要代表是惠施和公孙龙。他们的学说以名辩见重于世。名家从名词概念和逻辑学的角度提出“坚白同异之辩”。惠施认为事物的大小、今昔、生死等对立概念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公孙龙的理论则以“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命题最出名。名家的理论对于古代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邹衍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学说以“深观阴阳消息”为出发点，提

出了五行相胜的历史发展公式，认为“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七略》）。

兵家的代表人物是吴起和孙臆。汉世有《吴起》48篇，今传世有《吴子》6篇。孙臆著作虽亡佚，但近年从银雀山汉墓竹简中得见《孙臆兵法》30篇，可见当时兵家的主要理论。

（晁福林）

屈原和楚辞

(quyuan he chuci)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及其创作的楚辞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屈原名平(前339—前278),出身于楚国宗室贵族,“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曾任楚国左徒之职,与楚王商议国事,发布政令。他主张改革楚国政治,制定新的法令,选拔贤能者担任官吏。楚国旧贵族的代表人物对屈原进行诬陷攻讦,楚怀王幼子子兰、楚怀王宠姬郑袖、上官大夫等日进谗言,楚怀王不察忠奸而将屈原免职并流放。由于楚怀王不理睬屈原提出的联齐抗秦的正确外交方针,所以屡受张仪欺骗以至客死于秦。楚顷襄王继位以后,屈原再次被流放。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郢都,屈原在极度悲愤中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所创作的作品是楚辞中的代表作。西汉刘向曾辑屈原、宋玉、景差、贾谊、东方朔等人的骚体类文辞为一编,因都具有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风土色彩,故称楚辞。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25篇。这些作品强烈地表达了屈原忧国忧民的深厚情感和丰富无比的想象力。在《离骚》中诗人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和对未来的探索,表达了坚贞的爱国感情,抨击了黑暗腐朽势力。诗中运用了恰当的比喻,虚构出神游天上的幻境。鲁迅称赞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四)。《天问》是一篇瑰玮的史诗,全诗提出170多个问题,从自然现象、天地始生和神话一直问到古代的历史传说,表达了诗人对真理的顽强探索精神。屈原所作《九歌》共11篇,是经过重新加工的民间祭歌,创造了乘龙驾雾、来去飘忽的云中君、湘君、大司命、河伯等艺术形象。《九歌》里的《国殇》一篇描写了激烈战斗场面,颂扬了守疆将士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九章》是屈原在流放途中所作,表现了诗人思念郢都、忧思楚国的沉痛心情。屈原所作的楚辞是我国古代诗歌艺术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它打破了古代四言诗的传统格式,从楚地民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句式错落多变,音调铿锵有力,很适合表达复杂而多变的思想内容。屈原的作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财富,而且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晁福林)

先秦玉器

(xianqin yuqi) 我国利用玉的历史最迟可追溯到 7000 年前，河姆渡遗址就出土有玉管、玉珠等。早期主要用做装饰品及玉琮、玉璧类礼器，也将玉和石器一起加工制成实用器皿。商周时代，玉器的数量、品种及制作工艺有明显的提高。礼器类的玉器，已出现了“琮、璧、圭、璋、璜、琥”六种“瑞玉”，此外还有生产工具和戈、矛、斧等武器类玉器，出土时，均无使用痕迹，并不是实用之物。实用器皿有臼、杯、梳、耳勺、带钩等。有的青铜器配件上还装有玉质部件，成为珍贵的复合器。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了 700 多件玉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圆雕或浮雕的人像和各种动物，在造型上既有写实性，又有丰富的想象力，是这一时期玉器中的珍品。古代制玉的方法源于制作石器，完成一件玉制品，要经过锯截、琢磨、穿孔、雕刻和抛光等工序。《诗经》中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致概括了以上制玉的工艺过程。

(孙彦贞)

战国的科学技术

(zhanguo de kexue jishu) 战国时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进展。战国时期天文学的发展十分突出，当时出现了专门观测星辰运行的占星家，如齐国的甘德、楚国的唐昧、赵国的尹皋、魏国的石申等。甘德著有《天文星占》8卷，测定恒星118座，计510颗星。石申著有《天文》8卷，测定恒星138座，计810颗星。在医学方面，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气功疗法。《庄子·刻意》篇说：“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所提到的“道引”就是气功。扁鹊是战国时期的名医，他的诊治、疗法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素问》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医学著作，其中大部分写作于战国时期。这个时代的生理卫生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吕氏春秋》载有多篇讲究养生之道的论文，在云梦出土的《秦律》中还专门有防治传染病方面内容的条文。由于测量土地、计算租税和商业贸易的需要，战国时期的数学发展很快，除了一般的加、减、乘、除等运算之外，还能做分数的计算、面积和体积的精密计算，以及比例运算，《墨子·杂守篇》就有关于比例运算的例题。在对器物角度的测算方面，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曾列出各种角度的特定名称。《考工记》还具体应用了勾股弦定理进行运算，也有对于割圆和弧度的应用。后期墨家所作《墨经》在应用测算技术的基础上对几何学的许多原理和定义作了阐述。《考工记》记载了许多方面的声学知识，《吕氏春秋·音律》篇明确了12音律之间的关系以及细密的计算方法。这些与战国时代乐器制造技术的高度发展是有直接关系的。战国时代手工业制造中，力学知识的运用已很普及，如运用杠杆原理的天平和桔槔、用来起重的滑车、用水的浮力检查木材质量、运用滚动摩擦原理加工车轮等。战国时期已经发现磁石，并且制造出正南北、定方位的仪器——司南，还制造出能够取火于日的凹面青铜镜。冶炼业中对于铜、锡比例和火候已经有了很精细的认识。战国车辆和武器制造水平的进步是多种学科技术水平发展的结果。战国已有“连弩之车”，可以发射很大的连弩。《墨子》书中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突》、《备穴》等篇记载多种器械制造的知识，含容了许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公输般和墨子都是当时著名的器械制造专家。

(晁福林)

秦

(Qin 前 221—前 206)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前 221 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结束长期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封建大国。秦建立后，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南北广大地区；又派兵南开五岭，打败百越。其疆域东至大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

秦王嬴政在列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创立皇帝制度，自称“始皇帝”，宣布取消帝王死后以其行为为谥的制度，并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在战国时期秦国官制基础上，建立适应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新的政府机构。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军、监察大权，互不统属，最后决断权归皇帝一人。设分管中央各部门行政事务的机构：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等。地方实行郡县制。郡置守治民、尉典兵，监御史管监察。县设令或长，负责全县政务。郡县主要官吏，均由中央任免。秦朝这套中央集权统治机构的建立，确立了以后历代封建统治机构的基本形式。

为了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秦朝颁行严密繁苛的法律，下令收缴和销毁全国私人所藏兵器，迁徙六国豪富于咸阳和蜀地，拆除六国境内城防和山川险阻地区的军事设施，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直道。秦始皇还五次出巡六国故地和边境地区，刻石宣扬秦的威德。颁布“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法令，确认了土地私有制。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以上措施，对消除割据因素，促进地区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秦朝实行思想统制政策，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定挟书律，下令焚书。次年，又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坑杀方士和儒生 460 多人。这一“焚书坑儒”事件，毁掉大量典籍，在文化上造成了巨大损失。

秦始皇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封建王朝，把历史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但是，秦始皇的事业，是在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完成的，这就使秦朝的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的特色。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多次大规模的战争以及巨大的国防建设和土木建筑，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造成人民繁重的赋税、徭役负担，大大动摇了秦朝的统治基础。加之秦朝以严刑峻法镇压人民，使天下备受其苦。前 210 年秦始皇病死后，继位的秦二世胡亥进一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继续修建阿房宫，征发农民戍边，造成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广大农民困苦达于极点。前 209 年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前 206 年秦朝被推翻。秦朝的统治虽短，但却是一个极重要的朝代。秦朝建立的许多制度直接影响着以后各朝，而且中国开始成为一个伟大的统一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48-1.bmp}

秦始皇嬴政

(QinshihuangYingZheng 前 259—前 210) 秦王朝的建立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庄襄王之子。前 247 年，庄襄王死，13 岁的嬴政代立为秦王，国政为相国吕不韦和宦官嫪毐(lào i)所把持，统一事业没有显著进展。前 238 年，嬴政开始亲理国政。他首先平定了嫪毐的叛乱，免去了吕不韦的相职，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接着，又当机立断，作出了推进统一六国战争的重大决策，他任用尉繚、李斯等人，制定了统一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从前 230 年至前 221 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秦王嬴政为炫耀自己统一天下的功德，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创立了“皇帝”的尊号。随后，他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建立了由皇帝直接控制的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订和颁行统一的封建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在经济上，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又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废止战国时代的各国货币，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交通，又实行车同轨，墮毁原东方各国的城廓，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直达九原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在思想文化上，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为秦朝的专制主义统治制造神学根据。又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又坑杀儒生 460 余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还继续进行扩大统一的战争。他派蒙恬率军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同时修筑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又南定百越，设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秦始皇是很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但因刚愎自用，以刑杀为威，大臣多怕获罪，不敢指陈他的过失。他生活奢侈，大修豪华的宫殿和骊山墓。先后五次大规模巡游全国各地，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为求长生，召集方士求神仙，浪费大量财物。连年用兵，无休止的徭役和兵役，使广大人民痛苦不堪。他们纷纷起来反抗，揭开了反秦斗争的序幕。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七月，他出巡北还途中，病死于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葬于骊山。

(刘欣尚)

皇帝制度

(huangdi zhidu) 秦始皇创建的用以维护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尊严和权威的一项政治制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秦灭六国,秦王嬴政以为“王”的称号已经不足以显其尊贵,于是召集群臣议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问题。大臣们认为,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而泰皇最尊贵,便向秦王提议以“泰皇”为其尊号。秦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下令说,去掉“泰”字,保留“皇”字,兼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自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从此,皇帝就成为我国封建时代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专称。由于皇帝名号的确定,有关皇帝的政务活动及其亲属均制定了法定称号,如臣民对皇帝称“陛下”,史官记事称皇帝曰“上”,皇帝自称曰“朕”。皇帝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皇帝驾临曰“幸”,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印曰“玺”。其命令曰策书、制书、诏书、戒书。皇帝死曰“崩”。凡文书遇“皇帝”、“始皇帝”、“制曰可”等字样时,要顶格书写,因而产生了文书的抬头制度。臣民在语言文字中涉及皇帝名字时要避讳。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在通常情况下,一切行政、军事、立法、司法、财政、文教大权,无不由皇帝掌握运用;对一切文武官员和勋贵人等的任免、赏罚、生杀予夺大权,也无不取决于皇帝,即所谓“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的权限虽无所不包,无所不统,但在行使权力时,还必须通过一定的人员和机构,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为使皇帝的政令畅行无阻,保证各种讯息和政务及时而准确地上承下宣,皇帝就必须牢牢地驾驭全套国家机器,必须建立和健全一套上下有序的承传制度。皇帝掌握全国社会和军政讯息的途径主要有奏事、朝议、刺察等形式。

(刘欣尚)

虎符

(hufu) 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符身为铜质，虎形，有铭文，分左右两半，右半留存朝廷或君王，左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的将帅。调发军队时，须由使臣持符到地方验合，方能生效。盛行於战国、秦、汉。现存最早的虎形符节是战国时期的，如“辟大夫虎节”和“韩将庶虎节”。“韩将庶虎节”存半符，呈伏虎状，符身阴刻铭文“韩将庶信节”等十字。战国时期一般称“虎节”，但其形制、作用与虎符皆同，可谓“虎符”的前身。秦称虎符，如现存“杜虎符”，符身有错金文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殿。”表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掌握军队的征调大权，实行凭“虎符”发兵的制度，且管理制度严密。调动军队五十人以上，就要有君王符命，但如有烽火报警，则不必会君符，即可采取行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征调军队需以皇帝“虎符”为凭。如秦“阳陵虎符”，符身背左、右各有错金篆书铭文两行：“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汉代虎符铭文多为银错。汉以后虎符铭文，不限於符背，也有分布在胸、肘及腹等部位的。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49-1.bmp}

(冀莲芝)

琅邪刻石

(Langyakeshi) 歌颂秦始皇统一伟业的石刻之一，原立于山东诸城琅邪台上海神祠内。秦始皇为巩固统一，自前 220 年起多次出巡，并在峰山、泰山、琅邪台、之罘岛、东观、碣石、会稽等七处立石刻字，歌颂秦的功德。由于地震、雷击、火焚、风雨剥蚀等种种原因，这七处刻石大都早已毁坏无存，仅有泰山刻石和琅邪刻石留存至今。其中泰山刻石破碎得仅剩 10 个字，现存泰山脚下的岱庙内。琅邪刻石是七块刻石中文字最多的，有 300 多字，清末时此石被雷击碎，弃至荆棘丛中，后经寻找粘接，后半部分基本保存，但文字已大部剥落，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琅邪刻石的内容为“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齐吉祥)

三公九卿

(sangong jiuqing)对秦汉中央官制的一种称谓。三公之设，始于周代，但所指说法不一。西汉今文经学家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认为周代以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古文经学家则据《周礼》认为周代以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秦代不设周代三公，辅佐皇帝治国者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为百官之长，总揽行政事务，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掌图籍秘书和监察。西汉初承秦制，仍设丞相、御史大夫。另有最高军事长官太尉，但不常置。从汉武帝起，因受经学影响，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也被称为三公。西汉末年，废丞相、御史大夫，仿周制，建立三公，名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至此官有三员，名称三公，可谓名实相符。东汉因袭西汉之制，但将大司马改为太尉，大司徒改为司徒，大司空改为司空，合称三公。光武帝为加强专制皇权，将实权全归尚书台，三公受制于尚书。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交相专权，三公还要听命于外戚、宦官。三公制逐渐衰落下去。先秦文献中有九卿之说。秦始皇置奉常，掌宗庙祭祀；郎中令，掌宫殿警卫；卫尉，掌宫门屯卫；太仆，掌御用车马；廷尉，掌刑法；典客，掌民族事务；宗正，掌皇族、宗室名籍；治粟内史，掌全国财政；少府，掌山海池泽和皇室生活供给；中尉，掌京师治安；将作少府，掌治宫室。当时无九卿之称，实际上这些中央事务机构也超过9个。汉初仍如秦，只是名称有所变更，如奉常改太常，郎中令改光禄勋，治粟内史改大司农等。后渐有九卿之称，而将九卿定为九个机构及其长官名称，则始于王莽。现一般以三公九卿概括秦汉中央官制。

(刘欣尚)

郡县制

(junxianzhi) 秦代设置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结构。郡县之设，源于春秋。当时秦、晋、楚等国在新得的边地设县，以加强边防，后逐渐推行到内地。接着，各国又在边地设郡，作为军事国防区域。由于边地荒僻，地广人稀，所以郡的地位较县为低。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边地日趋繁荣，开始在郡之下分设若干县，于是形成了县统于郡的两级地方组织。战国中期以后，内地也逐渐设郡，成为县与中央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郡县制逐渐形成了。秦统一后，丞相王绾等人提议恢复分封，理由是六国刚平定，燕、齐、楚等地离秦京城远，不行分封难以控制，主张封授王子为王。廷尉李斯则坚决反对。他指出，周代曾普封子弟、同姓为王，后来，亲属疏远，诸侯互相攻伐，周天子难以制止，引起长期战乱。他主张废分封，实行郡县制。秦始皇赞同李斯意见，说：天下人苦于干戈不休，就是因为有了侯王。如今天下初定，再来建立许多封国，就是树立战争的根苗。于是，秦始皇把原来秦国实行的郡县制推行于全国，分全国为 36 郡。每郡设郡守，掌管全郡政务；郡尉，辅佐郡守并管军事；又置监御史，监察郡政。其后随着秦朝疆域的扩大，郡也继续有所增置，到秦始皇末年已有 40 余郡。每郡统辖若干县。县设县令或县长，掌管一县的政事；县尉，掌管一县的军事；县丞，助理县令、长，并掌司法、审判。郡县主要官吏均由皇帝直接任免、调动，不得世袭。各郡每年必须定期“上计”，即向中央汇报本郡的租税收入、户口统计及治安情况。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秦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后来历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欣尚)

令黔首自实田

(lingqianshou zishitian) 秦始皇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的法令。黔首之称，在战国时已经广泛使用，含义与当时常见的“民”、“庶民”相同。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下令“更名民曰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秦统一中国后更定名物制度的内容之一。黔，黑色，《说文解字·黑部》：“黔，黎也。从黑从今声。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秦始皇三十一年（前 227）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照当时实际占有土地的数额，向封建政府呈报。政府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并依此征收田租。这是根据现有文献所知道的秦第一个承认土地私有的法令，意味着私有土地受到封建政权的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得到确认。土地私有合法化，促进了大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地主阶级利用土地剥削人民成为合法，压在农民身上的地租、赋税以及各种徭役也愈来愈重。

（刘欣尚）

秦度量衡

(qin duliangheng) 计量长短的器具称为度，测定计算容积的器皿称为量，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称为衡，战国时期，已广泛使用度量衡，且“量值”渐趋一致。秦灭六国后，明令统一度量衡，使长度、容积、重量都有了统一的标准。我国陕西、山西、江苏、山东、辽宁、河北、甘肃等地都发现了秦权，上面都刻有秦始皇的诏文，有的还加刻了秦二世的诏文，毫无疑问，它们都是秦政府颁发的标准量器。“权”即是今天所称的“砝码”，在有刻度的等臂衡杆上，利用杠杆原理测重。根据秦权上自铭所示量值实测折算，秦一斤应为 250 克。秦的量器也已发现多件，经实测一升为 200 毫升。至今尚未发现秦尺，但可以通过商鞅铜方升计算出秦的度值。商鞅方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前 344）颁发的标准量器，秦统一后，在商鞅方升底部加刻了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继续做标准器使用。商鞅方升的边上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50-1.bmp}

有一段铭文“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以 $16^{1/5}$ 立方寸的容积为一升，近年来经反复实测，得出此升容积为 202.15 立方厘米，将 $16^{1/5}$ 立方寸和 202.15 立方厘米进行换算，得出 1 立方寸 = 12.478 立方厘米，进而算出 1 尺 = 23.2 厘米，这个数值，既是商鞅时的度值，也是秦统一后的度值。由于度量衡在使用中受到磨损，产生偏差，为此秦明令规定，每年都要对度量衡进行检验，校正。

（齐吉祥）

半两钱

(banliangqian)形制为圆形方孔，重 12 铢（我国古代规定 1 两为 24 铢），有钱文曰“半两”。“半两”二字分列方好（即方孔）左右，通常是右“半”左“两”。战国末期，秦惠文王二年（前 336）“初行钱”，即指秦国开始由王室铸造货币的流行，标明秦国王室专铸货币制度的确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战国时期流通的刀、布、郢爰和贝币等大小、形制、重量和货值不一的庞杂混乱的六国货币，把秦统一货币的政策和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西汉初年所铸的钱，虽陆续减轻重量，仍称“半两”。如吕后二年（前 186）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 175）减为四铢，民间私铸的半两，有轻不足一铢的，因其轻薄如榆荚，故称“榆荚半两”。汉武帝初铸三铢钱，元狩五年（前 118）废除半两钱，始铸五铢钱。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51-1.bmp}

（冀莲芝）

秦长城

(Qinchangcheng)长城是由列城和烽火台等单位建筑发展而成的防御工程。春秋战国时期，楚、齐、燕、魏、韩、赵、秦国，为了互相防御纷纷在各自的边境修筑长城，此为我国修筑长城之始。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燕、赵、秦三国为了防御我国北部的游牧民族东胡、匈奴的南下扰掠，他们在与之毗邻的北方修筑了长城，三条长城不相接。当时的秦长城，西起临洮，东至黄河。燕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独石山），东至辽东。赵长城西起高阙（今内蒙临河县），东至代（今河北蔚县），这是以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基础。秦灭六国后，派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在北击匈奴的同时，将燕、赵、秦国的北方长城进行增筑和扩充，形成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蜿蜒 5000 多公里的长城。秦长城的若干地段，在后来的明长城以北千余里，现在的甘肃、宁夏、陕西等省均有长城遗迹，当时修筑长城的材料主要是土、石和木料。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51-2.bmp}

（齐吉祥）

阿房宫

(Efanggong) 秦宫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阿房村。相传秦惠王时(前 298—前 251)即开始建造。秦始皇准备扩建成一个方圆 300 多里的大宫苑,直至秦灭亡仍未建成。后被项羽烧毁。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前殿规模“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汉书·贾山传》亦说:“东西五里,南北千步。”是一座规模巨大宏伟的宫殿。杜牧《阿房宫赋》用铺陈排比的手法,再现了它壮观富丽的面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其景十分壮观。现存殿基夯土台址,高约 7 米,东西长 1300 米,南北宽 500 米,经初步发掘,发现了一些残破的建筑构件,如夔纹瓦当,方形铜材等。

(吕瑞珍)

秦始皇陵

(Qinshihuangling)原名骊山。在今陕西临潼骊山北麓。创建于前 246 年,历时 38 年建成。秦始皇将自己的坟墓称“山”,定名“骊山”,将陵园称“骊山园”。他所以不称陵而称山,是为表示皇帝陵的等级要高于战国各国君王之上。他的陵园规模之大,雄伟壮观也属历代帝王之冠。经考古探测,陵垣是内外两层的“重城”,设有四门及角楼。外城南北长 2173 米,东西宽 974 米,周长 6250 米。陵墓呈方形覆斗式,位于内城的南半部,正当在东、西、南三面的两重六门的交点上,为整个陵园的西南部。按古代礼制,西南偶为尊位。陵墓高 76 米,周长 2000 米。据史书载,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051-3.bmp}

巨大的墓宫,是穿凿骊山,浇灌铜液铸成的,上具象形日月星辰,下具象形江河湖海,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应有尽有,可构成一座宏伟的地下宫殿。陵墓北半部是建筑群遗址,有寝殿、便殿,西北侧有饮食宫遗址。在陵墓的内外城的南部以东为陪葬区。陵墓的西侧约 20 米处,发现一铜车马坑,出土两乘彩绘铜车马,前后面西排列,车均为双轮、单辕。前驾四匹铜马。车上各有铜御官俑一件。陵园外城东侧发现三座兵马俑坑,据计算,有陶俑 7000 多个,陶马 600 多匹,它们面向东方,组成一个拱卫陵墓的屯卫军阵,俑坑以西还有马厩坑等。整个陵园坐西向东,并位于国都咸阳城正东方,而胸县的“秦东门阙”又居于咸阳和骊山园的正东方,这种设计的用意,正是表示墓主坐镇西方、面向东方的最高尊长的地位。

(吕瑞珍)

秦兵马俑

(Qinbingmayong) 1974 年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三华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经发掘和实测，俑坑为土木结构。一号俑坑最大，东西长约 210 米，南北宽 62 米，深约 5 米左右，面积为 12600 多平方米，坑的四边各有 5 个斜坡门道。坑中埋藏着与真人真马近似的陶俑和拖战车的陶马约 6000 多件，且排列有序，组成一个方阵。在坑东，南北向的长廊里，排列着面向东的三列横队，每列由 70 个战袍俑组成，当是军阵的前锋。其后，在 11 个过洞中，排列着由步兵和车马相间组成的 38 路纵队，是军阵的主体。坑的南北两边和西端各有一列面向外的武士俑，似是军阵的侧翼和后卫。二号俑坑位于一号俑坑的左侧，东西长 96 米，南北宽 84 米，深约 3.2 米，面积约为 6000 平方米。是由近 1000 个骑兵俑和步兵俑以及战车混合编队组成的曲形军阵，并出土有多种实用兵器。三号俑坑在二号俑坑的后面，平面呈凹字形，东西长 17.6 米，南北宽 21.4 米，深约 5 米多，面积为 500 平方米。有卫士俑 68 件，战车 1 乘，是一、二号俑坑军阵的指挥部所在地。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一般身高在 1.75 ~ 1.86 米之间，陶马高 1.5 米，身长 2 米。所出土的武士俑头梳各式发髻，身穿铠甲或战袍，腰间束带，打绑腿，足穿方口齐头履，有的挟弓挎箭，手执剑、矛、弩机等实用兵器。他们有的挺身站立，有的下蹲跪射，个个神态逼真，威武雄壮，面部刻划细致，静中欲动，栩栩如生。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秦始皇当年统一中国时兵强马壮的雄伟军阵。

(吕瑞珍)

焚书坑儒

(Fenshu kengru)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采取的措施。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的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一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至其末年，诸国由分裂归于统一；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冶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制政策。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前 213 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博士淳于越重提恢复分封制的主张，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反驳指出，时代不同，治理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史记·秦始皇本纪》），如不禁止，不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统一局面将遭破坏。因此建议：凡《秦纪》以外列国史书皆焚毁；除博士官外，私藏《诗》、《书》、百家语者，限期交官府烧毁；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情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面，罚四年筑城劳役；仅医学、卜筮、种树（农业）之书不烧。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李斯建议，下令施行。这就是焚书事件。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从性质上讲，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但起因有所不同。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寄希望于方士寻觅仙药。因此，方士卢生、侯生等很受宠幸。后来卢生、侯生因寻求“不死之药”而未得，无法继续行骗，于是密谋弃官逃走，还讥议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乐以刑杀为威”。秦始皇闻讯大怒，认为儒生多以妖言惑乱黔首，于是下令御史案问诸生，诸生相互举发，牵引 460 多人，最后都被坑杀于咸阳。焚书坑儒是“师古”与“师今”两种政治思想斗争激化的结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巩固统一局面，禁止“以古非今”活动，采取一些统一思想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焚书坑儒这种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它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

（刘欣尚）

陈胜吴广起义

(Chensheng wuguang qiyi)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秦始皇统治时期，大规模地兴建宫殿和陵墓，以及筑长城、修驰道，对匈奴和南越的用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徭役和赋税负担。同时，还制订严刑酷法，使人民动辄触犯刑律。秦二世继位后，赋敛益重，戍徭无已，用法也更为苛深，致使天下困疲不堪，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秦二世元年（前 209）七月，一队被征发到渔阳（今北京密云）戍守的贫苦农民，行进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遇到连日大雨，道路不通，无法按期到达目的地。按照秦法规定，误期当斩。在这种情况下，戍卒中的两个屯长陈胜和吴广密议，现在逃亡是死，起来造反也大不过是死，何不拼死干出一番事业来呢？于是，他们利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等计策发动戍卒起义，杀死监押的军官，提出“大楚兴，陈胜王”（《史记·陈涉世家》）的口号。陈胜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用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起义。起义军迅速攻占蕲县（今安徽宿县南），接着向西挺进，又攻占了秦朝重镇陈（今河南淮阳）。此时，起义军已拥有兵车六七百辆，骑兵千余，步兵数万人。起义军在陈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被推举为王。张楚政权的建立，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反秦斗争的高潮，各地农民纷纷杀长吏，响应陈胜。陈胜以陈为中心，分兵数路，四出进军，以扩大革命政权的影响。吴广率主力西进，准备直捣咸阳，在战略重镇荥阳受阻，与秦军相持不下。陈胜又派周文率军直驱关中，到达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时，起义军已拥有战车千辆，士卒数十万人。周文军所向无阻，迅速攻占了戏（今陕西临潼东），逼近秦都咸阳。秦二世大为惊慌，急忙赦免在骊山修墓的几十万刑徒，仓促组成一支军队，由少府章邯率领，向农民军反扑。周文军因孤军深入，又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经过几次苦战，接连受挫，被迫撤出函谷关。最后浞池之战，再次失利，周文自杀。秦将章邯乘胜东下，进迫正在围攻荥阳的吴广所部农民军。吴广因久攻不下荥阳被部将田臧所杀。接着，田臧率军西向迎战章邯，敖仓之战，田臧兵败被杀。章邯解除了起义军对荥阳的包围后，倾全力向起义中心猛扑。陈胜亲自率军迎战，不幸失利。秦二世二年十二月，陈胜败退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被叛徒庄贾杀害。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坚持了 6 个月，终告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秦王朝的腐朽统治，为推翻秦朝奠定了基础。其后，各地农民起义军继续坚持反秦斗争，终于推翻了秦朝。陈胜吴广起义所表现的革命首创精神和英雄气概，鼓舞了后世千千万万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

（刘欣尚）

巨鹿之战

(Julu zhizhan) 秦末农民战争中摧毁秦军主力的重要战役。陈胜吴广牺牲后，项梁召集各路义军在薛（今山东滕县东南）计议，并接受谋士范增建议，立楚怀王之孙名心的为王，仍称楚怀王。接着项梁率领起义军大败秦军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刘邦、项羽也在城阳（今河南范县城濮城东南）、雍丘（今河南杞县）等地打败秦军，斩杀秦三川守李由。项梁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骄傲轻敌，被章邯偷袭以至牺牲。章邯破项梁军后，认为楚地农民军主力已被消灭，于是就渡河北上，移兵邯郸，攻击以赵歇为王的河北起义军。赵歇退守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秦朝派王离率几十万边防军包围巨鹿，章邯在巨鹿以南筑甬道，以运粮供给王离军。赵歇粮少兵单，危在旦夕，乃遣使求救于楚怀王。楚怀王与起义军首领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刘邦率领向西直指关中。另一路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起义军主力北上救赵。援赵大军进至安阳（今山东曹阳东南）后，宋义被秦军的气焰所吓倒，逗留46天不敢前进。项羽痛斥宋义的怯懦行为并杀死了他。楚怀王遂封项羽为上将军，并令英布和蒲将军两支起义军也归其指挥。前207年12月，项羽率起义军到达巨鹿县南的漳水，立刻派遣英布和蒲将军率2万义军渡过漳水，援救巨鹿，初战告捷。接着，项羽率领全军渡过漳水，命令全军破釜沉舟，只带三日粮，以示不胜则死的决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巨鹿，断绝秦军粮道，包围了王离军队。义军与秦军接连激战，九战九捷。“楚战士（指项羽军）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史记·项羽本纪》），终于大败秦军，活捉了主帅王离，杀了秦将苏角，另一名秦将涉间被迫自焚而死。巨鹿解围后，章邯军退至棘原（巨鹿南），项羽军驻漳水之南，两军对峙，秦军的连续失败使章邯不见信于秦朝廷。项羽抓住时机，派蒲将军击秦军于漳水南岸。接着又亲率大军破秦军于汗水。在项羽的沉重打击下，章邯不得不于前207年7月在洹水南殷墟（今河南安阳）率其部众20万投降项羽。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所取得的一场巨大胜利。它基本上摧毁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战局，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

（刘欣尚）

楚汉战争

(Chu hanzhanzheng) 继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项羽和刘邦之间为争夺封建统治权力而进行的战争。自汉元年（前 206）初至高帝五年（前 202）十二月，历时 4 年多。秦二世三年（前 207），刘邦、项羽相继率兵入关，推翻秦王朝。按照原来楚怀王心的约言“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高祖本纪》），刘邦先入咸阳，理应王关中。但项羽自恃功高，企图独霸天下。他自封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 9 郡，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又分封 18 路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局促于巴、蜀、汉中一隅。项羽分封诸侯后即罢兵回归彭城。不久，田荣起兵反楚，自立为齐王，又以兵援助陈余袭击常山王张耳，迎故赵王于代复为赵王。齐、赵的起兵，对西楚构成直接威胁。项羽不得不调遣主力击齐，以稳定局势。此时，刘邦乘项羽无暇西顾之机，听从韩信等人的计策，于八月出兵击败封王关中的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继而领军东出，远袭项羽根据地彭城。项羽闻知彭城陷落，亲率 3 万精兵回击，刘邦兵溃败走，退守荥阳、成皋之间。时诸侯皆背汉向楚。由于萧何及时调发关中老弱未成年者补充兵力和韩信的增援，汉军才得以重整旗鼓。项羽虽将战略重点移至西线，但他始终未能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无法越过荥阳、成皋一线西进。从此楚汉战争便进入了双方相持的阶段。刘邦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一方面坚守荥阳、成皋一线，一方面积极在楚军的后方和侧翼开辟新战场。这一部署打击了项羽在战略上的弱点，很快收到了成效。汉二年八月至次年十月，韩信接连平定魏、代、赵、燕，矛头直指齐地，逐渐形成了包围西楚的态势。项羽主力虽再度攻克荥阳、成皋，但由于刘邦采取了“高垒深堑勿与战”的战术，不仅保存了汉军的实力，而且牵制了楚军的主力，使项羽更进一步陷入两线作战，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汉三年五月，刘邦命彭越率兵渡过睢水，袭杀楚将薛公，直接威胁彭城。八月，刘贾、卢绾将兵 2 万渡河，进入楚地。彭越在汉军的协助下攻徇梁地，连克睢阳、外黄等 17 城，完全截断了荥阳、成皋一线楚军主力的后勤补给线。于是，项羽不得不于九月命大司马曹咎固守成皋，亲自回师救援，夺回陈留等 10 余城。但是，汉四年十月，刘邦乘机诱使曹咎出击，大破楚军，收复成皋。与此同时，韩信也袭破齐历下军，进据临淄，并于十一月在潍水消灭了楚将龙且率领援齐、号称 20 万的楚军，尽夺齐地。项羽在正面和侧翼战场上接连遭到重大失败，有生力量丧失殆尽，腹背受敌，进退失据，陷于汉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汉四年八月被迫与刘邦议和，约定以鸿沟（今荥阳东南）为界中分天下。东属楚，西属汉。九月，项羽率兵东归，而刘邦则采纳张良、陈平的计策，乘机追击楚军于固陵，并调令韩信、彭越等人率兵围歼项羽。次年十二月，项羽被困于垓下（今安徽固镇界），汉军四面唱起楚歌，楚军士无斗志，项羽率少数骑兵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刎而死。历时四年多的楚汉战争，最后以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王朝而告终。

（刘欣尚）

西汉

(Xihan 公元前 206—公元 8) 继秦朝而出现的强大的统一封建王朝。前 206 年刘邦入关灭秦，称汉王。尔后在楚汉战争中打败项羽，于前 202 年称帝，国号汉，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西汉。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吸取秦亡的教训，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医治战乱后凋敝的经济，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经过惠帝、吕后、文景几代的治理，又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文景时期，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富庶的崭新局面，史称“文景之治”。与此同时，西汉政权建立后继承秦制，不断恢复和健全封建国家机器。汉初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搞了分封制。刘邦先是封异姓王，后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又封了同姓王。同姓王势力后来发展成地方割据势力。经过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王国势力才有所削弱。到汉武帝统治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在政治方面，颁布“推恩令”，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汉书·诸侯王表序》），大大削弱和打击了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基本上解除了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建立新的选官制度，用察举、征诏的办法选拔人才；创立州刺史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和控制。在经济方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推行新的生产技术；改革币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颁布“算缗”、“告缗”令；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军事方面，三次大规模出兵打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54-1.bmp}

败了匈奴，解除了对北方安全的威胁，并多次派人通西域；向南方用兵；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初步基础。在思想方面，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董仲舒改造和发展的新儒学成为封建统治思想，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

西汉时期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西汉中叶以后，西域归于汉朝版图，西南、东南、东北地区也设立郡治，更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同时，对外关系也有很大发展。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到达过大宛（今苏联乌兹别克境）、大月氏（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安息（今伊朗）等国。汉朝还开辟了两条通往西亚各国的道路，各国商人经此往来经商。我国的丝绸是主要商品，曾远销至大秦（罗马帝国）。因此，历史上称这两条道路为“丝绸之路”。

西汉时期的文化也有很大发展。史学家司马迁著有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赋和散文、乐府诗是这时期的主要文学形式。此外，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医学等都有所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所作的卓越贡献之一。

西汉后期，豪强地主和官僚贵族疯狂兼并土地，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公元 8 年，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国号“新”。西汉王朝结束。

（刘欣尚）

汉高祖刘邦

(Hangaozu Liubang 前 256—前 195) 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字季，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刘邦出身农家，少有大志，任泗水亭长奉令押送一批刑徒到骊山服役，因途中刑徒多逃亡，就将其余刑徒都释放，自己亡匿在芒砀山中。秦二世元年（前 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反秦。九月，刘邦聚众数十人，杀沛县县令，响应起义。沛县吏萧何、曹参推刘邦为沛公，征发沛县子弟，得兵 3000 人，转战于丰、沛之间。不久投奔项梁。后项梁战死，刘邦与项羽等奉楚怀王心为领袖，继续坚持反秦斗争。当项羽率领起义军和秦军主力决战巨鹿时，刘邦受楚怀王派遣率所部起义军向关中挺进。他迫降宛城，攻占武关，于汉王元年（前 206）十月进抵关中霸上。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汉高祖本纪》）因而得到人民的欢迎。项羽击溃秦军主力后也引兵入关。鸿门宴上项羽谋士范增阴谋刺杀刘邦未成。之后，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汉中之地。刘邦不甘心亡秦果实被项羽独占。不久，乘项羽东归，拜韩信为大将，率军还定三秦。接着，与项羽展开了长达 4 年多的楚汉战争。由于刘邦会用人，尤其懂得发挥部下的长处，又“好谋能听”，又能体贴民情，关心民间疾苦，注意在战争中尽量减少对无辜百姓的骚扰，得到人民的拥护，终于使自己转弱为强，最后打败了项羽。前 202 年，刘邦即皇帝位，建立了汉朝，初都洛阳，不久迁至长安。刘邦在位 7 年，政治上消灭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六个异姓王，巩固中央集权；迁六国旧贵族和地方豪强到关中，以加强控制；命萧何据秦律制定汉律，张苍定历法，叔孙通制礼仪；建立起汉朝制度。经济上招抚流亡，释放战争中自卖的奴婢，奖励农业，减轻田租，什伍税一。对北方匈奴的骚扰采取防御方针，先后消灭了与匈奴有勾结的陈豨、韩王信等北方割据势力，又把北方边塞的几个郡县，作了重新调整，从而加强了北部的防御力量。刘邦作为西汉的开国皇帝，在建立西汉封建政权、促进汉初社会安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等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汉朝人曾评价他“性明达，好谋能听”，是“拨乱世反之正”之主（《汉书·高帝纪》）。高帝十二年（前 195）刘邦病逝。葬长陵，谥号高皇帝。

（刘欣尚）

布衣将相之局

(buyi jiangxiang zhiju)西汉政权建立后形成的由布衣出身的人致身将相的局面。布衣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后来成为一般平民的代称，其中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劳动人民，也包括没有官爵的地主。西汉开国君臣，绝大多数出身布衣。如：刘邦是自耕农出身，陈平、王陵、陆贾、酈商、酈食其、夏侯婴等，都是一般农民，樊哙为屠狗者，周勃为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为贩缯者，娄敬为戍卒，萧何、曹参则出身于小吏。论阶级成分，或为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或为中小地主，大都属于社会下层。除娄敬外，都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他们在反秦起义中开始结合在一起。后来，在同项羽的斗争中，其阵容逐渐扩充和壮大起来。西汉建立之后，形成了“布衣将相之局”。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秦亡汉兴这场历史巨变的总结。陈胜起义所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为布衣主宰天下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他不仅提出了这个口号，而且在起义斗争中付诸实行。在灭秦以前，以陈胜为首的布衣王侯将相，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无疑是以陈胜为首的农民起义换来的。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变化的必然趋势。由于“世侯世卿之局”被扫除，从而削弱了奴隶关系的残余形态，改造了当时的封建统治。由“世侯世卿之局”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是一个历史进步。布衣皇帝将相的出身和经历，对他们的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使其保持某种“布衣”作风。表现在汉初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还不那么森严，注意选拔人才，也比较注意节俭。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布衣”皇帝将相逐渐变成新的封建贵族，其腐朽倾向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起来。汉武帝时发生的统治政策和指导思想的变化，是“布衣”君臣贵族化的产物，它标志着汉初“布衣”政治的终结。

（刘欣尚）

黄老政治

(Huanglao zhengzhi) 西汉初年为恢复封建经济稳定封建统治而实行的“无为而治”的方针政策。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思想中含有许多政治、战争的战略、策略思想，所谓“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或“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这种思想到战国末期发展成为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当时所谓黄帝之学，也属于道家的一个流派，它同道家的区别是，黄帝之学在道之中含有法的成分。二者合在一起称为黄老。黄老学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这恰好符合了汉初统治集团的需要。西汉初年接秦之弊，经济萧条，人口散亡，作业穷困，财政匮乏，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和发展。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统一，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其间君臣多好黄老之术，治道贵清静宽舒。因此，执行与民休息的“无为”的统治术，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所谓“无为”，并非统治者一切无所事事，无所作为。无为的原则有两个：一方面无为即是“守而勿失”，也就是说对于刘邦、萧何在汉初所确立的政治法律制度，在一般情况下不作原则上的大变革。另一方面无为并不是放弃阶级统治，而是在不伤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在封建统治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对人民的生产生活作些尽可能少的干预，使之休养生息。汉初黄老政治的内容主要有：重农抑商，恢复并发展生产。如提倡以农为本，鼓励从事农业生产；对商人实行抑制政策，禁止他们衣丝乘车，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除秦苛法，约法省刑，禁网疏阔，治民尚清静宽舒，以求百姓安辑。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西汉封建统治得到稳定。同时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起来。但在太平盛世的背面，也存在着农民破产失业的现象。

（刘欣尚）

翦除异姓王

(jianchu yixingwang) 汉高祖刘邦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巩固统一集权的措施。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笼络部下，争取支持，孤立和打败项羽，陆续封了一些诸侯王。这些诸侯王不是刘姓宗室，故称为异姓诸侯王。如韩信在平定齐地后、请求立为假王（暂署为王），刘邦为了笼络他，就封他为齐王。后又封英布为淮南王。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对诸侯王的封国作了调整，如彭越封为梁王，齐王韩信徙为楚王等等。当时异姓王有7人：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这些异姓王的封国跨州连郡，占据了战国时东方六国大部分的疆域，又握有重兵，是西汉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刘邦与异姓王之间的矛盾经过一段酝酿，终于爆发。汉高帝五年（前202）七月，燕王臧荼谋反。刘邦亲率大军前往镇压。九月，俘臧荼，随即封卢绾为燕王。六年十月，有人上书密告楚王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计，以巡游云梦为名，通知诸侯在陈聚会，乘机囚韩信回长安，取消其楚王称号，贬为“淮阴侯”。十一年阳夏侯陈豨与投降匈奴的韩王信勾结叛乱，刘邦亲率军队平叛。吕后以韩信在长安图变之罪，将其诛杀。不久，刘邦又以梁太仆告发彭越为由，逮捕彭越，废处蜀地。吕后为除后患，将彭越诱至长安，诬以谋反罪，随即处死。淮南王英布得知韩信、彭越先后被除，惶恐不安，遂起兵叛乱，被刘邦平定，兵败被杀。同年燕王卢绾因与陈豨有谋事泄，刘邦又派樊噲、周勃将兵击之，卢绾带几千人逃入匈奴。另外，赵王张敖（张耳之子）也因赵相贯高谋反受连，被贬为宣平侯。至此，7个异姓王中就只剩下长沙王吴芮，因地少力弱，忠于汉朝中央而得以保留王位。翦除异姓王实质上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异姓诸侯王并立，是趋向战国封建割据局面的倒退。翦除异姓王有利于国家统一、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

（刘欣尚）

削藩

(xiaofan) 西汉文景时期削减诸侯封地和权力的措施。刘邦在逐步消灭异姓王的同时，曾大封自己的子弟为王，认为这是天下同姓一家，可以屏藩朝廷。汉文帝继位后，为加强自己的地位，采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诸侯国析为几个小国，以图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但是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景帝继位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晁错建议削减王国的封地，限制他们的发展，逐渐加大中央直接管辖的地盘，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景帝采纳了晁错这一“削藩”主张，景帝三年（前154）楚王刘戊违犯汉丧制，被罚削去东海一郡；赵王有罪，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卬私卖官爵，削去6县。晁错的“削藩策”激起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一些诸侯王的强烈反对。吴王鼓吹说晁错侵夺诸侯之地，是为离间刘氏骨肉，危倾社稷，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串通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举兵叛乱，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将军往击吴楚，派郿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爱盎，建议景帝诛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卒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但吴王刘濞拒绝接受朝廷诏书，还宣布自立为“东帝”。战事继续进行。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所受到的吴楚军攻击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碭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刘濞率败卒数千逃至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吴王濞被杀。楚王刘戊和参加反叛的诸王也因兵败自杀或被杀。历时三月的吴楚七国之乱遂被完全平定。此后，景帝免除了诸侯王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削减了王国官吏，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只能衣食租税。诸侯王强大难治的局面大为改变，因而进一步加强了统一，巩固了中央集权。

（刘欣尚）

吕后称制

(Lühouchengzhi) 指西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执政。吕后名雉，山阳单父（今山东单县）人，汉高祖刘邦结发之妻。高帝五年（前 202）刘邦称帝，立吕雉为后。吕雉为人有谋略而性残忍，在刘邦翦除异姓王的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刘邦生前嫌太子刘盈柔弱，打算另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由于大臣反对，吕后又多方设法为刘盈辅翼，废立太子之事未果。刘邦死后，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吕后以惠帝年少，恐功臣不服，密谋尽诛诸将；后畏惧诸将拥有兵力，不敢下手。她又毒死赵王如意，害死戚夫人，对其他刘氏诸王，亦加残害。惠帝不满吕后所为，忧郁病死后，吕后临朝执政八年。她继续推行高祖以来“与民休息”的政策，先后废除秦以来的“挟书律”、“三族罪”、“妖言令”；减田租，奖励农耕，放宽对商人的限制等等。这些措施对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吕后临朝称制后，封侄吕台、吕产、吕禄等为王，遭到刘氏宗室和大臣的强烈反对。吕后病危时告诫诸吕部署应变，命吕禄领北军，吕产居南军，严密控制京城和皇宫的警卫。诸吕在吕后死后阴谋作乱，被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和朱虚侯刘章等迅速翦灭。西汉朝廷大权复归刘氏集团，代王刘恒被立为皇帝，即汉文帝。

（刘欣尚）

文景之治

(Wen jingzhizhi) 西汉文帝景帝时期出现的政治安定、社会经济得到显著发展的局面，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文帝刘恒（前 203—前 157），高祖中子。高帝十一年（前 196）受封为代王。前 180 年吕后死，诸吕谋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刘恒在位 23 年。景帝刘启（前 189—前 141），文帝太子，前 157 年即位，在位 16 年。文景时期继续推行并发展汉高祖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多次下诏劝农，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的负担，文帝前二年（前 178）和前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史记·孝文本纪》），即将田租率由原来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并一度全部免除田租。景帝时实行三十税一，成为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 120 钱减至 40 钱，徭役则由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1 个月）。景帝二年（前 155）又把秦时 17 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 20 岁始傅。此外，弛山泽之禁，促进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事业的发展。还废除一些严刑苛法，如诽谤妖言法、妻孥连坐法，停止断残肢体的肉刑，减轻笞刑等。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文帝时期还注意抑奢，提倡俭朴。在位期间，宫室、苑囿、服饰，都无所增益。他还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刮，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文景两代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也日益巩固。史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 70 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廩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见《汉书·食货志》）。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归根到底是地主阶级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时期减免田租，获利最大的是地主。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势力的日益发展。

（刘欣尚）

独尊儒术

(Duzun rushu) 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儒家学说虽从秦代的摧残压抑中逐渐复苏，但并未得到重用。武帝即位后，社会经济已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汉初所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的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汉武帝开始提倡儒学，“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延聘“儒者数百人”，引起天下学士“靡然向风”（《汉书·儒林传》）。元光元年（前 134），武帝召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得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其中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受到武帝的称许。元朔五年（前 124），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五经博士官置弟子员 50 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得到了独尊地位，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汉武帝“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刘欣尚）

太学

(Taixue) 汉代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的教育机构。西汉初年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时尊崇儒术，为了培养儒术统治人才，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在京师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为教官，教授儒家经典。最初学生有50人，叫做博士弟子，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汉书·儒林传》)充当。另全国各郡也保荐学生到太学受业，待遇同博士弟子。入学后免除本人徭役。每年考试一次，凡通一经者即可补为文学掌故，成绩优秀者得为郎中。以后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都逐渐增加，开设了讲解《易》、《诗》、《书》、《礼》、《公羊》、《谷梁》、《左传》、《周官》、《尔雅》等课程。到元帝时博士弟子达1000人，成帝时增至3000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万余人。太学规模空前扩大。东汉建武五年(29)，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明帝还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126)，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时1年，用工徒11万2千人，建成240房，1850室。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3万人。灵帝熹平四年(175)，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不绝。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刘欣尚)

察举制

(chajuzhi) 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前 196 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文帝前元二年（前 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书·文帝纪》）。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一是对于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新规定，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标准。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三是察举分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推举。科目有孝廉和秀才。孝廉始为孝与廉两科，后来连称为一科。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有名额限制，东汉和帝时制凡满 20 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 20 万人的两年举一人，不满 10 万人的三年举一人。边境地区郡国人少，10 万人以上则可以岁举一人。孝廉的出路最多的是在皇帝身边当郎官，然后再由郎迁中央或地方官吏。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举秀才的对象为现任官吏。到东汉为避刘秀讳，改秀才为茂才。茂才由州推举，所以人数比孝廉少得多。茂才的出路大多充任地方县令，比孝廉任用为重，但名额少。诏举，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的特科。其特点是：诏举常在灾异之后举行。诏举人数不限，由诏令临时规定。诏举科目很多，也不固定，能把有专门才能的人推举出来。无论岁举孝廉、秀才还是诏举贤良文学，到中央以后均需经过考试。考试办法有对策（命题考试）和射策（抽签考试）两种。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凡属诏令推举之士一般是由天子策试；郡国岁举之孝廉、秀才则由三公府考试。儒生考经学，官吏考举奏，通过考试选出优等生，报皇帝录用。考试实际是量才录用。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刘欣尚）

中朝和外朝

(zhongchao hewai chao) 汉武帝时期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中朝即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近臣所构成；外朝又称外廷，指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组成的官僚机构。西汉初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丞相多由功臣列侯充任，权力极大。他们既能参与制定国家重要政令、辅佐皇帝总管全国政务，又能督察中央百官和地方二千石郡守、王国相。丞相权力的强大影响皇帝的集权。汉武帝时，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加强专制皇权，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这样，在宫廷内逐渐形成了新的决策机构——中朝。由尚书、侍中、常侍等组成中朝之职。以丞相为首组成的官僚机构则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外朝。自从中外朝分立之后，中朝决策，支配外朝，丞相的权力日益转移到中朝。和皇帝最为亲密的宦官、外戚，很容易变为中朝的主宰。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即以中书的身分专断国政；哀、平之世，外戚王氏相继把持中朝，终于酿成新莽代汉的结局。东汉文献中已不大提到中外朝，但中外朝仍然存在，而且有所变化。光武帝、明帝时吸取西汉覆亡的教训，对功臣、外戚防范甚严，不许他们进入宫禁，竭力把权势揽在自己手中。外朝的三公成为备员，中朝的尚书的地位便更加重要。章帝以后，在位者多为女主、幼君，依靠外戚宦官治理朝政，他们逐渐取代尚书而成为中朝的支柱。

(刘欣尚)

刺史与州

(cishi yuzhou) 汉武帝时设立的刺史为中央派到地方的监察官。刺史所在的监察区域称为州(部)。秦代曾设监郡御史,或称郡监。汉高祖时不再设置。惠帝时派御史监三辅郡。武帝初年,也曾派遣监御史监郡,但没有成为一种固定和完善的制度。为了适应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正式废止派监御史监郡,又于元封五年创立了刺史制度。武帝对刺史的监察区域和督察范围作了严格规定。他把全国划分为13州(部),每州为一个监察区,设一刺史负责监察所在州(部)郡国。刺史的督察范围是“以六条问事”(《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第一条是禁止豪强田宅逾制和以强凌弱,其他各条是禁郡国守相横征暴敛、滥用刑罚、选举舞弊、勾结豪强。刺史俸秩仅六百石,权力却很大,每年八月到所部郡国巡察,年终回京师汇报。刺史内隶于御史中丞,还受丞相司直的监督。其出巡期间,若不忠于职守,所察过诏条,便会受到举奏和处分。可见武帝创立的刺史制度是一种比较严密和固定的地方监察制度,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稳定社会秩序曾发挥重要的作用。西汉后期,刺史权力逐渐扩大,有了固定的掾属和幕僚机构,有了选官用人之责,督察范围也由当初规定的二千石守相扩大到了六百石以上长吏。刺史有时改称“州牧”,秩二千石,地位大为提高。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采纳太常刘焉建议,改置州牧,以重臣出任。他们内亲民政,外领兵马,势大权重,独霸一方。东汉政权已失去对州牧、刺史的控制,而州牧、刺史也完全失去了监察地方的职能,演变成为拥兵自重的地方割据势力。东汉以后,州也逐渐成为居于郡县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刺史亦由监察官转变为地方行政长官。

(刘欣尚)

南军和北军

(nanjun hebeijun) 西汉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卫戍部队。南军，指负责殿外宫墙内警卫的卫士，由卫尉统领。因卫士居住在长安城内南面的未央宫，故称南军。西汉前期，南军卫士有2万多人，武帝时缩减至1万人。士兵从郡县的材官、骑士中选练，每年轮换一次。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北军，指守卫京师的屯卫兵。初由中尉率领。因屯卫长安城内之北部，故称北军。士兵均由三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骑士，一年更换一次。武帝时扩大北军，改北军中垒为校尉，又增置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七校尉，合称八校尉。每支约有士卒700人，分屯长安城中和附近各地。遇有战争，往往被征调随将军出征作战。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中尉为执金吾，不再直接统领北军，而是派遣监军御史控制北军。东汉时省去中垒，又合并胡骑入长水、虎贲入射声，置北军中侯以监五营，称为“北军五校”。

(刘欣尚)

汉武帝抑商

(hanwudi yishang) 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经济上打击和抑制工商业者势力的发展，以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和稳定小农经济。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用兵打仗，加上统治集团的奢侈挥霍，消耗了大量财富，国家财政发生极大困难。另外，工商业者通过经营盐铁、盗铸钱币、放高利贷而大发横财，又大量兼并土地，造成农民的破产流亡。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稳定小农经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打击工商业者的措施。一是国家垄断铸钱，改革币制。严禁私人及郡国地方铸钱，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实行五铢钱，统由上林三官（钟官、辨铜、技巧）铸造。二是实行盐铁、酒业国营。元狩中下令“笼天下盐铁”（《汉书·张汤传》），由大司农经管，任用齐地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铁商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在地方郡国、县设盐官或铁官，经营盐铁产销。还规定，私铸铁和经营铁的，处以刑罚，工具及产品没收入官。私自煮盐的处以同样的刑罚。汉武帝还实行由政府垄断酒的生产与销售，叫“榷酤”。三是实行均输平准。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剂运销收购郡国财物。同时又在京师设平准官，负责平抑物价，利用均输官购进的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保持物价平衡，防止富商从中牟利，而使利归国家。四是发布缙钱令，向工商业者、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元狩四年（前 119）规定：凡工商高利贷者，要向官府报告自己的资产。商人财产每值 2000 钱纳税 1 算（120 钱），对于手工业者、作坊主，其财产 4000 算 1。商贾的辎车，一辆纳 2 算，船 5 丈以上纳 1 算。又规定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一经查出则罚戍边 1 年，并没收全部财产。有能告发者，以所没收资产的一半奖励之。缙钱令发布后，遂掀起了一个告缙运动，史称“杨可告缙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国家由此而得民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汉武帝抑制和打击商人政策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当时对于稳定小农经济、保证剥削对象，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刘欣尚）

丝织

(sizhi)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织的国家，曾经创造出在古代世界属于最高水平的许多丝织技术。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表明，我国丝织的起源不会晚于新石器时代。其中缣丝技术是我国创造性的发明：将蚕茧放在沸水中，利用水温去掉蚕丝上丝胶等杂质，松解蚕茧，从而获得长纤维的蚕丝。在上古时代，中国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从丝织的历史讲，夏朝以前是我国丝绸生产的初创时期。夏到战国末期，是丝绸生产的发展时期。如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了桑、蚕、丝、帛等一百多个与纺织有关的字。丝织技术有了突出进步，已能用多种织纹和彩丝织成十分精美的丝织品。秦汉到清道光年间，是丝绸生产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汉唐的丝织成就尤为显著。1972年和1974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3号汉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包括了目前所知汉代丝绸品种的大部分，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发现了许多唐代精美的丝织品，是唐代丝织发展的重要物证。由于织造加工方法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结构，因而丝织物便有种种名称。汉代以来，丝织物总称“缣帛”，犹今日泛称“丝绸”。其中生帛称“缣”、“素”，有时不论生熟都用“缣”、“素”等名称泛指洁白的细缣。熟帛特称“练”。或保留白色，或再加染色，成为各色缣帛。在我国古文献中，常见的丝织品有绢、绣、纱、罗、锦及缣丝等。

绢：是一种较简单的平纹组织，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丝织品。古代原称为“练”，也称“素”或“纨”。后因梁武帝小名“阿练”，而改称绢，即现在所谓的绸。平织的绢，不织花纹，主要用印染方法来进行装饰。绢可分为二种：一是经、纬线根数大略相同的一般平纹绢。二是一种经线较密而纬线有规律地或松或紧显出“畦纹”的畦纹绢。

绣：指刺绣，即在织好的织物上面以针刺添附各色丝线，绣出美丽花纹。在陕西宝鸡西周墓中已有绣品。汉代刺绣纹样丰富，可分为云气纹、动物纹、几何纹等。刺绣不是靠机械而是完全依靠手工，所以费工更多，市价甚至比织锦更为昂贵。

{ewc MVIMAGE, MVIMAGE, !99900320_0060-1.bmp}

纱：一种经、纬线密度都比绢稀少，纤细、有均匀方孔的平纹丝织物。纱的特点是质地轻柔透亮，古诗云：“轻纱薄如空”。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一件结构精密细致的素纱单衣，身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量仅49克，是汉代纱类织物的杰出作品。素纱是秦汉时期做夏服和衬衣的一种非常流行的品种，史书记载：“纱衫盖三代之衬衣也。”

罗：同纱质地近似，古代应用较广，也是一种轻薄纤细的丝织品。但织法不同于方孔纱，是经丝互相绞缠后呈椒孔的丝织物。有二经、三经相绞，后又有四经及多经相绞的罗。早期是素罗，秦汉以来出现了花罗，是罗中的名贵品种。

锦：以彩色丝线用平纹或斜纹的多层组织织造的多彩丝织物。质地厚重。由于织造难度大，是古代贵重织品。锦分经线起花和纬线起花两种，称经锦、纬锦。唐以前以经锦为主，唐以后以纬锦为主。其中纬锦织造费时，要用两把以上的梭子，但容易变换色彩，图案丰富。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了一件花鸟纹锦，纬线共有八色，色彩变换自然协调，飞鸟竞翔，红花绿叶光华相映，是唐代织锦的杰作。元代还盛行一种加金锦，即将金线加入锦中，形成特殊

的光泽效果，织物显得华贵富丽，元代文献称之为“纳石矢”。在当时曾大量生产。

缂丝：是以彩色纬线显花的丝织物，也属于平纹组织。只是它以本色丝作经，彩色丝作纬，用专门的小梭根据花型色彩逐次织入经纱中。人称“通经断纬”。缂丝织法并不复杂，但因为断纬，可以随心所欲地织造图案。到宋代，缂丝已同中国绘画相结合，发展成和画卷几乎没有差别的缂丝画，成为驰名世界的工艺品。

（孙彦贞）

汉代冶铁遗址

(handai yetie yizhi) 我国已发现汉代冶铁遗址约 20 余处，铁器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前代。现以河南安阳、巩县两处汉代冶铁遗址为例，说明汉代冶铁手工业的生产情况。安阳冶铁遗址，位于该市北郊，1959 年发掘，是一处汉代铸造铁器的工厂，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遗址中发现炼炉 17 座，完整的冶铁坩埚 3 个，耐火砖、铁块堆、铁渣坑、打磨铁器的磨石、铁钻等，以及已铸成的铁器（有刀、锄、铲、镰、锤、车马饰、鼎、盆等）。另外还有铸造器物的范和模。特别是出土的齿轮，外圆内方，外缘有十个齿，有力地说明汉代铁制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力学原理的应用。河南巩县铁生沟冶铁遗址于 1958 年发掘，是一处比较完整的冶铁作坊，面积为 1500 平方米。在遗址附近发现有丰富的铁矿和煤层，遗址内有矿石加工厂，各式炼炉、熔炉和锻炉共 20 座。炼炉采用各种的耐火材料。还有配料池、铸造坑、淬火坑、储铁坑等设施以及大量的铁制生产工具。生产设备齐全，有鼓风装置。更重要的是遗址内发现了煤和煤饼。根据上述两处汉代冶铁遗址以及出土的大量实物，说明两汉冶铁和铸造锻制技术有很大发展，当时已用煤作燃料，使用鼓风装置，并具有成套的手工炼铁设备和完善的生产工序。

(吕瑞珍)

汉代水排

(handai shuipai) 最早见于《后汉书·杜诗传》“……建武七年(31), 迁南阳太守, 造作水排, 铸为农器, 用力少, 而见功多, 百姓便之。”“冶铁者为排吹炭, 今激水鼓之也。”这说明东汉建武七年河南南阳地区, 首先使用了这种先进技术。南阳自战国时, 就是著名的冶铁基地。汉武帝曾在此设铁官, 据发掘材料, 南阳郡内有汉代冶铁和铸造作坊 5 至 7 处, 从事冶铁者世代相传, 在鼓风冶铸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水排之前, 早已使用水碓舂米, 杜诗正是总结了这些经验发明了水排。水排是利用水力进行鼓风的冶铁设备。王祯《农书》记载的水排构造是, 在一立轴上, 作上下二卧轮, 用水激转下轮, 则上轮用绳套带动另一个小轮, 在小轮上装一个曲柄, 再由一个连杆和另一个曲柄传到一个卧轴, 经攀耳以及排前直木, 则排(木排)随来去, 将风鼓进炼炉。汉代水排较简单, 排囊是当时的冶铸鼓风器, 外部用皮革制成, 内部用木环作骨架, 体上用吊杆挂起, 以便推压鼓风。其构造是, 在一横轴的顶端, 作一竖轮, 然后在横轴中间置一拨子, 水激竖轮转动横轴, 使木拨子推动连杆和一个曲柄及囊前的从动杆使皮囊推压鼓风。中国历史博物馆根据《后汉书·杨璇传》和山东滕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刻复原了东汉的冶铁水排(排囊), 并在中国通史陈列中展出。

{ewc MVIMAGE, MVIMAGE, !99900320_0061-1.bmp}

(吕瑞珍)

五铢钱

(wuzhuqian) 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 118), 钱重五铢, 上有“五铢”二篆字, 故名。钱文“五铢”二字, 分列方孔左右, 通常是右“五”左“铢”。它的标准重量为 4 克, 钱径 2.5 厘米, 厚 0.12 厘米。它继承了秦半两钱的形制, 确立了圆形方孔, 内外有郭, 并发展成为轻重大小适度的铜质钱币。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至西汉末年, 币制不复改变。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61-2.bmp}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铸行东汉五铢钱。此钱径 2.5 厘米, 重 3.4 ~ 3.5 克, 外郭较窄。灵帝时铸“四出五铢”, 即钱背有四道斜纹, 由穿孔四角至外郭, 其形制、质量与东汉五铢钱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蜀汉铸直百五铢; 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始铸“太和五铢”, 宣武帝永平三年(510)铸“永平五铢”, 孝庄帝永安二年(529)铸“永安五铢”; 西魏文帝大统六年(540)铸“大统五铢”, 形制似“永安五铢”。萧梁初期, 曾铸“大样五铢”; 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铸“常平五铢”。581 年, 隋统一后, 另铸“开皇五铢”, 结束了长达一百余年币制混乱的局面。唐武德四年(621)铸“开元通宝钱”, 废止五铢钱。五铢钱流通七百余年, 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 流通时间最久的钱币。

(冀莲芝)

青瓷

(qingci) 器表施有青色釉的瓷器，是我国著名的传统瓷器品种之一。青瓷色调的形成，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焙烧所致。但有些青瓷因含铁不纯，还原气氛不充足，色调便呈现黄色或黄褐色。我国历代被称为缥瓷、千峰翠色、艾青、翠青、粉青等都是指青瓷而言。唐代的越窑、宋代的龙泉窑、官窑、汝窑、耀州窑都属青瓷窑系。

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原始青瓷。目前在河南郑州、安阳、洛阳、巩县、偃师，河北藁城、北京，陕西西安，山东益都，安徽屯溪，江苏南京、丹徒等地商周遗址和墓葬中，先后出土了许多原始青瓷及残片，主要器形有尊、碗、盘、瓶、瓮、罐、豆等。经科学测定，它们已基本上具备了瓷器的特征，但与后来成熟阶段的青瓷比较，还带有原始性，如气孔较大，胎料中杂质较多，釉色还不够稳定，故称为原始青瓷。青瓷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到东汉有了重大突破。在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河南、甘肃等地东汉墓葬和遗址中，都出土了东汉的青瓷器。仅在浙江上虞县就发现了四处东汉瓷窑窑址，对其中小仙坛窑址做了发掘，并对其典型瓷片做了科学测定，结果表明，含铁量比原始青瓷少，胎体呈灰白色，胎质烧结，吸水最低的一片仅有0.16%，烧成温度为1310℃，采用龙窑焙烧，显微镜结构与近代瓷器基本相同，透明度也达到较高水平。说明东汉时期青瓷烧造技术已达到成熟阶段。因浙江上虞县一带曾是古越人的故乡，战国时属越国管辖，唐朝时称越州，所以这一带的瓷窑统称越窑。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各地烧制青瓷更为普遍，瓷窑增加，种类繁多，质量进一步提高，南方和北方所烧青瓷各具特色。南方青瓷，一般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色，釉色晶莹纯净，常用类冰似玉来形容。北方青瓷胎体厚重，玻璃质感强，流动性大，釉面有细密的开片，釉色青中泛黄。河北景县北齐封氏墓出土的青瓷莲花尊，造型非常漂亮，堪称北方青瓷的代表作。

(刘桂英)

西域都护

(Xiyu duhu) 汉代在西域设置的最高军政长官。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后，中西交通畅通，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但是，当时匈奴贵族还控制着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等国，经常出兵截击汉和西域各地的交通，攻杀汉使，掠取财物。元封三年（前 108）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并在酒泉（今甘肃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太初元年（前 104）又派李广利出征大宛，败大宛后，西域的交通更加畅通，西域各国和西汉的政治经济来往更加频繁。于是西汉把亭障延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又在楼兰、渠犂（今新疆塔里木河北）、轮台（今新疆库车县东）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宣帝地节二年（前 68），遣侍郎郑吉屯田渠犂，与匈奴争车师，有功，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以西“南道”诸国。至神爵二年（前 60），匈奴日逐王降汉，使郑吉发兵迎之，“北道”亦通，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因总领南北两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始于此。西汉时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当时称之为都护府。都护是汉朝驻西域的最高长官，都护以下，设有属官。都护职在统领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至新莽末年西域乱，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西域 18 国请复置都护，光武帝以国力不足，拒绝了 this 要求。明帝永平十七年（74），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和帝永元三年（91），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十四年，班超还洛阳，继任者有任尚、段禧。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乱，征禧还，自此不复置都护。至延光二年（123），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

（刘欣尚）

和亲

(heqin) 西汉为缓和汉、匈关系，嫁宗室女与匈奴单于。秦汉之际，居住在北方的匈奴族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势力空前强大，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刘敬传》）。匈奴贵族为了掠夺财物和奴隶，不断向外扩地，骚扰汉边，给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带来严重的威胁。刘邦封韩王信于代，都马邑（今山西朔县），以防御匈奴的进攻。高帝六年（前 201），冒顿单于率兵进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匈奴与韩王信勾结，又引兵南下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率大军往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陷入匈奴重围，此即所谓“白登之围”。被困 7 天，用陈平计，重贿匈奴阏氏，才得突围。自此，西汉政府感到自己实力不足，乃采用娄敬建议，与匈奴结“和亲之约”，汉把宗室女作为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每年奉送给匈奴大量的絮、缿、酒、米等物品，并与匈奴进行贸易。吕后时，单于曾写信侮辱吕后，吕后因国力不足，继续实行和亲政策。后来汉元帝亦遣宫人王昭君嫁与匈奴呼韩邪单于。西汉初实行和亲，使双方关系暂得和缓。在边境通关市、贸易往来，对汉匈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

（刘欣尚）

昭君墓

(Zhaojunmu) 又名青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前 33），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请求和亲。她以入宫数岁，不得见帝，自请嫁匈奴。后立为宁胡阏氏。自昭君出塞后，匈汉两族人民更加团结友好，边塞出现了几十年的安宁局面。史书上称其为：“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昭君的这些功劳，深深地打动了后人。

昭君墓表为夯筑的封土堆，高 33 米，被高大的绿色树木和碧翠的青草环绕，远远望去，颇有“黛色濛笼，若泼浓墨”之意。墓前有平台及阶梯相连，其形制与中原地区汉代帝王陵墓多有相似，墓前、墓顶各建有亭，以供游人憩息。附近建有陈列室，展出昭君的有关文物。墓前立有 1963 年董必武《谒昭君墓》诗碑，诗曰：“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名摅胸臆懣，舞文弄墨总徒劳”。

（吕瑞珍）

丝绸之路

(Sichou zhilu) 汉代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天山南北通往中亚西亚各国的贸易通道，因有大量的中国丝绸经此西运，故称为丝绸之路。汉以前，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西汉初年，河西走廊曾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地区各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汉武帝元光二年（前 133）以后，西汉政府开始大规模反击匈奴。元朔二年（前 127），卫青率汉军收复河套以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元狩二年（前 121），霍去病率军西征，大败河西匈奴军。匈奴浑邪王率 4 万人降汉。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建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以后又从敦煌到盐泽筑造了很多烽燧亭障，以防御匈奴南侵。前 77 年汉兵攻克当道的楼兰国，更其名为鄯善，将其国都迁至以南的扞泥城。前 60 年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于乌垒城，以保西域通道。至此丝绸之路日益畅通，大量丝绸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了中国。此后，王莽当政和东汉期间，西域曾几度因政局波动暂与汉廷短时中断联系，但商业往来并未受到很大影响。通过这条丝绸之路，汉与欧、亚、非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达 300 年。这条丝绸之路，大致说，东起汉长安，西行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先到楼兰。由楼兰分南北两道。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乌垒、轮台，再往西经龟兹、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扞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扞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由于千余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路东段逐渐沙漠化，伊循、扞泥诸古城均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路东段已远在今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73），东汉明帝派窦宪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卢（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南侵西域。此后，汉与匈奴曾互争伊吾卢而多次交战，终于迫使北匈奴西迁，汉政府遂开辟了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卢，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越天山至龟兹。再循汉北道西行抵疏勒。

（刘欣尚）

王莽改制

(Wangmang gaizhi)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称帝后在政治、经济制度上所进行的变动。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奴婢和流民问题已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封建统治的危机日益加深。哀帝死后，平帝即位，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于初始元年(8)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为了缓和早已激化起来的阶级矛盾，摆脱政治危机，王莽宣布改制。他针对土地和奴婢问题，下令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皆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并且规定了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一夫一妇授田100亩，一家男丁不满8口而占田超过一井(900亩)者，将多余的田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没有土地者可按标准分给土地。又针对豪强富商囤积居奇和高利贷盘剥，下令实行“五均六筦”。在首都长安和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市设立五均官，负责管理市场、平抑物价和征收工商税。由国家向人民无息或低息贷款，官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川税，借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税收。这些措施在实行过程中遭到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抵制和反对。尽管法令严禁买卖土地和奴婢，犯令者罪至死，但土地、奴婢的买卖照样进行。始建国四年(12)，王莽不得不宣布买卖“王田”及庶人者，勿拘以法。负责推行五均六筦的人员，大多是富商巨贾。他们与郡县官吏勾结，上下其手，牟取私利，不但没给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许多不便和痛苦。王莽还屡次改变币制，铸造大钱、契刀、错刀等货币，名目既十分繁杂，换算比值又极不合理，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官奴婢的以10万数。王莽改制的结果，不仅一般人民深受其害，贵族官僚、地主也在混乱中蒙受损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改制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绿林赤眉大起义。

(刘欣尚)

绿林赤眉起义

(Lulin chimei qiyi) 新莽时期发生的全国规模农民大起义。王莽改制后，法令烦苛，徭役繁重，加以天灾相因，民不得耕桑，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天凤四年（17），荆州一带发生饥荒，饥民数百人共推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为领袖，发动起义。不久，南阳人马武、颍川人王常、成丹等率众参加。起义军以绿林山为根据地，称“绿林军”。次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 100 多人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不久转入泰山。第二年，逢安、徐宣、谢禄、杨音等也聚众数万与樊崇会合。起义军用赤色染眉，以与敌军区别，因称之为“赤眉军”。地皇四年（22）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 10 万官军前来镇压。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大败莽军，廉丹被杀，王匡逃命。成昌大捷后，赤眉军乘胜向西发展，人数已达 10 万人，他们转战黄河南北，有力地动摇了王莽政权在东方的统治。这时绿林军在南方也有很大发展。地皇三年（21），绿林军在云杜（今湖北沔阳）打败前来围攻他们的 2 万多官军，乘胜攻占了竟陵（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钟祥）等地，起义队伍发展到 5 万人。第二年，绿林山一带发生瘟疫，他们分兵转移。一支以王常、成丹为首，西入南郡（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同年七月，新市兵进到随县（今湖北随县），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聚众数千起兵响应，称平林兵，与新市兵联合。在农民起义推动下，南阳豪族刘縯、刘秀兄弟也组织地主武装在舂陵起兵，并与新市、平林兵暂时联合，进行反莽斗争。后绿林军各路大军会合一起，在泚水（今河南泌阳）西大破官军，并包围了南阳。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了 10 余万人。地皇四年（23）月，绿林军首领拥立刘玄为帝，恢复汉国号，改年号更始。绿林军的节节胜利使王莽惊惧万分。他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各州郡精兵 42 万，号称百万，进攻绿林军。这年五月，在昆阳为起义军所败，主力全部被消灭。起义军乘胜北攻洛阳，西攻长安。两路大军进展神速，北路军很快攻下洛阳。西路军也迅速攻克武关，直取长安，王莽被杀。刘玄由洛阳迁都长安，大封汉宗室，重用旧贵族，还杀害一部分起义军首领。当绿林军攻占洛阳时，赤眉军首领樊崇等曾前往联络，但刘玄拒不与赤眉军合作。更始二年（24），赤眉军兵分两路西攻长安，讨伐刘玄。次年春两路军会师于弘农（今河南灵宝），拥立了一个 15 岁的汉宗室刘盆子为帝，建立了政权。接着西进至高陵（今陕西高陵），与绿林军将领王匡等联合。同年九月，攻入长安。刘玄投降，不久被绞死。由于豪强地主隐匿粮食，聚众反抗，长安城中粮尽，赤眉军被迫退出长安。东归途中，在宜阳（今河南宜阳西）遭刘秀大军包围阻击，全军覆没。坚持 10 年之久的绿林赤眉大起义至此失败。这次起义推翻了王莽政权的腐朽统治，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刘欣尚）

东汉

(Donghan25—220) 西汉远支皇族刘秀夺取绿林赤眉起义胜利果实后于公元 25 年建立的豪族地主政权。都洛阳。史称东汉。

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针对当时严重的奴婢问题，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26—38）先后 6 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3 次诏令禁止虐待奴婢；又曾组织军屯、减轻赋役、兴修水利；还下令裁并郡县，省郡国 10 个、县邑道侯国 400 多个；精减吏员，十置其一；并在中央削弱三公的权力，加重尚书台的职权，使其成为皇帝发号施令的机构；废除掌握地方军权的郡国都尉，取消地方军。以上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有效地保证了对全国人民的剥削与统治权力，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自光武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东汉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东汉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大力提倡儒学，又盛行谶纬，二者结合起来，使儒学被神化，儒家谶纬神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论衡》是其不朽著作。在史学方面，班固及其《汉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体系，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历史巨著。在科学技术方面，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造纸技术，对文化传播有着重要意义。科学家张衡发明浑天仪、地动仪，对天文学和地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医学家张仲景、华佗也有突出的成就。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064-1.bmp}

东汉政权是在南阳、颍川、河北等地的豪族地主官僚集团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豪族地主政权。在这个政权的保护下，东汉豪族地主势力迅速膨胀。他们一方面大量兼并土地和财产，控制大量的依附农民，建立起地主田庄，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察举和征辟，把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形成许多官僚集团。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争斗。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以及“党锢”之争，都是这一斗争的表现。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交相专权，造成政治极端黑暗和混乱。桓帝以后，宦官独揽大权。在他们把持下，察举制度败坏，官场黑暗，人选滥杂，贿赂公行。太学生和官僚集团联合一起，反对宦官专政。这场斗争以党人失败结束。党锢之后，东汉统治更加腐朽，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中平元年（184），由张角组织和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黄巾大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统治。后因割据势力增长，统一国家逐渐走向瓦解。延康元年（220），曹丕代汉称帝，东汉灭亡。

尚书台

(shangshutai) 东汉中枢机关。秦代于少府内设尚书，有令、丞。汉成帝时，初置“尚书”员5人，开始分曹办事。东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末年大权旁落于贵戚大臣，所以竭力把权力集中于君主，凡机密之事全部交给尚书，以此制约三公。因而加重了尚书的职权。因尚书的官署在宫禁内而称为台阁，故有尚书台之称。东汉尚书台组织有：尚书令一人，秩千石。若以公为之，则增秩二千石，仪礼亦加。尚书仆射一人，秩六百石。职署尚书事，尚书令不在，则代行处理公务。尚书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掌录文书期会，佐令、仆治事。六曹尚书，秩各六百石。三公曹，掌管年终对州郡官吏的考绩；吏部曹，掌管选举和祭祀；民曹，掌管一切有关修建和盐池苑囿的管理；客曹，掌管护驾边疆少数民族朝贺事务；二千石曹，掌管司法诉讼事务；中都官曹，掌管水、火、盗贼等治安工作。尚书侍郎36人，秩四百石，每曹6人，职掌文书起草。尚书令史18人，秩二百石，每曹3人，主书。东汉尚书台权力极重，既出诏令，又出政令；朝臣选举，由尚书台主管；还拥有纠察、举劾、典案百官之权；参预国家重大政事的谋议、决策，对朝政有着重大影响。尚书台权力虽重，但台官职位卑微，长官尚书令不过千石，尚在九卿之下，这样位卑权重，皆由皇帝亲任干练之士充任，便于控制，发挥效率高。东汉和帝以后，多幼君弱主，实权常被外戚、宦官所掌握。尽管三公要听命于尚书，但尚书又往往被实权更大的外戚、宦官所左右。

(刘欣尚)

地主田庄

(dizhu tianzhuang) 西汉末年，豪强地主已经用田庄的形式剥削农民。东汉王朝建立后，由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盛行，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和西汉末年的战乱等原因，豪强地主建立了一个个封建地主田庄。地主田庄的内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占有大片土地和山林川泽，种植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还经营手工业、渔牧业。四川出土的一些画像砖，刻画着地主宅院外面的大片稻田、池塘、山林和盐井；山东滕县出土的画像石，则表现了地主田庄中冶铁的情景。《四民月令》还记述了地主田庄进行各类粮食及农副产品买卖的情况。地主田庄的多种经营，保证了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依赖外界供应。在田庄里，剥削者和劳动者每每是聚族而居，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豪强地主利用宗族血缘关系作为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豪强地主的贫困的宗族亲戚，大多成为地主田庄的劳动者。田庄的主要劳动者还有宾客，徒附和奴隶。他们对豪强地主有极强的依附性。田庄的依附农民除了向田庄主交纳实物地租外，还要为田庄主服各种劳役。地主田庄还拥有私家武装，称“部曲”、“家兵”，由依附农民组成。他们在农闲时操练军事，平时为地主豪强看家护院，巡守警卫，战时则随豪强地主出征打仗，地主田庄的出现，是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由于东汉地主田庄的大量存在，使东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表现为封建国家的强大和统一的巩固，而是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地主田庄的私人武装虽然在平时起到了维护封建秩序，镇压人民反抗，保卫地主田庄的作用，但由于它是地主田庄经济的产物，在中央控制无力的情况下，它又可以表现为统一的对立物，成为封建割据的重要因素。

(刘欣尚)

满城汉墓

(mancheng hanmu)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及其妻窦绾墓。在河北满城西南约三里的陵山东坡，南北并排。1968年发掘，共出土随葬品4200多件。刘胜是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的哥哥，汉景帝三年（前154）被封为第一代中山王，统治中山国42年之久。中山国的范围包括易水以南，滹沱河以北的地方，相当今河北西部。两墓均开凿在山岩中。刘胜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容积约2700立方米。窦绾墓全长49.7米，最宽处65米，最高处7.9米，容积约3000立方米。两墓形制相似，均由墓道、南、北耳室、中室、后室等部分组成，以刘胜墓为例，南耳室为车马房，埋葬6套刘胜生前使用的马车，北耳室是贮藏食物、饮料的库房，放置有装酒的大缸，存放粮食、鱼、肉的壶、罐、瓮等。中室象征刘胜生前宴请宾客，饮酒作乐的大厅，在岩洞中建成瓦顶木结构建筑，摆满了铜、铁、陶、漆等质地的生活用品，如铜鼎、铜壶、漆耳杯等。后室又分为石门、主室和侧室等部分，在岩洞内用石板盖成，主室象征刘胜的卧室，内有用汉白玉铺成的棺床，上面放置刘胜的棺槨和许多贵重的器物，如玉璧、金饼等。棺槨已朽烂，但刘胜的金缕玉衣都保存完好，侧室象征刘胜的浴室，放置盆、灯、熏香炉等。这两座墓的建造，充分反映了统治阶级生活的奢侈。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65-1.bmp}

(齐吉祥)

金缕玉衣

(jīnlǚ yūyī) 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皇帝、贵族的葬服。由于在编缀玉衣时，按照等级分别使用纤细的金丝、银丝、铜丝，故又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等名称。1968年在刘胜墓中首次出土一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此后，在刘胜妻子窦绾墓中以及江苏、山东等地陆续出土了玉衣。刘胜的玉衣形体肥大，全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和1100克金丝组成。窦绾的玉衣全长1.72米，由2160片玉片和700克金丝组成。这两件玉衣的头部内都有用玉制成的眼盖，耳珥鼻塞和口琫。玉衣内的尸体早已朽烂。经过复原可以看到，玉衣的外貌和人的形体一样，由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组成。头部又可分为脸盖和头罩。根据上述不同部位，玉片的大小和形状也有不少区别，绝大多数玉片是长方形和方形，少数是梯形、三角形和多边形。制造一件玉衣大体有三个工序：1.造型设计，根据人体部位，决定玉片大小和形状；2.玉工工艺，每片玉都要切磋琢磨，四角钻孔；3.金工工艺，用既柔软又结实的金丝（或银、铜丝）加以编结。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我国在春秋战国之际，已出现玉衣的雏形，当时已有在死者脸上覆盖用玉石片制成的面罩的习俗。西汉时，玉衣的形制才告完成，同时玉衣这一名称也正式出现。汉代帝王、贵族使用玉衣作为葬服，主要原因是他们错误地以为玉衣能保存尸体不朽，实际上没有一具被玉衣包裹的尸体能避免腐烂。曹丕即位后，斥责使用玉衣是“愚俗所为也”，以玉衣为葬服的制度至此结束。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66-1.bmp}

(齐吉祥)

外戚干政

(waiqi ganzheng) 东汉和帝以后不断出现的外戚利用皇帝年幼把持政权的局面。章和二年(88)章帝死,年仅10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其兄大将军窦宪乘机操纵朝政,“威权震朝廷”(《后汉书·窦宪传》),窦氏兄弟并居要职。和帝稍大,对大权旁落于外戚不满,与宦官郑众密谋,逼迫窦宪兄弟自杀,窦家宗族、宾客全部免官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直接参政。和帝死后,邓太后立出生100多天的殇帝即位,殇帝2岁夭折,再立13岁的安帝。邓太后临朝,外戚邓骘兄弟又出面把持朝政。邓太后死后,安帝与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合谋废逐邓氏。安帝除倚重宦官,也起用皇后的哥哥阎显等掌管枢要,一时出现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延光四年(125)安帝死后,立幼童北乡侯为帝,阎太后临朝。阎显得势,把原来安帝宠信的宦官下狱处死,独揽大权。几个月后,幼帝病死,阎显又为宦官所杀,11岁的顺帝上台。144年顺帝死,2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太后兄大将军梁冀掌权。冲帝死,梁冀主谋立8岁的质帝。质帝少而聪慧,知道梁冀骄横,对群臣说:“此跋扈将军也”(《后汉书·梁冀传》),即被梁冀毒死。梁冀把正准备和自己妹妹结婚的蠡吾侯立为皇帝,是为桓帝。从此,梁冀专权日甚,大小政事一切独断。皇宫近侍皆其亲信,皇帝一言一行,他都“纤微必知”。在梁冀专权的20多年中,外戚的势力发展到顶峰。梁家前后7人封侯,3人做皇后,还有6个贵人,2个大将军,女眷中有7人食邑称君。族中还有3人娶公主为妻,各级将官多至57人。当时官吏升迁调动,要先到梁家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台办手续。延熹二年(159)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先后死去,桓帝乘机与宦官通谋,发兵围攻梁冀,迫其自杀。查抄他家财产,多达30亿,相当政府全年税租收入之半。从此,外戚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趋于衰落。

(刘欣尚)

宦官弄权

(huanguan nongquan) 东汉后期不断出现的宦官依靠或控制皇帝而进行专权的局面。永元四年(92)，宦官郑众与谋诛外戚窦宪有功而受重用，是东汉宦官参政控权的开端。从此，在皇帝对外戚争权的斗争取胜之后，宦官往往挟功自重，形成新的专权集团。这种局面常与外戚专政交替出现。桓帝以后，外戚势力渐衰，宦官专权则达到高潮。桓帝诛除外戚梁冀后，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因与谋有功，同日封侯，人称“五侯”。他们专权后，骄横跋扈，“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后汉书·宦者列传》)。这些宦官有的兼做朝官，禄重位尊，娶姬妾，蓄养子，传爵袭封。他们不但把持朝政，而且贻害地方，其“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依仗宦官势力，横行无忌，搜括百姓，与盗贼无异。宦官弄权，虐遍天下，民不堪命，造成全国性灾难。167年桓帝死，12岁的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其兄大将军窦武出掌朝政，与太傅陈蕃通谋诛杀宦官。事泄，宦官曹节、王甫先发制人，劫太后，挟灵帝，发兵攻杀窦武、陈蕃。自此，宦官借典禁兵掌握大权，连皇帝也形同傀儡。灵帝常说：“张常侍(宦官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后汉书·宦者列传》)光熹元年(189)，14岁的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密谋召边将董卓进京，图诛宦官。不料宦官提前下手，矫诏诳杀何进。后司隶校尉袁绍勒兵入宫，尽捕宦官，“无少长皆杀之”(《后汉书·何进传》)，从而结束了宦官弄权的局面。

(刘欣尚)

党锢之祸

(Danggu zhihuo) 东汉桓帝、灵帝统治时期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禁锢的政治事件。东汉自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延熹二年（159），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了外戚梁氏，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从此，宦官独揽朝政。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谋取私利，侵占土地，扩展势力范围。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官僚们痛恨宦官把持政权，影响了他们的权位；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也痛恨宦官阻塞了他们作官的道路。于是，官僚士大夫把抨击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宦官。他们评论朝政，褒贬人物，猛烈抨击宦官集团，史称“清议”。永兴元年（153）太学生数千人为曾打击宦官的朱穆辩护。延熹五年（162）太学生和部分官僚一起，为得罪宦官的皇甫规辩护，斗争渐从一般清议转为实际斗争。延熹九年李膺捕杀与宦官勾结、教子杀人的方士张成。宦官乘机指使张成弟子牢脩诬告李膺等人蓄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谤朝廷。桓帝于是下令郡国逮捕“党人”，李膺和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 200 余人均被收捕。次年，经过太学生贾彪活动，借助尚书霍谡、外戚窦武之力，“党人”始得“赦归乡里”，但仍“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汉书·党锢列传》）。永康元年（167）桓帝死，灵帝幼年继位，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为大将军，执掌朝政。他与太傅陈蕃起用李膺与被锢之其他名士，打算消灭宦官势力。后因事机泄漏，宦官先发制人，陈蕃被杀，又迫使灵帝收捕窦武。窦武举兵反抗，兵败自杀。宦官再度得势，重又逮捕“党人”，杀李膺、杜密等 100 余人，禁锢、迁徙数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段熲逐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宦官挟持灵帝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官僚士大夫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有一定的正义性。“党锢之祸”发生后，宦官势力增长，政治黑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刘欣尚）

黄巾起义

(Huangjin qiyi) 东汉末年发生的有组织有准备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横征暴敛，政治腐败达于极点。豪族地主兼并土地，加以天灾频仍，人民颠沛流离，到处暴动。太平道首领张角借治病传教，秘密进行组织活动，10余年间，徒众达30多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张角部署道徒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统一指挥；并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汉书·皇甫嵩传》）的政治口号。中平元年（184）二月，张角号令7州28郡诸方同时举行起义，起义军以黄巾包头，因称“黄巾军”。黄巾军斗争矛头直指东汉王朝和地主阶级。他们所到之处，焚烧官府，捕杀官吏，夺回被地主豪强霸占的土地，攻打地主田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建立了指挥起义的最高领导中心。黄巾军主力集中于冀州、颍川、南阳三个地区，分别由张角兄弟、波才及张曼成领导。面对全国同时爆发的这场大起义，东汉王朝十分惊恐，马上解除“党锢”，大赦“党人”，地主阶级内部联合起来，集中力量镇压黄巾军。东汉政府命何进为大将军，调集大军防守洛阳周围8个要塞；同时任皇甫嵩，朱 为左、右中郎将，率主力镇压距洛阳最近的颍川黄巾军；卢植、董卓等率军镇压冀州黄巾军。二至四月，黄巾军在各地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的率领下攻杀郡太守诸贡。颍川黄巾军在波才的领导下，不仅接连打败了皇甫嵩、朱 ，迫使他们统率的官军主力退守长社（今河南长葛东），而且把这4万官军团团包围。冀州黄巾军在张角兄弟领导下活捉了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五月，包围长社的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军因缺乏作战经验，依草结营，遭皇甫嵩火攻受挫，在官军与豪强地主武装联合进攻下，陷于失败，几万黄巾军将士惨遭杀害。朱 军转攻南阳，围宛城三月不下，战斗异常激烈，后张曼成、赵弘相继战死，宛城陷落，南阳黄巾军遂被镇压。当官军在颍川、南阳大施淫威时，张角亲自领导的冀州黄巾军，正以顽强的斗志抗击着东汉王朝派来的官军。他们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先后打败卢植和董卓军。八月，东汉政府把皇甫嵩调到河北前线，两军在广宗相持。在这紧要关头，张角不幸病死，广宗黄巾军由张梁指挥。九月的一天凌晨，皇甫嵩用偷袭的方法打垮了守城义军。十一月，又攻克冀州黄巾军最后一个据点——张宝驻守的下曲阳。张梁和张宝先后牺牲，近20万黄巾军将士遭到杀害。黄巾军主力经9个月激烈战斗，沉重打击了东汉地主阶级及其政权。此后，分散各地的黄巾军与农民武装，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达20多年。黄巾起义事先经过长期准备，组织比较严密。它公开宣布要推翻东汉王朝，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比以前的农民起义有显著的进步。由于起义农民本身的弱点，他们先后都被残酷镇压。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刘欣尚）

董卓之乱

(Dongzhuo zhi luan) 东汉末年地方军阀董卓奉调入朝后实行的暴政。中平六年(189)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外戚何进辅政。何进与贵族官僚袁绍合谋诛杀宦官,不顾朝臣反对私召凉州军阀董卓入京。后因谋泄,何进被宦官张让等所杀。袁绍带兵入宫,杀尽宦官,控制朝廷。随后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并领何进所属部曲,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吞其众。由此势力大盛,得以据兵擅政。他废黜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并自任太尉领前将军事,更封为郿侯,进位相国。又逼走袁绍等人,独揽军政大权。董卓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剽虏资物,淫掠妇女,以致人心恐慌,内外官僚朝不保夕。初平元年(190)袁绍联合关东各州郡兴兵声讨董卓。董卓见关东联军势盛,乃挟持献帝退往长安,临行把洛阳的金珠宝器、文物图书强行劫走,焚烧宫庙、官府和居家,并胁迫洛阳几百万居民一起西行,致使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无复子遗”(《后汉书·董卓传》),室屋荡尽。次年,董卓又授意朝廷封他为太师,地位在诸侯王之上,车服仪饰拟于天子。他还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子孙年虽幼小,男皆封侯,女为邑君。又筑坞于郿(今陕西眉县东渭水北),号“万岁坞”,积谷可供30年。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与董卓部将吕布合谋,终于刺杀董卓。百姓歌舞于道,“市酒肉相庆”。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率兵攻入长安,赶走吕布,杀死王允,大肆报复,吏民死者万余人。随后李傕劫持献帝,郭汜扣留公卿大臣。不久,李傕为曹操所杀,郭汜也为其部将所杀。经过这场动乱,关中地区二三年“无复人迹”,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

(刘欣尚)

王充和论衡

(wangchong he lunheng) 王充是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论衡》是他所撰写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哲学著作。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生于建武三年（29），卒于永元（89—105）年间。出身“细族孤门”（王充《论衡·自纪》），早年入太学受业，师事班彪，博通百家言。历任县、郡功曹、州从事和治中等职，后辞官归家。晚年虽生活潦倒，而埋头于著书立说。其中流传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论衡》全书85篇，实存84篇。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提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世界万物是由元气构成的，元气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他认为天无意志，日月星辰的运行，是自然规律，并不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否定了董仲舒以来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认为天有意识地创造了自然万物的理论。他反对鬼神迷信，认为人死则血脉枯竭，精气灭绝，形体腐朽，变成灰土，不会成为鬼，断然否定了当时流行的“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说法，从根本上揭露和批驳了谶纬迷信说教的荒诞和虚伪。王充还坚持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反对人有先验的知识，认为虽圣人也无生而知之。人的知识的获得，首先必须通过感官与外界事物接触，然后再进行抽象思维。只有这样获得的知识才是比较可靠的。他认为为了探求知识，质问和驳斥孔子，也不“伤于义”、“逆于理”。王充的这些观点打击了汉代统治者提倡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传统的尊孔观念，其著述在东汉末期以后产生重大影响。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勇于批判的精神，为中国古代后来的唯物主义者树立了榜样。由于当时生产条件和科学水平的限制，王充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作了不少错误的解释。他无法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不得不用宿命论来说明人间富贵贫贱的现象，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等。这是王充思想的重大局限性。

（刘欣尚）

司马迁和史记

(sima qian he shiji) 司马迁是西汉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史记》是他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人。生年有中元五年（前 145）与建元六年（前 135）等说法，卒年不可考。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和皇家图书，曾有志于编写古今通史。司马迁从小受到熏陶，熟读史籍。20 岁时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 108）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 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制定《太初历》。此后开始著述通史。天汉二年（前 99），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并遭腐刑。后获赦出狱，为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写出空前巨著《太史公书》，即后人所称《史记》。《史记》记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历时 3000 余年。全书包括 12 本纪，10 表，8 书，30 世家，70 列传，共 130 篇，52 万余字。这种以本纪和列传为全书主体的编史方法，是司马迁所首创。司马迁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即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研究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史记》取材丰富，对《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多所采摘，又利用了国家收藏的档案、民间保存的古文书传，并增添了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作者在广泛取材的同时，又注意鉴别和选择材料，淘汰无稽之谈，表现了审慎的科学态度。在撰写过程中，“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汉代以前，出现过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但就记事的久远、内容的广泛、史事的翔实、材料的系统、组织的完善来看，都不如《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记》堪称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由它开创的史书纪传体影响深远，后历代“正史”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司马迁以寓论于叙事之中的笔法，描写了许多历史人物，形象真切动人，洋溢着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史记》作为一部传记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后人对《史记》的注释有南朝宋人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宋代将三家注分别排入正文之下，便于阅读。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曾对书中史事加以考证。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便于参考。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史记》，为目前最佳版本。

（刘欣尚）

班固和汉书

(bangu he hanshu) 班固是东汉著名史学家，所著《汉书》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父班彪，曾任兰台令史，博学多识，是东汉史学家，曾作《史记》续篇《史记后传》65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开始整理《史记后传》。以后便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着手编写《汉书》。明帝审阅他的书稿后，很赏识他的才华，于是任命他为兰台令史，掌管皇家图书和校书工作。又令其继续编写《汉书》。和帝永元初年（89）窦宪出征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后因窦宪在政争中犯罪被杀，班固受株连免官入狱。永元四年死于狱中，时年61岁。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完。和帝命班固之妹班昭补作。后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续成。《汉书》记事，上起汉高祖元年（前206），下迄刘玄更始二年（24）的西汉一代230多年历史。计有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共100篇，120卷，总计约81万字。从体例看，《汉书》沿袭了《史记》本纪、列传的记事方式，不过改“书”为“志”，去掉了“世家”。《汉书》史料来源，前半部分多取《史记》，后半部分则多本《后传》。12纪是按西汉一代帝王顺序，从高祖开始到平帝为止，共12人，按给每个人写传记的体裁，编年纪其大事。8表中前6表分别谱列王侯世系，另有《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10志取法《史记》的8书，但记事比8书丰富、系统，被认为是《汉书》的精华所在。集中记述了西汉的典章制度，为研究西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汉书》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体例完整，记载系统完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西汉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一部重要的史学名著。《汉书》始出，学者莫不讽诵。但由于它喜用古字古训，比较难读。东汉末年，服虔、应劭已开始注音释义，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的《汉书》音注更多。唐颜师古汇集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阙，完成了《汉书》新注。至清末又有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多达67家。颜、王的注本，是《汉书》旧注的代表作。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汉书》标点校勘本，是较好的版本。

（刘欣尚）

秦汉的科学技术

(qin han de kexue jishu) 秦汉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各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多种生产技术趋于成熟，出现了一系列的有关科学技术的专门性著作。它们为后世的发展确定了总的模式。

在农学方面，出现了中国现有最早的农学著作《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关于农政思想方面进一步确立了“以农为本”的农本思想，提出了“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等一般作物栽培的基本原理和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措施。表明中国传统农学的基本体系已大致确立。汉代农具已逐渐全部铁器化，农具种类也趋于完备，还出现了不少新型农具，如耒车、风车、水碓等，说明人们对自然力的利用和机械技术的重大进步。

在医学方面，中国的完整医学体系也在这时建立起来了。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是秦汉以来医学临床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重要医学著作。它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写的是病理现象和治疗原则。《灵枢》记述了针灸法。东汉时期的华佗，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他在治疗外科病症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曾用麻沸散（麻醉剂）使患者失去知觉进行在现在看来也是难度很大的手术。秦汉时期的药物学也有很大进步。东汉时编成的《神农本草经》是较完备的药学著作，共收药物 365 种。

在天文历算方面，亦有很大成就。汉代天文学有很大的发展，关于天象的记录非常丰富。《汉书·五行志》中有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正式记录。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是天体结构浑天说的集大成者，较近似他说明了天体的运行，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张衡发明的水运浑象仪，对浑天说能得到广泛承认，起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颁行的《太初历》，对秦朝的《颛顼历》进行了改订。西汉末刘歆等人又根据《太初历》制成《三统历》，这是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完整历法。在数学方面汉代也有新的成就，写成于当时的《周髀算经》中已有了周密的分数运算和著名的勾股定理。东汉初年写成的《九章算术》对历代数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以解决社会各种实际需要（计算田亩面积、税收等）为主要内容，以算筹为主要计算工具，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10 进位值制的记数系统来进行各种运算，形成了一个包括算术、代数、几何等各科数学知识的体系。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69-1.bmp}

在地理学方面，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地学专著——《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公元一世纪初的全国行政区划以及沿革、户口、山川、物产者。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绘制在丝帛上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在当时具有这样高的绘制水平，是世界地图史上罕见的。汉代地理学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关于地震的测量研究。张衡发明并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位的仪器——地动仪。中国从永建元年（132）开始有了准确地震记录，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地震记录。技术也都取得显著的发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纸的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伟大贡献。

（刘欣尚）

画像石

(huaxiangshi) 指在石料上雕刻平面图像的石刻艺术，盛行于西汉至唐，多见于墓室、祠堂，也有的刻于石碑、石阙、门楣、棺槨等处。在雕刻技法上有阴线刻、浅浮雕和凹雕等。阴线刻就是用阴刻的线条表达物体形象。浅浮雕是把所要表达的物体形象以外的石面普遍凿去 1 厘米左右，使物体的形象凸出石面，凹雕是在物体形象的轮廓线以内凿成凹面的技法。画像石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诸如生产劳动，历史故事，乐舞杂技，车骑出行，建筑，天象等，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如 1954 年在山东沂南发现的一座东汉墓中，共有 73 块画像石，布满墓室的主要部位。其中一块画像石再现了东汉地主剥削农民收取地租的情景：画面左端是仓楼，右端是 3 辆满载粮食的车，车前有两个戴高冠的人袖手坐在长席上，他们是监督收粮食的地主或地主的管家，站在他们面前的 4 个人都是地主家的奴仆，有的忙着扫粮食，有的张着口袋装粮食。粮食堆旁地上放的大的是斗，小的是升。又如山东嘉祥武翟山下的东汉武氏祠内的石刻有历史故事，列女故事，孝义故事，神话传说等 25 种，有如历史画廊，其中一幅刻画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柱子右侧是惊慌奔逃的秦王，秦王脚下是吓得瘫倒在地的秦舞阳，柱左是怒发冲天的荆轲，他拼力投出的匕首击中了铜柱，秦王的侍从拦腰抱住了他。柱旁有秦王撕断的衣袖，地面上的匣子里装着樊于期的头颅，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跃然石上。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70-1.bmp}

(齐吉祥)

画像砖

(huaxiangzhuan) 起于战国时期，盛行于两汉，多在墓室中构成壁画，有的则用在宫室建筑上。画像砖主要用木模压印然后经火烧制成，也有的是在砖上刻出纹饰。画面的表现形式有浅浮雕、阴刻线条和凸刻线条。有的上面还有红、绿、白等颜色。多数画像砖为一砖一个画面，也有一砖为上下两个画面的。画面内容非常丰富，有表现劳动生产的，如播种、收割、舂米、酿造、盐井、桑园放牧等，有描绘社会风俗的如宴乐、杂技、舞蹈等，有神话故事如西王母、月宫等，还有表现统治阶级车马出行的。因此，它们不仅是美术作品，也是记录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实物资料。画像砖的形制有两种，一为边长 40cm 左右的方形，一为长 45cm 左右、宽 25cm 左右的长方形。分布地区主要是四川，偶见于河南等地。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70-2.bmp}

(齐吉祥)

文房四宝

(wenfangsibao) 大约从宋代起, 将纸、笔、墨、砚称为文房四宝, 从考古材料看, 西汉早期已有植物纤维纸, 1986年, 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座西汉早期墓中, 出土纸质地图一幅, 纸面平整光滑, 用细黑线绘制山、河流、道路等图形, 这是目前最早的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 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到两晋南北朝, 纸张已代替简、帛的地位, 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唐代造纸手工业遍及全国, 其中安徽宣州府出产一种用檀树皮和稻草制成的纸, 具有质地柔韧, 洁白平滑, 吸水性强等特点, 宜于毛笔书画使用, 人称为宣纸, 有“纸寿千年”的声誉。宋代开始用竹造纸, 纸的消费也急剧增大。

墨是书写绘画的色料, 在殷墟出土的商代陶片和兽骨上有用墨书写的文字, 但不知是用天然石墨(石炭)还是用烟灰作原料制的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一些小圆块状的墨, 是已知最早的烟墨。当时不能用手直接拿墨在砚石上磨, 而是用研石压着来研磨。东汉出现较大的制墨作坊。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留下了最早的一篇讲制墨工艺的《合墨法》, 他强调要用纯烟、精筛和熟捣, 这是因为墨的黑度与炭黑的纯度及颗粒大小有关, 炭墨越纯, 粒子愈细, 则墨色越黑亮。宋代在传统的用松烟制墨的基础上, 发明用动、植物油烟、漆烟、石油烟制墨,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称石油烟制墨“黑光如漆, 松墨不及了”。油烟墨很快得到书法家的青睐。

{ewc MVIMAGE, MVIMAGE, !99900320_0070-3.bmp}

毛笔是我国独特的书写绘画工具, 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已使用毛笔, 当时一些彩陶上的花纹就能看出笔的笔锋, 甲骨文中的“聿”(笔)字象一手握笔的样子。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是在湖南长沙、湖北荆门、河南信阳等地战国墓中出土的。甘肃武威出土一支东汉毛笔, 笔头的芯及锋用黑紫色硬毛, 外覆以较软的黄褐色毛, 既便于蓄墨又刚柔相济, 更适宜于书写。唐宋时, 安徽宣州制的“宣笔”(又叫徽笔)因选料精简, 加工细致而名噪天下。

砚以发墨快, 不损笔, 不易干涸, 易于洗涤和雕刻精美为上乘。陕西西安半坡和姜寨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后期石研磨器, 可能是砚的始祖。目前所知最早的石砚是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汉代有石砚、陶砚、铜砚等, 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瓷砚, 唐代烧制三彩砚, 山西绛州还用汾河泥加以漂洗淘澄, 烧制成澄泥砚。当时广东端溪、安徽歙溪的石材已被用来制成著名的端砚、歙砚。宋代普遍使用石砚, 在甘肃洮州(今临潭县)的洮河, 有一种碧绿色的石块, 制成石纹如海涛翻滚的洮河砚。上述端砚、歙砚、澄泥砚和洮砚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砚。

(齐吉祥)

马王堆汉墓

(Mawangdui hanmu) 在湖南长沙市东郊，共有三座墓，墓主人分别为第一代软侯利苍、利苍之妻和利苍的小儿子。1972年发掘了1号墓，1973年至1974年初发掘了2号墓、3号墓。三座墓的墓坑，形式基本相同，都是在地面下10多米深的地方修筑长方形竖穴，墓底和椁室周围，都塞满了木炭和白膏泥，然后填土、夯实封固。白膏泥粘性强，渗透性极低，对密封起决定性作用，1号墓室由于有1-1.3米厚的白膏泥，封固严密，使棺椁中形成缺氧、无菌、恒温、恒湿的环境，不仅棺椁保存完好，棺中的女尸及随葬品也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另两座墓，由于白膏泥堆积较薄且不均匀，影响了密封效果，尸骨早已朽掉。

1号墓女尸包裹覆盖20多层丝、麻衣衾，还随葬了大量的丝织品和衣物，由于品种多，保存好，清楚地反映了汉代的纺织水平，其中有2件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量都不到50克。1号墓和3号墓各在内棺上有一幅彩色帛画，均作“T”形，长近2米，所绘主题是“引魂升天”，内容上既有天界，也有人间，是十分珍贵的艺术品。3号墓中出土了一批写在整幅帛上的书籍，如《周易》、《老子》和医方等，绝大部分是古佚书，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1号墓和3号墓中还出土了共约500件漆器，有耳杯、盘、鼎、壶等，是各地发现汉代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乐器、木俑、兵器、竹筒等物。为了长久地保存1号墓女尸，现已将其进行解剖处理。

(齐吉祥)

汉魏服饰

(han wei fushi)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各项典章制度，包括服饰制度日益完备。汉孝明帝永平二年（59）制定了汉代朝服制及有关祭祀礼仪服饰，包括冠冕、衣裳、鞋履及佩饰等。

中国古代贵族与平民在头服上有严格区别。贵族戴冠、冕、冑等，平民戴帻。冠——是一般贵族男子所戴的普通帽子，但又和后代的帽子形制很不一样。它是用一个冠圈套在发髻上，上面用一根不宽的冠梁，从前到后，覆在头顶上。冠圈两旁有丝绳，在颌（下巴）下打结，把冠固定在头顶上，这两根丝绳叫纓。加冠后还要用笄（j 机）、簪（z n）左右横穿过冠圈和发髻加以固定。笄簪是根细长的钗子，一头锐，一头钝，并有纹饰。冕冠，是帝王和巨僚参加重大祭祀典礼的祭服。冕——包括旒板和垂旒两大部分。纒板是块长方形木板，延纵向装在冠圈上，后面比前面高些，戴在头上略向前倾斜，纒板外包绢，以黑色为主，里用红或绿两色。旒是纒板前沿挂着的一串串小圆玉。皇帝用 12 旒（即 12 排），其质地为白玉，公侯 7 旒，其质地为青玉，卿大夫 5 旒，其质地为黑玉。汉代以后，只有皇帝才能戴冕有旒，“冕旒”也就成了皇帝的代称。除了冠冕外，打仗时还要在冠上加冑。冑，是古名，秦汉以后叫兜鍪，后代叫盔。帻——秦朝曾以“巾帕”颁赐武将，和冠帽同时使用，但仅限于军队中，不曾为民间所用。西汉时平民不能戴冠，发髻上覆以巾，一直盖到前额，称为巾帻。巾帻分为介帻和平巾帻两种，上端突起，状似尖角形屋顶，称“介帻”，而形成顶平状的，称“平巾帻”。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71-1.bmp}

衣裳的“衣”字狭义特指上衣。汉朝时上衣种类有单、夹，长、短之分。袍——里面絮麻或丝棉的夹衣，为汉代男子服装。汉朝 400 年间，袍服一直被当作礼服。袍服样式以大袖为多，袖口部分却收缩紧小。《尔雅·释衣》称袖口狭窄部分为“袪”，袖身宽大部分为“袂”。袍服的领和袖，一般都用花边装饰。禅衣——即单衣。形制与袍略同，只是不用衬里，平时在家穿著，上朝时，可穿到朝服里面，一般不穿着在外。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72-1.bmp}

襦——指短上衣。长度一般只到腰间，穿时多配裙子。襦裙是汉代妇女的常服，也是中国妇女服饰中的一种主要样式，历经两千年之久。古代上衣的领子有两种：交领和直领。交领的衣领直联左右襟，衣襟在胸前相交，左襟压右襟，在右腋下挽结，领子也随之相交。直领是领子从颈后沿左右绕到胸前，平行地直垂下来。古人上衣外面要系带：分有大带、革带。大带束衣，革带上拴有佩物，然后再系到大带上。大带通常用丝制成。所谓金带、玉带，都是在丝带上饰以金、玉。

古代“裳”一般泛指下衣，狭义指裙。古代男女服装区别不大，男子也著裙服。袴——即今之“裤”字，但其形制和现在的裤子很不一样。古代“袴”没有前后裆，只有两个裤筒，套在膝部，用带子系于腰间，类似现在的套裤。用纨（织造细致的绢）制作的袴为有钱人所穿著，后来，“纨袴”一词专指富贵而不务正业者。如“纨袴子弟”。褌（k n 昆），和现在的裤子差不多，是一种有裆之裤。还有一种合裆短裤，因其形似犊鼻又名“犊鼻褌”，类似后代的短裤、裤衩。蔽膝——这是遮住大腿至膝部的服饰，与今天的围裙有些相似，所不同的是蔽膝较窄，较长，它并不象围裙那样直接系到腰上，而

是拴到大带上，其功用主要不是保护衣服，而是一种装饰。

汉代鞋履有屨(jù巨)、履、舄(xì戏)、屐、鞮等名目。屨、履——用草、麻、皮、丝均可制作。汉以前称为屨，汉以后则称履。用草编制叫“草屨”，葛藤加工制成叫“葛屨”。舄——是在鞋底子下面加一层木板，很象现在加钉一层鞋掌。有时也用舄泛指各种类的鞋。屐，是木鞋，有前、后二齿。

《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代妇女出嫁时，穿木屐，屐上绘彩画，并以五彩丝带系之。鞮，是一种皮鞋。古代也有皮靴，写作“鞞”，主要是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古人的袜子多用布帛、熟皮制作，穿袜子时要用带子系上，富贵人家穿丝质袜子。

古代佩饰中较常见的是玉佩，种类很多。环，是环形玉，当中的空心直径与四周玉的宽度相等。玦，即环缺了一块。璜，是半环形的玉。容刀，也是一种佩饰，佩在带上，即佩刀。人们最初佩带刀是为自卫防身，但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仪容，有刀形而无刃，纯为“样子货”。汉代特许大臣带剑上殿成为一种难得的荣耀。《史记·萧相国世家》：“于是乃令萧何(功)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佩饰中还有佩巾，称为帨(shuì税)。它既是装饰品又是日常用品，可用来拭手、去垢。古人佩饰有多种，而且随时代变化而增损变更。

魏晋时期的法制服饰基本上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太和八年(494)北魏孝文帝改革，规定：“群臣皆服汉魏衣冠。”汉族传统的服饰被保存下来。同时，各民族长期杂居，南北生活习俗趋于融合，汉服也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特点，更加称身合体，中原地区出现胡服盛行局面。幅巾——魏晋南北朝时，幅巾束首，是主要头服。苏轼《念奴娇》词：“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羽扇纶巾，是三国时代儒将的装束。纶巾，为汉代幅巾的一种，一般认为以丝带织成。因传说为诸葛亮服用，故又名“诸葛巾”。幅巾束首，即不戴冠帽，只以一块帛巾束首，始于东汉后期。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以黄巾束首为标志。

《晋书》记载，汉末王公名士“以幅巾为雅”，这种厌弃冠冕公服，以幅巾束首的风气一直延续到魏晋，仍十分流行。衫——大袖宽衫是魏晋南北朝时汉族的主要服装。衫与汉朝袍的区别是袖端不收敛，不受衣袴的限制，袖口特别宽敞。有单、夹两种。当时上自王公，下至百姓，都以大袖宽衫为时尚，尤其受魏晋佛教、玄学及道教影响，文人突破了旧的礼教，服饰的穿著趋向宽大，并有袒胸露脯的习俗。袴褶(zh者)，是由缚袴和褶衣所组成的服饰。虽出现于汉末，但早在战国时代就是赵武灵王引进的胡服之一。汉魏之际主要在军旅中穿着。魏晋以后，被广泛用于民间，同时也仍是军将武士的戎装。其特点：衣身紧而窄小，长与膝齐；袴管宽松，下长至足。袴褶束腰一般多用皮带，贵重的皮带镂饰金银，袴管的膝盖处，用锦缎丝带系扎，以便行动。袴褶的质料可用布缣锦缎，也有用野兽毛皮制作，这主要用于官员临戎戒严和狩猎出征。裆——与背心形制相似。《释名·释衣服》称“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分前后两片，质地主要是布帛，肩部以皮制袷襻联缀，腰间用皮带系扎。有的裆之内，还纳有丝棉，是后代“棉背心”的最早形式。裆虽为男子服饰，但当时妇女也可服用，只是最初多穿在里面，以后才将它穿在交领衫袄之外。也有妇女在穿著裆的同时穿著褶的，但这种装束主要在北方，并且妇女头上往往戴有笼冠，与同时期男子装束无太大区别。受北方习俗影响，除袴褶外，其他少数民族服饰，如窄袖短衣、蹀躞腰带、

长鞞皮靴等也被汉人所普遍采用。

(孙彦贞)

三国

(sanguo220—265) 东汉王朝灭亡后，出现的魏、蜀、吴三个政权分裂割据的时代，亦指魏、蜀、吴三国。东汉末年的地方割据势力，经过近 20 年的混战兼并，在赤壁之战后，最终形成了曹操、孙权和刘备鼎足三分的局面。延康元年(220)，曹操死后，子曹丕称帝，国号魏，都洛阳。次年，刘备也在蜀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都成都。8 年后，孙权在江东称帝，国号吴，都建业(今南京)。

魏在三国中最为强大，其疆域大致为江淮以北，东至今辽宁，西及今甘肃。魏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中央虚设三公，置中书省执掌机要，中书省与门下、尚书同为中枢，这就是后来三省制的雏型。建立九品中正制，直接控制官吏选任。实行虚封，宗室子弟名义上受封为诸侯王，实际上毫无实权，还受到严密监视。地方为州、郡、县三级制，另派都督领兵驻扎各地，或兼任州刺史。经济上进一步恢复发展，继续推行屯田，开垦荒地，出现“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景象(《晋书·食货志》)。冶铸、丝织业都陆续恢复。五铢钱又重新流通。洛阳、邺城(今河北临漳)成为北方繁荣的城市。但是，世家大族的势力正在迅猛增长，其代表人物司马懿已大权在握，羽翼丰满，便于正始十年(249)发动政变，一网打尽中央的曹氏亲党，架空魏帝。景元四年(263)，魏灭蜀汉。咸熙二年(265)，懿孙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073-1.bmp}

蜀汉偏安益州一隅(相当于今四川、云南、贵州和陕西汉中地区)，疆域在三国中最狭小。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辅佐后主刘禅。内修农战，发展蜀中农业、手工业，平定南中，“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充实蜀国的军事、经济实力。但多次北伐，虽抑制曹魏南侵，亦消耗甚大。自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死后至延熙十六年(253)，执政蒋琬、费祎采取守势，只派兵据险固守，没有大举北伐，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继续发展。此后姜维执政，又连续出兵攻魏，国力虚耗；而宦官黄皓逐渐攫取大权，政治日益腐朽。姜维惧祸，领兵在外，不敢复还成都。炎兴元年(263)，魏派大军分两路攻蜀，刘禅出降。蜀亡。

孙吴疆域在江淮以南、三峡以东。孙权继承父孙坚、兄孙策的基业，依靠江东大族，建立强大的武装。其将领父死子继，世袭领兵，立功或死后可获得增兵、赐依附民的奖赏。以武力征服山越，壮者为兵，弱者补为编户，客观上有利于山越人居住区经济的开发。由于劳动力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改善、实行屯田和开垦荒地，江南农业有长足的发展，丝织麻织、铜铁采冶等都有进步，能制造上下 5 层，容纳 3000 人的大船。派聂友领兵进入珠崖、儋耳(即海南岛)，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远航夷洲(今台湾)，加强宝岛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孙吴赋役繁重，刑罚残酷。孙吴后期，起义不断发生，而暴君孙皓沉湎酒色，大修宫殿，滥杀无辜，朝野人人自危，上下离心。天纪三年(279)，西晋大举伐吴，吴军望风而降。次年，孙皓投降，吴亡。

(陈琳国)

官渡之战

(Guandu zhizhan) 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官渡战前,袁、曹是北方的两强。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人。袁氏四代有五人出任三公,势倾天下。董卓之乱时,袁绍被推为讨董联军的盟主,以后占领冀、幽、并、青四州,兵多将广,粮草丰足。当时,曹操占据兖、豫二州和司隶,挟天子以令诸侯,又屯田积谷,发展生产,亦生气勃勃,但势力终不如袁绍。建安四年(199),袁绍集中精兵10万,骑万匹,准备进攻曹操。谋士沮授等加以劝谏,绍自恃地广兵强,不听。曹操闻讯,立即进兵扼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继而分兵屯官渡。不久,刘备叛曹袭取徐州,遣使与袁绍连兵。次年(200)正月,曹操派兵进击刘备,时袁绍竟因儿子有病不肯乘机攻曹,丧失了大好战机,使曹操在击溃刘备后从容回师官渡。二月,袁绍始派遣大将颜良进围曹军侧翼刘延于白马,而自领大军进驻黎阳,准备渡河。曹操声东击西,佯装北上延津(今河南延津北)攻击袁军后方,袁绍果然分兵西去迎敌,但曹操却突然引军急趋白马,大破袁军,斩杀颜良。白马之围解除后,曹操率领军队与百姓沿河向官渡撤退,袁绍派大将文丑等领6千骑兵追击。至延津南,曹操令置辎重于道上引诱袁军,袁军中计,纷纷争抢辎重。曹军不满6百,猛然出击,杀死文丑,大获全胜。此后,两军在官渡相持数月。曹军军粮不继,处境艰难;百姓疲困,多叛而归袁。曹操准备放弃官渡,退守许昌。谋士荀彧主张不可后退,先退者败,操从或议,坚守不动。九月,袁绍运粮车数千乘送军粮到官渡,曹操派兵截击,烧毁粮车。十月,袁绍又从河北运来军粮万余车,由部将淳于琼领兵1万多人押运,以防曹军再次袭击。这时,袁绍谋士许攸叛归曹操,报告袁军运粮至乌巢(今河南延津县境)的情况,并建议派兵夜袭乌巢。曹操遂亲领5千精兵,换上袁军旗帜,每人带一捆干柴,连夜从小道进发。曹军到达乌巢,包围了袁军,放火焚烧军粮,袁军顿时大乱。袁绍得知曹操奔袭乌巢,以为曹军大营必然空虚,派大将张郃以重兵劫营,只派少数骑兵救援乌巢。张郃遭到曹军顽强抵抗,久攻不下,而乌巢已经失守、军粮烧尽,张郃见大势已去,便率军投降曹操。曹军乘胜出击,袁军完全崩溃。袁绍只带着长子袁谭和800骑兵逃还河北。建安十年(205),曹操彻底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基本上统一了北方。时人说:“袁公(绍)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操)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三国志·魏书·杨阜传》)这个分析和比较大体是中肯的,官渡之战之所以曹胜袁败的原因就在于此。

(陈琳国)

曹操

(Cao Cao 155—220) 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沛郡谯县（今安徽亳县）人。祖父腾，东汉大宦官，任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父嵩，腾养子，官至太尉。操少任侠，性机警，博览群书，尤好读兵书。20岁时举孝廉为郎，历洛阳北部尉、顿丘令，以骑都尉参与镇压颍川黄巾有功，迁济南相。严肃法纪，惩治贪污，而不避贵戚。灵帝建西园新军，操任统帅之一的典军校尉。董卓之乱时，逃至陈留，聚兵五千，参加以袁绍为首的讨伐董卓盟军。初平二年（191），引兵入东郡镇压黑山农民军。次年，领兖州牧，诱降青州黄巾军30余万，男女100余万口，以其精锐改编为青州军，势力大振。建安元年（196），汉献帝从长安逃还洛阳，操把他迎至许县（今河南许昌），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是年，在许县周围兴建实行屯田，获谷百万斛，部分地解决了当时极为急迫的军粮和流民问题。其后连战皆捷，破袁术、擒吕布、平张绣，消灭黄河以南的许多割据势力。建安五年（200），在官渡战胜北方最大的割据者袁绍，进而消灭袁绍余部，平定乌桓，占领青、冀、幽、并等州。建安十三年（208），进位丞相，率大军南征，准备统一全国，但受挫于赤壁。十六年（211），平定关中、陇右及河西四郡，完成统一北方大业。建安十八年（213）进封魏公；建安二十一年（216），更进为魏王。死后被谥为魏武帝。曹操主张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地提拔一批才能出众的谋臣猛将；谋略过人，又比较能倾听部下意见；敢于抑制豪强，虽亲戚亦不加宽宥；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故能令行禁止；反对奢华，自奉节俭，蔚成俭朴之风。曹操一生成就很大，他不仅是建安时代政治上的领袖，而且是建安文坛的领袖，建安文学的代表。史称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所著诗篇气势雄浑，慷慨悲凉，极富感染力。又精通兵法，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

（陈琳国）

屯田制

(tuntianzhi) 国家强制农民或士兵耕种国有土地，征收一定数额田租。渊源于西汉，至曹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西汉前元十一年（前 169），汉文帝以罪人、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汉武帝调发大批戍卒屯田西域。但当时屯田主要集中于西、北部边陲，主要方式为军屯，且规模不大。东汉末年，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粮食短缺，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在许都（今河南许昌）附近进行屯田。屯田的土地是无主和荒芜的土地。劳动力、耕牛、农具是镇压黄巾起义中掳获的，有一部分劳动力号称招募其实是被迫而来的。据说当年屯田收获谷物百万斛，缓解了社会矛盾。“于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曹魏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每 50 人为 1 屯，屯置司马，其上置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典农中郎将，不隶郡县。收成与国家分成：使用官牛者，官 6 民 4；使用私牛者，官民对分。屯田农民不得随便离开屯田。军屯以士兵屯田，60 人为 1 营，一边戍守，一边屯田。曹魏屯田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创造了物质条件。但屯田制的剥削较重，屯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身分不自由，屯田士兵则更加艰苦。三国时期，吴、蜀也都实行过屯田，只是规模和成就都不及曹魏。曹魏后期，屯田剥削量日益加重，分配比例竟达官 8 民 2 的程度，引起了屯田民的逃亡和反抗。屯田土地又不断被门阀豪族所侵占，于是屯田制逐渐破坏了。咸熙元年（264）政府宣布废除民屯。兵屯虽然继续存在，但作用已经不大了。

（陈琳国）

世兵制和兵户

(shibingzhi he binghu) 世兵制是魏晋南北朝主要兵制。实行兵、民分籍，凡入兵籍的士兵及其家属为兵户。兵户世代为兵。汉代实行征兵制，平民轮番服兵役，服兵役时为兵，退役为民。汉末战争频繁，人口锐减，兵源枯竭，征兵制逐渐衰落。为保证稳定的兵源，以适应征战戍卫之需，于是有了世兵制。建安（196—220）年间，曹操把士兵家属集中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可见兵、民已经分籍。魏晋兵户亦称士家，此后又称为军户、营户、镇户、府户等等。兵户男子年满16岁以上，国家可随时征调为兵，士兵行军作战居无常处，衣食不周，生死难卜，被人视为畏途；而兵户仍须承担国家各种徭役义务，士兵逃亡，又罪及家属，使兵户的处境十分艰难。兵户只有经过政府允许，才能脱离兵籍，恢复平民身分，这些都是兵户的社会地位较低的原因。东晋以后，政府以奴客、逃户、降民、罪犯及被征服的异族人民补充兵户，他们来源于低贱的社会阶层，遂使兵户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形同奴隶，处境极为悲惨。生活的困苦和地位的卑贱，严重削弱士兵的战斗力的，导致世兵制的衰落。后来国家以免除兵籍作为刺激士兵力战的手段，其结果是促成世兵制更快地破坏。

（陈琳国）

九品中正制

(Jiupin zhongzhengzhi) 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又称九品官人法。西汉选官主要由朝廷征聘和州郡察举，征聘察举例由地方官吏听取当地名士的评议并加以考察，此所谓乡举里选。东汉末年，战争频仍，许多士大夫避难迁徙，流移异乡，乡举里选已不可能，朝廷选官则无从考察与核实。延康元年(220)月，曹丕乃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法。这一制度是在中央选择“贤有识鉴”(《资治通鉴》卷69，黄初元年)的官吏，兼任其原籍所在郡的“中正”官，负责考察同籍贯流散在各地的士人，评定等第。等第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即九品。中正将评定结果申报吏部，作为吏部铨选官吏的依据。后来，州又设大中正，亦由籍隶本州的中央官兼任。九品中正制本为区别士人优劣，选拔人才，初行时确有利于改变大族名士操纵选官的局面，能够选任一些比较有用的人才。但九品中正制很快就蜕化为门阀士族维护其特权的工具，中正之职通常把持在士族官僚的手中，而中正评定品第则只问门第，不看才能。门第高的子弟品第就高，门第低的子弟品第就低，故至西晋时，经中正评定的九品人士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只有门阀子弟才能经过中正品第获得较高的官职。

(陈琳国)

赤壁之战

(Chibi zhizhan) 东汉末年，曹操大军与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今湖北嘉鱼县东北）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从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在基本统一北方后，企图一举扫灭南方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挥师南征荆州割据者刘表。这时，刘表刚刚病死，继立的次子刘琮闻风丧胆，遣使请降。原来投靠刘表的刘备匆促南奔江陵，而被曹军轻骑大败于当阳长坂，备妻子人众辎重等多失散，后与刘表长子刘琦及所领万余人会合，退守夏口（今湖北汉口）。曹军进抵江陵，收降荆州 7—8 万军队，总兵力达 20 余万，而号称 80 万大军。曹操送信给孙权，胁迫其投降，又顺流东下，直驰夏口，威胁刘备。此时，孙、刘形势至为危急，孙权派鲁肃进见刘备，刘备则派诸葛亮去游说孙权，共商联合抗曹大计。于是，孙权决定与刘备结盟，派遣大将周瑜、程普、鲁肃统领水军 3 万与刘备共御曹军。初次交锋，曹军失利，遂引船舰撤至北岸，屯于乌林（今湖北嘉鱼县西北）。周瑜等泊于南岸，两军隔江对峙。曹军长途跋涉，“远来疲敝”（《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加之水土不服，军中已经流行疫病；荆州降卒“尚怀狐疑”（《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缺乏斗志，所以曹军人数虽众，士气却不高。又北人长于陆战，而不习水战，惧怕风浪颠簸，曹军竟用铁索将船舰捆在一起，如此固然使士兵免受晕船之苦，但船舰的行动也就非常不便。周瑜部将黄盖见曹军船舰相连，就建议用火攻。黄盖派人送信给曹操，诈称投降，随后用艨冲斗舰数十艘装载干草枯柴，灌上油膏，上面覆盖帷幕，乘着猛烈的东南风扬帆驰往北岸，一边让士卒高喊：“投降！投降！”曹军士兵都出来观看。待离曹军 2 里余，黄盖令一齐放起火来，火烈风猛，船飞如箭，撞向曹军船舰，曹军船舰顿时烈焰冲天，又迅速延烧到岸上营寨。周瑜等见北岸火起，立刻擂鼓过江，攻击曹军。曹军大溃，人马烧死、溺死者无数，其余退保南郡。刘备和周瑜又指挥军队乘胜追击，一直追赶到江陵。赤壁一仗，使曹军遭到很大挫折，足见曹操尚未具备统一全国的力量，而骄傲轻敌，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刘备在赤壁之战中获利最大，占领荆州四郡，有了发展的基础；而孙权在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后，政权更加巩固了。

（陈琳国）

彝陵之战

(Yiling zhizhan) 三国时孙权与刘备因争夺荆州在彝陵(又作“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荆州是当时的战略要地,关系孙、刘双方的生存与发展。赤壁之战中,刘备轻易占领荆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孙吴一直耿耿于怀。建安二十一年(216),当刘备夺取益州后,孙、刘经过一番较量,暂时达成妥协:以江夏、长沙、桂阳归孙吴,而南郡、零陵、武陵归刘备。然而,荆州之争并没有结束。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荆州守将关羽出兵攻取曹魏襄阳,进围樊城。时连日暴雨,汉水泛滥,曹军主将于禁所督七军尽被困没水中。关羽俘获于禁及曹军步骑兵3万,一时威震华夏。曹操为解樊城之围,许割江南地封孙权,令孙权攻击关羽后方。孙权原来就在图谋夺取荆州,遂派大将吕蒙智取南郡和荆州首府江陵,又击溃关羽军队,擒杀关羽父子。孙、刘关系至此完全破裂,终于酿成彝陵之战。蜀汉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为重新夺取荆州、替关羽报仇,不听大臣劝阻,也拒绝孙权的和议,发动对孙吴的大举进攻。蜀军先锋吴班、冯习率4万人攻破巫县(今湖北巴东),直进秭归(今湖北秭归)。次年初,前军推进到彝陵,而刘备亦亲自率军深入吴境,立行营于猓亭(今湖北宜都北)。蜀军从巫峡至彝陵,立屯数十,“树栅连营七百余里”(《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气势颇壮。面对蜀军攻势,孙权派名将陆逊为大都督,率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等,士卒5万,迎击蜀军。吴军开始处于劣势,当刘备一再派兵挑战时,陆逊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不出。有些将领竟以为陆逊胆怯畏敌,他也不为所动,严令坚守阵地,不准擅自出兵。从年初至六月,蜀军毫无进展,却逐渐暴露出弱点来。由于天气燥热,将士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戒备松懈。这时,陆逊及时抓住战机,下令采用火攻。吴军士兵各持茅草一把,接近蜀营时,以茅草点火烧营。40多座军营,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火海,蜀军仓皇逃窜,全线崩溃。将领张南、冯习战死。刘备仓促间逃上马鞍山(今湖北宜昌西北六十里),陆逊领追兵四面攻击,蜀军死者万余人。当晚刘备乘夜色掩护逃遁,幸得驿站士卒焚烧军械铠甲阻断追兵,才逃回了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彝陵之战使蜀汉遭到惨重的失败,史称蜀军“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飘流,塞江而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刘备不听劝阻,凭感情用事,又不善用兵,彝陵之败,乃咎由自取。败归白帝城的第二年,刘备羞愧发病而死。

(陈琳国)

诸葛亮

(ZhuGe Liang 181—234) 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原籍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东汉末年避乱躬耕于南阳邓县隆中(今湖北襄樊市西)。亮素有大志，富于谋略，被人称为“卧龙”。建安十二年(207)，败走荆州、依附刘表的刘备势力寡弱，乃三顾茅庐求见诸葛亮。亮洞悉天下大势，为之剖析说：“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因此，他提出据荆州、取益州的策略，指出：“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策”。应刘备恳请，诸葛亮出山为之辅佐，刘备自喻是如鱼得水。次年，曹操兴兵南下，孙、刘危急。亮积极主张联吴抗曹，他游说孙权，坚定孙权抗曹的决心，又与周瑜等指挥赤壁之战，表现出杰出的外交和军事才能。赤壁战后，亮任军师中郎将，刘备西进益州，亮初与关羽留镇荆州，后率兵夹击刘璋。益州平定后，亮为军师将军。刘备领兵出战，亮保障供给。刘备称帝，亮任丞相。蜀汉章武三年(223)春，刘备病死，亮受命辅佐后主刘禅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己。他遣使通吴，重新缔结蜀吴联盟，解除东顾之忧；继而用兵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采取攻心战术，七擒七纵反叛的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又用叛乱四郡的夷汉首领统治本地，使“纲纪粗定，夷汉粗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对南中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起了促进作用。从建兴六年(228)起，诸葛亮集中兵力进行北伐，先后六次出师，但终因国力小力弱、粮运困难，不能有所作为。他治蜀有方，执法严格而公允，赏罚分明，经常亲自检查相府文书和刑狱案件，故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他重视农业，发展生产，在蜀中则注意兴修水利，出兵则屯田以供军饷；他还设置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掌管盐铁和铸钱，故虽连年出兵，经济上仍有所发展。诸葛亮性极聪明，改进“连弩”(一种兵器)，发明名为“木牛”、“流马”的运输工具，又精通兵法，著“八阵图”。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在北伐曹魏时，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死后内无余帛，外无余财，实践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夙愿。

(陈琳国)

西晋

(Xijin 265—316) 朝代名。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短暂的统一王朝。曹魏咸熙二年(265)，司马炎逼迫魏帝退位，自立为帝，是为晋武帝；国号晋，史称西晋。都洛阳。太康元年(280)，西晋出兵灭吴，重新实现全国的统一。

西晋是代表门阀士族利益的政权。政治上重用宗室，实行家族式的统治。不仅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允许王国建立军队，而且以诸王出任都督，作为藩屏。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而中正定品只论门第高低，“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当朝权贵)之昆

弟”(《晋书·段灼传》)。又修订《晋律》，号称宽简，实质上是宽纵门阀士族，对老百姓却十分严酷。经济上罢农官，废民屯，实行占田、课田和户调制，同时规定官吏可依官品高低占有土地(一品官占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九品官仍可占10顷之多)和佃客(一、二品官占15户，三品占10户，至八、九品占1户)。官吏还可荫庇亲族免除赋税徭役，而没有做官的士族也享有这种荫族特权。西晋前期，社会趋于安定。晋武帝屡次责令郡县劝课农桑，禁止私募佃客，实行占田制。这些措施有利于自耕农数量的增加。太康(280—289)中，生产恢复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但是，西晋统治集团很快就暴露出奢侈、腐败、贪婪、残忍的本性。晋武帝在灭吴之后，后宫姬妾近万人，荒淫无度，又卖官敛财。官僚贵族亦以淫奢相竞。大臣何曾每天吃饭花费1万钱，还说没有可下筷子之处。其子何劭一天则要2万钱。石崇后房以百数，饮食穷尽山珍海味。他与晋武帝舅父王恺斗富，恺以紫丝布作步障40里，他则作锦步障50里；他以花椒泥涂屋，恺则用赤石脂。晋武帝经常帮助王恺，曾赐给一株高2尺的珊瑚树，造型优美。恺拿出来炫耀，竟被崇用铁如意击碎。恺气急败坏，而崇一下子取出高三四尺的珊瑚树六七株，皆光彩夺目。百崇每次宴客，让美人行酒，客人不喝，便将美人杀掉。有的客人故意不喝，看石崇杀人取乐。奢侈刺激了贪欲，腐败的风气在整个统治阶级中蔓延。虽然有少数人对前途表示忧虑，著文加以抨击，如鲁褒作《钱神论》讽刺钱能通鬼神的丑恶现象。但更多的官僚名士安之若素，既拼命寻欢作乐，又伪装清高，用玄谈来为自身的腐化堕落辩解。

西晋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太熙元年(290)，武帝死后，惠帝司马衷继位。惠帝是个白痴。为争夺对这个傀儡的控制权，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终于演成“八王之乱”，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八王之乱”造成的破坏和接连不断的天灾，驱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四出流浪，漂流异乡，而内迁于秦、雍、幽、并诸州的匈奴、羯、氐、羌、鲜卑和氐等少数民族人民也深受其害，于是纷纷举行反对西晋统治的起义。元康四年(294)，匈奴族人郝散起兵上党。元康六年(296)，氐人齐万年起兵关中，匈奴、羌人都奋起参加，声势浩大，连败晋军。接着，略阳、天水六郡的汉人和氐人流民10余万进入巴蜀，在李特领导下起义。太安二年(303)，荆州也爆发了张昌起义，一时发展到几十万人，波及荆、江、扬、徐、豫五州。永兴元年(304)，并州匈奴首领刘渊在左国城起兵，羯人石勒在关东起兵，王弥在青徐起兵。后石、王都降于刘渊，汇成一股巨大的势力。一面是西晋统治阶级的相互屠杀，一面是各地各族人民起义的沉重打击，西晋王朝十分虚弱了。永兴三年(306)，东海王司马越成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

者，控制惠帝，掌握朝政；次年毒杀惠帝，立怀帝司马炽。永嘉二年（308），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全力进攻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军攻陷洛阳，俘获怀帝。后晋残余势力又在长安拥立秦王司马邺为帝，是为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匈奴军夺取长安，再俘获愍帝，西晋王朝至此灭亡。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77-1.bmp}

（陈琳国）

占田、课田和户调制

(zhantian ketian he hudiaozhi) 西晋的土地、田租和赋税制度。魏末晋初，在屯田制逐渐破坏的情况下，中央两次下令废除屯田制，原屯田官转为郡县地方官，屯田民则变成郡县的编户。太康元年（280），西晋统一全国后，颁布了占田、课田和户调令，实行新的土地，田租和赋税制度。占田、课田令规定：每一男子占田 70 亩，女子 30 亩。丁男课田 50 亩，丁女 20 亩（男女 16~60 岁为丁）；次丁男 25 亩，次丁女不课田（男女 13~16 岁、60~65 岁为次丁）。占田数，是国家允许农民占有土地的限额，不是由国家授予农民的土地数。国家限制农民占田不得超过这个限额，而实际上能否达到这个限额则不管。课田数，是农民必须缴纳的田租的田亩数，每年每亩田租 8 升，50 亩为 4 斛。边远地区不实行课田的少数民族分三等缴纳：稍远者每户每年交“义米”3 斛，较远者 5 斗，绝远者每人钱 28 文。户调令规定：丁男为户主者，每户每年交绢 3 匹，绵 3 斤；丁女及次丁男为户主者，交丁男户的一半；边远郡县交三分之二，最远者交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交“宝布”1 匹，远者 1 丈。西晋土地租赋制度承袭曹魏而对小农的剥削明显加重，田租由曹魏每亩 4 升增至 8 升，户调由每户绢 2 匹、绵 2 斤增至绢 3 匹、绵 3 斤。不仅如此，曹魏田租承担者是确实拥有私有土地的小农，而西晋小农不管是否拥有 50 亩土地，却都要交 50 亩地的田租，丁口越多，田租负担越重，这是不利于小农而有利于豪强大族的政策。

（陈琳国）

士族

(shizu)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部分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家族所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东汉世家豪族发展的延续，是士族的渊源；而魏晋统治阶级的政策是导致士族形成的直接原因。曹魏九品中正制规定门第为定品的主要条件，使当朝显贵子弟官运亨通；魏、吴给公卿客户和西晋官吏可按官品占田荫客，使显贵广占田地、佃客和奴婢。因此，魏晋士族必是当朝显贵，只有在魏晋获得政治地位，尤其是在魏晋蝉联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名士族。如琅邪王氏，王祥仕魏晋，累迁太常、司徒、太尉、太保；颍川庾氏，庾亮为魏太仆，从子峻为晋司空；陈郡谢氏，谢纘为魏典农中郎将，子衡为晋国子祭酒等。东晋是士族势力发展的鼎盛时期。东晋政权是司马睿倚仗琅邪王氏之王导、王敦等的策划和支持建立起来的，故谚称“王与(司)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其后门阀士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轮流执政，而形成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之局。这时士族势力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演化成门阀政治。士族为维护自身利益，故修撰族谱，禁止与非士族的寒门联姻，拒绝与寒门往来。南朝刘宋时，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有一次去拜访士族张敷，敷命移座远客，不与接触。士族不做事繁务剧的小官，即所谓“浊官”，以标榜门第高贵。东晋以后，士族与寒门的界限基本凝固，只有极少数的寒门能够上升为士族。而士族在发展中也有分化，如清河崔氏门第高于博陵崔氏，琅邪王氏后裔的门第也有高下之别。南朝士族渐趋没落。由于皇权压抑，虽授高官而不给实权；也由于士族日益腐化，士族子弟“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如何则秘书(郎)”，生而富贵，遂不思进取，纵情声色，穷奢极欲，乃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在侯景之乱中，南朝士族死亡殆尽。北魏孝文帝为巩固统治，制定了严格的士族制度，依官位定士族为4个等级，据等级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士族制度在魏晋南朝是习惯上形成的，而北魏始由朝廷以法律形式规定。北魏士族也很快腐化，在河阴之变时遭到沉重打击。

(陈琳国)

八王之乱

(Bawang zhiluan) 西晋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起的社会动乱。因先后参与者主要是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长沙王义和东海王越八人，故史称“八王之乱”。惠帝是一个白痴，最初政权掌握在皇太后父杨骏手中，引起皇后贾氏的极端不满。贾后权欲极盛，心狠手毒，永平元年(291)乃勾结楚王司马玮等，借口杨骏谋反，诛杀杨氏亲党数千人，迫使杨太后绝食而亡。八王之乱由此拉开了帷幕。杨骏死后，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辅政。贾后犹觉不能逞其所欲，同年六月，再次利用司马玮杀亮、瓘，然后又以假传诏旨之罪除掉司马玮，终于完全攫取了朝政大权。此后8年，西晋社会相对稳定，但因太子遹非贾后亲生，是贾后的一块心病。元康元年(299)，太子已日渐长大，贾后遂设计诬其阴谋杀害皇帝、皇后，于是废为庶人，继而逼杀之。禁卫军长官、赵王司马伦觊觎帝位已久，这时以替太子报仇为名发动政变，杀死贾后，接着又于永宁元年(301)二月篡夺帝位。司马伦此举，立即遭到宗室诸王，尤其是手握强兵者的强烈反对，酿成长达6年多的血腥混战。这年四月，齐王司马冏首先在许昌发难，起兵讨伐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冏则先后响应。三王联军与司马伦军队激战60余日，战死者近10万人。禁卫军见司马伦大势已去，遂杀伦及其党羽，拥惠帝复位，迎三王入京。司马冏以首功辅政，独揽大权。从此，诸王为争夺最高权力混战不止。太安元年(303)，司马颙与长沙王义联合攻杀义。冏死，司马颖称皇太弟，以继承人自居。接着东海王司马越奉惠帝攻颖，大败而逃，惠帝被颖所俘，司马颙乘机占领洛阳。越再兴兵，先后杀颖、颙。永兴三年(306)越毒死惠帝，另立司马炽为帝。至此，八王之乱才降下帷幕。八王之乱造成极大破坏，北方地区广被战火，历史名城洛阳、长安夷为丘墟，广大农村生产凋蔽，生灵涂炭，死者不可胜数。八王之乱还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直接导致270余年南北分裂的局面。

(陈琳国)

东晋

(Dongjin 317—420) 朝代名。西晋建兴四年(316),晋愍帝被前赵所俘。次年,琅邪王、扬州都督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晋王。又次年(318),愍帝被杀的消息传来,司马睿始正式称帝,是为晋元帝。司马睿重建的晋王朝,史称东晋,都建康。其疆域大致在江淮以南,曾攻入关中,占领长安、洛阳和黄河以南地区。

东晋是依靠门阀士族的支持建立的,门阀王导及其从兄王敦一内一外,分掌文武大权。司马睿即位时,竟请王导同登御座,受百官朝拜,虽王导固辞,而民谚云“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东晋初,元帝试图加强皇权,削弱王氏势力,王敦立即从荆州兴兵,以清君侧为名,在王导和另一些士族的支援下攻入建康,逼死元帝。此后,这种主弱臣强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门阀士族居于支配地位,军政大权先后由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执掌。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079-1.bmp}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皇权与士族之间、南北士族之间、北方士族之间、门阀士族与低级士族之间的内争不断发生。王敦两次举兵,其后又发生苏峻、祖约之乱。苏、祖攻破建康,纵兵放火焚烧,掠抢国库中的金银钱财布帛,攻略义兴、晋陵各地,所过无不残灭。这些叛乱虽终被平定,但严重破坏了江南经济,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内争亦牵制了东晋的北伐。祖逖北伐因内争而功败垂成,庾亮、庾翼经营北伐遭到反对。东晋中期,桓温领军攻取巴蜀,消灭成汉。尔后他力主北伐,但朝廷多方阻挠,另派不懂军事的褚裒、殷浩北伐。及褚、殷一败涂地后,桓温才开始进行北伐。永和十年(354),温率步骑4万,连挫前秦,攻入关中,驻军灞上。但未能及时进击长安,致失良机,后因军粮匮乏而撤兵。十二年(356),温再次北伐,收复洛阳。太和四年(369),温第三次北伐,亲督水军由黄河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陆路晋军已逼近前燕都城邺(今河北临漳)。因水不通退兵,遭到前燕军夹击,损失3万余人,淮北之地亦复失去。桓温北伐受朝臣牵制,而他也把北伐作为夺权手段,故无所成。

东晋门阀士族比在西晋拥有更优厚的政治、经济、法律特权。他们凭借门第,自可平步青云,位至公卿。当时中央和地方的文武要职基本上都由士族担任,特别是集中在王、庾、桓、谢、周、陆、顾等七大家族。他们兼并土地,封固山泽,荫占佃客,役使奴隶。国家规定一、二品官可占佃客40户,以下每品递减5户,至九品可占5户,而非法私占者则大大多于此数。如谢混“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宋书·谢弘微传》)。

谢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宋书·谢灵运传》)。由于朝廷征调频繁和地主豪强残酷剥削,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终于激起了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孙恩以五斗米道组织群众,于隆安三年(399),率部众从海岛(即今浙江舟山群岛)登陆,攻上虞,破会稽,转战东南各郡县,义军很快发展到数十万人。五年(401),义军从海上进军至丹徒(今江苏武进),震撼建康。后孙恩战败,投海而死,余众由卢循率领,从海道南下广州。义熙六年(410),卢循及另一首领徐道覆分兵两路上,再次挺进至建康附近,但最终被刘裕镇压下去。

刘裕出身低级士族,是东晋精锐之师北府兵将领,曾参与镇压孙恩起义。

元兴二年（403），桓温子桓玄篡晋，建国号楚。裕联合北府中下级军官起兵，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遂掌握东晋大权。义熙五年（409），出兵北伐南燕，次年灭南燕，收复青、兖地区。镇压卢循起义后，又西灭成都割据势力谯纵，北上攻取长安，消灭后秦，终于在元熙二年（420）代晋称帝，东晋至此而亡。

（陈琳国）

侨置与土断

(qiaozhi yu tuduan) 东晋南北朝期间，国家在迁徙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与他们原籍同名的州、郡、县及行政机构，加以管理。由于这些离开原籍，迁徙异乡的人口被称为“侨人”，故为之设置州、郡、县就称为“侨置”。侨置主要发生于东晋，永嘉之乱以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士族地主携眷南逃，随同逃亡的还有他们的宗族、乡里、佃客等，多者数千家。据统计，从永嘉（307—313）至南朝刘宋末年（479），南渡人口约90万，占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占南方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在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时，东晋政权为维护侨人士族的利益和安置侨人，陆续设置了许多侨州、郡、县，北方原有的徐、兖、青、司、豫、雍、秦、幽、冀、并等在东晋都有侨州。仅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地，就侨置了徐、兖二州，侨郡10多个。侨州、郡、县以侨人士族充任官吏，使他们继续享有特权。著籍的侨人，可获得免除调役的优待，对招徕北方流民与社会安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侨置日益增多，引起地方行政系统的紊乱。或一地侨置数州、郡，或一侨州、郡分散于数地，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二、三，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户籍混淆，连主管机关亦难以分辨。更为严重的是，侨人士族地主乘机私占流民为佃客，逃避调役，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受损失。因此，东晋政权从咸和年间（326—334）开始实行“土断”政策。所谓土断，就是以居住地（“土”）作为断定户籍的依据，使之著籍。取消侨人原来的临时户籍——白籍，由居住地编制统一的户籍——黄籍，同时也就取消侨人免除调役的优待。东晋南朝多次实行土断，咸康七年（341），令“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晋书·成帝纪》，意思是王公以下皆加以整顿，对持白籍的侨人实行土断。兴宁二年（364）三月初一（即庚戌日）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比较坚决，清查出不被士族豪门挟藏的私附人口。义熙九年（413）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也较有成效。土断中还整理了侨州、郡、县，或加以并省。或划给实土。北魏也曾经侨置少数侨州、郡。

（陈琳国）

祖逖北伐

(zhuti beifa) 东晋初年由祖逖领导的北伐。祖逖，字士稚，范阳道县（今河北涞水县）人。士族出身，任西晋司州主簿。值大乱前夕，怀抱报国之志，对每况愈下的政局十分关切。半夜里听见鸡鸣，即起身至户外，拔剑起舞，留下了“闻鸡起舞”的佳话。西晋末年洛阳沦没后，祖逖率领亲族乡党数百家避乱南下，“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时司马睿与南北门阀士族正热衷于建立东晋新朝廷，进行权力再分配，根本无意于北伐。祖逖不甘故国倾覆，恒存振复之心，主动请缨，要求领兵北伐。司马睿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但除了千人粮饷和3千匹布外，未给一兵一卒和兵器铠甲。建兴元年（313），祖逖带领旧部数百人毅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渡江后，他屯于淮阴，一面铸造兵器，一面招募士兵，组建了一支2千人的武装，然后挥师北上。北伐的形势十分严峻。黄河以南盘踞着不少豪强武装，阻遏祖逖北进，逖艰苦奋斗，才打败自封为豫州刺史的张平等，冲破他们的封锁，占领谯城（今安徽亳县）。而自封为陈留太守的陈川叛归石勒，祖逖攻陈川，石勒则派石虎率大军5万南下，逖设奇兵打败石虎，接着又大败虎留守蓬陂坞的桃豹，攻取雍丘（今河南杞县）。祖逖精于用兵，又善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化敌为友。当时豪强武装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相互攻战，他派人说明利害，进行调解，使他们都服从自己的指挥。他“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以上均引自《晋书·祖逖传》），因此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经过4年多的苦战，祖逖率领的北伐军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失地，使石勒不敢挥兵南向。太兴四年（321），正当祖逖抓紧积谷练兵，准备进军河北时，东晋朝廷派戴渊都督北方六州诸军事指挥逖军，并扼制逖军后路。同时东晋统治者内部斗争非常激烈。这些情形，使满腔热忱的祖逖忧愤成疾，病死军中。祖逖北伐不计成败利钝，生死以之，以攻为守，保障了东晋偏安。他以其节烈丰富了民族精神，是东晋北伐的最高典型，与后来以北伐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者大相径庭。

（陈琳国）

十六国

(Shiliuguo) 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止在北方及巴蜀地区出现的割据政权的总称，亦作时代名。汉魏以后，我国西、北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广泛分布于长城南北。他们遭受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或充当佃客，或被迫为兵，或沦为奴隶，过着悲惨的生活。西晋末年，他们与汉族人民一起奋起反抗，而少数民族的贵族乘机建立割据政权。从永安元年(304)匈奴贵族刘渊称汉王起，匈奴、羯、鲜卑、氐、羌、賚(又称巴氏)和汉人割据政权更相迭起。其概况如下：

汉* (后改称赵，史称前赵，304—329)，匈奴族刘渊立，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迁长安。占据今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各一部。亡于后赵。

成汉* (304 - 347)，賚族李雄立，都成都。占据今四川和云南、贵州的一部分。亡于东晋。

代(315 - 376)，鲜卑族拓跋猗卢立，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占据今山西北部及内蒙一部分。亡于前秦。

前凉* (317 - 376)，汉族张寔立，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占据今甘肃西部及新疆东部。亡于前秦。

后赵* (319 - 350)，羯族石勒立，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后迁邺(今河北临漳)。占据今河北、山西、河南、陕西、辽宁，势力曾及于淮、汉。亡于冉魏。

冉魏(350 - 352)，汉族冉闵立，都邺。占据今河北、山西一部分。亡于前燕。

前燕* (337 - 370)，鲜卑族慕容皝立，都龙城(今辽宁朝阳)，迁蓟(今河北蓟县)，再迁邺。占据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和辽宁一部分。亡于前秦。

前秦* (351 - 394)，氐族苻健立，都长安。占据中国北部及西南一部分。亡于后秦。

后燕* (384 - 407)，鲜卑族慕容垂立，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占据今河北、山西及山东、河南、辽宁的一部分。亡于北燕。

后秦* (384 - 417)，羌族姚萇立，都长安。占据今陕西、甘肃、河南。亡于东晋。

西秦* (385 - 431)，鲜卑族乞伏国仁立，都苑川(今甘肃榆中)。占据今甘肃西南部。亡于夏。

后凉* (385 - 403)，氐族吕光立，都姑臧。所据略同前凉。亡于后秦。

西燕(386 - 394)，鲜卑族慕容冲立，都长子(今山西长子)。占据山西一部分。亡于后燕。

翟魏(388 - 392)，丁零族翟辽立，都滑台(今河南滑县南)。占据今河南一部分。亡于后燕。

南凉* (397 - 414)，鲜卑族秃发乌孤立，都乐都(今青海乐都)。占据今甘肃西部及青海一部。亡于西秦。

南燕* (398 - 410)，鲜卑族慕容德立，都广固(今山东益都)。占据今山东、河南一部分。亡于东晋。

西凉* (400 - 421)，汉族李暠立，都敦煌。占据今甘肃极西部，亡于北

凉。

北凉*（401 - 439），匈奴族沮渠蒙逊立，都张掖（今甘肃张掖西北）。占据今甘肃西部。亡于北魏。

蜀（史称后蜀，405 - 413），汉族谯纵立，都成都。占据今四川。亡于东晋。

夏*（407 - 431），匈奴族赫连勃勃立，都统万（今陕西横山西）。占据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一部分。亡于吐谷浑。

北燕*（409 - 436），汉族冯跋立，都龙城。占据今河北东北部及辽宁。亡于北魏。

此外，还有氐族杨氏割据仇池（今甘肃西和西南），自东汉末建安元年（196）至萧梁承圣元年（552）间屡亡屡立，盛时占有今四川西北、甘肃东南、陕西南部。

以上共有割据政权 22 个。其中加*号的 16 个载入北魏史学家崔鸿《十六国春秋》，十六国之称即由此而来。在此百余年中，战乱相继，残杀酷烈，社会经济文化严重破坏，各族人民痛苦不堪。但各民族的错居杂处，接触频繁，各族人民在共同斗争中增进联系与了解，促进了民族融合。

（陈琳国）

匈奴

(Xiongnu) 中国古代民族。诞生和兴起于黄河河套和阴山（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带，长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史记·匈奴列传》）。在原始氏族公社制度解体的过程中，匈奴族出现了奴隶主贵族集团，经常向四邻发动战争，掠夺财物和人口，并逐渐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单于，单于之下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谷蠡音鹿黎）等。战国时期，匈奴经常骚扰燕、赵、秦，燕、赵、秦皆在北部修建长城。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蒙恬率兵 30 万北击匈奴，夺取河套地区，又大规模修筑长城，把原来的长城连结起来。汉高祖六年（前 201），匈奴单于冒顿（音墨毒）一再扰边，曾围困汉高祖刘邦于平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南）七日七夜。西汉前期，汉朝采取和亲政策，嫁宗室女为单于阏氏（音烟支，即妻、妾），每年送匈奴大量财物。汉武帝为解除匈奴威胁，发动对匈奴的反击，从元朔元年（前 128）至元狩四年（前 119）大战三次，将匈奴逐至内蒙古大沙漠以北，又切断匈奴与氏、羌的联系，打开西域通道。匈奴败后，原隶属于匈奴的丁零、乌桓也起来反抗，使匈奴力量进一步削弱。此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争夺单于位的斗争，出现五单于混战的局面。后郅支单于（郅音至）战胜呼韩邪单于（邪音耶），呼韩邪遂南徙归附于汉朝。汉宣帝册封呼韩邪，并赐“匈奴单于”金玺。汉元帝以宫女王嫱（字昭君）嫁与呼韩邪，进一步加强汉、匈友好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 60 余年。东汉初年，匈奴势力又有所发展，经常寇扰边境。不久，因连年灾荒与内讧，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单于袭用其祖父呼韩邪的称号，请求内附，于建武二十六年（50）入居北边各郡，助汉守边，而东汉每年供给之费达 10090 万钱。南匈奴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逐渐向东、向南迁徙。北匈奴北徙，控制西域，但亦时时南下侵扰，但后来受到了丁零、鲜卑、南匈奴和西域诸国的夹击，势力削弱。东汉又接连对北匈奴发动进攻，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等率师出击，北匈奴降者 20 余万人，汉军出塞 3 千余里，直追至燕然山。永元二年、三年，汉军又相继出击，北匈奴战败后遂向西远徙欧洲。东汉末年，南匈奴被卷入北方混战，曹操统一北方后，征召匈奴豪右为官，加以控制。建安二十一年（216），匈奴呼厨泉单于入邺都为质，曹操分匈奴为五部，置五部帅，而派汉官任五部司马，加以监督。至西晋初，司马氏又把匈奴部帅改为都尉，进一步加强对匈奴的控制。西晋末年，匈奴左部都尉刘渊（左部帅刘豹之子）乘机起事，建立匈奴政权，国号汉，其子刘聪改称赵，史称前赵。此外，建立北凉的沮渠氏与建立夏的赫连氏，也是匈奴族人。

（陈琳国）

羯

(Jie) 中国古代民族。原为西域、中亚细亚胡人，相貌特征为高鼻、深目、多须，以石、支、白、康等为姓氏，有火葬的习俗，信仰火袄（袄音仙，即“胡天”神）。东汉时，羯人被匈奴所奴役。西晋时随匈奴入塞，故称匈奴别部。其主要部分居于上党郡武乡县羯室（今山西榆社），仍保留部落组织，大多从事农耕。十六国时期，羯人石勒建立后赵。

(陈琳国)

氏

(Di) 中国古代民族。历史悠久，《诗经·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从战国到秦汉，氏人分布于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即今甘肃东南地区及其邻近的陕西西南、四川西北缘边一带。氏族部落繁多，各有称号，互下统属，其中以白马氏最大。汉武帝在氏族居住较集中的地区设置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武都郡（今甘肃成县西），氏人移居于山谷中，白马氏进据仇池（今甘肃成县仇他山），“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元封三年（前108），武帝派兵讨伐，分徙氏人居酒泉。东汉末，氏族首领杨千万再据仇池，与兴国（今甘肃秦安县东北）氏王阿贵各有部落万余家，因连兵抗御曹操，被曹军破灭，所部皆降。曹操前后徙武都氏人5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魏黄初元年（220）又有武都氏王杨仆率部内附，居汉阳郡。氏人主要从事农耕，亦畜养猪、牛、马、驴、骡等，板屋土墙，过定居生活。有自己的语言、习俗，自称为“盍稚”，因长期与汉人错居杂处，多会汉语。据统计，至西晋时内迁氏人的总数不少于30万，时“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其中主要是氏族和羌族。元康六年（296），秦雍地区氏羌人民举行起义，氏帅齐万年被推为领袖，义军有7万人之众。同年，杨茂搜建立仇池国，至北魏正始三年（506）始灭。十六国时期，氏人苻氏建立前秦国，吕氏建立后凉国。

（陈琳国）

羌

(Qiang) 中国古代民族。它的历史与华夏族一样悠久，《诗经》等古代文献和殷商卜辞都有关于羌人活动的记载。战国秦汉时，羌族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甘肃、四川。战国初，羌人首领爰剑被秦厉公拘执为奴，后逃归河、湟（今青海南部），教会部人从事农耕和畜牧，后羌人分成烧当、武都、广汉、越巂等许多部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后汉书·西羌传》）羌、汉关系紧密，汉景帝时，羌人留何率部内附，入居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南）狄道、安故、临洮、氏道、羌道。汉武帝为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系，筑令居塞（在今甘肃永登），列置河西四郡。羌人虽几次发动反攻，都被汉军打败，汉置护羌校尉进行统治。汉宣帝对羌族采取招抚政策，羌族地区的农业、畜牧有所发展。东汉统治者多次内迁羌人，迁先零羌于天水、陇西、扶风，迁烧当羌于三辅（今陕西中部）。羌人不断进行反抗，举行起义；一些羌族豪强也乘机骚扰州郡，掳杀汉族人民，前后延续60年，酿成所谓“羌患”，使羌、汉两族人民深受其害。魏晋以后，内迁的羌人常被各派政治势力所利用，卷入各种纷争。董卓率羌兵进京为乱，韩遂、马超仗羌人与曹操对抗，蜀汉后期北伐亦驱使羌人上阵。羌族人民甚至要承担比汉族人民更加沉重的赋税、徭役和兵役。十六国时期，烧当羌的一支姚氏建立后秦国。

（陈琳国）

鲜卑

(Xianbei) 中国古代民族，分东部和拓跋部。东部鲜卑原是东胡部落联盟的一部分。秦汉之际，东胡部落联盟被匈奴单于冒顿所破，鲜卑部落遂聚居于鲜卑山（今内蒙古科右中旗西，因鲜卑人聚居而得名），后迁居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从事游牧狩猎。在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以后，东部鲜卑才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并参与反抗匈奴的斗争。东汉永元（89 - 105）中，北匈奴西遁，鲜卑部落占领了蒙古沙漠以北的匈奴故地，而“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是渐盛”（《后汉书·鲜卑传》）。东汉后期，鲜卑部落大人（即部落酋长）檀石槐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三国志·魏书·鲜卑传》注引《魏书》），分成中、东、西三部。檀石槐死后，部落联盟很快瓦解。曹魏初年，原鲜卑小帅轲比能又建立一个较小的部落联盟，但亦在轲比能死后解散了。魏晋之际，东部鲜卑分成慕容部、段部、宇文部等，慕容部在十六国时期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诸国。拓跋鲜卑起源于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经考古证实，今大兴安岭北段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阿里河镇西北 10 公里的嘎仙洞即拓跋部早期遗址。大约在东汉前期，拓跋部落南迁大泽（今呼伦池），至诘汾为部落大人时，经“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亦进入匈奴故地。诘汾子力微率部与原为匈奴、乌丸、敕勒、柔然的诸部落错居杂处，逐渐控制了这些部落，于是“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魏书·序纪》），于是势力强盛起来。力微移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由于曹魏从这里撤消云中、定襄等郡，拓跋部得以顺利发展。永嘉四年（310），西晋封力微孙猗卢为代公，建兴二年（314），进代王。猗卢以盛乐为北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为南部，其疆域大约跨有今内蒙古中南部与山西北部。前秦建元十二年（376），苻坚出兵灭代，代亡。太初元年（386）拓跋珪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称登国元年，是为北魏。此外，拓跋部在南迁时分出一支进入河西地区，活动于今甘肃、宁夏、青海一带，称河西鲜卑，以秃发为姓，秃发即拓跋的同音异译，后建立南凉国。还有一支进入陇右，称陇西鲜卑，其乞伏氏建立西秦国。

（陈琳国）

苻坚与王猛

(fu jian yu wang meng) 苻坚 (338—385) ，字永固 ，一名文玉 ，氏族 ，略阳临渭 (今甘肃秦安东南) 人 ，前秦皇帝 。王猛 (325 - 375) ，字景略 ，汉族 ，寒士出身 ，北海剧县 (今山东昌乐西) 人 ，仕至前秦宰相 。二人都是十六国时期政治家 。苻坚少有大志 ，能礼贤下士 ，广交英豪 ，当他听说才华出众的王猛隐居华山时 ，特派相邀 ，对他十分赏识 ，自谓如刘备得遇孔明 。永兴元年 (357) ，苻坚发动政变 ，杀暴君苻生 ，夺取帝位 。即位后 ，苻坚更加信任和重用王猛 ，王猛亦全力相辅 。王猛不畏权势 ，抑制豪强 ，严厉惩办不法的氏族贵族 。外戚强德横行霸道 ，祸害百姓 ，王猛捕杀之 。他任京兆尹时 ，“ 数旬之间 ，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余人 ，于是百僚震肃 ，豪右屏气 。 ” 而苻坚不顾氏族贵族的反对 ，坚决支持王猛 ，一年中五次擢升王猛的官职 ，由京兆尹迁吏部尚书 、 尚书左仆射 、 司隶校尉 ，至尚书令 。苻坚和王猛都很注意选拔有才能的人 ，规定各级官吏要如实推举人才 ，推荐得人者受赏 ，推荐不当者受罚 ，故虽是宗室外戚 ，如无实际才干就不能做官 。苻坚和王猛还很重视农业生产 ，“ 开山泽之利 ，公私共之 ，偃甲息兵 ，与境内休息 。 ” 又组织修建水利灌溉工程 ，推广 “ 区种法 ” 。苻坚和王猛还非常注重文化教育 ，提倡儒学 ，兴办学校 。苻坚每月亲临太学 ，曾亲自考试学生 ，甚至禁卫军士 、 后宫掖庭 ，也皆令读书 。由于采取了以上一系列措施 ，前秦政治比较清明 ，经济有所发展 ，国家很快强盛起来 。史称 “ 关陇清晏 ，百姓丰乐 ，自长安至于诸州 ，皆夹路树槐柳 ；二十里一亭 ，四十里一驿 ，旅行者取给于途 ，工商贸易于道 ” (上皆引自 《 晋书 · 苻坚载记上 》) 。苻坚志向恢宏 ，企图统一天下 ，结束分裂的局面 。建元六年 (370) ，他派王猛统兵灭前燕 。七年 ，命将灭仇池 。八年 ，又取东晋的梁 、 益二州 。他对归降的鲜卑 、 羌族的王公贵族采取宽容政策 ，不仅不加杀戮 ，而且让他们担任尚书 、 将军等要职 ，对他们的野心缺乏警觉 。建元十一年 (375) ，王猛病死 ，临死前对苻坚说 : “ 我死之后 ，不要以灭东晋为目标 ，而鲜卑 、 羌族的首领应逐渐加以翦除 。 ” 苻坚对王猛的死极其悲痛 ，但对王猛的嘱咐却没有放在心上 。次年 ，前秦灭前凉和代 ；后二年 ，开始对东晋用兵 。自恃 “ 强兵百万 ，资仗如山 ” 的苻坚 ，终于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 ，前秦立刻分崩离析 。鲜卑慕容氏在中山 (今河北定县) 建立后燕 ，羌族姚萇也在关中自称大单于 、 秦王 。建元二十一年 (385) 七月 ，苻坚被姚萇军杀死 。

(陈琳国)

淝水之战

(Feishui zhizhan) 建元十九年(383)前秦与东晋在淝水(淮水支流,在今安徽中部)一带进行的一次战役。从建元六年(370)至建元十二年(376),前秦先后攻灭了前燕、前凉和拓跋鲜卑所建的代国,实现北方的统一,并且还攻占了东晋的梁、益二州。这是前秦的极盛时期。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前秦王苻坚沾沾自喜,踌躇满志,企图进一步消灭东晋,统一全国。建元十四年(378),前秦首先在襄阳(今湖北襄阳)和彭城(今江苏徐州)向东晋发动进攻,揭开战争的序幕。建元十八年(382),苻坚提出亲率大军南征的主张,但多数大臣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极力加以劝阻。唯有那些别有用心鲜卑、羌族贵族曲意迎合,怂恿苻坚出兵。苻坚听不进反对意见,他傲慢地说:“(东晋)虽有长江,其能固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次年七月,苻坚下令大举南征,“遣征南苻融……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八月,在强敌进犯之际,东晋谢安从容部署抵抗事宜,派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领兵8万应战。双方投入的兵力极其悬殊,东晋显然处于不利地位。但是,这时东晋“君臣和睦,上下同心”(以上皆引自《晋书·苻坚载记下》),内部矛盾趋于缓和,政局大体稳定。而且,由谢玄率领的北府兵是一支劲旅,主要由北方流民组成,他们有破国亡家之恨,斗志旺盛。相反,前秦统治阶级内部潜伏着严重的危机,鲜卑、羌族贵族的心怀叵测,离心离德。由于连年用兵,前秦兵疲将倦,而临时被迫当兵的各族人民更不愿为前秦卖命。这些因素使东晋有可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十月,前秦攻克寿阳,晋军退守硖石,秦军扼守洛涧,企图切断晋军的救援。苻坚赶到前线督战,他自恃兵多,派东晋降将朱序劝降,朱序却建议晋军宜乘秦军尚未集结,速战速决。于是谢玄派刘牢之统领北府精兵5千击溃洛涧的秦军,歼敌1万5千余人。苻坚登上寿阳城头观察形势,见晋军部伍严整,遥望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军,不禁大惊失色。晋军水陆并进,与秦军隔淝水对峙而阵。谢玄派人到秦军中,要求秦军稍向后移,以便晋军渡河决战。苻坚企图乘晋军半渡时加以攻击,遂同意退兵。秦军本是乌合之众,一退即不可止。朱序在阵后大声呼叫:“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阵脚大乱,将士溃散奔逃,自相践踏。晋军在谢玄等的指挥下渡河猛攻,势如破竹。秦军前锋统帅苻融死于乱军之中,苻坚也身中流矢,单骑逃回淮北。逃亡中的秦军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追兵来了,昼夜不敢停息,死者十有七八。苻坚在洛阳收拾残兵,只有十几万人。淝水战后,鲜卑、羌族贵族都背叛了苻坚,前秦政权顷刻瓦解了。

(陈琳国)

南朝

(Nanchao 420 - 589) 东晋灭亡后南方相继建立的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总称，皆都建康（今南京）。

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自立，建国号宋，史称刘宋。其疆域大致为黄河以南，是东晋南朝时期最大的。宋初社会比较安定，刘裕鉴于东晋门阀专政的教训，采取加强皇权，抑制大族势力的措施，继续推行土断，禁止私占山泽、人口。刘裕子刘义隆即位后，重视整顿地方吏治，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负担，在他统治的元嘉（424 - 452）期间，呈现了东晋以来少有的兴旺景象，历史上誉之为“元嘉之治”。元嘉末年，刘宋对北魏用兵失败而丧地折师，淮西及淮北四州沦于北魏。接着，宗室诸王为争夺皇位互相残杀，叛乱与征讨战争频频发生，皇权日益削弱，于是，禁卫军统帅萧道成伺机夺取政权。

升明三年（479），萧道成代宋称帝，国号齐，史称南齐或萧齐。齐初致力于“检籍”，即清查户籍。凡是伪冒户籍被清查出来，称为“却籍”，却籍的民户，全家罚充补兵远戍。许多检籍官吏乘机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致使“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典》），以钱买通官吏、涂改户籍的富人逍遥法外，穷人被诬为户籍诈伪，受到却籍的惩罚。永明三年（485），唐寓之在新城（今浙江富阳西南）发动起义，却籍户3万余人踊跃参加，声势颇大。南齐急忙派兵镇压，虽然起义失败了，但检籍也停止了。南齐宗室也如刘宋一样不断爆发争夺皇位的斗争，重演“骨肉相残”的丑剧。由于统治者无能，汉水以北的南阳与淮河以南的寿阳被北魏占领。中兴元年（501），雍州刺史萧衍领兵攻入建康，结束了这个只维持22年的短命王朝。

萧衍代齐称帝，改国号为梁，史称萧梁。梁武帝萧衍优容士族，改定士族谱牒，以保障他们的特权；设州望、郡宗、乡豪，专掌举荐旧族子弟；滥置州郡和增加官位，使他们都有官做。梁初原有23州、350郡，至梁中大同元年（546），竟有104州、586郡。他也重视拔擢寒门俊才，以满足寒族地主参政的愿望。对待宗室子弟，他则极力宽纵，封以王爵，委以方镇，只要他们不危及皇权，即便杀人越货、贪污纳贿、压榨百姓也不受制裁。弟萧宏肆意聚敛，库房百间贮满钱财，钱就有3亿余。他本怀疑库中私藏武器，及见是钱财，不仅不加责备，还夸萧宏“会过日子”。侄萧正德投降北魏，后来又跑回来，他亦不追究。他还大力提倡佛教，广建佛寺，笼络寺院地主。萧衍的这些办法，旨在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避免互相残杀，巩固梁家王朝的统治。但是，萧梁的政治却日益腐败，人民生活日益痛苦，以至“人人厌苦，家家思乱”（《通鉴》160卷梁太清元年），当时农民起义有数十次之多，后来的“侯景之乱”也决非偶然。太平二年（557），在平定侯景之乱中脱颖而出的陈霸先取代了梁王朝。

陈霸先即帝位，改国号为陈。陈的疆域局促于长江以南，信州（今湖北宜昌）以东，为东晋南朝时期最小。陈初，梁的残余势力不断起而反抗，江南寒族豪强则割据自立，政局很不稳定。陈霸先的后继者逐渐巩固了统治，宣帝陈项比较注意农业生产，鼓励耕垦，实行免税，促进寒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后主陈叔宝是有名的荒淫之君主，委政佞幸，纵情声色，饮酒赋诗，政治日坏。祯明二年（588），隋文帝杨坚大举伐陈，次年攻入建康，消灭陈朝，重新实现全国的统一。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84-1.bmp}

(陈琳国)

江南经济的发展

(jiangnan jingji de fazhan)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北方劳动人民不断南迁，既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南北劳动人民相互学习、辛勤劳动，是江南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首先表现在农业上，垦田面积日益增多，耕作技术有很大改进，牛耕已经普遍推行，粪肥也在推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江南种植。三吴地区的农业尤其发达，水利工程的兴修很受重视，如东晋在曲阿（今江苏丹阳）修新丰塘，溉田 8 百余顷；在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筑荻塘，溉田千顷；在会稽句章（今浙江慈溪西南）修复汉代旧堰，溉田 2 千余顷。南朝在乌程修吴兴塘，溉田 2 千余顷；修赤山塘（今江苏句容县西南），上接九源，下通秦淮。人们在河道建立堰闸以控制水位，旱则开启，引江水灌溉；涝则关闭，避免泛滥成灾。又筑堰围湖，开垦出土壤肥沃、产量很高的“湖田”。因此，三吴成了江南粮食的主要产区，“一岁或稔（丰收），则数郡忘饥”（《宋书·孔季恭等传》史臣语）。其次表现在手工业，冶铁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与冶唐（今湖北武昌），除兵器外，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创杂炼生铁法，即把生、熟铁混杂冶炼，反复锤打，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养蚕缫丝技术大见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蚕茧一年收获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收获八次。国家专门设立锦署，使丝织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江南河流纵横，为适应经济、军事的需要，造船业特别兴旺，既能制造载重 2 万斛（约 2 千吨）的大船，又能制造速度很快的舰只。其他如制瓷、造纸、漆器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水平。经济的发展促进商业和城市的繁荣。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是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 140 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业、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城内外的贸易市场 10 多个，来往船只成千上万。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陈琳国）

侯景之乱

(Hou jing zhiluan) 南朝萧梁末年北齐降将侯景发动的一场叛乱。侯景，原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戍兵，渐升为镇功曹史。北魏末年六镇起义时，侯景率部众投靠契胡族酋长尔朱荣，参加镇压起义，因大破义军、活捉葛荣之功被擢升为定州刺史。高欢灭尔朱荣，侯景又叛归高欢。景狡诈多变，残忍酷虐，但掠得财宝皆赏赐将士，故能得将士死力，所向多捷。历任东魏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台（即河南道最高军政长官），拥兵 10 万，专制河南，权力仅亚于高欢。东魏武定五年（547），高欢死，子高澄执政。侯景平素甚轻高澄，而澄则忌惮景叛乱，乃征调景入京，以剥夺其兵权。侯景惟恐被杀，于是投降西魏，但西魏亦调景入京，故景转而求降于萧梁。梁朝臣多表示反对，而梁武帝竟说夜梦太平，侯景求降，正符所梦，于是封景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梁武帝又遣将率军救援侯景，结果被东魏大败于寒山堰，主帅萧渊明被俘，全军几乎覆没。东魏又进击侯景，景众 4 万余只剩下 800 人南逃，骗取梁寿阳城（今安徽寿县）。东魏继而实施离间计，佯称与梁议和，挑拨侯景反梁。梁武帝覆信东魏说：“贞阳（指贞阳侯萧渊明）旦至，侯景夕返。”侯景本有作乱之心，遂暗中勾结野心篡位的梁武帝之侄萧正德作内应。梁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发动叛乱，领兵南下，直抵长江。梁武帝完全没有防范，命萧正德保卫京师，而萧正德却派船接侯景叛军过江，迎进建康，包围“台城”（即宫城）。侯景纵兵抢掠，又命北人被没为奴者，皆令放免，加以任用。“造诸攻具及飞楼、橦车、登城车、钩堞车、阶道车、火车，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陈于阙前，百道攻城并用焉”（《梁书·侯景传》）。侯景过江时兵不过 8 千，马不过数百，而当时台城中尚有男女 10 余万，甲士 2 万多，四方援军相继奔赴建康者 30 余万。但援军无统一指挥，多持观望态度，宗室诸王顿兵不前，只想保存实力以夺取皇位。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侯景又东略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侯景得势后，杀萧正德，软禁梁武帝。不久梁武帝忧死，景立萧纲为帝，又废杀萧纲立萧栋。天正元年（551），侯景终于废萧栋而称帝，国号汉。次年，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大败侯景军，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

（陈琳国）

北朝

(Beichao 439—581) 十六国时期结束后北方存在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5 个王朝的总称。

公元 386 年，鲜卑拓跋部酋长拓跋珪建立魏国，史称北魏，皇始三年（398）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先后灭后燕、夏、北燕、北凉，于太延五年（439）重新统一北方。这一年即北朝的开始。北魏初，拓跋部刚刚从部落联盟跨进阶级社会的门槛，在奴隶制尚未充分发展时，就走上封建化的道路，以适应统治中原的需要。北魏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逐渐采用汉魏以来的政治制度，多方笼络汉族门阀，给予官爵，承认汉族地主荫占依附民，并把它作为国家的基层政权，这就是所谓“宗主督护制”。但是，北魏前期的民族压迫还比较严重，汉族人士经常受到猜忌，致被杀戮灭族；汉族和鲜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艰难，不断进行反抗，仅史籍所载，当时各族人民的起义有 35 次，其中以盖吴领导的起义规模最大。北魏中期，冯太后实行政治、经济改革，颁行俸禄制，整顿吏治，实施三长制、均田制等。孝文帝亲政后，将都城迁到洛阳，并采取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推行汉化的措施，加速北魏封建化，促进民族融合。北魏社会经济有明显的发展，耕地增多，农具如耕犁、耙、锄、镰更齐全，耕作和施肥技术都有进步，粮食产量比过去增加。手工业生产如纺织、酿酒、压油、造纸、制瓷、冶铸都很发达，洛阳、邺和长安成为重要商业城市，南北往来、中外贸易甚为活跃。北魏末年，由六镇开始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北魏的统治。武泰元年（528）洛阳发生政变，秀容（今山西忻州）的契胡族酋长尔朱荣带兵入京，在洛阳附近的河阴杀死掌权的胡太后及王公大臣 2000 多人，史称“河阴之变”。是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尔朱荣死后，部将高欢倒戈，消灭尔朱氏势力，拥立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因高欢擅权，孝武帝被迫西走长安。同年，高欢另立孝静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武定八年（550），高欢子高洋废东魏自立，改国号齐，史称北齐。东魏、北齐政权掌握在六镇鲜卑贵族手中，排挤、打击汉族官僚，所任将相大臣绝大多数是鲜卑人或鲜卑化的各族人，放任他们贪赃枉法，欺压汉族人民；经济上也首先满足他们的利益，如重颁均田制，而宣布邺城 30 里内皆为公田，赐予六镇南迁的鲜卑贵族、官僚和禁卫军将士。与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相反，大刮鲜卑化之风，提倡鲜卑语与胡书，恢复鲜卑族习俗。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东魏、北齐的国力不断削弱。

尔朱荣另一部将贺拔岳率军入关，贺拔岳死后，其部下宇文泰以这支军队控制关陇地区。孝武帝至长安，被宇文泰鸩杀。次年（535），宇文泰另立文帝，都长安，史称西魏。西魏恭帝四年（557）宇文泰子宇文觉废西魏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宇文泰是鲜卑人，而善于处理民族关系，他任用苏绰实行改革，颁行苏绰提出的《六条诏书》，即“先修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周书·苏绰传》），作为施政纲领，不通《六条诏书》者不得做官。又制定计帐（租赋预计数），整顿户籍，实行均田，建立府兵制。这些改革使西魏的国力不断增强。周武帝宇文邕继续推行多方面的改革，他释放奴婢，放免杂户（依附民），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招募汉人充当府兵，禁断佛、道二教，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建德五年（576），周武帝率军东进，次年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周武帝死后，北周军政大权

逐步落入外戚杨坚手中，大定元年（581），杨坚逼周静帝退位，建立了隋王朝。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86-1.bmp}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87-1.bmp}

北魏冯太后孝文帝改革

(beimei fengtaihou xiaowendigaige) 北魏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著名改革。冯太后，汉族人，原文成帝拓跋珪皇后，孝文帝拓跋宏的祖母，延兴元年（471）孝文帝即位时被尊为太皇太后。孝文帝时年4岁，冯太后临朝称制，从此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直到太和十四年（490）九月病死时为止。冯氏当政之初，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官吏无俸，贪赃纳贿成风；大族豪强肆意兼并土地，私役依附农民；水旱蝗灾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北魏政治已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首先是实行均田制。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令，规定：15岁以上男子授露田（未种树的田）40亩，桑田20亩；女子授露田20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予，以备休耕。不宜种桑的地区，男子授麻田10亩，女子5亩。受田者年过60或身死，露田和麻田要归还国家，桑田则可传给后代。露田不得买卖，原有的桑田不足或超出部分可买卖。奴婢授田同平民，耕牛每头30亩，限4头。受田不足者可向空荒处迁移，每3口另给宅田1亩。与均田制相适应，制定新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纳帛1匹、粟2石；15岁以上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或耕牛20头，分别交纳相当于一夫一妇的租调。用以均田授受的土地是国家掌握的荒地和无主地，不触动地主的原有土地，地主还可以通过奴婢、耕牛受田多占土地。国家以均田地将自耕小农固定在小块土地上，加强控制，保障租调收入和徭役征发。贫苦农民受田多不足数，但在有荒地之处，国家还是尽可能分给农民，使无地少地农民的境况有所改善，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实行三长制。太和十年（486），决定重新建立乡官系统，取代宗主督护制，规定5家立1邻长，5邻立1里长，5里立1党长，是为“三长”。三长的职责是负责检查户口，催督赋税徭役。这一制度有利于抑制豪强大族隐匿人口，增加自耕农的数量，它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再次是实行俸禄制。北魏前期以掠夺战争为事，官吏瓜分掳掠的人口财物，而无有俸禄。这种落后的办法导致贪官成群，吏治败坏。太和九年始制定官吏俸禄，规定官吏贪赃满1匹者处以死刑。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亲政。由于平城地处边鄙，物资匮乏，鲜卑旧俗严重，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太和十七年（493）把都城迁往洛阳。同时，他采用汉族政权的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十九年（495），下令禁止鲜卑服装，改穿汉服；禁用鲜卑语，改说汉语；凡迁洛的鲜卑人即以洛阳为籍贯，不得归葬平城。次年，改鲜卑旧姓为音或义相近的汉姓，如拓跋氏改元氏、丘穆陵氏改穆氏、步六孤氏改陆氏、贺赖氏改贺氏、独孤氏改刘氏等等。这些措施有利于改善民族关系，促进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

（陈琳国）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

(beiwei monian gezhu renminqiyi) 北魏末年主要包括六镇起义、河北起义和关陇起义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孝文帝死后，北魏阶级矛盾又日趋尖锐。据统计，从太和末年（499）到正光五年（524），各种起义和斗争达 27 次，平均一年超过一次。矛盾日趋激化的原因是北魏政治腐败，贵族官僚荒淫奢侈，因而加紧对人民的盘剥。当时吏部被称为“市曹”，即卖官市场，各种官职皆有定价。咸阳王元禧占有大规模的田产和牧场，使用奴隶经营盐铁。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有僮仆 6 千，妓女 5 百。“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杨衒之《洛阳伽兰记》卷 4）而各族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政府用大斗、重秤、长尺征收赋税租调，兵役、徭役漫无止境，均田制遭到破坏，各族人民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起义首先在六镇爆发。六镇是北魏北部沿边地带设置的 6 个军镇。当时镇将残酷奴役、剥削镇兵，镇兵及其家属生活艰难。正光四年（523），怀荒镇兵要求开仓发粮，被镇将拒绝，于是群情激愤，聚众杀死镇将。次年，沃野镇民匈奴族人破六韩拔陵亦杀镇将起义，攻占沃野镇。邻近军镇的兵民群起响应，烈火迅速燃遍六镇。北魏统治者无力镇压起义，乞求柔然出兵。孝昌元年（525），在北魏军队和柔然兵的夹击下，六镇起义失败。北魏政府将六镇兵民 20 余万人迁往河北地区，而河北连年灾荒，生活无着的六镇兵民又再度举行起义，即河北起义。柔玄镇兵杜洛周首先在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举兵，攻下幽、定、瀛州。孝昌二年（526）怀朔镇兵鲜于修礼等也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起义，起义军发展到 10 余万。鲜于修礼被叛徒杀死后，部下葛荣继续坚持战斗，接连取得胜利，后葛荣自称天子，建国号齐。武泰元年（528），葛荣火并了杜洛周，占领河北广大地区，各地农民纷纷响应，义军进而发展到数十万。起义大大动摇了北魏的统治，一些汉族地主和胡族部落贵族乘机组织武装。秀容（今山西忻州）地方的契胡酋长尔朱荣带兵入京，掌握了北魏政权。这时葛荣率领起义军进至滏口（今河北磁县），由于骄傲轻敌，被尔朱荣军击败身死。关陇起义发生于正光五年（524），羌人莫折大提被推为首领，自称秦王。大提病死后，子莫折念生称天子，建国号秦。

起义军攻下岐州、凉州，曾一度受到挫折。孝昌三年（527），莫折念生重振声威，大败北魏军于泾州，复攻占东秦、岐、豳、北华等州。后来起义军内部出现叛徒，杀害莫折念生及其全家。但起义并没有结束，在另一义军领袖万俟丑奴的率领下，关陇人民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普泰元年（531）。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北魏王朝的腐朽统治，而且是一次汉、鲜卑、羌、氏等各族人民并肩作战的联合行动，各族人民在斗争中增强了解，增进团结，有力地促进各族人民的融合。

（陈琳国）

府兵制

(fubingzhi) 西魏、北周、隋、唐的兵制。其创立有一个过程。西魏最初把以六镇鲜卑兵户为主的军队编制为 12 军，分别任命 12 个大将军统领。大统三年（537），宇文泰担任柱国大将军，总领 12 军。

八年（542），更置 6 军。次年，因邙山（今河南洛阳北）之役败于东魏，6 军损失惨重，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周书·文帝纪下》），使鲜卑军人集团与关陇的地主豪强武装结合起来。此后至大统十六年（550）以前，又任命柱国大将军 7 人，并宇文泰为 8 柱国。但宇文泰乃军队最高统帅，都督中外军事，柱国之一的元欣则有名无实，故直接统领 6 军的是其他 6 柱国。6 柱国各辖两位大将军，仍为 12 大将军。每位大将军辖两位开府，每开府领 1 军，共 24 军。每开府又辖两个仪同，每仪同领 1 团，共 48 团。这就是府兵制的组织系统。府兵制创立之初，府兵由六镇鲜卑军人和关陇豪右组成，并非一般平民。府兵另立军籍，不入民户，不承担国家赋税徭役，实行轮番宿卫和训练。建德二年（573），改府兵军士称“侍官”，始募百姓充当。隋开皇十年（590），隋文帝下诏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隋书·高祖纪下》），府兵制遂与均田制结合成为兵农合一的制度。

（陈琳国）

道教的形成和发展

(dao jiao de xingcheng he fazhan) 道教是中国主要宗教之一，诞生于中国。东汉末年，神仙方士之说、阴阳五行之学与道家学说的某些部分杂糅起来，形成了道教。最早的经典是《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内容极庞杂。张角曾利用它组织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亦随之消亡。道教的另一派由张陵（一名张道陵）创立，他入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修道，尊奉老子为太上老君，以符书招致信徒，入道须交五斗米，因称“五斗米道”。张陵子衡、孙鲁传其道。张鲁率五斗米道徒保聚汉中 20 余年，自号“师君”，置祭酒治民，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后曹操取汉中，张鲁投降。此后五斗米道继续留传，尊称张陵为天师，故又名“天师道”。两晋之际，道教被改造成统治阶级的宗教。葛洪（284 - 364）著《抱朴子》，以道为本，以儒为末，主张儒道结合；提出采炼丹药以延年益寿，修成神仙；攻击张角等民间道教领袖为奸党，剔除道教中可能被利用组织起义的教义、仪式，从而使道教完全成为祈求长生之术和奴役人民的工具。东晋南朝道教信徒编出大量道经，如《上清真经》，南齐顾欢据此又编为《真迹经》，萧梁陶弘景再重编为《真诰》；又有《洞玄灵宝经》，经刘宋陆修静增修，以后陆修静广泛搜集各种道经，集成经戒、方药、符图等，凡 1228 卷。道教也在北朝传播，道士寇谦之托言太上老君授予“天师”之位，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等道经，并献给北魏太武帝，深受赏识。太武帝设道坛亲受符箓，并改年号为“太平真君”。道教教理杂乱，哲学思想贫乏，既接受传统儒家思想，又移植佛教教理和戒律，模仿佛教寺院建立道观。但道教经书中也保存了不少道教史料和天文、医药、化学等科技史料。

（陈琳国）

佛教传播和寺院经济

(fojiao chuanbo he siyuan jingji) 佛教是中国主要宗教之一。两汉之际，佛教由西域传入内地，当时只在少数皇室贵族和官僚中流行。黄巾起义失败后，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人民群众陷入苦难的深渊。当他们感到前途渺茫、哀苦无告时，自然会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产生对死后幸福的憧憬，这为佛教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儒学的衰微和玄学在统治阶级中盛行，玄理与佛理的某些共通之处，为佛教在统治阶级中的传播提供了方便。于是，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勃兴，广为流行。1.天竺、西域僧人相继东来，倡法说教，翻译佛经。据统计，三国时译经 201 部 435 卷，西晋 333 部 590 卷，东晋十六国 419 部 1716 卷，南朝 563 部 1084 卷，北朝 105 部 355 卷。译经多为东来僧人主持，如竺法护、鸠摩罗什、昙无讖等，也有汉族僧人参与，如释道安、僧肇、慧远等。2.汉代禁止汉人出家为僧尼，三国时僧尼不多，西晋以后增加很快。西晋有僧尼 3700，东晋 24000，后赵约 10000，宋 26000，齐 32500，梁 82700，陈 32000，而北魏、北齐竟达 200 万，北周也有 100 万。3.随着僧尼的猛增，寺院拔地而起，遍布南北。东晋有佛寺 1768 所，后赵 893，宋 1913，齐 2015，梁 2846，陈 1232，北魏、北齐都有 30000，北周有 10000。4.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佛教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历朝统治者大多崇信佛教，支持佛事。其中以梁武帝为甚，他大建佛寺，举行法会，亲自讲经，甚至四次舍身为“寺奴”，然后由朝廷以钱亿万赎回，实则为佛寺敛财。陈武帝亦曾演出舍身丑剧。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佛教寺院经济势力不断扩张，形成独立的寺院经济。寺院占有大量土地，上层僧尼构成寺院地主阶层，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对下层僧众和寺院的依附民、寺院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下层僧尼大多来自破产或为逃避国家赋役的小农，成为寺院庄园的劳动力；寺院依附民即寺院的佃户；寺奴系国家赐予或罪犯配给，他们担负着寺内和寺院庄园最繁重的生产劳动。如北魏僧祇户，岁输谷 60 斛，是寺院的农奴；又有佛图户，供寺院洒扫，兼营田输粟，是寺院的奴隶。寺院还兼营商业，从事高利贷剥削。寺院经济的发展，必然与国家争夺土地和劳动力，损害国家财政利益。所以北朝统治者曾采取灭佛措施，北周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令禁断佛、道，毁灭经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主要就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

（陈琳国）

塔

(ta) 起源于印度的一种宗教建筑物。相传释迦牟尼死后，遗体火化烧出了一些“舍利子”，他的弟子们将这些舍利子带到古印度各地，修建了8座坟墓分葬。坟墓为覆钵形，下面是一座高台，坟顶立一根尖刹。这种建筑便是最早的塔。梵语称作 STUPA，中文译音为“窣堵坡”、“浮屠”、“浮图”等。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传入我国，我国的建筑师在古代原有高层建筑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塔的建筑形式，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的新建筑——塔。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89-1.bmp}

我国古塔现存三千多座，种类繁多，丰富多采。塔的分类方法有多种：如从平面形状上分，有四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十二角形、圆形等。以建筑材料上分，又有木、砖、石、金、银、铜、铁、琉璃砖瓦造的等等。从佛教教义上讲，又有所谓生身舍利、法身舍利、各种宗教派的塔等等。为了概括和突出古塔在我国古建筑中的艺术造型与结构形式予以分类，大约有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亭阁式塔、花塔、覆钵式塔、金刚宝座式塔、过街塔及门塔、宝篋印经塔等。现选择其中比较典型的古塔，分别简述如下：

大雁塔 在陕西西安市城南慈恩寺内。唐高宗永徽三年（652），玄奘为贮藏从印度取回的佛经而建。塔高5层。武则天时重修，增高为10层。后经战乱破坏，只存7层。经明代修葺即今塔。塔身系青砖砌成，高64米，呈方锥体，底层各边长25米，逐层缩小。每层四面各有一券拱门。塔内呈方形，有扶梯盘旋而上，可凭栏远眺。该塔造型简洁，气势雄伟，为典型的楼阁式建筑。塔底的门楣上雕刻唐建筑图案和佛像等线刻画，门旁嵌有“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刻，均是唐代珍贵文物。

祐国寺塔 在河南开封市内。建于宋皇祐元年（1049），为八角十三层仿木构楼阁式砖塔，高54米多。塔身外包砌红、褐、蓝、绿各色琉璃砖，因红、褐色调近似铁色，故称“铁塔”。塔身细部的琉璃上有佛像、菩萨、飞天、狮子、宝相花等装饰花纹50多种。雕工精细，神态生动，为宋代琉璃砖雕艺术的杰作。此塔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一座琉璃建筑。

嵩岳寺塔 在河南登封嵩岳寺内，建于北魏正光元年（520），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密檐式砖塔。塔高40余米，15层，平面呈十二角形。第一层塔身特别高大，这是密檐塔的特点。塔身之上叠涩出密檐十五层，塔檐之间每面各有小窗1个。15层之上，为一巨大的仰莲瓣组成的须弥座，以承托七重相轮组成的刹身，刹顶为巨形宝珠。整个塔的外形，呈圆和的抛物线状。巍峨挺拔，雄伟壮丽。

崇圣寺三塔 在云南大理城西北原崇圣寺，三塔鼎足而立。大塔方形，中空，名千寻塔，为密檐式建筑，形状与西安小雁塔相似，高69米多，共16层，每层正面中间开券龛，置白色大理石佛像一尊。根据塔的形制和云南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及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分析，此塔建于唐开成（836—840）以后。南北小塔实心，八角形，各十层，均高42米。各层分别雕券龛，佛像、莲花、瑞云等，华丽庄重，两塔顶各有3个衔接的铜制葫芦，第二个葫芦上遮有八角伞，其周边系铜铃，从建筑风格上看，两塔建于五代（907—960）。

妙应寺白塔 在北京西城阜成门内。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因塔身外

部皆抹白灰，俗称白塔。高 50 多米，塔基为三层方形折角须弥座，其上为半圆突起莲瓣组成的覆莲座和承托塔身的环带形金刚圈，使塔从方形折角基座过渡到圆形塔身，自然而富装饰性。硕大的覆钵形塔身，形如宝瓶，外形粗壮稳健。刹座呈须弥座式，上立着下大上小的刹身，用砖砌成相轮十三重，其上置巨大的铜制宝盖，其周边悬挂着透雕铜制流苏和铜铃。宝盖上是刹顶，为一座铜制小喇嘛塔。1978 年维修时，发现塔内藏有乾隆所赐的僧服、经书等各种珍贵文物。据记载，该座塔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设计建造，是我国喇嘛塔的最早代表作。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 在北京西直门外，明成化九年（1473）建成。塔和宝座全部用汉白玉石建造，下为高 7 米多的四方形宝座，座前后辟券门，内有石梯盘旋而上通向宝座顶部。座上分建五座平面方形、单层密檐塔和一座琉璃罩亭。五塔分立在宝座中心和四角。中间一座较高，有十三重檐，四角的四座均是十一层重檐。塔身及金刚宝座上全部雕刻有佛像、梵文及宗教纹饰。造型虽近似印度建筑，但结构和雕刻手法则具有我国传统的民族风格，是中国建筑吸收外来文化的创造性作品。

佛宫寺释迦塔 在山西应县城佛宫寺。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塔高 67.31 米，楼阁式，塔身外观五层檐，每层出平座，内部则有四个暗层，实为九层，每层均有楼梯盘旋上下。平面呈八角形。平座上绕以柱杆游廊，可供周览眺望。塔的中心为了安置佛像，以各种斜撑和支柱结合使用，增强了塔体的刚度。由于塔的结构庞大复杂，各种物件变化很大，仅斗拱就有六十多种不同尺寸与形式。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大的木塔。木塔多次受强烈地震的波及，但没有任何损害。1974 年维修时，发现一批辽代写经、刻经和木板套色绢质佛像等珍贵文物，对进一步研究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活动等具有重要意义。

（吕瑞珍）

云冈石窟

(Yungang shiku)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 16 公里的武周山北崖上，自东而西，长约 2 里，依山势开凿。现存主要洞窟 53 个，造像 5 万余尊，其中有佛像、菩萨、力士、飞天等，姿态各异，形象生动。最大的佛像高 17 米，最小的仅有几厘米。云冈石窟造像以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采著称，是我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云冈石窟创建于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年间（460—465）。当时有一著名和尚昙曜主持监造石窟五座，称“昙曜五窟”。即现在位于云冈石窟西部东头编号为十六窟至二十窟。传说五窟中的主佛是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位帝王为楷模雕刻而成的。石窟顶部成穹窿式，外壁满雕千佛，风格古朴。其中十六窟本尊为释迦牟尼立像，高 13.5 米，面目清秀。十七窟正中是交脚弥勒，坐像，高 15.6 米，窟小像大，咄咄逼人。十八窟本尊为披千佛袈裟的释迦佛立像，高 15.5 米，气势磅礴雄伟。十九窟本尊为释迦牟尼坐像，高 16.8 米，是云冈石窟中第二大造像，体形挺健雄伟的佛和菩萨造像，充分体现了北魏作品的风格和特点。二十窟正中是释迦牟尼坐像，高 13.75 米，面部丰圆，鼻高唇薄，大耳垂肩，两肩齐挺，造型雄伟，气魄浑厚，堪称云冈石窟的代表作。云冈石窟中除开凿最早的“昙曜五窟”外，其他主要洞窟大多完成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之前，后世曾多次修缮，并增建了佛寺。各种造像雕刻更加精美成熟。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同期开凿的一组双窟，即编号为第五窟和第六窟。窟前有清顺治八年（1651）建造的五间四层木构楼阁，琉璃瓦顶，极为壮观。第五窟后室本尊是释迦牟尼坐像，高 17 米，是云冈石窟中佛像之最。第六窟堪称云冈石窟第一奇观，规模巨大，由地面到窟顶高 20 米，中间有一面积约 60 平方米的两层方形塔柱，上端连着窟顶，整个塔柱和洞壁嵌满佛龛和多种装饰，下层四面刻有佛像，上层倚角各雕九层出檐小塔，驮于象背之上，窟顶雕有三十三诸天及各种形式的骑乘，其余各壁雕有佛、菩萨、罗汉、飞天等。在东壁和南壁下边绘有“佛传图”，用连续浮雕故事画，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出家成佛的事迹。在这个洞窟中很难找出一处没有雕刻的空隙，规模宏伟，雕饰富丽，技法娴熟，内容丰富，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窟。在云冈石窟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洞窟内外壁面、藻井和佛光上，雕刻着身披锦帛或手持乐器的千姿百态的飞天。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香音之神，她们善飞舞，能奏乐，满身异香。古代艺术家用轻软绵长的飘带，衬托出女性优美轻捷的身躯，自由地飞翔在天上人间。

（刘桂英）

魏晋玄学

(Wei jin xuanxue) 魏晋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随着汉末社会危机的加深和汉王朝的瓦解，儒学逐渐趋于衰微，一些士大夫开始从道、名、法诸家学说中发掘有用的思想资料，从而动摇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曹操提倡名、法，公开否定儒家说教，更有利于各种思潮的活跃。曹魏正始(240—249)年间，何晏、王弼阐发《老子》、《庄子》和《周易》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因《老子》等三部书后来被称为“三玄”，故这个流派遂被称为玄学。何、王以探究宇宙本源为主要课题，从《老子》的“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出发，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晋书·王戎传从弟衍附传》)意思是说，“无”是超越物质性的世界本源，它不仅创造万事万物，而且是人生的根本。贤者能因之成就高尚的道德，不肖者能因之明哲保身。同时，他们走上综合儒道的道路，宣称名教出于自然(“自然”即“无”)，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面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举行论辩来阐释玄理。后一种方式即所谓“清谈”。清谈一般分主客双方，谈主阐述自己的见解，谈客提出质疑，经过数番诘辩。这是玄学发展的特殊方式。由于何、王出身高贵，身居显职，而言及玄远、神采飘逸，博得官僚士族的赞誉和竞起仿效。玄学之盛还在于魏晋之际曹氏、司马氏之争愈演愈烈，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为了避祸，名士们谈玄以逃避现实，阮籍“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嵇康虽稳居林下，拒不仕晋，但平时“无喜愠之色”(晋书《嵇康传》)，十分谨慎。他们在生活上则放荡不羁，颓废没落，及时行乐。玄学对于打破儒家思想的禁锢有一定作用，玄学的思辩形式也刺激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但玄学亦强烈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腐朽性。

(陈琳国)

范缜和神灭论

(fanzhen he shenmielun) 范缜(约 450—515)，南朝唯物主义哲学家。字子真，原籍南阳舞阴(今河南沁阳西北)，先世流寓江南。少时勤奋好学，性质朴正直，不媚俗，不盲从。仕南齐、梁，在佛教泛滥，皇帝和王公贵族都竞相佞佛之时，他敢于反佛教，宣传无神论思想，因而为权势者所压抑，终生仕进不过尚书郎、国子博士，但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永明五年(487)，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盛招宾客，范缜亦预其列。子良笃信佛教，而范缜却公开宣称无佛，否定佛教因果报应说，撰著论文《神灭论》。《神灭论》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这就是说，形(肉体，即物质)与神(精神)是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精神依赖于物质，物质是精神的基础，从而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是第二性的。他又以刀刃与锋利为喻，论证形神的关系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梁书·儒林·范缜传》)大意是如同离开锋利就无所谓刀刃，离开刀刃也谈不上锋利一样，精神岂能在肉体死亡以后仍然存在呢！《神灭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不仅有力地批驳了喧嚣一时的宗教迷信思想，而且在回答物质和精神关系的问题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辉。此论一出，影响极大。萧子良又惧又恨，发动对《神灭论》的围剿。时士族王琰攻击范缜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范缜回答说：“呜呼王子，知其祖先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南史·范云传从兄缜附传》)王琰等理屈词穷。萧子良又派王融以中书郎之职劝诱范缜放弃神灭论的观点，范缜义正辞严地说：“倘使我范缜卖论取官，早已当上尚书令、仆射了，何止中书郎！”梁武帝萧衍将佛教定为国教，佞佛气氛弥漫全国。范缜毫不妥协，进而修订《神灭论》，并加以传播。梁武帝斥之违经背亲，发动王公朝贵 60 余人群起攻之，范缜虽孤军奋战，但“辩摧众口，日服千人”。

(陈琳国)

三国志与后汉书

(sanguozhi yu houhanshu) 中国史学史上的两部名著，与《史记》、《汉书》并称为“前四史”。《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好学，熟读经史，富于识见。原任蜀汉观阁令史，蜀亡后仕晋为著作郎，编撰《三国志》。《三国志》含《魏书》（30卷）、《吴书》（20卷）、《蜀书》（15卷），共65卷。陈寿善总揽全局，不为三国王朝所限，记载了从东汉末黄巾起义至西晋灭吴的近百年史；又能尊重史实，不以魏为正统，吴、蜀为僭伪，分叙三国治乱兴废。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选材精审，文辞简洁，笔墨传神，如名士之风雅、文臣之谋略、武将之威猛，皆栩栩如生。但《三国志》比较简约，后南朝刘宋裴松之作《三国志注》，引书140余种，丰富了三国史的内容。今本《后汉书》作者为刘宋范曄和西晋司马彪。范曄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浙川县东）人。博涉经史，善为文章，精隶书、音律。仕刘宋，历任显职，官至左卫将军，统领禁旅，参与机要，后在官场倾轧中以“谋反”的罪名被杀。元嘉九年（432），范曄由尚书吏部郎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南史·范曄传》）。范曄《后汉书》90卷（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东汉一朝的历史。它博采众家后汉史的成果，而后来居上，所立《皇后本纪》、《宦者列传》、《方术列传》、《文苑列传》、《党锢列传》等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汉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开拓了纪传体史书记叙历史的范围。它的史论颇具特色，能够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分析历史问题，评价人物也比较妥当，“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1）。范曄原计划作志10卷，但未完成，后萧梁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始将司马彪《续汉书》的8志分为30卷补入，而《续汉书》的其他部分已佚。

（陈琳国）

酈道元和水经注

(li daoyuan he shuijingzhu) 酈道元(466?—527)，北魏地理学家。字善长，范阳涿(今河北涿州)人。历任尚书郎、治书侍御史、太守、刺史、御史中尉等职。以刚直著称，执法甚严，敢于打击为非作歹的权贵豪族，因此遭受忌恨，屡被罢官。孝昌三年(527)，雍州刺史萧宝图谋割据陇西，权贵们欲借刀杀人，使酈道元出任关右大使，结果在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东)被叛军所害。酈道元最重要的贡献，是留下一部地理学的巨著——《水经注》。《水经》系三国时的一部地理书，但只记述全国河流137条，且比较粗疏简略。《水经注》名为《水经》作注，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的、全新的科学著作。全书40卷，30万字，是《水经》原文的20余倍；记述的河流水道多达1252条，是《水经》所记的近10倍。它溯源探流，详细记载了这些河流水道的方位、流向、距离、经过区域，以及这些地区的地形地貌、地理沿革、温泉瀑布、地质矿物、植物动物、农业工业、水利航运、桥梁道路、园林陵墓、自然灾害和风土人情等等，内容之丰富，记述之具体，文字之生动，都是空前的，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从事地理、历史、考古、农业、水利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水经注》的不少篇章亦是优秀的山水文学。酈道元“好学，历览奇书”(《北史·酈道元传》)，故《水经注》旁征博引，搜罗宏富，所引用的书籍有437种，而且，他对征引的材料进行了整理分析、去伪存真的工作。他特别重视野外考察，足迹遍及今山东、河南、河北、内蒙。所到之处，他跋山涉水，寻觅水道，察看碑刻，收集民谚、民间传说，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水经注》的撰述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水经注》的价值已经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由研究《水经注》而开创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酈学”，可参看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陈琳国)

洛神赋图

(Luoshenfutu) 顾恺之以曹植的《洛神赋》为题材绘的图卷。曹操破袁绍时，曾得到一名叫甄氏的美女，曹植同曹丕弟兄二人都爱甄氏，曹操将此女给了曹丕，这很伤曹植的情感，不久甄氏死了。有一天，曹植到京城见到曹丕，曹丕将甄氏的一个枕头送给曹植，于是曹植见物思人，返回封地途经洛水时，顿觉生情，便假托梦见洛水女神来抒发自己的怀念情绪。画卷从曹植于黄昏时在洛水边恍惚中见到的洛神宓妃起，根据赋中所咏“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日，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雷”的意境，表现洛神丰姿秀美，含情脉脉，飘飘若仙。而曹植则是两手扶着侍臣，体态尊贵，双目流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接着描绘他们若即若离的关系和他们互赠礼物，一同乘车、坐船，畅叙衷情，四周“水禽翔卫”，旌旗飞扬，形成全画高潮。画卷最后画天将破晓，曹植回到岸上，哪有什么洛神，哪有什么美女，目痴口呆，疲倦懊丧，只得带着无限依恋之情，坐上马车，“归乎东路”。画家细致、准确地描绘了曹植和洛神在感情上的变化，格外传神，动人。此画现存宋摹本，长 572、宽 27 厘米，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齐吉祥)

女史箴图

(Nüshizhentu) 东晋画家顾恺之(约 345—406)绘,女史是宫中女官,经常在皇后左右,随时记载言行并制定宫廷中嫔妃应遵守的规章制度。西晋惠帝无能,皇后贾南风生性妒忌,操柄弄权,且荒淫放荡。张华为此作《女史箴》,以韵文形式,拟女史口气,写宫廷规箴既讽刺放荡暴戾的贾后,也规劝教育宫廷妇女应遵循的封建道德,如《女史箴》中写楚庄王的夫人樊姬,为了劝楚庄王不要再打猎以便多理朝政,自己坚持三年不吃肉。又如汉元帝与嫔妃同去观熊,刚好有一只黑熊攀槛而出,众妃皆惶恐奔逃,唯有冯婕妤为了保护皇帝,跑上前挡住黑熊,众武士趁机赶忙将熊杀死,张华称赞冯婕妤勇敢无畏“知死不吝”。顾恺之依据《女史箴》画成一段长卷。但是他的原作早已失传,现见到的《女史箴图》有两个摹本,一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南宋人所摹。另一本在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掠,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传为唐代人所摹,现在诸家著录多采用此摹本。这一摹本长 349、高 25 厘米,绢地,设色,有九段画面,形象生动传神。据记载顾恺之才气横溢,诗书画俱佳,一生作画很多,但都没有留传下来,即使是后人摹本也仅存《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

(齐吉祥)

王羲之书法艺术

(wang xizhi shufa yishu) 王羲之(321—379)，东晋书法家，在中国历史上极负盛名。字逸少，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东晋宰相王导之侄，官至右军将军，故人称王右军。王羲之生活在书法艺术飞跃发展的时代。中国汉字的字形在实践中几经变化，自甲骨文、大篆、小篆到隶、楷、行、草各种书体，走过了漫长的路程。汉字已经不仅仅是语言的符号，而且逐渐演变为一门独特的艺术。汉魏以后，人们从注重汉字的形体结构美上升到追求汉字的神韵，以书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趣和精神风貌。于是，书法名家迭出，涌现了蔡邕(东汉)、钟繇(曹魏)、卫瓘(魏晋)等代表人物。其中，曹魏太傅钟繇精于隶、楷、行书，发展秦汉以来所未有的楷法，对汉字的定型贡献尤大。王羲之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7岁开始学书。其叔父王廙工书画，对他影响很大。他又得到女书法家卫夫人(名铄，卫瓘族孙女)的指导，大有长进。稍长，“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晋书·王羲之传》)。后来，他博采众家之长，变汉魏质朴古风，创造了一种妍美流便的新体，遂独占鳌头，备受大家推崇。王羲之早年书法不如庾翼、郗愔等，但他能勤学苦练。他给友人的信中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我们如果都能这样勤奋，未必就落后于他。”他善于观察生活，从鹅划水的姿态领悟出笔势：食指高钩如鹅头昂扬微曲，无名指内钩如鹅掌撑地。运笔时如鹅两掌齐力拨水。至暮年，王羲之的书法臻于神妙，各种书体都有很高的造诣，变化无方而又挥洒自如，出入意表而韵味无穷。有一次，他去一位门生的家，见几案平滑洁净，一时书兴大发，就在几案上写起字来。但门生之父不懂书法，竟用刀刮去。门生见后懊丧连日。又有一次，他遇见一位卖竹扇的老妇，就在每把扇上写上5个字。老妇见新扇尽着墨迹，很不高兴。他说：“你说这是王右军写的，每把卖钱百文。”果然，人们听说是王羲之书法，遂抢购一空。王羲之书法代表魏晋时代的最高水平，对后代影响巨大。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写下史论曰：“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王羲之的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但真迹俱未流传下来。据说《兰亭序》的原本作为陪葬品随葬于唐太宗的陵墓中。传世的《兰亭序》、《丧乱帖》等多属后人摹本，散见于《淳化阁法帖》及宋以来诸集帖中。

(陈琳国)

算筹

(suanchou) 我国最早的计算工具，大约起源于西周，有两千多年的使用历史。算筹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竹、木、骨、铁、铜等均可，但要求每种筹必须一般长短、粗细。《汉书·律历志》记载秦汉时的算筹长六寸(13.86厘米)，直径一分(0.23厘米)，这是有关算筹形制的最早文字材料。1971年在陕西千阳县出土30多根西汉宣帝时的骨质算筹，每根长13厘米左右，是考古中首次发现的算筹实物。用算筹表示数字共有两种形式，一种称纵式，也叫直式，一种称横式。人们规定用纵式表示个位、百位、万位、百万位……用横式表示十位、千位、十万位、千万位……以此类推，纵横相间，可表示任何整数。遇到“零”数不摆算筹。用算筹可进行加、减、乘、除、开方等多种运算，其计算程序同珠算基本一样，如加减运算也都是从左边一位开始。采用的是十进位制。算筹的不足之处是运算时需占用一定面积，摆列算筹时容易出错，因此，在十五世纪算盘得以推广后，便取代了算筹。

(齐吉祥)

祖冲之和圆周率

(zu chongzhi he yuanzhouli) 南朝科学家。字文远，原籍范阳道县（今河北涞水北），祖先流寓江南。历仕宋、齐，曾任娄县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职。在科学技术上有许多发明创造，尤精于数学、历法和机械制造。数学方面著有《缀术》，此书在唐代被政府列为算学的主要课本，考试多从中命题，惜已失传，唯有他精确计算的圆周率保存在《隋书·律历志上》。关于圆周率，东汉张衡推算为 3.1466，还不精确。魏晋之际数学家刘徽以割圆术计算圆周率，主张“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九章算术·方田》注），从而得出 3.1416 的数值。在此基础上，祖冲之精确地计算出圆周率在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他还用两个分数值来表示：密率为 $\frac{355}{113}$ (约等于 3.1415927)，约率为 $\frac{22}{7}$ (约等于 3.14)。祖冲之求得的圆周率数值，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次。

直到 1427 年，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 (Al-Kashi) 才超过祖冲之，达到小数点后 16 位的精确度；而德国数学家奥托 (Valentinus Otto) 在 1573 年才得出密率的数值。此外，祖冲之还研究出运用二次、三次代数方程求“开差幂”、“开差立”的问题（前者为已知长方形的面积和长、宽之差，用开平方的方法求它的长和宽；后者为已知长方柱体的体积和长、宽、高的差，用开立方的方法求它的边长）。历法方面，祖冲之编制的《大明历》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一部历法。由于他善于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应用“岁差”原理和改进置闰方法，得出一年为 365.24281481 日，这与现今的准确数据仅差 46 秒。他又求得“交点月”（即月亮连续两次经过黄道和白道的同一交点所需的时间）为 27.21223 天，这与现在的准确数据差不到 1 秒。在机械制造方面，祖冲之曾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及机械运输工具等。为表彰祖冲之的卓越贡献，如今月球上的一座山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陈琳国)

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

(zhang zhongjing he shanghanzabinglun) 张仲景(约 150—219) 东汉末三国初医学家。名机，南阳涅阳(今河南南阳)人，官至长沙太守。建安时代(196—219)，中原地区传染病大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亡”(《伤寒杂病论·序》)。张仲景的家族亦不能幸免，200 余人死去三分之二。于是他励志从医，遍读古代医学典籍，博采民间验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撰著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16 卷。所谓“伤寒”，即当时流行的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胃等急性传染病的统称，不是时下西医所说的伤寒病；杂病，主要指内科各种疾病，也包括外科、妇科等。张仲景的贡献一是辨症，二是治疗。辨症就是辨明症状，运用望色、闻声、问证、切脉等四种方法诊断，把病症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大类型，对每一类型病症的发生、发展和转变进行分析，初步总结出中医诊断学的“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如先分析阴症或阳症，由阴阳辨明表里，再辨明虚实，进而辨明寒热。在辨症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归纳为汗、吐、下(泻)、和、温、清、补、消“八法”。除服药外，还有外搽、舌含、针灸、温熨、药摩、浸足、吹耳和人工呼吸等治疗方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中医医疗原则，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后经西晋医学家王叔和编辑整理分成《伤寒论》(10 卷)和《金匱要略》(6 卷)两部，流传至今。后世尊称张仲景为“医圣”，称这两部书为“医经”。这两部书影响深远，现在仍然是中医学的经典，并受到世界医学界的推崇，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医学工作者。

(陈琳国)

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jia sixie he qiminyaoshu)贾思勰, 北朝农学家, 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农学名著《齐民要术》的作者。史书中无传, 其生卒年不详。由《齐民要术》所提供的资料说明, 他大约是今山东人, 曾任北魏高阳(今山东临淄西北)太守。他博览群书, 善于从古书中汲取历代农业科学知识; 又实地考察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 广泛搜集民谚歌谣, 总结劳动群众的生产经验; 他还亲自喂过 200 头羊, 因饲料不足, 死去大半, 后种大豆为饲料, 仍不得法, 于是向老羊倌虚心求教, 才学到养羊的办法。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 他写成了《齐民要术》10 卷, 92 篇, 11 万字。此书“起自耕农, 终于醢(x, 醋)醢(h i, 肉酱), 资生之术, 靡不毕书”(《齐民要术·序》), 内容十分丰富, 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家畜家禽的饲养及农产品的加工制作等技术。如耕锄, 书中根据北方的气候特点, 指出秋天要深耕, 春夏则浅耕, 耕作时土壤须干湿适宜, 宁干勿湿, 过湿会造成板结, 不如不耕。强调在作物生长过程中要勤锄, 以除草、松土、保墒。如选种, 提出留种要优良纯净, 单收单放, 不可混杂。书中搜集介绍农作物的许多品种: 粟有 86 个品种, 粳稻有 13 个品种, 秈稻有 11 个品种。如施肥灌溉, 书中记载了肥料种类, 特别提到绿肥, 以绿豆的绿肥最好, 强调施用熟肥, 通过踏粪、压青和堆积等方法制取。又灌溉要适当, 水稻在薅后、熟前应排水晒田。其他如作物的轮种、套种、嫁接、防冻害, 家畜家禽的防病、治病, 以及酿酒、制醋、制酱、腌肉、剪毛、制毡等等, 书中都分别作了记述。《齐民要术》不仅总结了各种生产技术, 而且包含着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商品生产等许多宝贵的思想, 它在我国和世界农业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陈琳国)

隋

(sui 581—618)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统一王朝。杨坚为北周外戚，女为周宣帝皇后。周静帝年幼即位，杨坚总揽军政大权，逐渐剪除异己，为夺取政权扫平了道路。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称帝，建国号隋，建元开皇，是为隋文帝。开皇八年(588)，隋文帝以晋王杨广为统帅，大举伐陈。次年，攻下建康，俘后主陈叔宝，接着又陆续平定南方全部州县。隋的统一，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南北分裂近三百年的历史，顺应了这一历史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主潮流，使中国历史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隋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开皇二年、三年颁布关于均田和租调的新令，对授田规定、纳租调限额、服役等方面都做了调整，负担比北朝有所减轻。文帝采纳高颉建议，实行“输籍之法”，检括逃亡、隐漏之户，大大增加了国家编户，扩大了征收赋役的对象。文帝还确定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行政中枢的中央官制，简化地方行政机构，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官僚体系。改革选举制度，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废除了辟举制，基本结束了大族豪强垄断地方实权的局面。废除了九品中正制，炀帝时新创进士科，为普通地主参加政权开辟了道路。开皇十年，隋文帝改革府兵制，适应了民族融合的要求，有利于统一的完成和巩固。隋初修订《开皇律》，改革币制，统一度量衡，兴修水利等。上述一系列措施，使隋朝中央集权逐渐巩固，国力逐步增强，社会经济由恢复走向发展，呈现繁荣景象。

隋朝初期户口400万户，大业二年(606)增到近900万户。仓储丰实，谷物、布帛充溢于政府的各主要府库。手工业、商业都有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也很发达。隋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虽互有战和，但经济、文化交流逐步扩大，大陆与台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隋朝对外联系较为广泛，曾遣使出访东亚、南亚、西亚诸国，不少国家亦遣使到隋。佛教、文学、音乐、建筑都有新的发展和成就，工匠李春负责设计和建造的安济桥(即赵州桥，在今河北赵县)世界闻名。隋炀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全长数千里，贯通南北，适应了南北经济、文化联系的需要，对后世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隋朝最盛时，疆域东、南皆至海，西到今新疆东部，西南至云南、广西，北到大漠，东至辽河，统户约900万户，口近5000万，是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力富强的帝国。

隋炀帝杨广为杨坚次子，靠谋略夺取帝位，在他统治期间，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但繁重的力役、兵役连年不休，营东都、修长城、开运河、巡幸各地，每次工程动辄征发几十万到数百万丁男，甚至役及妇女。大业八年(612)、九年、十年三征高丽，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巨大，死亡众多，给劳动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尤其是山东、河北地区，作为东征基地，又逢连年水旱灾害，破坏尤为严重，隋末农民大起义也终于在这一地区拉开序幕。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削弱并瓦解了隋的统治，各地豪强和军府将领纷纷乘乱割据。李渊父子于太原起兵，占据关中一带，炀帝被杀后，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隋历文帝、炀帝、恭帝三世，共38年。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94-1.bmp}

(宁欣)

隋文帝杨坚

(Suiwendi Yang Jian 541—604) 隋朝的建立者。581—604年在位。杨坚父忠为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北周时杨坚袭父爵为隋国公，女为周宣帝皇后。周静帝年幼即位，他任丞相，凭借家世与后父的地位总揽朝政，陆续消灭了内外政敌，于周大定元年(581)代周称帝，建元开皇，建都长安，是为隋文帝。开皇八年(588)，隋文帝下诏伐陈，分兵八路，大举南进。开皇九年平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他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政治方面，总结魏晋以来不断发展的官僚体制，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为中心的中央官制，这一制度为唐代继承和发展；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除九品中正制和辟举制，选任官吏大权一律收归中央，实行科举制。兵制方面、改革府兵制，使中央军力得到加强。经济措施方面，继续推行均田制，规定自诸王至百姓的授田限额及所承担的义务，成丁年龄由18岁提到21岁，规定50岁以上可以免役收庸，力役和户调比北朝有所减轻。均田制的实施和输籍定样、大索貌阅等整顿户籍的措施，扩大了赋役征收对象，人民负担相对减轻，促进了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使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发展。仁寿四年(604)猝死，据说为太子杨广所谋害。隋文帝在位23年，完成了统一大业，推行一系列措施，使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他本人雄才大略，勤于政事，文治武功颇有建树，但为人失之于苛察，晚年惑于次子杨广的诈伪废嫡致祸。

(宁欣)

三省六部制

(sanshengliubuzhi) 隋唐时期的中枢制度。三省指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三省为中央最高中枢政务机构，一般为中书决策，门下审核，尚书执行。三省长官：中书令（隋为内史令）、门下侍中（隋为纳言）、尚书令共行宰相之职。六部为尚书省属下的中央行政机构，分掌各方面的政务及政令的贯彻执行，并对中央担任具体事务的九寺五监及地方上的府、州、县有领导、监督之权。其后，三省长官成为荣誉之职，其决策权逐渐被剥夺，宰相一职为他官参加议政所替代。唐中叶以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真宰相，其后，地位尊崇的翰林学士，因拥有起草诏敕权，被称为“内相”（《旧唐书·陆贄传》）。尚书省六部及下属各司的职权，在安史乱后，由于使职的趋重与普遍化，逐渐被分割，故三省六部制在唐中叶以后，趋向名存实亡。

（宁欣）

大索貌阅和输籍法

(dasuomaoyue he shujifa) 隋唐检括户口的措施。隋初，农民隐漏户口、诈老诈小的现象极为严重，直接影响到国家收入和对劳动力的控制。隋开皇五年（585），下令州县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大索貌阅，责令地方官当面查实，并与户籍簿上所登核对，规定如户口不实，里正，党正流配远方，奖励百姓互相检举。通过这次检括，户籍簿上有40万人查实为壮丁，有160万人新编入户籍。大业五年（609）再次大索貌阅，“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资治通鉴》卷181）。据载，当年进丁24.3万人，新附民64.15万人。唐代继承隋法，并进一步制度化。输籍法是隋代制定户等和纳税标准的办法。开皇五年，左仆射高颎鉴于兵役、力役、税收、授田等都与户等有关，而当时户等的划分因长吏怠情，多有不实，于是建议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做“输籍定样”，颁布到各州县，规定每年1月5日县令出查，百姓300家到500家为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即称“输籍之法”。利用这一方法，将大量隐漏、逃亡的农民转为国家编户，通过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剥夺许多士族豪门控制的依附民，削弱其经济势力，而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为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户籍制度创造了条件。

（宁欣）

隋末农民起义

(suimuo nongmin qiyi) 七世纪初推翻隋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隋朝末年，炀帝剥削残酷，大兴土木，巡幸游乐，徭役、兵役甚为繁重，民不聊生，终于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业七年(611)，炀帝为征高丽做准备，征发全国兵、民数百万，“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隋书·食货志》)，尤其是山东、河北地区遭到的破坏更为严重，加上水旱灾荒，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首先在这里拉开。当年，王薄在山东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率民众起义，自称“知世郎”，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反对辽东之役，农民纷纷参加义军。同时，山东、河北一带反隋义军相继起兵，有平原(今山东陵县)刘霸道、郟县(今山东夏津)张金称、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孙安祖和窦建德、渤海(今河北阳信西南)高士达、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翟让、章丘(今山东章丘西北)杜伏威等。经过几年的发展，义军队伍逐渐壮大，斗争区域扩大到江淮地区。大业九年(613)，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贵族杨玄感借农民起义之机，起兵反隋，虽很快被镇压，但消耗了统治集团的实力。十年(614)，全国各地义军已达百余支，起义人数达数百万，并逐渐形成了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夏军)和江淮的杜伏威、辅公柘军(吴军)三支大的起义军。瓦岗军在李密的策划下，联合附近各支义军，力量逐渐壮大，大败隋骁将张须陁及他所率2万劲兵。十三年(617)春，攻占洛阳东北的兴洛仓，开仓赈饥，队伍迅速发展几十万人，占有河南大部分郡县，成为北方起义军的盟主。四月，瓦岗军将20万隋军围困于洛阳城，与之展开了争夺洛阳城大战。窦建德为河北高鸡泊起义军的组织者之一，大业十二年，张金称、高士达先后被隋军镇压，他收合两部余众，转战河北中部，兵力发展到十几万人，占领了河北大部分郡县。杜伏威起兵山东长白山，转战至淮南，逐渐控制了淮南各县，并对炀帝驻守的江都(今江苏扬州)成三面包围之势。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隋朝统治面临土崩瓦解之势，各地官僚军将、地主豪强乘机割据一方。大业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渊从太原起兵，长驱入关中，攻克长安，闻炀帝死讯后，称帝建立唐朝。瓦岗军在与隋军的拉锯战中，消耗很大，被控制东都的王世充乘虚打败。窦建德军于唐武德四年(621)被唐军打败，余部曾在刘黑闥领导下复起，后被镇压。杜伏威于武德二年(619)降唐，五年(622)入朝长安。次年，辅公柘率部再起，被消灭。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起义，历时7年，遍及全国，摧毁了隋朝的统治。唐的统治者惩隋亡之戒，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对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宁欣)

唐

(Tang 618—906)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统一王朝，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鼎盛时期。隋末，农民起义如火如荼，豪强军阀拥兵割据，隋政权岌岌可危。太原留守李渊与次子世民等乘机反隋，挥兵南下，转而西入关中，占领长安。隋大业十四年(618)五月，李渊称帝，建唐王朝，年号武德，都长安。建国后，以关中为根据地，扫平诸雄，逐渐统一了全国。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登上太子之位，不久又即帝位，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太宗统治的23年，注意吸取隋亡的历史教训，为唐朝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疆域辽阔的和繁荣富强的世界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被史家誉为“贞观之治”。唐朝可以以“安史之乱”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国力从恢复走向发展，并达到全盛。各种制度和措施在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得到调整和完善，中央集权逐渐加强，边疆逐步开拓和巩固，国际交流日益扩大。后期中央集权逐渐削弱，割据势力和离心倾向日渐增长，各种制度处于大变革中，有些带根本性的变化具有划分历史时代的意义，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已经实现，文化发展达到高峰。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096-1.bmp}

唐前期继续推行均田制，凡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普通男子各受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官员按品级、勋官按勋级、其他百姓按类别(老、寡、道、冠、僧尼等)，可受多少不等的田地。课役制度则以租庸调为正税，辅以地税、户税，此外还有杂徭和色役，征收对象主要是授田民户的课丁(即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丁男)。人民的赋役负担比前代有所减轻，通过输庸代役，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唐前期政治制度进一步确立以三省六部为中枢行政机构的官僚体系，以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构，以九寺五监为事务机构，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二级，并逐渐向道、州、县三级过渡。军事制度以府兵制为主体，辅以部分征募之兵，以应付戍卫或征战的临时需要。法律制度方面，以律、令、格、式构成完整的封建法典体系，永徽年间修订的《永徽律》12篇和《律疏》30卷，成为中国现存最早而又最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学校和科举制得到较大发展，各级学馆生徒盛集，每年应举的士子多达数千乃至上万人，进士、明经二科最为重要，尤其是进士科，逐渐成为高官人选的主要来源，在选官制度中起了导向作用。太宗和武则天通过大兴科举，修订《氏族志》、《姓氏录》等，进一步抑制和打击了旧门阀士族的势力，为庶民地主参加统治集团拓宽了门径。由于对边疆各族采取平定边患，安抚降众，设羁縻州府、德化和亲等方式，前期疆土得到开拓，民族矛盾得到缓解和消除，呈现四海一家的景象。唐朝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全盛，是当时世界上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最先进、最文明、最富庶、最强大的大帝国。

“安史之乱”(755—763)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后期的一系列变化不少都萌肇于前期，但在后期才明朗化或制度化。开元、天宝之际土地兼并已日益加剧，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名存实亡，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实行两税法，改变以人身为本的征收赋役的原则，而以财产(主要是土地)作为征收的基本对象，完成了封建税制的一大变革，适应了土地占有状况。中央官制的三省六部地位逐渐下降，权力逐渐被分割、侵夺，新兴的使职差

遣取而代之，逐渐形成新的官制体系，选举制度亦随之进行了新的调整。府兵制废弛，代之以募兵制。边地设立的节度使，逐渐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再加上复杂的边疆形势、民族关系、政治矛盾，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内地也遍置节度使，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南衙北司之争和藩镇割据，构成了唐后期政治的主要特色，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与这几者有密切关系，或由此而引发的，表明唐中央集权日趋削弱，政局日趋混乱，统治日趋腐朽。劳动人民在土地兼并加剧、科敛加重、灾荒连年的重压下，终于奋起反抗。僖宗乾符二年（875），爆发了震撼唐王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广明元年（881）起义军领袖黄巢率众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在起义的巨潮冲击下，唐王朝内外矛盾并发，终于彻底崩溃。开平元年（907），朱温灭唐，建后梁，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历史时期。唐历 22 帝，共 290 年。

隋唐是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是个开放、壮阔、气魄恢宏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是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并对世界历史发展施以深远的影响。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唐代辉煌的文化，文、史、诗、绘画、雕塑、乐舞等都有较高的成就。唐代的社会经济、商业贸易、城市都呈现了高度繁荣，完成了经济中心的南移。唐朝的疆域超过了秦汉，东、南到海，西到咸海，北到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东北到外兴安岭以北和鄂霍次克海，西南到云南、广西。

（宁欣）

玄武门之变

(Xuanwumen zhibian) 唐初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与长子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宫廷政变。李世民在唐王朝建立过程中，从首倡起义到驰骋战场，军功卓著，勋业克隆，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日益增长。高祖称帝后，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长子建成被立为太子，在李世民野心增长的同时，李建成的防范、妒忌之心也不断膨胀，双方各自培植势力，打击对方，终于酿成一场骨肉相残的流血事件。武德九年(626)，双方的明争暗斗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六月四日，世民在与府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密议策划之后，采取先发制人的断然措施，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伏兵玄武门（即长安宫城北门，是中央禁军屯守之所，地位至为重要），世民射杀太子建成，尉迟敬德射死支持建成的齐王（世民弟）元吉，并奋力抗击和瓦解了东宫和齐王府的卫队，高祖遂被迫立世民为太子，不久又传位于世民。李世民的胜利，是对传统的嫡长制的挑战，并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宁欣)

唐长安城

(Tang chang ' ancheng) 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位于汉长安城的东南部，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全城周长 35 公里，面积 84 平方公里，是现存明朝重建西安旧城的 7.5 倍。唐长安城布局严整美观，建筑规模宏伟。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部分。宫城在全城北部正中，是皇帝和皇族居住及处理政务的地方。皇城在宫城的南部，是尚书省、御史台等中央官署衙门的办公区。宫城和皇城之外是外廓城，为全城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在外廓城内，采用了左右对称的布局，以宽 155 米的南北向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又由 11 条南北向和 14 条东西向的宽且直的街道纵横交错，将城划分为整齐的 108 坊和东西两市。朱雀大街的东西两边各有 54 坊和 1 市，坊是居住区，东西市为商业区，居住区和商业区是严格分开的。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又在宫城东北地势较高的龙首原上，建造了富丽辉煌的大明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097-1.bmp} 宫，这是唐太宗为其父李渊修建的夏宫。从唐高宗开始至唐末的历代帝王大都居住在这里。大明宫的宫殿区共有 33 个门，丹凤门是大明宫的正门，含元殿是大明宫的主殿，皇帝举行盛大朝会多在这里进行。现已对大明宫遗址内四座城门的含元殿、麟德殿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麟德殿是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场所。唐玄宗时又在长安城内东侧建筑极其豪华的兴庆宫，包括兴庆殿、大同殿、南薰殿、花萼相辉楼、沉香亭等主要建筑。兴庆宫与大明宫、太极宫之间有夹墙阁道相通，唐玄宗处理政务、接见外国使者多在这里进行。

雄伟壮观的唐长安城建筑群，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秩序的等级森严和唐帝国的强盛。唐长安城内有各族居民近百万，并以它特有的辉煌建筑和繁荣的经济、文化，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外国商人、留学生、各国使臣、宗教徒等，他们长期侨居在这里，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刘桂英)

唐太宗李世民

(Tangtaizong Li Shimin 598—649)唐朝第二代皇帝，政治家。唐高祖李渊次子。隋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集团也四分五裂，太原留守李渊在李世民等的策动下，于大业十三年(617)在晋阳起兵，乘王世充与义军胶着于洛阳攻守之战，无暇西顾之机，笼络关中豪酋，长驱攻克长安。义宁二年(618)隋炀帝被杀后，李渊即位，建国号唐，以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封为秦王。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建功颇多，引起太子建成猜忌，双方争斗日趋激烈。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建成和弟齐王元吉，为其夺取皇位继承权扫平了最大障碍，因而被李渊立为太子。随后，高祖李渊退位，世民即位，次年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唐太宗吸取隋亡的历史教训，常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语来警诫自己(《贞观政要》卷1)，实行轻徭薄赋，减缓刑罚等措施。在隋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了均田制、租庸调和府兵制，注意兴修水利，设立义仓备荒，对唐前期经济的恢复和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政治上，唐太宗继续完善三省六部制，大兴科举，扩大统治基础，网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本人虚怀纳谏，选用贤能，注意协调地主阶级各集团的利益，故上下一致，政局稳定。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名相，均为太宗所发现和选用。他气魄恢宏，包容并蓄，推行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而又致力于边疆的巩固，贞观十五年(641)，以文成公主和亲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传为历史上的佳话。太宗统治期间，社会比较安定，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呈升平景象，被史家誉为“贞观之治”。太宗晚年连年用兵，加重征敛，猜忌大臣，未能慎终如始，暴露了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繁荣昌盛的唐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历史功绩不可磨灭。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去世，年52岁，在位23年。

(宁欣)

政事堂

(zhengshi tang) 唐代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会议是常设的、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唐初，设政事堂于门下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共行宰相之职，在此共同参议国政。其后，由皇帝指定入政事堂议事，并以本官加带“参知政事”、“参豫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后逐渐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为宰相。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中宗即位，裴炎由侍中迁中书令，遂奏请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表明中枢决策重心已由执掌封驳之权的门下省转至草拟诏书的中书省。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改政事堂印为“中书门下之印”，同时，又创置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于政事堂正厅之后，分理众务，所设吏员，地位至重。在政事堂(中书门下)办公的数位宰相中，设秉笔宰相一名，谓之“执政笔”，在处理中书门下日常事务方面具有相当的职权。唐前期为专人，肃宗以后改为轮代，以防秉笔宰相借执政事笔之权，独揽大权之弊。

(宁欣)

科举制

(kejuzhi) 隋朝建立、唐朝完善并为后代沿用的选拔官吏的制度。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高门士族拥有政治特权，世代垄断高官显位。南北朝时士族门阀已日趋腐朽。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取士的办法，隋初规定原有的秀才、明经两科，由州县学送生徒到中央参加考试。炀帝时又置进士科，科举制逐渐形成。唐朝前期，科举制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发展。科举分为制举和常举两种，制举由皇帝特旨召试，应举科目广泛，应试者身份不限，中第者可获出身或官职。常举每年举行，科目比隋有所增加，但考生主要集中在明经、进士两科，应考者主要是各级学馆学成的生徒和不在学的士子。中第者可获得出身，通过吏部铨选，才能正式做官。明经科考试以帖经为主，进士科始以试策为主，后又加试帖经、杂文，天宝年间始试诗赋。进士科应举人多，而录取人数少，士人举子将考中进士比喻为“登龙门”，一旦登第，声名大振，往往宦途便捷，飞黄腾达。由于进士科在选官中的独重地位，日益为士林举子所重视，在唐后期高官人选中所占比例明显增加。武则天时创立武举，但地位不甚重要。唐代科举制从应举资格、考试内容、录取原则、审核手续、放榜期限、等第品定、获取出身等都有较严格的规定，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它通过考试方法体现的平等竞争精神，有利于广大普通地主步入仕途，扩大了统治基础，成为唐以及后世选官的主要导向。

(宁欣)

贞观之治

(Zhenguan zhizhi)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有名的治世，因年号“贞观”（627—649），故有此称。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初始，惩隋亡之鉴，顺应天下思治的民情，“抚民以静”（《资治通鉴》卷191）为施政的出发点，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增殖人口、广设义仓等措施，使隋末战乱一度凋敝的社会生产又呈现生机。从谏如流，选贤任能为贞观之治的明显特点。太宗本着舍短取长，兼明优劣的用人方针，充分发挥贤者能人的德才之长，亲君子、远小人，士庶并举、新故同进、汉夷并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虞世南、马周、秦叔宝，或以善谋、或以善断、或以忠直、或以干练、或以文才、或以武勇，各尽所能，效力于太宗，以至人才济济，文武荟萃，成为贞观之治实现的重要因素。太宗极为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亲民，执法务求宽简，提倡节俭，抑制旧士族势力，并大兴学校，盛开科举，笼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庶民地主广开参政之门。太宗致力于巩固边防，安抚边疆各族降众，广设羁縻州府，缓和了西北、北边的边患，民族间的交往得到加强，因此，北方各族尊太宗为“天可汗”，并开辟“参天可汗”道，以加强羁縻府州同中央的联系。太宗在兼容并蓄、开明开放的民族思想指导下，推行的和亲、团结、德化的民族政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在汉藏友好史上意义深远。贞观年间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效果显著，“贞观之治”所造就的盛世升平景象，史家经常与汉代的“文景之治”相媲美。贞观后期，太宗屡兴营建，日趋骄逸，又连年用兵，亲征高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不如前期。因此，“贞观之治”是有其历史和个人的局限性。

（宁欣）

武则天

(Wu zetian, 624—705) 唐高宗皇后，后为周则天皇帝。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名曩（即照），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父武士彠（音 yue），木材商人。武则天 14 岁入宫，为太宗才人，太宗死后，入感业寺为尼。高宗即位，复召入宫，拜昭仪，进号宸妃。在内宫争宠中，则天靠谋略与才华博得高宗欢心。永徽六年（655），高宗力排众议，废王氏而立武则天为后。高宗多病，则天乘机专权用事。上元元年（674），高宗为“天皇”，则天称“天后”，合称“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中宗即位，则天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代唐之心已昭然若揭。天授元年（690），则天在平定叛乱和铲除异己势力后，正式称帝，国号周，以自造字“曩”为己名，取日月当空之意。武则天执政（包括高宗后期）期间，重修《贞观氏族志》，改为《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抑制旧门阀及李唐皇族，提高庶族地主的地位，科举制得到较大发展，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她重用文词之士，以分宰相之权。社会经济在这一时期呈明显发展趋势，社会人口由永徽三年（652）的 380 万户猛增至神龙元年（705）的 615 万户。武则天对边防的巩固与疆土的开拓亦颇有贡献，如设置北庭都护府和恢复安西四镇等。武则天的弊政及消极行为后人多有抨击，她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宠信小人，封赏太滥，大兴土木，耗费民力，晚年尤甚。神龙元年正月，则天患重病期间，大臣张柬之等乘机发动政变，逼则天退位，拥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同年十一月，武则天去世，年 82 岁。

（宁欣）

唐均田制和租庸调

(tang juntianzhi he zuyongdiao) 唐前期政府颁行的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均田制，始自北魏，历朝多有变更。唐初为恢复生产，保证税收，在隋代均田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唐于武德七年(624)、开元七年(719)、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次颁布均田令，取消了前朝奴婢、妇女及耕牛受田的规定，放宽了土地买卖的限制，主要内容：丁男(21—60岁)和18岁以上的中男各授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其他为户者和老、寡、病、残等，授口分田、永业田不等。贵族和五品以上官可依品级请受5顷至100顷永业田，勋官可依勋级请受60亩至30顷勋田。授田有宽乡、狭乡之别，迁徙、买田、授田规定不同。永业田为世业，不再收还。职官有职分田，官署有公廩田，收入充俸禄和办公费用。与均田制相适应的租庸调制，亦源于北魏的租调制。唐武德二年(619)和七年颁布新令，规定：每丁每年纳租粟2石；调随乡土所出，每年纳绢(或綾、絁)2丈，绵3两，不产丝绵之地，则纳布2丈5尺，麻3斤；每丁每年服徭役20日，不服则纳绢或布代役，每天折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称作庸。政府加役15天，免调，加役30天，租调全免，但加役每年不得超过30天。如遇灾年，依灾情轻重，适当减免租庸调。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实施，对唐初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促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保证政府赋役来源，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均田制实施范围和实施程度学界看法不一，但授田不足确为普遍现象。唐均田令中对口分田买卖限制的放宽，体现了土地私有制因素的增长，普遍以庸代役，则体现了国家对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唐高宗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农民逐渐破产流亡，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按人丁为征收赋役的基本对象的租庸调制，与土地占有状况已不相适应，唐朝政府开始逐渐调整征收原则和内容。德宗建中元年(780)，正式实行两税法，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遂名实俱废。

(宁欣)

曲辕犁

(quyuanli) 又称江东犁。在敦煌莫高窟第四百四十五窟的壁画中有曲辕犁耕作图。据唐朝末年著名文学家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曲辕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即犁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和犁盘。曲辕犁和以前的耕犁相比，有几处重大改进。首先是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畜力。其次是增加了犁评和犁建，如推进犁评，可使犁箭向下，犁铧入土则深。若提起犁评，使犁箭向上，犁铧入土则浅。将曲辕犁的犁评、犁箭和犁建三者有机地结合使用，便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要求，并能使调节耕地深浅规范化，便于精耕细作。犁壁不仅能碎土，而且可将翻耕的土推到一侧，减少耕犁前进的阻力。曲辕犁结构完备，轻便省力，是当时先进的耕犁。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耕犁的结构没有明显的变化。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00-1.bmp}

(刘桂英)

含嘉仓遗址

(Hanjiacangyizhi) 位于今洛阳老城区的北侧，是隋、唐时期大型官仓之一。东西宽约 600 米，南北长约 700 米，总面积 42 万平方米。1971 年开始对仓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仓城内密集且有秩序地排列着 400 多座东西成行缸式地下粮窖，可储粮 580 多万石，占当时全国主要粮食储粮总数的一半。仓窖有大小之别，大窖口径为 18.5 米，小窖口径约 8 米，最深的距地表 12 米。根据遗址中所出铭砖记载，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可储千石余。粮入窖时，要将储粮的时间、数量、品种、来源、仓窖位置及授领粮食的官员姓名，都要刻于砖上，放置窖中。含嘉仓城设有管理机构，且驻有军队，守护仓城。1972 年再次发掘时，发现在一座仓窖内保存着大约 50 万斤已炭化的小米，颗粒清晰可辨。

含嘉仓的大小粮窖均为口大底小的圆缸形，其建造方法和结构较为科学。先从地面向下挖一口大底小的土窖，将窖底夯实，再用火烧硬，上面铺一层灰渣，以防潮湿，在灰渣上铺设木板，板上垫草，草上铺席。窖壁周围亦砌木板，在窖中分层堆放粮食，每层之间以席隔开，装满粮后，在窖口部位先盖一层 40 ~ 60 厘米厚的谷糠，其上盖席，最后用泥土密封窖口。这种仓窖，既可防火防虫，又能抗腐防盗。

(刘桂英)

印染

(yinran) 我国古代印染不仅颜色多，色泽艳丽，而且色牢度好，不易褪色。古代将青（即蓝色）、赤、黄、白、黑称为五色，也是本色、原色。原色混合得到多次色如绿、紫、粉等色，也称间色。染料来源分为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两大类。染红色的矿物颜料有赤铁矿和朱砂。早在山顶洞人时期即使用过赤铁矿，但因它是暗红色，故以后用于囚犯服色。朱砂又叫丹砂，色泽鲜亮，距今四千多年的青海柳湾墓地一男尸下就撒有朱砂。黄色有石黄（硫化砷）和黄丹（氧化铅），青色为天然铜矿石，白色为铅粉和白云母，黑色为炭黑。植物染料中的红色可以从茜草、红花、苏方木等中提取，黄色从栀子、姜黄、槐花中提取，青色是采用蓝草制成的靛蓝，故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名句传世。黑色主要从胡桃树、柿子树、栎树等中得到。

当用某种染料染色时，人们发现：织物每浸染一次，颜色便加深一些。由此，染色工艺便从简单的浸染发展到套染及媒染。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的丝织物有二十四种颜色，其中仅红色就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黄色也有六种之多。在原色套染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不同染料的套染技术，使织物的颜色更加丰富。到清代，有关染色的色谱和色名，由天然色彩的纵横配合发展至数百种之多。媒染早在春秋时已出现，即在染色中使用媒染剂。如用植物染料染黑色时，加一点青矾，便可提高色牢度。在染色方法上，绢、纱及棉布等都可以先织后染。而锦、绣等则需要先将丝线染色再织。我国古代曾把印花织物通称作“缣”，所以印染工艺又分为藤缣、夹缣和绞缣等数种。藤缣，又称蜡缣，即蜡染。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首先掌握了用蜡防染的技术。它是用融化的蜡在织物上画出图案，然后入染，煮出蜡，显出色地白花。由于蜡凝结后的收缩或加以揉搓，产生出许多裂纹，入染后，色料渗入裂缝，成品的花纹上往往出现一丝丝不规则的纹理，形成独特的装饰效果，蜡染的方法，至今仍在使用。夹缣。秦汉时已有，盛唐极为流行。它是用两块雕镂相同图案的花板，将布帛夹在中间，在镂花处染色，成为花纹。其图案特点是花纹对称，具有均衡规律的美。夹缣可染二、三种颜色。

绞缣。是民间常用的一种印染方法。通常可分两种：一是用线将布扎成各种花纹，钉紧后入染，钉扎部分不能染色，形成色地白花图案，具有晕染的效果。另一种是将谷粒包扎在织物上，然后入染，形成各种图案花纹。除上述主要印染方法外，春秋战国时还出现过凸版印花等工艺。至1834年法国佩罗印花机发明前，我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手工印染技术。

（刘桂英）

白瓷

(baici) 指白胎白釉瓷器。根据考古发掘材料,白瓷始烧于北朝时的北齐,历经隋代的发展,唐代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宋代白瓷的烧制达到了顶峰。白瓷的烧制成功,为烧制各种彩瓷奠定了基础。在制瓷原料中,含有一定量的铁成分,铁的呈色性能很强。含铁的胎和釉,经还原焰焙烧后,便会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青色,成为青瓷。白瓷和青瓷的唯一区别在于原料中含铁量的不同,要使胎、釉洁白,需尽量排除胎料和釉料中的铁成分。我国制瓷工匠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研究,能将胎、釉中铁含量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从而成功地创烧了白瓷。1971年在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中首次发现了一批白瓷,有碗、杯、三系罐、条颈瓶等,釉色乳白,薄而透明,釉厚处呈青色,说明此时虽掌握了烧制白瓷的技术,但还不够成熟,同时说明白瓷脱胎于青瓷的渊源关系。隋朝烧制白瓷的技术有很大提高,并发明了白色护胎釉,即在上釉之前先在胎体上施一层用含铁量极少或不含铁的瓷上配制成的釉,以掩盖胎体表面粗糙的缺点,使釉色更加光亮莹润。在河南安阳张盛墓和陕西西安李静训墓中,相继出土了隋代的白瓷,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没有泛青闪黄现象。其中龙柄鸡首壶是隋代白瓷的精品。唐朝白瓷的烧造达到更加完善的程度,邢窑白瓷最负盛名,胎、釉白净,似银类雪。唐朝除邢窑外,河北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山西浑源窑、陕西耀州窑都烧制白瓷。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101-1.bmp}

(刘桂英)

唐三彩

(Tangsancai) 唐代陶器和陶俑上的一种多色釉和具有这种釉色的陶制品。是唐代制陶工匠在汉代铅釉陶器的基础上创烧成功的新工艺。唐三彩属低温釉陶，用白色粘土作胎，釉质的主要成份是硅酸铝（包括石英、铅、金属元素），呈色剂是釉料中所含各种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如浅黄色是铁和锑的氧化物，绿色是铜的氧化物，蓝色是铜或钴的氧化物……。唐三彩除白、绿、蓝三种主要釉色外，还有褐、黑、浅黄等多种色调，斑驳灿烂，绚丽夺目。

唐三彩的制作和其他陶器一样，即成型、修整、晾干和焙烧。所不同的是唐三彩要进行两次焙烧。第一次烧胎，称素烧，烧成温度为 1100 。素烧后从窑中取出上釉，再送入窑中进行第二次烧造，称釉烧。温度在 900 左右，釉烧温度低于素烧温度，可使釉陶不变形，且能提高成品率。唐三彩种类繁多，造型生动。主要器形有碗、盘、罐、壶、盂、人俑、马俑、骆驼俑等。陕西西安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俑，塑造得非常生动，骆驼昂首站立，张口嘶鸣，背上架一平台，上铺花格纹长毯，平台上坐着由七人组成的小型乐队，他们分别手持笙、箫，琵琶、竖琴、横笛、拍板等乐器，为中间的舞女进行伴奏。唐三彩的主要用途，是为唐封建统治阶级随葬的冥器。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01-2.bmp}

北朝北齐范粹墓出土的带彩陶器和带釉陶俑，是唐三彩的前身。唐三彩盛于初唐到盛唐。辽代三彩也很有特色，以后逐渐衰落。

(刘桂英)

铜镜

（tongjing）古代用以照面饰容的用具。青铜铸造，一般作圆形，镜面磨光发亮，背面中央多设钮，在钮周围常铸各种花纹和铭文。

铜镜在我国起源久远。根据考古发掘，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距今 4000 多年的铜镜。从齐家文化经过商至西周，铜镜皆为圆形，镜身较薄，钮多为拱形，镜背已有简单的花纹，形体小，铸造量少，制作粗陋，始终处于原始状态。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铜镜铸造业迅速发展时期。春秋时期铜镜铸造数量有所增加，在河南、山东、山西、辽宁、湖南等地都有发现，主要仍为小型素面镜，制作粗糙，出现的少量花纹，仍显出稚拙，未脱离原始状态。战国时期铜镜数量增多，质量显著提高。制镜工艺以楚国最为发达。早期铜镜镜背花纹精致，多采用蟠龙纹、饕餮纹、兽纹、涡纹等。中期以后，镜背花纹分为“地纹”和“主纹”两层。一般以云雷纹、涡纹作地纹，衬托以山字纹、花菱纹、禽兽纹和蟠龙纹为主体纹。此时铜镜多数为圆形，也已出现方形镜。有的镜背铸出透雕式兽纹和蟠龙纹，也有用金银错的工艺饰出各种生动复杂的花纹，十分精致。汉代是我国铜镜铸造业昌盛时期，铜镜的制作和使用比战国更为普遍。西汉前期铜镜形制、花纹仍保留战国时代作风。当时最流行的是蟠龙纹镜，另外出现了“矩形”纹样。这时铜镜上开始铸有铭文。汉武帝时期，铜镜的形制和花纹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镜钮普遍作半球状，还有伏兽、蛙形和连峰状。花纹严格对称于镜面中心，铭文增多。中、后期主要铜镜种类有“草叶纹镜”、“星云纹镜”、“重圈纹镜”、“日光镜”等。王莽时期，大量流行“方格规矩镜”。此外，还有青龙、白虎等“四神”纹样和子、丑、寅、卯等十二辰文字的。镜铭中开始出现纪年。东汉前期最常见的是“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中、后期又开始流行“兽首镜”、“龙凤镜”、“盘龙镜”、和“双头龙凤纹镜”，都以图案化的动物为纹饰。在长江流域，从东汉中期开始，还出现了“神兽镜”（以东王公、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为主纹）和画像镜（车马、歌舞、历史人物、传说故事等图像）。花纹多对称于镜面圆心，还出现了对称于镜面直径的，纹样为浮雕式，内容丰富，立体感强。隋唐是我国铜镜铸造业高度发展时期。在形制、花纹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形制上突破了方、圆二形，创造性地设计出葵花形、菱花形、荷花形，还有钟形、盾形等多种式样，并出现了有柄镜。镜钮以圆形居多，也有兽形、龟形、花纹状。盛唐以后，镜上大量饰有瑞兽、凤凰、鸳鸯、蜻蜓、蝴蝶、葡萄、团花、宝相花和人物故事等新纹样。还采用了鎏金、金银平脱、螺钿和宝石镶嵌等工艺，使唐镜脱离汉代铜镜的拘谨古朴状态，显示出其多姿多彩、流畅华丽之风。宋、元、明、清时期，我国铜镜铸造业日趋衰落。北宋铜镜在形制和纹饰方面承唐遗风。南宋铜镜主要为湖州和饶州“铸鉴局”所造。在形制上最突出的是有柄镜增多。镜上多无纹饰，只铸出印章，标明铸造者的名号。元、明时期铜镜铸造都较粗糙，形状多为圆形，花纹有云龙纹、双龙纹和双鱼纹等。许多铜镜无花纹，只铸出纪年铭文。唐、宋以后，特别是明代，仿古镜风气盛行，主要是仿造各种汉镜。清代以后，则逐渐为玻璃镜所取代。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102-1.bmp}

（冀连芝）

六都护府

(liuduhufu) 唐朝设置在边区用以统辖羁縻地区的军事行政机构。贞观十四年(640)始设安西都护府,后陆续增置,建置多有改易,主要的有6个。安东都护府:辖境以东北地区为主;燕然(瀚海、安北)都护府:辖境包括今内蒙以北地区;安南都护府:辖境为西南边区,南抵越南境内;保宁都护府:今四川境内;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辖境包括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两都护府建置时间较长,在唐朝所起的作用也较为突出。安西都护府创置于贞观十四年唐军平高昌后,北庭都护府是长安二年(702)从安西都护府中析置,两都护府大致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南属安西都护府,天山以北属北庭都护府。唐前期,安西和北庭都护府对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关中地区,有效地起到了屏障和外围的环卫作用,巩固和加强了唐中央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管理。安史之乱前,两都护府的有效控制区域,已由于西北诸族及吐蕃、大食等国的蚕食与侵扰而逐渐缩小。安史之乱后,两都护府又坚守30年,先后为吐蕃所破,遂废,唐的西北屏障亦不复存在。

(宁欣)

唐律与唐律疏议

(tanglü yu tanglüshuyi) 唐朝刑律和刑律及疏注的合编之书。唐朝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袭隋朝,又经多次修订,逐渐更形完备。唐武德七年(624),始颁行《武德律》,即以隋《开皇律》为蓝本。贞观元年(627),太宗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订,于贞观十一年(637)颁行《贞观律》。高宗永徽元年(650),又令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等修律,次年颁行,是为《永徽律》。《永徽律》分 12 篇,律条 502,篇目分别为: 名例; 卫禁; 职制; 户婚; 厩库; 擅兴; 贼盗; 斗讼; 诈伪; 杂律; (11) 捕亡; (12) 断狱。名例律为全篇宗旨,阐明立法原则与论罪标准,其他各篇则各有范围,官、民、军、卫戍、司法、经济、交通、医疗、贸易、兵防、工程、礼制无所不包。其刑名则有笞、杖、徒、流、死,量刑定罪方面比隋律有所减轻。永徽三年(652),高宗又令长孙无忌撰写《律疏》,阐明律文内容,逐字逐句进行疏证解释,采用问答形式,共 30 卷,于永徽四年颁行。《律疏》与《律》合为一体,统称为《永徽律疏》。宋元时称作《唐律疏议》,明末清初始称《唐律疏议》。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唐律的制订与颁行,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等级特权、保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协调统治阶级内部以及各阶级、各阶层之间关系的作用。《唐律疏议》为研究唐代历史和社会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唐代律外,又有令、格、式,三者共同构成唐代完整的法典体系,对后世封建社会各朝以及当时的亚洲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宁欣)

翰林院

(hanlinyuan) 唐代草拟机密诏制，以备咨询的重要机构。原为各种艺能之士待诏之所，自唐玄宗选朝臣擅文词者入居翰林以起草诏制，遂发生演变。唐代翰林院何时设置尚未定论，多认为玄宗时始设。“待诏（即有待天子召见之意）翰林者成分复杂，但以词学之士最受重视。高宗武后时已有“北门学士”供奉内廷，但未设专门机构。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在翰林院南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草拟诏制者居住，供职者称翰林学士，主要职责为草拟表疏批答、检视王言，以备顾问。安史之乱后，天下用兵，深谋密诏多从内出，翰林学士的权任逐渐加重，“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新唐书·百官一》）。宪宗时又于学士中择一人承旨，承旨学士往往晋升为宰相。学士为差遣职，无品秩，亦无独立的官署，翰林学士院只是其办公之所，学士入选以文才为主，不重资历。唐后期由于翰林学士地位渐崇，遭到皇帝疏忌，又设两名学士院使，以宦官充任，翰林学士院逐渐流于形式，不预机密了。五代后晋时一度废翰林学士，不久又恢复。

（宁欣）

节度使

(jiedushi) 唐玄宗以后至五代时最高地方军政长官。节度一词出现较早，意为节制调度。节度使成为正式职衔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之时，玄宗开元、天宝之际，为了御边的需要，缘边陆续设置了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节度使为差遣职，其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所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安史之乱中，朝廷为平叛，内地也相继设置节度使，安史降将多封为节度使，各地节度使乘机扩大势力，地位略低的为观察使，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一些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节度使，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成为割据势力，内地节度使也程度不同的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状态。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节度使势力进一步膨胀，中央政府濒于崩溃，对藩镇的控制力也丧失殆尽，各藩镇争战不已，兼并频仍，遂演成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北汉在北方)政权纷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收回兵权，节度使失去实权，成为荣誉之职。

(宁欣)

安史之乱

(An shi zhi luan) 唐玄宗末年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胡人,因边功得到重用及擢升,一身兼领范阳(今北京)、平卢(今辽宁朝阳)、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集军、政、财大权于一己,实力与野心俱长。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因与权相杨国忠不协,遂以讨杨国忠为名,一月自范阳起兵,南渡黄河,进逼洛阳。唐大将封常清奉诏募兵抗敌,很快为叛军所败,洛阳失陷。天宝十五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各地官民纷纷反抗叛军,如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和河南一带的地方官张巡、许远等。杨国忠猜忌驻守潼关的大将哥舒翰,促令其放弃固守方针,出关迎敌,结果大败,潼关失守。玄宗匆忙逃往成都,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从行军士哗变,杀死杨国忠并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长安陷落后,太子李亨从马嵬驿回军北上,同年七月即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改元至德,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用李光弼、郭子仪为将,会集西北各军,又得到西域各族和回纥的援助,转入反击。至德二年(757),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同年唐军收复长安和洛阳,安庆绪退保邺(今河南安阳)。乾元元年(758),唐派九节度率兵攻邺。次年三月,降唐复叛的安禄山旧部史思明自范阳率兵救邺,数十万唐军溃败。同年九月,史思明南陷洛阳。上元二年(761)三月,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宝应元年(762),代宗新即位,借用回纥兵收复洛阳,叛军将领因大势已去,纷纷降唐。次年正月,史朝义穷迫自杀。安史之乱,至此平定。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火波及地区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西北边防呈空虚状态,吐蕃乘机东侵。在平定叛乱前后增设的节度使,权力日益膨胀,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

(宁欣)

两税法

(Liangshuifa) 唐中叶实行的用以取代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自唐玄宗开元(713—741)以后,均田制度逐渐废弛,与之相适应的租庸调也难以继,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减少。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始改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国家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向当地人民征收。

土著户(当地人)和客居户(外来户)均编入现居州县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主要是土地)多少定出户等,按垦田面积和户等高下摊分税额。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6月纳清,秋税限11月纳清,故称两税”(亦有一说因其分为户税、地税两项)。两税依户等纳钱,按垦田面积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数为准,平均摊派。租庸调和杂徭、杂税悉省,但丁额不废。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征税。两税法变租庸调以人丁为征收赋税标准的原则为以财产、主要是土地为征收标准的原则,是土地占有状况发生改变后的反映,是中国古代税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两税法实行初期,统一了紊乱的税制,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后来,弊端丛生,征敛趋于苛重。但由于两税法适应地主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其税制的基本原则为此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宁欣)

宦官专权

（huanguan zhuanquan）唐后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特色。唐前期，宦官的品级和权势地位都有严格的限制，他们在政治生活并不扮演重要角色。玄宗晚年深居后宫，宠信宦官高力士，宦官逐渐参政。代宗即位，宦官李辅国恃拥立之功，独揽军政大权，后因骄横太甚，被代宗所杀。代宗又先后起用宦官程元振、鱼朝恩典掌禁军。鱼朝恩被代宗杀死后，宦官不再典兵。德宗时，朱勣、李怀光叛乱被平定后，宦官再度专制禁兵。贞元十二年（796），德宗以窦文场、霍仙鸣两名宦官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至此，宦官典掌禁军成为定制。神策军待遇优厚、兵员众多，实力在其他禁军之上，是中央唯一的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宦官凭借典掌神策军，政治势力进一步膨胀。宪宗时，设枢密使两员，由宦官出任，于是，宦官正式参与机要。两中尉与两枢密合称“四贵”，权势炙手可热。宦官集团干预朝政，监临诸镇，进退朝官，任命节帅，甚至分为派系，互相攻杀，废立皇帝。唐后期有二帝为宦官所杀，七帝为宦官拥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宦官也代表腐朽的势力，他们广占良田，大兴园宅，勒索百姓，鬻官卖爵。宦官的专权与跋扈引起皇帝和官僚士大夫的强烈不满，曾发动几次翦除宦官势力的斗争，著名的有顺宗时的“永贞革新”，文宗时的“甘露之变”，都以失败告终。有识之士多次疾呼上言，抨击宦官专权，但无济于事。唐末，宦官与藩镇节帅内外勾结，攻杀不已，败坏朝纲。昭宗天复三年（903），汴宋节度使朱全忠拥兵迫昭宗从凤翔还京，尽诛朝内外宦官。至此，宦官势力全部被铲除。宦官专权是唐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根源之一。

（宁欣）

南衙北司之争

(Naya beisi zhizheng) 唐代后期外廷官僚集团和内廷宦官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南衙，指位于宫城南的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北司，指宫禁以北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唐玄宗时，宦官势力逐渐增长，他所宠幸的宦官高力士等把持了呈进章奏、承宣诏命之权。安史之乱后，宦官又逐渐掌握了军权，如肃宗时设立的观军容使、代宗时出现的掌枢密。德宗时更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典禁军，与二枢密使合称“四贵”，得预机密，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他们挟制皇帝，废立由己，左右朝政，引起皇帝和朝官及士人的不满和反对，因而唐后期多次发生两大集团的对立和斗争。顺宗即位，启用东宫旧臣王叔文等人，与刘禹锡、柳宗元等结成联盟，实行“永贞革新”，共谋打击宦官势力，不幸失败。文宗大和八年（834）和九年，文宗深患宦官擅权，擢用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以大明宫左金吾厅后石榴夜有甘露，诱使中尉、枢密等观看，以图一举铲除宦官集团，事败，株连者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唐末农民大起义后，中央的宦官和朝臣各自拉拢一部分藩镇势力以相抗争。南衙北司之争一直持续到唐王朝灭亡。

（宁欣）

十六卫和神策军

(shiliuwei he shencejun) 隋唐时期统兵宿卫京师的军事机构。隋初沿北周之制，设置十二府以统禁兵，炀帝大业三年（607）扩充为十六卫府。唐初沿隋制，龙朔二年（662），高宗改易官名，始定称为十六卫。后名称稍有改易，而一般指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一或二人，以总府事。十六卫中的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四卫不领府兵，监门卫掌诸门禁卫，千牛卫掌宿卫皇帝。其他十二卫各领 40 至 60 个军府，每个军府有千人左右，轮流到长安宿卫京师。因十六卫在宫殿之南，故称“南衙军”。唐中叶以后，由招募配置的北衙禁军渐兴，南衙诸卫基本上成为闲司。神策军是唐后期的主要禁军。唐北衙禁军是陆续建置的，至肃宗至德二年（757）有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各有大将军一人，将军三人。此后，又有英武军、神威军、宝应军，而以神策军最强盛。神策军本为陇右节度使属下的边镇军队。安史之乱起，其军将卫伯玉领兵勤王，后被代宗朝宦官鱼朝恩所控制。广德元年（763），吐蕃进犯，鱼朝恩领军护驾，入居禁中，从而为禁军。德宗时进一步扩充，贞元十二年（796），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以宦官充任。其军势力在诸禁军之上，衣粮赏赐优于他军。时戍守长安西、北诸军纷纷自请遥隶，迅速增至 15 万人，成为宦官专权的支柱，直至唐亡。

（宁欣）

藩镇割据

(fanzhen geju) 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与中央相抗衡的政治局面。节度使始创置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唐玄宗时期,陆续在边地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军、政、财大权逐渐集于节度使一身。安史之乱后,边疆节度使与内地采访使结合而成藩镇,大则称节度使,小则称观察使,形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藩镇成为凌驾于州之上的一级权力机构。藩镇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割据型,以割据一方,不受朝命的河北三镇为主要代表;二是防遏型,以中原地区与中央关系密切的诸镇为主;三是御边型,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边区;四是财源型,指唐后期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东南地区诸镇。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是安史之乱前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唐代宗初年(762)到唐德宗末年(805),是割据形势发展时期。安史之乱后,朝廷分封安史降将为节度使,继续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河北的成德、魏博、卢龙三镇,再加上相卫(后为魏博所并)、淄青等镇,甲兵自缮、财赋自专、官吏自署,父子相袭,或部将继代,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局面。各类藩镇最多时达50个左右,德宗虽有讨叛之举,但后期转为姑息,以求暂时安定。唐宪宗时期,采取军事讨叛与政治招抚两手,平抑藩镇获得成功。元和十二年(817),唐军雪夜袭蔡州(今河南汝南),擒吴元济,平淮西,引起连锁反应,淄青降,成德、卢龙二镇自请入朝,割据局面基本缓解。唐穆宗初(821)至唐懿宗末(874),长期战争与社会矛盾使中央实力大为削弱,河北降卒降将起而复叛,河北重又出现割据局面。武宗会昌四年(844)平定叛镇泽潞取得胜利,对稳定中央尚能有效行使控制权区域起了积极作用,但从全局看,割据形势仍在发展中。唐僖宗以后,藩镇相互混战、兼并,黄巢大起义瓦解了唐的统治,割据势力空前发展,兵战不休,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北宋统一,才结束割据局面。藩镇割据作为唐中叶以后至五代十国这一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它的出现是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政治、经济基础的,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宁欣)

牛李党争

(Niu li dangzheng) 唐朝后期朝廷大臣之间的派系斗争。一派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一派以李德裕为首，故有是称。牛李之争的起因及分歧焦点史学界众说不一，从酝酿到结束，历时约半个世纪，是唐后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宪宗元和（809—820）年间，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制举，对策时痛诋时政，引起当朝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不满，向宪宗陈诉，导致主考官被贬，牛僧孺等不予重用，埋下党争前因。在如何对待藩镇割据的问题上，李吉甫一派主张武力平叛，另一派宰相李絳、李逢吉等主张以安抚为主，遂形成对立派系。穆宗至文宗时期，党争循序展开，两派交相进退。穆宗长庆元年（821），因礼部贡举不公，经李德裕等证实，李宗闵等因涉嫌私情，被贬，两派遂由公怨转成私仇，更相倾轧，互引宦官为援。武宗时期，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相，李党自此独掌朝政，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被贬职流放。宣宗时期，牛党重新得势，执掌朝政，牛党纷纷被召还朝。李德裕被贬到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后死于贬所。牛李之争以牛党获胜结束。两派之争，既有公事，也有私仇，政治主张除对待藩镇所持态度有别外，在选举制度，对待文化传统等方面亦多有分歧，牛党拥护进士科取士，相互援引，结成朋党；李党则主张改革选举制度，以抑进士科所带来的浮华之风。李德裕于会昌（841—846）年间执政，在讨平泽潞叛镇、破回鹘、废佛等方面，颇有建树，为人称道。文宗曾慨叹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旧唐书·李宗闵传》）表达了对两党长期争斗厌倦又无可奈何之心情。

（宁欣）

渤海

(Bohai) 698—926 年间中国东北地区以靺鞨族为主体的边疆民族政权。靺鞨是肃慎族的后裔，唐朝初年，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分成若干部，其中以黑水部和粟末部最强。唐圣历元年（698），粟末首领大祚荣统一各部后，建立震国，也叫靺鞨。开元元年（713），唐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加封渤海都督府都督，此后这个政权便以渤海为号。自宝应元年（762），其第三世王钦茂被唐晋封为“国王”后，历世诸王都经由唐廷册立。唐之后，继续向后梁、后唐朝贡。渤海疆域最大时，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苏联沿日本海的部分地区均为其辖区，居民以靺鞨人最多，此外还有高丽、突厥、契丹人等。人口由初期的数十万增至为 300 万左右，被誉为“海东盛国”。在中原文明的影响下，渤海政权迅速完成了封建化过程，仿唐制建立了行政机构和军事系统，社会经济有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农业已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畜牧业有较大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年年遣使到唐，同时派去大量留学生，不断汲取唐代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后唐同光四年（926），亡于契丹，前后历时 228 年。

（宁欣）

契丹

(Qidan) 中国古代民族，东胡的一支，居于中国东北地区。北魏时始见族名。原分8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契丹原附突厥，唐初转而附唐，此时已形成部落联盟。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巴林右旗南），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赐姓李，又置羁縻州10，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终唐一朝。契丹受北部突厥及唐中叶崛起的漠北回鹘势力的影响与挟制，与唐的关系多次反复，时附时叛。9世纪时，契丹的社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务农业，善畜牧，种桑麻，织布，制盐，并掌握了一定的冶铁技术。唐后期，与唐不断有贸易往来。10世纪初，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为盟主，后梁贞明二年（916）称王，建立契丹国，后汉天福十二年（947）改称辽。

（宁欣）

吐蕃

(Tubo) 中国藏族祖先在青藏高原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藏族祖先部落众多，主要从事高原畜牧业与高原农业，能制造金、银、铜器，也能用铁制造精良的武器。隋末唐初，藏族祖先由部落联盟发展为奴隶制政权，君主称赞普。唐贞观三年（629），赞普松赞干布降服苏毗、羊同等部落，统一了青藏高原，吸收先进的封建文化，创立文字，制订法律，建立官制，统一度量衡，建都逻些（今西藏拉萨），确立了奴隶制中央集权国家。吐蕃赞普多次向唐朝遣使求婚，贞观十四年（640），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婚，结成和亲关系。中宗时，又以宗室女金城公主许婚。两位公主入藏时和入藏后，大量的手工业品、科技书籍、工匠、锦帛、蔬菜种子等被携带和陆续传入吐蕃。和亲期间，双方贸易、经济、文化往来逐渐增加，两族间的联系和团结得到加强，对吐蕃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唐中叶以后，吐蕃势力不断扩张，与唐多次发生冲突。安史之乱后，又乘虚占领唐陇右、河西之地。唐、蕃曾几次会盟，以解争端，划定边界。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二年（821—822），双方再次会盟，并于长庆三年建立了“唐蕃会盟碑”，至今屹立在拉萨的大昭寺门前，成为汉、藏两族情谊的历史见证。9世纪中叶，吐蕃内乱，王朝遂瓦解。自松赞干布起，共9赞普，历时218年（一说214年）。

（宁欣）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songzan ' ganbu yu wencheng-gongzhu) 松赞干布是藏族吐蕃王国的创建者，一作弃宗弄赞。唐贞观三年(629)，他继父位为赞普，迁都逻些(今西藏拉萨)，降服苏毗、羊同等部，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奴隶制王国。在位期间，注重发展农牧业生产，引进先进的封建文化，促进了吐蕃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贞观十四年(640)，因其请求，唐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婚，结成和亲关系，加强了汉、藏两族间的交流与团结，在位 20 余年，贞观二十三年(649) 卒。文成公主为松赞干布之妻，入藏时，随身携带了大量精致的手工艺品、药品、科技书籍和蔬菜种子，入藏后，唐高宗应松赞干布的请求，送去蚕种及养蚕、造酒、碾磨、纸墨等工匠，松赞干布还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文成公主入藏后，为吐蕃佛教事业也做出了贡献。调露二年(680)，文成公主去世，在吐蕃生活近 40 年。由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对藏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和汉藏两族友好团结所做出的贡献，至今仍受到两族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宁欣)

唐蕃会盟碑

(Tang bo huimenbei) 唐长庆元年(821)唐朝与吐蕃会盟后所立之碑,也称“长庆会盟碑”或“舅甥联盟碑”。时唐穆宗继皇位,吐蕃赞普可黎可足派使臣朝贺,后又遣使请盟。当年十月十日,唐廷派大理卿刘元鼎为使,与吐蕃使伦纳罗在长安西郊会盟,其主要内容为重申友好交往,各守本境,以及驿使来往路线和供应问题。唐长庆三年、吐蕃彝泰九年(823)将会盟内容刻成石碑立于今拉萨大昭寺前。碑身呈方柱形,高 4.76、宽 0.95,厚 0.50 米。向西的一面用汉、藏两种文字刻会盟全文,汉文是直行,共 6 行,每行 84 个字,藏文是横出,共计 77 列,两侧用汉、藏文字刻参加会盟官员的姓名、职位。向东的一面用藏文记叙吐蕃的起源,唐蕃友好的历史以及这次会盟的经过。它是自唐以来汉藏友好交往的物证,也是研究吐蕃历史的重要文物。现摘录碑文如下:“……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为此大和矣。……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须和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善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长庆会盟后,一直到唐末,双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齐吉祥)

突厥

(Tuque) 中国古代民族。原居地不详，以游牧狩猎为生，诸氏族中以阿史那氏最为显赫，诸可汗俱出于此氏。后迁徙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北山（今博格多山），以锻铁著名。5 世纪中叶，被柔然征服，被迫迁居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6 世纪初，柔然衰落，突厥逐步摆脱其控制。西魏废帝元年（552），首领土门破柔然，建立突厥汗国，称伊利可汗。次年，木杆可汗立，屡兴征伐，领地“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北史·突厥传》），达到全盛。北齐、北周对峙时期，突厥同时交通二国，从中取利，并不断骚扰北方边境。隋开皇二年（582），突厥因内讧分裂为东、西汗国。东突厥在隋、唐之际国力最强，役属众多部族，不断骚扰唐朝辖境。贞观四年（630），唐军与反叛突厥的薛延陀部联合夹击，灭东突厥，大批突厥人迁至大漠以南，东突厥贵族后又再建汗国，其毗伽可汗（716—734 年在位）与唐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双方互市规模很大。天宝四年（745），东突厥为回纥所灭。西突厥的势力范围主要在西域，显庆三年（658），为唐所灭。突厥汗国属部落联盟国，部落各级首领世袭，有文字、刑法、税法，与唐有互市交往，玄宗开元时，每年用帛数十万匹换突厥的马。唐前期，突厥的侵扰构成唐北方、西北方的最大边患。

（宁欣）

回纥

(Huihe)又作回鹘，中国古代民族名。维吾尔族祖先，后亦为以回纥族为核心建立于漠北的游牧汗国名。西汉前，回纥是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隋至唐初，居住在娑陵水（今蒙古色楞河）侧。隋大业元年（605）实行君长世袭制，势力渐强。隋末唐初，役属于突厥。唐贞观四年（630），唐灭东突厥前汗国后，回纥遂与薛延陀族并称雄于漠北，势力逐渐向南发展，与唐接触较多。贞观二十年（646），助唐灭薛延陀，并其部落，兼有其地。次年，唐册封回纥可汗吐迷度为瀚海都督府都督。8世纪中期，其君长骨力裴罗统一回纥各部，自为可汗，受唐册封，号“怀仁可汗”，控制着东到黑龙江上游，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一直到开成五年（840）前后，回鹘（788年更名）可汗被黠戛斯所杀，汗国瓦解，诸部离散，其中一部分南下降唐，其余西迁。西迁的一支迁到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带，一支迁到葱岭及其以西的地方。唐安史之乱时，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乱，唐先后三次把公主嫁与回纥可汗为妻。唐后期与回纥贸易往来较多，以绢茶易回纥的马匹与皮毛。不少回纥人滞留内地经商，仅长安城就有千余人。在唐先进文明的影响下，回纥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他们已从事农耕，并创制了回鹘文。

（宁欣）

党项

（Dangxiang）中国古代民族，羌族的一支，故又称党项羌。党项原居住在四川西部边境内外，以姓氏为部落，不相统属，大姓中以拓跋氏最强。隋时党项各部有降隋者。唐初，又有大酋细林步赖、拓跋赤辞等先后归唐，唐于其地置羁縻州。由于受到吐蕃的侵逼，8、9世纪内，内附各部逐渐向今甘肃东部、宁夏以及陕西西北部一带迁徙。拓跋部落迁到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境），称平夏部。唐末，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助唐围攻黄巢义军，唐廷特授予定难节度使称号，赐姓李，封夏国公，从此该部据有河套以南的五州之地，并控制着当时的中西交通线，从中继贸易中获利甚厚。1038年，思恭后代西夏国王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

（宁欣）

南诏

(Nanzhao) 唐代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在内，在今云南、贵州一带建立的地方政权。乌、白蛮为今彝族和白族的先民。7世纪后期，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一带，分布着众多的乌蛮、白蛮部落，其中，蒙舍、蒙嵩、越析、浪穹、施浪、登爨最强，史称“六诏”（诏即王之意）。由于蒙舍诏居地最南，又称“南诏”。其王为蒙氏，与唐关系密切。唐贞观二十三年(649)，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臣属唐朝。武则天时，细奴逻子逻盛亲身入唐朝贡。唐玄宗时，五诏衰微，逻盛之孙皮逻阁在唐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天宝年间(742—756)，由于南诏的向外扩张，与唐发生冲突，遂背唐而臣属于吐蕃。安史之乱后，唐朝无暇顾及西南，南诏乘机扩大势力范围。南诏王异牟寻在位(779—808)时，达到全盛，辖区包括今云南全部、四川西南部及贵州西北部等。南诏的不断侵扰，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南诏政权性质为奴隶制，统治者注意吸收封建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派遣子弟赴成都、长安学习。统治集团逐渐汉化，城邑修建亦仿唐制。大和三年(829)，南诏军队曾虏走成都城内数万子女工匠，被俘工匠入南诏后，传授手工技术，对南诏的社会经济和手工技术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南诏晚期，统治集团日趋腐朽，终因内乱于902年亡国。自细奴逻称王，共13主，历时254年。

(宁欣)

唐末农民战争

(tangmo nongmin zhanzheng) 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反抗唐朝腐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唐僖宗初年，政治腐败，科敛繁重，灾荒连年，黄河以南尤为严重，劳动人民无以为生，被迫揭竿而起。乾符二年（875）初，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率数千人起义，自号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次年，攻克曹州（今山东定陶西）、濮州（今山东甄城北），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起义，与王仙芝会合，数月之间发展为数万。王、黄二人从事过贩卖私盐，对交通路线及唐军虚实较为熟悉。乾符三年，王、黄联军出山东，活跃于今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唐朝镇压无效，转而诱降，王仙芝动摇，黄巢反对未遂，于是分道扬镳，黄返回山东。乾符五年（878），转战于南方的王仙芝为唐军所败，被杀。尚让率余部与黄巢会合，推黄巢为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势力又见壮大。黄巢义军再度北上，然后转而强渡淮河、长江，突入江西，又经浙西进抵浙东，开山路700里进入福建，攻克福州。又沿海岸南进，六年九月，攻占广州，并发布文告，痛斥宦官专权，纲纪败坏；下令禁止官吏殖财贪赃，并宣布即将北上攻打长安。他的主张深受人民拥护，义军发展为数十万。黄巢率众取道桂林，乘大筏沿湘江进入湖南，又下江陵（今湖北江陵）。荆门受阻后，转而东向。广明六年（880）重创唐军高骈部，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东岸）飞渡长江，以破竹之势又渡淮河，于十一月攻克东都洛阳。沿途义军纪律严整，收众至数百万。于是义旗西指，攻破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天险。十二月，进占长安，僖宗出逃成都。十二月十三日，黄巢于长安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宣布罢免唐三品以上高官，处死一批皇族、公卿和高官显贵，没收富豪财产。起义军由于长期大规模的流动作战，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进入长安后，又没有全力追歼残敌，使唐廷获得喘息之机，逐渐积蓄起反击力量，围困长安，并对大齐政权采取坚壁清野政策，使其陷入严重的缺粮困境。义军将领朱温降唐，沙陀族李克用率军援唐，大大增强了唐反击的实力。黄巢被迫于中和三年（883）东撤，攻下蔡州（今河南汝南），又攻陈州（今河南淮阳），然300余日不下，义军损失严重。面对唐军增援，黄巢只好解围。中和四年（884），黄巢退至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兵败自杀（一说被杀），起义失败。唐末农民大起义历时9年，转战10余省，瓦解了唐王朝的黑暗统治，进一步摧垮了魏晋以来的腐朽的门阀士族势力。起义中，第一次以“平均”为口号，表明农民起义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宁欣）

隋唐佛教

(sui tang fujiao)隋唐时期,佛教有较大的发展,已形成众多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创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智f (531—597),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是当时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法相宗,创始人为玄奘(596—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此外还有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各派流行地区、所奉教义及对经典的阐发各不相同。隋唐佛学已从魏晋玄学的附庸趋向独立,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学风亦由过去的南方重义理、北方重禅定的明显区别,渐趋融合。此时,亚洲佛教的传播中心已由印度移到中国,中外高僧互相造访,不同译本的佛经得到相互交流,中国已成体系的佛教理论陆续由国际僧人传播到各国,与佛教有关的音乐、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随之发展,主要经由西北“丝绸之路”得到中西融汇与交流。寺院势力在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发展较快,不仅占有大量人力、土地,还经营邸店、租赁、高利贷等业务,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及对劳动力的控制。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下令灭佛,毁寺 4600 所,招提、兰若 4 万余所(唐朝寺院由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还俗僧尼 26 万人,没收土地数千万顷(疑顷为亩之讹),放免为两税户的寺院奴婢 15 万人。为了保存佛经和弘扬佛法,手抄佛经、雕刻、石窟寺、造像、壁画等佛教建筑及艺术品大量出现,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及窟内的绘画、彩塑和出土文书,北京房山石经等,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并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宁欣)

刘知几和史通

(liu zhijihe shitong)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唐代著名史学家，江苏彭城(今徐州)人，祖父曾任史官，父于高宗时官至侍御史。他深受家庭影响，对史学兴趣浓厚，20岁进士及第，得官后继续研究史学。从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参与修撰过多部史书。景龙二年(708)，因痛感官修史书弊端诸多，愤而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阐发自己的史学观点，呕心沥血而于景龙四年(710)成书。《史通》全书20卷，分内外篇，内篇39篇，外篇13篇。其中，内篇的3篇北宋已佚，全书现存49篇。该书对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语言运用、人物评论、史事叙述、作史原则、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史家得失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并提出自己的治史观点。他还特别提到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为当时人所称道，对后世亦有较大影响。《史通》堪称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评论的开创性著作，它的成书标志着我国史学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宁欣)

杜佑和通典

(du you he tongdian)杜佑(735—812)唐著名政治家和史学家。京兆万年(今西安)人,以荫入仕,历任中外要职,唐德宗时,官至宰相,因编纂《通典》一书而闻名后世。唐开元末年,刘秩仿《周礼》六官,采经史百家之言,撰成《政典》一书。杜佑得其书,以为“条目未尽”(《旧唐书·杜佑传》),于是在此书基础上,增益资料,扩充条目,历36年,重新编次整理而撰成《通典》,于贞元十七年(801)进呈。《通典》共200卷,主要记述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和民族志,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该书博征史料,上下贯通,每事以类相从,上起先秦,下迄天宝,都详其本末,天宝以后史事则择要而记,并征引了很多前代和当时人的重要议论。《通典》一书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也为后代分门别类记载各朝的典章制度开创了先例。

(宁欣)

元和郡县图志

(Yuanhe junxian tuzhi) 唐代地理名著，为现存最早又比较完整的地理总志。编撰人李吉甫(758—814)，字弘宪，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宪宗时官至宰相。他力图惩前人之弊，从政治、军事角度着眼编撰地理志，于元和八年(813)完成此书。该书共40卷，又有目录2卷，以贞观(627—649)时划分的十道为纲，配以宪宗时的47镇，每镇篇首有图，分镇记载州、府、县的等级、户数、沿革、四至八到、道里、贡赋、古迹、物产、山川形势、城邑、盐铁、垦田和军事设置。宋代以后，此书的图和目录均已亡佚，故书名改称《元和郡县志》。原书在流传中散失颇多，多卷残缺。此书已成书1000多年，后代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方志，基本都继承了它的编纂方法，其影响极为深远，同时史料价值也较高。

(宁欣)

玄奘和大唐西域记

(xuan zang he datang xiyuji) 玄奘(596—664)，唐初高僧、佛经翻译家。俗姓陈，名祜，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13岁出家，玄奘为其法号。他苦心研读佛家经典，四处访师求学。在游历及研读各派理论过程中，他发现疑难问题甚多，佛经译本缺乏，屡有舛错，遂决心西行佛教圣地——天竺(即印度)求法。玄奘于贞观初年(627—629，说法不一)从长安出发，越过玉门关，经今新疆、苏联的中亚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和地区，进入北印度，途中跋涉高山雪岭、荒漠流沙，历尽艰辛。他在今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印度各地游历巡礼，拜师受学，在当时印度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伽雅城西北)研习佛学5年。贞观十六年(642)在曲女城(今印度卡诺吉城)举行的佛学辩证大会上，为论主，获得极高赞誉。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历时10余年，行程5万里。回国后主要从事译经活动。《大唐西域记》一书是玄奘回国后，口述旅行中的丰富见闻，由弟子笔录而撰成的。全书12卷，10余万字，记载了途中所历130多个古国(包括中国新疆和苏联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境内的古国)的山川、物产、风俗、宗教、气候和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7世纪中叶历史的重要文献。

(宁欣)

赵州桥

(zhaozhouqiao) 又称安济桥。位于河北赵县南门外，横跨洺河之上。由杰出民间工匠李春设计建造。建于隋朝大业年间(605—618)，是目前世界上保存下来最古老的一座单孔无墩敞肩石拱桥。全长 50.82 米，宽约 9.6 米，拱的跨度为 37.37 米，拱矢高 7.23 米。桥的结构和建造工艺有许多独到之处，桥的跨度与高度之比近于 5 : 1，使桥面坡度低且平缓，便于车马行人通行。在大拱两侧肩部各造两个小拱，既增加了桥身的美观，节省了建筑材料，又减轻了桥身对地面的垂直压力，利于排洪，减轻激流对桥身的冲击，增强安全度。在建桥工艺上有所创新，桥身由 28 道并列的石拱圈组成，各道拱圈之间用铁腰相连，使桥形成一整体。因每道拱圈又自成一体，便于部分损坏部分施工修理。桥面的栏板和望柱上，雕刻着精美的蛟龙、天马和雄狮，栩栩如生。赵州石桥一千三百余年来，历经多次地震和战火的考验，雨、雪和风的侵蚀，至今保存完好。赵州大石桥在中外桥梁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欧洲罗马帝国时代虽建成比它更早的石拱桥，但未能保存至今。直到 14 世纪在法国的泰克河上才又建造了石拱桥，比我国的赵州桥晚七百多年。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08-1.bmp}

(刘桂英)

敦煌莫高窟

(Dunhuang mogaoku) 亦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县城东南二十五公里的鸣沙山断崖上。南北长约两公里，是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据唐朝圣历元年(698)《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龕碑》记载：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当时有位乐僔和尚来到鸣沙山下，造窟一龕。随后又有法良大师在乐僔窟龕旁继续开窟营建。此后历经北朝、隋、唐、宋、元各代，在近千年的时间内连续不断地在这里开窟千余。现在洞窟 492 个，其中尤以唐窟最多，最为精彩。最大洞窟高 40 米，30 米见方，而小窟还不足 1 尺。塑像 2000 多身，窟中最大的佛像高 33 米，小的仅有几厘米。造像全部是泥质彩塑，有单身像和群像，佛像居中心位置，两则侍立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佛的庄严、迦叶的宁静、阿难的精明、菩萨的妩媚、天王力士的威武有力，充分显示了塑像技艺的高超。莫高窟艺术以壁画为主，现存壁画 4500 多平方米，其题材以佛教故事为主，有佛像、佛经故事、古代神话、供养人、装饰图案等。如《设头罗健变鱼救灾民》、《太子乘象入胎》等生动地描绘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降生前舍身行善和他的生平故事。在历代壁画中的本生故事画和大幅经变画中，也穿插有关人民生活写照的画面。如行船、走马、耕种、收割等都是人民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劳动情景。第 323 窟壁画中就有对“纤夫”的描绘，古代画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刻画了两个弯腰驼背、肩负重担的劳动者形象。

(刘桂英)

吐鲁番文书

(Tulufan wenshu) 1959 年到 1975 年，在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平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到唐的墓葬四百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有 2700 多件汉文文书。其中晋十六国时期的 100 多件，占全部文书的 5%，高昌王朝时期的 700 余件，占 30%，其余为唐朝的，约 1700 多件。据文书记年，最早的是西晋泰始九年（273），最晚的是唐大历十三年（778），前后历时五百年。其随葬形式，有部分文书直接随葬，如衣物疏、功德录、告身、契约等，保存比较完整。其余部分被裁剪成给死者穿戴的鞋、帽、腰带、枕、褥等形式随葬，故多已残损，这种形式的文书主要包括反映租佃、买卖、雇佣、借贷等内容的契约；还有手实、计帐、户籍、受田帐、退田帐等籍帐（户籍册）；符帖、牒帐、审理案件，授官授勋、告身、行旅过所、收支帐历等官府文书；经籍写本和私人信札等。这批文书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为研究古代高昌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如文书中有关于古代高昌地区棉、桑、豆、胡麻等农作物和兴修水利、施肥等生产技术以及马、牛、羊、骆驼、驴、狗等家畜的饲养的记述，从而使我们了解了古高昌地区农牧业生产情况。文书中还有《论语郑玄注》、《孝经》、《唐律疏议》、《七女经》、《法华经》、《金刚般若经》等古籍抄本，这些手抄古籍和经卷反映了高昌地区当时的思想文化面貌。

（刘桂英）

五代十国

(Wudai shiguo 907—960) 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唐朝灭亡后，中国中原地区相继出现 5 个短暂的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同时，南方和山西地区，先后出现 10 个割据政权，即：吴、前蜀、后蜀、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史称“十国”。五代十国前期，黄河流域是两大集团斗争的场所。一个是以开封为基地的朱温集团，另一个是以山西太原为基地的沙陀族李克用集团，河北、山东原有的强藩和唐中央禁军势力都已被他们消灭。朱温本为黄巢部将，降唐后封节度使，逐渐扫除了今华北地区的割据势力，并一举铲除宦官集团，于天祐四年(907)灭唐建后梁，是为后梁太祖。后梁历三帝，共 17 年。龙德三年(923)，李克用子李存勖南下洛阳，建后唐灭梁，是为后唐庄宗，后唐历 4 帝，共 14 年。清泰三年(936)，明宗(即李克用)女婿石敬瑭，乘后唐内乱，以割让幽蓟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为代价，换取契丹的援助，从太原南下灭后唐建晋，是为后晋高祖，历 2 帝，共 11 年。开运四年(947)，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后晋与契丹交兵之机，在太原称帝，建后汉，是为后汉高祖，后迁都开封，历 2 帝，共 4 年。乾祐四年(951)，邺都留守郭威依靠禁军势力，引兵南下，灭后汉，建后周，是为后周太祖，历 3 帝，共 10 年。显德七年(960)，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

南方九国的地区原为唐中央政府控制区，在黄巢义军两次扫平江南后，各地方割据势力纷纷称王，出现了九国，加上后汉高祖刘知远弟刘崇，留守太原，郭威南下灭汉称帝时，他占据河东 12 州，称帝，建立北汉。南方九国中前蜀与后蜀前后相接，吴与南唐先后相承，此外，钱镠以杭州为中心建吴越，王潮、王审知兄弟据福建全境建闽，马殷在湖南及桂管诸州建楚，刘隐据岭南建南汉，高季兴驻守江陵，控制荆南 3 州，建南平。北宋建国后，尚存的荆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相继被灭或归降，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全国统一，正式结束了唐末近百年南北分裂的历史。

五代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中原地区连年战争，朝代更迭频繁，征发科敛沉重，屠杀残酷，使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户口大量流亡和减少，繁华都市在乱军的焚掠、摧残下，变成瓦砾废墟，人烟荒芜，满目疮痍，后周时，这一局面方有扭转。南方经济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成为九国割据政权建立和存在一段时期的经济基础，战争较少，比北方相对安定些，尤其江南和巴蜀两个地区富庶安定，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极为有利。南方各国统治者相继施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兴修水利、减免人民负担的措施，推动了南方经济的不断发展。但由于战争时有发生，一些国家额外征敛名目繁多，甚至强迫青壮年从军，如北汉、南唐等国，无疑对社会生产起到了阻碍作用。五代十国时期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都处于不断改革的过程中，总的趋势是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禁军实力，逐渐削弱和消除分裂割据的势力和因素。后周太祖和世宗的相继改革，使后周逐渐具备了统一全国的政治力量、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世宗柴荣一统天下的雄心化为具体行动，于显德二年(955)征蜀，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但他壮志未竟身先死。赵匡胤建宋后，继其事业，太平兴国四年，太祖弟太宗赵光义征服北汉，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

五代十国时期，不仅是藩镇割据的继续和扩大，也是统一的宋王朝建立

的前奏，是唐宋两朝继往开来的过渡时期。统一的各种因素在割据混战的局面下迅速向前发展，人民对安定局面的渴求，经济、文化的联系和发展，抵御北方兴起的契丹入侵，都促使统一因素不断增长，终于促成了统一局面的最终形成。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10-1.bmp}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11-1.bmp}

周世宗改革

(Zhoushizong gaige) 周世宗柴荣 (921—959) 后周第二代皇帝。邢州龙冈 (今河北邢台) 人，后周太祖郭威的内侄和养子，后周开国皇帝太祖郭威在位期间，曾就恢复农业生产、革除累朝弊政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显德元年 (954)，柴荣即位，广泛收罗人才，继续推行改革。政治上，澄清吏治，严明赏罚，惩治贪赃，倡导节俭，力戒奢华。经济上，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减免各种无名科敛，安抚流民，招民垦殖逃户田，编制《均田图》，派遣使者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实隐匿耕地，使之均摊正税，废除曲阜孔氏的免税特权，动员民众兴修水利，疏浚漕运；停废敕额 (朝廷给予寺名) 外的寺院 3 万余所，敕额外僧尼一律还为编户，禁私度僧尼；收购民间佛像铜器铸钱，缓解了唐末以来长期缺钱的局面。军事上，整肃军纪。显德元年，处决了与北汉作战时临阵溃逃并劫掠辎重，扬言周军已败的禁军大将樊爱能、何徽以及中级将校 70 余人。班师后，检阅禁军，裁汰老弱，选募壮勇，组成了精锐的中央禁军。周世宗还修订刑律，修订历法，考正雅乐，广搜遗书，雕印古籍。显德二年，世宗采用王朴提出的“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致力于统一全国的大业，先出兵后蜀，收回 4 州。次年伐南唐，经三年苦战，收回淮南、江北 14 州 60 余县。六年征辽，收回燕云 16 州中的 3 州，五月间，乘胜进取幽州，突患重病，被迫班师，六月卒，年 39 岁。世宗柴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及成就，为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宁欣)

北宋

(Bei Song) 中国古代封建皇朝。后周显德七年(960)镇州与定州报契丹与北汉入侵,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奉命抵御,军队行至开封东北陈桥驿(今河南封丘县陈桥),士兵哗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史称陈桥兵变。不久,周恭帝被迫禅位,赵匡胤称帝,因归德军治所在宋城(今河南商丘南),遂建国号宋。史称北宋。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大将石守信等人兵权,先后平定李筠、李重进等人反叛,稳定了地位。然后灭掉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及北汉政权,迫使割据的漳州、泉州节度使陈洪进投降,统一中国大部,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制定了北宋制度。官制设立基本沿袭唐代,但集权程度更高。政事堂与枢密院共掌军国大政,政事堂中书、枢密使分掌文武,号称二府,财政大权归三司统领,号为计相,三者将宰相之权瓜分。台、省、寺、监均官无定员,无定职。皇朝派转运使至各地掌握财政。官员有职、差遣、官的区别。官是虚衔,作为叙级、定俸之用,职也是虚衔,没有实际职掌,差遣是实际负有责任的。知州、知县,乃至枢密使、三司使、转运使均属此类。这种措施使地位与职权分离,官员难以独裁形成势力。宋行政区划为路府州军监,监一般设于坑冶、牧马、产盐之地,军则设于要塞。二者常与府州同级,也有与县同级的。府多设于较大州中。路位府州之上,设安抚使司(帅司)、转运使司(漕司)、提点刑狱使司(宪司),总称监司,分掌地方兵马、财政、刑狱事务,直接对皇帝负责。这套系统强化了皇权,减少了地方专权的可能性,但也造成了积弱局面。兵制重视皇帝直接掌握的禁军,还有镇戍诸州的厢军,屯防本地的乡兵、著兵。驻防军队经常调动,统兵将帅不固定,“兵无定帅,帅无常师”(《文献通考》卷152《兵考》)是这种兵制的特点,军权直系于皇帝,甚至作战也由皇帝预授阵图。这种弱枝强干的措施也是造成北宋积弱局面的原因。还实行养官、养兵、养士政策。又用文官任地方长官,甚至统兵。后来造成了冗兵、冗员、冗费的严重社会问题。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曾主持新政,以图解决这些问题,史称庆历新政,但失败。神宗年间王安石也曾实行重大社会改革,也未取得成功。北宋建立之初,契丹政权就已存在,后来西北地区又出现夏政权,北宋无力消灭他们,只能与之对峙。辽、夏在宋初不断侵袭宋,掠夺疆土、人口、财富。宋与辽发生过三次较大的战争,第一次,宋太宗欲夺回被契丹占有的燕云地区,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进攻契丹南京,在高粱河之战中败北。第二次雍熙三年(986)宋太宗派三路大军攻契丹,宋先胜后败。史称此次事件为雍熙北伐。第三次契丹主动进攻宋,在澶州城下迫使宋订立和议,史称澶渊之盟,是对宋屈辱性的和约。西夏建立之初,宋欲镇压,夏军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战役中打败宋军,迫使宋承认夏的建立。宋与辽夏的战争暴露了宋的虚弱,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富国强兵。金灭辽后,连续入侵北宋,宋无力抵御。靖康二年(1127)金掳徽、钦二帝及宗室和官员3000余人北还,北宋灭亡。北宋的社会矛盾在一些地区较突出,初年在四川地区曾发生王小波、李顺起义,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标志农民起义发展到新阶段。北宋是中原经济发展时期,宋初注意发展农业,农业工具也有发明,农产量较高,水稻、棉花、茶的生产均较重要。手工业中印刷业有活字印刷术的出现,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发展均较突出。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量很大,

可与亚非诸国与地区交往，商业城市如开封、广州、泉州、杭州等均繁荣。文化发展也较突出，有苏轼等文学家，司马光等史学家，程颐，程颢等思想家，沈括、苏颂、刘益等科学家出现。有李诫《营造法式》、唐慎微主编《证类本草》、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宋慈《洗冤录》等科学著作。在文学上北宋奠定了词的发展基础，留下许多著名词作。宋末，大土地所有制迅猛发展，苛捐杂税繁重，民族矛盾尖锐，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一起，发展极为困难，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灭亡的。北宋疆北至今河北北部及山西雁门关，西北在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与夏相连；西在今四川东部、青海湟水流域与吐蕃、西夏相交，西南在今四川西南部与吐蕃、大理国交界，东达于海，南包南海广大地区，广西与今越南接界。共传 9 帝，167 年。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13-1.bmp}

宋太祖赵匡胤

(Songtaizu Zhao Kuangyin 927 - 976) 北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其父赵弘殷曾事周，为赵王镠部下，勇敢善斗。赵匡胤为其次子，善武。年轻时漫游四方，后郭威征讨李守真，应募从军征战。数与北汉军战，又与后蜀等作战，深受郭威、柴荣等喜爱。显德六年（959）为殿前都检点，周恭帝即位为归德军节度、检校太尉。显德七年（960）受部下推戴，在陈桥驿黄袍加身，不久建立宋，史称北宋。先后平定了大将李筠、李重进的反抗，稳定地位。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逐渐灭亡荆湖、后蜀、南汉、南唐政权，进行统一中国，消除割据状态的统一战争。平定南方后，亲自征取北汉。在战争开始前即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取缔了掌握重军的大将石守信等人兵权。战争同时，着手确立北宋王朝的各项制度与政策。在政治上，吸取唐以来的教训，改革官制，削弱分散权力的官员力量与制度，加强中央集权专制。以参知政事为副相，以枢密使掌军权、三司使掌财政，分散宰相权力。基本国策是守内虚外，加强禁军力量，由皇帝亲自掌握，使军队不断更戍地方，兵不知将、将不专兵，削弱地方军力。又以文人官僚任地方知县、知州，称权知，不使军人掌地方政权。以通判分知州之权，以转运使掌管地方财政，并监察地方官。史家认为“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相甚绝哉！”他所以能立国，根本原因在于能“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宋史》卷3《太祖纪》）。他于农业生产等亦很注重，兴修水利，奖励农桑，使宋初经济于大乱后能较快地发展起来，充实、吸取了各地已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经济发展。在军事上，无力抵抗契丹力量南下，对宋初发展亦有很重要影响。

（张立生）

王小波、李顺起义

(Wang xiaopo、li shun qiyi) 北宋初期四川地区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四川地区自唐末以来很少受到政治波动影响，因此豪强地主势力极强，拥有大量财富与土地，宋朝建立后为财政收入考虑，在四川设立专管盐、布帛、酒矾的机构，严重影响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与政府对工商业的控制成为当地社会矛盾焦点。淳化三年(992)左右，四川受到自然灾害侵袭，粮食大面积减产，人民生活困难。淳化四年(993)，味江茶农王小波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本末》卷13)。得到广大茶农与农民的拥护，很快发展到几万人，占据青城、彭山(均属四川)。他们每攻取一个地方，便命令富人大姓呈报家中财物，除按人口留给必需份额外，其余则分给民众。不久，进攻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王小波战死。李顺遂领起义军，取蜀州(今四川重庆)、邛州(今四川邛崃)等地。淳化五年(994)初，占领成都，建立大蜀政权，称大蜀王，发行应运元宝铜币和应运通宝铁钱，控制北起剑门，南至巫峡的广阔地区。宋以王继恩为将，由剑门与长江两路进攻，农民军被镇压下去。余部由张余领导斗争到至道元年(995)。前后持续约2年时间。起义打击了四川地主阶级所提出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标志农民起义发展到新阶段。

(张立生)

庆历新政

(Qingli xinzheng)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由范仲淹主持的社会改革。宋仁宗时期(1023—1032)宋朝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军事都面临巨大问题,集中表现为冗兵、冗员、冗费等现象严重。庆历三年(1043),仁宗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他们以整理吏治为中心,条陈十事,推行新政。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今江苏吴县)。长期从仕,有政绩。曾多次提出革新倡议,支持者有欧阳修、杜衍等名大臣。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明黜陟。改变过去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磨勘的旧例,根据政绩,可以破格提前晋级,也可延期或停职,以求改变“人人因循,不复奋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的状况。为此择派官长,巡视地方,以执行新政。这对改变冗官问题有一定作用。 抑侥幸、精贡举。改变恩荫之制,防止恩荫过滥现象再度出现。同时改变科举之制,避免凭词赋取士,而注重品德与办事才能的考核。这亦对改变冗员问题,整顿吏治有一定作用。 均公田。具体方法是:“外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同上)。公田即职田。主要目的在使官吏廉洁奉公,同时抑制官僚大地主的兼并之势。 劝农桑、修水利。具体方法是兴修水利,减轻徭役。主要目的在发展生产,增加政府收入,以应付冗费问题。 覃恩信、重命令。扩大宣传,使百姓感受到皇帝恩泽,取信于民。这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信心,以忠心护卫宋王朝。范仲淹庆历新政执行范围有限,施行亦不甚系统,但仍受到反对派猛烈攻击,以结朋党为名排挤他。一年多后,新政被彻底放弃,范仲淹被挤出朝,支持者先后遭贬。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触动了一些名臣、大官僚的实际利益。庆历新政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导。

(张立生)

王安石变法

(Wang anshi bianfa) 北宋中期王安石主持的重大社会改革活动。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抚州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市)。出身地主官吏家庭,早年有文学成就,曾与父亲经历许多地方。中进士后,历任幕僚、知县、通判、知州、提点刑狱等职,有政绩。有感于北宋社会矛盾的尖锐,力主改革政治,以扭转国势的衰落。宋仁宗时上《万言书》,希望改革,受到冷遇。宋神宗继位后,得到支持,开始实行改革。当时宋王朝面临的问题有三个方面: 社会矛盾激烈,民众起义不断,这些起义成为不稳定因素,使王朝权力难以行使,威胁到北宋政权的存在。 西夏、辽不断侵入宋王朝,蚕食宋朝疆域,还影响、破坏了北宋北方的经济,也威胁到宋朝的政权存在。 冗兵、冗员、冗费问题严重,国库空虚,财政困难。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改革。改革以增加财政收入,节俭支出,稳定经济秩序,整理经济环境,加强军事力量为主要内容。具体措施有: 均输法。宋在荆湖南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淮南路设立转运使,由于官员因循旧规,运转不灵,造成“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宋朝诸臣奏议·109·上神宗乞罢均输》)。均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减少财政支出,限制商人牟利,以稳定经济秩序。 农田水利法。由政府计工料、按民户等第出资兴修水利,抑制土地兼并与水利工程垄断,劝种桑柘等经济作物。整理经济环境,以利收入。 青苗法。青黄不接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半年加息二分偿还。主要目的是抑制土地兼并和高利贷。并强制上等户借贷与纳息。也属整顿经济环境的措施,利于财政收入稳定。 方田均税法。清查垦耕地,标明亩数、产主、田地优劣以定赋税,避免豪强隐产,使岁入有保证。 免役法。由政府募役,改变按户等轮流当差办法。费用由主户按等第负担。收取免役钱,由官、或形势诸户纳助役钱。目的在减轻政府支出,解放生产力,便利农耕。 将兵法。将黄河流域战区驻军分为几个或十几个单位,设将与副将各一人,训练军士。力图改变军士素质低下,不能作战的状况。 保马法。主要在京东、西,河北、东,陕西五路施行。由义勇或保甲养马一匹或二匹,以利征用,养马者受政府支持,可免折变钱等税。目的在加强军事力量,便于与敌作战。王安石变法陆续至元丰八年(1085)结束,其中经历了激烈的内部斗争,王安石二次罢相。以司马光为首的政治势力终于在元祐更化中破坏了大部分新法。宋哲宗后才又有恢复。王安石变法从总的效果讲,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维持了宋政局的稳定。但应注意到,变法是在保卫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

(张立生)

禁军与厢军

(jinjun yu xangjun) 两宋军队种类。“宋之兵制……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宋史》卷 187《兵制》）。禁军为北宋时期的正规军队，包括皇帝亲兵。集中于京师，有捧日、天武、龙卫、神卫等号。也曾屯驻，驻泊、就粮于各地，是人数最多、素质最好、武备精良的军种。分别由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步军司三衙统属。捧日等军又以兵力情况分为厢、军、指挥（营）、都四级编制。后又特立粮禁兵，常戍地方。宋神宗时，实行将兵法，开封府各县及各路多数禁兵组成将的编制，各地将编额不定，而东南地区固定为十三将，称系将禁兵，未编者为不系将禁兵。禁兵又采用唐制，五十人为一队。此时在京禁军未采用将编制，是机动力量。禁军士兵多从社会上雇佣，也有从厢军、乡兵中选拔素质优等者充任。人数最多时达 80 余万。宋朝末叶兵制松弛，京师三衙仅有 3 万余人，北宋灭亡时，禁军主力溃散。南宋时期，禁军地位下降，不是作战主力，专供杂役。

厢军为两宋时诸州之军。“厢兵者，诸州之镇兵。”（《宋史》卷 189《兵制》）厢军内总于侍卫司。也有一军分镇于数州的情况，有的则镇一州兼屯数州。京城诸司厢军有五，隶于宣政院管理，不同于各州，各自担负镇戍之责。厢军中壮勇者多拣选为禁军，余者为厢军驻本城，没有更戍之役。北宋时期，厢军更多从使役力，不为战争主力。厢军士兵来自招募、流放罪犯，以及禁军中淘汰的士兵。诸州厢军一般分为两级，即都和指挥。部分有军一级设置。名义上又有马军与步军之区别。马军和步军分属侍卫亲军、马军司和步军司三衙统帅。宋仁宗时期曾分为教阅与不教阅二种。神宗时期教阅厢兵升为下禁军，仁宗时仅作禁军使用，常按指挥分驻各州府。厢兵又全部为役兵。南宋时期各地驻军成为主要战斗部队，渐代禁军地位。

（张立生）

主户与客户（户等制）

（zhuhu yu kehu）宋代为了便于征取赋税，控制户口，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主户指占有土地，并承担赋役的户，官户与形势户亦包含在内。客户指住在农村，不占有土地，租种土地耕种的农人。主户约占全宋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其余则为客户的平均数。为能完纳赋税，宋将主户依资产高下分为五等，“天下郡县所定版籍随其风，或以税钱贯伯；或以地之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立为五等。”（《宋会要辑稿·食货》65）。在主户五等中一般称第一、二、三等户为上户，第四、五等户为下户，有时第三等户也被称为中户。第一等户一般为三顷以上土地占有者，超过三顷以上许多倍者为出等，高强、无比、极力户，所以一等户中占有土地情况相差较多。二等户约占土地二顷左右，三等户约占土地一顷左右。第三等户实际上是富裕户与小地主的混存阶层。第四、五等户占地在50亩至20亩以下，在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土地实际已被兼并，形成产去税存的状况，称无税户。第五等户比例最高，他们与客户相加约为全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社会生产的主要负担者。客户亦称为浮客，即为佃户，他们不必向国家交纳二税，但要担负夫役与纳身丁税。还要向地主纳地租，但人身依附关系已减轻许多，可以另择田主，所交地租约为收成的五成左右。宋代户等制中还有坊廓户，指非农业生产的城镇人口，单列户籍与分等。真宗时依财产状况划分约十等。分等目的亦在于方便科买与征税。等的区分地区间相差较多，财产依据的是房产，地课税与营造物力，大体可以分为上五等与下五等，上五等为坊廓上户，下五等为坊廓下户。家财在六千贯至一万贯的为第一等，超过一倍以上的为富强户，三倍以上为高强户，五倍以上为极高强户。也有主户与客户之分别，客户亦称浮客，有时坊廓户客户在十等以外。户等制中的官户主要为品官之家，享有特权，可免差役与劳役，税可免支移折变，以及科配等。形势户包括州县衙门公吏、乡里基层政权头目的部分上户与官户。但形势户中吏户无特权，另立版籍。

（张立生）

徽宗裨政与靖康之变

(huizongpizhengyuJingkangzhibian) 宋哲宗死后，徽宗继位，继位之初，向太后述政，打击变法革新派。向太后死后，徽宗改年号为建中靖国（1101），亲自主持政事。此时，变法守旧两派斗争极严重，成为北宋末统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徽宗企图清除这种内部斗争，调和两派，成为他执政时期政务的主要内容之一。此时宋朝还面临着农民起义与新兴的强大金政权的双重威胁。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他们的解决关系到北宋王朝的命运。徽宗任用蔡京主持政务，以期平弥两派斗争，但蔡京不仅不能平弥二者仇恨，相反，利用权势，打击其他官僚，又借变法强国之政大肆搜刮民力，鼓励徽宗崇尚道教力量，挥霍钱财，从而引起了更加大的社会动乱，在两浙有方腊利用宗教力量的起义，在山东又有宋江为首领的起义发生，极大地损坏了宋的统治力量，经长期斗争，才使起义平息下来。在对外族进攻上，蔡京一手遮天，将领难以用命，金兵连续给予北宋以沉重打击，徽宗企图媾和，受到内部的反对与金和议力量的破坏。宣和七年（1125）金兵南侵，兵锋直指宋都城，徽宗慌乱不堪，以儿子为监国，准备南逃金陵。在宗泽等大臣迫使下，传位与儿子赵桓，为钦宗，自为太上皇，改元为靖康（1126）。钦宗在抵抗金军同时，仍大肆进行投降准备，朝内战与和两派又争持不下，暂时达成和议后，两派斗争更加激烈。靖康元年（1126）金兵第二次南下，再次围攻开封，钦宗用道士郭京为将，企图以咒语破金兵于城下，结果大败。靖康二年（1127）金军攻破开封，徽、钦二帝及宗室、大臣三千余人被俘走，北宋王朝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张立生）

南宋

(Nansong) 中国古代封建皇朝。北宋靖康二年(1127)北宋为强盛的金朝灭亡,南甯诸臣及南方宋大臣推康王赵构为帝,重建宋朝,建年号建炎,建都于临安府(今杭州),赵构为南宋高宗,史称南宋。南宋建立伊始,便面临存亡问题。金军不断南下。在北方人民抗金斗争支持下,南宋与金发生过几次较大冲突后,才形成与金对峙的形势。建炎四年(1130)宋将韩世忠在黄天荡大败金将兀术,阻止了金军南下,同年宋将张浚又在富平之战中战败金军,次年金军侵川,受到宋将吴玠抗击,在和尚原金军大败。在此前,即建炎三年(1129)金扶植伪齐政权统治旧黄河以南及陕西地区。绍兴四年(1134)宋将岳飞收复襄阳等地,金遂与伪齐联合反击,被宋阻止。绍兴十年(1140)发生了著名的顺昌保卫战,宋将刘锜败金军于城下,宋将岳飞在郾城及颍昌也取得胜利,岳飞在华北军民支持下进军到朱仙镇,准备进攻开封,但被宋高宗召回,南宋与金订立绍兴和议。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南侵,欲灭亡南宋,但在采石之战又被打败,这是宋金史上重要的战役,此后金军再也无力南下。孝宗隆兴元年(1163)派将北伐,结果无功而返,次年宋与金订立隆兴和议。后开禧二年(1206)南宋欲借金处于困难的时机,在韩侂胄主持下进行开禧北伐,但由于内部斗争激烈而失败,南宋与金订立嘉定和议,南宋从此与金的大战告一段落。综南宋与金和战的情况,南宋始终处于屈辱地位,仅能苟且偷生。南宋在政治上基本沿袭北宋,腐败不堪,朋党斗争激烈,但官制较北宋减省。南宋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仍很突出,南方人民受到金军的劫掠,又受到溃散宋军的骚扰,苛捐杂税,劳役繁重,“以舟楫为生者,或奇充纲运,以网罟为业者则藉为水手。差徭例及于贫民。”(《梁溪全集》卷85)。建炎四年钟相、杨么曾在今湖南、湖北地区举行起义,建立政权,后被宋名将岳飞镇压。其他地区如福建、江西等地也有起义举行。南宋的经济在某些方面比北宋发展要高,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南方渐成为主要经济发达地区。南宋所占有地区便于农业生产,尤其利用水稻生产。南宋建立后,襄阳、汉中、两浙、江东地区渐成为粮食生产基地。尤其两浙与江东地区的圩田、梯田生产发达。粮食产量较高,棉花等作物的栽培也有发展。农业工具出现了人工踏犁、竹龙等先进工具,水利灌溉系统也得到开发。手工业中养蚕织锦、丝织业、棉织业均取得发展,所织棉布可幅阔五六尺,可染色,也可织出细字小花卉,称白叠。雕板印刷、活字印刷兴旺,可印出大量书籍,造纸业亦随之发达,可造出各种用途纸张。瓷器制造业有哥窑等著名产品。南宋造船业特别突出。工商业城市繁荣,各种市场遍布城中,称为作或行,出售商品很细致,米即有早米、晚米、冬春等多种名目。在商业中会子大量使用。海外贸易受到政府鼓励,与东南亚、大食等均有贸易往来,钦州等地设有许多海上贸易港,并设市舶司等机构。文化事业南宋也较突出,出现了理学家朱熹、陆九渊,文学家辛弃疾、陆游等人。南宋末年政治日趋腐化,宋理宗挥霍享乐无尽,大兴土木,任用贾似道为相,听他专横跋扈,恣意所为。蒙古汗国灭金后,积极准备灭宋,经合州保卫战、襄樊保卫战等几次战争,祥兴元年(1279)终于灭亡。南宋疆域北以秦岭、淮河为界与金对峙,南及琼州以外,东至于大海,包有几乎北宋南部原有地区,东南、西南与北宋同,共传9帝,152年。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16-1.bmp}

钟相、杨么起义

(Zhong xiang yang yao qiyi)南宋初年爆发的农民起义。南宋初年，金朝军队不断南侵，战争使江南一些地区受到极大破坏，南宋政府又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民不堪其苦，民族矛盾与尖锐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与金兵作战失败的宋溃兵流窜各地，行同土匪，在荆湖地区尤为突出。“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官兵盗贼劫掠一同，……盗贼既去，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1）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畔散，钟相、杨么起义即爆发在这种背景下。钟相，鼎州武陵人（今湖南常德），自称有神灵，以行医为名长期活动，组织武装，宣传“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当地人纷纷入教，自动分财互助。建炎四年（1130），金兵破潭州，劫掠后北还，宋军追击至此，公然打劫百姓，钟相遂借机举事。建大楚国，自为楚王，宣布宋朝制度为邪法，杀死儒、僧道，巫医卜祝、官吏。以武陵为基地，拥有今湖南、湖北地区七州十九县。后在作战中被混入的奸细告密，钟相及其子钟昂被俘杀，杨么遂领其军。杨么本名太，因年幼故称为么。他以洞庭湖为基地，利用湖区特点，采取陆耕水战策略，联合另外几支农民武装，屡次打败宋军。绍兴五年（1135）宋大将岳飞率岳家军镇压，采取“因敌人之将，用敌人之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6）的策略，分化瓦解农民武装，俘获杨么，平定了持续6年的起义。这次起义发展了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的均贫富思想。

（张立生）

岳飞

(YueFei 1103—1142) 抗金名将。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今河南汤阴)。出身农家，少年学射于名师周同，能左右射敌。北宋宣和四年(1122)，真定宣抚刘韜招募勇士，应募，多次与盗贼作战取胜。后归宗泽部下，在曹州等地作战多胜，宗泽奇之，并授以阵图。赵构即位，上书越职被罢官，投奔河北张所部，张所待他极厚，命与部将王彦渡河作战。不久因与王彦有隙，复投宗泽。宗泽死后，隶于杜充部下。杜充投金，他自领一军，能秋毫无犯，与金兵统帅兀术部作战屡胜。南宋绍兴三年(1133)镇压江西地区曹成等农民武装，皇帝手书“精忠岳飞”旗赠他。后齐军渡江南伐，杨么又在洞庭打败宋军，形势紧张，岳飞认为应先破齐，遂率军与齐军作战，收复荆襄之地。不久，即率军擒杀杨么，受到张浚的赞许，命驻师鄂州(今湖北武昌)，作为江浙后援。他积极联络太行义军，屡次建议北伐。绍兴十年，金军猛攻河南诸地，受命支援，亲率一路驻于郾城，与兀术大将及龙虎大王所率金军决战，重创金精锐拐子马，大败金军，随后又在颍昌击败金军。驱军抵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县西南)。金军极困，兀术派人至河北募军，竟无人应之。然而，宋高宗无意与金作战，急于议和，召岳飞回京，岳飞泣泪班师。回朝后，岳飞、韩世忠等三人分别叙功，岳飞为枢密副使，与张浚驻守楚州措置边防。绍兴十一年，以谋反罪被诬入狱，不久后即遭屠戮，同死者有其子岳云、其将张宪等人。他作战勇敢多智，善与部将合作，有事与众将谋，谋定乃战，因此常能取胜。岳飞为恢复宋朝土地，为保卫南宋政权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可歌可泣。他是一位战争技艺高超的汉民族英雄。

(张立生)

宋代的科举制度

(songdai de keju zhidu) 宋代科举制度大体沿唐制，所谓“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莫重于进士、制科，其次则三学选补”（《宋史》卷 115《选举志》），后有一些变化。但仍以进士科为重。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武举。常选之外又设制科、童子举。宋代科举制度最大一次变化在宋神宗时期，神宗时期罢九经、五经，开之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诸科，以经义、诗赋取士，通宋一代基本遵此未改。宋代科举年限初无定制，英宗时期定为三年一试。采取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于尚书省放榜。宋太祖时始确定殿试制度。宋代科举省试第一为省元，殿试第一为状元。宋太宗时规定，进士取三甲，评定标准以学识优长词理纯正为第一；才思赅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者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上二等为进士及第，即一甲；三等为进士出身，即二甲；四、五等为同出身，即三甲。有时亦取五甲。宋代进士科取录士人极多，最多一次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共取一百零九人，南宋时期进士每科取士动以 400~500 人。宋代科考后，殿试与科考名次有异，有的甚至相差较大，但殿试后即可授以官职。仁宗时期规定科考及第者任官办法为：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等任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任通判，再任满，则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三等除任为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五等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幕职官。宋代甲等三人升迁特别快。所谓制科，即为特科，有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娴吏理达于教化、博学宏词等等，科目极多。命士应举，称为黜厅试，所属先具名以上闻，得解而后行。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缙麻以上亲，以及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临考期，知举官联保，检核与状同后始派。状即家状。一般于状及试卷之首署年及举试之次数、场第、乡贯等内容，不能增损易移，“以仲冬收纳，月终而毕”（《宋史》卷 155《选举制》）初，就试时可挟《切韵》、《玉篇》。后挟书以及口相授授者，发觉即斥黜之。宋代科举始用弥封、誊录办法以防作弊，后代均仿照行之。

（张立生）

宋代的杂征敛

(songdai de zazhenglian) 宋代赋税以夏秋两税为主要税收内容，但在这两税而外，还有丁口之税和杂变之赋。所谓丁口之税是将五代十国时期存在的各种赋税，如身丁钱绢、身丁米麦、丁口盐钱、身丁米钱等项沿袭承续下来，改用丁口之税这个名称来征取。杂变之赋也承自五代十国时赋税，是将皮革税、筋角税、农具税，及鞋钱、曲引等，合并而成，也称作沿纳。这二种都须随同两税输纳。丁口税赋不分主户与客户均需交纳，常使用折变之法，税的交纳人常因此而被迫文纳好几倍的税钱。“自唐以来，民计田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谓之杂变，亦谓之沿纳。而名品烦细，具类不一。官司岁附帐籍，并缘侵扰，民以为患”（《宋史》卷 174《食货》）所讲的是这种情况。实际上除此而外，宋代还因国家财政困难，大量地随时随地征收额外税赋，有地里脚钱、折斛钱、土户钱、折绝钱、醋息钱、大军钱、正供钱、余本钱、军器物料钱等等。和买绢帛与和余粮米亦属此类。和买与和余初多按地产多少分别派定，强行征购一定数量，也付一些偿值，但后来竟然白取而不与偿值，再后则将白取绢帛、米粟折算为现钱，勒令交纳，成为一种经常的税务。北宋时期的各种杂征敛至南宋时期亦多沿取。这是宋代社会一个极为突出的经济现象。

（张立生）

宋代的铸铁

(songdai de zhutie)宋代主管冶金的机构有监、冶、务和场。在大的铁矿中心设有四监，次要的矿区设有十二冶和二十务，在较小的铁矿区设有二十五场。宋代铁的采冶以官营为主，民间采冶也有很大发展。采冶地区不断增加，生产规模明显扩大，采冶质量不断提高。北宋初年仅山东兖州莱芜监就有铁冶十八所，冶工 1800 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唐宪宗元和初(806—820)铁岁采收入为 207 万斤，而宋仁宗皇祐中(1049—1054)铁岁得为 724 万余斤，增长两倍多。在河北邢台、河南林县、安阳、安徽繁昌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有宋代的冶铁遗址。其中林县铁牛沟有宋代炼铁竖炉约十一座。安阳铜冶公社残存一炼铁竖炉，周围出土许多炉渣、大量矿粉和炭屑。林县及安阳冶铁遗址中皆利用山坡断崖建炉，既便于装料，又便于出铁、出渣。炼铁炉炉壁是用含硅较高的(红、白砂石)优质耐火材料砌成，具有较高的耐火度。河北邢台宋代冶铁作坊遗址发现炼炉十余处，产品中有许多铸有“丰明”二字的铁斧。繁昌炼铁作坊遗址范围甚广，炼炉作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石块作溶剂，只炼铁块，不铸成品，是单纯的采矿冶炼作坊。宋代(1044)已经有了关于木风箱的记载(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用木扇式风箱代替了东汉时期发明的皮囊鼓风，风量及风压都有明显的提高，强化了冶炼过程。公元十世纪前后，我国冶铁业开始广泛应用煤炭作冶铁的燃料。鼓风设备、炼炉原料及燃料等多项技术措施的改进，对铁的产量及冶铸质量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冀莲芝)

纸币

(zhibi)我国最早的纸币是“交子”。宋初，四川的富商大贾为便于贸易，首先印行“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设益州“交子务”，严禁私人印造，改由政府发行。面额一般为一贯、五贯和十贯等，以七百七十文为一贯。规定分界发行，三年为一界，界满以新换旧。徽宗崇宁、大观年间，政府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改“交子”为“钱引”发行。南宋改称“关子”或“会子”。金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设“交钞务”，仿宋发行纸币，称“交钞”。分大、小钞两种。原定七年为界，期满以新换旧。后由换发“贞祐宝券”、“兴定宝泉”等。金贞祐三年“壹拾贯交钞铜版”就是金代后期发行交钞用的。版头有“壹拾贯”三字，左栏外有“每纸工墨钱捌文足，纳旧换新减半”字样。中间栏框镌有面值、印刷地点、年月日及赏罚办法、流通领域等文字。上栏文中“壹拾贯八十足佰”，标明此张纸币可作八百枚铜钱使用；下栏篆书注明“伪造交钞者斩”、“赏钱三百贯”，是对伪造者和告发者的奖惩。其流通范围，基本上包括金代后期管辖的整个区域。元代禁止民间用铜钱交易。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造“中统宝钞”，面额为十文、二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一贯、二贯等十种。至元二十四年(1287)又发行“至元宝钞”，面额分为十一种。“至元宝钞”一贯当“中统宝钞”五贯，二者并行。明太祖洪武初年，设立宝钞提举司，立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面额六种为：一百文至五百文及一贯。每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此钞发行不分界，不回笼，一直流通一百余年。清咸丰三年(1853)开始印发“大清宝钞”，面额多种。最后由于恶性通货膨胀，于同治初年废止。

(冀莲芝)

宋代瓷器

(Songdai ciqu) 宋代制瓷手工业在唐和五代的基础上,取得了突出成就。瓷窑遍布全国各地,目前在全国十九个省一百七十多个县市发现宋代瓷窑窑址一千多处。汝、钧、官、哥、定是当时的五大名窑。此外,景德镇窑、磁州窑、耀州窑的产品也极负盛名。由于各地瓷窑烧造瓷器的工艺、釉色、造型和花纹装饰各不相同,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瓷窑体系。有定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龙泉窑系和景德镇窑系等。汝窑在河南临汝,是北宋经营的官窑,所烧瓷器的釉色青绿发蓝,器表有细碎开片。1987年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发现了宋代汝窑窑址。钧窑在河南禹县八卦洞,钧窑的突出成就是制瓷工匠在釉料中掺进了铜的氧化物,用还原焰烧成通体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色交相掩映的釉色,称窑变釉。海棠式玫瑰紫花盆釉汁肥厚润泽,色彩艳丽,是钧窑的代表作。宋代官窑是北宋朝廷在开封经办的一处青瓷窑场。窑址目前尚未发现,产品流传下来的很少。官窑青瓷色泽青白如玉,釉质肥润晶莹,器表有较大开片。哥窑制瓷工匠,利用胎和釉在焙烧过程中收缩率的差别,使瓷器釉面呈现出疏密不等,大小不匀的裂纹(即开片)。定窑窑址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和东西燕山村一带。曲阳宋时属定州,因而得名。定窑以烧白瓷器著称,也兼烧绿釉、褐釉、黑釉等品种。定窑白瓷胎薄质坚,釉色洁白莹润,因胎泥中含有大量氧化钛,所以定窑白瓷的釉色呈现出白中泛黄的颜色,且有泪痕。定窑白瓷造型美观,花纹装饰题材丰富,主要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磁州窑是一处规模很大的民间瓷窑。主要窑址在今河北省磁县漳河两岸观台镇东艾口和冶子村附近。这里古代属磁州,故而得名。其产品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特别是白地黑花瓷器,色调对比非常鲜明。器形以盘、碗、罐、瓶为主,还有瓷枕和玩具。瓷枕枕面常绘画出民间马戏图、小孩游戏图等,构图生动活泼,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景德镇(原名昌南镇)窑,始烧于南朝,五代时期烧制白瓷达到了较高水平。宋代所烧青白瓷(即影青瓷)的硬度、薄度和透明度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各项标准。

(刘桂英)

襄樊保卫战与南宋灭亡

(xiang fan baoweizhan yu nan-song miwang) 襄樊是南宋防御蒙古大军南下渡江的重镇，自咸淳三年(1267)起，蒙古军为了征服南宋，派刘整率大军猛攻襄樊二城，战争持续了五六年，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保卫战。宋军采取坚守二城，以援军支持作战的方针，抵抗蒙古军的猛烈进攻。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利用汉水，不断以军队和粮秣支援二城宋军，二城守军则在水道之上架设浮桥，并以铁索护持保持二城的相互支援。后蒙古军夺取浮桥，在岸边设堡控制水路，并于汉水中流筑台，设炮弩断宋军外援，采取围困战术。为了抵抗蒙古军，城中军民也日夜奋战，在水道被蒙古军控制的情况下，宋将张顺与张贵曾以轻舟，浴血冲过蒙军封锁，送去支援兵力与弹药武器，但守军支援主力范文虎部不肯配合，致张顺、张贵战死，援军大败。为攻破樊襄二城，蒙军在围困的同时，针对自己水战力量薄弱的特点，加紧制造战船与训练军士。而宋朝方面，以贾似道为首的官僚极力封锁襄樊二城战斗消息，消极派遣支援军。至咸淳九年(1273)正月，樊城首先被蒙古军攻破，宋军守将范天顺兵溃自杀，不久襄城守将吕文焕率残部投降，襄樊二城保卫战的失败为蒙古军灭南宋创造了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南宋方面依然不顾形势的危急，歌舞奢靡不休。宋军不能抵抗继续南下的蒙古军，大败于池州。此时南宋恭宗赵昀已即位，他年幼无知，太皇太后谢道清与宰相陈宜中执政，一味主张讲和，南宋勤王之军中只有文天祥部能与蒙古军较量。在常州被攻占后，文天祥与张世杰决定在临安与蒙军会战，但被破坏，讲和使者文天祥被扣押。恭宗太后、太皇太后均在临安被攻下后被俘。不久，广王赵昀重建政权，依靠文天祥与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抵抗蒙古军，但终因宋军屡败，无法挽回局势。祥兴二年(1279)张世杰在崖山与元军决战失败，陆秀夫背负皇帝赵昀跳海自杀，张世杰不久也失败，驾船退往海上，溺水身亡。至此，南宋有组织的力量已被消灭殆尽，南宋灭亡。

(张立生)

宋代理学

(Songdai lixue) 宋代哲学的主流，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又可称为道学。因理学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北宋时期的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周敦颐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他将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加以融合，阐述了理学的基本概念与思想体系。邵雍是先天象数之学的创始人，并使之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张载则发展了气一元论思想，为古代中国辩证法两一学说的集成者。二程兄弟是理学的重要代表，他们为北宋的理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宋代理学思想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又称为天理，承认事物的变化。但认为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至，还阐述了天人关系等问题，坚持天人相与的命题。在认识论上比较重视精致的先验论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命题概念，讲求穷理。南宋学者朱熹与陆九渊是理学的发展者。朱熹也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理学体系的完善与阐发上有特殊贡献。他继承了二程的思想，认为理是存在的基础，物质性的气是第二性的，“‘理在先，气在后’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朱子语类》），理的最高境界为太极。但他又认为理无气则不存，气无理亦不能存，二者紧密相关。陆九渊为主观唯心主义理学派别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多与朱熹对立，二人曾发生激烈的辩论。他反对朱熹的读书明理，观察万物以穷理的思想，认为这些均属支离事业，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以“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为核心，把格物致知的命题变为易简功夫，主张发明人之本心，反对著述立说与博取群书。宋代理学的这两派对后来影响较大，王阳明为明代理学代表，他基本上继承了陆九渊一派思想，对后代影响巨大。

（张立生）

沈括与《梦溪笔谈》

(shen kuo yu 《mengxibitan》)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宋代科学家、政治家。出身官僚家庭，23岁左右“以父任为沭阳主簿”(《宋史》卷331《沈括传》)。后擢进士第，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删定三司条例，颇受宋神宗赏识，又曾提举司天监，“括始置浑仪、景表、五壶浮漏，招卫朴造新历，募天下上太史占书，杂用士人，分方技科为五，后皆施用。”(同上)。在河北西路为察访使时，根据实际情况，陈述练兵括马之事，共31条，切实可行。辽派使者入宋，诡辞夺取宋地，沈括取旧牒，示辽使两国以古长城为界的协定图，辽使理屈，不敢再争。又奉命使辽，以所得有关古籍教授从者，遇辽人诘难时，以吏对答，辽人不能欺骗他们。知延州时，收集雄兵，安抚诸镇，打败夏军入侵。由此可知，沈括在政治上是一个十分有才干的人物。据《宋史》记载，沈括博学善文，对于天文、地理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学科无所不通，而且有多种论著，约有40种。现流传者有《长兴集》、《苏沈良方》等几种。价值最大的是《梦溪笔谈》一书。此书为笔记体裁，乃他58岁闲居润州梦溪园时写成。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地质化学、药物，及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常识、工程技术、政治军事等众多方面。其中除他自己考察研究所得外，还收录了许多平民发明家的创造及工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最突出的内容有：天文历法。他在书中记录了发现北极星与北天极距离为三度多，这是他长期观测的结果，从而打破了认为北天极与北极星基本相合的误解。12气历的基本创制思想亦由他在此书中提出。数学物理。他创造的隙积术，是求有空隙堆积体体积的方法，是一项著名的数学发明。还发明了求弧长的会圆术。他还对磁针指南的现象，以及相关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指出了磁偏角的现象，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这种现象的人。对小孔成像、声学中共振现象、反光镜成像以及成虹原理等诸多物理现象作过分析研究。地理地质。他长期考察华北平原情况后，得出华北平原为冲积平原的结论，并第一次采用24至的表示方法构画地图，打破了原有八至方法的局限，使地图准确性极大提高。对地史、矿床生成及矿物质等也作过详细考察，并录入《梦溪笔谈》。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它记载的内容多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与科学研究结果，许多发明家，如毕升等人的创造也得以保存此书中。

(张立生)

印刷术的发明

(yinshuashudefaming) 印刷术是按照文字和图画的原稿，制成印刷品的技术。我国在隋唐之际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宋代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20-1.bmp}

雕版印刷术是在古代印章和拓石技术的启示下，经反复研究试验而发明的。到唐朝晚期，雕版印刷已很流行，并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1900年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唐懿宗咸通九年（868）雕版印刷的《金刚经》，经卷长533厘米，由七个印张联接而成。卷首是释迦牟尼说法图，卷尾题记为“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善施”。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有年代可考的雕版印刷品。雕刻精美，线条流畅，印刷清晰。该经卷于1907年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

雕版印刷术发展到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据记载，971年在成都雕印了全部《大藏经》，雕版十三万块，用了22年时间。与北宋同时期的辽代，也掌握了较高水平的雕版印刷技术。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了一批辽代雕版印刷的佛经、书籍。刻工印工均非常精美，其中竟然还有辽代彩色套印的《南无释迦牟尼像》等绘画作品，是用丝漏印刷方法印制的，用两套版印制，先漏印红色，再漏印蓝色，这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彩色印刷品。

雕版印刷既费工，又不易保存。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做成反体单个字模，用火烧坚，便制成了单个的泥活字，排版时，在四周带框的铁板上，铺一层松脂、蜡和纸灰，按需印刷的书稿拣字排版，排好后的版用火烘烤，使蜡和松脂融化，再用一铁板压平版面，待冷却后，活字固定，便可涂墨印刷了，通常以两块铁板交替使用。印刷完毕，再用火烘烤铁版，待蜡和松脂再次融化，取下活字，以备下次再用。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下了这个伟大创造。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农学家王桢试制成功了木活字印刷法，并创制了“以字就人”的转轮排字盘。明弘治三年（1490），我国已开始用铜活字印刷书籍。明正德三年（1508），我国开始采用铅活字印刷。

（刘桂英）

火药的发明及应用

(huoyao defamingjiyingyong) 火药是我国古代炼丹家于公元七世纪，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发明的。火药发明后，首先被古代军事家所利用，制造出火药武器，用于战争。《武经总要》记有火药配方和火药武器。火药的主要成份是硝石、硫磺和木炭，这是目前世界上所知年代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据记载，唐昭宗天佑元年（904）郑璠攻豫章（今江西南昌）时，曾用飞火攻城，这是我国目前已知使用火药武器的最早记录。飞火是用弓发射的火箭，在箭杆上绑一火药团，点燃引线，用弓发射，以烧伤敌人。宋元时期，人们利用火药所具有的束缚力越紧爆炸力越强的特性，制成了爆炸性火器，如霹雳火球、火蒺藜、震天雷等。这类火器用生铁或陶器做外壳，内装火药，点燃后能发出极强的爆炸力。人们利用火药燃烧的性能，制成了喷射性火器，火箭称其代表。在一长的箭杆上绑一火药筒，利用点燃后所产生的热气流冲击尾部封口向后喷射的力量推动箭支前进。明朝出现了“一窝蜂”火药武器，能同时发射 32 支火箭，杀伤力很强。还出现了“火龙出水”，实际是二级火箭。宋元时期还制成了管状火器，突火枪就是其中的一种，外壳最初用竹筒制成，内装火药和“子窠”（子弹），利用火药的爆炸力将子窠射出，射程可达一百五十步。因竹筒的抗压力有限，且易燃，后改用金属做外壳，称“火铳”。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有元朝至顺三年（1332）铜火铳，长 35.5 厘米，重 6.94 公斤。它的发射原理是，从点火孔装入引线，从铳口装进火药和铁弹丸，点燃引线，使火药燃烧，将弹丸发射出去。小型火铳按木柄用手拿着施放，大型火炮需安装在特制的木架上发射。火药发明后，约在公元十三世纪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20-2.bmp}

（刘桂英）

宋代的航海业与指南针

(songdai de hanghaiye yu zhi-nanzhen) 宋朝的航海业十分发达，造船技术显著提高，对外贸易更加繁盛。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扬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泉州（当时泉州范围很大，几乎包括了福建东南部地区）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商港之一，经常停泊大海船百余艘，小船不计其数。北宋政府在这些重要港口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有关事宜，并征收商税。据记载：北宋政府每年从海船抽取的税款达二百万贯。各市舶司所在港口都设有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蕃坊”。当时由海路来中国通商的，除阿拉伯诸国外，还有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印度诸国。宋政府用金、银、铜钱、铅、锡、丝绸、瓷器等特产与外国商客运来的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玛瑙等进行交换。从宋代各港口到南洋和阿拉伯诸国的航线上，中国的海船很多，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东来，都乐意乘坐中国的船只。并有定期的船只开往亚非各国进行贸易。宋代所造船只，船体加大，结构科学，乘坐舒适。船形一般呈“V”字形，前端尖如楔，底部削如刃，破浪前进阻力小，速度快。全船有龙骨贯穿首尾，船内各舱之间有密封隔板。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现了一条典型的宋朝“V”字形海船残骸，船身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尖头方尾。经研究，原船长约35米，深约3米，排水量400吨。以十二道隔板将全船分成十三个舱。由于航海业的需要，宋代海船已广泛使用指南针辨别方向。据徐兢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记载：“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进，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关于使用指南针航海的最早记录。首先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是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的水浮法指南针，即用磁针横穿灯心草，放在水碗中，借助灯心草的浮力和水的滑动力，使磁针指示南北。这种指南针水面能保持磁针的平衡与稳定，又不受海船摇荡的影响。指南针的应用，不仅解决了恶劣天气时海上航向问题，也为仪器导航开辟了道路。同时充分说明早在十一、十二世纪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公元十三世纪指南针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21-1.bmp}

（刘桂英）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si maguang yuzizhitongjian)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宋代史学家、政治家与文学家。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出身官僚世家,早年中进士科,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事、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等职衔,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首要人物。后退居洛阳15年。宋哲宗继位后,任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主持变更新法,史称元祐更化,不久后病死。死后谥温公。著作极多,现有《司马温公文集》及《资治通鉴》等数种流传。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体裁通史。此书主要部分编写于司马光退居洛阳时期。在此之前,他曾写《通志》八卷,记述战国至秦二世时期的历史,宋英宗阅读后,命他写《历代君臣事迹》,成为《资治通鉴》一书的前身。宋王朝为使此书编写成功,给予司马光以优厚的条件,可以自选助手,观阅龙图阁、天章三馆的皇家藏书,宋神宗因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资治通鉴》《序》)而赐名《资治通鉴》,并预为之作序,并赐以“颖邸旧书2400卷”(《宋史》卷336《司马光传》)。经19年努力,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全部完成。记述事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共294卷。所取材料“其在正史外,……唐以来稗官野史,暨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亦不敢忽也。”(《文献通考》《经籍考》)所采诸家杂史约略222家。《资治通鉴》的编纂是严谨周密的。司马光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均为历史专家,他们分工仔细阅览原始文献,对内容进行抉择辨析,然后写成长编,有些长编相当长,如范祖禹编《唐纪长编》就有600卷。最后由司马光将长编加以删定,形成初稿,如《唐纪长编》经司马光的删定,成为81卷。这种编纂方法是司马光的创举。《通鉴》除本书外,还有《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两书作为辅助。《考异》一书指明了司马光考定史事及年代的依据,并及取舍要点。《目录》一书是《资治通鉴》的提纲。这种著作方式也是司马光的创举。《资治通鉴》发展了编史体裁,为后代开拓了新的编写领域,史料价值极高,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也使古代政治史资料得以系统化。但它过于偏重政治史,疏于制度、社会史。书中史论,以及史料抉择都体现了司马光的社会思想、哲学意趣和史学取向。

(张立生)

绘画

(huihua) 中国画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遗产和独特的风格，各个历史时期的绘画有各自的特点。早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人们便在陶器上以赤铁矿为颜料绘画了动植物纹样和人形图案，形成古朴的原始美术，在甘肃发现的距今五千多年的彩陶，是已知最早的彩绘。1982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一座距今五千年左右房址的地面上画有两个行走状的人，是已知最早的人物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由于丝织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用帛作绘画材料，在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两幅帛画作品，一件定名为《人物龙凤》，一龙一凤引导一成年女子缓缓前行，一件为《人物御龙》，一戴冠佩剑的男子以龙为舟行进在水中，从这两幅画看到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法已经形成。秦汉时期以壁画和帛画最为突出，陕西秦咸阳宫殿遗址已发现壁画，但大量的壁画还是发现于河南、河北、内蒙等地汉代墓室中，内容多是车马出行、乐舞百戏等，很富于写实性，色彩也很鲜艳。但比例不够准确，透视关系也较差。彩绘帛画多以墓主人生前生活及死后升天为主题，既有对人世间的写照，也有对天庭的幻想。此外在汉墓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画像砖以及漆器上的动、植物图案等，都是汉代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流传，在石窟内大量绘制壁画，内容多为佛教题材，特别是佛的本生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如《鹿王本生图》、《尸毗王本生图》等，这时期的壁画注重描绘情节却不注重比例关系，常出现人大于山、马高于树的不和谐场面。除壁画外，还出现了一批在中国传统绘画上取得杰出成就的画家如顾恺之、戴逵、张僧繇等，可惜的是他们的真迹未能传下来。隋唐时期的绘画灿烂壮观，形成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其成就一方面表现在壁画上，一方面表现在人物画中。莫高窟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壁画，不仅比例关系有了明显进步，线条的运用也很成功，如对飞天的描绘，让人感觉她就是飞翔在空中。这时壁画的题材虽然仍是佛教内容，但所绘情景是明显的人间生活，如对西方乐土的描绘完全是贵族家中歌舞享乐的情景，又如画家笔下的菩萨，完全是容貌端庄的姬妾。这是想象与现实的结合，堪称隋唐绘画的一大特点。当时的人物画、山水画都取得很大成就，产生了吴道子、张萱、周昉、阎立本、展子虔等一批著名画家，其中阎立本的《步辇图》等，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山水卷轴画。五代、两宋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表现手法多样，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风俗画都十分盛行，工笔、写意各有创新，形成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高峰。花鸟画家有黄筌、徐熙和宋徽宗赵佶等人。黄筌所绘多为奇花珍禽、用笔工整、细腻。徐熙的作品以野花野鸟为主，采用水墨晕染，轻色淡彩的方法。赵佶学习黄筌的绘画风格，画面具有艳丽富贵的情调。山水画家有北宋的李成、范宽、董源、郭熙、米芾等人，南宋有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等人。北宋多为大山大水全景的风格，南宋则多画河山的一角，这或许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人物画方面以顾闳中、李公麟等最为著名，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堪称广为人知的佳作，它由听琴、观舞，休憩、赏乐和调笑五个既单独成章，又相互关联的内容组成一个长卷，对人物的姿态神情都刻画得恰如其分。李公麟的人物题材极为广泛，现存的《维摩演教图》是代表作之一。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宋代出现了以描写社会现实生活和风俗为题材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元代的绘画艺术，“文人

画”占据了统治地位。文人士大夫画家强调画家应具有文学修养，把绘画作品变成诗、书、画融为一体的艺术形式，从而使中国绘画艺术更富民族特色。著名画家有赵孟頫、黄公望、倪瓚、王蒙、吴镇、王冕等人。梅、竹、兰、菊“四君子”是非常流行题材，这和它们寓意的气节有关。再一个重要题材是道教的人物故事画，如山西永乐宫的壁画就细致地描绘了钟离权开导说服吕洞宾入道的情景。明代画风趋向复古，创新不多，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陈洪绶等是较杰出的代表人物，清代阶级矛盾十分复杂，于是寄情山水花鸟的作品较多，众所熟知的郑燮、金农、李 等“扬州八怪”是一批敢于表现个性、勇于创新的画家。一些为宫廷御用的画家则以帝王的活动为内容，带有纪实性地画了康熙、乾隆等多次巡游江南的长卷，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清代高其佩以手指代笔，所作指墨画，堪称一绝，成为画坛中的一技奇葩。

（齐吉祥）

清明上河图

(Qingming shanghetu) 北宋画家张择端所作，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22-1.bmp}
全画长 528 厘米、高 24.8 厘米，反映了北宋晚期的人民生活和社会风貌。画面从北宋都城汴梁的郊野开始，疏林薄雾掩映着农舍田亩，小道上毛驴缓行，一派宁静的气氛。接着进入交通运输繁忙的汴河及跨河的虹桥，桥上车马喧阗，人往如梭。离开虹桥，一条大道通向城门，进城以后便是繁华的街市，即汴梁的东大街和十字路口。东大街路北朝南是一座酒楼，门左首有个写着“香醪”的牌子，屋角柱子上用扞挑着“孙羊店”的市招，三楼上有人对饮。门前有卖物的小摊。路南有“久住王员外家”住宅和“李家”的店铺。十字路口北边坐西面东的是卖香料木的店铺，挂有“刘家上色沉檀”等字样。从十字路口一直往北，是一家门面颇大的绸布店……街上有推车的、乘轿的、聚谈的、闲逛的、买卖的、赶路的等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他们姿态不同，神情各异。这说明作者不仅非常熟悉生活，而且有相当高的表现能力。以往诸多文章均说此图共画了仕、农、商、医、卜、僧、道、胥吏、缆夫等人物 550 余位，经重新统计应为 740 多人。“清明”二字非指清明节，而是指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天下太平。

(齐吉祥)

辽朝

(Liaochao) 10世纪中叶东北地区契丹族建立的封建皇朝。契丹为古代东胡一支，北魏以来活动在今辽宁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一带。唐时，在与突厥族斗争中形成部落联盟，唐曾于他们活动地区设松漠都护府。唐末，契丹部落渐趋强盛，多次参与中原政治斗争，夺取土地、人口和财富。天祐四年(907)耶律阿保机当选为可汗，设立了宿卫军等，把握了稳固的权力。贞明二年(916)，他设法控制各部落领袖，废除部落联盟制度，称天皇帝，建立契丹国，建年号神册，建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以后国号有时称契丹，有时称辽。辽主要因辽河流域得名。契丹国设南北面官制，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卷45《百官志》)北面官主治契丹事务，其中亦有南北区别。南面官主治汉族，设三省六部。制度设置基本是损益晋唐旧制。北面官多由地位显赫的家族世选，南面官依据科考或其他途径选用汉人和契丹人参用。北南面官制设立于太宗时期，太祖耶律阿保机曾设斡鲁朵宫帐，斡鲁朵即皇帝宫帐，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和州县，皇后也可有自己的斡鲁朵。契丹兵制有禁军、部族军以及乣军等，凡辽民15岁以上，50岁以下均选入兵籍。法律设蕃汉二律，以“凡四姓(契丹、奚、渤海、汉)相犯皆用汉法，本类自相犯者，用本国法。”(《辽史》卷61《刑法志》)为原则。契丹国的赋役与行政措施也基本分为契丹、汉两类。地方行政区划中，有头下军州的设置，辽的亲贵、外戚、大臣及部族首领有战功之人，建州县以所分得或所俘人口聚居，有手艺的从事手工业，会农耕的居于农耕区。农耕者既要向头下军州的贵族纳实物地租，又要向辽纳课税。贵族除节度使一职以外，可自选官吏。州内除酒税以外，其他税收归头下军贵族。至10世纪末叶，头下军州已渐归辽政府直接管理。契丹建国后即向周边发展，神册元年，耶律阿保机南下夺取土地与人口。后唐建立后，契丹继续南下侵唐，天显十一年(936)太宗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助其灭亡后唐。又于会同九年(946)灭亡后晋，据有燕云十六州之地。太祖天显元年(926)还灭亡渤海国，建属国东丹国，至辽穆宗应历二年(953)，东丹国被废除，统一于辽的统治下。宋建立后向北发展，辽支持北汉与周、宋对抗。宋灭北汉政权，辽始与宋对峙，经过几次大的战役，辽与北宋、夏成鼎立之势。高粱河之战是北宋与辽第一次大战，宋太宗欲借灭亡北汉的有利时机夺回幽燕之地，但在高粱河地区被辽击败。雍熙三年(986)宋再次进攻辽，史称雍熙北伐，又被辽军击溃。统和二十二年(1004)，圣宗亲征北宋，至澶州城下，宋与辽构和，史称澶渊之盟。此后，两国战争渐少。契丹统治者内部斗争激烈，应历元年(951)贵族蔡割刺杀世宗，自称皇帝，引起内部斗争，史称蔡割政变。寿安王璟平定叛乱后即位。后又有钦哀后政变，重元叛乱等。辽末年贵族间的斗争，各族人民的频繁起义，都沉重地打击了辽的统治基础。辽的贵族日益腐化，军队战斗力减弱。金国建立后，辽无法镇压，先后在宁江州、出河店等战役中失败，更加无力抵抗金的进攻。保大五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23-1.bmp}

年(1125)天祚帝西逃途中被金俘获，辽灭亡。契丹人最初从事渔猎畜牧业，畜牧业是契丹重要的经济部门，后太祖采纳汉人韩延徽建议，安置被俘汉族农民耕垦，夺得燕云十六州后，多次募垦耕，成为农业生产的基地。农耕技术有所创造，西瓜也被引种进来。手工业中，冶铁占极重要地位，纺织业以

燕云十六州和原渤海地区为基地，在唐五代基础上有所发展。制瓷业较突出，有著名的辽瓷，发展了唐五代的工艺。太祖建国后即令人造契丹文大字，后又有小字出现，但主要在文人中使用。佛教极流行，雕凿石经，校印佛藏，建筑寺院都使佛教文化深入到社会深处。儒学也有所继承发展。辽印制的书籍，在装帧、印刷、用纸等方面均超过了唐五代的水平。辽的雕塑、建筑、绘画均有特色，诗歌风格承自唐，亦有很多创作。辽的疆域在太宗时（927—947）基本奠定，南至今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东北直到黑龙江以北；西北至蒙古草原以西，西至今甘肃张掖地区。辽亡以后耶律大石西迁重建契丹国，史称西辽，后灭亡于蒙古汗国。辽传9帝，210年。辽朝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王朝，对奠定中国北部、西北部广袤疆土，弘扬中国的声威，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立生）

耶律阿保机

(Yelü'Abaoji) 辽国开国皇帝，史称辽太祖。汉名亿，小名为啜里只，为契丹迭刺部首长。初为挾马沙里（“挾马，人从也。沙里，郎君也。管率众人之官”。见《辽史》卷160《国语解》），带兵降服小黄室韦，又征伐越兀及乌古、六奚诸族，契丹人呼为阿主沙里（阿主意为父祖）。后又任本部夷离堇（部落长之号），专事征伐之职，升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大迭烈府即迭刺部之府）。曾率兵到蓟北。奚迭刺部兴起后，任于越，位居北南大王上（于越，贵官，无所职），总知军国大政。梁开平元年（907）为契丹大首领，以皇族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设官统领部众。梁贞明二年（916）建立契丹国，自称帝。率部众建都城皇城，即后来的上京，京中建孔子庙、佛寺、道观等。他立国后，渐以宗室为南府宰相，制定法律，颁定官爵位次。设立迭刺部南北二院夷离堇，成为后来的定制。又命人制契丹大字，弘扬民族文化。他在位之初，以部众设立宫卫骑军及州县部族军，成为契丹主要军队组成形式。他有雄才大略，不断征伐契丹及突厥诸部以图发展，又积极参与中原政治斗争，侵夺幽、蓟等要地，扶植东丹国为属从。“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辽史》卷2《太祖纪》）。他创设的诸种制度与开创的规模，都为后来契丹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天显元年（926），征服渤海，带军还皇都途中病逝于扶余（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部），谥号为升天皇帝。

（张立生）

南面官与北面官

(nanmianguan yu beimianguan) 辽设立的统治制度。辽的疆域辽阔，号称幅员万里，居民成份有突厥诸族、女真人及汉等，为了治理人口构成复杂的国家，创立南北面官制度。施行、创立于辽太宗时期。设立原则为“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辽史》卷 45《百官志》）其制北面官设北枢密院、南枢密院、北南二大王院、夷离毕院、宣徽院、敌烈麻都司等机构，分别相当于汉制的兵、吏、户、刑、工、礼部等六部之制，北面官中的南北之分源于辽俗，辽俗以西为上，故两翼以南北言之。北面官职掌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辽史》卷 45《百官志》）。南面官制设置仿照唐代或晋代诸制。辽太宗初入汴时，始设枢密使，因晋之制以掌汉人之事，天禄四年（950）建政事省，南面官制始立，设有三公、三师、三省及六部、台、寺、院、监，并设有诸卫、东宫的各种机构。汉人枢密院“因晋置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初兼尚书省”，是汉人官制中的重要机构，又由契丹汉儿司变化而来。南面官制除朝官设立如上外，还有“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咸在方州，如唐制也。”（《辽史》卷 47《百官志》）“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同上）。北面官均为契丹贵族担任，但不世袭，而是因才而举，名号极多，时有损益，实质上也是沿用唐晋之制。南面官仍沿用汉人习俗，以考试等方法选拔士人担任，南面官的权力远不及北面官。

（张立生）

辽与北宋的和战

(liao yu beisong de hezhan) 辽建国在五代之际，位于今东北地区，后扩展其疆至长城以北以西，今河北北及北京地区也在辽版图内。北宋建立后曾向北发展，恰与辽国利益相冲突，此时的辽朝也正想南下扩展，势力正盛，两国间遂发生战争。有几次较著名的战役。景德元年（1004）以后虽有战斗，但总的趋于和缓。高粱河之战是辽宋第一次交战。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为统一中国北方，率军攻打北汉，辽派使者前来质问，宋太宗以“河东逆贼，所当问罪”作为回答（《辽史》卷9《景宗纪》），表示不怕与辽作战。待北汉政权垮台后，宋太宗欲以胜利之师攻取幽蓟，大军至高粱河一带与辽军相遇，辽军因仓促迎战，先失利，引起幽州城内恐慌，几乎不能守住，但辽后援军队及时赶到，由两翼反击宋军，宋军溃败，辽军直追至涿州城下，宋太宗乘驴车逃回，遗弃车马器仗以万计。此战之后，辽多次主动向宋挑战，夺取所需战略物资，掠取手工业人口和土地。宋雍熙三年（982）北宋政府乘辽主年幼，母后主政的时机，发兵北伐，史称雍熙北伐，军分三路，以河北曹彬军为主力，以山西潘美军、河北田重进军为两翼，想夺取辽的南京。两翼军作战顺利，势如破竹，连夺重镇，中路曹彬则先胜，后退守待粮草。辽圣宗率军支援保卫南京的辽军。曹彬军冒险出战，被打败，辽夺得甲冑军仗无数。萧太后又率军击溃山西宋军，俘虏杨继业。雍熙北伐失败。它说明辽与宋势均力敌，辽稍占上风，从此宋再无力北上。景德元年（1004），萧太后率20万辽军南伐，宋朝野震惊，甚至欲迁都于金陵，宰相寇准力主宋真宗亲征，鼓舞士气，真宗始行至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射杀察看地形的辽大将萧挈，辽军士气受挫，遂与宋主动议和。宋保证每年向辽输送银10万两，绢20万匹，约为兄弟，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此次战役以和谈为结果，所订之盟称澶渊之盟，是一个屈辱性的盟约。但此次战役后，辽的国势渐衰，不再向宋大举进攻，两国关系转入稳定时期，虽有小战，均与大局无关。宋也不敢再议北伐。两国在河北等地边界处设榷场，辽从宋输入茶、绢、瓷、漆器、药品等物。宋则从辽输入羊马、盐、布、驼等物产。

（张立生）

辽的五京与五京道

(liao de wujing yu wujingdao)辽都为五京制。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国都临潢府位于今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南波罗城,耶律阿保机时始建,初为辽朝中枢机关所在地,后中枢机构迁出,为上京道治所,称临潢府。中京位于今辽宁凌源以西,原为奚王牙帐所在地,辽圣宗时建立,号为中京,府为大定,辽中枢机构后多迁入中京,皇室即于此京居住,皇帝接见使者也在此地。南京析津府,位于今北京地区,南京原为渤海辽阳,即今辽宁省辽阳,天显三年(928)时设,府号为辽阳府。天显十三年(938)改为东京,同年晋“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献”,辽据有燕,于是以燕京为南京,开泰元年(1012)南京又改为燕京,府称幽都。东京即今辽宁辽阳,唐曾于此地设安东都护府。原为渤海国故地,辽太祖征服渤海,于此设东平郡,天显三年为南京,天显十三年改称东京,府为辽阳府。西京大同府,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原为后唐大同军节度使驻地。后晋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为赂,大同来属,因建西京。”(《辽史》卷41《地理》)时在重熙十二年(1044),府称大同府。辽以五京为地方区划中心,分全国为五个道,简称为五京道。上京道辖府1;节度州8,祖怀、庆、泰、长春、仪坤、龙化、饶;观察州1,永;刺史州2,乌、降圣;头下军州14;边防州、城9。“上京,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给畜牧。”(《辽史》卷37《地理志》)东京道设留守司、户部使司、都总管府等机构,辖府2,辽阳、黄龙;节度州21,开、保、辰、兴、海、淶、显、乾、贵德、沈、辽、通、双、同、盛、信、宾、懿、苏、复、祥;观察州3、防御州4、刺史州24;其余府州军城13。中京道,设有留守司、度支使司、都总管府等机构,号称:“幅员千里,多大山深谷,阻险足以自固。”(《辽史》卷39《地理志》)辖府2,大定、兴中;节度州6;成、宜、锦、川、建、来。府、节度州下辖观察州3,刺史州13。大定府中还设有接待宋使之大同驿,接待高丽使者的朝天馆,接待夏使的来宾馆。南京道设留守司、三司使司、转运使司、都总管府等,辖府1,折津;节度州1,平州;节度州下辖刺史州8。西京道辖府为大同;节度州为丰、云内、奉圣、蔚、应、朔6个,刺史州有宁边,东胜;其余州、军2。《辽史》《地理志》分别记载了五京道及五京设立的情况。

(张立生)

西夏

(Xixia) 11世纪初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皇朝。党项是古代羌族一支，很早便生活在西北地区。唐代受节制，唐末叶出兵支持唐，首领拓跋思恭受赐姓李，占有银、绥、甘、夏、静、宥等5州之地。宋初，党项族在与吐蕃、回鹘的斗争中强大起来，赵宋赐党项首领姓赵。赵元昊任党项首领后，势力伸展至河西走廊一带。景祐五年（1038）建大夏，元昊称帝，建都兴庆（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又称上白国，北宋因其地处西部，称西夏。西夏建立后，设立了自己的各项制度。官制有两套系统，一套系统为党项官制，主要负责党项及汉人以外诸族事务，有宁令、漠宁令、丁卢、丁弩、素贲、祖儒、吕则、枢铭等官职。另一套为汉官制，仿自北宋，有省与枢密院设置，又有官计司、农田司、群牧司、磨勘司、飞龙苑、文思院等机构。党项官除由贵族担任外，也自蕃学中选拔人才担任职务。汉官制中诸官则由蕃汉分别担任，汉士人仍进行科考。仁宗时，汉制渐成为主要政治制度。西夏军队有擒生军、侍卫军和地方驻军。擒生军约10万，是夏军精锐，设有炮手，称泼喜迭，主要负责在战争中夺取生口。侍卫军由选拔的豪族子弟善骑射者组成，约5000人，号“御园内六班直”，分番宿卫。它又是一支质子军。部落首长统率各部兵为地方军队，称“溜”。全国有左、右厢十二监军司，分别委任豪族统之，监军司仿宋制立军名，设都都统、副统军、监军使等职，均由部落中贵族担任。有事政府以银牌招部落首领听节制。党项人以帐为单位抽兵，大致每二丁取正、负担各一人，组成抄。在礼仪上，西夏不再采用宋制，皇帝采择回鹘汗与吐蕃赞普服制，平民以青绿色衣分别贵贱等级。但文官基本仍用宋制。又仿宋制制朝仪、礼乐等。毅宗时，下令改用汉礼，不再使用蕃礼。西夏文字制成后，建党项学，即蕃学，选择党项与汉官僚子弟入学。夏建立初与宋、辽进行了激烈斗争。同宋的大战争有三次。夏宣布建立，宋朝野务以剿灭为事，下令削去元昊所受官爵，募人擒杀元昊，派兵将备战。初战宋将狄青败夏军，夏损失帐2000余。康定元年（1040），元昊率军于三川口大败宋军，次年元昊进攻渭州，在好水川再次打败宋军。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元昊攻镇戎军，宋将葛怀敏阵亡，宋军又败于定川寨。宋连续失败，接受元昊建国时提出条件，册元昊为国主，每年赐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后银增加2万两，绢增加2万匹，茶增加1万斤）。此后，夏宋之间交往较多，但战争亦时有发生，夏多次主动进攻，以夺取土地、人口。夏建元之初与辽亦有战争。夏辽以大河相隔，原处于辽统治下的党项族，在夏建国初多叛辽附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辽兴宗率骑兵10万攻夏。夏军退拒贺兰山，谢罪，辽将不允，元昊率军突围反攻，辽军大败。辽与夏和议。西夏经与宋辽的战争，确立了地位，形成与北宋、辽鼎立的局面，但多依辽抗宋。后又与金订约，乘金攻宋的时机，夺占宋地，与南宋、金成鼎立之势。西夏也与吐蕃国相邻，毅宗曾多次出兵攻入吐蕃边地，拓展土地。蕃部在哆讹等领导下，曾于大庆四年（1143）举行起义，较大的部队约万人，较小者也有五六千人，夏仁宗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乾祐元年（1170），权臣任得敬迫仁宗分夏之半为他建立楚国，并请金给予封号。金朝未允，在金支持下仁宗以计杀任得敬，宋联合任得敬夹击金的阴谋也破产。史称任得敬分国。夏自建立起，皇族与后族的斗争就较明显，成为左右夏政治的重要内容。蒙古兴起后始侵入夏，夏初联金以抗蒙，应天四年（1209）

蒙军围攻夏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金拒不支援，夏改变策略，附蒙攻金，配合蒙古大军作战。又与宋联合。但由于蒙古的压榨，夏国上下难以忍受，又因蒙古汗国决意灭夏，夏又改变策略联金抗蒙。乾定四年（1226）成吉思汗亲征夏，夏军连败，次年夏献宗投降，西夏灭亡。畜牧是西夏的主要生产部门，畜牧地区主要在银、夏、盐等州及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额济纳一带，河西走廊的凉州也为畜牧业中心，有“畜牧甲天下”之称（《金史》卷134《西夏》）。农业为另一主要经济部门，最初党项野利部人经营农业，后国土扩展，凉、甘、肃及河西走廊的农业区归入夏，农耕比重渐大。汉、蕃部、吐蕃人中的农业人口成为夏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夏的农业水利事业很发达。手工业以皮毛制造业最突出。金银饰、钢铁业、瓷器、竹雕等行业也有一定水平。文化事业，儒学渐深入，有许多用西夏文译的儒家著述。佛教文化亦较深入，有许多西夏文译的佛经，建筑了许多寺院，佛教礼俗深入社会生活，宫廷也得到很大影响。夏文化中有特色的主要是诗歌创作。夏疆域极盛时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青海东北、内蒙西南及新疆部分地区。共传10帝，190年。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26-1.bmp}

(张立生)

西夏与北宋的和战

(xixia yu beisong de hezhan)西夏建国正值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由于夏本为北宋属地，西夏的建立是经过与北宋的艰苦斗争取得的。景祐五年(1038)李元昊建国，北宋王朝大为震惊，朝野议论纷纷，大旨以讨伐叛逆为论，宋仁宗遂派遣兵将准备征讨，并下令削去元昊所受官爵，募征壮勇，缉捕李元昊。在这种情况下，西夏也积极备战。宝元元年(1039)，宋保安军狄青率军与夏军作战，揭开了宋夏之战的序幕，此战夏军失利，损失帐幕2000余。第二年夏军攻取北宋延州，生擒都监李士彬于金明寨，又在三川口设伏，再擒宋朝援军大将刘平、石元孙，取得巨大胜利，史称三川口之战。此战之后，宋与夏作战屡败。康定二年(1041)宋朝名臣经略陕西，派大将任福保卫渭州，夏军与宋军在好水川再次决战，宋将任福战死，夏军又取得胜利，史称好水川之战。次年夏军再次主动出击宋军，宋将葛怀敏等14名官员战死定川寨，宋军大批被俘，夏军乘胜夺取渭州战利品而还。经这几次大战役，宋军失去对夏取胜的信心，终于接受元昊的建议，进行和议，从此确立了夏与宋的关系。当时夏也因国小，力量不足，而且战争又使经济受到损坏，难以与国土辽阔的宋争雄，提出和议。和议确定：夏对宋称臣，宋册封元昊为西夏国主，每年赐夏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并准沿边开设榷场，以相互贸易。和议后夏与宋关系一直较稳定，战事时有发生，但均不重要。

(张立生)

元昊

(Yuanhao 1004—1048) 夏景宗，西夏开国皇帝。西夏王李德明之子。小字嵬理，更名为曩霄。称帝前改唐宋所赐姓，为嵬名氏，自诩为青天子，即所谓兀卒。曾受宋封赏，为难定军节度使，袭爵西平王。宋初党项发展较快，社会各方面均较成熟，他适应发展需要，建立了党项的国家夏国。在位时继续对宋、吐蕃、回鹘作战，连续夺得胜利，扩展、确立了夏的疆域。实行了许多利于夏发展的政策，倡导农业生产，注重手工业，尤其是铁冶业的生产发展。强调党项的风俗习惯，曾下令居民依照羌族原有习俗秃发，禁止盲目学习汉人束发习俗，下令废弃唐宋所赐李赵姓氏，改用党项名氏；又去除宋所赐爵号，称党项语首长名，建立自己的年号。夏的官制、军制、礼仪均在他指导下设立起来，能不拘民族成份，任用汉人中有才能者。西夏文字也是他命野利仁荣创制的。据史书记载，元昊很有智谋，擅长于法律、兵法、佛法、汉文等学问，20岁便领军作战，英勇机智。宋庆历八年（1048），由于他实行的建国方略与一部分贵族的主张有矛盾，具体表现为皇族与后族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被儿子宁令哥于此年刺杀。死后谥武烈皇帝。是党项的民族英雄。

(张立生)

金

(Jin) 12世纪初女真人建立的封建皇朝。女真人很早就生活在东北地区，历史悠久。10世纪以来，大多数处于契丹国统治下，以部落氏族为单位分居各处，有生女真、熟女真的区别。11世纪末叶，辽统治衰落，女真部落渐兴起，其中完颜部在乌古论等领导下，吞并诸部，向外扩展，形成强悍的部落联盟。完颜阿骨打继为部落长后，率女真人反抗契丹统治，先后在宁江州、出河店等战役中取胜，确立建国基础。天庆五年(1115)正式建国，国号金，年号收国。建都于今黑龙江阿城南，称会宁府。与西夏联盟，又于天辅十年(1120)订立金宋夹击辽的盟约，史称海上之盟。但宋朝无力按约收取燕云之地。金灭辽后，积极南下侵入宋。先后两次入侵，第一次在天会七年(1125)，在北宋军民共同抗击下，掠取财物北还。靖康元年(1126)宋背约，金再次入侵，包围开封，次年立楚，俘北宋徽宗、钦宗及百官、宗室3000人北还，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赵构重建宋朝后，金军追至杭州，在镇江及黄天荡被宋将韩世忠困住，史称黄天荡之战。金又立齐政权统治中原和陕西，作为属国，不久废除。天眷三年(1140)金再次侵入南宋，宋军取得顺昌、郾城大捷，几乎失去对中原的控制。后因宋内部矛盾反败为胜，开始与宋对峙，订立绍兴和议。皇统九年(1149)完颜亮夺得皇位，迁都至燕京，完成了金走向中央集权的进程。贞元三十一年(1161)他率军南下，准备灭南宋，但在采石之战被击败，他也被刺杀。宋隆兴二年(1164)与宋订隆兴和议。宋嘉定元年(1208)又与宋订嘉定和议。至此金与南宋的战事告一阶段。金建立初年设勃极烈制度，金太宗时又设立汉官制，至金熙宗时废除勃极烈制，采用汉制。天眷元年(1138)推行新官制，史称天眷新制。正隆元年(1156)海陵王完颜亮再次改制，史称正隆官制。金朝制度经此次改后，基本确立。金兵制初建猛安谋克兵，金太宗时模仿辽宋制度进行改革，设元帅府。海陵王废元帅府，仿汉制设枢密院。金建立后内部有较激烈斗争。海陵王曾于皇统元年(1149)发动宫廷政变，刺杀金熙宗。正隆六年(1161)他也被刺杀，金世宗在此前已发动政变即位，史称东京政变。女真人原以渔猎为生，建国后土地拓展，农业随之发展，出现了“天下治平，四民安居”的景象(《金文最》卷69)。金的农业工具水平已超过契丹时期，如犁的灵便性即比北宋时好。河北、山东等地的荒地大量开垦出来。水利事业也有发展。熙宗时期手工业恢复发展，制瓷业是较为发达的手工业，金代定瓷工艺水平发展显著。金代造纸与印刷业发展也较显著。金在印刷业中心平阳设有专门机构的管理民营书坊和书铺。铁冶、制盐业均为重要手工业。13世纪中叶蒙军始攻金，金此时的政治极为腐朽，军队作战能力降低。在蒙古侵金同时，金朝发生红袄军起义，遍布山东、河北等地区。至贞祐三年(1215)起义才陆续被平息或招降。正大六年(1229)蒙古大举攻金，金在庆阳、卫州等地与蒙军激战，正大九年发生三峰山之战，金军全部溃败，主要将领大部战死。同年蒙军围攻汴京，天兴元年(1232)金哀宗退出汴京，至归德时，蒲察官奴杀政敌，史称归德变乱。哀宗退往蔡州。哀宗连续逃跑主要原因在内部抗蒙策略不明确，使金失去抵抗信心，天兴二年蒙军围困蔡州城。次年，哀宗传位给元帅承麟，蒙军破城，哀宗自杀，承麟被乱兵杀死，金亡。金最盛时疆域，东北至今日本海和鄂霍茨克海岸，统治外兴安岭地区，西至陕西与西夏交界，南方以淮水为界与南宋接壤，西北控制蒙古草原。共传10帝，

120 年。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27-1.bmp}

(张立生)

完颜阿骨打

(wanYian ' Aguda 1068—1112) 金朝的开国皇帝，汉名，史称金太祖，女真完颜部首领劾里钵次子。“幼时与群儿戏，力兼数辈。举止端重，世祖（劾里钵）尤爱之。”（《金史》卷2《太祖纪》）。成年后助父征战诸部，确立了完颜部在女真联盟中的首领地位。乌雅束任部落联盟首领时，他主掌军政大权，加强了完颜部的实力。乌雅束死后，他任女真诸部的都勃极烈（即都部长），率女真人反抗契丹国的统治，在宁江州、出河店两次大战役中，指挥女真人大败辽兵。将女真人“诸路以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金史》卷2《太祖本纪》）组织起来，收国元（1115）年即皇帝位，建立金国，指挥女真人打败镇压的辽军，又攻打高丽等地区。改变女真人习俗，不许同姓为婚，倡导农耕。又创立统治制度，命完颜希尹制女真文。《金史》卷2《太祖本纪》称他“英谟叡略，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人乐为用”。他所确立的基础为金朝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进攻辽的过程中，与北宋联盟，收取幽燕之地，后又背盟自据，为后来金向南方发展打通了道路。天辅四年（1112）率军西逐辽天祚帝，途中病死于浑河北堵泺，谥为武元皇帝。他是女真的民族英雄。

（张立生）

金在北方的统治

(jin zai beifang de tongzhi) 金朝原占有东北地区，在灭辽、灭北宋以后拥有淮河以北的大片中原地区。金在北方地区的统治制度也相应发生变化，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熙宗以前。金太祖时基本上依照本族制度进行统治，设立勃极烈官制与猛安谋克的社会组织，占有原属辽的地区后，沿袭辽的南北面官制，进而采用三省之制。《金史》卷 55《百官志》记载了当时的一些情况：“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天辅四年（1117）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天会四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金太宗对金太祖制定的原则有所修改，始自天辅六年（1122）侵入燕云地区，但基本仍为双轨制。在此一段时期内，女真贵族以严刑峻法统治北方，禁止汉人服汉服，强令削发等措施与索取北方汉人为奴的法令也时有施行。金灭北宋后，拥有中原北部广大区域，先后扶植了附属政权楚与齐，“忠献（宗翰）惧亟取则百姓难以政化，故先立张楚，次立伪齐。”（《大金国志》卷 24《宣宗纪》）此时期在北方还有契丹的部族制社会组织存在。女真统治者也渐认识到中原北部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曾鼓励农耕。如天会元年“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穡”（《金史》卷 47《食货志》）。此时期特点是面对现实，随时改制。金熙宗以后为第二个时期。此时金在制度上全面推行汉制，改变多种制度并存状况，废弃勃极烈制度，地方遵宋、辽旧制为路府州县四级，废弃了齐国，设行台尚书省等机构。猛安谋克的社会组织也在汉人、渤海人中废除，改为计口授地，进行农业生产。天眷元年（1138）实行天眷新制，基本采用了新官制，废除了辽宋的一些旧制。官制系统至此基本完善，稍用辽、宋法。此时倡导农业，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解放一些奴婢。海陵王时期（1149—1161）是金对北方统治彻底改变面貌的时期，进一步实行适应广大地域统治要求的措施，在北方继续实行猛安谋克南徙，计口授地的政策。务农时，兴水利，治水田，发展矿冶等手工业，并迁都燕京。世宗以后金已完全封建化，对北方的统治也基本属于封建政治的内容。即加强皇朝政权力量，设官分职，注重农业、手工业管理等。

（张立生）

金朝的灭亡

(jinchao de miwang) 金至章宗时(1190—1208)发展至极盛,然而也正是由此时期始,金朝开始走向衰败。此时金朝的政治与经济早已封建化,这是它强盛的根本原因,但它也继承了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端,统治阶层日益腐化,侈奢之风日炽。经济因连年的自然灾害受到严重打击。宣宗继位后,企图挽救局势,但终因内部斗争严重而失败。女真官吏与军队原有的顽强,富有创造精神的时期已过去,组织涣散。此时蒙古部发展起来,不断围攻金朝,金在政治、军事上均不能抵御入侵,不堪忍受压榨的农民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动摇了金的基础,同时向南方扩展土地以求苟且的企图也失败。邻国西夏乘机吞并金的疆土。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蒙古再次攻金。开兴元年(1132)蒙古军破汴京,金哀宗逃往蔡州,金朝上下人心惶惶,无心再战,此时金朝已是“区区生聚,图存于亡,力尽乃毙”(《金史》卷18《哀宗纪》)。天兴二年,蒙军击溃金军抵抗,围哀宗于蔡州,守城金军进行了顽强抵抗,至天兴三年正月哀宗传位于完颜宗绪。蒙军攻破蔡州,杀宗绪,金灭亡。

(张立生)

辽、夏、金的文字

(liao xia jin de wenzi)辽、夏、金朝根据本民族语言特点，借用汉字或回鹘文字的笔画、形式分别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称契丹文、夏文和女真文。

辽创制的契丹字有大小两种，大字为辽太祖时突吕不创制。《辽史》卷75《突吕不传》谓：“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契丹大字是依据汉字隶体偏旁为之，几个音符构成一个方块字，约成于神册五年（920）。契丹小字由迭剌创制。相传迭剌熟悉回鹘字，故仿而为之。小字的字体仍为方形，但笔画简单，不再以方体字为单位，而是以方体字为一字缀，几个形成一个契丹字，略似拼音，书写形式自上而下。契丹大小字均已失传，编译的汉文著作也多散佚，现保存下来的多数是石刻摩崖或碑碣。当时大小字多在契丹文人中使用。

夏所创制文字称西夏文，创制者是野利仁荣，约有6000字左右。字体有篆、楷、行、草几种，元时仍存在，称河西字。明代也印行过西夏文佛卷。西夏文字体结构似汉字，也为方形，字笔画多左撇。造字以会意合成，会意字较多。多直接从音意上借用汉字，结构可分为干、头、下、左、右等部位。《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音同》等字学书籍现仍存，西夏文文献保存下来的也较多。西夏文创制后，多使用于公私文书，经卷也多有西夏文印制者。西夏文碑刻亦多。

女真人建国初期无文字，常利用契丹文字读写女真语，所谓“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金史》卷73《完颜希尹传》）后金太祖阿骨打命观都之子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字，完颜希尹仿效汉字，根据契丹文的创制原则，合本国语，制出女真文。天辅三年（1119）颁行。这是女真大字。“其后熙宗亦制女真字，与希尹制字俱行用，希尹所制谓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金史》卷73《完颜希尹传》）。小字颁行于天眷元年（1138），使用于皇统五年（1145）。现可见女真字仅一种，不知是大字，抑是小字。女真文曾用来编译大量汉文书籍，但均已失传。明代仍有女真文使用，有《华夷译语》、《女真译语》等字书，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也录有明代女真文。现还保存许多女真文石刻，镜、印、牌符等题识亦多见。

（张立生）

元

(Yuan) 中国古代封建皇朝，古代蒙古族乞颜部孛儿只斤氏贵族所建立，一般泛称忽必烈建国号至元顺帝出亡为元朝。蒙族祖先为古代东胡室韦的一支，早就活动在亚洲北部地区，蒙古部兴起于鄂嫩河与克鲁伦河流域。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乞颜部贵族铁木真完成蒙古高原的统一，建立蒙古汗国。建国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连续向邻境发动进攻，先后灭掉夏、金等国家。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大汗位，先后平定阿里不哥、李璘的叛乱，与蒙古诸王间的战争也不断发生。至元八年（1271）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正式建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于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亡南宋，统一中国。此后，元曾两次入侵日本，均失败。又渡海攻占城、爪哇，进攻安南、缅甸等国家。忽必烈死后，元朝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不断，曾先后发生南坡之变和两都之战。元朝制度多沿用金朝，也保留了一些蒙古旧制，忽必烈在中统、至元年间的创设，奠定了有元一代制度。皇朝官制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组成，中书省相当金代尚书省，统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兵，御史台掌监察。宣政院为管领全国释教及吐蕃地区军民政务的特殊机构。忽必烈即位初，设十路宣抚司为派往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又以都省官员“行某处省事”系衔，到地方行使中书省职权，至元后期，行省渐成为常设性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离省治较远地区设宣慰司等。御史台也派有行御史台到地方，有时枢密院也派有行枢密院机构。行省以下设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行省以下行政机构一般派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达鲁花赤一职，在管军机构也有设立。又以色目人为同知，汉为总管、知府（尹）、知州（尹），以相互制约。元朝兵制为两大系统，即宿卫军和镇戍军两种。宿卫军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组成，怯薛军常在万人以上，宿卫禁庭并任事役，侍卫军环节京畿，约30余卫，隶属枢密院，一部分色目人也被编入侍卫亲军。镇戍军，隶属行省者，有警时由行枢密院统领，平时归属行省，调遣更防仍守枢院节制。华北、四川、陕西等地蒙古军、探马赤军隶属枢密院。腹里地区主要由蒙古军与探马赤军防守，南方以蒙古军、汉军、新附军相参驻守，主要防卫临江沿淮地区。还有蕃军、高丽军、寸白军、纥军等设置。草原上的蒙古人战时出军，平时牧养，在中原与江南则从军户中签发，蒙古、探马赤军和汉军户均由奥鲁管理，新附军户不设奥鲁。元朝居民基本依民族与被征服先后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级，又有按职业划分的诸色户，如匠户、医户、儒户、僧户等。元初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建立劝农司以管理农业，编辑《农桑辑要》以推广先进生产技术，限制掠卖奴，禁止占地畜牧，又招集逃亡，鼓励垦耕以保护劳动力和耕地，又实行屯田、减轻减免租税、兴修水利。这些为初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关中、江淮、山东农业生产恢复发展最显著，棉花等作物种植也在以后取得普及。成宗以后，农业遭到破坏，生产呈现停滞。手工业在毡织造、丝织业、麻织业、棉织业、制盐业、制瓷业中均较前代有所发展，其中棉织业为新兴手工业，成绩突出。商业上已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了纸币——钞，自皇朝至地方均设有印制、发行、管理的交钞提举司，远至畏兀儿等边远地区也设有这种机构。新兴工商业城市兴起。海外贸易超过前代，元政府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过市舶司，并有市舶则法。东南亚、南亚、西亚，以至东非各沿海国家或地区均与元有贸易关系，与高丽、日本等国的贸

易规模也相当大。贸易以中国输出生丝、花绢、棉布、瓷制品、药品等为主，从亚非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珍宝、檀香、木材、漆器等物品。元代文化艺术以元曲为代表，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著名杂剧作家出现，他们写作了《窦娥冤》、《拜月亭》、《西厢记》等许多著名作品。女真人李直夫、回回人萨都刺、丁野夫等也是著名散曲作家。施耐庵、罗贯中于元末明初创作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标志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已成熟。科学技术方面，有郭守敬等天文学家，王祯等农学家；他们的成绩在科技史上较突出。对外关系发展至极盛，陆路与海路交通均比前代扩大，来往也极频繁。与西北藩国，东亚高丽、日本，东南亚安南、暹罗、爪哇，真腊，阿拉伯半岛，非洲层拔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等国家均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其中安南人带回的佛经、儒学经籍、诗文著述等对安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极大。欧洲与元的交往也很多，波斯、阿拉伯的天文、医学等成就多由此时东传入中国。元朝末年，吏治腐败，财政混乱，军备废弛，苛捐杂税增多，徭役繁杂“为郡者于民间徭役不尽校田方亩以为则，吏得并缘高下其手，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元史》卷 192《白景亮传》）内部斗争亦趋激烈，民族压迫的政策强化，进一步激起了民族矛盾的尖锐，脱脱任中书右丞时变更钞法，拯治河患未能缓和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催发了元末农民起义。到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等在颍州起兵，徐寿辉于蕲州起兵，起义爆发。至元十三年淮东张士诚起兵，至元十七年刘福通派人分三路北伐，次年北伐军毛贵部逼近大都，不久败退。至元十九年北伐失败。到至元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称帝，建明朝，此年，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元强盛时版图北至西伯利亚以北，南暨南海，西北至今中亚地区，东北则达鄂霍茨克海地区。元顺帝退出中原后，其继承者据漠北，仍用元国号，史称北元。元世祖建号以来共传 10 帝，98 年。元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对奠定今天的中国版图、提高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30-1.bmp}

(张立生)

成吉思汗

(Cheng ji sihan 1161—1227) 名铁木真，蒙古帝国的大汗，出身于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氏，为蒙古部首领。他是蒙古族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蒙古汗国的开拓者，元朝尊为太祖。蒙古部强盛前，草原上分有上百个部落，蒙古部居住于今鄂嫩河与克鲁伦河流域，受到金朝控制。10世纪初，铁木真父也速该为仇人毒杀，他目睹了各部间疯狂的仇杀与金朝严酷统治，力图恢复本部，重创大业。金末收集旧部众，依靠克烈部，建立宫帐，开始了与各部的剧烈斗争，几经挫折，终于征灭、招降诸部，占有呼伦贝尔草原，在今鄂嫩河畔召集忽里台大会，建立蒙古汗国，被举为大汗，称成吉思汗。颁布了大札萨（法律），并在蒙古汗国内实行分封制，大封功臣宿将，编列国民为户。后又命令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根据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创制了蒙文。也即在蒙古部统一大草原后，蒙古一词才通用于草原各部，并渐形成统一的蒙古族。成吉思汗还创立了蒙古军主力怯薛军。进行了第一次西征，攻取西辽。又派遣大将木华黎经略夏、金。他在世时开拓的疆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南自大漠，北包贝加尔湖。1218年，西征回军后病死于六盘山，葬于起辇谷。成吉思汗统一草原诸部族，促成了蒙古民族的形成，开创了蒙古帝国，初步形成了蒙族文化系统，使蒙族迅猛发展壮大，在征服草原以外地区的过程中，第一次将蒙古文化传播到欧亚两洲，给世界文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张立生)

成吉思汗陵

(Chengjisihanling) 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境内。建筑面积 1500 多平方米，由正殿、东殿、西殿、后殿、东西走廊等组成。四殿互相连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30-1.bmp}接。正殿最引人注目，以美丽的花岗石为底座，四周围以玉石栏杆，殿顶呈浑圆形，高达 26 米，上面砌着藏蓝、桔黄两色琉璃瓦，并饰刻着云勾浪纹图案。由蒙、汉文组成的“成吉思汗陵”五个金色大字竖匾，高悬在八角飞檐之下，远远望去，格外庄严肃穆。殿内正中塑成吉思汗坐像，殿内四壁雕饰着山、水、草、畜等。这里是祭祀活动中心。东西走廊分别绘大型壁画。西走廊绘成吉思汗的出生、遇难、东西征、统一蒙古各部等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东走廊壁画，再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创立元朝，以及当时农耕、冶金、桑织等事业的发展及各民族友好团结的景象。东殿安放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和夫人的灵柩。西殿展览成吉思汗用过的“苏鲁锭”（长矛）、宝剑和马鞍等遗物。后殿安放黄色蒙古包四座。堂正中为成吉思汗夫妇的灵柩。每年蒙汉等族人民都到此地举行公祭。

(吕瑞芝)

耶律楚材

(YeLiChucui 1190—1244) 蒙古汗国著名政治家。字晋卿，号湛然居士。为辽东丹王突欲之后，金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元史》卷 146《耶律楚材传》）。金规定丞相之子例试补省掾，他本想试进士科，但金章宗要他按照规定参加考选，同试 17 人，耶律楚材成绩独优，遂辟为掾，后为开州同知。金宣宗迁汴京，留在燕地，为完颜兴左右司员外郎。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略定燕地，欣赏他的才能，命随从左右，呼为吾图散合里，蒙古语意为长髯人，从成吉思汗西征。元太宗即位后，任主掌汉地文书的必阁赤，汉官称为中书令、中书相公等。他“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律历、地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同上）在西征策略、统治中原等诸多方面为元太祖、太宗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并受命创制了元朝礼仪制度，在中原设立行政与军事体制，开发财源，裁定财税制度。并提议保护、利用中原士人，开科取士以网罗人才。蒙古人南下时杀戮残酷，他说以军国利害，表陈大义，请止杀戮，保护了中原人口。后失去乃马真皇后的宠信，直至病死。后有人诬他在相位久“天下贡赋，半入其家。”麻里札前去查验，仅得阮琴十余、古今字画、金石、遗文千卷。元代至顺元年（1330）赠经国议制寅亮佐运功臣、太师、上柱国名号，追封为广宁王，谥文正。

（张立生）

元世祖忽必烈

(yuanshizu Hubilie 1215—1294) 元朝开国皇帝，全蒙古大汗，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未继任大汗前即关心政事，“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致道。”（《元史》卷4《世祖纪》）元宪宗继位后，委他以漠南汉地军国之事。他有韬略，攻大理、南宋时，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宪宗蒙哥于1259年战死合州，次年在开平（今内蒙多伦西北），召集忽里台大会，被推为蒙古大汗，平定其弟阿里不哥争夺皇位的反叛。至元元年（1264）击败反叛者，至元八年，正式建立元朝，至元十三年消灭最后一支抵抗的宋军，统一中国。元朝建立后，他逐步确立了元的政权规制，制订了行省制度，这种制度对明清两代影响深远。又在乌斯藏设立行政机构，以宣政院统领，确立西藏地区的僧俗政体，从而将西藏地区划入元的版图；废弃了成吉思汗时建立的分封制，实行赐田制，从而使蒙古贵族转化为地主，大大加强了王朝政权力量；在经济上，提倡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兴修农业水利工程，下令将许多牧场还归农田，禁止掠人为奴，以解放生产力，并在皇朝内设立了司农司、营田司等专门负责农业的机构；有效地解决了汉族等民族上层与蒙古族贵族的矛盾，不拘民族出身，任用贤才。这些作为确立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蒙语谥号薛禅皇帝。

（张立生）

元大都

(Yuandadou) 元代国都。建于今北京，元称大都，又称汗八里，史称元大都。元大都兴建于至元四年(1278)。是以太液池(即今北海)和金朝在太液池附近建筑的万宁宫为基础修筑的，有皇城与大城两部分。皇城内有大内、隆福、兴圣三组宫殿建筑，位于南城中央，外筑城墙称萧墙。三组建筑大致环绕太液池。皇城建筑之初，先构筑地下网道，设计水平较先进。今团城原为皇城中孤岛，有木桥与三组建筑相联。皇城外称大城，周围约28.6公里，东西6公里多，南北7公里多，呈南北向长方形。城内道路以南北、东西正向排列，南北方向为主，轴线为南北向，道路均以中轴线为准分居两侧。中轴线以丽正门(今天安门南)为起点，北至天寿万宁寺中心阁。大城共有11门。城中以坊为居住单位。海子即今积水潭，当时诸水道引水均汇于此，恰汇集在皇城后，是元大都中商业繁荣区。海子“恣民渔采无禁”(《元史》58卷《地理》)。元大都城墙北段遗址即今古城，南墙在今南北长安街以南，东西城墙位置与明清略近，四周均有角楼，今北海大桥即当时皇城中连接孤岛与三组宫殿的木桥位置。元大都的建设为明清北京城奠定了基础，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张立生)

元代的等级制度

(Yuandai de dengji zhidu) 元朝设立的社会制度。元朝建立后，为了建立一种统治秩序，维持社会阶层的稳定，适应多民族统治的状况，基本依照民族成份与被征服先后，将全国居民区列为四级，第一级为蒙古“国姓”诸部，享有许多政治与经济特权，在任职上，可以担任最重要的官吏，如达鲁花赤等；在法律上，如犯罪所受刑罚均较其他等级轻；贵族们可以拥有大量土地，并拥有驱口。第二级为色目人。色目人主要指西夏人，今中亚各族人，东欧人等，元大德八年（1304）规定除汉儿、蛮子、高丽外，均为色目人，可以任较低一级官职，法律上规定的也比下二级待遇优厚，如政府括马，色目人可取 1/3，还可以携带兵器，专设机构处理他们的案件。第三级为汉人，也称汉儿、乞塔札忽歹，主要指女真、契丹族人以及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族人，及今四川、云南两地区人、高丽人。他们当中的一些十分富有，拥有大量的奴和土地，但在法律上受到限制较多，也有一些人可以担任较高职位，并带兵。第四级为南人，也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主要指原南宋治下的各族，包括汉族。他们中个别人也拥有大量田地、奴及较高地位。元代法律严禁他们携带和私藏武器、习武与集会。他们与汉人的区别主要由于被征最晚。等级制与诸色户计等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元朝组织与控制社会的网络。虽然有等级制存在，在实际上，蒙古人虽贵为一等，仍有很多贫苦者，只能享受到名义上的法律保护，有一部分竟然也被掠卖为奴。色目人的情况也是一样。汉人和南人虽列三、四等，除有些地位较高外，元末他们甚至组织了保卫政府的武装。当然由于这种划分的民族色彩极浓，民族歧视的现象明显，实质上这是一种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与民族斗争的产物，是元朝民族分化政策的具体体现。

（张立生）

诸色户计与军户、匠户、站户等

(zhusehujì yu junhujiānghu zhanhu) 诸色户计指元朝居民按职业划分的户籍，有军户、匠户、医户、僧户、站户等，约为十种。这些户籍部分是按国家规定强制设立的，如盐、军户等户籍，部分是由考试等途径确认的，如道、儒、僧户等户籍。各户都按一定的要求服役，或承担其他义务。这是元朝为维持社会秩序而设立的一种措施，也说明了元朝政府对社会控制的严密。它与等级制等制度相结合，构成了元朝政权与居民的联络网络。这里的色为种类之意。军户是诸色户计之一，蒙古汗国初立仅以户，或丁计卒，建立元朝后始专设军户，分为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汉军户及南方新附军户等名目，所谓“天下既平，尝为军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元史》卷98《兵制》）军户一般由政府供应粮秣与装甲，其他则需自理，如蒙军户要自备战马。军户在赋役上可部分免征，元初还可免除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后改为远征者免。新附军户可月支口粮，但需服杂役与和雇和买，军士亦支取口粮。军户为强制签发。汉军普遍施行正贴军户制。只有贫至极才能除籍。户绝无丁，则签别户充补。新附军户设万户府管理，探马赤与蒙古军户设奥鲁官管理。匠户也是诸色户计之一。由于元朝政权十分重视手工业生产与手工产品的应用，初年曾大批劫括匠人，平定南宋后，规定匠人另编户籍，在政府的匠局、院中供役，并代代世袭。匠户除按规定服役外，可免杂泛差役与科差。政府发给他们盐粮，后改为与民户一体承担杂差役。匠户虽受到严格的户籍控制，但保存了许多珍贵的、世代相传的手工技术，使元代手工业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站户也是诸色户计之一。站户主要负责驿站差役，可以拥有土地，四顷以内可不征税，四顷以外则须纳地税。南人充站户之役者，数家供马一匹，可免税粮70石，供牛船之站户也可免除一定土地税，供应刺子食品者，还可免除杂差役与和雇和买。

（张立生）

元代的驿传制度

(yuandai de yichuan zhidu)元朝国疆辽阔，为能相互联络，设立驿传机构与制度。驿传，蒙古语称为站，现代汉语已吸收站字，称驿站。站“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者（《元史》卷 111《兵制》）。元建立前即重视驿站的设立，成吉思汗时期，设有通到中原和西域的驿路和驿站设施，以备军需。窝阔台建都和林以后，正式确立驿传制度，由和林至中原地区的驿道，每 70 里左右置一站，共有约 37 站。又有从和林至察合台封地，以及从察合台封地至拔都封地的驿路驿站。元朝建立后驿站制度进一步确立，规模宏大，以大都为中心，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北至吉利吉思，西达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南接安南、緬，乌斯藏亦设有驿站。全国约设驿站 1500 处。站有水陆两类，辽东又有狗站。江淮一般为水站。站设驿令、提领、脱脱禾孙等官，脱脱禾孙专设在关会要塞之地。有元一代，驿站一般归兵部与通政院分领，兵部负责南方汉地驿传，通政院负责蒙古驿传。至元十三年（1276）前统归兵部，此年设通政院专管驿站，至大四年（1311）至延祐七年（1320）汉驿站始归兵部。陆站一般使用马、牛、驴、车；水站一般使用船只。漠南漠北蒙古站又称为达达站，中原和江南地区驿站又叫汉站。散站一般又直领于各路总管府，或州县。站由站户负责役务，站户户籍隶所处路、州、县，或府。他们需保证供给驿卒交通工具，有的还需备粮食供刺子等食用，官员无通政院明文不得擅科其差役。站户每一百户设一名百户，三年一换。元以圆形符牌为驿传之信符，金字为紧急，银字次之，在内由皇朝直接掌握在外则由当地蒙人长官掌握。驿站制度使元的全国联络畅通，客观上有利于交通发展。但站户负担有时极重。

（张立生）

元代的行省制度

(yuandai de xingsheng zhidu) 元代行政制度。行省在魏晋时期就有，然多数指暂时性的机构而言。金代派驻各地的行尚书省极多，行省之称盛于此时，但多数是为军事需要而设立，也不是固定的、长期性的机构。蒙古汗国初设行省沿袭金代制度，属于暂时性机构，其设立仿照王朝中书省之制，称为行中书省，如木华黎招降东平严实后，承制授实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元史》卷1《太祖纪》）。有时也称为行台。忽必烈即位，设十路宣抚司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又以都省官员行某处省事衔，到各地行使中书省职权，属临时性机构。约在至元二十年（1283），改由某处行中书省平章或右丞、左丞、参知政事任职，不再保有都省官系衔，行省遂以派出机构变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元史》卷91《百官志》）。每省设丞相一人，不常设，平章二人，另有右丞左丞，参知政事，品秩与都省官相同。至元二十七年（1290），除中书省直辖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外，全国分为十个行省：湖广、江西、江浙、云南、岭北、辽阳、河南、陕西、甘肃、征东。行省下辖机构有路、府、州、县四级，有些还有军的设置，行省官制之外设达鲁花赤，由蒙人担任，执监督之职。行省权力一般较独立，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派有宣抚司等机构。元行省制对后代影响较大。

（张立生）

蒙古军与探马赤诸军

(menggujun yu tanmachizhujun) 蒙古军主要由蒙族人中签发，一般15岁以上，70岁以下，家有男丁者，均签为兵，初设10人一牌，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骡牧养。”（《元史》卷99《兵志》）元朝建立后草原蒙古人仍遵守战时出兵、平日牧养的原则，而进入中原和南方的蒙古人则设有蒙古军户。蒙古军分为宿卫与镇戍两个系统，宿卫军即怯薛军，怯薛为番直宿卫之意，建立于成吉思汗即位之忽里台大会，约在宋开禧二年（1206）。共有四怯薛，分别以成吉思汗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为统帅，统称四怯薛长。四怯薛每三日一班值宿。博尔忽死后，成吉思汗亲领一支，称也可怯薛，“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领之故也。”（《元史》卷99《兵志》）赤老温死后，怯薛常以右丞相率领。元朝建立后，怯薛军专事皇帝，除宿卫外，还任宫中各种事役。宿卫时，又根据情况，有众多名称。怯薛士兵称怯薛歹。怯薛长多为皇帝亲命，并为重要大臣。侍卫亲军亦为宿卫系统，环卫京畿，一部分色目人亦编入侍卫亲军。镇戍军是元朝建立后的蒙古军种，是从宿卫军中调集出来保卫漕运的军队，因此又叫海运镇戍军，一般有千余人。镇戍的蒙古军与探马赤军，主要宿卫腹里地区，探马赤军是蒙古和元朝军队中一种，军户中有探马赤军户。元朝建立后探马赤军主要镇戍腹里与全国战略要地，最初的探马赤军是蒙古汗国进攻金国时组成的先锋军队。探马赤军的主体仍为蒙古人，其中亦杂有北方汉人与畏兀儿人等。至元十年（1273）元世祖曾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蒙古国征讨中原各王朝时建立汉军，最初的汉军主要由北方汉人、高丽人、女真人等组成。签军的办法有以贫富为标准，户签一人，称独户军。合二、三人出一军为正军户，余为贴军户。或以男丁论，曾以20丁出一人，至正7年（1279）曾以10人出一卒。又有以户为标准，20户出一军，以年20以上者充，富贾大家再抽一人称余丁军，至元十五年免除。又有匠军，取手工匠人为军。元朝建立后，军人入军户籍，有汉军户，世代相袭不得更动。汉军中有炮军、水兵军、弩军等名称。征服南宋政权后，收编南宋降军及溃散之军为新附军，也入军户籍，为新附军户，多由南方汉人组成。除此之外，元朝建立后，有属于乡军的云南寸白军，又叫爨军，指白族土军，白衣军指傣族军，罗罗斯军指彝族军队，以及和尼（哈尼）军，广西有撞摇（壮族）士兵；福建有畲军，辽东有女直军、高丽军以及纥军。元招募的兵一般组成答刺罕军，蒙古、探马赤军和汉军户，一般通过奥鲁管理，新附军不设奥鲁。

（张立生）

元代对西藏地区的管辖

(yuandai dui xizang diqu deguanxia) 蒙古汗国兴起时，今西藏地区的吐蕃国早已衰落，僧俗势力分别控制着纳里、乌斯、藏地区。成吉思汗兵临西夏，甘肃、青海一带的藏族已归顺蒙古，后西藏地区的地方势力得知成吉思汗写给萨迦派大喇嘛的信，协商派出代表见成吉思汗表示顺服，这是西藏地方势力向蒙古军事力量建立关系的开端。绍定二年（1229），甘、青和原属西夏地区成为阔端的封地，他派大将多达纳波入藏，驻于拉萨北热振寺一带。淳祐七（1247）年萨迦派学者萨班与阔端见面，讨论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要求凡愿归顺者呈报官员姓名，并规定了各种制度。淳祐十一年（1251）汉、藏广大地区划归忽必烈，他也和西藏地区势力建立了关系。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以八思巴为国师，赐予玉印。至元元年（1264）设立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行政的机构，即总制院，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院务。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称宣政院，下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主要管理今属甘肃、青海及今四川阿坝与甘孜北部的藏族；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主要管理今四川阿坝与甘孜地区大部及今昌都地区一部分；乌里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西藏的卫、藏、阿里等地。在吐蕃等处、等路两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区紧邻内地的地方，设流官，分别由陕西、四川两行省任命或罢免；在藏族聚集地，设宣慰使、安抚使、招讨使、万户、千户等职，负责当地军政事务。万户以下职务任命当地僧俗上层充当，可世袭。宣政院、吐蕃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万户以上重要官员均由宣政院或帝师提名，由皇帝委任，各级官员均僧俗并用，军民通摄。元朝各帝均设帝师一职，可在皇帝名义下就吐蕃事务发布法旨，与诏敕并行，元朝一代共设十三四任帝师。帝师一般领院事，但权力掌握在宣政院使手中，长者为朝中大臣，位第二者为僧人，后增至10人，僧人由帝师荐举。宣政院的职能相当于行省机构，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同为可自选官员的重要机构，可不经中书省直接与皇帝联系，决定事务。有重大事务，则临时性机构——行宣政院前往处理，遇重大军事则与枢密院共商处理。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派以达门为首官员第一次清查西藏和沿途户口，设立驿站，规定贡赋数额。至元五年（1268）又进行了第二次清查，任命了13个万户长，确定每个万户应纳贡物品种与数量，并明确规定萨迦为13万户之首，元在西藏的地方行政建制由此确定下来。至元二十四年第三次清查户口，重新调整设立了大、小甲姆，并设置了马甲姆，甲姆即驿站。这是元朝对全国藏族地区的重要施政措施，大站约28处，小站约7处。元朝还在西藏派驻镇戍的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与新附军。此外，藏族地区为忽必烈第七子奥鲁赤的封地，他的子孙以镇西靖武王封号世袭领有，但有事也需经宣政院，由皇帝决定处理办法。

（张立生）

也里可温教的传入

(yelikewenjiao de chuanru) 也里可温是元朝人对基督教徒和教士的通称，又译为也里克温、也立乔，或称迭屑(tarsa)，是袭用波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基督教聂思脱里(Nestorian)一派在唐初传入，称大秦景教，唐武宗禁佛，西来宗教均被禁止，景教在中原趋于绝灭。辽、金时期在中国北方和西北的一些游牧民中很流行。蒙古汗国在几次西征中，俘掠和裹胁大批西亚、东欧基督教徒，多进入内地，散居全国。至元三十一年(1294)左右教皇派圣经济各会士孟特·戈维诺来东方，罗马天主教遂传入聂思脱里派教徒元初大都约有3万多人，设契丹、汪古大主教区管理，西北地区还设有唐兀等大主教区。孟特·戈维诺曾在大都建教堂2所，先后施洗约6000人。组成左卫、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的3万余人也是天主教徒。聂思脱里派与天主教间有矛盾，相互排斥，聂思脱里派曾在今房山三盆山建寺，遗址仍保存。泉州为天主教的活动基地，孟特·戈维诺曾向该地派遣主教，设立教区，曾任主教的安德烈其墓地已在泉州发现。孟特·戈维诺在大德十一年(1307)被罗马教皇正式任命为大都大主教与东方总主教。也里可温教传入江南地区是在南宋灭亡后，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是聂思脱里派教徒，在任时，他在镇江建教堂6所，在杭州建1所，说明那里的教徒数量不少。基督教在元朝的信奉者，一般是突厥人、阿速人及少数蒙古人，不是汉人的宗教。元设有崇福司以掌也里可温事务。

(张立生)

藏传佛教的兴起

(zangchuan fojiao de xingqi)吐蕃佛教一般称喇嘛教，喇嘛是西藏佛教僧人专称，意为上人。7 世纪，佛教传入吐蕃，受到王室扶植，至 9 世纪中叶，达玛赞普发动禁佛运动，吐蕃地区的佛教受到极大破坏。10 世纪后半期，在封建农奴主支持下，残余的佛教势力再度兴起，这时期称为后弘期（始于 978）。许多僧被派到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区学习佛法，并延请了一些印度僧人到阿里传播佛法，兴建寺院。复兴起来的佛教，是和原吐蕃宗教长期斗争、融合以后的佛教，在教义上是佛教的，在形式上吸收了许多原有宗教的色彩。因此称为西藏佛教、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11 世纪中叶喇嘛教间渐形成一些派系，主要有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各教派都拥有相当的政治势力，与封建农奴主的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各派修筑的寺院，渐形成文化中心，周围地区也出现一些城镇，成为经济、交通的中心。蒙古汗国兴起后，吐蕃各种势力开始与蒙古交往，表示臣服于蒙古汗国。绍定二年（1229），甘、青和原属西夏地区成为阔端封地，他邀请萨迦派大师萨班等人至凉州会面。此后经西藏佛教势力与蒙古的多次交往，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藏传佛教得到发展。藏传佛教教义以显密宗为主，大乘与小乘兼容，又以大乘为主，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成为藏密。元朝以后，藏传佛教又受到清政府支持。

（张立生）

元末农民战争

(yuanme nongmin zhanzheng)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元政府征募 15 万民工整治黄河，民工们在河工地上挖出一个独眼石人，应验“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引起骚动。五月，民间宗教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召集 3000 教徒借骚动在颖州颖上县祭天地，组织武装起义，因机事不密，韩山童被捕杀。刘福通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逃出，率徒众占领颖州城，随即发展成 10 万多人，称红巾军，又叫香军、红军。渐在今安徽、河南、河北地区形成势力。长江、汉水流域徐寿辉、彭莹玉也乘机而起，在蕲黄地区形成势力。还有李二、郭子兴等也相继而起，以上均为红巾军系统。南方张士诚、方国珍两股不属红巾军的势力也兴起。元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主要有：元朝社会组织的方式具有较强的民族色彩，居民以民族和被征服先后划分等级，引起了不满，民族矛盾突出。原中原王朝统治下的人，以恢复大宋朝为号召，极能形成势力。民间宗教势力强盛，宗教组织有利于组织民众，宣传思想。元王朝的统治愈来愈腐败，朝内斗争激烈，朝外大地主、大官僚兼并土地、欺压百姓，老百姓不堪忍受侮辱，很早就有“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何如”等民谣传播。至正十一年十月徐寿辉在蕲水建立天完政权，即帝位，占有湖广、江西北部、江浙、川陕地区，拥 10 余万众。后分裂，部将陈友谅杀徐寿辉，至元二十年在武昌建大汉国。明玉珍次年在成都建立夏政权。至元十七年张士诚在高邮建大周国，次年刘福通拥韩林儿，在亳州（今安徽亳县）建大宋国，并北伐，势力最盛时“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高丽史》卷 39《恭愍王世家》）。不久因部下叛乱而致溃败。至元二十三年刘福通被张士诚杀死，至元二十六年朱元璋沉韩林儿于长江，大宋国灭亡。经 16 年的相互作战，最大势力只余朱元璋一支，至元二十七年他命将北伐，次年灭亡元朝。元末农民暴动的根本意义在于它适应了社会矛盾发展的要求，虽然它打碎了元朝的统治机器，破坏了元代社会结构，但它又在元朝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稳定体，完善了社会组织与机构，因此，它是一种发展。

（张立生）

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

(make poluo he tade 《youji》) 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是威尼斯意大利商人的后代,他的父亲尼古拉和叔叔玛窦都曾到过蒙古汗国,并谒见过忽必烈。他们回去后,带去了古代中原的神秘故事。南宋咸淳七年(1271)兄弟二人带马可·波罗再来东方,经小亚西亚半岛、底格里斯河谷、巴格达、波斯湾、霍尔木兹、伊朗高原,最后越帕米尔进入今天新疆地区,又经由今塔什库尔干、喀什、额济纳等地进入宁夏。三年后,即至元十二年(1275)到达元上都(今多伦多西北),见到了忽必烈,不久在元大都任职,学习东方习俗,及蒙汉语言。他的稳重赢得了元世祖赏识,受任巡视各地和出使南洋。他曾巡视的地方有山西、河北、关中、四川、建昌、云南等地,淮安、宝应、高邮、泰州、扬州、南京、镇江、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地也曾由他巡视过。出使的南洋国家有爪哇、苏门答腊、緬、安南等国。除巡视地方外,还在扬州担任过三年职务。十七年后,元阔阔公主远嫁波斯阿鲁浑汗,马可·波罗与他父亲等人自荐为向导,由海路至波斯,然后回到威尼斯,带回了大量珍宝。三年后威尼斯城与热那亚城发生战争,马可·波罗任舰长,战败被俘。在热那亚监狱中,讲述了许多东方见闻,比萨城文学家鲁思梯切诺遂以中古法意混合语法文记述了马可·波罗的口述,形成了《马可·波罗游记》。全书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记述马可·波罗一行至大都途中见闻;第二部分述及蒙古大汗忽必烈,以及宫殿、都城、政事及马可·波罗出使云南、緬甸情况,对杭、福、泉诸城情况也有述及;第三部分讲述日本、安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城市及诸岛情况;第四部分记载成吉思汗后代间的战争及北亚情况。详细于城市、气候、物产、习俗、贸易及宗教信仰。第二部分谈及中国,共82章,为全书较多部分。它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元大都——汗八里的辉煌景象。也记述了杭州“行在所供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于天堂”繁荣的状况(《马可·波罗游记》)。书中还有关于中国使用煤、纸钞的情况。此书曾激起欧洲人对中国及东方的极大兴趣。

(张立生)

郭守敬与授时历

(guo shorjing yu shoushili)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邢州人(今河北邢台地区)。元代天文学家、水利工程家,在数学方面也有成就。与王恂一道开拓出我国独特而先进的球面三角学——招差术。在天文学方面,参与并创制了仰仪、简仪、候极仪、玲珑仪、灵台浑仪等十几种天文观测、演绎仪器。他经长期观测,更改了古代一直认为黄道与赤道平面交角为24度的结论,定为 $23^{\circ}90'$ (合今 $23^{\circ}33'34''$),虽与当时实际交角有误差,但已极小。对28宿的测定也比前代提高近一倍。最大成绩在历法制定方面。他参与制定的历法《授时历》在我国行使近360年。元代初年沿用金《大明历》,效果极差,天象与历象常违,耶律楚材曾更定之,有《西征庚午元历》,后又采用西域札马鲁丁制《万年历》,但均不为定法。平定南宋后,“诏前中书左丞许衡、太子赞善王恂、都水监敦守敬改治新历。”(《元史》卷52《历法》)。至元十七年(1280)新历制成,次年颁行天下。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比实际运行的天象仅差26秒,与格里哥里历周期同,又比它早制出300周年。《元史》称“授时历与古历相较,疏密自见,盖上能合于数百载之前,则下可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说。”(《元史》卷52·《历志》)综《授时历》的特点有:证实了南宋杨忠辅得出并在《统天历》中使用的一年为365.2425日为一年是精确的;精确地测定了28宿的位置与距离,并据此制出了星表;测定了24节气时大都地区的日出、日入时刻。《授时历》正式废除了上元积年日法,采用近世截元法。上元积年法是古代编历的传统方法,既从制历或颁历时的冬至夜半上推所选上元的年数,为了能推算出结果,以往的历法家往往牵强凑合,来求出一个理想的上元。郭守敬放弃了这种推算,而以至元十七年(1280)作为推算的起点,由于《授时历》便于应用,朝鲜、安南等地区也相继使用。

(张立生)

棉纺织

(mianfangzhi)棉花,原是一种热带植物,是在我国发展较迟的一种纺织材料。历史上,最早生产和利用棉花的地区,在我国南部、西南和西北地区。1979年,福建崇安出土有距今约三千年的青灰色棉布残片,1959年新疆民丰出土东汉时期的蓝地白印花棉布,还有白布裤和布手帕。南北朝时,称棉花为“吉贝”,南朝的帝王士大夫已穿用棉布衣服。唐代随着交通的发达,棉布输往内地,但种植棉花的技术并没有推广到内地。到宋代植棉和棉布生产在东南地区发展起来,并有了较高的水平。1966年在浙江兰溪南宋墓中出土了一条棉毯,是我国迄今出土的唯一的一条棉毯。它为平纹组织,双面起绒,绒头丰满厚实,经密与纬密都比较均匀。棉毯长约2.51米,宽约1.18米,这证实宋代已可织造宽幅棉织品了。但是,棉布在我国内地居民衣着材料中仍不占主要地位。元初,植棉和棉纺织技术在长江、黄河流域广泛传播,元代著名纺织家黄道婆将海南一带的纺织经验带回故乡乌泥泾,加以革新推广,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黄道婆在棉纺织工艺上的贡献,主要在“捍”(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几个方面。

捍——改进了“用手剖去其籽”的去棉籽原始方法。过去脱棉籽是棉纺织生产中的一道难关。因为棉籽生于棉桃内部,为数多,很不好剥,全部是手工操作,费时费力。黄道婆运用手摇轧棉搅车后,进入半机械化生产,“三轴相轧,则子落于内,绵出于外。”提高了劳动效率。

弹——改进了用“线弦竹弧”的弹棉工具。过去江南的弹弓只有一尺五寸长,用手指拨弦,效率很低。黄道婆推广四尺长的绳弦大弹弓,用弹椎敲击绳弦,振幅大,强劲有力,每日可弹棉6~8斤,弹出的棉花既松散又洁净。由于弹棉效果对成布质量关系很大,所以捍弹工具的革新,使手工棉纺织出现了新面貌。

纺——从单锭手摇纺车改革为三锭脚踏棉纺车。乌泥泾一带原需三到四人纺纱才能供应一架织布机的需要,黄道婆利用纺丝、麻的三锭脚踏纺车改革成三锭脚踏纺棉车,靠脚踏发动,可以同时纺制三根棉纱。用这种纺车,既省力,工效又高,在松江很快得到发展。

织——黄道婆发展了从黎族人民那里学到的织造技术,总结出“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丰富了提花方法。棉布上呈现出各种美丽的花纹图案,使棉织的实用与美观结合了起来。

黄道婆改进的织造技术迅速在乌泥泾和松江一带推广开来,明代松江府曾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植棉遍及全国,棉布品种增多,质量更好,有些布的织法仿丝织花机织造,出现了不少具有艺术价值的品种。十八世纪后期松江布和棉布的其他优秀品种一起经广州出口,当时的松江布真可谓“衣被天下”。

(孙彦贞)

黄道婆

(Huangdaope 1245—?) 元代棉纺织业手艺人。又称黄婆，松江乌泥泾镇人(今上海华泾县)。幼年做童养媳，因难挨虐待，逃亡至海南岛地区，那里的黎族妇女精于纺棉织布，黄道婆与她们相处 30 余年，学会棉纺织术，并加以改良，至大、大德年间返回松江，把技术带回故里，同时带回了她改进的棉纺织工具。她的家乡此时的棉纺织技术还很落后。据记载她传回的先进工具有“捍、弹、纺、织之具”(《南村辍耕录》卷 24)。捍即搅车，用于除去棉桃中棉籽，在此之前，松江地区妇女主要使用手工方式摘除棉籽，费工费时，效率极低。使用她带回搅车后，“凡木棉虽多，今用此法，即去子得绵，……不致积滞。”(《农书》卷 21)弹即弹棉弓。在此之前，江南弹棉用弓极短小，仅有一尺五寸，线弦竹弓。她带回的是长四尺的大弓，以绳为弦，体大而效率高。纺即纺车。黄道婆带回的为三锭纺车，以脚踏为动力源，提高了机械水平，也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多锭纺车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黄道婆带回的多锭纺车比欧洲同类机械早出现很多年。她还推广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用这些技术可以织出丰富多采的棉布，如用这种技术织的布被“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南村辍耕录》卷 24)棉织品由此开始与丝织品争艳夺奇。松江妇女很快发展了这种工艺，织成的“乌泥泾被”一时风靡全国，乌泥泾镇也因黄道婆的贡献成为棉纺业中心，推动了元代的棉纺织业发展。

(张立生)

毛织

(maozhi) 中国的毛纺织技术首先是在北部、西北部游牧民族中发展起来的。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开始用纺缚[由缚盘(纺轮)和缚杆(拈杆、锭杆)组成的原始纺纱工具]加工羊毛或其他兽毛进行纺织。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织物是1960年在青海都兰诺木洪遗址中出土的一块毛布和毛毯残片，距今4000年。古代用于毛纺织的原料有羊毛、牦牛毛、兔毛、羽毛等，其中主要是羊毛。秦汉以后，随着毛纺织业的发展，毛织品、毛毯两大类主要产品在质量、品种上有较快的提高。人们不仅利用毛纤维纺纱织布，而且还掌握了毛纤维的缩绒性，有了成熟的制毡技术。毡，大概是古代人们用毛铺垫，潮湿后引起缩绒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制毡用现代技术术语来说，是一种无纺织布。从这个意义上说，毡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无纺织布。元代，毡及毛织品极为发达，这主要是产品适应了蒙古民族生活需要，毡的名目在元代不下六七十种。中国毛纺织技术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是和丝麻纺织技术互相交融发展起来的。丝织品种之一“缣丝”其织法“通经回纬”，或称“通经断纬”，就源于毛织技术，称缣毛织物，到唐代才移用于丝织，出现了缣丝工艺。毛织衣料，古时也称“布”，宋代开始有了称毛织品为“尼”(呢)的记录。毛织品除了作衣料外，还用做地毯、陈设等。清代，地毯工艺有了突出的发展，已形成不同特色的地方体系。著名的有北京地毯、宁夏地毯、新疆地毯和西藏地毯。清康熙时，地毯曾作为圣品输入西欧诸国。新疆和田地毯也输入阿富汗、印度。

(刘桂英)

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ma duanlin yu wenxiantongkao) 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宋末元初史学家。饶州乐平人(今江西乐平县)。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咸淳九年(1273)漕试第一名。荫补为承事郎。其父曾任史官,富有藏书,马端临随父居住时得以阅读,出任过慈湖书院及柯山书院山长及台州路学教授,但一生大半时间在家隐居著书。所业弟子极多,常与之讨论学问,马端临“有所论辩,吐言如涌泉,闻者必有得而返。”(《乐平县志》《马端临传》)南宋灭亡后,马端临不愿出仕,认为自己是宋臣,不能腆颜以事新主,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文献通考》为他一生中所作最大著作之一,书分为24门,348卷。写作始于他34岁左右,经约20余年始成书,成书时间约为元大德十一年(1307),约在他54岁时。元延祐五年(1318)道士王寿衍访得此书,上奏朝廷,至治二年(1322),元政府为之刊印,至泰定元年(1324)始颁行。他写此书的目的是《自序》中反复申明,一是补续唐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事迹,一是配补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纪与志部分,欲“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文献通考》《自序》)所列24门中,自《经籍考》至《物异考》5门为杜佑《通典》所不备,《文献通考》发展拓展了典志体史书的内容。其他门均为《通典》原目或子目,内容也有所拓展。所载史实均溯源于上古,而终于南宋嘉定时期(1208—1222)。资料取材,中唐以前据《通典》为基础,并加以补充。中唐后则多摭取自文献。所收资料中宋代史料极多,其中大多今已佚散,马端临在行文中注意详加考文、评语,如对商鞅变法、杨炎两税法评定,均能注意其历史意义。《文献通考》写作的规模宏大,涉及内容无论从纵的方面,还是从横的方面都很繁富庞杂,因此也有疏漏。此书注意发挥郑樵《通志》所倡导的会通之义,强调研史要融会贯通,以博通为长,与《通典》、《通志》二书相较各有长处,史家并称此三书为“三通”。

(张立生)

王祯与《农书》

(wang zhen yu nongshu)王祯，字伯善，元代农学家，东平人(今山东省东平县)。生卒年月日不详。关于他生平的史料记载极缺乏，仅知他曾任旌德县(今安徽境内)和永丰县(今江西省境内)县尹，在任职期间，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组织修筑水利工程，劝课农桑。也注意考察农业生产技术，积累了许多农业生产知识。在旌德县尹任中，综合整理平日笔录，写作《农书》，在永丰县尹任内完成，时间约在元皇庆二年(1313)。《农书》是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它上续《齐民要术》，总结前人的经验，补充了大量实地考察的结果。全书37集，136000字。基本内容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谱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农业史与主要农耕技术；第二部分叙述各种粮食、蔬菜、瓜果与林木作物的栽培与管理；第三部分绘制各种农具与农业机械图281幅，并加以说明。《农书》是第一部兼论南北，力图从全国范围内对农业作系统性介绍，并把南北农业技术以及农具的异同和功能进行分析比较的农业科学著作。《农桑通诀》为总论性的部分，其他如《谷谱》等可视为各论，全书总论、各论系统分明，体例完整齐备。在各论中，如《谷谱》中对每一种作物的性状都作了说明，这在古代农书中是一个创举。农器谱图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四，较复杂的机械也编排进去，也是《农书》中较突出的内容，后代农书中的图谱多抄录自《农书》，是对我国古农具记载最完备的。《农书》还注意推广生产经验，以便利农业生产，如为解决农林劳动力不足问题，他主张推行北方流行的“锄社”，说：“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曰锄社，甚可效也。”(《农书》卷3《农桑通诀》三、《锄治篇》七)。《农书》是极值得重视的农业著作。《农书》后附录有《造活字印书法》，详细讲述制造木活字及排版、印刷的情况与经验。王祯还创制了转轮排字盘，使用情况也载在附录中。

(张立生)

明

(Ming)中国古代封建皇朝。明太祖朱元璋创建。元朝末年，红巾军并起，朱元璋继郭子兴之后，做了濠州起义军的领袖。至正十六年（1356）攻下集庆（今南京），继之消灭陈友谅、张士诚，派兵北上伐元。1368年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不久，改应天为南京。当年攻下大都（今北京），元朝灭亡。明代前期从开国至土木之败，计81年，有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袭替。建国之初，百业待举，太祖、成祖诸帝参酌前代典章，创制各项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在朝廷内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提高六部的职权和地位；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以监察御史纠劾百官；设大理寺，以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掌刑狱之事；设通政使司，掌上奏表章及封驳之事；设锦衣卫与镇抚司，监视大小官吏，刺民隐事。建立军制，中央设五军都督府，分领天下都司卫所，各省最高军事机构称都指挥使司，军事要地设卫，次一级设所；兵部掌武官任免及军事训练；出征由总兵官统帅军队，战事结束军归卫所，兵权操于皇帝。仿照《唐律》制订《大明律》，又陆续颁布《大诰》、《续编》、《三编》，强令百姓“奉法守分”，接受统治。太祖认为，“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明太祖实录》卷16），十分重视治理经济，一方面调整赋役制度，编造征收赋役的黄册，设置征纳赋粮的粮长，绘制清丈田土的鱼鳞图册，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恢复残破的经济，如奖励垦荒，劝种桑麻，修筑堤、塘、陂、堰、渠等水利工程，治理大运河，大兴军屯、民屯、商屯等屯田，使全国垦田总数达到850万余顷，岁入米麦豆粟3278万余石，矿冶、陶瓷、造船、纺织，制盐业都有相当发展，商、贾贸迁，无远不至。太祖建国，初都南京，靖难之役后，建文帝失国，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国家重心北移，有利于抚绥东北、北部和西北边地。朱棣曾经五次亲征，打击了蒙古鞑靼、瓦剌等诸部分裂势力，在西北地区（今甘肃、青海、新疆）设置了西宁、安定、罕东、沙州、哈密等卫，在东北设置了奴儿干都司，计有184个卫。国境南起南海（今南沙群岛一带），北至北山（今外兴安岭一带），西起葱岭（今帕米尔），东到苦兀（今苏联库页岛）。明对周围邻国采取睦邻政策，曾经派遣郑和七下西洋，进行友好往来，将朝鲜、日本、占城、苏门答腊、爪哇等国列为不征国。仁宗、洪熙、宣德年间，三杨辅政，遂成“仁宣之治”。正统期间，宦官王振专权误国，致有土木之败，英宗被瓦剌俘虏，大明遇到了严重危机。

郕王继立为代宗，于谦鼎力保卫北京，击败瓦剌，转危为安。明代转入中期，从土木之败到张居正改革计132年，有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8朝袭替。由于国家长期相对稳定，守成诸帝多耽于安乐，疏忽于政事，以武宗为最荒唐，最腐朽，他好逸乐，到处巡游，宠信佞倖，放纵宦官，国几不治。宦官利用皇帝的倚信窃取权柄，擅作威福，祸乱政治，造成长期混乱。自王振之后又出现象汪直、刘瑾等为害甚巨的宦官。世宗时，宦官之势稍刹，但是由于世宗信方术，好祥瑞，议大礼，改祀典，群臣争夺内阁首辅的斗争很激烈，也使国家政治处于不安定状态。封建社会的痼疾——土地兼并和地主阶级向农民转嫁赋役，日趋严重，农民重新陷入每况愈下的痛苦之中，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抗斗争，影响比较大的有浙江叶宗留为首的矿工起义，福建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荆襄流民起义，河北刘六、刘七起义等。社会矛盾激化，边防力量削弱，少

数民族上层，尤其是北方蒙古贵族，乘机骚扰，倭寇等外国侵略势力也纷至沓来。为了解除社会危机，嘉靖中期以后，许多地主政治家提出改革建议，到万历初年实行了有名的张居正改革。

明代后期从张居正改革到明亡，计 63 年，有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袭替。万历 10 年张居正病死，神宗亲政。第二年便查抄张居正的家，张居正引用的官员被斥逐殆尽，厉行的改革措施也几乎全被取消。从此，神宗深居后宫，不视朝，不亲郊庙，不御经筵，不批答奏章，唯知搜刮金宝。派遣宦官四出开矿征商，一时矿监税使遍天下，掠财扰民，闹得民怨沸腾，民变四起。万历末年，三案迭兴。光宗即位一月即崩。熹宗嗣位，童蒙昏昧，常效木匠兴作，朝政悉委之宦官魏忠贤。东林与阉党势同水火，屡遭杀戮。是时，朝廷黑暗，建州女真兴兵建国，农民起义烽烟燃遍全国，三饷加派为渊驱鱼，崩溃之势已成。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38-1.bmp}

明中、后期，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商品经济空前发达，手工业生产水平和规模不断提高和扩大，包买商和手工工场出现，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新的变化。明代的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都有很高的成就；理学上出现了程朱的反对派王守仁及王学左派；官私史学著述宏富，杰出的史学家辈出，如谈迁、王世贞、沈德符等；文学作品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等；编纂了类书《永乐大典》；医学上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农学上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撰写了《天工开物》；地理学有《徐霞客游记》；苏州名园、北京紫禁城、十三陵地下宫殿是明代建筑艺术的代表。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下北京，思宗自缢而死，明亡。明历时 276 年，传袭 12 代，16 帝。

（何本方）

明太祖朱元璋

(Mingtaizu Zhu Yuanzhang 1328—1398) 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古代有作为的政治家。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出身佃农。少时穷困，17岁在皇觉寺出家，遇荒旱，不得不到外地化缘游食，生活十分艰苦。他自己曾回忆这段生活说：“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西风鹤唳，俄渐渐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其汤。”（《御制皇陵碑》）数年的磨炼使他增长了阅历和本领。元至正十二年（1352）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以“度量豁达，有智略”被视为心腹，并嫁以养女马氏。郭子兴死后，他便成为这支农民军首领。至正十六年，攻占集庆，废除元代一些苛政。时刘福通转战于两淮，河南等地，迫使元军无力南顾；而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的元军势力较为薄弱。于是，朱元璋利用有利形势，很快控制了皖南及浙东的东南部地区。在打下徽州（今安徽歙县）时，他采纳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卷136《朱升传》）的建议，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实行屯田。还聘请浙东地主文人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到应天（今南京）参政。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被韩林儿封为吴国公。二十三年，困守安丰（今安徽寿县南）的韩林儿、刘福通遭张士诚袭击，刘福通遇难牺牲，韩林儿被朱元璋救出，安置在滁州（今安徽滁县）。此后，朱元璋西灭以武昌为据点的陈友谅，东败以平江为据点的张士诚。二十六年，发布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平周榜》，公开诬蔑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接着他又派大将廖永忠在瓜州凿船沉溺韩林儿于江中。这时的朱元璋已经完全蜕化成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二十七年，朱元璋平定张士诚，占有东南半壁江山后，就派大将徐达北上伐元。二十八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不久，以应天为南京。同年，北伐军攻占大都（今北京），结束了元朝的统治。明朝建立后，在四川存在着割据政权夏，在西北、云南等地存在着元朝的残余势力。朱元璋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统一。为了防御逃亡到上都的元顺帝及其后裔卷土重来，在长城一线遍立卫所，分军把守，修城屯田，并分封诸子为王，以亲王守边，专决军务。

他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徙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隶；减免赋役；严惩贪污；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经过洪武时期的努力，明初社会生产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洪武九年（1376），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各设左右布政使一人，掌管财政和民政；设提刑按察使司掌管法庭和监狱，长官为按察使；设都指挥使司掌军政，长官为都指挥使。布、按、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直接由朝廷指挥。在中央于洪武十三年借胡惟庸案，废除中书省，取消丞相，提高原先在中书省以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直接听命于皇帝。朱元璋以皇帝兼行宰相职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高峰。他对军事机关也进行了改革，使军权也控制在自己手中。此外，还设立了锦衣卫和巡检司，以侦察、监视大臣。他又与谋臣刘基商定，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答卷只能以朱熹等人的注为依据，以培养驯服忠顺的官僚。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极大地加强了。

（马克锋）

明成祖朱棣

(Mingchengzu Zhu Di 1360—1424) 明朝皇帝，有作为的政治家。朱棣为朱元璋第四子，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就藩北平(今北京)。朱棣长期在北方筑城兴屯，训练兵丁，多有建树。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病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明惠帝。惠帝采用削藩的办法，先废几个弱小的藩王，次及燕王。建文元年(1399)，朱棣在谋士姚广孝的策划下，起兵造反，号称“靖难”。经过4年的战争，打败惠帝，夺取政权，称帝于南京，是为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

朱棣即位后，下令将农器和耕牛发放给山东受兵灾的地区，对各地水旱灾害及时赈济，兴修苏松等地水利，疏浚大运河，使3000里运道畅通。同时继续推行屯垦和移民等政策，使社会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羨，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具仓廩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明史》卷78《食货二·赋役》)明成祖在政治方面继续执行削藩政策，将握有兵权的藩王，或削其护卫，或废为庶人，基本上实现了削藩目的。在中央集大权于一身，正式设立了内阁，协助皇帝办理政事；重用宦官，以之为信臣、耳目，但是，也使他们开始干预国政。永乐18年，又设立从事侦缉、搜捕臣民的特务机构——“东厂”，有特设的法庭和监狱，其权势比洪武中设置的锦衣卫还要大。明成祖为了宣扬国威，招致各国朝贡中华，也为了追寻“靖难”失国后去向不明的皇帝朱允炆的下落，派遣郑和六下西洋；从永乐八年到永乐二十二年，曾五次亲自率兵出击骚扰北部边境的鞑靼、瓦剌。他还完成了营建和迁都北京的工作。1403年下诏改北平为北京，并派人营建北京城和紫禁城宫殿。永乐19年正式迁都北京。此举有利于抗击来自北边的蒙古骑兵的袭扰，有利于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对于巩固边防以及维护全国的统一有积极意义。在位期间，命解缙等人以程朱为标准，编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确立了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同时编成22937卷的《永乐大典》及《历代名臣奏议》等类书，保护了文化遗产。1424年，明成祖在率兵出塞的归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东南)，葬于长陵。今人商传撰有《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对他的一生作了确当的评述。

(马克锋 何本方)

靖难之役与建文帝出亡

(jingnanzhiyi yu jianwendichuwang) 靖难之役为明代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的夺取皇位的战争。明太祖朱元璋为保障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及抵御元朝残余势力，在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实行分封制，将他的 24 个儿子和 1 个孙子分封到全国各地；以一部分藩王驻守北方，抵御蒙古，如燕王、晋王、宁王等。其他则驻于内地各省，监督地方官吏。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死，长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朱允炆及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鉴于北方诸王势力太大，决定实行削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废去周、齐，湘、代、岷五王，同时部署兵力，准备袭燕。燕王朱棣智勇兼备，曾节制沿边兵马，多次战败蒙古，屡建奇功。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先发制人，起兵反抗朝廷。他援引《祖训》，打起清君侧，诛奸臣的旗号，自称此举为“靖难”，即消除祸难之意。朱棣迅速夺取河北大部，合并了宁王及朵颜三卫的军队，全力对付讨伐之师。建文帝先后派老将耿炳文、膏粱子弟李景隆督师北伐，数十万大军均被击败。赖盛庸与铁铉力战，双方相持于河北、山东战场。建文三年，燕王大举南下，灵壁之战后，士气更盛，于建文四年六月三日进抵南京金川门，守卫开门迎降。经过了 4 年战争，朱棣夺得了皇位，是为明成祖。建文帝为朱标次子，朱元璋孙，在位 4 年（1399—1402）。在位期间重农桑、兴学校、整顿吏治，采用削藩政策，巩固中央集权。但所重用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等，均是文弱书生，不懂军事。北上讨伐，一败再败。燕兵进京后，建文帝去向不明，一说：建文帝自焚宫中“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明史》卷 4《恭闵帝》）；一说：“帝由地道出亡”，落发为僧，云游于滇、黔、巴、蜀之间。正统年间曾还居宫中，寿年而终。真实下落难确考，为明史一大疑案。

（单福海 何本方）

明代北京

(mingdai beijing) 1368年，徐达攻克大都，改称北平。为了消除前朝“王气”，明军拆毁了元代的宫殿建筑。从便于守卫着眼，又改建了城墙，将北城墙南移5里，这自然废掉了原来东、西城墙上最北端的各一座城门，使城门总数减为九个(东、西、北面各两座，南面三座)。永乐元年(1403)，朱棣改北平为北京，四年决定迁都北京，于十五至十八年对北京进行了大规模营建，十九年正月，正式迁都北京。这次营建主要是兴建宫城和皇城。宫城即是现在故宫的范围，是在元代大内的旧址，稍向南移，并加了护城河。皇城的范围比元代有了扩大，皇城的南门为承天门(清初改称天安门)，承天门北部左右两侧，新建了太庙和社稷坛两组严格对称的建筑群。承天门前开辟了一个“T”形的宫廷广场，广场两侧是各中央官署所在。此外，还在北京城南郊建筑了规模宏大的天坛和山川坛。天地坛是合祭天、地的场所，1530年，始将天地分开祭祀，在北京北郊另修建地坛，用汉白玉建二层方台，象征大地，每年夏至，皇帝来此祭地神。原天地坛改称天坛并新建圜丘坛——一个三层的圆形石台，象征天圆，每年冬至，皇帝来此祭天祈谷。嘉靖年间，因东北女真兴起，威胁北京，为加强防御，增筑北京外城，由于工程浩大，财力不足，仅在北京城南面筑了外城，周长28里左右。元大都的城墙为用土夯筑的土墙，明代一律改为用城砖包砌。为了培养、选拔官吏，在北京东北部设立了最高学府——国子监，最多时有监生万人。在城东部修了贡院，是每三年一次举行开科取土的考场。城南部则逐渐形成商业区。

(齐吉祥)

紫禁城

(zijingcheng) 又称大内，今称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是明清两代封建王朝的皇宫，为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它建于明永乐四年至永乐十八年（1406—1420），后虽经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和扩建，仍保持原来的布局。占地面积 72 万多平方米，周围有高 10 米的城墙和 52 米宽的护城河，四隅有角楼，建筑面积达 15 万多平方米，共有宫殿 9000 余间。这些宫殿是沿着南北的中轴线排列，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40-1.bmp}

中轴线不仅贯穿紫禁城内，而且贯穿整个北京城。宫内建筑分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文华殿、武英殿为两翼，是封建皇帝举行大典和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重要场所。内廷，包括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和御花园，以及三宫两侧的东六宫、西六宫等。内廷是皇帝办事、居住和后妃、太后、太妃等居住的寝宫、游玩和供奉神的地方。另外还有库房、书楼、史馆等建筑物。

(吕瑞珍)

三杨

(san yang) 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历仕明代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为内阁名臣，亦为仁宣之治的主要辅弼者，并称“三杨”。杨士奇（1365—1444），江西泰和人，名寓。少年家贫，刻苦好学，曾在湖北各地做塾师多年。建文初被荐入翰林，充编纂官，修《太祖实录》。永乐初入内阁，参与机务。永乐二年（1404）选为太子属官，官至左谕德。成祖北巡，常使留辅太子。曾因太子受攻讦而下狱。仁宗即位，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太傅。宣宗朝和英宗初年，长期辅政。于谦、周忱、况锺等都由他荐引。杨荣（1371—1440），福建建安（今建瓯）人，原名子荣，字勉仁。建文时进士。初任编修，永乐时入文渊阁。太子立，兼为太子属官，官至右庶子。以多谋能断，为成祖所重，多次随行北征，升至文渊阁大学士。仁宗即位，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造反，荣请宣宗亲征，师出全胜。英宗初进位少师，后死于归省途中。杨溥（1372—1446），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字泓济。建文进士，任编修。永乐时为太子属官，官至洗马。后因太子遣使迎帝太迟，下狱10年。仁宗即位后释放，任翰林学士。又建弘文阁侍值，以溥掌阁事，并升为太常卿。宣宗即位，召入内阁，升任礼部尚书。英宗初升少保、武英殿大学士，与士奇、荣并列于朝。时人以宅邸位置分别称士奇为“西杨”，荣为“东杨”，溥为“南杨”。士奇有学行，在朝多次进谏，匡正政事之失，待人宽厚而不记私仇。荣曾在帝前说他的坏话，他却仍旧称赞荣的长处。荣有才识，遇事敢为，谙练政事，通晓边务。溥有德操，为人质朴雅静，心无城府，恭谨待人。三杨皆为仁宗在东宫时的旧臣，为维护朱高炽的太子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深得仁宗、宣宗的信任。“仁宣之际，政在三杨”（《明通鉴》卷21）。三杨历仕四朝，正是明代内阁权力上升之时。“杨士奇在内阁43年，……杨荣37年，杨溥22年。”（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3）三人皆为内阁大学士，兼任公孤官，这对于阁臣权力的增长，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锋 何本方）

郑和下西洋

(Zheng he xiaxiyang)指明初郑和奉命出使 7 次下西洋的航海活动。郑和,本姓马,回族,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世界著名的航海家。洪武(1368—1398)时入宫,初在燕王藩邸任职,随朱棣起兵有功,擢升为太监,赐姓郑。历事永乐(1403—1424)、洪熙(1425)、宣德(1426—1435)三朝。世称“三保太监”,也称“三宝太监”。明人划分东西洋以今婆罗洲为中心,婆罗洲以西称“西洋”,以东称“东洋”。“文莱,即婆罗洲,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张燮《东西洋考》卷五《文莱》)郑和航海所到的地区大都在婆罗洲以西,所以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疑惠帝(朱允炆)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卷 304《郑和传》)特派郑和出使西洋。郑和第一次远航是永乐三年(1405)六月,他与副使王景弘等从苏州刘家河(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出发,首先到占城(越南南部),遍历爪哇(印尼爪哇岛),暹罗(泰国)、满刺加(马六甲)、苏门答腊、忽鲁谟斯(位于波斯湾)等地,于永乐五年九月返回南京,前后历时两年三个月。郑和这一次航行,共有船只 63 艘,人员 27000 多名,最大的船长 44 丈,宽 18 丈,可容千余人,是当时海上最大的船只。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具有最先进的航海设备。从永乐六年到宣德八年(1433),郑和又六次率领舰队远航。前后历时 20 余年,共经历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比西方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早将近一个世纪,舰队规模和船只之大更是远远超过了他们,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盛举。郑和远航的船队,满载瓷器、丝绸、锦绮、铁器等,一方面代表明朝皇帝向各国赠送礼品,邀约他们派使臣到中国访问;同时也和他们进行贸易,交换象牙、宝石、珍珠、香料等物。郑和的远航,促进了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很多国家在郑和的远航船队访问后派使臣来中国建立邦交和进行贸易。后郑和的随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至各国的情况,丰富了中国人民的世界知识。

(马克锋 何本方)

天妃灵应碑

(Tianfei lingyingbei) 在福建长乐县城关天妃宫内。长乐面临台湾海峡，附近有山峰环抱，是一处良好的避风港，郑和下西洋前多在此停泊等候出海的时机。天妃也称天后，是传说中的海神，中国古代的海港地区多立庙祭祀，乞求庇佑航海平安。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第七次统领舟师下西洋前，“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如是勒纪于石”。在碑文中记述了前六次航海的简况，摘录如下：“……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迄今七次，所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盗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刺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祿 狮子，卜刺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麋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赍捧金叶，表文朝贡……”。

（齐吉祥）

土木堡之变

(Tumubao zhibian) 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英宗被俘事件。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 2000 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 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 50 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 3 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槊槊死。明 50 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马克锋)

北京保卫战

(Beijing baoweizhan)明代北京军队抗击瓦剌军进攻的战役。土木之败，使明王朝遇到严重的危机。于谦挺身而出，艰苦经营，刷新内政，加强战备。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六日，消息传到京城，皇宫上下惊慌一片。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京城大官富户纷纷南逃，有的大臣也主张南迁。于谦、陈循、王直坚决反对，主张保卫京师为天下根本。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朱祁钰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也先挟英宗要挟明廷之计不逞，遂于十月率大军进犯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与瓦剌军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大败。随后又转战至西直门进攻明军，也被明军击退。瓦剌军不甘失败，又在彰义门组织进攻，明军失利，瓦剌军追到土城，遇居民阻遏，不得推进。加上天寒地冻，京师外围守军的奋力抵抗，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京师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想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

(马克锋)

荆襄流民起义

(Jing Xiang liumin qiyi)指明中期湖北荆州、襄阳一带的流民起义。明朝初期，政府对人户的控制比较有效，但到明中叶时，随着土地兼并的剧烈和赋役的苛重，“逃户”和“流民”日益增多。当时流民聚集得最多的是荆襄地区。荆襄的郟阳地区，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延蔓数千里，山深地广，有大量空闲荒地，是流民屯聚开垦的理想地区。长期以来，许多破产农民流亡到这里垦荒开矿，到成化年间，聚集到这里的流民已达150万人以上。为了加强这对一带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明朝政府特地添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管理制、襄、南阳三府流民事宜。由于明政府履次强令驱散流民，成化元年（1465），荆襄流民在刘通、石龙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刘通称王，国号汉，年号德胜，设将军、元帅、国师、总兵等官。众至4万人，分作7屯，且耕且战，分兵进攻襄、邓、汉中。明朝政府急忙派工部尚书白圭、湖广总兵李震前去镇压。次年，刘通、石龙被俘牺牲，起义暂时失败。但连续几年旱灾，流民仍源源不断地进入荆襄山区。到成化六年（1470）李原和小王洪又举起反抗的大旗，李原自称太平王，聚众数万，置总兵、先锋等官，受到百万流民的拥护。次年都御史项忠督军25万，分八道进攻。李原等被俘牺牲，流民被强迫遣散，沿路被杀和因饥饿瘟疫而死的达数十万人，史称“兵入，尽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明宪宗成化实录》卷98）。项忠立起一块《平荆襄碑》纪功，人们称它为“堕泪碑”。由于社会矛盾没有解决，饥饿交迫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成化十二年荆襄流民又集聚到几十万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祭酒周洪谟乃著《流民说》，主张安抚。明廷采纳了这项建议，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郟阳，抚定流民。于是有96000多户，近40万流民于当地附籍。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马克锋）

刘六、刘七起义

(Liu liu liu qi qi yi) 明中叶爆发于北直隶(今河北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北直隶是明朝的统治中心。明朝正德(1506—1521)年间,皇室和郅贵在这里广置庄田,大量夺占农民的土地;官府签派养马,死亡赔纳,往往卖田产鬻子女,苦不堪言,无怪乎当时人说:“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5)同时,北直隶环临京师,又是厂、卫特务人员肆虐最厉害的地方。因此,这里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人民生活极为痛苦,不断起来反抗。正德五年(1510)十月,由文安人刘六、刘七为首在霸州举行起义,民众响应,旬日之间聚集数千人,屡败官兵,深得人民拥护和欢迎。文安生员赵鏐,也与他的两个弟弟率500人参加起义军。正德六年,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以后又由山东反攻京畿。“自畿南达山东,倏忽来去,势如风雨。”(《明史纪事本末》卷45《平河北盗》)不久有众数万人,于是兵分两路:以刘六率领刘七、齐彦名为一路;以杨虎率领刘惠、赵鏐、邢老虎为一路。两路起义军时分时合,互相支援,转战于河北、山东等地。当年九月,杨虎一路起义军,破兴济、沧州,经由山东蒙山,进军济南、兖州、莱州等地。明派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镇压义军。十一月杨虎在渡小黄河时落水牺牲。至正德七年五月,余部赵鏐、刘惠也被明军击散。刘六、刘七率领的另一路起义军,从山东重入河北,进至香河、宝坻,转攻武清,大败明军,威胁京师。赵鏐兵败后,刘六、刘七孤军奋战,率部走湖广,在黄州兵败,刘六与其子投水自杀。正德七年七月,刘七与余部全军覆没于江苏狼山,起义失败。这次起义,持续三年,转战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等广大地区,狠狠地打击了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深得人民拥护。

(马克锋 何本方)

戚继光抗倭

(Qi jiguang kangwo) 即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击日本海盗骚扰的斗争。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明初开始，倭寇对中国沿海进行侵扰，从辽东、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到处剽掠，沿海居民深受其害。明初筑海上 16 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明史纪事本末》卷 55《沿海倭乱》），取得了一些成效。至嘉靖时，倭寇又猖獗起来，并与中国海盗相勾结，对闽、浙沿海地区侵扰如故。在倭寇长期为患之时，明朝军队中涌现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山东东牟（今莱芜）人。父死，袭官登州卫指挥僉事，升任都指挥僉事，负责山东御倭兵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浙江，任参将，积极抗御倭寇。他鉴于卫所军有不习战阵的弱点，恳请获准后亲赴“俗称慄悍”的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组织训练一支 3000 多人的新军。他治军有方，教育将士要杀贼保民，严格军事训练，“教以击刺法，长短兵选用”（《明史》卷 212《戚继光传》），排演自己创制的鸳鸯阵。由于新军将士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嘉靖四十年，倭寇焚掠浙东，他率军在龙山大败倭寇。继之在台州地区 9 战皆捷，扫平浙东。次年率 6000 精兵援闽，捣破倭寇在横屿（今宁德东北）的老巢。嘉靖四十二年再援福建，升总兵官，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卫（兴化城东），“斩级二千二百”。次年春，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福建倭患遂平。嘉靖四十四年又与俞大猷会师，歼灭广东的倭寇。东南沿海倭患完全解除。

（马克锋 何本方）

张居正改革

(Zhangjuzheng gaige) 明代张居正主持的一次改革。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穆宗死，他和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政大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为人善谋，独揽朝政，是明代最有权威的一个首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当政期间，面对吏治败坏、财政危机、赋役不均、军心涣散的局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整顿吏治。张居正目睹嘉、隆时期的混乱政局，认为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僚们“虚声窃誉”，“爱恶交攻”，结果吏治不清，贪官为害，故救时之急务便是刷新政治。万历元年(1573)提出考成法。其方法是逐级考核，随事考成，“抚按以此核属官之贤否，吏部以此别抚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观吏部之藻鉴。”(《张文忠公全集》奏疏5)以部院考查抚按，以六科监督部院，以内阁督察六科。实行相互制约、监督，借此提高内阁权力。同时，抑制宦官势力，整饬学政，加强对生员的控制，重用人才，裁汰“冗员十二、三”。结果，行政办事效率提高，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卷213《张居正传》)。整饬边防，改善民族关系。张居正安定边防的方针是“外事羁縻，内修战守”。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隆庆元年，调任御倭名将谭伦、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戚继光以曾对倭作战的浙兵作骨干，加紧练兵。他根据蓟州地理条件和蒙古兵作战特点，决定使用战车，并以步、骑配合作战。他又修补长城，建筑敌台一千多个，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戚继光整饬边备的工作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从而保证了北边的安全。辽东方面，经过王崇古、方逢时的修边墙，开屯田，战守力量也加强了。至此，长期以来“虏患日涂，边事久废”的局面得到扭转。在边防巩固的基础上，张居正还通过和谈来改善明朝和蒙古族之间的关系。停战议和，互市贸易，“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水，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卷222《王崇古传》)量入为出，节缩开支。为挽救当时的财政危机，维持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张居正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节省皇室的费用。另一方面，严加催征田赋和清理逋欠。万历初年，下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万历二年(1574)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第二年又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并用考成法来严厉督促官员奉行。经过一番整顿后，明王朝的财政收入有了好转。丈量土地，打击豪强。万历五年下令清丈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竣事。万历九年清丈基本完成，全国田亩数字为701万余顷。对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改革赋役制度，实行一条鞭法(参见《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是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明中叶以后积弱积贫的统治危机而搞的一场改良运动。经过改革整顿，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了，社会经济也有相对的恢复和发展，府库钱粮充羨，边防力量加强，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马克锋)

矿监、税使与民变

(kuangjian shuishi yu minbian)指明后期城市市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繁荣与白银的普遍使用，刺激了封建统治者的贪欲，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明神宗时，由于内外用兵，并营建宫殿、陵墓，使朝廷国用大匮，财政濒于绝境。为了括取市帛、勒索珍宝皇帝派出大批亲信宦官，到各地充当矿监税使，四出聚敛，肆意搜刮民脂民膏。所谓矿监，以开矿和征收矿税为名，凡是民间田园屋宇，都可指为矿穴，或抄家毁屋，或刨掘坟墓，实行公开掠夺。所谓税使，专门在重要城镇、关隘或交通要道，设卡征税，甚至穷乡僻壤，米盐鸡豕，皆令收税。这些矿监税使，掠夺民间金银，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一年贡献皇帝的就有白银90多万两，黄金1575两，还有钻石、水晶、珍珠、宝石等，中饱私囊的则数倍于此。他们手下豢养的拳师棒手直入民家，奸污妇女，甚至随意捕杀人民，终于激起民变，爆发了城市人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万历二十七年（1599），湖广人民反对宦官陈奉的斗争，是反抗矿监税使斗争的先声。湖广税监陈奉在荆州征税，恣行威虐，商民恨之入骨，“聚数千人噪于涂，竞掷瓦石击之。”（《明史》卷305《陈奉传》）吓得陈奉逃到武昌。万历二十八年，陈奉又在武昌征税，商民汇合万余人，把陈奉的爪牙五六个抛入江中，陈奉再逃。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爆发了商民反对税使孙隆的斗争。孙隆和他的参随黄建节及地痞多人设立“五关”，监收行商税，并擅自向机户加税，“妄议每机一张，税很三分”，“凡缙之出市者，每匹纳银三分”（沈瓚《近事丛残》），致使织户关门，机工失业，生活无着。这年六月三日，织工葛贤率众几千人在玄妙观誓师，兵分6路，奔向苏州各主要税卡，乱石打死黄建节，火烧地痞家宅，包围官府，孙隆逃走。万历二十七年，山东临清群众万余人在王朝佐率领下，驱逐天津税使马堂。万历二十九年九月，江西景德镇爆发了反对税监潘相的斗争；万历三十年，福建月港爆发了反对税监高霖的斗争；万历三十一年，北京西山窑工和运煤夫进京示威，反对王朝征商；万历三十四年，云南人民杀掉税监杨荣及其党羽200余人。同一时期，直隶、陕西、福建以至辽东等地商民也起来反对开矿征商，驱逐宦官的怒潮遍及全国。在城市商人、手工业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反抗斗争下，明神宗不得不下令撤回矿监税使，遏制了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的掠夺，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发展。

（马克锋 何本方）

明代宦官之祸

(mingdai huanguan zihuo) 即明代的宦官专权、祸国殃民之史事。明初鉴于前代宦官之祸，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卷 304《宦官传·序》）防范严密，宦官无机可乘。朱棣起兵“靖难”，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许多宦官立过战功。如狗儿、李兴、郑和、马靖等，开始受到重用。“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明史》卷 304《宦官传·序》）虽然宦官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明英宗时，开始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专权主要表现在：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在宦官 24 衙门中，司礼监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权力极大，“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明史》卷 72《职官一》），势焰在内阁之上；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甚至左右内阁大臣的去留；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职务；操纵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残害官民。明代宦官之祸迭起，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成化以前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正统年间，王振在朝中擅权，屡次对麓川用兵，劳师糜饷；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耽于逸乐，不问政事，遂使宦官得势。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铭、梁芳、钱能、韦兴、陈喜、王敬等人。其中以汪直最为有名。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屡兴大狱，激化了朝臣与宦官的矛盾。宦官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明史纪事本末》卷 37）。武宗时，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为“八党”，也称为“八虎”。刘瑾最为专横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必须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中去办事。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熹宗时宦官魏忠贤炙手可热，权倾朝野，“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卷 364《魏忠贤传》），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陷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自称九千岁，下有 5 虎、5 彪、10 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王振家藏金银 60 余库，刘瑾家有黄金 24 万锭又 57800 两。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安。

（马克锋 何本方）

明末党争

(mingmuo dangzheng) 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乡无锡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抨击当权派。一时“士大夫抱道杵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明史》卷 231《顾宪成传》）。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以此得名。与东林党同时，另一批官吏士绅又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都与大地主集团相互勾结，“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明史》卷 236《夏嘉遇传》）。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其他各党皆以乡里命名。在这些党派中，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明末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京察”（考核官吏）开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明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为长。但神宗宠爱郑妃，欲立常洵，乃迁延不立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先后依违其间。东林党人上书反对，各党派又群起反对东林。于是有“国本”之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李三才入阁”之争，东林党与它的反对派在立太子问题上展开了长达 20 余年的争论。最后，神宗终于立常洛为太子，勋戚郑氏的权势受到一定的压抑。但东林党推李三才为相的愿望也没能实现。熹宗天启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昆、宣各党派一度受到排斥。为时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魏忠贤是司礼秉笔太监，又提督东厂，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朝廷内外，“遍置死党”，从而把持朝纲，为所欲为。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被锦衣缇骑逮捕。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也被捕处死。东林党受挫。崇祯帝继位，捕杀阉党。南明福王政权下，东林党人与阉孽的斗争仍在继续。如“复社”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在党争的过程中，东林党人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权派的胡作非为，反对王公、勋戚对土地的掠夺，反对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市民的支持拥护。但明末激烈的党争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

（马克锋）

荒年志碑

(Huangnianshibei) 在河南内黄县苏王尉村，明崇祯十七年(1644)刻立。碑文记载了崇祯十二年至十七年，河南地区连年灾害，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同时也反映了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得到发展壮大的情况，是研究明末政治、经济的重要史料。碑文摘录如下：“记崇祯十二年春，旱风相仍，麦减收。至六月，大旱，蝗虫遍残，五谷减收。至冬月，不降片雪。此虽荒年，而人未死。记十三年春，红风大作，麦死无遗。□家□食野菜树皮，受饿者面身黄肿，生瘟病死者有半。至五月二十二日方雨。棉花、高粱、谷、豆，一时播种。至六月三日伏无雨，旱蝗残食，五谷不收。至八月二十四日降霜，荞麦不收。当时斗麦价钱六百文，斗米价七百文，斗豆价四百文。民流为盗，蜂拥蚁聚，无不被害之家。穷者饿极，凡遇死人，争剥肉以充腹，甚至活人亦杀而食。垣颓屋破，野烟空锁，子母分离，赤地千里，诚可怜也。”

(齐吉祥)

李自成与大顺农民军

(lizichen yu dashun nongminjun) 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陕西米脂人,农民出身,当过驿卒。崇祯二年(1629)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将。崇祯九年高迎祥战死,继称闯王,率部众转战于川陕之间。崇祯十一年,潼关战败后率余部退入商雒山,次年复出。崇祯十三年从四川突围入河南,用牛金星、李岩等地主知识分子为谋士,提出“贵贱均田”、“迎闯王,不纳粮”等口号,饥民争相依附,义军发展到百万之众。崇祯十六年,以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初建政权。中央设丞相一人,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创建五营军制,即中权亲军、左营、右营、前营、后营等。同年,在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孙传庭军队,乘胜破潼关,下西安。崇祯十七年在西安建大顺国,年号永昌,封功臣五等爵,设立中央机构。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又置六政府,设尚书、侍郎作为首长。地方官增设节度使。定设五营军制,即中吉、左辐、右翼、前锋、后劲五营。同年二月从陕西经山西进攻北京。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推翻明朝。当时全国局势发生变化,起义军内部分裂,在吴三桂和清军联合进攻下,撤出北京。永昌二年(1645)败于潼关,弃西安,东下湖广,四月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被害。余部在李过、李来亨等领导下组成夔东十三家军,联明抗清,一直坚持到康熙三年(1664)。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45-1.bmp}

(单福海 何本方)

张献忠与大西农民军

(zhangxianzhong yu daxinong min-jun) 张献忠(1606—1646)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

陕西延安人，出身贫苦，崇祯三年（1630）率领米脂十八寨农民起义，自号八大王。崇祯八年荥阳大会后，与高迎祥大举东征，从河南入安徽，占明中都丹阳，焚明皇陵，转战于豫、陕、鄂、皖等地。崇祯十一年在湖北接受“招抚”，驻兵谷城，屯田自养。次年再起，由楚入川，用“以走制敌”的战术，拖垮敌军，直捣襄阳，杀襄王，发饷银赈饥民。崇祯十六年攻下武昌，称大西王，初建官制，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并开科取士。后又弃武昌，席卷湘赣，诛豪绅，宣布钱粮三年免征，农民群起响应。崇祯十七年再度入川，在成都建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中央设内阁六部，置丞相、六部尚书等官。设五军都督府，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奇能四将军，分辖70营，所部有数十万之众。辖境占有四川的大部分。大顺三年（1646）冬，张献忠率军在川北西充的凤凰山迎击清军遇伏而死。四将军遵其遗嘱引兵南下，接受桂王封号，联明抗清，转战于云、贵、湖广、四川一带，直到永历十五年（1661年）失败。

（单福海 何本方）

建州三卫与辽东马市

(jianzhou sanwei yu liaodongmashi) 明代在东北地区建州女真部设置的军政机构，为建州三卫。明初统一东北地区，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下设卫所，控制女真各部。建州女真是由元代女真族中的胡里改部和斡朵怜部发展而来的，原居于以今黑龙江依兰为中心的松花江下游一带，后来南迁。永乐元年（1403），在奉州（今吉林市以南）设立建州卫，以胡里改部酋长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赐汉姓李名诚善。永乐七年改归新设置的奴儿干都司管辖。永乐十年，又在奉州设立建州左卫，以斡朵怜部酋长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猛哥帖木儿迁至会宁（图们江下游）。正统三年（1438），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阿哈出之孙）迁至苏子河畔（今辽宁新宾），正统五年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率部亦迁至苏子河畔。正统七年，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与凡察争夺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明为了调解纠纷，另置建州右卫，以董山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凡察为建州右卫指挥使，自此有“建州三卫”之称。明中央政府给建州三卫指挥使颁发敕书，令他们世代为官，兼治军民。“抚绥部众”、“看守地方”。建州三卫的设立对东北开发起了很大作用，发展到明后期建立大清国，开国者努尔哈赤即是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的后裔。马市乃明政府为便利女真人、汉人及东北各族贸易而开设的市。马市设于辽东通往女真地区的交通重镇。永乐四年，正式开设马市，当时有3处，“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真；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毕恭《辽东志》卷3）后随贸易发展，又陆续增设。如抚顺马市、古城堡南之马市，及暖阳、宽甸、清河等处马市。马市分为官市、私市两种。明廷收购军用马匹称为官市；女真与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易称为私市。贸易商品来自女真的有马匹、貂皮、人参等土产品，来自汉族地区的有铁制工具、生产资料、生活用品。明廷派官员主持马市，征收马市税。初期以物易物、后来实行货币交易。女真部参加马市贸易的次数愈益频繁，人数愈益增多，对女真地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单福海 何本方）

耶稣会士东来

(yesuhishi donglai) 16世纪中，欧洲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与殖民势力相结合，开始东来传教。耶稣会，拉丁文 Societas Jesu 的音意合译。天主教修会之一。1534年西班牙贵族、军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1541年决定向外传教。于是总会长罗耀拉就派遣西班牙贵族方济各·沙勿略作为“教会远东使节”去印度。耶稣会开始东来。16世纪下半期，葡萄牙人已在我国澳门半岛定居，除了商人外，还有耶稣会传教士。1665年澳门出现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中国人当中传教。罗明坚 (Michel Ruggieri) 是最早到达大陆的耶稣会士，而影响最大的则为利玛窦 (Matteo Ricci)，他是耶稣会在中国内地开教的创始人。利玛窦 (1552—1610)，意大利人，1582年随罗明坚到达澳门，剃发剃须，穿和尚服，作为“番僧” (后改儒服，称为西儒)，尽量“中国化”，按中国习惯打躬作揖，见了高官还欠身下跪，加上利玛窦凭他对天文、数学和舆地的博学，结识了许多大官和士大夫，以及名流学者。因此先后在广东肇庆、江苏南京、江西南昌、北京四地建有教堂，甚至还得到明朝皇帝的优待。利玛窦以后，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日渐增多。康熙皇帝曾任用传教士绘图。著名的传教士有：汤若望、南怀仁。康熙五十九年 (1720) 罗马教皇一纸公文，指责耶稣会中国化，提出纯洁基督教礼仪，激怒康熙皇帝。于是从康熙年间起，经雍正、乾隆几朝，掀起了百年禁教、排教风潮，使天主教几经蹉跌，一蹶不振。耶稣教东来几乎中断。

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科学。他所制的世界地图，使国人知五大洲之说；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使人们得以系统了解几何学；其他哲学、逻辑、水利、物理之学都有介绍。同时，利玛窦素称“仰慕中国的文化政治”，把中国文化的优秀典籍也介绍给西方。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功不可没。

(马克锋)

南明政权

(Nan ming zhengquan) 明末北京失陷后朱姓宗室在南方建立起来的诸政权。有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鲁王政权，唐王绍武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韩王定武政权，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福王和桂王政权。顺治元年（1644）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丹阳总督马士英等人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福王政权一方面抵御清军南下，一方面继续剿杀农民军。顺治二年春，清军始攻福王。福王政权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党争和内战，只有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坚决抗战，死守扬州。清军攻下扬州，杀害了宁死不降的史可法，并实行屠城。五月清军占南京，俘虏福王。弘光政权仅仅维持一年就灭亡了。当年六月，故明官吏、缙绅钱肃乐等扶植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建立政权。鲁王依据钱塘江天险，与清军相持一年，至顺治三年五月绍兴城破，鲁王出走而覆灭。在鲁王监国的同时，故明官吏黄道周和军阀郑芝龙等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号隆武。但两政权不能合力抗清，反而互争“正统”，彼此水火不容。清廷诱降了拥有重兵的郑芝龙，在攻下两浙之后兵入福建，消灭了隆武政权。顺治三年十一月，故明官僚苏观生等人拥立隆武帝的弟弟朱聿 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而仅过了40多天清军攻陷广州便灭亡了。绍武政权创立的同时，由两广官吏瞿式耜、丁魁楚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帝，改元永历。初期与广州唐王绍武政权互争“正统”，清军乘其内战，攻入广东，桂王奔逃于两广。此后由于抗清坚决的何腾蛟、堵胤锡、瞿式耜等将领力战，并得到大顺军、大西军的支持，政权方得以维持。顺治十三年李定国迎桂王到云南。顺治十五年吴三桂攻入云南，于顺治十八年入缅甸俘获桂王，支撑16年之久的桂王政权终于灭亡了。

（单福海 何本方）

都司卫所

(dusi weisuo) 明代的军事机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创立了都司卫所制度。明初在各省设都卫，管理地方军事。洪武八年(1375)改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又设行都指挥使司，简称行都司。共计有16个都司，5个行都司。其长官为都指挥使，乃地方最高军事长官，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并称三司。都司分隶于京师的五军都督府。在京师和各省皆设卫所，京卫有上直卫，南、北京卫。上直卫北京26个，南京17个。京卫北京48个，南京49个。各省在军事上重要的地方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大抵5600人为1卫，1120人为1千户所，112人为1百户所，卫所设有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等官。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卫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二十五”(《明史》卷90《兵志》二)。全国军兵约计180万。永乐中为了巩固东北边疆曾设奴儿干都司及132个卫。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明朗军士皆别立户籍，叫做军户，军户是世袭的，一旦入籍为兵就不能随意脱籍。军户皆由国家分给土地，令其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军官负责操练、屯田，一遇国家有事，则拨归兵部派遣的总兵官统领作战。战事结束，总兵交还将印，军士归还卫所。五军都督府无调兵之权，兵部无统兵之权，兵权操于皇帝一人之手。明代中叶以后，屯田破坏，军士缺乏训练，仅供役使，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也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单福海 何本方)

永宁寺碑

(Yongningsibei) 永宁寺位于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村以北 2.4 公里的江岸石崖上，是永乐十年（1412）亦失哈再次到该地巡视时为“柔化斯民”而建的佛寺。寺旁有两块石碑，一名《永宁寺记》立于永乐十一年，刻文 30 行，每行 64 字。一名《重修永宁寺记》，立于宣德八年（1433），刻文 30 行，每行 44 字。两块碑均记载了明创立奴儿干都司的经过，叙述了亦失哈巡视奴儿干的简要过程，在碑记后面还有一百多人的题名，其中既有汉族人，也有少数民族。在中外文献中有不少关于这两块碑的记载，1808 年日本人间宫林藏在进入黑龙江流域“探险”时，曾见到这两块碑，并写入他著的《东鞑纪行》一书（1942 年东京版），1885 年中国学者曹迂杰奉命到黑龙江东岸调查，也看到这两块碑，并拓了碑文。1904 年老沙皇将这两块碑搬走，先是到了海参崴博物馆，据说后又转移了。碑文摘录如下“……惟东北奴儿干国……其地不产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好弓矢，诸般衣食之艰，不胜为害……永乐九年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昔辽、金俦民安故业，皆为尧舜之风，今日复见而服矣。……依土立兴卫、所，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

（齐吉祥）

亲军卫和京营

(qinjunwei he jingying)明代亲军卫是皇帝的侍卫亲军，全称亲军指挥使司。掌番上宿卫，保卫宫禁，直属皇帝，不隶五军都督府。上直卫亲军共 26 个，洪武中置上 12 卫，永乐中置上 10 卫，宣德八年(1433)又置御马监 4 卫。各上直卫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四人及镇抚、经历、知事等官。亲军卫中锦衣卫执掌侍卫，巡察缉捕及刑狱等事。旗手卫掌大驾金鼓、旗纛，帅力士随驾宿卫，统所 5。府军前卫，掌统领幼军，轮番带刀侍卫，统所 25。金吾、羽林等 19 卫，掌守卫巡警，统所 102；御马监之腾骧等 4 卫，标为禁兵，掌帅力士值驾、随驾，统所 32。京营即京军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为明代拱卫京师之主力军，亦随皇帝亲征作战。永乐二十二年(1424)置。明成祖朱棣为远征漠北，将所率京卫军分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是谓五军营。三千营，是以塞外降丁三千人组成，神机营是征交趾(今越南北部)后设置的专门操演火器的部队。三大营中，五军营、神机营各设五军营制。五军营、三千营各设五司营制。每营都由皇帝派遣勋臣或太监提督营务；提督下设坐营、坐司，管各哨、掖军及各司。三大营是京卫军，五军司营阵，三千司巡哨，神机司火器，此外还负有训练部队之责。土木堡役后，三大营损失殆尽，景泰中改立团营。嘉靖时复罢团营，恢复三大营建制，并改三千营为神枢营。京营由于营帅无能，宦官监临，失去了战斗力，终于导致亡国。

(单福海 何本方)

内阁与大学士

(neige yu daxueshi)明清两代的内阁是封建皇朝中央政府的最高办事机构，内阁中的大学士地位类似前代的宰相。明朝初期，朱元璋撤销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置华盖殿、英武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选用一些翰林院的学士、侍读、编修等官员入值，协助皇帝处理书奏，以及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诏书、敕诰。其时，大学士也只是担任顾问和秘书的职务，“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明史》卷72 《职官志》），权限不大。永乐年间，解缙、杨荣等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因其在内殿阁办事而称“内阁”，内阁正式设立。当时规定：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级别也不过正五品，属于中级官员，且“不置官属，不得专判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同上）。内阁大学士只能遵照皇帝的命令办事，由皇帝“自操威柄”，内阁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明仁宗以后，内阁权位渐高。宣德时，大学士杨荣、杨士奇、杨溥等兼领尚书，并称“三杨”，权势较大。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治腐败，皇帝“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廿二史劄记》），由内阁代替皇帝草拟诏命、敕诰，六部尚书凡事须请示内阁大学士，而且“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内阁大学士有多人，其中一人为首领，称“首辅”。首辅更是位极人臣，一切朝政归其调度，俨然成为实际的宰相。此后，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嘉靖时把持朝纲20年的严嵩和万历时主持改革的张居正，都是明后期影响很大的内阁首辅。与此同时，围绕着首辅地位的内阁纷争也愈演愈烈。明中叶以后，宦官的势力不断发展，逐渐控制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司礼监代替皇帝批阅奏章，传布政令，凌驾于内阁之上，以至“首辅亦仰其鼻息”，“阁臣亦听命矣”。因此，内阁的权力也受到一定限制。清代的内阁制度沿袭明朝，并有所取舍。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裁撤内三院为内阁，设立殿阁大学士4人，协办大学士2人，均是满汉各半，其职务为“参赞机务，表率百僚”（《乾隆会典》卷二）。内阁下设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房、诰敕房等机构。具体职责是：替皇帝起草诏命、批答奏章，主持大典仪式等。与明代比较，清代内阁制度比较正规、比较完备，但实权远比明代为小。清代皇帝处理军国大事，最初是通过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后则由军机处策划。内阁虽居一切官署之首，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实际上却只能处理一般的行政事务。这种情形，一直沿袭到清末。

（马克锋）

改土归流

(gaitu guiliu) 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改任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云南、贵州、广西地区是中国苗、彝、瑶、侗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明初承继了元朝的土司制度，在这些地区任用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担任各级长官，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统称为“土司”。这些世袭的土司不断发生争夺地盘和反对明朝的战乱。

在平定战乱后，明廷就逐渐裁撤土司，代之以可调迁的“流官”，这种办法叫“改土归流”。永乐十一年（1413），思南、思帅的土司互相仇杀，朱棣出兵平定战乱，“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从此贵州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万历时期，播州（今贵州遵义）苗族上层分子杨应龙叛乱，明政府平叛后，即在其地设遵义、平越（贵州黄平）二府，改用流官统治。但明朝只是在西南部分地区实行。清初沿袭明朝的办法，继续在西南地区推行流官制。大规模改土归流开始于雍正四年（1726）。当时署云贵总督鄂尔泰向雍正皇帝建议：“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先正事略》卷13）雍正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任命他担任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负责改土归流事宜。鄂尔泰通过对土司采用招抚两种办法，用了五六年时间，到雍正九年（1731）基本上完成了三省的改土归流任务。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借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的机会，把四川西北部的土司逐渐废除，改用流官。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那里设立保甲，稽查户口，加强了控制。改土归流的结果，使西南地区基本上消除了土司的割据状态，改善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落后闭塞的面貌，有利于国内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进一步联系，有利于巩固边疆，因而也多少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马克锋）

明代的官田和民田

(mingdai de guantian he mingtian)明代封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形式。明初定制，分天下田为官田、民田两类，凡为封建国家或皇室所有并由政府征收地租的田地为官田。官田起初只有宋、元时的入官田地，后来名目渐多，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孺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明史》卷77《食货》一）官田中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是屯田，由国家提供种子、耕畜等并经营管理。洪武、永乐年间，全国屯田面积大约90余万顷，加上其他官田，总面积便有100多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面积的1/7左右。宗室、勋戚请乞的钦赐庄田是一种私有化的官田，肆无忌惮地夺占民田，是明代田制中的腐败因素。其他官田由民间经营，政府征收地租。官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得买卖，多以招佃承租为主，田丁免徭役。官田虽然比私田少，但是由于官田赋重，特别是占比重较大的江南官田赋重，因此官田收益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民田亦称“私田”，与“官田”对称，为私人占有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要按时向政府缴纳田赋。田赋较官田为轻，但是必须负担差徭。官僚、地主拥有大量民田，广大农民少地或无地，并且时时有被庄田夺占的危险。由于豪强兼并，隐占土地，农民赋重逃亡，明中叶全国纳赋土地数量锐减，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万历初，张居正主持清丈全国田土，查出大量隐占的官田、私田，均平赋役，改善了国家财政状况。

（单福海 何本方）

一条鞭法

(Yitiaobianfa) 明中期以后推行赋役改革而实行的新制度。鞭或作“编”、“边”，简称“条编法”，又有“类编法”、“明编法”、“总赋法”等别名。明中期土地兼并剧烈，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全国纳赋地亩减少一半，而国赋总额几乎不变，地亩赋额增多；金派徭役的项目渐趋繁多，享受免役特权的人也增多，繁重的徭役便落在民户头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生活痛苦不堪，不断起义反抗。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统治，一些有识的官吏开始试行赋役改革，从正德到嘉靖年间先后有征一法、一串铃法、十段锦法、纲银法和一条鞭法等新法。张居正于万历初年出任内阁首辅，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总结了以往赋役制度改革的经验，决定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此法颁行于万历九年（1581），主要内容如下：

赋役合并，以丁田分担役银。将原来征收的两税、徭役及土贡方物等合并为一项，徭役一律征银，取消力役，由官府雇人应役。役银由人丁、田地分摊。田赋一概征银。除苏、松、杭、嘉、湖征本色粮供皇室、官吏食用外，一律征折色银。计算赋役数额以州县为单位，原额不变。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不再假手于里长、粮长。一条鞭法的实行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续通典》卷7），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逃避赋役和官吏贪污舞弊，有利于减轻贫苦下户的负担；役银由以户、丁为征收对象改为以丁、田分担，也于少地、无地的百姓有利；赋役征银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项改革是唐代改行两税法以来赋役制度上的最重大的变动，它又为清代的“摊丁入地”改革创造了前提。

（马克锋 何本方）

明代江南市镇的兴起

(mingdai jiangnan shizhen dexingqi) 指明代中后期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的一批工商业市镇。江南市镇最早出现于宋元时期。所谓市称墟市，又叫草市，历来是商贾进行贸易的地方。所谓镇原指兵将戍守的军镇。宋代废除军镇，设官“主烟火兼征商”（谈钥《（嘉泰）吴兴志》），并将镇渐渐升格为乡以上、州县以下的行政单位。市镇工商业繁盛，成为大城市与乡村间新兴起的中小城镇。明代中、后期市镇在全国各地都已出现，而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分布最广，数量也最多。据《（正德）姑苏志》载，苏州府市镇竟达73个之多。《（万历）湖州府志》又载，该府市镇也有20多个。应天府的3县有12镇29市。常州府的江阴县有11镇21市等。这些市镇都有发达的工商业，如湖州府乌程县乌镇，“商贾走集于四方，市井数盈于万户”。德清县塘栖镇，地处官道舟车之冲，丝织品与粮食贸易兴隆。嘉兴府崇德县石门镇，“饶米菽丝纴，商贾辐辏，浮于邑。”（《（康熙）石门县志》卷7）桐乡县皂林镇，“明（天）启、（崇）禎间尤为蕃庶，薄暮四方舟楫云集，张灯夜市，成河路之要津。”（《（光绪）嘉兴府志》卷4）秀水县王江泾镇乃千家巨市，近镇村坊都以种桑养蚕织绸为业，四方商贾俱至此收货，买卖十分热闹。江南市镇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夹河为市，多为水乡市镇；大多分布在手工业、商业发达和种植经济作物普遍的地区；许多市镇带有行业性特征；出现一批工商业巨镇，如苏州的盛泽、松江的枫泾、嘉兴的濮院、湖州的南浔等。明代江南市镇的兴起，是当时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结果。

（马克锋 何本方）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ziben zhuyi mengya de chuxian)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开始出现,但尚未在全部生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明代中后期,即嘉靖、万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开始萌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时商品生产不断扩大,各地商业往来日趋频繁,工商业繁盛的城市和市镇大量涌现,国内商业中心区之间的联系愈益紧密,海外市场也有所开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以白银为主,东、西洋的白银源源流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产生于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的丝织业、棉布业、榨油业、矿冶业等部门,在农业中也有表现。包买商和手工工场也主要出现在这些部门之中。丝织业以苏州最发达,史载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明神宗实录》卷31)这就是说,存在着“机户”雇佣“机工”从事丝织生产的情形。时人蒋以化也说:“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西台漫记》卷4)文中所说的“大户”和“小户”的关系,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明神宗实录》卷361对出卖劳动力的机工的身份也有记载,它说:这些人是“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皆自食其力之良民”。所谓“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就是说,他们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所谓“浮食寄民”,是指随处流动为生,不系户籍的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政府的控制,是可以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松江的棉布袜制造业,据《古今图书集成》卷696《松江府部》记载:“郊西尤墩布,轻细洁白,市肆取以造袜,诸商收鬻,称于四方,号尤墩暑袜。妇女不能织者,多受市值,为之缝纫焉。”可见松江暑袜店的店主就是由商业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的包买主,而为店主缝纫的当地人就是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已属资本主义经营性质。万历年间,浙江崇德县石门镇的榨油业中,已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榨油工人皆招募而来;“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光绪)嘉兴府志》卷14)说明他们是出卖劳动力的人。铁冶业中,广东韶关、惠州等地,“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每炉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矿,煽铁取利。山主矿主利其租税,土脚小民利其雇募。”(《广东通志初稿》卷30)太湖地区的农村,当时普遍出现农业雇佣劳动。有“长年”、“忙月人工”、“月工”、“短工”、“工人”等多种雇佣劳动名称。明代中后期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产生的重要前提即商品经济虽与以前相比堪称发达,但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各地商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封建的生产关系仍是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在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单位里,封建残余大量存在。尽管如此,刚刚出现的不完善、极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毕竟代表了新社会的曙光,从此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逐步走上缓慢解体的道路。

(马克锋 何本方)

明十三陵

(Mingshisanling) 在北京昌平区天寿山下。各陵墓名称是：长陵（成祖）、献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宪宗）、泰陵（孝宗）、康陵（武宗）、永陵（世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庆陵（光宗）、德陵（熹宗）、思陵（思宗）共十三座。各陵除面积大小，建筑繁简有异外，其建筑布局等基本一样。平面均呈长方形，后面有圆形（或椭圆形）的宝城。建筑自石桥起，依次分列陵门、碑亭、棱恩门、棱恩殿、明楼、宝城等。各陵原设有监，专管祭祀扫陵之事，现存德陵监监墙。十三陵以长陵和已发掘的定陵为最著称。

长陵位于天寿山主峰下，建于永乐十一年（1413），为十三陵最早最大的一座陵墓。整个陵园围墙环绕，分为三个院落，有陵门、神库、神厨、碑亭、棱恩门、棱恩殿、棂星门、宝城、明楼等（部分建筑已不存）。宝城砖砌，圆形，直径约340米，周长1公里多，上有垛口，形似城堡。内为高大的封土，封土下面就是地宫的位置。明楼呈方形，四面辟券门，中贯十字形穹窿式天花。顶为黄瓦重檐歇山式，上檐下有匾额，书“长陵”二字。正中碑一座，上刻“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长陵地面最大建筑为棱恩殿，其形式、规模与故宫的太和殿差不多。殿面宽九间，进深五间，殿内有32根金丝楠木明柱，高四丈，直径3~4尺。黄瓦红墙，重檐庑殿顶，坐落在绕以汉白玉护栏的三层石台上。

定陵是明代第十三帝神宗朱翊钧和他的两皇后的陵墓。万历十二年（1584）始建。1956年发掘了定陵地宫，其面积为1195平方米，全部为拱券式石结构，由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的殿堂联成。前、中殿为长方形甬道，后殿横在顶端。前、中、后三殿之间各有一道石券门，券门下是两扇汉白玉门，高3.3米，宽1.7米，重约4吨，门扇上均横以青铜铸成的长方形大梁。中殿有汉白玉宝座三个及点长明灯用的大型青花龙缸和黄琉璃五供。左右配殿为石拱券无梁建筑，内有棺床，其上长形孔穴内填黄土，称“金井”。后殿为地宫最大的殿，殿内棺床中央置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皇后的棺槨，其周围放有玉料、梅瓶及装满随葬器物的漆木箱等。从地宫中出土大量的金银器皿、翠玉珠宝、丝织等珍贵文物，为研究我国明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吕瑞珍）

明长城

(Mingchangcheng) 明朝是长城修筑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修筑规模最大，是长城防御工程技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修筑居庸关处长城关隘。在东部重要地段采用整齐的条石和用砖包砌的结构，使长城修筑得更加坚固。后经一百多年的时间，完成修筑长城的全部工程。明长城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鸭绿江，全长一万二千余里。其中自山海关至鸭绿江一段，由于建筑简单，今已大部分毁坏，而自山海关至嘉峪关一段，修筑得非常坚固，至今仍保存完好。居庸关一带城墙高八点五米，厚六米，顶部宽五点七米，女墙高一米。为了加强防守，明代在长城沿边设立九个军事重镇，自东向西有辽东（辽宁沈阳）、蓟州（河北蓟县）、宣府（河北宣化）、大同、太原（山西太原）、延绥（榆林）、宁夏、固原、甘肃（今甘肃张掖），合称九边。沿途碉堡、烽燧林立，组成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万里城防。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50-1.bmp}

（吕瑞珍）

青花瓷器

(qinghua ciqi)用钴料先在胎体上绘画花纹，再上一层无色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呈现白地青花，是釉下彩瓷器。据目前已发现的材料，我国青花瓷的起源可追溯到唐朝。1975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了一件瓷枕的残片，枕面釉下用蓝彩绘出菱形轮廓线，经测试证明蓝彩的成分是钴矿土。在浙江龙泉县金沙塔和绍兴环翠塔的塔基中，发现了一批宋代的青花瓷片，花纹较暗，蓝中带黑、灰色，经分析测定所采用的钴料是国产钴矿土，烧成温度在 1270 。

元代特别是元朝后期青花瓷的烧制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尤以景德镇所烧青花瓷最佳。目前在江西景德镇、吉州、浙江江山县、云南玉溪县和北京元大都遗址都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在浙江湖田县还发现了元青花窑址。元青花瓷器胎质白中微显青色，色彩浓艳，光泽透亮，纹饰富丽。所用青花料有进口和国产的两种，当时作为青花料的钴土矿，在我国的浙江、江西、云南等地均有蕴藏。明代青花瓷，无论是质量、产量以及花纹装饰，都有很大提高，景德镇窑以烧青花瓷为主。明代各个时期所烧的青花瓷具有不同的特色，宣德青花胎质细腻洁白，釉层晶莹，青色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是我国青花瓷生产的黄金时代。所用青料主要是从国外进口的含钴矿石，称“苏泥勃青”，它含锰量低，含铁量高，故在青花中往往有黑色斑点。明成化以后，所用青料以国产为主，如“平尊青”、“珠明料”等。成化青花以青色淡雅著称。正德青花以胎骨厚重、青花浓中带灰为主。而嘉靖青花以蓝中泛紫，色调浓重鲜艳久负盛名。明代青花瓷器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远销到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

(刘桂英)

明代理学

(Mingdai lixue) 即明代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自北宋兴起的理学，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明代理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明初程朱理学被奉为统治思想；明中叶王守仁心学的崛起及王学的广泛传播；明末对理学的总结和反思。

理学这种哲学化的儒学，对于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自非汉唐时期的儒学所能比拟。明王朝的开创者非常懂得程朱理学的重要。早在明初开国伊始，即有刘基、宋濂等理学家，与明太祖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注解为规矩。其后，解缙等人对明成祖朱棣的讲筵、入对，更是君臣唱和。遂于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作为治国齐家的统一法理和准则。程朱理学遂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明代中期，王学崛起并得到广泛传播。朱学虽然也还是官方哲学，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学凡“三变”（“泛滥于词章”、“遍读考亭遗书”、“出入佛志”为前三变；“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专提改良知三字”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是后三变），最后建立了心学体系。其学说集宋明理学史上心学一派之大成，达到了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高峰。王守仁心学的主要论题有三：一曰心即理；二曰知行合一；三曰改良知。这三个论题都围绕发明本心的良知这一中心思想。可见，他的思想渊源上承陆九渊立大本，发明本心的统绪。由于王守仁事功赫奕，弟子众多，于是王学得到广泛传播。浙中则有王畿、钱德洪，“挤阳明而为禅”，为浙中王学。此外还有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等，地域很广。王学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泰州学派。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都是当时有名学者，对王学有所发展。

明末社会动荡，天崩地解，王学衰微。刘宗周和黄道周是明末两个理学大师。刘宗周持“慎独”之说，讲学于蕺山、明亡，不食而死。黄宗羲、张履祥、陈确皆其弟子。黄道周精于《易》学象数，其天文历算之学，十分深邃。方以智及“易堂九子”，对理学有所讥评，进行反思，由此产生了对理学的重新认识。明末清初随之兴起了以颜元为代表的事功之学；王夫之为代表的总结诸子百家之学的哲学思想；出现了探讨理学产生和发展的专门著作，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堪称为杰作，兴起了以顾炎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考据文学，对理学重视概念争辩而脱离社会实际的空虚迂阔学风有所批评，于是理学衰微，实学兴起。

(马克锋)

明代实学

(Mingdai shixue) 明代中期以后崛起的一个学术流派，至明末清初达到极盛，随后逐渐衰落。

“实学”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宋儒那里，实学就是讲习《春秋》，观览《资治通鉴纲目》，遵守祖宗法制，其实仍是道学的变体。在清儒那里，实学即指“朴学”、“汉学”，以与宋代道学相区别。明代实学学风是由丘濬开创的。他所著的《大学衍义补》一书，放眼“治平”之术，恢复儒学“有体有用”的真精神。此书被明末实学家陈仁锡所辑《经世八编类纂》列为八种“经世”书之首。明代实学分为两大理论流派：一为“明体适用”派，也可称之为“全体大用”派。这一派恢复儒学“内圣外王”的精神，强调“体围合一”、“学仕合一”。其代表人物有丘濬、吕坤、谢肇淛、陆世仪，顾炎武、李颙。一为“王霸并用”派，也可称之为“义利双行”派。这一派复兴先秦的诸子学说，对管子、韩子、老子、庄子、墨子等都有所称颂，尤其是吸收了管、商的“功利”学说，不讳言“富强”，以“富国强兵”作为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其代表人物有张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启。明代实学所要摒弃的是以下两种治学风习，即“八股之习”与“道学之习”。这是明代实学思想家所共同针砭的目标，往往称之为“俗学”，以与自己所提倡的“实学”相别，他们讲究“实用”，提倡“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他们抛弃道学家游谈无根的陋习，更多地注意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诸如农田、水利、河漕、盐法等等。明代实学思潮的代表性著作有《子史经济言》、《明经世文编》、《古今治平略》等。

(马克锋)

宋应星和《天工开物》

(song yengxing he tiangongkaiwu) 宋应星(1587—?)，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字长庚，江西奉新人。28岁中举人，历任知县、县学教谕、推官和知州等职。清军入关以后弃官还乡，并参加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他一生中把主要精力投入于社会实际的考察，尤其重视收集被人们所轻视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经验。宋应星的著述丰富，现存的只有《野议》、《论气》、《谈天》和《思怜诗》等，其代表作为《天工开物》。“天工开物”即是自然形成万物，由人开发利用的意思。《天工开物》刊行于明崇祯十年(1637)，全书分上、中、下3部，共18卷，依次为：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埴、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珠玉。此书是一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技术的著作，内容广博，记述扼要。书中讲述了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和纺织、制盐、制糖、陶瓷、冶铸、采煤、榨油、酿造、舟车、纸墨、兵器等手工业的制造工艺和方法，并附图123幅。该书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是研究我国古代科技的宝贵资料。此书的篇目次序是依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观点排列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因此书中首先讲述的是五谷的种植和调制。以水稻为例，书中对于水稻的栽培、施肥、灌溉、防治病虫害、优良品种的选育等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作者重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如对早熟高产稻叙述得详尽，而对于只“取其芳气，以供贵人，收实甚少”的香稻，则认为不应提倡，叙述甚略，一笔而过。农业部分的比重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一。由于明代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使作者更多地注意了手工业的生产。在手工业生产的记载中，纺织占有较大比重，从缫丝、调丝、卷纬、上浆，以至织成成品，对每道工序都有具体说明。提花机是当时最先进的织机，作者详细地介绍了它的构造和操作方法。同时总结了綾、罗、绸、缎等十几种织物的织造工艺。对制盐、钻井、陶瓷等具体制作都有详尽的叙述。书中所绘插图，比例恰当，有立体感，已具备现代工程画的一些特点。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书中也有一些迷信和不科学的叙述。《天工开物》成书以后，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几乎失传，而在日本却广泛流传。辛亥革命后始由日本转手重印。50年代初期，在宁波发现了《天工开物》的原刻本(崇祯十年刻)，不久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开始受到重视。《天工开物》是世界上最早的百科全书，已被译为日、法、英、德等国文字，备受外国学者称颂。

(马克锋)

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xu guangqi he nongzhengquanshu) 徐光启(1562—1633)，明代科学家。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幼时聪敏好学，青年时代“以文章名天下”，但屡次应试皆败。在这期间，他以教书为生，并阅读大量书籍。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在南京结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加入天主教。三十二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等职，终生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验。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复社，但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活动。他在天文、历算和农田、水利等方面都做过深入的研究，曾翻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编纂《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及《勾股义》等，其广泛的科学知识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优良的科学传统，本人的科学观察、实验和研究，及当时新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他既能融会中西双方的科学传统，又能以理论与观察、实验相结合，因而使他的科学成就超过前人，达到新的高度。其一生著述丰富，代表作为《农政全书》，这部书是他毕生从事农业试验和研究，搜集整理农学资料编著而成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集大成的著作。《农政全书》分成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等12部分，共60卷、60多万字。书中利用历代文献225种，同时，还以夹注或评论的方式，加进自己试验的新成果和看法。《农政全书》涉及的范围很广，从政策、制度到农田水利、土壤肥料、选种、播种、果木嫁接、防治害虫、改良农具，以及食品加工、纺织手工业等作了全面论述。其中记录了劳动人民的生产发明和农学、植物学的知识，如在《除蝗疏》中，记载了蝗虫的出现、成熟、习性等，是早期昆虫学知识的记录；西方农业知识，如水利的原理和新式提水工具等也有所记载；还批判了当时阻碍生产技术的落后思想和落后方法。他还强调了农业在中国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并且针对当时灾荒的情况提出“预防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积极主张，为说明问题，书中还绘制了大量图谱，很有参考价值。

(马克锋)

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lishizhen he Bencaogangmu) 李时珍(1518—1593)，明代杰出的药物学家。字东壁，号濒湖，湖北蕲州(今蕲春)人，其家世代为医。李时珍14岁中秀才，后参加三次乡试俱不中，加上“幼多羸疾”，遂放弃功名，专心学医。他“好读医书”，“三十年间阅书八百余家”(《明史》卷299《李时珍传》)。二十多岁就已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医生了。他曾在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任职，不久就辞官回乡，行医并从事医学著述工作。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和药物研究，李时珍发现前人所著《本草》中门类重复，名称驳杂，谬误很多。他立志辨疑订误，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李时珍遍访名医宿儒，远涉崇山峻岭，在樵夫、药农、猎户的帮助下，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并参阅古书八百多种。经过27年的努力，三易其稿，到万历十五年(1587)终于最后编成了空前的药物巨著——《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全书分为16部，52卷，62类。收载药物1892种，比前人增加374种，载入药方11096个，比前人增加四倍。全书共190多万字，附有插图1160幅。书中使用了科学的分类方法。如李时珍按草的自然生态习性，把草类细分为：干草、湿草、水草、石草等9类。在动物分类方面，李时珍正确地将动物药品分为虫、鳞、介、禽、兽和人几类。《本草纲目》对每种药物名称、性能、用途、制作都作了说明，并订正了历代相沿的某些错误。如泽漆和大戟是两种药物，但以前的本草著作中有的说泽漆是大戟的苗，有的说泽漆是大戟的花。又如苹是水田中的一种草，萍是水中的浮萍，而过去始终主为是同一种药物。李时珍在书中都一一作了订正。书中还增加了一些新发现的药物和重新认识的一些药物的功能。如对曼陀罗花含有麻醉成份，延胡索的止痛作用，都有新的认识。对于以前和当时医药书中的迷信记载，李时珍亦给予了一定的批判。《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典，也是一部植物学、动物学、矿药学的重要分类著作。它已被译成日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文字，流传全世界。

(马克锋)

大明律

(Daminglü) 明代主要刑法法典。明太祖朱元璋在吴元年(1367)即着手制订法律,他和臣属以唐律为蓝本,逐条讨论,至洪武六年(1373)制成《大明律》,以后又经不断修改,到洪武30年才正式颁定。《大明律》根据“法贵简当”、“当计远患”的立法原则制成,共有7篇,30卷,460条。由于朱元璋废宰相,用六部分掌中书省职权,因而《大明律》以“名例”冠于篇首,下分吏、户、礼、兵、刑、工6律,总为7篇,改变了隋唐以来沿袭唐律12篇的法律体系结构。篇目如下:“名例”为首篇,乃是沿袭唐律,为刑名和法例的简称,类似近代刑法的总则,为吏、户、礼、兵、刑、工6律的总纲,共1卷47条;吏律为有关官吏公务的法规,共2卷33条;户律为有关户役、田宅、婚姻等的规定,共7卷95条;礼律为违反礼制的刑法规定,共2卷26条;兵律为有关官卫、军政、关津、厰牧、邮驿等的规定,共5卷75条;刑律为各篇以外的刑事犯罪的处罚及诉讼、捕亡、断狱原则及制度的规定,共11卷171条;工律分《营造》与《河防》,共2卷13条。《大明律》与《唐律》一样,首列“十恶”,以凌迟处死等刑法镇压人民的反抗,其中规定犯有“谋反”、“谋大逆”之“罪”者,不分“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他们的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年在16岁以上的都处斩刑,比《唐律》严厉。凡犯有“造妖言”和“劫囚”之罪者,要判以死刑。擅专铨选,纠结朋党者斩,这些律令都是以前没有的。《大明律》中还规定人民要服从官府,雇工人、奴婢要服从主人,有敢侵犯官府、地主田土房舍者,要处以各种刑罚,严密保护私有制。《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法典,它条目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无论在形式内容上都表现了优于前代法典的特点,对大清律的制定有重大影响。

(单福海 何本方)

永乐大典

(Yongledadian) 明朝永乐年间官修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永乐元年(1403)由解缙主修,第2年完工。明成祖朱棣认为过于简略,永乐三年再命姚广孝、解缙等人重修,召集的朝廷官员、文人学士达2169人,动用了当时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到永乐六年冬,全书告成。初名《文献大成》,赐名《永乐大典》。全书共有22877卷,另加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约37000万字。《永乐大典》辑入上古至明朝初年的各类书籍七八千种,举凡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至天文、地志、阴阳、僧道、医卜、技艺之书无不搜罗在内。在目录排列上,按《洪武正韵》,以韵统字,以字系事,辑入各种文史记载,内容包括天文、地理、人事、名物及艺术、经书、史籍、工技、农艺、医学等。它所引材料均直接抄自各书原文,做到一字不改,许多书籍都是整部、整篇、整段地辑入,保存了我国宋元以前的大量文献资料。永乐以后,许多书籍失传。《旧五代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重要图书,都是在散佚后,清人从《永乐大典》里辑出来的。全书编成后,只缮写一部,到嘉靖、隆庆时又抄了一个副本。正本不知毁于何时,副本曾散失一部分,到清乾隆38年开四库全书馆时,已经散失2400多卷,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又被劫走不少。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此书一部分被毁,一部分被劫走。今天国内所幸存者有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730卷,加上后来从世界各地征集的65卷,共计795卷。

(单福海 何本方)

大明会典

(Daming huidian) 明代官修的典章制度史书。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由于历代典制散见于简册,难以查询,因而命儒臣分馆编辑,至弘治十五年二月修成书,称为《大明会典》,共180卷。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重校刊行,是为弘治本会典。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29)又命阁臣续修进呈,但未刊印。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重修,至万历十五年二月成书,称《重修会典》,共为228卷。题为申时行等撰,多是为万历本会典。《大明会典》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中文职衙门226卷,首卷为宗人府,其下依次为吏部12卷,户部29卷,礼部75卷,兵部41卷,刑部22卷,工部28卷,都察院3卷,通政使司、六科、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光禄寺、大仆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尚宝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僧录司各1卷。以上为文职衙门,共226卷。武职衙门仅两卷,列叙五军都督府及各卫等。各官职以下,多列为详细的统计数字。如田土、户口;驻军和粮饷等,提供了参考的重要依据,冠服仪礼等还附有插图。《大明会典》一书主要根据明代官修《诸司执掌》、《皇明祖训》、《大明集礼》、《孝慈录》、《大明律》等书和百司之籍册编成,记载典章制度十分完备,凡《明史》所未载者,多有交代,为研究明代史的重要文献。

(单福海 何本方)

明实录

(Mingshilu) 书名。明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原称《大明实录》，俗称《皇明实录》。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命令建立比较完备的保存官方档案的制度。老皇帝死后，新皇帝即位，即命史官根据档案撰修前一皇帝的实录。实录修成，誊写两本，正本藏于宫内，嘉靖年间皇史宬建成后，实录正本改藏于此，实录副本则藏于内阁。有明一代的270年中，共修成太祖至熹宗13期实录，记载了15位皇帝的事迹。洪武实录257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系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缩微卷影印，下同)，太宗(成祖)实录274卷，仁宗实录10卷，宣宗实录115卷，英宗实录361卷，宪宗实录293卷，孝宗实录224卷，武宗实录197卷，世宗实录266卷，穆宗实录70卷，神宗实录596卷，光宗实录8卷，熹宗实录87卷，共3045卷。另有《崇祯实录》17卷是清初修《明史》时补辑的。《明实录》篇幅庞大，其体例仿往代实录，经年纬月，将当时的各项政治设施、军事行动、经济措施、文化教育状况、自然灾祥、社会现状及帝王的婚丧喜庆、生子命名、祭祀、营造等事，都予记载。至于诏令奏议、百司重要案牘、大臣生平事迹等，也加选载，保存了大量明代史料。所记史事虽多曲笔和饰讳之处，但是有的部分史料价值极高，如清修《明史》，对清代祖先事迹隐讳不书，《明实录》却直书不讳。《明实录》今有影印本流传。现存各地藏本卷帙互有出入，内容间有详略。1940年影印的前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抄本，共2952卷，凡500册，其中有不少错字、漏字。

(单福海 何本方)

清

(Qing)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朝。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建州部女真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 国号大金, 史称后金。皇太极继立之后, 于崇祯九年(1636)改国号为清, 改族号为满洲, 始称皇帝。在入关前的29年中, 满洲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 创立了政治、军事、经济合一的八旗制度, 攻取辽沈为根据地, 击败蒙古察哈尔林丹汗, 据有了长城线以北的广大地区。顺治元年(1644)在吴三桂的辅佐下入关, 开始了满汉地主阶级联合政权对中国的统治。从顺治元年至道光二十年, 计197年。

清代前期从清兵入关到摊丁入地即雍正元年(1723), 计79年, 传袭了顺治、康熙两朝。顺治初年, 世祖冲幼, 由皇叔父多尔袞摄政, 实行剃发易服、圈地、逃人法等高压政策, 民族矛盾上升, 出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残酷屠杀事件。大顺军、大西军余部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 坚持了近40年的斗争。康熙亲政以后, 除掉鳌拜, 平定三藩之乱, 统一台湾, 三次出兵亲征噶尔丹, 抚绥了内外蒙古诸部。清初仿明制设立政府机构和建立各项制度, 以内阁为中枢首脑机构, 政府官员满、汉兼用, 为保障满洲贵族的利益, 特设满官缺, 不准其他民族染指。独具特色的机构有管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 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 参与密勿的南书房。建立军事制度, 除八旗兵外, 还建立了绿旗兵, 又称绿营兵, 多时可达66万人。为了加强君权, 世祖福临“自将”正黄、镶黄、正白3旗, 成为上三旗, 其余为下五旗。各旗旗主的势力削弱。圣祖玄烨裁抑议政王大臣会议。世宗胤禛设立军机处, 并直接掌握这个处理军国大政的常设办事机构。高宗弘历大权独揽, 取消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为了医治几十年的战乱疮痍, 把故明藩王的弃地以“更名田”的名义分给农民, 奖励开荒, 治理黄河、运河、永定河, 修筑浙江海塘及渠堰堤坝等水利工程, 体恤民生, 轻徭薄赋, 并且多次蠲免赋税, 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时, 全国垦田达八亿五千万亩, 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康熙五十一年宣布“盛世滋丁, 永不加赋”, 以康熙五十年的户口丁数为准, 将丁税固定下来, 免去加征之弊。雍正元年又实行“摊丁入亩”, 进行了赋役制度的改革, 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苦百姓的负担, 也废止了人丁税。

清代中期从摊丁入地到第一次鸦片战争, 即道光二十年(1840), 计118年, 传袭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由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孜孜求治, 调整了生产关系, 准许处于农奴地位的旗地上的壮丁“出旗为民”, 开豁属于贱民身份的世仆伴当、乐户、惰民、丐户为良, 废除匠籍, 使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出现了“康乾盛世”, 也使明清之际中断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得以恢复, 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得到缓慢的发展。清廷始终重视少数民族和边疆事务, 康熙三十年多伦会盟, 以喀尔喀蒙古三部设立37旗, 奠立了北部疆土。雍正中在“苗疆”(贵州), 云南之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司等地实行改土归流; 在西藏派遣驻藏大臣。乾隆中两次平定了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息天山南北大、小和卓木的叛乱, 奠立了祖国西北疆土。是时,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达于极盛, 国内辖地, 除顺天府和盛京外, 还包括称为本部的18省和称为藩部的内蒙古、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西藏、新疆等地, 其疆域北至蒙古高原以北, 南到南沙群岛, 东至外兴安岭、库页岛, 西到葱岭。乾隆末年, 土地集中现

象十分严重，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军队士无斗志，各地人民不断起来反抗，著名的有湖南、贵州石柳邓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北方的天理教起义。

满洲贵族为了巩固统治，提倡尊孔读经，兴学校，开特科，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时又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清代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正是在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发展前进的。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主张经世致用，也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受他们影响的学者常能突破前人的窠臼，在各领域中做出成就。在考据学上，有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名篇，一大批考据学者，形成所谓的乾嘉学派。史学上有官修《明史》、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著述，在对旧史的补遗和方志撰述上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文学上出现了曹雪芹、蒲松龄等文学巨匠。编纂了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绘画上，明遗民僧石涛、石溪、八大山人和扬州画家突破了正统，具有创新精神。科技方面，有擅长天文历算的科学家；在建筑上有圆明园、雍和宫、承德外八庙、拉萨的布达拉宫等建筑。有清一代是西方殖民者东来的时期，在陆路上与俄国相接壤，康熙中两国在雅克萨发生战争，双方订立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雍正中又订立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从而确定了中俄中段和西段边界。此后双方处于和平状态。在海路上与葡萄牙、西班牙、英、法等国发生贸易往来，清朝政府对其存在着畏惧心理，只与他们进行有限的贸易。中期以后，限制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和商人的贸易活动。走向闭关自守，最后被英法的炮舰轰开了大门。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为清后期，中国历史进入近代时期。清代历295年，传袭11代，12帝。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55-1.bmp}

(何本方)

清太祖努尔哈赤

(Qingtaizu Nuerhachi 1559—1626) 后金(后改为清)的创建者,满族爱新觉罗氏。乃明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青年时常至抚顺互市,广交汉人,通晓蒙、汉文,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小说,深受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后投明将李成梁部,屡立战功。万历十一年(1583)以父、祖遗甲13副起兵,至万历十六年统一建州各部。多次赴北京朝贡,表面上对明朝中央政府极为恭顺,背地里暗自发展势力,扩大地盘。万历十七年,明任命他为都督僉事,后又擢左都督,再迁龙虎将军。他收容部众,整顿内部,发展经济,实力日益加强。万历二十一年古勒山一战,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哈达等九部3万联军。继之,不断用兵征讨,统一了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和东海女真的大部分。万历二十六年,令额尔德尼和噶盖用蒙文字母标注满语语音,创制了满文,以代替女真人通用的蒙文,适应了女真内部加强联系的需要。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由费阿拉城迁至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筑城居住。万历三十六年,公然和明朝分庭抗礼,停止向明中央政府朝贡。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元天命,正式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政权。与此同时,建立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设议政大臣五人,参决机务,颁布法制,建立会审制度。从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向明朝公开宣战。四年,率军6万在萨尔浒(今辽宁新宾西浑河南岸)大败分四路合围的10万明军,乘胜夺取开原、铁岭。六年攻占沈阳,并乘势攻取辽阳,先后占领辽河以东70余城。十年迁都沈阳。十一年宁远战役中被明将袁崇焕击败,同年八月病死营中。清朝建立后被尊为太祖。

(马克锋)

清太宗皇太极

(Qingtaizong Huangtaiji 1592—1643) 努尔哈赤第八子，亦为清朝的奠基人。满族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初设八旗，皇太极为正白旗主旗贝勒，后金建立，他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共理国政，成为满族核心人物之一。萨尔浒之役，他冲锋陷阵，战功卓著，深受父王爱戴。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死，他被拥立为后金汗，改元天聪（1627—1635）。即位后，审度内外形势，采取了一系列增强实力的战略策略。首先，进行改革内政，加强君权，使后金政权进一步封建化。为改变自己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俱南面坐”（《清太宗实录》卷7）的局面，分别将他们治罪或降罚，独自控制了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增强了汗位的权力。仿明制，建立内三院及六部，订定官制，集中国家权力。任用汉官，开科取士网罗汉族士人，扩大统治基础。崇德元年（1636）称皇帝，定国号曰“清”。他重视农业，颁布保护农业的法令，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入主中原，覆灭明朝，增编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征服朝鲜，统一黑龙江流域，以稳定后方；打败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割断明朝的外援。对时朝采取逐步削弱的策略，以和谈为烟幕，多次越过长城大掠京畿北直隶、山东等地，崇德六年发动松山、锦州战役，大败明军。长城以北，非明所有，叩关入京只是时间问题了。崇德八年，因患脑溢血暴死，葬于昭陵（北陵）。庙号太宗。

（马克锋 何本方）

盛京皇宫

(Sheng jing huang gong) 位于陪都盛京(今辽宁沈阳)城中心,是清初两代皇帝的皇宫。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至清崇德元年(1636)。后经康熙、乾隆、嘉庆等多次重修与增建,成现在的整体形势。总面积6万多平方米,周围宫墙环绕,房屋三百余间,近十数个院落。整个建筑分三大部分:中部为大内宫阙,正中是崇政殿(俗称金銮殿),是皇太极日常朝会的地方,殿前有大清门,左右建飞龙阁、翔凤阁,殿后有师善斋和协中斋。最后为清宁宫,前有凤凰楼。清宁宫的东面是衍庆宫和关雎宫,西面有麟祉宫和永福宫。这些宫是皇太极及其后妃居住的寝宫。在崇政殿、清宁宫的东、西两侧,分别建有颐和殿、介祉宫、敬典宫、迪光殿、保极宫、继思斋、崇谟阁。东部为大政殿,是皇太极听政的地方,殿前分左右两行排列的十座官署(即“十王亭”),是八旗诸王大臣议政的地方。西部建有文溯阁、戏台、嘉荫堂、仰熙斋等,是皇帝东巡盛京时读书、看戏的地方。在全国的古建筑遗存中,它以满洲民族特色最浓而见长,在宫殿建筑群中,可与北京明清紫禁城媲美。又是明清两朝兴衰交替的历史见证。

(吕瑞珍)

清圣祖玄烨

(Qingshengzu Xuanye 1654—1722) 即爱新觉罗·玄烨。清朝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在位 61 年，年号康熙，故史称康熙皇帝。世祖第三子，八岁即位。初由贵族鳌拜等专擅朝政，强行更换圈占的土地，致使广大农民抛荒不耕。康熙六年（1667）亲政，八年智擒鳌拜，自握政柄。为安定畿辅，下令停止圈地。以三藩、河务、漕运三大事书宫中柱上，日夜筹思解决办法。为消除分裂，巩固边疆，完成统一大业，毅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二十二年降服郑克塽，统一台湾；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次亲征准葛尔部噶尔丹分裂势力，安定了漠北地区；六十一年进军乌鲁木齐，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此同时，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东侵，也给予沉重的打击。二十四年雅克萨之战，驱逐了盘踞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军，遏制了沙俄对华侵略的野心。二十八年派索额图与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

在位期间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为了“济运通漕”，任用靳辅大举治理黄河，前后十余年，使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并继续兴修南方水利工程。多次蠲免赋税，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零星蠲免钱粮 9 千余万两。五十一年规定各省分别免钱粮一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五十二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有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能正确对待传来的西学，曾用传教士参与修改历法，进行土地测量，绘制《皇舆全图》。他本人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好数学、天文等自然科学知识。提倡文学，优容文人，先后组织编纂《全唐诗》、《佩文韵府》、《字典》等书籍，倡导师朱理学，辑刊《朱子全书》。曾兴《明史》和《南山集》等文字狱，加强思想统治，统治时期号为“治平”，系清王朝的繁盛期。

（马克锋）

清世宗胤禛

(Qingshizong Yinzhen 1678—1735) 清朝皇帝。姓爱新觉罗。年号雍正，故史称雍正皇帝。清圣祖第四子，敕封雍亲王。在藩邸时，逢两度废太子，为谋储位暗结党人，培植羽翼，采用韬晦之策，博得父皇欢心。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圣祖崩逝，受遗命承继大统。以而立之年登极，洞悉下情，不满于政治废弛和办事因循苟且，即着手推行改革，刷新政治，“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雍正朝起居注》5年1月17日条）。改革赋役、整顿吏治、调整生产关系是“政治一新”的重要举动。元年伊始，便决定实行“摊丁入地”，将康熙末固定了的丁银总数分摊到地亩中征收，这是一项益贫损害于国家有利的政策。二年实行耗羨归公，将征收钱粮的加耗提解藩库，由国家发给官员养廉银，以止滥收加耗和贪污之风。改定有关主佃关系的法令，限制不法绅衿，开豁山陕乐户、绍兴惰民、宁国世仆、徽州伴当、广东旦户、常熟丐户、教坊司乐户等贱民为良，解决了数百年存在的矛盾，安定社会。为了加强皇权和稳固统治，屡变成法或采用异常手段：迭兴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禊）、年羹尧、隆科多等人大狱，不惜杀戮亲兄弟，从而消除皇子反对派和功臣集团，打击朋党；用亲、郡王管理旗务，终结下五旗内的私属关系，八旗巨细事务皆听命于皇帝；六科划归都察院，台省合一，取消六科谏议权；七年始设军机处，协助皇帝处理军政要务，内阁庶务之权也被削夺；兴文字狱，御制《大义觉迷录》，目的在于达到控制反满思想。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的经营；元年至二年平定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四年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在“苗疆”（贵州）及云南、四川、广西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完成这些地区的社会改革；六年派兵入藏平叛，设驻藏大臣领军驻守；七年至十二年对西北用兵，征讨噶尔丹策零不利而划界相守。四年开始与沙皇俄国进行边界谈判，双方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雍正是位奋发有为的君主，治国用人论才技而不限成例，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皆非藩邸旧人也能受到宠任；勤于政务，以“朝乾夕惕”自励，孜孜求治，仅朱批奏折便有数万件之多，八年以后积劳多病。在位13年（1723—1735），上接康熙，下衔乾隆，为康雍乾盛世的承前启后者。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故世，葬于易州泰陵（清西陵）。秘密立储所定之储君弘历继立。今人冯尔康先生著有《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对其一生作了确当的评价。

（单福海 何本方）

清高宗弘历

(Qinggaozong Hongli 1711—1799) 清朝皇帝。姓爱新觉罗。清世宗第四子，敕封宝亲王。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先皇崩逝，启缄封秘密立储之遗诏继位，时年 25 岁。改元乾隆，故史称乾隆皇帝。是一位颇有政治抱负，也颇有作为的君主。处处以乃祖康熙为榜样，大半生勤于政务，召见大臣，披阅奏章，事必躬亲。君临之初即说：“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清高宗实录》卷 4）决心要把乃父的严政改为宽政。实行中，纠正了前代出现的偏差，如献祥瑞、妄报开垦、隐瞒水旱灾害及对案件的过重处理。继续推行那些行之有效的措置，如摊丁入地、耗羨归公和实行养廉银制度、改土归流等等。而且进一步采取措施，继续发展经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振兴文化。高宗缓和内部的紧张关系，减轻民间负担，“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昭槁《啸亭杂录》卷 1）；解除八旗壮丁的奴仆身份，准其出旗为民；解除矿禁，准民开采。康、雍时期得到发展的经济更加繁荣，农田垦殖于三十一年（1766）达到 741 万余顷，岁入国赋达到银 4858 万两，人口增加到 2 亿 559 万；同时，手工业发达的行业增多，商业资本更加雄厚，资本主义萌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达到康雍乾盛世的高峰。注意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的开拓与经营，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先后平定了准葛尔部达瓦齐汗和阿睦尔撒纳的叛乱，派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分驻伊犁等地，控制天山北路；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平定了回部布那敦、霍集占（大、小和卓木）的叛乱，派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分驻各城，控制天山南路；三十五年蒙古土尔扈特部脱离沙俄，跋涉万里回归祖国，妥善地安置在伊犁；十二年、三十一年，四川大、小金川土司两度发动叛乱，都被平定，四十一年后实行改土归流；十五年平定藏王朱墨尔特叛乱，五十七年击退廓尔喀入侵，提高驻藏大臣职权，两大活佛转世灵童实行金瓶掣签制。这一系列活动，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北至恰克图，南至南海诸岛，西至葱岭巴尔克什湖，东至黑龙江库页岛。重视发展文化，两度举行博学鸿词科取士，开馆修书，完成了《明史》、《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四库全书》等书的编纂。修书中消极的一面是寓禁于征，借机屡兴文字狱，箝制了思想的发展。高宗在位 60 年（1736—1795），后朝暮气渐重，自夸“十全武功”，喜欢奉承，经常巡游，大事铺张奢侈，任用和珅为相 20 多年，吏治腐败，社会弊病丛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六十年禅位给仁宗颙琰，自称太上皇帝，名义去位，实则仍掌朝政。嘉庆四年（1799）正元崩逝，时年 89 岁。庙号高宗，葬于裕陵。

（单福海 何本方）

承德避暑山庄

(Chengde Bishushanzhuang) 又名热河行宫,承德离宫。在承德市区北部,原为清代皇帝避暑和从事各种政治活动的地方。是我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自康熙四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五年(1703—1790),历时八十余年建成,至今已有二百八十多年的历史。避暑山庄规模宏大,占地面积 560 万平方米。周围宫墙长达 20 华里。山庄,分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宫殿区在山庄南部,包括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东宫(已不存)四组建筑。苑景区又分为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康熙、乾隆所题名的七十二景散布在宫苑之中。山庄的建筑形式,体现了我国各地的建筑艺术风格和南北方建筑布局的特点。如湖区的水心榭、金山亭、烟雨楼等建筑群典雅、明洁,构图别致,一派江南景色。宫殿区的正宫、松鹤斋等建筑,则具有北方古朴的民居形制。而万树园又具有蒙古草原的风光。山峦区的雄浑山川,庄严肃穆的寺、庙,又别具一格,使山庄成为我国各地胜迹的一个缩影。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57-1.bmp}

(吕瑞珍)

鄂尔泰

(Eertai 1680—1745) 清代政治家。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字毅庵。举人出身。康熙四十二年(1703)袭任佐领，授三等侍卫。五十五年迁内务府员外郎。其时，皇四子雍亲王胤禛托其办事，他以“皇子宜毓德清华，不可结交外臣”(昭槎《啸亭杂录》卷10)为由，拒不承应。胤禛即位后，不计前嫌，赞赏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同上)雍正元年(1723)，充任云南乡试副考官，又即升江苏布政使。三年，于赴广西巡抚任途中改授云南巡抚。他认为土司割据，破坏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应该废除。当世宗征询对策时，他回奏说：土司相杀相劫，“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剪除者也。”(《朱批谕旨》鄂尔泰4月19日折)主张改土归流。世宗采纳其建议，四年实授云贵总督，主持改土归流事宜。因广西与云贵接壤，改土归流事务较多，六年又特授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改土归流主要在“苗疆”(贵州)、云南之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司以及云南西南部与缅甸连界的各地进行。他采取招抚和镇压两种办法，先后招降贵州苗瑶两千余寨，又缴纳了广西土司的敕印和军器两万余件，在各地设置州、县，改土司为流官，并在云南设置普洱府，以便于对西南各族的统治，从此基本上消除了西南地区的土司割据状态。在此期间曾多次督兵残酷镇压苗族人民起义。雍正十年(1732)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并晋封一等伯爵。此后曾受命督巡陕甘，经略军务。十三年苗疆复叛，引咎辞官，削去伯爵。世宗死，受遗命辅政。高宗继立后，与张廷玉等受命总理事务，加官至太保、太傅。乾隆十年(1745)病卒，谥文瑞。

(单福海 何本方)

和珅

(He shen 1750—1799) 清代大臣。满洲正红旗人，后抬旗入正黄旗。钮祜禄氏，字致斋，少年时家贫，入内务府所辖之咸安宫官学读书，通晓满、汉文字，亦懂蒙、藏文。乾隆三十四年（1769）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并为三等侍卫。官低，但有机会接近皇帝，便以仪表俊美、机灵善辩而深得高宗青睐。四十年以后，历任御前侍卫、步军统领、崇文门监督、总理行营事务、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等官。四十五年受命赴云南查办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审案甚明，回京后“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清史稿》卷 319）高宗选其子丰绅殷德为和孝公主额驸（驸马）。又连续授其户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等职，成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四十六年任钦差大臣，督师镇压甘肃回民苏四十三起义，指挥失误，又委过於人，高宗召他回京，独用大学士阿桂督师，以此衔恨阿桂。他初入部阁、军机处，尚能有所建议、匡正，时久便恃宠而骄，招权纳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倾陷正人，无所不为。因他“善伺高宗意”，深知高宗晚年极端自负，喜听谀词，他又佞于迎合，巧于弥缝，竟使高宗对他恩宠有加，倚任极专。后升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要职，并晋封公爵，阿桂死后为首席军机大臣。和珅柄国 20 年间，官吏贪污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府库日空，人民反抗渐成燎原之势。仁宗深恨和珅专权误国，待到嘉庆四年（1799）高宗一死，即宣布他的罪状二十款，责令自尽，抄没家产，所得金 32000 余两，银 300 余万两，全部家产估折银 8 亿两。民间有“和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单福海 何本方）

清初剃发令

(qingchu tifa ling) 清初发布的强迫汉人依从满族习俗剃发的命令。满洲习俗，男子均将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余，中间保留长发，分成三绺编成长辮一条垂于脑后，名为辮子，或称发辮。四周剃去的头发，除为父母守丧或国丧外，不准养长，应及时剃除，名为剃发，或谓剃头。清入关前即令降清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剃发，以示归顺。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后，山海关城内军民皆剃发归降。清兵进入北京后，颁令剃发。因入关未久，根基尚未稳固，剃发令执行并不严格，往往听任降者自便。千百年来，内地汉人都留头发，无剃发习惯，强迫剃发是让他们遵从满洲习俗，被认为是一种民族压迫、民族侮辱、遭到激烈反抗。顺治二年元月，大顺军受挫，清军攻下南京、苏杭后，清廷认为大局已定，便重申剃发令，全国各地，限定10日之内，尽行剃发蓄辮。凡是不剃的、迟疑的、上表章请求保存明朝制度的，一律“杀无赦”（《清世祖实录》卷71），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韩菼《江阴城守纪》上）。这加剧了民族矛盾，激起了内地汉人激烈的反剃发斗争。江阴人民发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在24万清军攻击下，苦战81天；嘉定人民也组织乡兵，据城不降，最后遭到残酷屠杀。各地人民的反剃发斗争，成为当时抗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单福海 何本方）

圈地

(quandi) 清初满洲贵族大规模圈占汉人土地的活动，为清初弊政。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和笼络八旗将士，派遣官员跑马圈地，先后出现了三次高潮。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下令：“凡近京各洲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地甚多，……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二年九月，圈占的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京东、京南府州县。顺治四年正月下令于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州县内圈地。此后，大规模圈地停止，但是零星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圈地持续了几十年，共圈占汉族人田地224982顷。圈占范围主要在直隶6府2州1县，共计77州县，广袤2000余里。少部分在山西之太原、潞州，山东之德州、徐州等地。所圈之地，最初为无主荒地，继之有主无主之地一体圈占；圈占还包括庐舍、场圃，使大批汉人地主和农民骤失田产庐舍，生活无着。满洲贵族用圈占的土地设立皇庄，赏赐王公勋臣，分给八旗兵丁。对王公勋臣的赏赐，按宗室、王公、官员的等级和所属壮丁数目，给以不同数量的庄田和壮丁地。八旗士兵按照“计丁授田”的原则，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他们依靠这些田土解决生活所需及出征的军事装备。八旗官兵的旗地约14万余顷，占圈占土地的绝大部分。清初圈地是野蛮的劫掠，致使百余万人破产失业，流离失所，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产，阻碍了社会进步。由于壮丁逃亡和汉族人民不断反抗，康熙八年（1669）下诏停止圈地。

（单福海 何本方）

逃人

(taoren) 指清初脱离主人在逃的农奴或奴仆。满洲社会在入关前后发展到了封建农奴制阶段，八旗王公贵族拥有大批的农奴和奴仆，八旗兵丁也有少量的农奴和奴仆。农奴或奴仆的来源主要有四：战争中俘虏，以占据辽沈和入关前对明作战时俘获的壮丁为多；买卖的人口，入关前后均准满洲买卖人口为奴；罪犯及其家属被没为奴婢者；投充人，畿辅之民或害怕圈地，或为逃避赋役，被迫携带土地，投充旗下。这些农奴和奴仆没有人身自由，也极少有独立的经济，过着非人的生活。农奴在皇庄、王庄、官员庄田上种田、牧马，承担沉重的地租和繁重的差徭，称为“壮丁”。奴仆从事家内杂役，或者随主人上阵出征，或者出外贸易。他们不能任意离开主人，主人可以对他们非刑拷打，任意虐待，有被打死的，有被逼自杀的，迫使一部分农奴和奴仆展开逃亡斗争。顺治三年（1646），“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定录》卷26）。顺治十四年一年内逃人几乎达到3万。康熙二十七年（1689）逃人仍有8800多人。农奴和奴仆大批逃亡，并且带走大量牲畜、农具，使八旗贵族在短期内无法恢复庄屯的农业生产，给农奴制经济以沉重打击，也影响了八旗的兵源。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清廷制订了严厉的逃人法。顺治三年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清朝文献通考》卷195）顺治六年十二月，特设兵部督捕衙门，专案缉捕。逃人法是以严惩窝主为重点的，恶棍诬告，贪官诬指，牵连治罪，引起社会动荡。这样不但不能制止逃亡，反而“穷治愈力，逃者愈多”。奴仆逃亡使得封建农奴制解体，八旗贵旗庄屯生产向租佃制过渡，八旗士兵的旗地开始典卖。在这种形势下，逃人法放宽了惩治，康熙三十八年将督捕衙门改为督捕司，改隶刑部，终岁“不治一窝隐之罪”。

（单福海 何本方）

郑成功收复台湾

(Zheng chenggong shoufu taiwan) 即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回台湾。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7 世纪初，荷兰称霸海上，实行殖民扩张。万历四十七年（1619）占领爪哇，以此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天启四年（1624）侵占了台湾西南海岸安平湾一带，修筑赤嵌城和台湾城。以后又和西班牙殖民者进行了长达 15 年的争夺，于崇祯十四年

（1641）独占台湾。荷兰殖民者强迫汉族农民和少数民族猎户交纳重税，利用基督教和荷兰语进行奴化教育，还把台湾人民掠卖到爪哇去当奴隶。台湾人民展开了多次斗争，最后由民族英雄郑成功完成武装驱逐荷兰殖民者出台湾的大业。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59-1.bmp}

郑成功（1624—1662），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父郑芝龙是一个长期居于台湾的大商人，对台湾的开发有一定的贡献。后回大陆为官，顺治三年（1646）降清。清军入关南下，对汉族人民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激起郑成功的义愤。他从南澳出兵抗清。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不断打击清军。同时，对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也非常激愤。十六年，郑成功北伐南京为清军所败，被迫退回厦门。清朝下令对东南沿海实行严厉封锁。郑成功认识到偏踞于东南沿海一隅，很难与强大的清朝对抗。这时，曾任荷兰人通事（翻译）的何廷斌自台湾回到厦门，将台湾地图献给郑成功，并报告了荷兰人的军事部署和台湾人民迫切要求驱荷的情况。郑成功于是决定收复台湾。十八年，郑成功留儿子郑经守金门、厦门，自己于三月二十三日率战舰 350 艘，将士 25000 多人，从厦门、金门出发，横渡海峡。四月初一到达台湾，在赤嵌城附近的鹿耳门登陆。台湾人民闻知，“有几千中国人出发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被忽视的福摩萨》）。登陆后，郑成功首先攻打赤嵌城。赤嵌城的荷兰守将猫难实丁，一方面写信派人到台湾城求救，一方面派兵仓促应战。荷兰总督揆一得信后，派战将拔鬼仔率鸟枪兵数百前来冲杀，结果全军覆灭，拔鬼仔也被打死。随后，郑成功切断了赤嵌城和台湾城之间的联系。不久，赤嵌城的敌军支持不住，猫难实丁被迫宣布投降。揆一写信给郑成功，表示愿意送白银十万两，请求郑成功放弃台湾。郑成功在回信中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复，表达了收复台湾的坚定立场。郑成功从四月下旬开始对台湾城实行长期围困。八月上旬，从爪哇来的荷兰援军被打败；十二月下旬，走投无路的揆一被迫签字投降。在长达 8 个月的围困当中，荷兰人死了 1600 多人。康熙元年（1662）初，荷兰总督揆一带着不满千人的残兵败将，狼狈地离开台湾向爪哇退去。被荷兰殖民者侵占 38 年之久的台湾，终于被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了。

（马克锋 何本方）

三藩之乱

(Sanfan zhiluan) 清康熙年间发生的三个汉姓藩王的叛乱。三藩即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他们割据一方，恣意妄为，鱼肉百姓，大为民害，且又拥兵自重，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吴三桂有八旗兵 53 佐领，绿旗兵 10 营，耿、尚各有 15 佐领和若干绿旗营，共计 10 万多人，军费开支“几耗天下财富之半”；在云、贵专横跋扈，“用人，吏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庭闻录》卷 4）甚至向全国选派官吏，称“西选”。耿、尚二藩也皆专擅一方，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康熙初年，为了阻遏三藩势力的膨胀，清廷命吴三桂交还大将军印，停止用人题补权，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圣祖亲政以后，以三藩为三件大事之一，书宫中柱上，夙夜忧心，筹思铲除之策。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尚可喜请求告老回辽东，以子之信袭爵，圣祖准其告老，令其撤藩回籍，但不准其子袭爵。吴三桂受其牵动，也假意请求撤藩。朝中为此发生争论，多数大臣反对撤藩。圣祖认为：“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清史稿》卷 269《明珠传》）于是乾纲独断，毅然下令撤藩。当年十一月，吴三桂闻撤藩令立即发动叛乱，杀巡抚朱国治，总督甘文焜自杀。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发布檄文，以恢复中华为号召，挥兵攻入湖南。广西、四川响应叛乱。十三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叛。不到半年滇、黔、湘、川、桂、闽六省皆叛。十五年尚之信据广东叛。同时，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面对险恶的形势，圣祖临危不乱，首先打击元凶，杀吴三桂之子吴梦熊，派兵阻击湖南、四川之叛军，固守江西。对于耿、尚二藩则暂时停撤。由于军事部署得宜，策略掌握灵活，到十六年渐渐扭转了战局。耿、尚二藩叛而复降，陕西几经反复终于平服。吴三桂取得湖南后，举棋不定，几十万大军游弋江上，毫无进取。清军倾全力进攻湖南，收复大片被占地区。吴三桂为作垂死挣扎，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他坐困一隅，于当年八月忧忿而死。其孙吴世璠继立，退居贵州。清军奋力猛进，十八年收复湖南，十九年收复四川，二十年十月下昆明，吴世璠服毒自尽，三藩之乱遂平。自此取消了藩镇制。平定了历时八载，蹂躏十省的叛乱，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有利于国家统一，有利于开发边疆。

（张立生 何本方）

雅克萨战役

(Yakesa zhanyi) 欧洲国家沙俄，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越过乌拉尔山向亚洲扩张，侵占了西伯利亚。17世纪40年代，清兵入关，无暇北顾，沙俄乘机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它一路以雅库茨克为基地，越过外兴安岭，顺治八年(1651)强占雅克萨，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据点。另一路以叶尼塞斯为大本营，越过贝加尔湖向东南地区进犯，十五年占领尼布楚，作为侵略中国的又一个据点。沙俄侵略者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夺，掳掠人口，并向当地居民勒索粮食、牲畜和貂皮，甚至杀害当地居民。沙俄的野蛮侵略，激起我国人民的强烈义愤。黑龙江流域的各族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击。从顺治九年(1652)起，清军也投入战斗。十六年，收复雅克萨。十七年，入侵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军已被全部赶走。沙俄侵略军东进之心不死，康熙四年(1665)又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强占雅克萨。清政府多次向沙俄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撤出中国领土，并建议两国和平谈判边界问题。沙俄政府不仅拒绝，而且增兵雅克萨，加紧武力扩张。清康熙帝认识到：“若辈非创以兵威，则罔知惩戒。”(《平定罗刹方略》卷1)决心组织自卫反击。二十一年他亲自巡行东北，视察防务。次年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负责收复雅克萨，清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先后拔除了黑龙江中下游及其各支流的俄军据点，使盘踞在雅克萨的俄军成了瓮中之鳖。二十四年，清军分水陆两路进攻雅克萨，毙伤大量沙俄侵略军，迫使俄军投降。清军平毁雅克萨城堡后，移驻瑗琿。然而沙俄仍不甘心失败，又派出大量援军，重占雅克萨。二十五年，萨布素率军两千再次进剿雅克萨，围攻达半年之久。城中800俄军，至此仅余150人，雅克萨指日可下。此时，沙皇政府慌了手脚，派出全权代表进行谈判，并“请解雅克萨之围”。清军主动单方面撤军，直至签订尼布楚条约后，方才平毁雅克萨。雅克萨之役是中国军民的自卫战，战争的胜利阻遏了沙俄侵略者继续东进。

(马克锋 何本方)

尼布楚条约

(Nibuchu tiaoyue) 清朝与俄国签订的边界条约。雅克萨战役后，清政府一方面在军事上坚决抵抗，一面写信给沙俄政府，建议谈判。那时沙俄政府忙于在西方跟德意志、瑞典争夺波罗的海控制权，在西亚跟土耳其争夺黑海出海口；此外，沙皇彼得大帝正当年幼，其姐索菲亚当权，内部不稳，因此无力大规模地东侵，只好接受清政府的建议。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双方进行谈判。清朝代表是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沙俄代表戈罗文·费要多罗。在中国政府作了让步的情况下，经平等协商，中俄双方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的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以后再议；凡一、二人越界捕猎或盗窃，立即械系，送回本国处罚，凡数十人结伙，持械越界、杀人掠夺者，捕拿送回本国，处以死刑；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往来互市；订约以前的逃人不必遣返，订约以后，两国不收逃犯。俄国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立即拆除，在此居住的俄国人，应全部迁回本土。《尼布楚条约》的内容，曾用满文、汉文、蒙文、俄文和拉丁文五种文字刻成了界碑。这个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的东西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沙俄同意把入侵雅克萨的军队撤回，清朝同意把贝加尔湖以东原属中国的尼布楚土地让给俄国。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一个平等条约。

(马克锋)

平定噶尔丹叛乱

(Pingding ge erdan panluan) 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的军事行动。清初，蒙古族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是厄鲁特蒙古的一部，居住在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过着游牧生活。17世纪中叶以后，准噶尔部的封建领主噶尔丹夺得准噶尔部的统治权后，自恃强盛，四处剽掠。各族人民“不堪其扰”，“死亡逃跑”，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沙俄已开始东进南下，噶尔丹与之相互勾结，“企图同俄国订立军事同盟和求得俄国给予‘军队和枪炮’的援助”（《十七世纪俄蒙通关系史》）。而沙俄也“保证以俄国军队的相应行动支持厄鲁特部对土谢图汗的进攻”（《准噶尔汗国史》）。其时，喀尔喀蒙古正在进行抗击沙俄的斗争。噶尔丹对喀尔喀蒙古的突然袭击，使喀尔喀蒙古腹背受敌，陷入困境，被迫南逃。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率军两万，推进到距北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于是康熙帝率军亲征，八月清军左翼同噶尔丹在乌兰布通遭遇。噶尔丹率数万军队列阵山下，并设“驼城”（将骆驼蒙以湿毡，环列如城，军士于隙间发矢铳）抗拒清军。清军集中火力，遥攻“驼城”，继之以步兵冲锋，重创敌军，噶尔丹率残兵逃跑。是为“乌兰布通之战”。三十四年，噶尔丹又率骑兵3万，沿克鲁伦河而下，声言借俄罗斯鸟兵枪6万，大举侵犯漠南。三十五年三月，康熙帝再次亲征。清军分东、西、中三路大军出击，约期夹攻。西路军在昭莫多与噶尔丹部相遇，双方激战。清军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将噶尔丹的军队诱入包围圈。清军马队迅速出击，噶尔丹疯狂反扑，清军鼓角交鸣，将士们“奋呼夹击”、“声震天地”，浴血奋战，噶尔丹全军溃退，仅“引数骑逃去”。昭莫多战役，清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清军乘胜追击，三十六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清军渡过黄河，分路进兵。噶尔丹军队弹尽粮绝。噶尔丹走投无路，染病死去。清军平定准噶尔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又重回故地。清政府授以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并将喀尔喀部分编为几十个旗，于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等重镇设将军和参赞大臣，派兵驻守。康熙三次亲征平定准噶尔是维护国家统一、消除分裂割据的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保卫了国家的独立和完整。

（马克锋）

布连斯奇和恰克图条约

(buliansiqi he qiaketu tiaoyue) 清代雍正年间与俄国签订的划定边界和通商的两个条约。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中俄中段边界待定。俄国利用这个机会，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清廷多次与俄国沙皇政府交涉，要求双方早日划定边界及解决与此有关的问题，沙皇政府置若罔闻。清于雍正二年（1724）断然停止中俄贸易。俄国庞大的商队在中俄贸易中赚取了丰厚利益，为保住这一财源，不得不于雍正二年派出谈判代表。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被任命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率领俄国使团赴中国谈判。雍正四年冬俄国使团到达北京，清廷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等人为代表，双方进行了6个月谈判，就原则问题达成了10项协议。接着，两国使团前往边界上的布拉河畔，在中方退让的情况下，按俄方提出的划界方案达成协议。雍正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条约规定了东起额尔古纳河，中经恰克图附近的楚库河（赤奎河），西迄唐努乌梁海地区西北角的沙毕纳伊岭（即沙宾达巴哈）的边界走向，中间树立界碑，以南属于中国，以北属于俄国。根据这个条约，又签订了《阿巴哈伊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以详细勘分边界。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中俄两国全权使臣在恰克图正式签订了两国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总协议《恰克图条约》。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有四：边界，其内容与《布连斯奇条约》相同；重申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关于乌第河与外兴安岭之间地区暂行存放的规定；贸易，规定俄国商队每三年来北京一次，恰克图为边界贸易地点；允许俄国在北京俄罗斯馆内建造东正教堂；交换越境人犯。上述条约，正式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在一定时期内限制了俄国的侵略，但是俄国从中也获得了巨大利益，不但使其对蒙古地区大片土地的占领合法化，而且获得了商业上的利益和传教的好处。

（单福海 何本方）

平定大小金川

(Pingding daxiao jinchuan)指平定四川藏族大小金川部落的叛乱。大小金川是小金沙江上游的两个支流，位于四川西北部，是藏族定居地区，“万山丛矗，中 汹溪”。土产惟青稞荞麦，俗信喇嘛教，居住皆驻石碉中。明代属杂谷安抚使。康熙五年（1666），原土司官嘉勒巴内附清政府，授与“演化禅师”印，“俾领其众”。雍正元年（1723）清朝于大金川设大金川安抚司，以嘉勒巴内庶孙莎罗奔为土司官，而以旧土司官泽旺居小金川。乾隆十二年（1747）莎罗奔公开叛乱，以土兵攻革布什扎以及明正两土司。四川巡抚纪山派兵镇压，反被莎罗奔所败。清政府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大学士纳亲督师，增兵再次进剿，也多次失利，“久而无功”，乾隆杀张广泗，将纳亲赐死。后改用岳锺琪，分两路进攻大金川，莎罗奔溃败乞降，“顶佛经立誓”。乾隆中期，大金川土司再次叛乱，不断侵掠邻近土司。乾隆三十一年清政府派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九土司兵攻大金川。大金川与小金川勾结一起，“诸小土司皆不敢抗”。三十六年，清兵为大小金川土兵所败。乾隆帝杀了阿尔泰，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代阿尔泰总督职，再次进剿大小金川，又为所败。三十八年，温福所率清军接连溃败，温福战死沙场，军粮被劫。乾隆帝在热河闻报后，“急调健锐、火器营二千，吉林索伦兵二千”增援，授阿桂为定西将军，并严令剿灭叛乱，最终平定大小金川。清政府两次出兵大小金川，“用帑银至七千万”，为防止土司继续叛乱，加强管辖，清朝在这一地区废除土司制，改置州县。设美诺、阿尔古二厅，隶四川省。同时将四川西北各地的土司，也相继改隶州县。美诺厅后改为懋功县。这样就巩固和发展了西南地区自雍正以来“改土归流”的成果，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马克锋）

平定新疆回部

(Pingding xinjiang huibu) 指清代平定新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明末清初之际，“回部”（维吾尔族）发生了白山党与黑山党的宗教派系之争，两派头目都称是“和卓（火者）”，意即回教始祖的后裔。他们各掌一些部落互不相让。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趁机征服了维吾尔族各部，控制了南疆。噶尔丹失败后，回部宗教首领玛罕木特管理南疆。不久，准噶尔汗策妄珂拉布坦势力强大起来，再度征服南疆。玛罕木特被俘，拘禁于伊犁，其子布那敦（大和卓木）和霍集占（小和卓木）一起被拘禁。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攻克伊犁后，由布那敦、霍集占统辖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族。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叛清，霍集占附和，阿睦尔撒纳叛乱被粉碎后，霍集占逃到叶尔羌，与布那敦会合，妄图割据一隅。乾隆二十二年，霍集占纠集了数十万人，控制了南疆的大部分地区，公开传檄回疆各地，煽动叛乱。当年清军进入南疆，平定库车。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清军分兵两路，一路由兆惠率领由乌什取喀什噶尔，一路由富德率领经和阗取叶尔羌。这时困守两城的霍集占兄弟早已人心丧尽，无力防守，弃城而逃。七月，平叛大军在帕米尔高原的伊西洱河谷追上叛军，归降者达 12000 余人。霍集占兄弟逃亡到巴达克山，被当地部落杀死。叛乱平定后，清政府在喀什噶尔派驻参赞大臣，辖治天山南路，在叶尔羌、和阗、库存、阿克苏等 11 城设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统属伊犁将军，结束了新疆的分裂局面，加强了对南疆的统治。1820 年到 1827 年，布那敦的孙子张格尔勾结英国人进犯新疆，不久失败。从此清朝的西部边疆得到巩固。

（马克锋）

土尔扈特归来

(Tu erhute guilai)指土尔扈特部落重新回归祖国。明朝崇祯年间,蒙族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噶尔丹之父)相处不和,带领部落离开了原来的牧地塔尔巴哈台,西迁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北与沙皇俄国为邻。沙俄最初跟它进行互市,出兵打仗也求他帮助;后来土尔扈特势力渐渐衰落,沙俄则把它役为属部。由于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与沙俄不同,且“受其役属”,“心不甘欲”,因“归向中国”。自从顺治年间起,不断派人到中国“奉表入贡”。康熙年间,清朝政府也曾派图理琛等人看望这些远在西方的同胞。当时土尔扈特的首领阿玉奇曾对图理琛等人倾诉了他们对祖国的深切怀念。乾隆年间,沙俄对土尔扈特的压榨更加厉害起来,“屡征土尔扈特兵与邻国战”,败绩,土尔扈特部众死者七八万人。”沙皇“思雪其耻,复征兵于土尔扈特,土尔扈特诸部人人忧惧。”在这种情况下,土尔扈特部众在首领乌巴锡的带领下,毅然决定返回祖国,摆脱沙皇俄国的奴役。他们自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月出发,沿途战胜了沙俄军队的追袭阻拦,于第二年六月胜利抵达祖国的土地。清朝政府热情欢迎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部众被安置在伊犁地区驻牧,并送来衣物、食物,使之“所至如归”(以上所引全见《朔方备乘·土尔扈特归附始末》)。清高宗弘历还特地派人把土尔扈特首领13人接到热河,诏见慰问。土尔扈特的归附,使漠西厄鲁特蒙古全部统一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马克锋)

达赖与班禅

(dalai yu banchan)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称呼，即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达赖”，蒙语，意为“大海”，“达赖喇嘛”，意为“德智广深如海无所不纳之上师”。明万历六年（1578），土默特蒙古俺答汗尊格鲁派领袖人物锁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为有此称号之始。锁南嘉错为达赖喇嘛三世（前两世乃追认）。清太宗皇太极时期，达赖五世已与清朝有书信往来。顺治九年（1652），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错亲自到北京朝见顺治帝福临，清政府特地为他建立西黄寺。第二年达赖五世返回西藏，清政府赐给他金册金印，正式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法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班”为梵文“班智达”（学者）的略称，“禅”，藏语意为“大”，“班禅”，即大学者之意。顺治二年统治卫、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尊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博克多”为蒙语，对睿智英武人物的尊称）的称号，令其主持扎什伦布寺，并划分后藏部分地区归其管辖。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四世（前三世乃追认）。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封班禅五世罗桑盖西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并赐金册金印。这样，清王朝就确定了达赖与班禅在宗教上、政治上的地位，并规定了以后各代达赖与班禅都必须经过朝廷册封。雍正四年（1726）决定设立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同时也确立了达赖、班禅在行政上的首领地位。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又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了“金奔巴瓶掣签制”，将达赖、班禅转世的确定权掌握在朝廷手中，更加稳固地控制西藏。

（马克锋 何本方）

布达拉宫

(Budalagong) 位于西藏拉萨市西北的红山上，是我国著名的宫堡式建筑群。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时，松赞干布特意为其建造宫室，这就是最早的布达拉宫。因它建在山上，显得格外壮观，虔诚的佛教徒将它比之为佛教圣地普陀山，因而命名为布达拉(即普陀罗的音译)。早期的布达拉宫因遭雷击被毁。现存的观音堂和所供奉的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是当年幸存的遗物。现在所见的布达拉宫是17世纪五世达赖及其以后不断增修扩建而成的，历时五十余年，始具今日规模。整座宫殿依山势垒筑，宫体主楼13层，高117.2米，东西长360米，全部为石木结构。形成了殿宇重叠，雄伟壮丽的建筑群。布达拉宫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也是原西藏农奴主政教合一的中心。布达拉宫包括达赖的寝宫、佛堂、经堂、习经室、日光殿(客厅)、东大殿(清朝驻藏大臣为达赖主持座床和举行亲政大典的场所)、灵塔殿等一万五千间房屋。五世达赖的尸体保存在第一座灵塔殿的塔瓶中。塔瓶用金皮包裹，并嵌有珍珠宝玉，极为富丽和豪华壮观。在高大宽敞的殿堂墙壁上，绘有题材丰富、色彩鲜艳、工笔细腻、线条流畅的壁画。室内陈设着几十万个用金、银、铜、玉和檀香木雕铸的佛像，并保存着大量珍贵的文物典籍。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63-1.bmp}

(刘桂英)

金本巴瓶

(Jinbenbaping) 清政府为防止蒙藏贵族操纵大活佛转世，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而特意颁发的，共两只，一只贮北京雍和宫，一只存拉萨大昭寺。本巴也作“奔巴”，是藏语“瓶”的意思。根据佛经的意思，“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等藏、蒙地区的大活佛在圆寂以后都要投胎转世，出现所谓的“转世灵童”，由转世灵童继任为下一代的达赖、班禅等大活佛。寻找转世灵童的作法是：先借助算卦的手段确定找人的方向，然后组织一些喇嘛，故意穿得破破烂烂去找人。一旦在他们寻找的地区遇到小孩，而那小孩又扑向穿得最破烂但却又是主事的喇嘛时，他们就会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找到灵童了。接着便对这小孩进行考验，他们拿出大活佛生前用过的物品如小荷包什么的，同时拿出仿制品，如果小孩从中找出大活佛用过的实物，他们就要从高兴变为虔诚，进一步确认已找到真正的转世灵童。并要立即报告有关部门。由于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投胎转世，所以有时找到几个转世灵童，如八世班禅逝世后，就找到三个转世灵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用金本巴瓶抽签，以确定人选。抽签的过程是：将每个灵童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各写在一支象牙制的签上，并用纸包好放入金本巴瓶中，然后由喇嘛们诵经七昼夜，诵经结束后，由清政府派的驻藏大臣(若是蒙族大活佛则改为清理藩院尚书)拿一双金筷子在金本巴瓶中搅动三匝，随即箝出一个纸包，此纸包内象牙签上所写的灵童便正式被确定为下一世的某大活佛。此金瓶的设立和使用反映了清政府对蒙藏地区的有效管理。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63-2.bmp}

(齐吉祥)

台湾朱一贵、林爽文起义

(taiwan zhu yigui linshuangwen qiyi) 清康熙、乾隆时期台湾爆发的两次农民起义。清统一台湾后，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地主豪绅的压榨，台民起义不断，其中席卷全台，影响较大的是朱一贵、林爽文起义。朱一贵，原为福建漳州府长泰人，明亡后，移居台湾罗汉门（今台南市东南），作过衙门小役，后以养鸭为生，广泛结交，联络民众，图谋起义。康熙六十年（1721）凤山县官吏苛征粮税，又拘禁入山谋生者，激起民愤，朱一贵乘机于4月19日发起起义。他托称明皇室后裔，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自称“大明重兴元帅”，各地群起响应。起义军发展至数万，攻下了台湾府城，“全台俱定”，建立农民政权，奉朱一贵为“中兴王”，建元“永和”，发布讨清檄文，决心会师北伐，饮马长江。同时封诸将为国师、太师、国公、都督等官，派兵镇守战略要地。清政府一方面从闽浙调兵镇压，一方面进行招抚，致使起义军内部分裂，所占府城相继失陷，朱一贵被诱捕，送到北京处死，起义失败。起义军余部一直到雍正元年（1723）仍在坚持斗争。

林爽文农民出身，原籍福建漳州府，迁居台湾彰化大里杙庄。乾隆四十九年（1784）参加天地会，两年时间，发展会员“众至万人”，遍布彰化、诸罗、淡水等地，成为领袖。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官府焚烧村庄，镇压天地会。林爽文以“安民心，保家业”为号召，于当年十一月率众起义，攻克彰化后建立政权，被推为大盟主，年号顺天。起义军很快攻克诸罗，又与凤山（今高雄）庄大田起义军合围台湾府城。乾隆王十二年二月，清军夺回诸罗，五月，起义军在府城南大败清军。同年八月，清廷又派福康安、海兰察统帅满汉兵入台镇压起义军。十二月，林爽文在大里杙、集集铺战败。次年正月被俘，解往北京被杀害。这次起义历时一年零一个月，迫使清廷两易主将，调集了福建、广东、广西等七省兵力，耗费军饷银1000万两。这两次起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单福海 何本方）

川楚白莲教起义

(Chuan cu bailianjiao qiyi)指发生在四川、湖北等地的白莲教大起义。白莲教起义爆发于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是元、明、清三代流行的民间秘密宗教,源于南宋的白莲宗,乃佛教的一支,后教义中渗入弥勒下生说,又受罗教影响,其教派林立,流传很广,常被用来发动农民起义。清朝中期,白莲教在河南、湖北、陕西、四川等省有广泛群众基础。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政府下令严密搜捕白莲教徒,杀害白莲教首领,仅荆州、宜昌一带,“株连罗织数千人,富破家,贫陷死无算。”(《圣武记》卷7《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各地白莲教首领紧急聚会,约定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十日)起义。后因事急,起义遂于此年二月在湖北荆、襄先行发动。荆州聂杰人、张正谟,襄阳王聪儿、姚之富两支义军并起,继之四川达州徐天德、王三槐起而响应,鄂西、川东烽烟遍地,并蔓延到豫、陕、甘一带。据当时人统计,起义军的首领有142名。起义军深得群众拥护。清朝统治者自叹,义军“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逼胁之人为之向导负运。”(同上书)起义军采用游击战术,在川、陕、豫、楚一带为高山密林中,“忽分忽合,忽南忽北”屡败清军。起义军按地区编制分别以白、黄、蓝、青、绿五色为号记,设掌柜、元帅、总兵等职;但长时期内没有建立政权,没有攻取城市,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也没有提出更高的革命目标。在各支起义军中,以女英雄王聪儿、姚之富等领导的襄阳起义军力量最强。她率领起义军转战几省,给清军以沉重打击。嘉庆三年,在湖北郧西被围,跳崖牺牲,年仅22岁。其他各支起义军仍在极艰的情况下坚持斗争,直到嘉庆九年,才被清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白莲教大起义波及五省,历时9年,是清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使清廷耗银2亿两,一、二品高级将领死去二十余名,沉重打击了满汉地主阶级,成为清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马克锋)

苗民起义

(Miaomin qiyi) 清代苗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爆发于苗民聚居的贵州和湖南西部。由于清朝官吏和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苗族人民日益贫困，不得不“将田地折算”抵债，“收获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苗防备览》卷 22《杂识》）土地逐渐落入汉族地主手里，被迫迁往高寒山区耕作，过着“柴火当棉袄，蕨根当粮草”的困苦生活。乾隆六十年（1795）贵州苗民石柳邓，首先在松桃地区发动起义，铜仁、镇远、思南、石阡等地苗民响应。继之，石柳邓转战湘西，与石三保义军汇合。当年八月在起义军占领的乾州推吴八月为王。他们提出了“逐客民（指清朝官吏和汉族地主），复故地”（魏源：《圣武记》卷 7·《乾隆湖贵征苗记》）的口号，要求收回被霸占的土地。起义军采取游击战术，利用高山峻岭的险要地势和自己善走山路的特点，使用鸟枪、弓箭、利刃、石块狠狠地打击敌人，屡创清军。清政府采取剿抚并用的办法，收买叛徒，诱擒吴八月和石三保，攻杀石柳邓。起义军仍英勇斗争，坚持到嘉庆十一年（1806）才被镇压下去。这次起义与川楚白莲教起义相呼应，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清政府镇压起义历时 11 年，先后动员贵州、湖南等 7 省 10 万兵力。起义迫使清政府提出了“民地归民，苗地归苗”的“善后章程”。

（马克锋 何本方）

天理教起义

(Tianlijiao qiyi) 清代嘉庆年间天理教发动的农民起义。天理教又名八卦教，乃白莲教支派。信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诀，崇拜太阳，教徒遍于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按照八卦分为8区组织会众。天理教的组织者主要有河南滑县的李文成和北京大兴县黄村的林清等人。嘉庆十一年(1806)教徒推林清为首领，主坎卦，后总领八卦。天理教提倡贫者互助，入教要交“根基钱”，并把“根基钱”分给贫民。林清、李文成与各地的其他教首都有联系，经过一段准备，约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八方共起，并由河南派人支援河北，进攻北京皇城。不料河南滑县起义的机密泄漏，李文成被捕下狱。滑县教徒为营救李文成，聚集3000人，于九月七日提前起义，他们杀死知县，救出李文成，占领县城。起义军进占要塞道口镇，又分军攻取了山东定陶、曹县。李文成在滑县“开帅府、设羽帐”(兰簃外吏《靖逆记》卷5)被推为天王，下设地王、人王、元帅等，建立了农民政权。清廷调那彦成、杨遇春、杨芳等率军镇压，道口、定陶、曹县相继失陷，滑县被围。十一月初，李文成转战于辉县，在司寨战败自焚而死。清军进围滑县，城破后起义将领大部分战死，河南、山东的起义失败。河北的林清等人仍然按原计划起义，于九月十四日派200人分成两个小队混入北京城。九月十五日，陈爽一队入东华门，陈文魁一队入西华门，由入教的清宫太监作向导，攻入皇宫，有的冲到隆宗门，有的冲到养心门，与护军展开激战。清廷调来火器营围攻，起义军人少势孤，才不得不退出皇宫。九月十七日因叛徒告密，林清在黄村被捕遇害。这次起义不仅在豫、冀、鲁等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而且攻入了皇宫，更使清廷坐卧不宁。

(单福海 何本方)

八旗制度

(Baqi zhidu) 清代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八旗制度是在氏族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氏族人员出猎时，每十人中以一人为首领，带领其他九人行动，“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这个以十人为单位的组织称作“牛录”，其首领称为牛录厄真（牛录汉语为大箭，厄真是主的意思）。后来便以牛录厄真为官名（汉语为“佐领”）。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为适应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压的需要，对牛录组织进行了改造。万历二十九年（1607），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管属”（同上）。各牛录又分别以黄、红、蓝、白四色旗为标志，建立了四旗。由于队伍的不断扩大，牛录的增加，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确定了八旗制度。规定：五牛录为一甲喇，由甲喇厄真（参领）统辖，五甲喇为一固山（即旗）由固山厄真（都统）统辖。每一固山又另设左、右梅勒厄真（副都统），为固山厄真的副手。各级厄真后改称章京。八旗为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每旗兵力7500人，八旗共6万人。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八旗旗主都要服从他的指挥。最初，他以子侄统率各旗，称为八旗和硕贝勒。八旗贝勒和各级厄真是奴隶主阶级，他们不仅拥有大量财富和奴隶，而且垄断着后金政权的主要官职。五大臣和十都堂，必须由梅勒章京以上的八旗官来兼任。八旗兵丁是自由民阶层，平时生产，战时出征，不能随意离开牛录，没有迁徙自由。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它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牛录厄真下设带子二人为副职，再置四名章京、四名拨什库，并把三百人组成的牛录分编成四个塔坦（村或部落），章京和拨什库管理一个塔坦的各种事情。由此可见，八旗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军政合一，又是“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战，组织生产的三项职能。到皇太极时期，对辖区的蒙古人和汉人，也用八旗制度编制起来，称为蒙古旗和汉军八旗。八旗制度把女真人严密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在生产和战斗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女真的发展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入关后，满族统治阶级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其生产意义日趋缩小。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八旗军与绿营军共同构成清朝统治全国的工具。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在某些地区，八旗各级衙署与州县系统并存，直至清末。凡八旗成员统称“旗人”，与州县所属“民人”以不同形式受清朝统治和奴役。清亡后，八旗制度才全部瓦解。清在东北边疆地区编置佐领，和对蒙古各部编旗设盟，均是受八旗制度的影响。

（马克锋）

军机处与军机大臣

(junjichu yu junjidachen) 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最高政务机构。初设于雍正七年(1729)，当时正值清廷用兵西北，军务紧急，因内阁在太和门外，官员混杂，易于泄露军机。为此，清世宗在靠近内廷的隆宗门内特设军机房。作为临时性的军事指挥机构。由于这一机构有利于君主独裁，战事结束后，于雍正十年正式改称军机处，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直到清末(1911)“责任内阁”出现时才被撤销，前后存在约190年。军机处设军机大臣，一般是三四人至五六人，最多时达六七人，通称大军机。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选任，没有定员。其中一人为首席军机大臣，或称“揆席”。首席军机大臣每日入值，随时准备皇帝召见，即使皇帝外出巡幸也不例外。军机大臣的职务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即秉承皇帝的旨意办理军政事务，实际上是为皇帝作侍从秘书工作。下设军机章京，从内阁和六部中抽调中书，即中等官充任，协助军机大臣处理文书，对一般奏章票签处理意见，根据皇帝的意图起草谕旨以及“记载档案”等。官品不高，但接近机密，俗称“小军机”。分满、汉两班，各以一人领班，一人为帮领班。处下还有两个机构：负责修纂的“方略馆”和掌翻译的“内繙书房”。

军机处总揽机要，还有向皇帝推荐官吏的权力，权限凌驾于内阁和六部之上。各地的奏章由军机处票签后呈请皇帝批示。皇帝的谕旨，凡属机要，都由军机处草拟，称为“密谕”，经由军机处通过兵部送达地方的督抚，称为“廷寄”，内阁无从过问。至于“文武官特简”以及西北两路军兵换防也要由军机大臣“进其名单”呈请钦定。军机处还立有“存记簿”，相当于机要档案，“凡有旨存记者，皆书于册而藏之”，“应密存事件，则密封存记”。总之，军机处奉命经办一切重大军政事务，成为国家的政治中枢。军机处产生后，原来的议政王大臣形同虚设，内阁也成了处理一般事务的机构了。军机处虽然总辖军国政务，但它本身不是一个正式的权力机关。军机大臣无专职，亦无定员。军机处不设官署，除了奉命办事之外，自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即“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檐曝杂记》卷1)。其官员互不统属，皆直隶于皇帝，军机大臣的罢置也听命于皇帝，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它的设立是清代统治者在中央行政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皇帝通过军机处，完全控制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实现了“乾纲独揽”的绝对君权。

(马克锋)

理藩院

(Lifanyuan) 官署名，清代管理蒙、回、藏少数民族事务的机关。初为“蒙古衙门”，设承政、参政等官。崇德三年（1638）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隶属礼部。顺治十八年（1661）改为与六部同等。主官设有尚书1人，左右侍郎各1人，均为满员；额外侍郎1人，于蒙古贝子、贝勒中特简。下设郎中宗室1人，满3人，蒙古8人；员外郎宗室1人、满11人，蒙古24人，及堂主事、主事、司务、笔贴式、经承、贴写等官，所属又有外郎、领催、通事、皂役等吏役。理藩院的设置最初是为了处理蒙古事务，随着清朝对西北、西南各地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理藩院管理的范围也逐步扩大到蒙古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其具体管辖范围为内外蒙古、青海蒙古、新疆之额鲁特部、回部与西藏喇嘛所属各处。理藩院的内部组织有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徠远、理刑等六个清吏司及管理行政事务的满档房、蒙古房、司务厅、当月处、督催所、银库、饭银处等单位、分别掌管部界、封爵、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会盟、朝贡、贸易、宗教等项。所属有内馆、外馆、俄罗斯馆及蒙古官学、唐古特学、托忒（te）学等单位。理藩院还掌管一部分属国及其他外国交往事务，如掌理与俄国交涉事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另成立了总理衙门，这部分事务始改归总理衙门管理。另外，清政府还在上述地区分派将军、都统、大臣等驻防，直接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理藩院的设置和将军、大臣的直接统治，标志清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地区隶属关系的加强，说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已深入到边区。光绪三十八年（1906）理藩院改为理藩部。

（单福海 何本方）

内务府

(Neiwufu) 官署名，清代特设管理皇家衣、食、住、行各种事务的机构。“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焉。”（《光绪会典》卷 89）由皇帝亲自统帅的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包衣（家内奴隶）均隶内务府。凡是宫廷财政、典礼、工程、护卫、刑罚、太监、宫女等项事务也归内务府管辖。顺治元年（1644）定都北京后，即设立内务府。十年改设宦官 13 衙门。十八年重设内务府。其总机关叫总管内务府衙门，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没有定额，初为三品，雍正十三年（1753）改为正二品。其下分为内务府堂及所属七司、“三院”等机构。所属七司为：广储司，掌管府藏及出纳总汇；都虞词，掌管所属武职官的铨选任用及打牲、捕鱼之事；掌仪司，掌内庭礼乐之事，并考核太监品级；会计司，管理内府帑项及庄园地亩之事；营造司，掌宫廷缮修工程事务；庆丰司，掌牛羊畜牧事务；慎刑司，掌审拟上三旗的刑狱案件。三院，简称内三院，包括上驷院，管理御用马匹；武备院，制备器械；奉宸院，管理各园庭。其地位与直属七司不同，是内务府统辖机构，除专设大臣管理外，各有三品卿二人，凡题奏事件可自行题奏，不必呈内务府堂。此处还有十几个机构，分别管理宫殿、药品、图书、造办各项器物、主办教育等项事务。内务府本府及所属各司各处计有 50 多个单位，职官 3000 多人，比户部官员还要多 10 倍以上，所用人员，还有太监 3000 多名，匠役、军丁数目更多，乃是清王朝规模最大的机关。内务府所管事项，远远超出了“宫禁”的范围。它还要掌管农业生产、建筑工程、制造工程与文教卫生等事务。其活动范围已扩大到畿辅、直隶、奉天、吉林、江苏、浙江等地，近人张德泽著有《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一书，对清代内务府机构作了介绍。

（单福海 何本方）

绿营兵

(Lüyingbing) 清代军制。其制与满洲八旗兵不同，是招募汉人组成的，因用绿色旗而名绿旗兵，又因是以营为主要基层编制亦称绿营兵。绿营兵除在京师五城戍卫以外，绝大部分分驻全国各省。在京师担任卫戍的称为巡捕五营，与八旗步军营同隶步军统领。步军统领下辖左右翼总兵及 16 门(内城 9 门，外城 7 门)千总。绿营兵的最高组织为“标”，下设

“协”、“营”、“汛”。标分督标，由总督统辖；抚标，由巡抚统辖；军标，设于四川、新疆，由将军统辖；河标，由河道总督统辖；漕标，由漕运总督统辖；提标，由提督统辖；镇标，由总兵统辖。实际各省绿营独立组织为提标、镇标。提督为各省绿营的最高武官，分为陆路与水师，共设水陆提督 23 人，惟东北三省不设。提标一般设左、右、中、前、后 5 营，并辖城守营与分防营。所辖军队一般为五六千人或六七千人。统辖镇标的总兵是仅次于提督的武官，也分陆路与水师，共有 83 人，镇标所辖一般为三营、二营，兵力一般为三四千人。各军标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下设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分别统领。兵分步兵、马兵两种。绿营兵直辖于兵部，将官的铨叙也属于兵部。绿营兵初期作为清王朝的辅助兵力，配合八旗兵驻守京师与全国各地，并受到八旗兵的监视和控制，中叶以后变为主力，其兵额时有增减，最多时达到 60 多万。清末渐裁，仅存营制而已。

(单福海 何本方)

清代柳条边

(Qingdai liutiaobian) 是一条用柳条篱笆修筑的封禁界线。又名盛京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辽河地区和吉林部分地区，是满族贵族的发祥地。辽河平原的肥田沃土绝大部分是旗地，不容其他民人染指。为了保护满洲皇室之“龙兴重地”和独占东北的经济利益，限制各族人民往来，清统治者在盛京、宁古塔和内蒙古几个行政区的分界线上修筑了柳条边。柳条边的修筑办法，是先用土堆成宽、高各 3 尺的土堤，堤上每隔 5 尺插柳条 3 根，各根柳条间再用绳子连结横条柳枝，即“插柳结绳”。土堤的外侧，再挖掘深壕，以禁行人越渡。柳条边有老边、新边之别。老边又称盛京边墙，建于辽河流域，南起凤凰城（今辽宁凤城）西南，北到开原附近的威远堡，再折而转向西南，直到山海关与长城相接，长约 1950 余华里。是顺治初年到十八年（1661）完成的。吉林地区的柳条边修筑时间稍晚，故称新边，是从威远堡向东北方向修到法特哈（今吉林市北法特）。康熙年间，由于户口繁生，边内旗地不足，又扩展柳条边。在柳条边上，初设 21 个边门（即关卡），展边后改设 20 个，盘查过往行人，凡进出边门进行生产的各族居民，必须持有证明，从指定的关卡验证进入，否则就以私入禁地论罪。清统治者修筑柳条边还有一层深意，企图借此禁止汉人进入满族聚居区，防止满族汉化，保持满洲的“国语骑射”习俗。边内外的皇族围场和人参、貂皮、珍珠等产地均为禁区，不许边民自由出入，私自采捕。但是随着各族人民不断斗争及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封禁界线渐被突破，到乾隆年间，柳条边已形同虚设。清人杨宾著有《柳边纪略》一书，可以参阅。

（单福海 何本方）

永不加赋与地丁合一

(yongbu jiafu yu diding heyi) “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是清代赋役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清初赋役制度沿袭明代旧制。正赋为田赋、丁赋分别征收。由于大地主勾结官府，诡避差役，赋役严重不均。“富者田连千亩，竟少丁差，贫民无地立锥，反多徭役”（《清世宗实录》卷 24），农民负担的丁税银十分沉重。山西每丁银至四两，甘肃巩昌至八九两，不堪负担的农民背井离乡，寻找出路，或竟铤而走险起来反抗。赋役“完纳甚难，催征不易”。清王朝为了缓和矛盾，保证税源，稳定统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清圣祖实录》卷 249）。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户口数字为丁银征收名额，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征收丁税。这对农民虽有减轻负担的好处，但仍分征田赋和丁税，赋役不均现象依旧严重。鉴于明代赋役不均引起农民战争的教训，当时曾经有人提出“均田均役”的设想。康熙二十年，湖南安乡县作了“丁随粮派”的尝试。康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提出了全国丁银按亩均派的方法。康熙五十五年，先在广东，后来又在四川试行“丁随地起”。但是，康熙时期未能推广。清世宗继位以后，看到赋役改革势在必行，于雍正元年（1723），正式确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亩”。二年，先在直隶、福建两省推行，接着云南、河南、陕西、浙江等 10 余省陆续实行。乾隆四十二年（1777）在贵州实行“摊丁入亩”。光绪中期吉林、奉天最终也推行此法。“摊丁入亩”的推行，自雍正开始历经乾、嘉、道、咸、同诸朝，至光绪年间，大约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才普遍实行。“摊丁入亩”是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总数为准，把丁银分摊于田赋之中一并征收。但各省在实行时，做法又不尽相同，有些省是以省为单位，通筹均摊，如直隶、山东等省。有些省是以县为单位，以该州县丁银摊于本州县地亩之中。由于各省田地人口数字不同，因此摊丁入亩的丁银数量也不相同。一般是地多丁少的省份摊入地亩的丁银较少，而地少人多的地方，摊入每亩的丁银则较多。

“摊丁入亩”的实行，将以人丁土地为征收依据的赋役制度，改为以地亩为征收根据的赋役制度。这是我国赋税史上一大变革。丁银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严重不均的状况；这也说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这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一变革，也保证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赋役不均的状况，农民仍然挣扎在各种征敛之下。

（马克锋）

官庄、王庄和旗地

(guanzhuang wangzhuang he qidi) 清代皇室和旗人所占有的土地。官庄有两种，一为皇庄，即内务府庄田；一为各部、寺管辖之庄田，直呼为官庄。内务府庄田由其会计司管辖，包括粮庄、银庄两类。粮庄以纳粮为主，银庄以纳银为主。粮庄主要分布于畿辅、盛京、锦州、口外四个地区，有 1000 余所，占地 35000 余顷，供给内廷杂粮、豆、草之类。银庄也称三旗纳粮庄，多为顺治元年（1644）在顺天、保定、永平、宣化等府圈地设立，有 132 所及未编庄的 285 户。蜜户、苇户、棉靛户也包括在银庄之内。皇庄还有瓜园、果园、菜园，在畿辅、盛京、广宁有园田 200 余所，供给内廷瓜、果、蔬菜。各部寺之官庄征纳银物，以备陵寝祭祀、宫殿坛庙修缮之用。王庄为宗室庄田，宗室中之亲王、公主、郡主等人皆依等级占有一定数量的王庄，主要分布于直隶、关外、口外等地，计有 13300 余顷。官庄、王庄使用“壮丁”耕作，每庄 10 至 15 人，由庄头监督生产。壮丁领种庄地，纳物当差，身份为农奴。入关后不久，在壮丁逃亡和汉族地主经济影响下，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迅速变化，乾隆中，官庄和王庄中允许壮丁“出旗为民”，改行租佃制，这才保证了田庄生产的进行。

清初旗人所占有的土地称旗地。清代文件往往用旗地专指一般旗人（即八旗官兵）所占有的土地，以与官庄、王庄相区别，这是对旗地的狭义理解。旗人主要分布于盛京地区和京畿各县，占地 141100 余顷，是入关初期满族农奴制存在的基础。八旗“正身旗人”在所得的“分地”（每丁 30 亩）上，平时生产，战时充兵。领取的“分地”又称“壮丁地”，不向国家交纳赋税，以保证其经济收入和保持八旗战斗力。一般士兵有很少奴仆或没有奴仆，主要靠自己全家努力耕作，温饱卒岁。八旗官员拥有大量壮丁，可以按壮丁数分得“壮丁地”，并按官爵分得园田。八旗官员庄田也使用壮丁生产，其管理及变化与官庄、王庄雷同。清初规定，凡是拨给旗人地亩，增丁不加，减丁不退，官员升迁不加，降革不退。旗地为国家所有，拥有者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不准典当、买卖。由于旗地经营不善，已经渐准买卖，康熙时准旗内买卖，乾隆时准越旗买卖。旗民不交产的禁令限制了旗地卖与民人，但是出现了变相出卖的老典。同时，旗地上的剥削关系也迅速改变。康熙末租佃关系已经渐占支配地位。官庄、王庄和旗地的形式一直保持到清末。辛亥革命后，丈放官庄、王庄和旗地，旗地、民地的界限才最后消失。

（单福海 何本方）

清代的钱法与滇铜

(qingdai de qianfa yu diantong)钱法是有管理钱币的制造和使用的制度。清代的铸币有铜钱、铁钱、铅钱及银币，前期、中期主要使用铜钱。顺治中，户、工二部皆置钱法堂掌理钱法，分设铸钱局鼓铸。户部所属宝泉局有4厂，建正炉50座，勤炉10座，每年铸钱61卯，每卯用铜7万2千斤，由云南运抵京师的铜中拨给410万斤供给鼓铸，所铸铜钱用于全国各项开支。工部所属宝源局有二厂，建正炉25座，勤炉6座，每年铸钱20卯，每卯用铜5万斤，岁用130多万斤，所铸铜钱供给工部所管各项工程经费。初铸“顺治通宝”钱，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康熙元年(1644)铸康熙钱，以后各朝改元皆铸纪元钱。各省也设铸钱局，直隶称为宝直局，山西称为宝晋局，浙江称为宝浙局，等等。各省局时开时停，铸钱的质地好坏不一。雍正中因云南产铜，即山铸钱甚便，开云南、大理、霁益四局，铸运京钱，后来也时铸时罢。铜钱七八百文兑银一两，钱贵银贱，民间私铸之风不息，惩治盗铸私铸之法也更加严酷。道光中纹银外流，钱贱银贵，发行官票(纸币)，铸当千当百之大钱，钱法紊乱，弊端百出。光绪中，广东省首铸银元，户部又铸铜元，银行开始出现，钱法向近代货币管理制度过渡。

铸造铜钱要用铜、铅、锡等金属。清初铸钱用旧钱、旧铜器、采办洋铜及自行开采之铜，而以后者为主。自采之铜出于两湖、两粤、川、陕、贵等省，以云南最多，即所谓“滇铜”。“向来京外鼓铸，洋铜而外惟仰给滇铜”(《清高宗实录》卷269)。为了垄断滇铜，清廷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起在云南设置铜官，专管驻铜厂收税，铸钱运铜及监督生产。云南采矿禁令放宽以后，铜厂数目不断增加，初有17个，雍正中达到35个，乾隆中达到300多个，著名的有汤丹、碌碌、大水、狮子山、大功等矿厂。大厂拥有矿丁六七万人，次等厂也有万人以上；铜产量也不断上升，雍正中年产80多万斤，乾隆初增到900多万斤，最多时增到1200多万斤，供给户、工二局及江南、贵州等九省局开炉鼓铸。

(单福海 何本方)

清代的盐法

(qingdai de yanfa) 即清代管理盐的产制运销的制度、盐政法令和则例。沿用明制，因时因地而有所变更。所产有海盐、井盐和池盐三种，全国内地 11 个产盐区中有 7 区产海盐：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有两区产井盐：四川、云南；两区产池盐：河东、陕甘。制作方法，海盐有晒法、煎法，池盐皆晒，井盐皆煎。论质量、味道，海盐最佳。论成本，晒法最低。设盐政管理各大盐区，盐政由总督、巡抚兼任，由户部山东司稽察，宣统二年（1910）由户部尚书兼任督办盐政大臣总摄。各省或设盐运使司，或设盐法道管理盐务，下设盐务分司、盐课司、批验所及巡检司等机构，分办事务。各大产盐区设场生产，划区域销售。长芦设 8 场，行销两省；奉天设 8 场，行销 3 省；山东设 8 场，行销 4 省；两淮设 23 场，行销 6 省；浙江设 32 场，行销 4 省；福建设 16 场，行销两省；广东设 27 场，行销 7 省；四川有 26 州县设盐井，行销 6 省；云南著名盐井 26 个，行销本省；河东盐设 3 场，行销 3 省；陕甘盐池，行销 2 省。盐的销售为官府和商人垄断，主要实行官督商销。盐商有总商，掌散商纳税；场商，主持收盐；运商，主持销售。盐商卖盐要凭盐引，每大引两千几百斤，小引则一二百斤。只有道光中，陶澍在两淮实行盐票制，盐引、盐票并行。无引、票贩卖之盐为私盐，官府明令禁止，违者处以重罪，穷民为了生计，铤而走险，敢于与官府对抗。海盐、池盐明代已多，清代井盐更趋繁盛，制盐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所发展。盐的总产量，康熙二十五年（1686）恢复到明嘉靖时的水平，约计 5336 万多斤，嘉庆中达到 3 亿斤。政府征收盐课以充国用，盐课有三种：向生产者征收的称灶课，向运销商人征收的称引课（又称正课），各项附加税称杂课。咸丰以后，又增收盐厘，归入地方财政。顺治中盐课银 56 万两，数目尚微；乾隆十八年达 700 万两，占赋入总额 17%，仅次于田赋银；光绪末，盐课、盐厘共 2400 万余两，与田赋岁入相同，成为国家必不可少的巨大财源。

（单福海 何本方）

清代商人与商税

(qingdai shangren yu shangshui) 清代的商业不断发展，商人活动范围日广，数量日多，资本日益雄厚。以商人与官府关系不同，可区分为官商、民商。官商是为政府服务的专业商人，拥有官府赋予的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从事与政府的财政、军需和经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商业活动。官商包括内务府的皇商、广东十三行的行商等。民商为一般从事商业活动的民间商人。从经营范围上划分，有钱商，铜商、茶商、盐商、米商、布商等。有的商人由于经营方式不同又可细分，如盐商分为场商、运商、票商、垣商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类商人经营形式也在发展变化，从钱商来看，由最初的票号到钱庄以至近代的银行。从地域上划分，有晋商、徽商、秦商、浙商、洞庭湖商等。有的大商人资本雄厚，常常拥资百万，乃至千万。其巨额财富，除用作消费外，主要用来购买土地和报效政府。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投资于手工业生产，转化为最初的工业资本。大量的中小商人，受到大商人的排挤和官府的榨取，苦心经营，惨淡度日。

商税是官府征商所得的财政收入。清代商税是我国古代商税制度的发展和继续，它包含着从封建税制过渡到近代课税的最初形式。清代前期、中期，商税的基本形式是杂税和榷关税。杂税乃市税，又称坐税。清代杂税主要是指芦课、渔课、田房税契、牙帖商行当铺税、落地税等项而言。杂税税率一般在 3% 左右。榷关税乃通关税，又称过税，新海关出现后又称为关税。榷关分户部关、工部关，户部关由户部管辖，有 24 处，征收正项税银及附加税银等。工部关抽征木税，由工部管辖。榷关税率浮动在 3~6% 之间。到了清代后期，在杂税与榷关税之外，又出现了厘金和新海关税。厘金是咸丰年间为镇压太平军筹饷，在水陆交通要道设卡加征的通过税。最先在扬州征收，随即遍及全国。税项名目繁多，税率甚高。杂税、榷关税、厘金三项税课是纯粹的封建性征商。新海关税亦称洋关税，系鸦片战争后所设对进出口物品征收的关税。它在机构设置与税务制度的某些方面模仿各国海关制度，具有保护关税的外壳，但实行“协定关税”，进出口税率均为 5%，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阻碍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单福海 何本方)

清代的捐纳与捐输

(qingdai de juanna yu juanshu) 捐纳是中国封建皇朝以授予官职(有虚衔或实衔)取得捐资的办法。始于秦汉,秦始皇因蝗灾而准许纳粟千石拜爵一级;汉文帝采纳晁错谏议,准予入粟赎罪或拜爵。以后历代常因筹饷、赈灾、备边或兴办工程等事,以捐纳为筹措经费来源。捐资者交纳金钱或粟米,即可得到官爵或褒奖。明景泰中,初定捐例(捐官章程),使捐纳制度化。清代捐纳有两类:一为暂行事例,因救荒,河工,军需开捐,事毕即停;一为现行事例(即常行事例),捐贡生、监生、捐加衔、封典等。文职官中,京官可捐至郎中,地方官可捐至道员;武职官可捐千、把总至参将。捐纳有常捐,有大捐,常捐只捐出身、虚衔,大捐则可捐实官。清前期,曾因军饷或兴办工程开办过暂行事例。乾隆十年(1745)开始举办现行事例。鸦片战争以后,财政支出激增,兼之战争、灾荒等不时发生,于是在广开捐例,平民、官员都可以报捐。捐事由户部捐纳房掌管,部库和各省都可收捐。咸丰年间,为镇压太平天国筹饷,曾准各省开捐。捐纳依等入资,如乾隆中,捐一名监生银 108 两;贡监生捐知县银 3700 两,捐道员银 13120 两,捐京官郎中 7680 两,等等。捐纳入资是清廷的一项重要财源,乾隆三十一年常捐 300 万两,占全国岁赋的 6.4%。嘉庆十八年(1813)常捐 400 万两,占全国岁赋的 9%。暂行事例捐额数字更大,嘉庆中达到 8000 万两。清后期,捐纳收入有时年达 8900 多万两,少的时期为 1000 多万两。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一般为 10%以上,最高年达 48%,大大缓解了财政危机。由捐纳授官是科举选官的一种补充,为地主、商人跻身官吏队伍开方便之门,扩大皇朝统治的阶级基础。当然,入资授官使官吏冗滥,出资之人刻意追求“肥缺”,上任后唯敛财是务,不顾国计民生,导致贪污成风,吏治腐败。

捐输是封建皇朝根据“报效”银数的多寡予以某种奖叙。清代,凡按照朝廷规定的捐官办法输纳银两,或对地方兴修文庙、城池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而捐献银两,或向皇帝报效的银两,统称捐输,乃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采取的勒索苛派手段。在财政收入中,列有捐输名目,依等入资,捐输者有两类,一类是个人,按规定个人捐输白银自一万至十万两者,分别赏给文官盐运使衔或武官副将等衔,捐马百匹的官员给予纪录之奖,运丁三年多交米三百石给予顶戴,各省盐商、士绅“报效”巨款分别给予不同奖励;另一类是地区,凡各省、府、州、厅、县捐输到一定数额,可以增加科举考试中的优遇,即所谓广乡试中额和生员学额。以上两种办法交相使用,称为“劝捐”。又,《辛丑条约》后,为筹集赔款之费,在四川等省征收的田赋附加税,亦名“捐输”。

(单福海 何本方)

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qingdai zibenzhuyi mengyade fazhan) 即清代康雍乾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复出现及扩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初发生在明代中后期，明清之际战乱频仍，发展中断。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并向商品生产转化；手工业匠籍制度废除，私营手工业兴起，打破了官手工业的垄断，商品生产的比重加大；商品交流日益扩大，银钱业繁兴，商业中心增多，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主要表现在手工工场的扩展、包买主的活跃和经营地主的出现等方面。手工工场和使用雇工进行生产的作坊比明代更为发展，主要特点：生产规模扩大，资本数额增加，使用劳动力增多，分工更加细腻。如矿业中，陕西、川北秦岭大巴山的铁厂包括烧炭、采煤、冶炼、铸造、运输等生产环节，类似联合性企业，其铁厂由“厚资商人”出本钱，每厂雇募匠人3000人左右(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0)。江西景德镇陶瓷手工工场和作坊逾千，平均每个工场或作坊雇工以百计，内部分工细密，有17个以上工种。雇工与雇主间渐少封建关系，或纯为雇佣关系。如苏州染纸作坊，雇工与坊主“平等相称”，“无主仆名分”，雇工“按日按工”领取货币工资，也可辞工不做(《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6~72页)。云南铜厂使用的劳动力有三种，即亲身兄弟、常用雇工、临时工，后两种由场主按月付给工钱，去留自由。分布广。分布的行业从棉织、丝织、陶瓷、造纸、矿冶扩大到制糖、制盐、木材加工、航运、造船等。分布的地区从江南、东南沿海扩大到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包买主是商人支配生产，主要有四种形式：通过预付贷款或借垫资金，控制产品，如安徽六安，茶商隔年预放款项给茶农，清明后前往收茶；以原料换取产品，如江、浙地区，商人以棉花换取农民织成的纱、布；分发原料、工具、酬金直接控制生产，如苏、杭等地开设帐房，组织丝织生产；包买产品，自行设厂加工，如漳、泉商人至江西瑞金开设烟厂。农业生产采用雇工方式经营，兼办油坊、酒坊等作坊，经营地主出现，如乾隆中广东安定县柯氏兄弟经营槟榔园，与租佃地主不同：生产规模大，生产条件好；商品生产为主；雇工剥削为主。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得到发展，但是由于官府抑商政策的压迫、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顽固结合、商业资本转投土地和高利贷、行会和行帮组织的束缚，它的发展是艰难、曲折和极其缓慢的。

(单福海 何本方)

清初三大思想家

(qingchu sanda sixiangjia) 即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中国 17 世纪后半期社会进步思潮的代表。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的石船山麓,世称船山先生。明亡,他在衡阳起兵抗清,败后退至广东肇庆,在南明桂王政府中任职;桂林失陷后,长期隐藏在湘西地区的苗瑶山洞,自称瑶人。直到康熙八年(1669)才在石船山麓定居下来。他刻苦钻研,勤于著述,著作有一百余种,主要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和《通读鉴论》等。后人集为《船山遗书》。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世称亭林先生。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嗣母王氏殉国。他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特别注重对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同时垦荒种地,联络同道,不忘兴复。晚年居住华阴,死于山西曲沃。他学问渊博,对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很有研究。他一生的著作很多,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思想家、史学家。父东林名士,为魏忠贤所害。他受遗命就学于刘宗周,19岁入都为父讼冤,以铁椎毙仇人。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抗清。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学问渊博,研究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及释道之书,史学上尤有成就。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等。

三大思想家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植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形势下,开创了新思潮、新学风,特点如下: 反对宋明理学,提倡唯物主义思想。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王夫之痛斥陆王心学是误国之学、亡国之学,认为“陆子静出而宋亡”(《张子正蒙注·乾称篇》上),王守仁为“祸烈于蛇龙猛兽”(《老子衍·序》)。他否定了“理本气末”、“理在气先”的谬论,肯定了“理在气中”、“理即气之理”(《思问录·内篇》)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把被程朱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他反对理学家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提出“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同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黄宗羲也反对理学家的空谈,倾向于唯物主义思想。 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黄宗羲在政治专著《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与“独夫”,宣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否定了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主张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这种学校具有面对天子直言“政有缺失”,“公其是非”的职能,类似于近代的代议机构。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王夫之的“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均天下”主张,顾炎武的以“众治”代“独治”,扩大郡县守令职权的主张,都与黄氏的思想是相通的。反对明末浮夸空谈的风气,讲求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顾炎武痛斥王阳明学派“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讲危微精一之说”(《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致使社稷倾覆。他认为治学就是求治道,强调“多学而识,

行必有果”，学以致用。他注重实地调查，提倡独创，反对盲从和剽窃，开辟了清代治学方法和学术门类新途径，为考据学派宗师。王夫之、黄宗羲也都力主学以“救世”救民。倡导均田说与“工商皆本”说。黄宗羲以恢复井田制为口号，提出“授民以田”、“田土均之”的主张。王夫之、顾炎武也反对土地兼并，力主自占自耕与均田。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相对立，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与普通地主的要求与愿望。

（马克锋 何本方）

乾嘉学派

(qian jia xuepai) 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讲究训诂考据的经学派系。清初,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以实事求是为宗,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开清代考据学之先河。康熙时,阎若璩和胡渭用考据之方法研究《尚书》和《禹贡》,成果斐然。乾嘉时期,由于清廷屡兴文字狱,迫使一部分学者躲进古纸堆里,寻章摘句,为考据而考据,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当时考据学主要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惠栋,江苏吴县人,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周易述》等书。《九经古义》务在恢复汉人讲经的说法。惠栋的弟子江声、余萧客等,在治经方面也颇有成就。吴派的缺点是对古人和汉人的解经达到迷信的程度,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以信古为旗帜”(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皖派以戴震为代表。戴震安徽休宁人,著有《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等书,着重于文字音韵和校勘训诂。戴门弟子段玉裁所撰《说文解字注》,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在文字学方面的成就较大。另一弟子王念孙撰有《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也是这一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作。皖派“以求是为标帜”,在考证、校勘方面成绩颇大。乾嘉时期是汉学复兴时代,知名的学者有60余人,除以上所举诸人外,江永的声韵学,王引之的训诂学、王昶、毕沅的金石考订,钱大昕、王鸣盛的史籍整理,皆能名称一时。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卢文弨的《群书拾补》,都是第一流的著作。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乾嘉考据学派在文禁森严的形势下,为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作出了贡献。梁启超称之为清代学术的“全盛期”。

(马克锋)

清代文字狱

(qingdai wenziyu) 清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反动措施之一。清代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文字狱自古就有，以清朝最盛。清代文字狱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 140 余年。少数民族掌权的清朝，对汉人控制极严。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讽清朝的内容，即兴大狱，常常广事株连。清代的文字狱多达 80 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纯属冤杀。康熙一朝的大案有庄廷 《明书》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浙江湖州富商庄廷 ，购得朱国祯《明书》之《列朝诸臣传》稿本。庄廷 刊行时，请人增添明末天启、崇祯两朝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满洲的文句。康熙二年（1663）被人告发。是时，庄廷 已死，仍被开棺戮尸。庄氏家属及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买书、卖书者，并地方官吏，被处死者达 72 人，充军边地者数百人，妻女均发边为奴。康熙十五年（1711）的《南山集》案又称戴名世案，戴名世作《南山集》（因居桐城南山，故名），采用了相城方孝标《滇黔记闻》中的材料，叙述明末清初的抗清事实，对南明诸王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事发，戴名世被斩，300 多人受牵连。查嗣庭案亦系较大冤案。查氏为隆科多党人，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出任江西主考。选用《易经》、《诗经》上的“正”、“止”二字（俗传“维民所止”）命题，被人告作要去“雍正”之头。查嗣庭病死狱中，仍被戮尸梟首（《清世宗实录》卷 48）。“明月清风”是前人口头禅，入清帝之耳，则被认为是对清朝的讽刺。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兴徐述夔狱。徐述夔死后留下刻板《一柱楼诗》及《传》各一本。当时清朝搜查“禁书”甚严，将这两本书缴出。江苏藩司陶易、幕僚陆琰承办此案，未能查出“悖逆”之处，后来被人检出“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一句加以告发，被定为“大逆”之罪，将徐述夔家族及列名校对入活者处死，已死者戮尸梟首，连陶易及陆琰等人也均身首异处，以惩“大员负恩玩法”之罪。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日趋腐朽、没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

（马克锋 何本方）

古今图书集成

(Gujin tushu jicheng) 清代康熙年间官修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康熙四十年(1701),福建侯官人陈梦雷开始编纂《古今图书汇编》,根据诚亲王允祉颁发的协一堂藏书和自己家藏的一万多卷图书,五年后完成初稿。康熙帝改今名。清世宗继位,允祉受到打击,陈梦雷被流放到东北,编书的功劳也被抹杀。世宗命尚书蒋廷锡等重加编校,雍正四年(1726)全书告成,世宗亲自写序,付梓刊印。全书一亿六千万字,共分为6个汇编,32典,其内容为:历象汇编,包括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四典;方輿汇编,包括坤輿、职方、山川、边裔四典;明伦汇编,包括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八典;博物汇编,包括艺术、神异、禽虫、草木四典;理学汇编,包括经籍、学行、文学、字学四典;经济汇编,包括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八典。每典之下又分若干部,总共6109部。部是最基本的单位,每部先列汇考,次列总论,有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目。汇考纪述大事,引证各种古书,详其源流;总论收录经史子集各书对该内容的议论;图表视内容需要,用图、表加以说明;列传记载历代名人传记;艺文是采集和该内容有关的诗、文、词、赋等;选句是摘出俚句、对偶,供吟诗作文时使用;纪事是罗列琐细小事;杂录、外编收录前述各项不好安排的有关材料。全书内容丰富,编排材料有系统,保存史料完整,引证一一详注出处,便于查对原书,是现存中国古代规模最大、体例最善、用途也最广泛的一部类书。该书有四种印本,流传较广,比较易得。

(单福海 何本方)

四库全书

(Sikuquanshu) 清代官修的一部大型丛书。清高宗弘历为了宣扬文治的盛世，宠络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设《四库全书》馆，任命亲郡王、大学士 6 人为总裁，六部尚书及侍郎 10 人为副总裁，组织了 360 人的庞大机构纂修《四库全书》，直到乾隆四十七年全书告成。全书总计收书 3457 种，79070 卷，装成 36000 余册；存目 6766 部，93556 卷。书成后，首缮四部，存放在北京大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的文溯阁，热河行宫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接着又缮录 3 部，分放在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母寺的文澜阁。自四库开馆至七阁书完成，前后历时 17 年。全书规模宏阔，卷帙浩繁，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壮举。它集古代典籍之大成，把晋武帝时荀勖创始的古籍四部分类法发展完备。书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分类，类下又分子目，便于检索。它优于一般丛书：在每部书的卷首都撰一篇提要，“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细考证，铨疏崖略。”提要由四库馆内学问渊博的专家分别撰写的，由总纂官纪昀汇总审定。纪昀又将“提要”汇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 200 卷。全书于经、史、子、集四部各撰“总叙”，各类撰有“分叙”，概述学术源流。全书修成对保护古代典籍是一大功劳，但是在修书过程中寓禁于征，对于书中词义有抵触清廷者，皆禁毁之。列入禁毁书目的，约有 2400 多种。在修书的十年中又兴文字狱 40 余起。

(马克锋 何本方)

内阁大库档案

(neige daku dangan)指贮存在内阁大库中的档案文献。内阁大库包括两座库房：红本库(俗称西库)和实录库(俗称东房,全称为实录表章库)。它由明代文渊阁和藏书楼改建而成。内阁大库档案按时代划分,可分为明档,清初为修明史而征集的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题行稿等档案及旧存实录、诰敕等。盛京旧档,清入关前后金天聪、崇德年间的满文档案等,清初由盛京移至京师。清档,清入关后形成的题本等各种档案、图册、试卷等。清档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内阁承宣或进呈的文件,记载国家政务的文件,官修书籍及为修书而搜集的文件,内阁日常公事的文件等。按其文种区则包括红本、史书、实录、圣训、起居注、敕书、诏书、表章、各种档册、舆图、明档、满文老档等。其中红本最多,其次是史书。由于年积月累,数量甚多,库房小,条件差,损坏相当严重。光绪年间销毁不少。宣统中,内阁大库中所存档案与书籍曾经交归学部,分贮于国子监南学和学部大堂后楼。1913年历史博物馆接收上述档案,移至端门保存。后因财政困难将8000袋档案卖给纸店制浆,罗振玉将其赎回,抢救了这批档案。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对内阁大库档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及整理工作,不仅分类分包,编排上架,还编辑出版了《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季教案史料》等书,以及史料汇编、图集、目录、论文集等,共50余种370余册。利用档案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也开始起步。这些档案历经战乱和政权更迭,大都保存下来了。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档有3000多件(册),清档有1000余万件(册)。一史馆对存档进行了分类编排,分包编号,缮写目录,使所有存档皆可查找。并且组织力量建立了明档全宗和清档之内阁、军机处、内务府等74个全宗。编选刊印了大量档案史料,如《中法战争》、《天地会》、《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史料专辑;又如《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等全宗性史料专辑。国内外一批利用档案史料获得的研究成果也在陆续发表。抗日战争时期运往南京,现存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档约有200多万件(册),也都整理编目,或复制胶片,或印刷出版,足资利用。此外,散见于国内各省及海外的明清档案也为数不少,有待于汇集整理,以飨研究者。

(单福海 何本方)

扬州八怪

(Yangzhou baguai) 清乾隆年间在江苏扬州从事艺术活动的八个画家的总称。具体人物说法不一，总计有 15 人之多，近年来都采用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一书之说定为金农、黄慎、郑燮、高翔、汪士慎、李 、李方膺、罗聘八人，八人都不是扬州人但都活动于扬州地区，他们之间有的相互往来，关系密切，在生活情趣、艺术观点、绘画风格上都有共通的地方，自然形成一个流派。由于不同同时流，被保守派目之为骚乱画坛的“怪物”，故有“扬州八怪”之称。“八怪”都是对当时社会现实不满，具有叛逆精神的人，或大都是不愿做官，终身布衣，或做个小官因触犯统治集团利益被罢官的人。他们均以卖画为生，读画对象主要是士大夫或商人。在艺术上重视写生，师法自然；强调以造化为师，注意吸收前人成果；主张自立门户，追求个性；所作笔意纵恣，苍润古朴，布局章法，不落前人窠臼。同时都擅长书法、文学、印章，因此形成诗、书、画综合艺术的整体，人称“三绝”。“八怪”来自各地，出身、经历、个性及师承等不完全相同，每个人的画风也不尽相同。汪士慎善画花卉，特别精于墨梅，笔致疏落，清妙独绝。黄慎擅长人物、山水、花卉，用笔酣畅，纵横驰骋，富于变化，与正统派的画风迥然不同，所画人物，多属社会下层。金农好古力学，精鉴赏，善于识别古书画的真伪，50 岁后始绘画，善用焦墨，以梅、竹、佛像最为著名，亦善画马及花鸟山水，苍劲疏拙，风格高逸，尽脱时习，有《冬心题画》、《冬心记画》行世。高翔善山水，取法于山水画家弘仁的静简而又参以于山水画家道济的纵恣，用笔简洁、气势豪迈，又善画梅。李 ，善画花鸟，随意点染，不拘绳墨，却有一种大自然的情趣，生平爱画五松图，老干杈桠，笔飞墨舞，尝以此自许。郑燮虽是著名诗人、书法家，又是很有成就的画家，擅长花卉木石，尤工水墨兰竹，笔墨劲秀，风致潇洒，给人以清新之感。李方膺善画松、竹、梅、兰，尤以梅为最，纵横排奁，不守寻常法度。罗聘的人物、山水、花卉画都很精妙，尤善画神怪，以《鬼趣图》为最。“八怪”绘画是历史上典型的文人画，继承了明人陈淳、徐渭，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的创新精神，突破了陈套旧俗，在中国绘画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的笔墨技法对近代法坛影响很大。

(单福海)

观象台

(Guanxiangtai) 北京古观象台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当时称观星台,清代改称观象台。台高14米多,东西长近24米,南北宽20米有余。明代观星台上使用的大型仪器有浑仪、简仪和天体仪等。台下修有计时、报时的漏壶房,观测正午日影的晷影堂等建筑。清代在此基础上,又新设计了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天体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并将原明代仪器全部移放台下。(“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护古代文物,于1931年将明代仪器迁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上安置新制的六件仪器。康熙五十四年(1715)法国传教士纪理安又设计了地平经纬仪。这是一种将地平经仪、地平纬仪合成制作的大型仪器,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乾隆时,花费十年工期设计制造了玑衡抚辰仪,这是清代制造的最后一件大型天文仪。至此,观象台上共有八大铜制观测仪器投入使用。其中的天体仪,是一个直径为6尺的巨大球面,上面精确刻画了1800多颗星宿在天体中的位置,银河纵贯整个球面,牛郎、织女星座隔河遥望,以此表现天象。玑衡抚辰仪,重五吨多,它的结构基本上与汉唐以来我国历代制造的浑仪相似,不同的是取消了浑仪中表示太阳位置的黄道环和地平圈,克服了过去环圈相互交错,遮掩部分天区,不便观测的缺点,时度刻划同于观

象台上其他七件仪器,用圆周360度和96刻制取代 $365\frac{1}{2}$ 度和百刻制。

我国古代对天文台曾有过多种称呼。夏代称清台,商代称神台,周代、西汉都曾称灵台,春秋时期鲁国称观台,两汉时也称候景之台,金代称司天台,元代始称观星台,一直沿用至明。

(孙彦贞)

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

(zhongguo jindaishi) 1840—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1840年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42年8月，清政府在英国侵略者威逼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随后，美国和法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于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其主要矛盾由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变为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革命任务由过去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变为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开始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激化了中国社会阶级矛盾，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1856年太平天国运动达到全盛时期。在太平军与清军激战时，英、法联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同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其间，沙俄乘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强占中国领土100多万平方公里。第二次鸦片战争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太平天国运动坚持14年，势力达到18省，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下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皇朝内部一部分具有买办资产阶级倾向的封建官僚，发起了洋务运动，目的在于加强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但它也有发展新的生产力，刺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进步作用。19世纪70年代，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近代工业，产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早在19世纪40、50年代，中国产业工人即在外国资本在华企业中产生，经过60年代的洋务运动，70年代民族企业的兴起，其人数不断增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使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1884—1885年，法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1894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1895年清政府战败乞和，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在中日甲午战争所引起的严重民族危机刺激下，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要求逐步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敢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害怕广大人民群众，它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戊戌变法失败后，爆发了以农民为主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它为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起了很大作用。1900年，英、法、德、俄、美、奥、日、意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和进一步瓜分中国，联合出兵侵略中国，于1901年9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此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随之兴起。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产生了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但由于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维护临时约法，但都失败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陷入绝境。

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随之而生长和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起了决定性作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领导和骨干作用，表明五四运动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领导了工人运动和各界群众运动，开展了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准备。1924年到1927年，国共合作发动了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和国民革命高潮的开始。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化，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是这一斗争的主要表现，国民革命在胜利发展中潜伏着危机。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从广东迅速进展到长江流域，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势力，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在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加紧干涉的情况下，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武汉汪精卫集团由动摇转向反动，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建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经过1928年“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国民党统治扩展到全国。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克服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发动和领导了各地的武装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革命根据地，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了土地革命，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军事“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日军占领东北三省，翌年3月成立了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反蒋派系乘机倒蒋，国民党统治陷入严重危机。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后，宣布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大力强化法西斯统治，“围剿”革命根据地，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策略，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使白区工作遭到严重损失，苏区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民族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推动了团结抗日新局面的出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0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挑起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进入全面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正式建立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四次（淞沪、忻口、徐州、武汉）大的会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想。但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造成了正面战场大溃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持久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配合正面作战的同时，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使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成为主要战场。1939年至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正式形成，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直接配合了盟军的作战。1941年至1942年，解放区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制定了“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策，克服了困难，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官僚资产阶级大发国难财，其统治日趋反动和腐朽。抗战后期，解放区战场开始局部反攻，而国民党战场出现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以此为契机国统区民主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美国对华政策由援蒋抗日改为扶蒋反共，国民党反动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坚持独裁内战方针。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战胜利后，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建立什么国家的问题。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和平谈判、政治斗争居主要地位。经过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严重斗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达成了反映人民和平民主要求的协议。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在向解放区进攻达到高峰时，召开了非法的“制宪国大”，同美国签订了卖国的《中美商约》。人民解放军经8个月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继而又粉碎了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同时，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发展，形成了反蒋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包围之中。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在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北京召开，制定了《共同纲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终结，中国历史进入新时代。

（李慎兆）

鸦片战争

(Yapian zhanzheng) 1840—1842 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19 世纪初叶，英、法、美等国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建立海外殖民地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是它们向东方侵略的重要目标。其时，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这种经济形态顽强地抵抗着西方国家的商品输入。在中西方正常的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为了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一方面扩大对华鸦片走私，以攫取暴利，一方面准备武装侵略，以打破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英国东印度公司自 18 世纪 70—90 年代取得鸦片专卖特权后，即向中国大量销售鸦片。1800 年（嘉庆五年）外国（主要是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为 4570 箱，1838—1839 年（道光十八至十九年）激增为 3.5 万余箱。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毒害了中国人民，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清朝封建统治危机。1838 年 6 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请严禁鸦片，重治吸食者。9 月，湖广总督林则徐上奏极言鸦片之危害，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01 页），主张严加查禁。道光皇帝采纳禁烟派的主张，于紫禁城先后 8 次召见林则徐，商讨禁烟事宜。12 月底，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前往广东主持禁烟。次年 3 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与英、美鸦片贩子坚决斗争，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及外国烟贩缴出鸦片 237 万多斤。从 6 月 3 日至 25 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同时，林则徐等大力整顿海防，组织团练水勇，加强战守，先后击退英国侵略者从海上和陆上的武装挑衅。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资产阶级决定以此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1840 年 2 月，英政府任命乔治·懿律为英国东方远征军总司令和谈判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为副代表。4 月 10 日，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对华战争的决议案。6 月英舰船 48 艘，士兵 4000 余人，陆续开抵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7 月 2 日英舰抵厦门投文，并作武装挑衅，被击退，旋北上。5 日攻占定海。8 月，抵达天津白河口，递交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鸦片贸易合法化等一系列侵略性要求。道光皇帝屈服于英军的武力恫吓，派直隶（今河北）总督琦善前往天津与英军谈判。琦善向英方表示一定重治林则徐，“秉公”查办鸦片问题，英军遂于 9 月中旬陆续南撤。道光皇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继续与英国侵略者谈判，并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11 月底琦善到达广州，一反林则徐所为，自动撤除珠江口附近防务，裁减水师，遣散水勇乡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76-1.bmp}

勇，并镇压抗英民众。1841 年 1 月 7 日，英军突然袭击，攻陷大角、沙角炮台，琦善派鲍鹏到穿鼻洋向义律（这时懿律已生病回国）求和。义律提出《穿鼻草约》，并于 20 日单方面公布，同时派兵强占香港。《穿鼻草约》包括割让香港、赔款烟价 600 万银元、恢复广州通商等条款。琦善的卖国行为，引起了广州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政府也感到赔款、割地有伤“天朝尊严”，下令将琦善锁拿进京治罪，派御前大臣、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军 1.7 万人

赴广东同英军作战。义律获知消息后，于2月进攻虎门炮台，守将关天培率军死战，壮烈殉国。4月奕山到广州。5月21日派兵夜袭，次日英军进攻，占据城外四方炮台，猛轰广州城，奕山龟缩城内乞和。27日签订《广州和约》，向英军文纳赎城费600万元，赔偿英国商馆损失30万元，清军退驻广州城外60英里，英军退出虎门。道光皇帝不得已批准了《广州和约》。此后清朝统治者以为战事就此结束，开始裁减军队。但是，英国政府却嫌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所得侵略权益太少，决定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扩大侵华战争。璞鼎查率舰队于8月26日攻陷厦门，10月1日再陷定海，10日陷镇海，13日占宁波。道光皇帝被迫于10月18日任命协办大学士、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率军赴浙江办理军务。1842年3月奕经集兵万余，从绍兴分兵三路进军，企图同时收复宁波、镇海、定海，结果一败涂地，从此不敢言战。道光皇帝急求妥协，又派耆英、伊里布赶赴浙江议和，遭到璞鼎查拒绝。为胁迫清政府接受其全部侵略要求，英军决定入侵长江，切断运河，直扑南京。5月18日，攻陷江防重镇乍浦。6月中旬，攻陷吴淞口炮台，占领宝山、上海。7月攻陷镇江，8月英军舰船侵入南京江面。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按照英国侵略者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至此结束。从此，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李刚）

十三行

(shisanhang) 鸦片战争前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也叫公行、洋行、洋货行、外洋行。相传其名起于明代，号为“十三行”，却非固定为 13 家。清代严格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规定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十三行业务十分发达。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广州 16 家洋行于 1720 年 12 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成立“公行”，但遭到外国商人反对。次年被两广总督废止。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1770 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直到 1782 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自 1820 年(嘉庆二十五年)伶丁洋面鸦片及各项商货走私贸易兴起之后，多数行家营业亏损，资金欠缺，负债很多，常有倒歇。《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废止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从此，十三行遂日趋没落。

(李刚)

林则徐

(Lin zexu 1785—1850) 晚清政治家。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浥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嘉庆进士，入翰林院。曾入宣南诗社。从 1816 年(嘉庆二十一年)起历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浙江盐运使、江苏按察使、陕西按察使。1830 年(道光十年)7 月授湖北布政使。12 月，调任河南布政使。次年 8 月，调任江宁布政使。他锐意整顿财政，兴修水利，救灾办赈，“一时贤名满天下”。11 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亲赴河南黄河沿岸查验河务，修治黄河。1832 年 3 月调任江苏巡抚，竭力维持漕务，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倡导兴修水利，调查银贵钱贱问题，开始察觉鸦片走私造成兵竭银涸的恶果。1837 年 2 月升任湖广总督，在两湖地区禁烟收到一定成效。1838 年 9 月上书道光皇帝，支持鸿胪寺卿黄爵滋的严禁鸦片的主张，指出：鸦片流毒天下，危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01 页)12 月底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粤查禁鸦片。次年 3 月抵达广州，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一面认真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令外国烟贩缴出全部趸船上的鸦片。他采取撤买办、围商馆等一系列有力措施，收缴英美不法商人的鸦片 237 万余斤，从 6 月 3 日起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继之，令外商出具甘结，保证不再夹带鸦片，以此作为恢复中外正当贸易的前提条件。为了解西方情况，他组织人员，搜集外文书报，编译成《四洲志》书稿，并译外国律例、军事技术等著作，开创近代研究西方的风气。为抵御侵略，他制定以逸待劳、以守为战的方略，加强沿海战备，补充水师。并相信“民心可用”，从渔民、蛋户、盐贩中招募水勇 5000 人，屡败英军武装挑衅。11 月 26 日奉旨宣布停止中英贸易。1840 年 1 月实授两广总督。6 月，英国发动侵华战争，他和关天培等坚决抵抗。10 月，因遭投降派诬陷，被革职。次年 6 月，被派往浙江镇海，协办海防，旋又发往伊犁。赴戍途中，因黄河在河南祥符决口，奉旨赶赴祥符工地效力赎罪。1842 年 12 月抵达伊犁，协助伊犁将军布彦泰办理废地垦务，捐资认修龙口水渠工程，奉旨勘察南疆垦地，推广坎井和纺车，并警惕沙俄的侵略，建议改屯兵为操防，实行兵农合一，加强边防力量。1845 年 11 月，释还。12 月，命以三品顶戴署陕甘总督。次年 4 月，授陕西巡抚。1847 年 4 月，升任云贵总督，先后镇压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起义；又整顿云南矿政，维护“放本收铜”政策，主张招商集资办矿。1850 年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拜上帝会，行至广东潮州普宁县病死。晋赠太子太傅，谥文忠。著作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林则徐集》。

(李刚)

邓廷桢

(Deng Tingzhen 1775—1846) 晚清政治家。字维周，号嶰筠。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嘉庆进士。1826年(道光六年)任安徽巡抚，颇有政绩。1835年升任两广总督。时鸦片走私猖獗，成为严重社会问题。他从堵塞白银外流的角度出发，赞成许乃济提出的弛禁鸦片的主张，并提出实施办法，但结果全无实效。后受严禁派的影响，转主严禁。1838年底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的消息传来，深受鼓舞，加紧查禁鸦片，广州附近的鸦片贩卖几乎绝迹。林则徐抵粤后，他全力配合，整顿海防，厉行禁烟，参与主持虎门销烟，又会同巡视澳门，驻沙角筹划战守，屡挫英国挑衅。1840年1月，调任闽浙总督，锐意整顿海防，加强守备。7月闻报英舰进犯厦门，即时赶赴泉州，坐镇指挥。10月，受投降派诬陷，与林则徐同时革职。次年6月，充军伊犁。1843年释还，任甘肃布政使，又奉旨清查甘肃荒地，专办招垦。1845年升陕西巡抚，次年卒于任所。为官之余，好诗词。遗著有《双砚斋诗钞》、《妙吉祥室词》等。

(李刚)

关天培

(Guan Tianpei 1781—1841) 晚清爱国将领。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行伍出身。1827年(道光七年)任苏松镇总兵，1833年署江南提督，次年任广东水师提督。时值英国鸦片走私猖獗，他亲历海洋厄塞，增修虎门诸炮台，认真操练军队，警惕西方侵略。1839年全力协助钦差大臣林则徐查禁广东鸦片走私，11月3日英军挑起穿鼻海战，督军迎头痛击，打伤英舰窝拉疑号，迫使败逃，后又调集官兵进攻尖沙嘴、乌涌，驱退盘踞在那里的英国侵略者。1840年11月琦善到广东后，裁撤江防。1841年2月25日，英军进攻虎门炮台，他率守军坚决抵抗，由于琦善拒发援军，遂孤军奋战，创痕遍体，血透衣襟，但仍激励士兵，奋力苦战，与守台将士400余人壮烈战死。遗稿有《筹海初集》。

(李刚)

义律

(Yi lü , Charles Elliot 1801—1875) 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军代表。出身英国贵族。1830—1834年在英国殖民地圭亚那任高级官员,管理奴隶。1834年(道光十四年),随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来中国。自称是英国资本家的“东方代理人”,屡次要求英国从印度派舰队到中国炫耀武力。1836年12月,接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时,他多方阻挠破坏,并怂恿英外交大臣巴麦尊对华使用武力。10月,英国决定发动侵华战争。次年2月,懿律和他被任命为正副全权代表。6月封锁广州海面,挑起鸦片战争。7月率舰队攻占定海,并北犯大沽,递交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无理要求。1841年1月在广州和琦善会谈中,提出《穿鼻草约》,并于20日单方面公布,同时派兵强占香港。5月又率军攻广州,迫使清将奕山订立《广州和约》。后被调任驻北美洲得克萨斯代办、百慕大总督等职。

(李刚)

虎门销烟

(Humen xiaoyan) 近代中国人民查禁鸦片的爱国运动。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在人民群众支持下,严厉查禁鸦片。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一面严拿烟贩,一面命令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在采取撤买办、围商馆等一系列有力措施之后,终于迫使英、美鸦片贩子缴出趸船上的全部鸦片,共237万余斤。从6月3日到25日,在林则徐主持下,用卤水和石灰将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

(李刚)

三元里抗英

(Sanyuanlikangying) 鸦片战争时期广州人民自发的武装抗英斗争。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五里处。1841年5月(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军攻陷泥城、四方炮台,炮击广州,迫使清将奕山签订了《广州和约》。英军的暴行,清朝的投降丑行,激起了三元里一带人民的义愤。5月29日,一队英军到三元里一带抢劫行凶,调戏妇女。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菜农韦绍光等当场打死英军10多名,其余的狼狈逃窜。为对付英军寻衅报复,三元里人民齐集村北三元古庙,面对神庙前的三星旗立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鸦片战争》,第4册,第34页),后又联络附近103乡人民,共商作战方策。在这支抗英队伍里有贫苦农民,丝织、打石、烧炭工人,渔民,秘密会党成员和爱国士绅。他们利用“社学”组成一支反侵略的武装力量。30日清晨,5000义勇佯攻四方炮台,英军司令卧乌古督率英军迎战。义勇们按计划且战且退,将英军诱至牛栏冈团团围住,展开肉搏。经过一天激战,打死英军少校毕霞等多人,生俘10余人,其余英军逃回四方炮台。义勇跟踪追击,并将炮台层层包围。31日,广州附近番禺、南海、花县、增城等县400余乡群众赶来支援,人数逾万。英军龟缩在炮台,派汉奸混出重围,向广州地方政府求救,并以“打破议和,大举进攻”相威胁。奕山大骇,令广州知府余保纯以又压又骗的方法,将群众驱散。6月7日,义律为掩饰失败丑态,张贴告示恫吓广东人民“后毋再犯”。广州人民针锋相对加以批驳,宣言: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显示了中国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进行斗争的英雄气概。

(李刚)

南京条约

(Nanjing tiaoyue) 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于 1842 年 8 月 29 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会谈，按照英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这项条约。条约共 13 款，主要内容为：割让香港岛；赔偿鸦片烟价 600 万元（银元）、商欠 300 万元、军费 1200 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驻领事等官；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1843 年 7 月 22 日、10 月 8 日，耆英在广东与璞鼎查继续谈判，先后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即《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五口通商章程》共 15 款，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商定海关税率值百抽五。这个章程后来又成为《虎门条约》的一部分。《虎门条约》共 16 款，附有《小船定例》3 款。主要内容：英国取得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今后任何国家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侵略权益时，英国均可分享）；英国人可以在五口租地建屋。

《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它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关税、司法等主权，初步规定了西方列强掠夺和奴役中国的恶劣制度。从此，中国的门户被打开，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李刚）

望厦条约

(Wangxia tiaoyue) 中国近代史上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美国专使顾盛用军事恫吓与外交讹诈的手法,胁迫清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共34款,附有《海关税则》。它攫取了《中英南京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全部特权,并有进一步扩大: 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美国人在中国与中国人或其他各国人之间发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 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中国日后变更关税税则,须与美国领事等官议允。 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 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进一步侵犯了中国的领海权。

(李刚)

黄埔条约

(Huangpu tiaoyue) 中国近代史上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4年10月24日(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法国专使刺萼尼以外交讹诈手段,胁迫清两广总督耆英在停泊于广州黄埔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上签定。共36款,附有《海关税则》。它攫取了《中英南京条约》(除割地赔款)和《中美望厦条约》中的全部特权,并有进一步扩大:法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11月11日,刺萼尼又迫使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其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从此,西方各国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

(李刚)

租界

(Zujie) 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在其口岸或城市划出作为外侨居留和经商的一定区域。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中英《虎门条约》规定英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租地建屋。1845年11月,英国通过《上海租地章程》取得第一个租界。此后其他列强争相效尤,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强划租界。1854年(咸丰四年),英、美、法三国领事趁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攫取了租界内的管理权,实行殖民统治。租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据点。中国人民为收回租界进行不懈的斗争,1927年1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被迫宣布放弃租界特权。但实际上租界制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取消。

(李刚)

买办

(maiban)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纪人。亦称康白度(来自葡萄牙语 Comprador)。原指葡萄牙人在印度进行经济侵略时雇用的当地人。中国早有“买办”一词,明代专指供应宫廷用品的商人,清代兼指官宦的采购人员。鸦片战争以前,广州的外国商行都须经由中国公行雇用官厅特许的人做管事,办理驳运、伙食,经营帐目和其他杂务;广州的中国公行也雇用一些人看视进口货样,议定价格,开舱起货,并代洋商购土货。这些人通称为买办。鸦片战争以后,公行制度撤销,外商直接雇用中国商人代理买卖,买办的性质遂发生变化,他们既是独立商人,又是外国商人所延揽、雇用的居间人或代理人。他们从外国洋行取得薪金,或作为企业合伙人取得利润,作为经纪人取得大量佣金和回扣,利用外人势力自己经营商业,在短时间里骤然致富,并取得重要社会地位,是旧中国反动统治的社会支柱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的买办制度已逐渐不适应帝国主义扩大对华贸易的需要,尤其不适应向内地推销产品的需要,于是它发生了多方面的转化:经理制,原先的买办改称华经理;高级职员制,买办只领薪金,取消或部分取消佣金;洋行与华商订立经销、包销、代销合同;经纪人制,买办不再固定受雇于某一行。但这些变化主要在部分日、美、德企业,英、法许多老企业照旧。买办的消失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后欧美外商相继歇业,日商则已不再用买办。

(李刚)

外国在华洋行

(waiguo zaihua yanghang) 外国商人在旧中国开设的以代理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各种行号。后期亦向工矿、铁路等生产领域扩张。根据现有资料, 出现在中国的第一家外国洋行是 1782 年(乾隆四十七年)在广州开设的柯克·理德行(Coxreid & Co)(一说 1715 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过洋行)。以后, 外商代理行号迅速发展, 至鸦片战争前夕已达 150 余家, 英商查顿、颠地两行居于垄断地位。这些洋行主要经营非法的鸦片贸易。大行号一般都拥有自己的飞剪船队和保险机构。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 洋行仍然主要依靠鸦片走私、掠骗华工、贩卖人口等暴力掠夺手段积累财富。洋行还大肆进行走私贸易。正是暴力掠夺奠定了洋行财富的基础, 许多大洋行的垄断地位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由于通商口岸的增辟和内河航运权的取得, 外商对华贸易迅速扩大, 洋行围绕着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 投资于轮船航运、船舶修造、码头仓栈、保险、银行以及为商品贸易服务的加工制造业等。一些洋行资本集团开始形成, 如著名的英商怡和洋行, 在代理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还与香港黄埔船坞公司、香港火险公司、怡和银行、香港九龙仓栈码头公司、上海顺泰码头公司等保有资本关系; 美商旗昌洋行以旗昌轮船公司的运输贸易为中心, 还有扬子保险公司、旗昌船厂等企业。这些洋行大班都成了新一代“巨富”。甲午战争后, 洋行势力空前扩张, 由 1894 年(光绪二十年)的 552 家陡增至 1911 年(宣统三年)的 2863 家, 1913 年又激增至 3805 家。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日本洋行, 至辛亥革命前已远远超过英国而居于首位。代理进出口贸易依然是洋行的主要业务, 势力已遍及广大内地地区, 内地的非通商口岸地区也有洋行的非法活动。军火贸易发展成为洋行代理业务的重要内容, 仅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一次就向德商订购价值达 200 万两的军火。这一时期, 资本输出在洋行业务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主要是对清政府的政治军事借款, 以及各地的实业借款和铁路借款。据统计, 1894 至 1912 年, 清政府的借款高达库平银 12 亿余两。参预借款的虽然以外国银行为主, 但也有大量洋行参加, 有些银行本身就有洋行投资, 或者是由洋行创办的, 与洋行关系密切, 有些借款则完全是由洋行出借的。洋行商人还不断地投资设厂, 业务范围已远远超过甲午战前的为商品贸易服务的行业, 进入了纺织、矿山采掘、冶炼、烟草、铁路修造等重要生产领域。通过这些投资, 外国洋行剥削和掠夺中国人民, 并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 洋行势力的扩张达到顶峰, 几乎深入到中国每一个城镇和穷乡僻壤, 经营范围也几乎无所不包。抗日战争胜利后, 日本洋行的在华机构和业务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全国解放前夕, 英、美等国的洋行撤离大陆。解放后, 不少洋行仍与中国大陆保持各种贸易关系。

(李志英)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Taipingtianguo nongmin zhanzheng) 爆发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更加残酷，从而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外国侵略者的疯狂掠夺，使得本来就已经相当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进一步激化。农民生活极端痛苦，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从 1847 至 1849 年（道光二十七至二十九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 100 多次。当时捻党、白莲教、天地会也积极活动，进行反清斗争。在全国各族人民反清浪潮不断高涨形势的推动下，洪秀全等发动和领导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出生于广东花县的洪秀全是一个屡试不第的农村知识分子，对于清朝科场黑暗和政治腐败极为不满。1843 年他读到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受到启发，在家乡创立拜上帝教。后与冯云山去广西传教。约在 1846 年后，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建立了拜上帝会，积极发展会众。同时，洪秀全写出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诗文，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奠定了理论基础。1850 年洪秀全根据“天兄”萧朝贵的“传言”，发布团营令（起义总动员）。1851 年 1 月 11 日，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正式举义，建号“太平天国”。1851 年（咸丰元年）9 月，太平军在浔州山区迂回作战八九个月之后，攻克永安（今蒙山县）。在这里封王建制，整顿军旅，颁刻《天条书》、《太平军目》、《太平礼制》等书，重申圣库制度，制定天历，初步建立起太平天国农民政权。1852 年 4 月，太平军自永安突围，欲攻桂林不下，北上全州出湖南。南王冯云山 6 月牺牲在全州蓑衣渡。太平军在道州进行三个月休整，解决了战士中普遍存在的“怀土重迁”思想，随后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揭露清朝的黑暗统治，阐明起义的宗旨。9 月围长沙，西王萧朝贵战死。后取益阳，渡洞庭，克岳州，向湖北挺进，1853 年 1 月攻占长江中游重镇武昌。复沿江东下，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克九江，夺安庆，取芜湖，于 1853 年 3 月 19 日一举攻占金陵，遂奠都，改称天京。此后，进一步制定官制、朝仪、刑法、礼制等，以期使农民政权臻于完善。并进行建立“金陵小天堂”的尝试，其主要作法是：取消家庭，将市民编入男馆女馆；实行圣库制度，不准私藏财物，取消商品交换；实行手工业官营，将全体手工业者按工种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这些不近人情、超越现实的作法，不久相继被取消。1853 年冬，天王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设计出一个“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方案，试图建立地上理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农民要求摆脱剥削和贫困，要求平等和温饱的愿望，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但这是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是行不通的。结果，在社会实践中，太平天国不得不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在军事上，太平军于 1853 年 5 月同时举行北伐和西征。

结果，由于偏师北伐，北伐军和北伐援军相继覆没。虽然西征军取得很大胜利，开辟了湖北、江西、安徽大片土地，但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特别是水师丧失殆尽。由于太平天国分兵北伐和西征，使天京的形势变得被动。为扭转天京外围的不利战局，天京当局于 1856 年初，从西征战场抽调部队回援天京，集中兵力对天京外围的清军发起进攻，一举粉碎了清军的江北和江南大营，使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是，太平天国军事上的胜利

不仅没有给其领导集团增加凝聚力，相反倒加速了它的分裂。东王杨秀清在胜利面前，居功自傲，飞扬跋扈，1856年7月，逼洪秀全封他“万岁”，从而激化了早已存在着的洪、杨矛盾。洪秀全调北王韦昌辉率3000精兵，包围东王府，杀死杨秀清及其家属、部属几千人，随后，洪秀全又处决了韦昌辉以及参与肇事的秦日纲等200余人，演出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悲剧。继之，翼王石达开不堪洪秀全的“疑忌”，负气于1857年5月率数十万太平军精锐部队出离天京。“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的形势变得十分险恶。然而，当时全国各族人民反抗斗争：南方的天地会起义，北方的捻军及其他农民起义，以及西南的川、滇、黔农民起义，回、苗、彝各族人民起义和西北的回民起义，汇成全国反清斗争的高潮，给太平天国以有力支援，使它能够通过危机。洪秀全大胆提拔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主持军事，接连取得再破江北大营、三河之战的辉煌胜利，初步稳定了天京上游的战局，保证了天京的粮源。1859年拜上帝教创始人之一，洪秀全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被封为干王，以军师衔总理朝政，旋提出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主张改革风俗，厉行法制，学习西方新技术，保护私人工商业等。经洪秀全旨准颁布。同年陈玉成、李秀成等也相继被封为王爵，皆振奋一心，共议军政大事。以“围魏救赵”的策略方针，一举二破江南大营，从而扭转了太平天国的危局。洪秀全又批准洪仁玕制定的“进取良策”：先攻苏、杭、上海，购置火轮船，掌握长江制水权，然后回师西征湖北，以解安庆之围。结果太平军连克苏州、松江，兵锋抵上海。月余间尽占苏南财富之区，在此建立苏福省。1862年（同治元年），李秀成、李世贤再克杭州、宁波、金华、绍兴各府县，建立浙江省。江、浙地区的开辟，对太平天国后期政治、经济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洪秀全、洪仁玕等忽略了巩固安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湘军寻机进入了安徽，并完成包围安庆的计划。1861年春洪仁玕制定了会剿武汉以救安庆的军事计划，即所谓第二次西征，但陈玉成所率北路大军至湖北黄州（今黄冈）为英国驻武汉领事所骗，未敢攻打武汉，而迅速回救安庆；李秀成误期两月才到武汉，贻误戎机，又见安庆危机而不救，居然挥师南下浙江。1861年9月，安庆失陷，天京屏障尽失，曾国藩率湘军顺流东下，直逼天京。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反动派公开勾结，联合镇压太平天国。1861年11月，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节制江南军务。曾国藩坐镇安庆指挥，派曾国荃率湘军主力沿江而下，进攻天京；派左宗棠率另一支湘军，由江西进犯浙江，以图杭州；又保荐李鸿章招募淮军6000人，从水路运往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成的洋枪队勾结，联合向苏福省发动进攻，目标是夺取苏州，取远势从东面包围天京。中外反动派对太平军三面进攻，其兵力大大超过太平军。当时，太平天国内部矛盾重重，洪秀全仍终日深居宫中，思想封建化，又沉迷宗教之中，信天不令人，失去了正确处理军政大计的能力。但广大太平军将士，毫不畏怯，英勇抵抗，给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1862年秋，李秀成调集各路大军20余万，与湘军大战于天京城郊，未能获胜，解围天京无望。此后形势更加恶化。1863年12月苏州陷落，长江中下游已无险可守。李秀成力谏天王“让城别走”，但遭怒斥，只好困守天京孤城。1864年春，杭州陷落。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终于陷落。标志着历经1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太平天国起义历14年，太平军驰骋18省，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

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把中国旧式农民战争推到了顶峰。

（梁义群）

洪秀全

(Hong Xiuquan 1814—1864)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农民出身的穷苦知识分子。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饱读经书、奔波科场中度过的。从1827年(道光七年)起，虽多次赶考，却连个秀才也未能考取。个人仕途的坎坷，与国家、民族的灾难交结一起，激起了他的反抗思想和改造社会的愿望。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再赴广州科考失败，偶然阅读了10年前得到的《劝世良言》。这本“内容奇极”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书中关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崇拜独一无二真神“皇上帝”等思想，给了他很大启发，便和冯云山、洪仁玕等创立拜上帝教。随之把村塾中供奉的孔夫子牌位撤除，为此他们失去塾师职业。于是决定“出游天下”，走向广阔的社会宣传“真道”。1844年4月与冯云山等离开花县老家，先到广东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等十数府县传教，应者寥寥。后辗转来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仍收效甚微。是年底，决意返回花县，从事新宗教理论上的创造。1845年后，写出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诗文，大胆地批判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热情向往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1847年3月至广州，从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要求洗礼，遭到拒绝。8月，再次到广西，在桂平紫荆山与冯云山会面。冯云山在两年多前与洪秀全分手后，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在紫荆山区宣传组织群众，建立了拜上帝会，发展会众3000余人，其中还有不少图谋大事的草莽英雄。广大受苦农民和烧炭工人反封建斗争的热情，使洪秀全深受鼓舞，更坚定了反清决心。这时写出《原道觉世训》等诗文，编造了一个他受命于天、是上帝第二子的神话，决心率凡间亿万人民消灭“阎罗妖”及“妖徒鬼卒”即压榨人民的清朝皇帝及大小贪官污吏。随之，又与冯云山一起率会众捣毁象州甘王庙及其他偶像。由此拜上帝会名声大振，与封建阶级的矛盾迅速激化，冯云山等人被地主团练头子王作新诬陷入狱，拜上帝会的敌人乘机从内部进行破坏。面对拜上帝会出现的严重危机，杨秀清、萧朝贵挺身而出，于1848年3月和9月，先后以代“天父”和“天兄”传言身份，迅速平息了敌人制造的乱子，挽救了拜上帝会，使免遭分裂。从此杨、萧突起。面对现实，洪秀全很快承认了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身份和在拜上帝会中已取得的实际领导地位，并于1849年初回广东说服不愿接受拜上帝会变化了的现实的冯云山。7月，二人一起返回紫荆山。次年7月，受“天兄”面谕，发布团营令。1851年1月11日，在万众欢呼声中，于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不久，称天王。1853年(咸丰三年)3月太平军攻克金陵，遂奠都，改称天京，建立起农民政权，颁布了体现农民反封建要求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和一系列制度政策，推动了革命事业进一步发展。军事上经过曲折的斗争，到1856年上半年，已控制皖、赣、鄂三省大部分地区，并击溃围困天京长达三年之久的清江北、江南大营，从而达到鼎盛时期。8月受杨秀清逼迫，答应封杨为“万岁”，却暗中密令韦昌辉回京，杀死杨秀清及其部属几千人，继之又把引起翼王石达开和天京军民强烈不满的韦昌辉等处死。命石达开回京主持朝政，却又心怀猜忌，处处掣肘，致使石达开负气率精兵10数万于1857年6月离京出走。此后太平天国形势险恶，他及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挽救，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主持军事，又任用族弟洪仁玕主持政务。经过

努力，在军事上连续取得三河之战，再破江北、江南大营，开辟江、浙地区的胜利，从而挽回了危局。但整个局势仍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特别是 1860 年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而他终日深居宫中，宗教迷信思想和封建思想愈加严重，完全丧失了正确处理军政事务的能力。太平天国内部政治更为腐败，朝内、军内矛盾重重，败象毕露。太平军的根据地接连丧失，天京被清军团团包围。而他仍信天不背人，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困守孤城。1864 年（同治三年）6 月 1 日病逝。7 月 19 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梁义群）

冯云山

(Feng Yunshan ?—1852) 太平天国起义军领袖。又名乙龙。广东花县人。出身一个富庶的农家。自幼学习刻苦，对天文、地理、兵法、历算、经传典籍无不通晓。与洪秀全有相同的经历，屡试不第，渐萌反抗思想。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与洪秀全一起创建了拜上帝教。次年5月，随洪秀全到广西传教。但半年间，仅发展教徒100余人。在洪秀全返广东后，他只身留在广西继续宣传“真道”。是年底，到紫荆山区，先打短工，后作塾师，在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皈依上帝者日众，于1846年后创立拜上帝会。到洪秀全1847年8月重返广西时，紫荆山地区已拥有会众3000余人。在紫荆山之外又开辟武宣、象州、平南、贵县、博白及广东信宜等根据地。因捣毁象州甘王庙及一切偶像，被地主王作新诬告入狱。巧妙利用合法斗争，获得无罪释放。为人识大体，顾大局。一向尊崇洪秀全的领袖地位，并承认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的传言身份，甘居杨、萧名下。1850年6月团营令发布后，与洪秀全转至平南花洲山人村布置起义。1851年1月1日和洪秀全一起指挥桂平蔡村江之战，阵毙清将伊克坦布。参加领导1月11日的金田起义。3月封为后军主将，12月在永安（今蒙山）封为南王。太平天国永安建制（包括军制、军律、历法、官制、礼制），多出其手。清方评论他说：“倡乱以来，用兵诡譎，几于不测，所有伪谕，悉出主裁。”（《金陵癸甲纪事略》）1852年（咸丰二年）5月攻全州时中炮受伤，6月逝于蓑衣渡。年仅30余岁。太平天国印书称颂他“前导开国护圣君，克取省郡如反掌，开疆拓土功劳深”。

（梁义群）

拜上帝会

(Baishangdihui) 1846年后冯云山创立的反清秘密团体。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等在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教,然后于1844年先后在广东一些府县和广西贵县传教,但信教者寥寥。1845—1847年秋,冯云山深入广西桂平紫荆山区宣传拜上帝,在实践中注意把拜上帝教的宣传与农民的现实利益结合起来,如说拜上帝可以“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个个安康”,“今世见平安,升天见永福”,等等;在入教仪式上也作了创新,吸收了传统宗教的某些形式,因而入教者日众。随着形势的发展,冯云山认为有必要在拜上帝教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农民革命团体。约在1846年以后,正式建立拜上帝会,仍推教主洪秀全为会首,进行秘密活动,并把拜上帝会扩展到贵县、平南、陆川、博白、信宜等地。1847年8月,洪秀全到紫荆山,会见冯云山,提出用捣毁庙碑的办法,进一步扩大拜上帝会的影响,确立独尊真神皇上帝权威。于是,洪秀全、冯云山率拜上帝会众,于10月砸碎象州甘王神像,捣毁庙宇。接着,又回紫荆山捣毁雷庙。当地团练头子王作新以此为借口,勾结官府,逮捕冯云山、卢六入狱。从此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发生公开冲突,拜上帝会由秘密趋于公开。冯云山被捕后,敌人企图在拜上帝会内部制造混乱,瓦解拜上帝会。杨秀清、萧朝贵挺身而出,先后借“天父”和“天兄”传言身份,揭露和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稳定了会众。1849年7月,洪秀全、冯云山回到紫荆山,对杨秀清、萧朝贵的“传言”,“审判为真者”予以肯定。至此拜上帝会的领导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杨秀清、萧朝贵的座次排在洪秀全、冯云山之后,但当他们代“天父”、“天兄”传言时,就凌驾在洪、冯之上,拜上帝会形成了二元化领导,它成为后来领导集团分裂的种因。不久,重建拜上帝会总部,发动了金田起义。起义之后,因为凡起义的会众都站在太平天国旗帜下,被编入太平军中,于是作为农民革命团体的拜上帝会也就失去存在的必要。这大概就是人们怀疑拜上帝会是否存在,为何在太平天国的文献上,和与太平天国交战的清朝官吏的奏报及书信上没有出现“拜上帝会”字样的缘故吧!

(梁义群)

杨秀清

(Yang Xiuqing? —1856) 太平天国起义军领袖。广西桂平人。自幼失去父母，由伯父抚养长大，后在紫荆山区以“种山烧炭”为生。一度浪迹江湖，深深地了解社会，性格坚强，处事机警，富于谋略和组织才能。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接受冯云山宣传的拜上帝教。1848年初，紫荆山团练头子王作新以“阴结党羽，图谋作乱”的罪名捕冯云山入狱。一时间拜上帝会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有瓦解之势，在此紧要关头，他机智地假托“天父下凡”，传言群众，揭露敌人，稳定了会众。从而，获得“代天父传言”的特权，骤然成为拜上帝会主要首领之一。洪秀全、冯云山为顾全大局，承认其代天父传言的身份和在拜上帝会中的领导地位。此后，便成为太平天国掌握实权的最高指挥者，与萧朝贵、洪秀全等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1851年1月11日的金田起义，显示出卓越的军政才能。3月，封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12月在永安(今蒙山)封东王，节制同时受封诸王。自太平军起义到占领金陵(今南京)的胜利进军中，他的正确指挥起了很大作用。曾和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揭露清政府黑暗统治，号召群众响应起义，为建立公平的社会而斗争。在战略方向问题上，力排众议，坚持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专意金陵”的主张。定都天京(金陵)后，总揽军政大权，在建设农民政权，制定军政决策中发挥重大作用。在1856年西征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亲自指挥太平军，一举粉碎清江南大营，解除长达三年之久的天京之围，使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于鼎盛。至此，更加居功自傲，竟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早已存在的洪、杨矛盾空前激化。在洪秀全密令之下，韦昌辉于9月2日带兵残杀杨秀清及部属几千人。被杀时定为“东孽”，后洪秀全追念其功，定其死日为“东王升天节”。

(梁义群)

韦昌辉

(Wei Changhui 1823—1856) 太平天国起义军领袖。原名志正，又名正。广西桂平金田村人。出身地主家庭。曾因入粟捐国子监生，招人诬陷入狱，深感人世不平。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8月接受冯云山的劝导，加入拜上帝会，为一方领袖。在拜上帝会准备起义时，他家是秘密打制武器的场所，1850年6月团营令发出后，又成为指挥起义的总机关。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后，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12月，在永安封为北王，六千岁。在太平军胜利进军中，亲自指挥过一些战役，多次负伤。在攻打南京的战斗中，立下战功。定都天京后，协助东王杨秀清处理军政大事，为创建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作出一定贡献。对独揽大权、专横跋扈的杨秀清表面逢迎，实则伺机夺权。1856年洪秀全、杨秀清矛盾激化。在接到洪秀全的除杨密诏后，即率3000精兵，于9月2日袭杀杨秀清及其部属几千人。后又杀害指责其滥杀行为的石达开，未成，转手杀石的家属，并且派兵包围天王府。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天京事变中，他使天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先后杀害太平军将士及家属2万余人，给太平天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最后，被洪秀全诛杀。

(梁义群)

石达开

（Shi Dakai 1831—1863）太平天国起义军领袖。原籍广东和平县，客家人。迁居广西，定居贵县那帮村。出身富裕农民家庭，父母早亡，终日勤于耕种，兼做生意。常受劣绅豪富欺凌，激发了他对清朝黑暗统治的不满。约在1845年至1847年（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参加拜上帝会，成为一方首领。金田起义后，被封为左军主将，在永安加封翼王。在胜利进军途中，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定都天京不久，被派安庆安民，从实际出发，实行了一些诸如按亩输米，设关收税，择有声望者任乡官等政策，政绩卓著，颂声大起。当西征军陷入被动局面时，受命主持西征军务，先后在江西、湖口、樟村镇重创湘军，扭转了战局。1856年4月回援天京，破江南大营，随即西援武昌，乘胜歼敌。正当与胡林翼激战武昌之际，闻天京事变爆发，10月中赶回天京，严责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不听劝阻，反欲加害，他只身缒城逃出，至安庆起兵讨韦。在天王洪秀全诛杀韦昌辉后，受诏回京辅政，很快稳住了大局。但因遭到洪秀全的疑忌和多方牵制，于1857年6月负气率太平军10数万自天京出走，造成太平天国分裂，给起义带来巨大损失。出走以后，虽仍使用太平天国旗号，在迂回作战的过程中，牵制不少清军，对太平天国克服危局起了一定作用，但长期孤军作战，没有周密战略计划，始终未能开辟出新局面。1863年（同治二年）5月，率军进入大渡河紫打地，陷入敌人重围，輜重尽失，粮食断绝，遂传令弃械，自己带着儿子和宰辅曾仕和等赴清营，被解往成都，临刑之际，神色怡然。

（梁义群）

金田起义

(Jintian qiyi) 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即太平天国起义。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等在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教，以崇奉“独一真神皇上帝”，否定一切偶像为宗旨。1845—1847年秋，冯云山深入桂平县紫荆山区宣传和组织群众。此间创立了拜上帝会的农民革命团体，并且把拜上帝会组织迅速扩展到浔州所属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等县和象州、藤县、博白、陆川，以及广东的高州、信宜等地。在拜上帝会领导下，开展了毁神倒庙等群众性斗争。1847年冯云山等被当地土劣王作新勾结官府捕拿入狱。拜上帝会群龙无首，敌人乘机在拜上帝会内部制造混乱。这时，杨秀清和萧朝贵先后分别假托天父和天兄下凡附身传言，稳定众心，整顿拜上帝会组织，并于1848年10月营救冯云山出狱。洪秀全、冯云山为了顾全大局，使起义早日成功，承认了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的传言身份和在拜上帝会中取得的领导地位。这时广东、湖南等邻省天地会的反清武装转移入广西，广西出现天地会反清起义的第一次高潮，拜上帝会以天地会作掩护，进行周密准备。杨、萧在1850年2月召集各地拜上帝会首领到紫荆山，“天兄”(萧朝贵)宣布“太平事是定”(起义已决定)。7月，“天兄”在与刚到广西的洪秀全家属对话时，面谕洪秀全，“天父天兄交威权给你(洪秀全)，你要牵带兄弟，同顶江山给人看。”于是，洪秀全立即正式下达团营(团方)命令。此后，“天兄”不断发出“不守天条，要处置”，“作事慎密”，“多买红粉”等谕令(以上均见《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各地会众实行自愿入伍、全家入伍，按照已编订的太平军的兵制、旗号、军律、营规和行军法等成法组织起来，创设圣库制度，保证军需供应。起义队伍分别在石达开、胡以晃、蒙得恩、秦日纲等率领下，冲破地主团练的阻拦，奔赴金田。11月杨秀清发援兵，在思旺战胜清军和团练对洪秀全所率花洲会众的围困，太平军簇拥洪秀全胜利回到金田，史称“迎主之战”。接着，太平军在金田祝捷，清军1000多人向金田扑杀过来，被太平军四处伏击，大败而逃。太平军乘胜追击，在蔡村江击毙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和千总、把总多人。1851年1月11日(一说1850年11月4日)，洪秀全领导1万多汉、壮、瑶等族人民在金田庄严宣告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洪秀全严申五项军纪，冯云山宣读秉承天父旨意，合力诛妖灭清，实现太平的讲词。从此，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大江南北展开。

(梁义群)

太平军北伐

(Taipingjun beifa) 1853—1855年(咸丰三年至五年)太平军为攻取北京而采取的军事行动。1853年5月8日,太平天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奉命统兵2万余人,由扬州出发,经仪征、六合到浦口,与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殿左三检点朱锡琨所部会合,出征北伐。按照洪秀全、杨秀清的“师行间道,疾趋燕都”的指示,北伐军由浦口北上,入安徽,连克滁州、定远、凤阳、蒙城、亳州,进入河南,占归德(今商丘)。当时黄河未改道,太平军欲从刘家口渡河,因无船只,继续西进。7月,到巩县,得运煤船越过黄河天堑,进围怀庆府(今沁阳)。攻怀庆不克,9月初从垣曲入山西,克平阳(今临汾),前锋进至洪洞,由此东折,经潞城、黎城,出太行山。9月末由临洛关突入直隶北上,由滦城东向,经深州至泊镇,由此沿运河北上,经沧州,10月末前锋进抵天津,屯据静海、独流。北伐军一路顽强作战,避实就虚,迂回前进,终于完成天京交给的“到天津扎住”的任务。然后回报天京,待援。清廷震动,一片慌忙,咸丰帝准备出逃热河行宫。但北伐军孤军深入,加之时值隆冬,粮尽衣单,死伤过重,不得不在1854年3月撤至山东阜城待援。5月突围至连镇,在得知北伐援军入山东的消息后,李开芳率精兵千人突围南下接应,途中闻知援军失败,遂据守山东高唐。北伐军被分割两处,既无援军,又无粮草,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长达9个多月,终被敌人各个击破。1855年3月7日,连镇陷落,高唐守军撤至茌平冯官屯。5月31日屯陷,林凤祥、李开芳先后被解往北京杀害。北伐军横扫6个省,转战5000里,前锋逼近京城,严重打击了清朝统治,推动了北方人民的反清斗争。但孤军深入,陷于失败,使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受到重大损失。

(梁义群)

太平军西征

(Taipingjun xizheng) 1853—1856年(咸丰三年至六年)太平军为控制长江中游各省以巩固天京而采取的军事行动。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于5月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1000余艘,自天京出发,溯江西上,连克安庆、九江、湖口。然后分兵两路:一路挺进皖北,攻取庐州(今合肥);一路向湖南、湖北进军,攻取武昌、长沙。1853年底胡以晃围攻庐州,击毙寿春总兵玉珊,又败陕甘总兵舒兴阿的救兵,次年1月用地雷攻破庐州,安徽巡抚江忠源兵败自杀。2月,殿左一检点曾天养率领一部西征军,在黄州击败湖广总督吴文镕统帅的清军,吴兵败投水而死。太平军乘胜攻占汉口、汉阳。后进入湖南,与曾国藩的湘军遭遇。4月,进占岳州、靖港、湘潭等地。曾国藩亲率水陆两路猛扑驻靖港的西征军。太平军全歼来犯湘军水师,曾国藩败回长沙,三次投水自杀未遂。西征军初战获胜。但是湘军经过整顿之后,又向太平军反扑,终因西征军兵力分散,内部磨擦,指挥失误,在湘潭战败,北退靖港。10至12月,武昌、汉阳、田家镇相继失守,太平天国水师丧失殆尽。天京派出英勇善战的石达开主持西征军务,采用诱敌深入和灵活机动的战术,于1854年1月29日和2月11日,先后在湖口和九江重创湘军水师,使其“辎重丧失,不复成军”。湖口、九江大捷使西征军扭转了湘潭战后的被动局面。自此西征军乘胜歼敌,扩大战果。秦日纲、韦志俊率部在鄂北战场上,大败湖广总督杨霁,再占汉阳,三克武昌。石达开、胡以晃率军克江西8府50余县。至1856年7月,历时3年的西征取得了辉煌战果:攻取了长江两岸的武昌、九江、安庆三大重镇,开辟了安徽、江西和湖北东部的广大地区,并为解天京之围创造了条件。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85-1.bmp}

(梁义群)

天朝田亩制度

(Tianchao tianmu zhidu) 太平天国起义军的纲领性文件。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 1853 年冬,洪秀全旨准颁布了反映太平天国基本国策的《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全面的农民革命纲领和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关于土地纲领。从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总的原则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目的是要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就从根本上否定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所有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进而建立一个“四有”、“两无”的理想社会。平分土地的原则和办法是:一、按人口平均分配,即“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二、按土地好坏搭配。先按早、晚二季产量,将田划分九等,然后按田好坏搭配分配,“如一家六口,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三、分田有年龄的差异,凡 16 岁以上男女分得田亩的面积应为 15 岁以下男女的一倍。关于理想社会蓝图。《天朝田亩制度》按照我国古代“寓兵于农”的思想,把太平军的组织系统移植到社会上,制定了“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守土乡官制度。规定五家为伍,设伍长;五伍为两,设两司马;四两为卒,设卒长;五卒为旅,设旅帅;五旅为师,设师帅;五师为军,设军帅。从伍长到军帅,都调选本地人充任,故称乡官。军帅以上设监军、总制,称守土官。“两”(加上两司马为 26 户)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由两司马管理生产、分配、行政、司法、教育、礼俗及军训等。每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规定每户必须种桑织布,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一切农副产品除留足每户“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丧失劳动力的人,都由国库供给。又规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上)”。《天朝田亩制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代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提出过的“平均”、“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集中反映了亿万农民迫切要求摆脱封建剥削和压迫、要求平等和消除贫富差别的愿望,表现了农民群众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深恶痛绝,和大胆否定的革命精神。它鼓舞了广大农民为反对封建制度而斗争,成为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斗争的最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经济生活方案,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这个文件还规定天王高度集权,官员世袭制,以及把“黜为农”作为对官员的处罚,表现出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观念。《天朝田亩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这个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太平天国领袖们所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梁义群)

圣库制度

(shengku zhidu) 太平天国团营起义后在太平军中实行的供给制度，亦称公库制度。金田起义时，因许多人都是全家参加起义的，因此作出规定：凡参加起义者都“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到永安后，1851年9月2日（咸丰元年八月七日）进一步宣布：“凡一切杀贼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圣库制度不仅是供给制度，也是太平天国一条重要纪律规定。军帅以下藏银不得过五两，旅帅以下不得过四两。圣库制度又是太平天国欲要建立的理想“天国”的尝试，新社会组织的雏型。它期望使每个社会成员皆以兄弟姐妹相待，一切享用完全平均。所以定都天京后，又将圣库制度推广到城市，进而又通过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向全社会推广。但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规定，一旦推广到城市社会，就遭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因为是个空想，无法行通。但是圣库制度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领袖人物不断滋长起来封建等级特权思想，无限制的多吃多占造成的。不过，圣库制度实行之初，对加强太平军的纪律性和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

（梁义群）

天京事变

(Tianjing shibian)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事件，又称杨韦之乱。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之后，其主要领导成员自以为成了“小天堂”的主人，生活上迅速腐化，政治上开始争权夺利，彼此猜忌，矛盾日深，特别是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其时，洪秀全沉迷于后宫生活和宗教迷信中，疏于朝政。而杨秀清大权独揽，飞扬跋扈，并利用代“天父”传言的身份，多次杖责洪秀全。1856年7月，在取得西征胜利和破除清江北、江南大营的胜利之后，杨秀清自恃功高，公然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佯为答允，实则密令在江西前线的北王韦昌辉剪除杨秀清。9月1日深夜，韦昌辉带兵3000多人从江西瑞州（今高安）回到天京，次日杀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众几千人。以后又进一步扩大事态，在两个月中共杀太平军将士和家属2万余人。10月中旬，石达开从武昌闻讯返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无辜，韦昌辉不听劝阻，反欲谋杀石达开，石得信半夜缒城出逃，韦昌辉又杀害石达开在京家属。11月，石达开在安庆出动靖难之师，向天京进发，要求洪秀全处死韦昌辉。洪秀全采取果断措施处决了韦昌辉及参与肇事的秦日纲、陈承镛等200余人，并派人把韦昌辉的首级送交石达开，诏石达开回京辅政。石达开雄才大略，累建奇功，深得将士们钦佩，特别是他在天京事变中采取了正确立场，更加得到满朝文臣武将的拥护，一致推举他“提理朝政”。但是洪秀全片面汲取天京事变的教训，从此不信异姓，对位高权重的石达开更为猜忌，起用昏庸无能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分别加封安王、福王，用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负气于1857年5月率10数万精锐出走天京，这一不顾大局的分裂行动，给太平天国造成重大损失。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的转折点，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前兆。

（梁义群）

陈玉成

(ChenYucheng 1837—1862) 太平天国将领。广西藤县人。世代住在大黎山区，祖孙三代均为勤劳农民。1848年至1849年间(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入拜上帝会。1850年秋，团营令下，闻讯随会众到金田。起义时为童子兵，年纪虽小，但行军打仗不甘落后，登高涉险，威猛无畏。定都天京后，以功受封为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1854年随军西征，在二克武昌城的战斗中，担任主攻，率精兵500继入城内，攻克了武昌城，越四级超升殿右三十检点。1856年升冬官正丞相，参加镇江解围之战，乘小船冲破敌人重围，入城联络，得以实现内外夹击敌人的计划。镇江解围成功后，又一举踏平敌人江北大营，继又参加破江南大营之战。天京事变后，晋封成天豫，又正掌率、前军主将。深知在危难之际，身负重任的严重意义，同新提拔起来的李秀成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从1858年8月起，连续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三河之战和二破江南大营等全歼敌人的胜利之战。1859年6月，以功封英王。1860年4月在天京高级军事会议上，针对当时一些领导人重下游轻上游片面的战略指导思想，提出“救安庆”的正确主张，但被洪仁玕、李秀成等否定。为顾全大局，随军参加开辟江、浙地区的战斗。这就给湘军在上游的发展以可乘之机。1860年5月安庆陷入敌人重围，奉命往救。当时洪仁玕提出由陈玉成、李秀成分江北、江南两路西进，会师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所谓第二次西征。他按期到达湖北黄州，但李秀成大军违约误期不到，加之受英国驻武汉领事所骗，未攻武汉，返回援救安庆。从1861年4月起，竭尽全力救安庆，洪仁玕也亲率大军来援，与湘军展开空前的激战，终未奏效。9月5日安庆失守，同洪仁玕一起受革职处分。后退守庐州(今合肥)，不思进取，又分军让部属陈得才、赖文光去河南、西北等省开辟新局面。5月，率部从庐州突围，北至寿州，为叛降的团练头子苗沛霖诱捕，送至颍州(今阜阳)胜保军营。1862年6月4日，在河南延津慷慨就义，年仅25岁。

(梁义群)

李秀成

(Li Xiucheng 1823—1864) 太平天国将领。广西藤县人。出身雇农家庭。1848年至1849年(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加入拜上帝会。1851年9月,太平军来藤县招集会众,随军出发。吃苦耐劳,勤学苦练,受到杨秀清的赏识,1853年东王保举为右四军帅,驻守天京太平门外。不久,升为后四监军。10月,随石达开赴安徽带兵安民,后镇守庐州(今合肥)。在镇江解围及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中,立下战功,升地官副丞相。1856年天京事变后,因招收捻军有功,升地官正丞相。次年10月后晋爵合天侯、副掌率、后军主将,与陈玉成共主军事。1858年8月以后,与陈玉成协同作战,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和三河之战的辉煌胜利。为了革新政治,冒死谏请天王“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为此受到洪秀全的打击。1859年12月封忠王,旋入京与洪仁玕商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一举二破江南大营。又支持洪仁玕提出的“乘胜下取”,攻打苏、杭、上海,开辟江浙地区的战略决策。在江浙地区建立农民地方政权,实行轻税轻赋政策,发展了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但渐渐滋长享乐思想,视江浙地区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不大关心太平天国全局性的战略,与洪仁玕、陈玉成存有隔阂,不能团结共事。1861年,未积极执行洪仁玕令其与陈玉成会师武汉解安庆之围的二次西征战略计划,贻误戎机。1862年(同治元年),奉命回援天京,与湘军大战40天,未能获胜。在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向洪秀全建议“让城别走”,遭到怒斥。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带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失散被俘。在狱中写了五六万言供词(即《李秀成自述》),记述了天国兴亡史,也流露出乞降之意。

(梁义群)

洪仁玕

(Hong Rengan 1822—1864) 太平天国起义领袖。字益谦，号吉甫。广东花县人。出生农民家庭。洪秀全族弟。二人有共同经历，自幼来往密切。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接受洪秀全宣传的“拜上帝”，受洗礼，成为拜上帝教创造人之一。1847年，曾随同洪秀全到过一次广州，结识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金田起义后，洪氏家族遭清政府抄捕，他约族人50多人同去浔州追奔太平军，为清军所阻，返回广东，后亡命香港，给传教士瑞典人韩山文教汉语，口述拜上帝成立和金田起义过程，韩山文记录成书，译名为《太平天国起义记》。得到韩山文等外国传教士资助，曾多次试图到天京，均未能成功。在滞留香港期间，专心留意考察西方文化科学知识。1858年6月再次离香港，历经广东、江西、湖北、安徽，于次年4月到达天京。当时太平天国正需用人之际，不到半月连升数级，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太平天国军政。不久，写出《资政新篇》，进呈天王洪秀全，得到诏准颁行。《资政新篇》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脱离太平天国实际，没有反映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土地问题，因此未产生实际影响。1860年春，为解天京之围，提出“围魏救赵”之策，即发兵攻打湖州、杭州，迫使清军驰援，然后乘隙蹈虚，回攻江南大营，以解天京之围。5月，天京解围后，又建议先“乘胜下取”，再“沿长江上取”的方略，得到天王批准，由是开辟了江浙地区。但毕竟不娴于军事，犯有战略指导片面性的错误，开辟江浙地区抵偿不了安徽根据地的丧失，制定的会剿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第二次西征的战略仍是二破江南大营战略方针的翻版，无法实现战略目的。虽亲率大军参加安庆破围战，但未起指挥作用。安庆失守，受到革职，便一蹶不振。天京陷落后，随幼天王等在向江西转移途中被俘。1864年（同治三年）11月23日，在南昌从容就义。

（梁义群）

资政新篇

(Zizheng xinpian) 1859年(咸丰九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的政治纲领,其基本精神是要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某些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以巩固革命政权,使“太平一统万万年”,建设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主要内容是:政治上,针对太平天国当时存在的宗派主义、分散主义,提出“禁朋党之弊”,反对“结盟联党”,加强中央集权,做到“权归于一”;经济上主张发展交通、工业、金融、邮电、水利等事业,准许私人雇工,鼓励私人投资,开办银行,发行纸币,保护发明专利;文化教育上,提倡开办学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克服“不务实学”的坏学风;社会风尚上,主张革除溺子女、酗酒、吸鸦片,禁止封建迷信,兴办医院、跛盲聋院、育婴堂和鳏寡孤独院等福利事业。《资政新篇》顺应了中国当时要求挣脱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要求,但是它没有反映太平天国起义农民的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得不到太平天国军民关注,加之领导集团内部意见分歧,客观上处于战争环境,它未能付诸实施。

(梁义群)

曾国藩

(Zeng Guofan 1811—1872) 晚清军政重臣，湘军首领。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在偏僻山村的一个地主家庭。1838年(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历任内阁学士，礼、兵、刑、吏等部侍郎。自幼受封建传统教育，尤其崇尚理学。鸦片战争前，在北京常与唐鉴、倭仁、吴廷栋等一般道学先生研讨宋学。为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得意门生，得到穆彰阿的赏识和提拔，十年七迁，连跃十级。鸦片战争失败后，曾两次上奏，建议革除弊政，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改革。1852年(咸丰二年)丁忧回籍。次年奉诏办理湖南团练。摈除八旗、绿营旧制陋规，仿明代戚继光之营制，招募山乡农民，编练成一支新型的地主武装——湘军，开近世兵为将有的先河。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1.7万人，会师湘潭，发表檄文，极力诋毁太平天国，向正在进行西征的太平军进攻。但出师不利，初败于岳州(今岳阳)、靖港。经过整顿，转入反攻，连陷岳州、武汉。然后三路东进，突破太平军田家镇防线，兵锋直逼九江、湖口。后水师冒进，大败于鄱阳湖，战船丧失殆尽，此后不敢轻举妄动，采稳妥战术，宁迟勿速，不用奇谋。1859年，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制定分四路攻略安徽的战略计划，遂完成包围安庆。次年受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亲率一军驻安徽祁门，命曾国荃围安庆，攻其必救，又以多隆阿军、李续宾军屯桐城外拒援，屡败太平军于安庆、桐城之间，终在1861秋攻克安庆。1862年(同治元年)，将大本营迁至安庆，作围攻天京(今南京)部署：命曾国荃部沿江从正面直逼天京，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1864年7月攻陷天京，大肆烧杀抢掠，人称“曾剃头”、“曾屠户”。以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受封一等爵，加太子太保。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各族人民反清起义，曾向列强购置洋炮，装备湘军。同时，1861年创办安庆军械所，生产子弹、火药、炸炮，为洋务运动之始。后又和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设置江南机器制造局，仿造外国军火，装备湘军、淮军。1864年春，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今菏泽)被捻军击毙后，奉命镇压直隶(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捻军，但屡战屡败。1867年，回任两江总督，旋授大学士。次年8月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讨好外国侵略者，屠杀不少中国人民，遭人唾骂。同年，再任两江总督。1872年死于南京。谥文正，其著述辑为《曾文正公全集》。

(梁义群)

李鸿章

(Li Hongzhang 1823—1901) 晚清军政重臣，淮军首领。字少荃，安徽合肥人。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1853年(咸丰三年)随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1858年，赴江西入曾国藩幕府。1861年冬，奉曾国藩之命赴皖北募勇。以淮南团练为基础，仿湘军营制，编练成淮军。次年率淮军赴上海，在英、法、美侵略者支持下，与太平军激战。旋升江苏巡抚。大量购买洋枪洋炮，雇用外国军官，装备和训练淮军。又伙同英人戈登的“常胜军”，采取先剪枝叶、后图根本的作战方针，攻占太平军苏南根据地。在夺占苏州、常州一带之后，积极配合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由于认识到自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免于垮台和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秩序，与奕訢、曾国藩、左宗棠等一起，推行洋务运动。从60年代开始，在上海、苏州创办小型洋炮局，仿西法制炮弹。1865年(同治四年)署两江总督，将原办洋炮局分别合并扩充为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依靠进口原料，雇用洋匠，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制造枪炮、弹药、轮船，用新式武器装备清军。1866年，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直隶(今河北)、河南一带“剿捻”。在承袭曾国藩“剿捻”方略基础上，提出“扼地兜剿”的战略方针，部署重兵，先守胶莱河，继扼运河，在山东、江苏之间剿灭了东捻军。1868年，又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等的配合下，集中10余万清军，在直隶、山东之间镇压了西捻军。1870年，由于曾国藩的推荐，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清政府的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70年代以后，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将洋务运动又推进一步，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开始兴办民用工业，先后设立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与此同时，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外国军舰，修造旅顺、威海卫(今威海市)军港，在天津、大连、威海分别设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和水雷学堂，并抽调军官赴德国学习，仿欧式练兵，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编练成北洋海军。为早期北洋军阀的首领。在外交事务中，一贯主张妥协投降。1876年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出卖大量主权。1884—1885年中法战争中，主张“乘胜而收”，以胜求和，与法国签订屈辱的《中法天津条约》(又称《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幻想“以夷制夷”避战求和，结果陷于被动挨打，招致陆军惨败和北洋海军覆没。以全权代表身份赴日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后，在“联俄制日”的思想支配下，于1896年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以中俄共同防止日本侵略为幌子，出卖我国东北三省主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主张镇压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支持“东南互保”。后被任命为全权大臣，1901年与奕訢一起，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德、意、日、美、奥、西、荷、比11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使得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统治，自此清政府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1902年9月病死。谥号文忠。遗著辑为《李文忠公全集》。

(梁义群)

左宗棠

(Zuo Zongtang 1812—1885) 晚清军政重臣，湘军首领之一。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举，后三次会试不第。好经世致用之学。在已故两江总督陶澍家当塾师，得以遍读群书，努力钻研军事。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充当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为镇压太平军出谋划策。后于1854年春，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所网罗，总揽幕府大权前后6年之久，协助骆秉章派兵镇压湖南省境内的农民军，巩固湘军基地——湖南省的统治，支持王鑫、刘长佑等筹建或扩招湘军，分发各地镇压农民军。1860年6月，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兵部郎中、四品京堂候补随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遵照曾的指令，在长沙招募湘军5000人，赴江西、安徽、浙江边境地区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任浙江巡抚。1862年（同治元年），率部攻入浙江，次年授闽浙总督。1864年，攻陷杭州。接着，率军进入福建、广东，在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镇压了太平军余部。1866年在福州创办船政局，修造轮船，并设求是堂艺局，培养造船及海军人才。是年，调任陕甘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制定“先捻后回”、“先秦后陇”方略，先后镇压了西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与此同时，继续在西北地区兴办洋务，1869年创办西安机器局，1878年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1865年初，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伪政权；1871年7月沙俄出兵占领我国北疆重镇伊犁地区。在对待要不要收复新疆问题上，清朝统治集团展开了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将用于塞防之银钱转用于海防建设，还有人认为远征西北是劳师靡费。他严斥放弃新疆的谬论，力主收复失地。1875年（光绪元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筹兵筹饷筹转运，准备进疆。1876年设大营于肃州（今甘肃酒泉），制订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命道员刘锦棠率大军进疆，先后取得了古牧地、达坂城和吐鲁番作战的胜利，最后直捣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将阿古柏残匪逐出国境。之后，他出屯哈密，以武力为外交后盾，终于收回伊犁，使新疆重回祖国怀抱。中法战争爆发，力主抗法。1884年，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进驻福州前线，整顿防务，部署战守，但于1885年7月病逝。谥文襄。著有《楚军营制》（附条规），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梁义群）

湘军

(Xiangjun) 晚清曾国藩组织起来的封建军阀武装。清朝的常备军——八旗军和绿营兵早已腐朽不堪,不足以应付迅速发展壮大的太平军。1853年(咸丰三年),曾国藩受咸丰帝之命任湖南“团练大臣”,办理团练。但曾复奏皇帝,说办练无济于事,须改弦更张,另练新军。于是在湘乡地主罗泽南、王鑫招募的团练基础上,编练成湘军。特点是实行封建乡土结合,建立严格的个人隶属关系。将领任用湘乡人,多为至亲密友,门生故旧。士兵也都招湘乡农民。其编制以营(500人)为一个独立的作战实体,营辖四哨,哨辖八队。士兵由什长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几营或十几营合做一“统”,设统领一人。营官由统领拣选,统领由统帅拣任。营只服从营官一人,统只服从统领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从而用封建隶属关系,造成曾国藩在湘军中的牢固统帅地位。到1854年2月,湘军水陆师编练完成,计有陆师13营,6500人;水师10营,5000人,全军合计员弁兵勇夫役共1.7万余人,成为太平天国的凶恶敌人。主要将领有左宗棠、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等,逐渐形成湘系军阀集团。

(梁义群)

淮军

(Huai jun) 晚清李鸿章组织起来的封建军阀武装。1853年(咸丰三年),编修李鸿章随侍郎吕贤基回家乡庐州(今合肥)办理团练,抗拒太平军。被击败后,于1858年投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1年,李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赴庐州、六安一带扩编地主团练武装。次年(同治元年)2月率领团练至安庆,曾国藩又按湘军章程定其营制,并拨湘军数营相助。淮军兵勇由将官亲自招募,凡欲立军,由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兵丁,皆同于湘军。后采用洋枪洋炮,编制随之变化,有洋枪队、开花炮队等,全军6500人,成为镇压太平军的又一支反动地主武装,也是李鸿章赖以起家的反动政治资本。1862年4月8日,李鸿章到达上海,他率领的淮军也由安庆分乘英国轮船陆续开赴上海,迅速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淮军在镇压农民战争中不断扩大,1865年已达7万多人,成为进攻捻军的主力。其主要将领有张树声、郭松林、潘鼎新、叶志超等,逐渐形成淮系军阀集团。

(梁义群)

华尔

(Huaer,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头子。美国人，受过基础军事训练，长期在海上及中美洲从事冒险活动。1859年(咸丰九年)来上海，开始在清军水师炮船“孔夫子”号当大副，后受清苏松太道吴煦委派，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任队长，帮助中外反动派镇压太平军。7月1日，进犯松江，遭太平军迎头痛击，大败而逃，旋由上海攻占松江。8月，在青浦被太平军击败，受重伤。因洋枪队在上海附近连续遭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他逐渐认识到只依靠外国流氓凑成的军队不能打败太平军，决定诱骗中国人来当炮灰，以新式武器加以装备，并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1861年8月，在松江正式改组了他的军队，以欧美人为军官，招骗中国人为士兵，组成中外混合军，用新式武器配备，并加以新式训练。11月中旬，这支所谓洋枪队已发展至2000多人，正式邀请英国侵华海军司令贺布检阅。贺布立即表示支持，并誓做“华尔的朋友和同盟者”，两支直接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武装力量从此合流了。1862年(同治元年)又将洋枪队扩编为“常胜军”，任副将，在上海、宁波配合英、法侵略军作战，残酷屠杀中国人民。9月21日，同英军进犯慈溪(今浙江慈城)，被太平军击成重伤，次日，在宁波毙命。

(梁义群)

捻军

(Nianjun)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军。原称捻子或捻党。起源于清朝初年，是长期活动在安徽、河南、山东西部和江苏北部一带的民间秘密组织。主要成员是农民和其他劳苦群众，往往以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捻（皖北方言称一部、一股、一支为“一捻”），“自号为捻，不相统一”，进行抗粮、抗差、打富济贫等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活动。太平天国的建立和胜利发展，给捻子以极大鼓舞。据河南的《巩县志》记载：“粤西洪秀全建太平天国，江南亳、颍、寿三州，山东曹县等处土寇（捻众）蜂起，首领张乐行、龚瞎子（得树）……等望风附降，长驱河南，所向侵暴。”1853—1854年间（咸丰三年至四年），太平天国北伐军和北伐援军先后经过皖北、豫东，捻子纷纷起义响应。安徽泗县、灵璧、宿州，山东兖州、沂州、曹州等地群众也相继而起，势力逐渐壮大。1855年7、8月间，张乐行在雒河集（今安徽涡阳）召集各地捻子首领会盟，被推为盟主，建国号“大汉”。张乐行称“大汉永王”（一作“大汉明命王”），制定《行军条例》19条，组成捻军，建立黄旗、红旗、蓝旗、白旗、黑旗军制。各旗人数或多或少，没有定数。雒河集会盟标志着捻军由分散趋于统一，战斗力大大提高。他们以雒河集为中心，南至庐州（今合肥），东到洪泽湖，北迄徐州，西达河南归德，形成一个半径达600里的主要活动区域。但是，它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没有一定的军饷和供给制度，不能克服原有的分散性等弱点，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1857年，捻军渡淮河南征，与太平军李秀成、陈玉成部会师于安徽霍丘及正阳关等地，并接受太平天国领导，蓄长发，受印信，使用太平军旗帜，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五旗将领亦各有封号。但他们“听封而不听调”，不出境远征，并保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和领导系统。1858年6月张乐行等部北上占领安徽怀远、临淮和凤阳等地，不久相继陷落。1860年淮北捻军3万人在张宗禹等率领下，攻占苏北重镇清江浦（今淮阴）。是年加封张乐行为“沃王”。1861年3月，龚得树率军配合太平军西征武汉，牺牲于途中。9月，安庆失守，张乐行率军北归颍上。1863年（同治二年），以僧格林沁为首的清军攻陷雒河集，张乐行被捕殉难。1864年天京陷落，标志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由张宗禹、任化邦率领的捻军与太平军余部赖文光联合坚持斗争，推赖为首领，改用新的流动战术，易步为骑，使捻军建成一支拥有10万人的骑兵武装力量。1865年5月，在山东曹州（今菏泽）全歼清主力军僧格林沁马队，旋又击败湘军和淮军，声势复振。次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为东西两部。以张宗禹和张禹爵为首的一军赴西北，联络抗清回众，为西捻军；以赖文光和任化邦为首留守中原，继续抗清，为东捻军。东捻军在鄂、豫、皖、鲁之间转战数千里，1867年被李鸿章的淮军包围，主力军覆没，任化邦战死于江苏赣榆。1868年初赖文光部覆没于扬州，赖文光被执就义。1868年8月，张宗禹败亡山东高唐徒骇河。捻军作为太平军在长江北岸的有力同盟军，坚持斗争18年，驰骋于江淮之间与大河上下，促成了西北回民起义的爆发，有力地配合太平天国和北方各地的人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势力。

（梁义群）

张秀眉

(Zhang Xiumei 1823—1872) 清咸丰、同治年间贵州苗民起义军首领。贵州台拱厅仰岗涨绢(今台江县南省乡板凳下寨)人。苗族。雇工出身。清初“改土归流”后,苗族农民长期处于清朝官吏、汉族地主和苗族地主的压迫下,过着惨无天日的生活。1851年(咸丰元年)金田起义消息传到苗寨,他待机起义。1853年参加榔党起义,从失败中学到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的方法,增长了才干。1855年,台拱官府擅自提高粮钱折合标准,激怒了苗民,集合数千人冲入台拱城杀了前来镇压的知州杨承照。他认为时机已到,公开领导群众在台拱厅掌梅尼议郎誓师举义。遍告各寨,千里苗疆,同时响应。起义苗民一致推举他为带头人(即为大元帅)。至1858年,起义队伍发展数十万,遍及贵州东南数十州县,军威直指贵阳,震撼清朝在贵州的统治。起义军建立自己的政权后,一方面加强根据地建设,以几百寨为门户,深沟高垒;一方面将所有屯田、苗、汉地主土地分给无地苗民,废除封建剥削。同时蓄发易制,但拒称王。苗民政权建立起强大的武装,除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外,其余全体成年农民均为后备军。平时从事生产,遇有战事由统帅部用刻木加鸡毛、火炭依次传递各寨,农民闻警立即放下锄头,拿起刀枪,投入战斗。这种亦兵亦农的政策,不仅扩大了兵源,而且解决了给养。苗民起义军还特别注意与号军(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起义队伍协同作战,互相支援,很快将起义烽火烧遍整个贵州,并震撼湘西,使得清政府不得不派出3万多湘军入黔,每年耗资200万两,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1869年,领导苗民起义军在黄平东南的黄飘、都匀以南的羊安的战役中,取得两次重大胜利,击毙清提督荣维善等,使以席宝田为首的清军,长期被动挨打,不敢与起义军作战。后来席宝田对苗民起义军所占据的山寨,采取烧光杀光的残酷策略,起义军积谷焚尽,遂陷入粮尽势穷的绝境。1871年2月,号召各路起义军大会乌鸦坡,连寨数十,准备决一死战。结果,兵败被俘,被解送长沙,于1872年6月27日慷慨就义。

(梁义群)

杜文秀

(Du Wenxiu 1824—1872) 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民起义军首领。回族。云南永昌府保山县城人。出身商人家庭。本姓杨，因承嗣舅家，故用母姓。自幼聪敏，勤奋好学，14岁考取秀才。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在保山县一次由清朝统治者制造的回汉械斗中，城内8000多回民被杀，他虽幸免于难，但家人中多人惨遭杀害。于1847年秋，偕被害家属丁灿庭、木文科、刘义等赴京，向清政府都察院控告保山县大规模屠杀回民的罪行，无结果。归后流落于云州、蒙化等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他待机行事。1856年(咸丰六年)，大理发生屠杀回民事件，趁机率回民占据大理府，被众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宣布起义，建立“平南国”。因准备事成之后归附太平天国，故拒不称王。此后多次围攻昆明，均未攻克。据有53个州县，区划为永昌、蒙化、江迤、江外、川、陕等六省，大理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采取恢复生产和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建立官制，严肃吏治军纪，对外反对侵略，给窥伺云南的英、法侵略者以坚决打击。1867年后，镇压贵州苗民起义的湘军入滇增援。清军对起义军大施离间之计，使内部发生矛盾，起义军首领降清事件时有发生。当英勇善战的大都督蔡春发、大司戎马国春战死后，军中无帅，军心大乱，纷纷瓦解。特别是掌握起义军兵权的大将大司衡杨荣叛变后，以武力威胁杜文秀出城投降，大理政权四面受敌。在形势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他义无反顾，拒不投降。为了避免被叛徒杨荣活捉送往清营，全家108人于1872年12月26日服毒自尽，以示宁死不屈。

(梁义群)

李文学

(Li Wenxue 1826—1874) 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彝民起义军首领。又名正学。云南弥渡县人。出身彝族佃农家庭，家境极度贫困，难以糊口，十一二岁时因欠“庄主”租谷，被迫卖身为奴。1855年（咸丰五年），云南大旱，“庄主”和官吏乘机勒索，催租催债，农民没有活路。李文学更加不幸，其父被猛兽咬伤而死，其母自杀未遂。在走投无路情况下，于5月，在哀牢山区天生营毅然率领农民起义，被推为首领，号称“彝家兵马大元帅”。随即带领乡亲向封建地主阶级展开斗争，惩办一些罪大恶极的“庄主”，没收其粮食和金银财宝。附近的汉、哈尼、白、傣、苗、回、傈僳等族农民纷纷起兵响应，起义队伍很快发展过万人。当1856年10月滇西杜文秀回民起义军被清军包围时，亲自率军前往援救。自此以后两支起义军结成联盟，多次互相支援，共同打击封建统治者。哀牢山农民起义军，先后控制十数州县，在3万平方公里面积、约5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农民政权，并在弥渡县蜜滴村建立“彝家兵马大元帅府”。任命田以正（哈尼族）为副元帅，其他各族起义军首领为正副参军、正副上将军。下设八个都督府，分管各地行政和军事。规定严格军纪，制定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及经济措施，废除雇佣兵制度，常备军都要从事生产劳动。没收近郊“庄主”田亩为军耕；庶民原种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免租薄赋，深得贫苦农民拥护。1870年（同治九年）后，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支持下，调集重兵镇压农民起义。因寡不敌众，加之自身的局限性，起义军处于不利地位，控制区日益缩小。1872年秋，率军北上援助杜文秀的回民起义军时，不幸战败被俘。1874年4月，壮烈牺牲于南涧县牛街。副参军李学东突围，领导余部继续战斗在哀牢山区。

（梁义群）

第二次鸦片战争

(Dierci yapian zhanzheng) 英、法等西方列强为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所获权益而挑起的侵华战争。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利益，急欲攫取更多的侵略特权。1854年(咸丰四年)英国以“利益均沾”为据，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12年后可以变通条款的内容，联合美、法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约的要求，包括中国开放全境，至少开放沿海城市及长江自由航行；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内地税；外国公使驻北京等。1856年美、英、法第二次提出“修约”要求，除包括第一次提出的要求外，还有改造中国司法机关、释放被捕的法国传教士等条件。清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英、法等国决定以武力达到目的。1856年10月23日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出动3艘军舰攻打广州，连陷猎德、凤凰山、海珠炮台。27日英军轰击广州城，29日攻破外城，并一度冲进内城，轰击、焚烧民房，劫掠总督署。由于广州军民奋力抵抗，英军兵力不足，于次年1月27日撤出广州，在珠江口要塞设防固守。英国首相巴麦尊极力主战，授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大臣组织侵华远征军，并怂恿法国出兵参战。法国遂以“马神甫事件”为由派出全权大臣葛罗统率的侵略军队。10月两军会集香港。11月英、法联军封锁了广州。12月中旬英、法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进行要挟。28日英、法联军全数登陆，攻广州。因叶疏于防守，次日广州失守。叶名琛被俘，后死于印度加尔各答。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在英、法监督下照旧供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人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1858年初英、法联军继续北上，4月到大沽口外。英、法与随行的美、俄两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谈判，又借口清政府委派的直隶总督谭廷襄无“便宜行事”之权，拒绝谈判。5月20日英、法联军突袭大沽炮台，陷之，溯白河而上，直逼天津，并扬言攻打北京。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津议和。俄、美代表以“调停人”斡旋，从中渔利，诱使清政府于6月13日、18日，分别签订了中俄、中美《天津条约》。26、27日，英、法代表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不仅实现了提出“修约”时的全部要求，而且还勒索大宗赔款。11月英、法、美三国在上海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是年5月沙俄抢先与清政府签订中俄《璦琿条约》，强行割去中国大片领土。1859年6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各率舰队至大沽口，拟入京换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英、法公使恃武力，坚持从大沽口溯河进北京，并要求限期撤除白河防御。25日英国舰队司令何伯率10余艘军舰攻击大沽炮台。炮台守军在直隶提督史荣椿指挥下奋勇应战，开炮反击。经过一昼夜战斗，击沉击毁敌舰10余艘，毙伤英军近500名，何伯负重伤。史荣椿战死。英、法军舰被迫撤走。美国公使华若翰在英、法军退走后按清政府指定路线入京，于8月在北塘与恒福互换了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则在4月先已互换。大沽事件后英国政府叫嚣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于1860年初与法国组成2.5万人的侵华联军，出动舰船200余艘，分别由额尔金、葛罗率领来华。4月联军占领舟山，5月攻占大连，6月占烟台，7月底到达大沽口外。清军统帅僧格林沁以重兵守大沽，未在北塘设防，企图诱敌深入，用骑兵歼之。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顺利登陆，12日进攻新河、军粮城。清蒙古骑兵与敌英勇搏杀，伤亡重大，节节败退，连失要塞。大沽炮台腹背受敌，守兵仍顽强

抵抗，终因孤军无援而失守，直隶提督乐善等阵亡。24日天津失陷。清军退至张家湾，通州一带。9月9日联军6000余人向北京进犯。清政府令僧格林沁率部防堵，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与英、法议和。载垣等全部接受了侵略者的要求，但拒绝外国公使向皇帝亲递国书。双方争执不下，谈判破裂。18日联军进攻张家湾清军阵地。清方则拘捕巴夏礼等39位英、法议和代表。清军先败于张家湾，又于21日和敌人激战于八里桥。因主帅僧格林沁等撤队反奔，动摇全军，八里桥失守。22日咸丰帝带后妃近臣出奔热河，留其弟恭亲王奕訢与联军议和。10月初联军进占圆明园，大肆抢掠，13日进入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奕訢在俄使伊格那提也夫的“斡旋”下与英、法代表和谈。和谈期间，英法联军于18、19两日放火焚烧闻名于世界的著名皇家园林圆明园，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和掩盖抢掠罪行。在侵略者的威逼下，奕訢被迫于24、25两日分别与额尔金、葛罗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天津条约》批准书同时交换。11月初，奕訢与英法代表换约，英法联军撤出北京。沙俄公使伊格那提也夫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机，借口“斡旋有功”，对清政府进行讹诈，于11月14日迫使奕訢在中俄《北京条约》上签字。该约共15款，主要内容有确认中俄《璦琿条约》，割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给俄国，确定中俄西部未定边界的划分原则，允许俄国在库仑、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设立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害。英国割占九龙司，沙俄掠去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完整。公使驻京加强了列强对清政府的影响。增开口岸、内地通商使外国势力扩大到中国内地和北方。这些都使外国侵略者取得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多的利益，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危机。西方列强通过这场战争达到目的之后，便对清政府采取扶植态度，帮助它镇压太平天国，形成了中外反动势力携手合作的新局面。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91-1.bmp}

（史革新）

亚罗号事件

(Yaluohao shijian) 围绕中国商船亚罗号进行的中英交涉，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亚罗号商船属华人苏亚成所有，船上水手均系中国人，曾于 1855 年 9 月在香港英国当局登记，有效期一年。雇英国人当船长。1856 年 10 月 8 日（咸丰六年九月十日），广州水师拘捕了该船的 12 名水手，其中两名是海盗，10 名有海盗嫌疑。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代理领事巴夏礼接到该船所雇英籍船长的报告，赶赴现场，捏称亚罗号为英国船，欲截留被扣人员，未逞。又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称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被中国兵勇侮辱，要求立即释放人犯，公开向英国道歉。叶名琛复函反驳，说明亚罗号系中国船，并无悬挂英国国旗，被扣人员中确有海盗，但仍同意放人。驻华公使包令伙同巴夏礼按英国政府“决不放过一件小事”的指令蓄意扩大事态。21 日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坚持所提无理要求，限叶名琛在 24 小时内答复。叶恐事态扩大，忙于 22 日将被捕人犯送至英领事馆。巴夏礼拒绝接受。23 日英国兵舰攻打广州炮台，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政府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向远东增派兵力，发动侵华战争。

（史革新）

西林教案

(Xilin jiaoan)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广西地方政府惩办法国不法传教士的案件。又称“马神甫事件”。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弛禁天主教，仍不准外国传教士入内地活动。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 (Au-guste Chapdelaine, 1814—1856)，1852年(咸丰二年)来华，先在广州传教。1853年他违反中法有关条约规定，非法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发展教徒，违法乱纪；包庇抢掳奸淫的不法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激起民愤。1856年知县张鸣凤将马赖及不法教徒20余人逮捕拘押。经审讯，罪犯对所控罪状供认不讳。2月29日处马赖及教徒2人死刑，其余各有惩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扩张教会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海外利益，以此事件为借口，接受英国请求，于次年派出远征军参加侵华战争。

(史革新)

英法联军

(Ying Fa Lianjun) 1857—1860 年间英法为侵略中国而组成的远征军。1857 年(咸丰七年)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法国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决定发动侵华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此组成英法联军。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和法国全权大臣葛罗分别率领本国军队先后于 7 月、10 月至香港。英国军队 4000 余人,军舰 26 艘。全军由步兵、炮兵、海军陆战队、辎重兵组成,多是从印度、新加坡、毛里求斯等地调来,有部分土著团队。军事指挥由西马糜各里负责。法军约 1300 人,13 艘军舰,由海军上将果戈·德热热依里指挥。战争期间两国不断扩充这支军队。到 1860 年英法联军已经拥有战舰和运输舰 200 余艘,英兵 1.8 万名,法兵 7000 名。联军舰船多蒙铁壳,以蒸汽动力为主。作战部队装备了新式的阿姆斯特丹炮和拿破仑炮,所用步枪性能精良。军队训练有素,有丰富的殖民战争经验,战斗力较强,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伤亡远比清军小。《北京条约》签订后联军宣告解散,大部分军队撤回,部分军队仍留在中国,驻在上海、香港等地。

(史革新)

火烧圆明园

(huoshao Yuanmingyuan)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在北京所犯的暴行。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汇萃中外美景奇观，收藏无数奇珍异宝，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它的修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150 余年，耗费亿万资财和大量人力。1860 年 10 月初（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6 日联军循城追击清军至圆明园。法国将军孟托邦率部率先闯入。次日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额尔金等进占。侵略者肆无忌惮地抢劫园中金银珠宝，秘笈古玩。联军官兵几乎每人都掠到数以万计、十万计，乃至百万计的财富。13 日留守北京城的清朝大臣交出安定门，英法联军控制了北京。奕訢代表清政府与英法议和。为压迫清政府作出更多的让步，掩盖焚掠圆明园的罪行，英法联军以报复清军虐杀俘虏为名，在 18 日、19 日出动数千军队，有计划地焚烧圆明园。园内殿宇楼阁陷入火海之中，大火连烧三天，烟云蔽日，笼罩北京。经此浩劫，这座闻名于世的皇家园林只剩下一片残瓦颓垣。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92-1.bmp}

(史革新)

慈禧太后

(Cixi taihou 1835—1908) 清代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掌权者。叶赫那拉氏，满洲镶蓝旗人(后改隶镶黄旗)。父惠征，官安徽宁池广太道。1852年6月(咸丰二年五月)被选入宫，册封为兰贵人。1854年封懿嫔。1856年生载淳，即日晋懿妃。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随咸丰帝出逃热河(今承德)行宫。曾代批阅奏章。1861年咸丰帝病逝，子载淳6岁即位，改元祺祥，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因住行宫烟波致爽殿西暖阁，故称西太后。时咸丰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位王公大臣为“顾命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幼皇执政，与慈禧太后及留在北京办理议和事宜的恭亲王奕訢等人发生矛盾。权力欲极强的慈禧暗中联络奕訢密谋策划，并于11月2日发动北京政变，逮捕辅政的八大臣，赐死载垣、端华，诛杀肃顺，其余人等革职或流放。同时宣布两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任命奕訢为议政王大臣。因东太后钮祜禄氏性懦弱，权操于慈禧之手。北京政变后实行对外妥协，保持和局的对外政策，重用地方实力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镇压了太平天国及全国各地人民起义。对外交涉依任妥协派，屡使中国利益受损。擅长政治权术，千方百计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实行个人专断独裁。因恭亲王奕訢声望渐高，恐成大患，在1865年、1873年两次借故给其处分，撤销其议政王大臣封号，使其威信大受损害。1875年同治帝病逝，无子，理应为之续嗣。为能继续独揽大权，不惜破坏旧制，立自己的5岁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仍以皇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在统治集团中搞势力平衡，扶植淮系，抑制湘系；扶植清流派，牵制洋务派；扶植张之洞，牵制李鸿章；扶植奕訢抑制奕訢。大大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勾心斗角，使清王朝政治更加腐败。1887年光绪帝成年，本应亲政。她不履行归政诺言，暗中策动奕訢等奏请继续执政，又“训政”三年之久。1889年为光绪帝举行“亲政”大典，表示“撤帘归政”，退居颐养，实则仍掌握实权。在朝内外培植、提拔大批心腹亲信，派充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机构，形成所谓“后党”。她穷奢极欲，搜刮民脂民膏，不惜损害国防建设，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以供享乐。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和李鸿章一味避战主和，致使中国战败，被迫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端仇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支持怂恿封建守旧势力破坏光绪帝推行的“戊戌变法”，并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重新训政，幽囚光绪帝，捕杀维新志士。戊戌政变后依任载漪、刚毅、徐桐等反对改革的大臣，中央政权完全被守旧派中强硬分子所把持。1900年为废光绪帝，与荣禄谋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即皇太子)，受到国内外舆论谴责。义和团运动时，刚愎自用，错乱处置，先利用义和团对英法俄美德日意奥八国同时宣战，诛杀阻谏大臣，泄一己私愤。当义和团攻打使馆，与侵略军战斗时，又暗中接济被围攻的外国人。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挟光绪帝逃往西安，遂下令血腥屠杀义和团，向侵略者乞降。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派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与八国议和，接受苛刻条件，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重新颁发曾被她一手废除的“变法”政令。1905年立宪运动兴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次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名为立宪，实则继续加强帝制专政。又下令加强训练新军，扩充警力，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起义和人民的反

抗斗争。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使国势日益贫弱，陷人民于深重的灾难之中。

（史革新）

奕訢

(Yixin 1832—1898) 晚清重臣，洋务派领袖。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咸丰帝登基时封为恭亲王。1853年太平军北伐逼畿南，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年授都统、宗令等职。1855年母逝，为母争皇太后封号，忤咸丰帝，被罢军机大臣等职。1857年复都统职，1859年授内大臣。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咸丰帝出奔热河，受命为议和全权大臣，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渐悉洋情，形成洋务思想。1861年奏请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保持“和睦”关系，全力对付“发捻”，变通清朝的外交、通商、教育制度以适应形势需要。在他主持下，总理衙门、同文馆相继成立。同年咸丰帝病逝，与两太后发动北京政变，将顾命大臣辅政改为两太后垂帘听政及议政王辅政，被命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享王爵世袭、亲王双俸等殊荣。对外主张“和戎”，以妥协保“和局”，换取外国支持，镇压太平天国。在购买外国船炮，训练新式海陆军，兴办近代军用、民用企业，推广西学，培养科技和外语人才，派出驻外公使及留学生等问题上持开明态度。1867年(同治六年)以倭仁等反对学习天文算学，反复与之论辩，力排众议，谤论遂息。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实力派相呼应，促成清末“同光中兴”。因声望日高而受慈禧猜忌。1865年以“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罢议政王等一切职位。经廷臣求情，复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职，但撤消议政王封号。1873年又以“召对失仪”降郡王，旋复亲王爵。经两次挫折，锐气减刹。中法战争期间不轻言战，受言官弹劾。1884年4月(光绪十年三月)慈禧以“因循贻误”的罪名，罢免其一切职务，令家居养疾。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重被起用。9月授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及内廷行走。又命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12月授军机大臣。虽膺重任，但暮年气衰，无大作为，反对维新派的改革主张。“百日维新”前病逝。

(史革新)

辛酉政变

(Xinyou zhengbian) 慈禧等人于 1861 年 (咸丰十一年, 农历辛酉年) 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 又称祺祥政变。咸丰帝生前, 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受宠用权, 与恭亲王奕訢及部分廷臣产生矛盾。1861 年 8 月 22 日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咸丰帝病逝于热河 (今承德) 行宫, 遗命载垣、端华、肃顺和御前大臣景寿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 杜瀚、焦祐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太子载淳为帝, 总摄朝政。改年号为“祺祥”。权欲极强的慈禧太后 (载淳生母) 鼓动东宫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夺权力, 暗中联络在京的奕訢为援。9 月 14 日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 并派近支亲王辅政。八大臣以清朝无此先例, 令军机处拟旨斥驳。慈禧串通慈安拒绝盖印, 将折旨留中不发。八大臣以“搁车”示威, 迫使两宫太后让步, 颁发驳斥董折谕旨。事后八大臣以小胜而疏于防范, 其对手则加紧暗中策划。在取得外国势力支持后, 奕訢不顾八大臣梗阻, 于 9 月中旬奔丧热河, 与两宫密谋政变之策, 召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密拟拿问各旨, 旋即返京布置。奕訢争取到朝中大学士贾祜、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的支持, 握有兵权的僧格林沁、胜保等人也表示效忠于两宫太后。在两宫太后催促下, 八大臣同意回銮北京。10 月 26 日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启程回京, 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后行。11 月 1 日两宫太后抵京, 即召见奕訢等王大臣, 安排政变事宜。次日, 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 罢景寿等军机大臣职。3 日命奕訢为议政王, 入军机处, 并以桂良等五人为军机大臣。7 日改年号“祺祥”为“同治”。8 日诏赐载垣、端华自尽, 肃顺处斩, 景寿、匡源、杜瀚、焦祐瀛褫职, 穆荫遣戍军台。从此, 慈禧以垂帘听政掌握清朝大权达 40 余年。她推行的对外“和好”, 重用洋务集团和汉族军阀官僚的统治政策, 影响了晚清政局。

(史革新)

中俄璦琿条约

(Zhong e aihui tiaoyue)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初,沙俄乘英法联军北犯天津之际,在中国东北边境陆续集结大量军队。5月22日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军舰直抵璦琿,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界务。谈判中穆提出扩张领土要求,遭奕山拒绝。俄舰开枪放炮,以武力威胁。28日在俄方胁迫下,奕山被迫签约。内容共3条: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给俄国,仅江东精奇里江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的小片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准原居之中国人居住,归中国政府管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划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舶航行,两国人可在这两条江及松花江一带贸易。清政府没有批准《璦琿条约》,当即处分了奕山,直到1860年订立中俄《北京条约》时方承认。该约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为沙俄向太平洋扩张、进一步侵略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史革新)

中英天津条约

(Zhong ying tianjin tiaoyue)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北上抵大沽口，纠合俄、美公使照会清政府谈判，并于 1858 年 5 月 20 日（咸丰八年四月八日）攻陷大沽炮台，逼天津，扬言攻打北京。清政府派出代表赴津议和，遂与英、法、俄、美分别签约。6 月 26 日清朝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天津海光寺签订该约。共 56 款，另附《专条》。内容为：

英国公使驻北京； 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潮州、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后来开埠时，牛庄口岸设在营口，登州口岸设在烟台，潮州口岸设在汕头），并在各口岸设领事馆； 允许基督教、天主教教士自由传教； 英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可在各通商口岸租地盖房，设立教堂、医院、仓库等设施； 英国商船可在长江一带通商各口往来； 修改关税税则； 中国赔款银 400 万两； 详密规定领事裁判权。11 月 8 日桂良、花沙纳与额尔金在上海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条款。主要规定：海关聘用英国人办理税务，进出口货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输内地或英商从内地购土货出口，只纳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不再纳厘金；准许鸦片进口贸易。次年换约，因发生大沽口战斗未成。到 1860 年 10 月订立中英《北京条约》时这些条款得到确认。

（史革新）

中英北京条约

(Zhong ying beijin tiaoyue)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60年9月(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逃奔热河,留下其弟恭亲王奕訢接洽议和事宜。10月英法联军入北京,大肆焚掠,恫吓清廷,强迫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签约。10月24日清钦差大臣奕訢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北京正阳门内礼部签订此约。共计9款。主要内容:确定《天津条约》仍属有效;赔款银增至800万两;开天津为商埠,居住天津的英国人享受其他开放口岸同等待遇;英国割占广东九龙司地方一区,并归英属香港界内;英国可以招募华工出国。11月初,奕訢与英、法公使先后换约。以中英《北京条约》为代表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西方列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获得的侵略利益,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史革新)

海关税务司

(haiguan shuiwusi) 晚清管理海关税务的官职。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曾在江、浙、闽、粤等省设海关监管税务。五口通商后始设洋税关。1853年(咸丰三年)英、美、法三国乘小刀会起义之机夺取上海海关行政权。次年,江海关成立。清政府虽派税务司管理,但实权由三国代表组成的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操纵。1858年改税务司为正、副各一人,由英美人担任。后相继成立了粤海关、潮海关、浙海关、津海关、厦门关、江汉关等。1859年南洋通商大臣任命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驻上海。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统辖总税务司。1865年(咸丰四年)总税务司迁北京。不久,李泰国离职回国,英人赫德继任。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生于北爱尔兰,1854年来华,历任英领事馆翻译、广州关副税务司。继任后,他改组海关机构,发展业务,制定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至1908年回国止,掌握中国海关40余年,曾屡次插手中国内政。总税务司掌各海关征收税课事宜,综理全国关税行政与人事变更。正、副总税务司下设税务司4人,副税务司6人,组织机构分总务、机要、统计、汉文、铨叙五科。另设内债基金处、造册处、驻外办事处。所属海关各设税务司一人,副税务司1至2人。正副均为洋员;下有帮办,人数不等,各关组织分总务、秘书、会计、监察、查验五科。1906年清政府设税务处,节制总税务司及各海关司。自同治朝后,洋税成为清政府仅次于地赋的财政收入。1879年洋税1200万两,1891年达到1800万两。海关税务司的地位也日益加重。

(史革新)

洋务运动

(Yangwu yundong) 19 世纪 60—90 年代清政府在“自强”、“求富”口号下推行的以举办近代军用及民用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涉及外交、军事、经济、文教等领域。旧称“同光新政”。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曾向外国购买新式武器，改进军队的装备。1861 年（咸丰十年）初恭亲王奕訢奏请联络外国，对付“发捻”，并提出变通外交、通商、教育的一些旧制，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遂被采纳。同年清政府设总理衙门，以奕訢主持，综理洋务事宜，设南北洋通商大臣，办理地方交涉事务。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起家的地方实力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是推动洋务运动的重要力量。他们先购买洋枪洋炮，60 年代后转向办厂制造，打出“自强”旗号。1861 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试制枪弹。1862 年（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设三所洋炮局。次年将其中一所迁至苏州。太平天国失败后，军用企业的创办进入高潮。1865 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生产枪炮弹药并修造轮船，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同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成金陵制造局。1866 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建成福州船政局。1867 年经奕訢奏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成立天津机器局。70 年代后左宗棠在兰州、岑毓英在昆明、瑞麟在广州、丁宝楨在济南和成都、吴大澂在吉林、张之洞在汉阳、刘秉璋在杭州、刘铭传在台北，都建立了类似企业。到 1893 年（光绪十九年）为止，全国已有大小 19 个近代军用企业。企业采取官办形式，资金由清政府拨给，产品统一调拨，内部机构一仍官办工场旧制。军用企业的庞大耗费使清政府财政拮据。从 70 年代起洋务官僚提出“求富”主张，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他们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建立起一批近代航运、采矿、通讯、纺织、冶炼等企业，实行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并举的方针。1872 年李鸿章首先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1876 年沈葆楨开办基隆煤矿。1877 年李鸿章派唐廷枢成立开平煤矿。1878 年在上海筹设机器织布局，1880 年在天津创办电报总局，次年修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1888 年黑龙江将军恭镛成立漠河矿务局，开发金矿。1890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建立铁厂。至 90 年代这类企业办了 20 多个。企业资金由政府垫支与招集商股构成。除少数几个外，大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用人、行政、经营大权掌握在官方手中。产品部分由政府调拨，其余可在市场销售，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训练新式海陆军也是洋务运动内容之一。清政府在 1862 年成立天津洋枪队，陆续推广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1874 年清廷筹议海防，次年（光绪元年）命李鸿章等督办南北洋海防，训练新式海军，后陆续建成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北洋水师实力最强，舰只绝大部分购自外国，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统辖。南洋水师部分舰只是中国自造，也配备了一些购自德国的战舰，由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统辖。福建水师由闽浙总督管辖，规模较小，多数舰只由闽局制成。1885 年 10 月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衙门事务大臣，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大臣，购买了一批外国军舰。1887 年以后海军经费被慈禧挪用，海防建设遂停止。1875 年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兼驻法国，是为中国派出驻外公使之始。同年任命陈兰彬、容闳分别为驻美正、副使。次年派何如璋出使日本。1878 年派崇厚出使俄国。同年命刘锡鸿出使德国。至 1894 年清政府先后向 12 个国家派出使节。继 1862 年北京同文

馆举办后，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广方言馆。次年两广总督毛鸿宾设立广州同文馆，以培养翻译人才。此外清政府还创办了一批培养军事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学堂，主要有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船政局附设的马尾船政学堂，1867年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附设的上海机器学堂，以及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上海电报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南京水师学堂、湖北矿业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这些学堂开设了外语、自然科学及某些专业技术课程，聘请部分外籍教师授课，在教学内容、方法及学堂制度等方面与传统的封建学塾有很大不同，成为近代教育的开端。1872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120名幼童赴美留学，但于1881年以“沾染外洋习气”为由全部撤回。1876年南洋大臣沈葆楨从马尾船政学堂学员中选派30名学生，分赴法国和英国学习造船和驾驶，开近代中国留学之先声。洋务派也重视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有专门的翻译机构，主要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北京同文馆译书处，聘请中外学者合译西书，译介了大量西方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自然科学及兵学、矿业、医学、通讯、驾驶、冶炼等专业技术书籍。李善兰、徐寿、华衡芳及外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等人为此做出了积极贡献。洋务运动使中国出现了自己最早的一批近代军用及民用企业，建成了第一支近代海军，创办了最早一批新式学堂并派出留学生，大规模引进西方经济技术和科技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守旧的社会风气，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准备了技术和人才条件。然而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主持者本身兼有封建官僚身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只把改革局限在经济、军事等领域内，拒绝对封建政体做相应变革，致使封建政体及其意识形态束缚、压抑了资本主义因素，引进的先进技术因受腐朽制度及习气的侵染而未起应有的作用。洋务运动本身所包含的这些矛盾和缺陷窒息了改革的活力，虽然耗费了大量资财和时间，并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史革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Zongli geguo shiwu yamen) 清政府办理洋务的中央机构，亦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恭亲王奕訢鉴于外事纷繁而中国无一机构“专一其事”，奏请设立。清政府于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批准正式成立。该衙门仿军机处体制，设大臣、章京两级。大臣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院堂官中选派，首席大臣则由亲王一人担任。最初大臣有3名，即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后渐有增加，多时达到12人。章京亦称司员，是总署大臣的助手，分担具体工作，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署官员中挑选。初建时满汉各8人，多时达到40多人。章京分为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和额外章京四类。内部机构有英、法、俄、美、海防五股，掌管各国外交、派出使臣、通商、关税、筹办海防、长江水师、北洋海军、购制船炮及制造、矿务、电线、铁路、学堂等事。另有司务厅、清档房，掌办往来文件及署内行政事务。下属机构有京师同文馆和海关总税务司。总揽国家的外交及涉外的财政、军事、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大权。与各省督抚无隶属关系，也无权指挥南、北洋通商大臣。它对他们仅备顾问和代转达而已。庚子事件后，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清廷于1901年7月24日（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九日）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总理衙门先后有过两位首席大臣：奕訢和庆亲王奕訢。奕訢任职凡28年（1861—1884，1894—1898）；奕劻任职凡12年（1884—1894，1898—1901）。

（史革新）

同文馆

(Tongwenguan) 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清政府于 1862 年(同治元年)首先在北京创办。体制仿原俄罗斯文馆例,目的是培养办洋务的人才。最初分设英、法、俄、德四馆,只设外语课,后增开天文、算学、化学、格致、医学各馆。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又增开东文(日文)馆。各馆学制初定 3 年,后改为 8 年、5 年两种。学生来源开始只收 14 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后扩大范围,允许 15 岁上下的闲散人员及各衙门保送的官员、有功名的未仕人员报考。该馆隶属于总理衙门,管理大臣从总理衙门大臣中特简,下设提调、帮提调若干人作为主管人员。教学工作由总教习、教习负责。除汉文外,其他课程的教习多数是外国人。自 1869 年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掌管教务近 30 年。附设机构有印书处、实验室、博物馆和天文台。1902 年并入京师大学堂。除了京师同文馆外,清政府还在 1863 年、1864 年分别于上海和广州开办了类似的学馆。

(史革新)

江南制造总局

(Jiangnan zhizao zongju) 清政府在近代创办的最早新式军用企业之一。全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亦称“上海机器局”。1865年(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派丁日昌购买上海虹口的英商旗记铁厂，归并了原设在上海、苏州的几个洋炮局建成总局。设总办(丁日昌是第一任)、会办、提调、委员充当管理人员，聘洋匠担任技术工作。1867年从虹口迁至高昌庙，陆续建成机器、铸造、枪炮、弹药、水雷、轮船、炼钢等分厂及船坞码头，附设翻译馆、工艺学堂、操炮学堂。制造枪炮、弹药、火药、水雷、机器及修造轮船。产品直接调拨清政府有关军事部门。创办经费约54万两，常经费70万两左右，以江海关二成洋税和淮军一成军费充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将轮船厂、锅炉厂、船坞等划出，成立了江南船坞，1912年(民国二年)改称“江南造船所”。兵工部分仍称制造局，1917年改称“上海兵工厂”。民国以后，兵工厂及造船所被买办官僚所把持。1932年淞沪抗战后，兵工厂停办，机器设备拆迁后毁于战火。1937年造船所随上海的沦陷而被日军占领，遭到掠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利用接收的造船所修造军舰，服务于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全国解放后造船所改称“江南造船厂”。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96-1.bmp}

(史革新)

福州船政局

(Fuzhou chuanzhengju) 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议创设,厂址在福州马尾罗星塔。聘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分任正、副监督,负责经办,使用法国技术设备。创办经费47万两,由闽海关四成结款内支拨,常经费60万两,出自闽海关洋税及闽省茶税。到1868年机器厂、铸铁厂,钟表厂、木模厂、转锯厂、水缸厂陆续建成,雇用工人1000~2000人。1869年6月制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至1874年造成轮船15艘,均为木质旧式船。1884年8月(光绪十年七月)遭法海军炮火轰击,损失严重。战后经修复,继续制造兵轮快船。1887年所造铁甲舰“平远号”下水,表明制造水平有所提高。附设船政学堂,内分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培养造船人才,后学堂培养驾驶人才。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海军造船所”。

(史革新)

北洋舰队

(Beiyang jiandui) 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一支新式海军舰队。1874年(同治十三年)清政府筹议海防,总理衙门奏请设北洋水师。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上折,建议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被采纳。遂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并从关税、厘金项下每年拨款400万两作为经费。从1875年(光绪元年)起,清政府从英、德等国购进各式军舰多艘。1876年起陆续派遣学生赴英、法各国学习海军。1879年李鸿章于天津设水师营务处,办理日常事务。1880年设天津水师学堂,不久先后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筑炮台,建设军港。1881年奏请任命淮系将领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中法战争期间北洋海军未参战。战后海军衙门成立,李鸿章以会办掌实权,提出整饬海军,增购外国舰船。两三年中,“定远”、“镇远”、“致远”、“靖远”、“济远”等舰陆续编入舰队,实力大增。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建成,共有军舰25艘,内含2艘铁甲舰,7艘巡洋舰。除5艘小舰系福州船政局制造外,其余均购自英、德诸国。官兵4000余人。丁汝昌被命为提督。聘英国、德国人指导军事训练。颁发《北洋海军章程》,确定船舰等级、人员编制、俸饷杂支及员弁升擢等制度,并规定3年举行一次会操。舰队成立后,海军经费被慈禧太后挪用修筑颐和园。除从福州船政局调来“平远”兵轮外,再未添任何舰只。舰队建设处于停滞状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参加对日作战,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而遭全军覆灭。战后清政府从南洋水师、福建水师调来部分舰只驻防北洋,又设北洋统领及帮统官,管理海军事宜,仍难复旧规。1905年以萨镇冰总理南北洋海军。1909年以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设立海军事务处,把南、北洋各舰统一编为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取消了南、北洋舰队的名义。

(史革新)

南洋大臣

(Nanyang dachen) 亦称“南洋通商大臣”、“上海通商大臣”、“上海钦差大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设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1858年（咸丰八年）改为两江总督兼职。《北京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增多。1861年初清政府设置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仍沿用“五口通商大臣”名义，由江苏巡抚兼任，掌管除北方三口之外的沿江沿海各口。1865年（同治四年）任通商大臣的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此职改为两江总督的兼职。直到1873年后两江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成定制，并简称为“南洋大臣”。除办理所属口岸的交涉、通商事务外，还兼督办海防、训练南洋海陆军和举办工矿交通等洋务。与总理衙门关系和北洋大臣相同，在地方督抚中权势仅次于北洋大臣。自曾国藩1866年回任两江总督后，湘系集团的沈葆楨、曾国荃、左宗棠、刘坤一等先后兼任南洋大臣一职共达40年之久。

（史革新）

北洋大臣

(Beiyang dachen) 亦称“办理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北洋通商大臣”。1861年初(咸丰十年底)，清政府鉴于北方已有通商口岸，对外交涉日繁，遂设立三口通商大臣专职，办理北方新辟的牛庄、天津、登州三口对外交涉事宜。1870年(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后，授三口通商大臣“钦差”名义，改称“北洋通商大臣”，并由直隶总督兼任，职责范围相应扩大。除办理北方地区的外交、通商外，还负责训练北洋海陆军，及兴办轮船、电报、煤矿、铁路、纺织等洋务企业。北洋大臣虽列于总理衙门名下，但与之并无直接隶属关系。如有上报事项，总理衙门仅起承转作用。担任过北洋大臣的主要有崇厚、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等。李鸿章在位最久，先后达20余年，分掌了一部分办外交、办洋务的权力，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断提高，其影响远在南洋大臣之上。

(史革新)

轮船招商局

(Lunchuan zhaoshangju) 晚清中国创办的最早的近代航运企业。19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军事企业的资金，与外国企业“分利”，清政府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经营近代民用企业。1872年(同治十一年)夏李鸿章令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朱其昂拟章集股，11月成立于上海。规定官方掌握企业大权，“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主要资本来自商股，也有部分官款。第一期资本100万两至1881年(光绪七年)集齐。局设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职。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及国外的神户、横滨、新加坡等地设分局。成立时仅有3只轮船，后规模渐大。1877年购美旗昌公司18艘船只，轮船总数达30艘。除转运漕粮外，还延揽各种客货运输业务。初建时，朱其昂任总办。1873年李鸿章委派买办出身的唐廷枢接任，改组全局，重订《局规》及《章程》。中法战争期间暂时售于旗昌洋行，以避战祸。1885年收回后改成官督商办，盛宣怀任督办。因受外商倾轧，日本、新加坡、旧金山等海外航线先后停顿。在官方控制和官场腐败习气影响下，内部管理不善，官商矛盾尖锐。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期间，援照中法战争时寄售旧例，将船售于外商，事后收回。1909年归邮传部管辖，改成商办。辛亥革命后，因受外轮排斥，地方不靖，亏损严重。1927年(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派员整顿，设招商局监督办公处，隶属交通部。后收归国营。抗战期间疏散到香港、南京、武汉等地。1943年设总局于重庆。抗战后复原，规模有较大发展。

(史革新)

官督商办

(guandu shangban) 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招募私人资本创设近代民用企业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洋务官僚在 19 世纪 70—90 年代兴办的 20 多个民用企业中绝大多数采用这种方式。19 世纪 70 年代清政府为解决军用企业的资金，开始举办民用企业。其时社会风气日渐开化，部分握有资金的地主、官僚、商人产生了投资于近代企业的积极性。创办时由政府指派专人（常由商人、买办或退职官僚充当）出面招募商股，有时政府预先垫款，以作资本。企业用人、行政、经营等权由官方掌握，商民不得过问。盈利双方分享，亏损则“全归商认”。组织机构类似衙门，设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等职。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都行此制。企业产品除一部分直接由清政府调拨外，相当部分拿到市场销售，以盈利为目的。如开平煤矿生产的煤炭在满足了天津机器局的需要之外，可以运到天津、唐山等地出售。电报总局除了为朝廷的军务、政务服务外，还开展民用业务，资本主义性质比较明显。因受官方控制和官场腐败习气侵蚀，内部管理不善，官商矛盾尖锐对立，弊端丛生，多数企业屡屡亏欠，难以为继。有的甚至成为官僚中饱私囊的渊藪，商民视为畏途。90 年代后这种形式逐渐被官商合办、商办所取代。

(史革新)

继昌隆缫丝厂

(Jichanglong saosichang) 中国较早的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是华侨商人陈启源于 1872 年(同治十一年)在南海简村创办的。它部分使用机器,共有 300 个釜位,雇佣女工 300 人,不久扩充至 800 个釜位,雇佣女工 800 人。出丝精美,行销国外,获利甚丰。从此,南海、顺德两县陆续增设了一些缫丝厂。但被当地人视为异端。1881 年(光绪七年)南海县 11 家缫丝厂全部被丝织业行会工人捣毁,封建官府乘机将其关闭。于是陈启源将厂迁至澳门,改称复和隆丝厂。3 年后得清政府许可,又迁回简村。该厂对广东缫丝业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房德邻)

曾纪泽

(Zeng Jize 1839—1890) 晚清外交家。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早年受其父影响，勤学好问，考求西学、洋务，自修外语。1870年(同治九年)以荫生补户部员外郎。1877年(光绪三年)父忧服除，袭一等毅勇侯爵。次年派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少卿。1880年使俄大臣崇厚擅与沙俄订立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被革职问罪。曾纪泽被委兼任使俄大臣，赴俄改订条约。他以“待凭口舌巩河山”的爱国精神，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外交部高级顾问热梅尼、驻华公使布策等据理力争，反复论辩。经半年多交涉，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当时称为《改订条约》，亦称《圣彼得堡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中国收回了伊犁地区。1881年迁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鉴于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他认真研究局势，多次向国内发出警告，通过外交途径揭露法国侵略野心，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中法战争爆发后，坚决主战，反对与法国议和，向朝廷疏陈抗敌策略，并不屈不挠地与法人抗争。1884年因与朝中主和派意见相左而被免去出使法国大臣的兼职。同年与英国订洋药税厘并征条约，岁增税银600余万元，晋兵部右侍郎。1885年被召回京供职，帮办海军事务，授兵部左侍郎，命在总理衙门行走。晚岁颇不得意。在出使期间注意考察西方国家政情风俗，有闻必录，写成《使西日记》。1887年英国报纸发表了他的《中国先睡后醒论》，表达了他在洋务改革问题上的看法。遗著集成《曾纪泽遗集》。

(史革新)

中俄伊犁条约

(Zhong E Yili Tiaoyue) 亦称《中俄改订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1871年5月(同治十年四月),沙俄借阿古柏侵略中国新疆而出现的边疆危机,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地区,并由此向周边渗透。清政府击败阿古柏后,于1878年(光绪四年)派出使俄国大臣崇厚赴俄交涉归还伊犁。次年10月2日,崇厚在沙俄胁迫下,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擅与沙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主要内容有:伊犁归还中国,但伊犁南之特克斯河流域及斋桑湖以东的土地割给俄国;允许沙俄在蒙古及新疆免税贸易,增辟两条到津、汉的陆路商路;允许沙俄在嘉峪关等七地设领事馆;中国赔偿兵费500万卢布。在国内外反对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问罪,改派出使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公使,赴俄谈判改约。经半年多交涉,曾纪泽于1881年2月24日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圣彼得堡(今列宁格勒)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争回中国的一部分主权。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收回伊犁,部分取消原约的割地规定;只许俄国在嘉峪关、吐鲁番设领事馆;俄商在蒙古等地贸易改免税为“暂不纳税”。但仍划失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及斋桑湖以东的地区。通过此约及以后的勘界议定,把中国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俄国。“兵费”赔偿数目从原来的500万卢布增为900万卢布。从本质上说该约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史革新)

马嘉里事件

(Majiali shijian) 英国向中国西南渗透而制造的边境事件。英国侵占缅甸后企图开辟从缅甸经云南达中国内地的通道。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国缅印殖民当局组成以柏郎(Horace A. Browne)上校为首有200多名军人参加的探路队拟入云南勘探,并要求英驻华公使派一名译员赴滇接应。威妥玛即择马嘉里膺任。马嘉里(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1846—1875),生于印度,父为驻印英国军官。1867年(同治六年)来华,历任驻台湾、烟台等地领事官。1874年调上海领事馆。马嘉里由沪启程,经汉口、湖南、贵州、云南,于1875年1月17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到缅甸八莫,与15日已到的探路队相会。2月初马嘉里带探路队离八莫向中国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探路队抵达云南境内腾越西南的蛮允(今腾冲曼允),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因洋人施放手枪”杀伤中国民众,遭到当地民众的阻截与还击,马嘉里被当场击毙。柏郎被迫率探路队退回八莫。这一事件成为英国政府向中国索取侵略权益的借口,最后迫使清政府同意签订《烟台条约》才获解决。

(史革新)

中英烟台条约

(Zhongying yantai Tiaoyue) 中英为解决所谓马嘉里事件签订的条约。1875年2月(光绪元年正月)英驻华使馆译员马嘉里在接应从缅甸开来的英国武装探路队时,在云南边境被当地人打死。事件发生后,英国以此为借口,乘机要挟清政府。1875年3月英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内容广泛的苛刻要求。在一年半的交涉中,威妥玛动辄以撤使、断交、出兵开战相威胁,以压服清政府。清方代表李鸿章恐和局破裂,一再退让。双方在1876年9月13日于山东烟台签订了该约。条约共分“昭雪滇案”、“优待往来”、“通商事务”三部分,计16款,附有《另议专条》。主要内容:昭雪“滇案”,赔偿“恤款”20万两,派大臣赴英“道歉”,在各地张贴有关“滇案”处理的文告;允许英人开辟印藏交通,去西藏、云南、甘肃、青海等省“游历”;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口岸;以后凡遇内地各省地方或通商口岸发生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等案件,英国可派员“观审”;免收各口岸租界内洋货厘金;长江沿岸的安庆、湖口、沙市等处准许停泊外轮,并上、下客货。条约签订后第4天清政府予以批准。英国方面则因有关鸦片税厘和厘金的条款未满足某些集团的要求而受到反对,迟迟未予批准。到1885年7月18日中英在伦敦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鸦片入口每箱(百斤)缴纳税厘110两后,由华商持凭单运销,中途不再征税。《续增专条》签字后不久,英国政府连同《烟台条约》同时批准。1886年5月6日,双方在伦敦交换了批准书。《烟台条约》扩大了英国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取得的权益,使英国势力不仅伸展到长江流域,而且深入到中国西部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史革新)

中法战争

(Zhong fa zhanzheng) 1883—1885年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19世纪70年代，已经占据越南南部的法国开始向越南北部扩张，并觊觎中国西南边疆。1873年（同治十二年），法军进犯河内，应越南政府邀请，驻扎在中越边境的黑旗军在刘永福的统率下援越抗法，在河内城外大败法军，击毙敌军头目安邨，收复河内。1882年（光绪八年），奉行殖民扩张的法国茹费理内阁增兵越南，再犯河内。黑旗军与越南军民联合拒敌。次年5月在河内城西纸桥双方展开激战，法军战败，其统兵官李维业被击毙。8月，法海军中将孤拔率舰队攻陷都城顺化，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清政府在法国侵越问题上意见不一。李鸿章主张妥协退让，以保和局；左宗棠、张之洞、曾纪泽等坚决主战。慈禧逡巡二者之间，但主要倾向于妥协。在主战派影响下，清政府加强两广驻军的力量，并颁谕奖励刘永福。12月孤拔指挥6000法军进攻山西中国军队阵地，挑起了中法战争。云南巡抚唐炯率领滇军未战先逃，黑旗军血战5日，势单难支撤退，山西失陷。至次年4月，法军连占北宁、太原、兴化等地，控制了红河三角洲地区。为了推卸战败责任，慈禧罢退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全部军机大臣，组成以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大臣的军机处新班子。法国利用军事胜利对清政府议和。1884年5月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谈判，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并从越南北圻撤兵；法国可经越南至中国贸易等。6月，法军以接收清军阵地为名，挑起北黎冲突，被中国守军击退。法国以此为借口，扩充远东舰队，准备战争，并要中国立即从北越撤军，向法国赔款。7月孤拔率法国舰队开进闽江口，要求在马尾港停泊。船政大臣何如璋、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恐拒绝生衅，予以接受，使法舰入港，将福建水师置于危险境地。8月5日，法海军少将利士比率舰队攻击基隆炮台，并强行登陆，遭守军回击，未逞。16日，法议会增拨军费，决定扩大侵华战争。19日，法驻北京公使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在清政府答复前下旗离开北京，以示决裂。23日孤拔向何如璋、张佩纶发出战书，攻击未作迎战准备的福建水师。中国水师官兵在极不利的情况下奋起还击。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福建水师11艘兵舰全被击毁击沉，官兵伤亡700余人。26日清政府发布对法宣战令，命滇桂清军整戍进兵，沿海加紧备战。9月孤拔率舰队主力再犯台湾，强占基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退守淡水，多次击溃来犯之敌。10月23日孤拔宣布对台湾实行封锁，并怂恿日本出兵侵华。1885年初法海军窜犯浙江。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宁绍道台薛福成添筑炮台，敷设水雷，严密布防。3月法舰两次进攻招宝山，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孤拔负伤，被迫率舰队退据澎湖，6月伤重而死。在陆路战场，清军最初处于不利境地。1885年2月法军在主帅尼格里指挥下向守卫在谅山的潘鼎新部大举进攻。清军战败，谅山失守。法军尾追北犯，一度攻占镇南关（今友谊关），战局告急。清政府起用老将冯子材为前敌主帅。他整顿溃军，激励将士，率军扼守镇南关外的关前隘，并在隘前筑起一道约3里长的长墙，在东西岭修炮台，派兵坚守。3月23日法军分三路来犯，以主力攻东岭炮台。冯指挥部下在长墙拒敌，派兵增援东岭，命王孝祺部抄袭敌人后路。24日法军攻势愈猛，从被毁处爬上长墙。冯子材手执长矛，率二子相华、相荣杀入敌阵。全军士气大振，奋勇争先，拼死搏杀，挫败法军进攻势头，将敌压下长

墙。王孝祺、王德榜军经过激烈战斗，夺回东岭失守炮台。当地中国各族民众及 1000 多名越南义军前来助战，对法军形成包围之势。25 日冯子材下令总攻，各路一齐出击，奋勇杀敌。法军全线溃退，主帅尼格里负重伤。清军一直追击 10 余里，歼敌 1000 余人，取得镇南关大捷。冯子材军乘胜进军，攻克文渊、谅山、谷松、威坡等地，并出击郎甲、北宁，重创敌军。同时，黑旗军、滇军在临洮击败法军，连克 10 数州县。法军败局已定。镇南关战役在法国引起震动，30 日巴黎人民上街游行示威，茹费理内阁当天倒台。然而清政府却在英、美、俄等国的“调停”下与法国谋求和谈。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联络，清政府在 1885 年 2 月授权英人金登干代表中国在伦敦与法国议和。4 月 4 日授权金登干与法国签订《巴黎停战协定》，规定两国停战，《简明条约》有效，中国从越南撤军，法国解除对台湾封锁。4 月 7 日清政府下停战令，命前线军队于 15 日停火，25 日撤回。前线军民闻讯无不义愤填膺，痛哭太息。冯子材致电两广总督张之洞“请上折诛议和之人”。清政府不顾舆论反对，派李鸿章同法国代表巴德诺在天津举行谈判，并于 6 月 9 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法国通过此约迫使清政府承认其对越南的侵占、取得在中国广西、云南通商、修铁路的权利，实现了打开中国西南大门的侵略目标。

（史革新）

刘永福

(Liu Yongfu 1837—1917) 晚清农民起义军领袖、抗法民族英雄。又名义，字渊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少随父流落到广西上思，当过佣工。曾向父辈学习武艺。1851年(咸丰元年)参加天地会起义，转战于广西归顺一带。1864年(同治三年)率200余人在广西安德同吴亚忠的义军合作，以七星黑旗为军旗，号黑旗军。次年赴越南。1867年驻越南六安州，建“中和团黑旗军”。1870年率部开至中越边境的保胜(今老街)。1873年法军侵占河内，受越南政府邀请率军赴抗法前线。12月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军指挥官安邨。次年被越南政府授为“三宣副提督”，所部驻防宣光、山西、兴化三省。1883年5月(光绪九年四月)在河内城西纸桥与法军激战，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战后升为“三宣正提督”。12月中法战争爆发，率部在山西等地作战，屡挫法军。1884年黑旗军受清政府收编，被清政府授予记名提督衔，与清军在西线抗击法军，在宣光、临洮等地取得胜利，克十余州县。1885年9月被调回国内，所部被裁至1000余人。次年任广东南澳镇总兵。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被调赴台湾，以帮办台湾军务驻守台南。将所余2营扩充至8营，仍号黑旗军。《马关条约》规定台湾割给日本，遭到举国一致反对。台湾人民成立“民主国”，决意抵抗日本侵略。为迫使台湾人民屈服，日军分两路大举攻台，陷台北。他在台南被军民推举为抗日领袖，联络各地抗日部队，在苗栗、彰化、嘉义等地抗击敌军，坚守台南。日本驻台总督桦山资纪通过英领事捎来降书，遭拒绝。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清政府的牵制，台湾军民处境日艰。仍身先士卒，率部与敌血战。10月日军从海陆夹击台南时，乘英国轮船内渡厦门。21日台南陷落。在下到半年的战斗中，其所率的黑旗军与台湾军民一起作战100余次，毙伤敌军3.2万多人。1902年署广东碣石镇总兵。1907年回钦州养病。1911年11月广东独立后，被推为广东民团总长，旋辞职归籍。1915年闻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愤慨异常，表示愿为报国再请缨上阵。

(史革新)

马尾海战

(Mawei haizhan) 中法战争期间中法海军在福建马尾港展开的海战。为了恫吓清政府,遏制清海军,1884年7月15日(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三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孤拔率舰队主力闯入闽江口,向闽浙总督何璟、福建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提出在中国马尾军港停泊的要求。何、张害怕影响中法正在进行的和谈,予以应允,致使总排水量1.4万余吨的法国8艘军舰长驱直入,进占马尾军港。总排水量只有6500吨的中国福建水师10多艘战舰处于法舰枪炮的监视之下。广大官兵要求启锚备战。何璟、张佩纶执行清政府妥协求和的方针,下令“不准先行开炮”,束缚了官兵的手脚。8月法国政府决定扩大侵华战争,令孤拔向福建水师发起进攻。23日上午孤拔发出最后通牒,限福建水师下午退出马尾。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及张佩纶不知所措,至中午,以战斗准备未妥要求法军更改开战日期。孤拔拒绝,下令法舰开炮。福建水师官兵在极被动情况下顽强抵抗。旗舰“扬武”、“福星”、“振武”、“飞云”、“振威”等舰,毫不畏惧,猛烈还击,将敌“伏尔达”号等舰击中击伤,但终因众寡悬殊,难挽败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福建水师11艘兵舰全部被击沉击毁,官兵伤亡700余人。接着,法军舰轰击马尾造船厂,并摧毁了马江两岸的炮台。3天之后,清政府对法宣战。

(史革新)

冯子材

(Feng zicai 1818—1903)晚清爱国将领。字南干，号萃亭。广东钦州人。行伍出身。早年曾参加广东天地会起义，后投清军。先后在清将向荣、张国梁部下供职，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积功至副将。1858年(咸丰八年)张国梁败死，代领其众，擢总兵。1862年(同治元年)，升广西提督，1875年(光绪元年)调任贵州提督。1881年回任广西，次年归乡养病。中法战争爆发后出任钦州、廉州、高州、雷州四府团练督办，练兵备战，准备御敌。1885年经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出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是时镇南关(今友谊关)已经失陷。他率部至关前隘，在隘口抢筑一道长墙，周密部署，积极备战。3月23日法军分三路来犯，他激励将士说：“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中法战争》，第6册，第455页)沉着指挥，击退法军。次日法军猛攻长墙，几欲得逞。他身先士卒，率部血战，将敌人逼离长墙。25日发出总反击令，所部各路在民众支援下勇猛冲杀，击溃法军，乘胜收复谅山等地，取得镇南关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局。但清政府决意与法议和，下令停战。他致电张之洞，请上折“诛议和之人”。被迫撤回境内，受命会办广西军务，晋太子少保。1887年调云南提督，因病未赴任。1894年加尚书衔。时值中日战争爆发，奉命募旧部北援，驻镇江，至战争结束仍回广西。1901年调任贵州提督，次年以病退職。

(史革新)

镇南关大捷

(Zhennanguan dajie) 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击败法国侵略军的一次战役。1885年2月(光绪十一年正月),法军在尼格里指挥下进攻清军在越南的东线战区,击败潘鼎新部,攻陷谅山,一度入镇南关。清政府起用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冯即赶赴镇南关就任前敌主帅,整军备战,准备克敌。时法军炸毁镇南关,退屯关外的文渊城。冯子材率军扼守关前隘,在隘口抢筑长墙,墙外挖深壕。命王孝祺部守右翼西岭,陈嘉部守东岭,自己率部当中路。又命苏元春等各部驻幕府、凭祥等地为后应,王德榜部守关外油隘。3月23日法军分三路来犯,以两路主攻东岭炮台。冯率部下在长墙阻敌,派苏元春部增援东岭,王孝祺部袭敌背后,稳住战局。24日法军猛攻长墙,局势危急。冯子材手执长矛,带其子相华、相荣跃出墙外,与敌搏杀。全军士气大振,拼死冲杀,挫败敌人攻势。当地人民及1000多名越南义军前来助战,将法军包围起来。25日冯子材下令发起总攻,各路将士一齐冲击,奋勇杀敌。法军全线溃退,被歼1000多人,狼狈逃回谅山。中越军民取得镇南关战役的辉煌胜利。它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冯子材乘胜率军出关追击,收复文渊、谅山、谷松、长庆等地。西线的黑旗军、滇军也在临洮大败法军,攻克10数州县。法军在陆路战场遭到无可挽回的失败。镇南关大捷极大地震动了法国各界。3月30日巴黎人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法国政府的穷兵黩武政策。茹费理内阁当即垮台。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201-1.bmp}

(史革新)

中法新约

(Zhong fa xinyue) 中法战争结束时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全称《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清政府在镇南关、谅山大捷后没有积极争取抗法战争的胜利，反而在英、美等国影响下趁胜求和，授权李鸿章与法谈判。1885年4月(光绪十一年三月)，李鸿章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商谈条约细则。6月9日双方签订《会订越南条约》，共10款。主要内容为：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对法国与越南签订的各种条约不加干预；在中越边境指定两处通商，允许法国在此设领事；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境的进出口货物应纳各税，照通行税则酌减；日后中国如修铁路，应请法国人商办；此约彼此画押，法军退出基隆，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军撤出台湾、澎湖。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法国通过这个条约不胜而胜，达到并吞越南、打开中国西南大门的目的。

(史革新)

中日甲午战争

(Zhong ri jiauwuzhancheng)1894年—1895年日本政府发动的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因爆发战争的1894年(光绪二十年)是农历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首先把侵略矛头指向朝鲜、中国。1885年提出以10年为期的扩军计划,1887年制定《征讨清国策》,加紧扩军备战,伺机发动侵略战争。1894年1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李熙向清政府乞援。日本政府把这一事件看作发动战争的良机。6月2日内阁通过以保护在朝日侨为借口的出兵朝鲜的决定。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调遣部队开赴朝鲜。与此同时又劝诱中国出兵赴朝,保证日本“必无他意”。6月5日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淮军1500人入朝,驻汉城以南的牙山,并通知日本。鉴于东学党起义已被平定,朝鲜局势趋于平稳,清政府于6月8日向日本建议双方撤兵,遭日方拒绝。日本反而提出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要求,继续增兵,蓄意扩大事态。到6月底入朝日军已达万人,占据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战略要地,不断向中国军队挑衅,战争迫在眉睫。面对日本的战争威胁,清政府内部意见不一,举棋不定。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战,但无实权。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主和,并占了上风。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力主避战求和的李鸿章不作迎战准备,寄希望于俄、美等国出面干涉调停。西方列强均对日本采取偏袒态度,致使清政府希望国际调停的幻想破灭。7月20日,清政府命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升阿4军29营、总兵力1万余人入朝,驻守平壤。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成立傀儡政权。25日日舰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向护送兵员的中国海军发动袭击。中国的“广乙”、“济远”两舰负伤,运输船“高升”号被击沉,船上中国官兵大部壮烈牺牲。同日,日本陆军4000多人向牙山的中国驻军进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29日双方激战于成欢驿。日军先头部队在安城渡遭伏击,伤亡较大,继以重兵猛攻成欢。清军不支,叶志超、聂士成先后率部撤出,退至平壤。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9月初日本政府任命山县有朋大将为第一军司令官,指挥日军第三、第五师团1.6万多人,分四路包围平壤,15日发起攻击。中朝军民奋起还击。左宝贵率部在平壤北门玄武门与敌展开血战,不幸中炮牺牲,阵地失守。清军统帅叶志超怯战失措,于当夜弃职逃走,导致全军溃退。16日平壤被日军占领。17日护送运兵船的北洋舰队返航途中行至大东沟海面,遭到日本海军中将伊东祐亨指挥的联合舰队截击。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即令各舰列队迎战。双方激战5个多小时,傍晚日舰退走,黄海海战结束。北洋舰队损失5艘军舰,牺牲了邓世昌、林永升等优秀将领,日本亦有5艘军舰负重伤,丧失战斗力。双方各有损伤,中国稍重。李鸿章为保存实力,令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今威海市),不许巡海。日军掌握了海战主动权。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大举进犯中国。山县有朋指挥的第一军从朝鲜义州渡过鸭绿江,击败四川提督、北洋帮办大臣宋庆统率的清军,接连攻占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岫岩、海城等地。清军在摩天岭、田庄台一带重筑防线,坚决抵抗,挡住日军攻势。由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的日本第二军于10月24日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进犯金州。驻守旅顺的清将徐邦道率部到金州御敌,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于11月6日弃守。7日日军未经大战,轻取大连。21日日军分三路猛攻旅顺。徐邦道、程允等率部英勇抵抗,因孤军无援而败。22日旅顺失陷。日

军占旅顺后屠城4日。为了扫除进犯京津地区的障碍，1895年1月日本决定组成以大山岩为指挥官的“山东作战军”，20日日军以25艘舰船运送2万士兵在威海卫以东的荣成登陆。得逞后，兵分两路直犯威海卫，并用舰队正面封锁威海卫港。清军阻击陆路进犯日军，未奏效。2月1日、2日威海卫港南北炮台相继失守，北洋舰队被合围于刘公岛。北洋官兵在丁汝昌指挥下顽强坚守，伤亡惨重，处于困境。部分将领伙同洋员迫丁汝昌投降。丁不从，又拒绝日军头目劝降，11日夜自杀殉国。部下托其名致书投敌，刘公岛遂为敌占。清政府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鉴于淮系军队及北洋海军的失败，清政府起用湘系军队。1894年12月28日授湘军宿将、时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节制关内外各军，湖南巡抚吴大澂和淮军将领宋庆为副帅，征调军队100余营，6万余人，部署在山海关内外。1895年2月底，湘军两次向占据海城的日军发起反攻，均以指挥失当，各部配合不协调而告失利。与此同时，日军乘全歼北洋舰队之机，实现扫荡辽河平原的作战方案。3月上旬日军从海城出动，在6天之内攻占山海关外牛庄、营口、田庄台等战略要地，湘军全线瓦解。3月15日日军组成澎湖混合支队5000余人，乘坐8艘军舰，从佐世保军港出发进犯澎湖。20日日军在澎湖岛东端的里正角登陆，向清军炮台发起攻击，双方展开激烈炮战。清军主将朱上泮弃职渡海逃回厦门，所部瓦解。27日澎湖岛被日军所占。对日宣战后清政府一度中止了求和活动。1894年9月底起用罢黜多年的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奕訢出面请求英、美、俄等国出面调停。1895年1月派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聘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日本政府以张、邵“全权不足”为借口，拒绝谈判。2月2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提出要李鸿章任全权代表，方准议和。3月初，湘军在辽东全线溃败。清政府见败局已无可挽回，被迫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授李鸿章以议和全权大臣。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携其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乘船赴日。20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举行谈判。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李鸿章与日本代表于4月17日签订了空前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日本通过这个条约取得大量政治经济利益，勒索巨额赔款，并割去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后由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大片中国领土。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空前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危机。战争结果也加速了日本工业和军事的近代化进程，大大膨胀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略扩张的野心。

（史革新）

光绪皇帝

(Guangxu huangdi 1871—1908) 清末实行维新变法的开明皇帝。爱新觉罗氏。名载湉。父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譞，母慈禧太后之妹叶赫那拉氏。1875年(同治十四年)同治帝死，无子，被慈禧以为咸丰帝续嗣名义立为皇帝，入继大统。2月25日登基，年号光绪。时年仅4岁，由慈禧“垂帘听政”。翁同龢为师傅。1887年(光绪十三年)亲政，慈禧发懿旨称“再行训政数年”。1889年太后“归政”，实则仍握大权。他不甘傀儡皇帝处境，意欲励精图治，振兴国家。翁同龢、志锐、文廷式等官员对慈禧用权不满，形成“帝党”，与听命于慈禧的“后党”发生分歧。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一力主战”，积极筹划御敌之策，下达对日宣战上谕。因无实权，难挽败局。战后，忧危之心益切，急求自强雪耻之方。时值康有为等发起维新运动，倡言变法。经翁同龢密荐，知康有为等可依赖，与维新派发生联系。阅读康有为等人的变法奏疏及论著，深受启迪，思想大进。1898年初在民族危机刺激和维新运动影响下，表示不做“亡国之君”，锐意维新。派王大臣接见康有为，驳斥守旧派对维新团体保国会的攻击。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在6月至9月的“百日维新”期间，发布改革诏令100余条，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各个领域的改革，希冀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慈禧太后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后，将其幽囚在中南海瀛台。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不顾处境险恶，反对慈禧太后对八国宣战，叹中国数万万生灵“将遭涂炭”。八国联军逼近北京，被慈禧挟持，逃往西安。迫于形势压力，慈禧于1901年许其“临朝”，但仍严密监视。1908年11月14日逝于瀛台涵元殿。谥庙号“德宗”。

(史革新)

左宝贵

(Zuo Baogui 1837—1894) 晚清爱国将领。字冠廷。回族。山东费县人。1856年(咸丰六年)，投清江南军营，升游击。1865年(同治四年)，随僧格林沁剿捻，擢副将。从崇实巡视东北，1875年(光绪元年)，晋记名提督。1889年授广东高州镇总兵，留奉天。1894年以朝鲜事急，率部6营3500余人渡鸭绿江入朝，8月初与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等部抵平壤。左军守平壤北门玄武门、牡丹台。9月初多次击退来犯日军。15日日军攻平壤，统帅叶志超怯战，谋与“同遁”，不从。日军以主力猛攻北门。他临敌不惧，指挥全军凭险据守，重创敌军。但因寡不敌众，牡丹台失守。战势虽危，仍亲自登城督战，鼓舞士气，手燃大炮轰击敌人，身负重伤而不退，不幸被流弹击中左胸而壮烈牺牲。清廷准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议恤，谥“忠壮”。

(支革新)

丁汝昌

(Ding Ruchang 1836—1895) 晚清爱国海军将领。原名先达，字禹廷，号次章。安徽庐江人。出身贫苦农家，当过佣工。1853年(咸丰三年)投太平军程学启部。1861年程降清，丁被编入湘军，后入淮军。以功历参将、副将。1868年(同治七年)授总兵，加提督衔。1879年(光绪五年)被李鸿章调至北洋。次年奉命赴英接收所购快船，以巡海功，赏头品顶戴。1883年授天津镇总兵。北洋海军成军后被任为提督。中日甲午战争中积极主战。1894年9月17日率北洋舰队主力护送兵船至鸭绿江口，返航时，在黄海大东沟附近遭日本联合舰队袭击。他令舰队列阵迎敌，首先对敌开炮。开战不久即负伤，仍坐在甲板上督战。所属将士倍受激励，奋力与敌拼杀，在付出重大代价的同时，重创数艘敌舰，迫使日舰率先退阵。战后李鸿章令舰队退守威海卫军港，“保船”避战。曾向李请战，遭拒绝。1895年1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攻占威海卫东面的荣成，并从海陆两路围困威海北洋海军。他指挥守军与日军展开激战，击沉击伤日舰多艘。日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致书劝降，予以拒绝。部分属员与洋员胁迫率众降敌，亦被驳回。但北洋舰队损失惨重，全军孤立无援，败局难挽。2月11日召集部属及洋员会议，下令突围，但遭到主降将领抵制，当夜自尽殉国。部将牛昶炳等托丁汝昌名致敌降书，缴出残余舰只及阵地。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灭。

(史革新)

邓世昌

(Deng shichang 1849—1894) 晚清爱国海军将领。字正卿。广东番禺人。出身于农家。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建船政学堂学习造船与驾驶,毕业后任“琛航”运船管带。1875年(光绪元年)调充“海东云”舰管带,迁守备,加都司衔。1879年调赴北洋海军,先后任“飞霆”、“镇南”等舰管带。1880年随丁汝昌赴英购铁甲舰。1882年夏奉命赴朝鲜平定兵变,以功升游击,赐“勃勇巴图鲁勇”号,任“扬威”舰管带。1887年与叶祖珪、林永升等同赴英、德接收定购船只,以“致远”、“靖远”、“经远”、“济远”四舰营务处副将衔参将兼“致远”舰管带。次年赴台湾平吕家望等起义,以总兵记名简放,加提督衔。北洋舰队成军,授为中军中营副将,仍兼“致远”舰管带。素怀忠义报国之志,究心西学,平时严于训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积极主战。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黄海激战,率舰冲锋陷阵,勇冠全军,重创敌舰。见北洋旗舰“定远”舰帅旗被震落,即令高悬致远舰旗帜,鼓舞军心。被敌舰包围,仍奋勇作战。后弹尽舰伤,令鼓轮怒驶,冲撞敌舰“吉野”号,不幸舰中鱼雷炸裂,与副游击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同时落水牺牲。全舰200余名官兵,除27人遇救外,其余全部殉难。清廷予优恤,谥“壮节”。与左宝贵并称“双忠”。

(史革新)

黄海海战

(Huanghai haizhan) 中日甲午战争中发生在中国黄海的一场海战。1894年(光绪二十年)9月16日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率舰队由大连护送增援朝鲜平壤的运兵船,至鸭绿江口大东沟。17日上午10时30分,北洋舰队正拟返航,突遭日本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率领的联合舰队的攻击。丁汝昌即令舰队起锚,以镇远、定远两铁甲舰居中,作“犄角雁行阵”迎敌。12时50分,双方舰队接近,定远舰首先开炮,双方展开炮战。日舰以快速的优势,避开“镇远”、“定远”火力,绕攻北洋侧翼小舰,击沉“超勇”,击伤“扬威”,并把“致远”、“经远”、“济远”三舰隔出圈外。北洋旗舰“定远”号桅楼被击毁,信旗无法发出,丁汝昌受伤,使北洋舰队一时指挥失灵,处于劣势。但广大将士同仇敌忾,英勇作战。“致远”舰官兵在管带邓世昌指挥下奋勇杀敌,毫不退缩。后弹药将尽,恰遇敌舰“吉野”横行,邓世昌下令快速冲撞,拟与“吉野”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沉没。全舰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经远”舰在管带林永升指挥下,力敌四舰,多次中弹起火,仍沉着应战,最后被击沉。全舰官兵200余人,除16人被救外,其余壮烈殉国。“定远”、“镇远”两舰在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指挥下,保持依恃阵形,与敌拼杀。下午3时半,“定远”舰发炮击中敌旗舰“松岛”号,引起该舰弹药爆炸,敌官兵死伤达113人。5时许,“靖远”舰代“定远”舰升旗集队,各舰纷纷向“靖远”舰靠拢,准备继续血战,迫使日舰首先退出黄海。北洋舰队亦返旅顺港。此役中国有10艘军舰参战,舰龄老化,装备陈旧,速度、火力均逊于日本。日本方面有12艘军舰参战,在炮火、吨位、兵员、速度等方面都占优势。战争结果中国损失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等5舰。日本的“吉野”,“赤城”、“比睿”、“西京丸”和旗舰“松岛”均受重创,“赤城”舰长坂元八郎太被击毙。相形之下,中国方面损失较大。

(史革新)

威海卫战役

(Weihaiwei zhanyi) 中日甲午战争中发生在中国威海的一次战役。威海卫(今威海市,位于山东半岛东端,扼渤海门户,与隔海相望的旅顺同是北洋海军的基地。卫东为海港,横亘港前的刘公岛设北洋水师提督署及水师学堂、制造局、水雷局等军事设施。清军在山东半岛北线驻 45 营,2 万多人。1894 年(光绪二十年)底日本组成以大山岩为首的“山东作战军”,次年 1 月拉开战幕。日军先扰登州,制造假象,20 日以 25 艘舰船护送 2 万士兵攻威海卫东的荣成,攻陷后分南北两路进犯威海卫,并用日船从正面封锁威港。清海军提督丁汝昌受李鸿章避战保舰命令的牵制,按兵不动。清军营官孙万林率部在桥头阻击日军,寡不敌众而败。30 日日军会攻南岸炮台。2 月 1 日炮台失陷,次日北岸炮台亦失。北洋舰队被四面合围于刘公岛。自 3 日起双方展开激战,日舰沉 2 艘,“松岛”、“浪速”等舰负伤。北洋舰队的“定远”、“来远”、“靖远”诸舰相继沉没,突围的 12 艘鱼雷艇被掳。10 日北洋舰队部分将领伙同洋员迫丁汝昌投降。丁不从,并下令沉舰和以铁甲舰猛撞敌舰突围,部属拒不从命。11 日夜,丁汝昌及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舰管带杨用霖等人自杀殉国。营务道员牛昶炳及美国顾问浩威等托名丁汝昌致书向敌投降。16 日牛昶炳代表清军在投降条约上签字,缴出北洋舰队残余的 11 艘军舰及刘公岛、日岛所有的军械弹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204-1.bmp}

(史革新)

马关条约

(Maguan tiaoyue)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95年1月(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旅顺失守后,清政府派张荫桓、邵友濂为代表,赴日求和。日方拒绝与张、邵谈判,公开指定要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清政府被迫接受,并于3月14日派钦差头等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及其子钦差全权大臣李经方赴日。谈判中李虽一再乞求减轻勒索,为日拒绝。4月17日在日方胁迫下,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今下关)春帆楼签订此约。凡11款,附有《另约》、《议订专条》,条约规定: 中国承认朝鲜国完全“独立自主”;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分8次在7年内交清; 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日本政府可在通商口岸设领事官及租界地; 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 双方交换俘虏,中国即行释放日本军事间谍及因间谍嫌疑被逮捕的日本人,并不得逮捕为日军效劳的汉奸; 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驻威海卫。该约使中国丧失领土之多、赔款之巨、损害主权之重,均创《南京条约》以来的纪录,极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04-2.bmp}

(史革新)

三国干涉还辽

(sanguo ganshehuanliao) 中日甲午战后俄、法、德三国迫使日本退出中国辽东半岛的事件。沙俄久已蓄谋侵占中国东北，对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扩张耿耿于怀。1895年2月(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俄国向日本提出放弃对中国大陆扩张而只割占台湾的要求，并擅派军队进入中国向日本示威。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夕，沙皇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决定联络别国阻止日本占据辽东半岛。4月17日俄国正式向法国、德国建议联合干涉，要日本退出辽东半岛，如果日本不应允，即以武力相加。法国以俄国同盟伙伴积极响应。德国在欧洲与俄有矛盾，但为把俄视线转移到远东，使自己的势力插入中国，也表示赞同。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各遵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放弃领有辽东半岛。三国海军遂出没于日本海面，施加军事压力。大战之后的日本政府无力对付三国，先向英、美等国求援，要求召开列国会议来牵制三国。英、美等国不愿冒此风险，亦恐日本在华势力发展过大，声明中立。继而日本提出“变相占领”对策，于4月30日向俄国提出占领旅顺、大连，要求补偿金，暂行占据辽东半岛等要求。5月3日俄国回复日本，表示“仍维持最初之劝告”毫不让步。德、法亦随声附和。最后，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对俄、法、德三国虽全然让步，对中国一步不让”的方针。5月4日日本声明接受三国“劝告”，但提出中国须交“补偿金”。10月19日三国与日本商定中国补偿“赎辽”费3000万两；中国付清该款项之日起3个月内，日军撤出辽东半岛。此事后，三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乘机敲诈清政府，索取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扩大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由此而起。

(史革新)

中俄密约

(Zhong e miyue) 中日甲午战后沙俄与清政府秘密签订的同盟条约。亦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19世纪90年代沙俄为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向远东扩张，极欲图谋中国东北铁路权。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拟派布政使王之春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俄国以王“位望太轻”提出异议，指定李鸿章为使臣人选。企图利用三国干涉还辽后清政府对俄国的幻想作新的勒索。清政府允诺，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衔出使大臣赴俄庆贺，并顺访英、法、德、美四国，递交国书。1896年3月底从上海出洋。英、德等国派人劝李先游欧，后赴俄。沙皇特使亲王乌赫唐斯基公爵专程至苏伊士运河，抢先把李迎至俄国。5月初，俄国财政大臣维持、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与李鸿章举行秘密会谈。会谈中沙皇接见李，并批准拨300万卢布作贿赂李的费用。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密约，法文本称为《防御同盟条约》。共六条：(一)如果日本侵占俄、中、朝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二)缔约国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不能独立与敌议立和约；(三)开战时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舰驶入，中国地方官尽力供应所需；(四)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公使与该银行订立；(五)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可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及军用物资；(六)条约有效期15年，届期6个月以前，可商办展限。9月8日清驻俄德公使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在柏林订立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设立了由俄国操纵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负责修筑和经营中东铁路。俄国通过签订密约与合同把中国东北地区划入了它的势力范围。密约签订后双方对外绝对保密。1910年2月李鸿章之子、驻英公使李经方在英国报纸上首次透露了该约内容。1921年华盛顿会议时北洋政府曾公布密约的部分内容。1924年苏联政府首次公布密约全文。

(史革新)

外国在华银行

(waiguo zaihua yin- hang) 外国在旧中国设立的金融机构。它是金融垄断资本运用货币信用手段对旧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侵入中国的第一家外国银行是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在广州和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的英国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基本上是英国银行独霸时期,英资银行一共有 9 家,其中发展最快的,就是后来长期居于中国金融霸权地位的汇丰银行(Hongkong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汇丰银行于 1864 年(同治三年)8 月 6 日在香港创立,次年 3 月 3 日正式营业,与同期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不同,它的总行在香港,投资者大多是在中国进行了长期、多方面侵略活动的外国洋行老板。总行在香港,使它在判断和决策方面胜于其他银行。因此,开业后发展极为迅速,至 70 年代已开始单独给清政府巨额贷款,利率高达 8~10%。同时,它通过买办与上海钱庄和中国商人发展信贷关系,开始控制中国金融。90 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加剧,外国银行接踵而至。主要有:1890 年(光绪十六年)正式营业的德国德华银行(Deutsche-Asiatische Bank);1893 年开始在上海设立分行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1894 年在香港设立分行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1895 年设立的沙俄华俄道胜银行;1902 年在上海设立分行的美国花旗银行(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以上 5 家再加上先期设立的英国汇丰银行,是六个帝国主义侵华国家的主要银行,是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枢纽和据点。20 世纪以后,外国银行的在华活动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出现帝国主义银行团,帝国主义携起手来共同剥削中国人民,有 1912 年 6 月成立的“六国银行团”,1913 年 3 月因美国退出而形成的“五国银行团”,以及 1918 年 5 月由美、英、日、法联合组成的“新四国银行团”。中外合资银行大量出现,这些银行名义上是“合办”,实际上大权全部操纵在外国人手中,不但破坏了中国金融主权的完整,而且使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中国的部分货币资金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消长,外国在华银行的势力主要是英、日、美三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日本银行的势力畸形膨胀。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银行操纵了中国金融市场。解放前夕,随着金融形势的恶化,众多外国银行纷纷退出中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取缔了外国银行的特权。外国在华银行的主要业务活动有:汇兑业务,垄断为中外贸易服务的国际汇兑,包揽华侨汇款,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205-1.bmp}

大力抢夺中国内汇业务;放款业务,主要是对中国反动政府的政治军事借款,和对铁路、工矿企业的所谓“实业借款”;存款业务,这是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20 世纪初达到顶峰;发钞业务,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的丽如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就开展了这项业务,80 年代以后规模日趋扩大,20 世纪以后在中国境内发行钞票的外国银行有十几家,发行的钞票多达数十种,严重地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通过上述业务,外国银行获得了高额利润,控制了中国的金融。

(李志英)

中国近代外债

(zhongguo jindaiwaizhai) 旧中国政府向外国政府或商民举借的债款，属于国债的一部分，一般不包括个人或私商向外商所借的债款。中国近代的外债具有强烈的不平等性质，它是在中国人民失去独立和主权后，由历届反动政府举借的奴役性债款，是帝国主义输出过剩资本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方式之一。鸦片战争前中国政府没有外债，清政府也禁止本国商民欠外商款项。中国最早的两笔外债，一般认为是 1853 年（咸丰三年）苏淞太道吴健彰为镇压小刀会起义，向上海的外国洋行举借的本息 12 万两白银的债款；1858 年两广总督黄宗汉为镇压广东人民反抗英法侵略军的斗争，向美商旗昌洋行举借的 32 万两白银的债款。60 至 70 年代，清政府的对外借款开始发生变化：数额急剧增大，清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为扑灭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先后借外债 2 次，总额达 200 余万两，左宗棠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而举借的“西征借款”，总数高达 1595 万两，沈葆楨向英国汇丰银行举借的“台防借款”也在 200 万两以上。这些借款已经有了国债的性质，与最早的两笔借款不同，它们需要得到朝廷的批准。进入 80 年代，外国资本主义除继续向清政府提供各种军需借款外，开始向铁路、工矿企业等“实业借款”延伸，利用借款掠夺中国的利权。据统计，1883 年（光绪九年）至 1894 年，洋务企业向外国洋行和银行借款共计 13 笔，总金额为 423 万余两。这一时期，英国一家独贷的局面受到了挑战，德、美、法都参与了激烈竞争。至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共借外债 45 笔，折合库平银 4626 万余两。这些外债战前基本都已还清，从 80 年代中期算起，清政府每年支付外债的本息，一般都占财政总支出的 3~6%，占海关税收的 12~20%。通过这些外债，外国侵略势力虽然还不能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却已牢固地掌握了海关征税和行政管理权，便利了商品倾销和掠夺中国的原料。甲午战后，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已成为它们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的重要手段。清政府的外债因此急剧地增加。为偿付对日巨额赔款，1895 至 1898 年清政府举借了“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三大笔外债，合计库平银 3.5 亿余两，为战前所借外债总数的 6.6 倍。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侵略者又把关平银 4.5 亿两的“庚子赔款”强加给中国人民。清政府无力筹付，于是转成 39 年摊还的债款，本息合计高达 9.8 亿两。通过这些巨额债款，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清政府的财政经济命脉：俄法两国获得了参预中国海关行政管理的权力；英德等国的侵略势力则从控制海关的洋关税收，扩展到各口岸的常关税收以及各地的盐课、厘金。至 1905 年，清政府每年债务的还本付息已占到财政总岁入的 25.9% 和岁出的 31%。清政府的财政陷于崩溃。铁路借款是甲午战后急剧扩大的又一项外债。至辛亥革命前，铁路借款合计已达库平银 3.3 亿余两，占外债总数的 27.4%。外国垄断资本利用铁路借款向清政府索取多项特权，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更重要的，这是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之一。如，通过对关内外铁路的贷款，英国的势力扩张到关外，进入沙俄的势力范围；沙俄则通过芦汉路的贷款进入长江流域与英国竞争。自甲午战争至 1912 年清廷覆亡，清政府外债的总数为库平银 1203825452.94 两，是甲午战前的 25 倍。民国以后，这些外债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继清政府之后，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继续大借外债，用于维持其反动统治。这一时期举借的外债，由于多用外

币结算，已很难核算总数，仅就可以折合的部分计算，1912—1915年袁世凯政府的外债即高达库平银5.19亿余两，1916至1919年北洋政府的外债也在库平银2.8亿两以上。帝国主义银行团已经全面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其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发展最快，仅“西原借款”一项即达1.8亿日元。利用这些借款，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段祺瑞傀儡政权和东北的军阀张作霖，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疯狂掠夺中国资源。

（李志英）

外国在华铁路

(waiguo zaihua tielu)外国在旧中国修筑的铁路和攫夺的相关权益。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西方侵略势力就开始鼓吹在中国修筑铁路，但直到 1876 年（光绪二年）英国人才在上海至吴淞间建成一条长 15 公里的铁路。铁路修建期间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抵制，地方当局也多次提出抗议。10 月，中英双方签订《收赎吴淞铁路条款》，确认私筑铁路侵犯了“中国自主之权”，中国以规银 28.5 万两赎回铁路，并于 1877 年拆除。至 1894 年中日甲午战前，外国在中国不拥有任何铁路，但 1885 年 6 月中法签订的《越南条款》中规定，中国如在广西、云南两省修造铁路，须同法国人商办。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开始激烈争夺中国铁路权益。最先取得这项权益的是法国，它迫使清政府同意将越南铁路接至中国界内。至 1900 年法、德、俄、英共从中国攫取了 14 条铁路的承造权。比利时的比国铁路公司、英国的中英公司、美国的合兴公司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先后取得了对芦汉路、关内外铁路（即后来的京奉路）、粤汉路、柳太路的投资权，经营方式侧重于直接经营，如沙俄之于中东路、南满路，德国之于胶济路，法国之于滇越路等。1900 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既得铁路权益的转让和再分割，并由此引起严重的外交斗争。如沙俄在 1902 年取得正太路的投资权益后不久，就被法国财团夺走；日本凭借对俄战争的胜利，从沙俄割取了南满支路，等等。在经营方式上，鉴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收回路权运动的高涨，以贷款的形式间接经营为主，即铁路所有权虽然属于中国，但受借款条件的约束，经营权实际控制在帝国主义债权人手中。至辛亥革命前夕，帝国主义已控制了全国铁路的绝大部分：1911 年（宣统三年）全国共有铁路 9618.1 公里，其中自有铁路 665.2 公里，仅占 6.9%，外国直接经营的铁路 3759.7 公里，占 39.1%，在外国控制下经营的铁路 5192.78 公里，占 54%，后两者相加占了 93.1%。帝国主义把铁路行经地区视同势力范围，不仅经营铁路，还向清政府索取种种特权，在铁路沿线设置警察、派驻军队等，把铁路沿线变成了他们直接控制的殖民地。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07-1.bmp}

清廷覆亡后，帝国主义继续疯狂掠夺中国路权。自 1912 至 1915 年的袁世凯政府时期，从中国掠夺的铁路权益超过了 11500 公里，涉及 18 个省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他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之机，妄图独霸中国，攫取的铁路权益遍及东北、华北、华南和沿海广大地区，仅“西原借款”一项一次就夺去了七条铁路的权益。与此同时，美国财团也进行了掠夺中国路权的大量活动，虽然由于日本的争夺，铁路建筑没有成为事实，但却获取了在中国修筑 1760 公里的铁路的条约规定。

（李志英）

外国在华工矿企业

(waiguo zaihua gongkuang qiye) 外国资本在旧中国境内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1840年(道光二十年)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是外国工矿企业在华非法经营时期,主要是为外国资本的进出口贸易服务,以利于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的原材料。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家外国工厂,是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苏格兰人柯拜(John Couper)在广州黄埔开设的船坞。最先发展起来的行业是为商品运销服务的船舶修造业。60年代,上海已成为外商船厂的中心,其中最大的是英商祥生和耶松船厂,至甲午战前已能修造2000吨以上的汽船。丝茶加工业是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另一项重要工业,以俄资和英资为主,主要是为了更便利地廉价掠夺中国的生丝和茶叶。外商建立的蛋厂、糖厂、轧花厂等也属于这种性质的企业。此外,外商还有经营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的企业,主要是为租界服务。总计甲午战前50余年间,外商先后开办过100余家工业企业,资本将近2000万银元。这些企业的设立没有任何条约和法律根据,是依仗侵略特权非法经营的,资本大多属于外国洋行或航运公司。甲午战后,帝国主义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权利,外国过剩资本竞相进入中国。工业托拉斯和资本财团的进入,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现象。外国投资的规模空前地扩大了,1895至1913年,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国大型工厂的投资,总计为1.03亿元,为战前50余年的13倍。外资非法侵入的原有企业,如船舶修造业、公用事业等,规模继续扩大,逐渐变成垄断性大企业。如英商耶松、祥生船厂于1900年合并,资本达到570万两,1936年又与英商瑞镕船厂合并,资本扩充到1400万元,成为上海最大的船厂。英商上海电光公司1882年(光绪八年)成立时只有资本5万两,1929年被美商收买时已达8100万元,以后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纺织、卷烟、矿山采掘和面粉工业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资本新侵入的部门,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纺织和卷烟业。《马关条约》签订仅两年,上海一下就出现了4家外商纺织厂,分属英、美、德资本,20世纪初,日资也参加了进来。至1911年(宣统三年)已有外商纱厂9家,纱锭近24万枚。19世纪末,已有英、美、俄资本在中国设立卷烟厂,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英美烟公司进入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垄断中国卷烟业的托拉斯。帝国主义采取各种手段控制了采矿业,1913年控制了全国机械化采煤的93%,1925年依然全部掌握着生铁和铁矿的机械化生产。面粉工业主要在东北,分别控制在俄、日资本手中,英资集中在长江流域,也有一定规模。外国工矿企业财力雄厚,但从外国引进的资本比重并不大,特别是甲午战前,外国大财团投资的重点在国内,来中国办企业的多是一些外国的“穷恶人”,他们依仗侵略特权,利用掠夺、讹诈手段起家,逐渐获得积累和发展。甲午战后,外国投资增加,但中外合资以及华人附股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是外国工矿企业的重要资本来源之一。外国工矿企业依仗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享有种种特权,纳税还有优惠,因此盈利率极高,大都在10%以上,高的可达25%,帝国主义因而从中国掠去大量财富。帝国主义在华办企业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生产,所以工矿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始终不大,1930年以前一直在百分之十几,1936年以后连日本在东北的以掠夺中国资源出口为目的的工业投资合计也只占20%。

(李志英)

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

(diguozhuyi zaihuashilifanwei) 19 世纪末西方列强在中国领土内各自划定一些享有优先权或独占权的区域。甲午中日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夺取矿权与铁路修筑权、强占港湾和租借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国伙同法、德干涉还辽，把日本挤出辽东半岛，通过《中俄密约》夺取中东铁路修筑权。1898 年 3 月（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同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占据旅顺、大连，取得修筑连接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铁路的权利。中国东北全境、长城以北及西北地区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在 1898 年 2 月迫使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并在 6、7 月间先后同清政府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订租威海卫专条》，巩固了它在华南的势力。德国久已垂涎胶州湾，1897 年借口山东曹州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迫使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不仅长期租占胶州湾，而且取得在山东境内修铁路、开矿山等特权，把山东变成它的势力范围。法国在 1895 年以前就取得在广东、广西、云南开矿的优先权，1898 年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湾，并于次年 11 月和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广州湾 99 年，取得修铁路、办中国邮政等特权，迫使清政府答应不把云南、两广割让给他国，把这些地区划成它的势力范围。日本不满足于从中日战争中取得的利益，于 1898 年 4 月 22 日通过驻华公使矢野向清政府照会，要求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让与别国。清政府即表同意，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意大利也于 1899 年 3 月提出租借浙江沿海的三门湾，因列强间的矛盾和清政府的拒绝未逞。美国因忙于同西班牙的殖民战争，无力插手中国，但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取得了与各国同样的利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割裂了中国统一的江山，肆无忌惮地践踏了中华民族的主权，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08-1.bmp}

（史革新）

门户开放政策

(Menhu kaifang zhengce) 美国政府在 19 世纪末提出的侵华政策。在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候，美国正与西班牙进行争夺古巴和菲律宾的战争，无暇顾及中国。1898 年 3 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美驻华公使康格建议美国派海军占领大沽，以便向直隶渗透。1898 年初美西战争结束，美国把扩张视线转向中国。由于其他列强已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为保证美国在分割中国的争夺中也享有均等的权利，美国政府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899 年 8 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 1838—1905）要求曾任驻华公使的柔克义起草“门户开放”文件草案。成文后，经海约翰修改，以照会形式于 9 月 6 日令美驻英、德、法、俄四国公使分别向所驻国政府发出。11 月 13 日以同样方式照会日本和意大利政府。是为美国提出的第一次“门户开放”政策宣言。主要内容：（一）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既得利益，其他国家不得干涉；（二）各国运往“势力范围”内各口岸货物，均由中国政府按现行的约定关税率征收税款；（三）各国在“势力范围”内征收港口税和铁路运费时，不论何国应一律平等。在照会六国政府前，美国并未征询清政府的意见。1899 年 11 月在清政府询问下，海约翰才通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并警告清政府不得妨碍美国在华利益。到 1900 年 3 月，受照各国相继表示赞同。1900 年中国北方发生义和团运动，列强出兵镇压，图谋瓜分中国。为防止别国乘机侵占中国更多的地盘，于己不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 7 月 3 日致美驻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日本、葡萄牙、荷兰等国外交代表，发出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宣言。声明“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1905 年，美国第三次重申“门户开放”宣言。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维护了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缓和了它们之间在华的矛盾，为美国向中国渗透打开了方便之门。

（史革新）

戊戌变法

(Wuxu bianfa) 发生于 1898 年 (光绪二十四年, 农历戊戌年) 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又称戊戌维新。1895 年 4 月, 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 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消息传到北京, 群情激愤。正在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 聚集达智桥松筠庵, 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 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 联络 1300 多 (又说 500 多) 举人签名, 于 5 月 2 日呈递都察院, 都察院拒绝代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它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5 月 29 日和 6 月 30 日康有为又连续两次上书光绪帝, 反复陈述变法主张。都察院仅代呈“第三书”, 光绪帝阅后颇为赞许。康有为的上书活动引起了帝党的注意, 帝师翁同 (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 曾亲往会晤, 并与之多次通信, 商讨变法事宜。帝党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力量, 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 富国强兵, 以挽救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 软弱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则希图依靠帝党来实现其政治目的, 于是两派联合起来, 共同推进变法运动。7 月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 令人草拟 12 道新政诏书, 请在皇族中威望很高的恭亲王奕面陈皇帝, 奕断然拒绝。从 1895 年夏至 1898 年春, 维新派积极创办报纸、组织学会、开办学堂, 为变法运动制造舆论, 团结力量, 培养人才。1895 年 8 月康有为在京创办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 宣传西学, 鼓吹变法。11 月中旬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强学会每 10 日集会一次, 每次均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 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同月, 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 出版《强学报》。维新派和帝党的变法活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御史杨崇伊于 1896 年 1 月奏劾强学会结党营私、贩卖西学书籍、刊印《中外纪闻》、勒索外省大员。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遂遭封禁。上海《强学报》也因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而停刊。但维新风气已开, 难以遏抑。8 月维新人士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 邀请梁启超任主笔。10 月严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抨击封建专制统治, 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影响深远, 是维新派鼓吹变法的南北“两喉舌”。1897 年至 1898 年维新人士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聚湖南长沙, 开展维新运动。他们创办《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 宣传爱国救亡, 提倡西学, 倡言民权; 组织南学会, 联络官绅士商, 以“收群谋之益”; 开办时务学堂, 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培养变法中坚。在维新派的努力和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 湖南的维新运动蓬勃开展, 为全国之冠。据不完全统计, 1895 至 1897 年, 维新派和开明人士在全国共创办学会 33 个、学堂 17 所、报馆 9 家、书局 2 家, 共计 51 个。到 1898 年增为 300 多个, 表明维新变法运动已具有一定的群众性。维新派的变法活动, 特别是舆论宣传活动, 引起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憎恨和恐慌, 于是双方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主要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和“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三方面展开。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以民权观念批判“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思想, 以资产阶级教育观点批

判“禁锢人心”的科举制度。经过论战，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广泛传播，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09-1.bmp}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迅即向光绪皇帝上“第五书”，痛言“瓜分豆剖”的危机局势，建议变法。书呈工部，格未上达。1898年1月康有为应诏上《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请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等12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实行地方自治。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妥议具奏”，总理衙门却遵照慈禧太后旨意将折中建议逐条驳回。4月，康有为怂恿御史李盛铎在京发起成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政治性团体保国会。此前此后有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士大夫经常集会，议论时政，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6月11日光绪帝接受变法建议，发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此后康有为不断上奏和进呈所著书籍，阐述变法理论，规划变法步骤，提出具体变法建议。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陆续发布几十道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传播的新政诏令，并罢黜一批顽固大臣，擢拔一批维新人士。9月4日诏令将阻挠新政的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次日，擢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4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光绪帝的一系列变法举措受到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一时“欢声雷动”，变法运动达到高潮。同时，维新派和守旧派、帝党和后党的矛盾和斗争也迅速加剧。光绪帝罢黜“礼部六堂官”后，满族亲贵环跪于慈禧太后面前，指责光绪帝妄变祖宗之法，请太后训政。怀塔布、杨崇伊等陆续到天津和直隶总督荣禄密商废立之事。9月18日杨崇伊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匆赶回皇宫，严密控制光绪帝。21日光绪帝被迫发布诏书，宣布即日起太后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同时，袁世凯又密报说康有为、谭嗣同等有围锢太后、诛杀荣禄的密谋。于是京中大肆搜捕维新党人。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推翻。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兴起，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革运动；它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大批年轻知识分子总结失败教训，走上革命道路，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房德邻）

康有为

(Kang Youwei 1858—1927)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青年时从名儒朱次琦学习，讲求经世致用。1879年（光绪五年）游历香港，深感西方人治国有法度，遂留心西学，逐渐产生改良思想。中法战争后，有感于国势日蹙，于1888年向皇帝上书，建议变法。1891年起在广州长兴里收徒讲学，宣传维新思想。学生有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人，后来多成为维新运动骨干。为了给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这一时期他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前者宣布古文经典都是伪经，后者宣传历史进化论。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时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即联合各省在京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榜发，中进士，授工部主事。自视非吏才，不肯到职。又接连上“第三书”和“第四书”，反复阐述其变法主张。光绪帝见过“第三书”，颇为赏识。7月在京创办《中外纪闻》，8月组织强学会，不久南下成立上海强学分会，出版《强学报》，积极推进变法运动。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即赶赴北京上“第五书”，力陈变法图存。次年1月应诏上《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开制度局于宫中”、“许天下人上书”的建议。4月组织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救国图强相号召。5月代杨深秀、徐致靖草拟奏疏，“请定国是”，并自上《请变法定国是折》，促成“百日维新”。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5天后在颐和园召见他，商讨变法步骤和措施。他建议光绪帝就“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尽量避免刺激守旧派。召见后，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可以专折奏事。此后不断上书和进呈所著书籍，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都提出改革建议，企图逐渐变封建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这些建议多为光绪帝采纳，以诏令发布出去。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临朝训政，他遭到通缉，逃亡日本。1899年7月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继续鼓吹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反对资产阶级共和革命。1900年乘国内发生义和团运动之机，鼓动唐才常、林圭等建立“自立军”，搞“勤王”运动，结果失败，1902年发表《答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美化清帝，诅咒革命。同年隐居印度大吉岭撰写《孟子微》、《礼运注》、《论语注》、《大同书》等一批学术著作。此后遍游欧美亚，考察各国政俗风情，发展保皇会。1906年9月清政府发布“预备立宪”诏书，他欢欣鼓舞，积极呼应，把保皇会改称“宪政会”。1911年（宣统三年）10月在日本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惴惴恐栗”，连写《救亡论》和《共和政体论》两篇文章，反对民主共和，主张“虚君共和”。次年指命门徒陈焕章在上海创立孔教会，大搞尊孔复辟活动。1913年11月回国，被推为孔教会会长，积极推进孔教运动。1916年9月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同时与张勋秘密联系，准备拥戴溥仪复辟。1917年7月1日溥仪复辟，他受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复辟失败后，一度藏身美国使馆。晚年继续宣扬孔教。1926年3月在上海创立于游学院，宣讲“大同学”和“天游学”。1927年病死青岛，临终前向清逊帝溥仪谢恩，表示忠诚。一生著作丰富。近年出版有《康有为政论选》、《康有为全集》第1册、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丛刊等。

（房德邻）

梁启超

(Liang Qichao 1873—1929)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时就学学海堂。17岁中举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读《瀛环志略》及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方书籍，初步接触资本主义文化。同年秋，拜康有为为师，协助编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1895年进京参加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遂与康有为一起联络在京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协助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传西学。参与发起强学会，任书记员。1896年8月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多篇论文，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文章观点新颖，议论风发，文字流畅，富于感情，影响甚大，由此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最著名的宣传家。同年底，赴澳门和康广仁等创办《知新报》。1897年11月应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邀请，赴长沙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继续宣传变法维新，提倡民权。为守旧派所不容。1898年春到北京，联络各省在京会试举人先后上书请求拒俄变法、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协助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保国会，宣传“保国保种保教”。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帝召见，赏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受军机大臣及总署委派，仿照日本学校制度，草定京师大学堂规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政府，鼓吹保皇维新。1899年12月赴檀香山，一面发展保皇会组织，一面为国内自立军勤王运动筹款。1900年8月到上海准备参加自立军起事，旋因武汉自立军失败，转赴南洋和澳洲。次年5月到日本。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一面着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进行思想启蒙；一面宣扬立宪保皇，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论战。他坚持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制度，甚至主张“开明专制”。遭到革命派激烈批判。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起而呼应，和康有为一道把保皇会改为宪政会。1907年10月创立政闻社，发刊《政论》杂志，声明遵守清朝法令，绝不干犯王室尊严和扰乱治安。同时又表示要把“与革党死战”放在“第一义”。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于11月间潜赴沈阳，待机入京，后因时局不利，折返日本，一时进退维谷。1912年10月回国，受到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礼遇。12月在天津创办《庸言报》，发表过许多关于行政、理财、司法等方面的文章。1913年2月加入以黎元洪、张謇为首的共和党。5月共和党与章太炎的统一党、汤化龙的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被推为理事。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拥护袁世凯，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后改任币制局总裁。1914年12月辞职，避居天津。1915年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变更共和国体，传诵一时。并策动蔡锷起兵反袁，1916年先后出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总参谋、广东肇庆军务院抚军兼政务委员长。8月组织“研究系”政客集团，投机政治。1917年7月反对张勋复辟，为段祺瑞讨伐张勋起草檄文。1919年五四运动后，专心致力文化教育事业，宣扬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写出《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等几部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一生著作极富，编为《饮冰室合集》。

(房德邻)

公车上书

(Gongju shangshu)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次爱国请愿活动。1895年3月(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4月,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康有为遂联合在京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三项建议,并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富国之法,包括钞法,建筑铁路,制造机器、轮舟,奖励制造,办矿务,铸银,设邮政等;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教民之法,包括分立学堂,开设报馆,设道学(儒学)科等。又建议每10万户推举一“议郎”,供皇帝咨询,讨论内外兴革大政,“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表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纲领已初步形成。《万言书》征集到1300余名(又说500余)举人签名,于5月2日呈递都察院,都察院借口《条约》已签字,无法挽回,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此即“公车上书”(汉朝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因以“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它是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以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爱国行动,虽然参加者均是举人,社会阶层狭窄,但联系广泛,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

(房德邻)

强学会

(Qiangxuehui)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创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康有为从“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的认识出发，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8月联络帝党和倾向变法的洋务派在京成立强学会。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沈曾植、张之洞、袁世凯、徐世昌等都列名会籍。立会宗旨是讲求“自强之学”。规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讲。发行《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传学习西方。计划购买译书，开图书馆。11月康有为赴上海组织强学分会，发行《强学报》。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奏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北京强学会遂遭封禁。不久，张之洞查禁上海强学分会和《强学报》。

（房德邻）

时务报

(shiwub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报刊。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创刊于上海。汪康年总理,梁启超主笔,黄遵宪参与创办。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太炎先后任撰述。旬刊,每册20余页,石印。设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是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影响广远,直到穷乡僻壤。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重要文章《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均发表于此报。张之洞以报中论说新奇激烈,频加干涉。1898年3月梁启超与倾向张之洞的汪康年发生矛盾,辞去主笔。《时务报》遂改弦易辙,成为洋务派喉舌。1898年7月奉旨改为官报,由康有为督办。汪康年遂于8月8日停办该报,而别创《昌言报》继之,从8月17日起《昌言报》共出10期亦停刊。

(房德邻)

百日维新

(Bairiweixin) 从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到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 103 天,史称“百日维新”。其间,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建议,发布一系列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关于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垦荒、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成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大小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销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军事方面主要有:裁减绿营,裁汰冗兵,采甲新法练兵,添设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历、留学。这些变法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为了推进变法,光绪帝还擢拔了一批维新人士。在变法开始后不久即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可以专折奏事。7 月 3 日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9 月 4 日表彰不畏强御、敢于上书的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5 日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擢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四章京代皇帝批阅奏章,属草谕旨,官小权大。与此同时,光绪帝革除了一批守旧官员。变法危及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顽固抵制和疯狂反对。光绪帝发出的变法诏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多少执行外,其他地方督抚均不执行。慈禧太后则从变法一开始就极力控制局势,精心部署,准备政变。在“明定国是”诏发布的第 4 天,她就迫令光绪一天中发出三道谕旨:罢免支持变法的翁同龢,逐回原籍;新授二品以上大臣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兼领北洋三军。旨在孤立光绪帝,使他不能破格提拔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顽固派手中。接着从 6 月 16 日到 24 日又迫令光绪帝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使顽固派完全控制京城防卫。然后,慈禧静观事态发展。到 9 月,变法开始触及到改革官制,新旧党争迅速加剧。9 月 21 日慈禧发动政变,重新临朝训政。百日维新至此结束,变法运动宣告失败。

(房德邻)

谭嗣同

(Tan sitong 1865—1898)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字复生，号壮飞，又号东海寰冥氏、寥天一阁主。湖南浏阳人。出生仕宦之家。少时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喜好经世之学，服膺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激赏魏源、龚自珍。又喜驰马舞剑，长于技击。1884年（光绪十年）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曾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甲午战败，深受刺激，思想为之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从此力抵旧学，倡言西学。在浏阳创立算学馆，开湖南维新风气之先。1896年夏，遍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求友访学，探索新知，先后结识梁启超、夏曾佑、黄遵宪、严复等维新人士及徐致靖、文廷式、翁同龢等帝党分子。欣赏康有为的学说、主张，自称是其私淑弟子。同年，其父为纳贖捐得五品衔候补知府，在南京候差。至1897年春写成《仁学》5万余言，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构成一种独特的哲学体系，以民主主义观点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和纲常名教，号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在南京待职期间，经常往来上海、两湖，为变法奔走呼号。在长沙筹办《湘学报》，计议设立湖南强学分会，在南京成立测量学会，办《矿学报》，担任上海《时务报》董事，参与发起上海女学堂、不缠足会。1898年2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回长沙兴办新政。和黄遵宪、梁启超、皮锡瑞、唐才常、熊希龄等创设南学会，出版《湘报》，办时务学堂，创电信，置轮船，建电厂，筹组机器制茶公司，逐步推行各项新政。又倡设不缠足会、延年会，改革世俗恶习。面对守旧派的指责和压制，不屈不挠，表示：“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二十一，《谭嗣同全集·书简》）8月应征入京。9月4日光绪帝召见。次日，赏四品卿衔，擢为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新政，时称“军机四卿”，为光绪帝批阅奏章，属草诏书。9月中旬帝后党争加剧，18日接读光绪帝密诏，令设法相救，遂以救上自任。当夜径赴京郊法华寺访袁世凯，说袁起兵救上。袁佯作应允，暗中却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命拿办维新党人。25日被捕，与林旭等6人同时被害，时称“戊戌六君子”。临刑有绝命辞：“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遗著编为《谭嗣同全集》。

（房德邻）

戊戌六君子

(wuxu liujunzi) 戊戌政变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 6 人于 1898 年 9 月 28 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参见《谭嗣同》条）。

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胞弟。自少鄙弃八股科考，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曾纳贖为小吏，深感官场黑暗，挂冠而归。从美国人嘉约翰学西医，计划在上海创设医学堂，未成。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2 月和徐勤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后到上海倡设女学堂。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成立戒缠足会。创设大同译书局，刊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898 年春挟金赴京，协助康有为开展维新运动。主张废八股，开民智。与御史宋伯鲁谋议上书，请变生童岁科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得旨允行。由于看到顽固守旧势力强大，变法难以进行，屡劝康有为离京南归，收徒讲学，培养维新人才，待机变法。戊戌政变时被捕，在狱中说：“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从容就义。

杨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号香齋子。山西闻喜人。1889 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97 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次年 3 月和御史宋伯鲁发起关学会，讲求变法。4 月列名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或为康有为代拟。6 月 1 日上新政条陈 5 篇，请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请厘正科举文体，废弃八股，改试策论；请议游学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历；请筹款译书。又多次奏劾阻挠变法的守旧大臣。曾对文悌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被文悌告发。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遗著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邨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

林旭（1875—1898）字暲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同年捐贖为内阁中书。1897 年进张元济等创办的西学馆学习。1898 年创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会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 月参与发起保国会，任董事。因仰慕康有为，受业于康。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推扬今文经说。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曾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商授救光绪的办法。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 24 岁。遗著有《晚翠轩集》。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1889 年（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 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强学会被封禁后，又联合会中志士抗争。清廷在强学会旧址基础上设立官书局，命其参与选书事宜。1898 年春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指南，兼习中学和西学。4 月列名保国会，而每于集会时常当众假寐。在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与康有为相交，

但变法主张多有不合，攻击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戊戌政变时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被害。遗著编为《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官清廉，不媚权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建议变法求强，刑部堂官阅后震恐，不敢代递。1898年春列名保国会。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曾与谭嗣同一起批驳守旧派曾廉请杀康有为的奏疏，但又经常依违于维新与守旧之间，处理政事尽量“无新旧畛域”，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刘光第：《与厚弟书》，《衷圣斋文集》）。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39岁。遗著有《衷圣斋文集》、《介文堂诗集》。

（房德邻）

义和团运动

(Yihetuan yundong)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发生在中国北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向中国大量输入资本的同时,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截止19世纪末,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达3300多人,发展教民80余万,帝国主义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由义和拳、八卦教、梅花拳、大刀会等不同源流的秘密结社,经过长期相互渗透和结合而成。参加者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无业游民。义和团基层组织是坛,又称坛口、坛厂或拳厂。坛是发号施令的领导机关,也是团聚群众、烧香拜神的场所。每一坛供奉许多神仙,诸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关圣帝君、唐僧、孙行者、猪八戒、张天师、黎山老母等等。首领称老师或大师兄、二师兄。坛的首领多少,则视坛口规模、人数多少而定。义和团的著名领袖人物有山东的朱红灯、心诚和尚,北京的李来中,天津的张德成、曹福田、黄莲圣母(林黑儿)等。练习拳棒,念咒降神,是义和团组织群众的主要方式。义和团组织十分分散,没有统一集中的领导。坛自成独立系统,负责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方面的事务。坛与坛之间,彼此平等,互不统属,各自决断。但也有一定联系,平时互相结拜,战时联合行动,“写帖约集起事”,共同战斗。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女子组成红灯照,大者十七八,小者十岁左右。成年妇女组成蓝灯照,老年妇女组成黑灯照,寡妇组成青灯照,都为数不多。红灯照是义和团妇女组织的总称。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213-1.bmp}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义和团在山东首先兴起,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期间,山东人民备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又首当其冲。1897年底,德国出兵山东胶州湾。次年,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同年英国强租威海卫,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其时外国教会势力,也无孔不入地深入山东各地。据统计,山东境内教堂达1100多处,传教士和教徒8万人,不少传教士窃取情报,霸占田产,包揽词讼,行凶杀人,并纵容教徒为非乡里。清政府的一些官吏站在帝国主义势力一边,“护教抑民”,以致“民冤不伸”。因此“反洋教”斗争就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末,山东“反洋教”斗争达到高潮。其口号是“扶清灭洋”,这一口号具有爱国反帝性质,同时也表现出落后的封建意识和笼统的排外情绪。1899年,朱红灯率领义和拳在山东西部和西北部的茌平、高唐、平原等地进行反洋教斗争,附近各县以及南部沂州等地纷起响应。起初,清政府下令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但毫无结果。1899年3月,清政府撤换镇压义和团不力的山东巡抚张汝梅,改派毓贤。毓贤在镇压义和团的军事行动遭到失败后,建议清廷招抚义和团。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各国极度不安。它们要求清政府严禁义和团的活动,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作山东巡抚。1899年12月,袁世凯带领他的“新建陆军”7000人到济南,疯狂地屠杀义和团和老百姓。

义和团受到袁世凯的压迫，离开山东北走。1900年初，其主力渐渐集中到直隶（今河北省）的天津、保定、通州一带，另一部分到了山西和东北。5、6月间，义和团已对天津、北京形成包围之势，从北京到天津、保定的铁路被拆断，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惊恐万状。北京各国公使要求清政府立即禁止义和团活动，但清政府已无力镇压义和团，只能采取欺骗和利用的手段。于是派大臣和义和团接洽，虚伪地宣布义和团是“义民”，使其合法化，同时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义和团进入北京和天津后，老百姓和清军许多士兵纷纷参加。北京城里设坛800多个，参加义和团的群众不下10万人，满街都是反帝的揭帖、“灭洋”的旗帜，“拳民”到处焚烧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把反洋教斗争推向全国。

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十分仇视和惧怕。各国驻华公使纷纷向本国政府告急，要求直接出兵镇压义和团。于是，英、美、俄、法、德、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从5月31日到6月2日，八国海军陆战队440余人，以“保护”使馆为名，先后自天津开抵北京。6月6日，一部分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在天津城外和义和团交火。6月10日，联军凑成约2000人，由英国侵华海军司令西摩尔统率，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但在廊坊附近遭到义和团以及爱国官兵的阻击，又狼狈逃回天津。另一支侵略军，在6月17日攻占了大沽炮台。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15日义和团开始攻打西什库教堂，20日开始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21日清廷发布宣战上谕，声称要与列强“一决雌雄”。但只隔4天，慈禧太后又偷偷地给出使各国大臣发电报，指使他们立即向各国政府作解释：她本想对“乱民”加以“剿灭”，只是怕操之过急，闯出大祸；并表白说她即使糊涂到极点，也没有胆量向各国宣战。她实际上是想向帝国主义求和，并借其力量消灭义和团。为此，她还派人带了水果、烟酒，到东交民巷使馆表示“慰问”。八国联军于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14日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光绪帝等仓皇逃往西安。9月间，侵略军继增援军，由德国元帅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任总司令，借口搜捕义和团继续扩大侵略。沙俄侵略军占了北塘、秦皇岛、山海关等地。10月，英、德、法、意四国侵略军由北京出发；另一支德、法侵略军由天津出发，向南进犯，侵占了保定、正定、井陘，进至山西境内。11月，德、意侵略军由北京出长城，侵犯宣化、张家口一带。八国总共出动兵力达10.5万人。与此同时，沙俄单独出兵10余万，侵占了东三省。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肆虐无度，“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军势力圈内，往来巡梭，足迹殆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圣教史略》第62页）1901年9月7日，英、俄、德、法、美、日、意、奥、比、荷、西等十一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通过该条约，外国侵略者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将清政府完全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决意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失败了，但是，它显示了中国人民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连瓦德西也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的国家，“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3册，第244页）义和团运动也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

者，进一步暴露它投降卖国、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加速了腐朽的清王朝的崩溃。

（梁义群）

朱红灯

(zhu Hongdeng ?—1899)义和团运动领袖。原名朱逢明。山东泗水人。家中贫穷，又遭水灾，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至长清县大李庄(今属齐河县)寄居其舅父刘亭水家。当时长清县也遇荒年，加之当地农民不堪忍受教会势力欺凌，自发组织学习拳棒，反抗外国教会的侵略。他也拜师学习“神拳”，并以为群众治病作掩护，到各乡宣传反洋教，组织群众，使义和拳的队伍迅速扩大。1898年6月，率领拳众攻打长清县徐家楼教堂，成为当地义和拳的重要首领。后因受地主“民团”压迫，于1899年春，率领部分拳民西渡黄河，转战茌平、高唐和平原一带。又与禹城义和拳重要首领心诚和尚(又名本明和尚，俗名杨照顾)联络，互为声援。于是，在几个月之中，便出现了860余庄设场练拳的大好形势。1899年10月，率领拳众1000余人至平原县杠子李庄，斗争了依仗教会、欺压人民的恶霸地主李金榜。李金榜向平原县衙诬告群众“闹教”，平原县令蒋楷派捕役和马队前往镇压。朱红灯率领拳众赶来，严惩了李金榜等十几家不法教民，阻击了蒋楷所率清军。蒋楷被部下掖在马上，狼狈逃窜。山东巡抚毓贤闻讯，急忙派济南知府卢昌治和统领袁世敦，率大队步骑分三路前来镇压。朱红灯在平原与恩县之间的森罗殿伏击清军，杀得清军官兵心惊胆颤，大败而逃。森罗殿大捷，极大地推动和鼓舞了山东各地义和拳斗争，使得鲁西北义和拳声威大振。此后，与本明和尚率义和拳众继续活动于禹城、长清、博平、茌平一带。1899年11月15日攻打茌平张庄教堂，拳众乘势放火，烧毁了教堂和洋楼洋房。毓贤派统领马金叙前来镇压，用计诱捕了朱红灯和本明和尚，查获了“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的计划文函，1899年12月24日，毓贤将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在济南杀害。

(梁义群)

八国联军

(baguo lianjun)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夏,英、俄、美、法、德、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镇压中国的义和团组成的侵华联军。从5月起,帝国主义各国分别从其在华军事基地、所属殖民地和国内抽调军队,陆续开到大沽、塘沽,并进入天津租界。6月初,由于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各国驻华公使共同议定,调各国军舰聚集大沽口,开始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共同发动侵华战争。6月中旬,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侵华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在廊坊受阻。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天津,在天津成立都统衙门,进行殖民统治。8月14日联军攻陷北京,在北京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并把北京分为各自的占领区,实行军事统治。9月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始建立统一指挥机构,总兵力最多时达12.8万多人。随后,英、德、法等国侵略军四处攻城略地,东占山海关,西犯娘子关,北攻张家口,南侵石家庄。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订立后,八国联军先后撤回回国,留下部分兵力常驻天津、津榆铁路线10多处战略要地。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15-1.bmp}

(梁义群)

荣禄

(Ronglu1836—1903)晚清大臣。瓜尔佳氏，字仲华。正白旗人。由荫生以主事用，数迁侍郎、兼内务府大臣、兼署步军统领、工部尚书、西安将军。中日甲午战起，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特设巡防局督理五城团防以卫皇室。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授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疏荐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为“新建陆军”。1898年6月“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权倾朝野，为慈禧太后所倚重。他反对维新，固执“祖宗之法不能变”，曾与慈禧太后密谋发动政变。“戊戌政变”后，为军机大臣受命掌兵部，节制北洋海陆各军。不久，奏设武卫军，以聂士成驻芦台为前军，董福祥驻蓟州为后军，宋庆驻山海关为左军，袁世凯驻小站为右军，而自募亲兵万人驻南苑为中军。1900年，策划立端王载漪子溥为大阿哥(即皇储)，谋废黜光绪帝。在义和团运动兴起时，他屡请镇压义和团，保护各国使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跟随慈禧太后仓皇逃往西安。1902年还京后，加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

(梁义群)

东南互保

(Dongnan hubao) 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英、美等帝国主义勾结清朝东南督抚，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协定。在中国北方各省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夏天进入高潮。英、美等国害怕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发展，危及它们在南方的既得利益。6月中旬，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霍必澜经本国政府同意后，向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分别提出保证：如果他们决心维持秩序，将会得到英国在华海军的支持。刘坤一、张之洞一向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并拒不执行清廷向列强宣战的命令，他们经过几度密商以后，同意霍必澜的建议。26日，他们向上海各国领事提出所谓《中外互保章程》，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双方“两不相扰。”（《官方文电》，《义和团》，第3册，第338页）各国领事十分赞赏，表示原则上同意他们提出的办法，但认为必须得到各国政府批准才能正式签字订约。张之洞等人到处张贴告示：“禁谣拿匪，敢有生事，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后来李鸿章、袁世凯等东南沿海督抚也陆续参加“互保”。这样，“东南互保”的地区，就从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进而扩大到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省，几乎占全国半数的省份。《中外互保章程》最后虽没有签字，但有关条款实际上是实行了。其结果是，限制和阻碍了中国广大地区群众反帝斗争的展开，便利了帝国主义集中力量进攻和屠杀义和团，也促成了清政府更迅速地向帝国主义投降。

（梁义群）

辛丑条约

(Xinchou tiaoyue)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农历辛丑年),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十一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扩大自己在中国的特权,抢占更多的地盘,彼此明争暗斗,争吵不休。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同意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以华治华”的政策,以使清政府彻底成为它们的傀儡。清政府更急于与列强达成和议,只要能保住自己统治地位,任何苛刻条件都愿接受。1900年12月24日,英国等11国组成的北京外交团,把《议和大纲》12条交给李鸿章,声称所有条件“无可更改”。李鸿章将大纲转给逃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她当即答应“全行照允”。并奴颜婢膝地公开宣布,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随后,各国在惩凶和赔款问题上,又进行长达9个月的争议,方根据《议和大纲》拟定出详细条款。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十一国公使在最后协议书上签字,条约共12款,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 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共计9.82亿两。 各国在北京划定使馆区,可在使馆区内驻兵,中国人不准在界区内居住。 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对所属境内发生的“伤害诸国人民”事件,必须立刻镇压,否则立即革职,永不叙用。 拆毁大沽炮台及亨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重要地区。 外国认为各个通商章程中应修之处或其他应办的通商事项,清政府概允商议,并改善北河及黄浦两水道。 清政府派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谢罪”,并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处建牌坊为志,对被杀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须用优荣之典”。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条约的订立,使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统治,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216-1.bmp}

(梁义群)

日俄战争

(Ri e zhanzheng) 1904—1905 年 (光绪三十至三十一年) 日本和沙俄为争夺远东殖民霸权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辛丑条约》签订后, 沙俄军队仍然盘踞在中国东北, 虽然经过中俄双方历时一年多的谈判, 沙俄迫于国际压力答应撤兵, 但仍蓄意破坏撤兵计划的执行。1903 年 8 月, 沙俄特设远东总督于旅顺, 管辖旅大租借地和中东铁路沿线, 并掌管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大权, 直接对沙皇负责, 这实际是兼并中国东北的信号。因此, 便与日本夺取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发生冲突。日本为排挤沙俄在中国和朝鲜的势力, 在英美等国支持下, 于 1904 年 2 月 8 日突然进攻沙俄在中国旅顺口的舰队, 日俄战争爆发。日俄战争分海战和陆战两个战场。海战主要集中在旅顺口及其附近的海面上进行; 陆战主要集中在旅顺、辽阳、奉天进行。5 月, 日本侵略军从辽东半岛登陆。1905 年 1 月, 日本海军攻占了战略要地旅顺口, 取得了制海权, 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3 月, 陆战分别在辽阳、奉天进行。在奉天战役中, 日俄双方总共投入了 60 多万人兵力, 结果沙俄陆军被日本击败。沙俄从欧洲调来波罗的海舰队, 企图挽回败局, 救援旅顺口, 结果于 5 月底又在对马海峡遭到日本的袭击, 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当日俄在战场上厮杀得精疲力尽时, 美国乘机出面“调停”。最后, 日俄双方于 1905 年 9 月 5 日, 在美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主要内容是: 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特殊权益。俄国把从中国霸占去的库页岛南部 (北纬 50 度以南) 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割让给日本, 俄国将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口 (即所谓的南满铁路) 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12 月, 日本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 清政府承认日本继承沙俄从中国攫取的长春以南的全部权利外, 还同意增开凤凰城、辽阳、长春等 16 处为商埠; 在营口、安东 (今丹东)、沈阳等城市划定日本租界; 并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木材和经营安奉铁路。从此, 沙俄继续霸占中国东北北部, 南部则沦为日本势力范围。在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不顾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 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 竟然无耻地宣布“局外中立”, 并将辽河以东地区划为“交战區”, 听任侵略军的蹂躪。由此, 清朝统治者的媚外卖国的反动本质已暴露无遗, 引起了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

(梁义群)

辛亥革命

(Xinhai geming) 1911年(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日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腐败的清政府成为侵略者的走狗,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为了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担负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历史任务,而最迫切的任务是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于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领导的。1894年(光绪二十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同年秋,孙中山怀着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远大抱负,到檀香山华侨中宣传革命,创建革命小团体兴中会。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它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选择了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正确道路。次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它先后筹划和发动了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和1899年10月广东惠州(今惠阳)三洲田起义,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特别是发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和1903年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拒俄运动”以后,清政府充当帝国主义驯服工具的面貌暴露无遗,许多人丢掉了对它的幻想,转向革命。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革命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1904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的华兴会和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几个革命团体的代表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一次联合会议。会议由孙中山主持,讨论决定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后来孙中山进一步把它阐发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通常称为“三民主义”。从此,中国有了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它的领导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同盟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思想斗争和武装斗争,出现了“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孙中山语)的生动局面。在思想斗争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主要阵地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激烈的论战。革命派坚持暴力革命立场,反对非暴力的改良主义立场;坚持实行共和制度,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坚持平均地权,反对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经过论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人们从改良主义的束缚下摆脱出来。在武装斗争方面,从1905年以后,革命党人纷纷归国,联络会党,运动新军,组织各种革命力量,领导了萍浏醴起义(1906年12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6月)、钦廉防城起义(1907年9月)、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1907年12月)、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3月)、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4月)、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2月)和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相呼应,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长沙抢米风潮、山东莱阳抗捐运动、抵制外货运动、保路运动等。人民群众的斗争使统治阶级惶恐地惊呼:“民气之悍,民心之愤,已成危象!”说明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

风暴就要来临。

武昌起义就是在保路运动的高潮中爆发的。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把已经由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铁路修筑权为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借款，这激起了川鄂湘粤人民的反对。四川有数十万人参加保路同志会，举行大规模请愿，遭到血腥镇压。同盟会员乘机将保路运动引向武装起义。为了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清政府派川汉铁路大臣端方从湖北率新军入川。文学社和共进会湖北分会及时决定在武昌起义。文学社是湖北革命党人的革命团体，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10月10日晚7时，共进会会员、工程营士兵熊秉坤率队起义，首先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接着汇集闻风举义的各营队和军校学生，往攻总督衙门。11日天明，起义官兵占领武昌，建立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胜利后，全国各省闻风响应，不到两个月，就有14个省先后宣布独立。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国。29日已经独立的17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南京临时政府在存在的3个月中，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法令和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创立的中华民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它未能巩固革命的成果。革命果实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取。袁在武昌起义之后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利用手中掌握的北洋军，对革命派施行又打又拉的策略，逼迫革命派屈服。经过南北会谈，在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孙中山于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离任，南京临时政府夭折，辛亥革命失败。

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者具有他们自己克服不了的弱点的原故，是由于中国广大下层群众——主要是农民的革命力量得不到正确和坚强的领导，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的原故。因此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7页）。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最终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开辟了新的前进道路。

（房德邻）

孙中山

(Sun zhongshan 1866—1925)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在日本时化名中山樵，后以中山为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0岁入塾读书。1878年随母亲到檀香山，住在哥哥孙眉家中，先后进英、美教会办的学校读书，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教育。1884年到香港求学。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学医。次年转学香港西医书院。先后结识陈少白、杨鹤龄、尤列，经常聚谈，放言反清，被称作“四大寇”。1892年毕业后，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结交同志，酝酿反清。1894年春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建议，遭到拒绝。10月赴檀香山，创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革命主张。次年赴香港，与辅仁文社的杨衢云等联络，成立兴中会总部。准备在秋天于广州发动起义，事泄失败，逃往日本，在横滨设兴中会分会。后赴美英等国考察。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羸囚在使馆，幸经康德黎等营救脱险，留居伦敦，研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接触到社会主义运动和有关学说。1897年秋重到日本。广泛结识日本朝野人士，争取他们支持中国革命。次年秋和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谈判合作，因康、梁坚持改良主义立场，未能成功。1900年10月组织惠州（今惠阳）三洲田起义，失败后又远涉重洋，四处奔走。先后到日本、越南、檀香山、美洲、欧洲，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宣传革命，组织队伍。并同改良派展开论战，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2页）坚持共和革命。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和黄兴、宋教仁等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反清团体和革命分子，组成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通过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0月26日《民报》创刊，为撰发刊词，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是更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此后，一方面领导与改良派论战，一方面发动武装起义。论战获得了巨大胜利，使许多人摆脱改良派的影响，转向革命；起义接连受挫，从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到1911年（宣统三年）4月黄花岗之役，先后8次起义全部失败。武昌起义后，于12月25日从欧洲回到上海，29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组织临时政府。3个月中，颁布30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令，并在3月11日公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由于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和革命党人的妥协，被迫于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袁世凯以自代。4月1日，正式解职。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理事长。9月接受袁世凯任命，任全国铁路督办，计划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1913年2月赴日本考察铁路，筹办借款。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主张武力倒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次年7月，鉴于国民党涣散，另组中华革命党，被举为总理，准备“再举革命”。党员最多时近500人。1916年5月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表讨袁宣言。袁世凯死后，为反对段祺瑞废弃《临时约法》而斗争。1917年8月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护法军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揭起“护法”旗号。次年，因受桂系军阀排挤，被迫于5

月向国会非常会议辞职，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此后寓居上海，继续撰著《建国方略》，1919年完成。1918年5月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表示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次年，指派廖仲恺，朱执信等在上海创办《建设》和《星期评论》杂志，宣传新文化。10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1920年命粤军逐走桂军，重返广州。次年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任非常大总统，筹划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仓促脱险，于8月回到上海。此后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思想发生极大变化，决心改组国民党。1923年2月在驱逐陈炯明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并邀请苏联的政治及军事顾问到广州，帮助中国革命。11月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确定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宣言，确认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6月在广州开办黄埔军校，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训练军事干部。积极组织东征军和北伐军。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1月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商讨国是。行前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年底到达北京，同段祺瑞政府进行坚决斗争，决定国民党不参加段将要召集的军阀分赃的“善后会议”，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因积劳病剧，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其《遗嘱》号召“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著作有《中山全书》或《总理全集》多种，1981年起陆续出版《孙中山全集》。

（房德邻）

兴中会

(Xingzhonghui) 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在20多人参加的成立会上通过《兴中会章程》，在秘密入会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任务。发展会员共计126人(一说130余人)，多为华侨资产阶级，也有工人、会党分子和知识分子。次年，孙中山抵达香港，和旧友陈少白、陆皓东以及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纘泰等商议，决定成立香港兴中会总会，推举黄咏商为会长。总会机关对外以“乾亨行”的名号为掩护。同年秋，筹划广州起义，事泄，陆皓东等被捕牺牲，孙中山、陈少白等逃亡日本。1899年孙中山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次年出版，宣传反清革命。10月，郑士良在杨衢云、陈少白等支持下在惠州(今广东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失败。兴中会先后在横滨、长崎、台湾、河内、旧金山以及南非洲等地成立分会，在华侨中发展组织。1905年与华兴会等组成中国同盟会。

(房德邻)

章太炎

(zhang Taiyan 1869—1936)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政治家、学者。初名乘，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本名绛）和黄宗羲（字太冲）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后以号行于世。浙江余杭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代从外祖父和父亲习诵儒家经典。1890年（光绪十六年）入杭州诂经精舍，从朴学大师俞樾学习经史。1895年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为挽救民族危机，投身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中，寄费报名加入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1897年赴上海，任《时务报》撰述，宣传改良思想。但他尊信古文经学，不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倡的今文经学和孔教，常与梁启超、麦孟华等发生争执。后愤而离开《时务报》馆，往返于沪杭间，参与《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笔政。次年春到武昌，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筹办《正学报》，因政见不合被逐。遂赴上海，主持《昌言报》。9月戊戌政变发生，遭到通缉，被迫避地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发表诗文多篇，抨击慈禧太后等封建顽固派。次年，编订论文集《榘书》。夏，赴日本，结识孙中山。秋，返回上海，编《东亚时报》。1900年7月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国会，因反对其既“排满”又“勤王”的矛盾主张，当场剪辫示绝。此后大倡排满革命。1902年春再度逃亡日本，与孙中山订交。又与秦力山等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大会宣言，号召推翻清朝。1903年春应蔡元培邀请赴上海，担任“爱国学社”教员。6月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康有为的“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改良主义观点，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湫小丑，未辨菽麦”，传诵一时，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誉之为“义师先声”。《序 革命军*海《苏报》发表，引发“《苏报》案”，遂被捕入狱。1904年蔡元培利用探监机会与之商定成立光复会。1906年6月刑满出狱，赴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编，与改良派论战，使革命思想广泛传播。1908年10月《民报》被日本政府查禁后，居东京讲学和著述，撰有《文始》、《小学答问》、《方言》、《国故论衡》等。其时，因与孙中山在武装起义地点的选择、《民报》经费和《民报》续办等问题上有分歧，于1909年（宣统元年）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次年1月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名统一党，5月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任副理事长。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并受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1912年冬任东三省筹边使。次年4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毅然投入反袁行列，遭到袁世凯软禁。在3年软禁期间，严拒袁世凯的拉拢收买，两次出逃，两番绝食，并曾以袁世凯亲授的大勋章作扇坠，诣总统府之门，大骂袁包藏祸心。袁死后获释。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秘书长。五四运动后渐入颓唐，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救国。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致电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同年在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1936年6月14日因气喘病逝。著作结集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等。近年出版有《章太炎全集》。

（房德邻）

邹容

(Zou Rong 1885—1905)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一作威丹）。四川巴县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在重庆从日本人学习英语、日语，开始阅读宣传“新学”的书报。时值戊戌变法，非常同情维新派，尤其敬佩因变法失败被杀的志士谭嗣同，曾写诗悼念并自勉：“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列传·邹容列传》）1901年夏在成都考取官费留日生，临出国前，四川总督奎俊冠以“聪颖而不端谨”的罪名，被取消官费资格。1902年自费赴日本留学，进东京同文书院。大量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历史著作，吸收民主思想，并积极参加留学生爱国运动。1903年春节，在东京留学生团拜会上发表激昂演说，号召推翻清朝统治。3月偕同几个留学生痛殴破坏革命运动、生活腐化堕落的留学生监督姚文甫，并剪其发辫悬于留学生会馆示众。事后，为躲避姚的报复，返回上海，入“爱国学社”。4月底先后参加在张园举行的拒法大会和拒俄大会，发表演讲，反对外国侵略。撰成在日本就已起稿的《革命军》，“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呐喊。章太炎为之作序，誉之为“义师先声”。出版后不胫而走，销售达110万册，对鼓动清末革命运动的高涨起了极大作用。上海《苏报》连续发表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及鼓吹革命的文字，遂有“《苏报》案”发生。他在得知章太炎被捕的消息后，到巡捕房投案，被英租界会审公廨判刑2年。1905年4月在离刑满只有两个多月时病逝，时年20岁。后人评价他说：“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吴玉章：《纪念邹容烈士诗》，《辛亥革命》插页）

（房德邻）

革命军

(Gemingjun) 书名。邹容著。1903年5月(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上海大同书局刊行。1册,2万余字。作者以浅近通俗的语言,揭露和抨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和黑暗,论证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全书以“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口号结尾。刊行后,受到热烈欢迎,风行海内外,销量达110万册。鲁迅先生评价它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全集》第1卷,第31页)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房德邻)

陈天华

(Chen Tianhua 1875—1905)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字星台、过庭，号思黄。湖南新化人。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4月参加“拒俄义勇队”，自荐为“运动员”，准备回国策动武装起义。从初夏至仲秋，撰写《猛回头》、《警世钟》，以通俗的语言号召国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影响广大。12月返抵湖南长沙，策动反清革命。1904年2月和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发动起义，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参与中国同盟会创建工作，为《会章》起草人之一，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撰述员。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中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留下《绝命辞》万余言，勉励留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时年30岁。遗著编为《陈天华集》。

（房德邻）

黄兴

(Huang xing 1874—1916)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原名轸，字廛午，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中秀才。1898年就读武昌两湖书院，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1900年策动清军中湘籍军人支持自立军起事。1902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并留意兵操射击等各种军事知识。与杨笃生、樊锥等创办《游学译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宣传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次年参加拒俄义勇队(旋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充任“运动员”，回两湖地区策动起义。1904年2月和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为会长。决定联络会党，举行起义，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8月和孙中山等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参加起草会章，为执行部庶务(协理)，负责主持本部工作。和孙中山、章太炎一起制订《革命方略》，作为指导党人在内地发动武装起义的纲领性文件。1907—1911年间，指挥或参与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广州黄花岗之役。1911年8月复信同盟会中部总部负责人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表示赞成他们准备在武汉发动起义的计划。武昌起义爆发后，从香港抵上海，与宋教仁、柏文蔚等商讨光复南京的部署。旋赴武昌，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率民军在汉阳前线同清军奋战20余日。10月31日汉阳失陷后，主张暂时放弃武昌，转攻南京，遭到武昌地区革命党人反对，遂辞职赴上海，被留沪独立各省代表先后选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副元帅，未到任，虚位以待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在南北议和中，赞成袁世凯在同意共和的条件下当选总统。临时政府北迁后，任南京留守府留守，主持南方军队的整编事宜。认为南北既已统一，无须保留大批军队，又因军饷无着，军队哗变，遂大量裁遣。6月14日留守府自行撤销。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推举为理事。12月就任袁世凯委派的汉粤川铁路督办。因发现袁世凯并无诚意，遂辞职赴沪闲居。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一度主张法律倒袁。7月“二次革命”爆发，即赴南京，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逃往日本。在总结“二次革命”教训时，与孙中山发生分歧，拒绝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14年6月底离日赴美。其时，一部分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国民党人组成欧事研究会，他也列名其间，并隐为会首。1915年秋，接到蔡锷将赴西南发难讨袁的密信后，先后命长子黄一欧、秘书石陶钧及张继回国，参与讨袁活动，并亲自在美国为护国战争积极募饷。1916年5月9日由美赴日，当天致电袁世凯，促其悔罪引退。袁世凯死后，7月回到上海，与孙中山和好，共同致力于讨袁善后，推进民主革命。10月31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42岁。遗著编为《黄兴集》。

(房德邻)

华兴会

(Huaxinghui)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 5 月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黄兴从日本回国,进行革命活动。11 月 4 日他以庆祝自己 30 岁生日为名,邀集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取名华兴会。1904 年 2 月 15 日正式成立。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为副会长。会员达数百人,多属知识分子。宗旨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方略为湖南发难,各省响应,“直捣幽燕”。对外以华兴公司、东文讲习所、作民译社和黄汉会为掩护。又与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联合,成立同仇会,联络会党。准备在 11 月 16 日(农历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 70 寿辰时发动起义,未发事泄。署湖南巡抚陆元鼎下令搜捕,黄兴、宋教仁等逃往日本。次年与兴中会、光复会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

(房德邻)

光复会

(Guangfuhui)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904年(光绪三十年)11月在上海成立。基础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发起人有龚宝铨、蔡元培、章太炎。蔡元培为会长，实际领导人为后来加入的陶成章。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暗杀和暴动。会员有272人(一说560余人)，多为知识分子、会党、商人，也有少数工匠和士绅。1905年部分成员加入同盟会，未加入者仍以光复会的名义活动。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失败被杀。15日，准备与之配合的秋瑾在绍兴遇害。1908年11月熊成基在安庆率新军起义，失败。光复会在国内的活动暂告停止。同年，本已加入同盟会的陶成章因与孙中山等发生矛盾，复以光复会的名义去南洋募款。1910年(宣统二年)又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章太炎、陶成章任正副会长，正式与同盟会分裂。在南洋各埠设立分会，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1911年武昌起义，光复军在汕头、浙江、上海、苏州、镇江等处响应。1912年1月3日章太炎在上海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14日陶成章被刺杀，光复会自行解体。

(房德邻)

同盟会

(Tongmenghui) 即中国同盟会。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20 世纪初，民主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要求将分散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革命政党。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7 月，在孙中山的倡议和黄兴、宋教仁等支持推动下，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组织的代表 70 多人，于 30 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宗旨。8 月 20 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 300 多人，来自 14 省籍。大会一致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通过了黄兴的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旧三民主义。同盟会章程规定，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按三权分立的原则，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由总理直接管辖，下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六科中以庶务科最为重要，如总理不在本部，即由庶务科干事代行其职权。第一任庶务总干事由黄兴担任，辅佐总理主持总部工作。相继接任或代理庶务总干事的有张继、章炳麟、孙毓筠、宋教仁、刘揆一等，其中以刘揆一任期最久。评议部设评议长一人、评议员数人，评议长为汪兆铭。司法部设判事长、判事和检事长，判事长为邓家彦，判事为张继、何天瀚，检事长为宋教仁。事实上，评议、司法两部从未独立行使主权，主要由执行部主持本部工作。同盟会章程还规定，国内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实际上只设了两个支部，即设于香港的南方支部和设于上海的中部支部。国外设四个支部，即南洋支部、欧洲支部、美洲支部、檀岛支部。支部之下设立分会。

国内各省区分会，先后推定黄兴、宋教仁、秋瑾、蔡元培、廖仲恺等为各省区的主盟人。中国同盟会主要成员来自农、工、商各阶层，以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多数。不到一年，会员发展到万余人。为了使各地革命党人共同遵循革命方针、政策，1906 年秋冬间，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等，共同制定了《军政府宣言》、《略地规划》、《对外宣言》等八个正式文件，发往各地同盟会组织。经过几年的努力，同盟会的分支机构，遍及于两广、闽浙、云贵川、两湖、江苏、江西、安徽、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直隶、京津、港澳，以及海外新加坡、马来亚、荷印、越南、暹罗、缅甸、菲律宾、澳大利亚、檀香山、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墨西哥等地。此外，还在欧美和南洋许多地区，设有通讯处。自 1906 年起，同盟会还组织革命派，同改良派展开思想大论战，并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直至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掀起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本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由秘密转为公开。1912 年元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本部又迁至南京。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本部再迁至北京。同盟会总理仍由孙中山担任，并选黎元洪为协理。其宗旨将三民主义改为一民主义即民生主义。8 月，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党、共和实进会，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21-1.bmp}

（梁义群）

三民主义

(Sanminzhuyi) 孙中山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是中国同盟会的纲领，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誓词，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提出较早，宣传得最广泛。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2月，孙中山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兴中会入会誓词。1903年以后，他再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民族主义纲领。其基本思想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满洲贵族的反动统治，解除民族压迫，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民族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在1906年秋冬间，在其《军政府宣言》中对他提出的民族主义纲领解释说：“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又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人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页）同年12月，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更进一步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4—325页）民权主义是同盟会政治纲领的核心。从兴中会提出的“创立合众政府”，到同盟会明确提出的“创立民国”，都属于民权主义范畴。民权主义的内容，在《军政府宣言》中说：“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906年12月，孙中山对民权主义作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至于着手的时候，却是同民族革命并行。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学说，列宁曾给予高度赞扬，认为“它到处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424页）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即“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原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页）孙中山在欧美考察期间看到，资本主义越发达，两极分化越严重，因而引起社会革命。他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为了使中国象欧美国家那样发达，又不致出现象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弊病，避免发生社会革命，他参照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理论，根据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特点，提出了“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的

主张。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称为社会主义。但这是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列宁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或“主观社会主义”。实行“平均地权”不但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反而大大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所以列宁说，“平均地权”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在当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的严重缺点在于：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口号，甚至对帝国主义和汉族封建势力心存幻想。所以，它是个不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关于新三民主义参见《新三民主义》条）

（梁义群）

民报

(Minbao) 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其前身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址设在同盟会的总部机关所在地——东京牛 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署名“群智学社”)。原定月刊，因经常脱期，遂改为不定期出版，先后共出版26期。分论说、时评、译丛、纪事、撰录等栏目。多数稿件由本社成员撰写或编译。先后署名为《民报》的“编辑人兼发行人”的有张继、章炳麟(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4人。其中张继和陶成章是出于需要而挂名的，《民报》的实际主编是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汪东、刘师培也曾代编过几期。除主编外，经常为《民报》撰稿的有朱执信、廖仲恺、陈天华、宋教仁、黄侃等。《民报》以宣传同盟会纲领为宗旨，孙中山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简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同时，《民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阵地，还与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等进行论战。它的出版，对扩大同盟会的政治影响，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促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很大贡献。1908年10月出至24期时，被日本政府查封。1910年初，在日本秘密印刷两期后即停刊。

(梁义群)

新民丛报

(Xinmincongbao)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为半月刊,共出版96期。主编梁启超,撰稿人主要有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等。分图画、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中国近事、海外汇报、教育、小说等栏目。初期着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宣传变法维新,鼓吹君主立宪。并力倡“民族主义”,激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加之,文章新颖,语言明快,文笔犀利,在这个时期深受读者欢迎,销量日增。但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喉舌的《新民丛报》,却坚持立宪保皇的政治立场,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连篇累牍地发表鼓吹改良、反对革命的文章。1906年4月,《民报》第3号便以号外形式,发布了《民报*了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原则分歧,就革命与保皇、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土地国有’等问题展开论战。从而廓清了改良派散布的谬论,彻底揭露其保皇派的丑恶嘴脸,使民主革命逐渐深入人心。《新民丛报》遂于1907年停刊。

(梁义群)

徐锡麟

(Xu Xilin 1873—1907)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生在一个田有百亩的富庶之家。自幼厌读经制艺,爱算术、天文。1893年(光绪十九年)中秀才,但无意仕路,转事教育。1901年被举为绍兴府学堂算学讲师,后升副监督。1903年赴日本参观博览会,大开眼界,深感复兴祖国的迫切性,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各项爱国政治活动,为营救宣传反清而入狱的章太炎,慷慨捐金。亲睹留日学生为开展拒俄运动而勇敢献身的精神,极受感动,从而立下反满革命的志愿。归国后在家乡创办热诚蒙学,提倡军训,创设书局,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05年,到上海访蔡元培和陶成章,加入光复会。接受陶成章密示,回浙江广泛联络各州县会党,在绍兴创体育会和大通师范学堂,招青年数百人和会党头目来校受兵操训练,借此积蓄革命力量。1906年两次赴日欲学军事或警政,但均因近视被拒。为谋从内部倾覆清政府,是年捐得道员,分发安庆,且取得安徽巡抚恩铭信任,受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暗中联络新军及各地会党,并与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约定,于1907年7月6日在皖、浙两地同时举义。是日为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期,当巡抚恩铭率三司道府各官员与会之机,徐锡麟突起枪击恩铭,急率部分学生攻占军械局,与清军激战四小时失败被俘。在审讯时,他浩然正气,在供词上写下掷地有声的革命宣言。当晚,穷凶极恶的敌人将他剖腹剜心杀害于安庆抚署东门前。

(梁义群)

秋瑾

(Qiu Jin 1877—1907)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女革命家。字璿卿。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因祖父曾在福建三霄厅、厦门海防厅任同知,她的童年是在厦门度过的。厦门是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受外国殖民主义势力侵扰最为深重,因而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对“红毛人”的仇恨。由于家长的鼓励,和自己的聪敏、勤奋,很小就能吟诗填词写文章,受到史书上古代英雄事迹的深刻感染,又从师习武,学会骑马击剑,用别号“竞雄”、“鉴湖女侠”明志。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依父母之命嫁给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1902年随捐得户部主事的丈夫进京。次年结识了颇负文名的革新派人物吴芝瑛(系“桐城派”吴汝纶之侄女)。吴的丈夫廉泉,曾开设“开明书局”,家中藏有许多宣传维新的书刊。秋瑾有机会接触新书新报,思想大为开阔。从此决心与不称心的家庭决裂。1904年秋东渡日本留学,加入到留日爱国青年的革命斗争活动中去。1905年春,为了筹措留学经费,返回祖国。不久,结识了蔡元培、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又通过陶成章结识了不少浙江的会党首领。夏天,在日本校方催促之下再次东渡。加入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兼任浙江支部负责人,成为留日中国学生中传奇式的女杰。1906年秋,因不堪忍受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压迫,返回祖国。一方面在吴县浔溪女校任教,传播民主思想,发展同盟会员;另一方面在浙江发动会党,组织义军,筹备武装起义。这年冬天,与徐锡麟、王金发等秘密议商,决定在浙、皖两地举行武装起义。徐锡麟去安庆活动,她返回山阴,担任徐锡麟、陶成章创办的大通学堂督办。对学员加以训练后,组成了一支以会党为骨干的“光复军”。“光复军”原定于1907年7月6日起义,但由于一些州县义军首领擅自行动或泄密,打乱了起义部署。在7月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失败后,清政府探知她是徐锡麟的同党,又是浙江会党的主谋人,迅速派兵到山阴镇压。在紧急关头,大通学堂师生建议提前起义,但她考虑到革命力量太弱,劝阻同志不要硬拼。7月13日,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经过一场枪战,被俘。面对敌人严刑拷问,坚贞不屈,提笔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表达对起义失败的无限惋惜。1907年7月15日凌晨,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年仅29岁。

(梁义群)

预备立宪

(Yubei lixian) 清政府在 20 世纪初年为抵制资产阶级革命而搞的欺骗性的立宪活动。1901 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完全确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地位，不仅使中国经济生活更加败坏，而且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更加孤立，成为国内各阶级和阶层的众矢之的。清政府妄图摆脱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求得帝国主义列强的重新支持，乔装打扮，曾推行“新政”。但是，20 世纪初，由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毫不触及君主专制政体的“新政”，为社会舆论所讥讽，很快陷于破产，完全失去了欺骗作用。为了稳定其反动统治，清朝统治集团，又上演了一出所谓“预备立宪”的丑剧。这幕丑剧是从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秋天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开始的。7 月，清廷发布谕旨，派满族贵族载泽为首的五大臣，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为将来实行立宪作准备。五大臣出洋分成两伙，载泽、徐世昌、绍英为一伙，赴英、法、日、比诸国；戴鸿慈、端方为一伙，赴美、德、意、奥诸国。1905 年 9 月 24 日，五大臣到北京正阳门车站离京启行。但在上火车时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炸弹的袭击，吴樾当场牺牲，载泽、绍英受轻伤，五大臣惊慌失措，未能如期启行。后改由李盛铎、尚其享顶替徐世昌、绍英，仍为五人，分两伙于 12 月 11 日启行。五大臣在国外逛了半年多，于 1906 年夏秋之交先后回国（李盛铎留任驻比利时公使未回），上朝复命，向慈禧和光绪帝奏请立宪。载泽所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说：“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又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宪政初纲》，《奏议》，第 4—7 页）这个密折，迎合了慈禧的意图，1906 年 9 月 1 日，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行宪政，当务之急是改革官制，然后制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好预备立宪准备，“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光绪朝东华录》，总 5563—5564 页）“仿行宪政”实际上变成了一纸永远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10 月，清廷又发出京朝官制改革的上谕，其方案是：除军机处和徒有虚名的内阁仍旧外，增设几个部和更易几个部的名称，计有 11 个部。1907 年下令将原来设立的“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负责“办理宪政一切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各事项”。不久又下令筹设“资政院”，作为将来“议院之基础”。1908 年，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选举章程”，命各省设立咨议局。同年 8 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 条，规定了起草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有 14 条，并规定“预备立宪”从 1908 年起 9 年完成。这个大纲公布不久，光绪帝和慈禧相继死去。溥仪继位，因其年仅 3 岁，由其父载沣监国摄政。1909 年 1 月，载沣罢斥了汉族官僚袁世凯，自封为代理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并任命他的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分别为海军大臣和军咨大臣，集军政大权于皇族之手。1909 年 10 月，各省“咨议局”成立。次年 9 月，“资政院”成立。清廷宣布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为 5 年，定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在国会未召开之前，先行设立责任内阁。1911 年 5 月 8 日，清廷裁撤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任命内阁各大臣如

下：

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宗室）、协理那桐（满）、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部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理、协理和各部大臣 13 人当中，满族贵族 9 人，汉族官僚仅 4 人；而 9 个满族贵族中，皇族又占 7 个。如与过去各部尚书满汉各半的规定相比，汉族反而大大减少。在整个清朝统治的 260 多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象这样多的皇族和贵族专权擅政的现象。所以，当时人们把这个所谓“责任内阁”，讽之为“皇族内阁”。清廷的“预备立宪”丑剧，不仅没有达到抵制革命、巩固其专制统治的目的，反而更加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增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对它的怨恨和汉族官僚对它的离心，使自己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11 月，清廷又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但已无法挽救它灭亡的命运。

（梁义群）

载沣

(Zai feng 1883—1951) 清宣统朝摄政王。字亦云。满族。爱新觉罗氏。袭封醇亲王。光绪皇帝之弟，宣统皇帝生父。曾任正白旗汉军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军机大臣等职。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被派充头等专使，赴德为其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请罪”。1908年11月中旬，西太后和光绪帝病死。西太后在垂危之际安排由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年号宣统。他为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时年27岁，属于志大才疏的纨绔贵少之流。对袁世凯势力日渐膨胀，愤嫉已久。为迅速把军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在善耆、载泽等怂恿下，起意杀袁。但又生性怯懦，惧怕袁有内外奥援，不敢贸然从事。为了取得元老重臣支持，以袁瞒着他与美国谈判互派大使为口实，与奕劻、张之洞密商杀袁，遭到奕劻、张之洞反对。虽不敢蛮干，但又不甘心，决意要将袁从朝廷中排除出去。于是，在1909年1月2日，传圣旨，以袁有“足疾”为由，勒令“开缺回籍养疴”。设禁卫军，自命海陆军大元帅，任命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分别为海军大臣和军咨大臣，集军政大权于皇族之手。进而继续玩弄“预备立宪”骗局，于1909年10月，宣布成立各省咨议局，次年又成立资政院，并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5月8日宣布组成责任内阁，在内阁总理、协理和各部大臣13人中，满族贵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官僚仅4人，所以被讽为“皇族内阁”。从而更加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使其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1911年5月9日，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任用大买办盛宣怀，以铁路国有为名出卖路权，大借外债，导致涉及南方数省的“铁路风潮”的形成，直接促成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12月，他被迫辞职。1928年迁居天津，后曾去东北。1951年病死。

(梁义群)

国会请愿活动

(guohui qingyuan huodong)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9月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得到资产阶级上层和一些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拥护。这些人被称为立宪派。立宪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他们分别组织立宪团体，康有为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组织“政闻社”，张謇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等等。他们想通过全国规模的立宪运动，促成早日立宪，以便他们分享政权，并抵制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从1907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纷纷上书清廷，请求速开国会。1908年夏，江浙的“预备立宪公会”发动了一次立宪请愿运动，约集湘、鄂、粤、豫、皖、直、鲁、晋、川、黔等省立宪团体各派代表齐集北京，上书清廷，请求速开国会。上书虽未上达，却促使立宪运动进一步发展，上书请愿的人越来越多。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9年为“预备立宪”期限。立宪派对此不满，认为9年时间太长，酝酿进一步上书请愿。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监国摄政王载沣罢斥了出卖维新派的袁世凯，立宪派误认为这是载沣为光绪帝报仇，要继行光绪帝未竟之志，便加紧从事请愿运动。1909年(宣统元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要求各派代表3人，齐集上海，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请求清廷“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1910年1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发动了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请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结果被清廷拒绝，请愿失败。6月，“国会请愿同志会”联合各商会，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号称20余万人，结果又遭失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立宪派并不甘心两次请愿的失败；他们利用“资政院”成立的有利条件，于10月发动了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请求速开国会。与此同时，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共有18个总督、巡抚、将军、都统联名奏请清廷立即设立内阁，明年召开国会。迫于当时革命形势的高涨和立宪派等再三请愿的压力，清廷被迫表面作出让步，决定“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缩短为5年，宣统五年(1913)设立国会。在国会未设以前，先行设立责任内阁。江浙立宪派人较为满足，退出了立宪运动。但是，另一部分立宪派仍然觉得期限过长，要求明年召开国会，继续进行请愿。清廷看到立宪派已经分化，并认为缩短为5年已经是对立宪派的宽容，便下令遣散请愿代表，将东三省到京请愿的代表押解回籍，将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发配新疆充军。从此，立宪派宣告各请愿代表团解散，开始对清廷失望。1911年5月“皇族内阁”公布后，全国为之哗然，立宪派人非常气愤，立即发表《宣告全国书》，说清廷“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他们一方面继续上书，要求撤销“皇族内阁”，并要续行请愿；另一方面筹组政党，准备在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时，夺取国会议席，参与政府权力的重新分配。他们成立的宪政党有“宪友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政学会”等。其中“宪友会”势力最大，它于1911年7月以“国会请愿同志会”为基础而组成，总部设在北京，各省设有支部，如直隶的孙洪伊，湖北的汤化龙、胡瑞霖，江苏的沈恩孚、黄炎培，山西的梁善济，奉天的袁金铠，江西的谢远涵、黄为基，湖南的谭

延闾，福建的刘崇佑、林长民，四川的蒲殿俊、罗伦等，都是该会各支部的领袖。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宪友会”开始分化，一部分立宪派人在革命势力影响下逐渐转向革命，多数则对清廷越来越离心，观望形势，等待时机，为自身的利益和前途作应变的准备。国会请愿运动告终，但辛亥革命后立宪派仍很活跃，是民国初年重要的政治力量。

（梁义群）

黄花岗起义

(Huanghuagang qiyi)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前夕由同盟会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即辛亥广州起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西南边境的六次起义,以及1910年春的广州新军起义,先后都失败了。1910年11月,孙中山到达马来亚北部檳榔嶼(即庇能),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以及南洋和国内东南各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部署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的工作。当时革命党人,因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而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鼓舞大家说:“一败何足馁”,号召“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出财”,积极作好起义准备工作。因有人告密,孙中山被南洋英殖民当局勒令离境,只好再度远涉重洋,去美洲募款购置军械,把领导广州起义的重任委托给黄兴、赵声等人。1911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决定占领广州后,由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由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由谭人凤、焦达峰等率兵响应。然后各军会师南京,即行北伐。随后,一面发动广州新军、防营、巡警及当地会党参加起义,一面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组成一支800人的敢死队,预定4月13日起义。不料在4月8日,同盟会会员温生才单独行动,枪杀了清朝署理广州将军孚琦。广州全城戒严,形势紧张,起义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人数大减。黄兴潜入广州,临时将原定十路进兵的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集中力量攻打总督署,其他三路分别由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负责,并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到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前,黄兴、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员写了绝命书,表示誓死疆场的革命决心。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领200人的敢死队,攻入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闻讯逃走。黄兴放火烧毁督署后,乃分兵攻袭督练公所等处,与敌人发生激烈的遭遇战,一夜之间杀死清军甚多。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起义发动后未率部响应,致使黄兴所率的队伍孤军作战,多数战死,其中著名的有林时爽、方声洞等。喻培伦、林觉民受伤被俘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英勇就义。黄兴,朱执信等少数人受伤后化装逃脱。事后,广州革命志士设法收殓死难烈士遗体72具,合葬于广州城外东北郊的黄花岗,因而,这次起义又称为黄花岗起义。

(梁义群)

保路运动

(Baolu yundong)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人民为收回铁路权益的斗争。从19世纪末，帝国主义就开始争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主要干线，更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美国夺取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后来经过广大人民，特别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和绅商的长期斗争，才收回自办。清政府允许四省自筹股金筑路，四省分别成立了铁路公司。广东铁路公司的资金是商股，其他三省除商股外，还有通过摊派附加捐税集起来的民股。这样，路权问题除去政治意义外，经济上也和广大群众的利害直接相关。铁路股本经过几年筹集，广东、四川已收到一半以上，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的一段也已动工。1911年5月9日(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任命端方为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派其南下接收四省商办铁路公司。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镑，将1905年人民群众争回的这两条铁路的路权再行出卖给帝国主义。根据这个借款合同，四国不仅掌握了路权，而且还得到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抵押。因此，清政府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便激起四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省。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1万多人举行集会；16日，长沙到株洲沿线的铁路工人万余人游行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广东铁路公司于6月6日召开股东大会，坚持商办。他们以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的形式，进行抗议，并成立了“保路会”，坚持斗争。7月，湖北商民群起抗争，《大江报》主笔、革命党人詹大悲发表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号召人民用革命的行动反抗清政府的卖国政策。宜昌铁路工人数千人手持铁锤、棍棒与弹压的清军搏斗，杀死清兵20余人。留日学生也群情激昂，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海外华侨也积极声援。四川的保路运动尤为激烈。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开会，“反对卖国奴才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当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确立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全省各地纷纷响应，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参加者数十万人，波及140多个县。8月，成都人民召开万人大会，号召罢市罢课，抗粮抗捐。9月，群众反抗斗争发展成为武装暴动，捣毁经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及外国教堂，并与警察发生武装冲突。清政府电令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抽调湖北部分新军入川镇压。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蒲殿俊、罗伦等人，查封铁路公司，命令军队向请愿群众开枪，打死数十人，伤无数，制造了“成都血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机组织“保路同志军”。旬日间，各路同志军遍布成都附近10余州县，共约20万人，包围成都，与清军激战。因作战失利，成都未攻下。9月25日，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王天杰带领东路同志军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全国第一个革命政权。随后，各路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形成全省人民的反清大起义。保路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统治，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26-1.bmp}

(梁义群)

文学社

(Wenxueshe)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其前身是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2月,湖北新军士兵钟畸、杨王鹏等十人在武昌发起成立群治学社,准备乘1910年春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举义,但不久风潮被镇压,群治学社很难活动,遂于1910年9月改名为振武学社。不久,振武学社又被黎元洪发现,并将该社社长杨王鹏及庶务兼文书的李六如开除军营,1911年1月30日又改振武学社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蒋系同盟会会员),以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借“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各标营队均设有文学社的代表,社员发展到3000人。詹大悲、何海鸣将《大江报》改为文学社机关报,发表文章,鼓吹革命。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推动下,联合成立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直接领导和发动了武昌起义。1912年5月文学社并入同盟会,停止活动。

(梁义群)

共进会

(Gongjinhui) 中国同盟会外围革命团体。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8月,成立于日本东京。主要领导人是同盟会会员焦达峰、日知会会员孙武等。它以同盟会的总理为总理,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但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1908年秋,共进会的主要成员分别回国活动。孙武、焦达峰等抵达汉口,于次年4月在汉口法租界设立共进会机关(后迁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在武昌设分机关多处。起初,共进会主要在湖南、江西、四川、湖北、广东、广西等省会党中进行活动,吸收会员,发展组织,准备武装起义。但会党不受约束,行动不统一,起义失败。从此,共进会的联络重点逐渐转向新军。1911年(宣统三年)共进会的主要领导人孙武等,同在武汉的革命党人一起,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建立组织,设有代表。谭人凤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命来到武汉,促进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共谋义举。9月24日,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成立了革命领导机关,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义,设在湖南、江西等省的共进会,积极响应。

(梁义群)

武昌起义

(Wuchang qiyi) 1911年(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同盟会在武昌发动的一次成功的反清武装起义。湖北的革命党人,由于一开始就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和指导,其革命斗争活动较快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他们以新军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继日知会之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湖北新军中又成立了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后来演变成文学社,社长为蒋翊武。除文学社外,当时尚有共进会,领导人为孙武等。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官兵共约1.5万人。在武昌起义前夕,其中半数以上的新军下级军官和士兵加入革命党或同情革命。因此,湖北新军实际上已经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1911年(宣统三年)9月中旬,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组成了领导起义的机关,制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和文告,派居正和杨玉如到上海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谭人凤、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预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后因故改期于10月9日。9日上午8时,孙武等在共进会机关总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试制炸弹,不慎爆炸,孙武受伤送往医院。沙俄巡捕入屋搜查,把起义文告、党人名册、弹药、印信、旗帜等,全部搜去,随即转交给清朝湖北当局。蒋翊武急令当晚12时起义,但官方戒严,命令无法下达,起义未成。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大肆搜捕,设在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革命党30余人被捕,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害。蒋翊武乘混乱之机逃离武昌。10月10日,瑞澂按所获名册继续搜捕,武昌形势异常紧张。革命党人认为与其束手就擒,不如起而斗争。当天晚上,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起义军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部队革命士兵闻讯响应,推举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分三路进攻总督署。瑞澂破墙逃至楚豫号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逃至汉口刘家庙,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也在武昌躲藏起来。次日拂晓,起义军占领武昌。11日、12日又先后光复汉阳、汉口,武昌起义获得初步胜利。当时,由于策动起义的领导人有的被杀,有的受伤,有的逃离,没有形成领导核心。黄兴、谭人凤、宋教仁等还未赶到武昌。加之起义者当时不懂得起义胜利后应由革命党人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错误地认为应推举社会上有威望有地位的人来当都督,才能稳定当时的局面。因此,他们在11日成立湖北军政府时,竟将一贯反对革命并杀害起义士兵的黎元洪找来,推为都督;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为民政部长。起初,黎元洪拒不就任。革命党人蔡济民等15人组成“谋略处”,负起军政府的实际领导责任。12日,汉口军政分政府成立,汉阳也成立了革命政权,从狱中出来的詹大悲和李亚东,分任汉口和汉阳的领导工作。蒋翊武回到武昌,参与谋略处的领导。孙武从医院出来,任军务部部长。军政府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改政体为五族共和;颁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布告》,号召全国“共图光复事业”,“建立中华民国”;下令永远裁撤除海关以外的税关和取消除盐、烟、酒、糖等税捐以外的所有税捐,免征本年和积欠的田赋。军政府决定招募新兵,扩充革命武装。10月12日,军政府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申明“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或外债,仍有各省按期如数摊还”,“各国之既得权益亦一体承认保护”,表示革命“并无丝毫之排外性质”(《辛亥革命》,第8册,第308—309页)。这反映出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武昌起义胜利的鼓舞下，湖北各县先后为革命党人光复，成立了革命政权，大大巩固了湖北军政府的地位。武昌起义后，全国响应。至 11 月底，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 14 个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朝，建立了军政府，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运动。清王朝在全国革命的打击下，很快土崩瓦解。

（梁义群）

黎元洪

(Li Yuanhong 1864—1928) 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83年（光绪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8年任职北洋舰队，参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海战。战后，投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1896年，随张之洞回湖北，被委以炮台监制、管带、督带等职，三次派往日本考察军事。1904年任湖北新军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兼护该镇统制。1906年，清政府改第二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受协统领。1909年，以军界代表身份参加“湖北铁路协会”，支持粤汉铁路收回自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他杀害革命党人邹玉溪和周荣棠，与革命为敌。11日起义军出于他平日的“资望”，决定推举他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于是把他从躲藏的地方找出来，但他力辞不敢出任，拒不在布告上签字，只是在汉口、汉阳光复后，才勉强就职。但暗地与清朝大臣勾搭，脚踏两只船，作应变的准备。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仍兼鄂督。当年2月，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说：“共和国立，革命军消”（《黎副总统书牒汇编》第1卷，第35页），要求解散革命武装。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他仍任副总统，此后伙同袁世凯反对革命。1913年，支持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同时，在湖北疯狂地镇压革命派，查封革命报刊《大江报》。报载他“妄诛无辜之人甚多”（《民立报》，1912年8月19日）。10月袁世凯成为正式大总统，他仍为副总统，支持袁解散国会，破坏“临时约法”。1914年6月，袁世凯御用参政院成立，被袁任为参政院长，但对袁世凯准备称帝表示不合作。袁改帝制后封他为武义亲王，拒不受。1916年袁世凯死，他继任大总统，宣布召开国会，恢复《临时约法》。但此时北京政府实权操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1917年5月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与段祺瑞发生权力之争，即“府院之争”。他在国会的支持下，免除段的总理职务。段则指使张勋以“调停”为名，带兵进京。7月1日张勋复辟，黎元洪逃往日本使馆。1922年，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一度复任大总统，未满一年被迫离任，避居天津。此后虽谋图东山再起，未获成功。1928年病死天津。

（梁义群）

中华民国

(Zhonghua minguo)简称“民国”。1912—1949年中国国家名称。中华民国它的创立时期(1905—1911)，民国成立后又可分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1月—1912年3月)、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和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倡议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一方面通过其机关报——《民报》,对保皇派展开论战,为辛亥革命胜利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在国内外各地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自1906年起,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宣统三年)4月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勇气,为辛亥革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各省响应。11月,起义各省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组织中央政府,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14日,会议改在南京召开,准备举行总统选举。但因获悉袁世凯有“赞成共和”的表示,又决定虚位待袁,选举暂缓进行。在筹备成立临时政府的过程中,立宪党人、旧官僚向革命党人争权夺位,斗争激烈。正当临时政府陷于难产之际,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声势大振,局势为之一变。由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12月29日,与会代表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并决定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改行公历,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各部总长、次长名单,并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1月28日,临时参议院亦在南京成立。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的成立标志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的覆灭。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政策法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和颁布的《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着严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帝国主义抱有极大幻想,公开申明承认帝国主义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债。正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存在着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帝国主义威胁下,革命党人向地主、买办势力代理人袁世凯妥协,只要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并逼清帝退位,便将政权让与袁世凯。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终于窃取了中华民国的政权。

袁世凯控制的北京政府,开始虽然打着民主共和的幌子,但实际上变成了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工具。从此,进入了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袁世凯为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和复辟帝制,进行一系列反动活动。他在1913年10月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又胁迫国会议员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下令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12月,袁世凯炮制出《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连任无限,下一任总统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他不但可以终身连任总统,连其子孙也可以世袭总统的职位,其欲当皇帝的野心暴露无遗。至此,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

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已全被袁世凯摧毁，中华民国已只是一块空招牌。但是，袁世凯错误估计了形势，当他在 1915 年 12 月宣布将 1916 年改为“洪宪”元年，并于元旦登极的时候，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在云南省组织护国军，通电讨袁，许多省份相继独立，袁世凯总共当了 83 天皇帝，就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分化成皖、直、奉三系，围绕着争夺北京中央政权，连年混战。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首先攫取了北京政府。1920 年直皖战争，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打败皖系军阀，以直系军阀为主把持北京政权。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打败奉系军阀，由直系军阀独占北京政权，奉系军阀撤出关外继续盘踞东北。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失败，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这一年，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其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深刻影响，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并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举行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 年，北伐军消灭了占据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直系军阀。但当北伐正在走向胜利的时候，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开始建立起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1928 年，奉系军阀退据东北，是年冬与国民党新军阀合流。北洋军阀被国民党新军阀所代替。

1927 年国民党新军阀在南京建立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仍打着“中华民国”的招牌，发展了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极端反动的法西斯统治。1946 年，蒋介石为挽回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继续欺骗人民，召开伪国民大会，炮制伪宪法，进行伪选举，1948 年取得伪“总统”的职位。在 1949 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推翻。

（梁义群）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Zhonghua minguo linshi yuefa)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简称《临时约法》。1912年3月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正式颁发。共分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等7章，共56条。它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了国家权力、政权组织和公民权利义务等。它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的民权学说。明确宣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各族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均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有保有财产和营业的自由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国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立法权属于参议院，行政权属于总统和内阁，司法权属于法院。国家的政治制度，实行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总统交办的事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命令须由国务总理副署，才能生效。约法的修改，须由议员三分之二以上或总统提议，须议员五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人数四分之三议决，才能生效。《临时约法》具有革命性、民主性。它确认了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否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和民权思想在法律上得到体现，并且进一步具体化；也反映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要求。它在国家机构体制上，改变了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规定的总统制，采取责任内阁制，在约法的修改程序上也规定了许多限制，缩小总统的权力，增大国务总理和参议院的权力，目的都在于要用法律限制袁世凯独裁专制，维护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它的最严重的缺点在于没有明确规定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所规定的人民自由也只是抽象的自由。它的颁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尽管它被北洋军阀撕毁而成为一纸空文，但仍成为孙中山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一面旗帜。

(梁义群)

袁世凯

(Yuan shikai 1859—1916) 北洋军阀首领。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叔祖袁甲三是淮军将领,靠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河漕总督。胞叔袁保庆随袁甲三屠杀起义农民,官至道员。其父袁保中未入仕途。他从小被过继给袁保庆,袁保庆死后则跟随堂叔袁保恒。虽有名师授业,无奈他受不得寒窗之苦,专想靠投机介身仕途。1878年(光绪四年),靠花钱捐了一个中书科小官,得以结识徐世昌。1881年投靠袁保庆的好友、淮军将领吴长庆,从此发迹于官场。1882年随吴长庆入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因协助朝鲜国王镇压汉城兵变,经吴长庆请功,被清廷提升为同知衔。不久,他利用与李鸿章的关系,1885年被保荐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以三品道员升用,从而排挤吴长庆,成为朝鲜的太上皇。1894年,受日本驻朝代理馆务书记官杉村的怂恿,电请清政府派兵入朝镇压东学党起义。日本暗中派出大量军队入朝,并占据汉城。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他仓皇逃回国内。甲午战争后,清廷开始训练新式陆军。他经过多方钻营,在1895年接替胡燏棻,到天津以南的小站练兵。到任后,招募大批青壮年,扩编为7000多人的“新建陆军”。聘请德国教官,采用新的训练方法,分马、步、炮、工、辎等兵种,全部洋式装备,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部队之一。为了牢固掌握兵权,又进一步培植一大批亲信,网罗段祺瑞、冯国璋、王世珍、徐世昌、曹锟、张勋等人,委以重任,为北洋军阀集团准备班底。因练兵有功,1897年擢为直隶按察使,专管练兵事宜。戊戌变法时期,伪装赞成维新,一度参加维新团体——强学会,骗取维新派的信任。9月16日,光绪帝赏他候补侍郎衔,办理练兵事务。18日,形势急转,维新派与顽固派斗争处于白热化,谭嗣同夜访,要求他杀荣禄,除旧党。他当即表示:“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隔日下午却跑到天津向荣禄告密。因告密有功,戊戌政变后,深得慈禧太后和荣禄信任。1899年1月那拉氏赏他西苑门内骑马,6月正式任命为工部右侍郎。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帝国主义各国强令清政府派他到山东镇压义和团。是年冬,他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到任后,立即颁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残酷屠杀团民,焚毁坛场,镇压山东方兴未艾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为保存实力,又免于得罪帝国主义主子,他阳奉阴违,不肯与八国联军交战。而暗地里却与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相勾结,参与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旨在分裂中国,并为其能集中兵力镇压北方义和团的“东南互保”。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中,荣禄的武卫军五个军就有四个军几乎崩溃,唯独他的武卫右军被保存下来,这为他以后独揽军政大权保留了资本。李鸿章死后,他于1901年11月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次年实授。在以后几年里,先后还兼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政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借编练新军、改革军制之机,进一步扩充其武装力量,建成北洋六镇。其中除第一镇由满洲贵族铁良统率外,其余五镇都成了他的嫡系,受其统制。以后,又将北洋军的势力由直隶扩展到山东、河南、江苏及东三省。并与其部属主要将领结成死党,逐渐形成一个以他为头子的武装政治集团——北洋军阀集团。从此,他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等大权于一身,成为左右清廷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1907年,清廷为削减他手中的权力,采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会办大臣又兼尚书。1908

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宣统皇帝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以其有“足疾”为由，命其回籍养病，解除一切职务。但他并未回原籍，而是躲在交通便利的彰德（今商邱），操纵旧部，窥视形势，伺机再起。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30-1.bmp}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队去武昌镇压革命，但北洋军主要将领多不听荫昌指挥，清政府只好起用袁世凯挽回危局。经过几翻讨价还价，清政府最后任命他为内阁总理，才率军奔赴前线。不久回京组阁，掌握了全国统治权。面对全国形势，他认为清朝统治实难恢复，但要用武力扑灭革命也确非易事。于是决定采取欺骗手法，派人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当上中华民国的合法大总统；另一方面用武力逼宫，迫使清帝退位。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他实现了其反革命目的，于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建立起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不久他派人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取得“善后大借款”后，又镇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其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从此便开始了复辟帝制的阴谋活动。1914年，公然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取消国务院，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全被摧毁。为了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2月12日宣布复辟帝制，次日在北京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决定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于元旦登极。这一倒行逆施之举，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组成护国军，通电讨袁，宣布独立，许多省份相继响应。1916年3月22日他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大总统的宝座。然在举国反对之下，他已众叛亲离，忧惧成疾。6月6日，在亿万人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梁义群）

宋教仁

(Song Jiaoren 1882—1913)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字遁初(一作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出身贫寒，读书时爱议论时政，关心国事，渐萌革命思想，成为两湖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1904年(光绪三十年)春，和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筹划起义，事机泄露，流亡日本。1905年，任中国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兼湖南分会副会长。鉴于孙中山在南方三省发动的武装起义均遭失败，于1910年春提出将革命斗争转向长江流域，组织中部同盟会以加强领导的重大战略决策。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上海成立，为五位负责人之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猝然爆发，他于当月下旬赶到武汉，积极参与湖北军政府《鄂州临时约法》的拟定。之后，到南京参与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命为法制院总裁。他在日本留学6年，遍读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十分倾慕欧美近代政治，特别是英国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并决定以此作为终身奋斗目标。南北和谈时，已经出现对革命派不利的形势，可他仍然一味迷信宪法的威力，甚至动员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以为自有《临时约法》可以束缚住袁世凯。袁世凯窃据大总统之后，他又拿起“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的武器，与袁进行合法斗争。为监督袁氏政府，夺取议会多数议席，进而出组责任内阁，以掌握国家政权，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几个小党，组成国民党。该党虽奉孙中山为领袖，但全部党务实际由他掌握。国民党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初选中和此后的第一届国会的复选中，均取得压倒优势的胜利，他即宣布将以多数党资格，成立责任内阁，出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曾亲自向他馈赠50万元，以阻止其南下进行竞选活动，但不为所动，毅然周游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竞选活动。国民党的胜利和宋教仁的政治抱负，引起袁世凯的切齿恼恨，于是决计在国会召开前夕杀死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晚，当他准备在上海车站搭车北上时遇刺，次日抢救无效，不治身亡。

(梁义群)

二次革命

(Erci geming) 孙中山为挽回辛亥革命的失败，在 1913 年发动的又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是以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为主要目的。1912 年，袁世凯窃取临时政府总统职位后，即在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下，逐步建立其反动的独裁统治。他紧抓军权，强调军权统一，极力保存并进一步扩充其北洋军，从而遣散了南方十几万革命军队。他想法破坏责任内阁制，极力控制内阁。从 1912 年 3 月至 9 月，先后三次更换内阁，直到由其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使内阁完全变成他自己手中的工具。然而，袁世凯破坏责任内阁制的活动，并未引起同盟会的警惕。相反，同盟会领袖之一的宋教仁等认为，要真正实行责任内阁制，就要组成一个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议席的政党，由多数党去组织责任内阁。1912 年 8 月，宋教仁等同盟会同几个小党派合并组成国民党，从而使国民党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政党。1912 年底，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优势。宋教仁便认为，由国民党组成责任内阁，大局已定，即从湖南转道上海，准备返回北京实现他当内阁总理的美梦。这时国民党和宋教仁成为袁世凯建立独裁统治的眼中钉，于是，袁世凯便于 1913 年 3 月 20 日，派人将来教仁刺杀在上海车站。这是袁世凯镇压国民党的开始。宋教仁案被揭露后，袁世凯决心先发制人，进一步对国民党实行武力镇压。4 月，他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同俄、英、日、德、法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以盐税收入为抵押，借款 2500 万英镑，作为对内镇压用的军费，随即下令，用武力扑灭革命势力。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惊醒了革命党人。孙中山首先觉悟，力主武装讨袁，立即于 3 月 26 日由日本返回上海，当晚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孙中山坚决主张武力解决，先发制人，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并耐心说服黄兴等人放弃“法律解决”的错误主张。同时，宋案也引起全国人民对袁世凯的极大愤慨，在上海公葬宋教仁时，送葬者达数万人之多，这是对袁世凯的声讨。各地报刊抨击袁世凯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呼吁国民奋起“诛奸讨逆”，发动“二次革命”。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大大增强了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信心，于是毅然重新举起民主革命旗帜，发动武力讨袁。袁世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加紧反革命部署，积极准备内战。于 4 月 7 日，电令山东的北洋军紧急动员，开始对南方用兵。5 月 6 日，袁世凯召开秘密的军事会议，制定出对湘、赣、皖、苏四省用兵的军事部署：一路主攻江西；一路主攻南京、上海；一路控制湖南；一路为预备队，决心发动全面内战。接着对国民党人发出最后通牒，声称：“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上海时报》，1913 年 5 月 24 日）6 月，袁借口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不服从中央，下令撤免职务。国民党在强兵压境的情况下，只好起而仓卒应战。7 月 12 日，李烈钧接受孙中山的指令，从上海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发表讨袁檄文。7 月 15 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宣布江苏独立，并表示“不除袁贼，誓不生还”。接着，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的“二次革命”。但袁世凯已经较为牢固地控制了全国军政大权，革命派发动讨袁为时已晚。袁世凯指挥北洋军大举进攻江西和南京。7 月底，李烈钧从湖口败退，黄兴从南京出走。原宣布独立的各省因孤军难支，相继取消独立。9

月，南京被北洋军攻占，至此，持续两月左右的“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相率逃亡日本，革命武装全部被解散，袁世凯通过残酷的暴力镇压，终于完成反革命的武力“统一”。“二次革命”是民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反动统治的第一次重大斗争，是此后一系列反袁斗争的开端，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梁义群）

西姆拉会议

(Ximula huiyi)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国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的破坏中国主权的所谓“中、英、藏会议”。英国召开这次会议，以“调停”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纠纷为名，实则是再次勾结西藏叛匪分裂西藏。会上，叛匪叫嚷西藏“独立”。接着英国代表提出会前拟好的“西姆拉条约”草稿和炮制的“西藏地图”，居然将西藏、西康、青海的全部，以及云南、四川、新疆、甘肃部分地区统统划归“西藏”范围，擅自分为“外藏”与“内藏”，并要“外藏独立”、“内藏自治”，妄图一举吞噬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以建立英国的统治。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个条约草案，并正式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陈贻范致北京外交部电》，1914年7月4日；《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后来，历届政府都坚持这个立场。因此，“西姆拉条约”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会议期间，根本没有讨论中印边界问题。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勾结西藏几个分裂主义分子，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会外秘密换文，捏造出一个所谓划定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把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规英属印度。所谓“麦克马洪线”也完全是非法的，中国历届中央政府也从来没有承认过。事实上，英国政府作贼心虚，多年来也不敢将这条线标在地图上。

（梁义群）

二十一条

(Ershiyitiao) 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的灭亡中国的条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欧洲国家忙于战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9月，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当时，袁世凯正在筹谋复辟帝制，急需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即利用袁世凯这种政治需要，于1915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作为支持袁世凯做皇帝的交换条件。“二十一条”分5号21条，其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增加筑路通商的新权利；日本享有南满、东蒙一带工商、土地、路矿、顾问、借款的特权；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和南满、安奉两路的期限为99年，中国沿海岛屿和港湾不得租借和割让他国；中国政府应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这些条件意味着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日本公使日置益把“二十一条”交给袁世凯时，露骨地说，如答应“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又进一步对北洋政府外交次长曹汝霖明确表示：“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君主，则敝国必赞成。”（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07—109页）袁世凯为了做皇帝，在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前四部分的全部要求，只把第五部分若干条改为日后另行协商。由于中国人民坚决斗争，“二十一条”才未能付诸实行。

（梁义群）

洪宪帝制

(Hongxian dizhi) 袁世凯在民国初年搞的帝制复辟活动。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表面忠于共和制度，实则步骤地加强其独裁统治。1913年3月他派人刺杀了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继之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此后便加紧复辟帝制。首先，他胁迫国会议员选举自己为正式总统。随即向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刀，并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解散国会，成立“约法会议”（或称“政治会议”），制定“新约法”。5月，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所谓《中华民国约法》。这个“新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取消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把大总统的权力，扩大到几乎和皇帝的权力一样。根据他炮制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连任无限制，下一任总统由现任总统提名。这样，袁世凯不但可以终身连任总统，其子孙也可以世袭总统职位。至此，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暴露无遗。接着，袁世凯为了正式当皇帝，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取得日本的支持，几乎全部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时，指使爪牙大造复辟帝制的舆论。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北京发表题为《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以君主制行之易”，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同月，他的复辟帝制的御用团体“筹安会”在北京成立，公然宣称：“全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最后，袁世凯便从组织上着手恢复帝制。1915年10月，他授意拟出《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在他的亲信爪牙一手操纵下，十几天里，各省代表全部选出，并分别举行所谓国体投票，结果全部赞成实行君主立宪制，全部同意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各省还向袁世凯递上划一的“推戴书”。12月11日，袁世凯的参议院以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向袁世凯上了“总统推戴书”。袁在12月12日宣告接受帝位。次日，在北京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袁世凯这一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在云南发动讨袁护国战争，各地纷起响应。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并于6月6日忧惧而死。

(梁义群)

蔡锷

(Cai E1882—1916) 中国近代军事家。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戊戌政变后进入上海南洋公学。后留日学军事。1911年(宣统三年)初至云南,任新军协统。武昌起义后,10月末,与革命党人策动云南独立,任云南军政府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委以虚职,实受监视。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与由拥袁转向反袁的梁启超密议,决定潜回云南策动倒袁。从北京经天津,取道日本,转抵昆明,与国民党人李烈钧、云南都督唐继尧等组成护国军,于1915年12月25日通电宣告云南独立,出兵讨袁。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进军四川。护国军的讨袁义举,深得民心,形成了强大的倒袁声势。随后,广西、陕西、贵州、浙江、湖南等省纷纷独立,迫使袁取消帝制。护国之役后,任四川都督兼署民政长。因艰苦转战,积劳成疾,1916年11月病逝于日本。

(梁义群)

护国运动

(Huguo yundong) 辛亥革命后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一次民主运动。1914年，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按照这些法令，他实际上已拥有皇帝同样权力，但他还要当真皇帝，便加紧谋划复辟帝制。1915年12月，袁世凯正式宣布恢复帝制，在北京中南海接受百官朝贺，定于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准备元旦登极，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坚持反袁斗争。1915年，他发表《讨袁檄文》。中华革命党曾在国内沿海地区最早组织了影响不大的反袁武装暴动，但未能担负起领导反袁斗争的重任。梁启超所领导的进步党本是拥袁的，在国会解散以前，帮着袁世凯排挤国民党。但当袁世凯被拥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之后，反被袁视为赘瘤，一脚踢开，一度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所以袁世凯斋制自为公开后，进步党抢先揭出“护国”旗号，公开反袁。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长文，反对袁世凯称帝。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是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将领，由于他在军界很有声望，被袁世凯授予各种荣誉职位，羁留北京。蔡锷不满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经与梁启超密议举兵讨袁。蔡锷以赴日就医为由，躲过袁世凯的监视，从北京辗转绕道日本、台湾、香港、越南，历时一个月，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联合云南的反袁力量，兴师讨袁。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何可澄、戴戡和受孙中山委托来云南准备反袁的李烈钧等，联合宣布云南独立，发布讨袁檄文，组织护国军政府，以唐继尧为都督。随即组织讨袁护国军，共三军。其中，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桂入粤；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此外，另组挺进军，计划出辰、沅、常德，以趋武汉。护国战争遂全面爆发。1916年1至3月间，护国军在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五省的广大战场上，与袁世凯的反动军队迭相激战，连连取胜。贵州和广西相继响应，宣布独立。未独立的东三省、山东、湖南等省，也纷纷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在各省策动起义，全国各地人民自发的反帝制斗争如火如荼。袁世凯四面楚歌，犹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持大总统的职位。全国各界识破了袁世凯的诡计，决心把他赶下台。4、5月间，反袁斗争继续发展，盘踞在广东、浙江、福建、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的袁世凯的心腹爪牙，也相继独立。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决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护国军纪事》，第1期，《对内文告》）。全国各地纷纷通函通电，揭露袁世凯的罪行和阴谋，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要求全国人民再接再厉，捕杀袁世凯，以绝乱种。袁世凯众叛亲离，内外交困，忧疾交加，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于6月6日死去。6月7日，黎元洪依法就任正式大总统。29日，宣布遵守《临时约法》，继续召集国会，恢复国务院，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0月底，冯国璋被补选为副总统，但仍坐镇南京。参加讨袁战争的各派政治势力，以为民国恢复，大功告成，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运动结束。护国运动推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结束了洪宪帝制，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但是，护国运动虽然恢复了“民国”，而大小军阀却随之而起，又窃取了全国人民反袁斗争的胜利果实，中国人民仍然处于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梁义群)

北洋军阀

(Beiyang junfa) 袁世凯建立的封建买办军事政治集团。军阀的起源可上溯到湘淮军阀。1885年(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在天津办北洋讲武堂,为后来的北洋军阀集团准备了班底。清政府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所依恃的湘军和淮军,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全面崩溃。李鸿章新建的北洋海军也全军覆没。为了支撑危局,镇压人民革命,清政府于1894年冬任命淮系官僚胡燏棻到天津附近小站训练新式陆军。1895年,清政府又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接统这支军队,归兼北洋大臣的直隶总督节制,这就是北洋军建立的开始。北洋军是按照德国的营制和操典来进行训练的,与旧式军队有所不同,故称编练新军。北洋军阀就是随着北洋军的建立和发展而产生的。袁世凯为了控制北洋军,一开始就注意搜罗党羽,拼凑班底。其中最重要的有袁世凯老朋友和号称“北洋三杰”的、由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此外还有曹锟、张勋等人,构成了后来北洋军阀的基干,成为北洋军阀各派系的首领。1898年袁世凯依靠北洋军,出卖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得到西太后和直隶总督荣禄的信任,袁世凯及其北洋军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因此,1899年12月,清政府便派袁世凯率领北洋军到山东镇压义和团,得到了中外反动派的赏识。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担任举足轻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清政府改革军制,成立练兵处,袁世凯受任会办大臣,又负责编练新军。他利用职权,竭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并将新军改名为“北洋常备军”。1905年,北洋六镇全部建成,兵额达6~8万人之多,其中五镇都由袁世凯统制。几年中,北洋军的势力由直隶扩展到山东、河南、江苏及东三省等地。随着北洋军的扩充,袁世凯及其亲信结成死党,逐渐形成一个以袁世凯为头子的能左右朝政的武装政治集团——北洋军阀集团。

1911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依靠北洋军,一方面迫使清政府交出实权,另一方面又迫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妥协。1912年,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实力,对抗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从此开始建立起北洋军阀对中国长达17年之久的反动统治。1913年袁世凯武力镇压了“二次革命”,建立并巩固了专制独裁统治。并靠大量出卖国家权益,换取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成为各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在帝国主义各国的分别收买和互相争夺下,分裂成几个派系,其中主要是直、皖、奉三系。

直系,首领是冯国璋(直隶河间人),后是曹锟和吴佩孚。主要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盘踞在长江中下游,即江苏、江西、河南、湖北等省。皖系,首领是段祺瑞(安徽省合肥人)。段和直系首领都是袁世凯手下的干将。袁死后,直、皖两系争权夺利斗争特别厉害。皖系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主要盘踞在安徽、湖南、浙江、福建等省。奉系,首领是张作霖(奉天海城人)。张非北洋系统,但与北洋军阀有一定历史渊源关系,一般都将他列为北洋军阀的一派。奉系军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主要盘踞在东北地区。自此以后,各系军阀争权夺利,连年混战。先是皖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控制北京政权。1920年发生直皖战争,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打败皖系军阀,以直系军阀为主把持了北京政权。1922年又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将奉系军阀打败,直系军阀独占北京政权,奉系军阀撤出关外继续盘踞东北。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失败，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次年，北伐军消灭了占据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直系军阀。“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建立起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1928年奉系军阀退据东北，是年冬与国民党新军阀合流。从此以后，北洋军阀就完全被国民党新军阀所代替。

（梁义群）

直系军阀

(Zhixi junfa)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1916年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失去了共同的工具。为维护并扩大各自在华的侵略特权和利益，它们都积极寻找和培植新的代理人。在它们的操纵和支持下，北洋军阀公开分裂。北洋军中以直隶（今河北）河间人冯国璋为首领的一派，被称为直系军阀。直系军阀所控制的主要地区，是富庶的长江流域，即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它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其势力仅次于皖系军阀。其主要头目开始为当时的“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萧耀南及曹錕等。1919年冯国璋死后，曹錕、吴佩孚、孙传芳、齐燮元等继起为主要首领。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的矛盾由来已久，后在各自所依靠的帝国主义支持下，围绕着争夺北京中央政权而展开反复而激烈的斗争。经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先后打败皖系和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曹錕一度窃踞总统职位。1924年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军阀打败，1926年吴佩孚和孙传芳也先后被国民革命军击败，次年直系军阀终被消灭。

（梁义群）

皖系军阀

(wanxi junfa)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以安徽合肥人段祺瑞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皖系军阀。系北洋军阀的主力，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其势力最大。因此，首先攫取北京中央政府。控制的主要地区是安徽、山东、浙江、福建、陕西等省。主要头目有徐树铮、卢永祥、靳云鹏、倪嗣冲、陈树藩、段芝贵等。段祺瑞掌权，大肆出卖国家利权，借巨额外债，加紧扩充武装，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建立独裁统治。早就与皖系军阀存有矛盾的直系军阀，虽曾一度与皖系合作，共同与非北洋系的黎元洪和西南军阀争夺，但因争相投靠帝国主义和追求个人与集团的权力，又彼此争夺，其矛盾日益加深，最后不惜付诸武力，以决雌雄。终于在 1920 年的直皖战争中，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打败皖系军阀。此后，皖系军阀一蹶不振，渐归于消灭。

(梁义群)

奉系军阀

(Fengxi junfa)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奉天(今辽宁)人张作霖为首领。原来东北地区有新军和旧军两部分武装：新军系由曾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去的一部分北洋军，逐渐扩建成二镇和二混成协；旧军有步兵八路计四十营，由张作霖、冯德麟、吴俊升、马龙潭等分任统领。张作霖、冯德麟等是清末由张锡奎(袁世凯的党羽)所招抚的一批马贼。辛亥革命后，张作霖等旧军改成新军编制，张锡奎、段芝贵又曾相继督奉，由此说明，东北军队与北洋军阀有其渊源关系。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于袁世凯死后乘机扩充兵力，霸占东北。其主要头目还有张作相、杨宇霆、张宗昌、姜登选等人。1920年直皖战争时，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勾结推翻段祺瑞政府，把持北京政权，任东三省巡阅使，转而又与直系军阀争夺北京政权。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控制北京政权，进而把其控制的地盘由东三省扩展到热河、直隶(今河北)、山东等省，并一度占领江苏、安徽。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今属沈阳)车站。所部由其子张学良统率，改称东北保安军，后宣布归从国民党政府，改编为东北边防军。

(梁义群)

段祺瑞

(Duan Qirui 1865—1936)北洋军阀皖系首领,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85年(光绪十一年)入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炮兵科)。次年回国先后任北洋军械局委员、威海随营武备学堂教习。1896年初,被袁世凯拉拢到天津小站,协助训练“新建陆军”,委以炮兵统带兼随营学堂监督重任。从此成了袁世凯北洋军一员得力干将,先后任北洋军第四镇、第三镇和第六镇统制。同时,又被清廷先后任命为保定军官学堂总办、陆军各学堂督理和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等职,故北洋军各级军官多为他的门生、故吏。与王士珍、冯国璋亦称“北洋三杰”。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再次起用袁世凯,他被任命为第二军军统。以军事实力帮助袁世凯实现“南北议和”的阴谋,以及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任命他为陆军总长,旋又代理国务院总理。为维护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在镇压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中不遗余力。但后来袁世凯对其独揽军权,培植实力有所猜忌。1914年5月,袁世凯设立“海陆军大元帥统率办事处”,把陆军部的权力收归自己掌握。因此事,与袁世凯的关系蒙上了阴影。1915年冬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迫不得已请其出来帮其收拾残局。他采用袁世凯当年对待清廷的故技,一面暗地与护国军作交易,一面迫使袁世凯交出实权。袁世凯被迫恢复国务院后,充任总理。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为皖系军阀首领。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国务院总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为了建立独裁统治,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扩大自己的实力,力主对德宣战,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组织所谓“参战军”。随之在“参战”问题上与总统黎元洪发生了严重冲突。被黎元洪罢免国务总理职务后,依靠北方各省北洋军阀的力量和日本的支持与黎对抗,又召张勋进京调解,暗地鼓动张勋复辟。而在张勋赶走黎元洪,实行复辟后,他即在马厂誓师,起兵讨张,以“再造共和”自居,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对外借口“参战”,出卖大量国家主权。1918年5月,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在“共同防敌”(指苏维埃俄国)的名义下,允许日本派遣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各地。当年秋,又同日本交换《中日山东问题换文》,承认战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对内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于是在1917年7月,便发生了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发动的护法战争。他虽然决定对南方用兵,但由于直系军阀与西南军阀进行勾结,其“武力统一”的梦想难以实现。1918年10月,为了缓和直皖矛盾,被迫辞去国务总理,退居幕后,继续操纵北京政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公然袒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镇压学生运动及在《巴黎和约》上签字。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联合奉系打败了皖系,北京政府由直、奉军阀控制。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统治。11月段祺瑞在奉系军阀和直系(除吴佩孚)残余势力支持下,在北京组织临时政府任“临时执政”。一上台就宣布“外崇国信”,保护帝国主义在华既得利益,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1925年2月,召开主要由军阀、官僚参加的“善后会议”,以抵制国民会议的召开。这年冬天,已倾向革命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天津。日本等八国为帮助直系军阀进攻国民军,炮轰大沽口。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当爱国群众结队赴执政府请愿时,他竟唆使卫队开枪射击,死伤200多人,制

造了“三·一八”惨案。1926年4月被国民军赶出执政府。1936年11月2日病死在上海。

(梁义群)

张勋复辟

(Zhang xun fubi) 张勋在民国初年搞的帝制复辟活动。张勋是袁世凯新军的部属，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调北京宿卫端门，曾扈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1911年（宣统三年）8月调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率军进入南京城与革命军对抗，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民国成立后，其部改称武卫前军，为表示仍忠于清王朝，他和他的军队都留着辫子，因而他的军队被称为“辫子军”，他则称“辫帅”。张勋一直企图使清帝复辟，梦想做个复国元勋。从1916年6月到1917年5月，他召开四次徐州会议，为复辟做了准备。1917年5月“府院之争”白热化，他认为这是搞复辟活动的机会。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段遂唆使北洋军阀督军宣布独立，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部，决心以武力倒黎。黎元洪一筹莫展，便想利用张勋对抗段祺瑞。张勋向黎元洪表示愿意入京“调停”黎、段之争。段祺瑞暗中表示支持张勋搞复辟，实则想利用他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所以也极力怂恿他入京。6月7日，张勋带领3000多（或5000）辫子兵从徐州出发，第二天到达天津，先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否则不进京调停。黎元洪出于无奈，于6月13日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入京，强令黎辞职，加紧准备复辟。各地王公贵族和清朝余孽，这时纷纷涌入北京，合辞上奏，请清逊帝溥仪复辟。老保皇党头子康有为早就和张勋暗中来往，在接到张勋的邀请后，带着早已暗拟就的“复辟登极诏”等古文诏书十九道，赶到北京。经张勋和康有为等人秘密策划以后，于6月30日晚上召集北京的军警头目开会，命令“辫子兵”把守清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7月1日早晨3点钟，张勋身穿朝珠蟒服，率领文武官员300多人进入清宫，拥戴清逊帝溥仪复辟。夏辟头一天，溥仪除发布“夏辟诏”外，连发“上谕”八道，宣布把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改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恢复清朝末年的旧制度。溥仪大加封官授爵，张勋被封为忠勇亲王，又任首席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徐世昌和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正副院长，劳乃宣被封为法部尚书。其余复辟重要人物，分别被封为尚书、侍郎等要职。还通令各省督军，一律改称巡抚或总督。当天，张勋还给各省军阀发出电报，让其改用宣统年号，悬挂龙旗。一时间，北京城内群魔乱舞，乌烟瘴气。大总统黎元洪逃到日本大使馆避难。复辟丑剧一开场，就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组织军队讨伐张勋。北京十几家报纸自动停刊，表示抗议。上海、天津、武汉等处的报纸也无不口诛笔伐，痛斥张勋等“妖孽”、“小丑”。全国各省军民纷纷通电或集会，表示拥护共和，反对复辟。一小撮复辟分子，立即陷入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怒潮之中。张勋复辟，本来是得到德、日等帝国主义支持的。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下，帝国主义眼见张勋复辟阴谋无法得逞，便马上转变了态度。德国因在欧战中已处于败势，自顾不暇，对复辟“不能协力”；日本见复辟无望，转而支持段祺瑞，并给段提供100万日元的军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相继抛弃张勋，支持讨逆。他们以北京公使团的名义发出照会，要求解散张勋的复辟武装。那些本来和张勋一道赞成复辟的各省军阀，见风向不对，摇身一变，也打出反对张勋的旗号。段祺瑞利用张勋解散国会、逐走黎元洪的目的已达到，又得到日本的支持，便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于7月3日在天津马厂誓师，进兵北京，讨伐张勋。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的“辫子军”

狼狈逃窜。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溥仪宣布退位后逃入美国使馆。其他复辟分子也作鸟兽散，张勋复辟丑剧只演 12 天，就可耻地收场了。

（梁义群）

护法运动

(Hufa yundong) 1917年至1918年,由孙中山领导的为维护《临时约法》,反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继任代理总统,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再次担任国务总理,独揽了北京政府的实权。段祺瑞认为,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他实行独裁统治的障碍,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原来的国会。他勾结研究系首领梁启超,准备另行召集由各省军阀指派的代表组成“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的组织法和选举法,再来召集新国会,以废除《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临时约法》和国会是民国的象征,孙中山认为段祺瑞废除《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对民国的背叛,故而举起“护法”的旗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而斗争。7月17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等由上海乘军舰抵广州,当晚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斥段祺瑞之流“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他宣布“政府犯法,国民有护法之义务”。并号召海军全体舰队和国会议员来粤,召开国会,组织政府。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由吴淞赴粤,联名通电,宣布自主,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7月下旬,国会议员130多人相继抵粤。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对段祺瑞的专制统一感到威胁,便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反对段祺瑞。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到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讨论组织军政府事宜。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十三条,其中第一条明确提出,军政府唯一职责是“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军政府公报》,第1号,广州1917年印本)。大纲规定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并确定各部组织。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次日,又选出滇、桂两系军阀头子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10日,选举各部总长,由孙中山批准任命,他们是:外交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唐绍仪、内务总长孙洪伊、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交通总长胡汉民。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出兵北伐。护法军与段祺瑞“政府军”在湖南、四川交战,护法战争开始。两广和云贵成了护法运动的中心。湖南、四川、湖北、河南、陕西、浙江、山东、安徽、福建等省的护法势力,也相继兴起。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护法烽火遍及十余省区。孙中山为护法战争制定的战略部署为:由唐继尧、陆荣廷统率滇、黔、桂、川四省的兵力,攻占四川后即顺江东下;由湖南的程潜、刘建藩和湖北的黎天才部夺取湘、鄂后即挥师北指;由陈炯明、李烈钧等统率粤军攻闽取赣、西上武汉;由四川的黄复生和熊克武部北出祁山,东进荆襄。然后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再大举北伐。北京政府内部对护法运动的态度不一。段祺瑞坚持以武力征服各省。冯国璋则企图利用西南军阀压制段祺瑞的势力,主张维持西南军阀现有地位。冯国璋与西南军阀暗地勾搭,提出南北议和。由此,护法军政府如何对待北京政府的问题上,也发生尖锐矛盾。孙中山坚持反对北京政府,西南军阀则主张只反对段祺瑞,不反对北京政府。西南军阀和直系军阀勾结后,就不再支持北伐,反而排挤孙中山,破坏护法运动。1918年1月,两广和云贵等省军阀,在广州成立“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同护法军政府相对抗。2月,追随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暗

杀，孙中山的卫队也被反动派捕杀。5月，非常国会在反动政客和国民党右派议员的操纵下，改组护法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制。选出的七总裁为：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陆荣廷、林葆懌、岑春煊，把孙中山的地位降至七总裁之一。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被西南军阀所把持，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去上海。行前特发表宣言，痛切指出：南北军阀实“如一丘之貉”。护法运动的失败，说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已完全陷于绝境。因此，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护法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孙中山只限于恢复《临时约法》，而《临时约法》当时已是空文，国会也徒有其名，因此缺乏号召力，难以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二是没有自己可靠的武装力量，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西南军阀。而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本质一样，他们参加护法运动，只是借“护法”之名，保持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护法”，同北洋军阀妥协。

（梁义群）

龚自珍

(Gong Zizhen 1792—1841)晚清朝思想家、文学家。又名巩祚，字璣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自幼深受汉学熏染，曾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鉴于社会危机深重，不甘埋首于考据学。1812年（嘉庆十七年）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后，逐渐“究心经世之务”。曾从刘逢禄学习公羊学，为嘉道间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并不专主今文。1829年（道光九年）中进士。1837年任礼部主事。1839年辞官南下，两年后病逝于丹阳云阳书院。他对清朝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及各种弊政非常不满，所著《明良论》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抨击封建专制淫威，大声疾呼“更法”、“改图”，对土地占有、八股取士、官制职掌、币制税制、西北边防、东南海防等问题提出具体的改革主张，强调改革是历史的必然。鸦片战争前，致力于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曾助程同文修《会典》。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建议新疆改设省制，开发和巩固西北边疆，防止外国侵略。很早注意到英国殖民主义者从海上“叩关”的侵略野心，1838年末写《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极力支持林则徐赴广州禁烟，建议严惩破坏禁烟分子，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其思想对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有很大影响。善诗文，留存文章200多篇、诗词500多首。诗文别具一格，富有战斗性，多为政治观点之抒发，语言丰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著作有《龚自珍全集》。

（李刚）

魏源

(Wei Yuan 1794—1857) 晚清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曾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尊今文经学。1826年(道光六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曾帮助江苏巡抚陶澍筹办漕运、水利诸事。后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有机会广泛阅读各种典籍文献。鸦片战争爆发后，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加浙东抗英斗争。鸦片战争失败后，撰著《圣武记》，推求盛衰之理，筹划海防之策。又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编成《海国图志》。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战舰、火器、轮船和各种机器，允许民间自由设厂。他批评宋学末流空疏无用，汉学考据“专务记丑，屏斥躬行”，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其哲学思想中有辩证法因素，认为“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气息无一息不变者”(《默觚》)。宣传进化的社会历史观，认为“势则日变而不可复”，主张革新求进，反对复古倒退。于晚清变法思想发展有深刻影响。晚年在高邮知州任上曾组织地主武装对抗太平军。后弃官学佛，整理著述。主要著作除《圣武记》、《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外，还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春秋繁露注》、《公羊古微》等。今人编有《魏源集》。

(李刚)

严复

(Yan Fu 1853—192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初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愈懋老人。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66年（同治五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曾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到台湾筹备海防。1877年（光绪三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悉心研究英国社会制度和欧洲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广泛涉猎达尔文、亚当·斯密、卢梭、孟德斯鸠、边沁、赫胥黎等人的著作。1879年学成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任职近20年。甲午战败，使他深受刺激，遂“致力于译述以警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和封建文化，主张开民智、学习西方。又译述赫胥黎的《天演论》（今译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唤醒国人，救亡图存，影响极大。1897年10月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西学，鼓吹维新变法，为维新派主要的舆论阵地之一。百日维新期间受到光绪帝召见，奏报办理海军及学堂事，并拟进呈万言书。戊戌政变后，心情沉痛，悲愤赋诗：“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从此倾力译介西书，先后翻译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英国哲学家穆勒的《群己权界论》、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通论》、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英国哲学家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比较系统地传播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起到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翻译态度严谨，所立“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颇得赞誉。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避居上海，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中国国会，为副会长。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1905年协助马相伯创办上海复旦公学。1906年任安庆高等师范学堂监督。1909年任审定名词馆总纂。次年（宣统二年）任海军协都统。又被征为资政院议员。1912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此后依附袁世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袁世凯摘录战事新闻数万言。在政治上反对共和政体，主张君主立宪。1915年列名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命，却又拒绝公开发表鼓吹帝制的文字。在文化上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尊孔读经，认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1921年病逝乡里。临终前手缮遗嘱一通，内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概括了晚年的思想。译著有《严译名著丛刊》、《严复集》。

（房德邻）

李善兰

(Li Shanlan 1811—1882) 中国近代数学家。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10岁通《九章算术》，15岁通《几何原本》。又读过《测圆海镜》、《勾股割圆》等著作，对数学有浓厚兴趣，决心毕生致力于此。后又结识当时国内外一些数学学者，经常在一起钻研探讨古今数学问题，眼界更为开阔，对数学研究日益加深。陆续写出《四元解》、《元圆阐幽》、《垛积比类》、《对数探源》、《对数尖锥变解法》、《级数回术》、《考数根法》等著作。其中，《方圆阐幽》能独立地达到微积分的初步概念，《考数根法》得出了一些关于二项定理系数的恒等式和判定素数的定理。1852年（咸丰二年），到上海，亲身目睹了中华民族为西方列强欺辱的情景，同时也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学术。从而认识到，中国如欲独立富强，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遂着手介绍西方的学术著作。他花费四年心血，克服重重困难，与伟烈亚力合作译出《欧几里得原本》（即《几何原本》）后九卷，名《读几何原本》。又与他人合作，译出《代数学》、《微积拾级》、《重学》（力学）、《谈天》（天文学）、《数理》、《植物学》等书，作了开创性的工作。1863年（同治二年）入曾国藩的幕府，与容闳、华蘅芳、徐寿等同处。重印了所有著作，最著者有《则古昔斋算学十四种》。1869年，被任命为同文馆数学总教习，培养不少人才，清政府赐给他总理衙门章京、户部郎中、三品卿衔。1882年（光绪八年）病逝。

（梁义群）

徐寿

(Xu shou 1818—1884) 中国近代科学家。字雪村。江苏无锡人。在青年时代便决然放弃科考，专研致知格物之学。对天文、数学、矿物、化学、医学以及声、光、电学等都有研究。尤其注重实验，精于制造。1862年（同治元年）与华蘅芳等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次年，又制成木质轮船一艘，船名“黄鹄”，为我国最早自制的轮船。经曾国藩保举，与华蘅芳一起，在1865年进入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在制造船、炮、枪、弹等方面都发挥出很大作用。又极力倡导翻译西方科学书籍，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专设翻译馆，负责翻译工作。与英人傅兰雅等合作，共翻译13部书。其中化学方面有《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记》等六部，此外还译有《汽机发轫》、《营阵揭要》、《测地绘图》、《宝藏兴焉》等书。还自编《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等工具书。译著引起日本科学家的重视，后来日本所译化学名词，很多袭用他的译名。1875年（光绪元年）左右，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开始化学实验的演示工作，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他是一个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科学家，反对鬼神迷信，提倡“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的学风。1884年病故于上海格致书院。

（梁义群）

华蘅芳

(Hua Hengfang 1833—1902)中国近代科学家。字若汀。江苏金匱(今属无锡市)人。在童年就对科举产生厌烦情绪,而对算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但认真学习研究中国古代算学著作,而且努力吸取从外国传进来的近代数学知识,为以后进一步钻研数学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结识了徐寿,二人志同道合,相互帮助,在1862年(同治元年)制成中国第一部蒸汽机,接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1865年到江南制造局协助徐寿主持技术事务。同时,在翻译馆负责翻译算学、地质著作。出于“强兵富国”的目的,与美国人玛高温合译《金石识别》,又译《地学浅释》。先后与玛高温、傅兰雅等人合译国外科技著作共12种,160卷。并潜心著述,其代表作是《算学笔谈》,为在中国普及数学知识作出了很大贡献。另一部《开方别术》,大大简化中国古算书的开方方法,被李善兰誉为“空前绝后之作”。后来将数学著作合刻为《行素轩算稿》,共6种。先后主讲上海格致书院、湖北自强学堂、两湖书院,晚年出长常州龙城书院,创办无锡蒺实学堂,以陶育后进,培养人才。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事业,直到1902年逝世,“未尝一涉宦途”,而以“敝衣粗食,穷约终身”。

(梁义群)

詹天佑

(zhanTianyou1861—1919) 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字眷诚。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出生于广东南海县。1872年(同治十一年),随中国第一批幼童飘海赴美留学。1878年(光绪四年)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考取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道工程学。1881年又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获学士学位回国。然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封建顽固派极力反对修造铁路,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被迫改学驾驶海船,耽误了七八年。1887年,“中国铁路公司”在天津成立。第二年,经留美同学邝孙谋推荐,才得以干他精通的铁路工程工作,成为中国第一名铁路工程师。开始负责修筑塘沽到天津的铁路,仅用80天就完成铺轨工程。后又参加修筑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需要在滦河修一座铁桥,面对英、日、德工程人员建造这座铁桥相继失败,毅然挺身承担造桥任务,最后出色地完成了全部工程。最大贡献,在于他成功地修建了京张铁路。1905年,担任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总工程师。这条路穿山越岭,全长200多公里,工程之艰巨为他处所未有。他亲自勘测,选定路线。在北京青龙桥东沟,采用人字形轨道,用两台大马力机车调头互相推挽的办法,解决坡度大机车牵引力不足的问题。又与工人一起,采取各种措施,解决隧道工程中渗水、塌方等困难。京张铁路于1909年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总费用只有外国承包商索价的五分之一。后受聘川汉、粤汉铁路会办或总理兼总工程师。辛亥革命后,任汉粤川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督办等,克服种种困难,修建了从武昌至长沙365公里的铁路。晚年编写出版《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等工程技术书籍,以及《华英工程词汇》这部我国最早的土木工程辞典。1919年逝世。中华工程师学会为该会第一任会长詹天佑在青龙桥车站建了一座全身铜像,永远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的铁路工程师。

(梁义群)

冯如

(FengRu1883—1912) 中国第一位飞机制造家和飞行家。号鼎三。广东恩平人。出身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2岁时随舅父赴美国旧金山谋生。年少有志，白天做工，晚上攻读科学知识，努力掌握机器制造技术。1903年世界上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之后，他萌发出制造飞机救国的思想。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爆发，曾表示：“倘得千数百万飞机分守中国港口，微特可以固吾圉，并足于慑强邻。”从此开始致力航空事业，发誓：“苟无成，无宁死！”在爱国华侨大力资助下，创办飞机制造公司，历经千辛万苦，克服无数困难，终于1909年试制成功第一架飞机。次年，又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性能较先进的“顿异前制”飞机。10月，参加国际飞行协会举办的飞行比赛，创造了飞行高度230多米、距离30多公里的成绩，折算时速达104公里，获得比赛第一名。1911年3月，谢绝美国的重金聘用，毅然带着两架自制飞机投到祖国怀抱。武昌起义后，参加革命，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飞机队飞行长。为了开通民智，宣传航空知识，于1912年8月25日，在广州燕塘为民众作飞行表演时，不幸失事，受重伤牺牲。弥留之际，勉励他的助手“勿因是而失其进取心”（以上引文见《中国飞行家冯君如行状》，《东方杂志》，9卷5号），至死念念不忘祖国的航空事业。遵其遗志，安葬在黄花岗。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38-1.bmp}

(梁义群)

五四运动

(Wusi yundong)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和国内新的社会力量生长、发展的历史条件下,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残民统治,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翌年1月,27个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实际上是一个由美、英、法三国操纵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向和会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项权利等要求,遭到与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4月30日,和会操纵者在邀请日本参加,拒绝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议定了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从2月初巴黎和会开始讨论山东问题,各阶层人民“保持国权”的活动就已展开。巴黎和会的严酷事实,使中国人民打消了对帝国主义宣扬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认识到必须自己站起来“直接解决”。5月1、2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出后,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便在北京爆发了。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学生,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他们手执小旗,高呼口号,发表宣言,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惩办亲日卖国官员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輿。集会讲演后,举行游行示威,火烧了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捕去32人。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学生们结成“救国十人团”,开展讲演、抵制日货活动,并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军阀政府一面为曹汝霖等开脱罪责,一面诬蔑学生爱国行动是“纵火伤人”,“举动越轨”,声言要对学生进行制裁。6月3、4两日,反动政府对上街讲演的学生实行大逮捕,捕去学生近千人,从北京开始的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天津、济南、太原、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南京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罢课、集会、示威游行,开展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许多城市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声援学生爱国行动。军阀政府对北京学生的大逮捕,进一步激怒了全国人民。6月5日以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由开始时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移到上海。6月5日,上海工人阶级为营救被捕学生,“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开始罢工。商人也在“罢市救国”的口号下,开始罢市。在此以前,2万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已经罢课。这样,就在中国工业中心上海实现了“三罢”。从上海开始的“三罢”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造成了巨大威胁。北京军阀政府被迫于6月10日免去曹、章、陆三人的职务。6月28日和约签字之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和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实现了惩办卖国贼和拒签和约两个直接斗争目标而告一段落。五四运动表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精神;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十月革命后中国出现的共产主义

知识分子起了骨干作用。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既是一个爱国政治运动，又是一次文化运动，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前者，从 5 月 4 日到 28 日，共 56 天。作为后者，则从 1915 年 9 月新文化运动兴起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共 5 年零 10 个月。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哺育了一代杰出人物，包括我国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后来做出重大贡献的文学家、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已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39-1.bmp}

（李慎兆）

新文化运动

(Xinwenhua yundong)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统称。包括“五四”前的启蒙运动和“五四”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时间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自2卷1号改名为

《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主要倡导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提出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民主,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态度与方法。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民主和科学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在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下,以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政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二千多年来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教条对人们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寻求真理、追求解放的浪潮,为中国接受十月革命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和进化论思想,是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舆论准备,其性质仍属旧民主主义。但从1918年下半年起,已开始有了新的内容与素质。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表示无限的欢迎与向往,由效法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转而效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由向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寻求出路,转而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此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并在新思潮百家争鸣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新文化运动已是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作舆论准备,其性质属于新民主主义了。“五四”后,许多早期宣传新文化的报刊转向以介绍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为主要内容,宣传社会主义的进步团体与刊物如雨后春笋增多起来,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大量翻译出版,涌现出一批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回击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坚持了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新文化运动就此结束。

(李慎兆)

新青年

(Xinqingnian) 五四时期著名的革命刊物。1919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月刊。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从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移到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参加编辑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专制与迷信、抨击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起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被称为青年界之“明星”、“金针”、“良师益友”。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开始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由民主主义刊物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刊物。1919年5月，出版了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1920年初，《新青年》编辑部又迁回上海。5月出版了“劳动节专号”。从9月第八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党的理论性的机关刊物，编辑部迁到广州。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组成季刊，由瞿秋白主编。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1926年7月停刊。

(李慎兆)

蔡元培

(cai Yuanpei 1868—1940)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字鹤卿，号子民。1892年时得翰林，旋补为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同情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回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1902年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任校长。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随后又发起组织爱国学社，从事革命宣传和爱国活动。1904年与章炳麟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任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留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忠君”、“尊孔”的教育方针和制度，对教育进行了若干改革。1913年赴法。1915年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1916年回国。1917年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研究，开展百家争鸣，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1920年2月，破例招收9名女生在北大文科旁听，随后正式招收女生，首开男女同校的新风。1923年出游欧洲。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2月回国，任国民党浙江政治分会委员。1927年后，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赞成中共提出的国内团结共御外侮的政治主张。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副主席，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人士。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后移居香港。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毛泽东在唁电中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遗著有《蔡元培选集》。

(李慎兆)

陈独秀

(Chen Duxiu 1879—1942) 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以前，创办《民国日报》、《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武昌起义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5年起创办并主编《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与孔学儒教。1917年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常以“只眼”笔名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与军阀，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直接鼓动作用。五四爱国运动中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入狱83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青年的启蒙导师，当时被称力“思想界的孙黄”(孙中山、黄兴)，“思想界的明星”，“五四”后，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联系纽约陆续在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李大钊一起并称为“南陈北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三大”前后，他提出“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等资本主义发展后，工人阶级再发动第二次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内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思想逐渐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自愿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进攻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从而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领导职务。以后他坚持错误立场，接受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观点，主张中共和无产阶级只能进行合法斗争，反对打倒国民党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成为取消主义者，并与彭述之等人组织秘密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中共开除党籍。1931年5月，被自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组织推为总书记，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5月病死于四川江津。

(李慎兆)

李大钊

(Li Dazhao 1889—1927)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读乡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次年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日留学期间，曾参加反袁世凯斗争，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研究马克思主义。1916年回国，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经济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6月，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编辑主任。不久又担任《国民》杂志社导师，《新潮》杂志社顾问。12月，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十月革命后，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是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同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作了坚决斗争。1920年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北方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都与其有关，与陈独秀有“南陈北李”之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北方区党的负责人，领导北方各地工人运动。1922年8月，参加中共西湖会议。会后会见孙中山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并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3年6月，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五个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作出了贡献。会后组建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领导北方的国民党工作。1924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到北京。之后，领导了国民会议运动和关税自主运动，并领导了内蒙人民的革命斗争。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北方区委书记。1926年领导北京人民开展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和段祺瑞卖国政府的三一八运动。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英勇就义。遗著编有《李大钊选集》。

(李慎兆)

胡适

(Hu Shi 1891—1962) 著名学者。原名洪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赴美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农科，后改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在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门下攻读博士，从此成为实用主义哲学信徒。1917年夏回国，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次年被选入北大评议会，任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和英文科教授会主任，同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文化，是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之一。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同年8月，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主义主张。1923年在北大创办《国学季刊》，提倡埋头“整理国故”。1929年著文提出“全盘西化”主张。此后发起“人权运动”，鼓吹把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移植到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逐渐依附国民党政权，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教育、农村复兴等委员会委员。1938年出任驻美使节，代表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拥护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参加伪“国大”并任主席团成员，领衔提出《勘乱条例》。1949年赴美。此后曾任国民党“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62年2月病死于台北。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

(李慎兆)

鲁迅

(Lu Xun 1881—1936) 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早年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春，鲁迅留学日本，初入东京弘文学院，后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他曾立志学医，希望用新的医学，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后又痛感改变国民精神比医学更为重要，于是弃医从文。留日七年，鲁迅广泛涉猎外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开始形成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并且确定了用文学作为自己为祖国独立自由、为人民思想解放而抗争的武器。在此时期内，他曾以《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著名论文，支持孙中山等革命派对保皇派的论战。

1909年8月，鲁迅离日归国后，先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开始进教育部工作。同年5月，随政府北迁，在北京政府教育部内历任部员、佾事等职，主管图书馆、博书馆和美术教育等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时代潮流鼓舞下，鲁迅开始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不久即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新军的伟大旗手。1918年初，鲁迅参加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同年5月，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猛烈抨击了封建宗法制度。此后，至1926年，又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等专集，以其独具一格的文艺创作和锋利的思想评论，对一切阻碍中国进步的旧势力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此期间，他还积极扶植、支持或参加发起了新潮社、语丝社、浅草社、莽原社、未名社等文学团体，为培养革命的文艺新战士倾注了心血。

1926年，鲁迅积极参加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运动和三一八运动，曾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是年8月南下福建，任厦门大学教授。不久又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和教务主任。1927年4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鲁迅愤而辞去了中大的一切职务。剧烈残酷的阶级斗争，促使他思想发生了新的飞跃。从此他彻底抛弃了长期信奉的进化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并在阴霾满天的白色恐怖中，无所畏惧地站到了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中。

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到达上海。在这里，他和许广平一起，开始了他后期十年最为光辉的战斗生活。

从1927年至1936年，鲁迅先后参加发起和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团体。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率领广大左翼作家，同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文艺观点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曾被毛泽东誉为：反“围剿”中“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在此时期，鲁迅创作了大量杂文，分别辑入《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这些杂文，以其犀利的笔锋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与此同时，他还领导和支

持了朝花社等进步文学团体，主编了《奔流》、《萌芽》、《语丝》等文艺期刊，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自 1927 年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后，鲁迅始终同党站在一起，他坚信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曾公开宣布：“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1932 年，他秘密会见了从苏区来上海的红军将领陈赓，向他了解红军反“围剿”的战斗和苏区人民的生活。1931 年至 1934 年，他和瞿秋白在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曾三次接待前来避难的瞿秋白，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这个著名的共产党人。1935 年，当闻讯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完成长征时，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托史沫特莱经巴黎致电中共中央，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1936 年 4 月，当他会见从陕北奉中共中央之命来上海的冯雪峰，听到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他心悦诚服，完全拥护，明确表示“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随后，他不仅撰文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阐述统一战线与文学运动的关系，而且身体力行，与郭沫若、茅盾、巴金等 21 人，代表文艺界的各个方面，发表宣言，率先结束论争，实现了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最终实现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当鲁迅愈战愈奋时，他原有的肺病日渐严重，1936 年 10 月 19 日在上海不幸病逝。鲁迅逝世后，广大群众争相奔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中共中央也发来唁电。10 月 22 日，送葬群众多达数万人。鲁迅遗体覆盖着上海民众所献的“民族魂”的旗子，安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1956 年，鲁迅墓迁至虹口公园，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题署墓碑。

鲁迅给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他撰有小说集 3 部，杂文集 17 部，散文诗 1 部，回忆散文 1 部，以及《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共约 400 万字。他还翻译了十四个国家将近 100 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印成 33 部单行本，共约 250 万字。此外，还辑录、校勘古籍 18 种，共约 100 余万字。鲁迅的上述著作，现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辑成《鲁迅全集》16 卷和《鲁迅译文集》10 卷出版发行。

（朱汉国）

毛泽东

(Mao zedong 1893—1976) 中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字润之。湖南湘潭人。辛亥革命爆发，参加湖南新军。1913年春到1918年夏，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其间，曾深入长沙、宁乡等五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主办工人夜校。1918年4月，与蔡和森、何叔衡等组织新民学会。8月，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北京，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领导湖南各界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主编《湘江评论》，并组织领导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1919年12月，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到北京，进一步阅读了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20年夏，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在长沙发起组织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湖南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组织领导湘区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局秘书。1924年1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一大”后，回到上海，除在中共中央工作外，还担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委员兼文书科主任和组织部秘书。1924年冬因病返湘休养，创立二十多个农民阶会，组织并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1925年9月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创办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并任总编辑，同时兼任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主任理事、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等职。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初到武汉，又担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等职，领导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1927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任中共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在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于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10月，到达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和前委书记。同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从1928年起，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正确的建党建军路线。

1930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前委书记等职，与朱德等一起领导中央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1933年1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后又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率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同年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1936年12月，被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此后，一直担任这一职务。1937年夏，发表《实践论》、《矛盾论》，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抗日战争爆发后，写了《论持久战》等著作，为党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报告，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1942年发动和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4月，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政治路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骗局和内战阴谋，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1945年8月，与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蒋介石等进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夏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指挥人民解放军先后粉碎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于1947年7月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和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同年6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任务和方针。9月，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10月1日，在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建国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胜利完成了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由他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并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同年9月，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同年夏，发动反右派斗争，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扩大化。1958年，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1960年冬以后，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63年至1965年间，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1966年至1976年，错误地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负有主要责任。1974年，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开创了对外关系的新格局。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编为《毛泽东选集》等。

毛泽东虽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与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慎兆）

新民学会

(Xinmin xuehui) 五四时期的重要进步社团。1918年4月17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于湖南长沙建立。开始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18年夏开始组织部分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学会活动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是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是法国。二者联系密切，互相促进。到1920年底，会员由最初的14人发展到70余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该会是湖南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1919年11月至1920年6月的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1920年9月至12月的湖南自治运动，以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都起了重要作用。1920年夏以后，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影响、带动下，大多数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宗旨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对建党建团问题进行了讨论。许多会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学会实际上就停止了活动。

(李慎兆)

周恩来

(Zhou Enlai 1898—1976)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胡必成。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秋，留学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6月，返回天津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9月，与邓颖超、郭隆真等人发起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1月，因领导天津学生向直隶省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爱国学生而被逮捕。在狱中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写了《警厅拘留记》、《检厅日记》两书，记述狱中斗争。1920年冬至1924年夏，先后到法国、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赵世炎、李维汉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工作。1924年8月回国，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1925年2月，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一起领导军校学生进行第一次东征。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0月，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11月，主持建立了中共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6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兼中共浙江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与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8月1日，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事委员会书记。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1935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会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西安，与蒋介石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和军事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等职，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从事中共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克服对日投降危险，制止反共逆流，粉碎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4

月，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在6月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抗战胜利后，为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1945年8月陪同毛泽东到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双十协定》上签字。此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谈判，支持和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2月，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代表中共同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导停战及谈判整军问题，签署了《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11月，在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后，从南京返回延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1948年9月后，参加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1954年后，任国务院总理，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此外，还兼任过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在中共第八届、第九届和十届一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在八届和十届一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多年来担负着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一起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亲自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60年参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科学文化工作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创造性地执行了重大外交决策，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工作的具体政策和基本原理。曾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影响。1950年1月，陪同毛泽东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1954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尼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方针，使会议通过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作出了贡献。在五项原则基础上，使我国和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61年10月，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972年1月，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打开了中美关系。同年9月，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举行会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挽救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费尽心血。1971年9月，与毛泽东等机智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1972年患膀胱癌后，仍坚持工作。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在我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规划。1976年1月8日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几十年来，周恩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赢得了中国人民

和世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李慎兆)

觉悟社

(Juewushe) 五四时期的重要进步社团。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于天津发起成立。宗旨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即“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1920年1月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该社主要活动为研究新思潮，探讨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领导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1919年9月21日，邀请李大钊到天津讲演，介绍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周恩来等11名社员到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等五社团成立“改造联合”。11月，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主要领导人赴法勤工俭学，国内社员陆续求学就业，觉悟社停止了活动。但社员仍保持着联系，以后半数以上的社员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李慎兆)

新民主主义革命

(Xinminzhuzhuyi geming)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虽然其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已经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世界革命的范畴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革命的领导、目的、前途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国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的革命，即属新民主主义革命。

(李慎兆)

共产主义小组

(Gongchanzhuyi xiaozu)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8月至1921年3月，先后成立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巴黎、东京八个党的早期组织。当时上海初建的党组织叫“共产党”；武汉、广州初建的党组织叫“共产党支部”；北京、济南初建的党组织叫“共产党小组”，1920年11月北京小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共产主义小组不是当时早期党组织的统一名称。这个名称最早见于陈潭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于1936年6月7日写的《回忆党的“一大”》一文。同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写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也用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以后就沿用下来了。

(李慎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yi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包惠僧、周佛海等13人。代表全国党员5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30日晚受到租界巡捕搜查后，大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继续举行。大会听取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情况的报告，起草、讨论和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从而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李慎兆)

董必武

(Dong Biwu 1886—1975)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号壁武。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五四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与陈潭秋等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作为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会后回湖北，负责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中共党组织，历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等职。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负责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返回湖北，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府常务委员兼农工厅厅长、《楚光日报》社社长、《汉口民国日报》社社长。大革命失败后去苏联，先后在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回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理主任。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之一，协助周恩来参加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领导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944年南方局改组为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任工委书记。此外，还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代表中共常驻参政会，同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45年4月，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抗战胜利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春国共谈判破裂后，率中共代表团撤返延安。随后前往华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和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1948年8月，主持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以后历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从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起，历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在北京病逝。

(李慎兆)

陈潭秋

(Chen Tanqiu)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名澄，字云先，又名秋荪。湖北黄冈人。1919年在武汉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发起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中共武汉区委负责组织工作。1923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同年6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安源担任中共安源地委及路矿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1924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1925年与董必武等建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组织部长。1926年任湖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武昌地委书记。1927年初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同年4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顺直（今河北省）省委宣传部长、中央组织部秘书、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粮食人民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1935年因伤转赴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年回国，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次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

（李慎兆）

何叔衡

(He Shuheng 1876—1935)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谱名启璿，学名瞻岵，字玉衡，号琥璜。湖南宁乡人。1918年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参加领导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1920年与毛泽东等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9月，被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委派为省通俗教育馆馆长，主办《湖南通俗报》。1921年7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与毛泽东一起回湖南开展建党活动。8月，与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任组织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创办的湘江学校校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并先后担任湖南省法院陪审员、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员、省中山图书馆馆长、水口山矿局监理、《湖南民报》馆馆长、中国济难会湖南总会执行委员兼财务委员等职。1927年马日事变后，离开湖南前往上海，与谢觉哉、徐特立、毛泽民等创办中共印刷厂聚成印刷公司，任经理，同时担任上海互济会书记。1928年6月赴苏联学习，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1930年7月回国，在上海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主要负责人。1931年秋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上杭县水口镇附近突围中壮烈牺牲。

(李慎兆)

王烬美

(wang Jinmei 1898—1925)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瑞俊，字灼斋。山东莒县北杏村(今属诸城)人。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1919年在济南参加五四运动，发起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0年9月，与邓恩铭、王翔千等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年底，建立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作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在苏参观学习。同年6月回国后，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主任。山东支部并入北方分部后，任北方分部副主任，在山海关、秦皇岛、唐山地区从事工人运动，整顿和健全了山海关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秦皇岛矿务局工友俱乐部，领导了山海关京奉铁路工人、秦皇岛开滦码头工人和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任中共山东地委书记。1924年1月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帮助建立山东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积极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孙中山北上路经天津时，以个人名义委派为特派员，在山东负责宣传和筹备召开国民会议，1925年初，前往青岛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和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一起，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同年1月，带病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19日在青岛病逝。

(李慎兆)

邓恩铭

(Deng Enming 1901—1931)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恩明，字仲尧，曾用名黄伯云。水族。贵州荔波人。1918年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在济南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1月，与王尽美等发起组织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1920年9月，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年底，与王尽美、王翔千等成立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作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委员。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山东淄博矿区从事工人运动，组织了矿业工会淄博部。年底，被派往青岛工作，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青岛市委书记。1925年2月，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4月，领导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8月，任中共山东区委书记。11月，被捕入狱，多次受刑，英勇不屈。1926年春，因病保外就医。同年夏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27年4月，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山东，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同年10月，被排挤出省委领导机构。不久调任青岛市委书记。1928年12月到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时，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1年4月5日，在济南英勇就义。

(李慎兆)

李达

(Li Da 1890—1966)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早年留学日本，开始幻想走“实业救国”道路，后接受十月革命影响，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比较系统地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1920年回国，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3月担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负责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宣传主任。同年9月，任中共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主编，主持出版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这前后，写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1922年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任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3年秋退出共产党。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出版了《现代社会学》一书。大革命失败后，长期在白区从事教学活动，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写了《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等专著，翻译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书。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年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常委、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国法学会理事、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等职。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遗著编有《李达文集》。

(李慎兆)

直皖战争

(Zhi wan zhanzheng) 北洋军阀直、皖两系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争夺中央政权的一场战争。袁世凯死后执掌北京中央政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大力扩充实力，企图用武力统一西南，排斥直系，因而与英、美帝国主义扶植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矛盾日益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英、美与日本争夺中国的加剧，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八省联盟会议，形成直、奉两系联合对皖。5月，被派往湖南与西南军阀作战的吴佩孚，撤防北上，通电指斥皖系“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7月8日，段祺瑞胁迫大总统徐世昌罢免曹、吴职务，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直系则设“讨贼军”大本营于保定，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奉系军阀张作霖也率兵入关，援助直系。14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双方各投入近10万人的兵力，激战于河北涿州、高碑店、琉璃河、杨村一带。开始皖系在日军支持下曾获小胜。后吴佩孚率军突袭皖军司令部，皖军在西线战败。同时奉军在东线协同直军作战，皖军遂全线崩溃。19日，段祺瑞辞职。接着直、奉军开到北京。北京政权落入直、奉两系军阀手中。

(李慎兆)

第一次直奉战争

(Diyici zhifeng zhanzheng) 北洋军阀直、奉两系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争夺中央政权的战争。直皖战争中直系军阀的胜利，表明英美势力在中国的加强。日本在失去皖系军阀这个工具后，转而扶植另一个工具奉系军阀与直系对抗。1920年8月，直、奉两系共推靳云鹏组阁。靳内阁亲直疏奉，引起奉系不满。1921年12月，张作霖进京推倒靳内阁，支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梁上台后，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同意日本要求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同时梁极力抑制吴佩孚。梁内阁的卖国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乘机逼迫梁士诒下台。由此引起直奉战争。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双方各动兵力约12万人，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交战。5月5日，直军在长辛店获得大捷，西线奉军溃败，东线奉军仓惶溃退。随后张作霖逃回滦州，率残部出关。6月17日，直、奉签订和约，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军阀独霸了北京政权。

(李慎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er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达、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大会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决议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政治状况，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对象、动力，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宣言同时指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党的最低纲领，也就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大会决定出版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会议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这次大会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特别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为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大会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没有提出武装夺取政权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

(李慎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Zhongguo laodong zuhe shujibu) 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

1921年8月成立于上海。张国焘任主任，出版机关报《劳动周刊》。除在上海设总部外，先后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建立分部。1922年8月，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主任改为邓中夏，把北京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改为机关刊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活动是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初期以铁路工人为工作重点。在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5月在广州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通讯机关。会后发动全国工人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1923年二七惨案后转入地下活动。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后撤销。

(李慎兆)

香港海员大罢工

(Xianggang haiyuan dabagong) 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重要罢工斗争之一。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由于英国资本家拒绝工人增加工资等要求，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至1月底，参加罢工的海员和运输工人增至3万多人。港英当局于2月1日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并玩弄“谈判”骗局，破坏罢工，引起香港各业工人和市民的公愤。3月初，海员罢工发展成为有10多万人参加的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纷纷离港回广州。3月4日，步行回省的工人队伍行至九龙附近的沙田时，英国军警向工人开枪射击，造成死6人、伤数百人的“沙田惨案”。此后，罢工继续扩大，使香港成为“死港”。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政府和全国工人支援下，香港海员罢工斗争坚持56天。3月8日，罢工谈判协议签字，港英当局接受海员所提条件。罢工取得胜利。这次罢工斗争成为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

(李慎兆)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149-1.bmp}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Anyuan lukuang gongren daba gong) 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重要罢工斗争之一。1922年5月1日，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领导下，江西安源煤矿工人和株萍铁路工人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同年秋，路矿当局拒发积欠工资，并企图解散俱乐部，引起工人强烈不满。9月初，毛泽东来到安源，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为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派刘少奇到安源工作。9月14日，1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并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工人发表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的17条要求。路矿当局勾结军阀派兵企图镇压，由于工人英勇斗争，组织严密，只好退步接受谈判。18日，签订了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福利的条约。罢工取得胜利。同年冬，俱乐部成员从开始时的300多人发展到13000人。

(李慎兆)

刘少奇

(Liu Shaoqi 1898—1969)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原名绍选，字渭璜，曾用刘士奇、赵之启、胡服等别名。湖南宁乡人。1919年在长沙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旅俄支部委员。1922年夏返回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被派往湖南，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参加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5年5月，作为汉冶萍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会后到上海，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底，在长沙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入狱，1926年1月获释。旋即前往广州，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5月，在广州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后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参加领导武汉地区工人运动。1927年1月，与李立三等领导武汉工人收回汉口英租界。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上海、天津、东北、华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参加中共顺直（即河北）省委领导工作。1928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审查委员会（即检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3月，出席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并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同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委员长。1934年4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党中央代表和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到达陕北后，继续领导工会工作，任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1936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白区工作中的错误，开创了白区工作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深入敌后，参加领导了山西新军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工作。1938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参与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1939年4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讲演。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军分会书记。1943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4月，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7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曾兼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军队攻占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朱德一起转移到华北，负责党中央委托的工作。7月至9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中国共

产党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战争时期，还兼任过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世界工联副主席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9年4月、1965年1月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不幸逝世。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主要著作收入《刘少奇选集》。

（李慎兆）

李立三

(Li Lisan 1899—1967)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之一。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湖南工作。同年11月以办平民教育名义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先后创建中共安源煤矿党支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并任支部书记和俱乐部主任，与刘少奇等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从事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活动。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冬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委。1926年4月回广州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同年9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参加领导了收回汉口、九江租界的斗争。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6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同年7月，与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五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陈独秀领导工作。8月，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广州起义失败后，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6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1930年6月至9月，在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去苏联学习，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1938年2月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被捕，1939年11月获释，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从苏联回国后，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职工委员会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1967年6月逝世。

(李慎兆)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Jing han tielu gongren dabagong)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罢工斗争的顶峰。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阻挠。总工会由郑州移至汉口江岸办公。为了抗议军阀的暴行，2月4日，在总工会统一领导下，京汉铁路全线3万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总工会发表罢工宣言，号召工人们为反抗万恶的军阀，争回人权及自由而战。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有52人惨死，300多人受伤，40多人被捕，千余人被开除，造成“二七”惨案。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人民、国外侨胞、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纷纷声讨军阀，援助罢工工人。为保存有生力量，罢工于2月9日结束。此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李慎兆)

第二次护法运动

(Dierci hufa yundong) 孙中山于 1920 年再次发起的以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号召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1920 年 10 月，孙中山扶植的粤军陈炯明部打败桂系占领广东。11 月，孙中山由上海回广州重组军政府，宣言护法。1921 年 4 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5 月，孙中山宣誓就职。为贯彻护法主张，孙中山于 11 月至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假道湖南北伐占据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孙中山的北伐主张遭到陈炯明的反对。陈炯明身兼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等要职，握有广东实权。他以“保境息民”为借口阻挠孙中山北伐，并与吴佩孚勾结，图谋夹击北伐军。1922 年 5 月，孙中山发布北伐令，在韶关设大本营改道从江西北伐。6 月 14 日，陈炯明乘北伐军平定江西之机，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包围总统府，炮击孙中山住所粤秀楼，孙中山脱险后登上永丰舰。8 月，被迫离粤赴沪，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李慎兆)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san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向警予等30余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大会。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与会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人怀疑国共合作，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在保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独立性的前提下，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和关于劳动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发表了宣言，修订了党章，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这次大会正确地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迅速形成，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但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土地问题以及革命军队问题，没有提出或没有作出明确决定。

(李慎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Diyici guonei geming zhanzhen) 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进行的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1924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于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武装，平定了商团叛乱，稳定了广东革命政权。国共合作的建立，直接推动了工农运动和各界群众运动的发展。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广东革命势力成立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举行了东征和南征，统一了广东全省。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国民党新右派代表人物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于1926年3月和5月，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进攻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使蒋介石篡夺了很大的权力，潜伏下了革命的危机。1924年至1926年间，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各派军阀为争夺北京中央政权和地盘，混战不已。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推倒了直系统治，成立了由皖系军阀段祺瑞为执政的临时执政府。北洋军阀形成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和原属直系后自成一派的孙传芳三大势力。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结合，对内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对外向帝国主义屈辱妥协。国共两党在全国发动了反奉倒段群众斗争。1926年3月，段祺瑞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5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挺进湖南。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7月11日占领长沙，8月下旬在湖北咸宁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中击溃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克武昌。11月上旬占领九江、南昌，歼灭孙传芳主力。12月18日占领福州，1927年3月19日占领杭州，24日占领南京，进逼上海。在北伐军胜利进军过程中，冯玉祥在苏联和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帮助下，于1926年9月率所部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进军甘、陕、豫西。北伐的胜利进军，极大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到1927年2、3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20万发展到200万。

汉口、九江的工人、市民驱逐英帝国主义者，收回了两地租界。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三次起义，于1927年3月22日解放了上海。与此同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到1927年3月，全国农会会员达到500万人。广大农民推倒地主政权、解除地主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开展减租减息减押斗争，猛烈冲击各种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从北伐战争开始不到10个月，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主力部队，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北洋军阀统治走向末路。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一方面增兵上海，炮轰南京，以武力相恫吓；一面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在帝国主义的拉拢、支持下，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相勾结，1927年4月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在其控制的地区举行反共“清党”。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失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渐由动摇走向反动，陈独秀等人继续推行投降主义的退让政策，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召集“分共会议”，公开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失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国共合作开始，以蒋介石的“清党”、汪精卫的“分共”而告终。

（李慎兆）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zhongguo guomindangdiyi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165人，共产党员约占14%。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李大钊、林森、谢持五人组成主席团，值日主持会议。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等决议案。大会宣言分析了中国的现状，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规定了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其政治原则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相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大会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否决了国民党员不得跨党的提案，确认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森、邹鲁、于右任等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选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等。在41名中央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10人。会后，孙中山主持召开一中全会，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及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军事等部。其中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廖仲恺任工人部长。这次大会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使国民党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方向。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标志着国民党的正式改组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单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联盟。大会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成为新的革命高涨的起点。

(李慎兆)

新三民主义

(Xinsanminzhuyi) 孙中山在 1924 年重新解释的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在 1924 年 1 月于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孙中山亲自审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是阐释新三民主义内容的经典性文献。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遍的、革命的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规定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原则。平均地权是由国家制定土地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对“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后不久，孙中山将上述方针归纳“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是凡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之企业，“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为之谋救济之道”。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它克服了旧三民主义没有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和彻底的反封建纲领、特别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纲领的根本弱点，对旧三民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采取了批判态度。它的政治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一个伟大功绩。

(李慎兆)

宋庆龄

(Song Qingling 1893—1981) 孙中山夫人。国际政治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原籍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文昌县，生于上海。早年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1908年到美国佐治亚州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学习。1913年毕业回国，任孙中山秘书，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5年10月与孙中山结婚。1922年在孙中山与中共代表磋商合作及与列宁所派使节反复交谈中，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时，坚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紧密合作，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在这次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武汉汪精卫政府公开叛变前夕，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同年8月1日，和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八一南昌起义时，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8月下旬赴莫斯科。1929年被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1931年回国后，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任何职务。1932年与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何香凝、柳亚子等率先响应。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亲自到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与冯玉祥、何香凝等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国际人士及海外侨胞募捐，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物质援助。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11月，随毛泽东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9年至1965年，连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曾代表国家多次参加国际活动。先后被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一贯关注新中国的妇女工作，三次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从1951年11月，一直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会长。热情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并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病逝。遗著编有《宋庆龄选集》。

(李慎兆)

胡汉民

(Hu Hanmin 1879—1936) 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曾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书记部书记、《民报》编辑。1909年任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广东都督。1914年任中华革命党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1919年与廖仲恺、朱执信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不久，提出建立民族国际来对抗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其右派面目日益暴露。同年9月孙中山离粤北伐后，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因与廖仲恺被暗杀有重大嫌疑，9月间以出使苏俄为名被逐出广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积极协助蒋介石反共清党，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立法院院长等要职。1931年2月与蒋介石争权被囚禁，九一八事变后释放。到广州与两广军阀结合，同蒋介石南京政府相对立。1933年在香港创办《三民主义月刊》，标榜抗日、反蒋、反共。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36年5月12日病死于广州。

(李慎兆)

汪精卫

(Wang Jingwei 1883—1944) 投机政客、大汉奸。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10年谋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武昌起义后获释。后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世凯窃国。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欧洲。1917年回国投奔孙中山。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2月为孙中山起草遗嘱，由此获得政治资本。1925年7月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被迫离粤去法国。1927年4月回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7月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928年冬，陈公博、顾孟余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奉之为改组派首领。1930年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派联合反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合作，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主张对日妥协。1935年11月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刺伤。1936年2月辞职出国。西安事变后回国，继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抗战爆发后，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抗战必亡”的谬论，并暗中与日本政府进行秘密投降活动。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副总裁。此外，还担任国民参政会议长、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等职。同年12月，由重庆逃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12月在上海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1944年3月去日本就医，11月病死在名古屋。

（李慎兆）

廖仲恺

(Liao zhongkai 1877—1925) 国民党左派领袖。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归善（今惠阳）人。出身旅美华侨家庭。少年就读于美国，1893年回国。1902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总部会计长。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任财政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护法斗争。1919年与朱执信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同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任财政部主任。1921年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1922年代表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翌年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任广东省省长、大元帅府秘书长、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部长、军需总监等职。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兼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等职。孙中山逝世后，坚决执行三大政策，同共产党亲密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李慎兆）

林伯渠

(Lin Boqu 1886—1960) 无产阶级革命家。名祖涵，号伯渠，字邃园。湖南临澧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了讨袁、护国与护法战争。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参与安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俄代表越飞同孙中山的会晤，以及陈独秀、李大钊同孙中山的会晤。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参加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参与举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委员，不久递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被蒋介石排挤出国民党中央，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随军北伐。1927年8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学习。1932年回国。次年3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和办事处主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红军驻西安联络处的红军总代表。1937年7月，与周恩来、秦邦宪前往庐山同蒋介石谈判，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时期为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七名参政员之一。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重要主张。从1937年至1948年一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与周恩来、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后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5月在北京病逝。

(李慎兆)

瞿秋白

(Qu Qiubai 1899—1935) 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江苏常州人。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与郑振铎等组织“社会实进社”，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以记者身份赴苏联，向国内如实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初回国，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主编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前锋》，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1924年1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是大会宣言起草人之一，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月在上海参加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同年5月参加领导五卅运动，主编《热血日报》。在这前后，写了大量论著，论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批判国民党右派和戴季陶主义。在中共党内，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1927年初由上海到武汉。在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7日，主持召开党中央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总方针。在八七会议前，和周恩来等一起，参与决定和指导八一南昌起义。会后，与毛泽东等一起，参与决定和指导湘、鄂、赣、粤等省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地方的起义。1927年冬至1928年春，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代表中共中央致开会词、作政治报告及讨论后的结论，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1930年9月与周恩来一起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之外。此后在上海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2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江西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同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遗著编为《瞿秋白文集》。

(李慎兆)

黄埔军校

(Huangpu junxiao) 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1923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指定以黄埔原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旧址为校址。5月5日第一期学生开始入学，6月16日正式开学。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部，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担任教授部副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为教官，并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军校还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军校是一个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新式学校，实行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开设的课程有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原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略、中国农民运动等。周恩来在建立学校政治工作制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从1924年5月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5期，共约7400人，成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重要力量，为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军校许多实权掌握在蒋介石手中，他利用职权极力培植个人势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军校实行清党。此后，黄埔军校成了蒋介石培养反共反人民骨干的学校。蒋介石用其在军校培养的亲信骨干控制军队，形成了所谓黄埔系。

(李慎兆)

蒋介石

(Jiang Jieshi 1887—1975) 原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906年考入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1907年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到上海，被派往杭州指挥光复之役，后任陈其美沪军第五团团团长。曾奉陈之命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913年在上海参加二次革命。1914年至1916年多次参加反袁起义。1916年6月，被孙中山派往山东居正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1918年3月参加护法战争，任粤军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自1916年8月至1922年，大部时间在上海从事投机买卖，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虞洽卿等经营恒泰交易所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从上海赶到广州护卫孙中山，得到孙中山信任。1923年2月任广东军政府大本营参谋长。同年8月，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1925年2月率军校学生和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6月，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出任广州卫戍司令。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0月，任东征总指挥率部举行第二次东征。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把共产党人排挤出第一军，还把地位超过他的汪精卫排挤出国。4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提出《整理党务案》，将共产党人排斥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其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开始形成其个人独裁。1926年7月离广州进行北伐。11月建大本营于南昌，为实现其以军治党、治政的军事独裁，提出迁都南昌，挑起迁都之争。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并在各地实行“清党”。4月18日于南京另立“国民政府”。

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举行“二次北伐”，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宣布实行“训政”。1929年至1930年，制造了一系列军阀混战，打败了反蒋各派系，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从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的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反革命内战，残酷摧残进步势力，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建立复兴社等特务机构，强化法西斯统治，并推行复辟封建礼教的新生活运动。1936年12月在西安事变中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4月，任国民党总裁。1939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参政会议长。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指挥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取得过台儿庄战役的胜利。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9月再次任国民政府主席。11月，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会谈，发表了《开罗宣言》。抗日战争胜利后，一面伪装和谈，一面加紧部署内战，企图独吞胜利果实。1946年7月，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11月，召开非法的“制宪国大”。1948年3月，召开“行宪国大”，当选为“总统”。1949年1月宣告“引退”，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控制国民党，

同年 12 月，由成都逃到台湾。1950 年 3 月，在台北重任“总统”。此后又四次连任“总统”。在国民党七至十大上，继续被选为“总裁”。1975 年 4 月在台北病死。

（李慎兆）

叶剑英

(Ye Jianying 1897—1986)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广东梅县人。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于民主革命。1922年任海军陆战队营长，陈炯明叛乱时，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1924年初，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参加创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兼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1928年冬，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与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红三军团参谋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在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紧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1936年12月，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参谋长、八路军驻南京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1937年至1941年，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1939年2月，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1941年2月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1945年12月，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1947年2月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1948年5月，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1954年10月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等职。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6年后，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一中全会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病逝。

(李慎兆)

恽代英

(Yun Daiying 1895—1931)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1917年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互助社。五四运动时，为武汉地区主要领导人。1920年发起创办利群书社。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安徽、四川等地任教。1923年到上海，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上海大学教授，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1924年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1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兼军校中共党团书记。5月，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兼任教员。1926年11月到武汉工作，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并担任总政治教官。同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政府委员、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兼职教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财务委员会委员、宣传委员会代主席。1927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中共六大后到上海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宣传部秘书长，主编党刊《红旗》。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任中共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同年5月6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次年4月29日在南京遭杀害。

(李慎兆)

萧楚女

(Xiao Chunü 1893—1927) 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和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原名树烈，学名楚汝，字秋。湖北汉阳人。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19年在武汉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恽代英等组织的利群书社，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四川任教，主编《新蜀报》。1924年秋任中共中央四川特派员，领导青年团的工作和四川的革命斗争。同年10月，与杨闇公等创建四川平民学社。1925年在上海与恽代英共同主编《中国青年》。同年8月到河南参加中共豫陕区工作，主编《中州评论》。不久返回上海，著文批判反动的戴季陶主义与国家主义派。1926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会后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协助代理部长毛泽东主办《政治周报》。5月至9月，任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专任教员。年底，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被聘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政治顾问。1927年4月，在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被捕，壮烈牺牲。

(李慎兆)

第二次直奉战争

(Dierci zhi feng zhanzheng) 北洋军阀直、奉两系为争夺中央统治权而爆发的第二次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权为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吴佩孚在英、美支持下，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一面准备对东北的奉系军阀作战，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同时加紧对人民的压迫。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反直系的各派军阀乘机反对曹、吴。奉系军阀张作霖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整顿军备，并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以及广东的孙中山形成反直三角联盟。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直系另一军阀孙传芳从江苏、福建进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以反对攻浙为由，于9月15日率奉军向热河、山海关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8日，吴佩孚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出兵迎战。奉系投入兵力17万人，直系投入兵力20余万，双方均有海空军参战。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十分激烈。10月7日，奉军下令总攻，12日，吴佩孚亲到山海关督战。正当两军在前方相持，北京空虚的时候，直系将领冯玉祥从热河前线秘密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10月23日，冯军进入北京，囚禁了曹锟。25日，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吴佩孚腹背受敌，全军覆灭。11月3日，率残部由大沽口浮海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之后，冯玉祥与奉系共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

(李慎兆)

北京政变

(Beijing zhengbian) 1924 年直系将领冯玉祥在革命高潮推动下于北京发动的政变。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不久被吴佩孚排挤出河南，改任徒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率部驻防北京南苑。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中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物，从 1920 年开始与孙中山发生联系，此后国民党人对冯玉祥不断进行争取工作。先后被吴佩孚打败的段祺瑞、张作霖也积极联络冯玉祥反直。1923 年 10 月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全国普遍反对。在反直浪潮中，冯玉祥与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1924 年 9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与热河一线奉军作战。孙岳、胡景翼分别被任命为京畿警备副司令和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时，冯军由古北口秘密回师北京，10 月 22 日夜，在孙岳部配合下占领北京城，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24 日，迫使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25 日，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任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11 月 2 日，曹锟被迫宣告下台，直系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同月 5 日，国民军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等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下旬，冯玉祥会同奉系军阀张作霖成立了由段祺瑞任执政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北京政权又落入官僚军阀手中。北京政变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武装政变，为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慎兆)

冯玉祥

(Feng Yuxiang 1882—1948) 国民党爱国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原名基善，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生于直隶青县，长于保定。行伍出身。1910年任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营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参加发动滦州起义。1914年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1915年奉令入川，反对袁世凯称帝，暗中与蔡锷联络，并促成四川独立。1917年7月，参加讨伐张勋复辟。1918年在湖北通电主和，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1920年派任佑民前往广州见孙中山。1920年7月直皖战争中，参加直系军队和皖系军队作战。1921年入陕，任第十一师师长、陕西督军。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出陕援直，转任河南督军。10月，调任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将所部改称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1月5日，驱逐溥仪出宫。1925年1月，前往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将国民军一军各部统辖于西北边防督办署，改称暂编西北陆军。此后冯部被人习称为西北军。1926年1月通电下野，赴苏联考察。4月于赴苏途中加入国民党。8月离苏回国，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国民军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抵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国民军联军，被推为总司令。率部誓师，表示遵奉孙中山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宣布全军将士集体加入国民党。五原誓师后，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整顿队伍，任命共产党人刘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采纳李大钊建议进军甘、陕。1927年5月，在西安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6月，占领郑州与武汉北伐军会师。后曾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1928年4月，与蒋介石、桂系、阎锡山三派新军阀联合举行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北伐”。以后因与蒋介石集团发生利害冲突举兵反蒋，先后爆发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战败通电下野，西北军分化瓦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1933年5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将日伪军驱逐出察哈尔境。后在蒋介石与日军联合进攻下失败。1935年重返南京，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被蒋介石免职。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与中共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与卖国政策。1946年9月赴美考察水利，在美国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反对美国援蒋内战。1948年初，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兼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响应中共号召，乘船由美国前往苏联，准备绕道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9月1日，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事遇难。著有《我的生活》、《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

(李慎兆)

五卅运动

(Wusa yundong) 1925年5月30日从上海爆发的全国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帝斗争迅猛发展。2月至5月，上海、青岛日资纱厂工人连续举行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5月15日，上海内外棉纱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名。接着租界当局又逮捕开展募捐援助工人斗争的学生，并提出损害中国工商业者利益的四提案，进行威胁，更加激起上海人民的义愤。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2千多人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演讲，抗议枪杀顾正红，反对“四提案”，又遭逮捕。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外的万余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4人，伤后不久死亡者9人，重伤数十人，逮捕4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人民，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开展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刘华任正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宣布总同盟罢工。自6月1日起，上海有20万工人罢工，5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6月7日，各界组成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公开领导反帝斗争的机关，提出撤退驻华之英、日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凶、赔偿等17项交涉条件。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北京、南京、武汉、天津、长沙、广州、济南、重庆等近500个城镇的人民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暴行，一些地方的农民也加入斗争。全国投入反帝斗争的群众约1200万人，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高潮。

帝国主义对上海人民的斗争继续采取镇压政策，同时采取分化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对资产阶级进行威胁利诱。上海总商会于6月19日宣布停止罢市，学生因暑期到来纷纷离校，工人阶级为避免孤军作战，决定改变斗争策略，由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在日英资本家先后答应“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对罢工工人在生活上“予以相当之帮助”、“酌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后，罢工工人于8、9月间复工。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李慎兆)

省港大罢工

(Shenggang dabagong) 广州和香港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而举行的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香港10余万工人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领导下，为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和实现自身要求开始大罢工。半月内罢工人数增至25万，并有10余万工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21日，广州英、美、日商洋行和沙面租界的工人也参加了大罢工。23日，广州和由香港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市郊农民、学生和黄埔军校学生军约1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游行队伍行至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英、法帝国主义军队猝然以机枪、步枪向隔河示威群众射击，英、法、葡等国军舰同时进行炮击，当场打死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无数，造成沙基惨案。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积极支援省港大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加强对罢工的领导，于7月3日正式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李森(李启汉)为总干事、邓中夏、廖仲恺等为顾问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组成有2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香港和沙面租界，使香港成了“臭港”、“死港”。这次罢工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坚持到1926年10月结束，历时16个月，是世界罢工史上罕见的。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锻炼了工人阶级，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58-1.bmp}

(李慎兆)

邓中夏

(Deng Zhongxia 1894—1933)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原名康，字仲懈。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1918年与许德珩等发起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国民》杂志。5月，参加北京学生五四集会游行，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与高尚德、何孟雄等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在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劳动音》周刊。1921年元旦发起成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5月，参加创办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负责北方分部的工作。1922年5月，作为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7月，到上海参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上海迁到北京后，接任书记部主任。在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参加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等，并起草《劳动法大纲》，在全国发起劳动立法运动。1923年二七惨案后，到上海任上海大学校务长。6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8月，参加在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后任团中央局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参与编辑《中国青年》。1925年2月，参加领导上海22家日本纱厂的大罢工。5月，到广州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和党团书记，与苏兆征等发动和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任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总顾问、工人纠察队训育长、法制顾问和劳动学院院长，主持出版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此外，还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1927年4月，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8月，在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初，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同年6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在苏期间写成《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1930年7月回国，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委。1931年冬，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回到上海。1932年任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遗著编为《邓中夏文集》。

(李慎兆)

苏兆征

(Su Zhaozheng 1885—1929) 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苏吉，广东香山人。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广州参加辛亥革命。1921年2月与林伟民等在香港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1922年1月，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任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海员工会代理会长。5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6月，领导省港大罢工，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春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劳工部长。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广州起义时，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这两个组织的执行委员。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1月回国，同年2月20日在上海病逝。

(李慎兆)

彭湃

（Peng Pai 1896—1929）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原名汉育，又名天泉。广东海丰人。1917年赴日本留学，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在日本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反帝爱国运动。1921年回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任海丰县教育局长。1922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创建赤山约农会。1923年先后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惠州农民联合会，当选为会长。同年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4月到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同年5月当选为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农工委员。9、10月间，当选为中共广州地委委员，稍后又当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1925年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1926年1月，发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3月，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秘书长。4月，在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农工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领导海陆丰农民起义，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和东江特委军委委员，在海陆丰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1928年11月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领导工作。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2月，兼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和省委军委书记。同年8月24日，由于叛徒出卖被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军阀逮捕，8月30日，被敌人杀害。遗著编有《彭湃文集》。

（李慎兆）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Guangzhou nongmin yundongjiangxisuo)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全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建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委派彭湃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主任。从1924年7月3日农讲所正式开办到1926年9月结束共举办了六届，第一、五届主任为彭湃，第二届为罗绮园，第三届为阮啸仙，第四届为谭植棠。1926年5月至9月的第六届，由主任制改为所长制，聘毛泽东为所长，招生范围也由以广东为主扩大到全国20个省区。农讲所学员都是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或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他们除了学习政治理论外，还进行军事训练，做社会调查和参加实际斗争。周恩来、萧楚女、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等都曾为学员讲授主要课程或作报告。农讲所培养了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学员毕业后分赴各地从事农民运动，其中许多人成为农民运动和大革命中的领导骨干，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59-1.bmp}

(李慎兆)

第一次东征

(Diyicidongzheng) 1925年2月至3月广东革命政府讨伐盘踞在广东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战役。1924年冬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于1925年1月7日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分三路进攻广州。中国共产党号召广东工农群众支持革命政府，保卫广州，打倒陈炯明。1月15日广州留守政府决定讨伐陈炯明。2月1日发布总动员令，以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为左路和中路，以黄埔学生军和粤军许崇智部为右路，开始第一次东征。右路军是这次东征的主力，由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统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战时政治工作，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帮助制定了东征计划并参加了东征。2月4日右路军占领东莞、石龙，11日占领宝安，15日攻克淡水，27日在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配合下占领了陈炯明的家乡海丰城。3月7日克复潮州、汕头。陈炯明逃往香港。3月底陈部主力溃败，残敌退往闽、赣边境。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李慎兆)

广州国民政府

(Guangzhou guominzhengfu)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政权机关。广东革命政府原为孙中山于1923年回广州后建立的大元帅府，孙中山任大元帅。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决定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它采用委员制取代大元帅府的一长制，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张静江等16人为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任主席。下设财政、军事、外交等部。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宣布它的职责是履行孙中山遗嘱，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为此，积极整顿内部，实现了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1926年底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李慎兆)

国民革命军

(Guomin gemingjun)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组建的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军队。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实现军政统一，于7月6日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的指导与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的军队和一切军事机关。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新练的军队和一部分粤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谭延闿所部湘军为第二军；朱培德所部滇军为第三军；在江西的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李福林所部福军为第五军；后来，程潜所部湘军为第六军；广西桂系李宗仁所部为第七军。国民革命军学习苏联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人担任。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先后曾任政治部主任或党代表。由于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军队中的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国民革命军取得了东征和北伐战争的胜利。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党政府军队仍用这一名称。
(李慎兆)

第二次东征

(Dierci dongzheng) 1925年10月至11月，广东革命政府第二次讨伐盘踞广东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战役。1925年9月，被击溃的陈炯明部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支持下，乘革命军回师平叛之际，重占潮州、汕头等东江一带，并集结重兵于惠州，企图和粤南的军阀邓本殷合力夹击广州。为彻底消灭陈炯明部统一广东，国民政府于9月28日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任命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军编为三个纵队，共3万余人。10月1日，东征军开始出师。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发，东江农民为革命军当向导、运粮食。海陆丰农民在革命军到达前，就占领了县城选举了县长。10月14日，东征军攻占了号称“南中国第一险”的惠州，歼灭了敌军主力。11月初占领梅县、汕头，再度收复东江，陈炯明部被全歼。

(李慎兆)

中山舰事件

(Zhongshanjian shijian)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打击共产党，进一步篡夺军权而制造的阴谋事件，亦称三二 事件。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向海军局传达蒋介石命令，要海军局迅速派兵舰到黄埔候用。但19日中山舰开抵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经请示蒋介石，中山舰又开回广州。蒋介石借中山舰的往返开动，诬陷共产党阴谋暴动，要将他绑架到苏联，推翻国民政府，改建工农政府。20日，擅自宣布广州戒严，调动军队断绝内外交通，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占领中山舰和海军局，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扣留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做党代表与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接着又强迫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50多名共产党员退出该军。蒋介石还利用这一事件排斥了汪精卫，逼汪离粤出国。由于中共陈独秀等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使其阴谋得以实现。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60-1.bmp}

(李慎兆)

整理党务案

(Zhengli dangwan)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制造的排挤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阴谋事件。1926年5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以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名，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任职和活动做出种种限制。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和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1/3；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共产党发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对蒋介石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阴谋，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使这一提案在会上得到通过。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垄断了党政军大权。

(李慎兆)

“三·一八”惨案

(Sanyiba canan)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卖国政府屠杀爱国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1926年1月，在英、日帝国主义指使下，直、奉军阀达成“谅解”，联合进攻国民军。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大沽口炮台，伤国民军10余人。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16日，日本联合英、美、德、意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由，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撤除一切防务，限48小时内答复，否则“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各国军舰20余艘云集大沽口，进行武力威胁。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3月18日，在国民党中央北京执行部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各界人士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8国最后通牒国民示威大会，李大钊在会上作了讲演。大会通过了驳复八国最后通牒、宣布辛丑条约无效、电勉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等决议。会后2千多名群众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当请愿队伍行至国务院东辕内时，执政府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余人。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陈乔年等为掩护群众而负伤。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使革命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此后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李慎兆)

北伐战争

(Beifa zhanzheng) 1926年至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进行的、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直接目的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五卅运动和全国工农运动的发展，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可靠的后方。这些表明，举行北伐的条件已经成熟。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中央特别会议，确定现时党的主要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并作出了准备迎接北伐的决议。5月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奉令为北伐先遣队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月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北伐动员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10万人。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白崇禧为总参谋次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敌军北洋军阀有三支：一是盘踞于湘、鄂、豫、陕、冀一带并控制京汉铁路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拥有兵力20万人；二是占据江、浙、皖、赣、闽五省从直系军阀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拥有兵力20万人；三是占据东北和京、津地区及津浦路北段，并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共有兵力35万人。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敌人内部矛盾状况，北伐军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首先以主力攻取两湖，消灭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然后转向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在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及其他军阀。7月12日，北伐军占领长沙。8月下旬，在湖北咸宁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中击溃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克武昌。至此，两湖战事结束，主战场转向江西。11月5日，攻克九江。8日，进占南昌，歼灭了孙传芳主力。12月18日，进入福州，占领福建。1927年初，北伐军分三路向长江下游的浙江、安徽、江苏推进。2月18日，占领杭州。3月中进抵上海附近。3月22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在北伐进军过程中，冯玉祥于1926年9月从苏联回国，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帮助下，于9月17日率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随后经甘肃、陕西进入豫西。国民革命军自广州誓师北伐，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就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湘、鄂、赣、闽、皖、苏、浙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把国民革命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在北伐胜利进军影响下，西南川、滇、黔各省地方军阀也转向拥护国民政府。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61-1.bmp}

(李慎兆)

叶挺独立团

(Yeting dulituan) 北伐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1925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领导下，于广东肇庆组建。其前身是中共两广区委领导的成立于1924年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此外，独立团还从黄埔军校抽调一部分人员作骨干。战士多为招募的新兵。全团共2000余人，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干部的任免、调动由共产党决定。团设党支部，直接由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领导。1926年5月作为北伐先遣队开赴两湖前线。6月5日攻占攸县，打破了吴佩孚的战略企图，稳定了湖南战局，为北伐军主力进入湖南创造了有利条件。8月27日、30日攻占汀泗桥、贺胜桥两战役和8月31日至10月10日围攻武昌的战斗中，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北伐军占领武昌后，该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李慎兆)

叶挺

(Ye Ting 1896—1946) 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字希夷，号西平。广东惠阳人。1912—1918年，先后在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孙中山创建的粤军，任第一支队副官，并加入国民党。1920年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工兵营营长。1921年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率部抵抗叛军，保护孙中山脱险。1923年任大元帅府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由苏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独立团团长。1926年5月，率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挺进湖南，为北伐军开辟了前进道路。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击溃吴佩孚主力。在武昌战役中，首先攻入城内。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兼第七十五团团长。1927年4月，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5月，率部击溃夏斗寅叛军。8月，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总指挥部总指挥、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去欧洲，与中国共产党失去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新四军军长。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挺进敌后，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张。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先后关押在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了著名的《囚歌》。1946年3月获释，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8日，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李慎兆)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Hunansheng diyici nongmin daibiao dahui) 1926年12月1日至26日在长沙召开，参加大会的有52个县、2个特别区的农民协

会代表170人，代表会员130多万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应邀出席了大会，在欢迎他的大会上和大会闭幕典礼上，作了两次重要报告。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要发展工商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号召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来抵抗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严厉斥责了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反对农民运动的反动理论。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禁止高利贷、反对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33个决议案。选举了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这次大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到1927年4月，湖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518万人。

(李慎兆)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Shanghai gongren sancu wuzh-uang qiyi) 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配合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而举行的三次起义。第一次为1926年10月23日至24日。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脱离孙传芳独立，并向上海进攻。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钮永建结合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流氓，准备暴动，响应夏超。中国共产党决定与钮永建合作，发动起义。由罗亦农、赵世炎担任总指挥。23日，上海总工会下令工人举行起义。由于夏超为孙传芳所败，工人战斗力量较弱小，仅有130名武装工人和2000名没有武装的战斗队伍，准备不充分，起义遭到失败。24日晨，中共上海领导机关下令停止起义。第二次为1927年2月22日。2月18日，北伐军进占嘉兴，孙传芳准备从上海退却，由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前来接防，上海政局不稳。中共江浙区委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18日晚，上海总工会发出总同盟罢工令，并发表罢工宣言，提出政治经济要求17条。19日大罢工开始。参加罢工人数达到36万。21日晚，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同敌展开局部战斗。22日，总同盟罢工转为武装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蒋介石又下令北伐军停止进攻上海，起义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再次失败。第三次发动于1927年3月21日。第二次起义失败后，周恩来来到上海，以中共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身份领导和组织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和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一起，总结了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做了充分准备。组织了5千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对敌人军事部署进行详细侦察，制定了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起义计划。起义前10天，发动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破坏张宗昌运兵上海的计划，切断敌人对上海的援助。3月21日，北伐军抵达上海郊区龙华镇，张宗昌直鲁联军接替孙传芳驻防上海，立足未稳。中共浙江区委和上海总工会决定立即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21日中午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接着转为武装起义，向直鲁联军发起全面进攻。这时，进抵上海近郊龙华的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依照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阴谋利用北洋军阀削弱工人力量。上海工人经一天一夜激战，于22日下午占领上海，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并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其中共产党员在政府委员中占过半。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李慎兆)

戴季陶

(Dai Jitao 1890—1949) 名传贤，字选堂，又字季陶，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职于《上海日报》，后任《天铎报》总编辑。1911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民权报》。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元帅府秘书长。1919年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同年5月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积极从事反共煽惑活动。6、7月间，连续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歪曲和篡改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所谓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等人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理论根据。

1927年，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8年以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

(李慎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Siyier fangeming zhengbian)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1927年春，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高涨，北洋军阀走向末路的形势下，中外反动势力力图从革命阵营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分化统一战线，破坏中国革命。在北伐战争中势力迅速膨胀，政治上日趋反动的国民党新右派头目蒋介石，成为他们选中的对象。蒋介石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建立其独裁统治，迫不及待地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加紧进行叛变革命的活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帝国主义称赞他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许其带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驻扎上海的外国侵略军帮助他镇压革命。蒋介石向帝国主义者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蒋介石在取得帝国主义支持的同时，又同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和流氓势力相勾结。上海大资产阶级保证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4月1日首先提供300万元。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和所谓“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上海总工会，充当蒋介石的流氓打手。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开“清党”反共会议，部署反革命政变。这时，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仍右倾麻痹。4月5日，他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国共两党“开诚合作”。这个宣言掩盖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企图，麻痹了革命群众。蒋介石一面调动军队控制上海，布置大屠杀；一面玩弄政治欺骗手段，4月6日亲题“共同奋斗”的锦旗，派乐队送给工人纠察队，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以麻痹工人的警惕性。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于11日发出“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4月12日凌晨，由“共进会”组织的全副武装的流氓分子，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公共租界大量出动，袭击闸北总工会和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14处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反击，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即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打死打伤工人300多人。为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13日，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总工会召开了有6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一致决议要求惩办祸首，发还工人武装。会后群众冒雨游行示威，向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时，埋伏在各里弄的反动军队用机枪向群众扫射，历时十五六分钟，当场打死工人、市民100多人，伤者无数。接着，反动派下令禁止罢工游行，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等先后牺牲。此后，在蒋介石控制的其他地区，也相继举行“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计其数。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

(李慎兆)

马日事变

(Mari shibian)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日益动摇，反动军官准备公开叛变。1927年4月底，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在汉口召集一批反动军官开会，密谋反共清党，举行武装叛变，决定首先在湖南发动。5月初，何健派其军部参谋余湘三到长沙进行策划，将土匪出身的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部从湘西调到长沙。5月17日，许克祥、余湘三与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陶柳等举行会议，决定21日举行公开叛变，由许克祥任指挥官。21日晚，许克祥率叛军1000余人，分头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省党校、省特别法庭等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人李维汉、夏曦等被抄家，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事变后，许克祥与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继续在长沙及各县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6月10日，被杀害者达1万多人。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这一事变是武汉汪精卫集团开始叛变，并准备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合流的信号。

(李慎兆)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Qiyiwu fangeming zhengbian)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等反革命势力对武汉地区加紧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赣三省工农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下，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逐渐由动摇走向反动。1927年4月，汪精卫提出制裁所谓“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一切言论行动。5月，武汉政府连续发出通告、训令，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禁止工会、农会逮捕反革命和没收其财产，保护“公正绅耆”，保护“军人田产”。指责农民协会“幼稚过当”、“骚扰后方，挠动人心”。下令解散湖北黄冈、黄陂两县的农民协会。在汪精卫的怂恿下，5月17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鄂南叛变。5月21日，驻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叛乱。5月29日、6月5日，江西省长兼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共产党人“遣送出境”。湘鄂赣地区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破坏革命组织，杀害革命群众。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发来的紧急指示不向中共中央传达，直接拿给汪精卫，汪即以此作为“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召集武汉地区非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策划反共办法。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蒋介石、冯玉祥等举行徐州会议，密谋“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在革命的紧急关头，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继续坚持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下令制止农民没收地主土地，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企图用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致使汪的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决定：在一个月內，开第四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问题。在未开会以前，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随后，反动军队封闭了工会、农会和所有革命团体。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蒋介石的“清党”，汪精卫的“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破裂，国民革命遭到失败。国民党由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变为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党，国民政府由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变为地主买办阶级的反革命专政策。

(李慎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Dierci guonei geming zhanzheng) 又称“十年内战”或“土地革命战争”。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战争。这次战争历时十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7年8月至1931年9月。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一方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镇压，另一方面继续同张作霖争夺对全国的统治权。经过1928年的“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国民党从形式上将其统治扩展到了全国。国民党各派军阀在打败奉系之后，内部矛盾开始激化，军阀混战接连发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军阀混战中打败了所有对手，在全国确立了统治地位，他们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残暴的白色恐怖。在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统治下，革命势力受到了严重摧残，革命形势转入了低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不畏强暴，坚持斗争。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率先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英勇的共产党人在湘、赣、粤、鄂、豫、皖、闽、浙、陕等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大张旗鼓地组织工农武装，走上了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中组织的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并进一步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中国共产党相继开辟了湘鄂赣、湘赣、闽浙赣、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陕甘、海陆丰、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部队。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不久，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第二阶段，1931年9月至1935年12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加剧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大敌当前，蒋介石统治集团却坚持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1932年6月和1933年10月，蒋介石又相继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五次“围剿”。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中国共产党一面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并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民主浪潮；一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正确作战方针，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曾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左”倾错误领导下也损失严重，被迫撤离根据地，先后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在长征中，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排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干扰，

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长征，推动了中国革命重新走向高潮。

第三阶段，1935年12月至1937年7月。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华北事变，进一步加剧了中华民族危机，国内阶级关系亦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地于1935年12月底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克服了1931年以来党所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及时地调整了各项政策，改变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方针。与此同时，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国民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也逐渐改变了它的对日政策。

1936年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继续向着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有力地推动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

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求停止内战，实现一致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内战的初步结束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实现。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朱汉国）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nanjing guomin zhengfu de ch-engli) 南京国民政府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成立于南京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1927年4月15日，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定都南京，否认武汉国民政府，并通过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案。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国民政府于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典礼。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成立大会宣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奠都南京宣言，并敦请汪精卫、谭延闿来南京行使职权。成立大会还发表了《国民政府宣言》，宣布了所谓“国民革命之方略”四条：“一曰使革命军愈与人民密切的结合；二曰造成廉洁之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之实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会议制，推举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蔡元培、李宗仁、何应钦、古应芬、柏文蔚、蒋作宾、陈铭枢、甘乃光、陈果夫、叶楚傖等为政府委员，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为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府各部门组成情况：秘书长钮永建，民政部长薛笃弼，外交部长伍朝枢，财政部长古应芬（钱永铭代），司法部长王宠惠，交通部长王伯群（暂代），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名义上虽由胡汉民掌印，实际大权系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执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内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清党”的通缉令。明令缉拿鲍罗廷、陈独秀、邓演达、吴玉章、徐谦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等197人。5月5日，成立了以邓泽如为首的所谓“清党委员会”，立即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开展“清党”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表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一开始就是一个抛弃孙中山三大政策，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权。

南京政府成立后，统治中国达二十二年，其间虽屡屡改组，组织方式也由会议制，改为主席制，后又改为总统制，但最终仍未逃脱覆灭的下场，1949年被中国人民所推翻。

(朱汉国)

宁汉合流

(Ning han heliu) 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武汉国民党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合在一起，史称“宁汉合流”。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建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造成“宁汉分裂”的局面。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叛变革命，消除了宁汉双方在反共问题上的分歧，使宁汉合流成为可能。此时，手握重兵的冯玉祥，几次致电宁汉双方，提议召集会议，讨论党务，解决党内争执。7月24日，武汉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回电冯玉祥，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并同意迁都南京。8月8日，南京的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等通电表示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至此，宁汉都有合流的契机，但双方存在着争夺国民党正统的尖锐斗争。武汉方面力主倒蒋，在宁的桂系与蒋介石也是貌合神离。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加之亲自督战的津浦线战事失败，8月13日，突然宣告下野，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亲蒋的张静江、胡汉民、吴稚晖等亦纷纷离宁赴沪。南京方面的实权主要落在早就有联汉之意的桂系手中，这为宁汉合流提供了有利条件。8月25日，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8月下旬到9月上旬，武汉的谭延闿、孙科和汪精卫、陈公博先后到达南京。汪精卫到南京后，即以国民党中央的“正统”自居，主张立即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宁汉纠纷问题。但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宁方响应。其时，由汉来宁的谭延闿、孙科也不再听命于汪，汪精卫只得放弃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孙科提出成立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的建议，得到宁、汉、沪（原西山会议派）三方赞同。9月15日，特委会成立。17日，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并发表宁汉合作宣言，宣布国民党“统一”完成。至此，宁汉合流正式实现。但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利害冲突，不可能达到真正统一。形式上的“统一”也很快为新的分裂所代替。

（朱汉国）

阎锡山

(Yan Xishan 1883—1960) 长期割据山西的国民党军阀。字百川。山西五台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 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 年回国，历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习、监督，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员、标统等职。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省长，从此长期盘踞山西。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电服从三民主义，归附国民党政府，并在山西进行“清党”反共。1928 年 2 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随后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等一起，进行了北伐张作霖的战争。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北平分会代理主席兼平津卫戍总司令等职。1930 年，联合冯玉祥、汪精卫等人，结成反蒋联盟，从而引起历时半年的国民党军阀间的“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失败后逃居大连。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返晋，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不久恢复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36 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曾同意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出任会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曾同意在山西省内建立青年抗敌决死队，进行抗日。1939 年底，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发动了反共的“十二月事变”。事变被击退后，采取保存实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并与日本侵略者加紧勾结，1941 年曾与日本达成共同防共的《汾阳协定》。抗战胜利后，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9 年 6 月 3 日在广州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同年 12 月 18 日去台湾。在台湾，曾任国民党当局总统府资政等职。1960 年 5 月 23 日在台北病死。

(朱汉国)

李宗仁

(Li Zongren 1891—1969) 国民党桂系军阀首领。字德邻。广西桂林人。早年入广西陆军小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6年参加护国军，后投桂系军阀陆荣廷部。1917年护法战争时参加粤桂联军，1921年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次年改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1923年3月与广东革命政府建立了联系，同年底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奉孙中山命，任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长。1925年与黄绍竑、白崇禧一起率部击败旧桂系沈鸿英部，从而统一广西，开始了新桂系在广西的统治。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曾指挥汨罗江、贺胜桥之战及武昌攻城战。1927年3月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协助蒋介石“清党”。1928年2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随后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一起指挥了北伐张作霖的战争。同年10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1929年蒋桂矛盾激化，被国民党“三大”以“拒绝裁军”之由开除党籍。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发表反蒋通电，失败后出走香港。后重返广西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与蒋、粤军交战再次失败。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任反蒋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失败后退守南宁。1931年5月，又与陈济棠在广州联衔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九一八事变后，被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恢复了党籍。1936年发动抗日反蒋的“六·一”事变，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倡导焦土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1938年3、4月间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徐州失守后，督师转战于鄂北、豫南，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游击基地，与日军周旋。1943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和第十战区。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1948年4月当选为南京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引退后，代总统职权。同年底，借口出国疗疾，携眷旅美。1954年被蒋介石免去副总统职务。1955年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1965年7月冲破重重险阻，偕妻回到祖国，希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声明“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欢迎。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病逝。

(朱汉国)

二次北伐

(Erci beifa) 1928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联合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因国民党自称这次战争是1926年北伐的继续，故有“二次北伐”之称。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了提高身份，巩固其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蒋介石打出了“继续北伐”的旗帜，意图把自己装扮成继承孙中山未竟事业的首领，以便“理直气壮”地号令天下，使国民党各派听其指挥。而此时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实力派，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也都有“北伐”之意。于是，国民党中各派军阀，在相互利用、相互争夺的基础上取得了暂时的妥协，并一致展开了同奉系军阀的战争。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进行“北伐”的决议。2月11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之后，蒋介石以“北伐”之名，对军队进行了重新改编。蒋介石把北伐各军编为四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全军共40多个军，约70余万人。北伐部署是：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京汉两线间的鲁西和直南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两线向东攻占石家庄，再转京汉线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然后四路会攻京津。当时张作霖的“安国军”，参战兵力约40万。

1928年4月7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第一集团军在鲁南和津浦线进展顺利。7日发起攻击，9日占郟城，10日克台儿庄，中旬占临城、滕县、兖州、曲阜，下旬占莱芜、泰安，5月1日克济南。第二集团军发起攻击后，在直南首克邯郸，后受安国军重兵相抗，苦战于大名、彰德一带；在鲁西，则连克郛城、巨野、济宁。第三集团军于4月20日冲出娘子关向石家庄进攻。

国民党军的北伐，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4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山东。5月3日，公然武装进攻济南，对济南居民和进驻济南的北伐军进行大肆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面对日本的武装干涉，蒋介石妥协退让，命令部队撤离济南，绕道北进。

1928年5月上中旬，北伐军继续向奉军进攻，相继占领石家庄、临沂、德州等地。5月19日，蒋介石调整部署，以第一、二集团军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线，兵分三路，进逼京津。北伐军很快占领绥远和大同、张家口、保定、沧州等地。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张作霖在退往沈阳途中，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6月8日，阎锡山部进入北京，12日接收天津。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蒋、冯、阎、桂联合的“二次北伐”，也随之宣告完成。

蒋冯阎桂联合进行的“北伐”，实际上是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军阀争夺北中国统治权的战争。这次北伐，尽管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除了新旧军阀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旧的矛盾和斗争很快就为国民党新军阀间的矛盾和斗争所取代。

(朱汉国)

济南惨案

(Jinan canan) 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军民的血腥事件。

1928年4月，亲英美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打着“统一”的旗号，开始了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英美势力向中国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于4月下旬，出兵侵占济南。5月1日，国民党北伐军开进济南，日军即寻衅闹事，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军又向国民党北伐军驻地大举进攻，将北伐军7000余人缴械。蒋介石命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日军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将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16名外交人员捆绑起来，并将蔡的耳、鼻、舌、眼剜下，用机枪将十七人全部杀害。是日自早至晚，日军任意枪杀居民，尸体遍街，惨不忍睹。5月4日，蒋介石下令撤出济南，绕道北进，但日军并不罢休。5月7日，日军向蒋介石提交最后通牒，提出要求严惩北伐军有关高级军官等五项条件，并限12小时以内答复。5月8日清晨，蒋介石派出代表熊式辉、罗家伦驰奔济南，准备答复日本。但日军谬称期限已过，下令重炮轰城。5月11日，济南全为日军占领。日军进城，再次大施淫威，杀人放火，连续数日不止。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查明：“济案”中，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

济南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曾由此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迫于民众的压力，国民党南京政府于“二次北伐”结束后，也曾多次与日本政府交涉“济案”问题，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抵赖罪责和国民党政府的迁就妥协，直至1929年3月28日，才达成“济案”协定。在中国政府保证日本人“生命财产之安全”的条件下，日军撤离济南。济南惨案至此结案。

(朱汉国)

皇姑屯事件

(Huanggutun shijian)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沈阳近郊皇姑屯火车站制造的炸死张作霖的事件。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但是随着奉系军阀集团势力的不断扩大和日本索取东北“权益”胃口的加大，加之英美势力的渗透，奉日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特别是1927年张作霖不但未能满足日本要求修建铁路和自由租借东北土地等要求，反而引进英美资本，修建大通（大虎山到通辽）、沈海（沈阳到海龙）等铁路和葫芦岛港，从而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不满。1928年5月中旬，南京政府的“北伐军”直逼京津，张作霖政权岌岌可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和高级参谋河本决定乘机谋杀张作霖，企图制造东北政局混乱，然后借口“维护治安”，出兵占领东北。为此，河本制定了杀害张作霖的详细计划，准备在张回沈阳途中炸车。

1928年6月4日清晨，当张作霖的专车行驶至沈阳西北郊皇姑屯车站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处时，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在南满铁路吊桥的炸药爆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和张作霖的一个姨太太当即炸死，张身受重伤，被急救回沈阳“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毙命。这就是皇姑屯炸车事件。

张作霖被炸死后，由于奉系当局秘不发丧，使日军未敢轻举妄动。当天，奉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作霖长子张学良连夜离京“奔丧”。回沈阳后张学良承袭父职，稳定局势，至21日才正式公布张作霖死讯，致使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未能得逞。

(朱汉国)

东北易帜

(Dongbei yizhi) 奉系军阀控制的东北地区归属国民党南京政府统一管辖的事件。1928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联合发起北伐奉系军阀的战争。一个月内，国民党军逼近平津。张作霖迫于形势，于6月3日放弃北京，退回关外，不意在翌日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军炸死。其后，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和东北政局的严重，于7月1日通电全国，表示愿与南京政府妥协。其时，国民党南京政府鉴于济南惨案的“教训”，也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随后，张学良、蒋介石之间互派代表，多次磋商，张学良的举动曾遭到一直企图独霸我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日本政府首相田中义一为此多次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强行干涉东北易帜。6月下旬至7月中旬，田中义一三次电令日本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反对张学良与南京政府统一。8月4日，日本政府又派原驻华公使林权助作为特使，假凭吊张作霖之名，到东北干涉张学良易帜。11月初，田中义一亲自接见东北赴日代表，以6000万元的资助，诱使张学良停止易帜。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终未能阻止张学良易帜的决心。经过五个月的交涉和斗争，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率东北各军政要员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12月3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北洋军阀的最后一支力量——奉军，纳入南京政府的军队体系，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朱汉国)

蒋桂战争

(Jiang gui zhanzheng) 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关于军队的编遣和两湖地盘问题。1928年春夏之际，李宗仁趁“二次北伐”之机，控制了两广、两湖，并在平津等地大量扩充军队，从而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29年1月，蒋介石为削减其他军阀的兵力和地盘，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会上，李宗仁联合冯玉祥，反对缩编自己的军队。蒋桂间矛盾日趋明朗。这时双方都在秣马厉兵，准备战争。1929年2月19日，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免去亲蒋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职务。这一事件成为蒋桂战争的导火线。3月7日，蒋介石电告李宗仁，为维护“中央”威信，不得不动调军队作正当防卫。这是蒋介石的公开宣战书。一时间，蒋桂双方调兵遣将，准备大战。3月25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蒋军兵分三路，设讨逆行营于江西九江，任命朱培德、刘峙、韩复榘为各路总指挥。桂军由于战线太长，内部矛盾重重，加之前线重要将领李明瑞、杨腾辉等为蒋介石收买倒戈，因此一战即溃。4月21日，桂系放弃武汉，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4月25日，蒋介石亲赴长沙，部署进攻广西计划。5月5日，李宗仁以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名义通电讨蒋，企图再决一战，但已是强弩之末。这时广东已为当时亲蒋的陈济棠所控制，蒋介石与陈济棠南北夹攻广西。6月27日，倒向蒋的原桂系派俞作柏部进驻南宁，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通电下野。蒋桂战争至此结束。

(朱汉国)

中原大战

(zhongyuan dazhan) 又称“蒋冯阎大战”。1930年国民党军阀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及其他反蒋派系在中原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混战。

1929年内爆发的蒋桂、蒋冯、蒋唐(唐生智)战争,都以蒋派军阀势力的胜利告终。但军阀内部的矛盾依然如故。冯玉祥、李宗仁等势力及汪精卫改组派等政客集团不甘心失败,决心寻找机会与蒋介石再作较量。而尚未被蒋打败的阎锡山则预感到他将成为蒋的主要打击目标,反蒋的态度遂更加坚决。于是,1930年春,上述各派势力终于形成了反蒋大联合,决心与蒋决一死战。3月中旬,冯、阎、桂三军将领联名发出逼蒋下野通电。4月初,阎锡山和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就任反蒋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5月初,阎、冯举行郑州会议,作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同时,蒋介石也完成了军事准备。5月1日,蒋介石发表讨阎、冯誓师词。5月8日,蒋坐镇徐州,准备亲自指挥陇海、津浦两线战事。5月1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于是,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在绵延数千里的战场上,空前的军阀大混战正式爆发。战争初始,反蒋联军南北夹攻,蒋军失利。6月底,广东军阀拥蒋出击,打败了从南向北攻蒋的桂军,解除了蒋介石的南线之忧,顿使战况开始发生逆转。8月,冯玉祥在陇海线集中大部兵力,对蒋发动猛烈攻势,但一因时逢大雨,作战困难;二因阎部军队不积极配合,终未达到作战目的。此后,反蒋联军开始由主动转为被动。9月18日,双方都极力争取的东北军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随后派东北军入关,助蒋讨伐冯阎联军。在此情况下,10月中旬,阎、冯通电下野。11月反蒋联军宣告战败。

中原大战期间,反蒋各派还联合起来于8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组织了排蒋的党政机构。9月,在北平宣告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扩大会议还声称要召集国民会议,并起草了“约法”。张学良入关后,扩大会议从北平迁到太原,后随反蒋联军的战败而烟消云散。

中原大战历时半年多,双方死伤30多万人,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战争痛苦。这次军阀大混战,也给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蒋介石通过这次大战的胜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在国民党中的统治地位。

(朱汉国)

邓演达

（Deng Yanda 1895—1931） 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早年先后进广东陆军小学和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19年毕业后，赴福建参加孙中山的援闽粤军，历任营长、团长等职，拥护孙中山北伐，曾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斗。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任教练部副主任。后受蒋介石排挤，赴德国学习、参观。1925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第三期教育长。1926年1月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过程中，始终随军作战。当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负责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旋任代校长，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分子。在武汉，与徐谦、吴玉章等人还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行使中央最高职权，与蒋介石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1927年3月，出席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农民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行为，极力维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年7月，鉴于汪精卫集团即将背叛革命，于13日公开发表《辞职宣言》，再次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作“真正之革命”。此后被迫流亡苏联、德国等国。1927年11月，与宋庆龄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谴责了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背叛革命的罪行，表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决心。1930年5月回国，同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被选为总干事，展开了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1931年8月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11月为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

（朱汉国）

八一南昌起义

(Bayi nanchang qiyi)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第一次英勇战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派遣中央常委李立三等到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力量，联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南下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但这时张发奎已实行“清共”政策，李立三等便向中共中央提出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的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了李立三的建议，并决定派中央常委周恩来赴南昌，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当天，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召开会议，宣告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任委员，并决定贺龙任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

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8月1日凌晨二时，在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第二、第三师，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总兵力共约三万余人。起义军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1万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8月1日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西花厅召开了包括起义领导人和各省市及海外华侨代表四十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包括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在内的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谭平山任主席。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代理总指挥，叶挺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任），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69-1.bmp}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向南昌进攻。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按原计划南下，“规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8月3日至5日，起义部队陆续撤离南昌，取道赣南，向东江进发，沿途打了不少胜仗，占领了不少城镇，但部队没有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集中兵力歼灭敌人。9月底10月初，起义部队主力到达广东潮州、汕头地区时，遭强大敌人围攻，激战数日，损失严重。剩下的部队，一部分退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军会合；另一部分则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进入湘南，与当地农民斗争相结合，于1928年春发动了湘南起义，后来到达井冈山地区宁冈砦市，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军队、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开始。因此，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日。

(朱汉国)

朱德

(Zhu De 1886—1976) 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字玉阶。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一个佃农家庭。幼年入私塾，因家贫，一面读书，一面劳动。1909年，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11年从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入云南新编陆军，历任副目（副班长）、司务长、连长，秘密向士兵宣传同盟会纲领和各地反清起义情况。在反对清王朝的革命中，率部参加云南武装起义。后参加援川军，支援四川起义。1912年返回昆明，任讲武堂军事教官。1915年参加反袁护国战争，任滇军步兵团长。1917年升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1919年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离开云南经北京、上海转赴德国，在柏林结识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因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即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同年11月，和杨闇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领导了四川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初，奉命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培训了一批革命军事干部。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参加领导了在江西南昌举行的“八一”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其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反动军队击败后，他率领余部重整旗鼓，坚持斗争，转战至湖南省南部，继续组织武装暴动。1928年1月，与陈毅一起在湘南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了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年关暴动。在暴动中，扩大了武装力量，建立了湘南苏维埃政权。同年4月，率部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随后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坚强部队——中国工农红军（初建时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军长。1929年初，与毛泽东一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为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2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参与制订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6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任总司令，随后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他与毛泽东一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春，他与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又挫败了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他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后与毛泽东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在长征北上途中，他与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一起，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促成了红军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的胜利会师，维护了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团结。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朱

德任总指挥（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并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事委员会分会书记。1938年3月，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一年后又改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率领和指挥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根据地。1938年，他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意义及抗日游击队的战术与活动方针，对当时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40年5月，他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战争。面对当时抗日根据地暂时遇到的严重困难，是年冬，他提出了“南泥湾政策”（南泥湾是延安南部的一片荒地），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开荒种地，为打破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1946年开始的解放战争中，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7年国民党攻占延安后，他同刘少奇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秋，他亲临晋察冀前线，参与指挥了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在战略决战阶段，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和毛泽东一起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作战的命令。经过渡江南下作战和解放西南、西北的几大战役，彻底摧毁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党内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任职期间，他积极参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检查工作，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还进行了一系列出国访问、会见外国领导人等国事活动，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朱汉国）

贺龙

(He Long 1896—1969)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出身贫苦。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16年率青年农民持菜刀袭击芭茅溪盐局，夺取枪支组织农民武装。1922年，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联军第九混成旅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等职。

大革命失败后，贺龙率部毅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从此开始了创建人民军队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7年9月，在起义军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奉命回到湘鄂西地区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1928年初，在湘鄂西相继领导了监利、石首、华容、南县等地的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后在湘鄂西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至1929年夏，初步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秋，率部去洪湖地区，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任总指挥，并使湘鄂边、洪湖两根据地连成一片。1932年秋，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被迫退出洪湖地区，返回湘鄂边。1934年6月，率部进入贵州，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与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任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随后又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兼任中共湘鄂川黔军分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1935年11月率部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9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成红二方面军，任总指挥。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率部深入敌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12月率部挺进冀中，打破日军多次“扫荡”，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率部返回晋西北。6月，连续进行了一个月的反“扫荡”战斗，作战250余次，歼敌4500余人。同年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任司令员。1942年6月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历任晋绥军区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等职，参与指挥了绥远、晋北、大同、集宁、晋南等战役，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龙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职。1964年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贺龙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人身摧残，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著有《南昌起义与我军建设》、《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等。

(朱汉国)

刘伯承

(Liu Bocheng 1892—1986)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四川开县人。家庭出身贫苦。早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在四川参与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1927年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

大革命失败后，刘伯承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起义失败后，被派赴苏联学习，先后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28年6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对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1930年夏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同年12月奉命到达上海，协助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1年赴中央苏区，任红军学校校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曾参与指挥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1934年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被错误地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在长征途中，刘伯承被重新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在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诸役中，刘伯承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在遵义会议上，他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红军长征途中，刘伯承还特别注意党的民族政策，曾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红军顺过彝族聚居的大凉山地区。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刘伯承坚持原则，对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就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率部深入敌后晋冀鲁豫边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秋，刘伯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侵华日军。在整个抗战期间，刘伯承组织指挥了一系列战役战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6月底，与邓小平一起率十万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11月，刘伯承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1949年4月，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同年11月，又参与指挥了西南战役。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系列重大战役中，均表现了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才能。在这一时期，刘伯承率部直接解放了南京、皖南、浙西、闽北等广大地区及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南京解放后，刘伯承担任了第一任南京市市长，并兼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伯承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中国共产党第七至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军队的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病逝。

著有《回顾长征》、《我们在太行山上》、《千里跃进大别山》等。

(朱汉国)

陈毅

(Chen Yi 1901—1972)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字仲弘。四川乐至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为寻求革命真理，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强行遣送回国。1922年在重庆任《新蜀报》文艺副主笔，并由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任北京学生总会的党团书记、中国国民党市党部的中共代表，在北京从事青年运动。1926年从中法大学毕业后，被派往四川万县在川军中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春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中共党委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陈毅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1月，与朱德一起领导了湘南年关暴动。同年4月，与朱德一起率部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先后任新创建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并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特委委员。1929年初，随毛泽东、朱德率部转战赣南、闽西。同年6月，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后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又协助毛泽东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此后在中央根据地历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赣西特委书记、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转战闽、浙、赣等省，坚持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陈毅出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此后率部挺进苏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他又率部北渡长江，在江北指挥了黄桥战役，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同年11月，华中总指挥部成立，任代理总指挥，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抗日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与刘少奇等一起重建了新四军部队，任新四军代理军长。从此，他统率新四军，抗击日伪军一次次“扫荡”和“清剿”，坚持抗战，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率部抗击了国民党军队对华中、山东地区的进攻。解放战争开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他率部连续取得了宿北、鲁南、莱芜和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秋，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有力地配合了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同年11月，参与组织和指挥了淮海战役。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重新整编后，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4月率部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和广大东南地区。上海解放后，陈毅为第一任市长，此后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等职，为建设新上海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陈毅调中央工作。此后，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协助周恩来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为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增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作了不懈的努力。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党内，他是中共第

七、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其诗文收入《陈毅诗词选集》。

（朱汉国）

八七会议

(Baqi huiyi)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李震瀛、陆沉。此外还有监察委员、团中央代表、两湖代表、军委代表及共产国际代表等，共20多人。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会议只开了一天，主要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报告；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报告；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及《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重要文件。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会议成立了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并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极大地振奋了全党的革命精神，明确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方向，开始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新时期。但八七会议也有不足，会议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没有注意防止党内已经开始滋长的“左”倾情绪，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会议的这些不足，为“左”倾冒险主义敞开了门户，不久就有瞿秋白发展成“左”倾盲动主义。

(朱汉国)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Xiang gan bianjie qiushou qiyi)大革命失败后湘赣两省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27年秋收季节举行的武装起义。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达湖南，具体部署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起义，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召开了军事会议，具体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军事部署问题。正式决定起义的武装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而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四个团。第一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平江、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以安源工人武装为骨干，加上萍乡，莲花等地的农民武装；第三团则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部分警卫团人员组成；第四团则全为原夏斗寅的残部收编而成，总兵力约五千余人。9月9日，湘赣边界起义爆发。当天，起义农民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第一团在修水起义后，准备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在长寿街附近，四团突然叛变，一团腹背受敌，损失惨重，被迫向浏阳方向转移。9月10日，第二团在安源起义，相继攻克醴陵、浏阳。后在浏阳陷入敌人重围，损失大部。9月11日，第三团由铜鼓西进，在攻占东门市后被敌人袭击，也遭损失。9月19日，各路起义军退集到浏阳县的文家市。在这里，毛泽东召集前委会议，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向湘赣粤边的农村进军。会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南下，向井冈山进军，开始了中国革命战略的伟大转折。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73-1.bmp}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抛弃国民党旗帜，独立树起工农革命军旗帜的开始。在其影响下，广东、湖北等地也相继爆发了秋收起义，从此中国革命转入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

(朱汉国)

广州起义

(Guangzhou qiyi) 1927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挽救中国革命的又一次英勇举动。

1927 年底，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抓住粤桂战争爆发、广州城内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大雷为委员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由叶挺、叶剑英分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

12 月 11 日凌晨 3 时，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杨殷等领导下，广州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叶剑英率领的第四军教导团和周文雍率领的广州工人赤卫队，大约六千余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城区。当天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任，由张太雷代理）。并颁发了宣言和各项法令，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一切土地收归国有。

广州起义震惊了中外反动派，他们立即联合起来向广州进攻。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的支援下，国民党军阀集中了五万兵力进攻广州。起义军经过三天三夜的英勇奋战，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在战斗中牺牲，革命群众七八千人惨遭杀害。13 日，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市区。一部分在花县改编为红四师，开赴东江同海陆丰农民起义军汇合；另一部分沿西江到达广西左右江，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一部分则北上韶关，找到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后来上了井冈山。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273-2.bmp}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人民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又一次英勇的反击，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朱汉国）

张太雷

（zhang Tailai 1898—1927）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张曾让，又名泰来、椿年。江苏武进人。1916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中，任天津学生的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会长，并领导讲演团活动，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1920年大学毕业后，赴北京从事革命活动，参与创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并与邓中夏等人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曾两次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东方局的工作，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翻译，对沟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1922至1925年曾多次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并参与主持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至第三次代表大会，先后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常务委员和团中央书记。在此期间，对于开展全国青年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1925年秋天，张太雷奉命赴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同时兼任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主编。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同年7月，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键时刻，与瞿秋白等人组成中共临时政治局，积极挽救中国革命。8月，参加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并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深入潮州、汕头等地组织群众，准备武装暴动。

1927年11月，张太雷到达广州，组建了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并兼任书记，开始策动广州武装起义。12月11日，与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次日在与国民党政府军作战中牺牲。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张太雷文集》。

（朱汉国）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liu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党员4万多人。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等1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周恩来任大会秘书长。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到会作了政治报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等问题。瞿秋白作了关于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补充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关于苏维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运动、军事工作、民族问题等决议案，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向忠发当选为总书记，李立三当选为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周恩来当选为组织部长和军委书记。

这次大会正确地肯定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十大纲领。大会正确地指出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同时又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这次大会制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使全党在革命的几个主要问题上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统一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次大会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错误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

(朱汉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Jinggangshan geming genjudi)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斗争。11月下旬，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县城，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民主政府。随后，遂川、宁冈等县也先后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到1928年2月，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砦市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5月4日，会师部队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三个师六个团。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多次打退反动军队的进攻。到1928年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分，5月下旬，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至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74-1.bmp}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力量。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则留守井冈山。留下的红军，经过曲折的斗争，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永新为中心，包括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几个县革命政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朱汉国）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E yu wan geming genjudi)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徐向前等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包括黄安(今红安)、麻城、商城、光山、六安、霍山等26个县。

1927年11月，共产党人吴光浩、潘忠汝、戴克敏、曹学楷等领导黄安、麻城农民起义，成立了鄂东军，建立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29年5月，共产党人徐子清、萧方、周维炯等领导了河南商城起义，建立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929年11月，共产党人舒传贤、周狷之等领导了安徽六安、霍山农民起义，建立了皖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4月，三块根据地联成一片，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以甘元景为主席的鄂豫皖苏维埃政府。至1931年5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同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2年10月，由于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向川陕地区转移。留下的红军组建了红二十五军，他们和当地的人民武装一起继续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游击战争。

(朱汉国)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Min zhe gan geming gejudi)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等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又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位于福建、浙江、江西三省边界地区。

1928年1月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了江西横峰、弋阳农民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在中共崇安县委领导下，发动了崇安农民起义，创建了闽北革命根据地。1930年6月，中共赣东北特委成立。1930年7月，闽北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赣东北、闽北两块根据地亦随之合并。1931年，又先后成立了以万永诚为书记的中共赣东北省委和以方志敏为主席的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到1932年底，赣东北根据地扩大到闽浙赣三省，形成了包括福建崇安，浙江开化，江西弋阳、横峰等26个县的闽浙赣根据地。中共中央鉴于新的形势，遂改赣东北省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省委书记。

1934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十军与以红七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合编为红十军团，由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粟裕任参谋长，继续担任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1935年1月，先遣队与优势敌人作战失利，方志敏受伤被俘。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继续转战闽浙赣坚持游击战争。

(朱汉国)

方志敏

（Fang Zhimin 1899—1935）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江西弋阳人。1919年考入南昌江西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江西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4年国共合作后，方志敏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主席等职，对开创江西的农民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回到赣东北地区，开始了重建中共组织、组织武装暴动的革命斗争。1927年11月，方志敏在弋阳窑头村发起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共产党代表会议，决定在赣东北发动农民举行年关暴动，并成立了五县共产党委员会和农民起义总指挥部。方志敏被选任书记和总指挥。1928年1月，方志敏与黄道、邵式平一起领导了弋（阳）横（峰）农民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军（1928年夏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1929年4月又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并成立了中共弋阳中心县委。随后，方志敏率工农军转战于信江流域，开辟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930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闽北根据地并入赣东北，赣东北红军与闽北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由方志敏任军长。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方志敏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一时期，方志敏曾与中共内部的“左”倾错误路线作过坚决的斗争，对巩固和发展赣东北根据地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2年底，赣东北根据地扩展到闽浙赣三省，中共中央鉴于新的形势，遂改赣东北省为闽浙赣省，旋任命方志敏为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10月，由红七军团改组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闽浙赣根据地，和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由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之后，方志敏率抗日先遣队继续北上，至皖南，遭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苦战两月受挫。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在撤回赣东北途中被七倍之敌围困于江西怀玉山区，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一部突围外，一部被俘，大部牺牲。方志敏被俘后押往南昌，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并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反映崇高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同年8月6日在南昌被秘密杀害。

（朱汉国）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Xiang exi geming genjudi)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等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两省边界地区，包括洪湖、湘鄂边、襄枣宜、巴兴归等革命根据地。

1927年底，贺龙、周逸群等奉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湘鄂西发动革命。1928年初，在监利县境内，贺龙、周逸群等与当地贺锦斋、吴仙洲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打起了工农革命旗帜，随后相继领导了监利、石首、华容、南县等地的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

1928年4月后，贺龙率一部武装力量进入湘鄂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7月初，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湘西前敌委员会，当地的工农武装正式整编为红四军。1928年底至1929年春，红四军相继攻克建始、鹤峰、桑植等县城，开辟了湘鄂边根据地。

与此同时，周逸群转至洪湖地区，组织中共鄂西特委，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等地领导武装斗争，并建立了分别由段德昌、段玉林领导的两支较大的游击队。1929年这两支游击队编为鄂西游击总队，1930年春又改编为红六军。红六军成立后，先后攻占沔阳、潜江、石首、汉川、华容、公安等地，开辟了洪湖根据地。

1930年夏，贺龙率红四军东下洪湖地区，7月初，与红六军会师公安城。随后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两军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湘鄂边、洪湖两个根据地亦随之连成一片。

1931年3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湘鄂西根据地扩展到汉水以北的鄂中地区。5月，红军在鄂西北开辟了均（县）房（县）革命根据地。同年底，中共中央把襄枣宜革命根据地划归湘鄂西中央分局管辖。到1932年夏，湘鄂西根据地发展刊包括洪湖、湘鄂边、襄枣宜、巴兴归根据地，以及鄂西北的均县、房县、谷城、保康等二十多个县的地区，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三万余人。

1932年秋，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对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被迫撤离湘鄂西，转至黔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朱汉国）

湘鄂边、洪湖革命根据地

(Xiang ebian honghu geminggenjudi) 参见“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平江起义(Pingjiang qiyi)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平江领导的武装起义。

1928年7月22日,共产党人彭德怀率原国民党湖南独立师第一团官兵在平江城郊天岳书院广场上誓师起义。经过近两小时激战,起义军捣毁了平江县城反动的军政机关,活捉敌县长,释放狱中所有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占领了整个平江城。

按照起义部署和事前的秘密联系,7月23日,共产党人黄公略率领在嘉义镇起义的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率领在岳州起义的独立师随营学校全体学员,赶往平江。

为了巩固和扩大起义成果,起义军仿效井冈山的红四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下辖十三、十四两个师。7月24日,红五军党组织和中共平江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成立平江具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7月29日,国民党军以6个团的兵力向平江反扑。为了保存革命力量,8月1日,红五军撤出平江城,转战于湘鄂赣边区的平江、浏阳、万载、修水、通山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转战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留下的部队在黄公略的领导下,继续在湘鄂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朱汉国)

彭德怀

(peng Dehuai 1898—1974)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彭得华。湖南湘潭人。早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

大革命失败后，彭德怀在共产党人段德昌等人影响下，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等发动和领导了湖南平江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此后，率部转战于湘鄂赣边，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28年12月，与滕代远一起率红五军主力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会师。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他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与敌军周旋于湘赣边界，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30年6月，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成红三军团，任总指挥。此后，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争，屡建战功。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提出了严肃批评。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后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司令员，和毛泽东等一起率部首先到达陕北，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36年奉命先后组织抗日先锋军和西方野战军，东进山西，西征宁夏、陇东，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和朱德一起指挥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抗日根据地。1940年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重创了日军，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1942年任中共华北局代理书记。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同时兼任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他率部在陕北地区与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在1947年进行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中，连战皆捷，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1949年挟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之威，他率部西进，一举解放了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等职。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

政委，率师援朝，为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1952年回国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尽了不懈的努力。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上书毛泽东主席，陈述1958年以来党所犯的“左”倾错误，被错误地定为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遭到错误的批判，并被免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诬陷和残酷迫害，1974年11月29日含冤逝世。1978年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著有《彭德怀自述》等。

（朱汉国）

黄公略

(Huang Gonglüe 1898—1931)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湖南湘乡人。早年参加湘军。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第三团连长、第二师三十团团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遵中共指示回湖南，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三团三营营长，积极在官兵中进行革命宣传。1928年7月，与彭德怀一起组织领导了湖南平江起义，参与创建了红五军，任红五军第十三师副师长兼第四团党代表。随后，率部转战于平江、浏阳一带，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根据地后，黄公略率部仍留守湘鄂赣边，坚持游击战争。1929年4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边境支队长兼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常委，对湘鄂赣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年秋，红五军主力回师平江后，黄公略升任红五军副军长。同年冬，奉命赴赣西南任新编的红六军军长。1930年红六军改称红三军，黄公略仍任军长。红三军在黄公略领导下，正确执行党的战略方针，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到1930年10月，不仅扩大了红军队伍，而且使赣西南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当年曾有诗咏赞黄公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此后，黄公略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在龙冈、老营盘、方石岭等战斗，屡建战功。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奉命率红三军向瑞金转移，经东固六渡坳时，遭敌机袭击，不幸中弹牺牲。为表彰黄公略对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业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在中央苏区设置公略县，命名公略步兵学校。

(朱汉国)

湘赣革命根据地

(Xiang gan geming genjudi)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等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湘赣根据地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位于赣江以西，袁水流域以南，大庾以北，攸县、酃县以东地区。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在彭德怀等领导下，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29年1月下旬，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分路向井冈山进犯，在优势敌人面前，留守红军被迫突围向赣南转移。5月，红五军在彭德怀率领下重返井冈山。在当地农民武装配合下，红五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会剿”，恢复和巩固了永新、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余县的革命政权。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永新成立了湘赣省临时省委和湘赣省工农兵政府。至此，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永新为中心，包括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几个县革命政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

1933年6月，湘赣根据地的红军和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军合编为红六军团。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撤离湘赣根据地西征，留下的地方武装在谭余保等领导下继续在湘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朱汉国)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Xiang e gan geming genjudi)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公略等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界地区。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湖南平江起义，建立了红五军。12月，红五军主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向井冈山转移，红五军另一部则改编为红军湘鄂赣边支队，在支队长黄公略的领导下，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武装斗争。1930年3月，彭德怀率红五军重返湘鄂赣边，与黄公略的湘鄂赣边支队一起，多次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初步创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31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以李宗白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赣省委。9月，成立了由赖汝樵任主席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是年，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展到湖南的平江、浏阳、岳阳、湘阴、临湘，湖北的通城、崇阳、通山、蒲圻、咸宁、阳新、大冶、鄂城、黄梅、广济、蕲春、浠水，江西的修水、宜春、铜鼓、宜丰、高安、萍乡、瑞昌、靖安、万载、奉新等二十余县。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根据地的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少数部队在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等领导下，在湘鄂赣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朱汉国)

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Gannan minxi geming genjudi) 参见“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

(zhongyang geming genjudi) 又称“中央苏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的南部和福建的西部，由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汇合而成，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2月，红四军先后攻占了赣南的宁都、兴国、瑞金、雩都。3月，红四军挺进闽西，在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配合下，先后攻占了长汀、上杭、龙岩、永定等县。4月初，红四军回师赣南，利用蒋桂战争爆发的有利形势，在赣南的兴国、宁都、瑞金、广昌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奠定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5月之后，红四军分别于5月中旬和10月两度入闽，在闽西地方党的积极配合下，消灭了土著军阀陈国辉和卢新铭，先后建立了龙岩、上杭等县的红色政权，奠定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1930年3月，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至此，正式形成了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

1931年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从而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在江西瑞金的成立，标志着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此后，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扩大了红军和根据地范围。中央红军最多时发展到十万，中央根据地全盛时扩展到二十一县（即江西的瑞金、会昌、寻邬、安远、信丰、雩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万。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也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其主力被迫于10月中旬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留下的一小部分红军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当地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朱汉国）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Zuoyoujiang geming genjudi)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等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位于广西西部左江、右江一带。

1929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当时化名邓斌）、张云逸、叶季壮等到广西开展工作。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领导下，举行了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次日，在平马召开了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以共产党人雷经天为主席的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红七军成立后，打击反对势力，发动农民革命，先后建立了百色、隆安、东兰、凤山等十余县工农民主政权，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2月1日，邓小平与李明瑞、俞作豫等一起又领导了龙州起义，成立了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随后红八军又占领了左江区域的龙州、宁明、靖西等十余县，初步创建了左江革命根据地。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左江工农民主政府实施了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进行了土地改革。后因强敌进攻，左江根据地首先丧失，红八军退到右江地区编入红七军。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奉命离开右江根据地，转战到达湘赣，同红一方面军会合。留下的少数部队则在韦拔群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朱汉国）

渭华起义

(Wei hua qiyi)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渭南、华县地区举行的武装起义。

1928年4月，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唐澍等人在渭南、华县一带率领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学校的学生，与当地农民以及西北军许权中旅举行起义，正式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下辖五个大队，大队长分别为谢子长、赵松生、武培漠等。同年6月，在国民党政府军三个师的进攻下，起义失败，总指挥唐澍在战斗中牺牲。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入陕甘边界的兰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朱汉国)

刘志丹

(Liu Zhidan 1903—1936) 红军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陕西保安(今志丹)人。1922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就学期间，曾当选为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随后，又加入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1924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赴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随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东征后奉命回西北入国民联军第四路军中工作，任该军党代表兼政治处长。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深入陕甘边区，开始了艰苦的武装暴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刘志丹与谢子长、唐澍等一起发动了陕西渭(南)华(县)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6月，率革命军进入陕甘边界的兰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刘志丹被选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反帝同盟军在陕西组建，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不久，反帝同盟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刘志丹任总指挥。1932年12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陕甘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任军长。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成为陕北红军的主力。红二十六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辗转于陕甘边界的枸邑、洛川等地，开辟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后来各路红军汇合建造了大本营。

1934年在陕北“肃反”运动中，刘志丹被“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人关押审查。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方得以获释。同年，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五、二十七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此后，刘志丹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1936年4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东征抗日，在山西境内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在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

(朱汉国)

土地革命

(tudi geming)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伟大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土地革命由此开始。随后，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办法，并逐步形成了一条土地革命路线。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规定无代价没收一切土地归公有，分给农民使用。这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第一项土地政策。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根据革命的具体实践修正了这一政策，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同时又规定中农是同盟者，并要争取富农中立。“六大”的这些规定基本是正确的。1928年底，井冈山根据地颁布了第一个土地法。当时因尚未接到“六大”决议，因此，《井冈山土地法》仍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为公有，分给农民使用。1929年初红四军进军赣南后，于4月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土地没收的对象是一切出租的田地山林和富农自食以外的多余土地，土地的分配政策是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土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的平均分配方法。不久，闽西根据地又提出“抽肥补瘦”的分配办法。上述正确政策在闽西的实施，使闽西根据地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形势。1930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召开会议，批判了阻碍土地革命的错误倾向，加快了赣南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步伐。除上述井冈山、闽西、赣南几个地区外，其他如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至1931年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又进一步解决了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问题，改变了过去土地国有、农民使用、禁止买卖的原则，变为土地一经分定，即为农民私有，租借买卖任其自由。至此，对于土地革命中没收对象、分配原则和方法、阶级路线和分配后土地所有权等问题，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规定，基本形成了一条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土地革命历时十年，成绩卓著。仅以湖北黄安九龙乡为例，土地革命后，该乡原无寸土的85户雇农共分得土地552亩。原平均每户1亩的114户贫农，共分得土地760亩。中农土地数量也有所增加。这就在局部地区改变了旧的土地所有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十年土地革命也为后来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朱汉国)

中国工农红军

(Zhongguo gongnong hongjun) 简称红军。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人民军队。它由中国工农革命军及其他革命武装于1928年5月后陆续改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会合。5月4日，根据中共湘南特委指示，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25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中国第一支红军部队。同年7月，彭德怀等发动了平江起义，起义军仿效井冈山的红四军，成立了红五军。1930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四军为基础，集合赣南、闽西的主力红军合编成红一军团；以红五军为基础，与红八军合编成红三军团。同年8月，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与红一军团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中央红军。此后，徐向前、陈昌浩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贺龙、任弼时等也将长期转战于洪湖湘鄂西的红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另外，刘志丹等人也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武装逐步发展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陕北红军。至1933年，红军发展到30万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33年5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开展了艰苦的游击战争，创建了闽赣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陕甘等革命根据地，击破了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的“围剿”。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除陕北红军外，各地红军主力被迫先后退出原来的根据地，突围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率先开始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战胜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也胜利到达陕北。长征的胜利，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3万余人。

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等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朱汉国)

第一次反“围剿”

(Diyici fanweijiao)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战役。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之后，立即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即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当时，驻守革命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约有4万人。在毛泽东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至赣江以东的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等地，准备迎敌。11月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继续向赣江东岸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军随即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外，主力则于11月26日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12月1日，又秘密转至宁都县的黄陂等地，隐蔽待敌。12月中旬，国民党军由吉安、建宁一线，分八个纵队，继续进攻。12月29日，敌张辉瓒部主力向龙冈推进。红军主力埋伏于龙冈附近山中，30日拂晓，红军以优势兵力向进入伏击圈的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经过半天激战，全歼张辉瓒师9000余人，张辉瓒也被俘。接着，红军向东韶急进，又歼敌谭道源师一半。余敌纷纷撤退。

这次战役，红军共歼国民党军一个半师，缴枪1.3万余支，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朱汉国）

第二次反“围剿”

(Dierci fanweijiao)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的战役。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调集 20 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建宁到江西吉安，构成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于 1931 年 4 月 1 日，兵分四路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即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三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消耗、疲惫北面之敌，主力则从根据地边缘区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一带转移到根据地内的广昌、石城、瑞金、宁都等地，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和整训部队，进行反“围剿”的准备。4 月底，国民党军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红军主力则迅速按预定计划秘密集结于东固、龙冈地区，待机歼敌。5 月 15 日，国民党军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由富田进入东固山区。16 日，红军乘其不备，发起猛攻，经一昼夜激战，歼公秉藩师和王金钰师大部，取得反攻首战胜利。随后，又迅速由西向东横扫。19 日，在白沙歼敌第四十三师大部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22 日，在中村歼敌第二十七师近一个旅。27 日，攻占广昌城，歼守敌第五师一部。30 日，直捣建宁城，歼守敌第五十六师三个多团。

这次战役，从 5 月 16 日起至 30 日，15 天中，红军横扫 700 里，五战五捷，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朱汉国）

第三次反“围剿”

(Disanci fanweijiao)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的战役。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仅隔一个月，又调集 30 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兵分三路，于 1931 年 7 月 1 日开始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即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当时，驻守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只有三万人左右，且刚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的苦战，大多分散于闽西各地，尚未来得及休整补充。面对优势的敌军，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歼”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敌军前进，红军主力则由闽西绕道千里，于 7 月下旬集中于赣南的兴国，诱敌深入。随后，又以红三十五军和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佯装主力，将敌主力七个师引向兴国以西和西北地区。红军主力则于 8 月 4 日乘夜从兴国插进敌后，6 日在莲塘歼敌第四十七师一部；7 日在良村歼敌第五十四师大部；11 日在宁都县北的黄陂歼敌第八师四个团。六天之内，红军三战三捷，缴枪逾万。这时，国民党军主力急忙转旗扑向黄陂，欲寻红军主力作战。8 月 16 日夜，红军声东击西，以一部红军将敌引向东北，主力则由东向西，从敌军的间隙中，再次返回兴国休整。待敌发觉后再向西进时，红军主力已休整半月，而敌被拖得饥疲沮丧，无力作战，只得退却。红军乘敌退却之机乘胜追击，于 9 月 7 日在老营盘歼敌第九师一个旅；9 月 15 日，在方石峪歼敌第五十二师。至此，国民党军被迫全线撤退。

这次战役，红军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通过这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拥有二十余县的大块革命根据地。1931 年 11 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此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式成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朱汉国）

“九·一八”事变

(Jiuyiba shibian)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的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事件。

日本侵华，蓄谋已久。19世纪末日本侵占中国台湾，20世纪初又在东北南满地区夺取了各种特权。192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先征服“满蒙”再征服中国，最后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随后，日本帝国主义驻中国的关东军在东北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加紧了进行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准备。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一段南满铁路路轨，并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同时，南满铁路沿线日军向沈阳城发起攻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紧接着日军分兵进攻吉林和黑龙江。至19日，日军攻占了沈阳、本溪、鞍山、抚顺、长春、四平二十余城。一周之内，辽宁、吉林二省基本丢失。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一再命令东北军要“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迫使19万东北军退避关内，坐视日军在东北的胡作非为。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大片国土很快沦丧。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它使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东北人民立即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全国人民也开始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

(朱汉国)

伪满洲国

(Weimanzhouguo)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制造的傀儡政权。成立于1932年3月1日。定都长春(后改称“新京”)，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任执政，年号大同。第一任国务总理由汉奸郑孝胥担任。1932年9月15日，与日本政府签订《日满议定书》，使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1934年3月1日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国务总理改由汉奸张景惠担任。溥仪名为皇帝，实如囚徒，言行均受日本人监管，由日本人任厅长的总务厅，总揽了伪政府的一切大权。并通过日本人在各级伪政权机关中任次长的制度，日本控制了伪满洲国整个政权系统。伪满洲国统治中国东北十三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人民实行残酷殖民统治的工具，1945年8月随抗日战争胜利而被摧毁。

(朱汉国)

“一·二八”事变

(Yierba shibian)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犯上海的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为取得继续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又发动了对上海的侵略。1932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蓄意制造了马玉山路事件。18日下午，受日本特务指使的五个日本僧人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上海三友实业社内的中国工人挑衅，在冲突中，双方互有受伤者。尔后，日方传出一受伤日僧死于日本医院。为扩大事态，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辅助官田中策动数十名日本浪人于20日焚烧了三友实业社总厂，暴徒与中国警察发生冲突，致使中国警察死两人，伤两人，暴徒也被打死一人，重伤两人。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颠倒是非，反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赔礼道歉，惩凶、赔偿、立即解散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并限“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前明确作出答复”。国民党政府于1月28日下午3时全部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并没有能终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举动。1月28日深夜11时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两千余人，突然向驻守在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发起猛烈进攻，从而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声称，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占领上海。

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

十九路军的抗战得到了上海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随后增援抗战的还有张治中领导的第五路军。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杀伤日军一万多人，迫使日军一再增兵，三易主帅而不能有所推进。但国民党政府却坚持不抵抗政策，不仅不给予十九路军有力援助，反而停发军饷，截留全国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捐款。3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出上海。3月3日，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宣布停战。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于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随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

(朱汉国)

淞沪停战协定

(Songhu tingzhan xieding) 亦称《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但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于3月3日宣布停战。3月14日，中日双方代表在英国领事馆进行谈判。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撤防、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驻兵上海。《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朱汉国)

珍珠桥事件

(Zhenzhuqiao shijian) 又称“珍珠桥惨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屠杀爱国学生的血腥事件。“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12月17日，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济南、安徽等地的学生代表到南京与当地学生联合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当游行队伍进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的珍珠桥时，遭到国民党大批军警血腥镇压，当场有30多名学生被打死，100多人受伤，100多人被捕。当夜，国民党政府又派出大批军警搜捕学生，并武装押送学生返回原地。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血腥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各地学生纷纷举行抗议活动。

(朱汉国)

东北抗日义勇军

(Dongbei kangri yiyongjun)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和部分爱国军队组织的抗日武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人民和部分爱国军队，自发组织了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这些武装主要有东北军的旧部，如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部队，吉林的李杜、丁超部队，辽宁的唐聚五等部队；东北军旧部与民众结合组织的部队，如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邓铁梅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等；一些农民自发组织的大刀会、红枪会等；还有一些倾向抗日的地主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在当时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到1932年底，东北抗日义勇军曾发展到30多万人，他们战斗在黑水白山之间，曾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他们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特别是东北军旧部改编的义勇军，情况复杂，内部矛盾重重，因而到1933年，这些抗日武装大部分溃散。其中有一部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

(朱汉国)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Wang ming zuoqin maoxianzhuyi)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延续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一次“左”倾机会主义。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统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王明，本名陈绍禹，留苏学习期间就组织宗派小团体。1930年回国，同年9、10月间写成题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后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全面阐述了他的“左”倾观点。1931年1月，经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控制了党中央。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特征是：

1.在政治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定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看成铁板一块，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大搞关门主义，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右倾，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提出更加“左”倾的“积极进攻”的方针，要求各大城市的党组织不顾客观条件地组织罢工、罢业、罢操、飞行集会和示威，不适当地夸大城市工人运动的作用，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形成全国的胜利。

2.在军事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视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追求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又实行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

3.在组织上，要求全党“坚决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反右倾”的幌子，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不同意见者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和红军蒙受重大的损失，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直至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批判了王明教条主义的错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从思想上做了彻底清算。

（朱汉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Zhonghua suweiaigongheguo linshi zhongyang zhengfu)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的中央政权机构。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等64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大众，对一切剥削阶级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幕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日常最高权力机关。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为副主席，下属外交、军事、财政、劳动、教育、土地、内务、工农检查、最高法院、国家政治保卫局、邮政总局、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等部门。朱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下属红军总政治部、军委总参谋部、军委总经理部、军委总供给部、军委总卫生部、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委后方办事处、军委抚恤委员会等部门。至1932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属七个省苏维埃政府，即江西省、福建省、湘赣省、湘鄂赣省、闽浙赣省、湘鄂西省、鄂豫皖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领土内同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是第一个为工农兵和一切劳苦群众服务的中央政府。它的建立，推动了根据地人民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

(朱汉国)

塘沽协定

(Tanggu xieding) 1933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关东军在塘沽签订的停战协定。1933年4月，长城抗战失败，日本关东军进入华北，直逼平津。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茨在塘沽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协定，习称《塘沽协定》。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2.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武装区域，中国不能驻扎正式军队；3.日军为确认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4.日军在确认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线追击，并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协定的签订，国民党政府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的占领，并使中国失去对绥东、察北、冀东的完全统治权，打开了华北门户，加剧了华北危机。

(朱汉国)

第四次反“围剿”

(Disici fanweijiao)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战役。

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经过长时间准备，于1933年2月，纠集5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其中中路军十二个师，由陈诚率领，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分三个纵队，由乐安、南城、金溪等地向广昌进攻。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以一部兵力将敌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引向黎川方向，主力则转至敌之右翼，集中于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吴村等地隐蔽待机。2月26日，敌第一纵队的三个师分由乐安、宜黄向广昌逼进。红军先以地方武装不断袭扰和迷惑敌军，当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个师进至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于27日拂晓突发猛攻，经两天激战，将敌全部歼灭。国民党军遭此打击，改取“中间突破”方针，于3月15日以六个师分成两个梯队由宜黄地区出发，经东陂、甘竹直扑广昌，寻求红军主力作战。红军放过敌军先头四个师，于21日晨向进至草龙岗、东陂地区的敌军殿后的两个师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余敌仓惶撤退。在陈诚的中路军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进攻期间，敌左、右两路军仅在各驻区进行了所谓的“清剿”就草草收场。至1933年3月底，红军基本上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红军歼敌2万余人，缴枪1万5千余支。

(朱汉国)

第五次反“围剿”

(Diwuci fanweijiao)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击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对中央革命根据地邻近的湘赣、闽浙赣等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吸取以往“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了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企图把红军严密地封锁包围起来，从四面向根据地压缩，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消灭红军。当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余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也有很大发展。如果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能够正确估计形势，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的这次“围剿”是有可能的。但是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在党和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博古和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反“围剿”一开始，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就采取了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9月28日，当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李德等人惊慌失措，急令红军北上迎敌，进攻黎川以北硝石、资溪桥等白区敌军的坚固阵地，结果屡战不胜。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军，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1934年初，红军与国民党军在建宁、泰宁等地相持数月，终未能胜。3月，敌主力向广昌推进，红军虽在高虎脑、万年亭杀伤敌军三四千人，但最终未能阻挡住敌军的进攻。4月，广昌失守。7月，国民党军分兵向中央根据地中心突进。在优势敌人面前，“左”倾冒险主义者又转为保守主义，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结果使红军处处设防，节节防御，完全陷于被动局面。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曾多次提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或湖南中部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建议，但“左”倾错误领导人拒不接受。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军虽苦战一年，终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已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从10月10日晚开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共八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遂告失败。

（朱汉国）

红军长征

(Hongjun changzheng) 1934年10月开始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根据地而进行的战略大转移。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突围长征。从1934年10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分别由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长征最初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初期，由于中共中央领导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红军虽浴血苦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渡过湘江时，人员即已由出发时八万余人减至三万余人。12月，蒋介石又调集40万军队，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占领贵州重镇遵义。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正确的指挥领导下，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接着又顺利通过凉山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中旬到达了川西懋功。

继中央红军之后，红四方面军也于1935年3月撤离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并于6月8日先于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两个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月下旬两军跨过草地后，中共中央挫败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要挟中央南下和企图危害中央的活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北上。随后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张国焘带着被他欺骗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屡遭挫折，部队减员一半，被迫于1936年2月向西康东北部转移。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83-1.bmp}

由湘赣西征到湘西的红六军团和原在湘黔边的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也于1935年11月开始，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并于1936年6月在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在朱德、贺龙、任弼时等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结束。

红军的这次长征，克服了罕见的艰难险阻，前后历时两年，途经11省，徒步行军二万五千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朱汉国)

遵义会议

(Zunyi huiyi)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于贵州遵义举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在党和红军处于极其危险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和地方政府及苏区群众支援不够等客观原因，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辩解。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红军的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军事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质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等人都在会上作了发言。经过三天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会议最后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人事调整，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长征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从而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也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共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朱汉国)

陕北红军

(Shanbei hongjun)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地区建立的一支工农武装部队。其主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

1927年10月至1931年间，刘志丹、谢子长等曾在陕甘地区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枸邑、洛川等地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12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陕甘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从陕甘根据地南下关中平原，在渭南、华县地区遭国民党军阻击而失败。同年11月，在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下，以驻防渭北根据地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为基础，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1934年8月，红二十六军曾同陕北红军游击队一起，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

红二十七军是由陕北独立师改编而成。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中共陕北特委于1935年1月30日正式将陕北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下辖三个团。

1935年2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主席。此后，陕北红军在西北军委会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陕北两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9月，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由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在延川县永平镇会师。不久共同组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刘志丹，政委程子华。同年10月，红十五军团取得劳山战役胜利后，同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在吴起镇会师。11月3日，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朱汉国)

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

(nanfang basheng sannian youjizhanzheng) 1934 年至 1937 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的部队在南方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坚持的武装斗争。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中共中央随即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梁柏台为正、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继续领导留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为了企图彻底消灭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及根据地内的人民武装，国民党政府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继续纠集优势兵力，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对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实行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残酷毒辣手段，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清剿”。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虽然和中共中央长期失掉联系，但他们在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分局的领导下，紧密地依靠群众，采取了公开与隐蔽、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策略，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在被敌军长期分割包围的形势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不断地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1936 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面同共产党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面却加紧对南方各游击区进行疯狂的“清剿”，并狂言在三个月内将红军游击队消灭。对此，红军游击队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并通过国共两党复杂的谈判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军在“七七”事变后，陆续停止了进攻。在国民党军残酷的“清剿”中，许多共产党人如贺昌、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瞿秋白等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85-1.bmp}

三年游击战争的结果，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革命旗帜，坚持了八省内的浙南、闽北、闽东、闽南、闽西、赣东北、闽赣边、粤赣边、湘南、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鄂豫边、琼崖等十四个游击区，牵制和消灭了敌人大量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并保存和锻炼了大批优秀干部，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南方八省（除琼崖地区、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后来编为琼崖总队）的红军游击队，于同年 10 月分别集中于安徽歙县和湖北黄安等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成为抗日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朱汉国)

华北事变

(Huabei shibian)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全面侵占华北而制造的一连串事件。1935年5月，日寇首先制造了河北事件。日寇借口天津两家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系中国人所为，同时借口中国方面援助热河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活动，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动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6月初，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接受了日本要求，使中国在河北的主权大部丧失。这就是人们通称的《何梅协定》。在河北事件纠缠未了之际，日寇在察哈尔又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6月上旬，察哈尔驻军在张北县逮捕了在察省偷绘地图的日本特务，旋即释放。日军却以此为借口提出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达成《秦土协定》，满足了日军的要求，使中国在察哈尔的主权又大部丧失。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大肆收买汉奸，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脱离国民党政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10月22日，日寇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发表所谓“自治宣言”。河北的安次、庆云等数十县也先后发生类似事件。11月25日，日寇又唆使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又奔波于保定、太原、济南等地，策动阎锡山、韩复榘等搞华北五省自治。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采取妥协敷衍的政策。他既不愿意华北五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武力的威胁，于是派何应钦北上，与宋哲元等紧急磋商解决华北危机办法。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虽没有公开挂“自治”招牌，但冀察已实际置于南京政府管辖之外。至此，华北危机达于极点。

(朱汉国)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Huabei wusheng zizhi yundong) 参见“华北事变”。

何梅协定

(He Mei xieding) 国民党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经过会谈订立的秘密协定。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天津两家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系中国人所为，同时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因而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于5月29日向国民党抗议，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三日内答复。经何与日方秘密会谈后，于7月6日复函梅津，全部承诺了日方的无理要求，时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取消河北省内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解散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并禁止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平津两市市长等。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权，扩大了日军在华北的势力。

(朱汉国)

八一宣言

(Bayi xuanyan) 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宣言。1935年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起草了此宣言，并于8月1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发表，通称《八一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国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倡议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八一宣言首先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刊登，后辗转传入国内，在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朱汉国)

“一二·九”运动

(Yierjiu yundong)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开始的大规模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一步伸向华北，制造了一系列旨在夺取华北统治权的严重事件，而国民党政府则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并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这就更加深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时，中共中央在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已辗转传入北平、上海等地，使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迅速在群众中传播。正是在上述情况下，12月9日，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北平五六千名大中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封锁、阻拦和袭击，在新华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学生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要求国民党政府实现抗日。当示威游行队伍行至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大批国民党武装军警的镇压，学生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次日，根据北平学联的决定，北平全市学生实行了总罢课。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原定成立的日子。当日，北平学生、市民三万余人，再次冲破军警的包围袭击，先后在天桥、正阳门前广场两次召开市民大会，并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之后，北平学生又迅速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宣传抗日救国。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和支援。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杭州、长沙等地的学生先后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从而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严密统治，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并华北的计划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有力地宣传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为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朱汉国）

瓦窑堡会议

(Wayaobao huiyi)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杨尚昆、郭洪涛等十余人。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86-1.bmp}

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和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认为，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吞并全中国。这一情况必将重新改变和继续改变着中国政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都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可能。因此，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应该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决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明确指出，为了更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倾关门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决议还指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应是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与最高的形式。决议宣布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调整了它的许多政策。决议最后号召全党及其干部要为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而斗争。

会后，毛泽东根据《决议》的精神，在中共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及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继遵义会议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它解决了遵义会议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迎接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朱汉国)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Quanguo gejie jiuguo lianhehui) 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1936年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上海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二百余人，于1935年12月12日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发起救国运动，随即在上海成立了妇女救国会、文化救国会等救亡团体，并于1936年1月28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救国运动的影响下，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的文化界和妇女界相继成立了救国团体。于是，在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号召下，1936年5月31日，全国二十余省六十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选举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成立大会还通过了救国会宣言和《抗日救亡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宣称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全救会”成立后，在华南、华北、西北和南京、济南、武汉等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旅居海外的华侨在各地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全救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救国会成员的主要活动是创办刊物，宣传抗战，他们先后创办了《抗战》、《全民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抗战胜利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全国解放后，鉴于救国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遂于1949年12月18日在北京宣告结束。

(朱汉国)

七君子事件

(Qijunzi shijian)国民党政府打击和迫害抗日民主人士的事件。1936年5月31日，由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7月15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性文章，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对此，国民党政府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于11月23日凌晨，在上海非法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立即举行各种形式的援救运动。宋庆龄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对爱国志士的无理迫害。1937年春，国民党政府竟不顾民情，要对“七君子”起诉公审。为此，中共中央于4月12日公开发表了“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错误政策，释放一切政治犯。北平、西安等地都举行了援助救国会领袖的示威运动。同年6月，宋庆龄、何香凝等17人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并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1937年7月31日，沈钧儒等七人被释放出狱。

(朱汉国)

西安事变

(Xi 'an shibian) 又称“双十二事变”。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重大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广大官兵因东北沦陷亲身感受到国破家亡的痛苦，怀有抗日的要求；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系陕西地方势力，一向与蓄意消灭异己的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1935年秋，两军奉命在陕甘进攻红军，屡遭失败，伤亡很大，而蒋介石却不予补充。两军上下对蒋借内战消灭异己的作法十分不满，感到和红军作战没有前途，要求抗日的情绪日渐高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队采取争取其抗日的政策，并取得显著效果。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完全停止了敌对状态，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抗日。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剿共”政策。1936年10月蒋飞至西安，压迫张、杨继续“剿共”。同时加紧部署“剿共”行动，调集重兵，准备向陕甘进发。12月4日，蒋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服从“剿共”命令，进攻红军，否则要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分别调至福建和安徽，再借机搞掉。12月7日，张学良哭谏蒋介石，要蒋停止内战，但遭蒋严词拒绝。随后，蒋介石又加紧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决定实行“兵谏”，迫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杨下令在蒋的行辕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城内逮捕了蒋的军政要员陈诚等十余人。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87-1.bmp}

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强烈反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亲英美派则主张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反对马上“讨伐”。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冷静地分析了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之邀，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中共和红军代表团到西安参加谈判。代表团在西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25日，张学良送蒋返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内战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朱汉国）

杨虎城

(Yang Hucheng 1893—1949) 国民党爱国将领，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原名 。陕西蒲城人。早年因家境贫困，发起组织中秋会，自任领袖，以“打富济贫”相号召。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率领中秋会成员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兵作战。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1917年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参加于右任、井勿幕为首的靖国军，反对段祺瑞政府及陕督陈树藩，历任靖国军左翼军第五游击支队司令、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等职。1924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旋任国民军第三师师长，隶冯玉祥部。1927年任国民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曾率部出潼关参加北伐。1929年投归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中，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率部攻入西安，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5年改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一度奉命率部阻击北上工农红军，结果损失惨重。后经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倾向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6年12月12日，与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逼迫离开军队出国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国参加抗战，在南昌被蒋介石扣留，后遭长期囚禁。1949年9月重庆解放前夕，被蒋介石指使的特务杀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内。重庆解放后，杨虎城遗骸被安葬于西安韦曲乡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

(朱汉国)

抗日战争

(Kangri zhanzheng) 1937年7月开始至1945年8月结束。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族各界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北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武装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和反共内战政策，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未能形成全国性民族战争。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芦沟桥事变，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中国军民奋起抗击，全国全面抗战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15日，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17日，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会谈。同日，蒋介石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坚决抵抗。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声明书。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同时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将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开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广播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正式形成。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对于促成抗日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抗战中，虽然国民党主要当权者没有放弃反共方针，但广大的爱国官兵、政府官员是坚持抗日的。抗日战争有两条根本不同的指导路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促进了全民族的团结，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必胜的斗志；中国国民党虽然在政策上也有了部分改变，但它实行的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抗击了大量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和卓越贡献，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议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作战的战场，在初期作战是比较积极的，先后英勇地进行了上海抗战以及太原、徐州、武汉保卫战。虽然连遭挫败，但牵制和消灭了一定的日军兵力。许多国民党部队英勇抗战，数百万官兵流血牺牲，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爱国传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1938年底，汪精卫等公开投降日本，后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权。中国共产党以抗日为最高利益，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从1938年11月至1943年12月；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就成为抗日战争胜利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百年耻辱，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显示了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华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这个胜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武力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作战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是八年，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算起，则坚持作战十四年。中国还是反法西斯国家中独立作战最久的国家，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一直单独对日作战。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承受的民族牺牲最大。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伤亡军民 2100 万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军民伤亡总数 9000 万人的 23.3%。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的贡献最大。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损失兵力约 427 万 4 千余人，其中，在中国战场损失 232 万 7 千余人，占日军总损失的 54% 以上，美、苏、英等盟军消灭日军兵力 194 万 7 千余人，占日军总损失的 46% 不到。中国人民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争取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打破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推动全世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具有深远的影响。

（欧阳礼泉）

芦沟桥事变

(Lugouqiao shibian) 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制造的事件。1937年7月7日晚，驻丰台日军在北平芦沟桥附近举行实弹演习。夜十一时左右，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诡称“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中国方面断然拒绝。日军立即调动丰台驻军，利用夜幕包围宛平城。7月8日晨，日军向宛平城开枪，炮轰芦沟桥。守卫芦沟桥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在团长吉星文指挥下坚决执行师长冯治安下达的“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的命令，英勇反击。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89-1.bmp}

芦沟桥的炮声震醒了全中国人民，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抗战。“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再次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9日，中国工农红军通电请缨开赴华北抗日。全国各阶层的爱国群众也纷纷动员起来，共赴国难，要求政府实行抗战。不少国民党将领也发表通电请求参加作战。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抗战与妥协之间动摇不定，在军事上未采取应有的部署。虽然二十九军官兵奋力抵抗，但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也壮烈殉国。这样，平津先后失陷。

芦沟桥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吞并全中国的必然步骤。芦沟桥抗战，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伟大气概，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加速了中国内部的团结统一，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在举国一致抗日旗帜下团结起来，走向抗日救亡的道路。

(欧阳礼泉)

淞沪会战

(Songhu huizhan)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了军事进攻,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三个月之久的大会战。史称“八·一三上海抗战”或“八·一三事变”。因战争是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的,所以又称“淞沪会战”或“淞沪抗战”。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289-2.bmp}

1937年8月9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水兵斋藤要藏,驾车强行冲入虹桥军用机场,窥探中国军队情况,当场被机场卫兵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于8月13日晨,突然发动对上海中国驻军的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8月14日至22日,中国的陆军和空军,对杨树浦以西至虹口敌司令部之间的日军发动进攻,一度攻入虹口日军阵地,并打进汇山码头,但未能包围歼灭敌人。23日,约三个师团的日军由张华滨、川沙登陆,向浏河、罗店、宝山进犯,战事中心移到罗店至月浦一线。这时中国军队在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统一指挥下,分三个方面御敌,浦东方面由张发奎指挥,淞沪近郊由张治中指挥,江防由陈诚指挥。敌我双方在被敌人称为“血肉磨坊”的罗店至月浦一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31日,敌海空军猛攻吴淞后,以步兵登陆,然后分兵进攻宝山和闸北。第十八军五十三团三营营长姚子青率部坚守宝山城,浴血奋战,500余官兵全部壮烈殉国。9月10日以后,日军增兵至10余万人。21日第三战区改组,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将淞沪作战部队编为左中右三个集团,张发奎为右翼军总司令,朱绍良为中央军总司令,陈诚为左翼军总司令,各自指挥两个集团军,总兵力达40余万人。30日,日军发动全线攻击,突破中国军队阵地,我军向蕴藻浜南岸转移。10月7日起,日军向蕴藻浜南岸猛攻,我军苦战10余天。25日,大场失守,我军退守苏州河南岸。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率800官兵,驻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部队撤退,孤军奋战四昼夜后,才奉命退入租界。10月底,日本从华北抽调三个多师团,从国内调来一个多师团,连同原在上海的部队共九个师团,编组了华中派遣军,取代上海派遣军进行淞沪作战。11月5日,日军三个师团从杭州湾北岸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12日,上海失陷,淞沪会战结束。

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奋勇苦战了三个月,歼敌6万余人,给敌人以重大打击,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想。中国军队也受到重大损失。上海的失陷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

(欧阳礼泉)

洛川会议

(Luochuan huiyi)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为了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战胜日寇的纲领、方针和具体政策，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和全国人民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是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它全面地概括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指明了争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道路。

会议分析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指出它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因此，共产党“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

会议决定了共产党在新阶段的具体行动方针：第一，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二，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第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红军实行战略转变，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同时决定将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增加为11人，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

洛川会议在历史转变关头，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规定了共产党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对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

（欧阳礼泉）

八路军

(Balujun)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其前身是抗日战争爆发时在陕甘宁的主力红军。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当局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正式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两旅制，每旅两团制，每师定员1万5千人。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9月11日，按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的总指挥职务改称总司令，彭德怀的副总指挥职务改称副总司令。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90-1.bmp}

8月22日至9月30日，朱德等率领八路军主力先后由陕西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路线和有关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八路军各师主力分散配置，深入华北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壮大了人民力量，从1937年抗战开始时的4万2千余人，发展到1940年的40万人，并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10月以后，八路军所开辟的华北敌后战场及新四军所开辟的华中敌后战场，就成为中国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1941年至1942年，日本集中兵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反复进行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并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八路军人数减少了6万，根据地面积和人口都减少了一半。八路军贯彻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与华北根据地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粉碎了日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克服了严重困难，1942年下半年，华北根据地局面好转。1943年，八路军和华北各根据地又进入恢复和再发展时期。1944年，八路军进行了局部反攻。1945年春夏又继续反攻，并于同年8月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举行了大反攻，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共作战10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35万人以上。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到102万8千余人，建立的根据地面积近8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9000万。

(欧阳礼泉)

新四军

(Xingsijun)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其前身是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闽、粤、浙、赣、湘、鄂、豫、皖八省十三个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经过两党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1937年10月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全军共10300人，6200余支枪，编为四个支队，九个团。同年4月，新四军军部由南昌进驻皖南歙县岩寺，所属四个支队分别向大江南北敌后挺进。同年7月，新四军军部由岩寺移至皖南泾县云岭。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谈判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惨遭杀害。同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以后，新四军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不断粉碎日伪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发展和巩固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中、鄂豫边、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对敌伪作战达193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17000余人，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的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253000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420余万。新四军也由建军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31万余人。

(欧阳礼泉)

平型关战斗

(Pingxingguan zhandou)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初期对日军的一次英勇而胜利的战斗。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北是恒山，南为五台山，地势极为险要，是晋北的交通要道。1937年8月，日军分兵两路南下，一路占领大同后直逼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等地向前推进，企图夺取平型关，以进攻忻口。9月下旬，八路军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到达平型关附近。一一五师在侦察到敌人的战略意图和行军路线后，决定利用关的险要地形，出敌不意，打一场漂亮的伏击围歼战。日军进攻平型关的是其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约一千多人，前面是100多辆汽车，中间是200余辆大车，后边是少数骑兵。9月25日晨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先于24日夜冒雨埋伏在这里的一一五师向敌人发起了总攻。经过一天激战，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余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机枪20余挺，步枪千余支以及战马和大量军用物资。单是军用大衣，就足够一一五师每人一件。

平型关大捷是中国全面抗战以来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也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但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还不宜集中兵力打平型关这样的战斗。因为这不能有效地充分发动群众，做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因此，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纷纷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欧阳礼泉)

论持久战

(Lunci jiuzhan) 是毛泽东论述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基本问题的光辉著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使一部分群众产生了对抗战的悲观情绪。国民党政府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宣扬“再战必亡”论。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希望依赖外力的援助或日本国内的变化，迅速结束战争。速胜论也使一些共产党人产生轻敌思想。肩负着领导抗战责任的共产党必须给全国人民指明胜利的前途，必须彻底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为此，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战争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92-1.bmp}

我得道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没有根据的，是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战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进攻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对全国军民进行广大的政治动员，发动其全部积极性，这样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92-1.bmp}

《论持久战》的发表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给全国人民指出了抗战胜利的前途，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成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也是重要的哲学著作。

(欧阳礼泉)

太原会战

(Taiyuan huizhan) 中国军队在华北为保卫太原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后，即向太原进攻。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给进犯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取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10月初，日军攻陷崞县、原平后，集中五六万兵力，大批飞机、坦克和大炮，于13日向忻口发动进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六个集团军，共约28万人，分为左中右三个兵团，在忻口以北顽强抗击进攻的敌军，激战达半月之久，歼敌约2万人。我军伤亡也在10万以上，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骥等壮烈殉国。正当忻口会战处于相持状态时，为策应晋北日军夺取太原，河北日军的三个师团于10月下旬攻陷娘子关，接着沿正太线西进，先后占领了阳泉、寿阳、榆次等地，直逼太原。11月1日，防守忻口的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原拟退至太原以北阵地，继续保卫太原，但在日军追击下，未进入阵地即渡汾河西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率第三十五军在太原与敌苦战五天后突围。8日，太原失陷。

这次会战虽然中国方面失利，但是中国守军英勇抵抗，付出了重大牺牲，消灭敌军2万余人，争取了时间。此役破坏了日军的河北平原会战，使平汉线中国军队得以南撤。太原失守以后，在华北战场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

(欧阳礼泉)

南京大屠杀

(Nanjing datusha) 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次极残酷的暴行。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日本侵略军谷寿夫所率领的第六师团是最早攻陷南京城的。同谷寿夫第六师团合攻南京城的还有中岛第十六师团，牛岛第十八师团，末松第一一四师团，共四个师团。统率这四个师团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日军进城后，几乎见到中国男人便杀，见到中国女人便奸，奸后再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从中华门附近的居民区，到中央路和中山北路的难民区，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遍地展开，六代豪华的文明古都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其狂虐残暴的程度，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在一个多月内，南京军民先后被杀害者达35万多人，全城约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焚烧、毁坏。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恨，更坚定了中国人民消灭侵略者的决心。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侵略者受到了历史的正义的惩罚。指挥灭绝人性大屠杀的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

(欧阳礼泉)

苏联空军志愿队

(Sulian kongjun zhiyuandui)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空军部队。1937年8月21日，苏联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政府派遣了以崔可夫将军为首的大批苏联军事专家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到中国，帮助作战。从1938年开始，苏联支援中国的轰炸机、驱逐机一队一队飞到中国，先后达一千架，随同飞机而来的苏联航空志愿队达2千余人。

苏联志愿空军人员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中国抗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据不完全统计，苏联志愿航空队进行的空战有：1938年2月28日的武汉第一次空战，击落日机12架；1938年2月21日的远征台北；1938年2月24日的粤北空战；1938年4月10日的顺德空战；1938年4月13日的广州空战，击落日机8架；1938年4月29日武汉第二次空战，击落日机21架；1938年5月11日海南之战，击落日机2架，击沉日舰一艘，击伤二艘；1938年5月20日远征日本；1938年5月31日武汉第三次空战，击落日机14架；1938年6月16日第二次粤北空战，击落日机6架。被日本侵略者一度视为不可一世的“空中武士”，“四大天王”和木更津、佐世保等航空队都相继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苏联志愿航空队在帮助中国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有近200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

(欧阳礼泉)

陈嘉庚

(Chen Jiageng 1874—1961)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今属厦门市)人。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890年赴新加坡随父经商。1904年以后,他自立门户,先后在新加坡开设了数家罐头厂和米店。1906年又开始从事橡胶种植业。此外,还兼营航运业、房地产业,在厦门办百货公司、酱油厂及同安、同溪、溪安等公路公司。1922年至1925年间,陈嘉庚经营的企业发展到顶峰,拥有资产1200余万元,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资本家。

陈嘉庚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支持革命。1910年,在新加坡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新加坡福建华侨推选为福建保安捐款会会长,并任新加坡商会董事长,积极募款支持闽省革命党人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时,他在新加坡组织华侨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并被推选为会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奔走呼号,激励海外侨胞的爱国热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组织“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被推选为主席,筹集大量款项实物,支持祖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抗日战争时期,他还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3月,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将士和进行视察。他先到重庆,目睹蒋介石集团贪污腐化、独裁专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罪行,终于认清了蒋介石集团的面目。5月,他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到达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看到人民生活安定,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奋勇抗日,卓有成效,确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他由拥护蒋介石转变为拥护共产党。同年12月返回新加坡。后担任南洋闽侨总会主席,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等职。1942年2月,日军侵占新加坡后,他避居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在此期间,写成《南侨回忆录》一书。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返回新加坡。1946年11月,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任报社董事会主席,并聘请胡愈之任社长,使该报成为团结华侨,宣传爱国,揭露美蒋罪行和支持祖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有力工具。1947年5月,他领导新加坡华侨组成“星洲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并任主席。

陈嘉庚热心兴办华侨和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从1913年起,他在家乡集美创办了幼儿园、男子小学、女子小学、师范、幼儿师范、女子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另外还有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医院、农林试验场和教育推广部等。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从1924年到1932年间,他先后创办了道南学校、南洋华侨中学、南侨女中、爱同、崇福、南洋师范及水产航海等学校。

1949年6月,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邀请,陈嘉庚到达北京。9月,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当选为政协常委。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同时继续担任南侨总会主席。1950年2月,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旋回国定居于集美。1953年1月,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到1961年,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曾称誉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病逝。

(欧阳礼泉)

白求恩

(Baiquiuen 1890—1939)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师。1890年3月3日，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州北部小镇雷文斯特。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1936年曾率医疗队去为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西班牙人民服务。1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在武汉、西安先后分别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朱德总司令的接见。4月底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5月1日，白求恩就前往晋察冀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白求恩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对八路军进行医疗救护工作。他还编写医学教材，著有《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及一本关于游击战争中医疗工作的著作。这是白求恩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医疗工作经验的结晶，也是世界医学史上熠熠闪光的一页。在一次为伤病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伤的手指被细菌侵入而感染恶化，终因医治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逝世。逝世前，他在遗书中向聂荣臻司令表示：“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93-1.bmp}

1939年11月1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驻地群众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殓殡典礼。21日，中共中央发出唁电和对白求恩家属的慰问电。23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通令全军举行壮烈哀悼。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21日，毛泽东主席写了《纪念白求恩》的光辉著作，号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1940年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唐县军城南关修建了白求恩墓。全国解放后，党和国家又特地将他的遗体迁到河北省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欧阳礼泉)

柯棣华

(Kedihua 1910—1942) 原名叫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抗日战争时期的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1910年10月9日生于印度孟买省绍拉普尔（今属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来华前，在印度学医，从事医疗工作。1938年9月27日，柯棣加入贾瓦哈拉·尼赫鲁派遣的援华医疗队，到达广州，受到宋庆龄和广州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9月29日到达武汉，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和接待。医疗队先后在武汉、宜昌、重庆工作近半年，于1939年1月22日离开重庆，奔赴延安。为了表示援华的决心，他在姓氏后加一个“华”字。从此，人们称他为柯棣华。2月12日，柯棣华到达延安，受到延安人民的欢迎。3月15日，柯棣华和其他印度医生拜会了毛泽东主席。他在延安工作近八个月后离开延安，到达山西武乡琼山谷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热烈欢迎，并应邀出席八路军总部举行的白求恩追悼会。

1940年5月，柯棣华告别朱德总司令，前往白求恩战斗过的晋察冀根据地。6月21日，白求恩陵墓在河北省唐县军城南关落成。聂荣臻司令员特邀柯棣华代表印度医疗队，参加陵墓的揭幕仪式。这年9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柯棣华率医疗队不辞辛苦地工作在前线。1940年10月，毛泽东曾给柯棣华发来一份电报，要他取道延安回国。但柯棣华没有回国。不久，他担任了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外科教员。以后，又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兼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他牢记聂荣臻司令员“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白求恩”的话，时刻以白求恩为榜样，在医学教学、医疗管理及医疗队伍的建设上都做出了重大成绩。写有《外科总论》的医学讲义。1942年，柯棣华参加了中共延安整风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9日，柯棣华积劳成疾，绦虫病引起的癫痫再次发作，抢救无效，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辞世，终年32岁。

1952年，柯棣华的陵墓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重建。1976年12月9日，柯棣华大夫逝世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周恩来生前亲自批准筹建的柯棣华纪念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落成开馆。1982年柯棣华大夫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分别题词纪念。

(欧阳礼泉)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Guomindang lingshi quanguodaibiao dahui)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抗战建国”。大会的宣言说：此次“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为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决不辞任何之牺牲”。又说：“吾人此次抗战，固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但同时又希望日本“幡然变计，放弃其侵略主义”，谋求同日本侵略者实现“合于正义之和平”。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纲领总则规定：“确定三民主义及总理遗教”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对外政策，主张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一切伪组织。对内政策，军事上：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之一致为国效命；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规军配合作战；在敌后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会；改善各级政治机构。经济上，进行以军事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民众运动方面，提出在不违犯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保障。大会决议确立领袖制度，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扩大特务机构。决定设立训练委员会，由总裁兼任委员长，分组掌管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机关、公务人员及学校教职员之思想训练事宜。决定成立由蒋介石任团长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全国青年“成为三民主义之信徒”。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坚持抗战并争取胜利，和人民的愿望基本一致，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是大会依然坚持一党专政的体制和片面抗战的错误方针，严格限制人民抗日的自由。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两面性的表现。

（欧阳礼泉）

抗战建国纲领

(Kangzhan jianguo gangling) 是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除前言外，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七项，共三十二条。总则规定：“确定三民主义及总理遗教”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对外政策，主张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一切伪组织。对内政策，军事上：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之一致为国效命；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规军配合作战；在敌后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会；改善各级政治机构。经济上：进行以军事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民众运动方面，提出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保障。

这个纲领，一方面，对于抗战初期的民主运动和推动抗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是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因为它具有两面性，国民党可以用它来包办抗战和维护其统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也可以利用它作为发动抗战力量和向国民党作斗争的工具。因此，为了团结抗战，利用和发挥国民党的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对该纲领表示赞助，并力争使其向进步的方向发展。

(欧阳礼泉)

国民参政会

(Guomin canzhenghui)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被迫成立的咨询机构。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抗日和政治改革的要求下，于 1938 年 3、4 月间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规定要设立国民参政机关。4 月 12 日，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规定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它只有听取国民党政府施政报告及询问建议之权，它的决议对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条例规定参政员总额 200 名，具体人选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后，由国民政府公布。在 200 名参政员中，国民党员 88 人，共产党员 7 人，中国青年党员 7 人，国家社会党员 7 人，社会民主党员 1 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委员 1 人，余为无党派人士。国民参政会基本上是国民党独占的机关，而不是真正民意机关。但是，设立这个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各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的政治机构是过去所没有的，这是一个进步。它给了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

1938 年 7 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随后迁往重庆，1947 年 5 月在南京举行了第四届第三次会议后宣布解散。成立之初，由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党与无党派人士的努力，国民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转而利用国民参政会混淆社会视听，制造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国民参政会上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了广大中间势力，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国民参政会亦成为其推行反共政策、鼓动内战，粉饰独裁的御用工具。但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民主人士利用国民参政会的合法讲台，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参政会日益不得人心，只好草草收场。

(欧阳礼泉)

台儿庄战役

(Taierzhuang zhanyi) 亦称鲁南会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保卫徐州的一次外围战役。1938年3月，日军矶谷师团主力沿津浦线南进，企图占领台儿庄，进而迂回攻打徐州。国民党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按预定的计划在台儿庄附近集中了约25万人的优势兵力，准备阻击歼灭敌人。从3月23日起，中日双方军队在台儿庄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中国军队英勇抗击，至死不退。日军未能全部占领台儿庄，为国民党的外线完成对日军之反包围争取了时间。4月初，国民党军在切断敌人退路后，即向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发动攻击，并击退了由临沂增援之板垣师团。4月7日，日军被迫突围，中国军队乘胜追歼。共歼敌11984人，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

台儿庄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次著名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在军事上，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上，鼓舞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显示了全民族举国一致团结抗战的伟大力量。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

(欧阳礼泉)

徐州会战

(Xuzhou huizhan) 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广阔地域上，展开的一场会战。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打通津浦路，连结南北战场，并进而切断陇海路，威胁平汉路，进窥武汉，决定进行以夺取徐州为主要目标的作战。中国军事当局采用利用优势兵力进行运动战，各个击破分进运动之敌的作战方针，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驻徐州指挥。

1938年3月日军一部进犯临沂，协助津浦路北段正面进攻的日军夺取徐州。14日至18日，临沂我军与敌激战，歼敌一部，残敌退却。津浦路日军于14日向滕县进攻，守军与敌激战，伤亡惨重，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等牺牲，18日滕县失守，日军直逼台儿庄。23日，台儿庄战斗开始，日军连续增援猛攻，守军池峰城部第三十一师浴血固守，坚守半月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在附近。4月6日，中国方面调集大量兵力，实行全线反攻。当受包围的日军撤退时，我军又乘胜追击。此役共歼敌万余人，取得重大胜利。之后，日军决定继续集中兵力进行徐州方面的作战。日军调华北方面军的四个师团攻击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调华中派遣军的两个师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5月中旬，日军从南北两方形成了对徐州的包围。由于双方装备对比悬殊及作战条件的不利，为保存实力，蒋介石下令作战部队突围撤退。19日徐州失陷。

徐州会战，是抗战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会战，历时五个多月。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付出了重大代价，为部署下一阶段的武汉会战赢得了充分的时间。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斗中，击败了日军两个精锐师团，震惊中外，这对于全国人民的抗战，是个极大的鼓舞。

(欧阳礼泉)

武汉会战

(Wuhan huizhan) 中国军队在华中保卫武汉抗击日军的一次战役。当时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了中国的军事、政治与经济之中心，是中国政府继续抗战的核心基地。在徐州会战时，日军即决定以“速战速决”的方针攻占武汉，击破中国军队在华中的主力，逼迫中国政府屈服。中国方面也制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1938年6月中旬，日军开始进攻武汉的准备作战，先后攻占安庆、潜山和马当要塞。7月，又攻陷湖口、九江，取得了从江南进攻武汉的据点。此后，即开始进行攻占武汉的外围战。在江南战场，敌占九江后，即分兵向南浔铁路和瑞武公路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自8月至10月下旬，先后在庐山两侧及南浔路、瑞昌、德安等处与敌激战。10月28日德安失陷。进攻南浔路之敌受挫后，于9月增调两个师团，在海、空军配合下沿长江西犯。我军在瑞昌至阳新一线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敌军先后攻占阳新、大冶、黄石、鄂城等地，进逼武昌。在江北战场，7月下旬，日军相继攻陷黄梅、宿松和田家镇，并继续西犯，进抵黄陂，威胁武汉侧背。江北的另一路日军于9月攻占了固始、商城、罗山等地。10月再陷信阳、麻城。这时武汉已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部队撤退。25日至27日，汉口、武昌、汉阳相继失陷。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多月，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的一次会战。会战最后以中国军队失利而结束，但它消耗了日军巨大的有生力量，赢得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日军虽占领了武汉，但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的目的并未达到。日军的战略进攻至此已达顶点。武汉失守，中国军民抗战进入更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

(欧阳礼泉)

日本侵华新方针

(riben qinhua xinfangzhen)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新的侵华方针。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实行大规模战略进攻，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高唱“剿共（共产党）灭党（国民党）”。1938年1月16日日军占领南京的第3天，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声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8日，近卫在会见记者时说，今后的“对华方针是谋求使国民政府崩溃”。但是开战一年来，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仍保有西南、西北广大地区，拥有很大兵力与日军对抗。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分散，兵源不足，庞大的军费开支难以承受，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不断增长。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10日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使战争进入敌我双方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3日，即在武汉陷落一周后，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明确修改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暗示只要它降日反共，就可根据一定条件进行谈判。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具体提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招降条件。上述两个声明，日本仍要求国民党政府“更换人事组织”，坚持把蒋介石下野作为“议和”先决条件。1939年2月，华北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所拟的“和平计划”中，改变了这个政策，公开声言“尊崇蒋介石上将的地位而给予崇高位置”。3月，日本新任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正式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这样日本在占领武汉后，就从否认国民党政府改为承认国民党政府，从反蒋变为拉蒋。由此可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新的侵华方针，把以前对国民党政府实行的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加紧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集中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李慎兆）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Guomindang wujie wuzhong quanhui)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庆举行。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移向敌后解放区战场。国民党政府也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和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的演讲。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演讲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指挥党政军各机关，蒋介石任委员长，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军委会委员及由委员长提出的人员担任。委员长有极大权力，“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还决定要彻底清查与整理户籍、保甲，健全保甲制度。规定要以保甲为单位，强制民众推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等。会后，国民党根据会议确定的方针，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因此，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改变政策，逐渐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标志。

(欧阳礼泉)

汪伪南京国民政府

(Wangwei nanjing guomin zhengfu)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伪中央政权。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汪精卫，抗战伊始就与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组织“低调俱乐部”，大肆宣扬失败主义，并暗中进行投降活动。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对国民党诱降的《第二次近卫声明》后，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谈，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汪精卫集团表示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有开发利用中国资源的特权。日本同意汪精卫集团提出的成立伪政府等行动计划。双方商定，协议内容由日本作为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然后由汪声明响应并开始行动。12月19日，汪精卫率周佛海、曾仲鸣、陈璧君、陶希圣等从重庆叛逃至越南河内。22日，日本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4月，汪精卫一伙抵上海。5月，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到日本进行卖国交易。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规定由汪精卫按“分治合作”的原则联合各伪政权组织伪中央政权，在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允许汪记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存在。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务整理案及修正国民党总章、修改国民党政纲、以反共为基本政策、根本调整中日关系等提案。决定废除总裁制，实行主席制，推汪精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大会发表的宣言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纲领。此后，汪精卫即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身份进行组建伪中央政权的活动。12月31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秘密订立《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主要内容是：承认伪满洲国；把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由日本长期占领；伪政权由日本派顾问或职员操纵；伪军、伪警察由日本教官训练，武器由日本供给；伪政权的财政、经济、工农业及交通等，均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协力反共，禁止一切抗日活动。1940年1月，汪精卫与北平伪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头子梁鸿志等在青岛举行“联席会议”，就组织伪政权问题达成协议。3月下旬，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伪中央政权名称为“国民政府”，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旗下附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和平反共）。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王克敏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3月30日，群奸粉墨登场，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11月30日，汪伪政权与日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将1939年订立的日汪密约变为正式条约。汪伪政权对沦陷区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协助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工具和无耻帮凶。1944年汪精卫病死后，由陈公博任伪国民政府主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汪伪政府宣布解散。

（李慎兆）

三次长沙会战

(sanci changsha huizhan)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湖南长沙地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三次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 年 9 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长沙为中南地区军事重镇，国民党政府军第九战区指挥中心所在地。1939 年 3 月日军占领南昌后，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消灭第九战区主力，调集 10 余万兵力从湘北、赣北、鄂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第九战区以 16 个军 20 万人的兵力，利用山岳江河组织防御。9 月 14 日，日军两个师团自赣北发动进攻，在遭到猛烈反击后退至原阵地。鄂南日军由通城南犯，也被击退。湘北是日军主攻方向，18 日，日军向新墙河北岸中国守军阵地发动攻击，经 5 昼夜激战突破中国守军阵地，强渡新墙河，推进到汨罗江一线。26 日，强渡汨罗江。29 日，主力进抵长沙外围。10 月 2 日，中国守军发起反击。日军遭到严重打击后，加之粮弹告罄，于 10 月 3 日北撤，中国军队跟踪追击，至 10 月 6 日恢复原有阵地。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 年 9 月上旬至 10 月上旬。1941 年 9 月，日军为消灭长沙一线之国民党政府军主力，调集 4 个多师团及海空军共 12 万余人，再次进攻长沙。驻守长沙地区的中国军队有 14 个军 30 万余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逐次防御。9 月 7 日，日军攻击大云山中国守军，双方在大云山西南麓港口地区展开激战。18 日，日军主力强渡新墙河，中国守军坚守工事顽强抵抗。日军用飞机大炮猛轰守军阵地，并发射毒气弹，突破中国守军阵地。20 日，突破汨罗江防线，强渡汨罗江。26 日，渡过捞刀河。28 日，进入长沙。国民党政府军 6 个军在长沙东南地区进行反击，洪源洞地区中国守军南渡汨罗江，南北夹击日军。10 月 1 日，日军突围北撤，10 月 8 日全部撤往新墙河以北地区，双方恢复原有阵地。此役日军伤亡 3 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损失约 10 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 年 12 月下旬至 1942 年 1 月中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配合其在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进攻，牵制中国军队南下增援英军在港九及缅北的作战，发动了第三次长沙战役。1941 年 12 月，日军以 3 个师团 1 个旅团约 7 万余人，配以海、空军及炮兵、战车部队，分两路进攻长沙。另以 1 个师团在南浔路进行牵制作战。第九战区以 14 个军在湘北、赣北组织防御。12 月 24 日，日军分八路强渡新墙河。28 日，突破汨罗江防线。中国守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主力向金井以东及铁路以西地区迂回。31 日，日军进至捞刀河、浏阳河，从三面包围长沙。1942 年元旦，日军两个师团对长沙发起猛攻。守军第十军奋勇抵抗，阵地失而复得。葛先才团坚守阵地，最后仅存 58 人。4 日，中国守军以 9 个军的兵力对日军反包围，发起全线反击。日军向东、北方向败退，15 日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最后胜利而告终。

(李慎兆)

三次反共高潮

(sanci fangong gaochao)指国民党顽固派在1939年至1943年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进行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威胁。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集团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政治和军事双重打击。1939年12月中旬，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袭占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县城，并袭击驻合水等地的八路军。在山西，阎锡山的部队制造了“晋西事变”，向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在晋冀鲁豫地区，国民党朱怀冰、石友三部于1939年11月和1940年1月，先后向冀西和冀南的八路军进攻。各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指示下，站在自卫立场上，对于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回击。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并未放弃其反共政策。1940年7月，国民党向共产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中心内容是削减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限制作战地点。共产党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皓电”，强令在大江南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彭叶项发出致何白的“佳电”，驳斥“皓电”，拒绝华中部队北移的要求，但为顾全大局，有利抗战，同意江南部队可以北移。12月7日，蒋介石将《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下达执行。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由安徽泾县云岭出发，6日抵达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军长叶挺前去谈判被扣。全军苦战七昼夜，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分以身殉国。1月17日，蒋介石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中国共产党严厉揭露蒋介石的滔天罪行，斥责蒋介石破坏抗日，准备降日的阴谋，并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释放叶挺军长，惩办祸首等12条解决办法。同时重建新四军军部。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拥护，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与孤立。3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表示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前奏是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封建法西斯理论，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5月，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了一场反共舆论攻势。6月，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调集几十万大军，准备闪击延安，并在7月7日炮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针对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采取政治和军事两面出击的策略。《解放日报》发表许多文章，披露资料，驳斥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污蔑、诋毁。驻延安的部队开往前线，严阵以待。延安和其他解放区举行各种集会游行，抗议顽固派的挑衅。共产党的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处境十分孤立。7月10日，蒋介石被迫命令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停止行动，并复电朱德，诡称无进攻边区之意。国民党这次反共高潮未发展成为大规模军事进攻就被制止了。

(欧阳礼泉)

新民主主义论

(Xinminzhuzhuyilun)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光辉著作。1940年1月，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妄图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又在舆论上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幻想走“中间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驳斥其谬论，打破民族资产阶级的幻想，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中国从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中国革命已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革命领导权必须是属于无产阶级，而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之间不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即：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并促使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实行“节制资本”的经济纲领；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它不但从思想上政治上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而且极大地帮助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帮助了各解放区政策的统一。它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指导中国人民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强大思想武器。

(欧阳礼泉)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Zhongguo minzhu zhengtuantongmeng) 它是在蒋介石国民党加紧推行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形势下，由几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一个政治联盟。

1939年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同时，国民党也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深感力量分散，易于被各个击破，决定联合起来以争取自由民主、反对内战，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发展。1940年12月下旬，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在重庆多次集会，决定将原来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2月至3月中旬，黄炎培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连续召开筹备会议，为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组织简章和政纲等，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了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勱、梁漱溟、李璜、章伯钧、罗隆基、江问渔、冷遹、杨赓陶、丘哲、林可玑等十三名中央执行委员。由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勱、梁漱溟、章伯钧等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推选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由张澜接任），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同盟的机关刊物《光明报》于同年9月18日在香港出版，梁漱溟任社长。同盟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要求民主自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是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同盟在组织上采取团体会员制，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及少数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

1944年9月，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是中间派政治势力发展壮大的标志。民盟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欧阳礼泉)

百团大战

(Baituan dazhan)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向日本侵略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战役。1940年8月,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打破其“囚笼政策”,并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全国抗战形势好转,八路军总部决定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的破袭战。参战兵力105个团,约40万人,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直接指挥。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中心任务是进行交通总破袭战,破坏和切断华北日军的交通线,以正太路为重点。八路军占领了娘子关,攻入并破坏了井陘煤矿,使正太路陷于瘫痪,切断了同蒲路北段和忻县至静乐、汾阳至离石等公路。同时,对平汉、津蒲、德石、平绥、北宁、白晋各铁路线及重要公路交通线进行了破袭战。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中心任务是扩大上一阶段战果,重点进攻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的日军据点。八路军进攻了涞源、灵丘、榆社、辽县等据点,再度切断同蒲路北段。华北各铁路线的日军均遭到八路军的进攻。第三阶段,10月6日至12月5日。从10月6日起,日军调集数万兵力对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八路军各部转入反“扫荡”作战。12月5日,战役基本结束。在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俘日伪军18600余人,攻克日军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桥梁、车站、隧道等260余处,煤矿五座。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但此役使用了华北八路军几乎全部兵力,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导致后来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299-1.bmp}

(李慎兆)

左权

(Zuo Quan 1905—1942) 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的卓越指挥员之一。湖南醴陵人。出身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程潜在广州举办的湘军讲武堂。1924年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在黄埔军校期间，他曾参加由周逸群、蒋先云等共产党人秘密成立的革命团体火星社，并且是以火星社为基础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重要成员之一。黄埔军校毕业后，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中任排长、连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又转入苏联陆军大学。

1930年，左权回到上海。后奉中央之命，到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教官，在龙岩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长。参加过攻打长沙的战斗。1931年，任红军总前委野战司令部作战科长，红军总前委参谋处长，并与王稼祥、刘伯坚等到宁都附近配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举行宁都起义。起义成功后，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辖第十三、十四、十五等三个军，左权任十五军政委。后任红十三军军长，红二十一军军长，红五军团政委等职。1933年12月以后，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2月，左权参加了红军东征。5月回师后，任红一军代理军团长兼参谋长，与聂荣臻一起率部参加西征，9月占领会宁城。11月，他参加指挥了著名的山城堡战斗，歼胡宗南主力七十八师。12月，左权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一军团由三边地区开赴陕西云阳镇，担负援助张学良、杨虎城的任务。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副参谋长，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委员。9月随朱德、任弼时等东渡黄河，开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协助朱德、彭德怀领导八路军抗日。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1938年冬，他主持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起草了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建立了各级司令部机构，制定了司令部工作规划。他还写了《扫荡与反扫荡》、《袭击战术》、《战术问题》、《交通战》、《论我军的后勤建设》、《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敌后作战指导与组织上几个问题》等文章，对军事理论、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研究。

1942年5月下旬，日军集结精锐部队3万多人，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分多路向驻山西辽县麻田镇的八路军总部实施远距离奔袭。为了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左权率三八五旅主力英勇抗击敌人。6月2日，他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为了纪念左权，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1950年9月，左权灵柩移葬于河北省邯郸烈士陵园。

(欧阳礼泉)

东北抗日联军

(Dongbei kangri lianjun) 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几十万大军几乎未作抵抗就退入关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东北人民奋起抗战，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4月，仅自发的抗日武装就曾达到30万以上。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开始着手建立抗日联军。1936年2月，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成立抗日联军第一、二、三路军共辖11个军，3万人，以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后改为李兆麟）为负责人。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由于环境的残酷，东北党组织采取保存实力，逐步收缩方针，把一、二、三路军缩编为十个支队，分散活动。到年底，抗日联军主力转移至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另一部分坚持斗争的游击支队，到1941年又进一步化整为零，编为若干个小分队，留在东北坚持斗争。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全部抗联队伍随着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参加了打击日寇的最后作战，400多名抗联干部被有计划地派到东北五十七个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对于恢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各地的组织，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争取迅速地同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并打通和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日本侵略军主力——关东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和八路军的北上反攻，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欧阳礼泉）

杨靖宇

(Yang Jingyu 1905—1940) 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本姓马，名尚德，字骥生；曾用名张贯一、乃超、周敏等。“杨靖宇”是他代表中共满洲省委赴南满巡视工作时正式启用的名字。河南确山人，出身农民家庭。

1923年，考入开封纺织染料工业学校，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冬被党派回家乡确山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4月，为迎接北伐军的北进，发动了确山大暴动，成立了确山县第一个人民的政权——确山县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杨靖宇当选为常务委员。1927年5月，杨靖宇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杨靖宇等在列店发动秋收起义，成立了确山农民革命军，杨靖宇任总指挥。1928年初，他把部队拉到四望山，创建农村根据地，成立豫南特委，杨靖宇任特委书记，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鄂豫皖别动大队，杨靖宇任大队长。

1928年秋，杨靖宇到开封、信阳白区工作，曾三次被捕。1929年初，奉命去东北，化名张贯一，在抚顺煤矿当工人，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建立了中共抚顺特别支部。这期间曾两度被捕。1931年冬由党营救出狱，转赴哈尔滨，先后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等职。1932年秋，到南满巡视工作，改组了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整顿了磐石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春，杨靖宇又到海龙巡视工作，整顿了海龙县县委和游击队，把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1933年9月，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4月1日，在濛江与那尔轰附近的陈家蹠子成立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任总指挥。11月，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成立，杨靖宇任常委。同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临江县板石沟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等联合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任抗联第一军军长兼政委，在桓仁、兴京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第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时，杨靖宇任总指挥兼政委，率军在南满和东满地区打击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抗联实行惨绝人寰的“围剿”。抗联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1938年秋，杨靖宇率领的第一路军在临江岔沟被两万多日军包围，经浴血奋战，始突出重围。同年冬，由于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全部被敌人破坏，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杨靖宇率第一路军一部1千4百多人，进入长白山密林中。1939年11月，再次遭到敌人包围袭击，损失惨重，只剩下4百多人。1940年1月，为了解决部队供给问题，他又把部队化整为零，主力北上，自己则带领一支五六十人的小部队东进。最后，战斗到只剩下他一人。2月23日，因叛徒出卖，杨靖宇被敌军围困，壮烈牺牲在吉林濛江县。他牺牲后，敌人剖开了他的遗体，想看看这位共产党员吃的是什麼，是什麼力量使他坚持那么长时间的战斗？结果，他的胃中没有一粒饭，全是野草、树皮和棉絮！

为了纪念杨靖宇，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杨靖宇牺牲地濛江县改为靖宇县。这年2月，杨靖宇殉国六周年之际，通化人民为杨靖宇等革命先烈开追悼大会，并当场处死出卖杨靖宇的两个民族败类。1948年长春解

放后，被敌人割下示众的杨靖宇将军的遗首恭置于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1958年，靖宇陵园在通化市建成。2月23日，杨靖宇殉国十八周年之际，在通化举行隆重的公祭安葬杨靖宇大会，杨靖宇的遗容和遗体合葬于靖宇陵园中。1980年在杨靖宇殉国地，建起一座高大壮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塔”。
(欧阳礼泉)

枣宜战役

(Zao yi zhanyi) 1940年夏，国民党军队在湖北枣阳、宜昌一带与日军展开的一场激战。1940年4月，日军为进逼四川，压国民党政府投降，决定以四个师团的兵力进攻湖北的枣阳、襄阳、宜昌等地。5月初，日军分路向襄阳、枣阳及桐柏山区等地进犯，企图在枣阳附近围歼国民党第五战区主力。国民党第五战区指挥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三集团军近40万兵力，且战且撤，并向外线转移。5月8日，日军攻陷枣阳，合击国民党五战区主力扑空。国民党第五战区主力从外线向枣阳反包围。日军从枣阳南犯。第五战区部队前堵后追，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战斗中壮烈殉国。后日军又北窜，再度攻陷枣阳。5月底，由随县进犯襄阳的日军渡过汉水，攻陷襄阳。同时，由武汉地区沿江西犯的日军，击败国民党第二、二十六、七十五、九十五军，攻陷荆门、江陵地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忙将在四川整训的嫡系第十八军调至宜昌防守，十八军以十八师守城。6月11日，日军进攻宜昌。国民党军抵抗一天，即撤退。于是，中国军队采取外线作战，部队分别到达江陵、宜昌、当阳、钟祥、随县、信阳以北一线，但由于敌据城死守，中国军队反攻无效，即调整部署与敌对峙。

这次会战，日军虽占有宜昌，但始终未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也未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日军的威胁。同年11月，日军以几个师团第三次向随枣地区进攻，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战，日军一无所获，敌我双方仍维持原来状态。

(欧阳礼泉)

张自忠

（Zhang Zizhong 1891—1940）字荃臣，后改荃忱。山东省临清县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1911年，张自忠考入天津法政学堂。为实现报国之志，1914年赴沈阳投奔二十师三十九旅八十七团当兵，后转至驻河北廊坊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部，在该部教导团学习军事，因品学兼优，被冯誉为“标准学员”。毕业后从连长升为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在冯部，张自忠任连长的连被评为“模范连”，任师长的师被誉为“模范师”。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张自忠奉命主持华北政府。当时，张虽有抗日救国之志，但只能在中国政府已承认的屈辱条约范围内行事，力求维护国家的尊严。他抓紧时机，积极补训部队，竭力改善装备。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将士顽强抵抗20余天，由于寡不敌众，伤亡极大。军长宋哲元决定率部撤离北平去保定。行前，委任张自忠代理自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在留平期间，张自忠安排因时间仓促未能撤退的部队及时撤退，发动城内和四郊民众将伤员抬到医院治疗；对阵亡者予以埋葬，派人接济和安置二十九军官兵的留平眷属。不久日军逼迫张自忠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张自忠化装躲开日军潜回天津家中，与妻儿作简短的交待后，经烟台去南京。南京军事当局经多方了解，断定张自忠不是汉奸，便任命他为五十九军军长。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张自忠率军与其他部队互相配合在临沂与日军两战两捷，粉碎了日军两个师团会攻台儿庄的计划，造成了五战区集中全力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的有利战机。临沂战斗后，张自忠又经历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第一次随（县）枣（县）会战，因屡建战功，升任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第二次随枣会战，日军企图分进合击，将中国军队包围于随枣并进而一举歼灭之。中国军队则计划对敌进行反包围，然后加紧围攻。在战斗非常激烈时，五战区电令张自忠“派有部队迅速渡河，向敌后出击。”张自忠立即率两个团一个营渡过襄河，将敌截为两段，敌万余人从南北两面夹击张部。张自忠决心拖住敌军，以便友军反攻。5月16日，敌人增援部队赶到，用大饱和飞机的强大火力向张部反攻。张自忠多处受伤，仍沉着指挥战斗，直到壮烈殉国。

第二天，张部夺回阵地，找回张将军的遗骸。这时上到副总司令，下至勤务、伙夫，都失声痛哭。附近乡亲也赶来焚香哀悼。灵柩运至重庆，国民党政府为张自忠举行了国葬，晋升他为陆军上将。同时，全国各地都先后举行了追悼会或公祭仪式。在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参加了当地各界举行的追悼会。国共两党负责人和各界人士纷纷为张自忠殉国题诗，写挽联等。毛泽东的题词为“尽忠报国”。朱德、彭德怀的题词为“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责在朝野团结图存”。李宗仁的题词为“英风不泯”。1943年5月16日，周恩来为纪念张自忠殉国三周年，写了《追念张荃忱上将》，对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了高度评价，赞扬“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为纪念张自忠，北京、天津、汉口、徐州、济南、上海等城市，均设立了“张自忠路”。湖北荆门县刘猴集建有张公祠，南瓜店建有张将军的衣冠冢，在他的殉国处，建有纪念塔。

(欧阳礼泉)

中国远征军

(Zhongguo yuanzhengjun)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派往缅甸支援英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作战部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要求中国派兵入缅作战。为协助盟国作战并保卫中国接受美援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中国军队于1942年2月以第五军、第六军、暂编第六十六军编组成远征军，先后入缅作战。1942年3月，第五军在同古与日军激战十多天，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因联络和给养被切断，于月底向北撤退。4月，暂编第六十六军克复仁安羌，解救被困英军七千余人。同月，第六军先后在棠吉、腊戍等地与日军激战，由于英军不予配合，远征军作战失利。5月中旬，远征军陆续退出缅甸，大部撤回滇西，另一部撤往印度。退往印度的远征军，加上后来从国内运去的部队，编为中国驻印军。退回滇西的远征军及新增加的部队，于1943年4月重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陈诚为司令长官，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下辖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和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团军共七个军的兵力。1943年冬，陈诚生病，以卫立煌继任司令长官。滇西远征军为策应驻印军在缅北作战，于1944年5月西渡怒江向日军反攻。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和驻印军在芒友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不久，中国驻印军被调回国。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有力地支援了英军在缅甸的对日作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军队在国际上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形象。

(欧阳礼泉)

三三制

（ sansanzhi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上所实行的政策。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了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分配的原则，即在参议会和政府里，代表工人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名额。人们将此原则习称为“三三制”。“三三制”原则的规定，既保证了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团结了广大群众。此原则公布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2月按这一原则率先进行了改选。此后，其他各根据地也相继进行了改选，建立了三三制政权。“三三制”的实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克服困难坚持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朱汉国）

减租减息

(jianzu jianxi)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 1937 年 8 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决定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洛川会议后，减租减息政策即在各根据地陆续实行。

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各根据地根据各自的情况有所不同。减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 25%。如群众要求多减时，可根据情况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得超过此限度。在游击区及敌占点线附近，一般只减 20%、15% 或 10%。总之，减租的原则是以能相当发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及团结各阶层抗战为目标。减息一般实行分半减息，即年息减为一分五厘。如付息超过原借本钱一倍者，停还利息，超过二倍者，本利皆停。总之，减息的原则是减至社会信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

减租减息政策在各根据地实行以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拥护。但就抗战前期来说，在个别根据地内，实行得还很不彻底；有些根据地则又犯了某些左的错误。为了在各根据地更广泛、更深入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1942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如何执行这个政策的指示，强调了地主必须减租减息，农民必须交租交息的原则，批评了个别根据地内出现的某些错误倾向。此后，减租减息运动在各根据地更为广泛地展开，并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查减运动和清理旧债、抽回地契运动。

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极大程度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它使贫雇农的经济地位显著上升，中农的户数和占有的土地大为增加，封建剥削制度受到限制，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它又规定了在减租减息之后须交租交息的政策，这就保存了地主、债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从而促使大多数地主参加了全民族合作抗日的事业，减少了根据地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总之，这一政策的实施，为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朱汉国)

精兵简政

(Jingbing jianzheng)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

1941年，日军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配合下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缩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面对根据地所遇到的严重困难，1941年11月，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开明绅士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主张，立即为中国共产党所采纳，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并规定了精兵简政的具体内容，要求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总数的3%。精兵方面，规定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山区为2:1，平原为1:1，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化。简政方面，要求裁并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实行合署办公。

从1942年开始，各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陆续开始整编部队，紧缩行政机构，减少脱产人员。例如陕甘宁边区将边区直属机关从35个减到22个，脱产人员由469人减少到279人。经过精兵简政，提高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增强了政府机关的行政效率，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一政策，对克服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朱汉国)

大生产运动

(Dashengchan yundong)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而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03-1.bmp}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一度发生了极大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保障军民的物质供应，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共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空前规模的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发展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广大群众最先投入了生产运动。1941年3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屯垦。他们一边战斗，一边生产，1941年开荒种地11200亩，1942年达26800亩，1943年达到粮食、经费自给有余，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从1941年到1943年，经过三年的艰苦创业，陕甘宁边区实现了粮食全部自给，棉花自给50%，基本克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军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

其他根据地的军民，按照中共中央“劳力与武力相结合”、“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也都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如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6个地区到1943年就增加耕地600多万亩。太行区的部队和机关，做到自给粮食3个月和全年蔬菜。

大生产运动使各抗日根据地克服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生活，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锻炼了广大干部，积累了经济建设经验。

(朱汉国)

整风运动

(zhengfeng yundong)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逐步纠正了“左”倾错误，使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形势的迅速变化，党对历次“左”倾思想还未来得及彻底清算，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仍然存在。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带来了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致使党内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针对上述情况，为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于1941年利用抗战局面相对稳定之机，开展了全党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列主义作风，这可以说是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接着，在党的高级干部中首先开始整风。

1942年2月，毛泽东相继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同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规定了整风运动的方法、步骤和阅读文件。6月，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于是，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就在各解放区由此开始。

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即从思想上彻底清算机会主义错误，建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即从组织上清算机会主义错误，加强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树立马列主义的文风。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整风运动的步骤是：第一步为学习阶段。学习马、恩、列、斯、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和党的文件，以提高党员的认识水平。第二步为讨论阶段。通过学习，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三步为总结阶段。各单位、各部门和每个党员经过讨论，写出总结。

到1943年夏，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阶段基本结束。1943年冬，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对整风运动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作了总结。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结论。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加强了党的团结，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过这次整风运动，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朱汉国)

中统

(Zhongtong)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 C.C 系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

中统的前身是由 C.C 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1937 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由 C.C 系分子徐恩曾任处长。1938 年 3 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蒋介石提议，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由此正式形成。

中统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反革命特务破坏活动。

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而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先后担任过局长，徐恩曾、叶秀峰、顾建中，邹学峻、季源溥等先后担任过副局长。

中统是蒋介石搞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的势力不只控制了党务部门，而且深入文教部门、政府机关、经济系统之中。这个特务组织除了进行反共颠覆活动外，还对国民党内及国内的思想言论进行严密的控制。

1947 年，中统局改名为党员通讯局。1949 年又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但人们将其成员仍习惯地称之为中统特务。最后，这个组织随着国民党全国政权的覆灭而垮台。

(朱汉国)

军统

(Juntong)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特务组织之一。

军统的前身是中华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蒋介石成立了法西斯秘密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任命戴笠为处长。同年，又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兼任该局第二处处长。1934年7月，戴笠接替邓文仪，兼任南昌行营调查课（特务）课长。次年，调查课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蒋介石提议，裁撤原来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以戴笠的第二处为基础，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由此正式形成。

军统局局长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钱大钧、林蔚都兼任过军统局局长，但负责实际工作的是副局长戴笠。

戴笠执掌军统局后，几乎将原复兴社分子全部网罗进军统之内，同时又将原特务处的科全部扩编成处。在军统局内，戴笠先后成立了军事情报、党政情报、行动、电讯、司法、人事、会计、总务、警务、布置等处，另外还成立了与处平行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技术研究室和经济研究室。

戴笠在“特务越多越好，组织越大越好”的思想支配下，又将特务武装大队扩编成总队，后又改为特务团，最多时内勤、外勤的特务发展到5万之多。军统特务几乎是无处不在，他们残害了大批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后，蒋介石于同年6月对军统局进行改组，将军统局的公开特务武装部与国民党原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合并组成军事委员会改组后的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原军统局的秘密核心部分则组成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任局长。1949年，这个特务组织随着国民党全国政权的覆灭而垮台。

(朱汉国)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zhong mei tezhong jishu hezuosuo) 简称“中美合作所”。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合办的特务机构。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情报署与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进行联系，表示愿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建立情报机构，以搜集对日作战情报。1942年春，美海军情报署派遣梅乐斯来重庆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笠进行谈判，决定正式签订一项合同，建立联合情报机构。经过一年多的商谈筹备，中美双方于1943年4月在重庆磁器口签订合作协定。协定内容共十项，主要有：美方无偿供给军统局必要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及交通医药器材，并帮助军统局训练特务部队；军统局无偿向美方提供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华活动的一切情报，协助解决美方人员在华期间食宿交通问题；美方人员享受外交人员待遇等。协定签订后，1943年5月，中美合作所宣布正式成立。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中方参谋长李崇诗，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下设军事作战、情报、心理作战、气象、行动、交通、经理、医务、总务等九个组和一个总办公室、一个总工程师处。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美国派遣了1000多名特务到中国来广泛收集情报，并帮助训练和装备国民党武装特务五六百人，同时无偿供给军统局大批军火武器、通讯器材、交通工具、新式刑具等。

中美合作所在重庆设立了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在福建建阳设立了东南办事处，下辖上海、闽侯、定海、漳州四个情报站；并先后在安徽、湖南、河南、绥远、贵州、江西、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开办训练班，专门培训特务，逮捕、残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反蒋民主人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协定，中美合作所于1946年3月宣布撤销，但该所的集中营全部移交给国民党特务机构。

(朱汉国)

中国之命运

(ZHongguo Zhi mingyun) 由陶希圣代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反共小册子。1943年3月10日出版。全书分八章，共10万余字。

《中国之命运》完整地表述了蒋介石集团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思想、政治观点和对内对外政策。蒋介石在书中篡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抹杀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斗争，鼓吹大民族主义；歪曲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的中国近代史，把不平等条约说成是中国近百年来落后的根本原因，企图取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蒋介石极力崇扬封建的伦理道德，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实为不变之常理”，宣称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是“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论儒的训释，自成崇高的体系”，并提出要将由身而家而族、由族而保甲而乡社、由乡社以至于县与省的古代建设国家的程序，作为他进行“建设”的中心内容。蒋介石恶毒攻击共产主义是“赤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是“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是封建割据，破坏抗战。他杀气腾腾地叫嚣，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命运问题，暗示要以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

蒋介石在书中还提出“诚”的哲学，作为他反动思想的基础。

这部反共著作的发表，为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和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

(朱汉国)

豫湘桂战役

(Yu xiang gui zhanyi) 1944 年日本发动的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役。

从 1943 年开始，日本在太平洋和缅甸战场接连失败。在中国战场，各抗日根据地从 1944 年春起开始局部反攻，日军的占领区逐渐缩小。这就使侵华日军在内外两方面都出现严重危机。为挽救危局，援救南洋孤立的日军，摧毁美国在华空军基础，1944 年 4 月至 12 月，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平汉、粤汉铁路的豫湘桂战役。

战役从 4 月中旬开始。战役第一阶段，日军在于占领平汉线南部阵地。为此，日军从东北，华北调集了 14.8 万余兵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分路向河南进攻。驻守河南的中国守军以第一战区汤恩伯集团为主，共 40 万人，决定在嵩山地区与日军决战。4 月 18 日，日军从河南中牟强渡黄河后，向郑州进犯。中国守军一战即溃。22 日，日军攻陷郑州，5 月 1 日占领许昌，25 日攻占洛阳。日军仅用 38 天时间即占领河南全省，打通了平汉路南段。

从 5 月下旬开始，战役进入第二阶段。5 月 27 日，日军兵分三路发动了进攻湖南的战役。日军投入兵力 13 个师团计 36 万余人。中国守军在湖南战场上有薛岳、张发奎、余汉谋部共 35 万余人。6 月 18 日，日军攻陷长沙。22 日，日军进攻衡阳，衡阳中国守军 4 万余人坚守孤城，曾给日军以重创。但终因孤军奋战，于 8 月 8 日失守衡阳。

战役的第三阶段是日军进攻广西阶段。9 月初，日军沿湘桂路进犯。10 月 27 日，日军围攻桂林，中国守军弃城溃逃。11 月 10 日，日军攻占柳州。接着，由柳州南犯的日军和从北海、雷州方面北进的日军以及由越南东犯的日军会攻南宁，于 12 月 16 日会合于思乐（今海渊），至此，日军打通了平汉、粤汉铁路，完成了建立纵贯中国大陆到印度支那交通线的战略任务。

在整个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丢失了包括 146 个城市在内的 20 万平方公里国土，丧失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 7 个空军基地和 36 个飞机场，使 6000 万同胞沦于日帝铁蹄之下。这次战役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腐朽，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

(朱汉国)

抗战后期国统区民主运动

(kangzhan houqi guotongquminzhu yundong) 1944 至 1945 年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掀起的以反国民党专制独裁为主要内容的人民民主运动。

1944 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的溃败，集中暴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腐朽本质，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人民群众痛感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1944 年 5 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训政，给人民以权利。6 月，成都、桂林、昆明等地的大学生集会游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随后，重庆、成都等地工人罢工；豫南、鄂北、陕南、贵州等地农民起义。在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也利用报刊呼吁，要求政治民主，生产自由，取消统制政策。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的各界民主人士，也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发表通电，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实行民主宪政。一时间，国统区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针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汇成了一个广泛的民主运动。

9 月 15 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召开各党各人民团体的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10 月 10 日，周恩来又代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张，并提出了进行的具体步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把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立即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响应。张澜、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李济深、陶行知、柳亚子等纷纷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迅速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 月 10 日，中国民主同盟再次发表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

到 1945 年春，国统区民主运动更加蓬勃开展。5 月 4 日，昆明两万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孤立和打击了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教育和争取了中间势力，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朱汉国)

黄炎培

(Huang Yanpei 1878—1965) 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爱国人士和教育家。

黄炎培字任之，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1902年考中举人。1903年在家乡举办小学，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教育司司长，并兼任过江苏省议会议员、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和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1914年2月，辞去教育司司长职务，专门从事教育事业，并先后到浙江、山东、河北、江西、安徽等省调查了解教育情况。1915年发起组织“美国实业视察团”，到美国进行实业考察。1917年，黄炎培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主张对教育进行改革，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1918年，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以“教业乐群”为校训，以“双手万能”为校徽；提倡手脑并用，注重实践。中华职业教育社从成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的32年间，在黄炎培主持下，先后创办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灌县都江堰实用职业学校等，并先后出版过一百二十多种书刊，对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1年，黄炎培去日本考察，发现日本侵华战备空气极浓。归国后，带着“日本即将侵我的预感”多方奔告，但未被国民党当局重视。“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为上海市地方协会)。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动员上海市民筹募捐款，供应军需物资，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他又组织上海市地方协会在战区救济、救护、慰劳、募捐和动员民族工业内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3月，黄炎培和张澜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上，黄炎培当选为五个中央常务委员之一，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任。当时，黄炎培等主张民盟的方针应是中间路线，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另走第三条道路。由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压力，在民盟成立后不久，黄炎培便于1941年冬辞去了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主任之职。

在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黄炎培起初主张采用温和手段，但在全国抗日民主浪潮的推动下，他也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争取国内民主的斗争。9月，他和章乃器等三十人联名发表了《民主与胜利宪言》一文，提出了实施“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对人民的各项权利“予以实际的充分的享受与保障”，“行政机构，自中央以迄基层，一切政令，皆须绝对公开与民更始”，“切实开放言论”等九项主张，以期“一新政象”，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5年7月，黄炎培和章伯钧等六名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了延安，会见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回重庆后，他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叙述了在延安目睹的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在当时的蒋管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2月，他和胡厥文、施复亮等人发起成立了一个以工商界、金融界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建国会。1946年1月，黄炎培和张澜等人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到上海和沈钧儒等一起负责民盟在上海的工作，以“第三方面”的身份参

加国共之间的调停活动。后来，蒋介石在召开伪国大时，曾使用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拉拢，但他坚持了旧政协决议的立场，未为所动。

1948年5月，中共发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的“五一号召”后，黄炎培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理监事会，通过了响应“五一号召”的决议，并推派代表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2月，他化装离开上海到香港，3月又转赴北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不久，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逝世。

（欧阳礼泉）

张澜

（zhang Lan 1872—1955） 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爱国人士和教育家。

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1894年中秀才，补廪生。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攻经史，后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留日期间，他反对留学生为慈禧祝寿，并倡议慈禧退朝，还政于光绪，被清朝驻日公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押送回国。曾先后担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成都游学预备学堂训导长等职。1906年回家乡，创办了南充民立两等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南充端明女学、南充县立中学和南充实业学校，实行新式教育。

1911年，张澜和四川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等领导了四川的保路运动。他作为南充代表，参加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当选为股东大会副会长。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借口谈判，将张澜、蒲殿俊等九人逮捕，并准备“候旨听斩”。四川各县的保路同志会因此动员了十多万武装群众围困成都、清政府遂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结果，武昌空虚，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张澜被任命为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并加入进步党，任该党四川支部常务委员。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他回四川，任南充中学堂校长。1915年，他联络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在南充宣布独立，响应蔡锷讨袁。讨袁战争结束后，任四川嘉陵道尹，主持川北政务。1917年11月，张澜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1920年被四川督军吕超驱赶下台后，在南充继续办学。1925年，曾担任过张澜川北宣慰使护卫营营长的刘湘，这时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在刘湘主持的四川善后会议上，决定成立成都大学，任命张澜为校长，到1930年去职。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严重，张澜参加了反蒋抗日活动。1934年，被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任命为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他促成刘湘派张斯可为代表到桂林签订了“红（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又促成刘湘派王干青为代表到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先后派李一氓、罗世文等为代表到成都，与川、康军政首脑联系，达成了联合反蒋的协定，壮大了反蒋抗日的力量。他还掩护过中共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等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开展了赈灾救济的慈善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

抗战时期，张澜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国民党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参政会中，他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进行了公开的抨击。1941年3月，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三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一些民主人士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口号是：“贯彻抗日，实践民主，加强团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张澜、黄炎培等十三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黄炎培任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张澜被一致推举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继任主席。在张澜领导下，民盟和中共互相配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张澜继续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张澜亲自到机场迎接，并进行过多次会谈。1946年1月，他作为民盟的首席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和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事先交换

意见，采取一致步骤，使政协取得达成五项协议的胜利。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时，张澜坚决反对民盟参加，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又强迫民盟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但张澜并未被吓倒，他发表了《呼吁书》，严正声明：“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1948年1月，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建立起临时总部，恢复了民盟的工作。张澜在上海虽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但仍积极支持香港民盟总部的活动。后来，国民党特务将他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并拟加以杀害。上海解放前夕，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大力营救，他才安全脱险。1949年6月，党中央邀请他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张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12月，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在第二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

（欧阳礼泉）

李公朴

(Li Gongpu 1900—1946) 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省民盟支部负责人之一。原名李永祥，号晋祥，后改名为公朴，意即“大众的仆人”。江苏常州人。幼年因家境贫寒，在商店当过学徒。后由其兄帮助，就读于光华大学附中及沪江大学。五四运动时，参加过抵制日货运动。北伐时期，他投笔从戎，由上海到广东参加北伐军。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愤然离开军队。1928年出国赴美留学。回国后，创办《读书生活》刊物。因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从事抗日救亡宣传，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于1936年11月同时被捕。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在上海创办《全民周刊》，后到武汉与邹韬奋合办《全民抗战》三日刊，宣传动员全民进行抗战，并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组织民众动员委员会，任宣传部长、全民通讯社社长。不久，应阎锡山的邀请，到山西主办民族革命大学。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去延安。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组织抗战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考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北方抗日前线转到西南大后方的昆明。1942年夏，在昆明创办北门书屋、北门出版社，出版进步书籍。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为该支部执行委员。抗战期间著有：《怎样争取胜利》、《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华北敌后——晋、察、冀》等等。抗战胜利后，积极从事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欧阳礼泉)

闻一多

(Wen Yiduo 1899—1946) 名亦多，字友三，号友山。著名的学者、诗人、民主战士。湖北浠水人。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五四时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出国赴美留学，专攻绘画，同时研究文学、戏剧。1925年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7年至1937年，先后在上海政治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和清华大学教书，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化。1937年北京沦陷，随学校到长沙，又从长沙到昆明。1938年，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大，改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中文系任教，主讲中国古代诗歌和文学史。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民盟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反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利用讲坛、报刊，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黑暗统治，如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了《复古的空气》；针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发表了《人民的诗人——屈原》；针对国民党报刊欺骗人民的行径，发表了《愈战愈强》等。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后，于15日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斥骂国民党反动派。当天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欧阳礼泉)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Zhong guo gongchandang diqici quanguo daibiao dahui)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

大会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前夜召开的。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大会的主要议程有：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选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08-1.bmp}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此外，还通过了《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

大会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不同抗战路线斗争的经验，指出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为此，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并号召全党要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

在军事方面，大会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逐步实现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抗日反攻阶段的到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党的建设方面，大会强调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党的重要性。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由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会后，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13人为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后来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朱汉国)

毛泽东思想

(Maozedong sixiang)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成功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特别是同本世纪20年代后期与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它在以下几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科学地制定了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方针和政策,强调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2)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经济建设方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3) 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规定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指挥枪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同时在总结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基础上和具体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提出了正确实行军事战略转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并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4) 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

学说，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且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艰巨任务。

此外，毛泽东思想在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等方面，也以独创性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点，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1945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历史作出的正确结论。毛泽东思想以其科学的理论和丰富的内容将长期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行动。

（朱汉国）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Zhongguo guomin-dang diliu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正式和候补执行委员、监察委员146人，正式代表579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听取了吴铁城的党务报告，吴鼎昌的政治总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程潜的军事报告，白崇禧的续军事报告和潘公展的特种问题（中共问题）的报告。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党员确立革命哲学之重要》等演讲。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决定坚持独裁，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通过的宣言以及《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等文件，装出“还政于民”的姿态，决定于1945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但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却是抗战前由国民党中央指定或包办“选举”出来的。国民大会将通过的宪法，也是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公布的，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的职权，也要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可见，大会宣扬的所谓“还政于民”，只是抵制联合政府的一个骗局。

这次大会的另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动员国民党的力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蒋介石在会上一再强调：今天的中心工作，就是中共问题。为此，大会成立了“特种审查委员会”，专门讨论反共方案。大会通过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和《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大会还公开宣称“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准备内战之意，昭然若揭。

大会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章，决定在三个月内撤销军队中的党部和学校中的三青团组织，增加军队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并改总裁“代行”总理职权为“行使”总理职权。

大会还就劳工政策、农民政策、土地政策等作出了一系列决议。

大会最后以全体起立的方式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同时选举产生了由222名中央执行委员和90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组成的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由104名中央监察委员和44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组成的第六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六大”，是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大会，是代表着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大会。

（朱汉国）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riben xuanbu wutiaojian touxiang) 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第一枚原子弹，并声明，使用原子弹是为了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迅速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并率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向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大反攻。与此同时，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军发动猛攻；美国则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朝鲜人民解放军和越南解放军也转入了总反攻。在这种形势下，8月1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士和瑞典两个中立国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乞降照会”。8月14日，日本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次日，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宣布投降后，中美英苏四国同意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并负责占领日本本土。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参加了签字仪式。9月9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举行了受降仪式。10月25日，在台北举行对台湾日军受降仪式，台湾重归祖国。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同时宣告结束。

(朱汉国)

解放战争

(Jiefang zhanzheng) 即全国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它是指 1945 年 8 月至 1949 年 9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伟大的革命战争。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建国，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的迫切愿望，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努力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并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为此，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 年 1 月 10 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1 月 10 日至 31 日，在重庆召开了包括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等 5 项决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完成其军事部署后，于 6 月 26 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反革命的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全国解放战争由此开始。从 1946 年 7 月至 1947 年 6 月，人民解放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锋和主体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广大人民群众反美、反蒋的人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逐步高涨，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到 1947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在一年的作战中，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 112 万人的重大胜利，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在国统区作战，迅速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10 月 10 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与此同时，在解放区彻底进行土地改革，开展了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到 1948 年 8 月，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从 1948 年 9 月 12 日起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止，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 154 万人，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地区，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4 月 20 日，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之后，21 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举摧毁了敌军的“长江防线”。23 日，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解放了许多大、中城市和广大地区。从 1946 年 7 月至 1950 年 6 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807 万人，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伟大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王宗荣)

重庆谈判

(Chongqing tanpan)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于 1945 年 8 月 29 日至 10 月 10 日在重庆举行。国民党政府代表为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中共代表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蒋介石慑于国际、国内和平民主力量和舆论的压力，加之内战部署尚未做好准备，便以谈判为掩饰，企图既可欺骗国内广大人民对和平民主的要求，又可应付来自国际的种种压力。蒋介石一面加紧部署军队，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面于 8 月 14 日、20 日、23 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商国是。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决定，并确定了争取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政治改革的方针。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8 月 26 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告诉全党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说明党中央关于谈判的方针，并提醒全党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于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8 月 27 日，国民党政府派专机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飞赴延安迎接。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飞抵重庆。29 日，开始谈判。双方谈判的主要内容有：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关于人民自由问题；关于党派合法问题；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关于解放区地方政权问题；关于奸伪问题；关于受降问题等 12 方面的问题。在历时 43 天的谈判中，毛泽东与蒋介石接触共达 9 次。经过谈判，双方于 10 月 10 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 月 11 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返延安。通过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用事实向全国人民表明了自己的和平诚意，它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揭穿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赢得了国内外广大中间群众的同情与支持；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承认以和平统一为基础，避免内战，这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也是一个约束；通过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用协商方法解决问题；通过谈判，国民党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从而为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恢复和开展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11-1.bmp}

(王宗荣)

双十协定

(Shuangshi Xieding) 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受降等12个问题。这12个问题中仅少数几条达成协议,在军队、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公布不久,即被蒋介石公开撕毁。尽管如此,但《双十协定》的签订是有其意义的,教育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间势力,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当局陷入被动。

(王宗荣)

王若飞

(Wang Ruofei 1896—1946) 贵州安顺人。原名王运生，字继仁，笔名若飞。1918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同年冬，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同年10月，在绥远包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5月出狱后，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1946年1月，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同年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

(王宗荣)

王世杰

(Wang Shijie 1891—1981) 湖北崇阳人。字雪艇。191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13年赴英国、法国留学，获法学博士。1920年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1933年至193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45年任外交部长，同年8月，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参加国共谈判。1949年去台湾。1950年后，曾任“总统府”秘书长、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总统府”资政。1981年4月在台北病逝。

(王宗荣)

张群

(Zhang Qun 1889—1990) 四川成都人，生于华阳。字岳军。1908年由保定军校保送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返回上海。1913年参加讨袁，失败后再度赴日。1916年回国。1917年于广州大元帅府任职。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兼军委委员。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张离职随蒋去日。1928年随蒋返国后，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议。1929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任上海市市长。1932年任鄂豫皖“剿总”党政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委。1933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5年任外交部长。1937年2月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时期，历任军委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兼重庆行营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1945年8月参加国共重庆谈判。1947年任行政院院长。1948年改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去台湾后，历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秘书长、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1990年12月14日在台北病逝。

(王宗荣)

张治中

(Zhang Zhizhong 1890—1969) 安徽巢县人。字文白。保定军校毕业。1917年到广州追随孙中山，先后在粤军、桂军、川军中任职。1918年随粤军参加援闽之役。后拥护国共合作，参加黄埔军校工作，并在军校任职。1926年参加北伐，任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后任武汉陆军军官学校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赴欧美考察。1928年回国后，历任国民党军委会军政厅厅长、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1932年参加“一·二八”上海抗战。1933年12月参加镇压福建事变。抗战期间，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干事会书记长。抗战胜利后，参加国共重庆谈判。1946年1月为国民党、共产党、美国政府三方组成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的国民党方面代表。后调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1949年4月1日，作为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国内和平协定》被南京政府拒绝后，留居北平。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著有《张治中回忆录》。

(王宗荣)

邵力子

(Shao Lizi 1881—1967) 浙江绍兴人。原名闻泰，又名凤寿，字仲辉。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1910年后任上海《民立报》、《民国日报》编辑。1919年参加国民党。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与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新南社。1925年离沪抵穗，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副主任。同年8月脱离共产党。1927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抗战期间，曾任军委会战地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驻苏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参与国共重庆谈判。1949年3月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赴北平与中共谈判。《国内和平协定》被南京政府拒绝后留居北平。同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中苏友协副会长等职。1967年12月25日病逝于北京。

(王宗荣)

上党战役

(Shangdang zhanyi) 解放战争初期，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在山西长治(古称上党郡)地区粉碎国民党军进犯的战役。故称此次战役为上党战役。1945年8月中、下旬，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调集所部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1.7万余人，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进攻，企图占领整个晋东南地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和关于彻底消灭进犯之敌的指示，集中部队3.1万人，9月10日发起上党战役。首先收复屯留、长子等四城。自9月20日起，从东、西、南三面合围长治。阎锡山急调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3个军8个师2.3万人，从太原出发南下，增援长治。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长治，主力北上消灭援军。10月2日，将援军合围于屯留西北地区，经4昼夜激战，国民党军除2千余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长治守军待援无望，于8日向西突围，企图逃回浮山、翼城。晋冀鲁豫区太岳部队跟踪追击，至12日将其歼灭于沁河以东之将军岭、桃川地区，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3.5万人，击毙彭毓斌，生俘史泽波等10余名师长以上将领，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斗争。

(王宗荣)

邯郸战役

(Handan zhanyi) 亦称平汉战役。1945年10月，国民党军第11战区孙连仲3个军约4万余人，从河南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犯，企图占领邯郸，打通平汉路，抢先进入平、津，进而夺取东北。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集中3个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万余人，在10万民兵的支援下，于10月24日将北犯之国民党军诱至邯郸以南马头镇时，尔后突然出击，将其包围，以一部兵力正面阻击，一部兵力控制漳河渡口，切断敌后续部队北上道路。同时，以地方武装分别牵制从安阳、石家庄南北两面来的援敌。激战至30日，歼敌一部，攻克村镇20余处，并争取了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万余人在马头镇起义。随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将主力先于敌移至漳河以北地区。10月31日，当国民党军主力向南突围逃至预伏地区时，即遭到预伏部队猛烈攻击，激战至11月2日，将其大部歼灭。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2.3万余人。此役，共歼敌3万余人（其中包括1万余人起义），对迟滞、挫败国民党军的北犯，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掩护人民军队在东北地区的战略展开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宗荣)

“一二·一”血案

(Yieryi xuean) 即昆明惨案。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为镇压昆明学生的民主运动而制造的震惊全国的惨案。1945年重庆谈判之后，国民党政府违背《双十协定》，调集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国统区人民掀起了反内战运动。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6千余名大中学校学生、教师，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时事晚会，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包围会场，并鸣枪进行威胁。从26日起，昆明大中学生会联合罢课，以示抗议。28日，昆明31所学校学生联合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制止内战、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决定进行镇压。12月1日上午，国民党出动军警、特务、暴徒几百人，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强迫复课，殴打学生，向学生投掷手榴弹，炸死学生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和中学教师于再等4人，重伤20余人。惨案发生后，重庆、成都、延安、上海等地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通电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在全国各界人民抗议下，蒋介石让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自请处分”，将代理省主席李宗黄调离云南。昆明惨案，推动了当时国统区的民主运动的开展。

(王宗荣)

停战协定

(Tingzhan xieding) 即《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协议。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后，在国内外要求停止内战的呼吁下，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团1945年12月27日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提议，派出代表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在重庆进行商谈。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宣布：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政府三方面代表组成。与此同时，由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向所属部队颁发了定于1月13日午夜12时起生效的停战令。中共履行了这一协定，但是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前，密令其部队“抢占战略要点”。随后又不断进犯解放区，并于1946年6月26日发动了全面内战，完全撕毁了《停战协定》。

(王宗荣)

军事调处执行部

(Junshi tiaochu zhixingbu) 简称军调部。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双方根据《停战协定》组成的调处军事冲突的机构。军调部是根据 1946 年 1 月 10 日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设立的。规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代表各一人组成。三方代表有同等的表决权，由美方代表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经三方一致通过。军调部设立于北平。下设若干执行小组，仍由三方面人员组成，分赴各冲突地点对国共双方的争执进行调处。1 月 13 日，军调部在北平正式成立，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代表罗伯逊三人组成。军调部下设的执行小组先后共达 36 个。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同年 8 月 10 日，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1947 年 1 月美国宣布退出，军调部随之结束。

(王宗荣)

政治协商会议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简称旧政协。是根据 1945 年《双十协定》规定召开的会议。1946 年 1 月 10 日在重庆举行，31 日闭幕。参加会议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 38 人。即中国国民党代表 8 人；中国共产党代表 7 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 9 人；中国青年党代表 5 人；社会贤达代表 9 人。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会议主席。会议分为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 5 个问题进行讨论协商。会议上斗争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坚持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实行政治民主化；中国共产党提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是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方案是国共双方的军队应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在政权问题上，国民党企图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派几名代表到政府中做官的办法，来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并要中共交出解放区；中共则坚持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并提出实行地方自治制，得到了民主党派的支持。会议先后召集 10 次大会。1 月 31 日，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 5 个方面的决议案。这次会议，由于中共代表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国民党政府作出了一定让步，从而使会议通过了一些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的决议案，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但是这些协议，后来都被蒋介石撕毁。

(王宗荣)

较场口事件

(Jiaochanghou shijian) 即较场口血案。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为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促使5项决议贯彻实施，2月2日，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19个团体发起，定于2月10日上午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邀请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推选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10日晨，当参加大会的群众团体陆续进入会场时，国民党特务和暴徒进行破坏和捣乱。他们抢占主席台，打伤大会主持人和演讲人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章乃器等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这一事件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坚持独裁内战、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反动面目。

(王宗荣)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xiangbei fazhanxiangnan fangyu de zhanlue fangzhen)“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根据当时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抗战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争夺东北的斗争成为中共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中心问题。因为东北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中共夺取了东北，就可以背靠苏、朝、蒙，南面可使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加速革命胜利的进程。反之，解放区则处于被敌人包围的状态中，受敌南北夹击，形势将十分不利。为此，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指示电，明确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初步弄清了东北的情况后，从各解放区调集了11万军队和2万余名党政干部，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在内的10名中央委员和10名候补中央委员，陆续进入东北。林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翌年初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组成，彭真任书记。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主动提出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8个省区的解放区，配合谈判斗争，掩护“向北发展”。在此时期，人民军队进行了上党、平汉、平绥、津浦战役，以阻止和迟滞国民党军进犯华北，保障人民军队在东北地区战略展开。中共中央东北局坚决贯彻执行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开展生产运动。到1946年初，从而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人民军队发展到近30万人。解放区面积增加1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3千万，解放区的城市由日本投降时的89座发展到509座，已经解放了小半个中国。这就为其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宗荣）

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

(lianbing jianzu he shengchan yundong) 中共中央指示各解放区 1946 年工作的重要内容。1945 年 11 月 7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指出，“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同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提出“练兵”、“减租”、“生产”是 1946 年解放区 10 项工作中的三项重要工作。练兵，即要求各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要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练兵的项目，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的方法，是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减租，即要求在所有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以提高广大农民的觉悟，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的主人翁。在老解放区，则要求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生产，即要求各地抓紧时机，使 1946 年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指示要求认真抓好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以巩固解放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王宗荣)

下关惨案

(Xiaguan can'an) 1946年6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发起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推派马叙伦、胡厥文、葛延芳、包达三、阎宝航、雷洁琼等11人为代表，以马叙伦为团长，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是日上午，上海各界群众数万人为代表团送行，随即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当晚，当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即被一群化装成“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殴打，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多人受伤。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闻讯后，当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深夜赶赴医院，慰问受伤代表。下关惨案发生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于6月26日接见请愿代表葛延芳，表示“不打内战”。可是就在当天，蒋密令刘峙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王宗荣)

李闻血案

(Li Wen xuean) 李公朴、闻一多均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和民盟西南支部负责人。抗战胜利后，他们经常参加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活动。1946年6月初，他们发起昆明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委员会万人签名运动。国民党特务便对李、闻恫吓威胁，叫嚷要采取行动。7月11日晚李公朴在回家途中遭特务暗杀。15日下午，闻一多在出席为李公朴被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在回家途中，亦被特务暗杀。李闻惨案发生后，引起国内各阶层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均发表声明，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残暴行径，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王宗荣)

中原突围

(Zhongyuan tuwei)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调集10个师约30万人部队,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于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原突围,愈快愈好”、“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为保存力量,争取主动,除由皮定均率领一部向东突围、由张才千率领一部坚持原地游击战争外,主力部队于26日黄昏,越过平汉路向西突围。向西突围的部队分两路:右路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领,7月下旬,突进到豫西、陕南、鄂西北地区,创建了鄂豫陕边游击根据地。其中的第359旅稍事休整后,由王震率领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边区;左路由王树声率领,8月,进入武当山,创建了鄂西游击根据地。向东突围的部队,由皮定均率领,于7月下旬到达苏皖解放区。此役,歼敌5千余人,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牵制了国民党军30多个师(旅)的兵力,从战略上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行动,为部署战略全局争取了时间,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保存了精锐主力和大批优秀干部。中共中央军委7月15日给郑位三、李先念的电报中指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王宗荣)

苏中战役

(Suzhong Zhanyi) 亦称“七战七捷”。国民党军继围攻中原解放区后，1946年7月中旬，集中正规军50万人，向华东解放区的苏中、淮北、淮南、鲁南、胶济铁路等地区发动进攻。其中进攻苏中解放区的兵力为5个整编师15个旅约12万人，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大举进犯。华中野战军集中主力19个团3万余人，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指示，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寻机各个歼敌的方针，奋起迎击。战役分为两个阶段进行：7月13日至8月3日为第一阶段。华中野战军连续进行了宣(家堡)泰(兴)战斗，如(皋)南(通)战斗，海安运动防御战。8月3日，主动撤出海安，进行短期休整。8月10日至31日为第二阶段，华中野战军连续进行了李堡战斗，丁堰、林梓战斗，如(皋)黄(桥)公路遭遇战，邵伯防御战。至此，苏中战役胜利结束，历时45天，歼敌6个旅、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人，占国民党军进攻苏中解放区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二，取得了在内线歼灭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的初步经验，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初期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中共中央军委将华中野战军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分批歼敌的经验，向全军作了介绍，希望各区仿照办理。

(王宗荣)

定陶战役

(Dingtao zhanyi) 1946年8月下旬，国民党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余万人，由郑州、徐州分东西两路进攻冀鲁豫解放区，企图以东西钳形攻势聚歼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于陇海路以北的定陶、曹县地区。晋冀鲁豫解放军共约5万多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集中4个纵队的主力歼击由郑州方向进犯之敌整编第3师，另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牵制其余各路进犯敌军。9月3日至6日，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定陶以西大杨湖、大黄集地区，分批歼灭敌整编第3师，俘该师中将师长赵锡田。9月7日至8日，又在定陶、考城（今河南兰考堙阳）地区追歼回窜之敌两个旅。此役，共歼敌4个旅1.7万人。中央军委曾作为解放战争初期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原则的一个范例，向全军作了推广。定陶战役的胜利，连同中原突围、苏中大捷，对整个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王宗荣）

临江战役

(Linjiang zhangyi) 亦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1946年12月，国民党军占领了安东(今丹东)、通化等地后，为实施其“先南后北”的方针，12月17日，集中6个师的兵力，进攻南满解放区的临江地区。同时，加强对松花江南岸各要点的守备，以阻止松花江北的解放军南下。东北人民解放军针对国民党军的部署，制定了“坚持南满，配合北满，南拉北打，北拉南打”的协同作战方针，迫使敌人南北两方面作战。人民解放军南满部队从12月18日开始，至1947年4月3日止，在临江、通化地区连续击退国民党军的4次进攻，进行了四次保卫临江的作战，歼敌1.9万人，收复桓仁、辑安(今集安)等5座县城。同时，人民解放军北满3个纵队又3个独立师，从1947年1月5日至3月8日，三次向松花江南岸出击，歼敌1.5万余人。这就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全战役，历时3个多月，共歼敌3.9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先南后北”进而占领全东北的作战计划，结束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进攻，为其后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王宗荣)

沙家店战役

(Shajiadian zhanyi) 1947年3月至5月，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奠定了基础。8月6日至12日，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未克，但却达到调动敌胡宗南部主力北上的目的。西北野战军遂主动撤围，即以一部伪装主力，掩护后方机关东渡黄河，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榆林东南、沙家店西北地区待机歼敌。胡宗南误认为西北野战军主力正在东渡，即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主力5个旅由绥德北进，令整编第36师由榆林南下镇川堡再折而向东，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于葭县（今佳县）地区。当敌军进占绥德后，刘戡率部向葭（佳）县方向急进，钟松率第36师2个旅进抵镇川堡。西北野战军主力乘敌第36师孤军冒进、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8月19日，当该师进至沙家店地区时，被解放军包围，激战一日，到20日黄昏，全歼该师2个旅。此役，共歼敌6千余人，扭转了西北战局，结束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从而使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进攻。

(王宗荣)

孟良崮战役

(Menglianggu zhanyi)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了24个师60个旅的45万人的兵力，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下，向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或迫其北渡黄河，以实现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的目的。4月26日，华东野战军全歼泰安守敌72师。5月上旬，华东野战军调整部署，将主力后撤至蒙阴、新泰、莱芜以东地区隐蔽待机。5月11日，国民党军主力自汤头、蒙阴、新泰、莱芜之线向北、向东进攻，企图逼迫华东野战军处于不利地位进行决战。华东野战军决定集中主力5个纵队，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法，于5月13日对蒙阴以东的整编74师发起攻击，14日，将其分割包围于孟良崮山区，封闭了合围口。激战至16日，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的整编74师及整编83师一个团，共3.2万余人。击毙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打乱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计划，坚定了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胜利信心，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王宗荣)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Zhong mei youhao tongshanghanghai tiaoyue) 简称《中美商约》。1946年11月4日，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政府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条约》共30条，其主要内容是：双方国民可以在对方领土境内享有“居住、旅行及经商自由”；双方商品在彼方享有与该国商品的同等待遇；双方船舶包括军舰可以在彼方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条约》名为“平等”、“互惠”，实质上是绝对不平等的。

《条约》的签订，使得经济、军事和运输力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获得极大的利益，美国的人员、商品和轮船、兵舰在中国领土、领水上可以任意横行；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经济、军事实力的落后，根本无法享受《条约》规定的权利。该《条约》及其后签订的《中美航空协定》等一系列协定，使得中国的主权从陆地到海上，从天空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被国民党政府出卖得一干二净，以换取美国对其经济与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国统区完全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王宗荣)

制宪国大

(Zhixian uoda) 国民党政府违反政协决议擅自召开的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不顾政治协商会议有关决议，擅自召集国民大会，于12月25日制订和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故称为制宪国大。出席大会的国大代表1381名，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员。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参加了此届国大。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中的民主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大会于12月25日通过了成为国民党统治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后闭幕。1947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了这部宪法，并规定自同年12月25日起施行。《中华民国宪法》共14章175条，它与《训政时期约法》一脉相承，实质上是恢复了《五五宪草》的总统独裁制，完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一人独裁的一部宪法，当即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坚决反对，均表示不予以承认。

(王宗荣)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kangyi meijun baoxing yundong) 简称抗暴运动。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在看完电影返校途中，行至东单广场附近，被两名美军强行奸污。消息传出，激起北平市民强烈愤慨。12月26日，北大女生集会，向司徒雷登等发出抗议。30日，北大、清华、燕京、辅仁、中法、师大、朝阳等大学教授、学生和一些中学生近万人宣布罢课，游行示威，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军滚出中国去”等口号，并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1947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响应北平学生反美反蒋运动的指示》，充分肯定北平抗暴运动是爱国运动，要求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并坚持下去。但国民党当局歪曲事实，无耻地为美军的罪行辩解。从12月底至1947年3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数十座大、中城市，有50万人以上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并得到各界人民的支持。3月8日，全国学生抗暴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这次抗暴运动在全国持续3个月之久。抗暴运动把反内战争民主联系在一起，沉重地打击了美帝的侵华政策和蒋介石的媚外政策，揭露了美帝的凶恶面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它是一次具有广泛性的人民统一战线性质的运动，是伟大的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

(王宗荣)

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

(Taiwan renmin ererbaqi) 1947年1月台湾人民响应大陆人民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在台北举行了反对美蒋的集会和示威游行。2月27日，国民党台湾省专卖局缉私队和警察，在台北市殴打女烟贩，并开枪打死市民1人。这一事件，成为台湾人民起义的导火线。2月28日，台北人民举行罢市，游行请愿，提出惩凶、赔偿、撤消专卖局等要求，国民党军队开枪打伤、打死请愿群众各3人，从而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起义。起义者夺取了电台，短短几天内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3月8日，国民党军在基隆登陆，对起义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和屠杀。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群众达3万多人，至13日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直接配合了当时祖国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

(王宗荣)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fanji 'e fanneizhan fanpohai yundong) 1947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国统区人民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7年5月初，上海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提出了“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5月15日，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各地也组织了区域性的学联，统一领导学生运动。5月18日，国民党为了对付学生的爱国运动，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请愿、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政府对民主运动采取镇压措施。5月20日上午，南京、上海、杭州等地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千多人，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提出增加伙食费和全国教育经费等5项要求，当游行队伍行到珠江路口时，遭到国民党宪警特务的殴打，遭毒打者500余人，重伤10多人，被捕20余人。这就是国民党政府一手制造的发生在南京的“五·二〇”惨案。同日，北平、天津游行示威的学生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逮捕。“五·二〇”惨案发生后，学生运动迅速波及全国，除上述城市外，昆明、广州、重庆、成都、桂林、福州、沈阳、西安等6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坚持将近一个月的斗争，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王宗荣)

进军大别山

(Jinjun dabieshan)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3万人，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接着，胜利地进行了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共6万余人，打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南大门，为千里跃进大别山创造了前进基地。8月7日，部队分为西、中、东三路南进。在20多天中，连续突破敌人防线，越过陇海路，涉过黄泛区，渡过沙河、涡河、颍河、洪河、汝河、淮河，8月底，进抵大别山地区，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又经1个多月的作战，歼灭国民党军6千余人，解放县城23座，建立17个县级民主政权。10月27日，主力一部又在湖北广济以西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至此，在大别山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并初步站住了脚，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与此同时，陈赓、谢富治率部挺进豫西、陕南；陈毅、粟裕率部进至豫皖苏地区。三支大军依托三山（大别山、泰山、伏牛山）四水（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在中原地区布成品字阵势，互为犄角，纵横奔驰，逐鹿中原，机动歼敌，逼近长江，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迫使国民党军转入战略防御。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17-1.bmp}

（王宗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Zhongguo renminjiefangjunXuanyan) 亦称《双十宣言》。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由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亦即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8项基本政策。这是一篇讨伐蒋介石的檄文，它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王宗荣)

全国土地会议与《中国土地法大纲》

(quanguo tudi huiyiyu zhongguo tudifa dagang)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解放区所属的平山县西柏坡村，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07人。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7月17日至8月底，主要是学习文件，各地代表汇报贯彻执行《五四指示》以来的土地改革情况；8月底至9月13日，讨论制定土地政策。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刘少奇作了《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的报告。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并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经营，不受侵犯。这是一个彻底的和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

(王宗荣)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

(Zhonggong zhongyang shieryuehuiyi)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并迅速地把战争推向国统区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 1947 年 12 月 25 日至 28 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除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负责同志参加，共计 19 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各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阐明了人民解放转入战略进攻后的作战方针，以及土改、整党、经济工作、统一战线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周恩来作了人民解放军 18 个月以来所取得的胜利的总结。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会议认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十二月会议是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一系列政策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王宗荣)

戡乱总动员令

(Kanluan zongdongyuanling) 即《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1947年7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第6次国务会议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这一方案，7月5日正式公布。“总动员令”基本内容是攻击、诬蔑中共“拥兵割据，扰害地方，武力叛国”，“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拒绝政府派员赴延商洽和平之建议”，等等。重申了国民党政府“戡平共匪”的决心，要求“全民一致奋起”，“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扫除民主宪政之障碍，达成和平建国之目的”。国民党政府颁布“总动员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其军事上的失败困境，加强其反动统治，更大规模的搜刮民财民力。其后相继发出《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等项法令，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但是国民党的总动员挽救不了其总崩溃的命运。

(王宗荣)

行宪国大

(Xingxan guoda) 蒋介石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决定 1948 年为“行宪年”。所谓“行宪”，就是开始实行所谓民主宪政，并按照宪法规定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1947 年 11 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孙科为主任的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国民党内成立了“选举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大会代表的选举和筹备事宜。1948 年 3 月 29 日，行宪国大在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 1679 人。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4 月 19 日，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其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经过激烈的争夺，大会经过 4 次投票，于 4 月 29 日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5 月 1 日，大会闭幕。5 月 20 日，蒋介石、李宗仁就任总统、副总统。其后，组成了行宪后的政府，由翁文灏、孙科、王宠惠、张伯苓、于右任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更加激化。

(王宗荣)

辽沈战役

(Liaoshen zhanyi)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进行的。解放战争进入第3年后，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这时国民党在东北全区的总兵力为4个兵团、44个师，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东北人民解放军有12个纵队，53个师，加上二线兵团和地方武装共约100万人。东北国民党军部署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城市，孤立分散。作战指导上，处于犹豫动摇，或撤或守，举棋不定。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采取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以主力南下北宁线，首先攻克锦州，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歼灭。辽沈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攻克锦州，解放长春（9月12日至10月19日）。9月12日战役发起，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先后占领昌黎、北戴河、绥中、兴城、义县，以及塔山、高桥等地，斩断了北宁线，将范汉杰集团分割包围在锦州、葫芦岛、山海关3个地区。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对锦州发起总攻。15日晚，占领锦州，全歼守军10万余人，生俘范汉杰等人，封闭了国民党军从陆上撤回关内的通道。17日，长春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3个师2.6万人起义。19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率部投诚，长春解放。第二阶段：会战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10月20日至28日）。锦州守军被歼后，蒋介石严令由沈阳驰援的廖耀湘兵团和锦西、葫芦岛之国民党军实行东西对进，企图夺回锦州，打开向关内通路。东北野战军迅即将国民党军包围在黑山、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台安以北的狭小地区。激战两天一夜，全歼廖耀湘兵团约10万余人，活捉廖耀湘。第三阶段：攻占沈阳，解放东北全境（10月29日至11月2日）。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见大势已去，将沈阳国民党军交由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指挥，自己坐飞机南逃。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占新民、辽阳、鞍山、海城等地。11月1日，向沈阳守敌发起总攻，周福成投降。2日，沈阳解放，全歼守军13万余人。同日，解放营口。辽沈战役结束。整个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万余人。东北人民解放军伤亡6.9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一胜利，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双方总兵力的对比，并为解放平津和华北准备了条件。

（王宗荣）

淮海战役

(Huaihai zhanyi) 国民党方面称为徐蚌会战。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进行。淮海战役是以徐州为中心，在东起海州，西至商邱，北起临城（薛城），南达淮河广大区域内进行的。国民党军由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共有4个兵团3个绥靖区部队，连同后来由华中增援淮海战场的黄维兵团等部共为80万人。解放军方面，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加上地方武装共约60万人。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19-1.bmp}

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以刘、邓、陈为常委，邓为书记，统筹淮海前线的一切事宜。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中间突破，歼灭黄百韬兵团，切断徐蚌线（1948年11月6日至11月22日）。11月6日，战役发起。华东野战军兵分三路，迅速挺进到陇海路徐海段和徐州外围，实施中间突破，将徐州“剿总”和徐州以东之黄百韬兵团（第7兵团）割裂开来。8日，第三绥靖区所属57军、77军共3个半师2.3万人由何基沣、张克侠（均为中共地下党员）率领在台儿庄、贾汪地区起义。华东野战军迅速通过第三绥靖区防区，向徐州东陇海线疾进。11日完成将黄兵团合围于徐州以东、以碾庄为中心的地区，经过激战，至22日黄昏，全歼黄兵团，击毙黄百韬。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合围杜聿明集团（11月23日至12月15日）。蒋介石为挽救危局，急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3个兵团与徐州守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线。当黄维兵团（第12兵团）仍按原定援徐计划东进，25日，中原野战军主力将黄维兵团合围于双堆集地区。黄维组织部队轮番突围，均遭失败。27日，该兵团的第85军110师在突围中由师长廖运周（中共地下党员）率部起义。28日以后，黄维调整部署，等待增援。中野则采取“坚决持久围歼敌人”的战法。30日，杜聿明率13兵团李弥、2兵团邱清泉、16兵团孙元良及其党政机关近30万人，由徐州向西撤退，华东野战军即以11个纵队展开猛追。12月1日，华野一部占领徐州。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合围于陈官庄、青龙集地区。为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华野以9个纵队继续围困杜聿明集团，抽调2个纵队南下，协助中野围歼黄维兵团。15日，全歼敌第12兵团，生擒黄维、吴绍周等正、副司令。第三阶段：进行战场休整，全歼杜聿明集团（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此时平津战役已发起半个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对杜聿明集团暂不攻击，两周内不作最后歼灭部署，部队进行战场休整。发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对敌军展开政治攻势。在20天休整中，被围的国民党军向解放军投诚者达1.4万余人。1949年1月6日，华野发起总攻，经5天激战，至1月10日，将敌全歼。击毙邱清泉，活捉杜聿明，李弥只身逃走。此役，历时65天，歼敌55.5万人，人民解放军伤亡13.3万人。这是人民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个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主力丧失殆尽，其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区，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击矛头之下，为尔后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王宗荣）

平津战役

(Pingjin zhanyi)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进行的。国民党方面：由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的4个兵团、12个军，共50多万人，部署在以平、津为中心的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的千里铁路线上。解放军方面：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两大野战部队协同作战，加上地方武装共100万人。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地区一切事宜。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兵力对比上居于优势。平津战役全过程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分割包围，断敌逃路（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11月29日，华北第3兵团向张家口外围据点发起攻击，先后占领柴沟堡、沙岭子等地，包围了张家口、新保安，切断了傅作义集团西逃的通路。东北野战军主力插向平津和津塘（沽）之间，先后占领通州、廊坊、杨村、军粮城等地，切断了平津和津塘间的联系，封闭了国民党军海运南逃的道路。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依据中央军委“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指示，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任务。第二阶段：打掉两头，孤立中间（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1月15日）。东北、华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指示，逐次围歼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的国民党军。12月22日，华北第2兵团攻克新保安，歼敌35军两个师。23日，张家口守军突围，5万余人被华北3兵团和东野4纵歼灭。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拒绝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总攻，15日攻占天津，全歼守敌13万多人，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塘沽守军5万余人，17日从海上逃跑，塘沽解放。第三阶段：傅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1月16日至1月31日）。中共中央为保护古都北平，力争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接管。同时，又要求部队不放松强攻的准备。傅作义从1948年12月下旬开始与解放军正式谈判。经过双方多次谈判，以及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配合工作，于1月20日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并将所辖8个军25个师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取得了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人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就地解决傅作义集团的目标，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为其后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20-1.bmp}

(王宗荣)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Zhonggong zhong yangqijieerzhong quanhui)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报告着重阐述了关于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方式，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问题；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问题；指出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和解决土地问题之后，中国还存在着国外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两种基本矛盾，着重规定了我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阐明了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问题，告诫全党同志，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号召全党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还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全会还批准了毛泽东1月14日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问题的声明，决定递补候补中央委员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21-1.bmp}

(王宗荣)

国共北平和平谈判

(Guo gong beiping heping tanpan)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和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力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国民党政府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陷于土崩瓦解，一片混乱。国民党统治危在旦夕。在此形势下，美国政府为使南京政府取得喘息时间，从各方面策动重开国共“和平谈判”，逼迫蒋介石让位，由桂系李宗仁出面与中共进行“和谈”。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遂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与此同时，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献辞。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表明了中共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的真切愿望，提出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的8项条件：1. 惩办战争罪犯；2. 废除伪宪法；3. 废除伪法统；4. 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 没收官僚资本；6. 改革土地制度；7. 废除卖国条约；8.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拥护，给蒋介石以致命的打击。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总统。李宗仁上台后，于22日宣称南京政府愿意在中共方面所提8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当天，南京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特派邵力子、张治中等5人为和谈代表。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并派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同南京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黄绍、章士钊、李蒸、刘斐和顾问屈武等，从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举行谈判。到4月12日，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8条24款，交给南京政府代表团，以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黄绍、屈武携《协定》返南京复命。但是南京政府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拒绝签字，导致谈判破裂。当日晚，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宣告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平骗局的彻底破产。

(王宗荣)

渡江战役

(Dujiangzhanyi) 大战役后，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决定把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从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由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 40 个师 25 万人；湖口以东至上海由汤恩伯指挥，其兵力有 75 个师 45 万人，并配有 170 艘舰艇和 230 余架飞机，协助防守长江下游。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也做好了渡江准备。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针对国民党军的江防情况，于 3 月 31 日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三野第 8、第 10 兵团组成东突击集团；以三野第 7、第 9 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以二野第 3、第 4、第 5 兵团组成西突击集团。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九江东北之湖口的千里长江战线上，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实施渡江作战。另以四野之第 12 兵团归西突击集团指挥，位于武汉正面，在鄂豫、桐柏、江汉各军区部队配合下，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的作战。整个渡江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4 月 20 日至 23 日，突破江防，解放南京。1949 年 4 月 20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 20 日午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在炮兵、工兵的支援配合下，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先后占领贵池、铜陵、芜湖、常州、无锡、镇江等地。23 日，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舰艇 25 艘在南京以东江面起义。同日，第三野战军一部攻占南京，宣告国民党 22 年的反动统治的覆灭。第二阶段：4 月 24 日至 5 月 13 日。追歼逃敌，前出浙赣线。总前委根据沿江之敌向沪杭及浙赣线退却的情况，及时调整部署，以三野主力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两侧之线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急进，切断宁杭公路，完成战役合围，求歼逃敌。以二野前出浙赣线，迂回敌之侧背，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三野聚歼被围之敌。各部队日夜兼程，紧追逃敌。4 月 27 日，东西两路解放军会师吴兴，三野占领苏州。5 月 3 日，解放杭州，随即渡过钱塘江，继续追击逃敌；二野于 5 月 1 日至 7 日，经屯溪、婺源、乐平，直趋浙赣线，先后解放上饶、贵溪、金华等地。同时，四野之第 12 兵团及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相继占领孝感、黄陂等地，直逼武汉。第三阶段：5 月 14 日至 6 月 1 日。解放武汉，占领上海。5 月 14 日，四野第 12 兵团 2 个军从汉口以东之黄岗、蕲春地段发起强渡，于 16 日、17 日先后解放武昌、汉口、汉阳，守军弃城南逃。5 月 12 日，三野发起上海战役，激战至 27 日，解放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歼敌 15 万余人。在此期间，解放军还解放了南昌、温州、宁波等地。6 月 1 日，解放了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历时 42 天，共歼灭国民党军 46 个师计 43 万余人，解放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武汉、南昌、杭州等大城市，以及苏南、皖南、浙江全省、闽北、赣东北、鄂东南等广大地区，为尔后解放华南，进军西南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王宗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Xie shang Huiyi)原称新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正式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的积极响应,也获得了中间阶层的热烈拥护。5月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李济深、马叙伦等人,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通电国内外,号召国人共策进行。8月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进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321-1.bmp}

入解放区,同中共一起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之所以称作“新政协”,是要区别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委会,负责办理经常工作。常委会推定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经过3个月的筹备,筹备会于1949年9月17日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

(王宗荣)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Zhongguo guomindang gemingweiyuanhui) 简称“民革”。是由原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建的一个民主党派，是它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统一事业的政党，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另由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等人组织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民促、民联都积极开展了爱国反蒋活动，参加民主运动。1947年11月，国民党各民主派领导人先后到达香港。11月12日，在香港举行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宋庆龄任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等16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于1948年1月1日发表成立宣言，主张推翻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同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9月，民革、民促、民联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同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将民革、民促、民联和国民党其他爱国分子进一步统一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促、民联宣告结束）。团结推动其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促进祖国统一贡献力量。民革现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党员近4万人，《团结报》为民革中央机关报。现由屈武任名誉主席，朱学范任主席，孙越崎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王宗荣)

中国民主同盟

(Zhongguo minzhu tongmeng) 简称“民盟”。是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前身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由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为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其他人士联合组成。其政治纲领主要是贯彻抗日，实现民主，结束党治，实现宪政。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黄辞职，由张澜继任主席。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1945年10月，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等文件。1946年1月，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地方组织和成员转入地下。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举行了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领导机构，制定了联共反蒋的政治路线。1948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3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同年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民盟主席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建国后，民盟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了其工作和发展的对象主要为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民盟现在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市县组织有268个，盟员9.9万余人。民盟中央机关出版了《群言》杂志。现任名誉主席楚图南，主席为费孝通，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苏步青。

(王宗荣)

中国民主建国会

(Zhongguo minzhu jiangguohui)简称“民建”。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发起人有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章乃器等。民建成立后，积极投入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建国后，民建确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组织、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民族工商业者进行学习和自我教育，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民建目前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会员5万多人。现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为孙起孟，中央咨议委员会主席为孙晓村。

(王宗荣)

中国民主促进会

(Zhongguo minzhu cujinhui)简称“民进”。是从事文教、出版、科学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民进“以发展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积极参加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1月民进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建议书》，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5月中共发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后，民进积极响应。1949年9月民进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建国后，民进于1950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团结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文教、科学、出版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民进目前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现有会员4.8万余人。民进中央主办的刊物为《民主》杂志。现任名誉主席为谢冰心，主席为雷洁琼，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为赵朴初。

(王宗荣)

中国农工民主党

(Zhongguo nonggong minzhudang)简称“农工党”。是主要由医药卫生、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所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的特点，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其前身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于同年11月在苏联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1930年8月9日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等决议，选举了中央干部会，由邓演达任总干事。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1933年宣布解散。1935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鼓舞下，章伯钧、彭泽民等人在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恢复党的组织，并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选举黄琪翔为总书记，由章伯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1938年3月在汉口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发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推定章伯钧为总联络人。抗战胜利后，为了进一步争取和平民主统一，1947年2月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易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其后该党被迫转入地下，总部迁至香港。1948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宣布接受中共领导。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建国后，制定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发展医药卫生、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现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党员有4.6万余人。现任名誉主席为周谷城，中央委员会主席为卢嘉锡，中央咨监委员会主席为沈其震。中央机关刊物为《前进》月刊。

(王宗荣)

中国致公党

(Zhongguo zhigongdang) 简称“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和与海外有联系的代表性人士、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1925年10月，由侨居在美洲的洪门致公堂的人员和在港、澳的洪门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洪门团体代表会议（洪门恳亲大会），决定以美洲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成立华侨政党——中国致公党。1931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在香港设立总部。抗战期间，致公党号召各地组织积极参加抗日。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告海外同胞书，决议参加以中共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主张为中国政治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大会选举陈其尤为副主席（主席为李济深，未公开），陈演生为秘书长，主持中央党部日常工作。1948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4月，致公党在广州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决定总部由香港迁至广州。1952年11月，致公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致公党发展组织的对象主要是归侨、侨眷，并决定将总部迁到北京。目前致公党在全国归侨、侨眷比较集中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党员1万多人。现任名誉主席为黄鼎臣，主席为董寅初。

（王宗荣）

九三学社

(Jiusan xueshe) 是由科技、文教、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1944年底，一批爱国的学术界人士为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在重庆组织民主科学社。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决议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选出许德珩、褚辅成等16人为理事，梁希、卢于道等8人为监事。同年8月，总部迁至北平，在重庆、上海、南京等地设有分社。解放战争时期，九三学社积极参加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而斗争。1949年1月北平被围期间，九三学社发表宣言，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拥护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年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建国后，九三学社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团结、推动社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科技、文教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九三学社目前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现有社员4.5万余人。由严济慈等任名誉主席，周培源任主席，王淦昌任参议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的刊物是《民主与科学》杂志。

(王宗荣)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Taiwan minzhu zizhi tongmeng)简称“台盟”。是由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省籍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1947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后，由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台湾省籍人士发起，于同年11月12日在香港召开了台盟筹备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通过了台盟的纲领、章程等文件。12月1日，正式宣布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一切阴谋活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实行人民民主制度。1948年5月，台盟发表声明，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同年8月，台盟总部成立，谢雪红等为总部负责人。1949年8月台盟在北平设立了办事处。同年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建国后，台盟由一个地方性的政治组织成为中国的一个民主党派，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团结推动盟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反对外国侵略台湾而贡献力量。台盟中央迁到大陆后，初设于上海，1955年迁至北京。目前台盟在台胞较多的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13个省、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在台湾省籍的人士中发展盟员。盟员中多数是文教、科技、医药卫生界的知识分子。现任台盟中央名誉主席苏子蘅，主席为蔡子民，评议委员会主席为李纯青。

(王宗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Zhongguorenmin zhengzhixieshanghuiyigongtonggangling) 简称《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的，是在中共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共同制定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共同纲领》除序言外，有7章60条。“序言”中，宣告了三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时代的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各章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纲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统一的部队；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使存在着的五种经济成分能够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文教政策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科学文化；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外交方面，以保障国家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在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前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王宗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heng li)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30日闭幕。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贺龙、林伯渠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宣言、向人民解放军致敬电和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办法及碑文。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324-1.bmp}

10月1日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副主席及委员们宣布就职。委员会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会议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愿意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下午3时,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毛泽东主席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并随即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王宗荣)

中国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

(zhongguo xiandaishi) 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历史。近 40 年的历程，经过了两种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四个历史时期。

1.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1949 年 10 月至 1956 年底）。

前三年，主要是统一中国大陆，巩固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在进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等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同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后四年，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执行并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实现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了民主化与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 在国际形势发生某些变化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艰苦地寻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1957 年 1 月—1966 年 4 月）。这个时期，有巨大的成功，也有严重的失误。一方面承认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的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夸大敌我矛盾，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挫伤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一方面要依靠亿万人民群众奋发图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号召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另一方面又急于求成，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认为它们是改变一穷二白和通向“共产主义”之路，并为维护这“三面红旗”，错误地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在全党发动反右倾斗争。由于这些，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一方面，由于贯彻“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大庆油田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等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认定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发动了“反华大合唱”，国内出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认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全面地“反修防修”成为毛泽东的重要战略思想。由此出发，对外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发动中苏论战，对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农村扩展到城市，并在运动中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概念。理论上、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则直接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准备了舆论。

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 年 5 月—1976 年 10 月）。“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他贯彻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战略思想及实现其理想社会的一次“演习”。它本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次全国性的大倒退、大灾难。这个时

期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发展，如现代科学技术，对外关系上的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文化大革命”最后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先后垮台而告终，历史转入新的时期。

4. 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6年10月—1987年10月）。头两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方针，国家在徘徊中前进。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党和全国人民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禁锢和个人崇拜的束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并从农村开始，切实调整国民经济，开始着手进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1981年6月中共中央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问题，作了明确结论。1982年和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逐步确立了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曲折前进的历史证明：新中国是从贫穷落后、被人侵略与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又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异常艰难的事业，每前进一步，都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显露出自己的民族特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既有能力站起来，也有能力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断地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

（李起民）

中国大陆的统一

(zhongguo dalu de tongyi)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军事力量主要是占据湘南及两广的白崇禧集团、余汉谋集团，扼守秦岭盘踞西南的胡宗南集团。为了全歼这些敌人，统一祖国大陆，人民解放军二、四两大野战军及一野一部，在南方各游击纵队配合下，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方针，于1949年9月开始了向华南、西南的大进军。四野十二、十五、十二兵团、两广纵队和二野第四兵团首先发起衡（阳）宝（庆）战役和广东战役。兵分三路，直捣湘粤，并掩护二野主力在湘西集结。10月7日解放韶关，10月14日解放广州，10月24日至26日又将余汉谋残部追歼于阳春、阳江地区。白崇禧集团在祁阳以北被歼47000余人，退入广西。湘粤作战共歼敌10万余人。11月6日发起广西战役，12月1日歼白崇禧集团主力于容县、陆川、博白地区，12月4日解放南宁，12日解放镇南关（今友谊关），共歼敌17万余人。残敌万余人经十万大山逃入越南。11月1日二野主力及一、四野各一部开始向大西南进军。起初，敌误以为解放军必从川北入川，故以重兵固守秦岭、巴山防线。二野主力及四野一部以神速动作突然从湘鄂川边入川，直扑重庆，11月30日解放重庆，胡宗南先是增援重庆，然后撤守成都。预先屯兵秦岭牵制胡宗南部于秦巴的华北第十八兵团，尾敌跟进，至12月7日兵分三路猛扑成都。与此同时，二野第五兵团亦于11月中旬解放贵阳、遵义后，向川南兜击，至12月20日接连解放泸州、宜宾、乐山、大邑等城。川境之敌完全被困于成都地区。在军事打击及政治争取下，敌人迅速分化，有的被歼，有的起义和投诚。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分别在四川彭县、西康雅安宣布起义。12月10日蒋介石父子逃离成都飞往台北，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4月解放西昌，整个西南战役共歼敌93万余人，除西藏外，西南全境解放。三野一部于1949年10月17日解放厦门。1950年5月19日解放舟山群岛。一野第一兵团于1949年10月20日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市）。1950年4月30日四野第十五兵团解放海南岛。

（李起民）

西藏的和平解放

(xizang de heping jiefang)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决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政府长期支持、策动西藏地方政府中亲帝国主义势力进行“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言人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活动，并宣布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7月又派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赴拉萨进行劝说活动。8月22日他行至昌都时被英国特务毒死。西藏地方政府又在昌都集结藏军，妄图阻挠人民解放军进藏。为了早日稳定西藏局势，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0月初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10月6—24日在昌都一战，全歼藏军5000余人，打开了进藏门户。此后，摄政大札挟持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生于1935）逃到亚东，准备出逃印度。这一举动加剧了内部矛盾，结果，大札下台，达赖亲政。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人代表团赴北京谈判。4月下旬抵京后即与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5月21日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签字仪式。协议共17条，故又称“17条协议”，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现行政治制度、达赖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西藏有关改革事宜，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为了保证协议的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等。协议的签署，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团结统一问题的重大成就，不但解决了西藏地方同中央的关系，而且解决了西藏内部自1923年以来达赖与班禅的不和问题。根据协议，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于8月8日抵达拉萨。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1937—1989）于1952年6月23日由青海塔尔寺回到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27-1.bmp}

（李起民）

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方针

(jingji goucheng he jingji jian she fangzhen) 建国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国营经济，也叫国有经济，除在革命过程中解放区已有的一部分国营经济外，主要是靠没收官僚资本和征购、征用外国在华企业而建立的。到1949年12月底，接收了国民政府“四行二局一库”及省市地方银行2400多家，国民政府交通部、招商局所属的铁路、航运等交通运输业，十多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资源委员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四大家族的工矿企业2858个，以及隐藏在私人企业中的官股等。这就使国家掌握了主要经济命脉。1949年，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占全国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80.7%，国有企业的总产值36.8亿元，占全国全部产值140亿元的26.2%，国有企业控制全国发电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棉纱的53%。全国私营工业12.3万户，职工164万人，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2%。其中轻工业最发展，占全国轻工产品的大部分，棉纱占46%，棉布占40%，面粉、卷烟、火柴等均占80%。私营商业402万户，从业人员662万人，商品销售额，批发占76%，零售占83.5%（1950年统计）。由于我国经济落后，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7%左右，因此，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共同纲领》中作了如下规定：“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执行这个方针，不但可以保证国营经济的优先发展，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而且还会使各种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一步步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李起民)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

(Zhongguogongchandang qijiesanzhong quanhui) 建国初期，由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改组，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未理顺，在党和国家干部中对《共同纲领》规定的经济政策还缺乏统一认识，因此在全国财经工作统一和物价稳定后，社会经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新的困难，阶级关系比较紧张。为了制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和统一全党的思想，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就党的战略策略思想作了重要讲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聂荣臻分别就土改、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财经、军事等问题作了报告。全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和讲话。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6月28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6月30日公布施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了今后三年的中心任务，这就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此要创造三个条件，即完成土地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节约国家机构经费，做好八项工作，即做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以调整公私关系为中心）、肃清反革命、整党、统战、民族、文教等工作。这三个条件八项工作就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毛泽东的讲话，着重从政治上强调了要稳步前进，要调整同各阶级阶层的关系，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而不要四面出击，造成全国紧张，绝不可树敌太多。这就实际指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矛盾。三中全会的纲领和路线，对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对动员、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李起民）

抗美援朝

(Kangmei yuanchao)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抗击美国侵略和中国人民掀起的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生内战。美国以“联合国军”名义直接出兵帮助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10月11日、19日美李军从东西两线长驱直入，接连侵占元山、平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应金日成首相请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帮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10月19日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28-1.bmp}

领志愿军首批部队进入朝鲜。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5月21日，志愿军接连发动五次大的战役，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歼灭美李军23万余人（其中美军11万），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7月10日双方代表开始进行停战谈判。此后两年内又经过反复的政治、军事较量，至1953年7月27日双方首席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字，随后金日成、彭德怀和克拉克（“联合国军”总司令）在协定上签字。朝鲜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告终。中朝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共歼敌109万余人（其中美军39.7万人）。志愿军指战员发挥了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涌现出30多万名功臣，6000多个集体立功单位，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特级英雄、特等功臣黄继光、杨根思，一级英雄、特等功臣邱少云、孙生禄等数十万中华优秀儿女的鲜血洒在朝鲜土地上。与志愿军入朝作战同时，国内各族各界人民轰轰烈烈地、深入地开展了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抗美援朝运动，不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政治、思想上也展开了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运动，清除了一部分人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提高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抗美援朝运动，促进了国内生产的发展和各项社会民主改革的进行。战争的压力变成了动力，前后方互相鼓舞，互相支持，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勇于献身，这正是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朝鲜停战后，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根据中朝双方协议，志愿军陆续撤回国内，至1958年10月26日完全撤退完毕。

（李起民）

土地改革运动

(tudi gaige yundong) 1950 年冬至 1953 年春分期分批进行的改革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运动。约在 3.1 亿人口的地区进行。大体分为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三个步骤。土改的总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改的完成，连同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半老区土改，共使约 3 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七亿亩土地，还分到耕畜、农具、房屋、粮食等财产，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 700 亿斤粮食的地租负担。在中国大地上消灭了存在 2000 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农民发家致富和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积极性。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29-1.bmp}

(李起民)

镇压反革命运动

(Zhengya fangeming yundong) 1950年冬至1953年春，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活动的群众运动。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留下的300余万溃散武装、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分子，一直没有停止破坏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自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就要到了，便猖狂活动起来。在一段时间内，专政机关对反革命活动打击不力，也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人民群众对此深为不满。1950年10月，中共中央纠正了“宽大无边”的偏向，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门机关和群众发动相结合的群众路线方法，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在全国张起了镇压反革命的天罗地网。1951年2月21日《惩治反革命条例》的颁布，使群众运动进入高潮。在人民政府坚决逮捕、处决、关押了大量首恶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以后，各类反革命分子受到毁灭性打击，人民群众拍手称快。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共杀掉罪大恶极的“南霸天”、“北霸天”等反革命分子70余万人，关押和管制各百万人，基本上消灭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再加上人民解放军剿匪的胜利，平息了历史上从未平息过的匪患，巩固了人民政权和社会的安定，保证了恢复经济和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

(李起民)

三反五反运动

(Sanfan wufan yundong) 1952年上半年在国家机关、国营经济部门、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在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随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恶性发作，许多不法资本家，违背《共同纲领》的规定，利用他们同国营经济的联系（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以“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千方百计腐蚀国家干部，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内部安插代理人，同时施放“五毒”即行贿、偷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大挖社会主义墙脚。在商品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进攻面前，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滋长了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当时称“三害”），有的人，甚至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贪污腐化，蜕化变质。“三害”和“五毒”成了腐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破坏国营经济的蛀虫。1951年冬三反运动首先从东北开始，1952年元旦以后迅速在中央机关和各省市展开，一面号召贪污分子坦白交代，一面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并认真查证落实。2月上旬处决了大贪污犯薛昆山（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宋德贵（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和刘青山（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原天津专区专员）等，3月即转入处理阶段。1952年1月下旬部署了五反斗争，2月上旬即进入高潮。人民政府逮捕了一批极为反动的不法资本家。鉴于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工商户占的比例相当大（一般占70~80%），国家采取了区别对待慎重处理的方针。3月5日中共中央规定了处理违法户的五条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依此原则，北京市将全部五万户私营工商业分为五类：守法户（占10%）、基本守法户（占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各大城市情况大同小异，基本照此办理。这些区分体现了五反的目的不是消灭资本而是限制资本，是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整个运动于6月底结束。三反五反运动，是同时从国家机关和私营工商业两方面打退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进攻，确立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运动。它教育了党员和干部，纯洁了国家机关，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李起民）

过渡时期总路线

(Guodu shiqi zongluxian)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学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最初设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先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毛泽东认为，只有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是很远的将来的事情。刘少奇认为至少要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现在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周恩来认为按照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做去，就是一步步地走向社会主义。1952年，当恢复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取得重大胜利，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的时候，毛泽东对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有了新的考虑，1952年6月6日作出了“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5页）的论断。1953年6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确保私有财产”等提法，认为这都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错误观点。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的、由中宣部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学习与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中，对过渡时期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明确说明和完整表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亦即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成为我国唯一经济基础的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同时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互相关连而不可分离的，比如一只鸟，前者是“主体”，后者是“两翼”；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过渡时间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这条总路线，1954年正式载入中国第一部宪法。在宪法“序言”中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改为“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此，为贯彻总路线而斗争，成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

（李起民）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diyijie quanguorenmin daibiao dahui diyici huiyi)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了大会的任务和国家的总任务，强调“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了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首先论述了制定宪法的根据，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他明确指出：在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的若干年间，中国一切有志救国的人，都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他们还只能这样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开始确信，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先进分子的这种正确的信念，很快地变成了广大群众的信念。最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长期的革命斗争证明，中国共产党指出的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道路。中国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接着，他又分析了近代中国所出现过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宪法，即封建买办统治阶级的伪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宪法，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这最后一种就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这次制定的宪法。在报告中，他还对宪法草案基本内容的若干问题，如国家性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人民民主制度及人民权利义务，民族自治问题等，作了说明，对全民讨论中提出的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也作了解答与说明。大会经过认真讨论，9月20日一致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审议、通过了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了根据宪法设立的国家机构的领导人，还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等法律。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选举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名，大会决定以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名，大会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选的决定，以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巩固了建国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反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新发展。标志着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过渡状态已经结束。

(李起民)

第一个五年计划

(diyige wunian jihua) 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依据苏联经验，由陈云、周恩来、李富春等负责，于1951年至1955年2月编制的。1955年7月30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一五”计划的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围绕这些基本任务，又规定了各项具体任务。“一五”计划的总投资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以上，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1956年提前实现了所规定的主要指标，1957年超额完成了计划。不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前实现，经济文化建设亦取得巨大成就。五年内，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基本建设投资493亿元，超过原计划427.4亿元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基建投资550亿元，折合黄金5.7亿两以上。其中工业部门占42.5%。在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占85%，轻工业占15%。施工项目10000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产的有428个，部分投产的109个。新增固定资产440亿元，其中新增工业固定资产214亿元，超出旧中国近百年积累的工业固定资产的60%左右，在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和有线电的制造工厂等。出现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包钢、武钢亦先后开始施工建设。有色金属冶炼、化工、机械、建材、森林、纺织等亦有一批项目投产。1956年9月9日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1957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比1952年484亿元增长25%，五年内每年平均增长4.5%。工业总产值达784亿元，比1952年343亿元增长近1.3倍，平均每年增长18%。钢产量由1952年的135万吨增至535万吨，为1949年的33.9倍。五年内新建和修复铁路一万多公里，使铁路运营里程达2.67万公里，比1952年增长17%。公路通车里程25万公里。内河航运、空运、邮电事业、外贸都有较大发展。文教、科研、体育、卫生事业也有显著发展，全国职工人数达到2451万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职工平均工资达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农民收入增加约30%。总之，达到了“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的要求，初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一五”期间也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

(李起民)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nongye de shehuizhuyi gaizao) 建国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内虽然有过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和先合作化和后机械化的争论，但都同意农业社会化与机械化要相适应，都同意采取逐步前进的方针。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和1953年2月《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都强调由于农民有发展个体经济与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两个积极性，因此必须采取说服、示范、国家援助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而不能强迫命令和急躁冒进。具体道路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并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点是区别于苏联的最重要的经验），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民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0年，全国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有1131.3万户，占总农户的10.7%，1952年达4536.4万户，占39.9%，这时有初级社300多个。总路线公布后着重发展了初级社，1953年底增至1.4万个，1954年春达10万个，1955年春达67万个（后调整到65万个）。虽有某些地区的急躁冒进倾向发生，但1955年7月以前，基本坚持了稳步前进方针和自愿互利原则，因而合作社一般都增加了生产，显示出社比组优越，组比单干优越。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等，象“小脚女人”走路，“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他还断言“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合作化方针引起的辩论是“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指出邓子恢等犯了右倾错误。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两次写序言，在104处写了按语，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继续反右倾。毛泽东的这些言行对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也助长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使干部中产生了恐右症。于是从1955年下半年起（主要是冬季）席卷五亿农民的合作化高潮在中国掀起：首先是大办初级社，由6月的63.4万个，10月增至107.7万个，12月达190.5万个，入社农户在总农户中的比例，6月为14.2%，年底为63.3%，1956年1月为80.3%。其次是初级社升高级社。1956年1月开始大办（先把牌子挂起），至年底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87.8%，初、高级社相加，占总农户的96.3%。再次，小社并大社。初级社本来平均20—30户，高级社平均200多户。在华北地区一个自然村成了一个或几个高级社。随着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了不同地区农作物产量标准和增产的措施。这样，1956年在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少数民族地区，除西藏外，也在1958年实现了合作化）。短短几年，中国5亿个体农民的个体私有制就转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

（李起民）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shougongyie de shehuizhuyigaizao) 由于我国现代工业不发达，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手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约占20%左右，1953年全国城乡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者达1930万人。他们不但承担着人民必需的日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以及不可缺少的修理、服务业务，而且他们生产的特种手工业品和工艺美术品是重要的出口换汇产品。它的分散、灵活、便民，可以补足大工业、大商业之不足，但它们在资金、劳动、技术等方面仅靠个人经营确有困难，有组织起来的要求。国家把手工业者引上合作化道路也采取了由低到高、逐步前进的方针，由初级形式的合作小组到供销合作社，再到高级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1950年有手工业合作社1300个，社员26万人。1953年合作化手工业从业人员30.1万人，1955年220.6万人，1956年603.9万人，占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1.7%，产值占93%。手工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类似，在1955—1956年的合作化高潮中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等缺点，使经营网点减少，品种、服务项目减少，有些特种工业品和工艺品的发展受到影响，甚至一些名匠故去后，后继无人，有些民间技艺濒临失传境地。这些缺点通过整顿本来可以解决，可是1958年的“大跃进”，也使手工业合作社急于向国营过渡，问题就愈难处理了。

(李起民)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ziben zhuyi gongshangyie de shehuizhuyi gaizao)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和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出发，建国后对之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同时把对私营企业的改造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改造结合起来，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平地逐步地达到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的目的。大体说来，总路线提出之前，主要是利用、限制，初步地把它们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总路线提出后，提出了完整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用各种方式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相联系与合作的、受工人阶级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具体形式，在工业中有收购产品、统购、包销、订货、委托加工和公私合营。前五种是初级形式，主要是在产品销售（委托加工涉及原料供应）方面同国营经济相联系，均不涉及企业生产和所有制。利润分配，从1953年起采取“四马分肥”办法，即把企业所得利润分成所得税、公积金、公益金、资方股息红利四部分，资本家所得股息红利约占25%左右。公私合营（分个别行业和全行业两种）是高级形式，国营经济同私人经济由外部合作发展到内部合作，不但涉及生产全过程而且由资本家的私有制改为公私共有或公有制。利润分配上，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仍实行“四马分肥”，全部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定息制，即根据核定的资方股额给以年息五厘的股息，定息自1956年1月1日算起，原定7年，实际至1966年9月取消。四马分肥和定息以及资方高薪的保留，工作的适当安排，体现了国家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在商业上，国家对私人批发商采取排挤和代替政策。对零售商采取经销、代销和公私合营方式。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解放时就开始出现了。至1952年，加工订货等形式的工业产值已占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56%，1955年占82%。1953年后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企业，1955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32-1.bmp}

年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16%，在私营工业产值中它占50%。1955年10月上海棉纺业等8个轻工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0月下旬毛泽东召集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定为正式决议）。1956年初，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下，北京工商业者首先申请各行各业全部公私合营，1月10日被批准。1月15日北京召开20万人参加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市长彭真宣布北京“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接着天津18日、上海20日，月底全国所有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都宣布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至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数的99%，商业户数的82.2%，纳入全行业公私合营轨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地交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变革的洪流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缺点，主要是工作粗糙，把大量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当做资本家对待，带进合营企业，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界限。企业和商业网点的大裁大并，使一些合营企业失去了特点，并造成分布上的不合理和门市部、零售店的减少，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但是，用和平赎买办法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逐步消灭剥削制度，而又使社会经济向上发展，这是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创举，能够做到这些的条件和政策是很值得研究的。
(李起民)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Heping gongchu wuxiang yuanze) 首先由中国政府倡导, 逐步为世界许多国家承认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就提出了“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 首次提出关于五项原则的设想, 1954年4月29日这个设想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西藏地方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之中, 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同年6月下旬中印、中缅总理分别发表会谈的联合声明, 确认五项原则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般准则。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 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本着“求同存异”方针, 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实际上是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具体化。到了70年代, 美、日等国亦接受五项原则。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 9月的中日联合声明都承认“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 都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政策的发展, 它不仅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原则, 也是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它是同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穷的强权政治根本对立的, 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锐利武器。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33-1.bmp}

(李起民)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ba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代表1026人，代表着1073万党员，有58个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列席了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有68人在大会发言，45人书面发言。经过讨论，通过了上述三个报告，选举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9月28日举行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彭真、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李先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为候补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为候补书记；董必武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刘澜涛、肖华、王从吾、钱瑛、刘锡五为副书记。这次大会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面临新情况之时召开的，及时地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这次大会总结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次大会还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把党的领袖神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但是，限于历史条件和经验不足，大会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尤其对于经济建设同阶级斗争的关系，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没有展开深入讨论；在反对个人崇拜、扩大民主、健全法制问题上缺乏具体措施，更没有从体制上去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缺乏理论上的深刻阐明，“八大”确定的正确论断和路线后来未能坚持并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中共“八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为此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基石。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34-1.bmp}

(李起民)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Guanyu zhengquechuli renmin neibu maodun de wenti)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会后经过整理、修改、补充,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全篇讲话分12个小题目,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明确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有无矛盾的问题。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其次,阐明了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他指出,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一般是非对抗性的,但在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的一面;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方法也不同。处理敌我矛盾用专政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方法,而且只能用民主方法。人民不能对自己专政,不能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专政。民主的方法就是历来运用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重要的是条件,看处理是否得当。再次,明确宣布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具体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表现,提出了处理这些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政治上强调了民主方法的极端重要性。经济上提出了从物质利益方面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即在国家、集体、个人之间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生产和分配,积累和消费,都要统筹兼顾。归根到底,要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科学文化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篇讲话,是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关头,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出并迫使人们认识和正确处理它的情况下,参照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对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的新的探索和科学概括,是毛泽东继创造了新民主主义学说之后又一重大创造。这篇讲话公开发表时,正值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毛泽东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讲话稿整理过程中加进了一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是鲜明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愈来愈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李起民)

反右派斗争

(fanyoupai douzheng) 1957 年夏至 1958 年夏主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发生了严重扩大化错误的政治斗争。1957 年春夏，中共中央为了贯彻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决定开展全党的整风运动，用批评自我批评和和风细雨的办法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4 月 30 日至 6 月 8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光明日报》编辑部也在京沪等大城市召开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各高等院校党委亦召集类似的会议，当时称为“鸣放”，即畅所欲言，大鸣大放。5 月初，由开座谈会转为群众集会、贴大字报等形式，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针对各级领导和党员干部，提出了许多善意的批评和对国内外形势的真知灼见。但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发表许多错误言论，并在群众中煽风点火，集中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叫嚷要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轮流坐庄”。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必须予以批驳和反击。5 月 25 日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对右派分子的警告。6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从此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7 月 1 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7 月中旬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正式定资产阶级右派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并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此后反右派斗争迅速由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和知识界扩展至省市以下的机关、工商界、中小学教师队伍中。8 月以后中共中央指示在企业 and 农村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主要围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展开辩论，实际是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至 1958 年夏基本结束，对右派分子作了处理。对这场斗争怎么评价？邓小平一再指出：1957 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447 页）。所谓扩大化，首先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正常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视为右派向党进攻，把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全国共划右派分子 55 万余人，属于划错的约占 97%。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重，定了 1—10% 的比例，导致了大量错划。民盟中共划右派分

子 6000 余人，占盟员总数的五分之一。民革成员中占 9.4%，民革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占中央委员总数 20.2%。省市一级委员会中委员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占委员总数 23.1%。河南省共划右派分子 70896 人，占全省干部总数的 15%（见吉林大学出版社《社会主义时期政党史》第 143 页）。其次，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采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抓住某些言论，无限上纲。再次，组织处理太严，打击份量太重。虽然在 1959 年以后的几年中陆续给一些人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实际上不能被人们当正常人看待，还有大批的人右派帽子一直戴了二十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导致了全社会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视。反右的扩大化也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形成的基础。正是通过反右派斗争，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957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9 日）改变了过去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认为我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多数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毛泽东在讲话中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稍后，1958 年 5 月 5 日至 23 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确认了这个提法，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当前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的错误理论，把知识分子大多数划归剥削阶级范围，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

（李起民）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shehuizhuyijianshe zongluxian) 1958 年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即将完成之际，约在 1955 年冬，毛泽东的注意力由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转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上，并不断反对右倾保守。后来，他吸收周恩来、李富春的意见，把社会主义建设设想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956 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将之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同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强调既要注意多快，又要注意好省。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则公开批评了这一社论，1958 年初接连进行批判。3 月的成都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进而指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被 5 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这条路线的基本点，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一方面规定了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运用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以及逐步实现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方针，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另一方面片面强调高速度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从 1958 年至 1978 年底，中国的经济建设都是在这条总路线指导下进行的。

(李起民)

“大跃进”运动

(Deyuejin yundong) 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出现的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运动。“大跃进”口号是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同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成了大跃进的奋斗目标。公开提法是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争取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内部要求是7年赶上英国，8年或10年赶上美国。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中央会议和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批“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批判张奚若1957年5月13日提出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等，到提出总路线，正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对1958年的生产指标，3月成都会议确定钢产量624万吨，比1957年增长19.2%（内部掌握700万吨，增长33.5%），粮食3920亿斤，比1957年增长5.9%（内部掌握4316亿斤，增长16.6%）。8月17日至30日的北戴河会议决定翻一番。确定在今后四个月内为完成全年1070万吨钢而战（当时只完成450万吨）。会议还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达8000~10000亿斤，钢产量达2700~3000万吨。时间紧、任务重，于是来了个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一切部门都要保证“以钢为纲”，“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省地县乡党委第一书记挂帅，亲临指挥，全国动员了约6000万至9000万人炼钢，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数百万座小高炉齐放“卫星”。由于主要劳动力去炼钢，丰产的粮食未能收获。经过三个半月苦战，12月19日中央宣布大战“告捷”，完成了“1070”的任务，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与此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开展“全民大办”。郑州会议时，发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并加以纠正，但很不彻底，因而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大反右倾，大批所谓“比例失调论”，生产上仍是高指标。伴之而来的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起来。直至1960年冬才被迫停止“跃进”。“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受到极大损失，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积累率由1957年的24.9%增至39.6%。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农业却下降22.7%。粮食减产1031亿斤，粮食征购由960亿斤增加到1021亿斤，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例由24.6%到35.6%。工交内部比例失调。国家财政赤字1958—1960年实际达169亿元，货币流通量增加82%。1957—1960年每人平均年消费的粮食由406斤降至327斤，猪肉由10.2斤降至3.1斤。收入减少，口粮下降，劳动强度又大，全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异常严重。1960年人口死亡率竟达到25.43%，大大超过了战争年代的1949年20%的死亡率，人口净减1000万。这一年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人。三年“大跃进”，主观上要求高速度，客观上带来的是大倒退。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336-1.bmp}

（李起民）

人民公社化运动

(Renmin gongshehua yundong)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主席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在农村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时，就产生了办大社的思想。1957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过“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小。”但至1957年冬和1958年春，全国范围的农田水利建设热潮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并社的现象。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纷纷进行并社工作。农民自发地采用了“共产主义公社”、“大社”、“集体农庄”等名称。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冀豫鲁农村，听了各地办大社情况的汇报。8月9日在山东历城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个消息一公布，各地纷纷仿效。“人民公社好”成了吹遍全国的号召。北戴河会议正式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这一决议公布后，全国在几个月内就由74万多个合作社合并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入社的农民1.2亿万户，占全国各民族总农户的99%以上。公社的规模，一般以一乡为一社，有的更大。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的特点、规模、具体制度、政策等问题在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2月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并认为它是“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的“新的社会组织”。人民公社一产生，“一平二调”、“共产风”如决堤的洪水泛滥开来。在公社范围内，穷队富队拉平，平均分配。公社对生产队的财产无偿地上调，对生产队乃至社员的财产无偿地收归公有，完全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在公社内部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再加上当时大炼钢铁、办公共食堂，许多农民的锅被收去炼钢，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起初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后来纠正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急于过渡”的思想，公社内部的经营管理始终没有搞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始终没有调动起来。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37-1.bmp}

(李起民)

“三面红旗”

(Sanmian hongqi) 中国对 1958 年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总称。起初一般提法是“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高高举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或“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旗帜”。1959 年以后始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1978 年以后这种提法才不见了。

(李起民)

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

(Lushan huiyi he fanyouqingdouzheng)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批判及会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由于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带来的浮夸风、“一平二调”（在公社范围内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把生产队的一些财产无偿上调）、“共产风”以及干部与群众中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界限、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界限等混乱思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后即着手加以纠正。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7月之前，接连开了一系列会议，采取了许多措施，毛泽东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努力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并收到了一定成效。7月2日至23日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左”。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读书、形势、任务等19个问题，讲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准备经过讨论，形成《纪要》发给全党。当时在讨论中，客观地、冷静地研究经验教训的空气不浓，有人护短，不愿倾听对工作中的失误的切实的批评。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况，又听说会议将于15日结束，便于13日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4日晨交给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意见，供毛泽东参考。这封信首先肯定了成绩，然后谈了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问题。基本精神和内容是正确的，对问题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表现了光明磊落的态度。但是，7月16日毛泽东将之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与会同志讨论，并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讨论中，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等表示同

意和支持彭的观点。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总路线进攻，对彭的“比例失调”、“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逐一批判。从此，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开始了对彭、黄、张、周的批判，以后又联系国际背景、历史问题，采取“老帐新帐一起算”的错误作法，上纲上线，逐步升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一切脏水都泼在彭的身上。8月2日至16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几次讲话为会议定了基调，认为彭德怀等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8月16日毛泽东又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个错误论断，把党内正常的工作上不同意见的争论看成阶级斗争，从而把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申到党内，使党内斗争扩大化。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升级。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在紧张的气氛下，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决议提出把彭、黄、张、周调离现处的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岗位，保留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会后，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这一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讲真话的同志，支持了搞浮夸、说假话的风气，助长了

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经济上中断了对“左”的错误的纠正，使 1958 年以来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重新泛滥起来，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全国进入 1959—1961 年的极端困难时期。

（李起民）

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tiaozheng guomin jingji de bazifangzhen) 1960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初步议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问题。李富春提出对工业要调整、巩固、提高。8月底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计划时再次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周恩来加上“充实”二字，形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央转发国家计委一个报告的批语中第一次正式使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这一方针。从此，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由“以钢为纲”的“全面大跃进”转入调整阶段。这是渡过困难时期并使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要方针。至1965年，这一方针获得重大成果。

(李起民)

“七千人大会”

(Qiqianren dahui) 中共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于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委及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因此又称“六千人大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分前后两段，前一段主要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一稿不是经政治局讨论后再提交大会，而是直接发给与会者讨论，这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特点。后一段主要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即“开出气会”。1 月 29 日毛泽东说：不出气就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关键要上下通气。他号召大家“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强调和系统地论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发扬民主问题，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刘少奇的报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主要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指出了今后全党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这次会议是在完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总结工作的，自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大会强调了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但在政治局内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有极少数人认为过去的缺点错误不在中央而在下边。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则继续制造个人迷信。大会“出了气”，但对庐山会议上反右倾斗争认为“完全必要”，对彭德怀不予平反。

(李起民)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

(Zhongguo gongchandang bajieshizhong quanhui)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问题的一次中央全会。“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在刘少奇主持下继续大力调整国民经济，进一步分析了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研究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强调工农业都要退够。在农业恢复过程中，一部分省区出现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也叫“责任田”。安徽省有85%的生产队采用这个办法。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省区灾情严重的地方，采用了包工、包产等经营管理办法；个别地区也有分田到户和单干的情况。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很注意农村的经营管理问题，主张以生产队为主体向作业组实行包工，大活分地片包到组，零散小活包到人。刘少奇、邓小平都表示支持这种主张。生产责任制对生产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中共中央在调整经济的同时，还注意调整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革命知识分子之冕），给一部分右派分子摘帽子，给“反右倾”中错批错斗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等。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申诉信（通称“八万言书”），以便澄清庐山会议加给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里通外国”的罪名。这个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有了某些激化的情况，1962年4月16日苏联策动诱骗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县6万余人逃往苏联，5月25日又制造伊犁暴乱事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军队非法越过中印边界侵犯我西藏、新疆边境，社会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利用经济困难进行犯罪活动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先后在北戴河、北京开了两个月工作会议，而后开了十中全会。

在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始终讲“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由于他对国内外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作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所以把阶级斗争问题当成了会议主题，提出并批判“三风”，即“黑暗风”（把刘少奇、陈云等充分估计困难、认真对待困难的态度视为将形势估计得“一片黑暗”），“单干风”（错误地把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具体管理制度同集体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翻案风”（错误地把彭德怀的申诉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同时认为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错误地开展了对邓子恢、彭德怀、习仲勋的批判。会上康生诬蔑小说《刘志丹》是反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宣读了康生写的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于是由康生负责，组织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原陕北的一些负责人，制造了株连近万人的大冤案。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把他1957年以来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进一步发展，更理论化、纲领化了。全会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写进了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有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

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毛泽东还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号召。这种思想对此后党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影响更大，“左”的偏差愈来愈严重，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还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各 21 人，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书记处书记。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考虑到“反右倾”斗争给经济工作带来的干扰，接受了刘少奇等人的建议，在会上提出了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继续按原计划调整国民经济成为可能。这时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还未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李起民）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Shehuizhuyi jiaoyu yundong)也叫四清运动。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发动的在农村和城市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湖南、河北等地开始整顿人民公社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保定地区称为“四清”，即清理帐目、仓库、财物和工分（人们称之为“小四清”）。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做法，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城市进行“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5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估量，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全国面临着出现“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的危险前景。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的运动。按照这一文件的精神，各地开始试点。9月，中共中央根据试点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经11月14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发出。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在全国铺开，派出大批工作队，向干部和群众逐条宣讲“双十条”。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估计，认为城市企业和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提出了进行夺权斗争的任务。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刘少奇主持修订并经毛泽东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这个草案对形势估计更为严重，认为“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是拉拢腐蚀干部和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这次运动比土改更广泛、更复杂、更深刻，有些地区要进行所谓“民主革命的补课”；整个运动要由工作队领导，全国由中央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高等院校师生抽调百万人组成工作团领导和参加社教运动。基于“左”的估计，运动中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造成了许多错案。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下达后，1964年下半年以来“左”的偏差有了部分纠正，解放了大部分干部，逐步实行了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但是，这个文件仍然把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并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提法，以此作为运动斗争的矛头所向，要整的重点。这就为尔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提供了依据。这一文件规定全国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六七年内搞完。实际至1966年夏秋，“文化革命”起来后即结束，全国开展过四清的县、社约占三分之一。四清运动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基本方面是错误的，但在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李起民）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Pingxinbian lishiju hairuibaguan)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署名的政治批判文章。《海瑞罢官》是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而于1960年底写成的剧本,1961年1月由北京京剧团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全剧共九场,主要是宣扬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精神。从1962年开始,江青就向毛泽东吹风说《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问题,要批判。1964年康生又诬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和批彭德怀有关。起初毛泽东不同意,后被“说服”了。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泡制,由姚文元执笔写成,历时八个月,一直背着毛泽东以外的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该文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视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因而把《海瑞罢官》打成了“一株毒草”。这同当时毛泽东把文艺界视为“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思想是符合的,所以毛泽东支持该文发表。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关锋谈话时还指出:“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姚文发表后,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不明毛泽东意图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未表示同意,全国各大报纸在一段时间内也未予转载。中共北京市委予以抵制,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时加了按语,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同一天,《人民日报》也在转载姚文时加了根据彭真意见写成由周恩来修改过的按语,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要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同时把姚文放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刊登。此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接连刊登了几篇学术讨论的长文。这不但激怒了江青一伙,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姚文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李起民)

“二月提纲”

(eryuetigang) 1966年2月中共中央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该小组是根据毛泽东提议于1964年7月成立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面对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在学术领域恶性膨胀起来的左倾思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1966年2月3日召开扩大会议，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及胡绳、许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11人出席。彭真主持会议，首先说明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系，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等。2月4日由许立群、姚溱起草了这个提纲。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五人小组汇报，通过了“二月提纲”。2月8日彭真等专程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月12日中共中央作为中央文件批转下发。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中宣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左”的提法和词句，但在当时条件下主要是试图把已经展开的批判约束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和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不赞成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所以提出了“摆事实，讲道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等主张。

(李起民)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Budui weiyi gongzuozuotanhuijiyao) 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林彪支持下，江青在上海邀请军队的四位文艺工作和政治工作方面的领导人座谈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后写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的中国文艺事业，抛出了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提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从2月下旬至3月下旬三次对《纪要》作了修改和补充。3月19日经毛泽东同意，江青将之送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4月10日中共中央予以批准，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纪要》的贯彻推行，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纪要》成了林彪、江青一伙在文艺界搞法西斯专政，打击迫害文艺工作者的合法理论根据。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1979年3月26日的请示报告，明令撤销这个《纪要》。

(李起民)

“五七指示”

(Wuqi zhishi)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在信中提出了对人民解放军、工人、农民、学生等的要求，说解放军应该成为“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所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封信，体现了毛泽东对即将发动的文化革命的设想从批判旧世界中所建立的“新世界”的向往与憧憬。

（李起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zhonggong zhongyangzhengzhiju kuoda huiyi)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会议。出席76人，包括中央“文化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会议根据毛泽东指示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揭发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早在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就以“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的莫须有罪名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同年12月8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以“反对突出政治”“篡党反军”的罪名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1966年春，陆定一以“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罪名，彭真以搞“反革命政变的头目”等莫须有罪名被批判。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和根据会上的所谓揭发材料整理的六个附件。5月18日林彪发表了大谈古今中外“政变”史和鼓吹个人崇拜的讲话。5月23日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5月24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问题。会议的第二件事是5月16日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正式宣布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以及“二月提纲”，决定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康生为顾问。8月2日中共中央又任命陶铸为顾问。“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越来越大，本身的人事也发生很大变动，1967年初逐步代替书记处成了江青一伙的一统天下，接着又取代政治局，夺取了处理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大权，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通知》给“二月提纲”罗织了十条罪状，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对文化革命“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等，并认为同“二月提纲”所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将来面貌和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通知》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的极端脱离实际的估计出发，要求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同时提出这些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

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种估计和论点，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及其根据，也是后来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这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一步，一方面在组织上清除了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障碍，成立了实际指挥班子，另一方面为“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针。这就表明“左”的错误方针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李起民）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nie yuanzi deng qiren dedazibao) 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署名在校内贴出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点名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副书记彭珮云。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号召人们起来“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张大字报是聂元梓等人在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授意下写成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夜，周恩来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聂元梓等人。5月26日康生得知周恩来的态度后，要走了大字报底稿，并背着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将它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5月31日毛泽东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当晚，经毛泽东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这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宣称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诬蔑市委和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党”，鼓动人们起来造党委的反，还别有用心地声称“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6月4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新市委关于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冲垮的党组织。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开始在全国燃烧起来。

(李起民)

红卫兵运动

(Hongweibing yundong) 红卫兵最早是在北京的中学生中成立的狂热的青少年“革命造反”组织。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些高年级学生组织了红卫兵，从6月初起，其他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东风等组织。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宣称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以后他们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托江青将他们给毛主席的信及前两张大字报转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复信，肯定他们的行动，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将他们的信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全文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与会者。8月3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到钓鱼台看了毛泽东的信。他们惊喜若狂。从此这封信不胫而走，“造反有理”的口号迅速传开。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泽东身着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成了红卫兵的最高统帅。从此，红卫兵组织从中学扩展至大学，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

(李起民)

“扫四旧”

(Saosijiu) 中国红卫兵是以“扫四旧”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们在林彪 8.18 讲话号召人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煽动下，从 8 月 19 日北京的红卫兵就走上街头，展开了疯狂的大破坏。他们狂热地涂抹原有街道、商店的路标、字号，大改原有的他们认为属于“四旧”的地名、店名、校名、医院名等，改为“反帝路”、“反修路”、“反修医院”、“立新商店”、“工农兵医院”、“红卫兵战校”等；他们野蛮地焚烧古代典籍，撕毁文物字画，毁坏名胜古迹；他们把党政领导干部，比较知名的专家、学者、民主人士，以及部分群众统统视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牛鬼蛇神，随意揪斗、游街示众、抄家、殴打侮辱，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伤致残致死，实行所谓“群众专政”“红色恐怖”。这一切，都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电台赞扬，社论肯定，使“扫四旧”迅速扩展到全国。据不完全统计，1966 年 8、9 月间，北京市被打死 1700 多人，被驱逐出北京的 8.5 万余人。北京市大兴县 13 个公社 48 个大队，1966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共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 325 人，有 22 户被杀绝。全市被抄家的 33695 户，被查抄的金银及其制品按当时牌价折算为 1226 万元，现金、存款、公债、外币 4478 万元，文物、字画、陶瓷器等 72 万件，图书 235 万册，其他财物变价 1857 万元。仅从北京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 117 吨，从造纸厂抢救出的图书资料 320 万吨。从 8 月 23 日至 9 月 8 日，上海红卫兵在全市抄家 84222 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教师 1231 户。从 8 月中旬至 10 月 3 日全国从城市赶走所谓“牛鬼蛇神” 39.74 万人。非法抄家中没收的财物，计黄金 119.8 万两，白银 30.6 万两，银元 978.9 万块，美钞 355.3 万元，英镑及其他外汇 373.9 万元，现金、存款、公债等 4828 万元，金银首饰等物约 171.9 万件，古物 1000 万件。至于摧残各民主党派更是骇人听闻。民主党派（民建不在内）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红卫兵揪斗或抄家的 100 人，占总数 36.5%。从 8 月 25 日起各民主党派被迫停止办公（以上材料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1 月版《中国现代史》下册）。“扫四旧”的参加者，虽然并不都是红卫兵，然而它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扫四旧”是对国家法制的肆意践踏，对文化的一场浩劫。1966 年秋季的红卫兵及其他“造反者”的打砸抢抄抓，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

（李起民）

“大串连”

(Dachuanlian) “文化大革命”初期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一种群众运动，完全符合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意图的大动乱。早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就提出各地学生去北京应该免费。约从7月下旬开始，每天均有上千学生到北京中南海反映文化革命情况，实际成了串连。8月16日陈伯达对外地来京学生讲话，赞扬他们的行动。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的百万人大会，实际是一次号召大串连的大会。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各地师生及红卫兵1100余万人。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的师生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中央文革”又鼓动、指使“造反派”赴全国各地串连，建“联络站”，煽风点火，冲击党政军机关，揪斗领导干部。这种数以千万人计的乘车、吃饭、住宿不要钱的全国性大串连，古今中外没有先例。后来又有工人到北京串连和到各大城市串联。由于交通十分拥挤，火车不堪重负，中央又提倡步行，于是无数的“长征”队，纷纷到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韶山等参观。经中央三令五申，到1967年春基本停止串连，但有些人甚至到1968年才回到原单位。

(李起民)

“一月上海夺权”

(Yiyue Shanghai duoquan)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策划下上海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的事件。早在1966年冬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林彪、江青就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集中力量攻击中共上海市委。11月9日成立了以王洪文（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副科长）等人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我们要夺权”。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对工总司不予承认。工总司蓄意制造事端。11月10日王洪文纠集数千人在上海郊区的安亭车站卧轨拦车，制造了使沪宁路中断30个小时的“安亭事件”。11月13日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到沪处理，承认工总司是“革命合法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1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的处理。工总司的成立，在全国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江青一伙更加放肆地煽动工人起来“造反”。接着，12月30日张春桥又支持王洪文等人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即王洪文调集10万人围攻聚集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院内要求曹荻秋接见的万余名工人赤卫队队员（“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队”，简称赤卫队，12月6日成立），打伤91人的武斗流血事件。这一事件又开了一个以武斗流血进行夺权的恶劣先例。这一事件也是全国武斗的开始。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根据毛泽东“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意图，宣称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月2日毛泽东讲“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1月4日、5日上海“造反派”接连夺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分到上海，策划夺权。1月6日以上海市32个“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大会，批斗、打倒陈丕显、曹荻秋，还把几百名干部揪到大会陪斗。大会发出《通令》，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1月8日，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这次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这些谈话，实际是对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予以高度评价。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称赞他们的“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夺权，由《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传达了毛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张春桥、陈伯达等人得意忘形，把上海夺权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相比，称为“一月革命”，把他们成立的全市政权组织叫做“新上海公社”，二月初又改名“上海人民公社”。2

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经毛泽东批准成立。2月24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张春桥为主任。从上海夺权开始，全国掀起了夺权的狂风。继上海之后，山西（1月14日）、贵州（1月25日）、黑龙江（1月31日）、山东（2月3日）、北京市（4月20日）、青海（8月12日）、内蒙古（11月1日）、天津（12月6日）等省市自治区被“造反派”夺了权，宣布组成“三结合”（“革命干部、军队、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全国各地各级组织普遍进行“夺权”。全党全民都卷入“文化大革命”，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许多地方发展为武斗，许多军队领导机关和军事院校也受到冲击。夺权、武斗更加深了混乱局面。

（李起民）

“二月逆流”

(Eryue niliu)在1967年1月中央军委会议上和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议上，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的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意志，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一伙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被诬称为“二月逆流”，实际可称为“二月抗争”。1月11日林彪批准同意关锋等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1月19日、20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林彪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一伙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盛怒之下震裂了右手掌骨。2月14日、16日在两次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上，又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4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责问康生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还质问他们：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叫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怂恿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16日下午的会上，谭震林责问张春桥，要他保陈丕显。张春桥推说“群众不答应”。谭震林打断他的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说着站起来，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谭震林说：我从上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陈毅说：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当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汇报。2月17日谭震林写信给林彪，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拚一下。”林彪将信送给毛泽东。2月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尖锐、激烈地批评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5日至3月18日连续召开七次“政治生活会”批判他们。同时，林彪、江青等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夏辟逆流”的浪潮，由北京开始，迅速传遍全国，更

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在 1968 年 10 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1969 年 4 月的中共“九大”上，林彪、江青一伙都一再批判“二月逆流”。但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说这些老同志是“阳谋”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1971 年 11 月 14 日还讲过为“二月逆流”平反的话。

（李起民）

九一三事件

(Jiuyisan shijian)林彪等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乘飞机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境内的事件。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之后，林彪自以为反革命集团已形成，便阴谋抢班夺权。先是在 1970 年 8 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企图当国家主席。不成，又利用林立果（林彪之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为头目的法西斯组织“联合舰队”，制定《“571 工程”纪要》（1971 年 3 月），阴谋举行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主席，夺取国家最高权力。毛泽东、周恩来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并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这次政变。9 月 13 日零点 22 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九人在山海关机场乘民航 256 号三叉戟仓皇出逃，3 时许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 10 公里处。晨 3 时左右，林彪集团的另一部分亲信从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飞机北逃，上午被迫降在怀柔县境内。林彪的出逃和折戟沉沙，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破产。

（李起民）

中美建交

(Zhong mei jianjiao) 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经历了15年没有结果。尼克松任总统后，美国开始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触。1971年4月10日至17日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公告。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问中国，28日在上海发表两国《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依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双方声明，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大国在世界划分利益范围。双方讨论了扩大两国人民在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问题。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就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联合公报的发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两国间扩大交往开辟了前景。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李起民)

中日建交

(Zhong ri jianjiao)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外务大臣大平正芳陪同下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同田中角荣举行多次会谈。2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角荣。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联合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日两国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两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双方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10月23日起生效。

(李起民)

“四五运动”

(Siwu yundong) 1976年“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首都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举国痛悼。但是，“四人帮”违背人民意愿，不但继续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反对周恩来，千方百计阻止人们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人民被激怒了。从3月19日开始，首都人民陆续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悼词、悼诗，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悲痛地抒发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表示人们对他们的愤怒。4月4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估计这天到天安门广场者达200万人次，有1073个单位送了2073个花圈。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制作了一个大的铁花圈送到广场。中国科学院109厂在纪念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牌，上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十分引人注目。目睹广场情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为之感动而落泪。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政治局意见，于4月2日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三层小灰楼内设立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决定抽调人员，准备镇压。当晚，政治局开会，认为天安门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反击；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抓“反革命”；调动民兵、公安人员在广场周围阻止群众送花圈和集会；调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会议决定得到毛泽东批准。4月5日凌晨广场的花圈被洗劫，看守花圈的人被抓。6时许，人们群情激愤，有人故意挑逗群众，并逃向人民大会堂。人们涌到大会堂东门外，几十万人齐声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一辆广播车因诬蔑群众悼念活动，被人们推翻，砸了喇叭。中午群众烧着了指挥部的上海牌轿车一辆，下午3时许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群众冲入指挥部楼内，小灰楼起火。愤怒的人群同民兵和警卫战士发生冲突。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晚6时25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声言有“极少数别有用心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9时35分，原先集结待命的民兵10000人，公安干警3000人，卫戍部队五个营分别包围广场，用木棍对尚未撤出的群众进行毒打，并逮捕数十人。4月6日凌晨部分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后，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动性质”。4月7日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姚文元组织写的《人民日报》记者的所谓“现场报告”，诬蔑天安门群众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当晚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两个决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随后，根据中央指示，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决定，开始追查“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勒令群众将传抄的诗词交出。一大批无辜群众被拘捕、判刑。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一地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即达388人，受株连的则以万计。其中副部长、军以上高级干部有30多人被牵涉。以天安门广场事件为中心的这次全国性的抗议“四人帮”的运动被镇压了，但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怒火。这个运动反映了人民的觉醒。实质

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46-1.bmp}

（李起民）

粉碎“四人帮”

(fensui “ si ren bang ”) 揭露和挫败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重大历史事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毛泽东称之为“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林彪相勾结，煽动极左思潮，大搞个人崇拜，掀起“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逆流，尤其他们的大反周恩来和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弄得天怒人怨。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后，他们加紧策划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以上海为基地准备武装叛乱。10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当时党中央领导人是“修正主义分子”，大造夺权舆论。他们拟定了政变后党和国家人选名单，还插手军队，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的两个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车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四人帮”的亲信们到处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在这紧急关头，华国锋同叶剑英等磋商，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和具体部署，决定以召开会议的形式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10月6日下午1时发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通知，并扩大范围要姚文元参加。晚8时，王、张、姚依次来到会场(中南海怀仁堂)时，华国锋一一宣布了对他们隔离审查的决定。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对江青、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实行隔离审查。耿飚奉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新华社、中央电台等宣传机关。接着，召开政治局会议，10月7日凌晨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立即传达到全党。由于“四人帮”的被审查，再加上中央的周密部署，“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王秀珍等策动的武装叛乱也顷刻瓦解。这样，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李起民)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guanyu zhenli biao zhun wentide taolun)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一场原则争论。1976年10月以后，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华国锋，思想上仍然坚“左”的错误路线，阻碍拨乱反正的进行。他不但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干部党员“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而且在他批准的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正式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这就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对“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出来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这是对“两个凡是”方针的最早的批评。但是，华国锋一再重申“左”的错误理论，并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说明，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了邓小平复职的决定，“十一大”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口号、方针并未纠正，“两个凡是”的思想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这样，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和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共“十一大”之后，老一辈革命家们开始写文章阐述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中强调“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1977年11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主持讨论关于“文革”的研究提纲时，指出，“研究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脑袋”，“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大地之子》一书第122—123页）他又直接领导在党校创刊了《理论动态》内部刊物，探讨问题，大胆地向一些禁区冲击。1978年5月《理论动态》第60期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经过胡耀邦审阅定稿后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文章首先说明：“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接着分四个标题加以论述。最后指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干部、党员、知识分子受到启发，感到思想获得解放。也有些人有些疑惑，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是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也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的责难，认为是“砍旗”、“丢刀子”。由于这篇文章有邓小平等的支持，这些责难和阻挠，未能阻止讨论

向深入发展。这次讨论涉及各个领域和许多问题，但主要是围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进行的。尽管这应该是个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问题，但在当时“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还未打破的条件下，确实具有打破精神枷锁、解放思想的作用。它使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使党有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思想基础。

（李起民）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Zhongguo gongchandangdishi yijie sanzong quanhui) 这是一次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的会议。经过 36 天工作会议后于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全会根据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及邓小平讲话,确定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重大决策。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为端正思想路线是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解放思想是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前提。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着重指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我们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及时地、果断地宣布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 1979 年 1 月起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和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就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同阶级斗争的关系。对于还存在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决策。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出的错误结论。会议指出,要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建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全会讨论了民主和法制问题,提出了健全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会议认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全会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以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中央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胡耀邦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为副秘书长。宋任穷任组织部长。汪东兴不再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决策和一系列决定，表明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不但结束了1976年以来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而且将中国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引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李起民）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gongshen linbiaojiangqingfangeming jituanan)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审理。确认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并形成了一个反革命联盟。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和已经死亡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的。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国家领导人，诬陷迫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和破坏军队，镇压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群众，毒害广大青少年，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前后共达十年之久，殃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特别严重的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特别法庭按照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审理他们的刑事犯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不审理各被告人的不属于刑事犯罪的其他问题。特别法庭根据他们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法于1981年1月23日做出终审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陈伯达、黄永胜、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吴法宪、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是正义的、历史的审判，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意志。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48-1.bmp}

(李起民)

“一国两制”

(Yiguo liangzhi) 中国政府为合理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而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个构想是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至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会见知名人士傅朝枢的谈话期间逐步形成的。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统一祖国的9条方针，则使其内容更具体化。其中建议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1982年9月下旬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首次使用了“一国两制”说法。此后他又讲过多次。其基本含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的主体。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4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一政策。根据这一构想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澳门问题。1982年9月起中英两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开始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1985年5月27日正式生效。联合声明规定：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恢复行使主权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987年4月13日中国、葡萄牙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确定：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李起民)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Zhongguogongchandangdishierciquanguo daibiao dahui)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和在组织上实行新老交替的大会。邓小平致开幕词，回顾了党的历史，明确了大会的任务，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他还指出了八十年代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三大任务和本世纪最后20年内应抓紧做的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胡耀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还实事求是地阐明了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部署及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蓝图。大会审议、通过了胡耀邦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新党章在组织制度上有重要改变，即不设中央主席、副主席，只设总书记；在中央、省市自治区设立顾问委员会，以便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设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选举出中央委员会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2人。9月12日、13日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批准了中顾委、中纪委人选，邓小平为中顾委主任，陈云为中纪委第一书记。

（李起民）

1987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yijiubaqinian zhonggong zhongyang zhengzhiju kuoda huiyi) 在 1986 年底部分城市发生学潮后召开的。 1987 年 1 月 16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20 人，中央书记处书记 4 人，中顾委委员 17 人，中纪委负责人 2 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胡耀邦在会上检查了他担任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会议要求全党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 年 10 月 20 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李起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Zhongguogongchandangdishisanciquanguodaibiaodahui) 1987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列席来宾 96 人， 400 名新闻记者采访大会。这是一次系统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据此制定全面改革纲领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大会。邓小平宣布大会开幕。赵紫阳代表中央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分为七个部分，主要说明深化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说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它的初级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坚持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党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49-1.bmp}

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报告将我国经济建设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当前是要走好第二步。为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着重解决好三个重要问题：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报告在“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这部分中，列举了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的理论观点，认为它们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核心的问题是要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其中关于第二十一条第五段“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大会还通过了中顾委、中纪委的工作报告。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175 人，候补委员 110 人。中顾委委员 200 人，中纪委委员 69 人。11 月 2 日十三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 17 人：万里、田纪云、乔石、江泽民、李鹏、李铁映、李瑞环、李锡铭、杨汝岱、杨尚昆、吴学谦、宋平、赵紫阳、胡启立、胡耀邦、姚依林、秦基伟；候补委员丁关根 1 人。政治局常委 5 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书记处

书记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候补书记温家宝。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全会批准了中顾委、中纪委人选。中顾委主任陈云，中纪委书记乔石。

（李起民）

世界上古史

世界上古史

(shijie shanggushi) 世界通史的开篇，人类社会发轫期和最初发展期的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世界上古史是世界范围内的原始社会与奴隶制社会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它的上限自地球上出现最初的人类时起，下限延至公元头几个世纪奴隶制生产方式在各地普遍解体时止，计时间长度约 200 万年，为世界通史体系中最巨长的段落。其中，原始社会至少占去 99% 以上的时间。与如此漫长的历史相比，近现代史仅是短暂的一瞬。

对于这段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存在如下一些基本认识：原始社会是人类所经历的第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工具从最简陋的打制石器开始，生产从最原始的狩猎采集发端，人类不得不强烈地依附于自然界，只能靠血缘纽带联结的公社才能得以生存。因此，血缘集体所有制或原始公有制构成原始社会中唯一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公社组织的管理实行原始民主制。然而，随着新石器革命在约 1 万年前的出现，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随之产生，定居生活成为可能，剩余产品日积月累，社会分工逐渐展开，原始公有制已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于是，个体劳动代替集体劳动，私有制逐渐排挤并取代公有制，阶级、等级关系渐次代替血缘关系，原始社会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至金属工具产生时，这一过渡得以完结，奴隶占有制国家从狭隘的氏族部落组织脱胎而生。

根据现有材料，奴隶制社会最初独立形成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约公元前 4000 年代末或前 3000 年代初），继之在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分别出现（约公元前 3000 年代末或前 2000 年代初），接着向世界其他地区广为扩展。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有些地区和民族可能超越奴隶制社会阶段，但就古代几大文明地区发展的一般趋势而言，奴隶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

奴隶制社会具有多种生产关系，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奴隶制生产关系。这一关系在古代不同时期、地点的表现形式不尽一致，但其基本特点是奴隶生产者本身为奴隶主个人或集体以及国家的财产，是主人手中会说话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奴隶制社会中阶级对立的基本形式之一是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奴隶主阶级正是依靠直接剥削奴隶才保证了自己对整个社会的统治。此外，奴隶制社会中还存在一些其他生产关系，存在大量独立、半独立或依附身分的小生产者阶级，他们同样受着统治阶级直接、间接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奴隶主统治阶级同广大小生产者阶级构成另一对本质上对立的阶级。这一对立通常以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等级斗争形式表现出来。

奴隶主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不断统治，采取多种统治形式，如君主制、君主专制、寡头制、贵族共和制、公民民主制等，但其国家的本质仍是奴隶主阶级的专政。随着各地阶级、等级斗争的尖锐化，古代世界各个地区带有不同程度民主成分的国家政体均被君主专制所取代。

奴隶制是最残忍的剥削制度，奴隶的生命几乎毫无保障。古代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克里特有人殉，罗马有角斗士。但这一制度的出现打破了原

始社会的狭隘关系，促进了劳动分工，推动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进步，奠定了人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成果，因此奴隶制社会的出现乃是充满痛苦的一种历史进步。

奴隶制社会的繁荣时间在各地因具体条件的差异有所不同。在埃及是新王国时期（前 16—前 11 世纪），在两河流域是乌尔第三王朝（前 2200）和新巴比伦王国（前 7 世纪末—前 6 世纪），在希腊是古典时代（前 5—前 4 世纪），在罗马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至早期帝国（前 2 世纪—公元 2 世纪）。但是，奴隶制社会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和尖锐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发展余地毕竟十分有限，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窒息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奴隶制逐渐被在一定程度上解放生产力的封建制所代替。大约在公元头几个世纪，世界各地的一些奴隶制社会均已瓦解，其残余形式保留下来，并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北美、加勒比岛屿和巴西得到复兴和异常发展。目前在世界个别国家仍可看到部分残余。

从世界范围内编纂世界上古史属于 20 世纪初叶。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以及信息存储、传递手段的巨大进步，专业历史工作者的视野扩大到世界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学、民族学、古人类学、埃及学、亚述学、中国学、印度学、古典学等学科的跃进，材料收集、整理、诠释的成果已达到全面总结、架构、解释的阶段。于是在本世纪初西方学者首先开始编写多卷本世界上古史，代表作有 1928—1938 年出版的英国《剑桥古代史》等。本世纪中叶以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编写世界上古史的条件也已成熟，在社会主义国家相继问世了一些有关著作，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头两卷。需要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内部，对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普遍性的认识远非一致。部分人认为这一形态仅在古代世界的局部（如古希腊、古罗马）占据过主导地位，古代东方并非奴隶制社会。也有人认为古代世界完全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

（郭小凌）

人类起源

(renlei qiyan) 人类在生物学方面的形成过程。揭示这一过程是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此前，尽管人们已提出人类进化问题，但还处于任意假设阶段，上帝造人等特创论在世界各地占绝对统治地位。1859 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说明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动植物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具有划时代意义。翌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明确提出人猿共祖论，指出新认识的方向。此后，进化理论不断完善，古人类化石相继发现，人类起源于动物界的观点逐渐得到学术界普遍承认。根据目前化石材料，人类起源过程可分作三大阶段：1. 古猿阶段，即尚未向人转化的纯粹动物的祖先阶段。20 世纪发现的属 2000 万年前左右的少数古猿化石，如埃及猿、森林古猿可能是人与现代类人猿的共同祖先。2. 正在形成中的人阶段，即亦猿亦人阶段。直立行走、能使用简单工具是具有人的新质的基本表现。其化石代表是属 1400 万—700 万年前的拉玛古猿和 400 万—100 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其中，南猿的一支已肯定为人类直系祖先。3. 完全形成的人阶段，即能制造工具的人阶段。古人类化石链至此越来越完整。该阶段包括猿人和智人两大时期，它们又分别析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段落。早期猿人（约 200 万—150 万年前）的化石代表为在非洲发现的能人。脑量达 500~800 毫升，身高约 1.2~1.4 米，直立行走，大概已有语言能力，能打制砾石工具。晚期猿人（150 万—30 万年前）化石代表为爪哇人、北京人、海德堡人。脑量增大，身高约 1.5 米，面部、牙齿较早期小，打制的石器已可分类，能用天然火，猎取较大动物。早期智人（30 万—5 万年前）又称尼人，化石典型是尼安德特人、圣沙拜尔人、马坝人等，广为分布在旧大陆。生物学上特点是脑量约 1350 毫升，体型体质接近现代人。物质文化方面发明打制石片、修理石核新技术，能制石头弹丸、骨器，可人工取火。晚期智人（5 万年前至今）又称智人、现代人。化石遍布新、旧大陆。人类进化过程相对而言已完成，世界三大人种形成，物质文化发生空前进步，经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金属器时代、机器时代，经济类型从采集狩猎到定居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现代工农业、商业。严格地说，人类生物学方面的进化仍在继续。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动因是多方面的，自然地理条件、遗传变异、人类形成前后为生存而从事的劳动等都是重要因素。

(郭小凌)

原始社会

(Yuanshi shehui) 这一术语有时与“前阶级社会”、“史前社会”并用，特指人类普遍经历的第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原始公社制形态。这是人类社会历时最久的形态，起点至少在二三百百万年前，终结于约5000年前左右。其特点是生产力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以打制石器为主，人们被迫结合在以血缘为纽带联结的狭小共同体中，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社会管理以公有制和利害一致的集体为基础，实行原始民主制，个人严格服从集体，社会关系靠传统、习惯、原始宗教来调整。原始社会在漫长演进过程中，表现形式肯定是不一样的。然而由于材料的局限与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别，原始社会的分期或阶段划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各种不同分期法均建立在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在我国较为流行的是两分法，即将原始社会分为血缘家族公社（或原初公社、前氏族公社）和氏族公社两大段。氏族公社段本身又包括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前者为原始公社制的繁荣期，后者为衰落期。血缘家族公社可能存在于二三百百万年前至5万年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婚姻关系发展到有所限制的族内婚，如班辈婚。氏族公社时期可能相当于旧石器晚期以及新石器时代，乃至铜石并用时代。社会转化为由出自共同祖先、彼此不能通婚的人们结合而成的许多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若干氏族组成一个部落。当血缘家族从族内婚转为族外婚时，世系只能按母系计算，因此氏族最初是母系氏族。当时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男女地位平等，不存在所谓妇女统治的现象。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明，剩余产品出现，社会分工深化，男子逐渐成为生产领域主要劳动力，妇女则从事家内劳动，族外群婚上升为对偶婚，家庭在氏族中突出起来，形成自己利益，母系氏族最终被父系氏族取代。父系氏族公社是氏族制解体形式。此间个体劳动代替集体劳动，一夫一妻制确立，剩余产品增多，为私有财产的产生、确立以及剥削他人创造了条件。动产与不动产的私有化开始，从氏族部落外部获取奴隶并进而把同族人变为剥削对象的过程展开，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现象。社会渐渐分裂为利益不同的阶级和等级，氏族民主制因而向国家转化，终于蜕变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组织——国家。原始社会在世界各地解体和国家的产生过程在古代、近代、现代均发生过。最早解体的地区是尼罗河、两河、黄河、印度河流域与爱琴海岛屿（约公元前4000年代末—前3000年代末），以后是希腊半岛、小亚细亚、腓尼基、阿拉伯南部等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000年，旧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和新大陆美洲的中部均出现国家，原始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瓦解。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原始社会史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它的基本理论认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总结、改造、发展摩尔根思想之后形成的。一百多年来，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史工作者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极大丰富、充实了人们对原始社会的认识。

（郭小凌）

古埃及史

(gu aijishi) 古代埃及奴隶制社会的历史。“埃及”一词最早出自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诗中称尼罗河流域为埃古普托斯。古埃及人自称他们的居住地为克迈特(Km.t, 黑色的土地), 以示与周围沙漠的区别。现代史学工作者主要根据公元前3世纪埃及史家曼陀的记载, 将古埃及史划分成9个大的阶段: 1. 前王朝时期(约前4500—前3100), 铜石并用时代, 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并进而形成最初的所谓“诺姆”国家。2. 早王朝时期(1—2王朝, 约前3100—前2686), 小国分立结束, 形成统一国家。3. 古王国时期(3—6王朝, 约前2686—前2181), 君主专制确立,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明确化, 国王大规模修筑金字塔, 因而又称“金字塔时代”。4. 第一中间期(7—10王朝, 约前2181—前2040), 统一王国解体, 社会发生大动乱。5. 中王国时期(11—12王朝, 约前2040—前1786), 青铜时代始, 国家重新统一, 社会基本结构未变。6. 第二中间期(13—17王朝, 约前1786—前1567), 再次分裂, 阶级矛盾尖锐, 爆发贫民、奴隶大起义。外患接踵而至, 喜克索斯人从亚洲侵入埃及, 建喜克索斯王朝。7. 新王国时期(18—20王朝, 约前1567—前1085), 青铜时代全盛期, 随后铁器时代来临。埃及奴隶占有制社会达极盛, 跨北非、西亚的埃及帝国形成, 王权与神权的斗争引起埃赫那吞改革。8. 后王朝时期(21—31王朝, 约前1085—前332), 埃及陷入长达400年的混乱, 几个王朝分立。从26王朝(前664—前525)始, 埃及多次沦入异族统治之下。最初是利比亚人建利比亚舍易斯王朝。公元前525年波斯征服埃及, 设行省。9. 从公元前332年起, 先后成为希腊人所建亚历山大帝国与托勒密王国的领土, 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古埃及史的创造者基本是属于哈姆语系的单一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创造活动中, 他们获得了许多思想文化成果。宗教上以拜日教为主的多神教, 象形文字, 建筑、雕刻、绘画艺术, 天文学、医学、数学知识的积累都是这些成果的写照。古埃及史得以恢复主要赖于考古发现的实物与文字史料, 古希腊、拉丁文献也可资借鉴。在编纂古埃及史的过程中, 象形文字的破译是关键性的突破, 这项任务是由法国古文字学家商坡良于1822年完成的, 它标志一门以古埃及历史、文化、古物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埃及学的诞生。

(郭小凌)

金字塔

(Jinzita) 古代埃及王陵。原名不详，古希腊人称之为“庇里穆斯”(Pyramids)。金字塔为中文转译，因其形似中文的“金”字。目前残存金字塔 70 余座，分布在尼罗河西岸的基泽和萨卡拉一带。古埃及国王营造金字塔有宗教和政治原因。金字塔为国王在冥世永久生活的住所，其巨大规模表明国王死后同在世时一样享有至尊至圣、压倒一切的权威。金字塔始建于古王国第 3 王朝乔赛尔统治时期，建筑师伊姆荷太普在传统长方体陵墓基础上为乔赛尔在萨卡拉造起 60 公尺高的层级金字塔，从而开始兴建这种大型王陵的热潮。第 4 王朝的首位国王斯尼弗鲁变层级金字塔为角锥体金字塔，确立了后来金字塔的形式。现存最大金字塔群位于开罗附近的基泽，由胡夫、哈夫拉、孟考拉三座金字塔组成，其中以斯尼弗鲁之子胡夫墓最大。金字塔内部结构复杂，有墓道、墓室，饰以各种雕刻、绘画作品。塔周围建有许多附属设施和臣属陵墓，构成一座死人城。哈夫拉金字塔前有长约 57 米、高约 20 米的哈夫拉人面狮身像，系一块巨石雕成，象征王权神圣。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建造金字塔要耗费无数财力、人力，毫无经济效益，因而给埃及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古王国末期埃及的衰败和内乱与此不无关系。除埃及外，美洲印第安人也建造过具有独特风格的金字塔。

(郭小凌) 法老 (Falao) 古埃及国王的称呼。出自古埃及文 *er-o*，在古希伯来文中译作“法老”，原意为“大房子”、“宫殿”。约中王国时期在某些颂词中用来称呼国王。在新王国 18 王朝时正式成为国王称号。至 22 王朝时为其他新尊称和头衔所代替。古埃及实行典型君主专制制度，法老是古埃及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总代表，集政权、军权、财权、神权于一身，自称阿蒙神或拉神（均为太阳神）之子，拥有支配臣民和社会财富的无限权力。在古埃及文献中，凡法老名字均被一椭圆所环绕，象征法老蒙受着太阳的辉映和庇护，君权神授。法老头戴红白双色冠，红色象征上埃及，白色象征下埃及，意为上、下埃及之王。

(郭小凌)

贫民、奴隶大起义

(pinmin nuli daqi yi) 古埃及中王国末期发生的大规模人民起义。反映这次起义的纸草材料《伊浦味陈辞》发现于萨卡拉墓地，现存于荷兰莱顿博物馆。该陈辞大概抄写于新王国末期，但语言据研究属更早时期。陈辞未交代起义的原因、过程以及具体人物，主要叙述的是起义的规模、景况和后果。用敌视起义的作者伊浦味的话说，埃及“大地象陶轮一般翻转起来”，“国家开始被一些不知法律的人夺去王权”。贫民和奴隶推翻法老统治，焚毁王宫，剥夺贵族和富人的权力、财产，将他们变为奴隶、流浪者、劳力者。原来的奴隶和贫民变成新的奴隶主，夺取原所有者的田产。整个天下大乱，杀戮盛行，旧秩序荡然无存。看来，起义沉重打击了中王国奴隶主阶级的腐败统治，为后来新王朝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郭小凌)

美尼斯

(Meinisi, Menes 或 Min、 Mena, 生卒年代不清) 古埃及早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其名出自希罗多德和曼涅陀的记载以及少量纸草材料,是古埃及成文史中最早的一位有名字的君主。据传原是上埃及阿卑多斯的统治者,约在公元前 3100 年征服下埃及,初步完成上下埃及的统一,开始古埃及史家曼涅陀所设王表上的第 1 王朝。在位 60 余年,建都白城,即后来的名城孟斐斯,并在上下埃及分设国库,谓“白仓”和“红仓”,收存在两地征得的赋税。传说美尼斯在一次河中狩猎时被鳄鱼吞食,死于非命。由于目前关于他的材料很少,他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尚难以确定。

(郭小凌)

图特摩斯三世

(Tutemosisanshi, Thutmose, 前?—约前 1450)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 18 王朝的法老之一, 因多次成功地进行掠夺战争而闻名于世。公元前 1504 年继位, 年仅约 10 岁。初由哈特舍普苏特王后代行主政, 公元前 1482 年亲政, 遂多次对外用兵。侵略方向集中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据说入侵该地区达 16、17 次之多。曾攻陷叙利亚各国联盟的中心城市美吉多, 击败强国米坦尼, 最盛时把疆域扩展到幼发拉底河。他还挥军南下, 溯尼罗河进攻努比亚(今苏丹), 将南部边界推到第四瀑布附近, 向西则吞并利比亚, 使古埃及帝国版图扩大到极限。作为剥削阶级代表人物, 他对被征服地区进行疯狂掠夺, 使大批奴隶、牲畜、钱财流入埃及。在国内极力扶持僧侣阶层, 赐予神庙许多地产、奴隶, 为后来僧侣势力的膨胀打下了基础。

(郭小凌)

古西亚史

(guxiyashi) 泛指东起伊朗高原,西至地中海东岸(包括小亚半岛),北依黑海、高加索山脉,南连阿拉伯半岛这一广大地区的古代奴隶制社会发生、发展、衰亡的历史。其编年范围大约在公元前 4000 年代末至公元 5 世纪。古代西亚同古代埃及不同,这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发展很不平衡,大体有如下三大类人:1.苏美尔人,古提人,加喜特人,原始赫梯人,其语言系属至今不清。2.属塞姆语系的阿卡德人,亚述人,阿摩列依人,迦南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以色列、犹太人),迦勒底人。3.属印欧语系的赫梯人,米底人,波斯人。其中最先进入文明史的是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他们是人类社会中最早步入文明、产生国家的民族之一。之后,西亚其他民族才陆续在不同的地区形成自己的阶级社会。在整个古西亚史中,两河流域地区因其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一直是古西亚人历史活动的中心舞台。早在公元前 4000 年代后期,即铜石并用时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便出现了约 17 个以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农村而成的小邦,较著名的有乌鲁克、乌玛、拉伽什、基什等。各国实行由原始军事民主制转化而成的早期君主制。国王(苏美尔人称之为“恩”、“恩喜”、“卢伽尔”)虽为一国之君,但权力或多或少受到贵族议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生产关系也表现为一种双重形态,正在发展的私有制与残缺不全的公有制并存。出现世界最早的楔形文字。苏美尔各国彼此为土地、财产、霸权而不断从事侵略或防御战争,对内则发展私有制,剥削本国自由民与奴隶,从而在内外矛盾中削弱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北邻阿卡德王国(前 2371—前 2191)军队乘机南下,其国王萨尔贡一世统一两河流域南部(巴比伦尼亚)及邻近地区,君主专制开始确立。约公元前 2190 年,东部山区的古提人灭阿卡德后,建新王朝。约公元前 22 世纪末,乌尔与乌鲁克起兵驱走古提人。继之,乌尔胜乌鲁克,在巴比伦尼亚建立新的统一国家乌尔第 3 王朝(约前 2113—前 2006),出现西亚奴隶制经济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形成利用大批奴隶劳动的王室大地产,君主专制牢固确立,产生西亚最早的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成文法典《乌尔纳木法典》。后来埃兰人和阿摩列依人入侵两河流域,乌尔第 3 王朝亡,苏美尔人及其语言逐渐消失,王室大地产崩溃,兴起了古巴比伦王国(约前 1894—前 1595)。汉谟拉比在位时(约前 1792—前 1750)两河流域大体统一,颁行世界第一部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后来古巴比伦王国被赫梯人所灭。之后 400 年加喜特人以巴比伦为中心立国,但留下的历史痕迹很少,直至亚述帝国(约前 1000 年代初—前 605)统一两河流域乃至西亚大部地区和埃及。亚述统治者建立庞大国家机器,对被征服地区疯狂掠夺,奴隶制得到较大发展。帝国最后在米底人和迦勒底人联合打击下灭亡,废墟上兴起新巴比伦王国(前 626—前 538),促成奴隶制的高度繁荣,奴隶劳动面广,形式多样,奴隶人数众多。公元前 550 年,波斯人在伊朗高原兴起,推翻米底人的统治,建立阿黑门尼德王朝。然后越出高原,灭新巴比伦王国,入主埃及、印度河流域西北部、中亚等广大地区,成为古代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庞大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的改革使帝国行政、财政制度定型。进入公元前 5 世纪,帝国与希腊城邦发生长期战争。公元前 334 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前 336—前 323)东侵,灭波斯帝国而代之亚历山大帝国。随后帝国分裂为几个由希腊人统治的王国,西亚为塞琉古王国(古代中译名为条支,前 305—前 64)所控

制。而后安息（前 247—226）崛起，占伊朗高原西部、两河流域、中亚南部，成新帝国。公元前 1 世纪，罗马灭塞琉古王国，与安息相持于幼发拉底河与叙利亚一带。226 年，波斯人推翻安息，建萨珊波斯王朝（226—652），走上封建化道路。国内一些学者把 5 世纪的马资达克起义作为古西亚史终结的标志。古代西亚人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苏美尔人发明了曾流行于西亚的楔形文字，腓尼基人创造出方便的字母文字，希伯来人的犹太教孕育了后来流行世界的基督教。至于古代西亚人在科学、文学、建筑、艺术方面的成果对后世也有重要影响。科学意义上的古西亚史研究出现于 19 世纪中叶。随着楔形文字的破译，形成一门历史学的新分支——亚述学，专门以使用楔形文字的古西亚人的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目前，大批古代城乡废墟出土，约 40 万块泥版文书得以发现，古西亚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西方一般认为古西亚存在的是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也有不少人认为那里并非有过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

（郭小凌）

古巴比伦王国

(Gu babilun wangguo, 约前 1894—前 1595) 古代两河流域重要的奴隶制国家。为便于同晚后时期的另一巴比伦王国区别, 史学界为其名之以“古”, 后者名之以“新”。由阿摩列依人始建于公元前 1894 年左右, 苏穆阿布姆为第一代王。初期为弱小国家, 在各国争霸中依附于其他强国。在第六代王汉谟拉比时后来居上, 大体统一两河流域, 成为当时西亚最强大的国家。两河流域在古巴比伦统治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较前期有所进步, 乌尔第 3 王朝时流行的王室奴隶制大地产消失, 私有奴隶制发展明显, 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关系十分突出, 出现一部内容较完备的法典(见《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死后, 古巴比伦王国衰落, 内外矛盾激化, 伊新、乌鲁克城发动起义, 奴隶流亡, 外部埃兰人、加喜特人、赫梯人乘虚而入。公元前 1595 年, 古巴比伦王国被小亚赫梯王国所灭, 但其都城巴比伦长期成为西亚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ewc MVIMAGE, MVIMAGE, !99900320_0355-1.bmp}

(郭小凌)

汉谟拉比法典

(Hanmolabi fadian) 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当政时制定的成文法典，旨在维护财产私有制，全面调整自由民之间的关系，巩固现存秩序。法典制定的确切时间不清，大概在公元前 1791 年或前 1790 年始拟，完成于巴比伦尼亚统一之后。汉谟拉比在位的第 35 年或 40 年用楔形文字刻写在一根高 2.25 公尺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昭示天下、后人。石柱现存于法国卢浮博物馆。法典包括序言、正文、结尾三部分。序言充满神化、美化汉谟拉比的言辞。正文包括 282 条法律，涉及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民法、刑法、婚姻法等内容，意在调解自由民之间的财产占有、继承、转让、租赁、借贷、雇佣等多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婚姻关系。法典表明古巴比伦社会存在奴隶主、奴隶、小生产者三个基本阶级，此外与阶级关系不尽一致的等级关系。自由民之间分为有权者阿维鲁和半有权者穆什根努两个等级。前者原意是“人”，享有一些特权；后者原意可能是“礼拜”，法律地位低下。法典对债务奴隶制和高利贷有所抑制，限制对小生产者过分的掠夺，以免动摇兵源和税源。法典对奴隶制予以严格保护，体现了法典的性质。结尾部分除继续对汉谟拉比歌功颂德外，还强调法典原则的不可改变性。法典的制定标志古西亚法律制度的进步，国家的成熟。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55-2.bmp}

(郭小凌)

汉谟拉比

(Hanmolabi , Hammulapi , 前?—前 1750) 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王, 约在公元前 1792—前 1750 年在位, 因统一两河流域与颁行法典的历史活动而著称。对其生平了解仅限于他当政后的文治武功。他是古巴比伦兴起为区域性大国的关键人物。即位后对外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策略, 远交近攻, 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对国家, 费时 35 年, 征服伊新、拉尔萨、马里等邦, 大体统一两河流域。对内推行缓和阶级矛盾、加强王权和发展经济措施, 抑制债务奴隶制, 使其在长期对外用兵中有相对稳定的后方, 促成国家繁荣, 巴比伦城变为西亚最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社会经济形势与阶级等级关系的状况, 在位期间制定了一部反映奴隶主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典(见《汉谟拉比法典》), 为后人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经济关系和西亚法律史提供了珍贵材料。

(郭小凌)

波斯帝国

(Posi diguo) 古代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下的庞大帝国，最盛时版图包括波斯高原、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印度西北部、中亚与欧洲部分地区。公元前 558 年，定居于伊朗高原的波斯人，在阿黑门尼德族首领居鲁士二世（约前 600—前 529）领导下，发动起义，于公元前 550 年推翻米底王国，建立阿黑门尼德王朝。巩固了在伊朗高原的统治后，居鲁士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公元前 539 年占领两河流域。公元前 529 年，居鲁士在迎击中亚游牧部落的战斗中身亡，其子冈比西斯即位（前 529—前 522）。他利用阿拉伯人的帮助，于公元前 525 年并吞埃及。因帝国形成过速，统治未稳，故广大被征服者伺机暴动。在冈比西斯滞留埃及期间，波斯全境发生各民族大起义，一个名叫高墨达的僧侣在伊朗高原僭位称王。冈比西斯回师西亚途中猝亡。阿黑门尼德族的大流士伙同六名波斯人谋杀高墨达，在贵族支持下成为帝国国王，史称大流士一世（前 522—前 485）。费时两年多，完全平定各地起义，并夺取印度河流域西北地区。为巩固政权，大流士一世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帝国行政体制、税制、币制和度量衡、兵制定型化，客观上有利于整个帝国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促进本来发展很不平衡的各地区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对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的延续起了重要作用。公元前 500 年，小亚细亚希腊城邦起义，希腊本土雅典等邦出兵支援，从而触发长达 43 年的希波战争。大流士一世先后两次入侵希腊失败，含恨病逝。其子薛西斯继位后仍对希腊用兵，遭更大惨败，从此波斯帝国走向衰落，统治集团腐败日深，内争激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帝国已无力对外扩张，只能勉强维持统治。公元前 334 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 35000 人发动东侵，腐朽的波斯帝国一触即溃，末代皇帝大流士三世被杀（前 330），帝国灭亡。波斯帝国是古代依靠暴力形成的君主专制大国的典型之一。波斯人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汉译又称拜火教、祆教）富有特色，广泛流行于中亚一带，并一度传入我国。

（郭小凌）

居鲁士二世

(Julushi ershi, Cyrus ,约前 600—前 529) 波斯帝国创始人, 因其祖父居鲁士同名, 故称二世。出身波斯贵族氏族阿黑门尼德族, 父名冈比西斯, 母为米底王国公主。早期身世富有传奇色彩, 古代史家把他描写为命定要灭亡米底的人物。少儿时便有帝王扮像。及长, 果然率波斯 10 部落起义, 于公元前 550 年推翻米底统治, 建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很快越出伊朗高原, 积极对外扩张。公元前 546 年灭小亚吕底亚王国, 进而鲸吞小亚细亚西海岸希腊城邦。后挥师东向, 打到中亚(今阿富汗北部和苏联塔吉克共和国西北部)。然后驱兵南下, 恩威并施, 兵不血刃占巴比伦, 灭新巴比伦王国, 奠定帝国基础。为打开通向埃及道路, 将犹太人(巴比伦之囚)送回巴勒斯坦。按照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记载, 死于同中亚游牧部落玛撒该塔依人的战斗中。居鲁士不仅善战, 且政治上颇成熟。尽管他因剥削阶级本性驱使而对外多次发动战争, 但却因对被征服者实行宽松政策而得到古代作家普遍赞赏。他扶持地方贵族, 尊重地方宗教, 善于使被征服者忘掉他是外来统治者, 因而在古代博得“公正”的统治者的美名。

(郭小凌)

大流士一世

(Daliushi yishi, Darius , 约前 558—前 486) 波斯帝国国王。出身王族，早年生活不详。公元前 521 年，在波斯帝位空虚、各地被征服民族普遍暴动的非常条件下被贵族推举为新王。即位后费时一年余平息波斯高原、巴比伦尼亚等地的起义，在帝国全境恢复统治。针对动乱中暴露出的问题，实行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政策，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史称“大流士改革”。他将帝国划成约 20 个行省，每省设总督为行政长官，将军为驻军长官，分别对国王负责。另设总督秘书行监督职责。建立统一财政体系，改革税制，规定各省上交中央的税额以及形式，包括货币与实物两种，税收由国王任命的专门官吏经办。他制定法律，统一度量衡和币制，修筑一些加强中央与各地联系的公共工程，如开凿联结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修建广泛的驿路网，最重要的一条驿路长达 2000 多公里，从首都苏萨通向小亚细亚希腊城邦以弗所。公元前 512 年，他进入欧洲讨伐游牧民族失败，小亚细亚希腊人乘机起义，触发著名的“希波战争”。大流士一世决意征服整个希腊，但两次入侵均告失败，他本人也在埃及人的起义声中去世。大流士一世是古代颇有建树的君主，他创立的国家体制多年未变，对帝国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一些改革措施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郭小凌)

古印度史

(gu yindushi) 印度次大陆早期阶级社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一般认为是奴隶制社会的历史。“印度”是地区名，泛指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所在地区。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身毒”、“天竺”等译名。古印度自然地理条件多样，人口众多，人种成分复杂，是最早的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旧、新石器时代均有人居住。进入阶级社会，古印度史大体分作6个阶段：1.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约前2300—前1700）。完全依赖考古学家的发现而被世人知晓。因发现地多集中在印度河流域，故名。文明中心在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哈拉巴和信德省的摩亨佐·达罗。文明标志是青铜时代来临，犁耕农业，手工业、商业出现，较大规模城市形成，明显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已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国家，发明了文字，存在原始宗教。文明创造者可能是黑色人种达罗毗荼人。文明衰落的原因不详，存在自然力（洪水、地震、生态变劣）破坏、外敌入侵、内争激烈等多种说法。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属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社会退回原始社会末期。2.早期吠陀时代（约前1500—前900），即古印度婆罗门教的经书（吠陀）之一梨俱吠陀反映的时代，印度社会始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雅利安人在社会组织形式上保持原始氏族部落制，但氏族公社已逐渐变为具有地域特点的农村公社，土地私有化已发展，阶级和等级结构初步确立，奴隶阶级产生，种姓制已现雏形。社会上层建筑为军事民主制。部落首领称“罗阇”，即王。贵族会议称“萨巴”，民众大会称“萨比提”。3.晚期吠陀时代（约前900—前600），沙摩吠陀等反映的时代。雅利安人国家发生和早期发展阶段。生产力进入铁器时代。土地私有制牢固确立，社会分化加深，奴隶增多，种姓制定型。在内外矛盾的作用下，一系列小国兴起，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婆罗门教形成。4.列国时代（约前600—前4世纪末），由小国分立走向统一的时代，奴隶制经济得到发展，社会酝酿着变动，摩揭陀国在16国争霸中脱颖而出，统一北印度，产生君主专制。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佛教出现。是故史学亦有此时代为“佛教时代”的说法。波斯于此时一度征服印度河流域西北部。5.统一的奴隶制帝国时期。公元前327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河流域并建立统治。公元前324年旃陀罗崛多领导印度人进行民族斗争，建孔雀王朝。赶走希腊马其顿人后，孔雀王朝统一几乎整个印度次大陆，奴隶制得到广泛发展，种姓制复杂化，形成庞大国家机器，佛教成为统治工具。6.后期印度（约前187—4世纪）。孔雀帝国灭亡，印度次大陆陷入分裂，多国并立。1世纪中叶—3世纪，中亚细亚大月氏人所建贵霜帝国曾统治次大陆北部。4世纪笈多王朝时期（约320—540），奴隶制社会解体。古代印度文化的突出之处是强烈的宗教意识及其影响。佛教是古印度人为当代世界留下的最大历史遗产。此外，文学上传下来两部著名史诗：《摩珂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文字（梵文）和建筑艺术富有特色。数学知识方面有卓越贡献。

（郭小凌）

哈拉巴文化

(Halaba wenhua) 南亚次大陆古老的青铜文化(前 2300—前 1700), 为该地区被列入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主要根据。1922 年由印度考古学家发现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境内)与莫亨佐·达罗(今巴基斯坦信德省境内)两地, 以后又在其他地区陆续发现 250 多处类似文化, 通名之为“哈拉巴文化”。由于发现地多集中在印度河流域, 因而该文化所反映的文明有时亦被称作“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哈拉巴文化是青铜时代的文化, 居民已知青铜的冶炼、铸造、锻造, 使用各种青铜工具、武器。动植物的驯化也已实现, 农业已能实行犁耕, 种植大麦、小麦、稻谷、棉花、胡麻、甜瓜等作物, 饲养水牛、黄牛、山羊、绵羊、猪、狗、鸡、骆驼、象等牲畜。手工业作为辅助生产部门除能制造金属制品外, 还可制陶、纺织、刺绣、染色、加工象牙珠宝。近、远距离的商业贸易已进行。人们具有较文明的饮食服饰文化, 如食面包、蔬菜、水果、牛奶、鱼、肉; 穿著棉毛织品, 上衣似围巾, 下衣如腰布; 注意修饰美容, 男女饰物有项链、耳环、头饰、手镯、指环、腰带、胸饰, 已懂修面、打粉、涂口红、擦眼膏、梳髻。宗教为自然崇拜与生殖器崇拜。葬俗有火葬、天葬、全尸土葬形式。这一文化的创造者发明了独特的文字, 现仍不能释读。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均为真正的城市, 人口各约 3 万或 4 万, 城市布局有所规划, 分卫城与下城两部分。卫城有防御城墙、护城河、公共建筑等设施, 下城有带排水沟的街道, 是居住区和手工业、商业区, 包括住宅、店铺、饭馆等单位。房屋多用红砖砌成, 有两、三层楼房。由于城内存在明显贫富分化迹象, 并设有行政机关、公共仓廩等反映国家职能的机构, 因此估计已形成国家, 但国体、政体不清。该文化的创造者问题目前仍是一个谜, 一般认为可能是南亚次大陆的古老居民达罗毗荼人。公元前 1700 年左右, 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城倒塌, 排水设施损坏, 代之是一些简陋小屋。造成这种结果的确切原因不得而知。哈拉巴文化从此湮没无闻。

(郭小凌)

婆罗门教

(Poluomenjiao) 古印度宗教之一。形成于早期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中，从原始吠陀宗教演化而来，伴生出专门的僧侣贵族等级婆罗门。经书是4部吠陀，经书注解是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祭祀礼仪繁缛糜费。所奉最高主神为婆罗摩，即大梵天（创造神）。另外两位主神是毗湿奴（保持神）和湿婆神（破坏神），表示宇宙世界由产生到灭亡的过程性联系。基本教义是业报轮回，因果报应。所谓“业”，指人的实践结果。该教认为人因欲望而生的行动会造成不同的业。造业即有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应的体现是死后轮回，灵魂转世。现世的阶级、等级差别与压迫皆为前生注定，而改变差别的希望则只能寄托于在现世行善守道，以便来世时来运转。婆罗门教是赤裸裸的统治阶级宗教，有一套关于种姓制合理性的解释。该教胡说四种姓系由众神所分割的原人（普鲁沙）肢体所生。婆罗门由口变成，刹帝利由双臂变成，吠舍由双腿变成，首陀罗由双脚变成。因该教保守、反动，公元前6—前5世纪时受到一些新宗教派别的抨击。孔雀王朝推崇佛教，使婆罗门教一度衰落。后来得到复兴，至4世纪笈多王朝时达到繁荣。随着各种宗教文献的编纂，宗教思想的改革，逐渐转化成今天在印度占优势地位的印度教。

（郭小凌）

摩揭陀国

(Mojietuoguo) 古印度国家，早期史不清，可能是位于恒河中游地区的小国。公元前6世纪在国王频毗沙罗（瓶沙王）当政时崛起，征服东邻鸯加等国，成为恒河中南部强国，传说统治村镇8万之多，首都王舍城。约前493年，瓶沙王之子阿闍世弑父自立，继续扩张，击败北邻跋珪国。继位国王迁都至交通便利的华氏城，以加强对占领地控制。约公元前430年，大臣希苏那伽藉人民起义登上王位，大举向北印度扩张，灭阿般提、居萨罗等国。约公元前396年，其子继位，承先王扶持佛教政策。约公元前364年，希苏那伽王朝亡，建立难陀王朝。平民出身的摩珂波德摩·难陀成为国王，摩揭陀国版图逐渐囊括整个北印度，为孔雀帝国统一打下了基础。约公元前324年，养孔雀家族出身的旃陀罗崛多自立为王，建孔雀王朝，进而灭难陀王朝，基本实现南亚次大陆的统一。古印度史的极盛期到来：君主专制加强，奴隶制得到很大发展，种姓制复杂化，经济生活活跃，佛教广泛传播。阿育王死后，帝国因内争而衰落。公元前187年，末代国王被杀，孔雀帝国亡，南亚次大陆陷于分裂，摩揭陀变为地方国家。巽加王朝（前187—前75）和甘婆王朝（约前75—前30）先后统治该国，终被来自德干高原的安度罗所灭。

（郭小凌）

种姓制度

(Zhongxing zhidu) 古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度，由国家政权从法律上对居民实行等级划分，不同等级具有不同的权力和义务。等级划分以阶级划分为基础，但又在阶级划分之上增加了法权分等的因素，同一个阶级的成员可能处于不同等级。等级制在古代世界广泛实行过，尤以印度的种姓制最典型和持久。“种姓”一词出自中国古代典籍，有时称作“族姓”或简称“种”和“姓”。这是对古印度人所使用的“瓦尔那”和“迦提”的意译。现代西方学者又称之为“卡斯特”。该制度的雏型产生于早期吠陀时代。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初用“雅利安瓦尔那”和“达萨瓦尔那”来表示自己与当地达罗毗荼人的区别。早期吠陀时代末期，雅利安人社会分化严重，出现表面上以社会分工为标志的四个等级：婆罗门(司宗教事务)，刹帝利(司军政事务)，吠舍(雅利安平民)，首陀罗(被征服土著)。吠舍与首陀罗多数从事普通劳动。前三个等级因种姓一致，称“再生人”，与首陀罗有种族鸿沟。到晚期吠陀时代，这一划分定型为森严等级制度。其基本特点之一是出身、等级不可改变，即使某一等级成员的职业、阶级变化了，也不能改变其原有等级和相应的权利。其次是各种姓实行内婚制，不同种姓间不得通婚。第三是法律地位十分悬殊，尤其表现在对不同种姓违法者的量刑上。第四是社会、宗教生活方面的差异。再生族和非再生族甚至禁止并坐、共食。后来种姓制随着社会分化、分工的深入日益复杂化，形成许多新种姓，《摩奴法典》所列种姓达 59 种，多系从吠舍与首陀罗种姓分离而来。其中最低下者是旃荼罗，被视为“不可接触者”和贱民，从事一些当时人们所不耻的搬运尸体等工作，被完全排斥于正常社会生活之外。种姓制在劳动人民中人为造成种种隔阂，是统治阶级维持政权的有效工具，直到印度独立后才从法律上予以废止，但其在社会心理上的影响至今仍未消失。

(郭小凌)

佛教

(Fojiao) 当代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古印度列国时代。当时社会动荡，阶级、等级关系需要调整，思想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旧的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佛教便是新宗教派别中的一支。传说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约前 566—前 486），释迦国兰毗尼生人，刹帝利种姓，后得名号“释加牟尼”，意为释加族的隐修者。他 29 岁离家修行，35 岁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体系，成为佛陀（觉悟者）。随之四处传播其佛教思想（教义），建立宗教组织。80 岁逝于拘尸那。佛教基本教义、教规载于佛经之中，由《论藏》、《经藏》、《律藏》三藏经书组成。中心思想为缘起论、4 谛、8 正道，终极目的是涅槃。缘起论认为人事万物无常，变幻不定，因而不值得留恋，由此人间有 4 谛（真谛）：1. 苦谛，归纳人生所受的苦楚如生、老、病、死等 8 类。2. 集谛，对人生痛苦起因的解释，核心是由欲念引起的轮回报应。3. 灭谛，谈灭苦的必要和佛教的目的，即灭欲以达到“涅槃”（不生不灭，永远超脱轮回的境地）。4. 道谛，关于修行灭欲的方式，如“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等 8 正道。佛教要人们蔑视人生和逃避现实，同婆罗门教一样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和富人的宗教。但它不承认婆罗门教的经典，否定婆罗门教和婆罗门种姓的最高权威，提倡在神灵面前的众生平等，因而得到刹帝利、吠舍上层的支持赞助，并在民众中找到了许多信徒。如同任何一种重要意识形态体系一样，佛教成型并发展后分化成许多流派，最大的两派为 1 世纪形成的与原主流派“小乘”相对的大乘佛教（“乘”为大道之意），区别在于某些教义和仪式。自孔雀帝国时代起，佛教开始向印度境外广泛传播。北路于 1 世纪传入中亚，经西域进中国北部。2 世纪起，中印僧侣双向交流，大小乘均入中国，以大乘为盛。2 世纪末从中国入越南，4—6 世纪，佛教又从中国传入朝鲜、日本。7 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后来同西藏地方宗教本教结合演化成藏传佛教——喇嘛教。继而该教派传到四川、青海、甘肃、蒙古高原等少数民族地区。前 3 世纪佛教还从南路传入斯里兰卡，以后又入缅甸、印尼、泰国、柬埔寨、老挝。佛教广泛传播的原因除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外，与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有着重要关系。在印度本土，因 4 世纪的笈多王朝打击佛教而偏爱婆罗门教演化成的印度教，故佛教衰落下去。至 13 世纪，佛教在印度基本消亡。

{ewc MVIMAGE, MVIMAGE, !99900320_0358-1.bmp}

（郭小凌）

阿育王

(Ayuwang, A' soka, 约前 273—前 236 在位) 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著名国王。父宾头沙罗为该王朝第二代王, 为其取名“阿育”, 意无忧。18 岁时任阿般提省总督, 后受命镇压旦叉始罗城居民起义, 崭露头角。父逝, 自立为王, 在权力斗争中, 据传诛杀兄弟姊妹 99 人。公元前 269 年, 补行登基大典, 政权得到巩固。开始对外扩张, 掠得大片土地, 战利品, 将南亚次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纳入版图, 仅在对羯陵伽国战争中便杀敌 10 万, 掳 15 万。战后皈依佛教, 使该教不仅成其统治的有力工具, 而且向境外广为传播。他加强君主专制, 事必躬亲, 注意缓和不同阶级、等级的关系, 大兴庙堂宫室建筑, 发展经济, 使孔雀帝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达到极盛, 从而成为古印度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 影响超出南亚次大陆, 连我国宁波也有阿育王寺。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59-1.bmp}

(郭小凌)

古希腊史

(gu xilashi) 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在古代希腊发生和高度发展的历史。关于古希腊史的时空范围，各国史学界无一致意见，一般以较大范围内的、操古希腊语人的居住地和古希腊人统治的地区与时间为划分标准。因此，这一历史的创造者是居住于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海岸、黑海沿岸、南意大利等地的古希腊人。一度受希腊人统治的某些亚非地区也往往列入古希腊史范围之内。其上限起自公元前 3000 年代末，下限约止于公元前 30 年。依其发展轨迹，大体可分作如下阶段：1. 爱琴文明或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代（前 20—前 12 世纪），欧洲文明的开端。在这一阶段，希腊半岛和爱琴海一些岛屿上开始氏族制瓦解过程，先是在克里特，后在南、中希腊等地兴起了一些国家，它们同古代亚非先进国家保持较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具备亚非早期国家的一些特点，如王室经济和王权的主宰地位。2. 荷马时代（前 11—前 9 世纪），军事民主制时代。约公元前 12 世纪，几乎所有爱琴文明时代的国家均被一些氏族部落所摧毁，传统认为这些来自北方的入侵者是多利斯人。古希腊因此退回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阶级已经产生，国家即将形成。3. 古风时代（前 8—前 6 世纪），以希腊奴隶制社会和数百个城邦的形成为特点，其间伴随激烈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和殖民浪潮。4. 古典时代（前 5—前 4 世纪下半叶）此概念同“古风时代”一样出自古希腊美术史，意即作品的古朴与古典风格，史学家借用来概括一个历史时段。希腊奴隶制经济、政治、文化均达到极盛。进入公元前 4 世纪，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引起小农经济大量破产，导致希腊城邦普遍危机，为马其顿的征服提供了条件。公元前 338 年希腊各邦反马其顿联军在中希腊喀罗尼亚会战中败北，大多数城邦丧失独立。5. 希腊化时代（前 4 世纪下半叶—前 30）。希腊奴隶制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随着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34 年开始的对东方的侵略得到广泛传播。一个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形成。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死后，其部将经过几十年权力分配战争，分割帝国为一系列希腊人统治的国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西亚的塞琉古王国和巴尔干的安提柯王国。公元前 30 年，罗马将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国纳入版图，为古希腊史打下休止符。勤劳、智慧的古希腊人创造出极为丰富的文化思想财富，它们成为欧洲文明的源泉。古希腊人的建筑形式广泛应用于西方现代建筑之中，古希腊的神话、诗歌、戏剧、美术作品是西方文学艺术的先导和创作源泉之一。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几乎蕴含了后来各种主要西方哲学思想的胚胎和萌芽。古希腊的政治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源头，古希腊民主政治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参照原型。古希腊史学家是西方史学的奠基人。至于西方数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伦理学、修辞学等学科的起点均需到古希腊史中去寻找。在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和亚非文化得到进一步融合、互补。古希腊史的编纂始于古希腊人本身。他们传下来大量历史或具有史料价值的著作。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文化倒退，古希腊史被冷落。14 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知识界掀起研究古希腊的热潮，到目前为止，已形成庞大研究队伍和问世了大量研究成果。

（郭小凌）

爱琴文明

(Aiqin wenming) 通常指分布于爱琴海域及邻近陆地、岛屿上的类型相似的古代青铜文明(前 3000 年代末—前 2000 年代末),主要成分有以克里特岛、昔克拉底群岛为代表的“克里特文明”和以希腊半岛南部迈锡尼为代表的“迈锡尼文明”。该文明得以发现并被较深入地加以了解主要仰赖于德国考古家施里曼(1820—1890)与英国考古家伊文斯(1851—1943)等人的考古发现以及英国古文字学家文特里斯(1922—1956)对线型文字 B 的破译。根据目前材料,公元前 3000 年代,克里特进入早期青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公元前 2000 至前 1700 年间,至少在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马利亚、札克罗四地形成了君主制国家,其主要证据为王宫建筑群和象形文字的出现。其中克诺索斯宫规模最大,宫殿以及周围建筑物约可容纳 8 万居民。公元前 1600 年左右,许多宫殿被毁。由于无火烧、设防的痕迹,可能系地震使然。不久,各地宫殿得到重建,克里特文明进入繁荣期。青铜器、陶器、金银制作技术有明显进步,宫殿规模宏大,设计奇巧,如克诺索斯宫占地 20000 多平米,依山而建,宫室环抱,有“迷宫”之称。许多屋壁还饰有充满自然祥和气息的壁画。更令人惊异的是克里特的宫殿竟无防御工事。考古材料表明,克里特同希腊半岛、埃及、小亚细亚等地有广泛的商业联系。这时的文字已转变为线型文字 A(尚未被释读),并在约公元前 1450 年进一步发展为属印欧语系的线型文字 B,系由希腊半岛传来。约公元前 1400 年,克里特的宫殿相继受到人为破坏,估计系大陆希腊人所为。自此,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合一,文明中心移向希腊半岛。克里特文明的创造者问题目前仍未解决。迈锡尼文明形成于前 16 世纪上半叶。这是目前可确认的属印欧语系的古希腊人创造的文明,以南希腊为中心,辐射到中、北希腊。文明的特点是一系列君主国家的兴起,伴之宫殿、卫城以及宏大的王室陵墓、众多线型文字 B 泥版文书等物质附属物。这些国家的典型代表是位于南希腊阿哥利特地区的小国迈锡尼、梯林斯、派罗斯。与克里特文明明显不同之处在于迈锡尼文明充满好战尚武气息。因防御需要,迈锡尼式的宫殿均建于山丘顶部,有坚厚城墙环绕。尽管线型文字 B 泥版文书的发现与释读有助于窥视迈锡尼社会结构,但由于史料数量、功能的局限,该文明时期的国家制度、社会经济关系等问题均悬而未决。前 12 世纪,整个希腊及爱琴海岛屿的青铜文明衰落,宫殿、城墙、巨大的王陵、线型文字 B 等物质与精神文化成果被某种力量一扫而光,从而被后人所遗忘。通常认为这是处于氏族部落社会中的多利斯人南下的结果。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60-1.bmp}

(郭小凌)

荷马时代

(Hema shidai) 国内外用来概括古希腊史的一个大阶段(前 11—前 9 世纪)的传统术语。因过去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主要出自可能为荷马所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故名。由于史诗中的主人公皆为“英雄”人物，故又有“英雄时代”的说法。但随着百余年来考古发掘成果，属于这一时代的实证史料日益增多，逐渐取代不太可靠的史诗材料，国外学者已使用其他术语来替换这一概念。但也有部分人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继续使用它。该时代的希腊社会看来退回到原始社会末期，没有文字、宫殿、国家、城市，因此又常被称作“黑暗时代”。但是阶级社会的曙光已经出现。铁器得到应用，居民从事农业、家畜饲养业，手工业、商业有初步发展。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水平上，土地私有制已产生，贵族、平民、奴隶阶级均已出现。贵族把持氏族、部落的管理机构，军事首长(王，希腊人称巴赛勒斯)掌有军事指挥权、宗教祭祀权和部分社会管理权，国家即将从军事民主制状态下的原始社会脱胎而生。

(郭小凌)

城邦

(chengbang) 早期国家的一种类型,以古希腊国家最为典型。词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文“波利斯”,原有城堡、国家、公民集体、城市之意,近现代欧美学者多将其译为“城市国家”(city—state),故有中文意译名“城邦”。希腊城邦约二三百个,形成时间、途径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千差万别,但基本上具有如下共同特点:1.小国寡民。各邦均局限于狭小领土之上,方圆多不过百里,人口最多不过几十万。如斯巴达领土最大,但也仅8400平方公里,人口几十万。中希腊弗西斯地区面积1656平方公里,拥挤着22个城邦。希腊甚至还有数千人口的小邦。2.多数以一个设防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农区组成。个别邦有两个以上的城市,如雅典。个别邦则无城市中心,如斯巴达。城邦的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存在政治依附或剥削关系,乡村中的公民与城市中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因居住地的不同而有所区别。3.均有一个小范围的、极端封闭的公民集体。如雅典公民最多时有3~4万余,斯巴达公民最多时9000~10000,还有几百公民的城邦。各邦都有严格的公民与非公民界限以及全权公民的概念。各邦均对公民权严格控制。按古希腊人的观念,同邦公民起源于同一祖先,有共同血缘、宗教、节庆、风俗和相互扶助的习惯。公民权意味着一种特权,即参预国家各种政治、宗教文化生活与占有土地的权力。城邦中的外邦人或移居者以及奴隶则完全被排除于公民生活之外,不被看作该国国民。在公民中间,尽管存在阶级和等级的差别,富有的公民奴隶主在国家生活中往往占据优势,但公民整体上是同奴隶和外邦移民对立的。因此,城邦本质上是特权公民集体联合起来压迫奴隶和异邦人的机器。4.与公民集体的存在相适应,希腊城邦在政体中均包含民主制成分,共和政体居多。各邦不管政体如何,均有公民大会、贵族或民主议事会、执政官员会议三级权力机构。以直接民主制为内容的公民大会在不同城邦中的作用有大有小,但原则上都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这点在民主制城邦体现得最为明显。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王权均未能膨胀为君主权力,相反在绝大多数城邦中失去了意义。5.城邦军事制度的主体是公民兵制。以公民兵为核心的武装力量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一般不存在脱离公民集体并凌驾其上、附属于个别统治者的常备军。6.城邦无独立的祭司阶层,公职人员兼祭司职能。祭神和组织各种节庆、运动会是城邦的重要任务。希腊城邦是在古风时代平民和贵族的激烈斗争中产生的,往往是平民胜利的产物。除古希腊外,意大利、腓尼基等地中海沿岸地区也曾出现过类型学上与古希腊城邦相同的早期国家形态,比如早期罗马的所谓公民公社(civitas)。这类国家有时也被称作城邦。目前中外有些史家提出希腊式城邦是世界各地国家形态的普遍形式的看法,赋予城邦更多的含义。

(郭小凌)

斯巴达

(Sibada) 古希腊著名城邦，位于南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名称的希腊文原意可能是“西班牙的金雀花”或“已播种的土地”。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中，系指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国家之一。公元前2000年代末，多利斯人侵入南希腊，古斯巴达亡。入侵者的一支定居在拉哥尼亚的攸洛塔斯河谷，离古斯巴达原址不远，定居地也称斯巴达。这条河谷叫“凹陷的拉凯戴梦”，所以古希腊人又把斯巴达称作拉凯戴梦。斯巴达的早期史笼罩在传说当中。大概最初分为三个部落，至荷马时代末发展成五个地域部落(奥伯)，实行军事民主制。公元前800—前730年，征服拉哥尼亚其他地区，初步建起耕奴制，即希洛制。依附民制(皮里阿西制)可能也于此时形成，在尖锐阶级斗争中，斯巴达基本完成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转化。约公元前740—前720年，为缓和平民与贵族围绕土地问题所产生的尖锐矛盾，发动侵略西邻美塞尼亚的战争。获胜后把土地在公民和参战的皮里阿西人中分配，公民得到平原好地，后者获山区土地。约公元前640—前620年，美塞尼亚人发动大规模起义，予斯巴达人以沉重打击，迫使斯巴达为加强统治，将国家体制军事化，变成赤裸裸镇压被征服者的机器。国内阶级结构简单：1. 奴隶阶级，又称希洛人(中译名有时又译作黑劳士、赫劳泰)，由一部分拉哥尼亚的土著亚该亚人与美塞尼亚的多利斯人组成，人口约20~30万。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固着在公民份地上，每户公民占有7户希洛人，每年需向主人交纳一半劳动产品。希洛人的人身属国家，占有者不能任意买卖、杀戮他们，因此希洛人实际上是国有奴隶，其社会地位极低，受到各种虐待。2. 小生产者阶级，又称皮里阿西人，同样由被征服者组成，居于山区或沿海地带，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人口约10余万。有土地等不动产占有权，但需向国家纳税和服兵役，无公民权，无同斯巴达人通婚权，但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3. 奴隶主阶级，即斯巴达公民。虽然公民集体内部也有平民、贵族之分，就整体而言都是不劳而获的奴隶主阶级。人口约4万人，公民最多时约9000~10000，完全脱离生产，专注于军训，彼此财产差别不大，每户有份地约20公顷，无所有权，只可传给后代。故公民自称国家为“平等者公社”。为防止分化，禁止公民从事工商业，禁止金、银货币流通和国外商品的输入。在政治制度方面，斯巴达存在独特的双王制，国王由两王族成员充任，执行军事统帅和大祭司职，政治上只有一般发言权。由30名成员、包括双王构成的元老会议拥有很大权力，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行使许多行政职能，主管各种案件审理。另一重要机构是公民大会，权力有限，对议案和公职人员任免有表决权，无讨论权。再一个机构是监察官会议，经选举产生，监督公职人员和公民日常生活。国家严格干预公民生活是斯巴达军事、教育制度的特点。从出生起，一个未来公民就受到特定的体质、品质、心理素质、军事技能的多方面训练，以便成长为出色的军人。因而斯巴达军队长期称雄希腊战场，早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就成为伯罗奔尼撒军事同盟的盟主。希波战争期间，曾为联军领导国家。公元前5世纪末战胜雅典，一度确立对全希腊的霸权。公元前371年，被后起的城邦底比斯击败，美塞尼亚希洛人乘机独立，获得解放，斯巴达元气大伤。马其顿征服希腊后，斯巴达保持了独立，但国势日衰，土地兼并严重，因失地而丧失公民权的人日增，至公元前3世纪公民仅存700人左右。国王阿基斯(前245—前241)、克利奥蒙尼(前

235—前 222) 先后试图改革，复兴斯巴达，均告失败。公元前 2 世纪中叶罗马并吞希腊，斯巴达终亡。其生活方式、政治和军事教育制度在古代和近现代均有过较大影响。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61-1.bmp}

(郭小凌)

雅典

(Yadian) 古希腊著名城邦，位于中希腊东南的阿提卡半岛。迈锡尼文明时期，该地已出现若干小王国，建有宫殿、卫城。多利斯人南下，阿提卡受到影响，宫殿倒塌。但入侵者并未定居于此。可能在荷马时代，传说中的英雄提修斯以雅典为中心统一阿提卡，雅典娜女神成为整个阿提卡的保护神。公元前8世纪，王政被贵族制替代，形成贵族国家，公民大会权力式微。贵族借职权、财力兼并小农土地，发展债务奴隶制，造成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执政官，实行重大改革，按财产划分等级，取消债务和债务奴隶制，扩大公民大会权力，建400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为奴隶主民主制奠定了基础，为剥削外来奴隶进一步开辟了道路。改革触动各方利益，社会力量重新组合，出现持续内争，毕士特拉妥乘机夺取政权，确立个人统治。在不损害个人权力前提下，他基本执行了梭伦的政策，强化了改革后形成的国家制度。毕士特拉妥于公元前527年逝世，其子统治被推翻。克里斯提尼改革（前506）以地域划分国民，确立500人议事会和严格制约执政人员权力的陶片放逐法，实现奴隶主民主政治。在希波战争中，雅典始终是主战国，率先兵援小亚细亚希腊人起义，基本上独自击退波斯军第二次入侵。在第三次反侵略战争中，是希腊海军中坚，对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做出决定性贡献。战争后期跃为希腊最强大国家之一，国内民主制进一步完善，奴隶制得到巨大发展。公元前431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发生争霸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最后惨败，提洛同盟瓦解。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东山再起，与斯巴达抗衡，组织第二次海上同盟。因霸主故态复萌，引起盟国反感，同盟破裂。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抗击马其顿失败，沦为附属国，曾多次争取独立。公元前2世纪中叶，被罗马征服。雅典民主的有利环境，促成思想文化的繁荣，出现一批彪炳史册的哲学家、历史家、戏剧家、美术家、修辞家。直到罗马统治时代，始终是地中海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为人类精神文明做出巨大奉献。

(郭小凌)

希波战争

(Xi po zhanzheng 前 500—前 449) 希腊城邦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直接导因于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反波斯统治的暴动。公元前 6 世纪下半叶，波斯将小亚细亚西海岸希腊城邦并入帝国版图，安插政治代理人和征收贡赋，引起希腊人强烈不满。公元前 512 年，大流士一世侵入欧洲，败归。小亚细亚希腊人乘势而起，于公元前 500 年起义。雅典和埃列特里亚两邦应邀军援。雅典出兵一方面因同小亚细亚希腊城邦起义者同族，另一方面因波斯收留雅典民主制的敌人希庇亚斯，干涉其内政。埃列特里亚则出于对起义首领米利都过去帮助的回报，希波战争因而爆发。公元前 494 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残酷镇压了小亚细亚希腊人起义后，借口雅典等邦的介入，遂向希腊本土进军。公元前 492 年，波斯第一次入侵因海军被风暴吞没而夭折。公元前 490 年，波斯第二次入侵。希腊许多城邦表示臣服，斯巴达动摇不定，雅典坚决抗战，会同友邦普拉提亚，在马拉松会战中大败波斯军队，鼓舞起希腊人的勇气。公元前 480 年，继位的波斯国王薛西斯亲率陆海军约几十万人，战舰千艘发动第三次入侵。31 个希腊城邦以斯巴达为首联合起来，步兵 11 万，战舰 400 艘。首战温泉关，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与 300 战士壮烈牺牲，通向中希腊门户打开，波军占雅典。不久，双方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湾决战，以雅典海军为主的联军舰队胜。整个战局被扭转，失去制海权的薛西斯返回亚洲，留驻陆军于次年同希腊联军决战于中希腊普拉提亚，惨败。联军由防御转为进攻，在米卡尔海角消灭波斯海军残余。保守的斯巴达退出战争，雅典取得战争领导权，建立提洛同盟，与波斯争夺爱琴海霸权，互有胜负。公元前 449 年，双方缔结和约，波斯放弃对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统治，承认雅典在爱琴海的霸权。希腊人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希腊人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士兵殊死作战，将领善于指挥，而波斯军多系受裹胁的被征服者，士气低落。在古代战争主要靠近距离肉搏条件下，士气和将领临战的指挥艺术对胜负往往起着决定作用。战争促进了希腊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巩固了雅典等邦的奴隶主民主制度，改变了希腊邦际关系的格局。战后雅典加剧了与老霸主斯巴达的争夺，从而为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铺平了道路。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62-1.bmp}

(郭小凌)

马拉松会战

(Malasong huizhan) 希波战争中的第一次重大会战。因会战地在马拉松小平原而得名。公元前 490 年，波斯第二次入侵希腊半岛，沿海路先攻占与中希腊隔海相望的优卑亚岛的埃利特里亚，然后由雅典前统治者希庇亚斯引导，于 9 月份在雅典东北沿海马拉松登陆，该地紧靠埃利特里亚，有道路直通雅典。对希庇亚斯来说，还有象征意义。其父曾从马拉松进军夺取了政权。雅典急遣约 1 万重装步兵迎战，盟邦普拉提亚也派出约 1000 人助战。波斯军人数不详，但数量远较雅典军为多，且有一支约 800 人的骑兵。雅典统帅米尔提太巧妙布阵，加强两翼，主动出击。位于中央的波军将雅典中军压退，但两翼却被对方突破，暴露后翼，造成四面受敌局面，死 6400 人，逃离战场。雅典以牺牲 192 人的代价取得反波斯二次入侵的决定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城邦的抗战决心，为泛希腊联合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郭小凌)

萨拉米斯海战

(Salamisi haizhan) 希波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海战，古代战争史上最重要的海战之一。公元前 480 年，波斯大举入侵希腊，陆军破温泉关，占雅典，海军抵雅典法利隆湾，形势危急。雅典海军统帅铁米斯托克里力主联军舰队在萨拉米斯湾与敌交锋，并有意造成被封锁局面，迫使联军舰队死战。9 月 23 日破晓，庞大的波斯舰队约 1000 艘先驶向海湾，希腊海军约 380 艘舰船奋力迎击，波斯国王薛西斯在岸上观战。双方进行殊死搏斗，或用金属包裹的船头撞碎敌舰船体和排桨，或登上敌舰展开肉搏。激战从清晨进行到夜晚。由于波斯海军在狭窄海湾中不能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加之成分庞杂，战斗力不一，损舰数百，被彻底击败。观战的波斯国王薛西斯失声痛哭，恐怕制海权的丧失造成退路切断，自己先行返回亚洲。这次战役使一度不利于希腊的战局被扭转，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郭小凌)

提洛同盟

(Tiluo tongmeng) 希波战争期间以雅典为首组成的希腊城邦反波斯的军事同盟，因同盟会址和金库最初设在提洛岛而得名。史学界亦称“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公元前 478 年末至前 477 年初，当战场已移至爱琴海域和小亚细亚时，斯巴达放弃了战争领导权，拥有海军优势的雅典被参战各邦推为领导国家，形成新的军事同盟。加盟国家除雅典外，最初主要是小亚细亚西海岸以及爱琴海大多数岛屿的那些直接受到波斯威胁的国家。同盟总部包括金库设圣岛提洛岛。雅典人当选为盟军统帅和会议召集人。但同盟事务由每年一次在提洛岛召开的同盟会议决定，每个加盟国有平等的投票权，以雅典为首的具有海军力量的一些盟国提供军舰、士兵，其他邦则提供一定数额的金钱。同盟的成立对打败波斯帝国起了决定作用。自公元前 5 世纪 60 年代始，随着雅典实力的增长，同盟成为雅典控制和剥削盟邦的工具。同盟金库被迁到雅典，捐款不仅由雅典自由支配，而且捐款额和捐舰额也由雅典随意摊派。公元前 464 年，总额达 400 塔兰特以上的捐款变成雅典的重要财政收入。希波战争结束后，同盟并未解散，盟捐转化为贡金，雅典向盟邦派遣大批军事移民，干预盟邦内政、外交、司法，将盟国沦为附属国，因而同盟又被称作“雅典帝国”。附属国最多达 250 余个。不少同盟国家发动反雅典暴动，遭残酷镇压。公元前 404 年，雅典被斯巴达击败，同盟被迫解散，从政治史的发展角度看，提洛同盟是希腊从小国分立状态走向统一的一个尝试。

(郭小凌)

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

(yadian nulizhu minzhu zhengzhi) 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4 世纪存在于雅典的一种仅限于公民集体成员的民主政体。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称之为奴隶主民主政治。现代西文中的民主(德摩克拉西, democracy) 一词由古希腊文“德摩克拉提亚”衍化而来。古希腊文中的“德摩”有“人民”之意,“克拉托斯”意“主权”、“权力”。两词合成一个即“人民主权”(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它可能最早出现于雅典,是雅典平民与贵族长期斗争的产物。因而“民主”一词最早是在雅典得到使用的。希罗多德的《历史》提到这个词(《历史》6.43)。雅典民主制思想的根源可追溯到原始氏族民主的观念。约在公元前 8 世纪贵族政治取代王政,改变了政体直接发展为君主专制的方向。公元前 594 年,梭伦在平民推动下实行改革,解放负债平民,促进了包括中小土地所有者在内的公民集体的形成、巩固,提高了公民大会在政治决策中的地位,建立公民普遍有权参与的民众法庭以及 400 人议事会,为民主制奠定扎实的基础。公元前 509 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地域原则划分政区,建立抽签选举产生的 500 人议事会和实行陶片放逐法,进一步削弱贵族势力,民主制得以确立。公元前 461 年,厄菲阿尔特民主改革彻底废除贵族会议政治特权,完善民主制。至伯利克里时代以及前 4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民主制已相当成熟,包括如下主要内容:最高立法、执法与行政权力机构是公民大会,每 13 天举行一次。公民均在大会上拥有投票权、辩论权、提出动议权。所有有关国家的重大事务,包括重大案件均由大会以多数票表决。附属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是 500 人议事会,职能是在公民大会休会期间主持国政,为大会准备提案,监督各级公职人员。议员从 30 岁以上公民中抽签选出。日常司法机构为民众法庭,审判员也由 30 岁以上公民中抽签产生。此外,还有隶属公民大会和 500 人议事会的众多具体行政、军事机构,多由 10 人组成,如将军会议、公卖员、市场监督等。成员均通过抽签或投票产生,无财产资格限制,无职业官僚。某些低级公职,如记录、警察等则由奴隶充任。为保证公民下层积极参加公共生活,国家对许多公职、甚至观看文艺演出都发放津贴。这是建立在社会上一部分人(公民)对另一部分人(奴隶和外邦移居者)以及附属国压迫、剥削基础上的有限民主制。但在古代各地专制横行的条件下毕竟是较先进的政体,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它对其他邦民主制的确立有重大影响,对雅典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古希腊众多最杰出的哲学家、戏剧家、历史家、艺术家、修辞家等等或是雅典人,或长期在雅典生活,这无疑是公民民主生活的结果。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雅典民主思想曾被资产阶级思想家发掘出来,成为反封建的锐利武器。

{ewc MVIMAGE, MVIMAGE, !99900320_0363-1.bmp}

(郭小凌)

希腊奴隶制

(xila nulizhi) 古希腊十分流行的剥削制度之一，以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为特征。在许多城邦曾得到高度发展，成为决定社会面貌的根本制度。根据文字材料，奴隶制在希腊的出现可确切追溯到迈锡尼文明时代，当时的宫廷和王室经济中均有相当数量的男女奴隶存在。荷马时代和古风时代，奴隶被用于家内劳动，作为主人生产的助手，数量看来并不多。古风时期，债奴制曾一度流行，但后来各邦都逐渐禁止了这种奴役同族人的制度，为奴役外族奴隶创造了条件。在斯巴达、帖撒利、克里特等地，发展起希洛制类型的耕奴制（也有人认为希洛制是农奴制）。随着希波战争进行和胜利，希腊同周边地区交往的扩大，大量战利品流入战胜国，城市人口的增加，居民对各种商品（包括武器装备）需求的增加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一些城邦的手工业、商业得到很大发展，容纳了大量奴隶劳动。农业中的奴隶数量也有所增加，奴隶制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决定着社会的面貌。就此类奴隶制（过去叫古典奴隶制）发展情况而言，雅典的材料最为充分，但奴隶在人口中的比重仍难以确定。近现代学者根据古代留下来的少数统计材料得出相距不太远的结论：多数认为雅典奴隶数量在 7~10 万，少数认为在 15~20 万，如以 10 万计，包括家属在内的公民人数与奴隶人数相近。这个比例可以作为估计其他蓄奴较多城邦奴隶数量的参考。但希腊城邦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用雅典简单比照其他城邦是不科学的。希腊奴隶的来源之一是部分战俘，但战俘命运是多样化的，并不都变为奴隶，且战争与和平时期相比，毕竟是短暂的，所以，同黑海沿岸、色雷斯、伊利里亚、西亚的人口贸易是另一重要的经常性来源。奴隶的自然生殖也在奴隶的再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奴隶买卖活动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进行，雅典、开俄斯、提洛岛都有较大的奴隶市场。女奴价格较男奴为高，有特殊技能的奴隶价格较无特殊技能的高。奴隶劳动最集中的生产部门是采矿业，在雅典劳洛温银矿劳动的奴隶最多时达 2~3 万。另一奴隶集中的生产部门是各种手工作坊。一般小作坊有两三个奴隶帮工，个别大手工作坊有奴隶工匠数十人。雅典一最大的奴隶手工作坊使用 120 名奴隶。此外，航海业、建筑业等部门也有奴隶劳动。除斯巴达类型的城邦外，农业领域仍是中小农民活动的主要领域，但较富裕的农民普遍有奴隶帮手，大土地所有者的农庄则使用较多的奴隶劳动，如伯利克里的农庄。在非生产领域存在大量奴隶，如各种家仆、演员、妓女和知识分子奴隶（教师、医生、秘书）。雅典有特殊的国家机器中的奴隶，如下级公务员、警察、造币工、清洁工等。奴隶的法律地位低下，完全是奴隶主本人、集体或国家的财产，一般不受法律保护。奴隶主可以对奴隶施以各种刑罚，直至杀死。奴隶可能无家庭、名字，需穿特殊服装，但并不是所有城邦和所有奴隶均如此。雅典禁止任意虐杀奴隶，奴隶在街上行走，不必给自由人让道。克里特允许奴隶同自由民结婚，一些奴隶阶级上层可以有家庭和少量个人支配的财产。希腊奴隶不断进行阶级斗争，斗争方式有武装起义、逃亡、怠工、破坏工具。希洛人起义和雅典 2 万奴隶大逃亡是突出的例子。由于希腊奴隶制十分突出，因而一般对希腊奴隶制社会的性质没有引起异议。

（郭小凌）

伯罗奔尼撒战争

(Boluobennisa zhanzheng,前 431—前 404) 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争霸战争。斯巴达等国所处的南希腊又称伯罗奔尼撒半岛,故记述这次战争的历史家修昔底德将战争称作“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战争”。后人简称之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引起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两霸对希腊控制权的争夺,“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第 19 页)。战争导火索是雅典同斯巴达盟友科林斯等邦的冲突,科林斯吁请伯罗奔尼撒同盟向雅典宣战。公元前 431 年,斯巴达通牒雅典遭拒,战争旋即展开,分三个阶段:头 10 年为第一阶段,双方相持,互有胜负。公元前 421 年,因两方均需喘息而订 50 年和约。公元前 415—前 413 年为第二阶段,战争急剧转折。雅典远征西西里,5 万多军队和 200 余艘战舰覆没,处境被动。公元前 413—前 404 年为第三阶段。提洛同盟成员纷纷起义,雅典国内政治斗争尖锐化,一度发生寡头政变。公元前 405 年,得到波斯资助的伯罗奔尼撒舰队全歼雅典舰队,彻底粉碎雅典海上霸权。公元前 404 年 4 月,雅典城在四面被围、粮草断绝的情况下投降。被迫拆毁城墙,仅留 12 艘舰只,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斯巴达的胜利使其暂时成为全希腊的霸主。但各邦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且更加激化。

(郭小凌)

马其顿

(Maqidun) 古代南欧国家。发源地在毗邻希腊半岛的马其顿尼亚地区，境内多山地，沿海有小平原，居民以农牧业为主。马其顿人可能由古代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和希腊人融合而成。无论是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关于是否把马其顿视为古希腊国家均无一致意见。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马其顿出现部落统一运动，形成王国。希波战争时依附波斯。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前基本被排除于希腊邦际生活之外。腓力二世（前359—前336）实行改革，加强王权，改革币制，建立常备军和改进战术，使马其顿跃为地方强国。他推行扩张政策，先征服邻近地区（前357—前352）。然后南下，于前338年在喀罗尼亚大败希腊联军，控制了整个希腊。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前336—前323）发动掠夺东方的战争，灭波斯帝国，将马其顿统治扩展到西亚、埃及、中亚、印度河流域，建起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病逝后，其部将纷争，帝国解体。公元前301年基本分裂成马其顿王国（希腊）、塞琉古王国（西亚）和托勒密王国（埃及）。公元前276年，军事将领安提柯取得希腊大部地区控制权，建安提柯王朝，持续百余年，公元前168年被罗马所灭。

（郭小凌）

梭伦

(Suolun, Solon 约前 630—前 560) 古代雅典著名政治家和诗人。出身贵族，早年经历不详。青年时出外游学，增长见识，到过希腊、小亚细亚的许多地方，但后人所说关于他经商一事并无充分根据。约公元前 600 年，在雅典同麦加拉争夺萨拉米斯岛的战争中，他以富有感染力的诗歌激起雅典人敢于胜利的勇气，初露头角。约公元前 594 年，平民与贵族围绕土地和债务展开激烈斗争，内战迫在眉睫。梭伦及时当选为执政官，实行改革：颁布解负令，废除一切公私债务和债务奴隶制，规定个人占有土地最高限额，按财产划分等级，确定不同等级的义务和权利，建立民众法庭、400 人议事会，沉重打击了贵族势力，使小农经济趋于稳定，为奴隶主民主政治奠定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他还禁止了买卖婚姻，提倡婚嫁自主，鼓励就业，废止奢侈，制定新法，进行多方面的创新。由于他实践活动的思想原则是中庸，不偏不倚，因此，他从调和矛盾出发，没有采取剥夺富人土地、财产以满足无地、少地公民的要求，从而既得罪了贵族，也引起贫苦公民的不满。去职后到国外漫游，探讨人生哲理。晚年从事写作，约 70 岁病逝，骨灰撒于萨拉米斯岛。

(郭小凌)

李奥尼达

(Li ' aonida , Leonidas 前 508—前 480) 斯巴达国王。公元前 488 年继位。公元前 480 年波斯第三次入侵希腊时率希腊联军的部分军队 7000 余人扼守进入中希腊的狭窄通道铁尔摩披莱 (中译名为 “ 温泉关 ”) , 连续两天击退波军轮番进攻。正面突击失利后 , 波军利用希腊人叛徒引路 , 夜里沿山间小路向李奥尼达军背后迂回。防守山路的联军部队猝不及防 , 未能加以阻击 , 希腊军队腹背受敌。李奥尼达令联军大部撤退 , 自己率 300 斯巴达国王卫队与 1100 彼奥提亚人及部分希洛人掩护 , 率先向正面敌人发起进攻 , 在肉搏中壮烈牺牲。残余的希腊人奋力夺回其遗体 , 退守防御墙后的小山丘上 , 终在敌人四面打击下全部阵亡。李奥尼达是古希腊人不屈的象征。

(郭小凌)

伯利克里

(Bolikelili, Pericles, 约公元前 495—前 429) 古希腊卓越政治家, 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杰出代表。名门望族后裔, 小时受良好教育, 养成正直、廉洁、自制、坚毅等品格。公元前 463 年控告贵族派代表客蒙而初露头角。而后成为平民领袖之一。同保守的贵族议事会进行坚决斗争, 推动公民大会陆续通过一些完善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法案, 包括取消贵族会议的政治职能, 允许公民不受财产资格限制担任高级公职, 向参加公共生活的公民发放津贴等, 开创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在对外关系方面, 他基于本国利益, 积极推行扩张政策, 与波斯、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国家多次冲突。他主张对附属国严加控制, 在许多地方建立军事移民点。自前 443 年至前 429 年, 他一直当选为首席将军, 事实上主持国家事务, 反映他在公民中的崇高威信。前 431 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伯利克里是坚定的主战派, 拟定扬长避短的战略, 把居民撤入城内, 避免陆上硬拼, 而以海军频繁出击。他在牺牲将士葬仪上发表的热情歌颂奴隶主民主制的演说, 是西方文献中的名篇之一。公元前 430 年, 因天灾人祸牵连, 被公民大会免职。次年仍被选为将军, 不久因病去世。

(郭小凌)

埃斯库罗斯

(Aisikuluosi, Aeschylus, 公元前 525—前 456) 古希腊杰出的悲剧作家。雅典人, 贵族出身, 参加过马拉松、萨拉米斯、普拉提亚会战。25 岁时开始参加戏剧比赛。公元前 488 年第一次获奖。一生勤于笔耕, 著有 90 部剧本, 82 部留有剧名, 7 部较完整传了下来, 包括描写萨拉米斯海战中希腊人爱国主义精神的《波斯人》, 歌颂舍己为人、抗争命运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关于迈锡尼时代英雄之死的《阿伽门农》等。他的悲剧多取材于神话传说, 但也有现实主义作品, 均反映公民普遍关心的问题; 情节简单, 心理细节刻画精微, 全部用诗歌形式表现, 深入揭示悲剧冲突。他改革表演形式, 把演员从一名增加到两名, 创造出真正的戏剧对话。他为演员设计了面具、服装、道具、布景, 增加戏剧效果。他常常充当自己悲剧中的演员、合唱队长或伴舞员, 直接从事表演实践。一般认为他是悲剧的真正创造者, 有“悲剧之父”的美称。他晚年访问西西里时去世。

(郭小凌)

阿里斯托芬

(Alisituofen, Aristophanes, 约前 445—前 385) 古希腊最杰出的喜剧作家, 雅典人。父菲利浦斯可能是来自罗德斯或埃及的移居者, 后来获雅典公民权。公元前 427 年发表第一部喜剧, 但因过于年轻, 剧上演时未能冠以真名。以后一些剧作也依此作法处理。前 424 年, 开始以真名写作。相传写有 44 部剧本, 但其中 4 部是否属他存有疑问。目前传下来 11 部, 这是仅存的古希腊喜剧的较完整剧本。此外尚有其他片断。11 部剧本包括《阿卡奈人》、《骑士》、《云》、《和平》、《鸟》、《青蛙》等。其剧作直接反映现实, 有较强烈思想倾向。如他在剧中批评一些与其同代的思想家、政治人物, 反对伯罗奔尼撒战争, 嘲弄政客与社会不公现象, 再现人生世象, 它们是一幅幅雅典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的风俗画, 因而也是研究该时期雅典历史的重要史料。其写作风格自由奔放, 融雅致、诙谐、辛辣的讥讽为一体, 创造出适于舞台表演、性格突出的表现形式, 早在古代便获得极高评价。

(郭小凌)

赫拉克利特

（Helakelite, Heraclitus 或 Herakleitos 约前 535—前 475）古希腊哲学家，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突出代表之一。小亚希腊城邦以弗所生人，名门贵族出身。一生孤傲淡泊，据说曾把某些世袭特权让予他人，拒绝波斯国王大流士讲学邀请，专注于宇宙人生的探索。后来宁愿离群索居，过苦行生活。写有一本哲学著作，未能完整传下来。他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不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认为万物都有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象火一样依一定条件生成、熄灭。他有关事物运动变化的名言是“一切皆流”，“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切都处于对立统一当中，是生动变化过程。“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恩格斯认为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是正确的世界观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表述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 20，第 18 页）

（郭小凌）

德谟克利特

(Demokelite, Democritus 约前 460—前 370) 古希腊哲学家，朴素唯物论的卓越代表。希腊殖民城邦阿布德拉人，富有的贵族家庭出身，少时聪颖好学，受到良好教育。及长，到埃及、西亚、印度旅行，增长见识。回国后避开所有公共事务，专事学术研究，是亚里斯多德之前希腊最渊博的学者，著有哲学、伦理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动植物学、农学、医学、军事学、文学艺术等学科作品约 60 部。马克思称他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 3，第 146 页)。现仅存其作品的少量片断和一些作品名。在哲学史上，德谟克利特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原子论的真正创始人。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的物质微粒，本质相同，依自身大小、位置与形状的不同而在虚空中运动，构成具体物质，如水、火、气、土、人类等世界万物。物质的生成与毁灭均由于原子的聚合与分散。他在政治上是古代少有的欣赏奴隶主民主制的思想家之一。他说过：“在一种民主制度下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他的人品学识受到阿布德拉人的崇敬，曾获公民的一笔赠款并得到树立铜像的殊荣。

(郭小凌)

苏格拉底

(Sugeladi, Socrates 约前 470—前 399)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西方哲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雅典人，出身贫寒，父是雕刻匠，母为接生婆。早年求知欲强，曾向许多名师智者求教，泛读大量学术著作，形成个人扎实的文化素养和思辩艺术。成年后他把个人的哲学探讨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在街头巷尾、广场、运动场等公共场所与人们讨论各种社会人生问题，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作为重装步兵参加战争，作为 500 人议事会成员主持国政。他在公共事务和意识讨论中固执己见，绝不逐流随俗，具有鲜明个性。他把自己比作一只刺激国家这匹骏马的牛虻，促其振奋发展。公元前 399 年，被人指控为不敬国家所奉之神，“败坏青年”的思想罪而被处死。临终前仍从容与朋友讨论哲学问题。后苏格拉底的控告者受到惩罚，表明雅典奴隶主民主制承认对他处理的错误。他述而不作，其思想是由学生记述流传下来的。一般认为，他是把希腊哲学研究对象由空邈宇宙自然变为社会人生的关键人物，开辟了西方人自我反省的新境界。他的哲学讨论的是关于正义、道德、智慧、真、善、美及其对立面问题，所以是一种观念的道德哲学。在他看来，纯粹的真、善、美并不存在于可以感知的物质世界里，而在于神的世界中，因此，他是一位客观唯心主义者。

(郭小凌)

柏拉图

(Bolatu ,Plato 约前 42—前 348 或约前 427—前 347) 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著名代表。雅典名门贵族后裔，母是梭伦后代。青年时象其他贵族子弟一样，得到良好教育，曾从师苏格拉底，思想受其深刻影响。后来到埃及、意大利等地游历考察。返国后于公元前 386 年在雅典近郊阿卡德米体育场，开办一所学校，边教书，边著书立说约 40 年。教授哲学、数学、天文学、动植物学等课程。其间两度去西西里，试图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未果。去世后葬于自己的学校旁。现存著作 30 余部，绝大部分以对话体写就。这是西方最早的系统化的思想作品，其哲学观的核心是“理念论”（也有人译作“相”），认为理念是一切事物的本原，感观世界则是虚幻的。他的政治思想反映在《理想国》一书中，设想哲学家治国，社会不同成员各安其位，国家职能在于实现正义。在《法律篇》中他修正自己的国家观，提出以法治来取代哲学家的政治。

(郭小凌)

亚里斯多德

(Yalisiduode, Aristotle 前 384—前 322)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爱琴海北岸斯塔吉罗斯生人，出身医生家庭。父母亡后，于公元前 384 年到雅典求学，入柏拉图的学校，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教修辞学。公元前 343 年，应马其顿王邀请任年仅 13 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私人教师。公元前 335 年回雅典自办学校，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因他经常同弟子在漫步中讲授探讨问题，故人们戏称他的学校为“逍遥学园”。公元前 323 年，雅典人的反马其顿情绪发泄到他头上，被迫避祸于其母亲的城邦哈尔基斯，次年逝于该地。他是古代西方最博学的人之一，著述宏富，不仅对当时已知的几乎所有研究领域都有所发展，而且还开创了一些新领域。现存著作 47 部，包括《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诗学》、《物理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志》等。他是第一位把哲学同其他学科真正划分开来的人。他不同意导师柏拉图的“理念论”，肯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在学术探索中，他有句名言：“真理高于吾师”。他的《政治学》和《雅典政制》是关于希腊政治体制、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为西方政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的著作和思想在西方中世纪曾被奉为经典，在近现代才得到真切的评价。

(郭小凌)

希罗多德

(Xiluduode, Herodotus 约前 484—前 425) 古希腊杰出历史家,《历史》一书著者,古罗马学者西塞罗称之为“历史之父”。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哈利尔纳索斯人,贵族出身。少小好学上进,成人后因政治上崇尚民主,反对当地僭主政治而受到迫害,移居国外。公元前 454 年左右,开始旅行考查,收集史料,足迹遍及两河流域、黑海沿岸、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许多地区。公元前 447 年到雅典,与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诗人索福克利斯过从甚密,立意撰写《历史》。公元前 443 年,随雅典人在意大利南部辟新城邦图里伊,遂定居该地,潜心著书,直至去世。《历史》一书结束得突然,看来尚未完稿。全书中心是希波战争的缘起和前半段的进程,同时也用不少笔墨记述埃及、西亚等地的历史、风情。书分 9 卷,取材广泛,视野宏阔,对史料有初步批判目光,对历史记载的目的和取鉴经世功能有所认识,且文字生动,是古代西方第一部较完整的史著。书内也有不少天命思想和某些偏颇评论,但这些并不妨碍他是西方史学奠基人的地位。

(郭小凌)

修昔底德

(Xiuxidide, Thucydides 约前 460—前 396) 古希腊杰出历史学家, 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代表古希腊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准。雅典人, 出身显贵。公元前 424 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当选为 10 将军会议成员。同年冬, 因率兵驰援被敌军围困的雅典部队不力而被放逐 20 年, 居色雷斯。战后返雅典, 不久逝世。他的史学著作共 8 卷, 从远古希腊史写起, 中心是伯罗奔尼撒战争, 至公元前 411 年止, 最后一句也是不完整的, 显然系猝然中止的未完成之作。全书结构紧凑, 与内容宽泛、松散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不同, 是一部专史。他治史严谨, 力求以客观态度进行写作, 不仅对史料进行认真筛选、考证, 真实再现战争过程, 而且还注意探讨各种事件发生的远因、近因。为了说明这一点, 他注意到经济因素的作用, 各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社会运动、人民心理的影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对希罗多德等古代史家津津乐道的各种神托、幻象、梦兆抱着理性的批判态度。比如他尖锐批评雅典统帅尼西阿斯因迷信天象而贻误军机的愚蠢行为, 揭露神喻的欺骗性, 相信人类有共通人性, 历史发展有一定规律性, 历史有垂训作用。他的文字准确、精炼, 善于用白描式的句子刻画出精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他书内用 1/4 篇幅征引或模拟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演说, 开了后来此类写法之先。西方文献中的佳作“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便因他的记述而流传于世。他治史的深度使他博得后代史学家的赞赏和效仿。

(郭小凌)

古罗马史

(Gu luomashi) 世界上古史的最后一章，古代罗马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崩溃的历史。起自约公元前 753 年，迄至 476 年。地域范围始终是一个变量。最初罗马只是中意大利台伯河畔的一个小邦，通过几百年的扩张，膨胀为古代史上罕见的大帝国，版图最盛时东抵亚美尼亚、两河流域，西到大西洋沿岸以及不列颠，南起波斯湾、整个北非，北至莱茵河、多瑙河流域。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一般分期法，古罗马史可划分如下三大时段：1. 王政时期（约前 753—前 509），传统有 7 王在位，前 5 王在位期间为军事民主制时期，后 2 王统治时期产生国家。公元前 8 世纪初，罗马人在俯瞰台伯河的几个山丘定居下来，保持氏族、胞族、部落制，军事领袖勒克斯（王）、贵族元老院、库里亚大会负责公共事务。社会分化出现，氏族内部分为贵族和依附贵族的被保护人，氏族外部则产生一个无氏族各种权利却负有义务的社会集团——平民，奴隶制形成，社会各集团之间存在矛盾斗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第 6 代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靠平民支持实行改革，按财产划分居民等级，以四个地域部落替代原三个血缘部落，设立新权力机关，创百人队（又称森都里亚）会议，平民可参加，从而导致国家形成。因继位国王小塔克文暴虐无道，王政被推翻，改制共和。2. 共和制时期（前 509—前 30），奴隶制城邦向帝国转变时期。建立贵族共和国，设两名权力相等的执政官，元老院实际主持国政。共和早期的罗马内部史贯穿平民与贵族斗争，斗争焦点是土地、债务、完整的公民权。经过 200 余年的反复较量，平民取得胜利，成为全权公民，债奴制被废除，罗马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富有平民与原贵族平民组成新贵（或称豪门贵族），下层平民与原罗马氏族部落中的贫苦成员融合，组成新“平民”。外来奴隶成为奴隶的主要来源，国家机构也随平民和贵族斗争而日益完善。共和早期外部史是不断的对外扩张，以第二次布匿战争最为激烈。至公元前 2 世纪后半叶，罗马已控制巴尔干半岛和小亚大部。长期对外扩张的成功，引起罗马社会经济、政治的巨大变化，奴隶制蓬勃发展，形成广泛利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出现奴隶制的繁荣。小农经济因大经济的倾轧而破产，土地、债务问题再次突出起来，奴隶与奴隶主、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矛盾急剧激化，导致共和末期长达百年的内战。奴隶大起义和农民运动以及被征服者的起义交织在一起。为加强奴隶主统治先后出现苏拉、恺撒独裁，标志共和制向帝制过渡。公元前 30 年，屋大维彻底消灭政敌，平定各地叛乱，成为独裁统治者。3. 帝国时期（前 30—476），君主专制时期，可分作两段，即繁荣的早期帝国时期（前 30—193）和衰落乃至崩溃的晚期帝国时期（193—476）。屋大维的独裁又称元首制，这是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专制，其统治的支柱是元老、骑士和军队。早期帝国对内维护奴隶制，注意缓和与平民的矛盾，从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67-1.bmp} 而保持了政治上的基本稳定，经济得到发展。进入 3 世纪，统治者内部权力斗争迭起，政府奢侈腐败和横征暴敛引起频繁的人民起义，工商业在战乱和重赋下萎缩，奴隶制危机降临，隶农制深入发展，早期基督教在帝国流行开来。为拯救帝国，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彻底抛弃共和外衣，加强君主专制，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改革，危机有所缓解。之后又以更大规模爆发了对皇权的争夺，各地人民起义不断。对帝国的最后打击来自因匈奴西迁

触发的日耳曼人大迁徙。395年，帝国分为东西两部。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各部落夹击下灭亡。古罗马史同古希腊史一样，构成西方史的最初篇章。罗马的政治制度、法律、宗教、文字、文学、建筑艺术、史学等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其发达的奴隶制和奴隶的阶级斗争具有最充分完整的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重要依据。

（郭小凌）

平民与贵族的斗争

(pingmin yu guizu de douzheng) 特指罗马共和早期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作为斗争一方的罗马平民与古代史上的一般“平民”概念不同，系处于罗马公民集体之外、近似于希腊外邦人地位的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团。他们多半可能起源于被合并的地方土著和外来移居者，早在王政时期就同罗马统治者存在矛盾，并因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改革取得了一定胜利，可以参加百人队会议。但是直到共和早期，他们仍受到债务奴隶制的威胁，不能担任高级官职，无权参加元老院，禁止同贵族通婚，不能分得公有地。由于公有地随战争掠夺而逐渐增多，成为贵族发财的源泉，因此斗争的实质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有权者和无权或部分有权者之间的斗争。双方力量对比有利于平民，因平民人数众多，不乏富豪，在罗马军队和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整个斗争随着罗马外部局势的变化时而紧张，时而缓和，总趋势是朝着有利于平民的方向发展。主要有如次几个大的事件：约公元前494年发生“第一次脱离”运动，即在罗马军情危急之时，平民士兵拒绝参战，迫使罗马政府设新的高级官职——平民保民官。保民官可出席元老会议，对贵族高级官吏的命令有否决权。公元前449年颁布12铜表法，制约了贵族的专横。公元前445年废除平民与贵族不能通婚以及平民可担任军团司令官的法令。公元前4世纪初，平民争得分配公有田的权力。公元前367年，通过执政官之一必须由平民担任的法令。公元前326年，债务奴隶制正式被废除。此间一切高级官职均可由平民担任。公元前287年，平民发动最后一次脱离运动，导致原平民大会（特里布会议）上升为公民大会，其决议对所有公民具有效力，平民享有全部公民权。斗争结果使罗马阶级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原氏族贵族不复存在，平民上层与氏族贵族合流成“新贵”，控制国家政权。平民也不再单指无充分公民权力的自由人，而仅指广大城乡下层公民。斗争进一步扫除了氏族制残余，有利于以剥削外来奴隶为主的奴隶制的发展。尽管如此，罗马仍然同过去一样是贵族共和国。

（郭小凌）

大征服

(dazhengfu)指罗马在共和早期所进行的侵略扩张活动。罗马发动历次战争的具体起因多种多样,总的说来是为获取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和其他物质财富以及生产者本身。公元前5世纪大征服始,中间有间歇和一些挫折,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已由小邦膨胀为囊括地中海地区的大国。至此,内部斗争突出起来。整个征服是逐步进行的。第一步先吞并周围地区。自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末,同北部埃特鲁里亚城邦、南邻拉丁城邦时断时续战斗,陆续占领台伯河北部与拉丁平原。第二步征服中意大利,发动三次萨莫奈战争,到前296年,终于战胜萨莫奈人。继而攻打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城邦。希腊人请来伊辟鲁斯国王皮洛士助战,两次大败罗马军。公元前275年决战,皮洛士惨败后退出意大利,南意大利纳入罗马版图。地中海国际政治因此改观,原罗马盟友、北非强国迦太基与罗马利益发生冲突,双方因争夺西西里而引发第一次“布匿战争”(前264—前241,因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人”而得名)。罗马胜,变西西里为第一个海外行省。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兴。迦军统帅汉尼拔入侵意大利,创造多次战争史奇迹,予罗马沉重打击,迫使罗马内线防御、外线作战,将军队派往西班牙和迦太基本土。公元前202年,应召回国的汉尼拔在迦太基扎玛城附近为罗军击败,罗马成为西地中海主人。公元前146年,罗马最终征服马其顿和希腊。此间罗马还夺取了小亚细亚,辟亚细亚行省。至此,共和早期的大征服结束。罗马扩张不断得手的原因在于有一支组织纪律严明、战术灵活、赏罚分明的军队,有一套逐渐完善的治理占领地的方法和灵活的外交政策。国际形势也有利于罗马的对外侵略。更重要的是罗马为后起国家,内部矛盾因平民和贵族斗争日益缓和,小农经济在大征服期间较稳定,保证了充足的兵源与稳固的后方。同时,作为一个后起的民族,罗马的元老贵族和一般公民身上没有或很少有瓦解士气、涣散斗志的消极品质。绵延几个世纪的连续、成功的对外征服造成大量物质财富、奴隶流入罗马,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发生巨变。人们开始疯狂追逐钱财,效仿奢侈,兼并土地,蓄养奴隶,社会矛盾因小农经济的日益破产,奴隶的增多和集中,大批异族人成为被征服者而急剧激化,从而引起震撼整个罗马社会的长期内战。

(郭小凌)

罗马奴隶制庄园

(luoma nulizhi zhuangyuan) 以剥削奴隶劳动为主的罗马大土地所有者的庄园经济。约产生于公元前 3—2 世纪之交，广泛在中、南意大利、西西里传播开来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并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产生原因在于侵略战争的不断得手，金钱、奴隶涌流入意大利，富有的元老、骑士通过购置、承租罗马国家掠夺到的所谓公有地和吞并小农土地发展成为大地主。在自己地产上，他们采用不同的经营方式，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适中面积的中小庄园（400~1200 亩），一般距城市较近，交通和市场条件较好，往往单一经营，使用十几名奴隶劳动，产品基本面向就近市场。这是一种商品性很强的经济，在公元前 2 世纪—公元 2 世纪相当流行，标志奴隶占有制经济的繁荣。一位大地主拥有几个这样的庄园分散经营是常见的现象。另一种是奴隶制大庄园，拉丁文为 latifundium，意即“广袤的土地”。面积在 4000 亩以上，具有自然经济特点，粗放经营，内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生产得兼，产品主要供自身消费。劳动力以奴隶为主，人数往往达百人以上。庄园也使用一些被保护人之类的依附农民劳动。2 世纪以后，随着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危机的降临，社会动乱，城市衰败，商业萎缩，商品性很强的中等奴隶制庄园衰落，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自给自足的大地产越来越普及，其内部结构也有所改变，奴隶劳动日益被隶农劳动所代替，庄园本身的独立性、闭塞性进一步加强，甚而出现庄园内部的集市贸易、庄园主武装及庄园法庭。这类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的庄园经济在西罗马帝国崩溃过程中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未消失，幸存下来的部分逐渐演化成中世纪的封建庄园。

(郭小凌)

斯巴达克起义

(Sibadake qiyi 约前 73—前 71) 由罗马色雷斯籍奴隶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大起义，共和末期罗马内战的重要事件之一。公元前 2 世纪以来，罗马奴隶制得到巨大发展，奴隶大量集中于城乡，从而使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从非暴力的消极怠工逃亡发展到武装起义的最高形式。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前 137—前 132 和前 104—前 101) 已充分显示奴隶争取自由的勇气，斯巴达克起义则把这种单纯的奴隶运动推到最高峰。起义爆发在中意大利加普亚城的一所角斗士学校中。约 200 名奴隶角斗士密谋逃亡事发，70 余人脱逃，集于维苏威火山，竖起义旗，斯巴达克是主要领导人。罗马军初期镇压失败，义军发展到 7 万人；主要成员有高卢人、色雷斯人、日耳曼人奴隶，个别自由人也加入队伍。义军向北部阿尔卑斯山进军，可能试图分别还乡。罗马政府调集重兵，在卡尔千山附近歼灭由另一起义领袖克列克斯的队伍，3 万奴隶战死。斯巴达克一路则顺利击溃敌人围追堵截，将 300 名罗马军俘虏作为祭品追悼克列克斯的亡灵。义军抵阿尔卑斯山时，已壮大到 12 万人。不知何故，斯巴达克改变计划，几乎按原路穿越意大利，途中重创罗马执政官率领的军队，直插南端城市图里亚，拟渡海入西西里，重燃那里的斗争烽火。公元前 72 年，罗马政府授命克拉苏主持对奴隶的战争。他将义军封锁在半岛南端。斯巴达克南渡计划失败，被迫回师，突破封锁线，转进意大利东部港口布林底西，试图横海入巴尔干。但罗马援军率先在港口登陆，义军陷入被前后夹击境地。前 71 年春，义军主力在布林底西港附近与罗马军展开决战，斯巴达克与 6 万将士英勇牺牲，6000 奴隶俘虏被钉死在加普亚通往罗马大道两旁的十字架上。奴隶力量受到巨大打击，从此类似大规模起义不复再现。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战争，总是为了生存和自身解放，客观上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而是完全正义的战争。起义失败有军事上的原因：奴隶无巩固后方，勇敢有余，军事经验、技能、战术不足。此外，他们面对的是自由人阵营，基本是孤立的运动。根本原因在于奴隶不是新生产方式代表者，提不出可行的纲领，不能团结广大群众，长期保持纪律和正确总结经验，指导战争。但起义的壮举毕竟成为一切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象征。马克思曾盛赞斯巴达克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 30，第 195 页)。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69-1.bmp}

(郭小凌)

隶农

(linong) 主要指晚期罗马帝国时期依附于大地产主的农业劳动者，地位介于奴隶和自由民之间。有关隶农的形成问题尚无确切答案，一般认为是农业小生产者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日益恶化的结果。就隶农概念而言，最初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指具有公民身份、可以自由流动的大地产承租者，人们用“科洛尼”(coloni)称呼他们。实际上这类人并无中文意义上的隶农身份。1世纪始，科洛尼地位因欠租等原因而恶化，不得不留在承租地上，直至清偿债务后才可离去。3世纪危机期间，社会动乱，人口流失，罗马政府和大庄园主为维持足够劳动力，利用各种手段将贫困的科洛尼束缚在他们租佃的土地上，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公民的自由身份受到限制，隶农属性开始具备。4世纪——5世纪，罗马皇帝出于保证生产和税收的需要，颁行一系列限制科洛尼权利的法令。其私有财产甚至本人均可当作庄园财产的一部分，逃亡者应戴枷送还原主，可当奴隶处理。但仍保有一定程度自由，如在法庭上不能象奴隶一样被拷打，可以当兵。总之，地位已接近奴隶，具有了充分隶农属性，于是科洛尼概念发生质变。同时，奴隶主为鼓励奴隶的生产积极性，仿效剥削隶农的方式，对奴隶也授以小块田地，令其独立经营，交纳剩余产品，使奴隶在身份未变的情况下向隶农地位靠拢。隶农的出现被看作是封建关系萌芽的产生，是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总危机的产物。

(郭小凌)

基督教（早期）

（Jidujiao）奉上帝之子救世主（希伯来语称“弥赛亚”，希腊文作“基督”）耶稣为主要崇拜偶像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大教派，均以“圣经”为主要经典，是当代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通常把基督教在世界上古史时段内的形成和演变为罗马奴隶主统治阶级宗教的漫长过程称作早期基督教或原始基督教。该教是公元1世纪30年代—60年代犹太人反抗罗马征服者斗争的产物。以色列—犹太民族是西亚弱小民族，历史上曾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后多次为大国所灭。公元前1世纪，罗马侵入巴勒斯坦，施行暴政，犹太人苦难到达顶点。他们多次起义均遭血腥屠杀，陷入愤怒与绝望中，不得不到宗教领域寻求出路。而传统犹太教也在尖锐民族和阶级斗争中分成许多具有政治色彩的派别，基督教便是犹太人下层教派中分化出的小宗派之一。据《圣经》记载，该派由加利利的拿撒勒人耶稣创建。耶稣据说是上帝独子，为救人类于公元元年12月25日降生人间。他构建思想体系，培训门徒，四处传教，被罗马的叙利亚巡抚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3日后复活升天，将重返人间，建理想的上帝之国。目前尚不能确定历史上是否真有耶稣其人，但可确认基督教最初是下层群众运动的结果，是被压迫者的宗教。初期教义主要有：崇拜上帝耶和華為唯一神，信仰基督降临并信仰得救，简单化的礼仪。与犹太教根本不同之处是信仰基督得救论，且信仰者不分民族，均可入教，这就打破了犹太教的狭隘民族界限，成为一种开放性的世界宗教。此外，早期基督教在创立时还带有鲜明政治色彩，鼓励人们推翻罗马与犹太上层统治，建立无阶级压迫、无私有财产的新社会。其社会成分主要是下层劳动群众，因而为罗马政府与犹太上层所不容。许多信徒被处死，组织被解散。但帝国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人民的失望却造就出一批批新信徒。殉教者视死如归的勇气和信徒们精诚团结的精神也鼓舞了众多的后来人。基督教很快在公元1世纪中叶至2世纪的帝国城乡广泛传播开来，教会组织、经典文献、宗教仪典逐渐形成、完善。随着该教发展壮大，一些中等阶级和富人加入教会，在组织中因其富有文化素养和捐资能力而逐渐取得领导地位。到2世纪中叶，业已编定的《新约大全》中增加了泛爱、忍耐和服从权柄的内容。于是基督教开始演变成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宗教，为帝国政府所容忍。在3世纪，教徒已发展到约600万。皇帝戴克里先在位时（约245—305），对基督教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镇压，企图恢复罗马教不可挑战的地位。几千名教徒被杀，教堂被拆毁，《圣经》被焚烧，但基督教仍保持着充分活力。君士坦丁称帝（306—337）后，改变政策，利用基督教为帝国的精神支柱和统治工具，企图摆脱帝国危机。313年颁布《米兰敕令》，正式宣布基督教合法，使它同国家政权结合到一起。为了进一步发挥基督教的统治工具作用，君士坦丁大帝于325年在小亚细亚主持召开该教会议，统一教义，消除派争，健全教会组织。尼西亚会议标志基督教实际上完成了由被压迫者的宗教向统治阶级宗教的转变，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380年（另说392年）罗马皇帝独尊基督教，正式确认该教的国教地位。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370-1.bmp}

（郭小凌）

巴高达运动

(Bagaoda yundong) 罗马行省下层居民反对罗马统治的武装斗争。巴高达意为“战士”，主要由“无生路的人”——破产农民、隶农、逃亡奴隶组成。作为运动发起于帝国统治的薄弱环节高卢(今法国、比利时、瑞士、卢森堡一带)地区。270年，一批巴高达分子起义，攻陷高卢重镇奥古斯托敦，运动很快席卷高卢大部地区。起义者四处袭击城市、庄园，迫使地方官吏、贵族纷纷逃亡。运动的两位领导人阿孟德和埃里安在各自控制区割据称帝，铸造钱币，使罗马在高卢的统治受到极大威胁。皇帝马克西米安亲率重兵镇压，运动受挫，转入低潮。5世纪初，民族大迁徙浪潮袭来。巴高达运动乘势又起，在高卢许多地区建立政权组织。449年，罗马政府军再次击败起义者，剩余巴高达分子转移到西班牙，展开长期武装斗争，直到5世纪末才销声匿迹。在古代史上，人民武装起义能坚持如此之久是罕见的。运动无疑对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起了一定的加速作用。

(郭小凌)

克拉苏

(Kelasu ,Classus 约公元前 115—前 53) 罗马共和末期著名政治家，血腥屠杀斯巴达克起义的刽子手。出身显贵，父曾任执政官等高级官职，在权力之争中失败自杀，克拉苏一度受牵连。公元前 83 年，追随苏拉参加内战，在争夺罗马的科林斯门的战斗中显露头角。斯巴达克起义爆发后，罗马军队几次战败，元老院把指挥权授予克拉苏。为整饬业已败坏的纪律，他恢复废弃不用的“十抽一法”，即在败军中命士兵每 10 人为一组，每组处死 1 人，结果总计处决 4000 人，恢复了纪律。他驱军封锁起义者于意大利半岛南端。义军突破封锁后，他穷追不舍。先吃掉其中一部，接着又消灭了斯巴达克所率的主力，把 6000 俘虏全部钉死在加普亚通往罗马的大道旁。他生性贪婪，通过巧取豪夺、敲榨勒索、倒买倒卖等活动聚敛起巨额财产，是罗马首富之一。前 70 年，与庞培一道当选为执政官，曾摆万桌酒席宴请罗马公民，以改变个人形象。公元前 60 年，同庞培、恺撒结成统治罗马的三头同盟，分得东方行省治权。任叙利亚总督时四处搜刮钱财。公元前 53 年，率 7 个军团发动入侵帕提亚的掠夺战争，兵败身亡。

(郭小凌)

恺撒

(Kaisa, Caesar 约前 100—前 44) 古罗马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出身显赫，受过良好教育，聪慧过人。公元前 77 年因指控元老派人物而初露政治锋芒。后接连担任高级官职，不惜负债广为收买民心，成为政坛风云人物。公元前 60 年与军阀庞培、克拉苏结成反元老院的政治联盟，史称“前三头同盟”，分享罗马政权。公元前 59 年任执政官，卸任后任高卢总督，征服山外高卢、不列颠，积累起大量个人财富，培养出一支只知恺撒不知共和国为何物的私人军队。公元前 53 年，克拉苏亡，三头同盟破裂，庞培与元老院结盟，欲剥夺恺撒权力。公元前 49 年，恺撒驱兵奔袭罗马，迫庞培及部分元老外逃希腊。他占意大利之后，先击败庞培在西班牙的部队，后进军巴尔干，与庞培军决战于希腊法萨卢，获决定性胜利。班师回罗马就任独裁官，实行一些新政治、经济措施，巩固和扩大了罗马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基础。由于他君主专制意向日益明显，终被仇视他的贵族共和分子所杀。恺撒是罗马共和制的埋葬者之一。政治上他善于审时度势，利用矛盾，破旧立新。军事上他指挥若定，当断即断，身先士卒，创出许多出色战例。他富文学修养，留有两部名著：《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71-1.bmp}

(郭小凌)

波里比阿

(Polibi ' a , Polybius 约前 204—前 122) 罗马统治时期的古希腊籍历史学家，古代西方史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生于希腊麦加罗城，是反马其顿统治的地方同盟——亚该亚同盟领导人的儿子。罗马侵占希腊时，任骑兵指挥官，兵败后同 1000 地方贵族一道作为人质被解往罗马，在那里居住了 16 年。公元前 150 年，同仍幸存的其他人质返回故乡。翌年，携友游历北非，目睹迦太基的毁灭。希腊变为罗马行省后，他受命在家乡组织政府，政绩显赫。后来可能移居罗马，致力于《通史》的写作，中间曾到各地收集史料。其父亡，返乡奔丧，82 岁高龄时从马上堕下身亡。他是罗马东征西伐、统一地中海地区的见证人。广博学识和经历使他有条件撰写一部长达 40 卷的巨著《通史》，综合记述从公元前 264—前 146 年地中海地区各国的历史，目的在于揭示罗马对外扩张所以成功的原因。目前仅存前 5 卷和其他卷残篇。作者是西方史家中把各国、各地区历史置于紧密的相互联系中分别加以考察的第一人，具有真正的世界史目光。他注意历史垂训后人、取鉴经世的现实作用，写作方法上力主求真，不轻易相信未经认真考定的材料，对神意持怀疑态度，小心追循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都使他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郭小凌)

李维

(Liwei, Livius 前 59—17) 罗马著名历史家。意大利帕塔维乌姆城生人，家道殷实，从小受到良好文化教育熏陶。30 岁时移居罗马，结识元首奥古斯都，受到他的保护和帮助。不久着手撰写卷帙浩繁的古罗马史《自建城以来》，耗时 40 余年得以告竣，目的在于弘扬罗马人的丰功伟绩。全书 142 卷，编年范围从传说中的罗马城兴建之年(前 753)到公元前 9 年奥古斯都养子德鲁苏之死。现存 35 卷(卷 1—10, 21—45)，余卷均已散失。书中援引了许多业已失传的文献，包括年代记、元老院会议记录、条约、各种私人契约、遗嘱、古代作家的作品，内容丰富，文字生动，为古罗马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不足之处是对所引史料缺乏考证，有不少以讹传讹之处。此外，书内含明显政治倾向性，甚至有时以牺牲或篡改史实来迎合实用目的。李维晚年返回故里，直至去世。

(郭小凌)

塔西陀

(Taxituo, Tacitus, 约 56—120) 罗马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演说家。生平材料甚少,可能生在高卢行省的贵族家庭中,早年跟随一些著名教师学习文学、修辞学、法律、演说术,为后来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深刻的历史意识打下基础。77 年成为罗马要员阿格里科拉的女婿,开始在政界顺利升迁,任财务官、行政长官,直至执政官等高级官职。约 79—81 年,完成第一部作品《演说家的对话录》。98 年,著有其岳父的传记《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是有关不列颠和日耳曼历史不可多得的材料。主要代表作为先后完成的《历史》和《编年史》。这是两部有关早期帝国的断代史。前者始自 68 年皇帝尼禄之死,止于 96 年皇帝多米沁亡,共 12 卷,现仅存前 4 卷和卷 5 部分内容。后者从 14 年奥古斯都辞世写起,到尼禄死结束,共 16 卷,现完整存第 9 卷,残存第 5、11、16 卷。作者是坚持史家良心,秉笔直书,摒除个人好恶的古代著名史家之一。他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因而他毫不留情地揭露罗马专制君主、高官显贵的昏暴。书中的史实基本是可信的。此外,作者文学简洁雅致,寓意深远,是拉丁文写作大师。

(郭小凌)

维吉尔

(Weiji 'er, Vergil 前 70—前 19) 古罗马著名诗人。前 70 年 10 月 15 日生于北意大利曼图阿城附近的安德斯村，父亲是富裕农民，这使他有条件得到较好的早期教育。曾到克勒蒙纳和米兰就学。公元前 53 年赴罗马进修哲学、修辞学等课程，后因健康原因返回故乡，专注于希腊诗歌的研究。公元前 43—前 37 年写出处女作“布科里克”(10 首牧歌)，赢得初步声誉。以后陆续发表众多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刻意模仿荷马史诗而写成的 12 卷长诗《伊尼特》。该诗描述特洛伊英雄伊尼斯在城陷后从小亚漂流到意大利的传奇故事。诗里的主人公被当作罗马独裁者恺撒与屋大维家族的祖先，具有明显涂饰目的。尽管如此，诗中离奇曲折的情节，美妙的语言，大胆的象征以及对罗马民族毫不掩饰的颂扬仍使它受到读者的喜爱，并使作者能跻身于西方最出色的诗人之列。

(郭小凌)

普林尼

(Plinius, pling 23—79) 古罗马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又称老普林尼，以别于其外甥，古罗马另一著名历史人物小普林尼。北意大利新科莫姆城生人，出身骑士。少年时曾赴罗马求学。47年步入军旅，在日耳曼行省任骑兵军官，与后来的皇帝提图斯交谊甚厚，为后来仕途打下基础。57年以后，陆续在西班牙、高卢、北非担任高级官职。约74年任海军一分舰队指挥官。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喷发，乘船赶赴灾区实地考察并救援灾民，因吸入含硫气体身亡。他是古罗马最渊博的学者，一生勤于治学，手不释卷，连吃饭时间都用来读书，辞世时仅遗下的笔记便多达160卷。发表过7部著作，6部散佚，余1部为《自然史》，计37卷，逐一论列当时人们所知的各门知识，谈及的事物几近2万种。在写作《自然史》过程中，他参阅过573位作家的著作，摘引了2000多部书中的材料，使该书成为有关古代东西方精神和物质文化成果的百科全书，在17世纪以前一直是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权威性著作。书中提到中国为“丝之国”，还认为中国所产的钢硬度高，质地好。由于当时信息传递与人们认知条件的局限，《自然史》也包括一些道听途说的荒诞内容，但这丝毫不能减低它的价值。

(郭小凌)

世界中古史

世界中古史

(shijie zhonggushi) 又称世界中世纪史。中世纪一词,最初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专指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之间一段时间,大约相当于5—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弗拉维奥·比翁多(1388—1463),在他的30卷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后的历史》里,专门论述472—1440年间的历史,第一次把中世纪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意大利历史学家贾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在他1725年发表的《论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把人类历史分为神权时代、英雄时代和人权时代。所谓英雄时代,主要指中世纪。从此,中世纪一词被西方学术界广泛采用。18世纪法国启蒙学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从法律和政治制度方面考察了中世纪封建制度,奠定西方中世纪史的基础。西方学者的中世纪史历来以西欧为对象,不包括拜占廷、俄罗斯、阿拉伯及其以东地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中世纪史。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论国家》等著作中,也使用中世纪一词,但赋予新的科学内容,专指封建社会。世界中世纪史则是研究世界范围内封建社会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

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很不平衡,想划定一个适合所有国家封建社会的起止年代是困难的。在我国和苏联等国,一般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世界中世纪史的开端,以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夕为终结。有些学者还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世界中世纪史的下限应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前,近年来还有人主张下限在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夕。欧美和西方诸国的史学家,一般认为15世纪末为世界中世纪史的终结。

封建社会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方面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前进了一大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5世纪以前,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帝国等东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影响很大。美洲的印第安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许多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俄国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新航路开辟以后引起的殖民掠夺,使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亚、非、美洲广大地区开始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严重地阻碍那里的社会发展。

尽管世界各国的封建社会千差万别,还是有共同规律可循的。揭示这个规律并丰富对整个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是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认为,封建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是封建制生产关系,其基本特征是封建主阶级(个人或集体)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农民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独立的经济,但必须向封建主缴纳劳役、实物或货币地租以及种种苛捐杂税。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或称超经济强制,是封建经济的必要条件,依附的形式千差万别,有权利不等的依附农和接近奴隶的农奴。在许多国家的封建社会里,如朝鲜、日本和阿拉伯帝国,往往残留着占次要地位的原始公社制或奴隶制成分,但都受封建关系的制约。

封建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封建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农民战争规模之大和次数之多,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阿拉伯帝国爆发过大规模的穆堪那起义、巴贝克起义和黑奴起义。朝鲜高丽末期爆发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14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也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中古晚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复杂。西欧的资产阶级利用宗教旗帜，发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但不幸以失败而告终。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终于获得成功，创立了荷兰共和国。16世纪以降，亚、非、美洲的农民运动，往往与各国的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相结合，成为一支不可抗拒的洪流。

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国家是封建主阶级的国家，但其政体，即政权形式，则各式各样。西欧在封建社会初期以分裂割据为主。城市兴起以后，各地经济联系增多，同时新兴市民阶级和王权结成联盟反对割据势力，帮助王权取得胜利，实现国家统一。13、14世纪的英、法形成等级君主制（又称“议会君主制”）。15世纪末，又形成君主制。在俄国，反对外族入侵的斗争加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德国和意大利与英、法相反，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亚洲一些国家长期实行中央集权，但市民力量弱，难以形成与贵族抗衡的力量。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在中世纪影响极大。西欧的天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教皇自称是上帝的代表，垄断着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在那里，对天主教神学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成就巨大，为近代欧洲文化奠定基础。伊斯兰教主要流行于西亚、北非和东南欧，古兰经具有法律效力。佛教广泛流传于中国、朝鲜、日本、印度支那和东南亚，被有些国家定为国教。

苏联研究世界中世纪史是有贡献的。科斯敏斯基院士（1886—1959）主要研究英国土地关系史、拜占廷史、外交史和史学史。他的《13世纪英国土地关系史研究》（有英译本），在苏联和英国很有影响。斯卡兹金（1891—1973）主要研究西欧土地关系和农民运动。他和科斯敏斯基主编的《中世纪史》第1卷早已译成中文（1957年三联出版），在我国影响很大。苏联科学院集体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也有中译本，其中第3、4卷是中世纪史。

当代西方史学界对封建主义的理解各式各样，但大体沿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传统。本世纪初英国剑桥学派编写的多卷本《剑桥中世纪史》，在西方史学界影响很大，奉为权威。美国中世纪史家汤普逊（1869—1942），虽然主张对历史的了解应扩大到各方面，但仍然错误地只把封建主义看成政治组织，也不了解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他的《西洋中古史》和《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有中译本。法国的年鉴学派，标榜要从总体上考察封建主义，仍然主要从政治上认识封建主义。代表人物是布洛克（1886—1944），著有《法国农业史》等。

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基础薄弱，基本上是解放后新建的学科。40年来取得很大成绩，翻译出版了许多外国史学名著和资料。已经出版并被教育部（教委）定为大学教材的有：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中古部分），朱寰主编的《世界中古史》和刘明翰主编的《中世纪史》。朱庭光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下册）和《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二分册），是兼有工具书性质的参考读物。近年来，世界中古史领域的学术研究空气比较活跃，发表的论文显著增多，有些具有相当的水平。

学习世界中世纪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保存下来的实物

和文献资料。资产阶级学者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因阶级的局限，不可能科学地解释封建社会。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和鉴别，不能兼容并蓄。

（孔祥民）

日耳曼人大迁徙

(Ri ' ermanren daqianxi) 4—6 世纪日耳曼人大规模向罗马帝国境内的迁徙。“日耳曼人”大概是凯尔特人对其邻人的称呼，含义不详，古希腊、罗马人称之为野蛮人。约公元前 325 年，希腊作家皮提亚斯从马赛出发航行到北方的琥珀海岸，首次报导了住在那里的日耳曼人的一支条顿人的情况。约公元前 49 年凯撒著的《高卢战记》和 98 年塔西陀著的《日耳曼尼亚志》，详细记述了日耳曼人的社会和生活。日耳曼人居住在多瑙河、莱茵河、维斯瓦河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大多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出现私有制和阶级的萌芽，军事首长及其扈从渴望向外扩张，夺取财富和土地。3 世纪起，罗马奴隶制帝国日益没落，无法抵御外族入侵。奴隶和隶农的起义连绵不断，并把日耳曼人当成救星。376 年，黑海北岸的西哥特人，抵挡不住匈奴人的进攻，经罗马帝国皇帝允许，渡多瑙河进入帝国，是为日耳曼人大迁徙的开始。410 年，西哥特人在起义奴隶支援下攻陷罗马，洗劫 3 天后离去，于 419 年在高卢南部建立以土鲁斯为中心的西哥特王国。439 年，奥得河畔的汪达尔人，经高卢、西班牙到北非，建立以迦太基城为中心的汪达尔王国。5 世纪中叶，住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勃艮第人进入萨伏伊，建立以里昂为中心的勃艮第王国。大致同时，盎格鲁、萨克森和裘特人渡过北海进入不列颠，建立许多小王国，9 世纪上半叶完成统一，称英格兰。476 年，雇佣兵将领奥多亚克废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建奥多亚克王国，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493 年，东哥特人从潘诺尼亚进入意大利，并在东罗马帝国支持下诱杀奥多亚克，夺取政权，建立东哥特王国。486 年，法兰克人在克洛维率领下大败罗马军队于苏瓦松，在高卢北部建立法兰克王国。568 年，伦巴德人从潘诺尼亚侵入意大利，在奴隶、隶农支持下占领意大利中、北部，建立伦巴德王国，日耳曼人大迁徙终结。日耳曼人大迁徙加速了西罗马奴隶制帝国的灭亡，也促进日耳曼人氏族制度的瓦解。在原西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的日耳曼人王国里，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互相影响，但主要在罗马生产力的影响下，终于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进入封建社会。

(孔祥民)

法兰克王国

(Falanke wangguo) 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建立的封建国家。3世纪罗马士兵唱的军歌里首次提到法兰克人，是住于莱茵河下游的一个部落联盟，以勇敢著称。4、5世纪时分为两支：住在莱茵河口附近和索姆河流域的叫海滨法兰克人，或称萨利克法兰克人；住在以科隆为中心的莱茵河两岸到默兹河之间的叫河滨法兰克人，或称里普阿尔法兰克人。他们不断冲入帝国边境，大肆屠杀，甚至威胁科隆和特里尔。

486年，一支萨利克法兰克人在首领克洛维率领下越过今比利时南下，联合另一支萨利克法兰克人，在苏瓦松击败罗马帝国军队，占领巴黎和卢瓦尔河以北土地，奠定法兰克王国的基础。克洛维从一个军事首领变成真正的国王，并以祖父之名称新王朝为墨洛温王朝(486—751)。克洛维东征西讨，用阴谋手段消灭其他法兰克人领袖，几乎占领整个高卢，并在都尔接受东罗马帝国所封执政官头衔，定都巴黎。他死后4个儿子瓜分国土，分别称梅斯王、奥尔良王、巴黎王和苏瓦松王。6世纪中叶，苏瓦松王一度统一整个王国，但死后又被4个儿子瓜分，他们是巴黎王、勃艮第王、纽斯特里亚王和奥斯特拉西亚王。7世纪中叶，王权衰落，大权归于原是王室财产总管的宫相之手。687年，奥斯特拉西亚宫相赫里斯塔尔·丕平，翦灭群雄，成为全国唯一的宫相。老丕平的儿子查理·马特和孙子矮子丕平相继独揽大权，也都以宫相名义进行统治。

751年，矮子丕平遣使晋见教皇札卡赖亚斯，说法兰克的国王们实际没有任何权力，全靠宫相的吩咐办事。教皇心领神会地回答，有实权的应当称王。丕平在苏瓦松召开大会，隆重宣布教皇的“决定”，自立为王，建立加洛林王朝(751—843)。矮子丕平的儿子查理统治时期，加洛林王朝达到极盛。800年圣诞节，教皇为他加冕，称查理大帝。查理拉丁文称“加洛尔”，故名加洛林王朝。

查理大帝死后，帝国分裂，三个孙子洛塔尔、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分别称意大利王、东法兰克王和西法兰克王。843年8月签订凡尔登条约，正式瓜分帝国。高卢、些尔德河和默兹河以西归秃头查理，称西法兰克王国，后来演变成法国。莱茵河以东，包括莱茵河以西的沃姆斯、美因兹和斯拜伊尔，归日耳曼人路易，称东法兰克王国，后来演变成德国。哥哥洛塔尔袭帝号，都亚琛，分得介于东、西法兰克之间土地，称中法兰克王国，后来形成意大利。马克思说：“查理帝国是近代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奠基的先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07页)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75-1.bmp}

(孔祥民)

采邑制

(Caiyizhi) 中古西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式，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688—741)率先实行。“采邑”拉丁文原意为“恩赐”，指封主赐给封臣的土地或其他财产。墨洛温王朝末期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自由农大量破产，国家无可可用之兵，中央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衰落。赫里斯塔尔·丕平死后，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立即开始。丕平的妻子监禁查理(即查理·马特)，把持政权。纽斯特里亚、勃艮第、阿奎丹和弗里斯兰独立，萨克森人、阿瓦尔人，特别是阿拉伯人乘机发动进攻。查理在奥斯特拉西亚贵族支持下平定叛乱，又于732年在普瓦提埃粉碎阿拉伯人的进攻，声威大振，被称为“马特”(锤子)。查理·马特是法兰克封建统治阶级中有眼光的政治家，深知不改变墨洛温王朝无条件封赐土地的办法，实行新的采邑制，便不可能长治久安。他没收叛乱贵族和部分教会土地封给官员和将领，受封者必须服兵役和履行封臣义务(如缴纳捐税，交出盗匪)，而且只限本人，不得世袭。双方如有一方死亡，或封臣不履行义务，分封关系终止。如愿继续以前的关系，必须重新分封。加洛林王朝时期，正式形成分封礼：封主赐给封臣以象征土地的泥土、茅草和树枝，封臣跪下双手合掌放在封主手里，并按着圣经向上帝宣誓忠于封主。查理·马特的采邑改革影响重大。它促进大封建主势力的衰落和王权的复兴，为加洛林王朝的强盛奠定基础。从国王到各级封建主，层层封受土地，层层结成主从关系，形成阶梯式的封建等级制，是西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征。封主有责任保护封臣，封臣必须忠于封主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封建主阶级的内部联系加强了。封主可以扣押、收回、转封土地，封臣可以经营、转让、再分封以至出售土地，但得到土地者必须继承凝结在土地上的种种义务。封臣得到土地时，往往得到对土地上自由人的管辖权，对劳动人民的控制加强了。采邑改革后，骑兵逐渐代替步兵，兴起骑士阶层，中小地主力量加强。天长日久，采邑改革的条件难以全部实行。9世纪以后，封臣及其继承人往往世代享有采邑，仍保留服兵役和其他义务，采邑变成世袭领地。大封建主的势力重新崛起，导致王权彻底削弱和查理大帝帝国的瓦解。

(孔祥民)

封建庄园制

(fengjian zhuangyuanzhi) 中古西欧封建主剥削农奴的基本组织(有人认为是封建社会的基层经济单位和生产的基本组织),在其他地区和国家,也曾有一定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这种组织。我国西藏地区亦有封建庄园,1959年民主改革时被彻底消灭。

在西欧,封建化过程完成后,国王、教会和封建主的庄园分布各地。他们大多先侵占公有地,后逐户蚕食,直到吞掉一个或几个农村公社,所以形成的庄园大小不等。大庄园有一个或几个村庄,小的只有一个村庄的一部分。庄园实际是农村公社的变种,只是增加一个主人而已。庄园里有教堂、堡垒、仓库以及封建主和农奴的住房,还有磨坊、烤面包坊和各种作坊。庄园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手工业尚未与农业分离。农民生产是为满足自己家庭生活的需要和为封建主提供消费资料,不是为了交换。需要购买的东西不多,只有盐、铁和少量香料。庄园的土地有耕地、园田、森林和荒地。耕地大致分成春播地、秋播地和休耕地三片,轮流耕作,即强制轮作制,总有2/3的土地在耕种。休耕地、收割后的耕地和荒地是公共牧场,大家使用。耕地,包括领主自营地和农奴的份地,都分割成条田,犬牙交错地分布在每片土地上。农奴除耕种自己的份地外,还要带着工具无偿地为领主耕种自营地,每周3~5天,农忙时增加,且须先完成领主自营地上的生产和收获。份地上的产品归农奴自己,自营地上收获归领主,所以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清二楚。这种封建剥削称劳役地租。农奴还得向封建主献纳贡物,如鸡蛋、家禽和酒;交纳各种捐税,如人头税、诉讼捐、什一税、结婚税和继承税(通常是一头好牲畜);还要做各种杂役和临时性徭役,如砍柴、运输、盖房、修桥、筑路等。农奴使用磨坊和烤面包坊也得交税,甚至变成固定税收,不用也要交税。封建主还有审判和惩罚农奴的权力。农奴虽然受到沉重的剥削,但毕竟有自己的独立经济,比奴隶有更多的劳动兴趣,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12、13世纪以后,西欧城市大批兴起,商品货币关系渗入农村,农奴改纳货币地租并逐渐取得人身自由,领主自营地消失,庄园解体。16、17世纪,随着商品经济和粮食贸易的发展,易北河以东和东欧一带,庄园经济又兴盛起来,直到近代。

(孔祥民)

封建等级制

(fengjian dengjizhi) 封建主阶级内部按经济、政治地位划分为不同等级或社会集团的制度，目的是协调封建主阶级的内部关系，维护封建统治。各个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上下尊卑，界限森严，象金字塔似的层层排列，故称封建等级制。在西欧各国，封建等级制是以土地的层层封授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国王把大部分土地作为采邑封给大封建主，如公爵、伯爵和侯爵(又叫边疆伯爵)，后者把部分土地作为采邑封给中等封建主，如子爵和男爵，中等封建主再把土地封给最低的封建主——骑士。每个等级的成员是其下一级的封主(领主)，下级成员是上一级的封臣(陪臣、附庸)。实际上，一个封主可以有许多封臣，一个封臣也可以有几个封主。如 12 世纪法国的香槟伯爵，最初只是法王的封臣，后来竟成理姆斯大主教、朗格里主教、勃艮第公爵等 9 个领主的封臣。13 世纪的英王“无地王”约翰，由于袭任安茹伯爵而同时是法王的封臣，使英、法两国关系复杂化。有时候，封臣只承认直接受封的封主是自己的封主，对封主的封主没有臣属关系，出现“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现象。天主教会也按照封建等级制分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甫、助祭和副助祭等不同的品位，各有不同级别的神权，即教阶制。东正教除无教皇和红衣主教外，其教阶制与天主教类似。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完全被排斥在封建等级制之外。城市市民称第三等级，位列僧侣和贵族之下，也处于政治上无权的状态。建立封主和封臣关系要举行隆重的仪式，称分封礼(又称“臣服礼”、“敕封式”)。封臣跪下，双手合掌放在封主手里，宣誓竭尽一切效忠封主。封主赐给封臣一小撮泥土、树枝或茅草，象征封给土地。教会里的分封式称“授职礼”(或“策封式”)，授给下级僧侣以象征宗教权力的指环和牧杖。11—12 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教皇发生争夺策封权的长期斗争，后达成协议(1122 年的沃姆斯和约)，当选主教由皇帝授予象征土地的权力，教会授给象征宗教的权力。封主要保护封臣，封臣必须效忠封主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为封主出兵打仗，一般每年不超过 40 天；封主被俘、长女出嫁、长子行骑士礼时要交纳一笔钱支援，称献金；出席封主的法庭，帮助封主解决争讼等。

(孔祥民)

手工业行会

(shougongye hanghui) 中世纪西欧城市里手工业者的封建性组织，最早出现于 10 世纪的意大利。11—12 世纪，法、德、英等国的城市纷纷兴起，普遍产生行会。初期的手工业生产规模狭小，市场有限，再加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经常遇到封建主的抢劫、勒索和逃亡农奴的竞争，很难正常进行。为抵抗封建主的欺凌，避免行业内部和外来者的竞争，生产者便组成行会。城市的军队，除用钱购买的雇佣兵外，主要是组织在行会里的手工业者。他们以行会为单位组织军队，由会长率领，在保卫城市和保障手工业者的生活生产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行会章程对生产规模、生产时间、学徒和帮工人数、原料分配以及产品的规格、质量和价格，都有明文规定，违者罚款或严厉惩处。有的甚至规定不许设橱窗招揽顾客，不许夜间加班。行会还兴办公益事业，如救济孤寡、修建公共会所、管理街灯等。总之，行会初期在保卫城市、保卫手工业生产和促进生产经验、生产技术的积累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行会的全权会员是本行业的作坊主，称师傅或匠师。师傅是全能的生产者，在学徒和帮工的协助下参加整个生产过程。就是说，生产过程没有分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密切结合，就象蜗牛和它的甲壳紧密结合一样。学徒住在师傅家里，向师傅学习生产技术并交纳学习费用，经过一定的学徒期（1、2 年到 7、8 年不等，个别有 10 年或 10 年以上的），可以升为帮工。帮工辅助师傅生产，有工资，经过一定时期并通过考核证明能独立操作，可升为师傅。在正常情况下，学徒可依次升为帮工和师傅。

14 世纪末起，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行会的积极作用渐渐消失，变成妨碍生产发展的障碍。它极力反对扩大再生产，限制技术革新和使用新设备，阻挠学徒、帮工的晋升，成为少数人把持的保守组织。学徒期限不断延长，以便尽量剥削。帮工的劳动条件恶化，工作日长达 16~18 小时，工资越来越低。他们拿不起成本昂贵的“匠师作”，摆不起豪华的宴会，晋升十分困难，成为“永久帮工”和学徒。师傅的儿子、女婿和近亲，不经考核就很容易加入行会成为师傅。帮工、学徒实际上沦为雇佣工人，少数富裕的师傅成了资本家。帮工和学徒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工资和举行罢工，捍卫自己的利益。1470 年，斯特拉斯堡、弗赖堡等地的毛皮匠帮工，举行同盟罢工。15 世纪初，康斯坦茨和伦敦的裁缝帮工，也发生过罢工斗争。有些地方的帮工还参加城市平民的运动。

(孔祥民)

基督教会

(Jidujiaohui) 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各支教派组织的总称，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和一些较小的派别组织。在我国，有时专指新教。

公元1世纪中叶，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的巴勒斯坦一带，反映受苦受难的下层群众的愿望。2—3世纪，分散的组织逐渐形成统一的教会，在成分、教义和性质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变成统治阶级可以利用的工具。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380年（另说392年），罗马皇帝正式承认基督教为国教，赐以大量土地和特权。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两部分基督教会之间的矛盾和分化加剧。1054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与罗马教皇互相宣布开除对方的教籍，基督教会正式分裂为两派。西派教会自称公教（意思是“普世”、“广泛”），音译为加特利教，我国又称天主教。东派教会自称正教（意思是“正统”、“正宗”），主要流传在东欧各国，又称东正教。在中古西欧，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一般占有全部土地的1/3，并向全体居民征收什一税。它建立与封建等级制相似的教阶制，不同的品级拥有等级不同的神权。天主教会还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有权为皇帝加冕，可以组织军队（如十字军东侵时期的骑士团），垄断着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一切反封建的斗争只能以“异端”的形式出现，首先批判天主教神学，以剥去其神圣的外衣。16世纪，西欧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即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基督教——新教。新教有三大支派，即路德教（路德宗、信义宗）、卡尔文教（归正宗、更正宗、长老派）和英国国教（圣公会、安立干教），还有数百个小支派。新教强调耶稣是上帝的唯一代表，只有通过耶稣才能知晓上帝，所以我国又称为耶稣教或基督教。基督教的不同派别，曾于7世纪（唐朝）和13世纪（元朝）传入我国，但流传不广。16世纪（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再度传来天主教。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占我国的台湾，一度传来新教。鸦片战争前后，新教各派纷纷派遣大批传教士到中国。18世纪初（清朝雍正年间），东正教通过俄国传入我国。

（孔祥民）

天主教

(Tianzhujiao) 基督教的一支,亦音译为加特力教(意思是“普世”、“广泛”)或公教。以罗马为中心,又称罗马公教。有时又称旧教,以区别于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新教。与新教、东正教并称基督教的三大宗派。“天主”一词,始于16世纪末(我国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蓄须留发,着儒服,号称“西儒”。他们将我国的儒家学说与加特力教教义结合,说中国古书上讲的“天”就是西方主宰万物的“主”,遂称天主教,信徒日增。与利玛窦同时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著有《圣教实录》阐述加特力教教义,在该书中首先使用“天主”一词。公元1世纪中叶,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东部的巴勒斯坦,4世纪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基督教分为东、西两派。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主教与强有力的法兰克王国国王勾结,势力越来越大。751年法兰克王国宫相矮子丕平在教皇支持下取得政权,建立加洛林王朝。不久,教皇受到伦巴德人威胁,丕平以教皇捍卫者自居,两次出兵意大利,并将夺自拜占廷人的拉韦纳至罗马之间的“五城区”赠给教皇。史称“丕平献土”,奠定教皇国的基础。查理大帝和德皇奥托一世都赠给教皇若干城市,教皇国版图扩大。大致同时,教皇伪造所谓“君士坦丁赠礼”,诡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感谢罗马主教治好他的病,将罗马和帝国西部统治权赠给他和他的继承人,自己迁往君士坦丁堡。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彻底揭穿这个骗局。1054年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分裂,东派自称正教,西派自称公教,即天主教。在中古的西欧,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大封建主,也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它按照封建等级制建立自己的教阶制,各有不同级别的神权。“教皇”是最高首脑,希腊文,意思是“爸爸”,即古代对高级神职人员的尊称。教皇的头衔很多,如罗马城主教、西部宗主教、梵蒂冈君主、基督在世代表和教皇等。下有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甫、助祭和副助祭等。12—13世纪,教皇势力达到鼎盛,声称拥有普世的最高权力。大致同时,教会正式规定七件圣事为重要礼仪,即圣洗、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和婚配。14世纪起开始衰落,出现教皇迁居法国的阿维尼翁时期(1309—1377)和大分裂时期(1378—1417)。16世纪西欧爆发宗教改革运动,许多国家建立不受罗马控制的新教,天主教丧失统治地位。为挽回颓势,它召开特兰托会议并成立耶稣会猖狂反扑,但再也恢复不到过去的局面了。

(孔祥民)

神圣罗马帝国

(shensheng luoma diguo) 962年德国萨克森王朝国王奥托一世始建的封建帝国。德国建国之后不久，积极发动对意大利的侵略战争，961年，罗马内部发生冲突，奥托应一派之请带领大批人马侵入意大利。次年2月，教皇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奥托加冕，称奥古斯都，奠定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础。1154年，德皇腓特烈一世攻陷罗马，帮助教皇镇压阿诺德领导的罗马共和国。教皇感恩，为腓特烈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正式在罗马帝国名称之前冠以神圣二字。帝国的疆土以德国和意大利的中、北部为主，有时包括瑞士、尼德兰、捷克和法国的勃艮第、普罗旺斯。1354年查理四世皇帝颁布“黄金诏书”，正式承认七大选侯拥有选举皇帝的特权，使帝国的分裂割据合法化。从此王朝更替连绵不断，不可能出现强大的王权和民族统一，使神圣罗马帝国徒有虚名。18世纪末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得好，神圣罗马帝国既非“神圣”，亦非“罗马”，也非“帝国”。三十年战争时期（1618—1648），德国是主战场，破坏惨重，最后被肢解。1806年7月，莱茵地区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成立“莱茵同盟”，宣布独立，是对帝国的沉重打击，同年8月6日，弗朗西斯二世皇帝被迫退位，神圣罗马帝国最终灭亡。

（孔祥民）

英吉利王国

(Yingjiliwangguo) 封建社会时期的英国。5 世纪中叶，居住在易北河、威悉河和日德兰半岛的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和裘特人，渡海进入不列颠，沿泰晤士河和汉伯尔河向内地推进，赶走当地居民，建立七个小王国，即苏塞克斯、威塞克斯、埃塞克斯、麦西亚、诺森伯里亚、东盎格利亚和肯特，史称“七王国时代”。829 年，威塞克斯王爱格伯特在反对丹麦人的斗争中统一七王国，建立统一的英吉利王国。1066 年诺曼第公爵威廉率军在英格兰登陆，入主伦敦，开始诺曼王朝（1066—1135），封建化过程完成。英国受罗马经济文化的影响很少，在日耳曼人原始社会瓦解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诺曼王朝结束后，发生 20 多年王位之争。1154 年，安茹伯爵亨利入主英国，开始安茹王朝（1154—1399），又称金雀花王朝或普兰他日奈王朝。无地王约翰时期，被迫签署大宪章。1265 年首次召开国会，建立等级君主制。13 世纪初，与法国爆发百年战争。兰加斯特王朝（1399—1461）时发生玫瑰战争，到约克王朝（1461—1485）末期结束，建立著名的都铎王朝（1485—1603）。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是著名的专制君主。斯图亚特王朝（1603—1649）是英吉利王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

（孔祥民）

瓦特·泰勒起义

(wate taileqiyi) 1381 年瓦特·泰勒领导的英国农民大起义。从 13 世纪起，英国的货币地租占优势，农民中的两极分化加剧。1348 年的黑死病，使人口减少一半，粮价飞涨。政府一再颁布雇工法，强迫劳工按黑死病前工资受雇。1380 年，国会为继续百年战争，加征人头税。抗税斗争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1381 年 5 月底首先在埃塞克斯郡爆发，很快波及肯特郡。6 月 13 日，农民军在平民支持下占领伦敦，震动全国。14 日，农民军向英王理查二世提出废除农奴制、贸易自由、每亩货币租不得超过 4 便士和大赦起义者 4 条要求，称迈尔恩德纲领。贫苦农民要求再见国王继续申诉。15 日，泰勒代表农民向国王提出废除雇工法、废除农奴制、取消领主特权和没收教会土地分给农民，称史密斯菲尔德纲领。这时国王已做好准备，派人刺死泰勒，并命令农民回家。伦敦贴出告示，居住不满一年者必须当天离开，违者斩。伦敦和各地的农民军先后被镇压。泰勒起义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斗争矛头直指除国王外的中央政府，并且提出土地问题和雇工法问题，是农民起义发展到新高潮的标志。起义加速了农奴制的崩溃，许多农奴取得人身自由。14 世纪末，英国的农奴制实际被消灭。

(孔祥民)

圈地运动

(Quandi yundong) 从 15 世纪末到 19 世纪末英国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运动，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典型方式，大致以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界线，分为两个阶段，顶点在 19 世纪。荷、法、德等西欧国家也有类似过程。15 世纪末，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英国和佛兰德尔的毛纺织业空前繁荣，引起羊毛价格上涨。养羊业变得有利可图，超过农业收益一倍以上，英国流行这样一句话，“羊蹄子可以把泥土变成黄金。”英国的旧贵族在玫瑰战争中互相厮杀消灭殆尽，醉心于赚取更多货币的新贵族竭力发展养羊业，他们的口号是变耕地为牧场。他们用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用栅栏、篱笆和沟渠把土地围起来作牧羊场，自己雇工经营或者租给农场主，这就是圈地运动。圈地最先从商品关系比较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最初圈占森林、牧场、荒地、池沼等公有地，后来殃及农民的耕地，强行拆除或放火烧掉农民的小屋，逼得他们家破人亡，以致有些地方只剩下地主的房屋。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里痛斥为“羊吃人”。著名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在他著的《亨利七世的朝代》中也写道：1489 年圈地更加习以为常了，以前由多数人及其家族耕作的耕地，转化为少数人照管的牧场；大部分小农生活所赖的各种租地，都转化为封建主的庄园了。政府考虑到流浪者太多影响治安，多次限制圈地。然而到 1533 年有的牧主竟养羊 24000 头，远远超过限额。16 世纪 30 年代亨利八世推行的宗教改革，把圈地运动推向第一个高潮，他下令没收 3000 多座寺院的土地和财产，然后分光卖净，不是送给贪得无厌的宠臣，就是廉价卖给投机的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同样赶走农民，把耕地合并起来经营养羊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国会通过几百项“剥夺人民的法令”，即“公有地圈围法”，送给地主几十万亩公有地。19 世纪初更有所谓“清扫领地”，即动员军队强行拆毁村庄，改成农牧场。圈地运动是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到 19 世纪前半叶英国的自耕农基本消灭。破产农民为生活所迫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大多数人流离失所，无以为生，政府污蔑他们自愿犯罪，颁布许多稀奇古怪的血腥立法予以惩罚。16 世纪末英国已有一个富裕的农业资本家阶级；他们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改进耕作方法，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圈地运动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但基础是用一种剥削代替另一种剥削。

(孔祥民)

新贵族

(xinguizu) 英国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主要由被称为乡绅的中、小贵族演化而来，也包括一批官吏、商人和少数富裕农民。从 12 世纪中叶起，英国的骑士交纳盾牌钱后免服军役，可以专营农牧业，渐渐与市民接近。15 世纪末起许多中小贵族参与圈地，与资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逐渐资产阶级化。16 世纪 30 年代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没收大量教会的土地和财富并分光卖净，把圈地运动推向高潮，使新贵族的力量明显加强。他们为赚取更多的利润，自己组织农牧场，雇工经营，或将土地租给农场主，坐收资本主义地租。除农牧业外，新贵族也经营采矿、工业、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17 世纪中叶，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这次革命中的著名领袖、政治家和军事家奥立弗·克伦威尔，就出生于亨丁顿郡的一个新贵族家庭。1646 年 2 月，长期国会通过决议废除“骑士领地制”，取消贵族对国王的从属关系和封建义务，新贵族在土地问题上不再受国王的干涉，完全变成资产阶级地主。革命成功后，新贵族与资产阶级逐渐合流。

(孔祥民)

斯图亚特王朝

(Situyate wangchao) 苏格兰的斯图亚特家族在英国建立的王朝(1603—1649, 1660—1714)。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死后无嗣,由堂弟、苏格兰王詹姆士继承英国王位,称詹姆士一世,开始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极力加强王权和安立干教,迫害清教徒,引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不满。其子查理一世继承乃父政策,矛盾激化,导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49年1月,查理作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的敌人被送上断头台,斯图亚特王朝倾覆。1660年查理一世子查理二世在保王党和新贵族、资产阶级的拥戴下回国登基,恢复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二世和其弟詹姆士二世在政治和宗教上推行反动政策,与海外贸易的劲敌法国保持亲密的外交关系,引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不满。1688年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发动政变,废詹姆士二世,迎立其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和女婿荷兰执政,威廉继承英国王位,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威廉之后,由詹姆士二世之女安妮继承。安妮死后无嗣,由堂弟、德国的汉诺威选侯乔治一世继承,斯图亚特王朝再度终结,开始了英国史上的汉诺威王朝。

(孔祥民)

法国城市公社

(faguo chengshi gongshe) 中古法国城市自治的一种类型。11、12世纪，在领主的土地上兴起大批城市。领主自然把城市当作自己的私产，从政治、经济、司法各方面进行剥削压迫，甚至强迫市民服劳役。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力量的壮大，城市便展开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争取自治权利，市民阶级反抗封建主的有力武器是货币，即用金钱购买自治权，多数是通过武装斗争，或者两种方式交替使用，最终获得自治权，建立城市公社。法国北部的琅城建立城市公社的过程具有典型性。琅城是个主教城市，1108年市民出钱买得自治权，并经国王批准成立公社。主教把钱用光后又来要钱，扬言不给就取消公社。1112年，市民发动武装起义，高喊“公社”口号，用乱棍打死主教，成立琅城公社。不久，国王和封建主镇压了起义，解散公社。经过反复斗争，琅城主教于1128年颁布“和平法令”，恢复公社的权利，但避免使用公社一词，称“和平机构”。苏瓦松和亚眠也是交替使用购买和起义两种方式取得城市自治权。城市公社有选举产生的市政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制定法令、决定赋税、成立武装和组织审判，并选举城市最高长官——市长。一般说来，公社的实权掌握在城市贵族或行会上层手里。

(孔祥民)

法国农民起义

(faguo nongmin qiyi)1358年法国北方发生的农民大起义。14世纪的法国，多数农民取得人身自由，向封建主缴纳货币地租和其他苛捐杂税。农民为交租，必须到市场上出卖部分产品，又遭受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1348年的黑死病，使农村劳动力锐减。百年战争初期法国惨败，国王和大批贵族被俘，英国乘机勒索大量赎金，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5月底，农民起义首先在博韦爆发，很快席卷北部广大地区，参加者达10多万人，领导人是有军事常识的吉约姆·卡尔。口号是“杀死全国贵族，直到最后一个”。他们的旗帜上绘有王徽百合花，象征忠于国王。当时巴黎发生市民起义，但拒绝支持起义农民，只有一些小城市站在农民一边。6月初，法王女婿、那瓦尔国王恶人查理，纠集约1000名法国和英国骑士，准备进攻农民军。卡尔下令用战车布成环形阵地，集中6000兵力严阵以待。查理见农民军势众，诡称和谈，将卡尔诱捕杀害，然后乘机进攻。农民军失败，被杀者2万多人。不久，太子查理攻占巴黎，市民起义也以失败告终。这次农民起义在法国历史上规模空前，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农民对封建主阶级存在幻想，没有识破敌人的谈判阴谋，终于受骗上当。以后农奴的解放过程加快，更多的人取得人身自由。

(孔祥民)

百年战争

(Bainian zhanzheng) 英、法两国力争夺佛兰德尔和大陆领地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在法国领土上进行，长达百年之久。1337 年底，英王爱德华三世声称有权以外甥资格继承法国王位，不宣而战攻入法国，百年战争开始，第一阶段（1337—1360），法国惨败。普瓦提埃一战，法王和大批贵族被俘，根据 1360 年的布勒丁尼和约，加莱和西南部大片领土割给英国。战争第二阶段（1369—1396），法军转败为胜，收复除加莱等 5 个港口外的全部失地。1396 年双方缔结 20 年停战协定。15 世纪初，法国发生王位之争，奥尔良公爵（又称阿曼涅克派）和勃艮第公爵两大集团混战不已。英王亨利五世又声称有权继承法国王位，派兵登陆诺曼第，百年战争第三阶段（1415—1453）开始。阿金库尔一战法军大败，包括巴黎在内的北方半壁江山尽陷敌手。王太子即位南方，称查理七世，力图复兴。法国人民的爱国情绪高涨，开展游击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百年战争的性质转变为反对英国侵略的正义战争。女民族英雄贞德晋见查理七世，请纓杀敌。1429 年贞德带兵解救奥尔良之围，并乘胜北上光复兰斯（巴黎附近）。1453 年波尔多之役，英军被歼，百年战争以法国的胜利结束。除加莱港外，法国光复全部失地。不久，法国实现统一，建立强有力的专制王权。

（孔祥民）

宗教改革

(zongjiao gaige) 16 世纪西欧多数国家发生的反对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的社会、思想和政治运动。改革后的基督教称新教，我国又叫耶稣教。

在中古的西欧，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也是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垄断着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所以，一切反封建的斗争必然以“异端”的形式首先攻击天主教会，剥夺其神圣的外衣。从 13 世纪起，改革教会的呼声此起彼伏。15 世纪，出现不受罗马控制的民族教会。16 世纪，终于演变成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遍及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唯名论反对唯实论的斗争，也对宗教改革发生深刻的影响。

德国是宗教改革的策源地，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奠基人。16 世纪初，德国的农、工、商业发展很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平民，反对天主教会和诸侯的反动统治，要求结束分裂割据，实现国家统一。1517 年 10 月 31 日，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在万圣教堂门口贴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 95 条论纲），正式点燃宗教改革的烈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卷入反罗马的浪潮之中。1520 年前后，路德系统提出唯信称义、政教分离、廉价教会和改革文化教育等主张，发出驱逐罗马教会实现德国独立的檄文。教皇发布训令进行迫害，路德当众将其烧毁。在 1521 年的沃姆斯帝国议会上，他顶住围攻，坚决捍卫自己的主张。1524 年夏大规模农民战争爆发后，路德号召象打死疯狗一样镇压起义的农民，他的宗教改革也堕落为诸侯的工具。1555 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承认路德教的合法地位。大致同时，瑞典、丹麦和挪威改宗路德教。

继路德之后，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成功的宗教改革。他提出先定论（又称预定论），主张建立民主选举产生的廉价教会，反映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教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宗教外衣，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地区广泛传播。今天，加尔文教仍是新教的一大支派，在英、美和瑞士有很大影响。

16 世纪初，法国建立强大的王权，取得任命教会人员的权力。法国天主教会成为王权的支柱，新教徒遭到迫害。“宗教战争”（1562—1594）闹得国家分裂，王权衰落。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1598 年），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但允许新教信仰自由。

英王亨利八世实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1534 年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有权处理一切教会事务，不服从者处死刑。从此剥夺教皇对英国教会的一切权力，变教会为国家机构组成部分。1559 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让国会重新通过“至尊法案”，并于 1563 年颁布“三十九信条”，作为信仰的唯一准则。改革后的教会接近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称英国国教会（或圣公会、安立干教会）。安立干教也是新教的一大支派，在英、美和意大利有很大影响。

16 世纪 60 年代，尼德兰的人民群众以加尔文教为旗帜举行资产阶级革命，反对西班牙的专制统治。1579 年，尼德兰北方 7 省成立“乌特勒支同盟”，宣布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永不分裂，奠定荷兰共和国的基础。1581 年，颁布“断绝关系法令”，废黜西班牙王，正式独立，终于诞生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宗教改革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和西欧的封建制度，在历史上具有进步

作用。在部分德国、北欧诸国、瑞士、荷兰和英国等地，建立不受罗马控制的新教组织。新教和天主教都是信奉耶稣为救世主的教派，都信仰上帝、三位一体、耶稣受难升天和末日审判等，但也有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新教主张人靠信仰可以直接和上帝交往，否认神职人员和圣礼的作用，即所谓“唯信称义”。新教还反对炼狱、圣餐变体和尊玛利亚为圣母，只承认洗礼和圣餐礼两种圣礼，解释也有所不同。新教的教会制度多样化：安立干教实行主教制，卡尔文教实行长老制，英国清教徒的独立派实行公理制（信徒自定礼仪、制度）。天主教会为挽回败局，猖狂反扑，成立耶稣会，召开特兰托宗教会议，重申天主教的一切原则都是正确的，谴责一切与此不符的言行。尽管如此，天主教再也无法恢复到宗教改革前的垄断地位了。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80-1.bmp}

（孔祥民）

德国农民战争（参见“闵采尔”）

（Deguo nongminzhazheng）1524—1525 年德国农民的反封建武装起义，也是从路德宗教改革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顶点。16 世纪初，德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上分裂割据发生尖锐冲突。驱逐教皇势力和结束诸侯割据，进而实现国家统一，是 16 世纪德国革命的基本任务。路德及其领导的宗教改革改弦易辙以后，接着爆发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1524 年夏，大规模农民战争首先在士瓦本南方爆发，次年春席卷莱茵河、多瑙河和莱希河之间地区，达 3~4 万人之众。在闵采尔的影响下，农民军制定革命纲领“书简”，号召打倒封建统治阶级，由普通人掌握政权。农民军中温和派占上风，主张采取守势并与官方谈判。陷于四面楚歌的士瓦本联盟司令官特鲁赫泽斯，乘机与几支农军达成停战协议，争取时间反扑。为准备谈判，这几支农军的领导人拟定 12 条要求，即门明根十二条款。这是农民的具体要求与新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共和派企图把农民战争纳入自己政治轨道的表现。特鲁赫泽斯纠集万余人的部队，分别击溃各支农民军。1525 年 3 月底，法兰克尼亚爆发农民起义，惩办地主恶霸，占领数百座寺院和城堡。5 月，几支农民军的代表在海尔布琅集会，讨论行动计划。一支农民军领导人希普勒提出著名的“海尔布琅纲领”，主要反映资产阶级君主派统一德国的要求。至于农民的具体要求，象变戏法一样踪影全无。特鲁赫泽斯率部赶到，各支农民军相继失败。图林根和萨克森是农民战争另一个中心地区。1525 年 3 月，缪尔豪森的矿工和平民推翻贵族统治，成立革命政权“永久市政会”。闵采尔是新政权的实际负责人。不久，整个图林根、萨克森到处发生起义。黑森伯爵惊呼：“缪尔豪森是一切冲突和不满的根基和发源地，一切叛乱行动象泉水一样从那里涌出。”5 月 15 日，黑森伯爵、萨克森公爵等组织 8000 人的联军，在弗兰根豪森击败装备差、缺乏良将的农民军主力。闵采尔受伤被俘，壮烈就义。6 月初，缪尔豪森陷落，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农民战争结束。上述三个地区的起义失败后，除蒂罗尔的农民军在盖斯迈尔的领导下坚持到 1526 年夏外，整个农民战争基本结束。失败的原因，除了农民的分散和极端狭隘性外，主要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市民的不坚决。血的历史经验说明，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并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农民战争打击了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显示了农民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诸侯是从农民战争失败中得到好处的唯一集团，德国的分裂割据依然如故。

（孔祥民）

文艺复兴

(Wenyi fuxing) 14—17世纪西欧多数国家发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意大利文原意是人文学的“复兴”或“复活”，因为当时的文学艺术家认为他们致力于研究以人为中心的新学科，如语法、修辞、诗歌、历史、伦理等，与以神为中心的天主教会神学根本不同。1550年，意大利画师G·瓦萨里在他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又译《意大利绘画、建筑、雕刻名人传》）里，第一次使用文艺复兴一词，把当时西欧文化的繁荣说成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尽管该词没有准确表达这次新文化运动的阶级性及其与古代文化的联系，人们还是沿用这个名称。

文艺复兴的历史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现。早在14、15世纪，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里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意大利是古代文明的中心之一，后来又与文化发达的拜占廷和阿拉伯国家有密切联系。14世纪初，教廷从罗马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成了法国王权的御用工具，威信扫地。所以，文艺复兴最早在意大利发生。15世纪末起，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文艺复兴也越出意大利一隅，遍及西欧各国。14、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称前期文艺复兴，16、17世纪的文艺复兴称后期文艺复兴。

在中世纪的西欧，天主教会垄断着文化思想。为麻痹劳动人民和巩固封建统治，教会竭力鼓吹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它强行把人的精神和肉体分开，要求人在肉体上苦修苦行，换取所谓来世的欢乐。那个时代人的价值等于零，物质生活越低越好，精神生活更是禁区。有位教皇公然说：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母。资产阶级兴起以后，为了发展经济，需要文化科学知识，他们搜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作品，从中吸取养料，并继承和发扬中世纪民间文学、城市文学和唯名论的斗争传统，在文学、艺术、历史、政治思想、自然科学和哲学各个领域，向天主教神学和封建制度猛烈开火。

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又称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人为中心，提倡人权，反对来世主义。他们颂扬人性，主张人应过人的生活，要有人情和生活气息，反对禁欲主义。他们赞美文化科学，反对蒙昧主义。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人具有高贵的理性，人具有伟大的力量，人的行为象天使，人的智慧象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文学家彼特拉克说得好：“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之中。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唯物主义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甚至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战斗口号。

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涌现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文学方面，体裁新颖多样，内容生动活泼，从不同角度鞭笞教会的腐朽，歌颂人的伟大，且用民族语言写作，流传广泛，脍炙人口。文学大师们塑造的哈姆雷特、安东尼奥、夏洛克和唐·吉珂德等典型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雕刻和绘画方面，突破中世纪呆板沉闷的格调，创造一批以人和自然为题材、充满生活气息的佳作。就是以宗教为题材的作品，也洋溢着现实主义精神。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像，温柔美丽，和蔼可亲，完全是普通妇女的形象，背景是田园风光，丝毫没有神秘的味道。史学方面，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一扫过去史学著作充满宗教气味的状况，进而指出教皇制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探求振兴祖国的道路，开创一代史学新风。意大利和德国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忧国忧民，痛感国家分裂之苦，奔走呼号，或直接拿起武器，为祖国的统一英

勇奋斗。彼特拉克号召意大利人挣脱身上的枷锁，马基雅维里和米开兰哲罗直接拿起武器奔向祖国解放的战场。著名的德国人文主义者胡登，积极参加和领导反对教皇和诸侯的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幻想建立没有私有制、没有人剥削人、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奠定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哥白尼创立的太阳中心说，揭开天文学和科学史上新的一页。布鲁诺提出宇宙无限的理论，克服了太阳中心说的局限。伽利略坚信真理存在于自然界中，还观察天体，丰富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刻卜勒发现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使哥白尼的学说更加接近真理，并为后来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奠定基础。此外，在数学、生物、医学、化学和唯物主义哲学方面，也有不少进展。

文艺复兴运动在历史上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然而，人文主义者鼓吹的人性、人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有的无限夸大爱情之类东西的作用，把它说成是最神圣的东西，否认阶级性的制约，或者划不清爱情与不正当男女关系的界线。有的从主张个人自由发展到鼓吹极端个人主义，反对任何约束和纪律。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只能散发有害的影响。人文主义者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崇拜英雄豪杰，轻视人民大众。他们塑造的典型人物往往是单枪匹马冲锋陷阵的英雄，没有群众斗争的场面。

（孔祥民）

克洛维

(Keluwei ,Clovis 465—511) 法兰克王国国王，墨洛温王朝的创立者。出生于墨洛温家族，父为军事首领。481 年继承父位。486 年在苏瓦松击败罗马军队，夺取巴黎和罗瓦尔河以北土地。史书记载，在分配战利品时，克洛维要求得到一只从教堂抢来的广口瓶，众人慑于他的权威只好答应。忽然一个坚持按旧习惯抽签分配的战士，举起战斧要砍瓶子，克洛维只好隐忍。可次年 3 月检阅军队时，借口该战士保管武器不当，用战斧劈开他的头颅。大家对此十分恐惧，说明克洛维已树立国王的权威。496 年，克洛维打败阿勒曼尼人，并率领 3000 亲兵接受洗礼，改信罗马基督教；教会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500 年与勃艮第人交兵。507 年在波瓦提埃附近击败西哥特人，杀其王，夺取加隆河以北土地。克洛维晚年，用阴谋手段残酷地剪除曾帮助他打天下的法兰克人其他首领，包括本族和近亲，统治着几乎整个高卢。克洛维在都尔接受东罗马皇帝所封执政官头衔，穿起紫袍披肩，戴上王冠，慷慨施舍，然后定都巴黎。511 年，克洛维在巴黎逝世，安葬在那里的圣彼得教堂。

(孔祥民)

查理曼

(Chaliman, Charlemagne 约 742—814) 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 (768—800) 和罗马人皇帝 (800—814), 又译查理大帝。法兰克名门出身, 曾祖父和祖父是执掌法兰克王国实权的宫相, 父亲是加洛林王朝第一代国王。父亲死后曾与弟共同治理国家, 弟死后成唯一国王。他一生发动 50 多次战争, 使王国达到鼎盛。774 年进攻伦巴德, 兼并意大利北部, 后又夺取南意之卡普亚和本内文图姆。787—801 年两次出兵西班牙, 夺取厄布罗河以北土地, 建立西班牙边区。787 年出兵莱希河畔, 夺取巴伐利亚。796 年攻占潘诺尼亚。772—804 年, 用兵 30 多年, 征服萨克森。800 年圣诞节, 教皇为之加冕, 称“罗马人皇帝”, 并高呼“万寿无疆, 永远胜利”。版图东起易北河, 西南至厄布罗河, 北临北海, 南至本内文图姆, 大致与西罗马帝国相当。中央权力强化, 设宫廷总管和管理各项事务的大臣。地方设伯爵区, 任命伯爵治理。他还奖掖文化, 兴办学校, 被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与苏格兰、阿斯图里亚和阿拉伯帝国关系友好, 东罗马帝国也最终承认其皇帝地位。查理曼为巩固新兴的封建统治做出重大贡献, 他采取的种种措施对后来西欧封建社会的模式有很大影响。814 年病逝于阿亨宫中, 终年 72 岁, 安葬在大教堂里。他死后不久, 帝国分裂。

(孔祥民)

奥托一世

(Aotuo yishi ,Otto 912—973) 德国萨克森王朝的第二代国王，兼意大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和首任皇帝，被尊为大帝。他自 936 年继位后，经过 10 余年的经营，完全平息各地公爵的叛乱，建立强有力的王权。955 年在奥格斯堡附近的莱希河畔粉碎匈牙利骑兵万余人的进攻，制止住匈牙利人的入侵，称大元帅。国际影响很大，希腊、罗马和基辅罗斯的使节纷纷来朝。951 年首次带兵侵入意大利北部，称意大利国王。961 年再次侵入意大利，次年 2 月教皇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他加冕称帝，奠定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础。奥托早就对易北河以东的斯拉夫人发动侵略战争，建立寺院、堡垒和移民区，实行殖民统治。大批斯拉夫人被屠杀和卖为奴隶，以致“斯拉夫”一字竟变成了奴隶的同义语。奥托晚年为掠夺更多的土地和财富，集中精力侵略意大利，把有生力量消耗在侵略战争上，终于使国家的统一事业付诸东流。恩格斯说：“罗马皇帝的称号和由此而来的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得民族国家不可能组成，并且使得力量在历次侵略意大利的征战中消耗尽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1964 年人民出版社，第 648 页）奥托的侵略也受到拜占廷的抵制。双方于 970 年议和，奥托放弃南意大利。973 年，病逝于萨克森。

（孔祥民）

贞德

(zhende, Jeanne d'arc 约 1412—1431) 法国女民族英雄。生于法国东北边境杜列米村农民家庭，自幼受过严格教育。当时，百年战争进入第三阶段，北方半壁江山尽陷敌手。法王查理七世在南方即位，控制着罗瓦尔河以南国土。1428 年底，英军包围通往南方的门户奥尔良城，妄图一举吞并整个法国。当此民族存亡关头，广大群众爱国情绪高涨，贞德就是群众中的优秀代表。她晋见法王，称上帝显圣命她解救奥尔良。1429 年 4 月底，她率 3000 援军抵达奥尔良，在决战中身先士卒，多处负伤仍坚持战斗，法军士气大振。英军不支，奥尔良之围遂解。法国人民热爱贞德，称她“奥尔良的女儿”。贞德乘胜北上，收复兰斯，并致书英王，要求英军全部撤回本国，还我河山，否则将予以全歼。法王慑于爱国运动的高涨和贞德的崇高威望，竟与里通英国的勃艮第公爵达成和解，实际剥夺贞德的军权。9 月初，贞德率部进军巴黎，法王却急令撤兵。1430 年 5 月，英军和勃艮第竟向兰斯反扑，康边告急。贞德主动出击，但寡不敌众被迫撤回。康边坡门紧闭，英雄不幸被俘。敌人将贞德押往卢昂审判，以妖术惑众、穿戴男装和“异端”等罪名，判处火刑，将尸灰投入塞纳河中。法国人民怀念贞德，称她“圣女”。法国人民爱国情绪继续高涨，终于取得反抗英国侵略的最后胜利。

(孔祥民)

马丁·路德

(Mading lude,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路德教的奠基者。生于矿业主家庭。爱尔福特大学毕业后加入奥古斯丁修会，后任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1517年10月31日，贴出95条论纲，点燃宗教改革的熊熊烈火。在1519年的莱比锡辩论会上，公开否定教皇权，为胡司翻案。1520年发表《罗马教皇权》、《基督徒的自由》、《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和《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等，系统提出唯信称义、廉洁教会、政教分离和改革文化教育等主张，发出驱逐罗马教会势力实现德国独立的战斗檄文，并勇敢地焚烧教皇的训令。在1521年的沃姆斯帝国议会上，顶住围攻，坚决捍卫自己的主张。接着躲在瓦特堡翻译圣经为德语，为德语的统一做出贡献，并开始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神化诸侯政权。1525年农民战争进入高潮，发表《忠告和平》，号召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要象杀死疯狗那样镇压起义的农民，犯了颠倒敌我关系的严重错误。1530年亲自审定路德教的系统理论提交帝国议会，称“奥格斯堡告白”，强调与无主教共同点的共同点，主张互相宽容，标志路德的宗教改革堕落成诸侯的工具，即庸俗市民的官方宗教。晚年仍幻想教皇召开宗教会议，解决分歧。1546年2月病逝于家乡厄斯勒本，葬于维登堡教堂。

(孔祥民)

闵采尔

(Mincaier, Thomas Münzer 约 1490—1525) 德国优秀的农民、平民革命家, 1524—1525 年德国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生于哈茨的施托尔堡, 家世和早年经历不详, 据说父亲被伯爵迫害致死。曾在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奥得) 大学学习, 后任神甫、修道院长和中学教师, 开始改革天主教的仪式。1517 年 10 月马丁·路德贴出 95 条论纲, 得到闵采尔的积极支持。1519 年的莱比锡辩论会, 他可能在场。1520 年 4 月, 经路德介绍任茨维克考牧师。他经常接近矿工、纺织工和下层群众, 与他们中间流传的再洗礼派关系密切, 帮助他们提出革命主张。当路德的调子越来越低的时候, 闵采尔挺身而出进行斗争。1521 年夏, 被迫离开茨维克, 辗转去捷克。11 月, 发表《告捷克人民书》(又称《布拉格宣言》), 第一次提出自己的系统主张, 号召用暴力实现社会变革, 把捷克的革命推广到德国和全世界。旋回德国任阿尔斯特德镇牧师, 大胆攻击诸侯和天主教会, 组织基督教同盟, 变该镇为下层人民运动的中心。闵采尔主张泛神论, 个别地方接近无神论。在政治上主张经过暴力革命建立没有私有制和阶级差别、由普通人掌权的社会。1524 年底, 到南方起义农民中去, 做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 接着直接领导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农民战争。1525 年 5 月受伤被俘, 遭严刑拷打, 但坚贞不屈, 壮烈就义。

(孔祥民)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254—1324) 中古意大利的旅行家，在沟通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上起过重大作用。威尼斯商人世家出身。父亲和叔父到过君士坦丁堡和布哈拉，并应元使之邀到过中国。1269年他们带着年轻的马可·波罗再次来华，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经伊朗和帕米尔高原，于1275年夏抵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受到忽必烈的盛宴欢迎。马可·波罗聪明颖慧，很快学会中国语言、书法和战术，被忽必烈重用。他多次奉命巡视国内各地，到过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和福建，甚至出使越南、爪哇、泰国、菲律宾和缅甸，详细报告各地风俗民情。1291年护送蒙古公主远嫁波斯，历时两年到达，然后动身西归，于1295年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全城为之轰动。1298年威尼斯与热那亚发生冲突，马可·波罗被俘入狱。在狱中口述在东方的见闻，由比萨人鲁思梯谦整理成书，即《马可·波罗行记》（又名《东方见闻录》）。书中描写北京的宫墙、房壁、天花板满涂金银，日本的金多无数用来盖房，而且声言绝对确实可信，促进15世纪末西欧冒险家寻找直接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达·伽马和哥伦布等人仔细阅读过此书。马可·波罗获释后任威尼斯大议会议员，1324年病逝，葬于圣劳伦斯教堂。

（孔祥民）

迪亚士

(Diyashi , Bartolomeu Dias 约 1450—1500) 葡萄牙航海家， 15 世纪末开辟新航路的重要人物之一。早在 15 世纪初，葡萄牙就积极参加对非洲的探险和殖民活动。1415 年占领非洲西北角距直布罗陀不远的休达城，亨利亲王任该地总督。亨利大力支持航海事业，设立航海学校，不断派船队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先后占领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等地。 70 年代至 80 年代，葡萄牙人抵达刚果、安哥拉和几内亚。1487 年迪亚士率 3 只船沿非洲西海岸继续南下，到达非洲东海岸的阿尔戈阿湾附近（南纬 33 度，东经 22 度）。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绕过非洲南端到达非洲东岸。1488 年返航时到达好望角，由于风浪极大，难于航行，迪亚士称之为“暴风角”。葡萄牙王认为，到此地后前往印度大有希望，改名“好望角”。迪亚士的航海图和资料，在达·伽马后来远航印度时发挥重要作用。 1500 年，迪亚士随葡萄牙另一航海家卡布拉从巴西去印度，途经好望角附近遇风暴罹难。

(孔祥民)

达·伽马

(DaJiama, VascodaGama 约 1460—1524) 葡萄牙航海家, 第一位完成从西欧经非洲南端到印度的航行。贵族出身。1497 年 7 月奉葡萄牙王曼努埃尔之命, 率船 4 艘和船员百余名, 从里斯本出发去印度。11 月 22 日绕过好望角。12 月初到达迪亚士所到最远处阿尔戈阿湾, 继续北上。经莫桑比克、蒙巴萨, 于 1498 年 4 月到达肯尼亚的马林迪。在这里遇到有经验的阿拉伯水手阿哈默德·伊本·马吉德, 在他的领航下横渡印度洋, 于 1498 年 5 月 20 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 (即《瀛涯胜览》里的古里)。达·伽马满载香料、宝石, 于次年 9 月初回到里斯本, 受到隆重欢迎, 被誉为葡萄牙的哥伦布。西欧直通印度的新航路终于开辟成功, 促进欧、亚两洲商业和航运业的发展, 同时开始西欧殖民者对东方的殖民掠夺。1502 年初, 达·伽马以海军上将身分率船 10 艘再航印度。沿途挑衅, 拦截商船, 杀人灭口, 炮轰卡利卡特, 强占果阿和柯钦。次年 9 月回到里斯本, 大发横财, 被封为印度和海上事务顾问、维迪奎埃拉伯爵。葡萄牙的殖民侵略, 受到东方人民的顽强抵抗。为控制局面, 葡王约翰第三次派达·伽马于 1524 年 9 月去印度, 并任命为印度总督。然而他力不从心, 同年 12 月底病死于印度的柯钦。

(孔祥民)

哥伦布

(Gelunbu, Christopher Columbus 约 1451—1506) 意大利航海家。毛纺织匠家庭出身。年轻时当水手，经常在地中海和北海航行。15 世纪末，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西欧出现黄金迷。哥伦布认为：有了黄金，“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他读过《马可·波罗行记》，相信意大利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的地圆说，认为从欧洲向西航行也可以到达盛产黄金、香料的中国和印度。他的远航计划受到葡萄牙王的冷落，却得到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西班牙王的支持。1492 年 4 月双方签订协定，哥伦布被任命为海军司令、钦差、总督，得到大批经济资助。1492 年 8 月 3 日，他带领 87 名水手，分乘 3 只船从巴罗斯港出发，经过艰苦的航行，于 10 月 12 日到达巴哈马群岛的瓦特林岛，接着又到古巴（哥伦布以为是中国）和海地（以为是日本），次年 3 月回到西班牙。1493 年 9 月，哥伦布再次远航，到了多米尼加、瓜德罗普和波多黎各，杀人越货，无恶不作。1498 年第三次远航，到达特里尼达和南美的奥里诺科河口。1501 年第四次远航，到达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等地，1504 年回到西班牙。不久患病卧床，1506 年病逝于法拉多利城。哥伦布的远航结束了美洲的孤立状态，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开始了西欧殖民者对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打断美洲历史上的独立发展进程。

（孔祥民）

麦哲伦

(Maizhelun, FernaodeMagalnaes 约 1480—1521) 葡萄牙航海家，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的组织者。破落骑士家庭出身。1505—1512年作为葡萄牙首任印度总督所率舰队的一名水手，前往印度、马六甲、瓜哇、菲律宾等地从事殖民活动，在海战中多次负伤，受到葡王的青睐。1513—1514年参加对摩洛哥的征战，又被击伤。他相信地圆说，认为绕道美洲仍然可以到达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葡王不理睬他的计划，1517年愤而迁往西班牙。在西班牙王的支持下，他于1519年9月20日，带领265人，分乘5只船，从圣卢卡港出发，于11月底绕过美洲南端的海峡（后称麦哲伦海峡），进入风平浪静的太平洋，到达菲律宾。1521年4月27日，麦哲伦进攻马克坦岛（在宿务以东），被当地首领拉普拉普领导下的战士击毙。他的同伴满载当地产的香料继续西航，横渡印度洋到达好望角，再沿非洲西海岸北上，于1522年9月6日回到出发地圣卢卡港，仅剩下维多利亚号一条船和18名虚弱不堪的水手。维多利亚号船长埃里·卡诺，公认为是麦哲伦死后完成环球航行的领导者。麦哲伦等人环球航行的成功，无可辩驳地证明地圆学说是正确的，对于人类地理知识的扩大和科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孔祥民）

但丁

(Danding,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佛罗伦萨没落贵族家庭出身。1300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六大行政官之一，后因反对教皇干涉内政，被革除公职，终身流放。他四处周游，讲学访友，广泛接触和了解现实，更加热爱祖国和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深知，“别人家的面包是多么含着苦味，别人家的楼梯是多么升降艰难。”他拒绝忏悔以求赦免，1315年又被佛罗伦萨当局缺席判处死刑。早年著有抒情诗《新生》，悼念早逝的女友。流放期间著有《论俗语》，主张用民族语言写作；《帝制论》主张政教分离，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君主国。代表作是用托斯卡尼方言写成的名著《神曲》，分《地狱》、《炼狱》、《天堂》三部，逝世前不久最后完成。《神曲》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的神学传统和宿命论观点，甚至不适当地把统一祖国的希望寄托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身上，但深刻地揭露了天主教会的腐朽，向往祖国的统一，赞美人的自由意志，表现出萌芽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神曲》结构严谨，形式整齐，善于抒情，感染力强，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但丁是新旧交替时期的思想家和诗人，恩格斯称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但丁晚年客居维罗纳和拉韦纳，1321年9月13日在拉韦纳逝世。

（孔祥民）

达·芬奇

(Da fenqi,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佛罗伦萨附近律师家庭出身，自幼勤奋好学，酷爱绘画，在名师安德烈·佛洛基奥指点下，初露才华。为创造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他研究了光学、力学、数学和地质学，不顾教会禁令亲自解剖尸体。1482年起担任米兰公爵斯福查的画师和工程师，为好战的公爵设计桥梁、战船、大炮和装甲车。1498年完成圣玛丽亚教堂的不朽壁画《最后的晚餐》，虽然取材于圣经故事，却突破中世纪的传统，生动地再现了现实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不同性格、不同心理状态，歌颂真理正义，鞭答邪恶势力，鼓舞人们奋发向上，开创一代艺术新风。1503年回到佛罗伦萨，历时3载完成著名的肖像画《蒙娜丽莎》，完全摆脱宗教题材，直接描写女市民(他的女友、佛罗伦萨银行家佐贡多之妻)的形象。他运用透视法和明暗法，生动地勾画出主人公的温柔典雅和迷人的微笑，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画家瓦萨里说，这幅“肖像描绘得那样好，以致任何一个卓越的艺术都感到惊奇和不安”。1513年去罗马，遭冷遇，画出著名的自画像，面容苍老，忧愁愤怒。1516年去法国，任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的画师和工程师，仍勤奋从事创作和研究。不久患中风，右手麻痹，仍用左手继续工作。1519年病逝，葬于安布斯城法王行宫的圣佛罗里亭教堂里。著有《绘画论》和数千页未整理的手稿。

(孔祥民)

莎士比亚

(Shashibiya,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文艺复兴时代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斯特拉福富裕市民家庭出身。后家道中落，当过兵和乡村教师。1587年只身去伦敦，在剧团里当马夫，演配角，后任导演，创作剧本。1593年演出自编历史剧《亨利六世》，初露艺术才华。1594年起成为伦敦内务大臣剧团的主要演员之一，后任剧院股东。1596年在南安普敦伯爵帮助下，成为低级贵族乡绅，在家购买房产和百多英亩土地。1610年回家乡居住，继续从事创作。他一生写了37个剧本、154首十四行诗、两部长篇叙事诗和一些杂诗。重要的历史剧有《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约翰王》、《理查三世》等，以古喻今，批判封建混战和暴君，塑造理想的开明君主。他的《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被称为四大喜剧，赞美爱情、友谊、自由、幸福，抨击禁欲主义和封建道德，洋溢着人文主义精神。《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佩斯》被称为四大悲剧，控诉封建社会的罪恶与黑暗，批判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极端个人主义；痛感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充满悲愤沉郁情绪。他的作品取材广泛，情节生动，语言丰富，刻画深刻，既立足现实，又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莎士比亚是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1616年病逝家乡，葬于圣三一教堂。

(孔祥民)

哥白尼

(Gebaini ,NicolausCopernicus1473—1543) 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托伦城富商家庭出身。少年丧父，由舅父路加斯·瓦兹洛德大主教抚养，并在他主持的学校里学习。1491年进入克拉科夫大学，深受人文主义和老师沃伊切赫·波鲁泽夫斯基(怀疑地心说)的影响，开始萌发太阳中心说。1495年遵舅父命去波伦亚大学进修教会法，获法学博士学位，同时用相当大精力研究天文和实地观测，探讨改革地心说。1499年任罗马大学天文学教授。1506年回祖国任乃舅秘书，兼弗罗恩堡修道院神甫，但仍以主要精力研究天文，自设天文台，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观测。1519年条顿骑士团来犯，他组织奥尔斯丁城人民奋起反击，终于击退敌人进攻，被政府委任为当地的行政长官。1516年开始写《天体运行论》，数易其稿，1540年完成。哥白尼在书中主要根据自己的观测资料，提出太阳中心说，即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绕太阳运行的一颗行星，宇宙的中心是太阳，推翻统治西方天文学界近千年的地心说，使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罗马教皇慑于太阳中心说的影响，对哥白尼横加迫害，斥为异端，株连亲朋。该书几经周折，当1543年印妥时，哥白尼已久病卧床，眼睛失明，不久与世长辞。《天体运行论》遭到新教和天主教的一致反对，长期被列为禁书。

(孔祥民)

布鲁诺

(Bulunuo, Giordano Bruno 1548—1600)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那不勒斯附近诺拉城破落贵族家庭出身。1563年加入多明我会，读了不少禁书，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古代许多哲学著作，开始批判《圣经》宣扬的创世说和三位一体说等。1577年以“异端”罪被开除出教。为逃避追捕，四处飘泊，先后到过意大利北部诸城以及日内瓦、巴黎、伦敦、维登堡、布拉格等地，到处演讲和著书立说，继续批判天主教会，捍卫哥白尼的学说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1583—1585年在伦敦出版《论原因、本原和统一》、《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和《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等著作，阐述自己的新观点。布鲁诺继承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并且纠正其学说中的错误，认为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是无限的，没有中心，有无数个象太阳系那样的星系，由于离得非常远看不清楚罢了。他的宇宙观尽管不彻底，带有泛神论特点，在当时仍有进步意义。布鲁诺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和不断前进的，主张社会变革，但反对用暴力改造社会。1592年一名威尼斯贵族（实际是密探）“请”他去讲学，一上岸就将他逮捕，押送罗马。教廷软硬兼施，迫使他就范，但他坚贞不屈，拒绝放弃自己的主张。1600年被判为顽固不化的异端分子，处以火刑。他临刑前高呼：“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的。”英勇就义。

(孔祥民)

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佛罗伦萨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生于比萨。自幼聪明好学，勤于思考。17岁入比萨大学，第二年在教堂做礼拜时看见高悬的油灯来回摆动，便潜心钻研，发现摆的等时性定律，25岁时任比萨大学教授。由于在比萨斜塔上做了著名的落体实验，推翻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降落速度与重量成正比的错误结论，被赶出比萨大学，于1592年去帕多瓦大学当教授。1609年，当他听说荷兰人发明望远镜后，便自制望远镜观察天体，发现月面有大山和海洋，太阳黑子，木星的4颗卫星，银河由无数星体组成，并于次年写成《星空使者》一书作了报导，轰动欧洲。人们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伽利略发现新宇宙。同年应邀回佛罗伦萨，任科西莫公爵的宫廷哲学家和首席数学家。1613年发表《论太阳黑子》，证明哥白尼的学说是正确的，被宗教裁判所传讯。1632年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用大量论据论证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1633年，年近古稀的老人伽利略被押往罗马受审，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判处终身监禁，宣布《对话》为禁书。老人被迫在悔过书上签字，承认“错误”。据说他签完字后却说：“可是，地球仍然在转动！”不久，老人被保释回佛罗伦萨，实际软禁，晚景凄凉，但科学研究一直未断。1642年病逝于阿尔切特里别墅。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386-1.bmp}

(孔祥民)

刻卜勒

(Kebule,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德国天文学家。符登堡破落贵族家庭出身。1587年进入蒂宾根大学，在麦斯特林教授的影响下，成为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1594年去奥地利格拉茨城一所中学任教，发表《神秘的宇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600年应著名天文学家第谷之邀去布拉格天文台工作，次年出版《天文学更可靠的基础》，并被任命为皇帝的宫廷数学家。1612年应林茨当局邀请，讲授数学和绘制地图。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后，他颠沛流离去波伦亚大学任教，继续研究天文，发表许多著作，如《宇宙和谐论》、《彗星论》和《哥白尼天文学概论》等。天主教会对他恨之入骨，烧毁他的书，扬言要处决他，但无法改变他献身科学的坚定信念。刻卜勒的主要贡献是发现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即行星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转，太阳位于椭圆形的一个焦点上；连结行星与太阳的直线在相等的时间扫过相等的面积；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其至太阳平均距的立方成正比。这些发现克服了哥白尼学说中的缺陷，使太阳中心说更加接近真理。后来牛顿在他的成就基础上继续前进，发现万有引力定律。1630年底，因贫病交加病逝于雷根斯堡，葬于拉提斯本的圣彼得教堂。

(孔祥民)

朝鲜古代史

(chaoxian gudaishi) 朝鲜人自古生活在朝鲜半岛上。近 20 多年，在朝鲜北部发现古人化石和几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关于朝鲜的最初国家，历来有檀君立国、箕子立国和古朝鲜立国诸说，其中以古朝鲜立国说比较可信。古朝鲜即古代朝鲜，约前 5 世纪出现在半岛北部。从《汉书·地理志》里记载的“八条”残存法律分析，大概是奴隶制国家。从公元前后到 676 年新罗统一，半岛上出现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史称三国时代。一般认为三国时代是封建社会（也有奴隶社会说），但奴隶制残余长期存在。高丽王朝是朝鲜史上一个重要王朝，它实行的田柴科制，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李朝时期中、朝两国人民互相支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取得了壬辰卫国战争的胜利，用鲜血谱写一支战斗友谊的颂歌。朝鲜历来注重修史。1145 年金富轼根据《旧三国史》、《海东三国史》和中国史籍中记载的朝鲜资料，编成纪传体的《三国史记》，是朝鲜现存最早的史书。13 世纪，僧人一然编《三国遗事》，补《三国史记》之不足。李朝初年，郑麟趾主持编成《高丽史》。李朝诸王都有实录，合称《李朝实录》，共 1893 卷。上述史书，在我国藏书较多的图书馆里都能找到。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86-2.bmp}

(孔祥民)

高句丽

(Gaogouli) 古朝鲜族的一支貊人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的古国。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发兵攻打朝鲜，在朝鲜北部建立乐浪等 4 郡。高句丽在反对乐浪的斗争中兴起，于公元前 32 年（西汉元帝建昭 2 年）建国，创始人高朱蒙。高句丽与后来在半岛南部立国的新罗、百济形成 600 多年的对峙局面，史称三国时代。王莽曾向高句丽征调军队，攻打匈奴。高句丽不断向南发展，4 世纪初占领乐浪郡。427 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从此深入半岛北部。598 年进犯辽西，被隋军击退。612—614 年，隋炀帝三侵高句丽，均以失败告终。高句丽长期奉行联合新罗反对百济的政策，致使新罗夺取富庶的汉江流域，经济和军事力量加强。642 年大将泉盖苏文发动政变，杀死国王，立王侄为王，自称“莫离支”（相当于唐朝的兵部尚书兼中书令），并改变政策，联合百济反对新罗。新罗向唐求援。660 年新罗和唐朝联军灭百济，668 年灭高句丽。唐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直接统治原高句丽和百济地方。关于高句丽以及新罗、百济的社会性质，在朝鲜和我国史学界历来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种说法，至今没有定论。

（孔祥民）

新罗

(Xinluo)古朝鲜族的一支韩人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建立的古国，又名斯罗、斯卢和新卢。约公元前2世纪，在半岛南部韩人居住的地方形成“三韩”部落联盟，即汉江下游的马韩、洛东江下游的弁韩和庆州一带的辰韩，后来马韩强大，统一三韩、我国史书称“辰国”。公元前后“辰国”瓦解，在其领土上分别形成新罗和百济。传说公元前57年，开国君主朴赫居士，统一六部，称“居西干”（意思是王或贵人）。据学者研究，新罗实际形成国家稍晚，约在2—3世纪。新罗实行贵族民主制，王位由朴、昔、金三姓贵族交互继承，王和高级贵族组成的“和白”会议决定国家大事。起初，高句丽联合新罗反对百济，新罗偏安东南，得到发展。6世纪的智征王、法兴王和真兴王统治时期，确立中央集权，夺取富庶的汉江流域，日益强大。7世纪中叶，高句丽转而联合百济对付新罗，新罗则向唐朝求援，双方组织联军先后灭掉百济和高句丽。唐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统治高句丽、百济旧地。670年高句丽爆发反唐起义，得到新罗积极支持。几经激战，新罗攻占部分百济、高句丽旧地。676年安东都护府被迫北迁辽东，新罗实际统一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735年，唐正式承认大同江以南属于新罗。新罗统一结束了半岛的分裂局面，为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孔祥民)

百济

（Baiji）古朝鲜族的韩人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建立的古国。公元前 18 年（西汉成帝鸿佳三年），高句丽王朱蒙次子温祚，率部南下至富庶的汉江流域，百姓悦乐，故取国名百济，定都于慰礼城（汉城）。由于高句丽长期奉行联合新罗反对百济的政策，百济迫于压力一再南迁都城。475 年高句丽攻陷汉城，被迫迁都熊津（忠清南道的公州）；538 年再迁泗泚（扶余），并一度改国号为南扶余。7 世纪中叶，高句丽改变政策，联合百济反对新罗。新罗向唐求援，双方组成联军，于 660 年攻灭百济，不久又灭高句丽，三国时代结束。676 年，新罗领导的反唐斗争取得巨大胜利，实际统一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

（孔祥民）

高丽王朝

(Gaoli wangchao) 朝鲜史上封建王朝，又称王氏高丽。新罗末年，朝政腐败，土地兼并盛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892 年梁吉领导的江原道起义，规模较大。901 年，新罗王族出身的弓裔篡夺起义军领导权称王，国号摩震，后改泰封。918 年，弓裔部将王建杀裔称王，定都开城（松岳），改国号高丽，建立高丽王朝（918—1392 年）。936 年，重新统一朝鲜半岛。高丽实行田柴科制，将国家支配的土地、山林按品分给文武百官和府兵、闲人（土豪），受封者可以征收田税，但不能世袭。后来赐开国功臣、归顺土豪以勋田，称功荫田柴，以传子孙。州、府、郡、具有公廨田柴，供行政开支。贱民、奴婢无权授田。由于实行田柴科，促进高丽经济和文化繁荣，中央集权确立。10 世纪末和 11 世纪末三次击退契丹入侵，捍卫了国家独立，涌现出民族英雄姜邯赞。12 世纪起土地兼并重新盛行，田柴科废，武臣崔忠献及其子孙专权 60 多年，同时爆发连绵数十年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1231 年起蒙古来攻，崔氏政权挟王室逃江华岛，各地义军群起抗敌。1280 年蒙古在高丽设立征东行省。1368 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蒙古贵族统治，有力地支援了高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1392 年大将李成桂兵变上台，废高丽末王，建立李朝。

（孔祥民）

李朝

(Lichao) 朝鲜史上封建王朝。元朝被农民起义推翻后，高丽末王仍依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并派兵攻辽东。1388年，反对进攻中国的大将李成桂，在鸭绿江威化岛发动兵变，班师回京，成立新政府。1392年李成桂废末王自立，迁都汉城，改国号朝鲜，是为李朝（1392—1910）。李朝前期约百年间，国势强盛。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实行科田法，限制土地兼并。颁布《经国大典》，规定国家机构和各项制度，加强中央权力。对女真的斗争取得胜利，向北扩展疆土到鸭绿江和图们江。学者郑麟趾、成三问、申叔周等创制“训民正音”，开始有朝鲜自己的文字。对明朝友好，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密切。15世纪末起，政治腐败，党争迭起，军备废弛。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积极发动侵朝战争。1592年日军悍然在釜山登陆，连陷三京（汉城、开城、平壤）。朝鲜人民奋起迎战，到处组织义兵打击敌人，史称“壬辰卫国战争”（1592—1598）。朝鲜军民在明军支援下浴血奋战，终于取得卫国战争的最后一胜利。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战争，日本乘机出兵，变朝鲜为保护国。1910年日本迫签《日韩合并条约》，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李朝灭亡。

（孔祥民）

李舜臣

(Li Shunchen 1545—1598) 朝鲜民族英雄。字汝谐，号忠武，汉城人，武科及第。1591年任全罗道左水使，改进龟船，加强海防，积极准备迎击日本的侵略。1592年日军登陆釜山，长驱直入。当此民族危亡之际，李舜臣决心抗敌，以雪国耻。他率领的水师，主动出击，连战皆捷，粉碎敌人水陆并进的计划。次年因功封资宪大夫，统制全罗、庆尚、忠清三道水师，在闲山岛设大本营。旋被解职，由昏庸无能之辈继任。1597年初，日军再次发动进攻，重点放在海上，闲山岛陷落。朝鲜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李舜臣为水军统制使，但仅剩12艘战船、120余名战士。李舜臣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他利用鸣梁海峡有利地形，暗设两道铁索，使敌舰能进不能出（退潮时），以巧制胜。9月16日以12艘战船击毁敌舰300多艘，歼敌4000余人，创下以少胜多的杰出战例。1598年，明朝派陈璘和邓子龙率水师来援。11月18日，朝、中联合舰队在露梁海面（庆尚南道南海郡）击沉敌舰400多艘，歼敌万余，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明军七旬老将邓子龙的战船起火，李舜臣驶舟来救，左胸中弹。他把战旗交给侄儿代施号令，并嘱不许声张。朝、中名将李舜臣和邓子龙不幸壮烈牺牲。壬辰卫国战争以朝鲜的最后胜利告终。舜臣谥忠武，著有《李忠武公全集》。

(孔祥民)

日本古代史

(riben gudaishi) 近几十年来,日本发现许多旧石器文化遗址和人类化石。据研究古日本人的体质结构与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非常相似,他们加工石器的方法大致相同,可能一部分古日本人来自我国的华南和东北。弥生时期(公元前3世纪到3世纪,金石并用时期),从中国、朝鲜传来青铜器、铁器和种植水稻的技术。秦、汉之际,两国交往增多。《汉书·地理志》载,公元1世纪,倭人“分为百余国”。《后汉书·东夷传》载,光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1784年,这颗金印在福冈出土。这是中日两国第一次使节来往,在两国外交史上有重要意义。日本史上第一个影响较大的国家是公元3世纪兴起的大和国,一般认为是奴隶制社会。大化改新后,进入封建社会。奈良时代(710—784)和平安时代(794—1192),天皇握有实权,又称王朝时代。日本极重视吸取先进的中国文化,屡派留学生和遣唐使,最有名的是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去佛教律宗和建筑、雕刻、医学等。1192年起日本建立镰仓幕府、中经足利幕府和德川幕府,到1867年幕府倒台,日本史称幕府政治时期,将军掌握实权,天皇形同虚设。德川幕府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封建社会发展到最高和最后阶段。岛原起义(1637)失败以后,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严禁与中国、荷兰以外的外国通商,直到19世纪中叶。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388-1.bmp}

(孔祥民)

大和国

(Daheguo) 3—7 世纪在西日本出现的奴隶制国家。中心在大和(奈良)，故名。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大和国有女王卑弥呼，统辖 21 个部落，7 万余户，以婢千人自恃，死后作大冢，径百余步，殉葬奴婢百余人。卑弥呼与曹魏有密切的外交来往，10 年内双方使节来往达 6 次之多。5 世纪初，刘宋时期，赞、珍、济、兴、武五代倭王遣使中国 13 次。据研究，这五代倭王就是大和国的统治者天皇。478 年倭王武(雄略天皇)致书刘宋顺帝，描写大和统一西日本的经过。大和国的社会性质有奴、封两说，但以奴隶制说较为有力。据日本学者井上清研究，大和劳动人民中奴婢占 10%，部民占 30%，自由民占 60%。部民主要来源有被征服部落，也有中朝移民或战俘(归化人)。归化人带来先进技术，对大和经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有学者研究，部民以类似罗马帝国的隶农型为主，奴隶型或农奴型的不多。天皇拥有大量领地，称“屯仓”，贵族领地叫“田庄”。天皇生活豪华，死后葬在高大坟墓里，并有金、银、珠宝陪葬。堺市附近有倭王赞(仁德天皇)的坟墓，长近 480 米，宽 300 米，高 27 米，从遥远的海上可以望见。有人估计，若每人日运土 1 立方米，则 1000 人劳动 4 年方可把土运齐。墓前铺着远方运来的花岗岩石板，墓里有金、银、珠宝殉葬，说明剥削日益加深。

(孔祥民)

大化改新

(Dahua gaixin) 7世纪日本的一次自上而下改革。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提高较快，但生产发展的好处却被皇室和贵族攫取。他们广占土地，将自由民沦为部民。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旧贵族苏我氏掌握朝廷实权，是旧势力的代表。贵族里的革新派主张以隋、唐为榜样改造日本，建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国家。640年前后，留学唐朝二三十年的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和僧旻等人相继回国。他们介绍中国情况，开办学校，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来受教，成为革新派的核心人物。645年6月12日，中大兄、中臣镰足等人乘苏我入鹿接见朝鲜使者之机刺死入鹿，发动政变。14日，革新派逼皇极天皇（舒明天皇皇后）退位，由其弟继位，称孝德天皇。革新派当即任命新的左、右大臣，中臣镰足任内大臣，高向玄理和僧旻为国博士（顾问）。646年正月初一，定年号为大化（日本第一次有年号），迁都难波（大阪），颁发革新诏书，史称大化革新或大化改新。改新的主要内容是：废除皇室的私地、私民，改为国家的公地、公民。实行班田制：国家班给6岁以上男子口分田2反（即段，1段等于11.9公亩），女子为男子的2/3，奴婢为良民的1/3；6年一班，禁止买卖，死后归还。受田者向国家纳租、庸、调，受田男子还须自带武器服兵役。3.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机构，天皇之下设二官（太政、神祇，前者总理政务），八省（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由左、右大臣分管）、一台（弹正）；地方设国、郡、里。各级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旧贵族的称号和特权。改新打击了旧贵族的经济、政治利益，引起他们的激烈反抗。实行班田制使生产者成为有一定经济独立的公民，负担相对稳定，生产积极性提高。大化改新是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标志，但仍保留一些奴隶制残余。在中、日两国史学界对大化改新的性质有不同意见，有待进一步研究。

（孔祥民）

武士

(Wushi) 日本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又称“武家”。9世纪起，随着班田制破坏和庄园兴起，大量农民沦为庄园主或权势之家的农奴，旧兵制难以维持，天皇和中央权力衰落。庄园主为保护自己利益和扩大势力，便组织本族人（“家子”）或仆从（“郎众”）练习骑射，即所谓“弓马之道”，形成武士集团。庄园主封给武士土地，武士效忠主人，履行包括军事在内的种种义务。武士集团的势力迅速增长。11世纪，最大的武士集团有关西（不破关以西，今京都、大阪、神户一带）的平氏和关东（今东京一带）的源氏，互相争战不已。12世纪中叶平氏一度得势，平清盛任太政大臣，当权20多年。1183年，源赖朝带兵攻入京都，消灭平氏，夺得中央政权。1192年他正式任“征夷大将军”，在关东的镰仓设立幕府，是为镰仓幕府，开始幕府政治时期。

(孔祥民)

幕府政治

(Mufu zhengzhi) 日本封建统治的一种政权形式，又称“武家政治”。“幕府”一词出自中国，指将军出征时的营幕，后转意为将军的府署（办公处）和武士政权。1192年源赖朝正式任“征夷大将军”，在镰仓设立幕府，开始幕府政治。将军名义上尊重天皇，并由天皇任命，实际上是政府首脑，垄断一切大权，天皇形同虚设。镰仓幕府下设政所（处理政务）、侍所（统帅武士）和问注所（司法），总揽全国军政司法大权。设“评定众”，参与决定幕府重要事务。1232年（贞永元年）评定众制定《贞永式目》（即《御成败式目》），是镰仓幕府的法典。1336年足利尊氏攻入京都，自称“征夷大将军”，开始足利幕府，又称室町（京都街名，幕府所在地）幕府（1336—1573）。室町幕府在将军下面设“执权”，由三家贵族轮流担任称“三管领”；侍所改为“所司”，由另外四家贵族担任，称“四职”。三管领和四职是室町幕府的领导核心。这个时期幕府权力较小，分裂割据严重。日本最后一个幕府设在江户，称江户幕府（1603—1867）。因创建人为德川家康，又称德川幕府。德川幕府设“大老”（仅次于将军的行政长官）、“老中”（处理日常政务）和“若年寄”（协助老中），辅佐将军，称“三役”。三役之下设“寺社”、“勘定”（管理将军直领地的财务）和“江户町”（管江户市政）“三奉行”。地方设藩，藩主拥有军、政、财权。德川同族大名是“亲藩”，功臣勋旧为“内藩”（或“谱代”），被征服地称“外藩”（或“外样”），领地交错，互相监督，称“幕藩政治”。德川幕府凭借经济、军事优势，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使日本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最高、最后阶段。岛原起义失败后，一再颁布锁国令，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关系发展，消极影响很大。1867年末代将军还政天皇，德川幕府和幕府政治终结。

（孔祥民）

丰臣秀吉

(Fengchen xiuji 1536—1598) 16 世纪末统一日本的军事家、政治家。尾张国爱知郡农民家庭出身，原称木下藤吉郎。后投奔织田信长，取得武士称号。1573 年因功获封近江三郡食邑，成小诸侯，并改称羽柴秀吉。1582 年信长战死，秀吉拥立其幼孙，举起忠于信长的旗号，同时剪灭群雄，扩大自己势力。日本史称从本年起到秀吉病死这段时期为“桃山时代”(1582—1598 年，后来秀吉在京都筑伏建城，又名桃山)。秀吉表面尊敬天皇，不当将军，只接受 1585 年赐给的“关白”(辅佐天皇批阅奏折。天皇年幼时称摄政，成年称关白。语出《汉书》)称号，实际是中央政府的首脑，统揽一切军政大权。1586 年任太政大臣，改姓丰臣。1592 年让“关白”位于养子，自称太阁。1593 年统一包括北海道在内的整个日本，在日本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执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如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修筑道路，废除大名关卡和行会特权，鼓励海外贸易。为打击地方豪强，增加中央收入，在全国丈量土地，史称“太阁检地”。1591 年发布身分统制令，强令农民永远住在农村，不准弃农经商或为佣工。甚至发布“刀狩令”，禁止百姓持有刀、枪和其他武器，防止暴动。1592 年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受到朝、中两国军队的沉重打击。1598 年 8 月忧急病死于桃山，不久侵朝战争彻底失败。

(孔祥民)

阿拉伯古代史

(alabo gudaishi) 早在公元前 3 千年, 阿拉伯半岛上的也门出现最初的国家。4—6 世纪, 在靠近伊朗和拜占廷的地方, 先后出现希拉王国和爱萨西奈王国。然而, 7 世纪以前, 半岛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国家产生的前夕。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形成, 揭开阿拉伯历史新的一页。初期四大哈里发统治时期 (632—661) 已经开始向外扩张, 占领叙利亚、埃及和伊朗。倭马亚王朝 (661—750) 在被征服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影响下, 逐渐过渡到封建制, 迁都大马士革, 哈里发职位世袭。到 8 世纪中叶, 终于形成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 (750—1258) 的重心在伊拉克和伊朗, 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大马士革附近、两河流域南部、波斯湾东岸和河中 (阿姆河和锡尔河) 流域, 被称为帝国的四大谷仓。阿拉伯商人的足迹遍及欧、亚、非三洲。1258 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 阿拉伯帝国灭亡。1263 年, 在伊朗一带形成伊儿汗国。原帝国西部大部分地区, 后来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帝国各族人民在继承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文化的基础上, 广泛吸收印度和中国的文化,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 中国归称阿拉伯为“天方”, “谭”同谈), 内容丰富, 描写生动, 真实地再现了阿拉伯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 也是研究阿拉伯史的珍贵资料。阿拉伯人吸收和改造印度人创造的“0”和十进位法, 再传入欧洲, 成为今天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穆罕默德·伊本·穆萨的代数学著作, 直到 16 世纪还是欧洲大学使用的教材。巴格达名医拉齐斯, 被誉为阿拉伯的华佗; 他的《天花和麻疹》, 首次将这两种病加以区分。被称为“医王”的阿维森纳, 著有《医典》5 卷, 反映阿拉伯医学的最高成就。此外, 阿拉伯帝国在天文、化学、史地和哲学方面也有重大成就。阿拉伯帝国在促进东西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过重要作用。

(孔祥民)

伊斯兰教

(Yisilanjao) 穆罕默德创立的一神教。我国归称“回教”、“回回教”、“清真教”或“天方教”。“伊斯兰”阿拉伯语意思是“服从”，即服从真主安拉（即上帝，原系穆罕默德所在部落主神）；基本教义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即 16 字清真言，7 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大多处于国家产生前夕；半岛西部有也门至叙利亚的商路穿越，商路上有麦加和雅特里布两座名城。自 6 世纪末伊朗占领也门和商路改走波斯湾后，半岛商业衰落，社会矛盾激化。为镇压群众反抗和夺回商路，阿拉伯贵族要求建立统一国家。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为建立统一国家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他吸取犹太教、基督教和地方崇拜资料，于 610 年在麦加公开传教。622 年被迫迁往雅特里布（改名麦地那，意为“先知之城”），建立政教合一的新国家，称“穆斯林公社”。630 年与麦加贵族达成妥协，麦加接受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承认克而白庙里的黑陨石崇拜。632 年，半岛大抵统一。伊斯兰教主张五信，即信安拉、信天使、信《古兰经》、信使者（即先知）、信死后复活和末日审判。基本宗教职责为五功，即念、礼、斋、课、朝。有人认为圣战是穆斯林的第六功。主要经典是《古兰经》。有逊尼和什叶（又称阿里派）两大派。我国穆斯林多属逊尼派。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佛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有信徒约 8 亿人，主要分布在西亚、东南亚和北非。7 世纪传入我国，主要在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十几个民族中传播，约有信徒 1000 多万人。

（孔祥民）

《古兰经》

(Gulanjing) 伊斯兰教的主要经典。又译《可兰经》。“古兰”阿拉伯语意为“诵读”或“读本”，因为它详细规定了穆斯林必须遵从的基本教义、立法、伦理和风俗习惯，是穆斯林的行动指南。我国又称“天经”、“天方国经”或“宝命真经”。信古兰经为伊斯兰教的五信之一。据说天使迦伯利向穆罕默德传达安拉的许多启示（第一个启示是“你应当以真主的名义传道”），由弟子默记，或写在树叶、兽皮、骨片上。穆罕默德死后，阿布·伯克尔将上述启示整理重抄，即第一个手抄本《古兰经》。其实《古兰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穆罕默德对宗教和社会问题发表的言论集，也是研究阿拉伯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650年，第三任哈里发鄂斯曼下令重新订正《古兰经》，抄录7部，分送麦地那、麦加、大马士革、库法、巴士拉、也门和巴林群岛，称“鄂斯曼本”或“定本”。共30卷，114章，6236节，分麦加篇（86章）和麦地那篇（28章）两部分。明、清时有汉文节译本，本世纪以来有多种通译本。

（孔祥民）

哈里发

(Halifa) 中古伊斯兰教国家执掌政教大权的最高统治者，又译“海里凡”。阿拉伯语意为“继承者”、“代理人”。穆罕默德死后，阿布·伯克尔执掌政教大权，称哈里发（即“先知的继承人”），定都麦地那。接着，欧默尔、鄂斯曼和阿里相继任哈里发，称初期哈里发。阿里时期发生内讧。叙利亚总督摩阿维亚称鄂斯曼之死与阿里有关，阿里不能当哈里发。阿里说鄂斯曼系倭马亚家族，曾是先知政敌，无资格当哈里发。拥护阿里派称什叶派，或阿里派、世袭派；拥护倭马亚家派称逊尼派，或正统派。阿里死后，摩阿维亚任第五任哈里发，从此哈里发职位世袭，开始倭马亚王朝，迁都大马士革。后来，阿巴斯王朝、西班牙倭马亚王朝、埃及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和 16 世纪以降的奥斯曼帝国君主，均称哈里发。有些地方的穆斯林亦称领导人、官员、清真寺学员为哈里发。

(孔祥民)

阿拉伯帝国

(Alabo diguo) 7世纪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封建帝国。我国史书称“大食”(阿拉伯语意为商人,另说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称呼),西欧称萨拉森(阿拉伯人的一支)帝国。7世纪30年代,穆罕默德基本统一阿拉伯半岛,形成统一的阿拉伯国家,632年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即位,第二年派兵攻占希拉和巴士拉,接着占领大马士革。第二、三任哈里发欧默尔和鄂斯曼大举扩张,到7世纪中叶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利比亚和伊朗,奠定阿拉伯帝国的基础。倭马亚王朝初期,忙于稳定内部,8世纪初大规模向外扩张,向西占领整个北非、西班牙,在波瓦提埃为查理·马特击败,向东占领印度河下游。8世纪中叶,形成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一般认为,阿拉伯人受到被征服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750年,阿拔斯朝兴起,定都库发。倭马亚朝一王子逃到西班牙,建立后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称“西大食”或“白衣大食”)。762年,阿拔斯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迁都巴格达,又称巴格达王朝。巴格达王朝尚黑色,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或“东大食”。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是帝国的极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学者辈出,对东西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随着宫廷挥霍无度和封建剥削的加强,阶级矛盾尖锐,农民和奴隶起义连绵不断,巴格达王朝削弱,北非、叙利亚、伊朗等地先后出现一些半独立或独立的王朝。10世纪中叶埃及兴起法蒂玛王朝,中国史书因其尚绿色,称“绿衣大食”或“南大食”。1258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杀哈里发,阿拉伯帝国灭亡。

(孔祥民)

穆罕默德

(Muhanmode, Muhammad 约 570—632) 伊斯兰教创始人, 阿拉伯统一国家的缔造者。麦加古莱西部落哈希姆家族没落贵族出身, 靠祖父、叔父抚养长大。早年放牧, 当保镖, 随商队到过也门和叙利亚。25 岁时与富孀卡狄加结婚, 共同经商。610 年开始在麦加传教, 遭倭马亚家族反对。伊斯兰教是一神教, 独尊真主安拉, 为统一阿拉伯国家的形成作了舆论和组织准备。622 年带领一批信徒去麦地那, 建立政教合一的新国家“穆斯林公社”, 自任政治、军事和宗教首领。他以麦地那为基地, 多次领兵攻打麦加, 并于 630 年迫使麦加贵族接受伊斯兰教和承认他的权威, 条件是他承认黑陨石崇拜, 改克而白古庙为清真寺。631 年半岛各地纷纷派代表来朝, 承认穆罕默德的独尊地位和改奉伊斯兰教, 半岛大抵统一。632 年病逝于麦地那, 葬于该地。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揭开阿拉伯经济、文化发展新的一页。穆罕默德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恩格斯称之为“穆罕默德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 1 卷, 第 547 页)。

(孔祥民)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Aosiman tuerqi diguo) 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封建帝国，又称奥斯曼帝国。原居里海东南岸，后西迁小亚细亚，依附罗姆苏丹。13 世纪末，这支土耳其人在酋长奥斯曼(1259—1326) 率领下独立，称奥斯曼国家。1326 年夺取拜占廷重镇布鲁萨，定都于此。1369 年迁都阿德里亚堡，改名爱德尔纳，统治者始称苏丹(又译素丹，即君主)。14 世纪末占领巴尔干半岛大部地区，奠定帝国基础，震动欧洲。1453 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亲率大军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帝国灭亡，并迁都于此，改名伊斯坦布尔。苏莱曼一世时期(1520—1566)，帝国臻于极盛，形成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苏莱曼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被尊为大帝。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人民起义高涨，国际形势越来越不利，国势衰落。19 世纪初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巴尔干诸国先后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战败国，领土仅剩土耳其本土。1919 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帝国覆灭。

(孔祥民)

非洲古代史

(feizhou gudaishi) 非洲大约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距今 1400 万年前，在东非的肯尼亚已经有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腊玛古猿。这种猿会直立行走，可能有语言，能用天然石块砸开野兽的头或骨食其脑髓，表现向人进化的趋势，一般认为是形成中的人。1974—1975 年，在坦桑尼亚北部的拉托利，发现距今约 370—359 万年前的 13 个人类化石。这是完全形成的人，或称猿人，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人类化石。到 4—5 万年前，非洲出现基本消失猿的特征的现代人。大约 1 万多年前，非洲已经居住着欧罗巴人、尼格罗人、科伊桑人和俾格米人等不同人种的居民。

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发展很不平衡。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第 4 千纪中叶已建立最初的国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公元前 4—前 1 世纪，埃及先后被希腊和罗马统治。公元 7 世纪中叶和 8 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占领埃及和整个北非。阿拉伯人的到来促进民族间的融台，许多居民讲阿拉伯语，改奉伊斯兰教。11—13 世纪，在马格里布先后形成穆拉比德王朝（1061—1147，西班牙人讹称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1147—1269，西班牙人讹称阿尔摩哈德王朝）。13 世纪初，穆瓦希德王朝衰落，在马格里布出现马林王朝、阿布德瓦德王朝和哈夫斯王朝，分别奠定后来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的基础。16 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大部分地区。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先后形成一批古国，著名的有努比亚、阿克苏姆、加纳、马里、桑海、刚果、津巴布韦和贝宁等。在东非沿海，即今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很早就与埃及、希腊、阿拉伯和印度有商业联系。7 世纪起，阿拉伯人大批涌入。他们种植胡椒、丁香、椰子，或经营黄金、象牙和奴隶买卖，并同当地居民融合，形成斯瓦希利（阿拉伯语，意为“属于海岸的”）人。15 世纪末，东非沿岸形成摩加迪沙、基尔瓦、蒙巴萨、马林迪、桑给巴尔、索法拉、布腊瓦、马菲亚和奔巴等 30 多个经济繁荣的城邦国家。

15—17 世纪，葡、英、荷、法等西方殖民者相继侵入非洲，给非洲人民套上殖民主义枷锁。他们经营万恶的奴隶贸易，长达 400 年之久。有的学者估计，到 19 世纪 70 年代，约有 1500 万黑人运到美洲，每运到 1 人就有 5 人被害或死于途中，非洲总共损失 8000 万—1 亿人。其后果是生产停滞，田园荒芜，传统文化中断、社会发展大多停留在 15 世纪的水平。非洲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中非友好源远流长。3 世纪鱼豢撰的《魏略》里已提到“海西”有“迟散城”，即今埃及的亚历山大城。8 世纪中叶，杜环著的《经行记》里提到的“摩邻”，一般认为是今肯尼亚的马林迪。9 世纪中叶，段成式著的《酉阳杂俎》里记载，“西南海中”有商业繁荣、拥有“步兵 20 万”的“拔拔力国”，大概是今索马里的柏培拉。12、13 世纪，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对东非沿海诸国有详细的记载。15 世纪，随郑和出访的费信，在他的《星槎胜览》里记载东非的竹步、木骨都束和麻林非常具体。非洲也有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字记载。1 世纪亚历山大城商人写的《红海环航记》和 2 世纪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志》里，都提到丝绸之路和盛产丝绸的中国。中非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比文字记载还要早。自汉武帝遣张骞通西域后，中国的丝绸已辗转运到埃及和北非，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前 51—前 30）

可以穿上丝袍，非洲的香料和象牙也远销中国。7 世纪兴起的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架起中非交流的新桥梁。阿拉伯商人把东非的货物直接运往中国。约 9 世纪，中国瓷器运到埃及，深受欢迎。稍晚，我国的造纸术传入埃及。宋代运到非洲的瓷器猛增，在基尔瓦发现的我国瓷器碎片不可胜数。东非沿海一带发现宋代钱币数百枚。与此同时，东非不断派使节来华，中国商船可能直接远航东非。高粱原产非洲，辗转传来中国，宋以后广泛栽培。西方殖民者侵入非洲后，中非之间的友好往来遭到破坏和阻挠。

（孔祥民）

努比亚

(Nubiya)指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至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会合处之间的广大地区，古埃及人称为“库施”。主要居民是黑人。从公元前第4千纪中叶起，埃及第二王朝的法老开始派兵侵入，到十二王朝（前1991—前1786）时合并第四瀑布以北地区。公元前1225年以后埃及衰落，努比亚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约公元前10世纪，在纳帕塔兴起一个奴隶制王国。公元前8世纪中叶，“伟大的国王”卡施达统一第一瀑布到第六瀑布间广大地区，并占领上埃及。公元前713年，国王沙巴卡征服尼罗河下游，建立埃及的第二十五王朝，又称“努比亚王朝”。公元前591年，埃及占领纳帕塔，努比亚迁都麦罗埃。公元1—3世纪，努比亚达到极盛，农业、炼铁业和纺织业发达。麦罗埃是当时非洲最大的炼铁中心，至今保留着堆积如山的铁渣，西方考古学家称之为“非洲的伯明翰”。麦罗埃还是东非的贸易中心，与埃及、乍得、阿克苏姆、红海沿岸和一些东方国家有商业往来。努比亚人在埃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字母表，在建筑、绘画、雕刻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约公元300年，麦罗埃被新兴的阿克苏姆王国打败，国势衰落，不久亡国。

（孔祥民）

阿克苏姆

(Akesumu) 公元前或公元初在东北非洲的奴隶制国家，首都为阿克苏姆城(今属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省)。公元1世纪，一位希腊商人写的《红海环航记》里首次提到它。国王埃扎纳在位时(320—360年)，征服埃塞俄比亚高原、麦罗埃和南阿拉伯，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缔结同盟条约，国势极盛，被称为“众王之王”。阿杜利斯港是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它地近曼德海峡，控制红海的航运；西距阿特巴拉河不远，沿河北上可至尼罗河中游，所以又是内陆贸易的集散地。来自意大利、埃及、拜占廷、印度的铁器、棉布、酒和装饰品，源源运进阿杜利斯，运出的是黄金、象牙、香料、犀角和玳瑁。使用铸有国王头像的金、银、铜币。阿克苏姆人民修建梯田和灌溉工程，种植小麦、葡萄、或放牧牛羊，驯猎野象。技术高超的匠人在山巅开凿(不是砌造)教堂和碉堡，堪称一绝。埃扎纳还信奉基督教，推行新拼音文字。6世纪中叶，伊朗攻占也门，阿克苏姆被挤出南阿拉伯。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垄断从印度到地中海的商路，阿克苏姆衰落。8世纪，阿杜利斯被黄沙淹没。9世纪起，埃塞俄比亚政治中心南移今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一带。11世纪，阿克苏姆亡。

(孔祥民)

加纳

(Jiana) 西非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古国，位于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上游，与今加纳共和国的位置不同。主要居民是曼丁哥族的索宁凯人。约3世纪立国，10—11世纪达到极盛，版图西临大西洋，东至尼日尔河与巴尼河会合处，北到沙漠重镇奥达果斯特，南达塞内加尔河上游。首都在昆比—沙勒（今马里共和国尼奥罗附近）。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后，听说撒哈拉沙漠以南有个“黄金之国”加纳，便绘制地图标明具体位置。穆斯林商人从摩洛哥出发南行，穿越沙漠来到加纳，用带来的盐、铜、织物换取那里的黄金、象牙和奴隶。加纳首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商业区，修有12座清真寺。国王垄断黄金开采（块金一律归国王，开采者只能得碎砂金），对过境食盐、杂货征税，从中获取大量财富。国王的头发和衣服饰有黄金，连马也披着金鞍。加纳广泛使用奴隶劳动，但社会性质尚难确定。1054年，摩洛哥穆拉比德王朝的阿布·贝克尔率兵占领奥达果斯特，又于1076年占领昆比——沙勒，加纳被迫迁都尼日尔河上游。1087年加纳人民起义，杀死贝克尔，重新获得独立，但商路破坏，国力日衰。1203年，加纳藩属苏苏国王领兵攻入，成为统治者。不久，马里国王松迪亚塔打败苏苏人，并于1240年征服整个加纳。

(孔祥民)

马里

(Mali) 意为“国王的驻地”，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上游的西非古国。主要居民是曼丁哥族的马林凯人。原属加纳，11世纪中叶独立，改奉伊斯兰教，国王称苏丹。松迪亚塔在位时(1230—1255)向外扩张，灭加纳等，势力达尼日尔河中游。他注意发展稻米、高粱和棉花生产，开采南方金矿和撒哈拉盐矿，发展贸易，兴起一批象廷巴克图、迭内、加奥和瓦拉塔等繁荣城市。他的儿子始称曼萨(皇帝)。康康·穆萨曼萨时(约1312—1337)，帝国臻于极盛，版图西抵塞内加尔河下游，东至加奥，北到撒哈拉沙漠，南达今上沃尔特。帝国靠战利品、沉重的赋税和商税积累大量财富。1324年，穆萨带领近万人的队伍，穿越撒哈拉沙漠，去麦加朝圣。据说有500名奴隶各手持约3公斤重的金牌在前开道，后有300头各驮约140公斤黄金的骆驼紧跟，还有许多驮给养和衣着的骆驼。他沿途慷慨施舍，使开罗金价暴跌，麦加人突然富有，引起欧洲注意。1339年出版的西非地图上，标有马里帝国的名称、位置和国王像，上题“几内亚的黑人君主穆萨·马里。”为庆贺朝圣成功，请来西班牙建筑师在廷巴克图修建宏伟的清真寺。穆萨死后，帝国分裂，马里变成偏居一隅的小邦，17世纪中叶灭亡。

(孔祥民)

桑海

(Sanghai) 继加纳、马里后出现的第三个西非古国，又译松加依，发祥地在加奥南的登迪。690年，开始迪亚王朝(690—1335)。11世纪改奉伊斯兰教，迁都加奥。1325年，马里攻占加奥，沦为属国。不久，在马里作人质的桑海王子逃回，建立契(伊斯兰尊号，相当于哈里发)王朝(1335—1493)，国王称“索尼”(王权尊号)，又称索尼王朝。索尼·阿里时(1464—1492)改称大王，夺取廷巴克图、迭内等富庶的尼日尔河中游地区。1493年，大将穆罕默德·杜尔(1493—1528)在穆斯林商人支持下夺取王位，兴起阿斯基亚王朝。杜尔发展生产，厉行改革，统一度量衡，建立常备军，鼓励学术，使帝国达到极盛；版图西到塞内加尔河下游，东至艾尔高原(今尼日尔共和国)，北抵撒哈拉的塔加扎，南及塞古。首都加奥有居民7万，人称伟大的城市。廷巴克图有26家拥有50—100名学徒的裁缝作坊，有著名的桑科尔大学。迭内是商业中心，富裕无比。在农业、造船和捕鱼生产上广泛使用奴隶劳动，城里有奴隶市场。杜尔死后，王位之争不断，国势衰落。1591年，摩洛哥苏丹派3000名配备火枪火炮的精兵，越过撒哈拉沙漠南侵，击败仅有刀矛弓箭的数万名桑海军，占领廷巴克图和加奥，国王南逃遇害，桑海瓦解。

(孔祥民)

刚果

(Ganguo) 讲西班牙图语的刚果人建立的古国，位于今扎伊尔、安哥拉和刚果(布)部分地区。据说，14世纪下半叶，尼米·卢克尼率部众从宽果河畔辗转来到刚果河下游的姆班扎定居，奠定刚果王国的基础。15世纪末，国王恩赞加·库武(?—1506)即位，东征西讨，扩张领土东到宽果河，画临大西洋，南达洛热河，北抵刚果河北岸。王是最高统治者，下设首相和权力很大的六总督委员会。全国分6省，由总督治理。国王直接控制安布里什的潘姆达盐场和罗安达岛黄色贝壳(作货币)的生产，接受总督奉献的象牙和奴隶等。刚果以农业为主，生产稻、麦、高粱、香蕉、棕榈果(可制油、酒、醋和面包)和16世纪初从美洲传来的玉米、薯类、冶金、造船和棕榈叶编织比较发达。他们重视冶金生产，据说最初的国王是从技艺精湛的铁匠中挑选的，奴隶不多，主要用于开采金、铜矿。16世纪中叶，王位之争不断，又连遭外族入侵，国势衰落。15世纪末，葡萄牙殖民者闯入刚果，国王和部分贵族领先加入天主教，首都改名圣萨尔瓦多。殖民者使用欺骗和引诱伎俩，使刚果卷入奴隶买卖和猎取黑人的场所。1536年，从奴隶贸易中心姆潘达港运走黑人5000人。16世纪中叶以后，奴隶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刚果一蹶不振。17世纪中叶，分裂为3个小国，1900年灭亡。

(孔祥民)

美洲古代史

(meizhou gudaishi) 15 世纪末西欧殖民者侵入前,美洲的历史基本独立发展。在北美,约有 100 万印第安人。他们是阿留申人、特林基特人、阿塔巴斯人、阿尔冈金人、加利福尼亚人、易洛魁人、达科他人和科曼奇人等,主要分布在今加拿大和美国,都处在原始社会时期。居住在中、南美的印第安人数目较多,有的比较先进,曾创造发达的农业文化,建立早期奴隶制国家。

墨西哥是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摇篮,那里先后出现的奥尔梅克文化、玛雅文化和阿斯特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卓越的贡献。奥尔梅克文化属前古典时期,发生在公元前第 1 千纪中叶,公元前 5 世纪衰落。1938—1946 年在拉本塔、特雷斯萨波特斯和圣洛伦索的考古发掘说明,奥尔梅克人已经从事简单的农业,有象形文字、计数法和历法,能用巨石雕成祭坛、石碑和面露微笑的人头像。从公元初到 10 世纪前后,墨西哥进入古典文化时期,出现巨型平顶金字塔和庙宇,有了城市和阶级分化,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这时有四个文化中心,即以特奥华坎城(意为“神仙降生地”)为中心的特奥华坎文化,以阿尔万山为中心的萨波特克文化,墨西哥湾的埃尔·达清文化,玛雅文化。玛雅文化是墨西哥古典文化的高峰,它与奥尔梅克文化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南美的安第斯高原是美洲印第安人文明的又一个发祥地。从公元前第 1 千纪开始,先后出现查文(秘鲁莫纳斯河畔一村庄)文化、莫奇卡文化(秘鲁北部沿海)、提华纳科文化和奇姆文化(秘鲁北部沿海)等。提华纳科文化遗址在今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东南 21 公里处,以巨石建筑著称。有名的太阳门,系由一块高 2.5 米、宽 4.5 米、重百吨的巨石雕成,中央凿一门洞,上有太阳神像和人体浮雕,工艺精细,堪称美洲建筑史上一绝。据学者研究,这块巨石从数公里外运来,需要数百人有组织的劳动。印加文化就是在继承上述诸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6 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先后侵入中、南美,印第安人奋起抵抗。在墨西哥,人们突然夜袭侵略者,迫使其仓惶逃窜,被杀和淹死者不计其数,大量财宝散落水中,这就是著名的“西班牙人忧伤之夜”。在秘鲁,人民群众、军队和两位王子坚持反抗斗争达数十年之久,至今受到人们的敬仰。16 世纪中叶,中、南美大都沦于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统治之下,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惨遭屠杀或被折磨而死,其文化受到摧残,严重地阻碍那里的社会发展。

中国与美洲之间的文化联系历史悠久。厄瓜多尔出土过王莽时的货币,秘鲁有刻着中文“太岁”字样的古碑,加拿大有刻着中国篆文的石柱,墨西哥发现一块有中文“日”、“月”、“市”字样的雕刻,玻利维亚发掘出刻有类似中文字样的人形石像。在特林基特人中间流行一种面具,以中国古钱作眼睛。在我国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发现世界最古老的 18 个月太阳历。这种太阳历与玛雅人的完全相同,都是一年有 18 个月,每月 20 天,共 365 天;只是最后 5 天玛雅人称禁忌日,彝族古历叫过年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 年 10 月 24 日)。《梁书·诸夷传》记载,公元 5 世纪,即哥伦布航行到美洲以前近千年,中国僧人慧深曾至扶桑国,并详细记载那里的经济、文化和地理状况。有的学者认为,当时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术能够适应远洋航行,扶桑可能就是墨西哥。中国与美洲的贸易联系,最初是通过菲律

宾进行的。1575年，即西班牙征服菲律宾后两年，墨西哥商船便来华贩运丝绸、瓷器，墨西哥城和秘鲁的利马很快充满中国货，前者甚至有了唐人街。美洲商人渐渐在菲律宾定居，从事对华贸易。与此同时，美洲的银元，特别是墨西哥的银元，大量流入中国，甚至一度成为中国的主要流通媒介。中国老百姓称银元为光洋，称墨西哥银元为鹰洋，因为它铸有站在仙人掌上食蛇的老鹰。16世纪初，玉米传入我国，最早的记载见于明武宗正德年间的《颖州志》。17世纪初，美洲烟草经菲律宾传入福建、广东。到17世纪中叶种烟和吸烟的习惯普遍盛行起来。大致同时或稍晚，马铃薯和甘薯也传入我国。

（孔祥民）

印第安人

(Yindi 'anren) 美洲的最早居民。15 世纪末，哥伦布一行到达美洲时以为到了印度，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即印度人；后来错误被纠正，但美洲的原来居民仍被称为印第安人。人类学者认为，印第安人头发色黑而硬直，颧骨突出，皮肤棕黄，属蒙古人种。一般认为印第安人主要是从亚洲东北部去美洲的，那里同美洲的阿拉斯加邻近，仅隔一道宽 80 公里、深 50 米的白令海峡。四五万年前的海平面比现在低 100 米以上，人们可以步行去美洲。一批又一批的印第安人先到阿拉斯加，再慢慢散布到整个美洲。初到美洲的印第安人主要靠渔猎为主，能制造粗糙的石器，会人工取火，会驾驶独木舟或小皮船，也会编制网具和兽皮衣服，可能有弓箭和陶器。后来定居从事农业，培育出玉米、马铃薯、番茄、烟叶、向日葵等作物，大大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印第安人族系庞杂，分布广泛，彼此联系不多，16 世纪初总共有 1400 万~1700 万人，方言竟达 1700 多种。他们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大多处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南美洲的玛雅人、阿斯特克人和印加人发展程度较高，逐步向奴隶制社会过渡，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欧洲殖民者的侵入打断印第安人社会的独立发展，给他们套上殖民主义的枷锁。

(孔祥民)

玛雅文化

(Maya wenhua) 印第安人的一支玛雅人创造的文化，繁荣期在 4—10 世纪，15 世纪初，特别是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后衰落。玛雅人分布在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伯利兹一带，是唯一有文字的印第安人。玛雅人的文化对后来的阿斯特克文化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被称为“新世界的希腊人”。公元前第 1 千纪前，玛雅人已有刀耕火种农业，培育出玉米、番茄、甘薯、南瓜、豆类、辣椒、可可、棉花和烟草等，为丰富人类生活做出重大贡献。他们用石头制造工具和武器，用金、银、铜、锡的合金制成精美的首饰和器皿，用棉花或龙舌兰织成种种布匹。公元初出现城市，先后共有 100 多座，重要的有帕林克、蒂卡尔、哥潘、玛雅潘和奇钦—伊察等。城市和村落里有贸易广场，交换蜂蜜、布匹、武器、鱼、盐和奴隶，甚至与南美的哥伦比亚也有商业联系，以可可豆、贝壳、布匹、铜铃或小铜斧为交换媒介。有的城市规模相当大，如蒂卡尔方圆达 80 平方公里，有大小金字塔 300 多座，估计有 4 万多居民。玛雅的金字塔是平顶，上面修建富丽堂皇的神庙，装饰着美丽的壁画和雕刻，四周有供攀登的阶梯。著名的奇钦—伊察库库尔坎神庙，其金字塔台基高 24 米，每边宽 5 米，各有 90 级阶梯，庙高 6 米，正面阶梯底部还有两个带羽毛的蛇头石刻，整个布局美观大方。玛雅人有立纪念碑的习惯，一般每隔 20 年立一座，记载重大事件。现已发现数百座纪念碑，最早的立于 292 年，最晚的立于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大肆侵略时的 1516 年，是研究美洲古代史的难得资料。1946 年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发现的博南帕克壁画，画有贵族仪仗、战胜凯旋、献祭俘虏、庆贺游行、交纳贡赋等场面，色彩绚丽，线条清晰，形态逼真，充分表现玛雅人的高超艺术才能。玛雅人在数学、天文和历法上有很高的造诣。他们根据手脚帮助计数的经验，创造 20 进位法，使用“零”（类似眼睛的椭圆形）比欧洲人早 800 年。他们的天文台能准确预测日蚀，知道月亮、金星的运行周期。他们使用太阳历，一年有 18 个月，每月 20 天，剩下最后 5 天为禁忌日，又 4 年一闰加一天，总长 365.2420 日，接近现代的科学预测（365.2422 日）。玛雅有象形文字，使用 800 多个表音和表意的符号，组成近 3 万个词汇，可惜至今未被全部释读。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394-1.bmp}

（孔祥民）

阿斯特克文化

(Asi tekewenhua) 印第安人的一支阿斯特克人创造的文化，繁荣期在15—16世纪。阿斯特克人的故乡在墨西哥西北部的阿斯特兰岛。据说战神兼太阳神威济罗波奇特里告诉他们，一只鹰站在仙人掌上食蛇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新居住地。1325年，他们在酋长特诺克率领下来到特斯科科湖中的两个小岛上，建立特诺奇蒂特兰城，称新居住地为墨西哥。“墨西哥”意思是“战神指定的地方”，因为威济罗波奇特里又名墨西特利，鹰吃蛇图案成了今墨西哥的国徽。15世纪初，墨西哥开始向外扩张，征服邻近部落。蒙特祖马二世(1475—1520)时期达到极盛，扩张领土到墨西哥湾、危地马拉和太平洋沿岸。墨西哥贵族向被征服者征收金银、玉石、皮毛、可可和蜂蜜，私有制和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形成早期奴隶制国家。阿斯特克人以农业为主，种植玉米、甘薯、棉花、番茄和豆类，还知道施肥和灌溉，产量较高。他们能对1200种植物进行分类。手工业比玛雅进步。他们在制造铜器和陶器、铸造和压制金器以及用宝石和羽毛镶嵌装饰品方面显示的高超技艺，使16世纪的欧洲人感到惊异。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有一座大市场，定期举行贸易，一般以物易物，偶尔以可可豆、细金砂作交换媒介。阿斯特克人擅长建筑，用不到200年的时间把首都建成一座布局整齐、气势宏伟的城市。城中央是供奉战神的大庙，庙基是一座高35米的巨型金字塔，两边各有120层阶梯。大庙附近还有许多庙宇(全城有40座庙宇)、宫殿和贵族的宅第，大都饰以羽蛇浮雕，修有亭台花园，两条大道纵横交叉，把全城分为四个区。为防止水患和联结各岛，筑有3条10米宽的堤坝，并派官员负责管理。每隔一定距离修建横渠和吊桥，便于船只往来，一旦外敌侵扰可拉起吊桥，断绝陆路联系。为解决居民饮用水不足，专门修建两条引水渠。据墨西哥著名历史学家丹·科·比列加斯估计，特诺奇蒂特兰有居民约8万人(丹·科·比列加斯等著《墨西哥历史概要》，杨恩瑞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是当时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城市之一。阿斯特克人的历法与玛雅人接近，都使用太阳历，一年有18个月，共365天。每天有特定的名称，如猴日、雨日等。每50年为一轮，要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在特诺奇蒂特兰发掘出阿斯特克人的圆形历石(即“太阳石”)，重20多吨，上刻计时用的精细浮雕。1978年发现的“月亮石”，重10吨，是阿斯特克人的又一件艺术珍品。

(孔祥民)

印加文化

(Yinjia wenhua) 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印加人创造的文化，繁荣期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初。“印加”意思是“太阳的子孙”，因为这支印第安人自认为是太阳的后代，国王是太阳的化身（亦称印加）。他们原居今秘鲁的库斯科，讲歧楚阿语。在第 9 代王帕查库蒂(1438—1471)及其子图帕克(1471—1493)统治时期，开始征服邻近部落。11 代王瓦伊纳·卡帕克(1493—1526)时，形成庞大的帝国，疆土北起哥伦比亚南部，南到智利中部，西临太平洋，东至亚马孙丛林，囊括今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总面积达 80 万平方公里，人口 600 万。人们称印加人是“新世界的罗马人”。公元之初，印加人已有相当发达的农业。他们垒起层层梯田，修成百余公里长的渠道引溪水灌田，知道使用粪肥，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他们培育出近 40 种作物，特别是玉米和马铃薯，为农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们开采金、银等多种金属，制造出坚固的青铜器、精美的装饰品。印加人能用手工织机织出绚丽多彩的布匹，上面带有精美的动植物图案和几何形花纹。印加人擅长建筑，被誉为印第安人的建筑工程师。首都库斯科有宏伟的太阳庙，正庙四壁装饰着厚厚的金片，人称金宫，中间是一座金铸的太阳像，镶满宝石和翡翠，一旦晨光照进，光芒四射。庙旁有太阳神的“黄金花园”，布满金银制成的花卉草木、飞禽走兽，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几可乱真。他们修建两条贯通南北的大道：一条在高原，从哥伦比亚南部直通智利，长约 5600 公里；另一条在沿海，从厄瓜多尔经秘鲁到智利中部，长 4000 公里。路面宽 5~8 米，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有的藤编吊桥长达 60 米。干线之外还有支线，通往全国各地。大道沿线遍设驿站，险要地段筑有要塞和烽火台。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可以吓倒现代最勇敢的工程师。印加人在数学和天文方面也有成就，但逊于玛雅人和阿斯特克人。库斯科设有观象台和测定时间、季节的“日表”。他们采用阴阳合历：太阴历以月亮圆缺一次为一个月，一年有 12 个月，共计 354 天；太阳历以冬至为岁首，一年有 $365\frac{1}{4}$ 日。他们会制作木乃伊，把国王的尸体保存下来供人们崇拜，或在盛大节日时抬着游行。他们能用青铜刀进行开颅手术，还知道从古柯叶中提取可卡因作麻醉剂。印加人没有文字，用结绳记事，以结子的位置代表数字，以颜色代表物品，如黄、白两色分别表示金银。1532 年，西欧殖民者皮萨罗等攻占库斯科，最后一位国王被杀，印加遂亡。

(孔祥民)

世界近代史

世界近代史

(shijiejindaishi)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直至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历史。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崛起,并以不可抵挡之势向全球扩张,逐渐形成了由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少数工业发达国家支配广大农业国家和地区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段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商业资本主义时期(17世纪中叶—19世纪初)。早在15、16世纪,资本主义就开始在欧亚大陆农耕文明世界的西端破土而生。西欧社会由农本转向重商,积极开辟通往东方市场的海洋航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主义触角伸向世界。佛兰德尔、尼德兰、英国和法国的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荷兰、英国确立。16世纪末的尼德兰革命和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分别导致在荷、英建立起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英国在17世纪成为欧洲大国之一,以后又获得海上乃至世界霸权。它的政治、经济变革和成就以及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对欧美乃至世界影响重大。因此,我国史学界一般以英国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英、荷、法、俄,继葡、西之后,到处进行殖民扩张。南北美洲、西伯利亚、亚洲东南海岛、印度沿岸、非洲东西两岸都被置于欧洲殖民强国的统治或控制之下。到18世纪中叶,初步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殖民扩张和掠夺支持和保证了欧洲贸易的兴隆、手工工场的繁盛和资本的原始积累。

18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大陆封建制度的危机日渐加深。抨击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倡言理性和人权的启蒙思想,以法国为中心向全欧迅速传播,形成国际性的思想运动。欧陆各国政府纷纷进行改革,开明君主专制风行一时。

18世纪后半期,英属北美殖民地和法国先后发生影响重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兼有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双重性质。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在北美的自由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新大陆”的名称由此获得新的意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被人们冠之以“大革命”。它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原则的鲜明性,它在动员群众方面的深度和广度,它的激烈程度,在近代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这场革命很快演变为欧洲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大搏斗。拿破仑战争进一步扩大了法国革命的影响。

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拉丁美洲掀起了反宗主国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的风暴。到19世纪20、30年代,17个新独立国家先后建立。但拉美国家在政治上普遍实行考迪罗主义,在经济上依然是西欧的附庸。

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欧洲建立起反动的维也纳体系。但法国革命留下了两笔思想遗产——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19世纪20、30年代,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此起彼伏。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波兰和俄国的革命运动遭到镇压,但希腊独立战争,1830年法国和比利时革命取得了胜利。

(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初到19世纪70年代)。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前后,在英国正在静悄悄地进行着一场意义更加重大的工业

革命。经过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国，获得“世界工厂”的称号。自19世纪初起，受英国影响，比利时、法国、美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西班牙等也先后开始各自的工业革命。到70—80年代，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世界出现于欧美。资本主义充分显示了相对于封建制度的优越性。

工业革命引起欧洲社会结构的变化，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工业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和贵族政治、封建专制的冲突愈益尖锐。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中形成。贫苦无告的悲惨处境迫使工人奋起斗争。救治社会弊病的各种方案纷纷问世，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思想潮流。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运动几乎席卷了欧洲大陆。在这次革命中，民主革命和民族运动同时迸发，工人阶级独立参加斗争。这次革命虽然遭到失败，但是民主改革和民族独立、统一的要求已深入人心。将革命镇压下去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正视历史潮流。

从50—70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再次高涨，欧美地区战争、革命接连不断。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历史的曲折中取得胜利。意大利和德国分别实现了统一。法国第二帝国崩溃，共和政体重新建立。奥地利实行改革，建立二元制的奥匈帝国。俄国废除了农奴制。美国废除了奴隶制，维护了共和制和统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大国确立了。

从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初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既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联系，又具有独立的性质。英国工人运动在政治性的宪章运动失败后，转向工联主义。后起的以法国为主的欧陆工人运动则具有更激烈的特征。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建立了国际性联系。

工业资本主义在欧美的胜利，使这一地区决定性地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欧美国家通过不平等贸易，对经济落后国家进行掠夺。一个几乎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基本形成。受到西方殖民入侵的亚洲和北非诸国，封建统治的危机加深，传统的思想文化受到震撼。人民革命、民族运动和上层改革在不少国家中交错进行。中国、波斯、印度、阿富汗、印尼、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等，先后爆发人民革命和反殖民入侵的斗争。土耳其、埃及、突尼斯、埃塞俄比亚、波斯、暹罗及中国进行了某些改革。但是这些国家都未能摆脱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命运。唯有日本例外，经过明治维新，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三）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确立时期（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欧洲和美国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迅速，生产和资本日益集中。资本的集中产生了垄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政治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不同程度地有所发展。美国两党制度日益健全，英国基本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法国共和制度逐渐稳定。这三个国家大体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德国、日本、俄国也先后设立了民选国会。但是，在包括德、俄、日在内的多数国家，君主、重臣和贵族仍掌握支配权力。为了对抗日益增强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平息不满情绪，西欧和美国的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现代福利国家的结构正在初具雏形。

随着工人队伍的壮大和民主权利的增加，工人运动的规模扩大了，合法斗争和经济斗争成为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自 1869 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美国、日本都相继诞生了工人政党。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工人运动的国际联系进一步加强。1889 年，第二国际成立。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形成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力量的对立。在军事专制的俄国，诞生了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1905 年俄国革命虽然失败，但是为 1917 年革命做了准备，并对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猛，特别是美国和德国后来居上，工业生产能力超过英国。为掠夺原料、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及投资场所，德、美、日、意等后起诸强，同英、俄、法三国争相瓜分世界。到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囊括了全球。

由于进一步卷入世界市场和外国资本的输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出现了银行和近代工业。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如土耳其新奥斯曼党、印度国大党、中国同盟会、古巴革命党。自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菲律宾、伊朗、土耳其、中国以及古巴、墨西哥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些革命揭开了 20 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争霸和重新分割世界的角逐愈演愈烈。德、奥同盟与英、法、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欧洲列强严重削弱。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被突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和十月革命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开始。

（刘北成）

英国近代史

(yingguo jindaishi) 17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发展，直至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

我国史学界一般以 17 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作为英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革命的前提条件至少要追溯到前一个世纪。16 世纪，都铎王朝的两位杰出君主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确立和维护了英格兰王国的统一和独立。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因海外贸易和圈地运动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成为最强大的社会阶层。进入 17 世纪后，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同入主英国的原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冲突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了被西方学者称作“大叛乱”的革命。英国革命在外表上是一场宗教战争（“清教徒革命”），其实质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其结果是建立起新型的贵族政治和君主立宪制。在革命期间，英国征服了爱尔兰，并控制了苏格兰。1707 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会合并，实现了政治统一和境内贸易自由。1800 年，不列颠联合王国正式合并爱尔兰。但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从未停止。

1688 年光荣革命后，英国享受着长期的国内和平，社会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对外，经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合称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英国战胜了主要对手——法国，获得并巩固了海上霸权。市场需求的扩大引起了工业技术乃至产业结构的革命。这场工业革命在形式上是渐进的，从 18 世纪 60 年代到 19 世纪 30、40 年代前后历经近一个世纪，但就其本质和后果而言，乃是历史大飞跃。它使英国首先步入工业化社会。

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两个新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诞生了。早在 18 世纪下半期，工业资产阶级就掀起了以争取选举权为目的的激进运动。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他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并借助工人阶级的支持，节节战胜土地贵族，通过一系列改革，如 1832 年、1867 年和 1884 年扩大选举权的国会改革以及文官制度改革等，消除了上层建筑中腐朽过时的部分，最终在 20 世纪初使英国建立起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充满了苦难，遭到工业资本剥夺的手工工人奋起斗争，从毁坏机器的卢德运动发展到声势浩大的争取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斗争中形成。工业革命完成后，合法斗争成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特征。工会运动和工联主义在 19 世纪中后期占了支配地位。此后，社会改良主义有决定性的影响。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有“世界工厂”之称。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曾因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而受到打击，一度踟蹰不前，但在工业革命后，获得了更大的动力。英国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帜，向全球扩张，建立了最大的殖民帝国。

在欧洲国际舞台上，英国凭借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长期采取“光荣孤立”政策，不与任何大国结成持久的、有约束的同盟，而是竭力维持、利用和操纵欧陆国家间的均势。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英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开始出现相对衰落的迹象。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都超过了英国。由于在商业、殖民地和海上都遇到激烈的竞争，英国被迫放弃

“光荣孤立”政策，与法、俄结成协约国，最终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近代历史上，英国对世界文明有极其重大的贡献。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型，革命后形成的政治制度成为各国竞相效仿的楷模。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人类从此开始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飞跃。几个世纪里，英国产生了璨若群星的文化名人，如科学家牛顿、达尔文，哲学家培根、霍布斯、洛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文学家拜伦、狄更斯，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等。英语逐渐成为国际交往的通用语言，对世界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英国的殖民扩张活动对各地的文明发展既有客观进步的意义，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刘北成）

清教徒

(Qingjiaotu) 16 世纪下半叶从英国国教内部分离出来的宗教派别。16 世纪上半叶，英王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决裂，进行宗教改革，建立以英王为首领的国教会（圣公会），但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重要教义和仪式。60 年代，许多人主张清洗圣公会内部的天主教残余影响，得名清教徒。他们接受加尔文教教义，要求废除主教制和偶像崇拜，减少宗教节日，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华纵欲。因其要求在圣公会内未能实现，自 70 年代起，脱离圣公会，建立独立教会，选举长老管理宗教事务。清教教义反映了资产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道德标准，以及通过教会改革推动政治变革的愿望。17 世纪上半叶，信奉清教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的冲突愈演愈烈，导致英国革命，亦称清教徒革命。内战期间，议会废除主教制度。1843 年在威斯特敏斯特牧师大会上清教徒分裂为长老派和独立派，后者主张地方自愿结合的宗教团体独立，反对凌驾于此之上的长老制度。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清教徒受到迫害。1688 年光荣革命后，议会通过《宽容法》，允许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建立自己的教会。但对清教徒担任公职仍有所限制，到 1828 年政权才对清教徒完全开放。

清教徒在美国影响最大。17 世纪上半叶因宗教不满和经济压力，大批清教徒移居北美。在最早的 13 个殖民地，80% 的教会都具有清教倾向。

(刘北成)

掘地派

(juedipai)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代表无地和少地农民的空想共产主义派别。领导人是温斯坦莱和埃弗拉德。温斯坦莱原为伦敦小商人，破产后到乡间为人放牧，同情贫苦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认为独立派于1649年3月建立的自由共和国并不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使用土地”，主张土地公有。自称真平等派，认为基督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真诚的平等派。1649年4月，退役军人埃弗拉德带领4个农民到伦敦附近圣乔治山岗开垦荒地，人数渐增至20几人。温斯坦莱加入，并发表《真正的平等派举起的旗帜》的宣言。掘地派的活动引起土地私有者的仇视。在政府的示意下，土地私有者进行骚扰和破坏，推倒小屋，践踏庄稼，围打垦荒者，拉走牲畜。掘地派不主张暴力斗争，而想用仁爱感化土地私有者。1650年3月，公社被迫解散。但是在其他许多地区，有不少支持者，出现了贫民耕种村社公地的运动。有的地方参加者达千人之多。由于地主和军队的镇压，到1651年，掘地派运动失败。1652年，温斯坦莱发表《自由法》，详细阐述了掘地派的主张，描绘了公有制共和国的蓝图。该著作被认为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与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齐名。

(刘北成)

19 世纪英国国会改革

(shijiushiji Yingguo gauohuigaige) 19 世纪英国进行了 3 次重要的国会改革,使英国政治制度从 18 世纪的贵族政治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革前,国会(下院)受贵族操纵。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选区划分和议席分配始终未变。有些“衰败选区”已人烟稀少,甚至沉沦海底,仍有权选派议员,而新兴工业区无权选出议员;对选民和被选举人有财产资格限制,选举时贿赂公行,贵族指派议员现象比比皆是。18 世纪 60 年代起,随着产业革命起飞,中产阶级激进派掀起争取国会改革的斗争,提出和后来宪章运动基本一致的 6 点要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受到政府的压制。19 世纪 20 年代末,激进派再度活跃,得到工人的支持。各地举行盛大集会,形成全国性改革运动。自 1831 年起,全国舆论鼎沸。1832 年,国会迫于压力通过改革法案:撤销和减少衰败选区的议席,增补居民较多的地区和新兴工业区的议席;规定占有年收入 10 镑以上的房屋为选民资格;为防止舞弊和闹事,将投票时间从 15 天缩短为 2 天。1832 年改革打破了旧选举制度,选民人数从总人口 2%增至 3.3%,中产阶级得以参加政权。但贵族势力在国会和政府里仍占优势,城乡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仍无政治权利。30—40 年代,工人阶级展开了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未获成功。自 1852 年起,议会内的自由党和保守党领袖为谋取公众支持,各自提出改革法案,均被两党中的守旧派推翻。60 年代,工人阶级重新展开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以有组织的工会为基础,于 1865 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结成“全国改革同盟”。伦敦等城市数以万计的群众集会、游行。1867 年,保守党政府提出和通过改革法案,规定在城市选区凡缴纳济贫税的房主、年付房租 10 镑以上的房客均有选举权。该法案使大部分城市工人(成年男子)获得选举权。此后,两党轮流执政,竞相实行改革,建立文官制度、秘密投票制度等。1884—1885 年,为同保守党争夺农村的选民,自由党内阁进行第三次国会改革,将 1867 年确定的城市选民资格扩大到农村,使农业工人和矿工获得了选举权;并规定按人口比例划分选区。1918 年,英国基本上实现了男(21 岁)女(30 岁)公民的普遍选举权,取消了一切资格限制。经过一次次改革,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逐步扩大。1906 年大选,工党联合自由党取得胜利,贵族垄断议会下院的局面被打破了。

(刘北成)

宪章运动

(Xianzhang yundong) 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工人争取国会改革的运动，其纲领是《人民宪章》，故名。1832年，工业资产阶级凭借工人阶级的支持，迫使国会通过改革法案，得以跻身于统治集团。但工人没有获得选举权。1836年，手工业者威廉·洛维特创立伦敦工人协会。次年，协会拟定致国会请愿书，1838年，以《人民宪章》的名义公布于世，提出6点要求：年满21岁的男子均有选举权；秘密投票；按居民人数平均分配选区，每区选派一名议员；每年改选一次国会；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议员领取薪俸。各地工人热烈响应，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掀起签名运动。资产阶级激进派亦加入运动。1839年2月，在伦敦召开宪章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名为“宪章派公会”，决定向国会递交请愿书。7月，125万多人签名的请愿书遭国会否决，不少宪章派领导人被逮捕。1840年7月，全国宪章派协会在曼彻斯特成立。该协会有较强的组织性，是英国第一个群众性工人政党。资产阶级激进派退出运动。1842年，在奥康诺领导下，宪章派掀起第二次高潮。请愿书上签名者达330多万人。5月，请愿书又遭国会否决。6月起，各地工人罢工，个别地方发生巷战。9月，军警进行镇压，1500多宪章派积极分子被捕。哈尼、琼斯等宪章派左翼坚持斗争。1845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帮助下，哈尼等同流亡伦敦的各国革命者创建“国际民主派兄弟协会”。1848年，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宪章运动形成第三次高潮，有197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政府动员大批军警，禁止工人在伦敦游行，并下令解散全国宪章派协会，逮捕500余人。此后，宪章运动日趋消亡。1853年，全国宪章派协会不再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1858年，协会解散。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列宁语），为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对英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造亦产生深远影响。它的6点要求，除每年选举议会外，后来都陆续得到实现。

（刘北成）

文官制度改革

(wenguan zhidu gaige) 19 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为消除腐败、提高效率而进行的一项行政制度改革。改革以前，国王、首相或贵族议员掌有直接任命政府官吏的权力，卖官鬻爵、任人唯亲非常普遍。贵族子弟庸碌无能而高踞要职，政府官员饱食终日甚至请人代职。官员晋升不凭才干和业绩，而靠年资和奥援。结果，政府部门冗员充斥，效率低下，业务混乱。18 世纪 80 年代，议会曾进行初步改革，规定录用官员首先须经各部门负责人的推荐，但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9 世纪 50 年代初，资产阶级自由派主张加以改革。在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的授意下，屈维廉和诺斯科特于 1853 年底拟出“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针砭当时文官制度的弊病，提出全面改革的方案。该报告在 1854 年的议会讨论中遭到反对，被迫撤回。因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政府机构的弊病导致英军的严重伤亡和后勤供应的迟缓，激怒了公众舆论。1855 年，首相帕麦斯顿绕过议会，颁布了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一个正式法令。但改革很不彻底。1870 年，首相格莱斯顿颁布了第二个法令，规定一切文官任用须经公开竞争考试，但外交部和内政部例外。财政部的附件决定，考试分为高级和低级两类。以后，政府对投考文官的年龄、文官待遇、分级等做了许多改革、补充和修订，文官制度日臻完善。这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通过改革，取消了个人恩赐官职的特权，减少了政府的腐败，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同时促进了其他部门的改革。

(刘北成)

工联主义

(Gonglian zhuyi)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潮,在英国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中出现得最早,发展得最充分,故名。工联主义者主张工人组成工会,为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和法律地位进行斗争,但反对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英国的工会组织出现较早,工联主义也相伴而生。工会埋头于内部福利活动和维护本行业和会员的利益。在整个宪章运动时期,工会组织基本上持消极态度。宪章运动失败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团体衰落,工会成为工人阶级最重要的组织。自19世纪50年代起,一批由技术工人组成的新的全国性行业工会出现,如混合机器工人协会(1851年),混合木工协会(1860年)。它们实行严格的关门主义,维护少数技术工人在行业中的特权地位,强调工会的福利活动,鼓吹劳资合作,主张通过谈判和协商来改善工人待遇,仅参加争取选举权和劳动立法的政治斗争。它们通过伦敦工联理事会和全国职工大会控制了全国工会运动的领导权,使工联主义支配了工人运动。自80年代末起,非熟练工人和普通工人纷纷建立工会,掀起罢工浪潮。工人政治团体(如苏格兰工党、布雷德福劳工联盟、曼彻斯特独立工党)相继成立。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开始流传。1900年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建立,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为工人贵族所控制。工党的建立标志着社会改良主义取代了工联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从此工联主义逐渐成为社会改良主义的附庸。

(刘北成)

自由党

(Ziyou dang) 英国 19 世纪中期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前身为辉格党。1660 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议会内形成两派。一派被对方骂为辉格，即苏格兰语的盗马贼，因此得名。辉格党不是严密组织，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议会贵族集团。1714 年后的半个世纪一直执政。以后半个世纪处于反对党地位，支持议会改革的主张。1830 年起，在政府中重占优势。1832 年国会改革后，中产阶级议员逐渐增加，但仍为少数。1839 年，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勋爵开始使用自由党名称。50 年代，旧辉格集团与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基本完成了辉格党向自由党的演变。50—60 年代，当政的主要是自由党。自由党政府推行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政策，如自由贸易。1868 年，格拉斯顿组阁，被认为是第一个明确无误的自由党政府。在他的领导下，各派别形成统一的议会政党，并开始形成议会外的政党组织结构。1868—1894 年，格拉斯顿曾先后 4 次组阁，执政 12 年。1886 年，该党因爱尔兰自治计划发生分裂，受到削弱。1905 年至 1915 年是该党单独执政的最后时期，该时期的改革成为福利国家政策的起点。1918 年后，工党取代自由党的地位，成为与保守党抗衡的大党。自由党日益衰微，二次大战后，在英国政治舞台上已无重大影响。

(刘北成)

费边社

(Feibianshe) 1884年由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取名于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斯，意为效法费边的缓进待机的战术。费边社创始人是戴维森，其核心人物是悉尼·韦伯、其妻比阿特丽斯·韦伯和文学家肖伯纳。其理论集中反映在1889年出版的《费边论丛》一书中。他们反对革命，主张通过渐进的改良，“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所有制下解放出来，把它们转归公社所有”。他们宣扬市政社会主义，即通过民主选举使社会主义者掌握地方议会和市政机关，运用立法将公用事业公有化，用征收租金税消灭土地私有制，渐进地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协助建立了工党并集体加入工党。费边社成为工党的研究机构，费边社会主义成为工党纲领和政策的理论基础。费边主义在英国和欧洲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也有深刻影响。

(刘北成)

伊丽莎白一世

(Yilishabai yishi ,Elizabeth I 1533—1603) 英国女王。亨利八世之女。其母安娜·玻琳因不贞罪被处死。她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受过有新教倾向的剑桥教师的教育，会讲法语和意大利语，通晓古典文化。1554年，被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同父异母之姊)囚禁于伦敦塔。1558年继位。1559年，实行宗教和解，释放被关押的新教徒，指使国会通过《至尊法令》，重申国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领。她还注意避免过分伤害天主教徒。她继续实行亨利八世出卖教会地产的政策。从未认真执行先王禁止圈地的法令，最终于1593年解禁。她鼓励英国的海盗活动，视之为打击西班牙和充实国库的重要手段，曾直接向海盗船投资2万镑。支持新兴的奴隶贸易，将自己的一艘船提供给贩奴者使用。她授权商人建立贸易垄断公司，向美洲和东方扩张。1569年，她镇压了天主教势力的叛乱。1570年，教皇宣布开除她的教籍。此后，旨在刺杀女王和拥立被她软禁的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阴谋活动愈加频繁。1587年，她处死玛丽，教皇号召天主教徒对英国作战。1588年7月，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被击败。伊丽莎白时代达到极盛，经济繁荣，文化兴旺，出现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等文化名人。伊丽莎白晚年，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女王多次处死清教激进派领袖。女王喜欢与男人交往，但终身未婚。伊丽莎白在英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巩固了亨利八世开始的宗教改革的成果，维持了民族的团结统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对西班牙的决定性胜利，英国成为欧洲强国。

(刘北成)

克伦威尔

(Kelunweier, OliverCromvell1599—1658)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生于英格兰东部亨廷顿郡的一个信奉清教的乡绅家庭。17 岁时被送进剑桥大学锡德尼·苏萨克斯学院学习，由信奉清教的沃尔德博士照管。翌年，因父病故，回家照理农庄。20 岁时曾在伦敦法学院学习法律。因家族的历史威望和本人热烈坚定的清教信仰，克伦威尔于 1828 年当选为出席国会的议员。他参与调查散布天主教影响的主教，支持议会抗拒国王。1840 年，再度当选为议员。1841 年提出《连根带枝法案》，主张废除主教制度，参与《大抗议书》的起草。1842 年内战开始后，以骑兵上尉军衔组织 60 名志愿骑兵参战。翌年，在英格兰东部招募了一支主要由笃信清教的自耕农组成的千人骑兵队。该军队纪律严明，作战英勇，临危不乱，所向披靡，被称为“铁骑”。1644 年 7 月，在马斯顿荒原之战中歼灭王军 4000 多人，扭转了国会军初期连遭失败的局面。1645 年，被国会任命为副总司令，改组军队，以“铁骑”为核心建立 2 万多人的“新模范军”。7 月，在纳斯比战役中摧毁王军主力。从此以破竹之势连克王军，取得第一次内战的胜利。1648 年，第二次内战中，率兵平息了威尔士的王党叛乱。他主张废除国王，支持独立派军官清洗国会中坚持与国王妥协的长老派议员。1649 年，组织审判和处决了国王查理一世。共和国建立后，他镇压了军队中的平等派，并率军侵入爱尔兰，镇压当地人民起义。他利用宗教信仰的不同，残酷屠杀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爱尔兰 1/3 的人口被剿灭，2/3 的土地被侵占，克伦威尔和高级军官都成了爱尔兰的大地主。1650—1651 年，克伦威尔挥师北上苏格兰，消灭了拥戴查理二世复辟的苏格兰军队。1653 年，利用军队对“残阙国会”的腐败不满，将国会解散。随后，就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护国主，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共和国名存实亡。全国被划分为 11 个军区，由高级军官任总督。对外，克伦威尔于 1652 年发动英荷战争，击败荷兰，使英国控制了海外贸易。1654 年，迫使葡萄牙签订条约，使英国商人获得在葡和葡属殖民地经商的特权。1655 年，抢占西属牙买加。1658 年，攻占西属敦刻尔克，使英国在欧洲大陆获得一个立足点。1658 年克伦威尔在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中病逝。

(刘北成)

欧文

(Ouwen, Robert Owen 1771—1858) 19 世纪初期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社会改革家。出身于北威尔士手工业者家庭。9 岁当学徒，10 岁起当店员。业余时间刻苦自学。20 岁时被曼彻斯特一家纺纱厂聘为经理，因管理有方而享有声誉。1799 年，同别人合伙买下苏格兰新拉纳克的一家纺织厂，第二年起担任该厂经理。他进行了通过改造环境来改造人的性格的实验，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将工作日缩减到 10 小时半，提高工资，修建学校和托儿所，组织伤病储蓄会，改善工人住宿条件。实验收到明显效果，居民成分复杂、堕落分子麋集的新拉纳克被改造成社会风尚优良的模范移民区，工厂股东亦获得优厚红利。欧文博得慈善家的声誉。19 世纪 20 年代，欧文形成社会主义思想。他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得出新结论：既然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那么劳动者就有权占有他们创造的全部价值。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充满谬见、不良行政管理、缺乏理智和正义的社会制度”，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主张建立由劳动者组成和管理的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主张消灭城乡对立，实行工农结合、脑体结合。1824 年，他在美国买下了 3 万英亩土地，创办共产主义移民区——新和谐村。参加者近千人。因宗教分歧和消费超过生产，1828 年，公社瓦解。欧文回到英国，直接面向工人，宣传建立合作社，被誉为“合作社之父”。1833 年，他主持了英国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当选为英国第一个总工会——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的主席。1835 年后，他同工人运动渐渐疏远，致力于宣传他的教育、道德学说和婚姻改革思想，反对政治斗争。1858 年辞世。

(刘北成)

法国近代史

(faguo jindaishi)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确立、发展，直至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法国是世界近代史上阶级斗争最激烈、政治发展最曲折的国家，从 1789 年到 1871 年先后经历五次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各阶级、各党派创造和试验了各种政治体制、政治思想、政治行为和行政法律制度。由于法国是欧洲最先进的大国之一，法国的政治文化对于世界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

史学界一般以 1789 年爆发的大革命作为法国近代史的开端。在革命之前，以绝对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为特征的旧制度已衰落式微。频繁的对外战争、宫廷的奢靡浪费和贵族的免税特权致使波旁王朝陷入难以解决的财政危机。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激励了改革社会的普遍愿望。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与旧制度的矛盾日益激化。1789 年 7 月 14 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开始。这次革命鲜明地宣布自由、平等、法制和民主原则，坚决废除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在与国内外反动保守势力的搏斗中，人民群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推动革命沿上升路线发展，从 1789 年到 1794 年先后经历了立宪君主制、吉伦特派共和国和雅各宾派民主专政。1794 年热月政变结束了恐怖统治，但未能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稳定下来。1799 年拿破仑·波拿巴将军通过雾月政变上台，于 1804 年建立法兰西帝国。拿破仑在国内维护和巩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国外扫荡了欧洲封建势力，使法国一度称霸欧洲。1814 年拿破仑被反法联军击败而退位。1815 年 3 月他重返法国，建百日王朝，6 月在滑铁卢彻底失败。

1814 年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颁布《宪章》，承认大革命所确立的经济秩序和自由权利。法国的经济开始从多年战争的破坏中恢复。1824 年查理十世继位后倒行逆施，背弃《宪章》，激起社会上普遍的不满。1830 年 7 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代之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为国王的七月王朝。

七月王朝实行立宪君主制，政权落入大资产阶级手中。政府残酷镇压 30 年代初的工人运动（如 1831 年和 1834 年里昂工人起义）和共和运动，以确保资产阶级的秩序。工业革命开始展开，纺织业和铁路建设发展较快。40 年代，社会各阶层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长。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工人中迅速流传。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扩大选举权。政府拒绝改革，激发了 1848 年 2 月革命。七月王朝被推翻，建立起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1848 年革命的显著特征是工人阶级为争取权利而奋勇战斗。工人代表也进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资产阶级对此深感恐惧。是年 6 月，巴黎工人起义，遭到残酷镇压。12 月，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利用农民对拿破仑的迷恋，当选为总统。1851 年 12 月，他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翌年，加冕称帝，自称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拿破仑三世稳定了法国政局，鼓励经济发展。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法国成为欧洲的工业大国。政治体制也由 50 年代的专制帝国演变为 60 年代的自由帝国，议会的权力逐步恢复，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等权利被肯定。共和运动、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逐渐兴起。拿破仑三世为谋求军事和外交威望，参加了一系列对外战争，1870 年 9 月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成为俘虏。9 月 4 日巴黎人民革命，推翻第二帝国，宣布共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由此诞生。

1871年3月18日，坚持抗战的巴黎工人发动了起义，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公社只存在了72天，但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19世纪70年代以后，自大革命以来的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斗争进入最后阶段。1875年，国民议会以一票之差通过第三共和国宪法，最终以法律形式把共和制度确定下来。1886—1889年布朗热将军因鼓吹对德复仇和推翻议会制度而名噪一时。共和派政府果断地平息了事态。1894年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判刑，1898年，该案件触发了全国性的保卫民主和人权、保卫共和国的政治斗争。这一时期，法国充分利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航空和汽车工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法国工业发展速度落后于美国 and 德国，农业发展也比较缓慢。法国金融资本发达和集中，被称为“二百家族”的法兰西银行大股东分别掌握着各垄断企业。

法国工人运动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经过10年才复苏。1879年盖德和拉法格创建法国工人党。90年代出现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独立社会主义者联盟。在米勒兰入阁事件上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形成两派，到1905年合并为统一社会党。工团主义在工会中具有重大影响。

在19世纪末瓜分非洲的活动中，法国夺取了相当本土10倍的领土，是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大国。在欧洲外交中，则准备对德复仇，先后与俄、英缔结协约。

近代法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法国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法兰西文化风靡全欧。法语是上流社会的国际通用语言。大革命时期确立的米制至今通行全世界。拉瓦锡奠定了近代化学的基础，巴斯德的消毒法改革了外科学，夏东研究出人造纤维的制造方法，居里夫妇发现了镭，卢米埃尔兄弟研制出电影放映机。近代法国文学先后流行过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出现了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等杰出作家。在美术方面，古典派的大卫、安格尔，浪漫派的德拉克洛瓦，印象派的莫奈、塞尚、高更等都驰名遐迩。

（许虹）

波旁王朝

(Bopang wangchao) 波旁家族在西欧若干国家和地区建立的王朝。波旁家族的先祖艾玛主教的封地在波旁堡，故名。1272年，该家族与法国卡佩王朝联姻，获得王族血统，后取得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纳瓦尔王国的王位。1572年，纳瓦尔国王亨利三世与法国瓦罗亚王朝公主玛格丽特结婚，于1589年瓦罗亚王朝绝嗣后继承法国王位，改称亨利四世，开始了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第三代国王路易十四在位时期(1661—1715)是该王朝的鼎盛时期。国内实行绝对君主专制，王权空前强大。政府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出口贸易，扶植手工工场，取消部分国内税卡。对外穷兵黩武，扩大了法国版图，法国成为号令欧洲的最大强国。路易十四有“太阳王”之称。连年的战争和王室的挥霍，致使国家财力衰减。路易十五统治时期(1715—1774)，虽然经济文化仍向前发展，但王权日趋衰落。政府多次实行财政改革，均未成功，三次参加国际战争均遭失败，丢失了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后，财政危机更为严重。1789年，为摆脱政治、经济困境，召开了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与国王、贵族的尖锐分歧导致大革命的爆发。1792年8月10日起义后，路易十六被囚禁，9月第一共和国建立，波旁王朝被推翻。翌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1814年拿破仑战败退位后，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七月革命最终结束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1701年，路易十四之孙菲力普继承西班牙王位，称菲力普五世，开始了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统治。1735年和1748年，菲力普五世之子分别领有那不勒斯王国和帕尔马公国，开始了波旁家族在意大利的统治。在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帕尔马公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先后被撒丁王国兼并。西班牙波旁王朝在1931年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推翻。

(许虹)

启蒙运动

(Qimeng yundong) 18 世纪流行于法国和欧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启蒙一词在法文中为 Lumières, 意为“以光明驱逐黑暗”, 在当时, 这是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伴随着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兴旺发达和政治上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展开, 启蒙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冲击着封建制度。

理论渊源 近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和近代哲学中崇尚理性的倾向是启蒙运动产生的理论背景。18 世纪初牛顿创立的经典物理学对宇宙进行了成功的解释, 纠正了中世纪许多权威理论的错误, 促使人们崇尚理性, 相信通过经验性推理, 人们可以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规律。科学的发展也为启蒙运动提供了彻底批判宗教神学的有力武器。17 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唯理论开启启蒙运动之先河。他主张以“理性的尺度”去检验以往的一切知识, 摒弃一切违反理性的迷信和偏见。英国哲学家洛克从经验主义立场修改了关于理性的学说, 认为理性可以综合感观印象而成为普遍真理, 感觉和理性不可偏废。这一思想成为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另外, 他的自然权利学说和分权学说、宗教宽容的主张等都深深地影响了启蒙运动。

基本思想 启蒙思想首先强调理性是通向智慧万无一失的向导, 人类的一切知识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接受检验, 按照理性的要求生活, 人类的前途将充满希望。其次, 启蒙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教会权威和宗教盲从, 主张用自然科学方法审视自然、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反对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 反对迷信和奇迹。在政治思想领域, 启蒙思想用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

法国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发端于 17、18 世纪之交的英国。自 18 世纪 20 年代起, 法国成为启蒙时代各种思想最活跃的中心, 涌现出一大批杰出思想家。伏尔泰 (1694—1778) 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泰斗。他激烈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 认为天主教会是一切进步的障碍。伏尔泰提倡自然权利学说, 主张自然赋予人类以自由平等的权利, 包括人身、思想、出版、信仰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孟德斯鸠 (1689—1755) 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 主张利用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避免滥用权力。卢梭 (1712—1778) 从人天赋自由平等的观点出发, 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 而封建制度使这种不平等发展到顶点, 因而用暴力推翻暴政是完全合理的。他主张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 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政府只是执行公意的机构, 一旦政府破坏了与人民订立的契约, 人民就有权推翻政府。卢梭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 实行直接民主, 反对代议制度。狄德罗 (1713—1784) 为编辑《百科全书》联络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宣传无神论和自然神论, 主张宗教宽容, 反对特权, 形成著名的“百科全书派”。以魁奈 (1694—1774) 为首的重农学派率先提出了经济上“自由放任”的思想。60—70 年代以后, 老一代启蒙思想家相继谢世, 启蒙运动的第二代人物崭露头角。他们对启蒙思想进行阐发和普及。孔多塞 (1743—1794)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坚信人的理性的不断完善是历史进步的源泉,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原则。

国际范围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和北美, 在德国表现为莱辛、歌德、席勒领导的文学革命和康德开启的古典哲学的革命; 在俄国表现

为普希金、拉吉舍夫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思想斗争和十二月党人的活动；维科、贝卡利亚使启蒙思想在意大利发扬光大；潘恩、杰斐逊、富兰克林是美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影响 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在启蒙时代欧洲知识界对西方文明传统信仰和价值观重新思考，强有力地扫荡了笼罩着西方世界的封建思想和宗教神学的迷雾。启蒙在理论上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欧洲和美洲的其他革命和改革作了准备。《独立宣言》、《人权宣言》是启蒙原则的法律化，某些立法原则在《拿破仑法典》中变成现实。从长远观点看，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思想最终导致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理性主义思想对粉碎专制暴政、削弱教会特权起了促进作用；人道主义、天赋人权和强调人的尊严的思想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基本价值规范；崇尚科学和对人类理智的乐观主义态度则促进了近代科学的重大发展。

（许虹）

三级会议

(sanji huiyi) 法国的等级代表会议。13 世纪末，法王腓力四世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关系紧张。1302 年，腓力四世为争取法国各阶层的支持首次召开三个等级的会议，与会者有教士、贵族、市民三个社会等级。此后，每当国家面临困境或国王需要援助尤其是征收新税时，通常都举行三级会议，制订新法令。波旁王朝君主致力于强化王权，从 1614 年起，175 年间从未召集过三级会议。1789 年，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国王路易十六同意召开三级会议。在选举代表期间，第三等级的广大群众撰写了大量陈情书，要求限制王权，废除特权。5 月 5 日，会议代表齐集凡尔赛，第一、第二等级各有代表 300 名，第三等级代表 600 名。按照三级会议的传统方式，三个等级代表分别开会，按等级表决。会议伊始，第三等级代表和一些自由派贵族就违背国王的初衷，把矛头指向专制制度。第三等级代表要求取消等级划分，三个等级共同集会，按人头表决。为了对抗王室和特权等级的顽固反对，第三等级代表于 6 月 10 日决定单独审查代表资格，17 日自行宣布为国民议会，推举巴宜为国民议会议长。20 日，路易十六下令关闭了第三等级代表的会议厅。代表们遂集合在一个室内网球场，宣誓不制订出宪法决不散会。国王对此大为惊慌，于 6 月 23 日召集三个等级代表举行御前会议，企图重新控制局面，第三等级代表坚持自己的立场。6 月 24 日和 25 日，大部分教士代表和一部分贵族代表先后加入国民议会。国王被迫让步，6 月 27 日，允许三个等级共同开会。7 月 9 日，国民议会进而改称制宪议会，并着手制订宪法。

(许虹)

8月4日之夜

(Bayue siri zhiye) 1789年法国制宪议会一次重要会议举行的时间，于此时开始制订著名的“8月法令”。1789年6—7月，由于国民议会的成立和议会中第三等级代表及自由派贵族与国王的严重对立，法国各地农村的局势也动荡不安。许多地方谣传宫廷要对第三等级进行报复，要派出“盗匪”和借用外国军队进攻各省，从而造成全国普遍的恐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聚众袭击贵族城堡，焚毁文契档案，强行取消领主权利等等。为了平息农民的义愤，稳定局势，在8月4日夜召开的制宪议会会议上，自由派贵族诺亚衣男爵和厄基养公爵提议无偿取消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用赎买方式逐步废除与土地相关的领主权利。议会在激昂的气氛中一致通过这一议案，又先后提出许多应予以废除的封建义务。从8月4日夜到8月11日，议会陆续起草并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废除领主及贵族特权的法令，合称“8月法令”。8月法令是法国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一个重大步骤。

(许虹)

人权宣言

(Renquan xuanyan)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有关人权的纲领性文件，全称《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789年7月9日，第三等级代表穆尼埃在制宪会议上提议，为防止国王利用专制权力解散议会和逮捕议会代表，应在新制定的宪法前面加上一个关于人的权利的宣言。议会经过对各种草案逐字逐句的讨论，最后确定17项条款，于8月26日正式通过《宣言》。《宣言》后来经过修改作为序文写入1791年宪法。《宣言》在思想上渊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同时也深受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它以法律形式庄严地肯定了启蒙运动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宣言》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该文件的缘起：由于“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宣言》首先肯定了人的自然权利：“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中，“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最主要的权利。基于人的自然权利，《宣言》提出了基本的政治原则：“主权属于国民”、“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宣言》还对人的自由作了重要阐释：“自由就是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宣言》确认人权的不可侵犯：未经法律程序，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和判刑。总之，贯穿于《宣言》始终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护人权的法律尊严。《宣言》对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中，它被印成传单、小册子，在公共场所广泛朗读和张贴，成为指引和鼓舞法国人民与封建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宣言》确立了近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念，以后，欧洲各国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都不同程度地在《人权宣言》的旗帜下展开。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404-1.bmp}

(许虹)

1791 年宪法

(Yiqijiuyinianxianfa) 法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89 年 7 月制宪议会开始着手制订宪法，年底基本条款已经拟定。1791 年 9 月 3 日议会表决通过，并呈报国王批准。在此之前，1791 年 6 月下旬路易十六曾经出逃未遂，致使人民群众要求废除国王和实行共和制的呼声高涨。慑于形势，路易十六于 9 月 14 日正式批准宪法。宪法的序文是经过修改的《人权宣言》。宪法规定法国的政体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立宪制，立法权属于由选举产生的一院制立法议会，立法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国王是国家行政机构的首脑。宪法规定：没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力，国王只能依据法律统治国家；国王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但国王若被废黜，也可交付法庭审判。司法权属于选举产生的法官，实行陪审裁判制。宪法把全国划分为 83 个郡，郡下设县，县下设区，各级行政长官和检察官都由选举产生。宪法确认取消一切贵族爵位、世袭荣衔和领主司法权，宣布全体公民都要纳税。在选举制度上，宪法把全国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年满 25 岁，有不动产，不是佣工，并且能够交纳相当于 3 天工资的直接税的人属于积极公民。凡积极公民都有选举权，而要取得被选举权必须达到更高的纳税和财产标准。按宪法所规定的标准，在当时法国的 2500 万人口中积极公民仅有 430 万左右，大量的农民、城市贫民和“机器工人”、手工业者被排斥在外。1791 年宪法采纳了启蒙运动提倡的人权思想和分权思想，也受到美国 1787 年宪法的启发和影响，其立国原则，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但是，这部宪法保留了君主的地位，也没有把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权和平等思想贯彻到底，而是以财产重新划分了公民等级，因而受到一些更加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反对。

(许虹)

吉伦特派

(Jiluntepai) 法国大革命中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吉伦特派的主要成员最初属于雅各宾俱乐部，后在俱乐部内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新派别，因该派领袖人物多来自西南部的吉伦特郡而得名。该派主要活动家有布里索、孔多塞、罗兰和罗兰夫人等，成员主要是与西部和南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有较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律师。1792年8月10日起义之后，以吉伦特派成员为主组成临时政府。在随后的国民公会选举中与雅各宾派展开激烈竞争，因各郡的支持而在选举中占上风，拥有国民公会750个议席中的160余席，从而出面组阁，开始吉伦特派执掌政权时期。吉伦特派主张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但认为法国革命应当止步，恢复秩序。该派掌权期间与雅各宾派在议会内外激烈斗争。1793年初法国局势恶化，前线吃紧，市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群众要求限制物价，打击投机商。吉伦特派则坚持经济自由原则，不愿实行对经济的干涉和管制。1793年4月前线发生吉伦特派将领杜穆里埃叛变事件，巴黎群众极为愤怒。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雅各宾派领导巴黎群众起义，迫使议会下令逮捕22名吉伦特派首领，结束了吉伦特派统治。在恐怖时期，吉伦特派首脑人物被大批处死或自杀。热月政变后，该派残余势力构成热月党的骨干。

(许虹)

雅各宾派

(Yagebinpai)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重要政治派别。1789年制宪议会期间，布列塔尼代表经常集会议事，代表之一、律师列·沙白里哀提议组成布列塔尼俱乐部，后其他郡代表也加入。1789年10月制宪议会随同国王由凡尔赛迁到巴黎，布列塔尼俱乐部更名为“宪法之友社”，因集会地点在一座古老的寺院——雅各宾修道院，又名“雅各宾俱乐部”。俱乐部成员及许多支持他们的代表构成雅各宾派。俱乐部初期会费昂贵，参加者多是经济上较为殷实的自由派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等。后来会费有所降低，但一般群众仍无法负担。1791年以后，在全国各地设立数以千计的支部。俱乐部曾几经分化。1791年7月马斯校场事件后，大资产阶级立宪派分子退出。第一共和国成立之初，国民公会内山岳派与吉伦特派矛盾不断激化，10月10日，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被开除出俱乐部，吉伦特分子也先后退出。至此，雅各宾派成为主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罗伯斯庇尔等人成为主要领袖。该派不以实现共和制度为满足，要求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实行民主的政治、经济措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对财产的不平等，要求限制财产权，并主张以严厉手段对付革命的敌人。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策动和领导了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统治，开始雅各宾派专政。专政期间，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农村土地问题，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制度；击退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攻，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专政后期内部发生分裂，罗伯斯庇尔先后镇压了忿激派、埃贝尔派、丹东派，该派本身也大大削弱。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之后，雅各宾派的政治活动基本完结。其残余势力在督政府时期曾以先贤祠、跑马厅等俱乐部名义出现，1799年最终被解散。

(许虹)

恐怖时期

(Kongbushiqi) 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雅各宾派专政并实行恐怖政策时期。雅各宾派掌权初期国家面临严峻困难。反法同盟各国军队从四面向法国进攻，国内王党煽动的叛乱迅速蔓延，巴黎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经济形势严峻。面临这种局面，肖美特和埃贝尔领导的巴黎公社鼓动群众示威请愿，要求实行激烈的恐怖措施。9月5日，国民公会迫于群众压力决定实行恐怖政策，是为恐怖时期的开始。

根据国民公会的决议，9月9日组建了由7000名无套裤汉组成的“革命军”，负责保证限价法令的实行和征发粮食。9月11日和9月29日法令对粮食、盐、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实行全国统一价格，对其他商品也规定了最高价格，对工资额也作了限定。9月17日颁布《惩治嫌疑犯条例》，规定了嫌疑犯的范围并宣布逮捕一切嫌疑犯。为此成立革命法庭，简化审判程序。在政治上，以救国委员会为中心的革命政府总揽立法和行政权力。恐怖政策对于打退国内外敌人进攻，稳定经济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恐怖政策破坏了大革命开始后刚刚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违背了大革命力图实现的法制原则，其结果不仅误杀了大批革命者和拥护革命的群众，也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从而使雅各宾派失去了群众的支持。热月政变后，督政府逐步取消了各项恐怖措施，结束了恐怖时期。

(许虹)

热月政变

(Reyue zhengbian) 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颠覆雅各宾专政的政变。1794年春夏之季，法国经济、政治局势趋于缓和，恐怖政策开始引起普遍的反感。执政的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等人继续实行高压政策，树敌日多，国民公会代表人人自危。1794年6月罗伯斯庇尔促使国民议会通过牧月法令，简化审判程序，更多的人被送上断头台。国民公会中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情绪日益滋长，塔里安、巴拉斯、富歇等人进行了频繁的幕后活动，准备发动政变。罗伯斯庇尔察觉了反对派的阴谋。热月8日（1794年7月26日）他在国民公会发言指控他的敌手，议会并未象以前那样报以热烈的欢呼。热月9日，忠于罗伯斯庇尔的圣鞠斯特准备争取国民公会的支持，但他的发言被打断。会议拒绝了罗伯斯庇尔发言的要求。然后，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的决议，同时被捕的还有雅各宾派的中坚分子圣鞠斯特、古东等人。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曾一度将他们救出，但由于他们无法把反应冷淡的群众动员起来，巴拉斯指挥军队重新逮捕了罗伯斯庇尔等人。次日下午，罗伯斯庇尔等人被送上断头台。至此，雅各宾专政结束，热月党人统治开始。

（许虹）

督政府

(Duzhengfu) 法国大革命后期的中央行政机构。1795年8月22日热月党人组成的国民公会通过共和三年宪法，宪法规定建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行政权属于由五位督政官组成的督政府。10月27日巴拉斯等5人当选为督政官，是为督政府时期的开端。这一时期法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政局动荡不安。督政府的政策左右摇摆，1796年5月镇压了巴贝夫运动，1797年9月3日发动“果月政变”，清洗了立法和行政机构中的王党分子。民主共和势力在1798年选举中获胜，5月11日督政府又发动“花月政变”，宣布该派议员的当选资格无效，这种摇摆政策在历史上称作“秋千政策”。督政府的统治基础十分狭窄，没有使人瞩目的政绩。1798年第二次反法同盟组成后，法国在军事上节节失利。1799年11月7日，拿破仑借机发动“雾月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

(许虹)

反法同盟

(Fanfa tongmeng) 1793年到1815年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先后组成的7次武装干涉法国的军事同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深入引起了欧洲封建君主国的恐惧。为了扼杀革命，1792年初普鲁士和奥地利率先结成同盟，出兵干涉法国。英国则企图乘法国内部发生革命之机夺取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同时也深恐法国更加激烈、更加彻底的革命会诱发英国人民起来反对当局的统治。因此，1793年2月由英国策动，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撒丁、那不勒斯、俄国等组成第一次反法同盟，从各个方向进攻法国。1793年6月以后雅各宾派掌握了政权，改组军队，整顿经济，开始扭转前线败局。1794年6月法军在比利时的弗勒吕兹大败联军，第一次反法同盟开始瓦解。1796年拿破仑在意大利重创奥军，使同盟完全解体。1798年底英、俄、奥、土耳其等国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法国督政府无力抵抗进攻，拿破仑乘机发动政变，掌握了国家权力。1800年拿破仑在马伦哥战役中打败奥军主力，迫使奥国和英国分别签订和约，第二次反法同盟瓦解。由于英国与法国在争夺土地和扩张方面的矛盾，英国纠集俄、奥等国于1805年组成第三次反法同盟。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的辉煌胜利迫使奥地利再次与法国签约，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英国不甘心失败，于1806年9月策动普、俄、瑞典等国组成第四次反法同盟。战斗正式开始仅6天，法军就在耶拿和奥尔斯特特两战役中全歼普鲁士军，随后长驱直入柏林，普鲁士投降。1807年法军在埃劳和弗里德兰两战役中大败俄军，再加上法俄在瓜分东欧领土问题上达成协议，俄法签订和约后，俄国退出同盟。至此，拿破仑帝国取得了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进入鼎盛时期。为了最终瓦解英国力量，拿破仑从1806年底开始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为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严格执行封锁政策，法军于1807年和1808年先后入侵葡萄牙和西班牙，挑起了伊比利亚半岛战争。英国利用此机会于1809年组成第五次反法同盟。法军迅速击退奥地利军的进攻，占领了维也纳，又在瓦格拉姆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打破了这次反法同盟。但是，战后利益分配不均导致法俄矛盾激化。1812年拿破仑以60余万大军入侵俄国，几乎全军覆没。乘此机会，欧洲各国于1813年迅速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10月莱比锡一役，法军大败。1814年3月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退位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15年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召集旧部，重返巴黎。英、俄、普、奥又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1815年6月18日联军在滑铁卢战役中打败拿破仑，拿破仑再度退位并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反法同盟战争至此宣告结束。

就法国而言，反法同盟战争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反对外国干涉，保卫资产阶级革命成果，主要体现在前几次打垮反法同盟的战争；另一方面，则有其争夺霸权的性质，反法同盟则带有被压迫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最突出的是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

(许虹)

拿破仑法典

(Napolun fadian) 法国第一部民法法典，又称《法国民法典》。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后的第二年就授意起草一部民法典，并亲自参加了法典的制订工作，拿破仑的意见直接影响到许多重要条文的拟定。1804年3月21日该法典正式颁行。法典综采罗马法、传统法和革命新法编成，为了纪念拿破仑对法典的贡献，该法典于1807年和1852年两次被命名为《拿破仑法典》。拿破仑自称，滑铁卢的失败会摧毁他在军事上的业绩，但任何东西也不能摧毁他的法典。这部法典确认了资产阶级和农民占有贵族和教会土地财产的合法性，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大革命的成果；法典反映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保证每个人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否定了封建特权。法典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立法的规范。该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对西欧国家民法的立法过程产生过重大影响。

(许虹)

百日王朝

(Bairi wangchao) 拿破仑一世复辟时期，从 1815 年 3 月 20 日至 6 月 22 日，历时百日左右，故名。1814 年拿破仑退位后，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但统治基础薄弱，政局不稳，在重新安排欧洲格局的维也纳会议上，俄、英、奥、普因利益分配矛盾重重，流放于地中海厄尔巴岛的拿破仑趁机于 1815 年 2 月 26 日夜率 1000 余名官兵向法国进发，3 月 1 日在儒昂登陆，7 日进入格勒诺布尔，10 日进入里昂。路易十八派出阻挡拿破仑的部队一经与拿破仑的军队接触立即倒戈，3 月 20 日兵不血刃进入巴黎，波旁王室仓皇出逃。拿破仑重登帝位，宣布废除波旁王朝危害革命的法令，允诺进行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欧洲各国立即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以 70~80 万军队围攻法国。拿破仑迅速组织起 12 万人的军队，6 月中旬与反法同盟军队决战，大败于滑铁卢。6 月 22 日拿破仑再次退位，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

(许虹)

七月革命

(Qiyue geming) 1830年法国人民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的革命。1824年复辟王朝的第二位国王查理十世即位后，热衷于恢复被大革命摧毁的旧制度，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社会舆论也倒向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了压制不满情绪，查理十世于1830年7月26日颁布了反动的七月敕令，封闭自由派报刊，解散议会，限制选举权等。7月27日，在综合工科学学校学生领导下，巴黎人民发动起义，反对七月敕令。在巴黎筑起街垒，8万多群众参加了起义，前来镇压的8000名王室军队在遭到重创之后退却。29日起义者占领了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查理十世逃往圣克鲁。8月2日查理十世宣布放弃王位，后被军队押解出境，逃往英国。在巴黎，由于参加起义的工人缺乏组织，共和派软弱无力，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控制了局面。7月31日众议院议员在大银行家拉斐德家中开会，决定把王位交给波旁家族旁支的一位成员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共和派曾予以反对，并且组织人民游行示威，但终未扭转局面。8月9日路易·菲力普在议会中加冕，宣誓效忠于“立宪宪章”。至此，统治法国240年的波旁王朝宣告终结，开始了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的统治。

(许虹)

1848年二月革命

(Yibasibanian eryue geming) 法国人民推翻七月王朝统治的革命。18世纪40年代法国人民要求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高涨。1845—1846年农业歉收，造成大范围饥荒；1847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法国，大批工人失业，社会矛盾更趋激化。此时，以“宴会”形式举办的政治性集会在各大城市广泛流行。基佐政府两次禁止预定于1848年1月和2月举行的“宴会”，引起群众不满。1848年2月22日巴黎市民群集协和广场和马德兰广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群众队伍在向政府所在地的波旁宫进发途中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群众伤亡。次日，示威演变成武装起义，巴黎到处筑起了街垒，国民自卫军的许多士兵拒绝执行实行镇压的命令，倒向革命。国王路易·菲力普为保全王位罢免了基佐，先后任命莫雷和梯也尔组阁，但愤怒的群众要求废除王政，建立共和。2月24日，巴黎市民共修筑街垒1500个左右，控制了巴黎局势，并开始向杜伊勒里宫进攻。国王带领随从逃往圣克鲁，军队瓦解，放弃守卫，国民自卫军和群众攻入王宫。与此同时，立法议会企图推举路易·菲力普之孙巴黎伯爵为国王，起义群众冲入波旁宫，驱散立法议会。资产阶级共和派以拉马丁为首组成临时政府，25日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七月王朝灭亡。

(许虹)

法国工人党

(Faguo gongrendang) 法国工人运动中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法国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经盖德和拉法格倡议，通过了成立法国工人党的决议。随后，盖德和拉法格在马克思的亲自指导下制订了党纲，马克思撰写了总纲部分。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获得通过，称为《勒阿弗尔纲领》，法国工人党正式成立。该党成立初期因各种工人运动理论问题的分歧而分裂。盖德派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布鲁斯和马隆为首的可能派则主张只提出在当时条件下可能实现的要求。1882年圣太田代表大会上两派正式分裂，盖德派保留了法国工人党的名称，可能派则于次年组成“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1889年法国工人党参与了筹建第二国际的工作，在7月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盖德和拉法格被选入大会主席团。法国工人党支持和领导了法国工人的几次大罢工，其中有1886年维卡尔维斯煤矿工人罢工、1891年弗来米工人罢工、1892年卡尔莫矿区政治罢工。工人党在1893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可观的票数，此后，工人党更加注重议会斗争。1899年以后，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围绕社会党人米勒兰加入内阁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盖德等人谴责米勒兰的行为是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而饶勒斯则赞许米勒兰入阁，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可喜成就。这场争论导致工人党组织上的分裂，1901年盖德派和布朗基派联合建立了“法国社会党”。次年，饶勒斯和可能派组成“法兰西社会党”。

(许虹)

德雷福斯案件

(Deleifusi anjian) 19 世纪末年法国政治丑闻。德雷福斯 (Dreyfus, Alfred 1859—1935) 是阿尔萨斯人，上尉军官。1894 年在法军总参谋部任职期间被控把有关新式武器的秘密文件出卖给德国驻法武官。由于当时军界排犹主义情绪猖獗，军事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德雷福斯终身监禁，押解到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服刑。数年后，法军情报处皮卡尔上校发现真正的罪犯是出身匈牙利贵族的埃斯特拉齐少校。但军方为掩盖真相将皮卡尔上校调任突尼斯，并于 1898 年 1 月宣布埃斯特拉齐无罪。案件的揭发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著名作家左拉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拆》，社会各界也要求为德雷福斯平反。对案件的不同态度演变成两大政治势力的斗争。1898 年 8 月法军情报处军官亨利在舆论的压力下供认关于德雷福斯罪行的材料是他伪造的。他当即被捕，在狱中自杀。围绕此案进行的争论引起法国政局动荡。1899 年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在“保卫共和国”口号下组成新政府，打击民族沙文主义者，要求司法部重新审理此案。但是，军事法庭仍判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把刑期减为 10 年。于是，总统下令对德福雷斯实行特赦。直到 1906 年最高法院才判定德雷福斯无罪，为其恢复名誉。

(许虹)

拉法耶特

(Lafayette, La Fayette 1757—1834) 法国近代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领袖人物之一。出生于法国奥弗涅省一个贵族家庭，承袭侯爵爵位。1776年4月他得知英属北美殖民地反抗宗主国统治、发表《独立宣言》的消息后，冲破重重阻力远渡重洋来到北美。1777年7月，费城大陆会议授予他少将军衔，任命他为大陆军司令华盛顿的副官。他在约克镇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华盛顿的亲密交往中深受华盛顿自由主义思想和保守主义政治理论的影响。回到法国后，他奔走于欧洲的宫廷和沙龙，传播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为新教徒争取合法权利。1789年5月他作为奥弗涅省的贵族代表参加三级会议。7月11日他向制宪议会递交了《人权宣言》草案，成为后来正式发表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的蓝本之一。7月14日革命后巴黎需要有一支警察力量维护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他在7月15日当选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任职持续到1791年。在此期间他的影响仅次于国王。他主张制定宪法作为自由的宪章，保留国王作为国家首脑，用国民自卫军保卫宪法和国王。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国王拒绝宪法，我将向他开战；如果国王接受宪法，我将保卫他。”他指挥了1791年7月17日在马斯校场对共和派的镇压。维护王权的立场使他逐渐丧失了群众中的威信。1791年9月制宪议会解散时，解除了他的总司令职务，他隐退到自己的领地。1792年初曾一度参与组织东路军，抵抗反法同盟的进攻。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推翻君主制的起义在他看来是一场灾难。他离开法国，但被奥军捕获，被监禁了5年。1797年由于拿破仑在意大利的胜利，迫使奥地利政府释放了拉法耶特。他回到自己的庄园经营产业。1824年再度访美，受到广泛的欢迎，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1830年7月革命时重登政坛，拥护路易·菲力普执政。1831年被免除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一职，隐退拉格朗吉庄园。1834年5月在自己家中一间四壁挂满美国独立战争遗物的房间去世，其灵柩用取自美国某一战场的泥土掩埋。

(许虹)

罗伯斯庇尔

(Luobosibier,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758—1794) 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出生于法国阿图瓦省一个律师家庭。1769年进入巴黎著名的路易学院学习哲学和法律，受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思想的影响。1781年，获硕士学位，回阿图瓦省的阿腊斯城作律师。1788年7月发表《告阿图瓦省人民书》，主张改革阿图瓦省三级议会。次年，当选为阿腊斯城第三等级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在三级会议和制宪议会初期默默无闻。1789年11月起经常出入雅各宾俱乐部，发表演说。在1791年宪法制订过程中曾经反对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划分，声名鹊起。宪法通过之后，他提议凡参加制宪者不得连任立法会议员，获得通过。立法会议期间以群众领袖身份从事革命活动，领导雅各宾俱乐部，主办《宪法保卫者》周刊，担任巴黎革命法庭公诉人。1792年8月下旬，在国民公会选举中当选为代表。参加了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坚决主张处决路易十六。同吉伦特派在议会内外展开斗争，组织和领导了推翻吉伦特派的活动。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起义后建立起雅各宾专政，罗伯斯庇尔成为法国最有权力的人。执政期间努力实践卢梭的社会政治思想，力图实现人民主权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主张通过部分地分配财产以达到社会平等。面对当时法国革命的严峻形势，果断实行恐怖统治。1794年初，法国局势趋于缓和，雅各宾派内部产生政策分歧。罗伯斯庇尔先后镇压了左翼的埃贝尔派和右翼的丹东派，使自己陷于孤立境地。1794年7月27日反对势力联合发动“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被捕，企图自杀未遂，于次日被送上断头台。生前的著作和言论被辑为《罗伯斯庇尔全集》10卷。

(许虹)

丹东

（Dandong，又译丹敦，GeorgesDanton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出生于一个检察官的家庭。学习过法律。1787年获得枢密院律师职位。大革命爆发后，参加戈德利埃区资产阶级组织的卫队。10月，当选为该区区长。1790年组织戈德利埃俱乐部。同年9月宣布放弃枢密院律师职位，以示与封建王权的决裂。1791年6月国王出逃事件发生后，坚决要求推翻君主制，实行共和，参加了马斯校场的请愿活动。马斯校场惨案发生后，为逃避迫害流亡英国。同年底回国，当选为巴黎市府副检察长。1792年8月10日亲自组织和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起义。在起义后建立的吉伦特派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同年8—9月间外国干涉军长驱直入，丹东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号召人民拿起武器自卫，对鼓舞人心和稳定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9月21日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在国民公会中与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同为山岳派的主要领袖。为了对付国内外敌人，提议建立“救国委员会”，1793年4月7日，该委员会成立，丹东是主要负责人。雅各宾专政建立后，认为民主政治已经建立，主张实行法治，提倡宽容和人道，成为温和派的代表，招致罗伯斯庇尔等人不满。1793年7月10日救国委员会改组，丹东被免职，一度脱离政治活动。11月重返国民公会，公开反对恐怖统治，呼吁要“珍惜人类的鲜血”。1794年3月被逮捕，4月5日以“通敌”和“危害共和国”罪被处死。

（许虹）

马拉

(Mala, Jean-Paul Marat 1743—1793) 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出生于瑞士。16岁时来到法国，1765年移居英国行医。1775年获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博览启蒙思想家著作，深受孟德斯鸠和卢梭影响。1776年回法国。1789年9月创办《人民之友》报，宣传人民主权理论，主张三权分立。该报的政治要求接近下层民众，代表了大革命中最为激进的政治势力，因而备受民众支持，被称为“人民之友”。在鼓动和组织1792年8月10日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1792年9月当选国民公会代表。此后，将报纸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报》。在国民公会中是吉伦特派统治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坚决主张处决路易十六。积极倡议建立公安委员会，实行革命专政。亲自参与领导了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起义。他的革命活动招致敌人仇恨。7月13日，被夏洛蒂·科黛刺杀身亡。生前的政治、文学和科学著作辑为《马拉文选》、《马拉通信集》等。

(许虹)

圣鞠斯特

(Shengjusite, 又译圣茹斯特 saint-just 1767—1794)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出生于军官家庭。青少年时玩世不恭，曾因私自变卖家产被捕，后发誓重新做人。1790年6月在家乡布勒兰古市担任国民自卫军中队长。1792年当选为埃纳省的国民公会代表。在国民公会关于审判国王的辩论中发言，力主将国王当作敌人来审判，审判国王的依据不在民法，而在民族的法律，国王本身就是罪行。这次演说使他崭露头角。1793年5月30日被国民公会选为新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之一，是1793年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1793年6月5日进入救国委员会，成为雅各宾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代表公安委员会向国民公会提出“以恐怖对付革命的敌人”，积极推行恐怖政策，多次以特派员身份到军队中去。在与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斗争中坚决站在罗伯斯庇尔一边，在国民公会中对两派提出指控。在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动的热月政变中，曾在国民公会发言，为罗伯斯庇尔辩护，7月28日同罗伯斯庇尔等人同时被处死。

(许虹)

埃贝尔

(Aibeier, Jacques René Hébert 1757—1794) 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活动家，新闻记者。出生于阿朗松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做过剧院收票人和仆人。大革命开始后参加戈德利埃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领袖之一，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代表城市平民利益的政治派别“埃贝尔派”，这一派别在巴黎公社和国民自卫军中很有势力。1790年创办《杜歇老爹报》，持论激进，在无套裤汉中颇有影响。1792年8月10日起义后，当选为巴黎公社副检察长。雅各宾专政时期他竭力鼓动实行恐怖政策，促成国民公会颁布全面限价法令和《惩治嫌疑犯条例》。在国内外形势逐渐好转的情况下，认为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领导集团实行恐怖政策不够彻底，不断煽动群众闹事，强制推行“非基督教化运动”。1794年3月4日企图在巴黎发动暴动，推翻雅各宾政权，由于未得到巴黎公社支持而失败，旋即被捕。3月24日被送上断头台。

(许虹)

拿破仑

(Napolun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 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出生于科西嘉岛一个小贵族家庭。1778年离开故乡进入奥顿中学学习,次年转入培养贵族子弟的布里埃纳军事学校。1784年进入巴黎军官学校,攻炮兵专业。1785年毕业后授予少尉军衔。青年时代,拿破仑信奉卢梭的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思想。大革命爆发后,拿破仑于1792年来到巴黎,目睹8月10日推翻君主制的起义,曾一度接近雅各宾派。1793年在攻克土伦的战役中战功卓著,被授予准将军衔。热月政变后因被控与罗伯斯庇尔勾结而被囚禁,不久获释。1795年10月5日(葡月13日)临危受命,迅速、果断地平定了王党分子的叛乱,声名大著,授少将军衔,担任巴黎卫戍司令。次年,被督政府任命为意大利军团总司令,在对奥作战中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迫使奥地利于1797年10月签订了《康波福米奥协定》,粉碎了第一次反法同盟。1798—1799年远征埃及。因第二次反法同盟组成后法国战况不利,国内政局不稳,拿破仑丢下在埃及的军队突然回国,于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统治,就任第一执政。

拿破仑坚决制止波旁王朝的复辟企图,迅速平定了一些迁延已久的叛乱,如旺代叛乱,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使自大革命以来动荡不安的局面安定下来。为进一步确保革命成果,亲自参与制定了《法国民法典》。拿破仑还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执政府和第一帝国时期法国经济迅速发展,纺织、钢铁等部门产量成倍增长,工业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

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军事上的胜利,拿破仑个人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同时也日益背离大革命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原则。1804年放弃共和制度,建立法兰西帝国,自任皇帝,恢复等级制度和贵族称号,实行分封制,在一定程度上与旧贵族和旧官僚妥协,剥夺了大革命期间人民取得的重要权利,如普选权。

拿破仑执政期间对外战争频繁。第二次至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多次打败数量上占优势的欧洲各国联军。至1809年,直接或间接控制了除英国、俄国以外的整个欧洲。1812年亲率60余万大军入侵俄国,惨遭失败。欧洲各国趁机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1813年10月16日至19日与法军大战于莱比锡,法军战败。1814年初反法同盟军队攻入法国境内,4月,拿破仑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15年3月从厄尔巴岛逃出,在法国人民和军队的拥戴下重返巴黎,驱逐了复辟的波旁王朝。6月,在滑铁卢被第七次反法同盟打败,再次被迫退位,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卒于该岛。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409-1.bmp}

(许虹)

圣西门

(Shengximen, Saint-Simon 1760—1825)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生于巴黎的一个贵族家庭，承袭伯爵爵位。早年师从法国著名科学家、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17岁时作为少尉军官参加远征军，奔赴北美援助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大革命开始后，从西班牙返回法国，热情投入革命，并且放弃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和伯爵爵位，一度更名为“公民包诺姆”，意为普通的好百姓。大革命后期，他逐渐厌恶雅各宾党人的恐怖统治，也对革命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失望，认为是“新封建社会”，因而对政治采取消极态度，从事金融投机活动，1802年因投机失败而破产。此后开始研究和写作生涯，在穷困中度过余生。在潦倒的生活中他与下层人民有了更深的接触，形成了他“改进最穷苦阶级命运”的理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真正“黑白颠倒的世界”，衣食不足的人每天必须丧失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去增益富裕者多余的财富。他的理想社会是以“新基督教”为基础的“实业制度”社会，这是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不承认任何特权，人们按照最有利于生产的方式组织起来，一切人都要从事劳动。他意识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态对社会的决定作用。他反对以暴力手段实现理想社会，寄希望于开明的国王和有势力的“实业家”。著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论实业制度》(1821)、《实业家问答》(1824)，《新基督教》(1825)。

(许虹)

傅立叶

(Fuliye,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法国东部贝让松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9岁丧父。中学毕业后，奉母亲之命到里昂学习经商。他对于大革命反应冷淡，漠不关心。1792年继承父亲一部分遗产，开始独立经营。次年，里昂发生叛乱，他经营的商品全部被叛乱政府征用，本人也被征入叛军。雅各宾党人平定叛乱后，他又为此遭逮捕和抄家。虽然侥幸逃生，但经济上破产。此后从事过会计、推销员、交易所经纪人等职业。在从事商业活动之余他勤奋学习和写作，创立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他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在这个社会中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对立，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傅立叶的理想社会是“协作制度”社会，其基层组织是“法朗吉”，由1600~2000人组成，内部实行劳动分工，按照每个人的兴趣选择工作。他主张消灭私有制，希望富人加入法朗吉，并从中得到利润。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每天定时等候自愿者来临，希望富人为创办法朗吉投资，但没有等到任何人。他自己创办的小规模试验性法朗吉也都失败了。其著作有：《宇宙统一论》(1822)，《新世界》(1829)、《论商业》(1845)。

(许虹)

布朗基

(Bulangji, Blangui 1805—1881) 法国职业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生于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一个官吏家庭。青年时代在巴黎学习医学和法律。19岁时参加反对波旁王朝的秘密组织烧炭党。1829年担任圣西门主义者创办的《地球报》的记者，受圣西门和傅立叶思想影响。1830年积极参加了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在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参加共和主义者建立的“人民之友社”，由于参预反对七月王朝活动于1831和1832年两次被捕。在此期间，布朗基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空想社会主义者。此后，他组织并领导了秘密革命团体“家族社”和“四季社”。1839年领导四季社在巴黎举事失败后被捕，直到1848年2月革命后才获得自由。1848年6月又因反对临时政府被判刑10年。1859年获释后不久又被捕。1864年越狱。1870年因反政府被捕。巴黎公社成立后，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直到1879年大赦才结束监狱生活，时年已经74岁。他一生经历了19世纪法国几乎每一次革命，被监禁的时间累积长达32年。1881年1月1日去世。在理论上他坚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但不主张在革命后取消私有制，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但革命是少数人的秘密活动，而不是阶级斗争。

(许虹)

路易·勃朗

(Luyi Bolang, LouisBlanc1811—1882)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历史学家。生于官僚家庭。1830年路易·勃朗开始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839年创办《进步评论》，并因在该刊上发表重要著作《劳动组织》而在工人运动中产生影响。1843-1847年任《改革报》编辑。他主张设立由国家主持、资本家投资的“社会工场”，并以此改革社会和改变工人阶级状况，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反对剥夺资产阶级。1848年2月革命后被选为“工人代表”参加临时政府，担任不管部长和工人问题调查委员会（卢森堡委员会）主席。根据路易·勃朗的设计方案，临时政府创办了“国家工场”，收容失业工人。但是，工场实际上成为奴役工人和离间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层关系的工具。6月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1870年第二帝国垮台后回国，次年当选为议员。他不赞成巴黎公社起义，也反对梯也尔政府的残暴行径。主要著作有《十年史》、《法国革命史》。

(许虹)

路易·波拿巴

(Luyi bonaba, LouisNapoléonBonaparte1808—1873)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和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之侄，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之子。6岁时拿破仑帝国覆亡，随母流亡德意志和瑞士。1823年移居意大利，参加过烧炭党活动。1832年拿破仑一世之子去世，遂以“法兰西皇统继承人”自居。1836年10月30日在斯特拉斯堡军营发表演说，号召士兵推翻路易·菲力浦的统治，被当局流放美洲，复流亡瑞士和英国。1840年8月在布洛涅海港发动暴动，失败后被判处终身监禁，1846年逃往英国。1848年革命爆发后回到法国，9月当选为制宪议会议员，又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凭借拿破仑一世的威望和君主派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大选中获胜，12月就任第二共和国总统。为笼络天主教势力，1849年出兵罗马，帮助教皇镇压罗马共和国，打击共和派，削弱一度与自己合作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和金融贵族利益的秩序党。1851年12月发动军事政变，1852年1月强行通过新宪法，授予总统独裁权力，12月正式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自称拿破仑三世。政治上实行集权统治，立法机构形同虚设。经济上保护、鼓励资本主义发展，工业革命在其统治期间完成。对外多次发动战争，以期重温拿破仑的“光荣”。1853—1856年参与克里木战争，1857年伙同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进行对奥地利战争，吞并萨伏依和尼斯。1860年以后国内不满情绪增长，被迫进行“自由主义”改革。1870年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为借口对普鲁士宣战，因战事失利，9月2日在色当向普军投降，第二帝国旋即因巴黎9月4日革命而倾覆。1871年1月普法和约订立后被释，流亡英国，后病逝。

(许虹)

0 (Waerlan, Varlin1839—1871) 1871年巴黎公社主要领导人之一，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生于法国赛纳—马恩省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进入巴黎一家装订作坊学艺。1851年，组织“装订工人协会”，并被选入理事会。1864年成功地领导了一次装订工人罢工，争取到11小时工作日。1865年加入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当选为支部委员会成员。在此期间接触到蒲鲁东的理论，成为蒲鲁东主义者。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上，他不赞同蒲鲁东主义“多数派”的一些主张，成为蒲鲁东派左翼“少数派”成员。1868年政府审判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瓦尔兰被审讯并受到监禁。1870年，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成立，瓦尔兰担任主席。同年，政府下令搜捕国际成员，瓦尔兰流亡到布鲁塞尔。1870年9月第二帝国被推翻后，回到巴黎，担任国民自卫军第19营营长，后又当选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1871年3月18日起义中，率领8个营参加起义。19日，签署了《告人民书》，宣告成立新的共和政府。在巴黎公社选举中当选为公社委员，负责财政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工作。5月21日开始的“流血周”中率领国民自卫军第六军团战斗，始终没有离开前线。5月25日德勒克吕兹牺牲后接任军事代表，领导了公社的最后战斗。5月28日被凡尔赛军捕获，旋即遇害。

(许虹)

德勒克吕兹

(Delekelüzi , Delesecluze1809—1871) 1871 年法国巴黎公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雅各宾主义者，新闻记者。生于法国布莱兹河德勒镇，父亲是第一帝国时期的退伍中士。在父亲影响下他非常景仰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1830 年他在巴黎参加了主张实行共和制的政治团体——人民之友社。1848 年他积极投身于革命，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委派到诺尔省和加莱省任特派员。5 月回到巴黎后，创办了《民主社会革命报》，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1849 年该报被查封，德勒克吕兹也因参加 6 月 13 日反政府的示威游行而遭到通缉，逃亡到比利时，后又到英国。1853 年回到巴黎，参加了“青年山岳派”和“玛丽安娜”等秘密社团，10 月被捕，先后被判监禁和流放。1859 年大赦后回到巴黎。1868 年创办《觉醒报》，因反对第二帝国的黑暗统治而三次被捕，后流亡到比利时。1870 年第二帝国垮台后，结束流亡生活，重办《觉醒报》。该报因反对国防政府的叛卖投降政策而被查封，德勒克吕兹再度被捕。1871 年 2 月因当选国民议会议员而被释出狱。巴黎公社起义之后，被选为公社委员，毅然放弃国民议会议员的身份，热情地投入到公社的事务中，先后担任公社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军事形势严峻之时，他临危受命，担任公社的军事代表，亲临前线整顿军队，指挥战斗。5 月 25 日下午在伏尔泰街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许虹)

梯也尔

(Tiyeer, LouisAdolpheThiers1797—1877) 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早年学习法律，曾任律师，后又从事编辑和新闻工作。1830年1月参与创办反对复辟王朝的刊物《国民报》，7月，起草了一篇反对“七月敕令”的抗议书。复辟王朝被推翻之后，拥戴奥尔良家族继承王位。路易·菲利浦在位期间当选为议员，并先后出任财政部、内政部、外交部部长，两度担任总理。在1848年总统选举中支持路易·波拿巴，又因政见分歧于1851年被后者放逐国外。1853年遇赦回国。1863年再度当选议员。1870年普法战争中，第二帝国被巴黎人民9月革命推翻，梯也尔虽然未进入特罗胥的“国防政府”，但积极从事政治和外交活动，奔走于各国政府之间，1871年1月与普鲁士政府订立城下之盟。2月6日，被新产生的国民议会推为法兰西共和国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后亲自插手搜缴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因而激发了3月18日起义，随即逃往凡尔赛，以凡尔赛为大本营搜罗反动军队向巴黎公社进攻，血腥镇压了公社。同年8月30日当选为总统，在政治上以温和的共和派的面目出现，自称要建立“保守的共和国”。因与保王派势力冲突，于1873年辞职。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史》、《执政府与帝国史》。

(许虹)

盖德

(Gaide, Jules Guesde 1845—1922) 原名马迪厄·巴齐尔，法国社会主义者。生于巴黎一个中学教师家庭。青年时代从事新闻工作，普法战争期间，因在报纸上宣传推翻第二帝国而被判刑 6 个月。巴黎公社革命时期热情颂扬公社的事业，斥责凡尔赛政府的暴行。公社失败后被判处 5 年徒刑，因此流亡瑞士和意大利，参加了第一国际工作。1876 年回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次年创办《平等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他和拉法格等人努力下，于 1879 年创建法国工人党。他团结了一批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成员，形成“盖德派”，进行了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的斗争。1893 年以后多次当选为众议员。曾积极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是第二国际著名领袖之一。进入 20 世纪后政治立场逐渐转变，成为第二国际“中派”的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吹“保卫祖国”，1914—1916 年担任“神圣联盟”内阁的国际部长。对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持中立态度。1920 年起脱离政治活动。

(许虹)

拉法格

(Lafage, Paul Lafargue 1842—1911) 法国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活动家。生于古巴圣地亚哥一个法国移民家庭。9岁时随父母定居法国。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医学院学习。1865年出席在比利时的列日举行的国际大学生代表大会，发言抨击路易·波拿巴的反动统治，回国后被大学除名，旋赴英国继续学医。1866年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会委员。他结识了马克思一家。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放弃了早年接受的蒲鲁东主义思想。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同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法国，居住在波尔多。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期间热情支持公社的事业，在《波尔多论坛报》上详细报道了公社的活动。公社失败后，受到政府通缉和追捕，逃往西班牙。此后，继续致力于第一国际的工作，与恩格斯一同起草了反对巴枯宁的文件《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70年代后期参与创建法国工人党，又在工人党内展开反对可能派的斗争。1891年当选为众议员。1905年在法国统一社会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领导成员。1911年11月25日，在他将届70岁时，与其妻劳拉一同自杀，留下遗书写道：因为不愿忍受无情的垂暮之年，所以早已决定不逾越70岁。并说明是怀着无限欢乐的心情死去的。一生撰写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列宁誉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渊博的传播者。

(许虹)

饶勒斯

(Raolesi, Jean Jaurés1859—1914) 法国社会主义者，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1878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希腊文学和哲学。1881年毕业后回家乡阿尔比中学任教。1883年任图卢兹大学讲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布朗热危机期间坚决反对布朗热，维护共和制度。1889年议会选举中落选，回到图卢兹，开始撰写博士论文。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开始转向社会主义，支持1892年8—11月卡尔莫矿工罢工，罢工胜利后被卡尔莫工人选为议会代表。德雷福斯案件中左拉因《我控拆》一文受控，饶勒斯出庭为他作证，并就此案进行调查，撰文披露真相。在米勒兰入阁事件中支持米勒兰，是法国社会党的领袖。在第二国际中是左翼代表人物。1902年再次当选为议员，1903年担任众议院副议长。1905年成为法国“统一社会党”右翼领袖。面对20世纪初开始的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坚持不懈地反对殖民扩张、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1914年7月31日被沙文主义者暗杀。著有《社会主义的法国革命史》等。

(许虹)

米勒兰

(Milelan, Alexandre Millerand 1859—1943) 法国政治家，右翼社会党人。生于世代豪富之家，在他父亲一代家道中衰。曾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从事律师职业。1885年当选为议员，政治上属于激进派。90年代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由于为被捕的工人领袖和矿工罢工辩护而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赢得声誉。1893年联合独立社会主义者竞选，并在议会中组织独立社会主义议员小组，成为独立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主张通过普选权和大工业国有化途径达到社会主义。1899年，新任内阁总理瓦尔德克—卢梭，延揽米勒兰入阁担任工商部长。入阁事件导致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重大分歧，第二国际也因此分化为左、中、右三派。1904年以后同社会党脱离关系。1907年白里安组阁，米勒兰再度入阁，维维尼安也出任部长，此三人都是前社会党党员，因此被称为“三叛徒内阁”。1910年严厉镇压铁路工人罢工，彻底背叛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初期两度出任军事部长，积极准备和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战后与资产阶级政治家彭加勒组成“国民联盟”，在1919年的议会选举中获胜，米勒兰出任总理和外交部长。1920年当选为总统。任期内对内加强总统权力，对外谋取欧洲霸权，“小协约国”集团即在其任内组成。1924年选举中国民联盟被左翼联盟击败，米勒兰任期未满足便辞去总统职务。此后几度出任参议员。

(许虹)

俄国近代史

(eguo jindaishi) 18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俄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长期演变，直至资本主义最终确立及其终结的历史。在 200 年左右的时间内，俄国从处于东欧一隅的内陆国家发展为横跨欧亚两大洲、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大帝国；由于溶欧亚两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于一身，沉重的封建关系赘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俄国最终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

史学界一般以彼得大帝启动俄国近代化过程的改革为俄国近代史的开端。彼得大帝执政时期（1689—1725 年）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更加完善，完成了从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变。沙皇个人拥有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贵族地主阶级是统治的支柱，广大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经济上由于国家的扶持而出现近代工业，但农奴制也日益强化。手工工场基本上也使用农奴劳动。18 世纪下半叶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商品货币关系有所增长，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增多。但是农奴制也达到鼎盛时期，成为资本主义因素成长的严重桎梏。因此，俄国近代前期的一大特点是，当西欧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农奴制早已消灭的时候，俄国农奴制方兴未艾；当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越来越稳固。

俄国历代沙皇都是野心勃勃的扩张主义者。18 世纪前，由于力量不足，只实行地域性蚕食政策。彼得大帝使俄国转向争夺世界霸权。通过与瑞典的北方大战和不断的对土耳其战争，俄国终获波罗的海和黑海出海口。18 世纪后期三次瓜分波兰，实现对乌克兰的完全占有。19 世纪上半叶又征服中亚、高加索地区，占领整个东西伯利亚。1809 年合并芬兰。1801—1812 年合并格鲁吉亚、比萨拉比亚等地。俄国成为庞大帝国，从单一的俄罗斯民族变成拥有 100 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俄国政府在各民族地区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迫俄罗斯化。在国际舞台上，沙俄充当扼杀一切进步事业的“国际宪兵”。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参加反法同盟，镇压法国大革命。1848 年欧洲革命时出兵镇压。

19 世纪俄国资本主义有长足进步，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取得优势。到 30 年代至 50 年代广泛使用机器，工业革命开始。农村出现为出卖而进行的生产，开始使用雇佣劳动，农民进一步分化。农奴制出现严重危机。农奴制问题成为 19 世纪上半叶一切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焦点。俄国先进思想家认识到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孪生关系，提出推翻专制制度、废除农奴制的革命要求，开始了几代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的俄国解放运动的漫长历程。18 世纪末拉吉舍夫是擎起这一旗帜的第一人。19 世纪 20 年代出现第一代解放运动：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运动。从 40—50 年代起进入第二代解放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时期。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是这一代的杰出代表。

俄国是通过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1861 年废除农奴制后，俄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但是俄国仍保存大量农奴制残余，政治上从专制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演变极其缓慢，专制制度仍然拥有绝对权力，继续实施黑暗统治。俄国社会各阶级间的矛盾也因此表现得更加深刻和

复杂。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在 60 年代继续发展，70—80 年代展开大规模的民粹派运动。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工人阶级的作用愈加显著。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活动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有重大作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三代——无产阶级时期。列宁是这一时期运动的卓越领导者。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1905 年革命被镇压下去后，虽然国家杜马的召开和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使国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进一步演变，但不能彻底挽救危机。俄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国内危机，导致 1917 年二月革命的胜利和沙皇制度的覆亡。

俄国是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国家之一，近代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如科学家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巴甫洛夫，文学家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艺术家列宾、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等等，对世界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

（高晓惠）

莫斯科公国

(Mosike gongguo) 14 世纪至 15 世纪东北罗斯的封建国家，首都为莫斯科。13 世纪初在弗拉基米尔领地上兴起，并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水陆的交叉点、各公国的中心、莫斯科周围的天然屏障——从众多分封小公国中脱颖而出。蒙古人征服时期，争夺蒙古人册封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称号是俄罗斯各公国争雄的引线。伊凡一世在位时期（1325—1340），同特维尔大公争夺大公称号，获胜。兼并了邻近诸公国，受权为钦察汗代征全俄罗斯贡赋。因善聚敛钱财而获“卡利达”绰号，意为“钱袋”。在其孙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统治时期（1362—1389），继续兼并各公国，开始与钦察汗发生冲突。1380 年 8 月于顿河库里科沃一役击败钦察汗主力，提高莫斯科公国地位。德米特里因此获得“顿斯科伊”（意即顿河上的英雄）的荣誉称号。伊凡三世时期（1462—1505）先后兼并诺夫哥罗德、特维尔、里亚赞等大公国，统一大部分领土，奠定俄罗斯基本版图的基础。1480 年在乌格拉战役中战胜钦察汗阿合马，阿合马被击毙，俄罗斯最终摆脱蒙古人统治。并开始向波罗的海方面扩张领土。其子瓦西里三世先后归并普斯科夫、梁赞等大公国，完成俄罗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过程。1547 年伊凡四世时加冕沙皇，莫斯科公国变成沙皇俄国。

（高晓惠）

俄国农奴制

(eguo nongnuzhi) 农奴制是农民的封建依附关系，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并服从封建主的行政和司法权力。俄国农奴制延续时间长，压迫特别残酷。确立阶段：伊凡三世时期于1497年颁布法典，规定农民只能在每年指定的日期，即秋后尤里耶夫节（俄历11月26日）前后各一星期可以转换农奴主。农奴制在法律上被初步确立，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伊凡四世时期于1581年颁布“禁年令”，即禁止农民在尤里耶夫节前后两星期离开主人，使农民进一步农奴化，并宣布1581年为禁年。以后又有连续实行禁年的记载，如1581—1586年、1590—1592年、1594年。16世纪80—90年代全国进行人口登记，并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农民易主。人口登记簿成为农民契约的法律依据，农奴制关系通过人口登记进一步固定下来。对逃亡农民的处理也不断作出决定，最初把地主搜寻逃亡农民的期限定为5年。1649年沙皇法典规定，对逃亡农民的追回不受时限，同时追回妻子、儿女及财产。至此，农奴制最终被确立下来。发展阶段：18世纪农奴制达到极盛时期。彼得一世时期进行人口调查，开始征收“人丁说”，加强地主对农民的控制。叶卡德琳娜二世时期于1765年发布敕令，地主取得放逐农民去作苦工的权力，1767年剥夺农民的任何申诉权。申诉被定为诬告罪，判处终身流放。地主贵族特权不断扩大，可以任意干预农民的家庭生活（如男婚女嫁），可以任意迁徙、流放农民。衰落到最后废除阶段：农民处境悲惨，农民起义不断发生。18世纪后半叶爆发了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起义。同时俄国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日益排挤落后的农奴制关系，农奴制出现严重危机，并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9世纪上半叶的全部社会问题都是围绕着农奴制危机而展开的。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二世都曾成立改革委员会，提出农奴改革的方案。19世纪50—60年代农奴制危机异常尖锐，出现革命形势，统治阶级日感废除农奴制的迫切性。1861年2月19日（俄历）由亚历山大二世签署法令，最终废除了农奴制。俄国农奴制的废除是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确立的标志。

（高晓惠）

北方战争

(Beifang zhanzheng) 1700—1721年俄国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与瑞典进行的长达21年的战争。到17世纪末叶俄国仍是一个内陆国家。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沟通对外贸易渠道，迫切要求争夺出海口。当时瑞典作为欧洲北方的一个强国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和出海口。彼得一世时期出现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有利形势，东北欧的萨克森和丹麦等国与瑞典发生冲突，而瑞典的盟国英、法、荷等国忙于准备西班牙王位战争。1698—1699年俄与萨克森、丹麦建立反瑞典的“北方同盟”，1700年7月与土耳其签订为期30年的和约。同年8月向瑞典查理十二世宣战。战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700年2—11月为第一阶段。纳尔瓦战役（9—11月）俄军损失17000人，79名军官被俘，全部大炮被瑞军缴获，暴露俄国军队的落后。原来互相利用的北方同盟国丹麦、萨克森退出战争。1700年11月—1709年为第二阶段。彼得进行军事改革和工业改革，大力发展军火工业，整顿俄国陆、海军，筹建波罗的海舰队。外交上拉拢波兰参战。1709年4—6月波尔塔瓦战役大败瑞军，扭转战局，萨克森、丹麦重新参战，普鲁士也加入。1709年6月—1721年9月为第三阶段。继波尔塔瓦战役后，俄军进展顺利，先后占领里加、波尔诺夫、维堡等地。1714年夏汉古特海战，俄舰队大获全胜，彻底摧毁瑞典海军舰队。查理十二世被迫提出议和。1721年9月最终签订《尼什塔特和约》，宣告战争结束，俄国获得波罗的海沿岸广大地区和出海口。瑞典从此走向衰落。俄国则由内陆国家成为濒海国家，跻身于欧洲大国之列。

(高晓惠)

普加乔夫起义

(Pujiaqiaofu qiyi) 1773—1775年发生的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1742—1775)，顿河哥萨克人，曾参加七年战争(1756—1763)和1768年—1774年俄土战争。1771年因病退役，浪迹民间，深谙民间疾苦和愿望。18世纪中叶农奴制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方式的封建农奴制剥削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尖锐。1773年9月普加乔夫利用彼得三世隐匿哥萨克人中间的传说和人们拥戴“好沙皇”的幻想，自称彼得三世，率80名哥萨克在雅伊克沙一带起义。多次以彼得三世名义发布檄文，提出解放农奴，把土地、河流、森林分给农民，取消人丁税，惩治贵族，还人民以自由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纲领，深得哥萨克、农奴的支持。乌拉尔工厂区的农奴工人和矿工参加了起义，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也卷入。起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773年9月至1774年3—4月从雅伊克沙起义到围攻奥伦堡(乌拉尔地区中心)，起义人数壮大到5万人。第二阶段，1774年3月、4月—7月起义军在政府的压力下，解除对奥伦堡的包围，转战到乌拉尔工厂区，并继续向西开进，于7月12日一度攻陷喀山城。第三阶段，1774年7月至1775年1月。起义军在喀山与政府军展开决战，终因装备不良，力量悬殊大败。起义军约8000人阵亡和被俘。普加乔夫率残部渡过伏尔加河，到达西岸地区，重新掀起起义浪潮。8月起义军在离察里津75公里的萨尔尼柯夫村遭到毁灭性打击。9月普加乔夫被出卖，遭逮捕。1775年1月10日晨被押解到莫斯科行刑，头颅滚落，尸体被肢解后焚烧。统治者为抹杀人民对“造反”的记忆，把雅伊克河改名为乌拉尔河。起义席卷俄国东南部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区，沉重打击了封建农奴制的统治。

(高晓惠)

瓜分波兰

(guafen bolan) 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俄普奥对波兰领土进行的三次瓜分。16世纪波兰已发展成东欧的封建强国，版图比现在大得多，居欧洲第三位，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大片土地。从17世纪中叶起波兰走向衰落，农奴制强化，封建割据严重；“自由选王制”（国王由议会选举产生，外国人有资格竞选）致使王位频繁更迭，外国人为王者不乏其数，1572—1795年总共11位国王中有7名外国人；“自由否决权”制度（议会决议只要有一人反对便不能通过）使波兰无法实行有效统治，从17世纪中叶起约100年间召开的55次议会上，有48次未作出任何决议。政局混乱的波兰成为强邻争夺的对象。其东邻俄国视波兰为自己通往西欧的障碍。北方战争后，成为波兰的最大侵略者。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继承了削弱波兰的政策。其西邻普鲁士和南邻奥地利也对波兰有领土野心。177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提议，由俄、普、奥瓜分波兰，沙俄虽有独吞波兰的野心，但因正陷于1768—1774年俄土战争中，遂同意。1772年8月5日三方达成协议。次年逼迫波兰割让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波兰部分贵族激发起改革愿望，于1791年制定新宪法，废除“自由否决权”。1792年4月沙俄政府出兵干涉波兰内政，普鲁士也趁机将军队开进波兰。在镇压了波兰国内的改革运动和反抗运动后，俄、普两国于1793年1月达成第二次协议，强行瓜分波兰部分领土。奥地利因正忙于同法作战，未能参加。在民族危亡关头，波兰爆发柯斯丘什科领导的民族起义，推翻国王，建立临时政府。1794年俄普联军绞杀波兰革命。1795年10月俄、普、奥三国签订协定，将波兰瓜分完毕。在三次瓜分中，俄国夺得最多土地，占原波兰领土的62%，共463200平方公里。普鲁士夺得20%，共141400平方公里。奥地利夺得18%，共128900平方公里。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被灭亡了，但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始终未停止，但均遭失败。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复国。

（高晓惠）

1812 年卫国战争

(Yibayiernian weiguo zhanzheng) 1812 年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入侵、保卫祖国的战争。19 世纪初拿破仑随着帝国的建立，扩张野心无限膨胀，时刻寻找征服俄国的借口。1810 年俄国解除对英国货的限制，破坏了反英大陆封锁的协定，并规定了抵制法国货的新关税率，激起拿破仑的愤怒。双方的外交冲突和争霸野心造成战争危机。1812 年，拿破仑集结重兵 60 余万，俄国拥兵 20 万在边境守护。拿破仑试图速战速决，逼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投降。6 月 24 日拂晓前夕法军渡过涅曼河进入帝俄领土，不宣而战。战争初期，俄军因力量悬殊被迫后撤。8 月法军攻打斯摩棱斯克，驻守该城的巴克莱将军下令弃城，引起俄国国内的普遍不满。亚历山大一世被迫起用失宠的杰出将领库图佐夫为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采取防御战术，消耗敌方有生力量，同时为缓解国内舆论，改变力量对比关系，决定在莫斯科郊外的波罗丁诺展开决战（9 月 7 日）。结果拿破仑折兵 58500 人，俄军损失 38500 人。双方都未能给对方致命打击，但拿破仑的速胜战略失败。9 月 13 日在库图佐夫坚持下俄军撤出莫斯科。他认为，丢掉莫斯科，俄国不会亡；丢掉军队，俄国一定亡。9 月 14 日拿破仑进驻空城莫斯科。当晚莫斯科突然起火，连续燃烧了 6 昼夜。此时，法军疲惫不堪，后备、给养跟不上，且深秋即去，寒冬将至。滞留莫斯科 35 天后，拿破仑决定撤离。撤退途中屡遭阻截，人民游击战争和库图佐夫军队与法军的正面战争使法军一蹶不振。12 月 24 日当法军残部准备渡过涅曼河逃离俄国时只剩下 3 万人。战争以俄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拿破仑远征俄国的失败使拿破仑帝国开始瓦解，并掀起被占领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

(高晓惠)

十二月党人起义

(Shieryue dangren qiyi) 1825 年俄国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贵族军官领导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度的起义。因起义发生在 12 月，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19 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发展，开始产生废除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社会要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由于取得 1812 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地位得以巩固，在国内加强专制统治，摧残进步事业，对自由主义思想大张鞑伐，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利用教会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建立军事警察制度，监视一切革命活动。专制统治加剧国内的不满情绪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一批年轻的贵族军官，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也深受国内进步思想家，如拉吉舍夫著作的熏陶，逐渐形成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1816 年他们建立秘密组织——“救国协会”（后改为“祖国忠诚子弟协会”），会员有 30 人，但因目的不明，不久瓦解。1818 年成立第二个秘密组织——“幸福协会”，会员增加到 200 人，1821 年宣布改组，分别成立了两个组织：乌克兰的以彼斯捷尔为首的“南方协会”和彼得堡的以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雷列耶夫为首的“北方协会”。其宗旨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彼斯捷尔曾于 1824 年起草文件《俄罗斯真理》，实际上是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草案。南、北方协会计划于 1826 年秋举行起义。1825 年 11 月 19 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猝然死去，俄国出现皇位虚悬局面。北方协会领导人决定利用 12 月 14 日军队向新沙皇宣誓之日提前起事。因准备仓促，指挥不力，且沙皇军队 4 倍于起义军，起义遭血腥镇压。时隔半月，南方协会获知消息后举行起义亦被镇压。大批十二月党人被逮捕，121 人受审，彼斯捷尔、雷列耶夫等 5 位领导人被处绞刑，31 人判徒刑，余者流放西伯利亚。十二月党人起义唤醒了新一代的革命家，对俄国解放运动产生巨大影响。

（高晓惠）

1861 年改革

(Yibaliuyinian gaige) 1861 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革。19 世纪上半叶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农奴制陷入严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俄国在 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中惨遭失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落后性和腐朽性。国内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农奴工人运动方兴未艾，革命民主主义思潮风云激荡着，革命形势一触即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公开承认改革的必要性，认为从上面解决要比由下面解决好得多。从 1857 年起，各种政治派别就如何废除农奴制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地主——农奴主阶级始终持顽固反对立场，自由派（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带土地解放农民，但要实行赎买，旨在促使农民分化，走普鲁士式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首的平民知识分子鲜明地提出无偿解放农民的主张。1861 年 2 月 19 日（俄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法令”，规定：农民获得人身自由，有买卖、开办和经营工厂、手工作坊的自由，有受教育、服兵役、起诉等权利，有自由通婚和处理家庭事务的权利，地主不得交换、买卖农奴；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份地，农民的份地可赎买成私产。农民在赎买份地之前，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交纳货币代役租和工役租；地主要求赎买份地的赎金要一次付清。为此，国家鉴于许多农民无力一次偿付赎金，由政府给农民贷款，农民则可先偿付国家赎金的 1/5 或 1/4，余者分 49 年内偿还，每年还 6%；在划地界时，农民在得到应得的份额后，地主可从农民原种份地中割去其中最好的部分，称为“割地”；为了加强对农民的管理，保留村社制，实行连环保等等。1861 年农奴制的废除是俄国一系列改革的开端。60 年代至 70 年代上半期，沙皇政府又实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地方自治局改革、市政改革、司法改革和军事改革等等。1861 年的改革虽然保留许多农奴制残余，如工役制，但是废除了农奴制，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封建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促使俄国的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化。

（高晓惠）

民粹派

(Mincui pai) 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代表农民和小生产者利益。主要由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组成。其基本理论可溯源到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受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影响很大。民粹派相信俄国村社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把农民理想化，认为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生的革命者”；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有三位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主张宣传鼓动、否定暴力行为的拉甫罗夫，狂热推崇农民暴动的巴枯宁和寄望于少数知识分子阴谋活动的特卡乔夫。对民粹派运动的不同阶段产生重大影响。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有长足进步，但小生产者农民仍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民粹派运动正是反映了这一阶层对农奴制残余的存在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压迫的强烈不满情绪。农奴制废除后，俄国又出现社会民主运动高潮。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产生民粹派早期小组活动。著名的有柴可夫斯基小组和多尔古申小组，以青年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工人为骨干，从事宣传鼓动工作。规模不大，很快被沙皇政府摧毁。70年代中期民粹派转向农村，希望唤起农民进行社会革命。1874年春夏，大约2000~3000名热血青年，穿上农民的服装，模仿人民的语言，发起大规模的“到民间去”活动，足迹遍及欧俄37个省。民粹派也因此得名。但运动并未得到农民的理解，数月后被镇压，许多人被逮捕，1876年被审判。此后，民粹派开始触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和自由问题。1876年在彼得堡成立“土地与自由社”，主要活动家有亚·米哈伊洛夫、普列汉诺夫、纳坦松等。在农村建立居民点，也在城市青年和工人中间活动。但并未真正达到与农民的结合，并更多地采取了个人恐怖手段，组织内部出现分歧。1879年该社分裂成“土地平分社”（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波波夫等，但多流亡国外，影响不大）和民意党。民意党的主要领导人有热里雅鲍夫、亚·米哈伊洛夫、彼罗夫斯卡娅等，该党坚持恐怖主义策略，认为暴力变革是改变现行不合理制度的唯一方法。1881年3月1日（俄历）民意党人用炸弹炸死亚历山大二世，并未达到推翻专制制度的目的。该党活动由于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而逐渐解体。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民粹派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农奴制残余和专制制度的要求，客观上起到推动革命运动发展的进步作用。一般称这时期的民粹派为革命民粹派。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民粹派蜕变为自由民粹派，主张同沙皇妥协，以改良方法修补现行社会制度。这时期自由民粹派的活动已经不代表民粹派运动的主流了。1902年一些具有民粹派思想倾向的小组和团体组成了社会革命党。

(高晓惠)

《火星报》

(Huoxingbao) 由列宁创办的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1900年12月在慕尼黑创刊。从1902年4月起在伦敦出版,1903年春起在日内瓦出版。《火星报》之名取自十二月党人的诗句:“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焰。”并刊刻在每期的报头上。编辑部成员有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和查苏利奇,编辑部秘书从1901年春起由克鲁普斯卡娅担任。报纸在国外出版,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报纸周围聚集了一批俄国革命者群体。列宁是该报的主编和领导者,多次发表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基本问题,反映并评述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该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重大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参与下,编辑部制订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草案,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次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选出新的编辑部成员: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后因为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吸收进编辑部,列宁因此于1903年10月19日(俄历)退出编辑部。从第52期起,该报成为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所以,一般把列宁主持出版的前51期称为旧《火星报》,把以后各期称为新《火星报》。共出版112期,1905年停刊。

(高晓惠)

布尔什维克

俄文音译，意为多数派。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形成的拥护列宁的多数派政党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98年成立后，尚未制订出党章和党纲，党的组织也不够成熟。列宁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在国外出版《火星报》的活动为进一步建党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1903年7月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就党纲、党章问题展开争论。由于列宁的坚持，党纲中写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讨论党章时，在入党条件问题上出现尖锐分歧。列宁主张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内某一组织者，皆可成为党员。以马尔托夫为首的一些人反对把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作为入党条件。结果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但在选举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时，拥护列宁的占多数，被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派占少数，被称为孟什维克。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两个对立的政治派别。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行争取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上把孟什维克开除出党。布尔什维克成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1918年3月根据列宁建议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5年易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52年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苏联共产党。

（高晓惠）

孟什维克

(Mengshiweike, Me eB)俄文音译,意为少数派。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马尔托夫为首的一派在党纲、党章问题上与列宁为首的一派发生分歧,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辑部时,马尔托夫派占少数,即称为孟什维克,并逐渐发展成代表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机会主义派别。其理论观点被称为孟什维克主义。组织上把党视为一个涣散的、成分复杂的、不定型的小资产阶级团体;政治上宣传改良主义幻想。主张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否认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不赞成武装起义的策略,反对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对革命转变问题,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应有一个长久的停顿时期,无需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1905年革命失败后,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出现主张取消党的秘密组织、停止党的活动的取消派,试图建立沙皇政权许可的合法的改良主义政党。1912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被驱逐出党,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沙俄政府的战争政策,成为沙文主义者。二月革命后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与白匪的叛乱和武装干涉,反对苏维埃政权。大多数人流亡国外。

(高晓惠)

流血星期日

(Liuxue xingqiri) 又称1月9日事件。1905年1月9日(俄历)俄国沙皇政府枪杀彼得堡工人的事件。俄国1905年革命的开端。1905年1月3日(俄历)彼得堡最大的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为抗议厂主开除4名工人举行罢工,很快得到其他工厂的声援。8日发展成全市总罢工,参加人数达15万人。同时,在工人中间广泛宣传以合法途径改善工人处境的加邦牧师鼓动工人去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处于地下状态的布尔什维克密切关注着彼得堡事态的发展,散发传单警告工人不要相信沙皇,指出自由只能去争取,不能期待沙皇的恩赐,并对加邦的活动表示怀疑。但工人普遍对沙皇抱有幻想。1月9日(星期日)晨彼得堡工人偕同家属约14万人举着宗教旗帜、圣像、十字架和沙皇画像,唱着祷告和对沙皇的颂歌,前往冬宫请愿。加邦领着队伍中最大的彼得堡纳尔瓦区的工人队伍,手捧成千上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准备呈递沙皇。请愿书上写道,我们来向皇上乞求公道和保护。并提出实行8小时工作日、将土地转交人民、实行大赦和各种政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等基本民主要求。沙皇政府布下数万军警把守要道。当队伍行至冬宫前广场,军队突然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鲜血染红积雪的广场,死伤达4600多人。惨案唤起广大人民群众觉醒,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导致1905—1907年革命的爆发。

(高晓惠)

莫斯科工人起义

(mosike gongren qiyi) 1905年12月爆发的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最高峰。1905年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积极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提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策略。革命形势不断深入。10月爆发全俄政治总罢工，明确提出“打倒沙皇政府”、“起义万岁”等口号。罢工中产生群众性组织——工农代表苏维埃，成为领导罢工与武装起义的机关。12月5日（俄历）彼得堡苏维埃全体代表被捕，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决定总罢工。次日莫斯科苏维埃举行会议，通过告全体工人、士兵和公民书，号召在12月7日12点举行总政治罢工。罢工如期进行。在沙皇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下，罢工逐步发展成武装起义（8日）。莫斯科市内街垒林立，到处展开激战。勃列斯尼亚区是武装起义中心。起义在12日至14日达到白热化。为了保住沙皇政府的统治，尼古拉二世于12月15日从彼得堡调集2000名谢苗诺夫近卫兵团到达莫斯科，16日又从华沙调来拉多加兵团。工人奋起用手枪、自制炸弹同沙皇的精锐部队展开殊死搏斗。因力量对比悬殊，12月16日勃列斯尼亚战斗队司令部决定自12月18日起停止罢工，市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分别决定自18日午夜后停止武装起义。莫斯科工人起义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援，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行动被镇压。自此，1905年革命转入低潮。

（高晓惠）

1917年二月革命

(Yijiuyiqinian eryue geming) 1917年3月(俄历2月)发生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国社会矛盾异常尖锐,革命形势日趋成熟。1917年1—2月间掀起罢工浪潮,计有676000工人罢工。3月30日(俄历2月18日)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罢工。为对付罢工,该厂宣布不定期歇业,3万工人失业,引起许多工厂工人声援。市内面包恐慌,加剧工人的愤怒情绪,饥饿的妇女捣毁了食品店。8日(俄历2月23日)国际妇女节彼得格勒有9万女工和男工举行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次日罢工人数增加到20万。10日(俄历2月25日),发展为全城政治性总罢工,提出“打倒沙皇”、“打倒战争”、“要面包”等口号。26日罢工发展成武装起义。12日(俄历2月27日)起义席卷全城,首都驻军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的工人、士兵联合起来攻占了军火库、兵工厂、炮兵总部和全部火车站,释放政治犯,逮捕政府大臣和将军,占领政府机关。首都全部掌握在起义者手中。当晚在布尔什维克号召下召开第一次工兵代表苏维埃。十月党、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等资产阶级政党乘机夺取胜利果实,宣布废除旧政权,建立新政权。15日(俄历3月2日)组成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统治俄国300多年的沙皇统治被推翻。彼得格勒起义胜利推动全俄革命。各地工人、士兵纷纷推翻当地政府。革命后俄国出现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

(高晓惠)

伊凡四世

(1530—1584) 俄国第一位沙皇。1533年即位，为莫斯科大公，年仅3岁。大贵族集团当政时期，亲眼目睹宫廷中的相互倾轧和专横肆虐，养成专制、多疑、残酷无情的性格。1547年17岁时举行隆重的加冕仪式，宣誓为沙皇（“沙皇”源于古罗马皇帝的称号“恺撒”，意即皇帝。）。为加强中央集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巩固沙皇统治，着手各种改革。1549年1月组成新政府集团，史称“重臣拉达”（拉达即会议之意），承担全部改革工作。废除世袭贵族特权，如食邑制、门第制，器重封地贵族。1549年2月沙皇主持召开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即各阶层代表会议，有大贵族、高级僧侣、莫斯科封地贵族等参加，后来还有商人和手工业者参加。缙绅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的确立。“重臣拉达”的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未根本消除大贵族分裂割据的隐患。1560年解散“重臣拉达”。从1565年起实行沙皇特辖制。全国领土分为特辖区和普通区，特辖区直属沙皇，凡划归特辖区的地方，原来的王公、大贵族一律迁入普通区。沙皇建立特辖军，实行了持续7年（1565—1572）的血腥恐怖统治，严惩一切叛乱阴谋。如诺夫哥罗德，因有背叛沙皇之嫌，便遭到持续6周的大屠杀，每日有1000或1500人被扔进沃尔霍夫河，城市周围200~300公里内几乎洗劫一空。沙皇特辖制摧毁了大贵族势力，消除了封建割据的隐患，巩固了沙皇的统治，但也使无数无辜百姓涂炭。所以伊凡四世有“雷帝”之称。对外奉行扩张政策，先后征服喀山汗国（1552）和阿斯特拉罕汗国（1556），远征西伯利亚（1581），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发动长达25年的立沃尼亚战争（1558—1583），未果。1584年3月18日猝然病逝。

（高晓惠）

彼得一世

(1672—1725) 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第四代沙皇。1682年10岁的彼得与其兄伊凡五世同时即位，因彼得年幼、伊凡多病痴钝，由其姊索菲亚摄政。彼得随母退居莫斯科近郊，在此组建两个游戏兵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和谢苗诺夫斯科耶兵团，习武练兵，这两个兵团日后成为他的嫡系。1689年索菲亚策动俄国的常备军——射击军叛乱，预谋刺杀彼得。事泄，彼得亲率游戏兵团粉碎了叛乱，索菲亚被投进修道院。归政之初，彼得于1695年1月和1696年5月两次远征亚速，最终占领亚速，取得亚速海的出海口。为夺得黑海出海口，1697年派出“大使团”到西欧各国游说，以建立反土耳其联盟。此外，“大使团”考察了西欧各国军事、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彼得本人乔装为下士随团前往，曾在荷兰萨尔丹的一所造船厂作木匠学徒，在英国的泰晤士河畔的一家造船厂学习造船理论，走访英国皇家协会、格林威治天文台、高等院校，拜谒牛顿等学者，旁听英国国会辩论，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1698年8月中断考察，回国平息索菲亚再度策动的叛乱。随后，彼得开始了俄国的欧化进程，着手进行涉及各方面的改革。他毕生重视军事改革，使俄国军事逐步走向正规化。建立包括步骑炮工四个兵种的、拥有20万人的正规陆军，创建由48艘战舰、大批快艇和28000名水兵组成的海军舰队。实行义务兵役制，颁布军事法规，设立军衔制，并办军事学校和学院。他大力发展工业，国家对贷款和提供劳动力等方面予以优惠。到1725年，俄国的手工工场由原来的21个发展到近240个，涉及冶金、纺织、造纸、造船等基本工业领域。彼得大力扶植国内贸易活动，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大刀阔斧地改革国家行政机构，废除了臃肿重叠、职责混乱的旧衙门制度，取消了波雅尔（意为大贵族）杜马，建立了作为国家最高政权机构的九人枢密院（也译成参议院），在1718—1721年间成立了11个专门委员会（也译成院）。先后把全国划分为8大省（后增至11个）和50个州。各省总督一人，直接由沙皇任命，并听命于沙皇。1721年实行宗教改革，设立宗教事务管理总局，总局长一职由非宗教人士担任，使教会从属于世俗政权。1714年3月颁布“一子继承法”，规定贵族只能把土地和其他不动产传给一个儿子，防止土地分散，进一步巩固了大地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1722年颁布《官职等级表》，文武官职各分为14级，打破了贵族世袭制度和门阀观念，量才使用，论功取士。彼得对科学文化事业贯注巨大热情，先后开办算术、造船、航海、医护、矿业、工程技术学校，培养各方面专门人才。要求10~15岁贵族子弟必须上学，并学会算术和一门外语，否则剥夺贵族特权，甚至规定，不毕业者不得结婚。还建立俄国第一个印刷所、博物馆、图书馆、剧院。1699年下令采用儒略历。1703年创办第一份报纸——《新闻报》，并亲任主编，并简化了俄文字母。1724年筹建俄国科学院。在生活习俗上要求欧化，禁止人们留胡须，禁止穿俄国旧式长袍。商人可蓄须，但要纳税。彼得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满足了地主阶级和新兴商人阶级的利益，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在进行国内改革的同时，彼得不断对外发动战争。1700—1721年与瑞典进行了21年的战争（史称北方大战），获得胜利，夺取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领土和波罗的海出海口。战争期间，于1713年把首都从处于内陆的莫斯科迁至濒海的彼得堡。1721年10月，枢密院封彼得为“大帝”和“祖国之父”。1725年1月28日彼得因病死于彼得堡。

(高晓惠)

叶卡特琳娜二世

(1729—1796) 俄国女皇 (1762—1796 年在位)。生于奥德河畔的什切青市,德意志公爵之女。奉俄女皇叶丽萨维塔的旨意,1744 年前往俄国,1745 年与后来的彼得三世成婚。在叶丽萨维塔宫中度过 18 个春秋,寄人篱下,且目睹宫廷中争权夺利黑幕,养成虚伪狡诈和凶狠残暴的性格。1762 年 6 月发动宫廷政变,废彼得三世自立。依靠贵族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统治,赐给 6 月政变中有功的贵族巨款和农奴。在位的 34 年里,赏赐贵族 80 万农奴及伏尔加河流域和黑海北岸的大片肥沃土地。没收教会和修道院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再不断把这些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赏给贵族。为巩固贵族统治,进行一系列改革。1763 年颁布敕令,把枢密院划分为 6 个委员会,自己直接主持陆军、海军、外交委员会,设总检察官监督和處理枢密院政务,权力日益集于沙皇,1775 年颁布《全俄帝国各省管理体制》的敕令,取消旧有三级(省州县)体制,代之以两级(省县)体制;全国按人口划分为 50 省,省下置县;取消少数民数地区自治权,强制俄罗斯化。1785 年颁布御赐贵族特权诏书,确认贵族对土地和农奴的垄断权,及免丁税、免兵役等特权。为照顾新兴资产阶级利益,鼓励发展工商业,同年又颁布御赐城市特权诏书,赋予城市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标榜“开明君主专制”,早在 1767 年设立新法典编纂委员会,吸收贵族、商人和农民代表参加。利用委员会,大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三权分立,曾博得西欧一些进步思想家的青睐。1773 年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应邀访俄。但当狄德罗真诚建议她废除农奴制时,遭到拒绝。她残酷镇压普加乔夫起义,迫害进步知识分子。1790 年俄国先进思想家拉吉舍夫著书揭露农奴制和专制制度,被判死刑(后改流放)。女皇的统治结束了彼得一世之后的混乱局面,使俄国进入鼎盛时期。其政绩博得贵族的赞赏,被授予“大帝”称号。对外,三次参与瓜分和灭亡波兰,在 1768—1774 年和 1787—1791 年两次俄土战争中最终打败土耳其,取得黑海出海口。吞并立陶宛、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地,积极参加欧洲君主国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活动。1796 年 11 月因突然中风死于沙皇村(今普希金城)。

(高晓惠)

赫尔岑

（1812—1870）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著名政论家和作家。出身大贵族家庭。幼年深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14岁时曾与好友奥加略夫登上莫斯科城郊的麻雀山（今列宁山）庄严宣誓，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替死难志士报仇。1829—1833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数理系，组织青年政治小组，阅读禁书，研讨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和政治问题，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圣西门的学说。毕业后，被当局以“对社会极为危险的自由主义者”的罪名逮捕，被判流放（1835—1842）。流放归来，进行创作活动。针对俄国青年崇拜黑格尔哲学的现象，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但反对黑格尔保守的政治观点，主张哲学应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联系起来；认为文学创作可以使人民听到“自己愤怒与良心的呼声”，写出影响颇大的小说《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等。1847年起长期侨居国外，目击1848年6月巴黎枪杀工人事件，从而产生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俄国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直接依靠农民村社而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为日后民粹派的思想渊源。1852—1865年侨居伦敦，以杂志《北极星》、《钟声》为阵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俄国农奴制改革运动而疾呼。曾一度赞成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的改革，通过《钟声》上书亚历山大二世，希望以“理智的方法”进行和平的“经济革命”。但不久便抛弃了这种幻想。1852年起历时15年完成著名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含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等多种体裁，展示了19世纪中叶俄国和西欧社会生活及革命斗争的广阔历史画面。1869年写给巴枯宁的《致老友书》中，放弃“俄国社会主义”理论，目光转向马克思。1870年病逝于巴黎。

（高晓惠）

车尔尼雪夫斯基

(1828—1889)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家，作家。生于牧师家庭。1846—1850 年就读于彼得堡大学文史系，广泛涉猎，研究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对赫尔岑、别林斯基、果戈理的作品也有浓厚兴趣。在改革农奴制的社会争论的影响下和欧洲 1848 年革命的震动下，逐步形成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毕业后回家乡任中学教员。1853 年迁居彼得堡后从事创作活动和革命活动。1855 年发表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向唯心主义美学观点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论点提出挑战，在美学史上首次提出“美是生活”的命题，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同年起任《现代人》杂志文学批评栏的编辑工作。1857 年转为专门负责杂志的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栏，集中精力研究俄国经济政治问题，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进行无情揭露，提出无条件废除农奴制的要求。改革前夕撰写著名革命传单《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号召农民待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1862 年发表《没有收信人的信》，把俄国比作一件破烂不堪的旧衣服，认为应该停止补缀、重换新衣。为了论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深入进行经济和哲学理论的研究，于 1860 年发表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宗教神秘主义的《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被政府视为“动摇君主政权的基本原则”之作。他承认资本主义的相对进步性，但也揭露和谴责资本主义的剥削，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主张俄国可以通过农民村社绕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了民粹派的理论基础。1862 年遭沙皇政府逮捕，监禁 2 年，后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 7 年（又改为终身流放）。身陷缧绁仍坚持革命信仰，写出塑造一群反对农奴制的民主主义者新人形象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以及政治小说《序幕》。晚年获准离开流放地，移居阿斯特拉罕，从事翻译工作。1889 年获准返回家乡，4 个月后病逝。

(高晓惠)

巴枯宁

(1814—1876)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出身贵族。1840年出国，先后侨居德国、瑞士和法国。关注社会现实，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参加1848—1849年欧洲革命。1849年5月因参加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逮捕，并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51年由沙皇政府引渡回国，狱中曾两次写“自白书”，请求赦免。1857年被减刑流放西伯利亚。1861年逃往国外，同赫尔岑、奥加略夫合作，加入《钟声报》编辑部。积极参加和领导俄国的民粹派运动，成为70年代民粹派三大理论家之一(另二人为拉甫罗夫和特卡乔夫)。1864年9月在伦敦会见马克思，参加第一国际的活动。同年底来到意大利，逐渐形成无政府主义思想，宣扬个人的绝对自由，视国家为社会祸根，主张以理想的自治性质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来代替国家。认为阶级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继承权，而不是私有制，废除继承权，就可以实现各阶级平等。还认为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而建立“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的途径，是通过少数人的自发暴动，而不需要积聚革命力量，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作用，更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的活动在第一国际中产生消极影响。1872年因从事分裂活动被第一国际开除。著有《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等。1876年7月1日病逝于瑞士伯尔尼。

(高晓惠)

克鲁泡特金

(1842—1921)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出身贵族。1862—1867年在西伯利亚的军队中任职，并从事地理和地质考察工作。1867年辞去军职，入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学习。大学期间开展地理学研究。1871年去芬兰和瑞典考察冰河期的堆积物，著有《关于冰河期的研究》一书。1869年被选为俄国地理学会委员。其间也关注社会政治问题。1872年到瑞士加入第一国际工作，与巴枯宁组织一拍即合。1872—1874年回国参加民粹派秘密组织柴可夫斯基小组的活动，宣传国外工人运动情况，包括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斗争，同时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1874年被捕。1876—1917年流亡国外，积极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主张废除私有制和一切国家，建立农业村社和工业劳动组合的联合的“无政府”社会。为实现这种理想，主张社会革命来推翻现存制度，反对改良主义。二月革命后回国，反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苏俄，曾多次会见过列宁。1921年病逝于莫斯科。著有《一个革命家的札记》(1899)、《法国大革命》(1909)、《现代科学和无政府主义》(1913)等。

(高晓惠)

普列汉诺夫

(1856—1918) 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理论家。出身于小贵族家庭。早期参加民粹派运动，是“土地与自由社”和“土地平分社”的领导人之一。1880年侨居国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脱离民粹派。1883年9月在日内瓦组织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亲自撰写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189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898)、《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等等，批判民粹派的错误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出卓越贡献。俄国社会主义工党和《火星报》的创建人之一，参加第二国际活动，进行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对工农联盟认识不足，夸大自由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策略。但是在1903—1914年期间仍然摇摆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反对取消派，反对党内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护国主义者，站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一边。二月革命后回国，支持临时政府。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但不支持反革命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活动。1918年5月30日病逝于芬兰。

(高晓惠)

斯托雷平

（1862—1911） 俄国政治家。出身贵族。毕业于彼得堡大学。1884年起在内务部供职，1902年起相继担任格罗德诺省和萨拉托夫省省长。因镇压农民运动有功，1906年起任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策划并发动1907年“六三政变”，开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1911）。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大肆屠杀革命者，绞索遍及全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领导实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年法令规定农民有权退出村社，随时可将份地确定为私产，以建立独立田庄（在村社某一地段内获得一块份地）和独家农场（完全脱离村社的土地），通过农民银行扶持“殷实”农民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1911年法令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进行土地规划的地方，村社份地均自动变为私产；推行向西伯利亚等边疆的移民政策。旨在摧毁村社，扶植富农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改革进展缓慢，1906—1916年间只有24%的农民脱离村社。1911年在基辅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高晓惠）

德国近代史

(deguo jingdaishi) 一般认为, 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结束, 标志着德国宗教改革的结束和近代历史的开始。根据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 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新教(路德教、加尔文教)与旧教(天主教)地位平等; 帝国内各诸侯拥有内政、外交的一切权力, 帝国完全徒有虚名, 分裂状况比战前更严重, 计有300多个诸侯国、1000多个骑士领地, 只有皇帝和帝国议会表明帝国的存在。战争的破坏、劳动力缺乏以及战后的分裂状态, 使德国的经济长期处于衰退状态。尤其是新航路的开辟, 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沿岸, 使德国失去了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为了保证农业劳动力, 地主加快了16世纪末以来的农奴制再版进程, 尤其是在东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

在德意志各诸侯国中, 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最为强大。普鲁士是在17世纪迅速崛起的, 统治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在1415年获得勃兰登堡选帝侯国, 面积仅2万平方公里。17世纪初先后获得克列夫兹、马尔克、拉文斯堡及东普鲁士, 三十年战争后获得波美拉尼亚东部大部分地区, 1701年升格为普鲁士王国。奥地利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世袭领地, 除奥地利本土外, 还占有捷克、匈牙利、南尼德兰及意大利北部的部分领土。

18世纪德意志境内的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其中普鲁士最为明显, 使之有实力与奥地利争夺中欧的霸权, 经过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 普鲁士从奥地利手中获得了工商业发达的西里西亚地区。1772—1795年, 普、奥先后与俄国3次瓜分波兰(奥地利参加了两次), 普鲁士获得了西普鲁士等地, 奥地利获得克拉科夫等地。普鲁士的扩张政策得到了国内容克贵族的支持, 并逐步形成了好战的军国主义传统。

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与封建农奴制度发生了矛盾。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又译腓特烈二世)、奥地利的玛丽亚·特丽萨和约瑟夫二世都曾标榜“开明专制”, 实行有限的改革。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 普、奥两国纠集德意志各邦及欧洲封建势力联合进行干涉。19世纪初, 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 普鲁士、奥地利屡屡败北。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二世被迫放弃帝国皇帝称号, 改称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 神圣罗马帝国灭亡。1806年耶拿战役后普鲁士被一分为三, 在其领土上新建了华沙大公国和威斯特伐里亚王国。同时, 德意志各邦按拿破仑的意志组成了“莱茵联盟”。各国也仿照法国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 废除农奴制度。

1815年拿破仑战败, 根据《维也纳和约》, 成立以奥地利为中心的德意志邦联, 共有34个诸侯国及4个自由市组成。邦联议会没有中央政府的权力, 各邦在内政、外交和军事上都独立自主。被拿破仑打破的封建秩序虽然表面上恢复, 但农奴制度等封建制的根本已经无法彻底恢复, 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在20、3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要求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的呼声日益强烈。与此同时, 普鲁士与奥地利的角逐也继续发展。1834年普鲁士建立了“关税同盟”, 德意志邦联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 但遭到了奥地利的反对和抵制。

1848年3月柏林、维也纳都爆发了起义。资产阶级自由派获得了革命的领导权, 企图通过和平、妥协的手段统一德国。5月, 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在

法兰克福召开国民议会，商讨统一问题。议会形成了“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前者主张以奥地利为中心统一德国，后者主张以普鲁士为中心统一。1849年欧洲反动势力转入反攻，革命时期的立法被纷纷取消。但政治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1862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首相。俾斯麦推行现实主义的政治，着手以武力统一德国的计划。经过对丹麦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奥地利被排除在外。1867年，多民族的奥地利，实行改革，采取联邦制，允许匈牙利有自己的议会和宪法，但由奥地利的皇帝兼任匈牙利国王，是为奥匈二元帝国。1871年1月18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帝国由4个王国、5个大公国、12个公国、侯国及4个自由市和帝国行省阿尔萨斯、洛林组成，其中普鲁士王国在帝国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普鲁士国王和首相分别兼任帝国皇帝和宰相。帝国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德国各邦号名义上保留，但已失去了以前的独立和权力。

统一后的德国继续推行俾斯麦的现实主义政治达30年之久。对内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70年代初发动“文化斗争”，打击天主教势力，取消了教会的相对独立权。1878年颁布镇压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德国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地下，工人运动受到压制。对外推行“大陆政策”，力图孤立法国并使英、法、俄、奥、意等欧洲大国互相牵制，确保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权。1873年促成了德、俄、奥“三皇同盟”，1882年签订德、奥、意三国军事同盟。

统一后的德国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其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扩大世界市场，参加瓜分世界的竞争。1888年年轻的威廉二世即位，推行与俾斯麦不同的“世界政策”，力图在世界舞台上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争高低。1914年德、奥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法、俄争夺世界霸权与殖民地。1918年11月德国最终战败，国内发生“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帝制，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史称“魏玛共和国”。

（邓伟云）

普鲁士王国

(Pulushi wangguo) 德意志邦国，1701 年建立。普鲁士原为古普鲁士人居住地，位于维斯瓦河与涅曼河之间，公元 13 世纪为条顿骑士团征服，始称普鲁士。14 世纪初条顿骑士团征服维斯瓦河以西地区，称之为西普鲁士，从此有东、西普鲁士之称。1466 年西普鲁士为波兰收复，东普鲁士也臣属波兰。1618 年，统治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的霍亨索伦家族兼领东普鲁士，成立勃兰登堡——东普鲁士选帝侯国。

霍亨索伦家族在 10 世纪只是一个小城堡的主人。1415 年腓特烈六世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封为勃兰登堡选帝侯。1614 年勃兰登堡选帝侯获得莱茵河下游的几块领地。1648 年获得了波美拉尼亚东部地区。同年摆脱了波兰宗主权。1701 年，腓特烈一世以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为条件，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封为普鲁士国王，普鲁士王国正式建立。18 世纪后半叶的七年战争和三次瓜分波兰，又使普鲁士获得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波兰的西普鲁士等地，领土面积达到 194891 平方公里（勃兰登堡的面积为 23751 平方公里）。

普鲁士王国的崛起，受益于勃兰登堡的地理位置。勃兰登堡侯国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几条重要的河流如莱茵河、奥得河、易北河等都流经此地，贸易发达，霍亨索伦家族亦重视工商业的发展，1685 年至 1703 年约有两万法国胡格诺教徒和 1 万多各国的新教徒来到这里定居，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普鲁士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国家财政收入的 3/4 以上用于军事。军国主义政策得到了容克地主阶级的支持，因为他们是扩张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新的地产、新的军官职位和新的行政机关职务等。容克地主同时又是落后的农奴制度的代表，17 世纪至 18 世纪上半期，农奴制在德意志再版，农民失去土地和人身自由，地主对农奴可以行使警察权和司法权。

19 世纪初，容克贵族统治的腐朽性在拿破仑军队面前暴露无遗，普军在 1806 年的耶拿战役中一败涂地。根据 1807 年的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王国被肢解，在它的领土上新建了华沙大公国和威斯特伐里亚王国，普鲁士被挤在两国中间。普鲁士国王任命施泰因男爵为首相（1807—1808），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改革。施泰因的后任哈登堡（1810—1817）继续推行改革。改革使容克地主失去了一些特权，并逐渐向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转化。1815 年的《维也纳和约》使普鲁士恢复了原有的国土。普鲁士政治反动，但经济较开放，于 1834 年建立关税同盟，拉拢多数德意志邦加入，逐渐实现经济一体化。1848 年 3 月，首都柏林爆发人民起义，提出了民主和统一德意志的要求，起义一度取得胜利，但不久被镇压。容克贵族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希望通过王朝战争的形式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1862 年俾斯麦就任首相后，通过战争，击败了主要竞争对手——奥地利和当时的欧陆霸主——法国，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在 1871 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里，普鲁士王国处于中心地位，帝国皇帝和首相分别兼任王国国王和首相。帝国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普鲁士王国失去了，“国家”的含义。1919 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共和国，普鲁士王国的名称消失。

（邓伟云）

施泰因—哈登堡改革

(Shitaiyin-hadengbao gaige) 19 世纪初普鲁士王国进行的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主要推行者是两位首相海因里希·斯泰因和卡尔·哈登堡，故名。当时的普鲁士在军事上屡遭拿破仑的打击，反映出经济政治制度的腐朽性。1807 年 7 月的提尔西特和约使普鲁士失去了大半国土。10 月，普鲁士国王在拿破仑的压力下任命施泰因为首相。施泰因推行的改革主要有两项：新的城市条例和“十月敕令”。前者规定由城市自己管理财政、教育和救济工作，由市民投票选举的市议会行使城市的行政权。“十月敕令”全称为《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法令》，规定容克地主可以兼营工商业，市民和农民也可以购买贵族地产；废除农奴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仍要他们对容克地主负担一定的义务。“十月敕令”基本上废除了农奴制度，并使容克贵族失去了对土地的垄断。资产阶级既可以购买地产，又能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因而促进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1808 年 11 月，施泰因被保守派赶下台。不久邻国推行的资产阶级改革初见成效，使普鲁士感到了压力。1810 年 6 月，哈登堡就任内阁首相。他仿照其他邦国的经验，先后颁布工商法、税收法、宪兵法令、解放犹太人法令和调整法令。解放犹太人的法令使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著名的调整法令颁行于 1811 年 9 月 14 日，为进一步调整农民与地主间的关系，对农民如何获得土地作了规定。1816 年 5 月，普鲁士政府又以公告调整法令的形式，对内容作了补充。它规定农民可以有条件地赎取他们的祖先作为自由人时耕种过的土地；获得土地的农民以后还须自备牛马为地主尽一定的义务。这项法令使一定数量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与一定意义上的自由，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817 年哈登堡下台。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虽然不彻底，但促进了普鲁士王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邓伟云)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Deguo shehui minzhu gong dang)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1869年8月7日至9日在爱森纳赫市成立，故又有“爱森纳赫派”之称，以别于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派。主要领导人有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等。党的领导机构是一个5人委员会以及由11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机关报为《民主周报》(同年10月改称《人民国家报》)。党的纲领基本上按照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纲领制定。党纲指出：私有制是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政治斗争是经济解放的前提。党建立后即宣布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后，积极引导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党的领导人还积极利用议会的讲坛作为斗争场所。1870年爆发普法战争，工党公开声明予以谴责。巴黎公社成立后，工党即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因此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72年被当局逮捕，并以“图谋叛国”罪判处两年监禁。工党的主张和行动很快在德国工人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影响越来越大。1874年国会选举时，工党有6人当选为议员，而拉萨尔派只有3人当选。工党还得到了第一国际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对工人运动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措施，面对现实，德国工人阶级希望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共同对敌。日益走下坡路的拉萨尔派也提议两派合并。马克思、恩格斯支持两派的合并，但主张在拉萨尔派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时才能合并。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没有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劝告，于1875年2月与拉萨尔派共同起草了一个纲领草案，这个纲领具有明显的拉萨尔主义思想，1875年5月22—27日，两派在哥达城举行合并大会，纲领被通过，并因之被称为《哥达纲领》。两派合并后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党的领导机构中，拉萨尔派占了多数。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统一的作用，但对爱森纳赫派在纲领和组织上的无原则让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马克思为此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可惜没有引起德国党内的足够重视。

(邓伟云)

俾斯麦

(Bisimai , Otto Fürst Von Bismarck 1815—1898) 德国政治家。1815年4月1日出生于勃兰登堡阿尔特雷恩豪森庄园的容克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1847年为普鲁士联合邦议会议员。当时思想保守，反对德国统一，竭力主张维持以奥地利为中心的德意志联邦。1851年出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联邦代表会公使，1859年出任驻俄公使，1861年任驻法大使。这一时期思想发生变化，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以武力统一德国。1862年9月出任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几天后，在普鲁士议会的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即席发表了被后人认为是深思熟虑的谈话：“当代重大问题不是演说和多数派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只能用铁和血来解决”，并声称这已是普鲁士依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取得好处的时候了。由此，被人称为“铁血宰相”，所推行的政策也被称为“铁血政策”。“铁血政策”又被后人当作战争政策与穷兵黩武的代名词。此后不顾议会中多数派的反对与“违宪”的指责，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并不断煽动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1864年联合奥地利发动了对丹麦王朝的战争，兼并了属丹麦国王领地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小公国，因此被封伯爵。1866年在法国的默许下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即普奥战争，战争连续了7个星期，在关键的7月3日萨尔瓦战役中与普鲁士国王亲临战场观战，普军获胜后，说服国王停止追击奥军，以免刺激其他大国。8月签订布拉格和约，迫使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不久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由莱茵河以北的22个德意志国家及3个自由市参加。1870年，为了统一法国庇护的南德意志四国，决意发动对法国的战争。7月13日普鲁士国王从休养地埃姆斯温泉发来急电，俾斯麦加上了侮辱法国皇帝的字样，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使其成了引逗“高卢公牛”的“红布”，法国于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早有准备的普军很快击败了法军，并进军巴黎城下，迫使法国新政权赔偿巨款，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1871年1月18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俾斯麦被任命为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邦宰相，并晋封为侯爵。70年代初期，又掀起“文化斗争”，反对代表天主教会与西南德意志分离势力的中央党，借机剥夺了教会的相对独立权。但不久即与中央党妥协，转而进攻工人运动，1878年10月使议会通过“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非常法”），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地下。在外交上，推行“大陆政策”，力图保证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其主要做法是：孤立法国；阻止法俄接近；阻止俄国向中欧、南欧发展，形成英、法、俄、奥、意在欧洲的互相制约。1873年促成俄、奥、德三皇协定；1879年使德国与奥匈缔结秘密军事同盟。1882年意大利加入，形成三国的秘密军事同盟。80年代还促进德国向亚、非、拉开拓殖民地。1888年，年轻的威廉二世继位当皇帝，威廉主张实行称霸世界的“世界政策”，与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发生冲突。1890年3月被迫辞职，被封为布劳恩公爵。1898年在自己的庄园去世。后人认为，俾斯麦当政后实行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内外政策，比较符合德国当时的现实。

(邓伟云)

拉萨尔

(Lasaer ,FerdinandLassalle1825—1863) 德国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国际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重要代表，拉萨尔主义的创始人。生于布勒斯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1843—1846年先后在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学和古典语言学，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848年革命爆发后，在杜塞尔多夫参加了革命活动，并认识了马克思。1848年11月被普鲁士政府逮捕，次年底出狱。1854年8月离开莱茵省迁居柏林。1862年4月在柏林郊区奥兰宁堡的手工业协会作了一次演说，同年11月这篇演说以《工人纲领》为题出版，在德国工人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邀请他担任未来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此名稍后由拉萨尔提出）领导并起草纲领性文件。1863年3月，发表了《给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的小册子，准备作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同年4月在莱比锡作了《论工人问题》的演说，5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后以《工人读本》为题出版。这些演说和著作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人称“拉萨尔的鼓动”。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上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暴力斗争；经济上提出“铁的工资规律”，认为工人的工资只能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偏高或偏低则会影响生育，引起劳动力过剩或不足。要使工人获得全部劳动所得，就必须由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自己成为企业主。而要获得国家的贷款，首先必须争取到普选权。这套漏洞百出的思想构成了“拉萨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并长期影响着德国工人运动。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并宣布正式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当选为主席，他起草的纲领也被大会通过。同年5月11日至1864年4月左右，拉萨尔与普鲁士宰相俾斯麦进行了秘密交往，幻想俾斯麦实行普选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作为交换，拉萨尔要德国工人支持普鲁士发动“王朝战争”。这种政治交易以及在“联合会”内搞个人独裁，引起了工人的不满。俾斯麦也很快对他失去了兴趣。1864年8月，在瑞士与人决斗，下腹中弹身亡。死神的过早降临，反而提高了他本人及拉萨尔主义在工人中的声望与影响。

(邓伟云)

倍倍尔

(Beibeier ,August Bebel 1840—1913)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领导人之一。1840年出生于科隆一个下士军人家庭，由于家庭贫困，14岁就当学徒。1860年到莱比锡一家作坊当镟工，很快投身于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1863年6月，建立与拉萨尔派相对抗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1867年担任联合会主席，同年被选为北德意志联邦议会的议员，成为议会中第一个工人议员。1869年认识了威廉·李卜克内西，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了一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经他与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不懈努力，1869年在爱森纳赫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被选为党的主要领导人。1872年被当局判处两年监禁。1875年参加哥达代表大会，当选为新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监察委员会主席。在“非常法”时期，坚持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正确路线。1884年至1889年三次被选为帝国议会议员。1889年参与了第二国际的筹备工作，并参加了国际的成立大会。在第二国际的历史上倍倍尔一直起着重要作用，恩格斯逝世后，成为德国党和第二国际中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上，他与饶勒斯激烈论战，谴责米勒兰的叛卖行径。1907年参加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提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消灭战争。1913年逝世。

(邓伟云)

伯恩斯坦

(Boenshitan,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的鼻祖，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生于柏林一个火车司机家庭。犹太人。16岁到银行当职员，1872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878年“非常法”公布后前往瑞士，与赫希伯格、施拉姆合写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提出取消革命、取消党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他们因此被称为“苏黎世三人团”，马克思、恩格斯写了《通告信》对他们予以严厉的批评。伯恩斯坦不得不向马克思当面认错。1880年伯恩斯坦出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1888年随报社迁居伦敦。在瑞士苏黎世和伦敦期间，逐渐取得了恩格斯的赏识，被恩格斯选为遗嘱执行人。但恩格斯逝世后，立即开始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1899年写了《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展开全面进攻：在哲学方面，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是“历史宿命论”；在经济学方面否认剩余价值学说，并认为垄断组织能消除经济危机；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阶级合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资本主义能够“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主张把无产阶级政党改为和平、改良的党。针对他的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专门召开了5次代表大会（1898—1903年期间）进行辩论和批判。1901年伯恩斯坦从伦敦返回阔别22年的德国，此后多次当选为帝国议会的议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议会投票支持军事拨款和帝国主义战争。1917年退出社会民主党，同年4月与考茨基建立“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11月，德国建立共和国，伯恩斯坦出任财政部官员。1919年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党。1932年逝世。

(邓伟云)

考茨基

(Kaociji, Karl Kautsky 1854—1938)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领袖之一。1854年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1874年进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80年1月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赫希伯格之邀到瑞士苏黎世,因此结识了伯恩斯坦。这期间阅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恩著作,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年1月在恩格斯、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支持下在斯图加特出版《新时代》理论刊物,担任主编至1917年。1885年迁居伦敦,在大英博物馆研究经济学和历史学。1889年受恩格斯之托开始整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手稿。1891年返回斯图加特,并参加社会民主党新党纲理论部分的起草,这个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恩格斯逝世后,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持认可态度。1896年10月起,让伯恩斯坦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一系列文章,引起德国党和各国社会主义者的不满。1899年9月出版《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批驳伯恩斯坦的观点,但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1900年9月参加第二国际巴黎大会,对米勒兰入阁问题提出折衷决议案,认为这只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从而以“中派”的面目出现在第二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本国政府辩护,1914年9月发表《帝国主义》一文,提出了“超帝国主义”的观点,认为随着国际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帝国主义可以进入一个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超帝国主义”阶段。因而不能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1918年出版《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攻击苏维埃政权是“独裁政权”。德国十一月革命胜利后,任临时政府外交部副部长。1921年2月,支持原第二国际内的中派在维也纳成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二半国际”,与共产国际相对抗。1927年出版《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阶级、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全面摒弃了马克思主义。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迁居维也纳。1938年病死在阿姆斯特丹。

(邓伟云)

兰克

(Lanke,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19世纪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近代西方“客观主义”历史学派、“兰克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图林根维埃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4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和神学。毕业后对古代史发生浓厚的兴趣，1824年，他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1494—1514》一书问世，引起轰动。1825年应聘为柏林大学历史副教授。不久写成《16和17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君主政治》一书。1827—1831年，访问奥地利和意大利，看到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1833年开始写作《教皇史》(3卷)，同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1839年出版《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1841年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并被准许利用国家文件，以此便利条件编纂了《普鲁士王国史》。1865年70岁生日时被授予贵族爵位。1871年从柏林大学退休。1877年开始口授《世界史》，逝世时编至第7卷，后两卷由其门生续编而成。此外，兰克还写过不少人物传记，他的全集有54卷之多。

兰克对历史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主张历史要客观公正，不能渗杂个人的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还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真面目。在研究方法上特别强调资料的重要性，强调对史料的考证和辨别。他的史学思想影响到欧洲许多国家，远及美国、日本，被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称赞为近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邓伟云)

意大利近代史

(yidali jindaishi) 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意大利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

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本土、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近代资本主义的摇篮，但在16世纪至18世纪，社会发展落后于英、荷、法等国。新航路的开辟使地中海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下降。意大利四分五裂、纷争不息的局面使大国得以逐鹿争雄。自1494年起，法国、西班牙相继侵入意大利。西班牙击败法国，从1521年到1713年，控制了意大利大部分邦国。18世纪前半期，经过几次战争，意大利基本被西班牙和奥地利瓜分，只有撒丁王国保持了独立。18世纪后半期，由于相对的和平环境，意大利逐步复苏。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启蒙思想、统一和独立的主张开始传播，产生了法学家贝卡利亚这样驰名欧洲的人物。

意大利的近代复兴是从18世纪末开始的。1789年爆发的法国革命震撼了意大利。民族意识迅速觉醒，革命情绪急剧高涨。1796年拿破仑进入意大利后，扶持亲法的自由派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共和国。1799年，俄奥联军发动进攻，法军失利，这些共和国纷纷垮台。雾月政变后，拿破仑重新征服意大利，在北部建立意大利共和国。1804年拿破仑称帝后，兼任意大利王国的国王，并占领和控制了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拿破仑在意大利推行《拿破仑法典》，废除封建特权，加速了社会进步，但也无情地压榨意大利的人力和财力，激起各阶层的不满和反抗。1807年，争取民族解放的秘密革命组织——烧炭党诞生。

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根据维也纳会议的规定，意大利被分割为8个封建邦国，除独立的撒丁王国和教皇国外，伦巴底——威尼斯划为奥地利的总督辖区，奥地利还控制了托斯坎那、帕尔马、摩地纳、卢卡诸公国。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恢复对两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岛）的统治。封建复辟和奥地利的民族压迫促使民族、民主意识进一步发展，烧炭党组织迅速遍布各地。1820—1821年，那不勒斯王国和撒丁王国先后爆发革命，1831年，中部各邦爆发革命，均遭镇压。1831年，马志尼组建意大利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青年意大利，明确提出建立自由、独立和统一的共和国的目标，多次组织起义，均告失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产生，主张由撒丁王国领导意大利实现统一。1848年，意大利革命首先在西西里岛爆发，旋即蔓延各地，撒丁王国发动了第一次反奥独立战争。在奥地利的反攻下，意大利革命失败。撒丁王国保存了宪法，成为意大利爱国者的指望。1852年，自由派加富尔出任撒丁王国首相，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加速了经济发展。1859年，撒丁联合法国发动第二次反奥独立战争，获得胜利，伦巴底、托斯坎那、帕尔马、摩地纳等并入撒丁王国。1860年，民主派加里波的率千人志愿军远征西西里，解放两西西里王国，通过投票将其并入撒丁王国。1861年，君主立宪制的意大利王国建立。1866年，在第三次反奥战争中，意大利遭到失败，但因普鲁士战胜奥地利而收回威尼斯。1870年，意军趁驻守罗马的法军回国参加普法战争而进占罗马。意大利王国的首都从佛罗伦萨迁至罗马。意大利的统一事业终于完成。

统一后，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但因封建残余保留较多，发展速

度低于西欧国家。自 1876 年起，政府被所谓左翼党把持，当权者热衷于政治权术，收买和操纵议员。加上选民资格的限制和天主教會的抵制，议会民主对群众没有吸引力。

工人运动曾深受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影响。从 80 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拉布里奥拉教授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1892 年，意大利社会党建立。1887—1900 年，社会不满情绪高涨，暗杀、农民骚乱、工人暴动频频发生，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

20 世纪最初 10 年是经济高涨时期，垄断组织形成发展。自由党内阁承认工人组织合法和罢工权利，颁布劳动保护法，逐步实现普选权。社会党领袖支持政府，工人对此不满，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大。

统一后，意大利急于参与瓜分世界的争夺。1881 年，意大利所觊觎的突尼斯被法国吞并，意、法关系紧张。意大利遂于 1882 年同德、奥结成三国同盟。此后，意大利在东北非进行殖民扩张，但在 1895—1896 年进攻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遭到惨败。1911 年又发动意土战争，打败土耳其，占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将两地合并为利比亚殖民地。因与奥匈在巴尔干有利益冲突，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转向协约国。

（刘北成）

烧炭党

(Shaotandang) 19世纪初期意大利秘密爱国革命组织。其来源和名称意义，众说不一。1807年，在意大利南部烧炭山区出现了第一批支部。它们崇尚自由平等，反对异族统治。其活动极端秘密，有复杂的入会仪式和标志、暗语、密码，使用蓝（希望）红（美德）黑（信仰）三色旗。该组织发展迅速，至1814年已遍布南意大利，并向中部和北部扩展。1814年3月，在南部各地连续发动起义，遭到法军镇压。1815年后，拿破仑军队的复员军人和曾为法国服务的文职人员纷纷加入，该运动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半岛。因社会成份复杂、派系众多而政见各异，或倡导共和或主张君主立宪，或赞成联邦制或要求统一。1820年，在那不勒斯发动起义，迫使国王斐迪南一世同意制定宪法并委任自由派组织政府。1821年，按照神圣同盟的决议，奥地利出兵镇压了起义。同时，烧炭党人在撒丁王国举行起义，要求颁布宪法，旋即遭国王军队和奥地利军队镇压。1831年，受1830年法国7月革命鼓舞，在意大利中部举行起义，建立了临时政府，又遭奥军镇压。历次起义几乎都是在军队内密谋活动的产物，脱离广大群众，均告失败。马志尼建立青年意大利党后，烧炭党逐渐退出政治舞台。

(刘北成) 马志尼(Mazzini, 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 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生于热那亚医生家庭。因父母曾与共和民主运动有关，自幼受到熏陶。1827年毕业于热那亚大学法律系，加入烧炭党，提出“思想和行动”的口号。1830年11月，因叛徒告密被捕。1831年初获释，流亡到法国马赛，创建青年意大利党，纲领为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包括全意大利领土的、独立和自由的共和国”，斗争手段定为“宣传和起义”。1832年，创办《青年意大利》杂志。马志尼热烈有力的宣传，风靡全意大利，深得城市爱国青年的拥护。各城市建立起“青年意大利”地下支部，成员从最初的40人发展到五六万人。马志尼从抽象的民族、自由概念出发，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方面的主张，使运动脱离了广大群众，30—40年代，“青年意大利”发动几次起义，均遭失败。该党陷于瓦解状态。1837年，马志尼移居伦敦。1848年革命爆发后，两度赴意大利，受到热烈欢迎，被推选为1849年成立的罗马共和国三执政之一。他推行没收教会财产、废除教会特别法庭等进步改革。应教皇吁请，法国军队入侵干预。马志尼没有发动农民并采取消极防御战略，共和国被颠覆。马志尼返回伦敦，于1850年发起建立“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50年代，指示追随者在意大利各地多次组织小规模起义，均告失败，运动发生分裂，他本人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亦丧失。1860年，加里波的占领那不勒斯后，他曾亲往，建议建立共和国，未被采纳。1869年，前往西西里领导共和党人的起义，途中被捕，两个月后获释。马志尼的影响不限于意大利，他被视为欧洲最杰出的民族主义思想代表。他与第一国际曾发生联系，因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而停止来往。

{ewc MVIMAGE, MVIMAGE, !99900320_0426-1.bmp}

(刘北成)

加里波第

(Jialibodi, GiuseppeGaribaldi1807—1882) 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运动领袖之一，杰出军事家。生于尼斯。少年时随父亲当水手，深受人民爱国主义传统的熏陶，立志解救和振兴意大利。1833年加入“青年意大利”党。12月，受马志尼委托策划起义，事泄，被缺席判处死刑。1836—1848年，流亡南美。其间，组织游击队为巴西的里乌格兰德共和国的独立而战，率领意大利军团为乌拉圭共和国的独立而战。因赫赫战功而声名远播。1848年革命爆发后，返回意大利。招募志愿军参加反奥战争。1849年，指挥罗马共和国保卫战，因其作战方案被否决而遭致失败。随后率领军队北上援助威尼斯。越过亚平宁山隘抵达海岸时，遭奥海军追击而失利。1850年，流亡到纽约。1854年回国。1859年，被撒丁王国授予少将军衔，组织志愿军参加反奥战争。因对加富尔割让威尼斯不满，辞去将军职衔。1860年，组织千人义勇军（又称红衫军）远征西西里，以破竹之势解放整个意大利南部，建立革命政府，就任总执政。他拒绝马志尼宣布南意大利为共和国的主张，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将南意大利并入撒丁王国。意大利基本实现了统一。1862年，加里波第组织志愿军进军罗马，遭政府军袭击而负伤并被囚禁4个月。1866年，参加了收复威尼斯的战争。1870年，应邀到法国同普军作战。他拥护巴黎公社，缺席当选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他热烈支持第一国际，反对马志尼对它的攻击。许多意大利工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加里波第是意大利的民族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意大利游击队以他的名字命名。马克思评价他：“既具有一颗火热的心，又兼有某些只有在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身上才能发现的灵敏的意大利天才。”

(刘北成)

加富尔

(Jiafuer ,CamilloBensoCavour1810—1861) 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温和自由派领袖。生于都灵的贵族家庭。按贵族传统,10岁进入都灵陆军学院学习。1827年毕业后任工兵少尉。他放荡不羁,接触民主共和分子,为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所激动,高呼“共和国万岁”,受到调职处分。1831年,辞去军职,周游法、英等国。1835年归国后发愤经营实业,将大庄园变为近代农场,从事铁路建筑,开办工厂,参与创办都灵银行,应邀参加最高统计委员会,参与创立农业协会,作为实业家和经济问题研究者而闻名遐迩,是贵族资产阶级化的典型代表。1847年,创办《复兴报》,不满奥地利的民族压迫,反对封建正统主义,拥护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提倡自由贸易,但拒绝民主共和主张和革命手段,成为自由派的喉舌。1848年,当选为撒丁王国众议院议员。1850—1852年,任农商贸易大臣和财政大臣,1852年起长期任首相。他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坚持反奥立场,使撒丁王国经济发展迅速,政治声望提高。1854年,派兵参加英、法同盟对俄国的克里木战争,为此赢得法国对撒丁王国反奥政策的支持,由此产生1858年的法、撒秘密反奥军事同盟。1859年,撒、法发动反奥战争,收复伦巴底。根据事先协定,撒丁割让萨伏伊和尼斯给法国,引起国内不满。加富尔一度辞职,到中意大利活动,促成托斯坎那、帕尔马、摩地纳和罗曼等地区并入撒丁。1860年,对加里波第远征西西里,先是加以阻挠,继而转为秘密支持,最终促使南意大利与撒丁王国合并。1861年,出任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但旋即病故。在19世纪中期欧洲民族解放和统一运动中,加富尔代表了既不同于民主共和主义也不同于俾斯麦的强权政治的温和自由主义路线,该路线在意大利获得成功。

(刘北成)

美国近代史

(meiguo jindaishi) 美国从 17 世纪初到 19 世纪末拓殖、建国及发展的历史，也是美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

现今的美国是从北美沿大西洋岸的英属 13 个殖民地发展来的。史学界一般以 1607 年第一个英属殖民地——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为美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以英国人为主的广大移民，在开发新大陆的过程中，逐渐融合而成一个新的美利坚民族。北美社会与经济在一个多世纪里获得长足的进步，虽存在代役租等封建残余及黑人奴隶制，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逐渐居主导地位。包括农业、商业、制造业在内的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从本质上要求挣脱宗主国的桎梏；英国 18 世纪中叶以后从经济上加强掠夺、政治上加强控制、军事上加强挟持的政策，愈益使双方的矛盾尖锐化。于是，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直至武装斗争的独立革命，轰然爆发。华盛顿、杰斐逊等领导北美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英建国斗争。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也是美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它为资本主义的成长扫除了最大的外部障碍。

独立之后，美国通过 1787 年宪法，确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通过 1812—1814 年的第二次反英战争，进一步清除了外来殖民势力残余的羁绊。从 19 世纪 30、40 年代起，工业革命、西进运动，几乎齐头并进，强有力地推动着年轻的合众国的发展。通过侵略战争、和谈购买、驱逐印第安人，美国一步步加速度扩展其领土，从偏居大西洋东岸一隅之地一跃而为横跨美洲大陆的泱泱大国。同时，大力招徕移民，引进外资与技术，兴办教育，广修铁路，发展其民族工业。19 世纪上半叶，两种经济制度即北部的工业资本主义与南部奴隶制的矛盾，经过曲曲折折的妥协、斗争，终成不可调和的炽热化冲突；1861—1865 年的南北战争，是此种冲突的最后解决。在这场战争中，林肯领导美国人民平息了奴隶主的武装叛乱，摧毁了黑人奴隶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最大的内部隐患。经过 1865—1877 年的南部重建，加诸西进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统一的美国国内市场最终形成，资本主义高歌猛进，迄 19 世纪 80 年代末，工业化、农业革命告成。美国由后进变先进再超先进，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1825—1910 年，美国按人口平均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1.6%；同期内，通过自然增殖和移民，美国人口每 27 年即翻一番。单 1877—1892 年，美国工业产量就翻了两番。与此同时，美国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日益完善。选举权范围不断扩大，机会相对均等的文官制取代了政党分赃制，两党制亦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改革社会积弊的进步运动蓬勃兴起。教育、科技、文学、技术及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兴旺，既发展了美利坚民族文化，也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外交政策有了重大变化，由最初对欧洲袖手旁观的“孤立主义”发展为插手其事务的均势外交，由最初对拉丁美洲尚有积极作用的“门罗主义”变换成充当国际警察的“大棒政策”。1898 年的美西战争，是美国问鼎世界强权政治的尝试，也是其由大陆扩张到海外扩张的转折点；同一时期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亦同样是这一转折的表征。美国由此跻入世界强国之列。一般认为，美西战争是美国近代史结束的标志。

(杨玉圣)

五月花公约

(Wuyuehua gongyue) 由创建北美普利茅斯殖民地的 41 名成年男子在登陆前制订的一份协约，因它是 1620 年 11 月 21 日在移民们所乘坐的“五月花”号船上签署的，故名。最初发起人是威廉·布雷福德。其主要内容是：“在上帝面前庄严结盟，同心协力，为较佳秩序与生存建立一个文明政体，……并且要随时制订、拟定和设计那种被公认为适合殖民地全体人民利益的公正法律、条例、法令、法规以及设立治理机构。”签订这一公约的主要目的，是为防止有的人脱离集体、自行其是，或者哗变。它是普利茅斯自治政府的基础，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的滥觞。

(杨玉圣) 大觉醒运动(Dajuexing yundong) 18 世纪 20 至 40 年代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发生的一场宗教革新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是乔纳森·爱德华兹、乔治·怀特菲尔德。其基本主张是，人人皆可通过《圣经》、灵光与上帝相通；每个人都能因善行而得救；否认一切超自然的启示和人为的标准等。它对于冲淡宗教压迫、推进政教分离、传播民主思想等都有积极作用，并为美国独立革命从精神上作了一定的准备。

(杨玉圣)

波士顿茶会

(Boshidun chahui) 美国独立革命前夕发生于波士顿的一次反英倾茶事件。为了抵制英国国会针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条例”，1773年12月16日晚，一批富有正义感的波士顿人化装成印第安人，将停泊在波士顿港的英属东印度公司3艘茶船所载价值18000英镑的茶叶悉数倒入海中。当晚月光清澈，波士顿港外犹如茶海，故时人幽默地称之为“波士顿茶会”。此一义举加剧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业已激化的冲突。

(杨玉圣)

独立宣言

(Duli xuanyan) 美国独立革命期间颁布的重要历史文献。全称是《美洲十三联合邦的一致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等起草,大陆会议于1776年7月4日予以通过。为了表示纪念,7月4日被规定为美国的独立节。它阐明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确保这些权利,人民才建立政府,其权力是由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出来的。当任何形式的政体妨碍了此种目的时,人民就有权利去改变它或废除它;人民有权利建立新政府,它须建立在最能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的原则之上,其政权组织形式亦得以此为依据。”它宣布:“这些联合的殖民地从此成为、按照正义也应当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独立宣言》是英属北美13殖民地脱离英国而政治上独立的标志,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曾称它是“第一个人权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0页)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428-1.bmp}

(杨玉圣)

邦联条例

(Bangliantiaoli) 即《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由约翰·迪金森起草，大陆会议于 1777 年 11 月 15 日通过。经 13 州先后批准，1781 年 3 月 1 日生效。它规定：国家名称为“美利坚合众国”；各州保留其“主权、自由与独立”，“为共同防御、自由的保障和相互的公共福利”而加入这个“彼此友好的巩固同盟”；设立由各州代表组成的邦联国会；等等。在《邦联条例》之下的邦联制，较之有邦无国的状况是一个进步，但仍是极松散、脆弱的联合体。1789 年《美国宪法》生效后，《邦联条例》即告终止。

(杨玉圣)

美国宪法

(Meiguoxiaofa)即1787年宪法,亦称联邦宪法。它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1787年5月至9月,“以修改《邦联条例》为唯一的和明确的目的”、“使全国体制足以应付政府的紧急事务和保全联邦”为名义,除罗德艾兰之外的当时美国12个州的55名代表会聚费城,由乔治·华盛顿任会议主席,经多方讨论、协商和妥协,制订出一部新宪法,即1787年宪法。其主要起草者是詹姆斯·麦迪逊。新宪法交付各州批准时,引起公开的激烈争论,经过一年多的斗争与妥协,除罗德艾兰外的各州先后予以批准。以它为基础,美国联邦政府于1789年诞生。美国宪法是一部政府组织法。它言简意赅,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首次明确了人民主权思想和共和制政体;创立联邦制,即建立一个拥有某些重大独立主权的、中央与各州取得有机权力平衡的政府;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与相互制约的原则,设立政府机构;首创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行政首脑制,即联邦制。美国宪法开近代成文制宪之先河,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石,并对其他国家影响至深。有的历史学家说,它是美国最经得起检验的出口品——世界上先后大约有160部国家宪法是以美国宪法为蓝本而制订的。美国宪法本文从未修改,但不时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以适应新情况,迄今美国宪法修正案已有26条。

(杨玉圣)

西进运动

(Xijinyundong) 美国 18 世纪末迄 19 世纪末不断由东向西自由移民、领土扩展和开发大西部的群众性运动，也是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它兴起于 18 世纪 80 年代美国独立之后，19 世纪中叶时进入高潮。移民们先是开拓“旧西部”即阿巴拉契亚山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区，旋即越过密西西比河，开发大草原、落基山脉及其以西的地区。随着西进的开展，农业、畜牧业、商业、矿业、制造业在西部蓬勃兴起和发展。当时人称，“整个西部象磨菇般成长着”。1890 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宣布：“现在未开发的土地大多已被各个各自为政的定居者所占居，故不能说有边疆地带了。”这通常被认为是西进运动结束的时间标志。西进运动是与印第安人遭受的深重灾难和屈辱分不开的，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它对近代美国经济的发展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影响，实际上是美国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的历史运动。

(杨玉圣)

门罗主义

(Menluo zhuyi) 美国早期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出自 1823 年 12 月 2 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阐述的一系列外交政策，故名。它的主要历史背景是 19 世纪 20 年代美洲独立战争及神圣同盟干涉的危险、美英矛盾和美俄矛盾。其主要内容是：“今后任何欧洲强国不得把美洲大陆上已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美洲必须归美洲管理”；神圣同盟“将其政治制度延伸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任何欧洲对新独立的拉丁美洲予以干涉，“以压制它们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控制他们的命运，我们只能看作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示”。它在 19 世纪上半叶曾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侵略扩张的借口。

(杨玉圣)

美墨战争

(Mei mozhanzheng) 1846—1848 年间美国对墨西哥进行的一次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它是因美国兼并得克萨斯而引起的。1846 年 5 月 13 日，美正式宣战；6 月，墨西哥亦对美正式宣战。美国海、陆军分三路，入侵墨西哥，1847 年 9 月，攻占墨西哥城。1848 年 2 月 2 日，双方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格条约”，战争结束。美国劫掠了 190 多万平方英里土地，几乎是墨西哥的半壁江山；作为报偿，美国付给墨西哥 1500 万美元。这场战争对美国的发展影响至大。

(杨玉圣)

解放宣言

(Jiefang xuanyan) 即《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总统颁布的一项重要法令。1862年9月22日，林肯在内阁会议上宣读了经过多次修改的《宣言》草稿；9月24日，予以公布。它郑重宣布：“从公元1863年1月1日起，凡在当地居民那时尚在反叛合众国的任何一州之内或一州的指明地区之内作为奴隶被占有的人，都应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行政部门，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并保障这些人的自由，当这些人或他们中的任何人可能为自己的实际自由而作任何努力时，不采取压制他们的行动。”1863年1月1日，林肯颁布正式的《解放宣言》。这是投向叛乱者的致命的道义上的炸弹，对埋葬奴隶制、夺取战争的胜利都有重大影响。马克思认为，它是“在联邦成立以来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86页）。

（杨玉圣）

宅地法

(Zhaidifa) 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颁布和实施的一项重要法案。1862年2月18日，由众议院以107票赞成、16票反对而通过；5月6日，参议院以33票赞成、7票反对予以通过。是年5月20日，林肯总统予以签署。它规定：凡一家之长，或已达21岁，并为合众国公民，或决定按照合众国入籍法之规定申请、愿意成为合众国公民，同时从未持械反对合众国政府或支援、帮助合众国政府的敌人者，自1863年1月1日起，有权登记160英亩或160英亩以下尚未分配的国有土地；耕种5年以上，即归己所有；登记时，须纳10美元手续费。它对激发广大群众参战热情、促进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有很大作用。

(杨玉圣)

美国两党制

(meiguo liangdangzhi) 美国资产阶级两大政党有组织地、依照美国联邦宪法、轮流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关于其缘起和确立的时间，众说不一。一般认为，美国两党制形成于 19 世纪 40 年代。它的产生是与美国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分不开的。它的不断演变则是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目前的民主党成立于 1828 年，现在的共和党成立于 1854 年。内战以前，双方在奴隶制等问题上尖锐对立。南部重建后，民主党与共和党长期共存，轮流执政。其党籍无足轻重，其党纪若有若无，其党纲大同小异。两党既合作又斗争。19 世纪末以后民主党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性质转换，是对传统的美国两党制的重大刷新。两党制对协调美国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维系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运作有重大作用。当然，其实质仍是美国资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工具。

(杨玉圣)

杰斐逊

(Jiefeixun,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美国独立革命主要领袖之一、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生于弗吉尼亚阿尔贝玛尔县的夏洛茨威尔。毕业于威廉—玛丽学院。当过律师，曾为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议员、县治安法官、土地测量员。在北美人民的反英浪潮中，他逐渐形成反英、独立的民主革命思想。1775年，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参与起草《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宣言》。翌年6月，被选入《独立宣言》5人起草委员会，系《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阐述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原则。1776年10月重返弗吉尼亚州议会，翌年起草“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并为促进弗吉尼亚社会的民主改造作出很大贡献。1779—1781年，任弗吉尼亚州州长。1783年，被选为邦联国会议员，曾起草《1784年土地法令》。1786—1789年，任美驻法公使。1792年，与麦迪逊创建民主共和党。他是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任国务卿(1790—1793)、第二任美国副总统(1797—1800)。180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蝉联两届。任内购买路易斯安那(1803)，对外持中立外交政策，其政治思想富有民主性，主张天赋人权、人民主权及人民革命权利，主张使美国发展成为一个以农立国、以小农为主体的、充满人情味的农业共和国。他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奠基者。杰斐逊于1800年曾说：“我已经在上帝圣坛前发过誓，永远反对笼罩着人类心灵的任何形式的暴政。”他还热爱科学，重视教育，博学多才。曾创办弗吉尼亚大学，任校长；曾任美洲哲学会副会长、会长。1826年7月4日，即美国独立50周年纪念日，因患慢性腹泻病逝于蒙蒂塞洛。著有《英属美洲权利综论》、《弗吉尼亚札记》等。

(杨玉圣)

富兰克林

(Fulankelin,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美国独立革命主要领袖之一、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生于马萨诸塞的波士顿。家境贫寒，少时失学，靠勤奋自学成才。读书是他唯一的乐趣，“时间比金钱更宝贵”是他的座右铭。当过学徒、印刷工。他第一个发现金属尖端放电现象，进行了科学史上有名的费城电风筝试验，发明、安装了世界上第一个避雷针；发明了新式的“富兰克林火炉”；研制了第一个具有伸缩性的导尿管；试验了物体传热灵敏度。他对经济学也有贡献，马克思认为他“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表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5页）。1730年，创办《宾夕法尼亚报》（今《星期六晚邮报》）；系北美第一家图书馆——费城图书馆的创建者、美洲哲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议会秘书（1736—1751）、宾夕法尼亚邮政局长（1737—1753）。1758—1762年、1765—1775年为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等殖民地驻英国伦敦代表。1751年，协助创办宾夕法尼亚大学。1754年，出席新罕布什尔等6个殖民地在阿尔巴尼召开的代表会议，提出了阿尔巴尼联盟计划。为了说明联合的必要性，富兰克林曾在—篇论文中配了一幅有名的漫画——一条被砍成数段的蛇，每一段代表一个殖民地，蛇下面写着警句：“联合或者死亡！”1775年，出席费城第二届大陆会议，为《独立宣言》5人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大陆会议外交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起草《宾夕法尼亚州宪法》。1776年，他赴法争取国际援助，显示出卓越的外交才能，获得极大成功，为独立战争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783年，参与对英和谈以及美英“巴黎和约”的签订。1785年返美，旋即连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3年。1787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对美国宪法的制订及其批准，亦作出特殊贡献。曾4次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理事。1790年4月17日，因患肌膜炎，在费城逝世。富兰克林被认为是18世纪美国名列华盛顿之后最著名的人物。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称颂说，“他从天上夺下了雷电，从暴君手里夺下权杖。”德国哲学家康德则赞誉他是“第二个普罗米修斯”。著有《穷理查历书》、《自传》等。

（杨玉圣）

华盛顿

(Huashengdun, 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 美国独立革命主要领袖之一、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生于弗吉尼亚威斯特摩兰县的波普斯克里斯(今威克菲尔德)。幼年丧父。未受系统的正规教育。年轻时当过土地测量员助手、土地测量员以及费尔法克斯治安法官。参加过几次英国人对法国人的战争,升至上校。后成为当地殷富的大种植园主。1755年,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殖民地民兵司令;1758年,被选入该殖民地议会。面对英国政府的高压政策,逐渐形成争取独立的思想。1774年,他在弗吉尼亚议会发表演说称,“我要自己出钱招募1000名战士,并亲自率领他们支援波士顿。”9月,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支持抵制英货,并主张不惜以武力抵抗作为最后手段。翌年5月,出席第二届大陆会议;6月,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1776年初,他迫使英军退出波士顿;12月,出奇制胜,取得特伦顿、普林斯顿之捷;与士兵一起,同甘共苦,度过1777—1778年艰难的“福治谷之冬”;1781年夺取约克敦之战的全胜。身为独立战争的最高军事将领,华盛顿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身处逆境,依然坚忍不拔。他领导北美人民,奋力抗争,克服种种困难与挫折,终于赢得了反英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1783年12月,解甲归田,但仍关心国家的命运。1787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为大会主席,对美国宪法的制订贡献良多。他反对君主制,赞成共和制。1789年,当选为美国开国总统,连任两届,内政外交皆多建树,奠定了联邦政府未来发展的基础。1796年9月发表《告别词》。翌年任满后,息影政坛,开美国总统不连任三届之先例。1799年12月14日晚,因患喉炎病逝于维农山庄。亨利·李称他是“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第一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人”。1976年,为表彰华盛顿的军事才能,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一项法案,将他提升为六星上将,以使其居于比其他任何美国将军都高的独一无二地位。华盛顿在美国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被誉为美国的“国父”。

(杨玉圣)

潘恩

(Panen, Thomas Paine 1737—1809) 美国独立革命时期政治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生于英国诺福克郡的萨福德。家境贫寒，少时辍学。当过裁缝、教师、店员、税务官。1774 年移居北美，任《宾夕法尼亚杂志》编辑。是年底，发表题为《美洲的非洲奴隶问题》的文章，谴责黑人奴隶制。翌年参加反奴隶制协会。独立战争爆发后，积极投身反英斗争。1776 年 1 月出版《常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清新、明快的笔调，对英国封建专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讨伐，公开、明确地主张独立。该书数月之内即畅销 50 万册，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是年底，潘恩参加大陆军。1777 年 4 月至 1779 年 1 月，曾任大陆会议外交委员会秘书。1779 年 12 月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秘书。1781 年 2 月至 8 日，曾随约翰·劳伦斯赴法谋求援助。美国独立后，他仍然一贫如洗。1787 年离美返欧，积极宣传反封建思想。曾参加法国大革命，1792 年 8 月获法国公民权资格，9 月当选为国民公会议员，10 月当选为九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雅各宾派执政时，曾被捕入狱。他还参加过英国的激进工人运动。潘恩说，“世界就是我的祖国”；“没有自由的土地，都是我的故乡”。1802 年返美，在贫困潦倒中孤度残年。1809 年 6 月 8 日，在纽约病逝。他被称为“自由的使者”、“两个大陆的英雄”、“英国的伏尔泰”，著有《村中居民的信札》、《人权论》、《理性时代》等。

(杨玉圣)

麦迪逊

(Maidixun, James Madison 1751—1836) 美国建国初期资产阶级政治家、美利坚合众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生于弗吉尼亚的康韦港。毕业于新泽西学院。独立战争爆发后,积极投身反英革命。1776年被选入弗吉尼亚州议会,曾负责起草该州新宪法,并与其他人一起促使州议会通过关于“独立”的决议案。1780—1783年,为大陆会议代表。1784年被选为弗吉尼亚州议员。1786年,出席安纳波利斯会议,并倡议召开修改《邦联条例》的代表会议。1787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系大会灵魂之一。他提出的“弗吉尼亚方案”,是制宪的重要依据,他因此成为《美国宪法》主要起草者之一。为了争取新宪法被各州批准,他与汉密尔顿等著文作了强有力的辩护,后被结集出版,即《联邦党人文集》。1789—1796年,为美国众议院议员,起草和推动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的通过。麦迪逊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1801—1809年任美国国务卿。1809年就任美国总统,蝉联两届。在1812—1814年美英战争中,他任总指挥。后任弗吉尼亚大学校长。1792年时,还曾同杰斐逊一起创建民主共和党。麦迪逊坚决反对19世纪30年代南方的州权主义,他说,“我发自肺腑的忠告和我心灵深处的信念,就是要珍惜和维护美利坚合众国,使其永存。”1836年6月28日,病逝于弗吉尼亚奥兰治县的蒙特彼埃庄园。

(杨玉圣)

汉密尔顿

(Hanmiedun, 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 美国建国初期资产阶级政治家、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1789—1795)。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少年丧母,遭遇坎坷。1772年赴北美,先后在一所私立中学和王家学院求学。他聪慧过人,才华横溢。1774年7月,他作了一次反对英国统治的公开演讲,此后一年之内,即写了《论魁北克法案》等3本反英,爱国的小册子。旋即投身革命,参加过1776年8月的长岛之役、10月的白平原之役和1781年10月的约克敦之役等,机智勇敢,有“幼狮”之称。1776年3月先是任炮兵上尉,翌年初升为陆军中校,担任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参谋部副官4年。1780年结婚,并因此跻身上层社会。1782—1783年为邦联国会代表。当过律师。1786年被选入纽约州议会;同年,参加安纳波利斯会议,并负责起草会议报告。1787年,出席费城制宪会议,为大会中心人物之一,对促使纽约州批准新宪法起过重大作用。1787年10月至1788年5月,他与麦迪逊等以“普布利厄斯”为笔名,连续发表一系列论文,论证、阐释和维护新宪法与联邦政府,对各州批准美国宪法有很大影响。此即有名的《联邦论》。汉密尔顿逐渐成为联邦党人的主要领袖。1789年9月11日,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1795年初辞职。1790年至1791年间,先后提出关于国债问题、征收消费税、建议创办国家银行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等4个有关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与经济的报告,实则是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蓝图。因与杰斐逊派不合,当时未得很好贯彻。由于美法关系紧张,1798年7月至1800年6月,他被约翰·亚当斯总统任命为督察将军,这是仅次于华盛顿享有的荣誉。在1801年选举总统时,他不计恩怨,支持杰斐逊当选,并因此死于非命。1804年7月12日,因决斗受致命伤而在纽约去世。

(杨玉圣)

杰克逊

(Jiekexun, Andrew Jackson 1767—1845)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美利坚合众国第七任总统 (1829—1837)。生于南卡罗来纳的瓦克斯霍豪。幼时父母双亡，未受正规教育。但据他自己说：9岁时，他曾给一群不识字的边疆居民诵读过新收到的《独立宣言》。独立战争爆发后，他投身革命，参加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1781年被俘，因拒绝给一个英国军官擦皮靴，脸上挨了一军刀，当时年仅13岁。独立战争后，他浪迹西部，当过律师、北卡罗来纳州纳什维尔检察官、田纳西州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1798—1804)，1802年起任田纳西州民兵司令。曾当选为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1813年11月至1814年3月，率民兵征讨克里克族印第安人，被晋升为陆军少将。1815年1月，他率军在新奥尔良大败英军，遂饮誉全国。1827年就任美国总统。在两届总统任期内，杰克逊改革积弊成习的官僚制度，推行“轮流担任公职制”；大幅度地扩大总统权力；制止南部分裂危机，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果断进行“反银行斗争”，置第二合众国银行这只“九头怪物”于死地。他处事果断，政绩卓著，历史学家称他执政时期的美国为“杰克逊时代”、“杰克逊民主”。1845年6月8日，因患肺结核在赫米蒂奇去世。

(杨玉圣)

约翰·布朗

(Yuehan bulang, John Brown 1800—1859)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废奴运动活动家、哈普渡起义的领导者。生于康涅狄格州的托林顿镇。家境清贫，未受正规教育。当过土地测量员、木材商、羊毛商、邮递员等。为人耿爽，富有正义感。极其同情黑人奴隶的悲惨境遇，视奴隶制为“罪恶的渊藪”。参加过帮助黑奴逃跑的“地下铁道”。1851 年，成立反抗“逃亡奴隶法”的武装组织——“美国基列人同盟”。1856 年，带领子女参加“堪萨斯内战”，率先武装抵抗和反击奴隶主势力的进攻。1857 年，他开始筹划以解放黑人奴隶为目标的武装起义。1858 年 5 月，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举行起义。1859 年 10 月 16 日夜，约翰·布朗率领包括 3 个儿子、6 个黑人在内的总数为 22 人的小队伍，在弗吉尼亚州杰斐逊县(今属西弗吉尼亚州)位于波托马克河与谢南多亚河文汇处的小镇——哈普渡起义，遭到镇压，寡不敌众，起义者或死或伤，约翰·布朗本人被俘。于是年 12 月 2 日被处死。他在临刑前说：“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这个罪恶的国度的罪恶，只有用鲜血才能涤净。我曾以为，不用流很多的血即可做到这点，现在，我认为这是徒劳无益的。”布朗起义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成了美国内战的先声。

(杨玉圣)

林肯

(Lincoln, Abraham Lincoln 1809—1865) 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1861—1865)。生于肯塔基州哈丁县一个普通的拓荒者家庭。家境清寒，几乎未受过正规教育，其博学多闻是靠顽强自学“一点一点捡来的”。早年干过帮工、店员、土地测量员、邮递员、律师。他谦逊正直，平易近人，被人们称为“诚实的亚伯”。1832年竞选伊利诺伊州议员，未成功，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参与政治；1834—1840年，四度当选该州议会议员。1847—1849年为美国众议院议员，曾提出逐步、有补偿地解放哥伦比亚特区奴隶的议案。其基本主张是限制奴隶制扩张，稳健地解决因它而引致的各种问题。1856年，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但落选。1860年1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林肯就职前后，实行奴隶制的南卡罗来纳等州悍然分裂联邦，并首先挑起内战。在国家危难之时，林肯力挽狂澜，克服内政、外交上的艰难险阻，先后在1862年颁布《宅地法》、《解放宣言》等重要法令，1863年11月在葛提斯堡演说中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思想，终于领导美国人民赢得平息叛乱的完全胜利，并促使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于1865年1月在国会以2/3的多数通过，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彻底根除了黑人奴隶制度。奴隶出身的黑人政治家弗·道格拉斯说，“在我与林肯先生的历次会见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没有丝毫蔑视有色人种的偏见。”当美国人民沉浸于胜利之际，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翌日晨去世。马克思赞扬林肯：“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位英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08、109页）。

（杨玉圣）

西奥多·罗斯福

(Xi 'aoduo Luosifu, 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 即老罗斯福。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美利坚合众国第 26 任总统(1901—1909)。生于纽约市。家境殷富,少时体弱多病,但自信好强,练就一副强健体魄。1880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翌年当选为纽约州议会议员,连任 3 届,少年得志,论评时弊,有“改革者”之誉。后任美国文官委员会委员、纽约市警察局长、海军部助理部长。1898 年,曾组织、率领一支义勇骑兵团参加美西战争。同年,当选为纽约州州长。1900 年,当选为美国副总统。因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42 岁的西奥多·罗斯福遂于 1901 年 9 月继任其职,后连选连任。他推行“反托拉斯战”、保护自然资源等社会经济改革,系 20 世纪美国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之先声。他自己认为,认真执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是他在内政方面的最大成就。政治上,承认自己“确实大大地扩充了行政权力的使用范围”。外交方面,对拉丁美洲奉行“说话柔和、但手握大棒”的“大棒政策”,“发挥国际警察作用”;对欧洲奉行抑德、扶法、联英的均势外交,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对小国粗鲁无礼,但对大国却谨慎从事。1906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10 年提出新的资产阶级政策纲领——“新国家主义”。1912 年,组建主要由共和党改革派构成的进步党,参加总统竞选,未果。后游历非洲、南美,从事狩猎和探险考察活动。1919 年 1 月 6 日,因患风湿病在纽约去世。著有《1812 年的海战》、《托马斯·哈特·本顿》、《征服西部》等。

(杨玉圣)

威尔逊

(Weierxun, Woodrow Wilson 1856—1924)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美利坚合众国第 28 任总统(1913—1921)。生于弗吉尼亚州的斯汤敦县。自幼接受严格的学校教育,先后就学于北卡罗来纳州戴维森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共受了 13 年高等教育。1885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州布林·玛尔女子学院、康涅狄格州韦斯莱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1902 年 10 月至 1910 年 9 月,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倡导导师制等教育改革。1910 年 11 月当选新泽西州州长,推行教育、选举、市政等一系列改革,有“进步派政治家”之称。1912 年 11 月竞选美国总统成功,蝉联两届。任总统期间,他对内推行“新自由”改革,涉及降低关税率、确立联邦储备体系、制订反托拉斯立法以及颁布工人罢工合法、铁路工人 8 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童工等法案。对外政策上,因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狼烟四起,威尔逊先是宣布美国“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做到中立”,继而不失时机地、有步骤地将孤立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美国拖入战争。1917 年 1 月 22 日,曾提出“没有胜利的和平”的议和原则。4 月 2 日,要求国会对德宣战;6 日,签署宣战书。1918 年 1 月 8 日,提出“世界和平纲领”,即“十四点”。其主要内容是公开外交、公海自由、建立国际联盟等。1918 年 12 月至 1919 年 6 月,亲率美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因国联计划招致反对,威尔逊从 1919 年 9 月 4 日起,不顾体弱多病,开始在全国巡回演说,以谋求支持,25 日病倒;10 月 2 日,返回白宫后,因精疲力竭,抑郁之至,患中风而半身不遂。1920 年 12 月接受 1919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1924 年 2 月 3 日,因患心脏病而在华盛顿去世。著有《国会政体》、《美国人民史》等。

(杨玉圣)

拉丁美洲近代史

(ladingmeizhou jindaishi) 15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拉丁美洲由殖民地到独立国、由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

拉丁美洲近代史的开端，可以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为标志。这之前，印第安人世代居住于此；这之后，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先后侵入，摧毁了玛雅人、印加人和阿斯特克人的古印第安文明，葡萄牙占领了巴西，西班牙占领了除巴西之外的中、南美洲大陆及西印度群岛。美洲的被发现与被征服，是拉丁美洲历史巨变的起点，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亦有极深刻的影响。

在漫漫三个世纪的殖民地时期，西、葡基本上推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农业、制造业并未获得明显的发展，广大的殖民地亦未能被进一步开发。拉丁美洲主要是变成了宗主国的金、银等贵金属产地。据不完全估计，在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从美洲掠夺了大约 250 万公斤黄金和 1 亿公斤的白银。葡萄牙从巴西运走了至少价值 6 亿美元的黄金和 3 亿美元的金刚石。印第安人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与牺牲。为了加强控制，西班牙还实行贸易垄断体制，18 世纪后期始有松动。从 18 世纪中叶起，拉丁美洲殖民地经济开始有较大起色，资本主义因素萌生，在有的地区甚至获得初步发展，对外贸易联系亦较以往有所加强。迄 1800 年，西属美洲殖民地人口约 1400 万。然而，在殖民统治与封建专制藩篱的抑制之下，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同，亦很不平衡。

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占领西班牙、葡萄牙和这两国发生革命导致宗主国本身发生统治危机，成为刺激拉丁美洲殖民地几乎同时爆发独立战争的极重要的动因。杜桑领导的海地革命是这一革命风暴的先声。1810—1826 年，玻利瓦尔、圣马丁等领导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几经曲折，凡十数载，赢得彻底胜利。与此同时，巴西亦通过相对和平的途径，于 1822 年完全从政治上脱离葡萄牙而告独立。上述革命与战争使美洲的殖民统治体系基本上土崩瓦解，大体上奠定了近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格局。

独立以后，拉丁美洲仍保留了相当多的封建因素，大地产制盘根错节，英、法等以经济渗透为手段，使拉丁美洲沦为自己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美国趁毗邻之便，以强凌弱，除以武力劫掠墨西哥的半壁江山，还用泛美主义、美洲国家组织从政治上控制拉丁美洲，使后者成为自己的后院。1898 年，美国又趁火打劫，把古巴变成自己的实际殖民地，使加勒比海成为自己的内湖。总之，殖民主义象魔鬼一般附着于拉丁美洲，使其经济单一化，始终处于不发达的依附状态。当然，也不排除拉丁美洲的民族资本主义仍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除巴西采用帝制外，近代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后名义上实行共和制，但实际上却是程度不同地实行军人独裁专制的政治统治形式，即“考迪罗主义”，结果政变成风，动荡频仍，严重阻碍了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反帝、反封建，争民主和法治，是拉丁美洲各国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胡亚雷斯领导的墨西哥“革新运动”和“第二次独立战争”，何塞·马蒂等领导的古巴独立战争，1910 年—1917 年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皆为拉丁美洲近代史上的光辉篇章。

(杨玉圣)

米达制

（midazhi）西属美洲殖民地时期主要存在于秘鲁地区的一种强迫徭役制。在印第安人的岐楚阿语中，“米达”是“轮换”的意思。米达制源自秘鲁的前印加时代，指当时印第安人盛行的一种公社成员按一定比例、定期轮换、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的一种义务劳动制。它贯穿于印加帝国形成、发展过程，曾起过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西班牙征服秘鲁后，殖民者盗用印加时代“米达制”轮换劳动的形式，使其注入奴隶制强迫劳动的因素，遂成为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印第安人中强制推行的徭役制度，实则是隐藏在轮换劳动形式之下的普遍奴隶制，具有极其残酷的特征。该制度实行 300 年之久，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深重灾难，是束缚秘鲁社会发展的桎梏。1821 年 7 月 28 日被废除。

（杨玉圣）

阿亚库巧战役

(Ayakuqiao zhanyi, Battle of Ayacucho) 19 世纪初西属美洲独立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1824 年 12 月 9 日，苏克雷率领的 5780 名大哥伦比亚—秘鲁联军，与西班牙主力部队(约 9310 人)在秘鲁南部的阿亚库巧遭遇，双方激战 2 个小时，结果后者一败涂地。1000 多人死伤、4 名元帅、10 名将军、200 多名军官和 2000 多名士兵被俘，连秘鲁总督兼总指挥拉塞尔纳亦被生俘。此次战役决定了西班牙 300 年殖民统治在美洲最终覆灭的命运，它是“最终保证了西属南美洲独立的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172 页)。

(杨玉圣)

考迪罗主义

(Kaodiluo zhuyi) 拉丁美洲近代史上一种反动独裁者的政治统治方式。考迪罗，原文是 Caudillo，系首领或领袖之意。原指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作战的普拉塔地区的首领，后引申泛指拉丁美洲军事独裁者，即以暴力攫取政权并用暴力维持其统治的独裁军人；有时亦指掌握军事力量的独裁政客和向追随者宣扬个人崇拜观念的政党领袖。考迪罗主义几乎在独立之后的拉丁美洲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对社会发展危害极深。

(杨玉圣)

墨西哥 1917 年宪法

(Moxige yijiuyiqinian xianfa) 1917 年墨西哥颁布的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它是 1910—1917 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成果。它宣布，国家是土地、河流、矿藏的根本所有者；有权收回外国垄断组织占有的土地、矿山和油田；规定了实行土地改革的原则与具体步骤，即“为了公平分配公共财富”，应“分割大地产，发展小土地所有制”；确认包括农业工人在内的工人劳动保护权以及组织工会、举行罢工的权利，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尚属首次明确规定。它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是迄那时为止世界上最富有民主色彩的一部资产阶级国家宪法。

(杨玉圣)

杜桑

(Dusang, Toussaint L'ouverture 1743—1803)原名弗朗索瓦·多米尼克。1791—1804年海地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生于海地北部布雷达种植园的一个黑人奴隶家庭。自幼饱尝辛酸，胸怀大志。自学法语、拉丁语，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影响很深。海地革命爆发后，杜桑于1791年10月率奴隶起义，提出“为自由而斗争”的口号，组建队伍，加以严格训练，以卓越才能领导海地人民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并成功地赶走了西班牙、英国的殖民势力。1800年，统一海地。翌年，统一了整个海地岛。1801年6月，颁布海地第一部宪法，规定：由杜桑任终身总督；永远废除奴隶制；居民不分肤色，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拿破仑派大军远征海地，杜桑坚决抗争，坚壁清野，掌握了主动权。1802年6月7日，被法国人诱捕。因遭严刑迫害，1803年4月27日病逝。杜桑领导的海地革命揭开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序幕，敲响了奴隶制度、殖民制度在拉丁美洲崩溃的第一声丧钟。

(杨玉圣)

伊达尔哥

(Yidaerge, Miguel Hidalgo Costilla 1753— 1811) 19 世纪初墨西哥独立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生于墨西哥的巴利阿多里德城。毕业于圣·尼古拉斯神学院，先后获文学硕士、神学硕士学位。曾执教于该校，任教授、院长。1791 年后作神甫，传播启蒙学说，谴责君主制，主张共和制，并逐渐形成争取独立的思想。1810 年 9 月 16 日晨，他发动所在多洛雷斯教区的群众起义，即“多洛雷斯呼声”，旋被推举为“美洲大元帅”，领导武装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并组建政权机构，创办《美洲觉醒者报》，制订革命法令和措施，功勋卓著。1811 年 1 月，在败退突围途中因叛徒出卖而被俘。同年 7 月 31 日就义。伊达尔哥是墨西哥最早明确提出独立、并以武装斗争争取独立的先驱者，被誉为“墨西哥独立之父”。

(杨玉圣)

圣马丁

(Shengmading, José de San Martín 1778—1850) 19 世纪初西属美洲独立战争主要领导人之一，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生于阿根廷的亚佩尤。少时曾在西班牙求学。1789—1811 年，服役于西班牙军队，升至中校。曾加入以解放美洲为宗旨的“劳塔罗社”，逐渐形成其争取独立的革命思想。1812 年，返抵美洲，组织“劳塔罗互济会”。1813 年，被任命为阿根廷北方军司令。为了实施其解放南美大陆的宏伟计划，1814 年，圣马丁改任库约省行政长官，亲自组织、训练“安第斯山军”，被任命为总司令。1817 年，他指挥这支军队，翻越安第斯山，出奇制胜，解放智利。1820 年，率军从海上攻入秘鲁；翌年，解放利马，被推举为“护国公”。为了推进独立大业，1822 年 7 月，与玻利瓦尔在瓜亚基尔举行秘密会晤。其后辞去“护国公”，同年 9 月，悄然隐退，后寄居法国。他为南美洲的独立和解放，艰苦奋斗 10 载，功绩昭彰。1850 年 8 月 17 日，病逝于法国的布洛涅城。他被称为南美洲“安第斯山的骑士”、阿根廷“国父”。

(杨玉圣)

玻利瓦尔

(Boliwaer, Simón Bolívar 1783—1830) 19 世纪初西属美洲独立战争主要领导人，资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3 岁丧父，9 岁丧母，由亲属扶养成人，性情倔强。曾在西班牙求学，后游历法国等地，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矢志以解放美洲为己任。1810—1826 年，他领导委内瑞拉等地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武装斗争十几载，数度受挫，但从未被失败吓倒过。他指挥的军队所解放的国土十倍于西班牙，比西、德、英、法、意加在一起还大一倍半。他是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拿马的奠基者，是当时把独立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并为民主立国和振兴拉丁美洲拟定大政方针的唯一领袖。他还提出了美洲联合的主张，反对任何形式的君主政体，赞成共和制度。曾任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总统、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1830 年 12 月 17 日，因患肺结核逝世。玻利瓦尔被称为拉丁美洲的“解放者”、委内瑞拉“祖国之父”。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国都把他看作是世界上最先主张并实施国际真诚合作的政治家。

(杨玉圣)

马蒂

(Madi, José Martí 1853—1895) 19 世纪下半叶古巴独立战争主要领导人、思想家、诗人。生于古巴的哈瓦那市。自幼聪慧好学，立志“为一切被奴役的人雪耻”。1868 年，古巴发生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马蒂以笔为枪，号召人们：“捍卫祖国，英勇顽强；死得其所，芳名万世传扬。”翌年被捕。1871 年放逐到西班牙。他就学于萨拉戈萨大学，获博士学位。1878 年，辗转返回祖国，鼓励同胞们“为自由而战”。翌年，因参加反殖民统治再次被放逐，后流亡美国，任《美洲杂志》主编，宣传古巴革命。1892 年，组建古巴革命党，创办《祖国》报。1895 年初，率爱国志士返回古巴，领导反抗西班牙的革命；5 月 19 日，在一次战斗中中弹牺牲。他的著作后被人辑成《马蒂全集》(73 卷)出版。马蒂集诗人、战士、革命家于一身，文武兼备，革命一生，矢志不移，被认为是古巴最负盛名的民族英雄。

(杨玉圣)

胡亚雷斯

(Huyaleisi, Benito Pablo Juárez 1806—1872) 又译华雷斯。墨西哥总统(1858—1872)、政治家、民族英雄。生于墨西哥瓦哈卡城附近的圣巴勃罗格拉陶村一个普通的印第安人农民家庭。3岁时父母双亡。少时作过家庭仆役、装钉工、学徒。1829年考入瓦哈卡科学和艺术学院。后为律师。历任瓦哈卡州议会议员、瓦哈卡州州长、司法部长、内政部长、临时总统，四度当选总统。他领导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墨西哥“革新运动”，推翻独裁政权，先后颁布《胡亚雷斯法》、《墨西哥社会改革宣言》(即《改革法》)，推行自由主义改革；1861—1867年，领导墨西哥人民取得抗法卫国的“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胜利。法国作家雨果称胡亚雷斯是“使自由复活”的英雄。1872年7月28日，因患心脏病在首都墨西哥城猝然去世。

(杨玉圣)

迪亚斯

(Diyasi , José de La Cruz Profirio Diaz , 1830—1915) 墨西哥总统 (1876—1880、1884—1911)、独裁者。生于墨西哥奥阿哈卡省。务过农、当过兵，后任州长、参议员。曾支持胡亚雷斯改革，1861—1867年参加反抗法国入侵的战争。1867年、1871年，两度竞选总统，未果。1876年11月以政变方式攫取总统职位。第一任期内，尚小心处事，亦搞些民主。1884年再任总统后，逐渐推行高压政策，所谓“面包或者棍棒”；违背其“不许连选连任”的主张，一再抓住总统宝座不放；同时，恢复教会特权；对外依附英、美。民怨沸腾，不堪其苦。1910年，墨西哥发生革命，迪亚斯被迫在1911年5月流亡法国。1915年7月2日死于巴黎。

(杨玉圣)

亚洲近代史

(yazhou jindaishi) 亚洲不断遭受西方列强殖民掠夺和瓜分的历史，也是亚洲人民不断反抗殖民侵略的历史。

亚洲是块古老和文明的土地。欧洲资本主义时代来临之时，亚洲一些主要地区仍是世界较先进的地区。当时，亚洲有四大帝国：中国明、清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波斯萨菲王朝和卡扎尔王朝，印度莫卧尔王朝。明代中国的财富和大于欧洲人口总和的一亿人口，令欧洲望尘莫及。直到 18 世纪，中国和土耳其还是许多欧洲人羡慕和尊敬的榜样，这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有反映。但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深蒂固和农业文明的封闭性等种种原因，亚洲逐渐落后于欧洲。欧洲资本主义时代是以寻求到东方的新航线为开端的。从那时起，亚洲便成为殖民主义势力觊觎的对象。

始于 16 世纪初的欧洲对亚洲的早期殖民活动，延续至 17、18 世纪。葡、西、荷、英、法充当了急先锋。他们的活动多限于进行垄断贸易和不等价交换、海盗式掠夺，或沿海岸建立贸易据点，虽给亚洲带来了灾难，但还不至于对亚洲主要国家的封建统治构成威胁。中国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便轻易地驱逐了占据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到 19 世纪，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展开产业革命而增强了力量。资本主义日益迫切要求开辟更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其结果是用炮舰政策、鸦片贸易、商品倾销等手段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征服。在亚洲，它不但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且锋芒直逼封建统治者本身。至 19 世纪上半期，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先后沦为殖民地，伊朗、中国、土耳其、日本相继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

亚洲人民为挽救民族、革新国家，展开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 19 世纪中期形成了第一次民族运动高潮，包括 1825—1830 年印度尼西亚爪哇人民反荷起义，1839—1842 年阿富汗人民第一次抗英战争、1848—1852 年伊朗巴布教徒起义、1851—1864 年中国太平天国运动、1857—1859 年印度反英民族大起义。这些斗争均属农民或封建主领导的旧式反抗，而且带有强烈的宗教偏见，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封建上层的某些开明分子饱尝了资本主义船坚炮利之苦后，也曾产生学习西方科技以挽救危机的想法。中国的洋务运动和土耳其的坦志麦特（改革）颇具代表性。但封建统治的腐败和顽固，证明了他们的天真和肤浅。唯有日本经过坚决鼎新革故的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道路。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出现，给 19 世纪 70—90 年代的第二次民族运动高潮注入了新鲜血液。印度国大党运动、伊朗君主立宪运动、土耳其奥斯曼人领导的立宪运动、中国戊戌变法是其中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旧式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运动，如越南安世反法农民战争、朝鲜甲午农民战争、印度尼西亚萨敏运动、中国义和团运动。这些斗争都遭到失败，但改良派提出的学习西方，推进政治、经济、教育近代化的主张，启迪了后来者。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亚洲掀起了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三次民族运动高潮。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党的出现及其活动，明显地说明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崭新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称之为“亚洲的觉醒”。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西方资本主义长期冲击亚洲的一个后果是亚洲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成长，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

双重压迫。其次，在 20 世纪初刚走上垄断资本主义道路的各国对亚洲压迫和掠夺的加强，骤然导致了亚洲各国民族危机的深化和反抗的加剧。此外，1905 年俄国革命，对亚洲尤其是伊朗和土耳其颇有震动。日本在同年日俄战争中取胜，使亚洲民族主义者大受鼓舞。亚洲的民族资产阶级从改良走上革命的道路。1896—1902 年菲律宾资产阶级的革命、1905—1911 年伊朗资产阶级革命、1908—1909 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1911—1912 年中国辛亥革命、1905—1908 年印度国大党领导的反英斗争、1912—1914 年印度尼西亚新兴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潮迭起。虽然一些旧式的斗争如越南安世反法农民战争、印尼的萨敏运动还在继续，但未能影响这场运动的主流。

囿于历史的局限，亚洲的革命斗争并未能使各国在资产阶级民族和民主两方面取得完全成功。不过，它毕竟使亚洲进入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时代，奠定了以后亚洲各国独立的基础。

（张锋）

东印度公司

(Dongyingdu gongsi) 1.英国东印度公司。全称“在东印度群岛贸易的伦敦商人的总裁和公司”。1600年建立时，其主要目的是经营英国在远东和印度的贸易。后逐渐成为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侵略掠夺的代理统治机构。英王特许它享有在属地进行垄断贸易、拥有武装、宣战媾和以及司法的权力。17世纪在印度沿海建立了据点。之后，通过一系列战争，排挤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法国印度公司的势力。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控制了孟加拉，此后至1849年旁遮普邦被征服为止，使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在统治印度期间，通过进行强盗式的抢掠、实行垄断贸易、征收巨额田赋、经营种植园、向中国走私鸦片等手段，劫掠了巨额的财富。这笔财富成为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成分，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繁荣。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印度管理法案》，规定印度总督由英国政府任命。1784年通过《改善东印度公司和不列颠印度领地的管理法案》，规定公司保留任用一切文职和军职人员的权力，其他一切重大事务均由内阁任命的督察委员会处理。公司统治印度的最高权力实际上已被收回。为适应新兴工商业资本迅速发展的需要，英政府于1813年和1833年又相继取消其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在印度民族大起义的打击之下，公司于1858年被迫撤销。1873年，其法人地位也被取缔。2.荷兰东印度公司。又称联合东印度公司，是荷兰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殖民侵略掠夺的代理统治机构。1602年荷兰国会通过决议，将到印尼搜购香料的各公司合并而成。它获得东起好望角，西至麦哲伦海峡广大地区的贸易独占权，以及招募军队、占据土地、任用殖民官吏和宣战媾和等特权。17世纪初，公司排挤了葡、英的势力而控制了安汶、德那地、帝多利亞和班达群岛等。1609年在印尼设立总督府，1619年驱逐英国的势力而夺取雅加达作为公司大本营。此后，公司逐渐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岛屿而成为东方贸易霸主之一。公司在爪哇实行两种统治形式，一是公司直辖殖民地，约占爪哇面积的五分之三，任命荷兰人为省长。当地封建王公的地位仍保存，并被任命为各级官吏。实行实物定额纳税制，规定各邦应上缴定量贡物作为赋税。二是藩属土邦，由公司派员监督之下的各邦苏丹统治。实行强迫供应制，规定各邦有偿地向公司供应某种产品。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公司对香料等实行强制性的垄断贸易。公司掠夺了当地大量财富，1650年公司平均利润高达500%，后由于印尼人民的不断反抗以及本身经营方式的日益落后，公司日趋衰落。1796年荷兰政府接管公司的营业，1800年正式将其解散。

(张锋)

爪哇人民起义

(Zhaowa renmin qiyi) 1825—1830年印度尼西亚爪哇人民反抗荷兰殖民者的起义，领导者是爪哇日惹王国王子蒂博尼哥罗，又称爪哇战争或蒂博尼哥罗起义。荷兰殖民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爪哇一般民众生活日益困窘，也极大地侵犯了当地封建主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爪哇社会各阶层普遍对殖民者怨恨不满，各种形式的反抗连绵不断。蒂博尼哥罗由于其显赫的出身和坚定的不合作态度而逐渐成为日惹抗荷封建贵族集团的领袖，其拥有的领地也成为抗荷人士的聚集地。1825年7月，荷兰殖民当局以修公路为名出兵包围蒂博尼哥罗的住宅并企图逮捕他。蒂博尼哥罗当即组织人马杀出重围，并树起圣战的旗帜，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荷兰异教徒的统治。从贫苦农民到王公贵族闻风而从，几天之内达六万之众。起义军到处捣毁荷兰人的仓库、住宅、种植园、关卡，严惩殖民当局的贪官污吏，迅速控制了日惹的广大农村。殖民者被迫退守日惹和梭罗等重要据点。10月，蒂博尼哥罗建立伊斯兰教王国，自称爪哇正义之苏丹，整顿了起义军队。至1826年上半年，起义军控制了整个中爪哇和东爪哇部分地区。年底，对梭罗进攻失败，蒂博尼哥罗亦身负重伤。1828年3月，南旺地区的起义被荷军镇压，起义军逐渐衰落，参加起义的宗教顾问奇阿依·摩佐、亲王莽古甫美、将领申托特，以及大批封建主纷纷向荷军投降，亲王雅贝伊等相继牺牲。1830年3月，在停战谈判中，殖民当局背信弃义地拘捕了蒂博尼哥罗。起义失败。蒂博尼哥罗被流放到苏拉威西的万鸦老，后又转至望加锡。1855年死于流放地，留下一部《蒂博尼哥罗自传》。爪哇人民起义打击了荷兰的殖民统治，是19世纪中期亚洲民族运动的序幕。

(张锋)

伊朗巴布教起义

(Yilang Babujiao qiyi) 1848—1852 年伊朗人民反封建反殖民大起义。起义发生前，伊朗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1804—1813 年和 1826—1828 年，沙俄先后两次战胜伊朗，强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吉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条约》，攫取了大片土地和大量赔款，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入口关税仅征收 5% 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特权。英、法、奥等也援例强迫伊朗签约。伊朗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封建统治腐朽没落，租税日益苛酷，饥馑、鼠疫、霍乱等频仍发生，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与官方伊斯兰教派什叶派相对立的新教派——巴布教勃然兴起。巴布教的创始人是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他自称巴布（阿拉伯语“门”的意思），意即人民盼望已久的马赫迪（救世主）的意志将通过他这个“门”而向人民传谕。他极力反对封建的暴政和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宣称救世主将要降临，人人平等的“正义王国”也将建立，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尽管巴布不主张暴力，推崇改良，但统治者还是在 1847 年逮捕了他。巴布的教义逐渐被其他领导人发展为以暴力建立“幸福王国”的激进主张。1848 年 10 月，穆罕默德·阿里趁国王病死之机，在巴尔福鲁什领导 700 名巴布教徒起义。起义军在市郊的塞克·塔别尔西陵墓建立了基地并多次打败王军。后在王军的欺骗之下投降，随即被全部屠杀。1850 年 2 月，巴布教徒又在赞兼发动了起义，宣布建立“正义王国”，坚持半年之后又被王军以同样的手段所镇压。同年 6 月和 7 月，亚兹德、尼里兹还分别爆发了起义，起义有席卷全国之势。国王为控制局面而下令处死了狱中的巴布。到 1851 年，大规模的巴布教起义逐渐被平息，教徒们开始转入隐蔽的恐怖活动。次年，巴布教教徒刺杀国王未遂，激起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捕杀巴布教徒。起义至此完全失败。由于伊朗已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伊朗封建王朝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代理人，因此，反对封建王朝的巴布教起义客观上也具有反抗外国殖民主义的意义。

（张锋）

印度国大党

(Yingdu guodadang) 全称印度国民大会党，印度第一个全国性的和最大的民族主义政党。英殖民官吏休谟于 1885 年 12 月 28 日在孟买所创，目的在于笼络地主资产阶级中的上层分子。成立之初，主张通过宪法的手段在印度实现立宪和代议政治，确立了只讨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不讨论影响民族团结的地方性事务和宗教问题的宗旨，获得了广泛的支持。19 世纪末随着大量的中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加入，以巴尔·甘葛达·提拉克为首形成激进派，主张印度独立，影响日增。1905 年 10 月，针对殖民当局分割孟加拉省的法令，掀起全国规模的抗议活动，并发展为抵制英货、提倡国货的运动。次年，在激进派坚持下第一次提出：司瓦德希（自产）、司瓦拉吉（自治）、抵制英货、民族教育四点纲领。但温和派和激进派对“自产”和“自治”两点的解释分歧甚大，导致 1907 年 12 月公开分裂。激进派退出，组织了“民族主义者党”。1916 年，两派重新联合。1920 年提拉克死后甘地遂成党内最有影响的权威。1920 年加尔各答特别会议上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同年 12 月通过“用和平和合法的手段来获得自主”的斗争纲领和关于必须组织工人和吸收工农和手工业者参加基层组织的决议。当年在全国规模掀起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7 年后党内又分裂为以甘地为首的不变派和以莫提拉尔·尼赫鲁为首的主变派。后者主张放弃抵制立法议会，进而在党内组成自治党，后自行瓦解。1928 年通过一个旨在建立在大英帝国范围之内的责任政府的宪法草案计划——《尼赫鲁报告书》。莫拉提尔·尼赫鲁之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苏巴斯·鲍斯等反对该报告书而坚持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遂形成党内新的激进派。1929 年拉合尔年会通过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纲领。1930 年和 1934 年掀起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间国大党曾被宣布为非法，甘地等被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掀起了反对大战和反对印度参战的运动。1942 年通过甘地提出的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而遭解散，甘地再次被捕。1947 年，迫于印度的形势，英国公布了将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印度分治方案》（《蒙巴顿方案》）。1950 年 1 月 26 日印度独立成立共和国，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任总理，并于次年起领导国大党直至 1964 年逝世。此后，除 1977—1979 年被人民党击败外，一直是印度的执政党。1949 年确立了在印度建立以机会均等和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力为基础的合作联邦为党的新目标。1964 年将此目标进一步明确为：建立“民主社会主义”。1964 年夏斯特里被选为总理和党的领导，1966 年被尼赫鲁的独女英迪拉·甘地所取代。1969 年党内以英迪拉·甘地为首的一派和以党的主席尼贾林加帕为首的“辛迪加派”分裂，后者称国大党（组织派）。1978 年英迪拉·甘地的新国大党再次分裂成以雷迪为首的国大党（正统派）和以英迪拉·甘地为首的国大党（英迪拉派）。前者后改称为国大党（社会主义派），后者在 1982 年第七次大选获胜后被选举委员会承认为真正的国大党。1979 年，德瓦拉吉·乌尔斯等从国大党（英迪拉派）分裂出而组成卡纳塔克国大党。1983 年西孟加拉国大党（社会主义派）和国大党（英迪拉派）合并。该党思想的四大支柱为民主、社会主义、非教派主义和不结盟。1984 年英迪拉·甘地被刺身亡之后，其子拉吉夫·甘地继任党主席和印度总理。1989 年 11 月在大选中被全国阵线击败再次下台。

（张锋）

拉克西米·芭伊

(Lakeximi bayi, Laksmi B i 1835—1858) 亦称詹西女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主要领袖之一。原为印度詹西邦土王甘加达尔·拉奥的王后。1857年5月印度反英大起义爆发，6月女王率詹西军民响应，打败了英军，重登詹西王位。詹西成为中印度的起义中心。英军于1858年3月派重兵攻击詹西，女王亲临前线指挥保卫战。8天后，詹西城陷落。女王突围投奔唐提亚·托比领导的起义军。6月18日，女王率军防守瓜廖尔城东，立马横刀与英军骑兵厮杀，英勇战死，时年仅23岁。

(张锋)

提拉克

(Tilake, Bal Gang dharTilak1856—1920) 印度民族民主主义者, 国大党激进派领袖。出身于马拉特族婆罗门种姓家庭。早年创建了旨在培养爱国主义者的学校“新英格兰学校”, 并创办《雄师周报》和《马拉特人报》, 揭露殖民者的残暴和专横, 宣传民族主义的思想。1885年12月国大党成立之后, 积极参与活动, 逐渐成为激进派的领袖, 反对温和派的改良主义, 主张采取一切手段, 依靠人民来推翻英殖民统治, 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1905年殖民当局公布分割孟加拉的法案, 企图以“分而治之”的办法来瓦解民族运动, 提拉克领导激进派号召抗议。抗议活动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提倡国货和抵制英货、司瓦德希(自产)运动。翌年, 在以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的坚持之下, 国大党年会通过了司瓦德希、司瓦拉吉(自治)、抵制英货、民族教育四大纲领。1907年, 提拉克领导激进派退出国大党, 组织了“民族主义党”。次年, 被殖民当局以“阴谋推翻女王政府”为名逮捕并判处6年徒刑。此事激起了印度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抗议, 孟买10万多工人进行了长达六天的政治总罢工。刑满释放后提拉克向英王递交了《忏悔书》, 表示以后仅进行“行政制度的改革, 而决非推翻政府”, 观点开始趋向于温和派, 建立了新组织“自治同盟”。在1916年国大党年会上, 重新实现和温和派的联合, 并和真纳签订了《勒克瑙条约》(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协商制订的印度改革纲领)。在社会经济方面观点保守, 坚持印度教传统, 维护种姓制度和落后风俗, 回避土地问题。甘地称他为“现代印度的缔造者”, 尼赫鲁称他为“印度革命之父”。著有《薄伽梵歌中的奥秘》、《奥里安神》等。

(张锋)

朝鲜甲午农民战争

(Chaoxian jiawu nongmin zhanzheng) 1894 (甲午)年朝鲜农民反封建和反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又称东学党起义。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英、法、德、俄、意、奥亦援例签约。朝鲜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内政腐败，外患交迫，民不聊生，各地小规模起义不断。早在1860年，崔济愚合儒、佛、道三教，附之以本国的神道创始东学道。它声称“广济苍生”、“人人平等”，要和西学（天主教）相抗衡，受到下层人民欢迎。1893年贪官全罗道古阜郡守赵秉甲不顾当年歉收，强迫农民修建“万石湫”水利工程，并以此为借口征收水税中饱私囊，甚至将请减水税的农民诬为乱民而滥施酷刑。全琫准之父即被拷打而死。次年1月，东学道徒全琫准率古阜、泰仁两郡数千愤怒的农民攻占了古阜郡城。3月，攻下要地长白山，整顿了队伍，共推全琫准为总大将，明确提出了“辅国安民”、“逐灭倭夷”、“尽灭权贵”的斗争纲领。义军传檄四方，宣布“拯救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4月，义军先后在黄土岬和长城一带两次击败官军，一举攻下南方重镇全州，锋芒直指汉城。国王自感无力镇压，便假意求和以争取时间请清政府派援军。政府接受了起义军提出的十二项要求，其中包括停止迫害东学道徒，严惩贪官污吏和私通日本者，取消封建等级，废除苛捐杂税和公私债务，平分土地，烧毁奴婢文契和改善贱民待遇等。义军同时撤出全州城作为交换。义军在全罗道各郡设立地方政权性质的“执纲所”监督上述要求的执行和处理地方事务。6月，清军应邀在牙山登陆入境。一直努力排挤清王朝在朝鲜势力的日本，也趁机派兵入朝。7月，日军发动宫廷政变而建立了亲日政府。不久，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清朝而独揽朝鲜朝政。日军旋即开始和朝鲜官军勾结镇压义军。义军领导层在关键时刻因东学道教主崔时亨反对北进而产生了分裂。全琫准坚持北进攻向汉城，10月在公州遭到惨败，义军被迫分解为小股部队作战。12月，全琫准因叛徒告密被俘，次年被处死，起义失败。这次起义是朝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张锋)

菲律宾独立战争

(Feilübin duli zhanzheng) 19世纪末期菲律宾人民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1892年安得列斯·波尼发秀成立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秘密团体——卡蒂普南（最尊贵的菲律宾儿女协会），主张依靠人民和暴力争取民族的独立，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成为革命的核心。1896年8月，波尼发秀在巴林塔瓦克发动起义，各地纷纷响应，攻击殖民军并纷纷建立了政权。1897年初，卡蒂普南发生分裂，艾米利奥·阿奎那多成为新政府的总统，波尼发秀被处死，卡蒂普南瓦解。革命力量因分裂元气大伤，在殖民军反扑之下节节败退。12月，阿奎那多政府被迫和殖民当局签订了《破石洞条约》，同意缴械投降，解散政府，殖民当局许诺改革、大赦革命者和向菲律宾人民赔款。除阿奎那多流亡香港一条以外，条约并没有被双方认真执行。各地人民武装斗争仍坚持不断，卡蒂普南相继恢复。1898年4月，马卡布罗斯将军在中吕宋建立临时革命政府，阿奎那多在香港设立爱国委员会。5月，阿奎那多由美国军舰护送回国重新领导战争，利用美西战争的有利时机迅速扩大了战果。6月2日（今菲律宾国庆日），他在甲米地发布《独立宣言》。1899年1月，《马洛洛宪法》颁布，菲律宾共和国成立，阿奎那多当选总统。但共和国不久即被美国发动美菲战争绞杀，菲律宾又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张锋）

青年土耳其党

(Qingnian tuerqidang) 奥斯曼帝国的进步团体的联盟——统一进步协会的别称。1889年伊斯坦布尔军事医学院的4名青年学生发起成立名为奥斯曼统一的秘密协会，后改统一进步协会，主张保持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完整、恢复1876年宪法、反对专制制度，广泛地吸引了青年学生、军官、知识分子和海外流亡者。早期活动多为宣传活动。1896年发动军事政变失败后，主要领导人多流亡国外。1902年召开第一次大会，会上因是否利用列强的干涉而实行改革的问题产生分裂：以艾哈迈德·里札为首的少数派组成进步统一协会（1908年恢复为统一进步协会）；以萨巴赫丁亲王为首成立个人主动和地方分权联盟。1906年穆斯塔法·基马尔等在马其顿驻军中成立祖国与自由协会，促使在军官中有广泛基础的奥斯曼自由协会成立，马其顿成为国内革命的根据地。次年，奥斯曼自由协会和在巴黎的里札派合并。1907年，里札派和萨巴赫丁派等在第二次大会上作出在国内共同发动起义的决定。翌年7月，驻马其顿第三军团的艾哈迈德·尼亚齐少校在列斯尼发动起义。起义军迅即控制了马其顿，迫使阿卜杜勒·哈密德素丹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和召开议会。1909年废黜阿卜杜勒·哈密德，另立穆罕默德五世，统一进步协会亲自组阁掌权。1912年被亲英势力赶下台，次年由恩维尔发动政变而重新上台。执政期间军政不分，宣传大奥斯曼主义而压制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实行了某些行政改革和风俗改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依附德国参战，因战败下台而被镇压。1922年恢复活动，1926年被取缔。

（张锋）

1905—1911 年伊朗革命

(yijiulingwu-yijiuyiyinian Yi-lang geming) 1905—1911 年伊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1905 年 12 月，德黑兰地方官吏毒打商人和阿訇，在德黑兰等大城市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迫使国王穆札法·厄丁于次年召开国会和颁布宪法，并让位于王储穆罕默德·阿里。1908 年 6 月，国王在沙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除宪法，解散国会和大肆迫害革命者。革命中心从德黑兰转至大马士革，革命领导权从高级阿訇和大商人手中转到以萨塔尔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手中。1909 年 4 月俄军攻入大不里士干涉革命，英国也镇压了伊朗南部的革命起义，革命中心又转至吉兰省。7 月，以谢别赫达尔为首的吉兰爱国义务队和以阿萨德汗为首的巴赫蒂阿尔部落军队同时攻入德黑兰，另立新国王并召开了第二届国会，恢复了宪法。自由派地主和部落酋长掌权，压制民主运动并谋求和封建势力、列强的妥协。1911 年 11 月，俄、英两国干涉军分别从北、南攻入伊朗境内。12 月，阿萨德汗在沙俄策划之下，在德黑兰发动政变，解散国会并恢复了王室的权力。革命失败。

(张锋)

日本近代史

(riben jindaishi) 日本从封建的幕藩体制面临崩溃，到资本主义和近代天皇制国家形成、跻身资本主义列强的历史。

一般认为，1853年的“黑船来航”是日本近代的开端。在这以前，日本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孤立。为防范西方殖民者对日本的渗透进而对封建统治产生危害，德川幕府在1640年前后先后5次颁布“锁国令”，统制贸易，严禁日本人的对外交往，取缔基督教和驱逐外国人，仅开放长崎一地允许荷兰、中国和朝鲜进行有限的来往。

幕藩体制作为德川幕府的统治方式，在早期是行之有效的。它给日本带来了两个多世纪与世无争的繁荣与和平。18世纪前后，工商业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它给商人和手工业者带来了财富，却把贫困留给了领主和武士。幕藩体制开始日益陷入危机之中，虽多次改革幕政和藩政也未奏效。农民暴动在1801—1868年间高达508次。粮价偏高经常引起城市贫民的“米骚动”，以1837年大盐平八郎暴动最著名。部分生活日渐穷窘的下级武士“恨主如仇敌”，成为以后讨幕维新的中坚。由荷兰人传来的兰学（西方科技和文化知识）使人大开眼界，早期传入的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令人对封建等级不满。幕府为巩固统治倡导儒家伦理，却适得其反地让人怀疑其统治的正统性。多少年来已存在的神道又流行了，人们认为天皇才是诸神之王的太阳神——天照大神的正宗后裔。

1853年7月，柏利指挥的美国舰队，迫使幕府于次年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而开港。英、俄、荷相继仿效。1858年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又强签了不平等的《安政条约》。日本陷于严重的民族危机，幕府顿时内外交困。主要由萨摩、长州两藩下级青年武士构成的讨幕派，乘机将国内所有的不满导向屈从列强的幕府。1867年，明治天皇在萨摩、长州等藩的支持之下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一切权力复归天皇。次年，新政府在军事上彻底击溃了幕府。

1868年4月，天皇祭祀天地神明并宣誓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其中，“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和“求知识于世界”，表明了新政府仿照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决心。同年，政府组织法——《政体书》颁布，在中央设立号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太政官”，在地方实行府、藩、县三治制。次年，政府诱迫各藩主向天皇“奉还版（领地）籍（人民）”。1871年强令“废藩置县”，由中央委派知事管理新划分的3府72县。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基本形成，讨幕派出身的藩阀官僚掌握了政府的实权。为建立一个在实力上能和列强分庭抗礼的国家，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实行了改革。1873年颁布《征兵令》，废除了武士们垄断军事的特权，建立了近代常备军。1873年颁《地税改革法》，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以货币定额地税取代按收获量课实物税。近代土地制度自此建立。占政府岁入80%的地税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大项。政府毕尽“诱导奖励之力”倡导和扶持“殖产兴业”。在工矿、交通、通讯等基础部门和军事部门实行官营，建立了近代大工业。为扶助私人资本，除提供无息贷款和巨额补贴外，还将国营企业廉价转让给三井、三菱等大财阀，奠定了向大资本集中的基础。以引进欧美技术、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为目的的“文明开化”政策，导致了以“四民平等”为内容的封建等级身份制的废除。对平民取姓、担任官职等限

制取消了，武士的俸禄和带刀的特权也被废止。1872年颁《学制》，要求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1879年颁《教育令》明文规定义务教育。在本世纪初基本上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在学校的规模和教学内容的西化方面，中、高等教育亦有长足发展。为尽快获取西方科技知识，政府不惜重金大批选派留学生和聘请外国专家。但同时强调的军国主义教育，却留下了后患。

改革在70年代中期开始遭到失意武士的强烈反对。一方面是留恋特权的士族的武装叛乱，先后有1874年佐贺之乱，1876年的荻、秋月、神风连之乱，以及1877年西乡盛隆领导的鹿儿岛叛乱；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士族在言论上的反抗——士族民权运动，后发展为全民性要求制订宪法、请开国会的自由民权运动。两方面均遭政府镇压，但后者促使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在确立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同时，也容许最低限度的基本人权，设立权力极其有限的议会。近代天皇制在法律上确立。

改革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19世纪80年代后期，纺织工业出现。90年代后期，重工业初具规模，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作为丝和棉织品为出口对象的对外贸易迅猛增长。到本世纪初，长达一万公里的铁路网基本覆盖了全国。国力的增长导致了国内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野心的膨胀。从1894年开始收回治外法权和部分税权，到1911年恢复关税自主权为止，全面收回了国权，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得以摆脱。1876年入侵朝鲜强签《江华条约》，1878年无视中国的主权并吞琉球。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击败清王朝而取得亚洲领导地位，割取了台湾并攫取2万万两赔款和3千万两“赎辽费”。1904年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开始跨入列强行列。1910年并吞朝鲜，版图迅速扩张。

作为在非西方世界实现西方式政治和经济近代化的杰出范例，近代日本受到世界，尤其是正致力于现代化的第三世界的注目。

（张锋）

德川幕府

(Dechuan mufu) 又称江户幕府。1603年由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所建。至1867年德川庆喜被迫宣布还政天皇为止,共经十五代将军,历时265年。幕府原为将军征战时处理军务的营幕,后将军架空天皇取得实际统治权。历史上先后有镰仓(1192—1333)、室町(1338—1573)和德川三个幕府。德川幕府的统治形式是幕藩体制。将军之下,设大老(不常设)、老中(常设)掌握全国政务,设若年寄协助老中,设大目付,目付负责监视大名和幕府的直属武士旗本和御家人。设寺社、勘定、江户町三奉行,分别管理寺社、幕府财政和江户市政。在大阪、长崎等主要城市设远国奉行来支配地方的直辖领地。在京都设立所司代以监视皇室和寺社,以及近畿诸大名。在幕府赐封的260—270多个诸侯国内,藩主们拥有行政、司法和征收年贡的权力。武士们则以为各自的藩主服兵役为己任。德川将军采取如下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首先,幕府掌握了占当时全国总产量1/4的富饶的土地,和大阪、京都、江户等重要城市以及主要的矿山,还垄断了金、银、钱三种货币的铸造权。其次,幕府控制之下的直属武士旗本、御家人,以及旗本的陪臣,号称“旗本八百旗”。相对于各藩,在军事力量上占绝对优势。第三,将藩侯们分为“亲藩”(德川氏同族)、“谱代”(德川氏原属)、外样(新臣服)三个等级。三者的领地互为交错以达到监视外样大名的目的。而且,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占据了富庶和重要的领地。第四,颁布统治大名的基本法《武家诸法度》,限制各藩修建城堡,禁止结党,规定婚姻需经幕府批准,还定下了“参觐交代制”,令大名隔一年在江户和领地轮住,回领地时妻、子需留在江户为人质。旅途和在江户生活的庞大开支,不断消耗了大名们的财力。第五,实行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来巩固封建统治。占人口10%的士阶层是统治阶层。从1639年实行锁国政策,由此限制大名们有利可图的对外贸易,限制自由贸易的盛行以保护农村的自然经济不遭破坏。幕府的统治在初期是有效的,给日本带来了长达200多年的和平和繁荣。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德川幕府自18世纪中期起逐渐陷入危机之中。财政日益困窘,农民和市民的起义此起彼伏。虽进行了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和天保改革,也不见收效。资本主义列强强迫日本开港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终于导致了全国规模的倒幕运动。1867年11月,德川庆喜被迫向天皇“大政奉还”。至次年鸟羽、伏见之役,幕府军终于被击溃,德川幕府彻底垮台。

(张锋)

安政条约

(Anzheng tiaoyue) 日本安政五年(1858)德川幕府被迫先后同美、荷、俄、英、法五国签订的不平等的《友好通商条约》的总称。又称《五国通商条约》。1854年3月,在美国坚船利炮的威胁之下,日本被迫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而开关。为争取更多的权益,美国于1858年7月29日进一步诱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条约共14条,主要内容如下:日本除下田、箱馆之外,另开设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庫四港口。神奈川开港后6个月,封闭下田港,增辟江户、大阪为商埠;美国公使派驻江户,其他各通商口岸可派驻领事或参赞。他们均有在日本旅行的权利;美国可在江户、大阪两地及各通商口岸等设相当于租界的“居留地”,允许信教自由,“居留地”内所设教堂均受保护;美国享有贸易自由和领事裁判权;双方协议关税,美国的进出口货物一般仅收5%的极低的关税。同年8—10月间,荷、俄、英、法相继迫使日本签订了内容类似的《友好通商条约》。各条约后均附有贸易章程。这些条约进一步损害了日本的主权,彻底地打破了日本的锁国政策。从此日本陷入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条约由于未经天皇批准而签订,加剧了尊王攘夷的活动,导致了安政大狱。明治政府建立后,一直为修改条约而努力,至1911年完全恢复了主权。

(张锋)

明治维新

(Mingzhi weixin) “明治”取自中国古籍《易经》“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是睦仁天皇在位的年号；“维新”也取自中国古籍《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句，意指变旧法而行新政。狭义上，指 1868 年日本讨幕派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明治政权的所谓“王政复古”。广义上，指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全过程。对后者，上限的划分有两说：天保改革的天保说（1830—1843）；美国强迫开港的开国说（1853—1858）。下限的划分在日本史学界分歧甚大，有 1871 年（废藩置县）、1873 年（《学制》、《征兵令》、《地税改革条例》三大法令颁布）、1877 年（西南战争）、1879 年（“处理琉球”）、1881 年（明治十四年政变）、1884 年（秩父事件）、1889 年（《明治宪法》颁布）等诸说。我国主要有 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和 1911 年（完全修改不平等条约）两说。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长期争论不已，基本上可概括为由日本讲座派和劳农派所开创的两大派别：封建制度的重新组合，导致绝对主义专制王权形成的“绝对主义说”；（不彻底的或后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改革）说。作为使日本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独立国家的契机，明治维新被当代世界广泛深入地研究。

（张锋）

岩仓使团

(Yancang shituan) 1871 年日本明治政府派往美欧的外交使团。使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 48 人。最初主要目的是向各国政府表明日本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愿望，但遭到各国的蛮横拒绝。使团转而以考察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制度为主旨，先后考察美、英、法、比、荷、德、俄、丹、瑞典、意、奥地利、瑞士 12 国，历时一年零十个月。使团对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法则深有体会，认识到日本只有以富国强兵为后盾，才有可能修改条约。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借鉴西方政治制度而完善法制，大力发展西式教育，是致富的重要手段。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则是日本强兵的典范。这便是他们的“内治优先”的观点。回国后以使节团首脑人物为中心的新萨长派击败了政府中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并以大久保利通为首逐步掌握了政府的实权。他们根据以上认识为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加速日本资本主义化和中央集权化的政策，并对以朝鲜为中心的东亚采取实力扩张的态度。

(张锋)

自由民权运动

(Ziyou minquan yundong) 1874—1887年日本全国规模的民主改革政治运动。主要有反对藩阀专制，要求开设国会，制订宪法，减轻地税和修改条约等项要求。1874年1月，在“征韩论”政争中下野的前参议板垣退助、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后藤象三郎等8人提出了《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批评大久保政权的“有司(官僚)专制”，要求设立“民选议院”，拉开了运动的序幕。4月，板垣退助、片冈健吉等在高知县建立了“立志社”。之后，各种类似的民权组织在各地纷纷出现。1875年3月，以立志社为中心的各地民权组织代表40人(都是士族)汇集大阪，成立了全国性组织“爱国社”。政府为了抑制运动在全国的发展而拉拢板垣入阁。4月，爱国社解散。由于农民反对地税改革斗争的兴起，民权派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使运动有了转机。1877年6月立志社代表片冈健吉再次向天皇递交“建议书”。其中隐含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三大内容，广泛地吸引了社会各阶层。运动从少数士族知识分子的请愿建议运动扩展为全国性请愿。1878年9月，爱国社以立志社为中心重建。1880年3月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更名为“国会期成同盟”，同时掀起了请开国会的大规模请愿，签名者达24万余人。政府迫于形势，一方面颁布了《集会条例》对请愿予以镇压，并发动“明治十四年政变”，将主张立即开设国会的大隈重信赶出了政府；另一方面，被迫颁布以1890年为期开设国会，公布宪法的诏书。民权派发生了分化。以板垣为首的激进派于1881年10月成立自由党，其党纲声称“为确立善美的立宪政体而努力”。以大隈重信为首的渐进派于1882年3月成立了立宪改进党，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反对自由党比较激进的主张。在政府严厉镇压和分化瓦解的两手政策之下，两党之间的对立分歧日益加深，对运动的领导能力也不断削弱。自由党内激进的地方党员掀起武装反抗政府的“福岛事件”、“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等，政府加以严厉镇压，自由党领导感到局面失控而丧失信心。1884年10月自由党宣布解散。12月，改进党也瓦解。运动遂进入低潮。1887年，以反对井上外相的屈辱性修改条约草案为开端的反政府活动又将自由民权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片冈健吉等提出的言论自由、减轻地租、革新外交三大要求，以及后藤象三郎倡导的自由党和改进党重新携手努力的“大同团结运动”，成为运动的主流。1887年政府颁布《保安条例》加以镇压，运动失败。该运动毕竟促使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取消了每隔五年修改一次地价的规定。井上外相的草案也被粉碎。

(张锋)

大日本帝国宪法

(Dariben diguo xianfa) 又称《明治宪法》。从 1889 年 2 月 11 日颁布至 1947 年 5 月 3 日《日本国宪法》颁布为止，一直是日本的基本法。明治政府建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间要求制订宪法、开设国会的呼声日高。明治政府决定用钦定宪法的形式来制宪，1882 年 3 月派出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宪法考察团去欧美考察宪法。伊藤着重考察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宪法，亲自听了柏林大学法学学者格奈斯特和维也纳大学法学学者施泰因的课程，自称“充分了解确立皇基，使大权不至旁落的大道理”，决定排除美、法、英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或虚君民主政治的模式，而按照君主立宪专制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宪。1883 年 8 月考察团归国之后，伊藤博文、井上毅、伊东已代治、金子坚太郎等着手秘密制宪。宪法在天皇亲自参与审议之下几经修改，于 1889 年 2 月 11 日举行大典颁布。宪法共 7 章 76 条，主要内容有：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乃国家元首”，总揽立法、司法、行政、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但天皇权力有所限制，天皇必须依宪而治，在帝国议会协助赞同之下行使立法权，天皇的法令须经国务大臣的副署。帝国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组成。前者由皇族、华族及敕任议员组成，后者由公选议员组成，但有财产资格限制。帝国议会立法权和天皇共同分享。内阁由天皇任命，“国务大臣以辅佐天皇为其责任”，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设置枢密院，名为天皇咨询机构，实为凌驾于议会和内阁之上的最高决策机关。在法律规定之范围内臣民有著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教等诸权利，有纳税及服兵役的义务。相对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宪法来说，该宪法极为保守，确立了专制主义近代天皇制。但它毕竟是日本也是亚洲第一部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

(张锋)

大陆政策

(Dalū zhengce)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所奉行的对外侵略扩张总方针的概括。1890年首相山县有朋写成《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将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将“与我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称“利益线”，强调“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保卫利益线”。青木外相又写成《东亚列国之权衡》，主张在近期内先行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东海岸地区。山县、青木提出的对邻国外交的策略，被通称大陆政策。以维持国家独立，推行富国强兵和对外扩张政策为目的的“国权论”者为该政策作了疯狂的鼓动。日本政府的军备扩张为它准备了实力后盾。1893年天皇决定六年内每年抽取内币30万元，扣取官员们薪金1/10来修建军舰，终于使日本舰队达到了北洋海军的实力水平。在此政策之下，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日俄战争（1904—1905），吞并了台湾和朝鲜，并和列强在中国大陆角逐，割取了东北南部和福建为势力范围。1912年和1916年曾策划满蒙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7—1928年三次出兵山东。据传，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根据1927年7月召开的军事会议的决定，向天皇提出奏文，即“田中奏折”，声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奏折是该政策的高度总结。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后悍然发动八年全面侵华战争。1940年和德、意结成三国同盟，次年偷袭美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日本战败，“大陆政策”的梦想彻底破灭。

(张锋)

大盐平八郎

(Dayanpingbalang 1793—1837) 德川幕府末期大阪市民暴动领袖。幼名文之助，本名后素，号中斋。自幼丧父母，14岁袭祖父职担任大阪市下级警官。1816年在家设“洗心洞”私塾，讲授王阳明阴阳学说，主张知行合一。1830年因不满现实辞职，潜心研究。1836年(天保七年)发生大饥馑。大盐出面再三请求官吏和富豪救济，均遭拒绝。愤而卖掉家中5万册藏书先行赈济饥民，然后筹集武器、弹药，分发檄文“致天赐各村小前书”，准备举兵惩罚贪官污吏。因叛徒告密，率门生同道约300人于1837年2月19日仓促起兵。他们高举“救民”的大旗，攻打富豪店铺住宅，烧毁大阪市街约1/5。当天即遭官方镇压。大盐潜伏1个多月后被发现，自杀而死。起义虽规模小、时间短，但对下层贫民有极大影响。起兵的檄文被到处传抄，大盐的事迹被编成戏剧、歌谣等传遍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都以“大盐门生”和“大盐同道”的名义起兵。生平著有《古本大学刮目》、《洗心洞札记》等。

(张锋)

大久保利通

(Dajiubaolitong 1830—1878) 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家。出身于萨摩藩下级武士家庭。幼名正助，后改一藏，号甲东。自幼擅文熟武，17岁步入政界，任萨摩藩属下记录所书役，属藩政改革派。1860年晋升为御小纳户（藩主的家臣武士），成为萨摩藩实力派人物。1863年7月爆发“萨英战争”，大久保任萨军总指挥，对西方船坚炮利深有体会。兵败后致力于“富国强兵”的藩政改革，并成为倒幕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和西乡隆盛、岩仓具视、木户孝允等策划建立了以萨长同盟为主的武力倒幕联盟。1867年9—12月策划和组织“王政复古”的政变。明治政府建立后被任命为参与，次年被任命为总裁局顾问、参议。因他对推翻幕府有特殊的贡献，被后人誉为“维新三杰”之一。1871年任大藏卿，开始执掌新政府的实权。同年任岩仓使团副使出使欧美，对欧美文明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得出日本要提高国际地位，必先仿效西洋文明，努力将日本建设成近代化国家的结论。在向政府提出的《关于殖产兴业的意见书》中，力主先从“殖产兴业”入手。回国后，以他和岩仓使团人员为主的“内治派”在政治上击败了留守政府内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取得政府的实际统治权。1873年11月起以参议身份任内务卿。任职期间，完善了政府的行政机构，建立了一支近代的常备军，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1877年镇压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西南武士叛乱。在对外方面他并非和平主义者。1874年策动入侵台湾，并趁此讹诈了清政府50万两白银。1876年遣军入侵朝鲜迫使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1878年5月14日被刺身亡。

(张锋)

木户孝允

(Muhuxiaoyun 1833—1877) 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家。长州藩士出身。号桂菊、木圭等，原姓和田。幼时过继桂家，称桂小五郎，后改准一郎。1825年改姓木户，名贯治。早年曾拜著名民族主义思想家吉田松阴为师，还向斋藤弥九郎学习剑术，向江川英龙学习过西方军事，均有所得。1859年步入政界。1862年赴京都辅佐长州藩主，开始参与藩政，为长州藩制定了“尊王攘夷”的方针。两次险遭幕府势力杀害。1865年得到藩主重用，成为长州藩实力派人物。1866年代表长州藩策划建立了萨长倒幕军事联盟，奠定推翻幕府政府的基础。明治初年，历任政府徵士、总裁局顾问，后任参与、参议，成为政府中实力人物。参与了建国基本方针《五条誓文》的制定。力主“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明治政府。和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被后人盛誉为“维新三杰”，是“征韩论”的倡导者之一。1871年任岩仓使团副使出使欧美后转为“内治派”，支持大久保利通击败以西乡隆盛为主的“征韩派”。1874年兼任教育大臣，提出“普及小学教育乃当务之急”。因反对大久保利通出兵台湾而辞去参议职务。翌年复职，并任第一次地方官会议议长。1876年3月辞去政府职务，改任顾问。1877年病中惊闻西乡隆盛兵变，感叹“与其病死窗下，不如捐躯于征途”，企图亲自劝阻西乡，终未酬志而病死，年仅44岁。主要著作见于《木户孝允文书》和《木户孝允日记》。

(张锋)

西乡隆盛

(Xixianglongsheng 1827—1877) 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出身于萨摩藩下级武士家庭。幼名小吉，后改吉之助，号南洲，维新后改隆盛。自幼习武，熟读儒家诗书，修过禅学。1844年任郡书记官助理，后任郡书记官。1854年受到重用，积极为藩主岛津齐彬所提倡的“公武合体”（公指朝廷，武指幕府或强藩，即试图以幕府或强藩和传统的权威皇室相结合，来挽救即将崩溃的幕藩体制，同尊王攘夷派相对立）所奔走。曾因此被萨摩藩保守势力流放三年。1868年被萨摩藩实力人物岛津久光起用。但思想已倾向于“尊王攘夷”，因此再次被流放。1864年回藩后被委以萨摩藩军事实权。在尊王攘夷派发动的“禁门之变”和第一次征长战争中，仍站在幕府一边。以后，代表萨摩藩参与策划了萨长倒幕联盟，转而成为坚定的倒幕中心人物之一。1867年参与策划和组织“王政复古”政变。翌年，被授权指挥政府军，取得了征讨幕府军的一系列胜利。之后，积极参与策划“废藩置县”等重大改革，被后人盛誉为“维新三杰”之一。明治初年，历任参议、陆军大将、近卫都督等。1871—1873年岩仓使团出使欧美期间，掌握了政府的实权，主持和参与了地税改革，发布了《征兵令》等。1873年10月因其“征韩论”的主张被持“内治优先说”的大久保等否决，辞职下野，退居家乡萨摩藩鹿儿岛，仍任岛津久光的顾问，并创办军事学校性质的“私学校”。1877年被鹿儿岛土族推为首领发动叛乱，反对大久保政权损害武士身份特权的政策。9月战败自杀。西乡经历复杂，思想矛盾，从维新功臣变为“乱臣贼子”，在变革时代的近代日本具有一定代表性。12年后政府赦其“逆罪”恢复名誉。主要著作见于《大西乡全集》。

(张锋)

福泽渝吉

(Fuzeyuji 1835—1901) 近代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出身于中津藩下级武士家庭。小时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后就学于大阪绪方洪庵的适塾学习兰学，思想遂从儒学转向西洋的功利主义。1858年在江户开设兰学塾。19世纪60年代曾三次随同幕府遣外使节周游欧美列国，对西方近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了解。明治初年，将所设学塾定名为庆兴义塾（今庆兴大学前身），并以此为中心致力于近代化的教育工作。他对教育极为重视，曾说：“当今之急固属富国强兵，然富国强兵之本，唯在专心培育人才。”1873年参与组建了启蒙团体“明六社”（因明治六年成立而得名），随后发行了《明六杂志》。因受西方功利主义影响，他极力提倡个人之间及国家之间的平等独立，注重社会的现实利益。这显然是针对当时日本的民族危机，以及社会上对西洋文明卑屈奴从的不正确态度和封建蒙昧主义而言。在致松山栋庵的信中说：“一身之独立而有一家之独立，有一家之独立，才能使一国独立、天下独立。而能致一身之独立者，无他，唯先开其智识耳。”在其创办的《时事新报》中宣称：“国家的富强，在于贸易的发达。”在《文明概略论》中疾呼：“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从而提出了较完整的日本欧化理论。作为日本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他享有“日本伏尔泰”之盛誉，但其思想也不免带有旧传统的烙印。他主张“官民调和”而反对自由民权运动，强调伸张国权而支持政府的大陆扩张政策。有名的“脱亚论”即是他所提。主要著作有《福泽渝吉自传》、《劝学篇》、《文明概略论》等，见于《福泽渝吉全集》。

(张锋)

伊藤博文

(Yitengbowen 1841—1909) 近代日本政治家。出身于长州藩下级武士。幼名俊辅，号春苗，曾多次改名，有多种化名。早年师从著名攘夷论者吉田松阴，追随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参加“尊王攘夷”活动。曾短暂留学于英国。参加过1864年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事件的调解。在倒幕和建立新政府的过程当中出过力。明治初年任对外事务员，开始外交官生涯。之后，历任参与、外国事务局制事、兵库县知事。1869年调任大藏少辅，后赴美短期考察，回国后任工部大辅。1871年任岩仓使团副使出使欧美。支持大久保利通的“内治优先说”，出任参议兼工部卿。1878年大久保被暗杀后接任内务卿，权势日趋显赫。自1881年起，成为政府中心人物。1882年受朝廷委派赴欧考察宪法，回国后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主持制订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在法律上完善了近代天皇制。1885年着手进行废除太政官、建立内阁制度的官制改革，同时任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和枢密院议长，组成了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1885年12月—1888年4月)。此后，在1892年8月—1896年8月，1898年1月—6月，1890年10月—1901年5月还曾三次组阁。1890年任第一届议会贵族院议长。1900年成立宪政友会，任总裁。是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策划者。1895年在日本马关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1905年任特派全权大使赴朝鲜缔结《日韩条约》，使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1906—1909年任朝鲜总监。1909年在中国哈尔滨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

(张锋)

片山潜

(Pianshanqian(1859—1933)日本和世界工人运动活动家，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出身于冈山县贫农家庭。自幼因家贫而读书不多，当过印刷工人。1884年赴美勤工俭学，就学于耶鲁大学等，并曾到英国短暂考察，期间逐渐成为社会主义信仰者。1896年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次年参与创建了日本第一个自主的工会筹备会——劳动组合期成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世界》并任主编。之后，领导了铁工工会等一批工会的创建并组织了日铁工人罢工等系列罢工斗争。1898年和幸德秋水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1年参与创建日本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政党——社会民主党，但当天即遭查禁。1904年出席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会议。会上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亲切握手，共同呼吁反对当时进行的日俄战争，自此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参与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曾担任共产国际美洲局委员长。1921年应列宁之邀移居莫斯科，自翌年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起，连续当选国际执行委员。1922年初，筹划召开了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并当选大会名誉主席。不久，指导建立了日本共产党。片山潜还是中国革命的一贯积极支持者。“九·一八”事变以后，74岁高龄的他还亲自参加了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召开的反战大会，呼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3年病逝于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红墙下安葬。主要著作有《日本工人运动》、《片山潜自传》等，刊有《片山潜著作集》。

(张锋)

幸德秋水

(Xingdeqiushui 1871—1911)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先驱者。出身于高知县没落商人家庭。原名传次郎，号秋水。早年曾师从著名民权论者林有造和中江兆民，从事自由民权运动。在《自由新闻》、《中央新闻》、《万朝报》当过记者。期间，思想逐渐倾向于社会主义。1898年经片山潜介绍加入社会主义研究会。1901年与片山潜等发起创立了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该党当天即遭查禁。1903年，与堺利彦退出鼓吹日俄战争的《万朝报》，成立平民社并发行了周刊《平民新闻》，推动反战和社会主义运动。1905年因受政治迫害被迫旅美，思想转而倾向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1906年回国后，倡导以整个社会总罢工而使社会瘫痪的“直接行动论”，反对议会斗争。1910年遭当局诬陷，被指控为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的主谋，次年被处以绞刑。主要著作有《廿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神髓》等，见于《幸德秋水全集》。

(张锋)

非洲近代史

(feizhou jindaishi) 非洲大陆各民族卷入世界历史潮流，逐渐沦为西欧各国殖民地的历史。

15 世纪西欧各国开辟新航路之前，除北非地中海沿岸外，非洲大陆与外界只有零星的、断断续续的接触。西欧人的入侵打断了非洲各民族独立的发展道路，使之卷入世界历史的统一进程。因此，近代非洲的历史起源于西欧人的入侵。

西欧人到来之前，非洲大陆地理上的隔绝状态造成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16 世纪时，南非的布须曼人、霍屯督人、刚果河流域的俾格米人仍然依靠食物采集为生，西非则出现过强大、繁荣的廷巴克图王国。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臣服于奥斯曼帝国。

葡萄牙人最先来到人口稠密、文明程度较高的西非，通过沿海部族首领的中介，用欧洲生产的小商品、布料、酒类等交换非洲内地出产的金银、象牙等。非洲各部族广泛存在着奴隶制。从 1510 年起葡萄牙人开始向新大陆贩奴。16—18 世纪相继出现的主要贩奴国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为此，各国在西非塞内加尔到安哥拉沿海建立了 40 个据点。奴隶来源主要是当地部族战争中捕获的俘虏。典型方式是三角贸易。400 年的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数以亿计的人口，加深了部族之间的冲突。18 世纪末开始的欧洲废奴组织的积极活动和工业革命后扩大正常贸易的需要推动欧洲各国政府从 1833 年起相继禁止奴隶贸易。阿拉伯人穿越撒哈拉沙漠经东非沿海的奴隶贸易持续到 1914 年。

到 1800 年，非洲内陆仍然被称为“黑暗大陆”。炎热的气候、热带疾病、沙漠和沼泽、湍急的河流以及当地部族的抵抗阻滞了欧洲人的深入。19 世纪初到 70 年代以英、德等国科学家和传教士为主的探险队依靠先进的交通、医药、军事技术深入非洲内陆，揭开了尼日尔河、尼罗河、刚果河和赞比西河流域的秘密，也为 19 世纪末对非洲的瓜分提供了科学依据。最著名的探险家是利文斯顿和斯坦利。

1870 年代，奴隶贸易时代的沿海据点均已荒废，欧洲人只在阿尔及利亚和开普地区开始真正的殖民活动。70 年代的新殖民主义理论视殖民地为母国强盛的基础。1876 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以向非洲传播文明的名义，委托斯坦利以同当地土著首领签约的方式控制了刚果盆地 90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揭开了瓜分非洲的序幕。德、法、葡、英、意各国相继以这种方式参加瓜分，到 1914 年，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外，非洲被瓜分完毕。

瓜分非洲时期开采钻石、黄金、铜等矿产资源和兴办出产棕榈油、橡胶的种植园成为殖民活动的主要内容。欧洲移民大批涌入罗德西亚南部等富饶地区。为运送内地产品殖民者修建了铁路。非洲土著居民丧失土地后被迫在白人矿场、种植园劳动。自给自足经济破坏，非洲各国经济卷入世界市场并受西方各国控制。教会学校教授农业、建筑、医药方面技术和知识，传教士把非洲语言记录成文字，奠定了非洲土著文学的基础。医药知识的传播使当地人怀疑祖先对疾病和死亡的看法，从而削弱了当地宗教的影响力。殖民者通过国际协约，无视土著居民的利益，自行划定了国界。政治上一般采取保留当地酋长一定权力的间接统治。非洲各族人民为反抗西方殖民者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尤以 1882 年埃及奥拉比抗英运动、1881—1899 年的苏丹马

赫迪起义、1895年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最为著名。20世纪初，受过西方教育的土著居民要求参与行政管理，是为民族主义的开端。

（许虹）

苏伊士运河

(Suyishi yunhe) 贯通苏伊士地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南北走向、不设船闸的海平面运河。长 168 公里，宽 180~200 米，深 12~15 米。公元前 19 世纪法老西索斯特里斯曾试着开凿从尼罗河到红海的东西走向的运河。公元前 600 年法老尼可重新动工，直到公元前 285 年托勒密王朝才完工。公元 767 年，被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堵塞废弃。1798 年，拿破仑占领埃及后，曾考虑开凿从地中海到红海的运河。1833 年法驻埃副领事费迪南·德·莱塞普斯读到当年开凿计划报告，为之打动。1854 年和 1856 年，作为商人，与早年结交的现任埃及帕夏签订了两项合同，被授权建立运河公司，负责开凿运河，规定自运河通航之日起，公司占有运河 99 年，然后交归埃及。1858 年，国际苏伊士海运运河公司成立，法国购买 52% 的股票，因英国鼓动其他国家拒绝认购，埃及被迫购 44% 的股票。1859 年，运河开始动工。原定 6 年完工，实际历时 10 年。埃及先后强征几十万劳工，主要使用锹镐和土筐。因气候炎热、饮水匮乏、伙食粗劣、疾病流行（1865 年的霍乱最为严重），据说有 12 万劳工丧生。1869 年 11 月，运河正式通航。1875 年，埃及因财政困难被迫将运河股票廉价卖给英国。运河完全受英法股东的控制。1888 年，君士坦丁堡国际会议决定，无论平时战时，运河对一切国家的船只开放。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445-1.bmp}

(刘北成)

苏丹马赫迪起义

(Sudan mahedi qiyi) 19世纪后期苏丹反埃反英大起义，非洲近代史上最大的反殖武装起义。领导者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阿卜杜拉，生于贫苦的造船工家庭，从小受伊斯兰神学教育，后从事传教。1871年起，率信徒在阿巴岛洁身自修，主张复兴纯洁的伊斯兰教义，指斥埃及和欧洲人对苏丹的压迫。1881年6月，自称“马赫迪”（救世主），8月发布起义公告，率举木为兵的300信徒击败埃及政府讨伐军，随即转入卡迪尔山区。各地群众闻风而动，投奔义军。到1883年初，起义军先后歼灭、击溃两支讨伐军并占领苏丹第二大城乌拜伊德。1883年11月，在希甘战役中全歼英国军官希克斯率领的8000远征军。已于1882年占领埃及的英国政府决定出面干涉，委任“苏丹通”戈登为苏丹总督（戈登以前曾以个人身份受聘于埃及政府，出任苏丹赤道省长和总督）。马赫迪拒绝了戈登的诱降，围困了首都喀土穆。1885年1月26日，攻击破城，击毙戈登。然后，定恩图曼为新首都。6月，马赫迪猝然病逝，由其弟子和助手阿卜杜拉继位。至9月，起义军解放了除萨瓦金港以外的苏丹全境。在阿卜杜拉哈里发执政14年间，苏丹成为独立的封建神权国家。起义领袖将没收的原土耳其、埃及地主官僚的大地产据为私有，起义时期的公产平均制度被新的封建等级关系所取代。因同埃塞俄比亚进行长达5年的战争，同埃及的边境冲突不断，以及内部叛乱迭起，马赫迪国家急剧衰落。1896年，英、埃联军大举入侵苏丹，马赫迪军进行英勇抵抗。1898年9月2日，经过激战，恩图曼陷落。阿卜杜拉率余部，退入西部沙漠。1899年11月，阿卜杜拉战死。马赫迪国家灭亡。

（刘北成）

利文斯顿

(Liwensidun,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 非洲近代史上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探险家。生于苏格兰贫民家庭。10岁进纱厂做工，坚持在业余学校学习。很早便立志当传教士，并学习医学。1838年，参加伦敦宣教会。1840年，被派往非洲南部。1841年到宣教会南非北部最远的传教站库鲁曼后，深入周围各部落，一面传教，一面免费行医。目睹奴隶贸易而深恶痛绝。为了传教和用“合法贸易”取代奴隶贸易，先后进行三次地理考察，寻找进入中南非腹地的道路。1852年，从开普敦出发，经库鲁曼到赞比西河，1854年抵达西海岸的罗安达。不久沿原路折回，顺赞比西河而下，1856年抵达莫桑比克的克利马内。年底回到英国，受到热烈欢迎，分获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勋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所著《在南非的传教旅行和考察工作》风靡全国。1858年，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率领考察队，进行第二次非洲考察旅行。考察队溯赞比西河而上，考察了尼亚萨湖(今马拉维湖)，还到达鲁伍马河流域。赞比西河被葡萄牙殖民当局视为禁脔，反对利文斯顿的活动。英政府遂于1863年召回考察队。1864年，利文斯顿回国，翌年出版《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险队》，集中地揭露了奴隶制度的罪恶和奴隶贸易的丑闻。1866年，组织了几十个非洲人参加的考察传教队，从坦噶尼喀沿海出发，越过鲁伍马河，绕道尼亚萨湖南端，到达坦噶尼喀湖，相继勘察了姆韦鲁湖、班韦乌卢湖，1869年到达乌季季，以后最远到刚果河上游地区。1871年折回乌季季，遇到因三年没有消息受雇调查他的下落的《纽约先驱报》记者斯坦利。1872年再次向南进发，因体力衰竭、重病缠身，于1873年5月在赞比亚中部的奇坦博村逝世。1874年，遗体运回英国，在伦敦举行了葬礼。

(刘北成)

奥拉比

（旧译阿拉比，Aolabi，Ahmad Orabi 1841—1911）19世纪末埃及抗英运动领袖。生于小地主家庭。13岁应征入伍，19岁成为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第一个荣获中校军衔的土著埃及人。在伊斯梅尔当政时期（1863—1879年），目睹国家危亡，身受民族歧视之害（16年间未升一级，反被无辜革职三年），形成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1876年，参加并领导了青年埃及协会。该协会与祖国协会联合，于1879年改名为祖国党，奥拉比当选为主席。该党以土著军官、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地主为主体，要求改革，消除西方殖民主义和土耳其、契尔克斯人的民族压迫，实现“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1881年9月，奥拉比进行兵谏，迫使政府改组。1882年2月，由亲奥拉比的巴鲁底组阁，奥拉比出任陆军大臣，为内阁实际掌权者。内阁颁布“基本法”，规定内阁向议会负责；解雇一批外籍官吏；提升土著军官；扩充军队。5月，英、法舰队抵埃，迫使巴鲁底内阁辞职，改革夭折。奥拉比在土著军人支持下留任。7月，英军入侵亚历山大城，奥拉比英勇抵抗后，率领全城军民撤离，随即号召进行“圣战”。在开罗组成军事会议，履行中央政府职责，被授予“埃及保卫者”头衔。8月，亲自指挥开罗附近的保卫战。因敌强我弱，9月14日，开罗沦陷。奥拉比被捕，被流放到远离国土的锡兰（今斯里兰卡）。1901年，获释回国，曾一度表示支持英国占领埃及，但终于消除幻想，号召青年一代为光复埃及独立奋斗。

（刘北成）

孟尼利克二世

(Mengnilike ershi, Menelik 1844—1913) 埃塞俄比亚皇帝，埃塞俄比亚现代民族国家的缔造者。原为绍阿国王之子。11岁时，成为西奥多皇帝的战利品而被囚禁。1865年逃回绍阿，成为国王。在诸侯争雄中实力日长，1889年继约翰四世为帝。为借助外力消除分裂，与意大利签订《乌西阿利条约》。但意大利故意曲解该条约，宣称埃塞俄比亚是它的保护国。1893年，孟尼利克宣布，翌年废除该条约。1894年7月，意大利不宣而战，侵占了一些城市。经过准备，孟尼利克于1895年6月颁布“告人民诏书”，号召“保卫祖国，人人出力”。同年12月和翌年1月，初战告捷。和谈建议遭到意军拒绝后，3月1日在阿杜瓦决战，意大利17000兵力几乎被全歼。意军惨败消息震惊欧洲。10月，意大利政府被迫与孟尼利克王朝签订新约——《亚的斯亚贝巴条约》，承认埃塞俄比亚的“绝对独立”，并赔款1000万里拉。埃塞俄比亚国际声望大大提高，英、法、俄也相继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孟尼利克多次用兵削弱封建分裂势力。1886年，迁都至亚的斯亚贝巴，该城名为皇后所起，意为“新花”。孟尼利克重视经济发展，改革税收制度，吸收外资修建公路、铁路，敷设电报、电话系统，开办现代卫生教育事业。1908年，孟尼利克中风瘫痪，丧失说话能力，权力落入皇后手中。

(刘北成)

马克思

(Makesi, Karl Marx 1818—1883)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市一个律师家庭。1835年10月进波恩大学学习法学, 一年后转到柏林大学法律系, 但经常研究历史、哲学。1841年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5月开始为自由主义者创办的《莱茵报》撰稿, 10月任主编。1843年秋迁居巴黎, 积极参加法国工人运动。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 标志着他最终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巴黎期间还认真研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著作。1844年8月, 恩格斯到巴黎拜访了马克思, 从此开始了两人伟大的合作。

{ewc MVIMAGE, MVIMAGE, !99900320_0446-1.bmp}

1845年1月马克思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 2月, 迁居布鲁塞尔。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1847年初, 写了《哲学的贫困》, 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的理论, 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正确纲领和策略。同时与恩格斯应邀参加了“正义者同盟”的改组工作, 6月, 该组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11月, 出席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1848年2月纲领正式发表, 这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3月马克思被比利时当局驱逐出境, 4月返回德国, 参加德国革命。6月创办《新莱茵报》, 成为当时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德国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并长期在这里定居。1850—1852年写了《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等著作, 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等重要结论。

50年代至60年代, 马克思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创建工作。1859年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系统地阐述了价值理论。1867年, 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 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在于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

50年代末开始, 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高涨, 马克思立即投入了这场运动。1864年9月28日, 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 马克思被选入领导机构, 并担任德国通讯书记, 同时为第一国际起草了《成立宣言》、《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在“国际”存在时期, 马克思积极参与了“国际”的各种活动, 在理论和斗争策略上与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了斗争, 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巴黎公社时期, 马克思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 通过各种渠道与公社保持联系, 宣传公社的意义。公社失败后, 在很短的时间内写了《法兰西内战》一书, 歌颂了巴黎公社的伟大壮举, 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1876年,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的建议下宣布解散, 但马克思继续关注着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准备于1875年5月与拉萨尔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 并在原则上作了很大让步, 马克思抱病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一书, 指出了德国党的错误。1879年针对“苏黎世三人团”的言论, 与恩格斯写了著名的《通告信》, 予以批判。1883年3月14日, 马克思在伦敦逝世, 被安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

(邓伟云)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的纺织厂主家庭。1837年中学未毕业即被迫经商。1841年到柏林服兵役。1842年9月在英国曼彻斯特一家纺织厂工作。1844年3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标志着恩格斯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1844年8月，恩格斯途经巴黎，拜访了马克思，他们倾心交谈了各自的观点，从此成了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同年，他们合著了《神圣家族》一书；1845—1846年又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1845年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846年初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应邀加入德国流亡工人的组织——正义者同盟，并积极参与同盟的改组工作，6月，出席了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盟在他和马克思的建议下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宣言的形式起草一个新的纲领，1848年2月，同盟新的纲领——《共产党宣言》问世。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与马克思合著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为无产阶级制定了行动纲领。4月与马克思回到德国，协助创办《新莱茵报》。革命失败后到伦敦写了《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等总结性著作，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1850年重返曼彻斯特，进行了长达20年的经商生涯，主要目的是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同时他还认真研究自然科学和军事理论。1870年1月回伦敦，10月被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成立后，热情赞扬公社的伟大壮举。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潮如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进行了批判，先后写了《论住宅问题》、《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著作。1873年恩格斯开始研究自然辩证法，写的手稿在逝世后被编成《自然辩证法》一书出版。1877—1878年写成《反杜林论》一书，详尽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集中精力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使之在1885年和1894年分别出版。1884年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第一次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了经典的概括，并着重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889年积极帮助、督促倍倍尔等人筹建第二国际。1891年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3月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对主张和平、改良的机会主义理论进行反击。1895年8月5日在伦敦逝世。

(邓伟云)

共产主义者同盟

(Gongchanzhuyizhe tongmeng) 世界上第一个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也是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1847年6月由德国政治流亡者组织——正义者同盟改组而成。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莫尔等在同盟遭受多次挫折后，感到原先的指导思想存在不足，转而寻求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1847年初沙佩尔等人正式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帮助制订新的纲领。1847年6月2日至9日，同盟在伦敦秘密举行改组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大会选举沙佩尔为主席，马克思、恩格斯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同盟的纲领，马克思第一次出席了大会。大会经过讨论，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纲领中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大会正式通过了恩格斯等人起草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章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还决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以宣言的形式起草同盟的纲领。1848年2月，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

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后，同盟中央委员会把权力移交给以马克思为主席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3月又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并派遣数百名工人回德国参加革命。4月，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中央委员也返回德国。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成了指导盟员斗争的指导性刊物。由于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盟员间的联系中断，盟员各自以各种形式参加革命斗争，有的参加各种公开组织，有的在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1848年底，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派莫尔回德国整顿组织，试图恢复组织联系，没有成功。1849年秋，同盟大多数领导人回到伦敦。次年春组织得到恢复，并日趋活跃。1850年9月，同盟发生了分裂，维利希、沙佩尔等少数派反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准备长期斗争的策略，另建新的中央委员会。同盟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同盟总部由伦敦迁往德国科伦，并委托科伦区部委员会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准备解散伦敦区部，成立两派各自的伦敦区部，以挽救同盟的分裂。9月底科伦区部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宣布解散伦敦区部，但维利希、沙佩尔等拒绝合作。

由于警察的迫害，到1851年5月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基本停止，同盟的11名重要成员被捕，其中7人在第2年11月被判处徒刑，这就是“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1852年11月17日，鉴于同盟各支部活动日益困难，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同盟宣布解散。

(邓伟云)

国际工人协会

(Guoji gongren xiehui)即第一国际。世界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国际组织，成立于1864年9月。19世纪60年代初，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走出低谷，掀起新的高潮。各国工人在实践中认识到加强国际工人间合作的必要性。1863年7月22日，英国工人在伦敦举行声援波兰人民反抗俄国统治者的群众大会，法国工人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两国工人代表讨论了成立国际组织的问题。11月英国工人会议通过了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号召召开各国工人参加的大会，成立国际组织，共同对付资产阶级。1864年9月28日，英国工人在伦敦圣马丁教堂为波兰事件举行工人大会，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等国的工人代表也应邀出席了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法国工人的倡议，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协会，并选出21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同年11月改名为中央委员会，1866年底又改称总委员会），委托它制订协会的章程。大会还决定协会的总部设在伦敦，以《蜂房报》（英国工联的机关报）为协会的机关报。这次大会被认为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大会。10月5日，临时委员会召开会议，选举出协会的领导人：主席、总书记、财务委员和各国通讯书记，并由这些人组成常务委员会。选举结果：奥哲尔为主席，克里默为总书记，马克思为德国通讯书记。10月11日临时委员会决定把协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11月1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执笔起草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马克思在这两个文件中，以巧妙的语言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思想，既坚持了原则，又灵活地照顾到现实条件下工人的思想水平。《成立宣言》阐明了“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指出了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临时章程》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获得”，工人阶级的任务是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还规定“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由它选举总委员会，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总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国际工人协会存在期间，积极团结各国工人组织，发展“国际”的支部。1864年底成立了巴黎支部，并在瑞士成立了德国流亡者国际支部和法国流亡者国际支部。此外，在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也成立了支部。德国“全德工人联合会”拒绝参加“国际”，加之各邦法律的限制，许多工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际”，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宣布自己是第一国际的支部。英国许多工人团体也加入了国际，但奥哲尔反对英国工联与国际联系，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第一国际还积极支持和参加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其他进步活动。1867年2月巴黎铜工的罢工、1868年春日内瓦建筑工人的罢工、1868年11月开始的巴塞尔织带工人的罢工等等，都得到了第一国际及各支部的多种形式的支持，如募捐、声援大会等等。第一国际还支持和参加各国的民主运动。波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得到了第一国际的支持与帮助。

第一国际在内部积极开展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曾在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中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两派也都想夺取第一国际的领导权，把自己的纲领和主张强加于国际。开展同他们的斗争对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正确引导各国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1866年第一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在合作社、工会及罢工、妇女劳动等问题上否定了蒲鲁东主义的观点；1868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又就土地所有制问题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的观点。蒲鲁东主义彻底失败。60年代末，“国际”又与巴枯宁主义展开斗争，

1868年12月总委员会拒绝巴枯宁的“社会民主同盟”加入国际；在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主义者提出的继承权问题没有被大会通过；1871年9月，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讨论了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活动问题，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开除巴枯宁主义者。

1871年3月18日爆发的巴黎无产阶级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国际”的威信，第一国际也通过各种方式声援、支持巴黎无产阶级的行动，“国际”许多成员如瓦尔兰等直接参加了革命斗争。因此，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政府对第一国际及其会员共同进行了“讨伐”和迫害，加之巴枯宁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的活动重新活跃，1871年的国际海牙大会决定把总部迁往美国纽约，由于与欧洲工人联系困难，至此，“国际”的活动基本停止。同时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各国工人组织开展符合本国实际的斗争，“国际”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宜新形势的要求，根据马克思的提议，1876年7月的费城代表会议宣布国际解散。国际工人协会加强了各国工人之间的团结，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伟云）

第二国际

(Dier guoji) 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和团体联合组成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889年7月14日,即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日。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和团体在欧美各国纷纷建立,几乎遍及每一个国家。如1876年美国成立了美国劳动人民党,次年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1879年法国工人党成立;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瑞士创建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加强国际间的联系和相互支援成为各国政党的共同要求。1888年,英国工联主义者、法国可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抢先决定在1889年7月召开新国际成立大会,企图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为此,马克思主义者于1889年2月召开海牙代表会议,决定同年7月14日在巴黎也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恩格斯的直接帮助和督促下,大会如期在巴黎召开,到会代表393人,来自22个国家。而同时法国“可能派”召开的大会只有10个国家的代表,而且绝大多数是法国代表,其余9个国家的代表总共只有70多名,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巴黎代表大会成为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但第二国际没有常设的中央领导机构,也没有制订纲领和章程。直至1900年才决定成立一个执行局,但只是一个工作机关,不具有领导职能。因此第二国际实际上是以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作为它的组织形式,组织比较松散。在第二国际存在的26年中,共召开了9次代表大会,除了成立大会外,另外8次是:1891年8月16日至22日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3年8月6日至12日的苏黎世代表大会、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的伦敦代表大会、1900年9月23日至27日的巴黎代表大会、1904年8月14日至20日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7年8月18日至24日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0年8月28日至9月3日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以及1912年11月24日至25日的瑞士巴塞尔代表大会。

在巴黎的成立大会上,代表们讨论了劳工立法问题,并作出决议要求各国工人为实现劳工立法而斗争;还讨论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问题,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还必须开展政治斗争。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是这次大会最重要的决议,它号召各国工人在每年的5月1日举行示威游行,要求8小时工作制。1891年的第二次(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讨论了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罢工问题、妇女问题等。大会通过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决议草案,认为要消灭战争就必须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实现社会主义。1893年的第三次(苏黎世)代表大会讨论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争取普选权问题、工会问题等。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中,强调组成全国性、国际性的工会组织和其他工人联合组织是绝对必要的。会议还重申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以上几次代表大会都是在恩格斯逝世前举行的,在各项决议中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既反对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又抵制了机会主义、合法主义的倾向。1895年恩格斯逝世。此后机会主义思潮开始泛滥,并逐渐在第二国际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伯恩斯坦、米勒兰等,他们形成了第二国际中的右派,反对实行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1900年的第五次(巴黎)代表大会就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进入资产阶级内阁一事展开激烈的辩论,由于右派和中派的支持,大会没有形成谴责的决议。国际中的中派以考茨基为首,他们实际上是同情和支持右派。在国际的第五次代

表大会上，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被大会通过，他认为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策略问题，是一个暂时性的特殊手段。这个决议案伸缩性很大，被人称为“橡皮决议案”。以列宁、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为首的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他们的努力下，第二国际在后期继续通过了一些正确的决议。1904年的第六次（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通过了谴责任何与资产阶级政党妥协的提案。1907年的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案，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而应利用战争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大会还通过了谴责“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决议。1910年的第八次（哥本哈根）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合作社运动的修正案，指出合作社运动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效武器，工人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才能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1912年的第九次（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巴塞尔反战宣言》，全称为《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指出正在酝酿的战争完全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各国人民要以一切手段来反对战争，一旦战争爆发，则应利用战争出现的经济政治危机来加速社会革命。但这些决议并没有真正被各国党执行下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和领导人都公开支持战争，完全抛弃了第二国际的决议和立场，各国社会党之间也都失去了联系，第二国际在政治上、组织上都彻底破产了。

（邓伟云）

三十年战争

(Sanshinian zhanzheng)在欧洲中古到近代交替阶段发生的第一次全欧性战争，从 1618 年到 1648 年绵延 30 年，故名。战争导源于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宗教和政治纠纷。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后，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争夺教会地产和势力范围，1608 年和 1609 年分别建立了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欧洲其他国家为争夺地区和全欧霸权而觊觎分裂的德意志，积极介入德意志的争端。法、荷、英、丹、瑞等支持新教联盟，西班牙和罗马教皇则支持天主教联盟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18 年 5 月 23 日，在布拉格召开的波希米亚（今捷克）等级会议上，新教贵族代表抗议宗教迫害，将几个皇家官吏掷出窗口，是为“布拉格窗口事件”，开始了反对帝国皇帝的波希米亚战争。战争历时 5 年，得到新教联盟支持的波希米亚起义军终不敌天主教联盟军队而失败。波希米亚丧失原有的自治权利。1625 年，在英、荷、法的支持下，丹麦侵入德意志，得到新教诸侯的军事策应，开始了丹麦战争时期。1629 年，因战争失败，丹麦被迫签订吕贝克和约。同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颁布“归还教产敕令”，要求新教诸侯将侵占的教会地产归还天主教会。1630 年，瑞典以反对敕令为名，发动瑞典战争。瑞军得到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配合，节节取胜，但在 1634 年诺德林根会战中失利。1635 年，新教诸侯相继与帝国皇帝议和。为扭转劣势，法国放弃表面的中立，与瑞典结成军事同盟，公开参战。由此开始了持续十几年的法瑞同盟战争时期。在意大利和尼德兰战场上，法军重创西班牙军队，在德意志战场上，法瑞联军完全控制了局势。自 1643 年起，交战双方开始和谈，但军事行动没有停止，影响了各方的要求。直到 1648 年 10 月 24 日，才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条约，法国获得阿尔萨斯地区、麦茨、土尔、凡尔登等；瑞典获得西波美拉尼亚，并控制了德意志北端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荷兰、瑞士的独立得到承认；德意志各邦获得内政和外交的自主权，德意志的政治分裂进一步加深。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和和约创立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并在实践上肯定了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原则。

(刘北成)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xibanya wangwei jicheng zhanzheng) 1701—1714 年英、法等国利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为争夺贸易霸权和政治优势而进行的国际战争。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无嗣，指定法王路易十四之孙菲力普为继承人。1701 年，菲力普继位。路易十四宣布菲力普有继承法王的权利，并派兵进驻西属尼德兰。英、荷遂联合早已觊觎西班牙王位的奥地利组成抗法大同盟，普鲁士、汉诺威、德意志其他诸邦、葡萄牙、丹麦、瑞典、萨伏依等先后加入。与法、西结盟的只有巴伐利亚、科隆。1701 年 3 月，战争开始。在欧洲有四个战场：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西班牙。反法联军在前三个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在西班牙战场上，菲力普五世进行顽强的抵抗。1711 年，该战场形势转而有利于法、西。同时，英法在北美展开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英军取得优势，1710—1711 年，英国内主和派上台、反法同盟内亦发生分歧。英国单方面与法秘密谈判，各国随后亦与法议和。1713 年，在荷兰乌特勒支缔结一系列和约。根据乌特勒支和约，西班牙国王不得兼任法国国王，西班牙在欧洲的属地被瓜分，大片法属北美殖民地让与英国。英国还获得西班牙的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上的要塞，并取得向西属殖民地贩运黑奴的特权。该和约划定了 18 世纪西欧的基本疆界，进一步确定了英国海上和殖民地霸权，使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开始丧失。

(刘北成)

七年战争

(Qinian zhanzheng) 法国大革命前最后一次全欧性冲突，其中主要是普、奥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和英、法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1756年，奥地利为收回1740年普鲁士占领的西里西亚，缔结法、奥反普同盟，其后萨克森、瑞典、俄国相继加入。普鲁士则与法国的对手英国、汉诺威结盟。8月，普鲁士先发制人，攻占萨克森，战争爆发。在欧洲大陆战场，战争初期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少胜多，战绩辉煌。1757年11月5日在罗斯巴赫战役中以550人伤亡的代价创敌7000。12月5日洛伊滕会战，普军损失6000，奥军则折兵2万多，为军事史上一奇观。但后期，普军兵源枯竭，处境恶化。1762年，俄国由助奥转为助普，旋即退出战争。普军转劣势为优势。在海上和殖民地，英军节节胜利。1759年，几乎全歼法国舰队。1760年，占领加拿大全境。1761年，消灭了法国在印度的军事势力。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和约，英国获得加拿大等美洲殖民地及对印度的支配权。普、奥签订胡贝尔图斯堡和约，奥承认普对西里西亚的占有。七年战争结束了法国的欧洲霸主地位，进一步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奥地利被削弱，普鲁士国际地位提高，俄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刘北成)

维也纳会议

(Weiyena huiyi) 拿破仑帝国覆灭后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会议。会议从 1814 年 10 月到 1815 年 6 月，历时 8 个月，宗旨为恢复旧的封建统治秩序，重新安排欧洲版图，防止法国东山再起。除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外，欧洲所有国家都出席会议。但从未正式召开大会。最初，俄、奥、英、普四强密商一切，奥首相梅特涅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主角。列强矛盾重重，焦点是波兰——萨克森问题。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为维护法国利益，提出正统原则，挤入列强，形成五国协商。1815 年 1 月，英、奥、法秘密签订针对俄、普的防守同盟条约，迫使俄、普有所收敛。6 月 9 日，各国代表签署总决议。根据总决议，法、西、那不勒斯、葡萄牙等恢复旧王朝；意大利、德意志维持分裂状态；建立以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邦联；比利时与荷兰合并，充当防御法国的屏障；瑞士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俄国占有波兰、芬兰等；英国占有战争中夺得的大片殖民地和马耳他岛；普鲁士占有萨克森北部和波兹南等；奥地利占有伦巴底、威尼斯等。维也纳会议建立了俄、奥、普、英支配欧洲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梅特涅起了特殊作用，亦称“梅特涅体系”。

(刘北成)

神圣同盟

(Shensheng tongmeng) 1815年以俄国沙皇为首的欧洲君主组成的反动同盟。根据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倡议,1815年9月,俄、奥、普三国君主在巴黎共同发表神圣同盟宣言,声称,为维护基督教、和平与正义而互相支援。宣言没有规定有效期限和具体义务。年底,除英国、教皇和土耳其外,所有欧洲国家都加入该同盟。英国表示同意宣言原则。同年11月,英、俄、奥、普建立四国同盟,1818年,法国加入,变为五国同盟。五国同盟是维也纳体系和神圣同盟的实际支柱。五国同盟于1820年10月在奥属特洛波、1821年1月在莱巴赫举行会议,决定由奥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1822年10月至12月,在意大利的维罗纳举行会议,决定由法出兵镇压西班牙革命。英国反对这两项决定。1822年,希腊独立战争开始后,希腊问题造成五国之间更深刻的分歧。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五国同盟和神圣同盟实际已不复存在。

(刘北成)

克里木战争

(Kelimu zhanzheng) 1853—1856 年以克里木半岛为主战场的一次国际战争，其实质是沙俄与英、法在近东争霸。19 世纪 50 年代初，俄、法分别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争夺耶路撒冷圣地建筑的“钥匙权”（管辖权），对土耳其施加压力。1852 年，土耳其将钥匙权交给天主教。1853 年 7 月，俄国以保护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徒为名，侵入土耳其属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今罗马尼亚）。10 月，土耳其对俄宣战。11 月，俄国舰队在锡诺普歼灭土耳其黑海舰队。1854 年 1 月，英、法舰队驰入黑海，保护土耳其海岸和运输。3 月，英、法、土缔结军事防守同盟，随后，法、英对俄宣战。5 月，俄军在锡利斯特拉遭土军抵抗，折兵 5 万。奥地利陈兵边境，要求俄国撤军。俄军被迫放弃两公国。9 月，英、法、土联军在克里木半岛登陆，围攻俄国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恶战 349 天。1855 年 1 月，撒丁王国参加联军作战。9 月，俄军放弃要塞。俄、土陆军在高加索、英、法和俄海军在波罗的海也进行了战斗。1856 年 2 月，俄国被迫宣布停战。3 月，双方签订巴黎和约，规定列强共同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完整，俄国将南比萨拉比亚割给摩尔多瓦，实行黑海中立化，禁止军舰通过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禁止俄土在黑海沿岸建立军火库。克里木战争双方损失惨重。统计数字众说纷纭。最低数字为双方各损失 25 万人，最高数字为俄国损失 52 万、土耳其 40 万、法国 9 万 5 千、英国 2 万多。战争结束了俄国的欧洲霸权，建立了法国拥有欧陆优势的新格局。

（刘北成）

普奥战争

(Pu Ao zhanzheng) 1866年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决定性战争。奥地利和普鲁士长期以来争夺德意志的统治权。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决定用战争解决问题，为此做了周密准备。1866年初，以含混的许诺争取法国中立。4月，与意大利缔结秘密军事同盟。普军经过改革，装备了先进的后膛枪和线膛后装炮，擢升了年轻能干的军官，制定了速决速战的战略计划。6月7日，普军侵入奥地利管辖的霍尔施坦公国，战争爆发。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黑森等邦支持奥地利。北德意志各邦、汉堡等自由市支持普鲁士。20日，意大利参战。普军用发达的铁路线快速调动，用电报统一指挥。7月3日，在萨多瓦（今捷克境内）会战中，重创奥军主力。俾斯麦否定军队将领关于攻占维也纳的主张，于7月26日与奥缔结停战协定。战争历时七个星期，亦称七星期战争。8月23日，普奥签订布拉格和约，规定德意志邦联议会解散。9月，普吞并汉诺威、黑森——加塞尔、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等地。翌年，成立以普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基本实现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统一。

(刘北成)

普法战争

(Pu fa zhanzheng) 普鲁士为完成德意志统一和争夺欧陆霸权与法国进行的一次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后，普法关系日趋恶化。法国拿破仑三世反对普鲁士的兴起，阻挠普统一德意志。1870年，为防止腹背受敌，要求普王室不得接受虚悬的西班牙王位。7月14日，俾斯麦删改普王答复电文，侮辱法国。7月19日，拿破仑三世对普宣战。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等南德诸邦参战支持普鲁士。普军在数量、装备和训练方面均占优势，进入法境，连战连捷。8月底，将法军麦克马洪军团和拿破仑三世围困于色当要塞。9月1日，法军突围失败。9月2日，拿破仑三世、麦克马洪及39名将军、8万士兵投降。9月4日，巴黎发生革命，宣布废除第二帝国，建立第三共和国，组成国防政府。19日，普军开始围攻巴黎。10月中，普军南下占领奥尔良市，该月底，在法国北部迫使巴赞元帅率17万法军投降。法国南方组建了数支新军，一度收复奥尔良。加里波第率16000军队收复第戎市。1871年1月，法军在各地均遭失败。法国1/3领土沦陷。1月18日，普鲁士王在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1月28日，国防政府与德国缔结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2月，新选出的法国国民议会建立梯也尔政府，与德国谈判和签订和约。3月1日—3日，德军占领巴黎48小时。5月10日，在法兰克福双方签订最终和约，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及洛林的大部分，3年分期向德国赔款50亿金法郎，赔款付清之前，德军占领法国北部，法国负责占领军的给养。普法战争结束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及法国的欧陆霸权。德意志实现了在普鲁士统治下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德国对法国领土的占领和掠夺改变了战争初期的客观进步性质，使法德结为世仇。

(刘北成)

英布战争

(Ying bu zhanzheng) 1899—1902年英国和布尔人争夺对南非的殖民统治权的战争。又称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19世纪末南非有两个布尔人(荷兰人后裔)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英国殖民地——开普和纳塔爾。1867和1884年在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境内先后发现金刚石矿和金矿后,英国和布尔人争夺加剧。1877年,英国武装吞并德兰士瓦。1880年12月至1881年3月,布尔人与英军进行战斗,是为第一次英布战争。8月,英国被迫承认德兰士瓦恢复独立。1895年,英国殖民当局策划组织“詹姆森袭击”(南非公司经理詹姆森率500人偷袭德兰士瓦政府),遭到失败。1899年,英国借口布尔人共和国不给非荷兰人以选举权,陈兵德兰士瓦边境。10月11日,布尔军队在英军拒绝撤离后,攻入纳塔爾,揭开战幕。战争伊始,布尔军队依靠人数和熟悉地形的优势,取得辉煌战果。1900年,英军更换将领,并从英国、印度、加拿大、澳洲等地调来援军,兵力十倍于布尔军队。2月,英军从防守转为进攻,3月占领奥兰治首都布隆方丹,5月占领德兰士瓦首都比勒陀利亚。布尔军队化整为零,展开游击战。英军则实行焦土政策,焚毁农庄,将200万人赶入集中营,在铁路沿线建造8000个碉堡,还不时扫荡游击区。1902年5月31日布尔人游击队代表会议决定投降,当夜英布签订韦雷尼京条约,布尔人承认英国的统治权,英国则允许布尔人成立自治政府,同时赔偿300万英镑。1910年,英国将南非4个殖民地合并成南非联邦。列宁认为,英布战争是帝国主义形成的主要历史标志之一。

(刘北成)

美西战争

(Mei xi zhanzheng) 1898年4至7月美国与西班牙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主要起因于美国侵占古巴的企图。1898年4月，美趁古巴掀起反抗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胜利在望之机，借口美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爆炸事件，对西班牙宣战。双方交战3个月，主要是在古巴和菲律宾进行，互有胜负，但美军在海战中大获全胜。8月12日，双方同意停止军事敌对行动。12月10日，美国和西班牙在巴黎正式签订和约。通过这场战争，美国占领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它是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标志，亦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主要历史标志之一。

(杨玉圣)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

(yijiulingsi—yijiulingwuni-anrie zhanzheng) 1904—1905 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后，日、俄在远东矛盾日趋尖锐。俄国发起“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1898 年，俄国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1900 年，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02 年，英、日缔结针对俄国的同盟条约后，日本开始准备对俄战争。因外交孤立，俄国被迫与清政府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但俄国不仅没有按期撤兵，而且将军队开进在朝鲜的森林租让区。1904 年 2 月 6 日，日本与俄国断交，2 月 8 日，日军对旅顺口和仁川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2 月 9 日、10 日，俄、日相互宣战。2 月 16 日，日本第一军在仁川登陆，4 月底渡过鸭绿江，第二军和第三军先后于 5 月和 6 月在辽东半岛登陆，占领大连。8 月底，日军进攻辽阳，遭受重大伤亡。俄军指挥官却判断错误，于 9 月 3 日下令撤退。在辽、沈地区，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日军转而集中兵力围攻旅顺口。从 8 月 19 日起，经过多次鏖战，困于港口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几乎被全歼，旅顺俄军于 1905 年 1 月 2 日投降。2 月 20 日起，日军进攻沈阳。俄军调度失误，惨遭失败。3 月 10 日，日军占领沈阳。5 月 27 日，前来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在马尼拉海峡遭到日本舰队的伏击，几乎被全歼。俄国的战争失败引发了 1905 年革命，日本亦因消耗过大希望停战。美国出面调停。9 月 15 日，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霸权，将旅顺、大连和一部分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同时割让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该条约直至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才宣告失效。日俄战争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的格局，俄国被削弱，日美矛盾开始突出。日、俄双方野蛮践踏中国和朝鲜的主权，尤其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452-1.bmp}

(刘北成)

同盟国

(Tongmengguo) 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德、奥为核心的帝国主义军事同盟。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德、法结下世仇。1878年，德、俄关系恶化，德国遂同与俄争雄于巴尔干的奥匈帝国秘密缔结针对俄、法的同盟条约。其后，意大利因与法国矛盾激化，要求加入德奥同盟。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在维也纳签订。条约规定，如意大利受到法国进攻，德奥军队全力援助意大利；如德国受到法国进攻，意大利负有同样义务；如某同盟国与俄国发生战争，意大利将守中立。1887年，三国同盟条约续订，同时分别签订德意条约和奥、意条约，规定如意为保障其在地中海的地位而进攻法国，德国将给予军事援助。1891年，三国同盟再次续订，德国承诺支持意大利在北非扩张的行动。此后，德国与英国矛盾发展，而意大利与英国有利益关系，并且意大利与法国逐渐和解，于1902年订立中立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意大利宣布中立，1915年，加入协约国。1914年10月和1915年10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先后加入同盟国。1918年，同盟国战败，同盟瓦解。

(刘北成)

协约国

(Xieyueguo)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法、俄为主的帝国主义军事同盟。19世纪80、90年代，德、奥、意三国同盟建立，德、英友好，英、意交往。法、俄为打破各自的孤立状态而相互接近，于1893年正式签订秘密军事协定，规定在遭受三国同盟进攻或威胁时互相支持。进入20世纪，因德、英矛盾发展，英、法接近，于1904年签订协定，就双方瓜分非洲等殖民地的矛盾达成协定。该协定意在消解双方矛盾，共同对德。在日、俄战争中俄国失败，俄国不再成为英国主要竞争对手。1907年，缔结英、俄协定，就双方在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殖民扩张达成妥协。至此协约国最终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意大利、罗马尼亚、美国等24个国家先后加入协约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退出。自1918年3月，协约国军开始武装干涉苏俄。德国战败后，协约国分别于1919年春、秋和1920年4月发动三次对苏俄的大规模武装干涉，均被挫败。随着第一次大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协约国不复存在。

(刘北成)

萨拉热窝事件

(salarewo shijian)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事件。萨拉热窝是波斯尼亚首府。1908年，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的斯拉夫人热切希望摆脱奥地利控制，与塞尔维亚合并，建立统一国家。1914年6月28日是塞尔维亚人民纪念1389年沦为土耳其属地的国耻纪念日，奥军在波斯尼亚进行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奥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夫妇亲往检阅。事毕，乘敞篷汽车巡视萨拉热窝。塞尔维亚秘密爱国军人组织黑手党沿街伏击。查卜林诺维奇投掷炸弹，未击中，被捕。稍后，“青年波斯尼亚”成员、17岁的普林西波开枪击毙斐迪南夫妇。普林西波被捕后因未到判死刑年龄而被判监禁，1918年死于结核病。奥地利以行刺事件作为对塞战争的借口，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政府提出苛刻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接受了绝大部分条件，奥地利仍于7月28日对塞宣战。由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刘北成)

施利芬计划

(Shilifen jihua)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实施的战略计划，由前总参谋长施利芬伯爵于 1905 年制定，故名。施里芬是闪电战理论的创始人，主张以优势兵力袭敌于不备，围而歼之，速战速决。针对在未来战争中德国将面临与法、俄两线作战的情况，他主张，首先在西线迅速打垮法国，然后再全力打击俄国。其作战计划是：在东线用少量部队顶住俄国，集中兵力于西线；因瑞土地形复杂，不适宜大部队快速运动，德军右翼应穿越地势坦荡的比利时，以镰形攻势包抄到法军的正面防御阵地的后面，攻占巴黎后，将法军围歼在德、法、瑞边境。然后，转向东线。1906 年小毛奇继任总参谋长后，对施利芬计划做了部分变动，加强了西线左翼和东线的兵力，削弱了西线进攻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由于德军在马恩河战役失利，施利芬计划破产。

(刘北成)

马恩河战役

(Maenhe zhanyi)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马恩河地区进行的两次会战。第一次发生在 1914 年 9 月 5 日—12 日。此前，英、法联军在边境作战失利，撤过马恩河，集结了精锐部队，重新做了部署。德第 1、2 集团军因追击退却之敌而偏离原定进攻方向，进入法军重兵集结之地区。9 月 4 日，法军总司令霞飞下令反攻。双方在宽达 200 公里的地带展开激战。德军作战兵力为 68 万，英、法联军投入 84 万军队，占有优势。由于德第 1、2 集团军之间出现宽达 50 公里的缺口，英、法联军趁虚而入。10—14 日，德军为避免被分割包围而后撤到埃纳河以北。这次战役英、法伤亡 22 万多人，德军折兵 25 万多人。从此，战争转入旷日持久的阵地战。德国施利芬计划破产了。第二次发生在 1918 年 7 月 15 日—8 月 4 日。1918 年 3 月—6 月，德军在西线发起一系列进攻，形成若干突出部。马恩河突出部距巴黎已不到 70 公里。德军决定由此突破法军防御，向巴黎方向迂回挺进，称这次进攻为“争取和平之战”。7 月 15—17 日，德军的进攻遭到法军的阻止，18—20 日，法军按预定计划转入反攻。德军伤亡惨重，遂于 21 日起后撤。至 8 月 4 日，法军推进 40 公里，解除了德军对巴黎的威胁。这次战役以德军惨败告终。德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称之为“德国第一次大的不幸遭遇”。从此，西线从长期相持转为德军节节败退。

(刘北成)

凡尔登战役

(Faner deng zhanyi)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法在凡尔登地区进行的大会战，由 1916 年 2 月 21 日至 12 月 18 日的一系列战斗组成。1916 年，德军作战重心转回到西线。总参谋长法金汉主张，通过一次大规模战役，使法军力量全部投入，消耗殆尽。德军统帅部选择凡尔登为“碾碎法军的磨盘”。2 月 21 日，德军由威廉皇太子指挥，集中近 900 门大炮，辅之以飞机，向凡尔登马斯河左岸的法军阵地发起猛攻。法军被迫退至马斯河右岸。自 2 月 27 日起，法国用 3900 辆汽车运送援兵和武器，组织了有效的防御。双方不断增加兵力，反复冲杀，形成拉锯战。德军仅推进 7 公里。6 月初，德军 20 个师第二次大举进攻，一直打到法军最后一道防线，但始终未能突破。8 月，法军发起反突击。10 月 24 日，转入反攻。到 12 月 18 日，收复了原防守阵地。德军战略计划破产。该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战役，双方损失惨重，法军伤亡 40 多万人，德军伤亡近 35 万人。

(刘北成)

索姆河战役

(Suomuhe zhanyi)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英、法联军在法国索姆河地区对德军发动的进攻战役。作战计划在1915年底制定，因凡尔登战役消耗了法军的预备队而被迫做了重大修改，主攻任务改由英军承担。因准备时间过长而丧失隐蔽性和突然性。进攻开始前，连续7天对德军阵地进行猛烈的炮轰。7月1日，英、法军队发起进攻。法军进展较为顺利。英军损失巨大，到7月10日伤亡近10万人。因德军调集援兵，英、法联军的优势下降，经过两个月激战，仅楔入德军防线几公里，但德军被迫放弃凡尔登城下的进攻。9月15日，英军首次使用秘密武器——坦克，因数量有限和战场泥泞，未取得完全的胜利。11月中旬，因天气恶劣和物资耗尽，战斗停止。该战役双方投入150个师、近万门火炮、1000架飞机。联军夺回240平方公里的土地。双方伤亡巨大，法军损失34万人，英军损失45万多人，德军损失53万8千人，其中10万多被俘。虽然联军未实现战略计划，但显示了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优势，掌握了制空权。德军兵员难以补充，士气从此低落。该战役与凡尔登战役成为大战的转折点。

(刘北成)

世界现代史

世界现代史

(Shijie xiandai shi) 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以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构成现代世界历史的基本社会矛盾。以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划分为两个时期。具有明显的新特点：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取得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各国发展不平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主要的历史潮流；世界经济的最终形成，各国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世界历史真正成为世界性的整体历史。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内外矛盾空前尖锐，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1917 年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领导下，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1918 年 1 月，芬兰发生工人革命。同年德国爆发 11 月革命。1919 年匈牙利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英、法、意、日等国工人运动高涨。许多国家诞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党，共产国际成立。苏维埃俄国在击退外国武装干涉、平定国内反革命叛乱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通过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成就。至 30 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1937 年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除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王公或部落酋长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外，出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民族解放运动持续不断高涨，冲击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斗争主要集中在亚洲、北非和拉丁美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大战后初期革命高潮的冲击和经济动荡后，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利用科学技术使经济获得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资产阶级民主范围扩大，政局比较稳定，内在矛盾暂时得到缓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相继诞生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帝国主义建立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作为维持其统治和调整内部关系的世界秩序。在武装干涉苏俄失败后，资本主义大国不得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局面。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争夺霸权的斗争激烈，各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1929 年德国工业产量再次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

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的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动荡之中。为摆脱困境，美英法在维持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围内采取反危机措施，出现大力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罗斯福新政。德日建立法西斯专政，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企图重新瓜分世界，不断对外扩张。法西斯侵略成为世界人民的主要危险。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人民采取各种形式与法西斯进行斗争，英法等国拒绝建立有效防止侵略的集体安全体系，采取绥靖政策。法西斯国家在 1939 年全面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 4/5 的人口、60 多个国家卷入战争。美、苏、英、中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终于在 1945 年打败德日，取得反法西斯战

争的最后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现代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帝国主义体系受到严重削弱，欧洲丧失了世界中心地位，欧亚两洲相继诞生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不断走向胜利，殖民主义衰落，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深刻的社会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为世界大国，短期内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欧亚一些国家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后，普遍实行了民主改革，按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开展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暴露出经济政治体制上的弊端。50年代初，南斯拉夫率先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出现三次改革高潮，社会主义制度在自我完善中不断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持续高涨，至1984年90多个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或政治斗争获得独立，旧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基本瓦解。新兴独立国家在摆脱殖民枷锁后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缓和阶级矛盾。50、60年代，经济发展迅速。1973年世界经济危机后，出现经济滞胀。1979年再次爆发经济危机。1983年陆续回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美、苏关系由战时的合作转入冷战，在欧洲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5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政治格局逐渐由两极走向多极化。第三世界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开展联合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进行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和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出现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局面。美苏差距缩小，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仍在继续，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冷战逐渐转为对话，紧张逐渐转为缓和。

世界现代史体现出这一历史时期人类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当前争取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日益成为时代的主潮流。

（杨宁一）

苏联现代史

(sulian xiandaishi)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建立和发展的历史。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领导俄国工农大众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它改变了俄国历史的方向，掀开了俄国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俄国历史进入了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新时期。苏联现代史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7—1936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的时期。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措施来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8年3月，苏俄和德奥集团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帝国主义大战，赢得了和平喘息时间。从1918年夏开始，经过三年国内战争，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捍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废除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制定了一条符合俄国国情的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正确道路。苏联人民经过5年左右时间的艰苦努力，恢复了因多年战争破坏而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在这一时期，苏联外交也取得了重大胜利。1922年4月，苏俄利用帝国主义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和德国签订了《德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即《拉巴洛条约》，打破了帝国主义反对、孤立苏俄的统一战线。到1925年底，除美国外，苏联与所有资本主义大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26年，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时期。1929年，斯大林用农业全盘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政策代替新经济政策。到30年代中，苏联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形成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1937年，苏联工业生产水平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社会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剥削阶级被消灭，整个社会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三部分组成。这些变化说明，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基本建成。1936年通过新宪法，确认了这一成果。30年代，苏联实行争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对外政策。1933年与美建交；1934年加入国联；1935年分别与法国、捷克签订互助条约。

第二阶段从1937年到现在，是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时期。

30年代后期，大战日益迫近，苏联加紧卫国战争的准备。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苏联由争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逐渐转向一国自保，1939年8月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同年9月大战爆发后，苏联把欧洲地区边界线向西推进了几百公里。1941—1945年，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战后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逐渐掌握了苏联党政领导大权，开始了苏联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的时期。他开展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斗争，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提出现代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著名论断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路线方针，调整了对外政策。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内推行新经济体制，初期经济发展比较迅速，八五计划期间（1966—1970），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7.7%。进入70年代后，经济政治生活渐趋停滞。对外推行缓和政策与霸权外交。1968年出兵侵捷，随后提出“有限

主权论”；1970年与联邦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70年代上半期，与美国进行了4次首脑会谈，签署了《苏美相互关系原则》、《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以及几十个涉及工业、贸易、文化交流等内容广泛的协议，并促成了欧安会的召开；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70年代东西方缓和局面的结束。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短期执政。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使苏联面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失误、挫折难以避免。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巨大的成就。苏联的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1950年分别为美国的31%、30%和55%，到1975年分别上升到67%、80%和85%。苏联在科技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1949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3年制造了氢弹；1954年建成世界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1957年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首先发射载人宇宙飞船；1971年发射第一个航天站；1977年9月到1982年7月，礼炮六号航天站在地球轨道上停留4年10个月，并先后与31艘飞船相接。苏联文学创作也相当繁荣，著名的优秀文艺作品有：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和《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费定的《城与年》；法捷耶夫的《毁灭》与《青年近卫军》；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柯切托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和《叶尔绍夫兄弟》等。此外，还有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如艾伦堡的《解冻》，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

（段炳麟）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Eguo shiyue shehuizhuyi geming) 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联合贫苦农民于1917年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因发生在俄历十月而得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是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并且形成了用革命方法解决这些矛盾的现实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革命形势迅速成熟。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前者是主要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政府；后者的领导权掌握在小资产阶级政党手里，自愿把首位让给了临时政府。苏维埃没有掌握政权机关，但掌握武装，得到群众的支持。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4月，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格勒（今列宁格勒），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制定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在《四月提纲》精神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展开了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党的教育下，广大群众从临时政府的倒行逆施中逐步看清它的反人民的本质。5月到7月，彼得格勒群众三次走上街头，抗议临时政府的反动政策，使它的统治三次陷于危机之中。5月3—4日（俄历4月20—21日），彼得格勒10万工人和士兵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导致临时政府出现第一次政治危机。临时政府被迫撤销米留可夫、古契柯夫的外交部长、陆海军部长职务，改组内阁，吸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组成临时联合政府，暂时渡过了这次危机。7月1日（俄历6月18日），彼得格勒50万群众利用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形势，在“打倒战争”、“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再次举行了示威游行。临时政府企图用“护国主义”来转移群众视线，下令在西南战线发动进攻，结果遭到惨败，伤亡6万多人。消息传到首都，更加激怒了人民群众。7月17日，彼得格勒50万群众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临时政府派出军队进行血腥镇压。从此，政权完全转到临时政府手中，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期终结。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党有秩序地转入地下。列宁隐蔽到首都郊外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里，在那里写了《国家与革命》这部名著，从理论上阐明用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8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确立了武装起义的方针。临时政府夺取了全部政权之后，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任总理。他宣布要用“铁和血”的手段建立秩序，极右翼势力则主张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来消灭革命。9月7日，俄军总司令科尼洛夫公然发动叛乱，但被迅速粉碎。9—10月间，俄国革命形势成熟。士兵和水兵不断转向革命，北方战线，西方战线，波罗的海舰队以及后方的卫戍部队共约600万人，在9月份先后表示站在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一边；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边区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群众的斗争促进了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到10月中，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200多个地方苏维埃的领导权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10月20日，列宁秘密回到彼得格勒。23日和29日，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召开了中央全会和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成立了党的革命军事总部。25日，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内部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起义的具体领导工作。11月6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爆发。

当夜，列宁秘密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到7日晨，彼得格勒已基本处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当日晚，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声为信号，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向冬宫发起攻击。8日清晨，攻下临时政府盘踞的巢穴——冬宫。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了。11月7日晚，正当起义队伍冲击冬宫的时候，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大会宣告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成立苏维埃政府——以列宁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到1918年2、3月间，全国各地都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预示着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胜利。

（段炳麟）

布尔什维克党

(Buershiweikedang)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俄共(布)、联共(布)的通称。1903年7、8月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的成分比较复杂,有拥护列宁的坚定的火星派分子,也有拥护马尔托夫的不坚定的火星派分子,以及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派和反火星派分子。大会在讨论党纲草案和党章第一条时出现了激烈的争议。在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时,由于5名崩得派分子和2名经济派分子中途退出大会,从而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列宁派的变化。选举结果,拥护列宁的一派在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辑部中占了多数,从而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文

的音译),即多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的一派居少数,被称为孟什维克(俄文的音译),即少数派。从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了两个政治观点对立的派别。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捷克布拉格召开了第六次代表会议。会议在列宁领导下,彻底地批判了取消派的错误,并且在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下把取消派开除出党,选举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中央俄罗斯局。这次会议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党内形式上的统一,从此布尔什维克党正式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4年列宁开始提出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此后,列宁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等著作和讲话中多次论证了更改党的名称的重要性。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而且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背叛社会主义,投降资产阶级,如果仍沿用这个腐朽了的陈旧名称,只便于他们欺骗群众,阻碍革命运动前进,因此应改称共产党。1918年3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把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的决议。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成立,1925年12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把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鉴于孟什维克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无须保留双重名称,因此决定将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苏联共产党。

(段炳麟)

社会革命党

(Shehui gemingdang) 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 年底—1902 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组成。首领 B·M·切尔诺夫等。它的纲领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折衷混合物，在政治上，主张在联邦制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国，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阶级差别，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宣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土地社会化的幻想；在策略上以搞个人恐怖为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 年二月革命后，同孟什维克一起掌握了苏维埃领导权，并使苏维埃支持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建立。它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当时的任务只是转上“正常的”宪制轨道。1917 年十月革命后，公开地进行反苏维埃活动，1918 年 6 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 年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内战结束后，组织了一系列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到 1922 年彻底瓦解。社会革命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的观点十分混杂，它在一战中分化出一个左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 1917 年 10 月武装起义。同年 12 月 15 日，他们组成了独立的政党。1917 年底有 7 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人民委员会，但他们因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于翌年 3 月中退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 年 7 月 6 日，他们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一部分采取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 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

(段炳麟)

四月提纲

(Siyue tigang) 1917年4月17日(俄历4月4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所作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因发表在四月,故名。它的主要内容是: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基本完成,应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实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提出了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形式应是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议会制共和国;指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进行的战争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要摆脱这场战争,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认为,当时不能采取一般的暴力方式去推翻临时政府,因为苏维埃支持它,这样做会同苏维埃对立,会脱离群众。他要求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收回到自己手中,然后通过苏维埃内部的斗争,使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列宁预计到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因为当时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同时,列宁也提醒人民要警惕资产阶级使用反革命暴力镇压革命;在经济方面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银行国有化,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对社会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四月提纲制定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它象一盏明灯照亮了俄国革命前进的道路。

(段炳麟)

七月事件

(Qiyue shijian) 1917年7月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镇压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游行示威的事件。1917年7月中，临时政府在前线发动进攻遭到惨败的消息传到彼得格勒，群情激愤。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开始，并有发展成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时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当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于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在该日深夜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翌日，参加游行示威的达50多万人。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于18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临时政府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派往前线。妥协党把持的苏维埃宣布临时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自愿把全部政权交给它。从此，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结束，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日程。

(段炳麟)

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Buershiweikedang diliu-ci daibiaodahui) 1917年8月8日至16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因受临时政府暗探的追寻而未能出席大会，但被大会一致推选为名誉主席。大会由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等人主持，主要任务是总结前一时期的革命经验，决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任务和策略方针。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总结报告和政治形势的报告，指出革命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搏斗和爆发的时期已经来到。鉴于苏维埃在妥协党的把持下，已经成为临时政府的附属物，提议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大会通过了斯大林提出的政治形势决议草案，确立了实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大会讨论了党的经济纲领，通过了《关于经济状况》的决议，提出没收地主土地，把土地、银行和辛迪加化的企业收归国有；拒绝偿付国债，但保持小债权人的利益；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并逐步过渡到对生产实行完全的调节等措施。大会决定接受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区联派”成员集体入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革命的重大转折关头，及时地把党引向实现武装起义，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目标。

(段炳麟)

科尔尼洛夫叛乱

(Keerniluofu panluan) 1917年9月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反革命叛乱。七月事变后，沙俄将军科尔尼洛夫被临时政府任命为最高总司令。他在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于9月7日公然发动叛乱，企图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来消灭革命力量。他借口“保卫首都”，调号称“野蛮师”的克雷莫夫骑兵第三军团向彼得格勒推进，同时向克伦斯基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临时政府成员全体辞职，全部政权转交最高总司令。政府中的立宪民主党人部长立即辞职与之配合。与阴谋叛乱有密切关系的克伦斯基，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又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彼得格勒的4万多名工人武装和1万多名卫戍部队的革命士兵严阵以待；几千名喀琅施塔得水兵赶到首都；各地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控制了通往首都的交通要道。布尔什维克党还派出大批鼓动员到叛军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9月12日，克雷莫夫在绝望中开枪自杀，克伦斯基政府被迫将科尔尼洛夫解职下牢。翌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形势开始成熟。

(段炳麟)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Bidegele wuzhuang qiyi)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起义。1917年9至10月间，俄国革命形势成熟。10月2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武装起义的决议。为了加强对起义的政治领导，党中央成立了由列宁等7人组成的政治局。25日，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内部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起义的具体领导工作。29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武装起义问题，成立了党的起义领导机构——军事革命总部。至此，起义准备就绪。这时，彼得格勒的革命力量拥有工人赤卫队25000人，转到革命方面来的卫戍部队士兵15万人和8万名波罗的海舰队水兵，而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拥有的武装只有3万人左右。11月6日，起义爆发。当日上午，起义部队夺取了涅瓦河上10座大桥中的9座；下午，占领了电报局、电台和通讯社。深夜，列宁化装来到起义司令部——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到7日上午，起义部队占领了除冬宫及其附近的少数据点外的全部战略据点。克伦斯基见大势已去，乘上插着美国国旗的轿车仓皇出逃。下午5时，起义部队包围了临时政府盘踞的巢穴——冬宫。“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停泊在离冬宫不远的尼古拉耶夫桥边，做好了炮轰冬宫的准备。革命军事委员会两次向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它立即缴械投降。但是敌人继续负隅顽抗。晚9时45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发出进攻信号。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立即从邻近冬宫的街道和屋角发起进攻，在雷鸣般的“乌拉”声中急速地、暴风雨般地涌向冬宫。深夜1时，冲破冬宫大门，攻进皇宫大厅。冬宫是一座拥有1050个房间、110座云石楼梯的巨型建筑。起义队伍同士官生在冬宫内部的厅室里、楼梯上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到8日2时10分，攻下了冬宫。临时政府除总理克伦斯基外，其他13名部长全部就擒。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了。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作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日子载入史册。

（段炳麟）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Quan e suweiai dierci daib - iao dahui) 1917年11月7日夜，正当起义部队攻打冬宫时，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到会的有673名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390名，社会革命党人160名（其中大多数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72人，其余属于各个小党派或无党派。会上，一部分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大会。大会首先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全部政权一律转归苏维埃。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建议一切交战国立即停战谈判，签订公正民主的和约，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反对兼并和侵略别国领土，指出凡把一个弱小民族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明确而自愿的表示，都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主张废除秘密外交，宣布无条件地废止俄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所缔结的全部秘密条约；向英、法、德三国工人呼吁，号召他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无偿没收地主、皇室、寺院、教会的土地，连同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实行土地平均分配，根据各地条件，按劳动定额或消费定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大会选举产生了代表大会的常务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101人组成，其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名，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6名，其他党派4名。大会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由于左派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府，因此这届政府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9日凌晨，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段炳麟)

布列斯特和约

(Buliesite heyue) 即《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及其同盟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于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签订。苏俄政府在多次向协约国各政府提出关于共同与同盟国和谈的建议被拒绝后,于1917年12月15日与德国签订了为期28天的停战协定。12月23日开始正式和谈。1918年1月18日,德方提出了苛刻的“和平”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党内是否签订和约问题上意见分歧。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缔结和约,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宣布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列宁权衡国内和国际形势,主张接受德方条件,以便得到喘息时间,巩固苏维埃政权。列宁同参加和谈的苏俄代表团团长托洛茨基商定,拖延谈判到德方提出最后通牒为止,然后立即签订和约。1918年2月9—10日,德方以最后通牒口气要求苏俄立即接受德方条件。2月10日,托洛茨基违背同列宁的约定,书面声明苏俄宣布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拒绝签约,随即退出谈判。德军以此为借口,于2月18日发起全线进攻。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在2月23日以多数票通过了签约的决议。3月3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主要内容是:双方终止战争状态;俄国放弃对波兰、立陶宛,以及部分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地区的管辖,它们的未来结构将由德奥政府确定;苏俄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承认芬兰、乌克兰为独立国(实为德国附属国),俄军立即撤离,俄国军队全面复员。同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的补充条款中,规定苏俄要付给德国60亿马克的赔偿。1918年3月14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了和约。和约对苏俄来说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掠夺性的条约,它使苏维埃国家失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列宁称它为“不幸的和约”。但这是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不利条件下,为摆脱战争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采取的暂时退却的革命妥协策略。它使苏俄赢得了和平喘息时间来积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红军。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即在11月13日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段炳麟)

苏维埃国内战争

(suweiai guonei zhanzheng) 1918年到1920年，苏维埃俄国与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武装所进行的战争。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英、法、美、日等协约国的干涉军打着“保护俄国”的旗号，在摩尔曼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侵入中亚和外高加索，并挑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俄国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纷纷叛乱：北高加索地区有邓尼金的白卫“志愿军”，顿河地区有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卫军。德国占领者霸占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苏维埃共和国四面受敌，3/4的领土为反革命所控制。到1918年夏，由于缔结布列斯特和约而争得的和平喘息时期结束，从此进入了严酷的国内战争时期。1918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实行劳动人民义务兵役制；9月，宣布国家为统一军营，成立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成立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和指导所有军事机关和民政机关的活动。这些措施保证了一支正规红军的建立及其在各条战线的初步胜利。到1918年底，在东线粉碎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在南线击退了克拉斯诺夫哥萨克白卫军对察里津的两次进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协约国又先后组织三次大规模武装干涉。第一次是以盘踞在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军队为主力，从东部实施主要突击，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军队分别从南方和西北方实施辅助突击，目标指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协约国预定用于这次联合攻势的兵力为100万人，而苏维埃军队为62.5万人。1919年3月初，高尔察克军队在东线发动了全线进攻，至4月中逼近伏尔加河。4月下旬，红军东方面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8月解放了乌拉尔，年底全歼高尔察克军队，并活捉高尔察克。在西北方向，击退了尤登尼奇军队对彼得格勒的进攻。第二次武装干涉是以邓尼金军队为主力。1919年7月邓尼金兵分三路，从南向北进犯，指向莫斯科。10月中占领奥廖尔，直接威胁红军重要军需库图拉和首都莫斯科。尤登尼奇的军队也再次突破苏军防线，于10月中抵彼得格勒郊区。红军10月中在奥廖尔——克罗梅地域和沃罗涅日地域发起反攻，到1920年初收复了乌克兰全境和北高加索，邓尼金残部逃往克里木。与此同时，红军击退了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的第二次进犯。第三次武装干涉是以波兰军队为主力，从苏维埃共和国西部实施主要突击，以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军队从南部实施辅助突击。1920年4月底，波军侵入乌克兰。5月下旬，红军转入反攻。8月中进抵华沙城下。波军利用苏军战线过长、先锋部队缺乏后备和给养的弱点，重新发起反攻。苏军被迫后撤。10月12日，双方签定了初步和约。在南线，红军也击溃了弗兰格尔军队的进攻，于11月解放了克里木全境。至此，苏维埃国内战争基本结束。1922年10月底，盘踞在远东地区的日本干涉军也被逐出苏俄国土。苏维埃国内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它向全世界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段炳麟)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Zhanshi gongchan zhuyi zhengce)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夏到1921年春实行的经济政策，亦称“军事共产主义”。它是在战争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为动员国内一切资源，保证前线需要和城市居民最低限度的口粮而被迫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也掺杂着一些幻想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成份。主要内容是：实行余粮征集制。1919年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在各产粮省份征集余粮和饲料交国家支配》的法令，即余粮征集制法令，正式开始实施余粮征集制。国家组织工人征粮队，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乃至部分口粮。到1919年下半年，它又扩展到肉类、油料和棉花等其他农产品。国家征集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部分是以固定价格付给农民以迅速贬值的纸币，实际上近似于无偿征收。在工业企业中实行普遍的国有化。不仅大中企业实行了国有，而且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920年11月的决定，又把拥有机械动力而工人在5人以下和不具有机械动力而工人超过10人的小企业也都宣布收归国有。实行贸易垄断制，禁止私人贸易。1918年1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了贸易垄断法令，规定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全部由国家和合作社经销，禁止私人贸易。1920年中，又取缔了各类小商小贩。实行口粮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以及实物工资。开始是在各城镇按固定价格定量供应口粮和生活必需品；1920年改行免费配给，同时，各类公用事业和公寓也免费使用。这样，职工的工资大部甚至全部实物化。实行高度集中的总管理局体制。国有企业的原料和生产工具的供应、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均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总管理局实行统一管理。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普及一切阶级的劳动义务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维埃俄国能够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用于前线，它对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的实施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对经济发生消极影响，并在后期引起农民的不满。内战结束后，1921年春为新经济政策所代替。

(段炳麟)

喀琅施塔得叛乱

(Kalangshitade panluan) 1921年2月在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组织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并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利用内战期间由农村补充来的新水兵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于1921年2月28日在喀琅施塔得煽起叛乱。提出建立“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企图在苏维埃的掩盖下，恢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成立所谓“临时革命委员会”，控制了该要塞的行政领导权以及两艘主力舰和几百门大炮，逮捕当地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平息叛乱采取了紧急措施。3月2日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5日重组第7集团军，由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员，负责镇压叛乱。正在开会的俄共(布)“十大”派出约300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团军。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于3月18日晨占领了要塞，平定了叛乱。喀琅施塔得普通水兵被骗参加叛乱这一事实，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必须迅速制定新的经济政策。

(段炳麟)

新经济政策

(Xinjingji zhengce) 1921年春以后，苏俄实行的通过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经济政策，以区别于战后共产主义政策而得名。国内战争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已不适应和平经济建设形势的需要，也不符合俄国国情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造成了生产力的下降，引起了农民的不满。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并肯定了1920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租让法令》，标志着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根据俄共(布)“十大”的决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1年3月21日颁布了《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和原料收集制》法令；4月，人民委员会又作出了《关于粮食、土豆和油粮实物税法的规定》，规定第一年度粮食税征集额比上年度征收的余粮少43.3%，油籽、肉类、亚麻纤维分别减征50%、74.5%和93.3%。同时规定纳税后的余粮农民可以自由支配。为了鼓励农民发展商品经济，1923年3月，把18种产品的繁杂实物税，简化为征收主要农作物的实物税。1923年5月，再简化为以小麦、黑麦计算的统一农业税，并将其一半由实物税改征货币税。翌年5月全改为征货物税。允许自由贸易，重建商品货币关系。最初实行的是商品交换制，其特点是不通过市场和货币，不经过私商中间人，而是国家用工业品去直接换取农产品。这种交换实质上是产品交换，它不符合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遭到农民的抵制。于是在1921年的秋冬，把商品交换改为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同时又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把自由贸易限制在农民经济所需要的范围内，限制在无产阶级政权所许可的范围内。

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改为将部分企业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租让制是苏维埃国家将某些企业、森林、矿山等按照一定条件及期限的合同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目的是为了吸收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到1925年，苏联和外国签订的租让合同达113个。租赁制是把某些中、小国有制企业租给国内的私人或合作社经营，目的是尽快恢复商品生产，活跃商品经济。到1924年春，租赁企业数达8632个。此外，还允许苏俄公民开办不超过20个雇工的小企业。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废除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高度集中的总管理局体制，实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新体制，把国营工业划分为联盟工业和加盟共和国工业，分别由中央和地方领导。在国营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实行独立经营和经济核算制。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1921—1936年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政策。实际上，1929年以后已经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建立了工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提供了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丰富经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不仅具有苏联一国的意义，而且具有普遍的意义。

(段炳麟)

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Buershiweikedangdishici daibiao dahui) 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工作。他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作了报告,并起草了大会的最重要的决议草案。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这是苏维埃国家经济建设史上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变,也是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一项伟大创造,对苏联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立即解散削弱党、破坏党的统一的一切派别集团,授权中央委员会对进行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采取直到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大会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指出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动摇性的表现,认为宣传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张同俄共党员的身份不相容,必须同这些主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思想斗争。此外,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扩大党内民主、改善党员素质的决定,以及《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监察委员会条例和有关民族问题的决议。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段炳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Suweiai shehuizhuyigongheguo lianmeng) 简称苏联,由具有平等权利的加盟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盟国家。成立于1922年12月。沙皇俄国是一个通过侵略扩张形成的多民族殖民帝国,是各民族人民的监狱。十月革命打碎了民族压迫的枷锁。1917年11月15日,苏维埃政府公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主张各民族在平等、自主的基础上建立真诚的、巩固的联盟。俄国境内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或自治共和国。到1919年初,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5个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3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19年上半年被颠覆,成为资产阶级国家。随着内战的逐步胜利,在1920—1921年初,又成立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3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布哈拉、花拉子模2个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于1922年11月并入俄罗斯联邦)。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逐步建立了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联盟关系。到1922年,建立一个多民族统一的苏维埃国家条件成熟,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都提出了关于国家的联合问题。为了研究这一问题,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主持的专门委员会。不久,斯大林提出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即“自治化”方案,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不赞成这个方案,认为它缩小了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权利。他建议所有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自愿联合而又保留其平等权利的基础上,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年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以列宁的提议为基础写成的决议。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宣布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由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联合组成)根据自愿和平等的原则成立了统一的联盟国家。1924年1月,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根据宪法规定,联盟有统一的国家政权、军队、法律和国民经济体系,有统一的国籍;各加盟共和国又有自己的国家政权机关、宪法,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1924年中亚地区按民族重新划定疆界,撤销了俄罗斯联邦属下的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国,还撤销了布哈拉、花拉子模两个共和国,成立了土库曼和乌兹别克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25年5月加入苏联。1929年12月,隶属乌兹别克的塔吉克自治共和国改建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31年3月正式加入苏联。1936年,根据苏联新宪法规定的条件,南高加索联邦分成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3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3个加盟共和国。与此同时,隶属俄罗斯联邦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两个自治共和国都改建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从1939年9月—1940年8月,苏联先后把它的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二三百公里。1940年,将芬兰割让的领土和俄罗斯联邦属下的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合并,建立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联;将从罗马尼亚割取的比萨拉比亚和乌克兰属下的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合并,成立摩尔达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联。同年,苏联红军开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建立了3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联。1956年,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

国改为俄罗斯联邦属下的自治共和国。此后，苏联由 15 个加盟共和国联合组成。

（段炳麟）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

(sulian shehuizhuyi gongyehua) 苏联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工业,并用它去装备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使机器大工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过程。1925年12月俄共(布)“十四大”通过了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确定把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装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装备的国家。1926—1928年,是苏联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在此期间,一方面进行工业建设,另一方面探索工业化的道路,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政策问题上,党内进行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确立了斯大林的主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统一计划,集中管理,实行高积累、高速度,迅速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的决议,指出计划应注意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不平衡现象,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但强调高速发展重工业。根据决议精神,并考虑到某些无法预测的客观条件,国家计委起草了两个“一五”计划(1928—1932)的方案即最高方案(又称最佳方案)和最低方案(又称初步方案)。最高方案比最低方案的指标高20%。在领导机关审查讨论时,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赞成最低方案,主张工农业的均衡发展,但遭到斯大林的批判。1929年4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高方案,5月经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计划规定,国民经济总投资为6469500万卢布。经过苏联人民的艰苦努力,“一五”计划提前9个月完成。1932年工业总产值比1928年增长了102%,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70.7%,但消费资料生产只完成计划的73.5%,农业产量下降到历史上最低水平。从1933年起开始实施“二五”计划(1933—1937)。计划规定国民经济总投资为1375亿卢布,并要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考虑到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计划把发展轻工业放在重要地位。计划规定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6.5%,其中轻工业为18.5%,重工业为14.5%。“二五”计划也提前9个月完成。在“二五”计划期间有4500个工业企业投入生产,工业产量比1932年增加120%。但由于种种原因,轻工业和农业分别只完成计划的85.4%和76.9%,而重工业完成121.3%,因此农轻重比例失调情况没有解决。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苏联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消灭了工业中的非社会主义成份,使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由原来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

(段炳麟)

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sulian nongye shehuizhuyigaizhao) 苏联通过组织合作社、集体农庄把小农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程。经历了共耕制、合作制和农业全盘集体化三个发展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没收了地主土地，实行了土地的平均分配，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只有共耕制才是出路。从 1918 年夏开始，苏俄就从实行土地平均分配过渡到实行共耕制。共耕制是一种公有农业，是农民在生产领域中的联合。组织形式有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共耕社三种。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公有化，以及共同劳动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农业劳动组合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和共同劳动，按劳动日计酬，并允许社员经营规定的宅旁园地和家庭副业；共耕社是简单的生产联合。这种统一劳动，共同分配的组织形式不能从物质上兼顾农民的个人利益，因此农民不愿意参加。到 1920 年集体化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 0.5%。列宁在该年底及时指出，集体农庄的问题不是当前的的问题，不应该奢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1921 年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后，列宁指出用合作社作为组织农民的基本形式。合作社是农民小生产者在流通领域中的联合，采取集资入股，按股分红。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以及土地国有的条件下，国家通过合作社把进行独立生产的农民从流通领域组织起来，使他们与国营经济直接联系。这样，农民便摆脱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并在农业生产中添进了社会主义组织的因素，使农业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列宁认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既保持农民分散经营和自由贸易的积极性，又把这种积极性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从而使农民的私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得到了恰当的结合。因此，合作社一经提倡便迅速发展，到 1927 年，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农户总数的 32%，而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口占农户总数的 0.8%。1927 年年底，联共（布）第“十五大”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任务。1929 年，在批判了所谓“右倾反对派”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农业全盘集体化与农业集体化一般进程比较，具有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是农民不是一户一户，而是整村、整乡、整区地加入农庄，集体化百分比急剧上升；二是对富农不是采取限制，而是采取消灭政策。导致 1929 年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 1928 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和高速度工业化需要农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商品粮。斯大林认为，集体农庄有更高的生产率，能生产更多的商品粮，并能使资金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得到组织上的保证。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期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从 1928 年占农户总数的 1.7% 上升到 1932 年的 61.5%。经巩固和发展，到 1937 年上升到 93%。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成就，是把个体小农经济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消灭了农村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富农。全盘集体化运动也存在着错误：普遍违背自愿原则；片面追求运动发展的高速度；违背列宁的合作制原则，未能兼顾农民的个人物质利益；把集体化作为获得商品粮和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的组织保证。全盘集体化运动一度造成农业生产的下降和苏维埃政权同农民关系的紧张。

(段炳麟)

苏联 1936 年宪法

(Sulian yijiusanliunian xianfa) 1936 年，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后颁布的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根据 20 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事实，1935 年 2 月，联盟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修改 1924 年宪法。以斯大林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了新宪法草案。1936 年 11 月 25 日，联盟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听取了斯大林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12 月 5 日，大会逐条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共 13 章、146 条。新宪法规定：苏联为工农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城乡劳动者，由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实现之；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它行使苏联立法权，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最高苏维埃由权利平等的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构成；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和等额选举制；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和性别，一律平等，均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人身不受侵犯；苏联公民必须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爱护公共财物，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新宪法标志着苏联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段炳麟)

大清洗

(Daqingxi) 1936—1938 年苏联进行的一场大规模镇压运动。1934 年 12 月 1 日，联共(布)著名领导人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一名叫尼古拉耶夫的凶手枪杀。前反对派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 16 人被控策划恐怖行动而遭逮捕。1936 年 8 月在莫斯科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 16 人被处决。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内务部对成年男子和知识分子妇女进行审查，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1938 年间，又审判了所谓以皮达可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派中心”，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科西奥尔等政治局成员组成的“平行的布哈林中心”，以及以叶戈罗夫元帅、布柳赫尔元帅与司令员组成的“平行的军事中心”等案件。被告绝大多数都以莫须有的策划恐怖、间谍、叛国等罪判处死刑。在地方上对中小案件也进行了审讯。这次大清洗错判、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少普通党员和公民也受到牵连。它对苏联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带来了损失。30 年代形成的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对阶级斗争形势判断的失误，是造成大清洗的重要原因。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在 50 年代和 1988 年先后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

(段炳麟)

斯大林经济体制

(Sidalin jingji tizhi) 30年代在苏联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1921年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后，苏联改革了经济体制，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代替高度集中的总管理局体制，以托拉斯代替总管理局，以经济核算制代替国家包干制，初步调整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企业的权限。但是，随着斯大林战胜了党内反对派和五年计划的实施，权力日益集中，到30年代形成高度集中的斯大林经济体制。它的主要特征是：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1932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改组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另设轻工业、木材工业和森林工业等人民委员部。到1941年，分管工业的人民委员部增至25个。各人民委员部的职权是：制定或审批、检查生产、财务和基建计划；组织材料和技术供应；产品的推销和调拨；任命厂长、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等。各人民委员部重大业务问题的最后决定权属于人民委员。国家通过下达繁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来控制和管理企业。管理经济重行政手段，轻经济杠杆。在财政上实行统收统支。企业所需生产基金由国家拨给，所得利润基本上悉数上缴，亏损由国家补偿。在产品分配上实行统一调拨制。企业所需物资由国家统一拨给，所生产的产品由国家统一分配。这种体制之所以在30年代形成有其客观历史条件，起过积极作用。当时苏联处在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之中，面临战争威胁，有必要通过行政手段高度集中地利用有限资源来加速发展急需的工业。但是，它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把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对立起来，使企业没有必要的经营自主权，因而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结合，构成斯大林体制的主要特征。它使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受到阻碍，使千百万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并使个人崇拜越来越盛行，使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失误难以及时纠正。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体制改革。

(段炳麟)

苏共二十大

(Sugong ershida)于1956年2月14—25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是苏共在斯大林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总结报告。报告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苏联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在阐述对外政策方面，他根据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新形势，提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著名论断，宣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强调和平共处应当发展成为和平竞赛。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他认为，由于历史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大会通过了关于总结报告的决议、部分修改党章的决议、关于“六五”计划的指示和草拟新党纲的决议，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赫鲁晓夫继续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24日，大会宣告闭幕。当夜，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代表再次开会，向他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在代表中引起巨大的震动。赫鲁晓夫总结报告中的“新论点”，以及不久就被透露出来的秘密报告内容，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荡。

(段炳麟)

赫鲁晓夫经济改革

(Heluxiaofu jingji gaige) 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对苏联经济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在农业方面的改革措施有：改善计划体制。1955年以前，国家给农庄、农场所下达的生产计划指标多达280项，从1955年起，改为只下达农产品收购指标一项，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改变农产品采购制度。苏联从30年代起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农庄每年要向国家义务交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其价格低于成本。1958年，苏联政府取消义务交售制，实行国家统一的收购制和统一的采购价格，并规定采购价格应高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从1952—1964年，农产品采购价格平均提高了2.54倍。其中谷物提高了7.48倍，畜产品提高了15.09倍，经济作物提高了58%。解散机器拖拉机站，使集体农庄拥有农业机器。1958年2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理站。到1959年1月，80%的农庄买下了农业机器，全国8000个机器拖拉机站撤消了7655个，这项措施结束了“一块土地两个主人”的不合理现象。但由于赫鲁晓夫要求过急，给农庄，特别是贫困农庄造成了困难。此外，赫鲁晓夫还采取了扶植家庭副业经济，增加农业投资和大量垦荒等发展农业的措施。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尽管很不彻底，有很多失误，但还是促进了苏联农业的发展，打破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苏联农业总产值1958年比1953年增长了50%。在工业方面的改革措施主要是1957年对工业、建筑业的改组。苏联政府撤消了25个中央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的部，中央只保留了航空、无线电、造船、化工、中型机器制造和运输建筑6个部。同时将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国民经济委员会。原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各部管理的企业交给所在地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这次改组对改变中央过分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促进同一地区的企业协作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次改组只是把部门行政管理改为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管理经济的方法和企业的地位没有变，而且由于权力过分下放，使中央丧失了对经济的必要的宏观控制与管理，结果造成地方割据和经济秩序混乱。

(段炳麟)

新经济体制

(Xinjingji tizhi) 苏联“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简称。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10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相应的决议，部长会议制订了《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这些决议和条例确定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基本原则是：在不改变集中管理体制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领导生产重心转向经济方法；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方针，使工人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企业的生产成果。主要内容是：撤销国民经济委员会，重建中央各工业部，恢复部门领导的管理体制；完善计划工作，把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由原来的几十个减少到9个，并用产品销售额指标代替传统的总产值指标作为考核企业工作成果的一项重要指标；提高经济杠杆在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实行生产基金付费制和企业固定缴款制度，调整工业品批发价格，提高信贷作用；建立企业经济刺激基金，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和从物质利益上刺激职工对企业的关心。新经济体制的推行，原计划在3年内完成，实际到1975年才完成。它部分地改善了原来的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病，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保守性，成效不大。

(段炳麟)

列宁

(Liening, e H, 1870—1924)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 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 首届人民委员会主席。原姓乌里扬诺夫, 1870年4月22日生于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1887年进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 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遭流放。翌年, 回到喀山, 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1889年秋迁居萨马拉(今古比雪夫), 组织了当地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893年秋移居彼得堡。1894年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批判了民粹主义观点, 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先进作用, 提出了工农联盟思想和建立工人政党的任务。1895年创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年12月被捕入狱。1897—1900年被流放。其间, 写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 从思想理论上完成了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1900年, 在国外创办《火星报》, 为建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1903年,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布尔什维克。1905年回国领导革命。1907年再次流亡国外。1901—1907年期间, 写了《怎么办?》、《进一步, 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 批判了机会主义, 奠定了建党的理论基础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 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1908年, 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1912年, 领导了在布拉格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 布尔什维克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揭露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叛卖行径, 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经过对帝国主义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在1915年和1916年写了《论欧洲联邦口号》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全面阐述了帝国主义的理论, 提出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结论。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 发表《四月提纲》, 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7月, 由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转入地下。8—9月间写了《国家与革命》, 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10月, 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领导全党实际转向武装起义。11月6—7日, 亲自领导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1月8日, 当选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的主席。1918—1920年,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 领导苏维埃各族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期间, 总结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并极为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1918年写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批判了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观点,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1919年, 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1920年, 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策略问题的一系列重要原则, 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途径。国内战争结束后, 及时领导党和国家转上和平经济建设与新经济政策的轨道, 提出了通过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1922年底, 健康状况恶化。在病重期间, 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 但要好些》等文章和书信。这些著作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极为重大, 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在苏俄的命运问题; 总

总结了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发展了在以前论著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和原理，指明并论证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道路。这些思想构成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计划。列宁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

（段炳麟）

斯大林

(Sidalin, Сталин, 1879—1953)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前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原姓朱加施维里。1879年12月21日生于格鲁吉亚的哥里城。1894年在梯弗里斯(今第比利斯)正教中学读书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梯弗里斯组织。1899年因参加革命被学校开除, 此后成为职业革命家。1901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1903年被选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年12月, 领导了巴库石油工人大罢工。1912年1月,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 被缺席增补为中央委员, 并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编辑工作。1912年底至1913年初写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 得到列宁很高评价。从1901—1917年, 先后被捕七次, 流放六次, 从流放地逃出5次。1917年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 参加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及此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同年8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俄国获得胜利的学说, 阐述了列宁的武装起义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10月, 参加中央政治局和党的起义机构——军事革命总部, 是十月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后, 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参加第一届人民委员会, 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9年起兼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1920年起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国内战争时期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一些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4月起任党中央总书记。在1922年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做了大量工作, 但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 受到列宁的批评。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 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到30年代后期, 苏联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但在此期间, 逐渐发展起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犯有一些错误, 如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 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违背自愿原则, 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发展, 进行大清洗等。特别是30年代的大清洗, 给苏联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1941年5月—1953年3月, 先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 在卫国战争时期, 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领导苏联人民和武装力量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1945年6月, 获苏联最高军衔——大元帅称号。战后, 领导苏联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但个人崇拜继续盛行, 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仍不正常。1952年10月, 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1953年3月5日病逝。

(段炳麟)

托洛茨基

(Tuoluociji, Tpouku, 1879—194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原姓勃朗施坦, 1879年10月26日(俄历)生于乌克兰赫尔松省一个富裕犹太农民家庭。1897年在尼古拉耶夫组织“南俄工人同盟”。翌年被捕, 判处流放西伯利亚。1902年以署姓托洛茨基的假护照逃往国外, 加入《火星报》组织。1903年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属孟什维克。翌年脱离该派。此后长期游移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1905年回国参加革命, 曾任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 同年再次被捕, 判处终身流放。1906年在狱中写成《总结与展望》一书, 提出“不断革命论”。1907年逃往国外。1912年在维也纳组织反布尔什维克的“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 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吸收入党, 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期间, 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参与组织、领导十月武装起义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建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外交人民委员。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期间, 主张不战不和, 并违背同列宁的约定, 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918年3月, 改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 具体负责建设红军, 指挥平定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9月, 最高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任主席。针对苏俄当时军事上软弱混乱的情况, 提出了放弃民兵制、建立社会主义常备军, 加强军事纪律和集中制, 实行义务兵役制, 吸收旧军事专家参加红军建设等主张, 并在列宁的支持下付诸实施。国内战争时期, 作为最高指挥官, 经常乘坐一辆军用列车到达前线指挥作战。1920—1921年挑起工会问题争论。1924年列宁逝世前后, 进行派别活动。1926年与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对派联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 翌年被流放; 1929年被驱逐出国; 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挪威、墨西哥等国。1938年组织托派的“第四国际”, 企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住所被刺, 次日因伤重而死。

(段炳麟)

布哈林

(Buhalin, axap H, 1888—1938) 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888年10月9日生于莫斯科。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经济学专业学习。1908—1911年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其间多次被捕。1911年从流放地逃往德国, 后辗转流亡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美国等国。在国外参加工人运动, 开始著述活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 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斯巴达克》杂志编辑。在1917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0月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参与领导莫斯科武装起义。1917年12月起长期任《真理报》主编。1918年初, 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 反对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领袖。1919年3月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共产国际成立后, 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在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领导“缓冲派”。1921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 他是新经济政策理论的阐述者和捍卫者。1924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起负责主持共产国际工作。20年代末期,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斯大林发生了意见分歧。1929年被作为“右倾派别集团”的首领受到批判。同年4月被撤销《真理报》主编职务; 7月被解除在共产国际担任的全部领导职务; 11月被开除出党中央政治局。在1930年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继续遭到批判, 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1931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4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1935年参加宪法起草工作, 是1936年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1937年2月被捕; 3月被开除出党。1938年3月13日, 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莫须有的从事恐怖、间谍和破坏活动罪判处死刑, 15日被处决。1988年2月, 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为布哈林平反。同年5月10日,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恢复布哈林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同年7月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恢复布哈林党籍。主要著作有: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共产主义ABC》、《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等。

(段炳麟)

赫鲁晓夫

(Heluxiaofu, Xpy eb, 1894—1971) 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894年4月17日生于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乌克兰人。15岁以前当过牧童和雇工，只受过初级教育。1918年参加共产党。国内战争时期在南方战线作战，担任过党支部书记。内战结束后，在尤佐夫卡（现顿涅茨克）的一个煤矿任党支部书记。1922年秋进尤佐夫卡矿山技术学校工人专修班学习。1925年起，在斯大林诺任佩特罗夫斯科—马林斯基区的区委书记。1927年当选为联共（布）“十五大”代表。翌年调任乌克兰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久改任基辅市委组织部部长。1929—1931年，在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学习，并任该院党委书记。1931年任莫斯科市鲍曼区区委第一书记；同年7月，改任该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第一书记。1932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34年1月任市委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1935年3月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1934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8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翌年升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起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领导了乌克兰的大清洗。卫国战争期间，任基辅特别军区、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2月获陆军中将军衔。卫国战争结束后，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兼人民委员会（1946年3月起称部长会议）主席，领导乌克兰的重建工作。1947年曾一度被解除第一书记职务，但很快复职。1949年12月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在中央主管农业。1952年10月，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1953年9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对防止现代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某些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并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以及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论断。1964年10月被解除党内外职务。1971年9月11日病逝。赫鲁晓夫在担任苏联最高领导职务期间，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放宽农村政策，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探索，调整对外政策，使苏联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他培植个人崇拜、主观武断、朝令夕改，在对外政策方面迷恋大国政治，谋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继续推行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造成了不良后果。

（段炳麟）

勃列日涅夫

(Bolieriniefu, pe HeB 1906—1982) 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06年12月19日生于乌克兰的卡缅斯科耶镇(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1931年加入共产党。1935年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冶金学院。卫国战争前,曾先后任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商业部长、州委书记等职。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南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43年晋升少将。1946—1952年,历任札波罗热州委、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等职。1952年10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1952年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改组时落选,改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二书记,翌年升为第一书记。1956年2月,重新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翌年被递补为主席团委员。1960—196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4年10月取代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6年3月起改称总书记)。1975年晋升大将。1976年兼任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并获苏联元帅称号。翌年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2年11月10日病逝。他在担任苏联最高领导职务期间,对内推行新经济体制,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都有所增强;对外奉行霸权主义政策,使中苏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在逝世前不久,多次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

(段炳麟)

德国十一月革命

(Deguo shiyiyue geming)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德国爆发的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前的德国是比较发达的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陷入空前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全面危机。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群众反战革命运动高涨。1918年11月3日，拒绝出海作战的基尔港水兵举行起义，得到当地工人积极响应，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了全城，揭开了十一月革命的序幕。起义迅速席卷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苏维埃。11月9日，在斯巴达克团等组织号召下，首都柏林工人和士兵发动武装起义。德皇威廉二世调集军队镇压未遂，被迫退位出逃，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被推翻。首相巴登亲王将政权交予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艾伯特，企图限制革命的发展。艾伯特拒绝斯巴达克团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议，组成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人民全权委员会，并得到柏林工兵苏维埃批准。该政府进行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宣布保证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大赦政治犯、8小时工作制和普选制等，继续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保留旧的国家机器和容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特权，阴谋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打击苏维埃，因而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为了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斯巴达克联盟于12月30日建立德国共产党，宣布革命的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艾伯特政府十分恐慌，挑起事端，解除同情革命的柏林警察总监的职务。1919年1月5日，柏林工人举行抗议游行示威并转变为推翻艾伯特政府的武装起义，旋即遭到镇压。15日德共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捕遇害。2月国民会议在魏玛召开，宣布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此后，革命斗争仍在继续。4月13日，慕尼黑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夺取政权，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5月初，政府军队攻入慕尼黑，苏维埃政权被颠覆，革命结束。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部分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由于条件不成熟而失败。此次革命锻炼了德国的工人阶级，支援了苏俄，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斗争。

(杨宁一)

斯巴达克团

（Sibadaketuan）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成立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即已分成左、中、右三派。大战爆发后，右派公开支持资产阶级政策。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等人为首的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批判右派领导人对工人阶级事业的背叛，主张重建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因1915年出版杂志《国际》被称为“国际派”。1916年1月1日，该派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卢森堡起草的《国际社会党人的任务提纲》，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主张反帝反战，清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决定出版刊物《政治书信》。该刊物后称《斯巴达克书信》，左派即称“斯巴达克团”。一月会议为其成立标志。斯巴达克团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组织领导工人斗争和反战运动。1917年4月作为一个派别组织上加入中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积极领导和推动德国十一月革命，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1918年11月10日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批判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支持艾伯特政府的妥协政策。同年12月29日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完成立独立的德国共产党。

（杨宁一）

基尔港水兵起义

(Jiergang shuibing qiyi)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基尔港水兵举行的起义。1918年10月底，德国战败已成定局，海军司令部仍命令舰队出海与英国决战，要求如不能取胜，就“光荣地沉没”，企图以此来鼓舞陆军的士气。水兵拒绝执行命令。当局采取高压手段，逮捕水兵上千名。11月3日，基尔港水兵集会要求释放被捕者，提出“打倒军国主义”及“和平、面包”的口号。会后举行的游行遭到镇压，死伤数十人。起义遂爆发。11月4日，基尔水兵苏维埃和工人苏维埃相继成立，前来镇压的军队或加入起义队伍，或被解除武装。5日，全城举行总罢工，工人、士兵苏维埃掌握了该城政权。起义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揭开了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序幕。

(杨宁一)

柏林一月战斗

(Berlin yiyue zhandou) 1919年德国柏林工人反对艾伯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而成立的艾伯特政府继续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引起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1918年底，德国共产党成立。艾伯特政府蓄意挑起事端，诱使工人进行没有准备的战斗，以扑灭革命力量。1919年1月4日，颇受群众拥护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埃喜霍恩被解除柏林警察总监的职务。5日，柏林工人举行抗议示威游行，成立了由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的革命行动委员会，号召推翻艾伯特政府。6日，柏林数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占领部分战略要地，政府陷入孤立。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发生动摇，放弃对工人的组织领导，而与政府进行谈判，遂使政府得以借谈判之机，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准备血洗柏林。社会民主党右派头目诺斯克被任命为柏林总督和政府军总司令，宣称：“总得有人来做嗜血豺狼，我不怕担这个责任。”1月8日，政府中断谈判。1月11日，政府军队大举反扑进入柏林，血腥屠杀起义者。13日，罢工停止。15日，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捕，在押解途中被杀害。

(杨宁一)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Bafaliya suweiai Gongheguo) 德国十一月革命中在巴伐利亚邦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亦称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4月7日，在工人阶级的推动下，独立社会民主党宣布该邦成立苏维埃政府。4月13日，反革命分子在首府慕尼黑发动叛乱。工人和士兵在共产党领导下，平息了叛乱，夺取了政权，组成以共产党人莱威奈为首的有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政府。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共和国政府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建立赤卫队和红军，实行银行和工厂国有化，没收存粮分配给工人，成立肃反委员会，制定工人监督企业的制度。资产阶级纠集6万军队于4月19日向慕尼黑进攻。红军初战胜利，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动摇，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企图与资产阶级妥协，防务受到削弱。5月1日，反革命军队攻入慕尼黑。共产党人率领部分红军顽强抵抗，坚持数日。5日，战斗结束。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结束。

(杨宁一)

魏玛共和国

(Weima Gongheguo) 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建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1918年爆发的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君主制，资产阶级利用社会民主党篡夺了政权。1919年2月6日，国民会议在小城魏玛召开，讨论制定宪法，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艾伯特当选为总统。8月，魏玛宪法生效。宪法规定了国家的议会制共和国政体和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以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在镇压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和平定了极右反动势力的暴动后，共和国暂时得到巩固。大力扶植垄断资本，借助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的流入，工业生产迅速达到和超过战前水平，1929年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竭力加强垄断资本的政治统治，削弱工人民主权利。1925年军国主义分子、前帝国元帅兴登堡当选为总统。外交上通过合法途径，签订《洛加诺公约》，加入国际联盟并任常任理事国，重新取得欧洲大国的地位。1929年，受到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打击。政府反危机措施不力，极力把经济危机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激起人民群众强烈反对。革命形势高涨，政局动荡。垄断资本遂支持希特勒于1933年1月上台，建立法西斯政权。魏玛共和国宣告解体。

(杨宁一)

纳粹党

（Nacuidang） 德国法西斯政党。全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旧译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为德文民族社会主义缩写的音译，前身为慕尼黑一小政治团体“德意志工人党”。1919年，希特勒加入后，逐渐控制该党。1920年2月发表党纲《二十五点纲领》，鼓吹民族复仇主义、种族主义和对外扩张，标榜“社会主义”以欺骗群众。该年4月更名为纳粹党，制定卍字党徽和红底白圆心黑卍字的党旗，以《人民观察家报》为党报。1921年确定“领袖原则”，希特勒在党内取得绝对领导权。同年建立准军事组织冲锋队，进行暴力恐怖活动。1923年发动啤酒店暴动，失败后被勒令解散。1924年希特勒出狱后重新恢复活动，利用魏玛宪法不断扩充力量，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争取容克地主和垄断资本家的支持，企图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政权。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大肆进行蛊惑性宣传，竭力拉拢对现状不满的中下层群众，取得军队的支持，1932年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夺取了政权。对内镇压共产党，解散其他政党，取消资产阶级民主，煽动排犹运动，实行一党独裁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对外撕毁《凡尔赛和约》，积极扩军备战，组织轴心国集团，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欧洲各国和苏联，在占领区实行掠夺和镇压政策。1945年德国投降后，被盟国管制委员会宣布为非法组织。

（杨宁一）

啤酒店暴动

(Pijoudian baodong) 德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的反动政变。1923年1月，法国、比利时借口德国未按期支付赔款出兵占领鲁尔，德国出现严重混乱局面。纳粹党乘机策划发动暴乱，阴谋用武力夺取政权。11月8日，在军国主义分子、原德军总监鲁登道夫等人的支持下，希特勒率领武装党徒占据慕尼黑市贝格布劳凯勒啤酒店，劫持在那里集会的州政府首脑，宣布州政府和全国政府已被推翻，成立临时全国政府。次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2000余名武装政变分子举行游行，准备占领慕尼黑并以此为基地在全国建立纳粹党政权。此时纳粹党力量有限，也没有得到垄断资本的全力支持。暴动队伍与警察发生枪战被驱散，希特勒是“第一个跳起来向后跑的人”。政变遂告失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等人被捕。此后，纳粹党转而力图用合法方式夺取政权。

(杨宁一)

我的奋斗

（Wo de Fendou）书名。德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所著。1923年啤酒店暴动失败后，希特勒被捕入狱。在狱中由他口述、其助手赫斯记录整理而成该书。1925—1926年出版。全书冗长，分两卷27章，700余页。内容庞杂，涉及外交、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诸方面问题。主要内容为：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攻击民主制度；宣传反动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叫嚷雅利安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和“主宰民族”；主张打破凡尔赛体系，发动侵略战争，“夺取生存空间”，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征服欧洲；鼓吹绝对独裁的“元首制度”和“领袖原则”，实行法西斯恐怖专政。该书集法西斯主义大成，是纳粹运动的理论和行动纲领。希特勒上台后，成为法西斯教育的必读物。其续篇名为《希特勒的第二本书》，由希特勒1928年口授，1961年出版。

（杨宁一）

国会纵火案

(Guohui zonghuoan) 德国法西斯制造的陷害共产党人的案件。希特勒上台后，加紧镇压共产党，图谋建立一党专制的法西斯独裁体制。1933年2月27日夜，在国会议长戈林等人的策划下，纳粹分子从戈林官邸潜入国会大厦纵火，然后嫁祸于共产党，诬陷纵火事件是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现政权的信号。纳粹当局借口“保卫人民和国家”，颁布紧急法令，取消宪法中保障人身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言论通信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取缔共产党和进步党派的报刊，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德共主席台尔曼和当时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均被捕。在白色恐怖气氛中，3月5日举行国会选举，纳粹党获胜。9月21日，纳粹当局在莱比锡组织挑衅性审讯。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揭露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实质和血腥罪行，戳穿了纳粹分子的谎言，宣传了共产主义真理，捍卫了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荣誉。由于季米特洛夫的英勇斗争和世界舆论的压力，法庭最后不得不将其无罪释放。

(杨宁一)

授权法

(Shouquanfa) 在德国确立纳粹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的重要法律，即《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希特勒上台后提出，1933年3月23日强迫国会通过。该法借口形势紧急，授予政府制定与宪法不相符合的法律的权力，不经国会及联邦议会同意自行制定法律的权力，不经国会同意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力，规定国会放弃通过预算案、监督政府信贷政策等权力。据此，希特勒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就内政外交发布法令，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国会名存实亡。该法为期四年，1937年和1941年纳粹党操纵国会两次延长。

(杨宁一)

德国的分裂

(deguo de fenlie)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期间德国分裂为两个德国的事件。1945年德国投降后，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及其首都柏林。由于四国尤其是美、苏之间对德方针分歧严重，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各占领区实际上形成独立的政治实体，实行不同的占领政策。苏占区逐步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西占区着重于重建资本主义。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和冷战的爆发，美国为了称霸欧洲并利用德国遏制苏联，采取扶植和分裂德国的政策。1947年1月，美、英合并两国占领区。1948年2月至6月，美、英、法、荷、比、卢六国召开伦敦会议，提出西方三个占领区合并并协调经济政策，参加马歇尔计划，进行货币改革，召开制宪会议，尽早成立西德政府。6月21日西占区单方面实行货币改革。苏联采取措施对美国进行反击，1947年6月在苏占区成立管理经济事务的德国经济委员会（后具有准政府职能），12月召开第一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1948年6月22日，苏联亦在苏占区发行新币，从6月24日起“封锁柏林”。柏林危机爆发。同年11—12月，东西柏林分别成立市政机构首先分裂。美国利用柏林危机的紧张局势，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1949年5月12日，西方占领当局批准西占区德国议会委员会通过的基本法即“波恩宪法”，公布占领法规。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同年10月7日，在苏占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个德国形成。

（杨宁一）

社会市场经济

(shehui shichang jingji) 联邦德国 50—60 年代实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提出者为联邦德国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根据人民群众对纳粹统治时期统制经济的痛恨，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广泛发展的需要，联邦德国成立后，采取既区别于所谓“中央计划管理经济”，又不同于古典式的“自由放任”经济的政策。政府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定法律和措施保护生产和市场销售的自由竞争。国家主要不采取企业国有化的方式，而是通过货币、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利用减税、免税、奖励投资、支持出口、适当限制垄断发展等办法，对国民经济实行一定程度的有节制的干预。其实质是在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市场经济为主，国家调节为辅的资产阶级改良。该政策和理论起到了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联邦德国 50 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 8%，1955 年工业产值超过英、法，重新跃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工业强国。

(杨宁一)

新东方政策

(Xin dongfang zhengce) 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推行的改善与苏联、东欧关系的外交政策。50年代联邦德国执行以外交部国务秘书之名命名的哈尔斯坦主义，即坚持联邦德国在国际上代表整个德国，拒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边界和民主德国，除苏联外不与任何同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建立和保持外交关系。此政策使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长期对立，加深对美国的依赖。1969年勃兰特出任总理，放弃哈尔斯坦主义，正式推行新东方政策。包括：改善与苏联的关系，1970年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条约，双方保证战后欧洲边界不可侵犯，承认民主德国与波兰以奥得—尼斯河为边界线；改善两个德国的关系，1972年两个德国签署《关于两国关系基础的条约》，实现了国家间的关系正常化，1973年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改善与东欧其他国家的关系，分别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东方政策反映联邦德国在国际形势缓和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摆脱美国的控制，谋求独立的外交，提高国际地位的倾向，对欧洲国际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杨宁一)

台尔曼

(1886—1944)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主席。生于汉堡，少年时期被迫辍学做工。1903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学习勤奋，积极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拒绝资本家提升许诺的收买，在工人中享有声誉，成为汉堡地区党的负责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抨击社会民主党右派的背叛行径，组织反战斗争。1918 年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十一月革命，为汉堡苏维埃负责人之一。1920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3 年领导汉堡工人起义，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三天后组织有秩序的退却。1924 年被选为德共主席。1924 年和 1928 年两次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20 年代末开始全力以赴领导全党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希特勒上台后，1933 年 3 月 3 日在柏林被捕。被监禁 11 年，受到严刑拷打和各种折磨，始终坚强不屈。在法西斯灭亡前夕，1944 年 8 月 18 日被秘密枪杀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杨宁一)

希特勒

(Xitele, Adolf Hitler 1889—1945) 法西斯德国国家元首和总理，纳粹党党魁，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出生在奥地利，其父为小职员，在校期间学习很差。1908年后到维也纳谋生，过着流浪生活，受到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很大影响，形成为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世界观和处世哲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列兵升为下士。故后有人蔑称之为“奥地利下士”。1919年奉命调查“德国工人党”情况，同年加入该党。1920年将其改组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1921年成为该党拥有绝对权力的元首。1923年发动啤酒酒店政变，在与警察的冲突时率先逃走。不久被捕入狱。在狱中撰写《我的奋斗》一书。1924年底获释后，企图利用合法方式夺取政权，进行蛊惑性宣传以争取群众，加强与垄断资本的勾结。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1934年兴登堡总统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兼总理，拥有对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权。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取消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解散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迫害犹太人。积极重整军备，建立战争经济，武装干涉西班牙，与意大利、日本结成轴心国侵略集团。1937年11月召开秘密会议，提出进行战争的全面计划，史称《霍斯巴赫备忘录》。1938年—1939年先后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入侵波兰，全面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大举进攻西欧。1941年6月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侵苏战争。1943年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4年德国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败局已定。7月遭暗杀，侥幸脱险。从此陷入歇斯底里和狂暴的幻想中。1945年4月，苏军攻入柏林，第三帝国灭亡在即，于30日在总理府地下室开枪自杀。

(杨宁一)

戈林

(Gelin, Hermann Goring 1893—1946) 德国法西斯头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犯。早年从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空军上尉，参加作战并负伤。战后结识希特勒，颇受器重。1923年加入纳粹党。参加啤酒店暴动，失败后逃亡国外，结识法西斯主义首创者墨索里尼。1926年回国。1928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任国会议长。奔走于名门望族之间游说，争取垄断资本的支持，为纳粹党攫取政权起了重要作用。希特勒上台后，被委以帝国不管部长、航空总监、普鲁士内政部长、普鲁士总理等要职。一手制造镇压共产党人的国会纵火案，筹建秘密警察，总揽第三帝国经济大权，建立战争经济体制，策划和指挥对外侵略战争。1939年被希特勒指定为继承人。为人骄横贪婪，好大喜功，另一纳粹党头目戈培尔讽之为“挂满奖章的蠢材”。亲自指挥对占领国家的掠夺，借机中饱私囊。1945年4月急于取代希特勒，被希特勒以叛国罪逮捕。德国投降后，1946年10月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行刑前服毒自杀。

(杨宁一)

阿登纳

(Adengna , Konrad Adanauer 1876—196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出身寒微，父为法院书记官。先后在弗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波恩大学就读。毕业后以律师为业。1906 年竞选为科隆市议会议员，1917 年任该市市长。在市政建设和发展工商业上颇有建树，受到垄断资本的赏识。1928 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长。主张联法反苏，反对纳粹独裁。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被以“政治上不可靠”为由撤消一切职务，遂隐居。1944 年受谋杀希特勒案件牵连，两度被捕。1945 年盟军攻占科隆后，一度再任市长。力图重建德国，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任主席。主持制定基本法（临时宪法）。1949 年 9 月任联邦德国第一届总理，至 1963 年连任四届。执政期间，主张与美国合作，加强西欧联合，赞同联邦德国加入欧洲煤钢联营、北约和欧洲共同体，反对共产主义，拒绝承认民主德国，坚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德国。放手由经济部长艾哈德等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使联邦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1966 年辞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职务。著有《阿登纳回忆录》。

(杨宁一)

法西斯党

(Faxisidang) 意大利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独裁政党。法西斯为拉丁文“束棒”的译音，系指古代罗马高级官吏出巡时由扈从所执的棒束，中间插一把战斧，象征权力和暴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经济困难，政局动荡，工人运动高涨。1919年，墨索里尼在米兰建立“战斗的法西斯”，标榜实行“革命”和“社会正义”，反对共产主义。1921年11月正式改称法西斯党，墨索里尼为领袖。因党员以黑衫为制服，又名黑衫党。从事恐怖暴力活动，破坏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因在行动时成员手提大棒，又称“棒喝队”。得到垄断资本家的支持，党徒数量迅速增加。1922年10月，墨索里尼组织武装党徒向罗马进军，取得政权。在国内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逐步取消议会民主制度，解散其他所有政党，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总体国家”。对外鼓吹重新瓜分殖民地，推行战争政策，侵略埃塞俄比亚，武装干涉西班牙，与德、日勾结组成轴心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意大利投降后瓦解。也泛指本世纪30—40年代一些国家出现的类似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政党。

(杨宁一)

向罗马进军

(Xiang luoma jinjun) 意大利法西斯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的武装政变。20年代初，在垄断资本的支持下，意大利法西斯党势力膨胀，武装人员达30余万，超过政府军队数量，夺取了部分地区的政权。墨索里尼等人认为时机成熟，于1922年10月16日召开法西斯党中央会议，决定发动政变向罗马进军。10月24日，法西斯分子在那不勒斯举行大会，墨索里尼发表夺取政权的讲话。会后数万名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党徒分四路进逼罗马。政府一直未采取有力措施，迟至10月28日才宣布在全国范围实行戒严。但反映垄断资本意志的国王同情法西斯，怀疑政府军的力量，担心镇压会危及王室，拒绝在戒严令上签字。内阁被迫辞职。国王遂委任墨索里尼组阁。10月31日，墨索里尼组成政府，意大利法西斯专政初步建立。

(杨宁一)

墨索里尼

(Mussolini, 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 法西斯主义的首创者，意大利独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出生在破产农民家庭。幼年家境贫寒，渴望出人头地，就学于师范学校。1900年加入社会党。毕业后生活贫困，一度到瑞士谋生。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以“强硬的革命派”著称，逐渐进入社会党领导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积极鼓吹参战，被开除出党。战后，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于1919年成立“战斗的法西斯”组织（1921年改称法西斯党），进行恐怖暴力活动，镇压革命运动。1922年组织武装法西斯党徒向罗马进军。11月29日受命组阁，建立法西斯专政。在国内用牺牲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办法，来确保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取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缔其他一切政党，迫害屠杀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进步人士。积极扩充军备，加紧准备对外侵略。1935年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与德国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1937年正式结成德意日轴心国侵略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先后出兵进攻法国、巴尔干地区和东北非。在军事战略上从属于德国。1943年7月，被国内政变力量逮捕软禁。9月被德国救出后在意大利北部组织傀儡政府，残酷镇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5年4月意大利爆发全国总起义时，化装潜逃。在去瑞士的途中被游击队截获。4月28日，经人民法庭判决被枪决。

（杨宁一）

英国现代史

(yingguo xiandaishi)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英国历史和英国相对衰落的历史和英国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其开端。以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分为两个时期。

19 世纪最后 30 年，英国失去了工业垄断地位，逐渐衰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战国，国力严重受损。战后由债权国沦为债务国，传统经济支柱出口贸易的数额锐减，海上霸权丧失，工业技术落后，失业人口庞大，经济萧条，1921—1929 年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7%。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对英国打击沉重。政府采取一系列反危机措施，紧缩财政开支，取消自由贸易，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与自治领和殖民地建立内部特惠制的关税同盟。1935 年，工业超过 1913 年水平。这一时期，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发展。1918 年和 1928 年两次扩大普选范围，给予 21 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以选举权。1924 年 1—11 月组成历史上第一届工党内阁，麦克唐纳任首相，加强福利措施，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以稳定资产阶级统治。此后保守党和工党长期轮流执政。1926 年镇压工人大罢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1921 年承认爱尔兰南部为爱尔兰自治邦（1937 年宣布为独立共和国），北部与英国合并，英国改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1931 年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承认自治领的平等地位，正式建立英联邦。在外交上，1919 年参加巴黎和会，掠夺到最大份额的殖民地。20 年代推行大陆均衡政策，抑法扶德，以维持英国的霸权。参加道威斯计划和洛加诺公约。进入 30 年代后，对法西斯侵略扩张实行绥靖，在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问题上采取不干涉政策。1937 年 5 月，张伯伦出任首相后，默许德国吞并奥地利，签定《慕尼黑协定》，出卖捷克斯洛伐克。1939 年初与法国结盟。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3 日，英国对德宣战，实则宣而不战。1940 年 5 月，德国进攻西欧。主战派丘吉尔出任首相，取得不列颠保卫战胜利。逐渐与美国结盟。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迅即支持苏联。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盟国之一。1942 年秋以后，相继取得北非战事、进攻意大利和诺曼底登陆的胜利，为打败德国法西斯作出重大贡献。竭力维护世界霸权，划分势力范围，镇压希腊民族民主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进一步相对衰落。由于接受马歇尔计划，主要竞争对手德、日被打败，战后初期经济恢复较快，1948 年工业总产量达到并超过战前。50 年代以后固定资本投资不足，技术设备落后，经济增长缓慢，1956—1970 年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仅为 2.8%，高于战前但远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被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由战后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退居到 1970 年的第五位。力图挽救殖民统治，未能奏效。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50 余个国家相继取得独立，殖民体系基本瓦解，英联邦日趋松散。战后初期实行“三环外交”（即由英、美同盟、英国与欧洲、英国与英联邦构成英国外交的三环），企图依靠英、美特殊关系，维持与英联邦的传统关系，控制西欧，恢复其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地位。故 60 年代两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均被否决。1971 年被迫宣布将英、美特殊关系改为“自然关系”。1972 年被接纳为欧洲共同体成员。战后初期，艾德礼工党政府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采取国有化和建立福利国家政策。其基本内容为以后历届政府继承。70 年代爆发两次经济危机，陷

入经济滞胀。政府反危机、反滞胀无术。1979年撒切尔组成保守党政府，控制货币发行量，紧缩信贷，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一些国有企业私营化，取得一定成效。从1982年起经济回升，国民经济增长率提高，通货膨胀率下降。

（杨宁一）

1926 年英国总罢工

(yijiuerliunian Yingguo zongbagong) 1926 年英国工人举行的反对资本家阶级加强剥削的总罢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长期萧条，采矿、纺织等工业部门处于衰落状态。为摆脱困境，煤矿主企图加强剥削，于 1925 年 6 月宣布延长工作时间，削减工人工资，并以同盟歇业相威胁。煤矿工人在其他工会的支援下，拒绝煤矿主的条件，准备同盟罢工。政府和资产阶级没有作好准备，暂时让步休战，维持现状，同时积极储备物资，加强警察力量，以对付总罢工。1926 年 4 月，在政府的支持下，煤矿主再次发动进攻，并于 5 月 1 日同盟歇业。运输、印刷、冶金、化学、建筑、电力、机器制造等部门的工人采取联合行动，自 5 月 3 日午夜起，分批投入总罢工，总人数达 600 万。大部分企业停产，交通运输瘫痪，全国经济生活一片混乱，给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使其不得不动用军队承担生产和运输。斗争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援，英国共产党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府大批逮捕罢工积极分子。把持罢工领导权的工会总理事会害怕镇压，担心失去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控制，与官方代表秘密谈判达成妥协，于 5 月 12 日宣布停止罢工。煤矿工人孤军作战，处境艰难，至 11 月被迫复工。此次罢工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暴露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杨宁一)

英联邦

(Yinglianbang) 英国及一些曾为英国殖民地的独立国家组成的松散的国家集团。近代英国通过殖民侵略活动，建立起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殖民地长期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至 1910 年，移民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先后取得自治领的地位，可拥有自己的议会和责任政府，但外交及其他关系到整个帝国的事务仍由英国掌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自治领参加协约国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地位进一步提高，改变了完全听命于英国的局面，开展独立外交活动。英国为缓和矛盾，继续保持与自治领的特殊关系，于 1931 年由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宣布英联邦成员国是通过对英王的效忠联合起来的，自治领议会拥有制定法律的全权，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不再作为自治领法律的组成部分。至此，自治领获得完全独立自主权，英联邦正式形成。1944 年英帝国会议改名为英联邦总理会议。内部政治关系松懈，经济联系密切，不定期召开英联邦总理会议，英王为名义上的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体系瓦解，前殖民地相继独立，部分国家加入英联邦。截至 1980 年 7 月，有独立成员国 44 个。

(杨宁一)

艾德礼民主社会主义改革

(Aideli minzhu shehuizhuyigaige) 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在 1945—1951 年执政期间进行的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改革。1945 年，英国工党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竞选纲领，即所谓建立一种“将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在大选中获胜。7 月，艾德礼政府成立，开始实行范围较为广泛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扩大资产阶级民主，恢复工人进行总罢工的权利，限制上议院权力；在经济方面，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国有化政策，把重要的银行和煤炭、电力、国内运输、民用航空、钢铁等部分工业部门收归国有，给予企业主和股票持有人以优厚的补偿，其管理权仍保持在资本家手中，至 1951 年国有化企业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20%；在社会方面推行“福利国家”措施，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险制度，规定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系列保险项目，资金主要来自工人和企业主缴纳的保险费及国家的预算拨款，实行免费享受医疗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通过国民援助法，由政府拨款救济贫困者。改革并未改变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杨宁一)

张伯伦

(Zhangbelun, Neville Chamberlain 1869—1940) 英国首相，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出生于伯明翰巨富家族，父兄曾任政府要职。早年经商。1911年当选为伯明翰市议员，1915年任市长。20年代数次入阁，历任邮电、财政、卫生等大臣。1937年5月，出任首相。独揽外交大权，力主对德绥靖，避战求和，确保英国既得的霸权地位。打击排斥对德强硬派，任用绥靖派。1938年默认德国吞并奥地利，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向德国屈服，以69岁高龄生平第一次乘飞机赴德国与希特勒会谈，签订《慕尼黑协定》。9月30日回到伦敦后，挥舞《英德宣言》对欢迎的人们宣称：“这是一代人的和平”，“现在我请你们回去，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1939年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不得不调整外交政策，采取某些阻止德国进一步扩张的措施。德国入侵波兰后，被迫对德宣战，实际上却按兵不动。1940年德国入侵西欧后，受到举国谴责，声誉扫地而下台。同年11月9日，抑郁病死。

(杨宁一)

丘吉尔

(Churchill,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1874—1965)
英国著名资产阶级政治家，首相，保守党领袖。出身贵族世家，少年入贵族子弟学校哈罗公学。好历史与文学，尤喜军事。1893年考入桑德斯军事学院。毕业后，1895—1900年先后参加镇压印度、苏丹人民的战争和英布战争。1900年以保守党议员身份进入下院。自1906年起，多次入阁，任商务、内政、财政大臣。仇视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积极策划武装干涉苏俄。30年代希特勒上台后，视德国为最危险的敌人，主张以英、法为核心与苏联结盟，联合欧洲一切力量，共同对敌，为对德强硬派代表人物。在绥靖主义泛滥之时不惧孤立，抨击张伯伦政府的外交政策，反对《慕尼黑协定》。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入阁任海军大臣。1940年5月德国进攻西欧后，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接替张伯伦任首相兼国防大臣，宣布“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拒绝希特勒的诱降，领导英国人民保卫英伦三岛，取得不列颠空战的胜利。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同盟者。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当即决定援助苏联。同年8月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大西洋宪章”，推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作为同盟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大战后期日益表现出反共、反苏、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极力维护英国的霸权地位和殖民利益，拖延第二战场的开辟，力图恢复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镇压希腊人民的革命斗争。1945年7月在大选中失败，辞去首相的职务。1946年访问美国，在富尔敦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鼓吹英美联合，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揭开冷战的序幕。主张欧洲联合，提倡“三环外交”。1951年再度出任首相，未能阻止英国的衰落和殖民体系的瓦解，1955年辞职。1965年1月24日逝世。主要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等。

(杨宁一)

法国现代史

(faguo xiandaishi)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的法国历史。开端标志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说为 1899 年“保卫共和国”政府的成立。可分为 4 个时期。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战后从德国手中获取新的殖民地，扩大殖民掠夺，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得到德国巨额赔款（至 1931 年达 80 亿金马克），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1921—1929 年工业生产增长 1 倍多。战后初期革命运动一度高涨，1920 年法国共产党诞生。政治上实行多党制政体，常由观点相近的政党联合进行竞选和组阁。1924—1926 年，第一次出现由激进社会党等组成的“左翼联盟”执政，采取允许公务员组织工会等扩大资产阶级民主的措施，反映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外交上力图削弱德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结盟以防范德国。1923 年，与比利时共同出兵占领德国鲁尔。欧洲大国地位逐渐受到削弱。1924 年后推行对德和解政策，接受道威斯计划（1924），签订洛迦诺公约（1925），签署非战公约（1928）。

1930 年爆发经济危机，持续至 1935 年。工农业生产和外贸大幅度下降，失业人口剧增，社会矛盾激化，法西斯势力活跃。1934 年 2 月 6 日，数万武装法西斯分子包围议会所在地波旁宫，企图推翻共和国。人民阵线运动兴起。1934 年 7 月，共产党和社会党签订“统一行动公约”，实现联合，次年 7 月与激进社会党等左翼政党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936 年 6 月，人民阵线政府成立，推行进步的改革措施，起到阻止法西斯上台的作用。德国法西斯专政建立后，巴尔都任外长期间（1934 年 2 月—10 月）采取对德强硬政策，试图联合苏联遏制德国。后逐渐转向绥靖政策，纵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1938 年 9 月签订《慕尼黑协定》。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后，虽于 3 日对德宣战，实际上宣而不战，战备松弛。1940 年 5 月，德国攻入法国，英、法联军溃败。6 月 22 日，贝当政府投降。东部和北部由德国占领，贝当政府迁往南部城市维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灭亡。国防次长戴高乐在伦敦开创“自由法国运动”，进行抗战。国内抵抗运动蓬勃发展。1943 年，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成立，为抵抗运动领导核心。1944 年 6 月改组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1944 年 6 月，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法军和内地军与盟军配合，至 1945 年 3 月基本解放法国。

法国光复后，临时政府解除人民武装，巩固资产阶级统治。1946 年 10 月建立法兰西第四共和国。1947 年 5 月将议会第一大党共产党排挤出政府。政党斗争激烈，内阁更换频繁，政局动荡不稳。经济上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国有化政策，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接受马歇尔计划，1948 年工业产量达到战前 1938 年水平。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发起组织欧洲煤钢联营和“共同市场”、“欧洲原子能联营”。企图恢复殖民统治，发动印度支那殖民战争（1946—1954）、苏伊士运河战争（1956）和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战争（1954—1962），致使财政枯竭。外交上追随美国，参加冷战，加入北约，国际地位下降。

1958 年 5 月，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尔发动叛乱。6 月 1 日，戴高乐再度出山组成新内阁。9 月，第五共和国成立。此后政局较为稳定。自 1958 年起，戴高乐长期担任总统。1968 年爆发“五月风暴”。1969 年，戴高乐辞

职。在其任内，法国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求恢复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反对美国充当欧洲霸主，1966年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机构。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倡导欧洲合作，推动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实现法德和解。与苏联东欧保持良好的关系，1964年和中国建交。经济上进一步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68年国有化企业资本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3.5%，居西欧首位。经济发展速度加快，1960—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5.6%。197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持续萧条，左翼政党力量大增。1981年，社会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密特朗出任总统。

现代法国的文化继承了历史上的优秀传统，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矛盾，流派繁多，成果丰硕。文学上的主要代表作有：罗曼·罗兰的《欣慰的灵魂》、路易·阿拉贡的《真实的世界》、安德烈·纪德的《伪币制造者》、娜塔利·萨洛特的《金果》等。在哲学上，法国涌现出两位存在主义大师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他们著有大量哲学著作、小说和剧本，影响巨大。（杨宁一）法国人民阵线运动（Faguo renmin Zhenxian yundong）

法国人民组成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运动。30年代初，法国法西斯势力猖獗。1934年2月，数万法西斯分子向国会大厦进军，企图推翻共和国，夺取政权。为有效地打击法西斯势力，1934年7月，社会党和共产党签订《统一行动公约》。1935年7月14日，包括社会党、共产党、激进党在内的69个左翼党派和团体举行反法西斯集会和游行，标志着人民阵线的正式形成。1936年1月，人民阵线公布其纲领，在4—5月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取得多数席位。6月组成以社会党人勃鲁姆为总理的人民阵线政府，进行社会改革，解散法西斯组织，实行每周劳动40小时法，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的福利待遇，保障工会权利，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部分军事工业国有化，国家监督法兰西银行。人民阵线遭到大资产阶级的反对。社会党和激进党与垄断资本妥协。1937年2月，政府宣布暂停实施人民阵线纲领。政府推行的绥靖政策在其内部引起严重分歧。1938年激进党人达拉第总理签订《慕尼黑协定》，10月将反对协定的共产党开除出人民阵线，11月激进党亦退出。人民阵线瓦解。该运动对于制止法国走上法西斯化道路，推进社会经济改革起到重要作用。

（杨宁一）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Falaxi disi gongheguo)法国历史上第四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940年，法国政府向纳粹德国投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告终。法国光复后，1945年10月公民投票，否决恢复第三共和国，决定重新制定宪法。1946年10月13日，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草案，第四共和国成立。为议会制共和国，实行多党制。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两院组成，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为国家权力中心。总统由两院联合选出，任期七年，不掌握实权。总理由总统提名，国民议会任命，政府严格对议会多数派负责。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经济得到恢复，外交上追随美国，连年进行殖民战争。政党林立，政争激烈，内阁更迭频繁，先后共达20届，其中最短的罗贝尔·舒曼仅执政两天，导致政局长期动荡。至50年代中期陷入困境，为第五共和国代替。

(杨宁一)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Falaxi diwu gongheguo) 法国历史上第五个资产阶级共和国。50年代中期，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1958年5月，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利亚发动叛乱，局势混乱。6月初，被视为法兰西救星的戴高乐出任总理，接管政权，并被授予重新制定宪法的全权。戴高乐主持制定的新宪法于9月28日经公民投票通过。10月5日宣告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权力扩大，议会权力缩小，为半总统、半议会制共和国。总统为国家元首和三军统帅，拥有任命总理和部长、签署法令、解散议会、决定公民投票、在紧急状态下行使独裁的权力，任期7年。议会无权监督和罢免总统。据1962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总统由全民投票选举。这些变化适应了巩固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和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的需要。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政治上较为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杨宁一)

法兰西共同体

(Falaxi gongtongti) 法国与其已独立和尚未独立的殖民地组成的国家集合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经过长期侵略扩张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趋于瓦解。战后，法国企图重建殖民统治，由法国和海外省、海外领地、归并地、归并国组成法兰西联邦，取代法兰西帝国。殖民地人民不断掀起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成立法兰西共同体代替法兰西联邦，法国总统任共同体总统，各成员国在内政、经济方面有自主权，外交防务等方面仍受法国控制，所有海外领地可以自行决定加入共同体或独立。1959年2月，共同体正式成立。除几内亚独立外，马达加斯加、达荷美等所有海外领地均加入。1960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成员国独立后仍可留在共同体内，其他独立国家亦可加入共同体。同年，共同体的非洲成员国先后独立，达荷美等6国脱离共同体。1961年其组织机构参议院解散，共同体日趋瓦解。至1980年尚有7个成员国，保持比较密切的经济联系。

(杨宁一)

法国五月风暴

(Faguo wuyue fengbao) 1968年5—6月法国反对戴高乐政府和垄断资本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戴高乐政府执政后期，资产阶级民主受到限制，垄断组织进一步发展，通货膨胀严重。社会普遍不满，巴黎的青年学生要求改革。1968年5月初，大学当局开除学生运动领导人及警察的野蛮镇压，成为运动爆发的导火线，3—13日，运动主要在学生范围内展开。巴黎学生举行抗议活动，占领校舍，筑起街垒，与警察发生冲突，得到市民和工人的同情与支持。斗争规模迅速扩大，其他地区的学生积极响应。5月13日，学生和工人联合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巴黎等地900万人示威游行，要求戴高乐辞职。此后，社会各界广泛投入运动，提出改善经济地位，扩大民主权利的要求。一些无政府主义和极“左”的政治团体也竞相发表自己的主张。参加运动的人数达千万人，使法国陷入经济瘫痪和社会政治危机之中。运动具有自发性，反映了群众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统一领导。5月30日戴高乐许诺进行改革和提高工资，宣称将用武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工人、市民逐渐退出运动，斗争趋向低潮，于6月逐渐平息。

(杨宁一)

达拉第

(Daladi ,Edouard Daladier 1884—1970) 法国总理，激进社会党主席。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里昂大学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加入激进社会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参加过凡尔登战役，形成憎恨和恐惧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想。1919年当选为省议员。自1924年起，多次入阁，任殖民、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外交和陆军部长等职。1933年和1934年两度出任总理，对1934年2月6日的法西斯暴乱采取镇压措施。1935年参加人民阵线运动，同年底出任激进社会党主席。1936年任勃鲁姆内阁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赞同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改革措施。1938年4月出任总理，组成有右翼参加的政府，抛弃人民阵线纲领，推行对德绥靖政策，签订《慕尼黑协定》。1939年9月，宣布法国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审讯法共议员。1940年3—4月，先后辞去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法国败降后，被维希政府逮捕，长期遭监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领导激进社会党，数次当选为国会议员，但他本人与该党影响力日益下降。晚年反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主张与苏联友好，抨击第五共和国宪法中的反民主条款。1959年完全退出政治生活。1970年病故。

(杨宁一)

戴高乐

(Daigaole, Charles Andre Joseph Marie De Gaulle 1890—1970) 法国著名资产阶级政治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幼年受家族民族主义情绪的熏陶，立志从戎。1912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受伤被俘。战后入军事学院深造，在总参谋部等处任职。军事理论上颇有创见，著书立说，倡导机械化装甲部队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反对消极防御战略，不为保守的军事当局采纳，反遭排挤。主张采取行动制止法西斯德国侵略。1940年5月德国入侵西欧后，任第四装甲师师长，两次指挥作战获胜。6月初被破格提升为国防与陆军部次长。贝当投降政府成立后，毅然出走，在伦敦广播电台向法国人民发表著名的“六·一八”讲话，号召与纳粹德国斗争到底。组织领导自由法国（后改称为战斗法国），在国内外开展抵抗运动。1943年6月，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1944年6月任法国临时政府首脑。与盟军诺曼底登陆配合，指挥正规军和内地军投入光复祖国的最后战斗。巴黎解放后，极力维护资产阶级统治，解散人民武装。因其主张加强总统和政府的权力，遭到各政党的反对，1946年1月辞职。1953年退出政治舞台，隐居乡间。1958年6月再度出山出任总理。主持制定新宪法，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59—1969年任总统。同意阿尔及利亚自决，结束侵略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谋求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地位。采取排斥英国，与联邦德国和解，实现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联合，与美国抗衡的策略：两次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于1963年与联邦德国签订合作条约；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组织；建立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反对美国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于1964年与中国建交；与苏联东欧保持良好的关系。对国内事务注意较少。其防务政策给经济造成很大压力，且大权独揽，侵害了资产阶级民主，引起群众不满，爆发1968年“五月风暴”。为缓和矛盾，1969年提出改革方案，被公民投票否决，遂辞职。1970年11月9日因心脏病猝发去世。著有《战争回忆录》、《希望回忆录》等。

(杨宁一)

西班牙人民阵线

(Xibanya renmin zhenxian) 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1931年西班牙成立共和国后，法西斯右翼势力活动猖獗，1933年亲法西斯的勒鲁斯政府上台。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号召下，西班牙共产党与社会党首先就反对独裁统治，争取恢复民主自由进行合作。1936年1月，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左翼共和联盟、工团主义党等左派政党组织签订了人民阵线公约，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提出人民阵线纲领。2月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组成新政府。人民阵线政府推进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实施人民阵线纲领，释放政治犯，实行军队和国家机关的民主化，恢复民主自由，宣布各民族拥有自治权利；进行局部土地改革，实施劳动和社会立法，降低捐税和租金，提高工资。7月反动势力发动叛乱，德意法西斯全面武装干涉西班牙。在人民阵线支持下，共和国政府坚决镇压叛乱，领导了反法西斯的民族革命战争，进一步推行社会改革政策。1939年，共和国被扼杀而失败。

(杨宁一)

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

(Xibanya minzu gemingzhanzheng) 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叛乱、抗击德意武装干涉的正义战争。1936年7月，佛朗哥等西班牙反动势力阴谋推翻共和国，建立法西斯专政，在西属摩洛哥等地发动叛乱。共和国政府予以坚决镇压。叛军仅在南、北方占据个别地区，速胜计划破产，叛乱濒临失败。7月底，德意法西斯公开进行武装干涉，支持叛军，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共出动5万德军和15万意军直接参加作战。西班牙内战演变为民族革命战争。英法采取“不干涉”政策，共和国处境艰难。在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下，西班牙人民进行了坚决斗争。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法西斯军队向首都马德里发动三次进攻，叛军将领莫拉称四路进攻纵队得到市内“第五纵队”的协助。从此，“第五纵队”便成为间谍和内奸的同义语。广大军民英勇抗战，马德里凡能拿起武器的群众几乎都走上前线，取得保卫战的胜利。1937年中，法西斯军队把进攻重点转向北方，大肆轰炸和平城镇和无辜居民。格尔尼卡镇化成废墟，800名妇女、儿童和老人死亡。此惨剧成为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的素材。10月北方陷落后，法西斯军队转而进攻东部，于1938年春突破阿拉贡防线，前出至地中海。1939年2月，东部加泰罗尼亚等地区落入敌手，英法承认佛朗哥政权。至此，共和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物资极度匮乏，内部党派分歧加剧。右翼势力加紧投降妥协活动，发动政变。3月28日，马德里陷落。3月30日，共和国全境被法西斯军队占领。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失败。

(杨宁一)

国际纵队

(Guoji zongdui) 各国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组成的支援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德意武装干涉的志愿军。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组成。成员来自苏联、意大利、法国、加拿大、中国等 54 个国家，共 4 万余人，分别编为第 11—15 纵队。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加拿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等参加。1936 年 10 月正式参战。其誓言是“为拯救西班牙和全世界的自由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作战英勇，纪律严明。约 1 万人为西班牙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由于英、法、美推行“不干涉”政策和“中立”政策，纵容侵略，被迫于 1938 年 9 月撤出西班牙。

(杨宁一)

佛朗哥

(Felangge, 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 1892—1975) 西班牙国家元首，法西斯军人，独裁者。出生于军人家庭，毕业于托莱多步兵学校。1912—1926年，多次参加和指挥对殖民地摩洛哥人民起义的镇压，残酷屠杀当地居民，被授予贵族称号，晋升为准将。1931年共和国成立后，一度被取消现役军人资格。1934年亲法西斯政府执政时，重返现役，被提升为少将，全权指挥镇压抗议亲法西斯分子入阁的起义。1935年任参谋总长。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被免职，调任加那利群岛部队司令。1936年7月组织指挥发动反对共和国的武装叛乱。10月被宣布为国家元首和叛军最高统帅。1939年，叛军攻下马德里，在西班牙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对内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用恐怖手段巩固政权，对外名为“中立”，实则与轴心国合作，派遣“志愿部队”帮助德国进攻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上孤立，转而投靠美国。在国内继续实行法西斯式的统治，独断专行。1969年指定西班牙正统波旁王朝的王子胡安·卡洛斯在他死后担任国王。1975年病死。

(杨宁一)

东欧现代史

(dongou xiandaiishi)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历史。1918年秋，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人民开展民族民主革命，先后摆脱了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扼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阿尔巴尼亚被法西斯国家占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是法西斯德国的附庸。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些国家和东德先后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其途径大致可分为三类：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获得解放的国家，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人民在南共领导下，于1943年11月23日成立了具有临时政府性质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庆节。1945年5月15日解放全国。同年11月29日宣布废除君主政体，成立共产党领导的联邦人民共和国，铁托任部长会议主席。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于1944年5月成立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10月改称临时民主政府。同年11月29日解放全国，这一天后来成为国庆日。1946年1月11日，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霍查任部长会议主席。既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又得到苏军支持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国家，如罗、保、匈、波、捷等国。罗马尼亚各爱国力量和军队在苏军入境的大好形势下，于1944年8月23日发动起义，推翻安东斯库法西斯政权。这一天后来定为解放日。翌年3月，农民阵线领导人格罗查组成新政府。1947年12月30日，废黜国王，成立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在苏军入境的形势下，于1944年9月8日发动起义，次日推翻反动政权，建立祖国阵线政府。1946年9月15日废除君主政体，成立人民共和国。10月，季米特洛夫任部长会议主席。1945年4月14日，苏军解放匈牙利全境，这一天后来定为解放节。翌年2月1日，匈牙利废除帝制，成立人民共和国。小农党领导人纳吉·费伦茨任政府总理。波兰人民在工人党领导下于1944年在卢布林成立临时政府。翌年6月，根据雅尔塔会议协议，吸收伦敦流亡政府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在卢布林政府的基础上，组成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社会党人莫拉夫斯基任总理。1947年初，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于1945年4月4日在科希策成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同年5月5日，布拉格爆发起义。9日，苏军坦克部队开进布拉格，消灭了德军。这一天后来定为国庆日。翌年5月，成立以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为总理的新的联合政府，贝奈斯任总统。在苏军事管制下组织革命力量建立民主政权的国家，如民主德国。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1949年9月20日，西占区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是苏占区在同年10月7日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威廉·皮克任总统，格罗提渥组成多党联合政府。东欧各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础上建立的政权大多是多党制的民主联合政府，资产阶级政党拥有相当势力。随着国际冷战的加剧，各国内部的斗争日益激化。各国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经过1947—1948年的激烈斗争，才最终确立起自己在政权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普遍进行了民主改革和对城乡私人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展开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们一般都仿效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发

展，这种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苏南冲突发生后，南斯拉夫首先向传统的苏联模式提出挑战，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从 1950 年起开始实行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掀起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第一次浪潮。在此前后，波、匈、捷等国的一些领导人也曾提出过按照本国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对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提出疑问，但都被视为反马列主义的异端，遭到批判讨伐。1956 年苏共“二十大”给东欧国家以猛烈冲击，这年相继发生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此后，又有一些东欧国家走上了改革之路，在 60 年代掀起了第二次改革浪潮。1968 年匈牙利开始全面推行新的经济体制，建立了一种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南斯拉夫的改革模式，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实行经济调节制度，使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等。其他东欧国家也先后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由于世界新科技革命以及 7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东欧国家严峻的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东欧国家又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东欧国家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发展很不平衡，阿尔巴尼亚一直坚持原有模式，罗马尼亚等国很少进行改革。

（段炳麟）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Xiongyali Suweiai Gongheguo)匈牙利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918年10月31日匈牙利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1月，匈牙利脱离奥匈帝国，成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卡罗利·米哈伊尔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激进派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从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1月20日，以库恩·贝拉为首的共产主义者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共产党提出解除资产阶级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并在工人群众和武装部队中展开卓有成效的宣传组织工作。从1918年12月中旬起，工人同武装警察之间，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同效忠政府的部队之间的武装冲突频繁发生，工人占领企业和农业工人占领大地产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面对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卡罗利于1919年2月21日逮捕了库恩等40多名共产党领导人，捣毁了共产党的机关报《红色报》。政府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工农运动进一步高涨。3月20日，协约国代表威克斯向匈牙利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匈牙利在4月1日以前，让出2/3领土，以便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建立一个中立地区。卡罗利政府没有能力应付内部和外部困难，于当天辞职，并建议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织政府。但是在当时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当时还在狱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库恩提出共产党参加政府的条件：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红军和人民警察，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业国有化，与苏俄建立同盟。与此同时，布达佩斯的工人和革命士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除了反动军警的武装，占领了各个重要战略据点。协约国在布达佩斯的两团法军也被包围在兵营之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被迫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匈牙利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政府委员会组成，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任主席，库恩任外交人民委员。其他人民委员绝大多数是原社会民主党人，原共产党人一般只任副职。

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实行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大农场，把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25%，实行8小时工作制，并为保卫共和国建立了红军。苏维埃政权也犯有一些错误，特别是没有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从4月起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局势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在军队中和后方加紧破坏活动，并在维也纳同协约国代表进行谈判。他们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妨碍同协约国缔结和约和解除封锁为借口，迫使匈牙利革命政府委员会于1919年8月1日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133天，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失败。匈牙利人民的斗争对当时正在争取自由解放的各国劳动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

(段炳麟)

匈牙利事件

(Xiongyali shijian) 1956年匈牙利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动乱。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以拉科西·马加什为代表的前匈党领导照搬苏联模式和推行极左政策引起人民的不满，以及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乘机进攻。10月21日，哥穆尔卡担任波党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后，布达佩斯民情激愤。翌日，裴多菲俱乐部和布达佩斯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相继向党中央提出10点要求和16点要求。内容包括要求进行改革，清算拉科西的罪行，彻底改组中央党政领导，让纳吉·伊姆雷重新执政，撤走苏联驻军等。23日，首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晚上，电台大厦前发生了武装冲突。整个城市陷入混乱之中。24日凌晨，布达佩斯街头出现苏军坦克。同日纳吉出任政府总理，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呼吁停止流血冲突。25日，卡达尔·亚诺什出任第一书记。28日，苏军坦克部队开始撤出。29日，纳吉下令解散国家保安机构；30日，再次改组政府，取消一党制。帝国主义乘机扩大事态，派遣大批间谍进入匈牙利，逃亡在外的匈牙利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也纷纷回国。一些武装暴徒袭击国民议会、电台、电话总局、军械处和市委大楼等要害部门，屠杀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11月1日，纳吉宣布匈牙利中立，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向联合国求援。11月4日，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苏军再次开进布达佩斯。在苏军干预下，局势逐步趋于平静。10多天的动乱给匈牙利造成巨大损失，几万人死伤，经济损失达全年国民收入的1/4。

(段炳麟)

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

(xiongyali jingji tizhi gaige)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后，匈牙利开始酝酿经济体制改革，并进行了局部改革的试验。在农村，政府承认在集体化运动中使用了强制手段，允许农民退社，然后按照自愿互助的原则重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初期，合作社的耕地急剧减少，1957 年只占全国耕地的 10%；经过几年努力，到 1961 年，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耕地占 93%。在工业方面，减少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注意运用经济杠杆，酝酿全面的改革。1966 年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1968 年开始在全国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把计划调节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把中央对经济的领导同扩大企业自主权结合起来，把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手段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以经济手段为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国家计划主要通过经济调节手段来促使企业关心和接受；用市场贸易代替由中央统一调拨生产资料和统一分配产品的制度；采取国家定价和生产单位定价相结合的办法，实行三种价格形式，即固定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改变投资办法，用银行贷款代替预算拨款；调整工资制度，用有差别的浮动工资制代替国家统一规定职工工资的制度。实行新体制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1966—1970 年的“三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了 31%，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 3.8%。“四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了 35%，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 6.2%。粮食产量从 1950 年的 369 万吨增加到 1976 年的 1135 万吨，人均产量为 1070 公斤，居世界第五位。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73 年以后，由于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和石油涨价，匈牙利商品成本提高，出口减少，外贸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新经济体制未能对此作出及时的、适当的反应，暴露了这一体制仍有缺陷。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在经历了 1973—1978 年的停滞阶段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撤销酿酒、制糖等 18 个工业托拉斯，把它们分成近百个企业，以加强竞争；从 1980 年起开始采用竞争性价格制度，把国际市场价格作为国内商品定价的基础，用国际竞争能力来鉴别企业的经济效率；放宽对集体和个人企业的限制；1986 年公布企业破产法，使企业自负盈亏的政策进一步落实。

(段炳麟)

库恩·贝拉

(Kuen Beila 1886—1939) 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生于特兰西瓦尼亚莱列村的一个农村小书记员家庭。1902 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应征入伍，1916 年在俄国被俘。在托木斯克战俘营中进行革命宣传，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地组织建立联系，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 年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党(布)托木斯克省委员会委员。1918 年 3 月组织俄共(布)匈牙利组，任该组主席；同年 5 月起任俄共(布)外国人团体联合会主席。1918 年 11 月秘密回国，参与创建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党的主席。1919 年 2 月被捕，3 月获释。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人民委员和陆军人民委员，是苏维埃政权的实际领导人。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1920 年到苏俄。1920—1924 年，先任苏俄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继任克里木革命委员会主席，尔后在乌拉尔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接着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 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 年秘密来到维也纳，于翌年重建匈牙利共产党。1928 年 4 月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同年 8 月获释回到苏联。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反对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受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严厉批评。1937 年 6 月在苏联被捕，1939 年 11 月 30 日死亡。后被恢复名誉。

(段炳麟)

纳吉·伊姆雷

(Naji Yimulei 1896—1958)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896年6月生于波什瓦尔。当过钳工。1915年应征入伍，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服役。不久，在战斗中被俄军俘虏，解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参加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9年回国，参加了保卫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1921年再次回国，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7年被捕；翌年出狱后，流亡奥地利。1930年起移居苏联，先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农业，毕业后在集体农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担任在苏联播音的科苏特电台的负责人，并在一些高等院校讲授农业科学。1944年10月回国。同年12月以共产党代表身份任临时国民政府农业部长。1945年11月改任内务部长。同年当选为匈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翌年3月，当选为国民议会主席。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抵制拉科西左倾错误，被控犯有“布哈林倾向错误”而于1949年免去了政治局委员职务。1950年，先后在食品部长，征购部长。1951年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翌年11月，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年7月起任主席。上台后，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大力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允许农民自愿退社和解散合作社，允许小私有企业存在，宣布宗教自由，实行政治大赦。1955年4月，以“右倾”罪被解除党内外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56年10月恢复党籍。匈牙利事件中，再次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和政治局委员，采取解散保安部队，取消一党执政等妥协措施，使局势更加恶化。11月4日，苏军开进布达佩斯，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纳吉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经交涉于11月23日离开，被苏军逮捕。1958年6月被匈牙利最高法院判处死刑。

(段炳麟)

卡达尔

(Kadaer, 1912—1989)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12年5月26日生于阜姆(今里耶卡)。受过中等教育,当过学徒工和仪器工人。1931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同年被选为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942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翌年任党中央书记。曾多次被捕。解放后,曾组织布达佩斯警察局工作,一度任党中央干部部长。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布达佩斯市委书记。在1946年匈共三大和1948年匈劳动人民党一大上均当选为党中央副书记。1948—1951年任内务部长。1951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同年因拉伊克案件牵连被捕,1953年获释。1954年—1956年先后任布达佩斯第13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佩斯州党委第一书记。1956年7月当选为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同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于25日出任第一书记;11月组成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政府总理。1958年1月辞去总理职务,改任国务部长。1961年9月—1965年6月又任总理。1988年5月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和党的总书记职务,改任党的主席。1989年5月又被解除中央委员和党的主席职务。同年7月6日逝世。在担任匈牙利最高领导职务期间,对内推行改革,对外坚持同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时也主张进一步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段炳麟)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制度

(Nansilafu zizhi shehuiZhuyizhidu)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是“自治”，即由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直接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经济自治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南共认为，这种所有制既不是国家所有制，也不是集体、集团所有制，而是生产资料属于所有从事劳动的人所有。政治自治制的核心是代表团制，即由基层自治组织的公民选出各单位的代表团，再由这些代表团从自己的成员中推选出议会代表候选人，经全体选民投票，选出参加议会的代表。代表团是常设的，议会代表要接受本代表团和基层选民的监督与指导。基层组织有权撤换议会代表和整个代表团。议会代表和代表团成员的任期均为四年；议会代表不能兼任政府职务，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1963年，是“工人自治”阶段。1950年6月，联邦议会通过了《关于工人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即“工人自治法”。法令宣布将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并规定在企业中建立工人委员会，把企业的管理权交给工人，标志着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始。1951年12月议会通过《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宣布国家计划只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主要比例。1953年1月，联邦议会通过新宪法，把自治原则规定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时期，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扩大，但自治主要局限于工矿企业内的简单再生产领域。第二阶段从1963年到60年代末，是“社会自治”阶段。主要特点是：自治由工厂扩大到国家机关和社会事业单位，使工人自治发展为社会自治；企业不再上交投资基金税，只向国家交纳供社会行政费用的税款，国家把扩大再生产资金的支配权下放到企业；实行市场经济。第三阶段是从7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联合劳动和建立在联合劳动基础上的政治自治制度的阶段。在经济制度上，通过劳动组织的相互联合协调而加强社会经济的统一集中，但它是在不断削弱国家经济职能，扩大劳动者自治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来实现的。这是一种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自治社会经济体制。在政治制度上，根据1974年的宪法，南斯拉夫各级议会由代议制改为代表团制。南斯拉夫实行自治社会主义制度，使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参加管理生产和社会事务，从而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经过30多年的建设，南斯拉夫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具有中等水平的工业—农业国。但是，过早削弱和取消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过分削弱中央权力和计划指导作用，造成经济建设中的无政府主义，比例失调等问题。

(段炳麟)

铁托

(Tietuo 1892—1980) 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原名约瑟普·布罗兹。1892年5月25日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维茨村。1905年初等学校毕业后当五金工人。1910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13年被征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被俄国俘虏。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获释。十月革命后，一度参加“国际赤卫队”。1920年回国，同年9月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20—1928年，历任南共区委委员、萨格勒布市五金工会书记和市委书记等职。1928年被捕。1934年出狱，化名铁托，任南共克罗地亚省委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5年赴莫斯科任南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候补委员，化名瓦尔特。1936年任南共中央组织书记；翌年任总书记，立即着手整顿党的组织，把党逐渐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党。1941年德、意法西斯军队侵占南斯拉夫后，建立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任总司令，创建人民军和抗敌根据地，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反法西斯侵略的武装斗争。1943年11月当选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即临时政府）主席。同年被授予元帅称号。1944年获人民英雄称号。1945—1955年任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1952年1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任南共联盟总书记。1953年起任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66年当选为南共联盟主席。1971年7月起，兼任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1974年由宪法规定任终身总统，同年在南共联盟“十大”当选为终身主席。在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期间，对内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对外推行不结盟政策，积极倡导不结盟运动，在国际关系中坚持独立、平等、不干涉内政，反对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贡献。1980年5月4日在卢布尔雅那逝世。

(段炳麟)

波兹南事件

(Bozinan shijian) 1956年6月发生在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的政治风波。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照搬苏联经济模式，大量资金用于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加上苏联在领土等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致使在波兰群众中孕育着不满情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传出后，在波兰引起巨大反响。1956年6月上旬，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现名策盖尔斯基工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降低奖金税，并派代表团去机械工业部请愿，没有得到满足。消息传来，1万多名工人在6月28日前往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喊“面包、民主、自由”和“维斯瓦夫”（即哥穆尔卡）的口号，并同警察发生冲突。破坏分子乘机煽动，扩大事端。示威游行发展成为武装冲突。群众包围保卫部大楼，袭击市委大楼、电台和监狱。政府出动军队，平息了骚乱。在这次事件中，有5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波兰统一工人党于7月召开七中全会，认为事件的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走狗的煽动，但极大部分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全会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政治民主化。8月，恢复了哥穆尔卡的党籍。10月，波党八中全会选举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通过了《关于党在目前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清算了照搬苏联经验的缺点和工作中的错误，决定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段炳麟）

哥穆尔卡

(Gemuerka 1905—1982)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05年2月6日生于热舒夫省克罗斯诺县。青少年时期当过五金工人和石油工人。1926年参加波兰共产党。1930年任波兰化工工人总工会书记；翌年任全国左翼工会委员会书记。1934—1935年在莫斯科列宁国际学院学习。回国后任波共西里西亚区委书记。曾多次被捕。1942年任波兰工人党（前身为共产党）中央委员兼华沙市委书记。翌年起任工人党总书记，联合波兰各爱国民主力量进行反法西斯斗争。1944年苏军解放波兰东部部分领土后，前往卢布林，领导公开的波兰工人党，进行人民政权的建设。1945年起兼任政府副总理和收复地区部部长。1948年8月，由于他强调波兰的独立自主，认为波兰应走自己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对南共采取的措施太严厉，因而被控犯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错误而受到批判，并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翌年11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51年7月被捕下狱，1954年获释。1956年6月波兹南事件发生后，7月党中央全会正式取消对他的控告，恢复他的党籍。同年10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党中央第一书记。他上台后，在新的基础上调整了波苏关系，进行了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后期领导工作中发生了一系列错误，造成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削弱了党和人民的联系，最终酿成1970年底的政治危机。同年12月，被撤销了党的第一书记职务。1982年9月1日病逝于华沙。

(段炳麟)

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

(Jiekexiluofake eryue shijian) 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在 1948 年 2 月为夺取政权而制造的政府危机。战后初期，捷共与各资产阶级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总统贝奈斯推行平衡政策。在 1946 年 7 月组成的第 3 届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 26 名成员中，共产党 9 名，社会民主党 3 名，三个资产阶级政党——民族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各 3 名，无党派人士 2 名，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出任总理。1947 年后，随着美国发动冷战和东西方关系恶化，捷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1948 年 2 月 20 日，12 名资产阶级部长以内务部用共产党人代替 8 名警官为借口，集体向总统辞职，制造政府危机，企图搞垮共产党人任总理的联合政府，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排挤出阁，组织看守政府，再进行选举，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捷共发动群众，坚决反击。21 日，布拉格 10 万群众集会，要求总统接受资产阶级部长的辞呈。24 日，全国 250 万工人罢工 1 小时，表示对哥特瓦尔德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内务部破获了民族社会党军官企图破坏国家电台的阴谋，于是进行了广泛的搜查和逮捕，并调精锐公安军团进驻布拉格。在群众的压力下，贝奈斯总统于 25 日接受 12 名部长的辞呈，并同意哥特瓦尔德提出的新政府名单。同年 5 月颁布新宪法，规定捷克斯洛伐克为社会主义国家。6 月，贝奈斯辞职，哥特瓦尔德当选为总统，共产党人萨波茨基任总理。人民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段炳麟)

布拉格之春

(Bulage zhichun) 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一场自由化改革运动。在捷克人民强烈要求按照自己民族特点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浪潮冲击下，1968年1月，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他上台后，撤换党政军领导中诺沃提尼派人物，放松书报检查，扩大报纸的讨论范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宣布“将进行试验”，“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在政治方面，改变党的职能，改造整个政治制度，保证集会、结社、迁徙、言论和新闻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使人民的一切政治团体直接参加国家权力机构；在民族政策方面，主张建立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在经济方面，改革工业结构和布局，允许私有企业存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取消国家对外贸易垄断权；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在进一步发展同苏联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一切国家的互利关系。这是一次综合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改革运动，有自由化倾向。这一改革运动曾被西方报刊称为“布拉格之春”。

(段炳麟)

季米特洛夫

(Jimiteluofu 1882—1949) 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882年6月18日生于拉多米尔县科瓦切夫齐村。12岁辍学，当排字学徒工。1900年当选为索非亚印刷工会书记。1902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翌年，该党分裂，参加“紧密派”社会民主工党，当选为索非亚党组织的常务委员。1904年，当选为中央工人理事会理事和索非亚地方工人理事会书记。翌年，当选为索非亚党组织的书记和全国工会同盟中央书记。从1909年起，一直任党中央委员。191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任紧密派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书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1918年8月，因从事革命鼓动被捕；同年12月获释。1919年5月，紧密派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继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23年参与领导反法西斯九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同年，任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主席团书记，协调巴尔干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翌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的领导人。1933年德国纳粹当局制造国会纵火案时被捕，在莱比锡法庭上大义凛然，揭露法西斯罪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光荣旗帜。1934年2月出狱后赴苏。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为建立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领导建立保加利亚祖国阵线，组织反法西斯游击战争；1944年，参与组织领导九月起义。1945年11月返国。1944年起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1946年起兼任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7月2日病逝于莫斯科。

(段炳麟)

亚洲现代史

(Yazhou xiandai shi) 自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现在的亚洲历史。进入近代后，亚洲除日本外，大多数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是亚洲现代史的基本内容。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与近代不同的新特点：第一，历史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由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第二，各国斗争遥相呼应，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持续发展的特点；第三，运动呈现多样性，表现为：领导力量上，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部分封建王公贵族、部落酋长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等三种类型；采取的斗争形式有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和政治斗争为主的两种。亚洲现代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可分为两大时期。

在第一时期，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掀起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并且运动呈现持续蓬勃发展局面。东亚地区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主要反对英、法、荷等国的殖民统治。这段历史可分两个阶段。1918 年左右至 1928 年为第一阶段，民族解放运动出现第一次高涨。当 1918—1923 年欧洲无产阶级掀起革命高潮时，亚洲也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革命高潮。中国、朝鲜、印度、土耳其、印尼、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等国都爆发了大规模民族解放斗争或人民起义。1924—1928 年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东亚、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仍继续发展。中国、朝鲜、印度、越南、印尼等国都发生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出现第一次高涨的原因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新兴社会力量壮大，阶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为内在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帝国主义对亚洲国家新的殖民掠夺和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是外部因素。1929 年至 1945 年为第二阶段。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帝国主义各国加强了对亚洲各国的殖民掠夺以转嫁危机，民族矛盾更为激化。30 年代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上武装斗争道路，并且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彻底打败法西斯作出巨大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民族独立。此后这些国家为巩固政治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继续斗争，并作为第三世界的重要力量，在反对超级大国强权政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战后亚洲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二战结束至 50 年代中期是第一阶段。二战中日本帝国主义的溃败和英、法、荷等西欧殖民国家的削弱以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为中心，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很多国家取得民族独立。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是第二阶段。在万隆会议精神鼓舞下，亚洲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迅猛发展，东南亚、西亚尤为突出。60 年代初不结盟运动兴起后，亚洲人民与非洲、拉美人民一道，互相支援，更深入广泛开展反帝反霸斗争。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和平、中立外交政策。70 年代至现在是第三阶段。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向纵深发展，在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扩张斗争中巩固和发展民族独立成

果，在发展民族经济过程中继续推进民族民主革命。70年代以来，亚洲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东盟、西亚产油国尤为突出。由于亚洲各国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国与国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甚至有些地区战火长年不熄。

战后时期亚洲历史发展有如下特点：第一，民族解放运动的规模和深刻程度及成就前所未有。第二，取得独立的形式和道路多种多样，少数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多数国家是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民族独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第三，这些取得独立的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真正从政治经济上独立的问题。目前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亚洲国家有两种类型：少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还很贫穷。因此，亚洲国家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金相春）

日本现代史

(riben xiandaishi)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的日本历史。1918 年的米骚动是日本现代史的开端。它包括大正 (1912—1926)、昭和 (1926—1989)、平成 (1989—) 三个天皇年号。这段历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标, 可分为两个历史时期。

第一时期 (1918—1945) 是日本帝国主义走上法西斯化道路和法西斯彻底灭亡的历史。这一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对外侵略: 1918 年出兵西伯利亚、1927—1928 年出兵中国山东、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 年发动“七·七事变”、1941 年挑起太平洋战争, 大体平均每 5 年就发动一次侵略战争。在侵略战争中, 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发展起来。法西斯势力的增强又促使日本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并在战争中彻底崩溃。1945 年以前的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都与其侵略战争和法西斯化密切联系在一起。

第一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918 年至 1930 年是第一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经济迅速发展, 垄断资本主义最终确立起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政府专制和军部骄横跋扈, 要求政治民主的潮流不断高涨。从 1912 年开始的“大正民主运动”在这一阶段达到高潮。1918 年爆发规模空前的群众革命暴动“米骚动”。在人民斗争推动下, 1924 年起出现了 8 年政党政治时期。但同时, 以“犹存社”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民间法西斯团体和以“改造国家”为目的的军部法西斯势力活跃起来。1931 年至 1936 年是第二阶段。世界经济危机袭来后, 日本处于国内外矛盾的漩涡之中, 为摆脱困境, 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军部和民间法西斯势力勾结, 发动“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一系列政变, 加速了自下而上的法西斯化进程, 加强军部对政府的干预和控制, 1936 年建立了军部控制下的法西斯政权。在经济上, 国家政权与财阀结合, 建立准备大规模战争的军国主义经济。1937 年至 1945 年 8 月是第三阶段。1937 年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在战争过程中加速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进程。军部与垄断财阀进一步勾结, 推行经济的全面军事化, 把金融、产业、人民生活各方面都置于总动员体制之下。1940 年 9 月, 签订日德意法西斯同盟条约。同年 10 月, 建立“政治新体制”和“经济新体制”, 最终确立了法西斯体制。1941 年发动太平洋战争, 国内法西斯专政达到顶峰。在反法西斯力量联合打击下, 1945 年 8 月日本法西斯投降。

第二时期 (1945 年至现在) 是日本从战败中迅速重新崛起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日本走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道路, 用较短时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现代化, 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与这一基本线索密切联系在一起。

第二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945 年 8 月至 1955 年是第一阶段。二战结束后初期, 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 日本进行了以修改宪法、解散财阀、农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民主改革, 完成了明治维新遗留的历史任务, 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变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 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打下了基础。1951 年签订“旧金山和约”, 成为主权国家, 确立了日美同盟关系。1955 年完成恢复经济的任务。同年, 保守势力联合起来成立自民党, 形成了 55 年体制。1956 年至 1973 年是第二阶段, 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政府制定

“经济自立五年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符合国情的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1956年至1972年出现三次经济“大景气”，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速度增长。60年代末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外交上逐渐实行独立自主政策。1956年与苏建立外交关系，加入联合国。1960年，与美国签订具有对等军事同盟性质的《新安保条约》，日美关系向“伙伴关系”转化。1972年与中国恢复邦交。1973年至现在是第三阶段。1973年日本爆发战后第7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减缓，进入低速平稳发展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大体为4%，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债权国。随着经济势力的膨胀，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动向愈发明显。80年代初，日本雄心勃勃地提出，从“模仿和追随的文明开化时代”迈向“首创和领先的文明开拓时代”，即所谓“第三次远航”。日本这种发展势头对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日本现代史始于何时，国内外学者观点不一。除1918年说外，尚有1890年说和20世纪初说。日本大部分学者认为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属于近代史范畴，二战结束后进入现代史。中国学术界同意此观点的人越来越多。

（金相春）

米骚动

(Misaodong) 1918年7—9月因米价暴涨而引起的日本民众暴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落后的农业生产和迅速发展的工业之间矛盾突出，粮食供应紧张。日本政府为干涉俄国革命，出兵西伯利亚，大量收购军粮。地主、资本家、米商大搞囤积居奇，市场粮食奇缺，米价暴涨。1918年夏，米价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涨4倍，人民生活急剧恶化，引起民众不满。1918年7月23日，富山县下新川郡鱼津町渔民妇女首先展开反对米商外运粮食的斗争，妇女们陆续起来进行要求降低粮价、救济穷人的运动。8月3—5日，鱼津、滑川、东水桥等地发生包括男子在内的数百人骚动，与警察发生冲突。8日，斗争扩展整个富山县。报纸很快报道富山县事件，斗争迅速波及大城市。8月10日夜，京都、名古屋两市发生袭击米店的骚动，以此为转折点，斗争迅速发展至全国。至8月15日，大阪、神户、横滨、东京等全国大城市都发生暴动。这些城市的居民举行集会，发表演讲，要求降低米价，袭击米店和高利贷者、奸商住宅，捣毁警察署，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发生搏斗。8月16日起暴动蔓延到小城镇、农村和矿山。民众袭击地主和富豪，煤矿工人用炸药对付军队的镇压。9月17日，明治煤矿起义被镇压标志着此次米骚动最终失败。米骚动共持续57天。全国一道三府四十三个县中，除青森、岩手、秋田和冲绳之外，都有骚动。直接参加斗争的群众估计达70万人以上，数万人被拘捕，其中7700余人被起诉。至1918年底，被判刑者有2600余人。米骚动是群众自发的运动，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使寺内内阁被迫下台，促进了工农群众革命觉悟的提高，对以后革命斗争高涨影响甚大。

(金相春)

东方会议

(Dongfang huiyi)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义一内阁为了制定对华政策而在东京召开的会议。参加者有外务省、军部、朝鲜总督府、关东厅、驻华公使及总领事等。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领》8条，主要内容有：“满蒙并非中国本土”，要从中国本土割离；支持中国的“稳健分子”和“稳健政权”来对抗中国人民革命；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日本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1929年，中国《时事日报》刊登田中义一根据东方会议内容上奏天皇的奏文，史称《田中奏折》。奏折中有“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占领中国之后，“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等内容。自奏折公布至今，学术界对其真伪有争论，但都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侵略步骤与奏折是吻合的。

(金相春)

军部

(Junbu) 日本掌握军事部门并起独特政治势力作用的军人上层集团。主要指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此外，陆军省、海军省、侍从武官长、元帅府等军事首脑机关也属于军部势力。1872年日本取消兵部省，成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8年，陆军省参谋局改组为参谋本部，成为直属于天皇的独立的军令机关。1888年取消参谋本部，分别设立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参谋本部（1893年改为海军军令部，1933年又改名为军令部），根据“帝国宪法”，天皇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这种统帅大权即军令权的行使则由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辅佐，元帅府和军事参议院是其顾问机关。作为军政机关的陆军省和海军省的首脑陆海军大臣为内阁成员，拥有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的“帷幄上奏权”。陆海军大臣只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即“现役武官专任制”）。根据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幕僚全由陆海军将校组成。国务大臣不得参与大本营一切作战计划和作战领导事宜，法律上确定了军部上层在战时的独裁权力。因实行“现役武官专任制”，陆海军大臣的任免权法律上由军部一手掌握，这就使军部可以随意摆布内阁，事实上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内阁的军部特权地位。进入30年代以后，军部是日本对外进行侵略战争和法西斯化的核心力量，确立了军部控制下的法西斯体制。1945年日本投降后，军部被废除。

（金相春）

五·一五事件

(Wu·yiwushijian) 1932年5月15日，日本海军少壮派军官策划发动的武装政变。20年代末起，在海军青年军官中出现以“改造国家”、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为目的的法西斯组织。1932年2月和3月发生“血盟团事件”后，直接支持血盟团的海军青年军官继续策划军事政变。同年5月15日晨，古贺清志、中村义雄、三上卓等海军少壮派军官，率领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本部、日本银行等，首相犬养毅被枪杀。同日夜，橘孝三郎率领的“爱乡墅”成员企图袭击东京周围变电站，在混乱中颁布戒严令，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但均未达到目的。政变参加者纷纷自首。事件后，军部借口“时局非常”，拒绝由政党继续组阁，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内阁。五·一五事件标志着“政党内阁时期”结束，自下而上的法西斯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金相春)

二·二六事件

(Er·erliu shijian) 1936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的武装政变。30年代日本一系列法西斯军事政变中规模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政变。30年代初，陆军中法西斯分子分裂为两派：一派为主张以军事政变推翻现政府、建立天皇亲政的军事独裁政权的皇道派，其成员大多为现政府中没有地位的青年下级军官；另一派为主张运用军部现有地位，逐步扩大其势力，以合法手段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统制派，他们多为在现政府中有地位的上层骨干。两派对立逐渐激化。1936年1月，皇道派成员较集中的第一师团调往“满洲”的消息传出，引起皇道派极端不满。他们决定提前发动武装政变。2月26日清晨，中村孝次、矶部浅一、安藤辉三等皇道派军官，率领1400余名士兵，在东京举行叛乱。杀死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并一度占领首相官邸、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国会。他们提出“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等口号，要求“解散国会”，“任命真崎大将为首相”、“荒木大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建立维新政府”。陆军大臣动摇，发布公告，称他们为“蹶起”部队，“体现了国体之真姿”。但天皇、统制派大部分人和官僚、财阀反对叛乱。29日，地方部队调进东京后，宣布他们为“叛军”，以“敕命”形式勒令其“归顺”。至29日下午2时许，大部分士兵回营，叛乱被镇压。荒木、真崎等退出现役，19人被判处死刑，70人被判徒刑。于是皇道派瓦解，统制派牢牢掌握军部。3月9日，广田弘毅遵照军部的意见遴选阁僚，组织内阁，建立军部控制下的法西斯政权。

(金相春)

日本战后改革

(riben zhanhou gaige)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之下进行的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广泛领域的民主主义改革。主要包括：第一，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采取如下措施：解散日本全部军队；逮捕东条英机等 140 多名战犯，并组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讯；废除《治安维持法》和《治安警察法》，撤销特高警察；解散右翼法西斯团体；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神道和国家分离；释放共产党人在内的全部政治犯等。第二，根据美国占领当局意旨修改宪法。修改后的《日本国宪法》于 1946 年 10 月 7 日经贵族院和众议院通过，11 月 3 日正式公布，从 1947 年 5 月 3 日起生效。新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废除天皇的绝对统治大权，“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日本为议会制国家，内阁对国会负责，行政权由内阁执行；“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新宪法使日本成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第三，解散财阀。美国占领当局首先指定三井总公司等 83 家为持股公司，指定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十大财阀的 56 人为财阀家族。这些被指定者的所有股票须交给“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处理。解散持股公司，勒令财阀家族及财阀公司负责人一律辞职，十年内不许复职。在此基础上又制定《禁止垄断法》和《经济力量过分集中排除法》，禁止卡特尔的共同行动，划小经济力量过分集中的企业。此项改革远未达到预期目标。被指定的 83 家持股公司只解散 28 家，原指定为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 325 家企业中，实际上被划小的企业只有 8 家。解散财阀虽不彻底，但铲除了日本财阀的封建统治形式，促进了战后日本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第四，农地改革。先后颁布两次农地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有：凡在村地主超过一町步的出租地和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由政府强制收买，出售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全国原 230 万町步出租地征购了 190 多万町步，其中 180 多万町步廉价售给佃农。农村 90%耕地变成自耕地，90%左右农户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封建地主制基本上被消灭，形成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新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此外，日本还对文化教育、劳动立法、公务员制度、警察制度、家族制度等进行改革。战后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解决了明治维新遗留下的历史任务。日本由军国主义法西斯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为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打下良好基础。

(金相春)

日美安保条约

(Ri mei anbao tiaoyue) 全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与美国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1951年9月8日，签订《旧金山和约》后5小时，在美国旧金山由日本首相吉田茂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签订。1952年4月28日，与《旧金山和约》同时生效。《安保条约》和《旧金山和约》同时签订和生效说明两者有密切联系。在美国称霸亚洲的政策中，日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但美国感到继续在日本驻扎军队的条文不宜写进“对日和约”之中，故单独签订条约。条约共五条，主要内容有：美军有权在日本领土及其周围驻留，美国希望日本逐渐增强军事力量；驻日美军可用以“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可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出兵镇压日本的内乱和骚乱；未经美国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将任何基地给予任何第三国；美军驻扎日本的条件，由美日两国政府的行政协定决定。条约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平等的，是单方面承担义务的条约，是驱使日本作为美国战争工具的条约，使日本与美国形成军事同盟关系。1958年夏起，美日之间举行修改《安保条约》的谈判。1960年1月19日，在华盛顿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同年6月23日生效。该条约与《日美安全条约》相比，是两国对等的、双方承担义务的条约，加强了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日本仍依靠美国核保护伞维护自身安全，承担提供军事基地、扩充军备、共同作战等更多的义务。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日本人民掀起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举行了23次全国统一行动。每次参加统一行动的人数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斗争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参加阶层之广泛，在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

（金相春）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guomin shouru beizeng jihua) 1960年12月,日本池田内阁通过的1961—1970年度日本经济发展计划。实际上是国民生产总值倍增计划。在下村治的经济高速增长论影响下,1959年初,池田勇人、中山伊知郎等人提出“工资倍增论”。岸信介内阁的经济审议会组织17个小组委员会,动员2000多名学者和各方人士开始制定计划。1960年5月基本方案已形成。同年12月,第二届池田勇人内阁时期正式制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分两大部分:正文共四篇十四章;另一部分为篇幅较大的“附录”,即工业、农业、贸易……等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计划”所要解决的课题是:充实社会资本;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促进对外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与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与确保社会安定。池田政府宣称“本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和达到充分就业。为此,必须最大限度地谋求经济的稳定增长”。计划提出的主要几项具体目标是:1970年度国民生产总值为1960年的2倍(年增长率7.2%),1970年人均国民收入为20.8万日元,达到1960年的2倍水平。人均工资1970年达到1956—1958年平均数的1.94倍。“计划”的重点是充实社会资本,即政府投资和行政开支的分配上。它是50年代中期经济起飞以来,日本政府制定的许多经济计划中最有名、影响最大的一个。同其他几个长期经济计划一样,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没有约束力,是指出趋向性的诱导政策。它表明日本有经济迅速发展的能力,对于动员国民的劳动热情,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金相春)

东条英机

(Dongtiaoyingji1884—1948) 日本首相，陆军大将，甲级战犯。生于东京。1915年陆军大学毕业。1919年至1921年考察欧洲。1921年10月，在德国南部的巴登同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三个少校订立“盟约”，发誓要刷新陆军人事，改革军队建制，“改造国家”。他们后来都进入参谋本部，成了陆军中枢的掌权人物。1931年任参谋本部第一课课长，1933年3月任参谋本部辅佐，晋升为少将，同年11月转任陆军省军事调查部长。1935年9月，调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1937年3月，任关东军参谋长。同年6月，向近卫内阁建议尽快发动对华的大规模进攻。“七·七事变”爆发后，极力主张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938年5月调回国内，晋升为陆军省次官。1940年7月，担任第二次近卫内阁陆军大臣，反对日军从中国撤退，主张对美开战。同年10月组织内阁。在他的策划下，11月5日御前会议作出12月上旬向英美开战的决定。为加强法西斯统治，任首相期间先后兼任外务、文部、内务、商工、军需大臣、参谋总长等要职。1944年7月下台。日本投降后，被占领军司令部列为战犯，下令逮捕。1945年9月11日自杀未遂。1948年11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为甲级战犯，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金相春)

吉田茂

(Jitianmao 1878—1967) 日本首相。生于东京。原为自由民权运动时期自由党干部竹内纲之第五子，后过继给大富豪吉田健三。1906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毕业。同年，外交官考试合格进外务省。至1928年止，派驻中国奉天（今沈阳）、天津、安东（今丹东）、济南、青岛等地，任领事或总领事。1927年参加东方会议，极力主张对华强硬政策。1928年任田中义一内阁外务次官。后任驻意大利、英国大使。30年代中期，因为自由主义亲英美派遭军部排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秘密从事结束战争活动。1945年2月，与近卫合写要求结束战争的秘密上奏书，4月被宪兵队逮捕。日本投降后，任东久迩、币原内阁外相。1946年任自由党总裁。1946年5月至1954年12月间，曾组织五届内阁。极力重建日本资本主义。1951年签订《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2年4月签订《日台和平条约》，与台湾当局建立外交关系。推行亲美反共政策，纠集和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形成“吉田学校”，为战后的日本保守体制打下基础。著有《十年回忆》、《激荡的百年史》等。

（金相春）

三·一起义

(San·yi qiyi) 朝鲜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起义。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实行残暴的“武断政治”，朝鲜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工农运动不断兴起。国内外的朝鲜学生、爱国志士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各种反日活动，宣传独立思想。1919年1月，风传日本当局毒死朝鲜废王高宗李熙的消息，进一步激起全民族义愤，成为反日起义的导火线。3月1日，汉城青年学生、市民和前来参加高宗葬礼的成千上万外地群众，在塔洞公园举行大会。虽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与敌人妥协，但学生代表仍按原计划宣读《独立宣言》，随后举行30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和海外。1919年3月至年底，在全国218个郡中，217个郡爆发示威和起义，参加者达200多万。在日本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下，8000余人被杀害，52000多人被捕。“三·一”起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增强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独立意识。从此，朝鲜革命进入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阶段。

(金相春)

光州学生运动

(Guangzhou xuesheng yundong) 朝鲜爱国学生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群众性运动。1929年11月，全罗南道光州学生因日本中学生横暴侮辱朝鲜女学生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和罢课，多次同日本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斗争很快波及全国。汉城、平壤、新义州、开城、釜山、晋州等地学生相继投入运动。各地工人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以罢工、散发反日传单等斗争方式积极支持爱国学生。1929年11月至1930年4月，全国有194所学校、约6万名学生参加斗争。斗争高潮过后，继续出现零星的反抗活动，5月至12月共发生50余次。充分显示爱国学生是反日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光州学生和市民反对南朝鲜当局独裁统治，要求民主的斗争。1979年10月26日，南朝鲜发生政变，独裁者朴正熙总统被打死。继任总统崔圭夏、总理申铉镛、中央情报部长全斗焕等控制政权。1980年3月，岭南大学学生发起的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斗争，迅速波及全国80多所大学和10多所中学。5月，学生斗争进入高潮。5月17日，南朝鲜军事当局宣布“非常戒严令”。18日起光州学生和市民奋起反抗。每天有成千上万人举行示威游行，用棍棒、石头、钢管作为武器，同军警展开搏斗，抢夺枪支弹药和装甲车等武装自己。20日，全斗焕的“亲卫师”和3个空降旅开到光州。21日，80万人口的光州有20万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汉城等地大学生和光州郊区农民赶来支援。军队和防暴警察被迫撤到市郊，市长等官员仓惶逃跑。学生和市民控制市区，由学生领袖、教授和宗教界人士组成光州市民委员会。军队暂时撤离市区后，立即切断通往光州的一切交通，停止对市区的食品、水电供应。27日晨，南朝鲜当局动用17000名军队和120辆坦克、数百辆装甲车、几百门重炮，向市内发起总攻击，对学生和市民进行血腥镇压。从18日至27日10天内，死伤者数百。8月27日，全斗焕在白色恐怖中当选总统。

(金相春)

祖国光复会

(Zuguo Guangfuhui) 朝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1936年5月，在中国东北汪清成立，会长金日成。由金日成制定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纲领阐明了朝鲜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任务，提出组织革命军队，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建立人民政权，进行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改革等目标和将要建立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祖国光复会成立后几个月内，其组织网分布到中国东北各地和朝鲜国内广大地区。会员达20多万人，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企业家、宗教界人士和朝鲜各界层反日爱国力量。创办《三·一月刊》、《火田民》等机关刊物，开展宣传工作。祖国光复会为组织动员广大群众，推动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为在朝鲜建立马列主义政党，打下思想和组织上的基础。

(金相春)

朝鲜的分裂

(chaoxian de fenlie)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期间在美国的干涉下朝鲜分裂成两部分的事件。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朝鲜北部。日本投降后，美苏商定以北纬38°线为两国在朝鲜接受日本投降的临时分界线，两国分别占领朝鲜南北部。9月8日，美军进驻朝鲜南部。12月，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达成协议，决定创造条件重建朝鲜为统一国家。但美国企图长期统治南朝鲜进而兼并北朝鲜，竭力破坏朝鲜的统一，在南朝鲜扶植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势力，大肆镇压人民爱国运动，于1946年2月成立“民主议院”。1947年冷战爆发后，美国加快分裂朝鲜的步伐。1948年5月10日，在美国的策划和刺刀保护下，南朝鲜举行非法的“国民议会”选举，7月12日公布“大韩民国宪法”，8月15日成立“大韩民国政府”，李承晚任“总统”。为了回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在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整个朝鲜于1948年8月25日举行选举，北朝鲜99.97%的选民和南朝鲜77.52%的选民参加，产生了最高人民会议。9月8日公布宪法，组成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政府。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1948年底，苏军全部撤离北朝鲜。美国军队仍然驻扎在南朝鲜，继续推行分裂朝鲜的政策，使两个朝鲜的局面长期得不到解决。

(金相春)

义安河静苏维埃运动

(Yi' anhejing suweiai yundong) 1930—1931年，越南中部地区人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争取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斗争，亦称义静苏维埃运动。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到法国殖民地越南，民族矛盾激化，各阶层人民反帝情绪不断高涨。1930年2月民族主义政党——越南国民党领导的安沛起义的失败，标志着越南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结束。刚刚成立的越南共产党(1930年2月3日成立，10月改称印度支那共产党)担负起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一面着手统一各级党组织，一面发展工会、农会组织。1930年“五·一”劳动节，在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号召下，爆发全国性群众示威游行，义静地区尤为突出。5月1日，边水火柴厂和试场火车修理厂工人罢工，万名农民进城游行。罢工和游行遭到军队和厂方联合镇压，但革命运动未间断，到9月达到高潮。9月12日，兴元县2万多农民在义安省委和县委领导下示威游行，支持边水工人斗争。他们切断电话线，截住火车，向旅客进行宣传。殖民当局开枪镇压，出动飞机轰炸扫射，造成“兴元大惨案”。此后，义安、河静两省工农运动继续发展，各县纷纷建立农村党支部、农会、妇女会、青年会和自卫队组织。一些地方官吏弃官逃跑。农会成为农村唯一政权机关，负责农村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从而出现苏维埃式工农革命地方政权。一些工人运动干部受党组织派遣到农村担任苏维埃的顾问。苏维埃实施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没收地主强占的公田，分给农民；废除苛捐杂税，减免地租，取消公债和贷款利息；建立法庭，惩办反革命；废除封建迷信和颓风旧俗；开办夜校，组织群众学习民族语言和文化。义静苏维埃运动鼓舞和推动了全国人民反法斗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声援和支持。殖民当局与封建地主勾结，调集军队颁布戒严令，进行残酷镇压。1931年3—5月，共产党中央机关连续遭到破坏，总书记、中央常委和义静领导干部相继被捕，运动失去领导核心。年中以后，运动逐渐低落，苏维埃政权不复存在。义静苏维埃运动确立了党对革命的领导地位，为八月革命的胜利准备了力量。

(金相春)

越南八月革命

(Yuenan bayue geming) 1945年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日军侵占印度支那后，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力量日益壮大。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印度支那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利用有利时机举行总起义，夺取全国政权。8月16日，越南独立同盟在解放区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以胡志明为主席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政府。起义相继在各地爆发。8月19日河内解放，23日顺化解放，25日西贡解放。日本扶植的傀儡皇帝保大被迫宣布退位。不到半个月，各地起义均获成功，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革命政权。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巴亭广场的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越南《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几十个世纪的君主制度，结束了数百年的殖民统治。

(金相春)

越南抗法战争

(Yuenan kang fa Zhazheng) 1946—1954 年越南人民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战争。1945 年 9 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面临极其复杂、困难的局面。根据战时盟国协议,中国国民党军队和英军各自开进越南北纬 16 度线以北和以南地区,接受日军投降。在英国支持下法国殖民军占领西贡,同时侵入柬埔寨和老挝,妄图恢复其殖民统治。1946 年初,英军和国民党军队撤出越南,3 月法军开进北方,占领海防、河内,局势更为紧张。为争取时间,发展抗法力量,越南作出重大让步,与法国当局于 1946 年 3 月和 9 月,先后签订《法越初步协定》和《法越临时协定》,规定法国承认越南是自由国家,拥有自己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越南为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的成员之一;同意让法军进入北越代替蒋军;双方采取措施停止敌对行为,法军 5 年内撤离越南。1946 年 12 月 19 日,法国撕毁协定,发动全面进攻。越军奋起抵抗,开始了长达 8 年之久的抗法战争。战争初期,法军靠军事优势,迅速占领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越南军民以山区、农村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年战斗,收复部分城镇,消灭大批法军,人民军发展到 20 万,挫败法国殖民者“速战速决”战略。此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越南军民坚持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为辅的方针,逐步扩大解放区。1948—1949 年,取得一系列反扫荡战役胜利。1950 年初,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越南相继建交,为越南抗法战争创造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1950 年 9 月,在胡志明直接领导和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越南人民军发动“边界战役”,一举粉碎高平至谅山一线的法国全部防御体系,越北解放区与中国连接起来。老挝和柬埔寨的抗法战争亦广泛展开。越南人民军转入反攻。1951—1952 年越南人民军接连发动中游、东北、宁平、西北、上寮等一系列战役,歼灭法军大批有生力量,把越南北部的法军压缩在奠边府一带。1953 年 12 月,人民军发动攻势,解放莱州,包围奠边府。1954 年 3 月 13 日,向奠边府发动总攻。经过 55 天激战,全歼被围法军,粉碎了法国政府固守奠边府,作为在日内瓦会议上谈判资本的梦想。同年 7 月,法国被迫签订《日内瓦协定》。越南抗法战争取得历史性胜利。

(金相春)

奠边府战役

(Dianbianfu zhanyi) 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役。1951—1953年，进入抗法战争反攻阶段的越南军民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越南北部解放区连成一片。法国殖民者为挽回败局，在美国参与下制定“纳瓦尔计划”，妄图一年半内消灭越南抗战力量。1953年11月大量法军集结在西北军事要地——奠边府，构筑坚固工事，把它变成进攻解放区的战略要点。1954年初，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决定发动奠边府战役。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之下对奠边府发起进攻，经过55天激烈战斗，于5月7日解放奠边府，全歼法军16000余人，活捉法国守军司令官德卡斯特莱少将。这一胜利彻底粉碎“纳瓦尔计划”，扭转整个印度支那战局，对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产生重大影响，迫使法国政府于7月21日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

(金相春)

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战争

(Yinduzhina sanguo kang mei zhanzheng) 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法斗争胜利不久,美国破坏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于1955年10月在越南南方策动亲美势力废黜亲法的保大皇帝,建立吴庭艳傀儡政权,制造了正式分裂越南的局面。1959年起南越人民开展武装斗争。1960年上半年,南越西南部游击区已连成一片,农村建立起基层革命政权。同年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美国为长期霸占南越,从1961年起发动由美国出钱、出枪,越南出人的“特种战争”。南越人民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粉碎美伪军的“全面进攻”、“重点扫荡”。到1964年底,歼灭和击溃包括3000多名美军在内的几十万敌军,摧毁敌人80%以上的“战略村”,解放2/3以上的南方地区。美国发动的“特种战争”彻底失败,于1964年8月初制造“北部湾事件”,以北越鱼雷艇袭击美舰为借口,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翌年起大批美军直接参加侵越战争,将“特种战争”升级为“南打北炸”为特点的“局部战争”。越南北方军民边生产边战斗,全力支援南方同胞抗战。南方军民英勇战斗,连续粉碎敌人的旱季攻势。虽然美国派遣部队陆续增加到50多万,仍无法取胜。1968年3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5月,越美在巴黎举行会谈。11月,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北越轰炸,“局部战争”失败。1969年起,尼克松政府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为在欧洲和中东集中对付苏联,决定收缩力量,从南越逐步撤退,采取“以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越南化”策略。美国侵略越南的同时,在老挝扶植亲美势力,把老挝划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的“保护”范围。老挝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在爱国战线党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屡次打败敌人武装进攻。1964年4月,美国策动右派政变。5月美国飞机轰炸解放区,直接进行武装干涉。1965年3月,爱国战线党和爱国中立力量举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至60年代末,老挝人民解放军英勇抗战,解放区迅速扩大。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柬埔寨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坚持推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开始轰炸柬埔寨,柬美断绝外交关系。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际发动军事政变,颠覆王国政府。4月,派遣近10万名美军和西贡伪军入侵柬埔寨。柬埔寨人民立即拿起武器,奋勇抵抗。至此美国把侵略战火扩大到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整个印支三国。为了联合抗美,印度支那三国四方领导人于1970年4月举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会议号召印支人民加强团结,英勇战斗,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同年5月,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成立。经过5年艰苦战斗,柬埔寨爱国军民消灭大量美国侵略军和伪军。1975年4月17日,爱国武装力量解放金边,4月19日宣告全国解放。柬埔寨抗美救国战争首先取得胜利。在越南战场上遭到惨败的美国于1973年1月27日签订《巴黎协定》,同意结束战争,撤出在越南的美军及其盟国全部军队。但美仍在南方支持阮文绍集团。1975年4月,南方军民发起总进攻,4月30日解放西贡。5月1日,十七度线以南的国土全部解放。1976年7月,越南实现全国统一。老挝爱国军民在坚持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为寻求和平解决问题进行不懈努力。1973年2月21日,老挝爱国力量代表和万象政府代表签订《万象协定》,老挝人民

一面巩固发展解放区，一面打击右派势力军事冒险行动。1975年5月以后，老挝人民在越、柬人民胜利的鼓舞下，展开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8月底斗争胜利完成。12月1日，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万象举行，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至此，印支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金相春）

胡志明

(Hu zhiming 1890—1969) 越南劳动党创始人，越南民主共和国缔造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生于义安省南坛县。早年当过教师、海员和杂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巴黎参加法国工人运动，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俄，出席农民国际会议，当选为农民国际执行委员。1924年出席共产国际“五大”。1925年在广州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培养大批干部送回国内。1930年2月，代表共产国际领导建立越南共产党（后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1938年，从苏联到中国，先后在延安、桂林、重庆、贵阳、昆明等地，一面协助中国抗日战争，一面领导在中国的越南革命者，准备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41年初回到越南，5月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任主席，领导抗日驱法斗争。1945年8月领导“八月革命”，取得胜利，任临时政府主席。1946年3月，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改称越南劳动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46—1954年领导越南人民进行8年抗法救国战争。1954—1965年间，领导了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1965年起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斗争，直到1969年9月逝世。他为祖国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了终生。

(金相春)

印度尼西亚反荷民族起义

(Yindunixiya fan he minzuqi yi) 1926年11月至1927年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人民武装起义。1920年5月，印尼共产党成立后，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1920年至1925年，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持续不断。1925年12月底，印尼共产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翌年发动起义，推翻荷兰殖民统治。1926年11月12日晚，雅加达郊区农民在印尼共产党起义委员会领导下首先起事，按预定计划分三路向市中心进发，夺取电话局，切断交通线，但攻占监狱和警察局的计划失败。战斗延续到14日晚。12日晚，西爪哇万丹县农民也发动起义，袭击荷兰官员住宅，打死反动官吏，破坏铁路桥梁，切断电话线，一度占领拉勿安市，后因兵力、武器不足，被迫撤出。雅加达、万丹起义很快蔓延到勃良安、谏义里、万隆等地。这些起义断断续续坚持到12月底。当爪哇地区起义被荷兰殖民军队各个击破、渐趋平息时，西苏门答腊又爆发起义。在起义委员会领导下，1927年1月1日伦多煤矿区发动武装起义，斗争历时一个月。各地农民分散斗争坚持3个月之久。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加上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致使起义失败。数千名党员和起义者惨遭杀害和流放。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金相春)

印度尼西亚八月革命

(Yindunixiya bayue geming) 1945年8月，印度尼西亚人民举行的资产阶级民族独立革命。1942年日本侵占印尼后，印尼人民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印尼共产党决定，乘西方殖民者尚未重返印尼的有利时机，立即独立，并推动苏加诺、哈达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予以宣布。8月17日，苏加诺和哈达在雅加达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人民群众夺取日军武器，占领车站、电台、发电厂、船坞等要害部门，建立政权机构。18日，各政党、社会团体领袖召开“印度尼西亚独立筹备委员会”会议，通过印尼共和国宪法，选举苏加诺为总统，哈达为副总统。11月组成以右翼社会党人沙里尔为总理、共产党人沙里佛丁等参加的国会制内阁。八月革命是印尼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9月底，英军以接受日军投降为名占领雅加达、万隆、三宝瓏等大城市，荷兰殖民军尾随英军重返印尼。1946年10月，英军把占领区移交给荷兰殖民主义者后撤出印尼。印尼人民经过3年抗荷战争，迫使荷兰殖民军于1949年底撤出印尼。

(金相春)

九·三 事件

(Jiu·sanling shijian) 1965 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军事政变。苏加诺总统在执政后期，实行进步的“纳沙贡”政策，印尼共产党人数迅速扩大，1963 年达 200 多万。右翼势力妄图消灭印尼共产党和工农运动。1965 年 9 月底，以苏哈托、纳苏蒂安为首的右派军人集团组织“将领委员会”，密谋于 10 月 5 日前发动政变推翻苏加诺政权。9 月 30 日，以苏加诺总统警卫队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军官发动“九·三 运动”，逮捕和处决一些右翼高级将领，以阻止颠覆苏加诺政府的政变。10 月 1 日，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政变，镇压“九·三 运动”参加者，剥夺苏加诺实权。几十万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杀害，被投入监狱者达 100 多万。1966 年 3 月 11 日，苏加诺被迫宣布由苏哈托代行总统职权。1967 年 2 月，苏加诺将总统权力交给苏哈托。从 1966 年起苏哈托政权掀起反华排华浪潮。1967 年 10 月 30 日中断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金相春)

苏加诺

(Sujianuo 1901—1970) 印度尼西亚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奠基人，首任总统。出生于东爪哇泗水教师家庭。1926年毕业于万隆理工学院，获工程师职称。学生时期参加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民族解放运动。1927年7月，建立印尼民族主义协会（翌年改名印尼民族党），任主席，提出争取印尼民族独立的政治纲领。他发挥学生时期学会的演讲本领，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抨击荷兰殖民统治，有“讲坛雄师”之称。1929年和1933年，两次被荷兰殖民当局监禁流放。日本占领印尼后，曾幻想靠日本获印尼独立。参加“八月革命”，8月17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告印尼独立，当选为印尼共和国总统。荷兰殖民军卷土重来，1948年12月遭被捕流放。荷兰、印尼“圆桌会议协定”签订后，1949年12月当选为印尼联邦共和国总统。1950年8月，成立印尼统一共和国时仍任总统。1959年起对内实行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政策（即纳沙贡）。同年7月恢复1945年宪法，组成总统内阁制，兼任总理。一贯奉行独立自主、反帝反殖不结盟的对外政策。1965年“九·三事件”后，被逐步剥夺总统权力。1967年3月，被撤销总统职权，翌年3月被软禁。1970年6月21日病逝于雅加达。

（金相春）

阿姆利则惨案

(Amulize canan) 英国殖民当局血腥屠杀印度阿姆利则人民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民掀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高潮。1919年3月初，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人民开展反英斗争，抗议《罗拉特法案》。4月10日，英殖民当局在阿姆利则城逮捕两位著名民族运动活动家。当日，该市群众举行游行示威，与军警发生冲突，并一度控制城市。英殖民当局派戴尔将军指挥军队开进阿姆利则，实行戒严，禁止一切集会。13日，阿姆利则大批锡克教徒在贾连瓦拉·巴格广场举行集会活动。戴尔带领军队包围广场，封锁出口，下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370余人，打伤1200余人。阿姆利则惨案激起旁遮普和印度各地更大规模的反英浪潮。

(金相春)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feibaoli buhezuo yundong) 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领袖甘地领导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从一战后至 40 年代初，曾掀起 3 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将印度拖入战争深渊，印度人民同英殖民统治间的民族矛盾激化。大战结束后，英殖民者为缓和印度人民的反抗和巩固殖民统治地位，采取镇压与怀柔两手政策。1918 年 7 月，英国颁布标榜将在印度“逐步发展自治体制”，“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的《孟太古—蔡姆斯福改革方案》。1919 年 3 月，又颁布继续采取高压政策的《罗拉特法》。

《罗拉特法》的颁布，激起印度人民抗议怒潮，各地举行集会、示威和罢工。国大党为了掌握反英斗争的领导权，迫使英国让步，于 1920 年 12 月，在那格普尔会议上通过了甘地拟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方案”，宣布要以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取得自主，并提出一个包括几个连续阶段的不合作运动措施。其主要内容有：拒绝英国授予的爵位、封号和名誉职位，学生退出英办学校；立法机关、法院及政府中服务的人员离职；家家户户恢复手工纺织，提倡国货，抵制英货；在运动最后阶段拒绝纳税。不合作运动立即得到各阶层人民广泛响应。许多职员离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各阶层群众拒购英国商品，公开烧毁英货，并掀起自织土布的热潮。1921 年国大党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民族斗争的高潮。工农运动突破非暴力限制，全国许多地方发生起义和流血冲突，有的农村建立了农民自己的管理机构。1922 年 2 月 4 日，发生了联合省曹里曹拉村农民袭击警察所，打死向群众开枪的 21 名警察和一名更夫，烧毁警察所和破坏铁路的事件。甘地指责曹里曹拉事件违反了“非暴力”原则，国大党发表告农民书，指责农民运动中的“不道德行为”。2 月 11—12 日，国大党在巴多利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在全国无限期地停止不合作运动的决议，要求国大党地方委员会动员农民交租纳税，规定今后只允许开展在国大党地方组织领导下的局部斗争。在英殖民当局血腥镇压和国大党妥协投降方针下，1920—1922 年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宣告失败。

1929 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印度民族矛盾，印度人民反英斗争重新高涨。在工农运动推动下，1929 年 12 月，国大党拉合尔代表大会通过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1930 年 1 月底，甘地向印度总督提出的 11 项要求被拒绝后，宣布开展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30 年 3 月 12 日，甘地率领 78 名信徒从阿麦达巴德出发，4 月初到达丹地海滨。甘地等人一路上自煮食盐 3 个星期，以示公开反对英殖民当局的“食盐专卖法”。沿途许多农民和放弃职位的 200 名村长加入斗争行列。“食盐进军”点燃了全印抗英斗争浪潮，标志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甘地极力设法使群众运动限制在和平抵制的范围内。但群众斗争冲破规定，示威游行、罢工、抗税斗争继续发展，不少地区爆发了武装起义。英国殖民者使用反革命两手策略，时而采取白色恐怖的镇压手段，逮捕甘地、尼赫鲁等运动领导人和十几万群众；时而召开圆桌会议，进行欺骗性谈判。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于 1931 年 3 月与英国驻印度总督欧文签订《甘地—欧文协定》，使群众斗争日趋低落。1934 年 5 月，国大党宣布无条件终止不合作运动。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英在东南亚节节败退。1942年3月日军占领英属缅甸，战火有蔓延到印度之势。甘地于1942年7月向日本递交公开信。公开信说，若英国撤出印度后日本想要进入印度，那么“我们印度必定竭尽全力抵抗你们”。与此同时，8月起甘地发动第三次不合作运动，他要求英当局允许建立印度国民政府，甚至提出“英国滚出印度”的口号。英国殖民当局很快把以甘地、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大批干部逮捕监禁，运动未出现高潮即停止。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映了印度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增强了印度人民民族自尊心。它一方面用“不合作”形式动员人民群众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使反英斗争具有空前广泛的群众性，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又以“非暴力”原则阻止人民群众用暴力推翻现行社会制度，阻碍民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充分反映了甘地所代表的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ewc MVIMAGE,MVIMAGE,!99900320_0492-1.bmp}

(金相春)

印巴分治

(Yin ba fen Zhi) 1947年英属印度按《蒙巴顿方案》被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而独立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人民掀起反英斗争高潮。工人、农民、学生举行大规模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参加者达上百万。英殖民统治的基础军队也发生动摇。1946年2月18日，孟买水兵举行起义，提出“打倒英帝国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英国首相艾德礼惊呼：“不能采取旧的方式对待目前的形势。1946年的局面不是1920年、1930年，甚至1940年的局面了。”英殖民当局意识到必须作出让步，才能保住殖民权益，决定利用印度内部分长期存在的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间的矛盾，采取分而治之政策。1947年3月，新任总督蒙巴顿与甘地、尼赫鲁、真纳等印度各政党及教派领导人商谈，制定了关于印度独立的方案，即“蒙巴顿方案”。6月3日，英政府公布该方案。方案规定：英属印度根据居民宗教信仰的不同，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分别建立自治政府；巴基斯坦由东西两部分组成；各王公土邦在移交政权后享有独立地位，可加入印、巴任何一个自治领。7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案”。同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宣告独立，成为英联邦内的自治领。至此，英国在印度190年之久的直接统治结束。1950年1月和1956年3月，印巴分别宣布成立共和国。印巴分治使印巴两国获得独立，但也造成统一的经济被分割、领土纠纷等问题，使两国长期纠纷不已。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492-2.bmp}

(金相春)

甘地

(Gandi 1869—1948)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著名领袖。生于古吉拉特邦波尔班达城土邦大臣家庭，属吠舍种姓。从小受印度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思想影响。1883年就读于伦敦大学，学习法律。回国后在孟买以律师为业。1893—1914年在南非任一穆斯林商社法律顾问，目睹印度人的悲惨生活和遭受的种族歧视。1906年起领导印度侨民开展称作“萨蒂亚格拉哈”（掌握真理）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反对英、荷殖民者的种族歧视政策，逐渐形成“非暴力抵抗”的政治主张，并获得一定的成功。1915年回国后继续开展非暴力抵抗斗争。1920年12月，国大党那格普尔年会通过甘地拟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方案”。从此，“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国大党的指导思想和纲领性策略，甘地成为国大党最有权威的精神领袖。他发动和领导了1920—1922年和1930—1934年全国范围的轰轰烈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4—1934年、1940—1941年任国大党主席。1948年1月30日，因反对教派纠纷，被印度教极右分子刺死。长期为印度民族独立奋斗，曾十多次绝食，三次被捕入狱。在反英不合作运动中身体力行，为抵制洋布亲自手摇纺车织布。为反对英国食盐专卖权，和群众一起自煮食盐。提倡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团结、社会改良和妇女、贱民的地位平等。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威望。因阶级局限性，反对暴力革命，对超出“非暴力”范围的群众斗争采取敌视谴责的态度，以至与英殖民当局妥协。但他发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有极广泛的群众性，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为印度独立奠定了基础。由于甘地为印度独立作出杰出贡献，被印度人民尊为“圣雄”和国父。

(金相春)

尼赫鲁

(Nihelu 1889—1964)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印度总理。生于阿拉哈巴德婆罗门贵族家庭。国大党元老莫提拉尔·尼赫鲁之子。早年在英国学法律。1912年归国，追随甘地从事政治活动。1918年入选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20年起参加甘地领导的历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曾多次被捕，遭长期监禁。1929年、1936年、1937年、1946年、1951—1954年屡任国大党主席。印度独立后，任第一届政府总理，连任至逝世。奉行和平中立外交政策。1954年，与周恩来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万隆会议发起人和不结盟运动倡导人之一。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与巴基斯坦发生争执，导致武装冲突。1959年挑起印中边界争端，掀起反华浪潮，1962年挑起中印边界武装冲突。1964年5月27日病逝。著有《尼赫鲁自传》、《印度的发现》、《印度和世界》等。

(金相春)

凯末尔革命

(Kaimoer geming)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1914年土耳其追随德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1918年10月与英、法等国签订“摩得洛斯停战协定”，许多重要地区被协约国军队占领。1920年8月，与协约国签订《色佛尔条约》，4/5领土被瓜分，海峡地区归国际共管，素丹政府成为英法意的傀儡政权。在民族危机关头，土耳其人民奋起举行反帝武装斗争。1918年11月，安那托利亚农民首先展开反对英、法占领者的游击斗争。各地资产阶级、军官、官吏、伊斯兰教代表人物纷纷组织民族主义团体——“护权协会”。1919年7月和9月，在凯末尔主持下，先后在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召开护权协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统一了全国护权协会，选举了以凯末尔为主席的代表委员会。代表委员会起临时政府作用。此后，凯末尔着手组建国民军。在民族主义力量迅猛发展形势下，素丹政府被迫同意1920年1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奥斯曼帝国议会。凯末尔派议员占多数的议会通过了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纲领《国民公约》。同年3月，英军占领伊斯坦布尔，迫使素丹解散议会，逮捕议员。素丹政权配合英国指使的希腊军进犯安纳托利亚地区。凯末尔决定与素丹政府公开决裂。1920年4月23日，凯末尔在安卡拉召开国民大会，建立国民政府，凯末尔任临时总统兼国防军总司令。凯末尔政府对内依靠广大群众，对外争取苏俄援助，并利用英、法、意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很快击溃素丹政府军。1921年1月至1922年10月，集中力量歼灭英国支持的希腊侵略军，收复安纳托利亚全部领土。1922年11月素丹被废黜，结束600年之久的奥斯曼专制王朝。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被迫与土耳其签订《洛桑条约》，正式承认土耳其独立。同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第一任总统，定都安卡拉。建国后，凯末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改革，取得成果。凯末尔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取得胜利的民族民主革命。因阶级和历史局限性，未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压制工人运动，迫害共产党人，经济上未能彻底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金相春)

国民公约

(Guomin gongyue) 在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中凯末尔派提出的政治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迅速高涨。1920年1月，土耳其苏丹被迫同意召开奥斯曼帝国议会。1月28日，议会通过了凯末尔起草的《国民公约》，确认了第一、二次护权协会代表大会宣布的各项原则，重申了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土耳其的政治主张。《国民公约》的要点是：宣布土耳其的本国领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土耳其应享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废除任何危害土耳其独立和发展的政治、司法、财政等方面的限制；海峡地区的开放不应使土耳其的领海受到侵犯；明确表示土耳其所进行的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斗争是维护自身生存和继续存在的基本条件。《国民公约》是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号召书和纲领，被誉为土耳其独立宣言。

(金相春)

凯末尔改革

(Kaimoer gaige) 20 世纪 20 年代，土耳其在凯末尔总统领导下进行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在政治方面，1924 年 3 月，废除哈里发制度，创立资产阶级民法、刑法、律师法。1928 年宣布政教分离。在经济方面，根据 1923 年通过的《经济公约》，支持和发展民族经济，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创办国家银行，资助私人企业。发展农村个体经济，同时建立国家农场。政府把荒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向农民提供贷款，出资兴修水利，建立信用合作社。1925 年废除“实物什一税”，改为货币税。在文化教育方面，关闭伊斯兰教会学校，扩大世俗学校，创办各种专业技术学校。1928 年，大国民会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字母的法律，废除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创立语言协会，剔除阿拉伯、波斯等外来语，提倡土耳其语言民族化。在社会生活方面，禁止一夫多妻制，女子除去面纱，提倡男女同校，给妇女以选举权。凯末尔改革对提高土耳其国民的民族意识，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具有重要意义。

(金相春)

凯末尔

(Kaimoer 1881—1938) 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土耳其共和国总统。生于萨洛尼卡商人家庭。1905年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毕业。参加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参加1911—1912年意土战争和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屡立战功，1916年被授予将军衔。大战后，土耳其爆发反对外国军事占领的斗争。1919年7月，凯末尔辞去土耳其素丹政府军政职务，到安纳托利亚地区，领导全国民族解放运动。1920年任国民议会主席、国民政府临时总统兼国防军总司令。在他的领导下，土耳其1922年打败英希武装干涉，获得独立战争胜利。1923年10月，当选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一直连任到1938年10月病逝。1924年建立土耳其人民党（不久改为人民共和党）。执政期间，对内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改革，对外实行和平中立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1934年11月，被土耳其国民议会授予“阿塔土耳其克”（土耳其之父）称号。

（金相春）

伊拉克革命

(Yilake geming) 1958年7月，卡赛姆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王朝统治，建立伊拉克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拉克仍处于费萨尔王朝反动统治之下。该政权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取缔一切政党和组织，迫害爱国进步人士；对外参加《巴格达条约》，反对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侵略扩张政策效劳。各阶层人民不断掀起反对费萨尔王朝的斗争，政府军队内部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1952年9月，中下级爱国军官仿效埃及“7·23革命”，开始秘密组建“自由军官组织”。1956年底至1957年初，各地“自由军官组织”联合起来，成立自由军官最高委员会，卡赛姆任主席。1958年7月14日晨，“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革命军民支持下，起义很快取得胜利，推翻王朝统治，处死国王，宣告伊拉克共和国成立，组成以卡赛姆为总理的共和国政府。新政权对内采取没收王室财产、实行土改等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对外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奉行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伊拉克革命使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的扩张战略遭到重大打击，鼓舞了中东人民民族民主运动。

(金相春)

伊朗“伊斯兰革命”

(Yilang“Yisilan geming”) 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反对巴列维国王，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运动。伊朗在帝国主义长期控制和国内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下，经济发展缓慢。1963年起，巴列维国王进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白色革命”，同时大力推行以国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取得较大成效。但同时也出现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王室、贵族、政府官吏腐败，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等严重问题。在政治上，国王仍大权独揽，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75年3月，取消一切政党，成立伊朗民族复兴党，实行一党专制。群众强烈不满。改革也触犯了宗教上层僧侣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反对。1975年以后，伊朗形势日益紧张，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席卷全国，少数民族武装反抗活动频繁。巴列维多次改组政府仍未能稳定局势。流亡在国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以宗教为思想武器，领导了国内的反国王、反美运动。在政局已不可收拾的形势下，美国为防止苏联插手，促成了巴列维1979年1月“出国度假”和伊朗军方中立。2月1日，霍梅尼回国，控制了全国局势。伊斯兰革命推翻了53年之久的巴列维封建王朝，结束了3500余年的君主制。同年3月，伊斯兰共和国成立。12月，颁布宪法，确立了共和国体制。虽有议会和总统，但霍梅尼生前一直是最高统治者。

(金相春)

美国现代史

(meiguo xiandaiishi) 美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的历史。一般以标志着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 1898 年美西战争为起点。美国现代史是美国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历史,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历史,是美国人民反对垄断统治,争取民主进步的斗争与美国局部生产关系不断调整和改革交织发展的历史,是美国由一般资本主义大国发展为头号超级大国的历史。大致可分四个发展时期。

1898—1929 年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经济高速发展,开始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时期。美西战争起,美国真正步入世界经济大国行列,走上对外经济扩张道路。此后美国经济持续迅速发展,并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20 年代达到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出现柯立芝繁荣。在这一时期,通过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分配、威尔逊的“新自由”及 20 年代的自由放任等政策,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但也孕育着潜伏的危机。此时美国尚无全面称霸世界的实力,巴黎和会上受挫后,退守巩固拉丁美洲基地,同时争夺全球经济霸权。

1929—1945 年,是美国爆发经济大危机,推行罗斯福新政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美国社会经济生活。胡佛政府“自愿联合”的反危机措施未能制止危机的蔓延。罗斯福任总统后于 1933 年起实施新政,通过国家干预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减轻了危机的破坏,缓和了阶级矛盾,维护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方向性的影响。在法西斯国家不断扩大的侵略面前,美国先是“中立”,继而在不卷入战争的前提下积极援助反法西斯力量,最终在 1941 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正式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反法西斯重要盟国之一,发挥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重大作用,对促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加速战争的胜利,筹划战后世界和平安排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1969 年,是美国大力对外扩张、称霸世界并达到鼎盛的时期。在二战中美国是损失最小、得益最大的唯一大国。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美国的兴起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使美国成为工业现代化的头号超级大国。50—60 年代经济持续迅速发展。对外推行冷战遏制政策,组成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军事集团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峙,插手全球事务,实行全球扩张。战后初期一度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强化反共反民主措施,导致麦卡锡主义泛滥。在国内经济社会生活中,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政府基本上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发展完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1969 年至今,是美国在保持超级大国地位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相对衰落的时期。50、60 年代西欧和日本的崛起,苏联实力的增强,侵越战争的失败,使美国的霸主地位相对衰落。70 年代以来发生两次经济危机,出现经济滞胀,进一步加速了相对衰落,也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从尼克松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内政策的目标在于解决面临的这些新问题。对外政策上相应地缓和美苏关系,改善对华关系,收缩海外力量,以弥补称霸世界目标与力量不足的差距。

现代美国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许多领域居领先地位,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心。1941—1978 年,美国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占总数的 50% 以上,超过德、英、法的总和。1945 年在世界上首次研制成功原子弹和电

子计算机。1969年“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第一次将人送上月球。文学艺术亦流派繁多，相当繁荣。著名的文学家有西奥多·德莱塞、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等。

(孙平)

柯立芝繁荣

(Kelizhi fanrong)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高涨。因其主要发生在柯立芝总统任内，故名。此间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时期，英、法、德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处于停滞或恢复状态，便于美国经济势力向外扩张。美国国内通过技术革新、固定资本更新和企业生产及管理的合理化，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空前加速，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产值均创新纪录，汽车制造、电机电器制造和住宅建筑业发展尤其显著。到 1929 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达 48.5%，超过了当时英、法、德三国所占比重总和，以致柯立芝总统声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但这种繁荣主要集中在部分工业部门和城市中，其他一些工业部门和农业的不景气，使美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并且由于股票投机成风，使繁荣本身带有一定虚假性。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则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孕育着新的危机。

(孙平)

罗斯福新政

(Luosifu xinzheng)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于 1933—1939 年间实施的各项经济社会改革措施的总称。因其强调用国家力量大规模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摆脱危机，从而有别于此前的自由放任政策，故名。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极端混乱局面。1933 年工业生产比 1929 年下降 39%，农业总收入降低 57%，进出口贸易下降 70%，失业人数达 1700 万，破产农户达 100 余万户，1 万家银行倒闭（占全国银行总数的 49%）。社会生产遭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急剧恶化。阶级矛盾尖锐，工人罢工，失业者示威游行，饥民哄抢食品店，小农武装反抗，时有发生。经济大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极不适应的状况，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为了摆脱危机，缓和阶级矛盾，维持资产阶级统治，1933 年罗斯福当选为总统后，立即改变胡佛总统任内基本上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开始了以“救济、复兴、改革”为指导思想的新政改革。一般认为 1933—1935 年初为第一次新政，主要目的是救济、复兴；1935 年中至 1939 年被称为第二次新政，改革是其主要目标。第一次新政期间，以 1933 年 3 月 9 日—6 月 16 日颁布的新政立法和命令最多（达 70 多个），史称“百日新政”。新政主要内容为：

整顿财政金融措施。首先，整顿银行。暂时关闭银行，经检验后，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才允许重新开业。1933 年 6 月 16 日通过《格拉斯—斯特高尔法》，迫使商业银行完全脱离投资机构，并拟建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其次，改革银行体系。规定凡拥有百万美元资金以上的大银行都要参加联邦储备银行，以扩大国家银行的权限和业务控制。再次，统制货币。1933 年 6 月 5 日颁布《放弃金本位法令》，使美元贬值 41%，以加强出口竞争能力。又次，改革税制。强调应根据纳税能力重新分配税收。

调整工业生产措施。1933 年 6 月 16 日国会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由国家出面协调国家、企业主及劳工间的关系，实行工业企业的公平竞争，并由国家举办各种公共工程，减少失业。1935 年 7 月 5 日颁布《全国劳工关系法》，重申被最高法院裁决为违宪的工业复兴法中关于劳资关系的条款。1938 年 6 月 25 日颁布《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

节制农业发展措施。1933 年 5 月 12 日，国会通过《农业调整法》，缩小现有耕种面积，以农产品加工公司的税收补偿减耕的损失；重定农产品价格，由政府补贴维持农产品的价格。根据该法成立农业调整局，以控制农副产品的生产。1933 年 6 月 16 日通过《农业信贷法》，成立农业信贷署，援助农民。1938 年 2 月颁布新的《农业调整法》，规定丰年由政府收购剩余农产品，歉收时由政府控制市场价格。

实行社会救济和以工代赈。1933 年 3 月 31 日，国会通过法案，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为失业青年提供工作机会，使其从事垦植和建筑。5 月 12 日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加强公共工程。1935 年 8 月 14 日通过《社会保险法》，对失业者、老人、残疾者提供社会保险。新政实施的结果使美国逐渐摆脱了危机，为千百万人提供了就业和生活的保障，使经济不平衡状况有所改善。1935 年起所有经济指标都稳步上升，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新政缓和了阶级矛盾，避免了法西斯上台的危险，维护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新政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大多是应急措施，没有完整的理论依据，但体现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潮，反映了现代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一

总的趋向，对美国以后历届政府的政策影响很大。

（孙平）

工业复兴法

(Gongye fuxingfa)即“全国工业复兴法”(亦译作“全国产业复兴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美国罗斯福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式调整工业生产之规模、结构和劳动条件的立法措施。是罗斯福政府最重要的反危机法案,于1933年6月16日由国会通过后,罗斯福签署生效。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由国家调节各企业主之间的关系。法案要求企业主共同制定“公平竞争法规”,用以规定各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产品价格、销售范围、工资及工时数,禁止以低于规定的价格出售产品,并对产品产量严格限制。二是由国家出面调整劳资关系。据法案第七条规定,雇员有权组织起来并选派代表谈判和签订集体合同,禁止雇主强迫雇员加入公司工会或反对雇员加入其他工会,雇主必须遵守最高工时、最低工资和其他雇佣条件。三是由国家举办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社会购买力。此外,根据法案成立“国家复兴管理局”,在政府指导下由雇主、雇员和消费者共同“监督”和“调节”生产。《工业复兴法》对摆脱危机、恢复经济、缓和阶级矛盾有一定作用。但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后,美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就斥责它具有“社会主义”倾向。1935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工业复兴法》违宪。

(孙平)

公平施政

(gongping shizheng)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内制定和实施的由战时转入平时经济和加强经济社会改革的各项措施。因其强调“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人都有权指望从我国政府得到‘公平施政’”，使“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机会从我国日益增长的财富中得到他的公平的一份”，故名。其内容包括：实行价格控制政策以制止通货膨胀；制定 1946 年《就业法》，帮助实现充分就业；实行廉价民用住宅建筑计划，为退伍军人、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住房；扩大社会保险，实行国民健康保险和教育津贴；援助农业，津贴农民；制定保障民权立法以消除种族隔阂等。“公平施政”是运用国家力量干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社会改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非战争和非危机条件下的新发展。

(孙平)

麦卡锡主义

(Maikaxi zhuyi) 1950—1954 年美国反共反民主的政治迫害逆流。其主要代表者为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故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对外实行冷战政策，对内推行反共政策，在野的共和党利用所谓“共产党人渗入政府”问题攻击民主党政府，为麦卡锡主义的产生和泛滥提供了条件。1950 年 2 月，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无中生有地宣称有 205 名共产党人渗入到国务院，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此后，麦卡锡利用参议员的特权，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大肆指控和调查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渗透”，进行非法审讯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麦卡锡主义诬陷诽谤的范围，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面，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红队被迫一度改名。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和费正清、进步作家斯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员被解雇，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麦卡锡主义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而且因其严重干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危及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也逐渐为统治阶级所不容。1954 年 12 月，参议院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麦卡锡主义从此衰落。

(孙平)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Meiguo heiren minquan yundong)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大规模斗争运动。美国黑人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长期受到种族歧视，处于社会最底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国家有色人种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的鼓舞以及由于工业化的进展，大批黑人流入城市，使黑人地位问题成为全国性问题，是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1955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黑人为反对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坚持抵制公共汽车运动达一年之久，使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违宪。此事件表明，黑人运动由合法斗争发展到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新阶段，是黑人民权运动开始的标志。运动以非暴力主义为指导方针，采取抵制、静坐、游行、和平进军等方式。1957年，南部基督教领袖会议组成，作为民权运动最有影响的组织，负责协调各有关组织的行动，马丁·路德·金任主席。1960年，南部各州普遍开展在公共场所的静坐示威，显示出运动范围已越出某一城市的局限，主动冲击种族隔离制。1961年和1962年，民权运动的重点分别是反对长途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和争取南部黑人的选举权。1963年运动达到高潮。4月，在种族隔离最严重的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爆发黑人抗议示威斗争，迫使当局接受黑人要求。8月，在华盛顿举行该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25万黑人和白人同情者举行争取就业和自由的“自由进军”。在民权运动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公民权利法案》，1965年通过《选举权利法》，正式以立法形式结束美国黑人受到的在选举权方面的限制和各种公共设施方面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1964年以后，黑人运动走上武装抗暴斗争的道路。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496-1.bmp}

(孙平)

尼克松主义

(Nikesong zhuyi)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任内提出的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的外交方针。1969 年尼克松就任总统时，美国面临国内外的困难局面：越南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引起国内不满；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与西欧日本矛盾加深；第三世界力图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中苏关系恶化。尼克松政府认为，这种形势表明战后以来的两极世界即将被多极世界取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利用各种相互制约的力量关系，操纵力量“均势”，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1969 年 7 月 25 日，尼克松出访途中在关岛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美国在亚洲的新政策，被称为“关岛主义”或“尼克松主义”。1970 年 2 月 8 日，尼克松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把只是针对亚洲的“关岛主义”正式发展为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即“尼克松主义”，宣布要以“伙伴关系”、“实力”、“谈判”三原则作为尼克松主义的“三个支柱”。其内容为：与盟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实际上是要西欧、日本分担防务义务，要美国扶植起来的傀儡或附庸更多地承担军事行动的任务，以使美国腾出手来，收缩战线，加强重点，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霸主的“实力”，以“实力”为后盾进行“谈判”，达到限制苏联实力增长、使苏联“自我约束”的目的；改善对华关系，加强自身战略地位。尼克松主义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从进攻转为防守的标志，是美国力图继续称霸世界但又力量不足的表现。

(孙平)

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

(nikesong de xinjingji zhengce)1971年8月—1974年4月尼克松政府为克服美国经济滞胀危机采取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60年代末70年代初，失业、通货膨胀和美元危机是美国经济的三大严重问题。尼克松就任之初，试图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限制经济增长速度，削减政府开支，但未能缓解通货膨胀，反而加剧了失业。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转向“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对外维持美元的经济霸主地位，对内控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回升。它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971.8.15—1971.11）冻结工资和物价，禁止外国用美元兑换黄金并增收10%的进口附加税；第二阶段（1971.11—1972.12）对工资和物价实行管制，把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3%，工资增长率不得超过5.5%，同意将美元贬值7.89%，并取消10%的进口附加税；第三、四阶段都以限制工资和物价增长率为目标。1973年又将美元与黄金的比价贬值10%。“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美元在战后国际金融中的霸主地位的消亡，也是依据凯恩斯经济理论克服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双重危机的尝试。

（孙平）

水门事件

(Shuimeng shijian) 1972 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尼克松共和党政府的非法活动引起的政治丑闻。水门是华盛顿的一座综合大厦，民主党全国总部所在地。1972 年 6 月 17 日，有 5 个人潜入大厦进行窃听活动而被捕。随后的调查表明，尼克松政府为确保共和党竞选获胜采取了一系列非法行动，闯入水门只是其中之一。1973 年 3 月，调查取得新突破，事件涉及到白宫。尼克松最初竭力掩饰，后来不得不声明他对卷入此案的白宫工作人员的行动负有责任。尼克松的国内问题高级助手霍尔德曼、埃利希曼以及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因涉嫌与此案有关相继辞职。1974 年法院查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第 6 天，曾指示其助手让中央情报局制造一次“国家安全行动”，以掩饰水门的非法活动，并指示不让联邦调查局插手。法院要求尼克松交出他在白宫的有关录音带，以验证此事。尼克松拒绝交出。最后最高法院裁决，尼克松应交出录音带。同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表决通过并向众议院呈送三项弹劾总统的条款，指控尼克松滥用职权，阻挠司法工作，蔑视国会。1974 年 8 月 8 日，尼克松被迫宣布辞职。1974 年 9 月 8 日，继任总统福特宣布无条件赦免尼克松。水门事件是党派争夺的产物，亦是美国人民运用宪法权利制约总统非法行为的成功范例。

(孙平)

里根“复兴经济计划”

(lifenfuxing jingji jihua) 美国总统里根任内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改革措施。里根执政之初，美国经济面临严重的滞胀局面和 1981—1982 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81 年 2 月 18 日，里根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复兴经济计划，采纳供应学派理论，认为克服危机和滞胀，应从凯恩斯的调节需求转向调节供应，即从扩大消费转为减税、鼓励投资来刺激生产，削减联邦政府开支，降低通货膨胀。计划主要集中在税制改革和社会福利改革两方面。1981—1984 年分 3 次把个人所得税共减少 23%，公司所得税最低由 17% 降至 15%。但减税使财政赤字剧增，政府又不得不于 1985 年 5 月进行新的税制改革，大规模减税与大规模增税并举。1986 年 10 月通过的新税法把税率降到 60 年以来最低水平，并且简化了税栏。计划一改新政以来扩大社会福利和联邦干预政策，紧缩社会福利规模并逐步转入私人承办轨道，减轻联邦财政负担。计划实施结果，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居资本主义世界之首，达 6.9%。里根的复兴经济计划是美国政府交替以至混合使用凯恩斯经济理论和供应学派及货币学派理论解决滞胀问题的改革尝试。

(孙平)

富兰克林·罗斯福

(Fulankelin Luosifu,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
美国第 32 任总统，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1933—1945 年连续 4 届任总统。1882 年 1 月 30 日生于纽约州海德公园的富豪之家。1900—1904 年就学于哈佛大学，1905 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参加纽约律师考试合格后即从事律师工作。1905 年与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埃莉诺结婚。1910 年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当选纽约州参议员，1912 年连任。1913—1920 年任助理海军部长。1921 年 8 月患脊髓灰质炎症（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仍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努力促进民主党内城乡两派的团结。1928—1932 年任纽约州长。1932 年竞选总统，提出“新政”计划，以压倒多数选票获胜。上任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美国经济状况空前恶化。他充满信心地厉行改革，受到各阶层的欢迎，“新政”得以顺利实施。结果使美国逐渐摆脱经济危机，维护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发展。在对外政策方面，1933 年 11 月 16 日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结束了孤立和封锁苏联的政策。在法西斯侵略威胁日益严重之时，努力改变国内盛行的孤立主义情绪，提醒人们认清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危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吁请国会召开特别会议，修改中立法，允许交战国在“现款自运”条件下从美国购买武器，以支援反法西斯国家。法国战败后，积极进行防御准备，决定采用参战以外的一切方式援助英国。1941 年 3 月促使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物资和援助。苏德战争爆发后，把法案适用范围扩大到苏联。1941 年 8 月，与英首相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和日后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正式对法西斯国家宣战。在国内动员全部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对外注重战略全局，致力于尽早打败法西斯势力和与盟国磋商未来国际和平构想。1943 年 1 月提出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1943 年和 1945 年两次与苏、英首脑会晤，为早日结束战争和战后和平制订了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1945 年 4 月 12 日，在任内患脑溢血病逝。著有《向前看》、《我们的道路》等。作为政治领袖，罗斯福与华盛顿、林肯齐名，深受美国人民的赞扬。逝世时中国解放区下半旗致哀，《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民主巨星的殒落》的社论。
(孙平)

杜鲁门

(Dulumen, Harry STruman 1884—1972) 美国第 33 任总统，民主党右翼政治家。生于密苏里州，父亲为小农场主。1901 年从拉马尔高级中学毕业后，家贫无法上大学，在堪萨斯城作银行职员。后历任地方邮政局长、城镇公路监督和国民警卫队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上尉。1922—1934 年在杰克逊县任法官、首席法官及两届县长。1934 年当选为国会参议员。1945 年 1 月任副总统后不久，罗斯福病逝，继任总统。1948 年竞选连任获胜。上任初致力于结束战争和与盟国筹划战后安排。参加波茨坦会议，批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制定实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的遏制政策，挑起冷战：1947 年 3 月提出全球扩张的“杜鲁门主义”；1947 年 6 月公布“马歇尔计划”；推行扶植日本和分裂德国的政策；1949 年组织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向不发达地区扩张的“第四点计划”；1950 年发动侵朝战争；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对中国进行封锁。在对内政策上，一方面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制定反共反民主的“忠诚调查法”，纵容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提出“公平施政”纲领，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调整。著有《冲突性的一年》、《考验与希望的一年》、《公民先生》等。

(孙平)

马丁·路德·金

(Mading Lude Jin, 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著名领袖，牧师。出身于南方黑人牧师家庭，15岁入大学，先后获文学学士、神学学士和博士学位。1954年，任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浸礼会教堂牧师。从50年代中期参加并领导美国黑人民权运动。1955年在蒙哥马利市领导抵制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的运动，获胜。1957年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并当选为主席。1958年在南方21个主要城市领导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1963年春在种族歧视严重的伯明翰市组织黑人举行静坐示威和游行，反对在餐厅、学校、公共场所和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迫使白人种族主义者让步。同年8月，125万黑人向华盛顿和平进军、争取就业和自由时，在集会上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一贯主张非暴力抵抗主义，多次被捕入狱，在黑人群体中深孚众望。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4月4日，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被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暗杀。著有《阔步走向自由》、《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待》等著作。

(孙平)

拉丁美洲现代史

(ladingmeizhou xiandaishi)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来拉丁美洲各国维护民族独立、争取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历史。进入现代后，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仍然是拉美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近代取得了政治独立的拉美各国继续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以及军事政治干涉。国内具有封建性质的大庄园制、殖民主义造成的单一产品生产状况以及对外国资本和市场的严重依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受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支持的大地主、军人和教会三位一体的反动独裁势力是争取社会政治进步的首要敌人。因此，反帝、反独裁、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及各国间的相互合作和支持，构成拉丁美洲现代史的基本内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拉丁美洲现代史大致可划分为两大时期。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帝国主义加紧对拉美的渗透和控制，拉美民族资本主义曲折发展，人民反帝民族革命运动蓬勃开展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拉美各国民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产业工人人数有较大增长，开始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强，是民族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阶级。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其中美国垄断资本在拉美扩展尤甚，逐渐取代英国。垄断公司直接占有大片土地，成为拉美的最大庄园主。为了保护其经济利益，美国往往扶植反动独裁政权，甚至直接出兵进行侵略和干涉。因此，20年代拉美人民掀起反帝、反美、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高潮，出现1919年阿根廷工人的罢工和武装起义，1920年危地马拉人民推翻亲美独裁者卡布雷拉统治的斗争，1924年巴西圣保罗卫戍部队士兵的反独裁起义，1926—1934年桑地诺领导的尼加拉瓜反美爱国游击战争等。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一些国家诞生了共产党。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使拉美国家深受其害。各国设法克服单一产品生产及过分依赖外国市场的状况，采取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的措施，如保护关税、限制进口、管制外汇、发放国家津贴、低息贷款等。一些国家还将外国企业收归国有，进行土地改革，鼓励发展多种经济。从1934年起，拉美民族经济又有较大发展。巴西的轻工业、食品工业、交通运输业、电气和煤气业发展迅速，阿根廷工业总产值从1935—1941年增加了一倍。经济大危机使帝国主义加紧争夺拉美市场。美国通过“睦邻政策”，加强经济渗透，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也渗入拉美经济社会生活。1939年，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拉美贸易国。拉美人民一方面继续开展主要针对美国垄断资本的民族民主运动，同时也对法西斯经济政治渗透进行了坚决斗争。不少拉美国家建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积极支持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古巴、巴西、墨西哥等国先后对轴心国宣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是拉美经济迅速发展，逐步摆脱美国经济政治控制，加强各国间及同亚非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共同反霸，争取世界和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期。战后拉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许多国家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发展中资本主义社会。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末，拉美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国民经济平均年递增5.5%，高于除日本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其中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三国发展尤为迅速。50年代前，拉美各国主要是为工业化奠定基础。50—60年代多数国家注重发展本国工业，以

替代进口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从 60 年代中期起，一些国家大力发展钢铁、石化、汽车、航空、造船、机器制造等工业。到 70 年代，部分国家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超过农业。但各国经济上对外国资本和市场的依赖性严重，外债负担沉重，农村中大庄园制仍占优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财富日益集中。战后拉美社会政治进程的基本趋向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逐步建立和巩固。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取代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体基本上取代封建寡头统治或军事专政而普遍建立起来。但这个过程也有曲折和反复。50 年代是拉美人民反对军事独裁统治的第一个高潮。1954 年拉美 20 个独立国家中，有 13 个处于旧式军人统治之下，到 1959 年，只剩下 4 个。但 60—70 年代，又有 12 个国家相继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政权。70 年代后期，拉美人民争取政治民主化运动再次出现高潮，军人政权纷纷让位于民选政府，大多数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政体。此外，古巴和尼加拉瓜分别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战后拉美各国为争取经济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了长期斗争。50—60 年代，各国主要致力于反对美国垄断资本的控制，收回外国垄断资本掌握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经济部门。70 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开展了限制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斗争，进一步消除外国垄断资本对拉美经济社会生活的控制和影响。各国还努力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创建原料生产与出口国组织，联合起来捍卫民族权益。到目前已有 7 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战后初期拉美国家与美国签订了泛美互助条约，组成美洲国家组织，在政治上听从于美国。进入 60 年代，随着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及拉美政治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国家积极争取独立自主，摆脱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要求改变为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服务的泛美体系，提出“以拉美的观点、拉美的方式、拉美的特点和拉美的力量，解决拉美自身的问题”的口号。在各国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一体化向政治领域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开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采取共同立场，联合反霸，加强南南合作，促成南北对话。到 1983 年，已有 17 个拉美国家成为不结盟运动的正式成员。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较快发展。

（孙平）

尼加拉瓜抗美游击战争

(Nijialagua kangmei youjizhanzheng) 1926—1934 年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桑地诺领导的反美民族革命战争。尼加拉瓜地处中美洲，很早就成为美国扩张的对象。美国操纵尼加拉瓜的经济命脉，任意干涉尼加拉瓜的内政。1925 年，美国在尼加拉瓜的代理人迪亚斯发动政变，建立傀儡政权。美国公然出兵予以支持。尼加拉瓜人民奋起反抗。战争分三个阶段。1926 年 10 月—1927 年 5 月为第一阶段，是桑地诺发动起义、领导游击队与 1926 年 12 月建立的同迪亚斯政权相对抗的自由党“护宪政府”，反对迪亚斯卖国政府的国内战争阶段。1926 年 10 月 26 日，桑地诺率领 29 名矿工在圣阿尔维诺金矿举行起义，在山区开展游击活动。12 月开始与“护宪政府”联合作战，多次沉重打击卖国政府军队和美国侵略者。正当桑地诺胜利进军逼近首都马那瓜时，1927 年 5 月护宪政府与美国签订协定达成妥协。1927 年 5 月至 1932 年底为第二阶段。是桑地诺独自依靠工农群众，武装抗击美国占领军的民族革命战争阶段。桑地诺拒绝敌人的诱降，率领队伍撤至塞戈维亚斯山区，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展反美武装斗争。1927 年 9 月，正式成立“尼加拉瓜民族主权保卫军”，多次粉碎敌人的围剿。从 1931 年初开始扭转了被动局面。年底，游击队发展到 3000 余人，控制了全国一半省份的广大农村地区。美国被迫陆续撤军。1933 年初到 1934 年 2 月为第三阶段，是桑地诺武装反对美国御用工具——国民警卫队，监督并力图改造萨卡沙政府的和平斗争阶段。1932 年 11 月萨卡沙当选为总统，1933 年 1 月最后一批美军撤走。2 月 2 日，桑地诺与萨卡沙总统签订《和平协定》，双方保证维护尼政治经济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实现和平，游击队放下武器，只保留 100 人作为“紧急应变部队”。此后，桑地诺努力敦促萨卡沙总统改组国民警卫队。1934 年 2 月 21 日，在桑地诺与政府会谈期间，美国指使国民警卫队司令索摩查将其暗杀。尼加拉瓜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鼓舞了全拉美人民的反美斗志。

(孙平)

桑地诺

(Sangdinuo 1895—1934) 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抗美游击战争领导者。生于尼加拉瓜马萨亚省尼基诺沃莫镇。小学毕业后务农。青年时期先后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做工，参加过墨西哥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1926年5月回国，在尼北部一美国资本家的金矿做工。1926年10月26日，率领部分矿工起义，开展游击活动。号召反对美国占领，主张把美国垄断资本占去的土地分给农民，开发民族资源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人民广泛支持。1927年5月起以塞戈维亚斯山区为根据地，独立领导抗美游击战争。拒绝高官厚禄的诱降，领导游击队顽强抗击6倍于己的美军。逐渐扭转被动局面，迫使美军于1933年初全部撤出尼加拉瓜。为结束战争实现和平，1933年2月与政府签订《和平协定》，同意所率部队放下武器。1934年2月21日被美国指使的国民警卫队司令索摩查暗杀。桑地诺赢得本国和拉美人民的爱戴和尊敬，被誉为“尼加拉瓜民族的光荣”。尼加拉瓜人民相继以桑地诺命名组成革命组织，进行反帝、反独裁斗争。

(孙平)

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

(Moxige kadenasi gaige)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在其任内(1934—1940)实施的资产阶级改革。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严重影响了墨西哥社会经济,原料生产因世界市场萎缩大量减产,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失业剧增,农产品价格大跌,社会矛盾尖锐。卡德纳斯提出“六年计划”的竞选纲领,得到广泛拥护。1934年7月当选为总统后,立即开始推行改革。主要内容为:土地改革。政府没收本国和外国人拥有的大地产,分配给农民。其任内共分配土地2000万公顷。同时设立国家农贷银行帮助农民,并鼓励和扶持农民组织合作农场。实行国有化。1937年把为外国垄断资本控制的铁路全部收归国有,1938年宣布把属于英、美、荷的17家石油公司收归国有,政府在10年内还清它们在墨西哥的资产。鼓励工会的发展,修订全国劳工法,把分散的劳工组织合并成墨西哥劳工联合会。教育改革。1934年12月开始在全国推行“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扩大和普及教育,并专设印第安人事务司,加强印第安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巩固民主政体,打击军事寡头势力。1938年3月把执政的国民革命党改组为墨西哥革命党,容纳工会、农民和其他群众组织参加。改革基本上摧毁了封建大庄园制,并使民族资本取代外国资本掌握了全国最主要的经济命脉,基本上完成了1910—1917年革命以来由半封建社会过渡到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为墨西哥比较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孙平)

古巴革命

(Guba geming)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建立人民革命政权的武装革命。1952年巴蒂斯塔在古巴建立独裁政权，对内实行军事恐怖统治，对外依附美国，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反抗。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率领100多名青年发动起义，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被捕。1955年获释后流亡墨西哥，建立“七·二六运动”组织，提出建立民主制的纲领。1956年12月2日，卡斯特罗率82名革命者乘坐“格拉玛”号游艇在奥连特省登陆，遭围剿，仅12人突出重围，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点燃了古巴全国革命斗争的火焰。1957年3月13日，一批爱国者攻打总统府，失败后余部组成“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继续进行武装斗争。1958年2月，福雷·乔蒙领导的另一支远征军从努埃维达斯登陆，在埃斯坎布拉依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1958年3月17日，古巴42个群众团体的数千名代表发表联合宣言，反对独裁政府血腥镇压革命运动，要求巴蒂斯塔下台。4月9日，哈瓦那工人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被镇压。1958年7月，起义军同国内各派反独裁力量在委内瑞拉签订《加拉加斯协议》，组成反巴蒂斯塔的革命阵线。8月，切·格瓦拉率一支起义军纵队挺进拉斯维利亚省，打开通向哈瓦那的道路。巴蒂斯塔逃往国外。1959年1月1日，起义军进入哈瓦那，建立革命临时政府，卡斯特罗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同年2月任政府总理。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孙平)

吉隆滩战役

(Jilongtan zhanyi) 1961年古巴人民抗击美国雇佣军入侵的战役，又称猪湾事件。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企图拉拢古巴未遂，将古巴视为在拉丁美洲推行霸权的障碍，对古巴进行经济封锁，策划武装入侵，两国关系恶化。1961年4月17日凌晨，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训练的1000余名雇佣军在美国军舰和飞机的掩护下，在古巴中部拉斯维利亚省南部沿海登陆，并空投部分伞兵，企图推翻古巴革命政权。雇佣军占领吉隆滩和长滩，继续向北推进。古巴军民奋起抗击入侵，将雇佣军压缩包围在吉隆滩。经过不到72小时的战斗，于19日将其全歼。

(孙平)

智利阿连德改革

(zhili aliande gaige) 1970—1973 年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推行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智利长期处于美国资本的掠夺剥削之下，国内军人专政，民主改革大部半途而废。1970 年 9 月智利进行大选，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组成“人民联盟”，推举社会党人阿连德为总统候选人并获胜。阿连德执政后，立即开始进行重大改革，包括：推行国有化政策，把美国资本和其他外国资本占有的铜、铁、硝石等矿业全部收归国有，对数十家本国和外国资本的企业与银行实行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执政第一年共征收 1328 个庄园；调整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增加工资，减免税收，改善人民居住条件。对外奉行独立自主和反霸反殖的外交政策，坚决维护 200 浬海洋权的立场，积极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改革具有进步意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有些改革措施和步骤过急过左，损害了一般群众的利益。1973 年 9 月 11 日，在美国和国内右翼势力的支持下，军队发动反政府军事政变，推翻了政府。阿连德以身殉职。

(孙平)

非洲现代史

(feizhou xiandaishi)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来的非洲历史。是非洲人民长期进行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摧毁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取得民族独立，建立起独立国家的历史；也是非洲人民维护民族政治经济独立，与外国垄断资本进行斗争，发展民族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历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可划分为两大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在非洲的殖民地，并加强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除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个别独立国家外，其他广大地区都处在英、法、比、葡、西班牙等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或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行政官员进行直接统治，或通过当地部落酋长实行间接统治。在经济上组织垄断公司掠夺非洲的矿产资源，片面发展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强迫种植一种或几种经济作物，剥夺农民的土地，迫使他们为白人剥削者劳动。结果造成非洲经济结构畸形，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需要，并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非洲人民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矛盾异常尖锐。由于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渗透，非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发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分化，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发展。前者因流动性大、文化水平低、政治觉悟不高等原因未能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后者在一部分地区力量较强，拥有一批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中许多人积极投入民族解放斗争，组织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领导反帝独立运动。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进入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20 多年内，非洲大陆先后爆发了 100 多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斗争，包括城市人民起义、农村长期武装斗争、群众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等。其中尤以 1919—1922 年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1921—1926 年摩洛哥里夫人民反对西、法殖民统治的起义、1935—1941 年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斗争最为著名。这一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如下特点：范围较为广泛，过去斗争比较沉寂的地区也爆发了反帝斗争；斗争发展很不平衡，北非等地区反帝斗争规模较大，组织程度较高，提出了明确的独立纲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斗争往往较为分散孤立，组织力量薄弱，政治要求比较含糊，部落酋长或宗教人士仍充当领导者；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除埃及外，绝大多数斗争都被帝国主义镇压下去，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胜利作了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经济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内外部条件。战后初期，北非最先掀起独立运动，利比亚、苏丹、突尼斯、摩洛哥等国相继独立。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以加纳和几内亚独立为序幕，整个非洲进入独立运动的高潮时期，一系列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迅速崩溃。到 1980 年非洲已有 50 个独立国家。这一时期的非洲独立运动仍属于反帝反殖的民族革命，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手中，斗争方式多种多样，大多数国家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和谈判迫使殖民者放弃旧殖民统治，独立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取得独立的非洲新兴国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在政治上，由于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疆界问题

和民族、部落的复杂分布及大国的插手等原因，许多国家政变频繁，内战不已，政局动荡，边界冲突不断；在经济上，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大量存在甚至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在国际上仍受到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束缚。因此，各国一般都采取国有化、土地改革、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调节、积极利用外资等措施，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有些国家的工业已初具规模。为了有效地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斗争，非洲国家努力消除内部分歧，加强团结与合作，共同维护民族主权和民族权益，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许多国家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国。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成立，至80年代已有50个成员国。1974年，西非法语国家经济合作组织西非经济共同体成立，有马里、毛里塔尼亚等6个成员国。1975年，非洲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立，成员国有贝宁、加纳、几内亚等16个国家。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孙平）

1919—1921 年埃及反英独立运动

(yijiuyijiu—yijiuaryinian Aiji fanying duli yundong)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世纪80年代以前，埃及是奥斯曼帝国属地，1882年被英帝国主义占领，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1918年11月13日，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柴鲁尔等人会见英驻埃高级专员温盖特，要求到伦敦同英政府谈判埃及独立问题，遭拒绝。柴鲁尔等人便组织“代表团”（阿拉伯语音译为“华夫脱”，后发展为华夫脱党），准备赴英。1919年3月8日，殖民当局逮捕了柴鲁尔等4人，将其流放至马耳他岛，引起埃及人民反英浪潮。斗争从3月9日开罗高校学生罢课起，发展到全国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群众示威游行，直至武装起义。有些城市和乡村建立起命名为“苏维埃”的革命政权。斗争要求释放柴鲁尔等人，取消英国对埃及的“保护”，英军撤出埃及，立即给予埃及独立。英当局被迫释放柴鲁尔等人，允许他们前往欧洲，同时派重兵镇压起义。1919年6月巴黎和会确认埃及为英国的被保护国，再次引起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英国政府企图与亲英的埃及政府单独谈判，玩弄“自治”阴谋，分裂民族独立运动，遭到柴鲁尔的坚决反对。1921年12月英殖民当局又逮捕了柴鲁尔，激起人民进一步反抗，城市罢工和农民武装斗争重新高涨。1922年2月28日，英政府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对埃及的保护，承认埃及独立，但提出四项保留条件（保留对埃及的国防和大英帝国交通线的控制；保护外国人在埃及的权益；维持对苏丹的统治等）。埃及成为非洲现代史上第一个依靠自己的斗争取得独立的国家。

（孙平）

埃及七月革命

(Aiji qiyue geming) 埃及推翻封建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拒不撤走战争期间进驻埃及的军队，支持法鲁克王朝实行专制统治，维护其在埃及的特权。埃及国内局势动荡，人民要求英军全部撤出埃及，取得完全独立和自由。由青年军官秘密组织的“自由军官组织”在纳赛尔的领导下，积极准备推翻王室。1952年7月22日，“自由军官组织”发动起义，于次日控制了首都。26日，法鲁克国王被迫宣布退位，逃往意大利。起义者成立“革命指导委员会”，没收王室的土地，取消社会等级和贵族封号，清洗腐败的国家机构，废除了1923年宪法，颁布土地改革法。1953年正式宣布永久废除君主政体，成立共和国。纳吉布任总统兼总理，纳赛尔任副总理。次年4月纳赛尔取代纳吉布任总理。1956年6月23日制定新宪法，纳赛尔当选总统。

(孙平)

苏伊士运河事件

(suyishi yunhe shijian) 1956 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引起英、法武装干涉的国际冲突，又称苏伊士运河危机。苏伊士运河自凿通后，一直为英、法所控制，运河公司 95% 的股票掌握在两国手中。英国有在运河区驻兵的权利。埃及在 1952 年七月革命后，要求收复运河主权。1956 年 6 月 12 日，根据 1954 年的英、埃协定，英军全部从运河区撤走。同年 7 月 26 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英、法对此疯狂反对，采用军事威胁、经济制裁等手段，妄图迫使埃及改变决定，均未奏效。1956 年 10 月 29 日，英、法唆使以色列军队侵入埃及西奈半岛。31 日英、法借口“保护运河”，侵入埃及，轰炸开罗、亚历山大港等地。埃及人民奋起反抗入侵者，并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11 月 2 日，在美、苏支持下，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英、法立即停火。英、法和以色列在极其孤立的情况下被迫分别于 12 月和次年 3 月撤离埃及。埃及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和主权的行动取得了胜利。

(孙平)

柴鲁尔

(Cailuer 1857—1927) 埃及政治家，埃及独立运动领袖，又译作扎格卢勒。出身于小康农民家庭。早年就学于爱资哈尔大学和埃及法学院。毕业后成为律师兼记者。1882年参加阿拉比领导的抗英战争，失败后遭监禁。1892年任上诉法院法官。1895年与埃及首相法赫米之女结婚。1906—1912年先后任教育大臣，司法大臣。1913年入选立法会议，任副议长。1918年率代表团会见英驻埃高级专员，要求谈判取得埃及独立。遭拒绝后，组织华夫脱党领导反英运动。1919年3月被捕后被流放马耳他岛。获释后率代表团赴巴黎、伦敦商谈埃及独立问题。未果。1921年12月再次被捕流放至塞舌尔群岛。1922年英国被迫同意埃及独立后，1923年获释。次年华夫脱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出任首相。任内用直接选举代替两级选举制，并与英国商谈英军撤离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等问题。1924年11月因埃及军队的英人总司令遭暗杀被迫辞职。1926年华夫脱党再次在大选中获胜，但在英国压力下，柴鲁尔同意组成联合政府，自己只担任众议院议长。1927年8月23日因病去世。

(孙平)

纳赛尔

(Nasaier 1918—1970) 埃及共和国的奠基人，总统，第三世界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生于亚历山大。在开罗上中学时参加反英活动。中学毕业后进埃及皇家军事学院。1938年毕业后在部队服役。支持成立“自由军官组织”，后成为该组织主要领导人。1942年任军事学院教官。1948年参加巴勒斯坦战争，次年任“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具体部署和领导推翻法鲁克王朝的起义。1952年7月23日发动“七月革命”，取得胜利。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1954年4月出任总理。1956年6月埃及颁布新宪法后，当选为总统。同年7月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领导抗击英法的侵略的战争。1958年促成埃及和叙利亚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任总统（3年后叙利亚退出）。1962年将执政党民族联盟改建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任最高主席。倡导“阿拉伯社会主义”。执政18年中政绩显著。重视发展民族经济，实行企业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加速重工业发展。奉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持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是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1967年领导埃及人民抗击以色列侵略，遭失败。1970年9月28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52岁。著有《革命哲学》、《埃及的解放》等。

(孙平)

摩洛哥里夫人民起义

(moluoge lifu renmin qiyi)摩洛哥里夫各部落人民反抗西班牙和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1912年摩洛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其北部地区由西班牙管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班牙着手对未被征服的山区发动大规模殖民战争。1921年初，殖民军入侵里夫山区。同年6月1日，里夫人民在势力最强的部落酋长克里姆领导下，发动起义。7月，里夫人民在安伐尔重创殖民军，侵略军司令西尔维斯被迫自杀。9月，克里姆召集起义部落的代表会议，组成国民会议，宣布成立独立的里夫共和国，克里姆为最高领导人。1924年，里夫军民再次击退西班牙军的进攻，几乎解放了全部西属摩洛哥领土。法国害怕里夫起义影响到法属摩洛哥，企图扼杀起义，多次进行军事挑衅。1925年西、法联合出动30万军队从南北两面发动攻势。不足7万人的里夫军队寡不敌众，被迫退却，部分部落首领投降。1926年5月，法军包围里夫共和国最高军事指挥部所在地塔尔吉斯特，发起猛攻。克里姆被迫放下武器，被流放到留尼旺岛。里夫起义失败。

(孙平)

埃塞俄比亚抗意卫国战争

(Aisaiebiya kangyi weiguozhazheng) 埃塞俄比亚人民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战争。埃塞俄比亚位于北非东部，扼红海南大门，战略地位重要。意大利为掠夺新的殖民地，把已有的殖民地意属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连接起来，建立地中海霸权，策划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挑起边境冲突。1935年1月，埃向国联提出控诉，要求制止意大利侵略。国联在英、法控制下，没有谴责意的侵略行为。1935年10月3日，意军从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两线侵入埃塞俄比亚。国联宣布意为侵略者，进行经济和财政制裁，但未对意急需的石油实行禁运，英国也不关闭苏伊士运河，姑息纵容侵略。战争爆发后，埃皇海尔·塞拉西一世即颁布总动员令，抵御入侵，并亲临前线指挥。埃军利用山地条件，顽强抗击意军。至1936年2月，意军在北线进展不到100公里。但埃国力弱小，军队装备落后，协调作战差，亦无外部有力支援，总体上处劣势。意军得到精锐部队和军事装备的补充，加强进攻，依靠空军优势狂轰滥炸，并践踏国际公约，使用毒气。埃军坚持阵地战，伤亡惨重，一些重要城镇相继失陷。4月初，北线意军击溃埃军，占领埃军大本营，进迫首都亚的斯亚贝巴。5月初，塞拉西一世流亡伦敦。5月5日意军进入首都，5月9日南北两线意军会合。同日，墨索里尼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此后把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合并为意属东非殖民地。埃塞俄比亚人民坚持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意军，迫使意军固守在一些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1941年英军在东北非向意军发动反攻，塞拉西一世率数千游击队从苏丹进入国内，在人民支持下，配合盟军作战。5月5日，塞拉西一世率军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年底，入侵者全部被赶出埃国土。

(孙平)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

(Aerjiliya minzu jiefangzhanzheng) 1954—1962 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尔及利亚掀起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高潮。1954 年 8 月，本·贝拉等人成立“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11 月改组为“民族解放阵线”），联合其他民族主义组织，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争取民族独立。1954 年 11 月 1 日，3000 余名爱国者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在奥雷斯山区首先发动起义。卡比利山区等地区继起响应。起义军多次粉碎法国殖民军队的镇压和围剿，不断壮大。1956 年民族解放阵线在苏马姆举行代表大会，通过政治纲领，宣布革命目标是废除殖民制度，建立共和国。1958 年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全国 2/3 的土地获得解放，民族解放军发展到 15 万人，军事上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法国无力继续殖民战争。1959 年戴高乐政府被迫同意给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经过两年谈判，1962 年 3 月 18 日，双方签订《埃维昂协议》，规定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和主权，法军三年内分批撤出。7 月，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结束了法国 130 多年的殖民统治。

(孙平)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Nanfei zhongzu geli zhidu) 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的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制度。南非位于非洲最南端，居民中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占绝大多数。1910年南非联邦(1961年改称南非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之下。该政权为维持其统治和对非洲人的掠夺剥削，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政策。特别是1948年种族主义政党国民党执政后，以“种族隔离”为纲领，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法令，将种族压迫法律化和制度化，建立了完整的种族隔离制度。其主要法令有：《种族隔离法》(1951年)，把南非居民分为白种人、有色人、非洲人等等级，分别隔离，非洲人被赶到贫瘠的“保留地”内，而占人口总数不到17%的白人却占有87%以上的肥沃土地；《通行证法》(1952年)，规定非白种人必须携带60余种证件，否则一经查出，即遭监禁或罚款；《班图自治法》(1959)，把非洲人按语言文化的区别分为8个部落自治单位即“班图斯坦”(后称“黑人家园”)，企图将所有黑人逐步赶到这些地区。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遭到南非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许多国家对南非进行制裁，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

(孙平)

现代国际关系史

(xiandai guoji guanxishi) 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历史。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国际关系中的基本矛盾，除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外，又增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这三类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构成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基本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朝鲜、越南、阿富汗、埃及、摩洛哥，以及尼加拉瓜、古巴和墨西哥等国燃起了反帝斗争的烽火，猛烈冲击着帝国主义的后方，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陷于危机之中。苏俄经过三年国内战争，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到20年代末，除美国外的资本主义大国都先后与它建立了外交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先后召开了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确立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新秩序，即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体系是战胜国列强在共同宰割战败国、瓜分殖民地和反对各国人民革命中所达成的暂时的妥协，是不牢固的。

20年代，帝国主义国家围绕着德国赔款问题和安全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其实质是争霸欧洲的斗争。斗争的直接结果是，在1924年通过了道威斯计划，1925年签订了洛加诺公约。道威斯计划为德国恢复经济大国地位和重整军备提供了条件，洛加诺公约则为德国恢复政治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它们对法国的欧洲霸权地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欧亚两洲形成两个战争策源地。德、日、意组成轴心国集团，不断向外侵略扩张。法西斯成为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发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苏联也向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倡议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共同制裁侵略者。但是，英、法等国推行绥靖政策。这种政策的顶峰是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此后，苏联对外政策由争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逐渐转向一国自保。1939年8月，在和英、法的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随着战火的逐步扩大，世界60多个国家、4/5的人口卷入了战争。英、美、中、苏等国家组成反法西斯联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但是，联盟内部的各国社会制度不同，作战目的也不完全一样，因此一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经过6年奋战，世界人民终于在1945年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风云变幻，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从两极向多元过渡，从冷战对峙逐步走向缓和，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是美、苏冷战，两大阵营对抗时期。二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新变化：德、意战败，英、法严重削弱，欧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欧洲中心的国际格局被彻底打破，战后的欧洲不得不长期分别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庇护之下；美国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苏联成为欧亚大陆上唯一的军事、政治强国；社会主义超出一国范围，组成社会主义阵营；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汹涌澎湃，日益深刻地改变着本地区乃至

整个世界的面貌。随着二战结束与共同敌人的消失，美、苏两国的矛盾日趋尖锐，关系日益恶化，美国挑起了冷战。美、苏以欧洲为重点的严重对峙，给整个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形成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

第二阶段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末期，是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国际关系调整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西欧、日本复兴，其独立自主的倾向日益明显，西欧走向经济一体化，戴高乐执行独立外交政策，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美国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控制西方阵营；中苏关系恶化，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以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为标志，第三世界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冷战开始转变为对话，出现了有限的缓和。

第三阶段从 70 年代初至今，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时期，是世界走向多极的时期，是东西南北关系发展的时期。主要特点是：世界日益走向多极。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尼克松提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说，亦有人称世界形成了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东西方关系虽不时出现对抗，但对话、缓和已成为总的发展趋势。70 年代，出现了以美、苏首脑会晤、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和欧安会为主要内容的“缓和时期”。苏联入侵阿富汗标志着缓和时期的终结，东西方关系再次进入紧张状态。80 年代中期以后，又出现了以中导条约为主要标志的新的缓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南北对话、南南合作有了新发展。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国际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迎来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段炳麟）

十四点

(Shisidian) 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提出的纲领。1917年11月苏俄宣布《和平法令》，在饱受帝国主义战争灾难的世界各国劳动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抵消《和平法令》的影响，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在国会的演说中蛊惑人心地提出了“十四点”，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主要内容是：公开订立和平条约；公海航行绝对自由；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各国军备裁减到同国内安全相一致的最低点；“公正调整”殖民地；德军撤出俄国，调整俄国问题；德军撤出比利时；德军撤出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重新调整意大利边界；奥匈各民族自治；(11)重新调整巴尔干国家领土；(12)奥斯曼帝国境内非土耳其族自治，开放达达尼尔海峡；(13)重建有出海口的土独立波兰；(14)建立国际联盟。“十四点”打着民主、自由、平等、和平的旗号，其真实意图是，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来打破老牌殖民帝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关税壁垒，夺取世界市场和殖民地，取消英、法、意、日等国在大战初期签订的未包括美国的分赃密约，并通过国际联盟来操纵国际事务。它是一个标志着美国企图越出美洲、争夺世界霸权的纲领，对《凡尔赛和约》的订立起了一定作用。

(段炳麟)

巴黎和会

(Bali hehui)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的协约国集团于 1919 年 1 月 18 日至 6 月 28 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和会。参加国共 27 个。由于出席和会的不列颠帝国代表团中还包括英国的 4 个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以及印度的代表，所以实际参加和会的国家共 32 个。苏俄未被邀请，战败的德国及其盟国不许列席会议。会议有 3 种，即全体会议、最高委员会和审议各种专门问题的委员会。表面上，一切决议都要由全体会议通过，实际上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是最高委员会。它最初是 10 人会议，由英、法、美、意、日各出 2 名代表组成，后又缩小为 4 人会议，由美、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组成，不是现任首相的日本首席代表被排斥在外。意大利力量薄弱，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伙伴”，所以真正操纵和会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会是帝国主义战胜国的分赃会议，各国带着各自不同的争霸计划与掠夺要求，在和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法国在战争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仍拥有战胜国中最强大的陆军，在欧洲大陆上占有军事战略上的优势。它力图大大削弱甚至肢解德国，以便确立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但这个企图遭到英、美的反对，而且国内经济上的困境也使法国在讨论对德和约时不得不向其盟国有所让步。英国在战争中也遭到削弱，但仍是世界头号海军强国，保持着对欧洲盟国的债权国地位，支配着殖民帝国的巨大资源。它玩弄传统的“大陆均衡”策略，一方面主张剥夺德国的全部海外殖民地及大部分军舰、商船，限制德国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又反对过分削弱德国，想用德国牵制法国。美国则企图凭借它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利用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来左右会议，以达到遏制英、法、日，攫取世界霸权的目的。日本、意大利也提出了自己的争霸计划。经过长期的激烈争吵与讨价还价，战胜国列强才在对德和约问题上达成协议。1919 年 6 月 28 日，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了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在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还秘密讨论了武装干涉苏俄问题，巴黎和会实际上也是指挥武装反苏的司令部。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505-1.bmp}

(段炳麟)

凡尔赛和约

(Fan ersai heyue) 即《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帝国主义掠夺战败国的条约。1919年6月28日,战胜国与战败国德国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共15部分440条,其中第一部分为国联盟约。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领土问题,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萨尔区由国联代管15年,期满后经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莱茵河西岸由协约国占领15年,东岸50公里为不设防区;德国承认波兰独立,波兰得到波兹南、西普鲁士、上西里西亚的一部分领土及穿过西普鲁士的所谓“波兰走廊”的狭隘出海口,但泽被宣布为自由市;西里西亚的古尔琴地区划归捷克斯洛伐克;默麦尔由国联代管(1923年合并于立陶宛);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德、奥不得合并。此外,丹麦、比利时也得到一些领土。德国共丧失1/7的领土和1/10的人口。关于军事问题,德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撤销参谋本部;陆军总数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舰艇的最高限额为战斗舰、轻巡洋舰各6艘,驱逐舰、鱼雷艇各12艘;不得拥有坦克、装甲车、军用飞机和潜水艇;拆除西部边境防御工事,保留东部边境防御工事。关于赔偿问题,和约在原则上要求德国承担战争责任及提供赔偿,但关于赔款总额及支付期限等问题没有解决,决定成立一个赔款委员会来研究确定,德应在1921年5月1日前先交出200亿金马克。关于殖民地问题,德国的全部殖民地由几个主要协约国以“委任统治”的形式予以瓜分。德属东非的坦噶尼喀为英所得,卢旺达及布隆迪归比利时,多哥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德属西南非洲由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统治;德属太平洋岛屿,赤道以北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利亚纳群岛划归日本,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岛和萨摩亚分别划归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约不顾中国是战胜国,竟决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 and 胶州湾租借地让给日本。中国人民对和会粗暴践踏中国主权的行爲极为愤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人民反帝爱国怒潮的推动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凡尔赛和约是在战胜国列强宰割战败国和牺牲弱小民族的基础上订立的,它本身就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段炳麟)

共产国际

(Gongchan guoji) 即第三国际。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陷入破产，列宁为团结各国革命左派，建立共产国际，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建立，进一步为第三国际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主持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告全世界无产者》等文件，宣告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总部设在莫斯科。凡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共57个。共产国际从成立到1923年，是它活动的初期阶段，共召开4次代表大会。1920年7、8月间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开幕式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阐明反对机会主义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大会通过列宁拟定的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件及《土地问题提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1921年的三大和1922年的四大先后发出“到群众中去”的号召，提出建立具有广泛统一战线基础的“工人政府”的口号。共产国际在活动的初期阶段，在列宁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促进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建立，帮助了各国年轻的共产党成长。但它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一度脱离实际，认为世界革命的条件已全面成熟，近期任务是在世界各国“立即夺取政权”，“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期是共产国际活动的中期阶段，先后于1924年和1928年召开了第五和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一时期内，它把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党等同看待，甚至把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也视为主要打击对象。这种左倾错误妨碍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给反法西斯斗争带来了不利影响。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七大”，制定了反法西斯的策略方针。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及各国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共产国际原有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经各国共产党一致同意，于1943年6月宣告解散。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506-1.bmp}

(段炳麟)

国际联盟

(Guoji Lianmeng) 简称国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根据巴黎和会通过的国联盟约，于 1920 年 1 月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成立时会员国 44 个，后逐渐增加到 60 多个。美国本是国联的主要倡议者，但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日本、德国在 1933 年退出，意大利于 1937 年退出。苏联于 1934 年加入，1939 年被开除。其主要机构是会员国全体代表大会、行政院、秘书处，附设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等常设机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常会一次，行政院由英、法、意、日 4 个常任理事国和经大会选出的 4 个非常任理事国的代表组成。大会和行政院的决议，除程序问题和盟约另有规定者外，须经全体一致通过。由于战后人民反战情绪高涨，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国联盟约规定要裁减军备、制裁侵略，但自相矛盾和含糊的条款使这些规定根本不能实现。国联组织的国际裁军大会经过长达近 7 年的筹备在 1932 年召开，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于 1934 年结束。国联盟约还规定了“委任统治”制度，把战败国的殖民地和领地以“委任统治”的形式由战胜国瓜分。国联自成立之日起就为英、法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维护其世界秩序、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已名存实亡。1946 年 4 月宣告解散，所有财产、档案均移交联合国。

(段炳麟)

华盛顿会议

(Huashengdun huiyi) 又称太平洋会议，是帝国主义国家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及势力范围进行再瓜分的一次会议。巴黎和会暂时调整了帝国主义在西方的关系，但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列强之间仍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其中美日、美英之间的争夺尤为激烈。美、日、英三国为了争霸，展开了激烈的造舰竞赛。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倡议召开国际会议，试图通过外交途径限制对手，拆散英、日同盟，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夺取更多的权益。1921年8月11日，美国总统哈定正式向有关国家发出邀请。同年11月12日至翌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葡、比、荷、中九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议的正式议程是限制海军军备及远东、太平洋问题；目的是想解决凡尔赛和约中未能解决的帝国主义国家间关于海军力量对比及其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会议的组织机构，除大会外，还设有由美、英、日、法、意五国代表组成的缩减军备委员会及由与会九国代表组成的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操纵会议的是美国国务卿休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和日本海相加藤友三郎，美国在会上居主导地位。会议经过激烈争吵，通过了7项条约和多项决议案，主要内容有3项：美、英、日、法《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即《四国公约》，规定缔约各国相互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地区内岛屿属地与岛屿领地的权利，在本条约批准生效后，英、日同盟条约即终止。美、英、日、法、意《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国海军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的限额为，美、英各52.5万吨，日31.5万吨，法、意各17.5万吨，即五国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依次为5 5 3 1.75 1.75。与会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公约在形式上宣称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但对中国向会议提出的取消治外法权和势力范围、废除外国在华租借地、撤退外国在华军警、恢复中国关税自主等要求，一概未予解决。公约的核心是确认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侵略原则，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对象。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它在承认美国占优势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从而完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按照新的实力对比在一战后建立的国际关系新体系。

(段炳麟)

热那亚会议

(Renaya huiyi) 又称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讨论复兴欧洲经济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苏俄、英、法、意、比、日等29个国家。美国派观察员列席。这是苏俄建国后首次参加的国际会议，意味着资本主义大国出于经济需要事实上承认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代表团由列宁任团长，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任副团长。列宁虽未出席会议，但实际上领导了代表团的工作。契切林在大会发言中阐明了苏俄的对外政策，指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与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提出世界和平纲领与普遍裁军建议。英、法等国要求苏俄偿还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和地方当局所借的一切外债共184.96亿金卢布；归还已被收归国有的外国企业和财产，或给予相当的赔偿；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让外国人享有类似治外法权的特权；由协约国监督苏俄财政。对于帝国主义奴役苏俄的无理要求，苏俄代表团坚决拒绝。关于债务问题，苏俄代表团指出，战债是沙皇政府、临时政府为进行罪恶的战争而借的，何况俄国作为协约参战国，损失严重却并未索取分文赔偿，因此没有理由要求苏俄政府偿付战债；至于战前债务问题可由谈判解决。同时，苏俄代表团要求协约国赔偿由于武装干涉而给俄国经济造成的390.497亿金卢布的损失。双方各持己见，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最后决定在海牙召开专门委员会继续研究。海牙会议在1923年6、7月间召开，也未能达成协议。在热那亚会议期间，苏俄与德国单独签订了《拉巴洛条约》。

(段炳麟)

拉巴洛条约

(Labaluo tiaoyue) 全称《德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1922年4月16日在热那亚会议期间，苏、德两国代表在意大利热那亚近郊拉巴洛签订。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德国由于关于修改《凡尔赛和约》有关条款、减少赔款的要求被协约国列强拒绝，又被排斥于大会秘密会议之外，于是就转而从东方寻找出路。德国统治集团虽仇视苏俄，但与苏俄关系正常化，不仅会给德国的经济带来好处，也会有助于改善德国的国际地位。苏俄代表团遵照列宁指示，充分利用德国与协约国的矛盾，选择有利时机，建议举行苏、德谈判。4月16日，苏、德两国代表团会谈，签订了《拉巴洛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彼此放弃对战争费用及因战争损失而要求赔偿的权利；德国放弃它因在俄国的公私财产被苏维埃政府收归国有而产生的要求，但以苏俄不得满足其他国家的类似要求为条件；立即恢复两国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两国按最惠国原则发展彼此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条约的缔结突破了帝国主义妄图孤立、封锁苏俄的联合阵线，为苏维埃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树立了一个典范。

(段炳麟)

道威斯计划

(Daoweisi jihua)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处置德国赔款问题的计划。鲁尔危机造成的严峻经济形势以及英、美的压力，迫使法国同意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重新审查赔款问题。1923年11月30日，赔款委员会决定成立2个由美、英、法、意、比代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主持，研究稳定马克和平衡德国预算问题。1924年4月，该委员会向赔款委员会提出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方案，该方案于同年8月经协约国伦敦国际会议正式通过，史称道威斯计划。主要内容是：协助德国稳定金融，复兴经济，在此基础上索取赔偿。为此，先向德国提供8亿金马克贷款，主要由美国提供；对德国赔款总数和支付年限未加确定，只规定该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德国应支付10亿金马克赔款，以后逐年增加，从第5年起每年支付25亿金马克；赔款的主要来源是关税、间接税、铁路收入和工业税收；德国的国家预算、货币、对外支付及交纳赔款等均须受外国代表监督，监督权集中在赔偿事务总管手中。后来，由美国代表任此职。计划被双方接受。道威斯计划打击了法国的欧洲霸权，使德国赔款与美国贷款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加强了美国在欧洲事务上的作用，为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流入德国扫清了道路，从而为德国恢复经济大国地位和重整军备提供了条件。

(段炳麟)

洛迦诺公约

(Luojianuo gongyue) 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8个文件的总称。1924年以后，由于道威斯计划的援助，德国实力日增。法国深感威胁，要求维持《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领土和边界现状。德国亦试图调整对法关系，争取恢复大国地位。英、法、德等七国在美国支持下举行洛迦诺会议。公约于1925年12月1日在伦敦正式签字，其主要内容包括：洛迦诺会议最后议定书；德、比、法、意、英《相互保证条约》，又称《莱茵保安公约》，规定德、法、比互相保证德比、德法边界不受侵犯，遵守《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区非军事化的规定，英意充当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德比、德法、德波、德捷之间的《仲裁条约》，规定德国和比、法、波、捷用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的纠纷，每一组缔约国分别设立一个常设调解委员会处理双方面的问题；法波、法捷间的《保障条约》，规定在抵御遭受无端袭击时互相支援。公约保证德国与西部邻国的边界现状，对改善法、德关系，稳定欧洲局势有积极意义，但未给予德国与其东部邻国的边界以保证，即不约束德国向东扩张。公约签订的结果，使法国受到削弱，丧失作为战胜国对德国的制裁权，自身安全需要英、意的保证。德国是主要受益者，取得与法国平等的地位，为其恢复政治大国奠定基础。希特勒上台后，于1936年3月派兵进驻莱茵非军事区，并宣布不再受《洛迦诺公约》的约束，1939年4月正式宣布废止《洛迦诺公约》。

(孙平)

非战公约

(Feizhan gongyue) 全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亦称《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或《巴黎公约》。1928年8月27日签订。1927年，法国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希望把美国拉入某种防御同盟中，外长白里安倡议两国缔结一个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双边条约。同年12月，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建议改为多边条约，以避免卷入法国在欧洲的纠纷，树立美国“和平”形象。1928年8月27日，法、美、英、德、意、比、波、捷、日、印度等15国在巴黎签订《非战公约》。1929年7月24日正式生效，苏联、中国等国先后加入，至1934年5月签字国共达64个。公约规定签字国废弃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用和平方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和冲突。公约是帝国主义在维护和平口号下进行争夺的产物，但具有包含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准则的积极意义，具有反战号召力。由于帝国主义各国持有保留条件，公约本身未规定对违犯者的制裁办法，结果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

(孙平)

杨格计划

(Yangge jihua) 192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重新规定德国赔款问题的计划。因由美国银行家杨格主持制定，故名。1929 年初，德国提出因财政困难，无力执行道威斯计划，要求修改有关规定，得到美国支持。经协约国商定，1929 年 2 月由杨格为主席的专家委员会在巴黎开始工作，制定新的赔款计划。1929 年 6 月委员会通过杨格计划，经 1930 年 1 月海牙会议批准生效。计划规定：把德国应付的赔款总额缩减为 1139 亿马克，分 59 年付清；取消对德国财政经济的国际监督，由新成立的美国操纵的国际清算银行处理赔款的一切事宜。计划制定后仅 4 个月，1929 年 10 月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德国财政面临崩溃的危险。1931 年 6 月，美国总统胡佛宣布，赔款和国际债务延期支付一年。德国此后不再支付赔款。杨格计划夭折。

(孙平)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yijiuerjiu — yijiusansannian zibenzhuyi shijiejingji weiji) 又称 30 年代大危机。迄今为止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破坏最严重、影响程度最深的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的私人占有形式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旧的经济体系，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对缩小，加之大战后科技的发展和资本集中垄断程度的提高，使生产和消费之间、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状态加深，导致大危机的爆发。以 1929 年 10 月 29 日美国纽约股票市场价格暴跌为开始标志。危机具有如下特点：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继而波及德国，袭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论是工业国还是农业国，宗主国还是殖民地，无一幸免；对各国经济的打击空前严重，美国最重、德国次之、英国较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 40%，损失达 2500 亿美元，失业人数最多时达 3500~4000 万；农业危机、信贷货币危机与工业危机同时爆发，相互交织，世界贸易额锐减；持续时间长达 5 年，危机结束后未见经济复苏，进入“特种萧条”阶段，至 1937 年新的经济危机再次到来。大危机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激化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资本家把危机的后果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人民群众的斗争接连不断。帝国主义者加强对殖民地的掠夺，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国家各自以邻为壑，展开关税战、货币战和市场战，使世界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为对付危机，美、英、法等国在维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之开始形成制度，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主要代表；德、日等国法西斯势力上台，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孙平)

法西斯主义

(Faxisi zhuyi)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鼓吹种族主义、专制独裁和侵略扩张的政治理论、运动和政权形式。最先由意大利墨索里尼提出。“法西斯”一词源于拉丁文，原指古罗马官吏出巡时由其扈从所执的权力标志棒，象征强权和暴力。法西斯主义否定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思想，鼓吹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和国家主义，宣称“高贵”民族有统治“劣等”民族乃至全世界的权利，融种族主义历史观和专制暴力哲学于一体，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建立少数独裁者的恐怖统治，镇压劳动人民和进步势力，实行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及意识形态全面危机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和德国分别出现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又称喝棒党、黑衫党）和希特勒的纳粹党，先后于1922年、1933年建立法西斯专政。日本亦于30年代法西斯化。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阿根廷等国也推行过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泛滥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最终通过反法西斯战争被世界人民埋葬。

(孙平)

国际裁军会议

(guoji caijun huiyi) 1932年2月至1934年6月国际联盟主持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减军备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限制对手的军备，掩盖自己的扩军备战的事实，欺骗人民群众，纷纷提出裁军口号。国际联盟盟约亦规定会员国应将军备减少到最低限度。根据国联决定成立的国际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自1926年5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会上帝国主义斗争激烈，经过六次会议才于1930年通过一裁军方案最后报告书。1932年2月2日，国联主持的裁军会议在日内瓦正式开幕，共有包括非国联成员国美苏在内的60余国参加。会上各大国都提出自己的方案，力图加强自己，削弱对方的军事实力，尤以法、德矛盾突出。至1933年6月，会议才接受英国提出的《麦克唐纳计划》作为未来裁军协定的基础。会议进行期间，德、日已走上法西斯化道路，国际局势恶化。1933年10月，德国退出裁军会议。1934年6月11日，在帝国主义激烈的军备竞赛中，裁军会议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而宣告结束。

(孙平)

共产国际七大

(Gongchan guoji qida) 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亦是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30年代上半期，法西斯势力日益成为世界人民的主要威胁，迫切需要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等政党联合起来，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法西斯。为适应这一变化，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以确立新的战略和策略路线。65个党的5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所作的《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及大会据此通过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揭露了法西斯的阶级本质，呼吁各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法西斯，制止战争爆发，要求各国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并联合其他民主阶层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要争取建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决定，鉴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各国具体情况又极为不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党内部组织的事务”。大会实现了共产国际的重大策略转变，纠正了“左倾”宗派主义错误，对推动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孙平)

绥靖政策

(suijing zhengce) 专指在国际关系中对侵略者采取姑息纵容、让步妥协，以牺牲他国利益去满足侵略者欲望，谋求自身安全、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在德、意、日法西斯疯狂侵略扩张面前，英国、法国、美国都推行过绥靖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主要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一直一蹶不振，政府财政极其困难，被迫紧缩国防开支，军事力量屠弱，尽力避免在国际上采取军事对抗政策。国内存在着强大的和平主义思潮，执政党为争取选票亦鼓吹“和平”。因此，当德国重新走上侵略战争道路时，英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企图靠牺牲中、东欧弱小国家和苏联，来把德国扩张矛头从自己身边引开。1937年5月，张伯伦上台后，不仅继承了前任政府的绥靖政策，而且使之登峰造极。法国经济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长期处于萧条状态不能复苏，国防费用减少，军事实力落后于德国。为了其既得利益，法国在30年代后半期放弃同小协约国、苏联的合作，和英国一道对德采取绥靖政策。30年代初起，美国公众主要关注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就业问题，对国际事务普遍不感兴趣，孤立主义势力再度崛起。在法西斯侵略尚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欧洲政治事务采取中立政策。在英、法、美默认和纵容之下，1935年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进军莱茵非军事区，1936—1939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绥靖政策达到了顶点。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自食其果，被迫卷入战争。1940年5月，德国进攻西欧，张伯伦下台，标志着绥靖政策彻底破产。在东方，“九·一八事变”后，西方一些国家对日本也实行绥靖政策。“七·七”事变之后，尤其是日军占领武汉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与日本之间曾几次酝酿以牺牲中国求得相互妥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揭露和斗争，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出卖中国利益的阴谋均未得逞。

{ewc MVIMAGE,MVIMAGE, !99900320_0509-1.bmp}

(金相春)

中立法

(Zhonglifa)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初期先后通过的几个避免卷入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法案。30年代大危机使美国主要关注国内经济问题，对国际事务参与不多，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占上风，主张在法西斯侵略面前退守美洲，置身于欧洲之外以自保。1935年8月31日，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中立法”，禁止向一切交战国输出武器。不久该法即适用于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但美国仍向意大利输出原料和战略物资。1936年2月，国会对该法进行修改，增加禁止贷款给交战国和武器禁运不适用于拉丁美洲等内容。德、意发动对西班牙内战的武装干涉后的1937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三个“中立法”，使武器禁运适用于发生内战的国家。这三个中立法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而不对被侵略者提供援助，纵容了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9年10月底至11月初，在罗斯福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新中立法，取消武器禁运条款，改为“现款自运”。因英国海上运输发达，又有强大的海军，新中立法有利于英、法而不利德国法西斯势力。它的通过表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即在不直接参战的前提下尽可能援助反法西斯国家。1941年通过的租借法案彻底取代了中立法。

(孙平)

不干涉政策

(buganshe Zhengce) 英、法、美等国对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采取的纵容法西斯侵略的政策。1936年7月起，德、意公开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构成对英、法两国潜在的威胁。但英、法统治者敌视西班牙革命，害怕被其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序幕的人民阵线运动蔓延欧洲，遂以避免世界性冲突为借口，采取对西班牙事务“不干涉”的政策。1936年7月25日，法国政府宣布中立。8月15日，英、法两国互换照会，保证不向西班牙及其属地输出武器及军事物资。不干涉政策开始正式生效。到9月3日，共有27个国家缔结了《不干涉协定》。协定规定禁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和军用物资，禁止西班牙各派力量购买的武器过境。为了监督协定的执行，9月9日在伦敦成立了“不干涉委员会”，由英国代表任主席。美国未加入协定，但奉行的政策与英、法相同。德、意两国虽加入协定，却根本不予执行，继续向西班牙叛军提供援助。不干涉政策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广义亦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美采取的牺牲弱小国家，姑息纵容法西斯侵略，维护自身利益的政策。

(孙平)

反共产国际协定

(Fangongchan guoji xieding) 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缔结的表面反对共产国际、实际针对苏联的政治同盟协定。德、日走上法西斯道路后，为了与英、法、美等国抗衡，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急欲在国际上寻求盟友。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协定规定两国对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紧密合作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协定的秘密附件还规定当缔约一方同苏联作战时，另一方不得采取有利于苏联的措施，双方不同苏联缔结与该协定精神相违背的任何协定。随着德、意关系的接近，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亦加入该协定。协定是针对苏联的，也是在“反共”旗号下针对英、法、美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它的签订标志着轴心国侵略同盟初步形成。后匈牙利、伪满洲国、西班牙等相继加入。

(孙平)

德奥合并

(de ao hebing) 1938年3月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事件。吞并奥地利是德国法西斯蓄谋已久的战略目标。1934年7月，即希特勒上台第二年就策动奥地利纳粹分子发动暴乱，刺杀奥地利总统陶尔斐斯，图谋夺权。政变遭英、法、意反对而未能得逞。希特勒并未到此罢休，继续一方面大力资助奥地利纳粹分子，加紧恐怖活动，一方面利用意与英、法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矛盾，拉拢意大利。1937年6月，德国制定武装入侵奥地利的“奥托计划”。同年11月，希特勒在与张伯伦亲信哈里法克斯会谈中完全摸清英、法默许合并的态度。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把奥总统许士尼格召到伯希特斯加登，以军事威胁逼迫许士尼格在一份最后通牒式文件上签字。文件内容包括：取消对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释放纳粹分子；任命纳粹分子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任命亲纳粹分子汉斯·菲许包克和格拉斯·霍克斯特璠为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德、奥有步骤地交换100名军官；做好使奥地利纳入德国经济体系的准备。16日，奥地利政府改组，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并宣布大赦纳粹罪犯。在亡国危机面前，奥地利人民举行游行集会，发动大规模签名运动，反对德国侵略和政府的卖国政策。3月9日，在人民群众压力下，许士尼格宣布3月13日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国家前途。3月11日凌晨，希特勒下令实施奥托方案，20万德军向奥地利边界集结。同日他向奥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取消公民投票，由赛斯—英夸特担任总理。奥被迫接受。12日凌晨，德军越过边界，一枪未发占领了整个奥地利。13日，赛斯—英夸特在德炮制好的《奥地利同德国重新统一法》上签字，正式宣布德、奥合并。奥地利成为德国东方省，赛斯—英夸特任省长。德、奥合并使德国领土扩大17%，人口增加10%，军事实力大为增强，为下一步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进攻波兰打开了通道。

(金相春)

苏台德事件

(Sutaide shijian) 1938 年法西斯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西北边疆苏台德地区的事件。苏台德区与德国接壤，居住 300 多万的日耳曼人。1933 年 10 月，根据纳粹党指示，成立以汉莱因为首的苏台德日耳曼人党，实际为希特勒在苏台德的“第五纵队”。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希特勒立即指示汉莱因，要他提出捷政府无法接受的要求，以便挑起事端，为侵捷制造借口。1938 年 4 月，汉莱因提出苏台德区完全“自治”的要求。遭到捷政府拒绝后，同年 5 月希特勒向德捷边界集结军队，以发动战争相要挟。5 月 20 日，捷政府为捍卫国家独立，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实行局部动员，40 万后备军应征入伍，准备抗击德国入侵。德、捷边境形势骤然紧张，出现了“五月危机”。英、法权衡当时形势的利弊，向德提出警告。苏联表示坚决支持捷。希特勒看到国际局势对其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5 月 26 日，希特勒命令汉莱因恢复同捷政府的谈判，还声称德对捷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五月危机”暂时缓和。但另一方面希特勒却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令，最迟在 1938 年 10 月 1 日将“绿色方案”付诸实行。1938 年 9 月，《慕尼黑协定》签订，英、法出卖捷克。10 月初，德夺取苏台德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区归还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遣返德国。

(金相春)

慕尼黑会议

(Munich huiyi)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区领土给德国的会议。1938年“五月危机”暂时得到缓和后,德国的既定战略方针未变,侵捷准备加快。英、法亦加紧出卖捷的活动。5月26日苏台德日耳曼人党头目汉莱因奉希特勒之命,恢复了与捷政府的谈判。不仅德国给谈判施加压力,英、法也劝告捷接受汉莱因的要求。9月5日,捷总统贝奈斯表示同意给苏台德日耳曼人以广泛的自治权力。希特勒恐失去侵捷借口,一面指示汉莱因中断谈判,一面叫嚣德国不能容忍捷现状继续下去。汉莱因逃到德国,宣布唯一解决办法是将苏台德割让给德国。汉莱因分子乘机在苏台德发动武装骚乱。捷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并宣布边境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希特勒立即召回驻捷公使,在边界集结军队。局势再度出现危机。英、法节节退让,不惜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以避战求和,并企图将祸水东引。在英首相张伯伦要求下,1938年9月29日晚在德国慕尼黑举行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议。翌日凌晨签订《慕尼黑协定》。协定基本上是会前德国起草的建议书,规定将苏台德地区和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边境地区割让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10月1日至10日之间,从上述地区撤退完毕;上述地区一切设备不得破坏,无偿移交给德国。“协定”附件中还规定,由四个签字国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捷代表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协定签字后才把捷代表召到会议厅,向他们宣布协定内容,并声明不容讨论,须立即遵照执行。捷政府被迫在德限定的6小时内接受了协定。1938年10月1日,德军开始占领苏台德地区及其他住有日耳曼人地区。10月6日,德国策动斯洛伐克宣布“自治”。翌年3月15日,德军开进布拉格,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把捷克斯洛伐克改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区”,纳入德国版图。“慕尼黑协定”并没有保证捷克斯洛伐克新国界的安全,也没有制止住希特勒的武装侵略,反而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金相春)

英法苏三国谈判

(ying fa su sanguo tanpan) 1939年4—8月间英、法、苏三国为商讨共同制止法西斯德国侵略而举行的谈判。希特勒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后，把侵略矛头指向波兰。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在即。1939年3月，苏联建议召开英、法、苏、波、罗、土等国参加的会议，讨论如何共同制止希特勒侵略。英先以为时尚早为理由拒绝，后迫于形势与社会舆论压力同意。谈判于4月15日在莫斯科开始。第一阶段为关于缔结三国互助条约的政治谈判。英国首先提出不平等的建议，要求当苏联的欧洲邻国（包括已与英、法结盟的波兰和罗马尼亚）遭到侵略时，苏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却不提英、法对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承担义务。苏联提出反建议：三国缔结为期5—10年的盟约，任何一缔约国在欧洲遭受侵略时，其他缔约国须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如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国家遭受侵略时，三国应立即提供一切援助；三国应在短期内确定在上述情况下进行援助的规模和方式。英、法对苏这一体现平等原则的建议迟迟不予答复，至7月1日才基本接受，但拒绝在波罗的海国家受到间接侵略时给予援助。谈判陷入僵局，经苏建议，转入军事谈判。英、法采取拖延态度，使谈判至8月12日才得以开始，并在谈判中空谈军事合作的“目标原则”，回避具体军事计划，不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施加影响以使其同意一旦发生战争后允许苏军过境对德作战。由于英、法继续对德姑息纵容，在三国谈判中消极推诿，遂使谈判于8月21日破裂。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金相春）

苏德条约

(Sude tiaoyue) 1939年8月23日,苏、德在莫斯科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在希特勒为避免两线作战,迫切需要入侵波兰时苏联保持中立,苏联亦因英、法、苏三国谈判破裂退而求自保的情况下签订。正文共有7条,主要内容有,双方保证彼此间不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的纠纷;条约有效期为10年,除非缔约一方在期满前一年通知废止,条约被认为自动延长5年。二战后,西方公布该条约附加秘密协定书,主要内容为划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秘密协定书规定,立陶宛北部疆界为苏德在波罗的海地区势力范围的界线;两国在波兰势力范围大体以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一线为界;在东南欧,苏关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宣布在该地区无利害关系。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苏暂时解除对英、法祸水东引的忧虑,赢得一个短暂和平时期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但它表明苏放弃了同西方民主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努力,使希特勒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为德国发动世界大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条约对欧洲势力的划分暴露了苏联大国主义的倾向。

(金相春)

联合国

(Lianheguo)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最大的最有影响的世界性国际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普遍希望战后建立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美国亦企图利用这样一个组织在世界上取得“领导地位”。经过美、英、苏三国多次磋商，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50个国家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国际会议，讨论通过了《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这一天即为“联合国日”。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促进国际间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作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其基本原则为：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忠实履行宪章义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侵害他国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平共处。总部设在纽约，主要机构有：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每年定期举行一届例会，重要问题的决议需要有会员国2/3多数票通过。安全理事会是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由美、苏、英、法、中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秘书处设秘书长一人，为联合国行政负责人。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经安理会推荐，由大会2/3多数票通过。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由于美国的阻挠，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才得以恢复。联合国成立后至50年代中期，被美国操纵利用，后一度为美、苏争霸进行政治交易的场所。7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加入，逐渐改变受少数大国操纵的局面，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讲坛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场所。至1985年共有会员国159个。在缓和国际冲突，防止世界紧张局势，加速非殖民化，促进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福利的发展与交流，进行对话与磋商等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也有缺陷和局限性需要改进。

(杨宁一)

富尔顿演说

(Fuerdun yanshuo) 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反苏、反共演说。又称铁幕演说。1946年1月，丘吉尔应邀访美。3月5日，他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在演说中公开攻击苏联“扩张”，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美国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应担负起未来的责任。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富尔顿演说后不到10天，斯大林发表谈话，严厉谴责丘吉尔和他的朋友非常象希特勒及其同伴。演说是杜鲁门借他人之口发表的“冷战”宣言，是美国发动“冷战”的前奏曲。

(金相春)

冷战

(Lengzhan)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除直接武装进攻外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敌对活动和实力对峙局面。“冷战”一词，由美国政治家赫伯特·斯沃普于1946年初为美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起草演说稿中首先使用，称美国处在“冷战方酣之中”。1947年9月，美国政治评论家李普曼出版小册子《冷战》。此后，冷战一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企图称霸世界。苏联则以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与之针锋相对，并决不让美国染指苏联直接影响的范围。美国把苏联视为实现霸权的唯一障碍。美、苏由战时同盟变为敌对关系，但双方都不愿也不敢放手一战。因此出现冷战局面。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笼为冷战开始的标志。50年代中期以前为冷战高潮阶段。美国为了“遏制”苏联，抛出“马歇尔计划”，组织“北约”集团。对此，苏联成立“欧洲共产党九国情报局”、“经互会”和“华约”集团与之对抗。除在欧洲形成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外，冷战亦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展开。美国利用冷战，加强对广大中间地带的控制。第一次柏林危机是这一时期全面冷战的顶峰。在冷战中发生局部热战即朝鲜战争。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是由全面冷战走向部分缓和的阶段。由于冷战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反对，也未能达到削弱对方的目的，从1955年“奥地利国家条约”签订开始，美、苏之间出现让步、妥协趋向。1955年7月，美、苏、英、法首脑举行自波茨坦会议以来的第一次四国最高级会议。美、苏首脑于1959年9月举行戴维营会谈，1961年6月又举行维也纳会议。全面对峙逐步转向对话，苏、美谋求合作主宰世界，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但冷战仍然存在，出现过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冷战冲突。70年代以来进入全面缓和时期。美国是冷战的主要挑起者，许多国家先后被卷入，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

(金相春)

杜鲁门主义

(Dulumenzhuyi) 1947 年 3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的谋求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纲领。1947 年 2 月，英国向美国提交照会，声称因经济困难，3 月 31 日后，无法再给希腊、土耳其以经济军事援助，并决定届时从希腊撤出英军；鉴于希、土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希望美国承担援助义务。这是美国夺取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战略要地，把自己势力范围推进到苏联东欧边界的极好时机。3 月 12 日，杜鲁门向国会宣读咨文，宣称共产主义“危害自由世界和美国的安全”，美国负有帮助某些国家复兴的使命，采取果断措施去填补真空是美国的责任；要求在 1948 年 6 月 30 日前向希、土提供 4 亿美元紧急援助，并选派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以此“抵制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杜鲁门提出的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1947 年 7 月，美与土签订《关于援助土耳其协定》，美国向土提供大批军事物资，并在土建立海、空军基地。1948 年 10 月，希腊革命被美、希反动派所扼杀。杜鲁门主义最初援助对象是希、土两国，其后扩大到西欧及其他地区。“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杜鲁门主义在经济、军事方面的直接产物。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杜鲁门公开宣称所有地方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第一次把“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美国基本国策公之于世。它打着“反共”旗号，在世界一切地方同苏联对抗，争夺和控制处于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是美、苏战时同盟正式破裂、冷战正式爆发的重要标志。

(金相春)

马歇尔计划

(Maxieer jihua) 亦称《欧洲复兴方案》。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说中提出的美国援助欧洲的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经济困难，政局动荡，而美国生产严重“过剩”。马歇尔在演说中指出欧洲经济濒于崩溃，希望欧洲各国联合起来，主动向美国提出要求援助的倡议，美国则愿尽力给予“援助”。演说受到西欧各国热烈欢迎。7月12日，英、法、意、奥、比、荷、卢等16国在巴黎召开欧洲经济会议，苏联、东欧国家拒绝参加。会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9月22日，该委员会签署总报告，向美国提出4年内提供224亿美元援助的要求。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1948年对外援助法》，次日经杜鲁门签署生效，计划正式执行。根据该法，美将在头15个月内拨款53亿美元，不确定4年援助总额，以后逐年审批援助额。美政府把款项拨给为管理马歇尔计划专门设立的经济合作署，由该署向美国企业采购西欧所需物资，然后输送给受援国。到1952年6月30日，美国共提供131.5亿美元，马歇尔计划结束。马歇尔计划使西欧摆脱困境，经济得到恢复，为美国过剩产品找到出路，加强了美国对西欧的控制，增强了以美国为盟主的遏制苏联的力量，是美国冷战政策在经济上的表现。

(金相春)

欧洲共产党九国情报局

(Ouzhou gongchandangjiuguoqingbaoju)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协商机构。1945年，南共领导人铁托向斯大林建议，在各国共产党间建立国际性协商机构。斯大林表示赞成。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笼，美、苏之间“冷战”正式开始后，苏共中央于同年夏写信给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请他出面召集欧洲一些国家共产党的会议，讨论加强各党之间联系问题。波党接受。1947年9月22-27日，在波兰举行情报局成立会议。苏、波、南、罗、匈、保、捷、法、意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出席会议。成立情报局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争取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交流经验，协调和统一各国党的行动。其决议对各党无约束力。总部初设在贝尔格莱德，后迁往布拉格。出版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情报局从成立到1956年4月解散，共存在8年零7个月。情报局在反击美国“冷战”政策、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等方面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在苏联直接控制下，背离成立宗旨，按照苏联意图部署各国党的行动计划，作出一些粗暴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决定。尤其是情报局成立第二年，利用集体制裁手段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情报局实际成为苏推行大党大国主义、压制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工具，对国际共运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

(金相春)

苏南冲突

(su nan chongtu) 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导致关系破裂的争执与冲突。苏、南两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存在分歧。苏联承认南流亡政府而对南共领导的临时政府不甚支持，未与南共商议与英、美就南斯拉夫有关问题达成协议。战后初期两国摩擦加深。苏共以领导党自居，干涉南内政，要求南照搬苏联模式，批评南在外交上下与苏磋商。两国经济关系不够平等互助。南共对此有所抵制。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3—5月，两党交换信件，阐述各自观点。苏共指责南共反苏，背离马列主义，放弃党的领导作用，低估苏联经验，奉行机会主义理论，声称间谍内奸充斥于南党政机构内。南共进行反驳，表示了该党遵循马列主义，学习苏联的榜样，坚持独立自主，以略有不同的方式发展本国社会主义的立场。经苏联提议，6月20—28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在南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通过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严厉抨击南内外政策，宣布将其开除出情报局。1949年，苏联与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的关系。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是苏、南冲突的根本原因。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南，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国关系正常化。

(杨宁一)

巴勒斯坦问题

(Balesi tan went i)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并不断扩张导致阿以冲突而引起的国际问题。巴勒斯坦地区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其最早的居民是迦南人。公元前 12—11 世纪，犹太人进入并建立国家，后灭亡。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该地区长期为阿拉伯人的居住地。19 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在英国等国的支持下，犹太人大批向巴勒斯坦移民殖产，引起阿、犹民族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利用其向中东扩张取代英国。阿犹矛盾尖锐。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通过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规定在该地区分别成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次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爆发战争即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果阿拉伯国家战败。以色列乘机扩张领土，大批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沦为难民。此后，阿拉伯人民为捍卫民族生存权利，与以色列的侵略扩张进行了长期斗争，阿、以之间又爆发过四次中东战争。大国不断插手中东，使巴勒斯坦问题更加复杂，一直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杨宁一)

中东战争

(Zhongdong zhanzheng)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扩张主义在中东地区进行的战争。中东一词源于欧洲人根据距离远近对东方部分地区的称谓，无严格界线，现一般指欧、亚、非三洲连结的地区。中东战争共五次。 巴勒斯坦战争。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的支持下，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在巴勒斯坦地区成立“以色列国”。次日，战争爆发。初期，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五国军队联合进攻取胜，以军败退。后以色列得到美国大量军援，借联合国停火决议休整备战，尔后大举反扑。阿拉伯国家内部分歧加剧，作战失败。1949年2—7月，以色列分别与各交战国签订“停火协定”。以色列通过战争控制了4/5的巴勒斯坦土地，100多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失去家园，沦为难民。 苏伊士运河战争。1956年7月，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唆使以色列于10月29日侵入埃及的西奈半岛。10月31日，英、法借口“保护运河”，入侵埃及，轰炸开罗，进攻塞得港。在埃及人民的英勇抵抗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加之美国企图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亦反对英、法出兵，使英、法陷入孤立，被迫于11月6日停火。英、法和以色列军队分别于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撤出埃及。 “六·五”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后，阿、以仍处于紧张对峙状态，美、苏加紧对中东的争夺。1967年6月5日晨，以色列空军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进行突然袭击，掌握了制空权，随后发动地面攻势。埃及等国轻信美、苏诺言，对以的冒险进攻估计不足，防备松懈，损失惨重，第一天就被击毁飞机300余架，被迫同意停火。此战仅六天，以色列占领了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等地区共6.5万平方公里土地，使50万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 十月战争，又称斋月战争或赎罪日战争。为了收复失地和打破超级大国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局面，埃及和叙利亚于1973年10月6日向以色列发动进攻。该日是伊斯兰教的斋戒日和犹太教的赎罪日。按犹太教教规，此日不得进食喝水，应虔诚祈祷。下午2时，埃、叙全线进攻，突破以军的“巴列夫防线”，分别收复部分失地。巴勒斯坦游击队在以后方配合作战。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以石油为武器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美、以受到沉重打击。10月16日，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反击得手，偷渡苏伊士运河，切断埃军补给线。10月22—24日，双方同意停火。此后，埃以逐渐实现和解。 黎巴嫩战争。1982年6月6日，以色列侵入黎巴嫩，占领其1/4领土，攻陷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大部分基地，围攻巴解组织总部所在地贝鲁特西区，摧毁叙利亚部署在贝卡谷地的导弹基地。巴解游击队被迫撤离贝鲁特，分散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8个阿拉伯国家。

(杨宁一)

柏林危机

(Bolnweiji)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围绕德国问题出现的冷战高潮。曾发生两次。 第一次柏林危机。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包括柏林)。1947年后，美国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1948年2月美、英、法、比、荷、卢六国在伦敦召开会议商谈成立独立的西德政府。苏立即采取对策，3月20日，宣布退出盟国对德管理委员会；30日，通知美方，从4月1日起，苏方将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美国人证件，检查所有货运和除私人物品外的所有物品。6月21日，美、英、法根据“伦敦会议”的决定，在德境西占区(包括西柏林)实行币制改革，企图割断西占区与苏占区的经济联系，正式分裂德国。次日，苏联决定苏占区也实行币制改革，发行“D”记新马克，并从24日起全面切断西占区与柏林之间水陆交通和货运。美派出大量飞机对西柏林空运煤、粮食和日用品，英、美、法加强对苏反封锁。局势虽紧张，但美、苏都未决心走向武装冲突。经过秘密谈判，1949年5月12日双方取消一切交通封锁。5月23日在巴黎召开苏、美、英、法外长会议，讨论德国和柏林问题。持续近一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暂告结束。这次危机加速东、西德国最终形成。 第二次柏林危机。1955年5月《巴黎协定》生效后，柏林问题又成为美、苏争夺欧洲的焦点之一。1958年11月，赫鲁晓夫提出要把西柏林变成联合国管辖的“自由城市”，限定美、英、法在半年内撤出西柏林驻军，否则苏军单独与东德签订和约，把进入西柏林的通道交给东德管理。美国毫不退让。不久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谈上让步。1961年6月初，赫鲁晓夫与肯尼迪毫无成果的维也纳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又照会西方，提出与1958年11月相同的要求。8月13日，苏联与东德沿东、西柏林分界线及西柏林与东德其他交界处筑起“柏林墙”，封锁边界，切断往来。西方对此提出抗议，美国增派部队开进西柏林。双方剑拔弩张，相继在东、西德进行军事演习。持续近3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达到高潮。美国态度强硬，表示不惜一战。赫鲁晓夫再次撤回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冻结了德国和西柏林问题。此次危机以苏联的妥协退让而宣告结束。苏、美关系得以再次缓和。

(金相春)

经互会

(Jinghuhui) 全称《经济互助委员会》。1949年苏、罗、捷、保、匈、波六国在莫斯科成立的国际经济组织。战后初期，苏联东欧都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1945—1946年间，苏联与东欧一些国家签订一系列经济合作协定。1947年6月马歇尔计划出笼后，为抵制该计划，巩固东欧阵地，苏进一步加强与东欧各国间的经济合作。1947年7—8月间，苏与保、捷、匈、波、罗等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即《莫洛托夫计划》。在此基础上，1949年1月，上述六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基本任务是：会员国间进行经济合作；交流经济经验；相互给予技术援助；在原料、粮食、机器装备等方面相互协助。主要组织机构有经互会会议、执行委员会、计划工作合作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及若干专业性常设委员会。总部设在莫斯科。经互会的成立标志着欧洲经济上的分裂。此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加入。它们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加入，1961年退出）、民主德国（1950年）、蒙古（1962年）、古巴（1972年）、越南（1978年）。目前共有10个成员国。南斯拉夫、老挝、朝鲜、安哥拉等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一些会议。中国代表于1956—1961年曾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例行会议。其经济合作经历了进行商品交换和科技资料交换、推行生产的“国际分工”、实行“经济一体化”三个发展阶段。经互会对打破西方经济封锁、促进各成员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到苏联的控制，苏联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关系不够平等。

(金相春)

北约组织

(Beiyue zuzhi) 全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4月美、英、法、荷、比、卢等12国在华盛顿成立的政治军事集团组织。1952年2月土、希加入，1955年5月西德加入，1982年5月西班牙参加。现有16个成员国。冷战爆发后西欧深感没有美国的力量无法与苏联、东欧抗衡，想同美国建立大西洋安全体系。美国亦想利用西欧的“恐苏症”实现对西欧的全面控制，进一步“遏制”苏联、东欧。1949年4月4日，美、英、法等12个国家的外长正式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公约规定：缔约国实行集体武装防务；协商共同行动；缔约国中一国或数国受到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的攻击；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武力的使用，协助被攻击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公约于1949年8月24日开始生效。公约签订后，先后建立各种组织机构，主要有“部长理事会”，由各国成员国外交、国防、财政部长组成，是北约组织最高权力机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常任代表理事会”，由成员国驻布鲁塞尔大使组成，部长理事会休会期间负责日常事务；“军事委员会”，由各成员国参谋长组成，协助部长理事会办理军事事务，是北约组织最高军事机构。军事委员会下属重要机构是“常设（军事）委员会”，总部设在五角大楼，有三个直属司令部，即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大西洋盟军司令部和海峡司令部。其中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为最主要作战机构，最高司令历来由美国将军担任。北约的建立，标志着美国推行遏制苏联，控制欧洲，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部署已初步完成。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加紧推行霸权主义，北约组织成为美国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金相春)

朝鲜战争

(Caoxian zhanzheng) 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争，又称朝鲜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两个朝鲜形成后，在美国支持下，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企图武力侵占朝鲜北部。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之间爆发战争。美国立即宣布参战，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组织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6月25日至9月15日为战争第一阶段，朝鲜人民军击退越过三八线进犯的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6月28日解放汉城，到9月上旬解放了朝鲜南部90%以上的土地和人口，把敌人压缩在洛东江一线。9月15日，美国调集兵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同时在洛东江一线增强兵力转入反攻，企图合围朝鲜人民军，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北撤。10月初，美李军越过三八线，侵入朝鲜北部，攻占平壤，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威胁中国的和平与安全。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赴朝参战，战争进入第三阶段。至1951年6月，中朝军队并肩作战，连续取得了五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共歼敌23万，将美李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美国军事失败，内外交困，被迫于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开始进行停战谈判。谈判期间，美国企图以谈判掩盖军事进攻，以军事压力迫使中朝在谈判中屈服，多次进行反扑。朝中方面针锋相对，粉碎敌人的进攻，并于1953年6月取得金城反击战的胜利，歼敌12万，迫使美国于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之一，美国投入了1/3的陆军，1/5的空军和1/2的海军。美李军及仆从国军队损失156万兵力（美军伤亡45万）和1.2万架飞机、560艘舰艇、3200辆坦克，耗费1650亿美元军费，仍以失败告终。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军司令克拉克承认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美国报刊认为，这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朝中人民的胜利粉碎了美国霸占整个朝鲜、侵略中国的阴谋，戳穿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杨宁一)

社会党国际

(Shehuidang guoji) 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及其他政党的国际联合会组织。由英国工党发起，于 1951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会议上宣告成立。为成员党加强联系，交换情报和经验，表明共同立场的组织，其决议对成员党无约束力。纲领为民主社会主义，宣称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多党制和分权主义，提出以民主方法建立“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和“民有、民治、民享”的目标。成员分四种，正式成员党和兄弟党组织享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咨询党和联系组织有发言权，无表决权。至 1983 年 4 月，共有 49 个正式成员党，17 个咨询党，3 个兄弟党组织和 8 个联系组织，欧洲党居多。一些成员党曾为国内执政党。

(杨宁一)

旧金山和约

(Jiujinshan heyue) 全称《旧金山对日和约》。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操纵下部分国家与日本签订的片面和约。日本投降后，美军单独占领日本，使之成为美国称霸亚太地区的重要基地。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日本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但长期霸占日本不仅会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而且还会激起日本人民反美运动的高涨。因此，美国策划对日片面媾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加快对日媾和步伐。1951年9月4—8日，在旧金山召开包括日本在内的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媾和会议。美国未邀请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大的中国、朝鲜参加。印度、缅甸、南斯拉夫虽被邀请，但未派代表出席。参加会议的苏、波、捷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条约共7章27条，主要内容有：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日本同意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等交美国“托管”；各盟国承认日本是一个主权国家；盟国占领军应尽早撤出日本，但外国武装部队可依照同日本缔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在日本领土上驻扎或驻留。同一天，美、日签订《日美安全条约》，规定美军有权在日本领土及周围驻留。翌年2月28日，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第三条规定，在东京签订《日美行政协定》。《协定》规定：日本应向美国提供海、陆、空军基地，向驻日美军提供航空管理、铁路、通讯、电话、气象等业务所必要的设施，分担驻日美军的军事费用，驻日美军成员、文职人员及其家属享有治外法权。《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于1952年4月28日同时生效。上述条约和协定宣告了美国对日本全面军事占领时期结束，日本取得主权国家地位，确立起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日、美特殊关系。

(金相春)

亚非会议

(Ya feihuiyi) 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也称万隆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国家相继独立，面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联合发起召开此会议。宗旨为促进亚非国家的合作与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24个国家接受邀请，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帝国主义妄图加以破坏阻挠，制造舆论，施加影响，挑拨与会国之间关系，并利用台湾特务在中国代表团包乘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放置定时炸弹，致使飞机中途爆炸，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遇难。会议于1955年4月18—24日举行。在全体会议的发言中，少数与会国代表背离会议宗旨，提出亚非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反对共产主义”，借口“颠覆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影射攻击中国。19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分发的书面发言外进行补充发言，针对帝国主义的阴谋，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指出亚非国家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在反对殖民主义问题上有共同基础，应该互相了解、尊重、同情和支持，表示中国是为了求同而不是为了求异而来的，并就宗教信仰等有关问题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发言受到各国与会代表的赞扬，求同存异方针被普遍接受。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的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分“经济合作”、“文化合作”等7部分，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宣布一切国家的人民享有自决的权利，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独立斗争，倡导以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十项原则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强调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号召亚非国家发展全面的经济与文化合作。会议体现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殖，争取与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起到推动亚非人民联合反帝反殖的作用。会议为第三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

(杨宁一)

华约组织

(Huayue zuzhi) 全称华沙条约组织。1955年苏、保、匈、罗、波、捷、阿、东德在华沙成立的政治军事集团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苏联为对付美国扩张威胁，与东欧各国加强政治军事合作，先后签订一系列友好合作条约。1947—1949年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也签订类似双边协定。1954年10月23日，美、英、法等西方九国签订《巴黎协定》，同意西德加入北约集团。同年11月29日—12月2日，苏联和东欧共8国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会议，会议宣布：爱好和平的国家不得不联合起来，对抗西方军事集团的侵略势力；一旦巴黎协定被批准，与会8个国家将建立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翌年5月5日，《巴黎协定》正式被批准，西德正式参加北约组织，以美为首的西方军事集团最终形成。5月11日—14日，苏联等8个国家在华沙举行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第二次会议，签订《华沙条约》。条约规定：当缔约国遇到武装进攻时，各缔约国应以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给予援助；缔约国就一切有关它们共同利益的重要国际问题彼此进行磋商；缔约国不参加与华约相反的任何联盟或同盟，不缔结与条约相反的任何协定。同年6月4日，条约正式生效，华约组织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主要机构有：政治协商委员会，由缔约国党的第一书记、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组成，是华约最高决策机构；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是军事指挥机构，总司令历来由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担任。此外，还有国防部长委员会、外交部长委员会、联合武装部队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部等机构。华约组织建立使东西方之间在欧洲最终形成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华约组织成立初期，在对抗北约组织、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起了一些作用。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它日益变成苏联控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美国争夺霸权的工具。1968年8月，苏联以华约组织名义出兵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同年9月阿尔巴尼亚退出该组织。

(金相春)

欧洲共同体

(Ouzhou gongtongti) 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一体化国际组织。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国家联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普遍发展，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趋势日益突出，西欧各国因美苏争霸而要求加强合作以维护自身利益，并希望改变欧洲长期战乱不已的局面。1951年4月18日，根据法国外长舒曼提出的计划(即舒曼计划)，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签订《欧洲煤钢联营条约》，把六国的煤钢工业联合起来，建立超国家的组织机构，管理六国煤钢的生产、投资、价格和原料分配等事务。1957年3月25日六国在罗马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统称《罗马条约》)，决定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即共同市场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58年1月1日条约生效。1967年7月，上述三个组织合并，总称欧洲共同体。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加入。1981年，希腊加入。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其主要政策有：实现关税同盟，成员国之间逐步降低直至取消关税，工业品在内部自由流通，统一对外关税率，至1968年7月已完成；实施共同的农业政策，在内部逐步统一农产品价格，促进农产品的自由流通，对外部进口的农产品提高关税以保护内部农业生产，建立共同的农业基金，用于奖励出口和促进农业结构的改革；协调财政金融政策，走向货币联盟，自1979年起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以建立欧洲货币单位为核心，各成员国根据本国货币与欧洲货币单位中心汇率确定相互之间的货币汇率，对非成员国实行浮动汇率，设立货币基金稳定汇率；促进政治联盟，1974年决定成员国首脑会议制度化(即欧洲理事会)，每年举行三次，1979年采取直接投票方式选举作为共同体的监督咨询机构欧洲议会的议员；调整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加强南北对话，与非加太国家四次签订洛美协定。其主要组织机构有部长理事会、欧洲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欧洲共同体使西欧国际关系得到缓和和稳定，成员国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成为与超级大国抗衡的重要力量，反映世界多元化的趋势。

(杨宁一)

戴维营会谈

(Daiweiyeng huitan)1959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总统别墅戴维营举行的会谈。50年代中期，东西方的10年冷战开始出现缓和。1959年9月，赫鲁晓夫应艾森豪威尔邀请访问美国。25—27日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就德国的统一、柏林的地位、裁减军备、美苏关系等问题进行谈判。会谈中，赫鲁晓夫作出让步，取消1958年提出的关于在一定期限内解决柏林问题并与民主德国签订和约的最后通牒；美国同意召开四大国会议，讨论德国与柏林问题；艾森豪威尔接受邀请，定于1960年春访苏（后因美国U—2飞机入侵苏联事件被取消）。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首脑的第一次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使紧张的柏林局势得以缓和，美、苏关系有所改善。会后，赫鲁晓夫宣扬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戴维营精神”。

（杨宁一）

南南合作

(Nannan hezuo) 发展中国家互相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努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作。发展中国家多位于南半球，故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日益需要密切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运用集体力量，抵御西方国际垄断资本的掠夺和剥削，改革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南南合作初兴于 60 年代，建立起一些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及原料生产国组织，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非洲统一组织、七十七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等。70 年代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成为全球性运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参加双边和多边合作并取得显著进展，相继成立大批合作组织，天然橡胶、铝土、肉类等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多达 20 余个。采取共同兴办工业企业，促进贸易发展，维护本国资源，协调财政金融等政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 1970—1980 年年平均增长率为 30%。80 年代以来继续发展，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首脑会议通过一系列会议决议和宣言，阐明南南合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具体措施。新的经济合作组织拉美一体化协会、海湾合作委员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陆续出现，原有的经济合作组织不断完善。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包括资源、能源、资金、农业、劳务、技术等领域，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南南合作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杨宁一)

石油输出国组织

(Shiyou shuchuguo zuzhi) 亚、非、拉主要石油生产国维护民族经济利益、反对国际石油垄断资本掠夺和剥削的国际组织。简称欧佩克。长期以来，亚、非、拉石油生产国的石油开采、提炼和经营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和操纵。石油生产国为维护石油资源与民族经济权益，逐渐走向联合。1960年9月，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和委内瑞拉五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会议，于14日宣告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该组织宗旨是协调统一成员国的石油政策，采取集体行动，维护各国石油权益。卡塔尔、印度尼西亚等国相继加入，至80年代中期有成员国14个。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为第三世界最早成立的原料生产国组织之一，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14个成员国的石油蕴藏量和输出量均占世界石油蕴藏量和输出量的70%。该组织成立后，与国际石油垄断资本进行一系列斗争，夺回石油标价权，多次提高石油标价和石油税率（每桶石油价格由1972年的约2美元提高至1980年底的32—41美元），通过参股和国有化等措施全部或大部分掌握了本国石油资源，在成员国内部分配石油生产比例以控制世界石油的供求和价格。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成员国以石油为武器，采取减产、禁运、提价和国有化等措施，沉重打击了以色列侵略者及其西方支持者。

(杨宁一)

不结盟运动

(Bujiemeng yundong) 第三世界国家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原则，团结合作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老殖民主义者和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威胁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摆脱大国控制，维护独立与安全，在万隆精神推动下，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等倡议发起不结盟运动。1961年9月1—6日，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共25个国家参加，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以和平、中立、不结盟为宗旨，努力加强成员国的团结和协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定期召开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与外长会议，常设机构有部长级协调局和驻联合国代表协调局。初期运动重点在不卷入大国冲突，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自1970年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召开的第三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发生重要变化，转为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斗争亦由政治领域深入到经济领域，谴责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大力提倡“集体自力更生”的南南合作。运动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至80年代成员增至101个，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杨宁一)

古巴导弹危机

(Gubadaodanweiji) 美、苏就苏联在古巴设置的导弹基地问题发生的尖锐冲突，亦称加勒比海危机。1962年苏联以保卫古巴为名，采取冒险主义政策，秘密向古巴运送导弹，建立基地，以加强与美国进行争夺的战略地位，被美国发现。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演说，要求苏联在联合国观察员监视下，迅速拆除和撤走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并下令武装封锁古巴，命世界各地美军进入戒备状态。随后，美军在古巴领海周围设置警戒线，拦截检查前往古巴的船只，集结庞大的部队准备参战。苏联实力不足，在美国的军事讹诈下退却，于27日、28日两次表示以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并从土耳其撤走导弹为条件，接受美国要求。美坚持必须先撤走设置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然后才能提供对古巴的保证，避而不谈土耳其的美国导弹。经过私下密谈，10月28日和11月21日，苏联先后同意从古巴撤走导弹和伊尔28式轰炸机。美国遂解除封锁，危机基本平息。

(杨宁一)

南北对话

(Nanbeiduihua)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经济合作与发展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的谈判对话。因发展中国家大多在南半球，发达工业国家大多在北半球，分别有“南方”“北方”之称，故名。又称南北谈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取得政治独立，但经济上仍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束缚和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控制与剥削，因而要求与西方发达国家对话，争取经济独立，扫除经济发展的外部障碍，建立公正、合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新秩序。1959年英国劳埃德银行总理弗兰克首次使用南北问题的提法。对话兴起于60年代中期。1964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贸易与发展会议上，发展中国家组成七十七国集团，与发达国家进行集体谈判。此后，每届贸发会议召开前，七十七国集团均举行部长级会议，协调立场，统一行动。70年代发展较快。1975年和1977年，19个发展中国家与7个发达国家两次在巴黎举行国际经济合作部长会议，就原料、能源和金融等问题进行讨论。1977年11月，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成立（又称南北委员会），主席为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就促进南北对话多次举行会议。1978年起，联合国大会成立全体委员会，审议南北对话有关问题。1981年10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了有14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发达国家政府首脑参加的国际经济与发展会议，即坎昆会议。南北对话取得了一些成果。原料生产国组织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部分掌握了原料的开发、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主动权。1975年，欧洲共同体同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在多哥首都签订较为平等的《洛美协定》。以后该协定续订三次。由于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竭力维护其既得利益，南北对话困难重重，成效不大，80年代陷入僵局。

（杨宁一）

东南亚国家联盟

(Dongnanya guojia lianmeng) 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合作组织。简称东盟。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影响下于1961年成立的东南亚联盟为其前身。60年代后期，东南亚各国进入政治相对稳定和经济建设时期，相互之间关系缓和，受到国际上区域性合作组织的鼓舞，谋求加强联合，以实现安全与经济目标。1967年8月6—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在曼谷举行外长会议，发表宣言，宣告东盟成立。1984年1月，文莱独立后加入。东盟以经济合作为主要任务。成立初期，处于调整内部关系的起步阶段，成就不大。进入70年代后，经济合作日益加强，采取关税特惠等措施扩大相互贸易，共同投资兴办大型工业企业和开发自然资源，在财政、金融等方面进行协调，实行开放政策，在与发达国家保持密切经济联系的同时，开拓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合作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增长。70年代，五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比增长率高达7.5%，远远高于美国和西欧，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政治合作逐渐加强。1971年发表《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宣言》。1976年2月在印尼巴厘举行第一届首脑会议，通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协调一致宣言》，正式将政治合作纳入联盟合作范围，强调团结合作，反对干涉，维护独立。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协调彼此立场，采取共同对策，一致要求越南撤军，支持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谋求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东盟为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成就显著，国际影响日益提高。

(杨宁一)

1968 年苏联侵捷事件

(yijiuliubanian SulianqinJie shi-jian) 1968 年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与波、匈、保和民主德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具有明显摆脱苏联的控制和苏联模式的束缚的倾向。苏联极为不满，称之为反苏的自由化运动，指责其背离社会主义，多方施加压力，要求捷改变政策，被拒绝。1968 年 8 月 20 日深夜，苏军空降部队在布拉格机场降落，占领布拉格，绑架捷党和国家领导人杜布切克等人。同时，苏、波、匈、保和民主德国的 50 余万军队越过捷边境，控制各战略要地。捷共宣布不进行抵抗。8 月 26 日，捷领导人被迫在莫斯科签署两国会谈公报，称五国出兵是为镇压帝国主义策划的反社会主义阴谋而提供的国际主义援助。10 月 16 日，两国签订《关于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使苏军占领合法化。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多次举行集会示威，采取各种方式抗议苏军入侵。1989 年底，捷和苏、保、匈、波、民德五国分别发表声明，宣布 1968 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

(杨宁一)

欧安会

(Ouanhui) 1973—1975 年欧洲国家及美国、加拿大、土耳其和塞浦路斯举行的国际会议。全称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最先由苏联建议召开。60 年代末，长期在欧洲处于冷战对峙的美、苏两国出于各自需要，积极加紧推行缓和政策。此会议即为 70 年代东西方关系全面缓和的产物。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苏，双方达成召开欧安会的协议。1972 年 11 月—1973 年 6 月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筹备会议，为会议作出初步安排。正式会议分为三个阶段。1973 年 7 月 3—6 日，在赫尔辛基举行各国外长参加的第一阶段会议，通过筹备会议制定的文件，确定会议的议程。同年 9 月 18 日开始在日内瓦举行第二阶段的专家会议，时断时续，经过近两年的 2400 余次会议，至 1975 年 7 月 21 日结束，拟定出《欧洲安全合作最后文件》。第三阶段为首脑会议，1975 年 7 月 31 日—8 月 1 日在赫尔辛基举行，35 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了《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宣言》），包括《指导与会国之间关系的原则的宣言》、《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和安全与裁军的某些文件》、《人道主义和其他方面的合作》、《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等。其主要内容有：欧洲安全问题，提出欧洲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边界可以根据国际法，以和平手段和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关于建立信任措施问题，规定以自愿为原则，与会国如在离边界 250 公里以内地区举行有 2.5 万人以上的军事演习，应在 21 天前通知各签字国，并邀请他们派观察员观看演习；经济技术合作问题，提出希望签字国彼此给予最惠国待遇；关于人员交流问题，规定在相互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根据每个国家自己的方式，促进各国人员、机构和组织更自由地往来和接触，为家庭团聚、旅游等提供方便。该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1977 年、1980 年和 1986 年分别在贝尔格莱德、马德里和维也纳召开三次续会，检查《最后文件》执行情况。

（杨宁一）

1973 年世界经济危机

(yijiugisannian shijie jingji weiji)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使经济迅速发展。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和有限的市场的矛盾，暂时缓解积累起来。1973 年中东战争期间，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斗争导致西方国家发生的石油危机为其重要触发原因。1973 年 11 月，经济危机首先从英国开始，美、日、法等国相继卷入。于 1975 年下半年渡过最低点，经济转而回升。此次经济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第四次经济危机，严重程度超过前三次。其主要表现是：工业生产普遍持续大幅度下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 8.1%，日本高达 20.8%；大批企业破产，股票行情大跌，美、日、西德等 10 国两年内资本超过百万美元的公司破产 12 万家以上，拥有 50 亿美元资产的富兰克林银行倒闭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股票价格下跌总额达 5000 亿美元；失业人数巨增，创战后最高纪录，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全失业人数 1975 年月平均为 1448 万，美国 1975 年 5 月失业率为 9.2%；物价上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入逆差严重，危机期间物价指数的上升英国为 43.9%，日本为 32.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贸易入超达 203 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为 392 亿美元。危机过后，各国经济没有出现全面高涨，而是进入滞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相对停滞，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

(杨宁一)

欧洲共产主义

(Ouzhuo gongchanzhuyi)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纲领性主张。欧洲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共产党为主要代表，故名。1976年意共总书记贝林格首次正式使用此词。兴起于70年代中期。其主要内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认为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充分利用现行民主制度，通过普选，和平夺取政权，不排除在统治集团使用暴力时也使用革命暴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强调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充分体现民主自由的原则，主张政治上的多元化和经济上的多样化，实行多党制，各党通过选举“更迭执政”，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杠杆掌握在社会手中；承认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作用，但认为党应成为“新型的群众性的党”；强调国际上各共产党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反对“领导中心”、“领导党”，更反对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压制和指挥各国党为其服务。目前已宣布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党有近20个。

(杨宁一)

越南侵柬战争

(yuenan qin jian zhanzheng)1978年起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侵略柬埔寨的战争。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战争胜利后，越南企图称霸印度支那，建立“印支联邦”，遭到柬埔寨的坚决拒绝。1978年12月25日，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出动10万军队侵入柬埔寨，占领柬首都金边和大片领土，扶植韩桑林傀儡政权，向柬境内大批移民，实行“越南化”政策。柬埔寨人民奋起开展民族自卫的抗越武装斗争。1982年7月9日，抗越武装力量三方民主柬埔寨、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和柬埔寨民族解放运动组成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为主席，乔森潘为副主席，宋双为总理。抗越武装力量多次在旱季粉碎越军的扫荡，雨季主动出击，进攻越军主要据点和交通干线，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至1987年，武装抵抗力量已发展到7万余人。越南不断增兵，不仅未能达到消灭抵抗力量的目的，反而遭受巨大损失。自1977年侵袭柬边界以来至1988年年中，越南官兵死伤11万人。柬埔寨人民抗越卫国战争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1979年以来，历届联大均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支持民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要求越南撤出柬埔寨。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越南玩弄假撤军骗局，拒不执行联大决议。

(杨宁一)

苏联入侵阿富汗

(sulian ruqin afuhan) 1979 年苏联军队对阿富汗的全面入侵。70 年代苏联为从陆路南下印度洋，对阿富汗进行渗透和扩张。1979 年 12 月 27 日，驻阿苏军突然袭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处决 9 月通过政变上台的阿明，在苏境内播发所谓阿富汗政府请求苏联援助的声明。早已集结在边境上的苏军大举入侵，一周之内控制了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扶植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头目卡尔迈勒组成傀儡政权。苏联的侵略给阿富汗带来深重灾难，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数百万人逃亡国外，沦为难民。阿富汗人民奋起抵抗。1981 年 6 月各派抵抗组织联合成立“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其常年从事战斗的武装力量逐渐增长到 10 多万人，控制了广大山区和农村。苏军以 10 余万兵力占领阿富汗，仍无法赢得战争，而且耗资巨大，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人员装备损失严重，国内反战呼声增高，在国际受到进步舆论和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经过 6 年谈判，1988 年 4 月 14 日，巴基斯坦、喀布尔政权和美苏外长于日内瓦在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协议上签字。协议规定，苏军 1988 年 5 月 15 日起撤出阿富汗，9 个月内全部完成，巴阿互不干涉，美苏提供国际保证，联合国实行监督。1989 年 2 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

(杨宁一)

两伊战争

(Liangyi zhanzheng) 1980 至 1988 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两伊地处西亚，互为比邻，长期存在边界、宗教和民族纠纷。两国共同边界 1200 公里，南部界河阿拉伯河流域石油资源丰富。双方多次就以该河主航道中心线或靠近伊朗侧浅水线为界问题谈判，1975 年达成以前者为界的协议。此外，伊朗居民为波斯民族，属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拉克居民属阿拉伯人，50% 为什叶派，但逊尼派掌握国家政权。1980 年 9 月，伊拉克宣布对阿拉伯河拥有全部主权。22 日战争爆发。初期，伊拉克军队攻入伊朗境内。1981 年 9 月，伊朗大举反攻，收复绝大部分土地，拒绝伊拉克停火建议，将战线推进到伊拉克境内。1984 年 4 月，战争向波斯湾水域和城市扩展，双方展开“油轮战”和“袭城战”，破坏对方经济，切断石油出口运输线。大国乘机插手以扩大在该地区影响。由于双方势均力敌，战争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两国损失巨大。据统计，两国伤亡人数总计 160 万，战争耗费和经济损失超过 5400 亿美元。战争危及邻国的安全和海湾局势，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注，开展各种调解活动。1987 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598 号决议，要求两伊尽早结束战争，伊拉克迅即表示赞成。1988 年 4 月，伊拉克发动攻势，取得一定进展。7 月伊朗宣布接受 598 号决议。8 月 20 日两伊战争正式停火。

(杨宁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

(Dierci shijie dazhan) 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挑起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世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德、意、日法西斯企图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重新瓜分世界。日本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远东战争策源地形成。1937年日本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3年希特勒上台,欧洲战争策源地形成。意大利于1935年侵入埃塞俄比亚,次年与德国勾结武装干涉西班牙。1938—1939年德国先后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对外侵略扩张中,德、意、日结成轴心国集团。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等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抗击侵略,受到苏联等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援。英、法、美采取绥靖政策,纵容侵略。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德国在西线发动进攻,相继侵占丹麦、挪威(4月)、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5月),6月法国败降。7月英国展开不列颠保卫战,挫败德国入侵计划。此后德军于1940年秋至1941年春占领东南欧各国。1940年意大利进攻东非和北非受挫后,德军于1941年3月出兵北非进行援助,与英军展开北非争夺战。美国受到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于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与英国结成同盟。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大战范围进一步扩大。英、美宣布支持苏联。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战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半年内,日本占领了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和太平洋许多岛屿。德、意、日的侵略,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1942年1月1日,美、苏、英、中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宣言》,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建立。

1942年底至1943年初,大战各主要战场发生根性转折。苏军在1942年7月—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获胜,全歼被围德军,从根本上扭转了苏、德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面。美军相继取得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和1942年8月—1943年2月瓜岛战役的胜利,迫使日军转入战略防御。1942年11月,英军在阿拉曼战役中获胜,同时英、美盟军在北非卡萨布兰卡等地登陆成功,至1943年5月解放了北非。从此盟军进入全面战略反攻。在欧洲战场上,1943年7月英、美军队攻占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9月意大利投降。苏军继1943年7月粉碎德军在库尔斯克的反扑后,连续向德军发起大规模的攻势。1944年6月,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形成对德国的两面夹击。欧洲各被占领国的人民加强反法西斯斗争,爆发欧洲人民大起义。1945年初,苏军和英、美军队分别攻入德国本土,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解放区和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八路军自1944年开始局部反攻。英、美军队也于1944年大大加强了在太平洋的作战能力,相继攻占马绍尔群岛、马利亚那群岛、菲律宾群岛和冲绳岛等地。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进攻关东军。中国各解放区展开大反攻。亚洲各国人民纷纷举行起义。8月14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 6 年，先后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 亿左右人口卷入，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据统计，交战国直接军费达 1 万多亿美元，死伤人口约 1.1 亿，物资损失更为巨大。世界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大战的胜利构成了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通过大战，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德、意、日被打垮，英、法实力受到严重削弱。战后欧洲和亚洲建立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空前高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取得独立，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杨宁一）

轴心国

(Zhouxinguo)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结成侵略性政治军事集团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政权为重新瓜分世界，共同对付英、法、美和反共反苏，在对外侵略过程中逐渐调整相互之间的矛盾而结盟。1936年10月25日，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签订协定，德国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两国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划分势力范围，决定解决国际问题的共同方针。几天以后，墨索里尼发表演说，宣称罗马和柏林是轴心，欧洲国家应该围绕这个轴心进行合作。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2月，日本和意大利订立协定，彼此承认对中国东北和埃塞俄比亚的占领。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标志着轴心国侵略同盟初步形成。1939年5月22日，德、意签订同盟条约即“钢铁盟约”，结成军事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的1940年9月27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正式结成军事集团。后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相继加入该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彻底瓦解。

(杨宁一)

同盟国

(Tongmengguo)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受到德、意、日侵略和威胁的中国、埃塞俄比亚等国人民奋起开展反法西斯斗争,但由于英、法等国推行绥靖政策,未能结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德国进攻西欧后,英、美的根本利益和生存直接受到严重威胁。英国支持欧洲大陆沦陷国家坚持对纳粹德国进行斗争的流亡政府和组织。1940年8月,英、美签订《共同防御西半球协定》。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同月,两国制定共同的军事和政治战略。英国与欧洲沦陷国家及英美之间遂建立起同盟合作关系,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宣布支持苏联,向苏联提供援助。苏联与欧洲沦陷国家的流亡政府建立合作关系。1941年8月英、美发表《大西洋宪章》,苏联和其他10余个国家表示支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等国正式参战,反法西斯阵营进一步扩大。1942年1月1日,美、苏、英、中、加、澳、印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此后,一些国家陆续加入,其总数达47个。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互相配合和支援,最终打败轴心国,为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杨宁一)

德国入侵波兰

(deguo ruqin pelan)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的战争。1938年慕尼黑会议后，德国把侵略矛头指向波兰，提出“收回”但泽等无理领土要求，蓄意恶化德、波关系，制定入侵军事计划“白色方案”。1939年8月31日深夜，一支身穿波兰军服的党卫队“攻占”靠近波兰的德国边境城市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用波兰语广播反德演说。希特勒宣称德国受到“侵略”，命令早已集结的150万军队、2000余架飞机和2800辆坦克向波兰发起进攻。9月1日，德军采取闪电战术，首先以大批飞机密集轰炸战略要地，继而以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为先导分三路突进。波军第一线对德作战部队约100万，但因准备不足，仓促应战，装备落后，军事思想保守，虽奋勇抗击，未能挡住德军的攻势，边境防线迅即被突破，部队被分割包围。3日，英、法政府根据同波兰签订的条约对德宣战，却并不出兵援波作战，致使德军得以集中兵力长驱直入，9月8日开始进攻华沙。波兰政府无力挽回败局，于16日撤离首都华沙，流亡国外，波兰陷入全面瘫痪。华沙军民顽强抵抗20余天，至28日该城陷落。10月初，其他被围波军相继被击溃，波兰灭亡。战争进行中的9月17日，苏联军队越过苏、波边界，占领波兰东部。德国入侵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杨宁一)

东方战线

(Dongfangzhanxian)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在欧洲东部扩大边界建立的防御德国侵略的防线。30年代后期，苏联面临纳粹德国侵略的威胁，力图改善西部边界的防御地位。德国入侵波兰后的1939年9月17日，苏联发表声明，称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和要保护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遂出兵波兰，占领波兰东部并将其并入苏联。通过1939年10月—1940年3月的苏芬战争，苏联取得芬兰部分领土，获得汉科半岛租借权。1940年6月，苏联分别照会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出改组政府和让苏军自由通行等要求，得到同意。7月，三国举行选举，成立苏维埃政权，要求加入苏联，被接纳。同年6月，苏联照会罗马尼亚政府，以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的政策严重威胁苏联西南边界的安全等理由，要求把比萨拉比亚“归还”苏联，把北布科维纳“移交”苏联。罗马尼亚政府接受苏联要求，苏军占领上述地区。东方战线的建立使苏联共增加领土46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200多万，西部边界向西推进约300—400公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防御空间，改善了战略地位，在苏德战争中起到有限的作用。东方战线的建立反映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有损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

(杨宁一)

苏芬战争

(Su fen zhanzheng) 1939—1940 年苏联与芬兰之间进行的战争。自 1938 年春起,苏联多次向芬兰提出,为了西北边界和列宁格勒的安全,与芬兰交换和租借领土。芬兰表示坚守中立立场,只同意进行小的边界调整,未能满足苏联的要求,两国谈判破裂。1939 年 11 月 28 日,苏联宣布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1 月 30 日,苏芬战争爆发。苏军对芬兰的抵抗能力估计不足,不适应芬兰的地形和气候,作战初期阶段进展不顺利。英、法等国借机反苏,向芬兰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筹划派遣远征军支援芬兰。经过整顿后,苏军于 1940 年 2 月突破芬兰的主要防线曼纳海姆防线,取得军事上重大胜利,同意与芬兰政府谈判。1940 年 3 月 12 日,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和约。依约,卡累利阿地峡、拉多加湖西岸和北岸以东领土和若干岛屿划归苏联,汉科半岛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为期 30 年。苏联共获得 4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杨宁一)

马奇诺防线

(Maqinuo fangxian) 1929—1936年法国为防备德国进攻在其东部与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的边境上构筑的防御阵地体系。由陆军部长安德烈·马奇诺提议并主持构筑，故名。1940年前不断加以改进。北起隆维，南至贝尔福以南，全长约400公里，共有5600个永久性工事，22个大型工事群由地下坑道连接，设有暗堡、宿舍和容纳3个月粮食与弹药储备的仓库、独立电站等。工事混凝土顶盖厚达3米。防线共耗费2000亿法郎，是法国军事当局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理论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50个师驻守防线。1940年德国向西欧发动进攻时，以少量兵力牵制防线守军，主力绕过防线，从北面法比边境阿登山区攻入法国，使其丧失作用。

(杨宁一)

敦刻尔克撤退

(Dunkeerke chetui)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军队在敦刻尔克进行的重要军事撤退行动。1940年5月10日,德军分三路进攻西欧,占领荷、比、卢三国,主力越过阿登山区侵入法国,直扑英吉利海峡。英、法联军军事战略保守,指挥不当,作战失利,遭到分割,近40万军队溃退至法国西海岸的敦刻尔克地区,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德军先头坦克部队受命暂缓前进,使英、法联军得以巩固防御工事,掩护实施从海上撤退至英国的“发动机计划”。自5月26日至6月4日,英国动用800余艘各种类型船只,冒着德机的轰炸,将20万英军和13万法比军队由英吉利海峡撤至英国。此次撤退英法联军损失惨重,700辆坦克、2400门大炮等大批重型武器落入德军手中,200余艘船只沉没,担任掩护的4万法军未及撤退被俘。整个军事行动组织严密,有条不紊,卓有成效,是一次战术上的成功之举,对保存英军实力,重新武装,日后反攻欧洲大陆有着重要意义。

(杨宁一)

不列颠空战

(Buliedian kongzhan)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德军准备侵入英国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空袭而进行的空战。德军占领西欧大陆后，诱英妥协失败，希特勒于1940年7月下达全面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为夺取制空权，把占有优势的英国海军赶出英吉利海峡，给入侵扫清道路，并迫使英国屈服，德国空军对英国本土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空袭，轰炸自7月10日开始。德军最初主要目标是英军的军舰、海军基地、机场和雷达站。9月7日起转而主要轰炸伦敦等重要城市，企图摧毁英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德军动用了2000架左右飞机，飞行4.6万多架次，投掷了6万吨炸弹，给英国造成重大损失。首都伦敦破坏严重，形势严峻。英国军民在丘吉尔政府领导下团结一致，奋力抵抗。仅拥有1000余架飞机的皇家空军充分利用本土上空作战的优势，使用刚刚发明的雷达早期预警，以915架飞机的代价使德国损失飞机1733架，飞行员6000名，并对德国进行了有限还击。德军无法实现战役目的，同时希特勒的注意力也转向东方准备进攻苏联，因而“海狮计划”的实施无限期推迟。10月初，德国空军转入夜袭，不列颠空战接近尾声。此次空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空战。英国取得自卫战的胜利，希特勒的军事冒险受到严重的挫败，有力地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

(杨宁一)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De yi ri sanguo tongmeng tiaoyue)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日结成侵略性军事同盟的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意、日已政治结盟，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开始就军事结盟谈判。因两国就同盟针对英、法还是苏联存在分歧，未能缔约，谈判一度中断。1940年希特勒打败法国后，希望利用日本牵制英、美，夹击苏联。日本亦决定南进，与英、美矛盾加剧。德、意、日三国遂于1940年9月27日签订该条约。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承认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当缔约国遭受到目前未参加欧战或中日冲突之国家的攻击时，三国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正式形成，其矛头明显指向尚未参战的美国和苏联。

(杨宁一)

租借法案

(Zujie faan) 194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援助的重要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美国日益受到纳粹德国侵略扩张的威胁。德国入侵西欧后，罗斯福政府为了美国自身的安全和防御，并扩大势力范围，确立战后世界中美国的领导地位，决定加强对处境困难、财政拮据的英国的援助。1940年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提出美国可以借出军火，并用生动的比喻加以说明：假设邻居失火，我只能把浇园的水龙带借给他去灭火，而不应让他事先付钱买这条水龙带，待火灭后邻居原物送还即可。1941年3月11日，参、众两院通过的《租借法案》经罗斯福签署后正式生效。法案授权总统可以以出售、交换、转让和租借的形式向被认为其防御对美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提供武器、军用物资、粮食等任何军需品。该法案的通过埋葬了中立法，是美国由孤立主义走向参战的决定性重要步骤。据此，美国共向英、苏、法、中等几十个反法西斯国家提供500多亿美元的物资，英帝国约占60%，苏联约占20%，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停止执行。

(杨宁一)

苏日中立条约

(Su ri zhongli tiaoyue)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日本在确立南进战略后，力图调整日苏关系，以促使苏联中止对中国的援助，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加强日本在日、美谈判中的地位。苏联亦迫切需要缓和日、苏关系，稳住日本，集中力量对付来自西方的主要威胁纳粹德国，避免两线作战。两国于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该条约。条约规定，双方维持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如果缔约一方受到其他国家的攻击，另一方严守中立，条约有效期五年。同时苏、日发表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条约有利于保障苏联东部边界的安全，但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使日本放手南进。日本也未放弃侵苏企图。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不再延长条约期限。8月8日条约尚未期满，苏联即对日宣战。

(杨宁一)

苏德战争

(Su de zhanzheng) 苏联人民与纳粹德国及其仆从国家进行的战争。又称苏联卫国战争。法西斯德国侵苏蓄谋已久，在占领北欧和西欧大陆后，于1940年底制定了代号为“巴巴罗萨”的对苏作战计划。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纠集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出动550万兵力、近5000架飞机和4000多辆坦克，分兵三路突然向苏联发起全线进攻，企图在三个月内征服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奋起反击，开始了卫国战争。在战争初期，苏联处于防御阶段，因对德国的突然袭击准备不足，作战严重失利，损失惨重。至7月中旬，苏军28个师被击溃，70个师人员、武器损失过半。德军进攻凶猛，进展顺利，深入苏联腹地300—600公里，占领了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广大地域。9月，德军在南路占领基辅，在北路包围列宁格勒，在中路进攻莫斯科。苏军在1941年9月—1942年1月的莫斯科会战中展开积极防御，获胜，粉碎德军“闪击战”计划。德军虽仍处于战略优势，但已无力发动全线进攻，遂调集兵力于南线。1942年7月—1943年2月，双方展开斯大林格勒战役。此役苏军歼敌150万，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从根本上扭转了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此时，苏联战时军事工业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武装力量大大增强。1943年7月希特勒企图制造一个“德国的斯大林格勒”以挽回败局，投入90万兵力，进攻库尔斯克，结果又遭惨败，损兵50余万。此后，苏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展开全面反攻，解放斯摩棱斯克、顿巴斯、基辅等地，至1943年年底收夏被占领土2/3。1944年，苏军连续进行对德军的十次打击，将德军全部逐出国土并进入东南欧作战，与当地人民的武装斗争配合，推翻了各国的法西斯政权，肃清其境内的德国军队。1945年初，苏军全线展开强大攻势，攻占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逼近德国首都柏林。4月16日苏军发起最后冲击，于5月2日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投降。苏德战争结束。

(杨宁一)

大西洋宪章

(Daxiyang xianzhang) 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的联合宣言。全名为《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联合宣言》。苏德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范围扩大，美、英迫切需要进一步协调反法西斯的战略。两国首脑于1941年8月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的奥古斯塔号军舰上举行大西洋会议。8月13日签署大西洋宪章。该文件全文共8条，宣布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不承认法西斯通过侵略造成的领土变更，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恢复被暴力剥夺的各国人民的主权，各国在贸易和原料方面享受平等待遇，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摧毁纳粹暴政后重建和平，公海航行自由，各国必须放弃武力削减军备，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大西洋宪章提出的对法西斯国家作战的目的和进步民主的重建战后和平的目标，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对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打败德、意、日侵略者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成为以后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同时，“机会均等”、“海上自由”等内容有利于美国战后与英国争夺势力范围，取得世界“领导地位”。同年9月，苏联等国表示同意宪章的基本原则。

(杨宁一)

莫斯科会战

(Mosike huizhan)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德军与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进行的会战。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取得暂时胜利，北南两线分别攻占基辅和包围列宁格勒，遂集中其苏德战场上的总兵力的 50% 于中路，进攻莫斯科，企图一举占领该城，消灭苏军主力，结束对苏战争。会战自 1941 年 9 月 30 日开始。在 10 月攻势中，德军进行了 3 次大包围。大批红军被俘，形势十分危急，苏联政府部分机构和外交使团迁往外地。德国曾令各报 10 月 12 日留下头版位置，以刊载“特别重要的消息”，意即攻陷莫斯科。莫斯科军民在斯大林的亲自指挥下采取攻势防御，浴血奋战，使德军进攻能力于 10 月底减弱。11 月 15 日，德军发起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一度占领距莫斯科仅 24 公里的伊斯特腊。由于苏军的顽强阻击，德军南北两翼包围、中央突破的企图未能实现。苏军在防御期间，集中后备力量，自 12 月 6 日起转入反攻，至 1942 年初前进了 100—250 公里，解除了对莫斯科的包围。尽管希特勒为挽回败局自任陆军总司令，仍未能阻止德军的溃退。1942 年 1 月 8 日至 4 月 20 日，苏军在莫斯科方面全线反攻，进一步扩大了战果，把敌军击退 150—400 公里。苏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保卫了首都，消耗德军大批有生力量，削弱德军的军事优势，收复部分失地。此役是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到的第一次军事大失败，标志着德国“闪击战”和“德军不可战胜”神话的破产，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和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信心。

(杨宁一)

大东亚共荣圈

(Dadongya gongrongquan)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奴役亚洲各国人民，建立殖民大帝国的侵略扩张目标。在 1931 年提出的“ 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和 1938 年提出的“ 东亚新秩序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1940 年 7 月，日本确立武力南进方针，近卫文麿内阁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立“ 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 ”。8 月 1 日，外相松冈洋右首次使用“ 大东亚共荣圈 ”一词。其范围为南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西到印度，包括中国、朝鲜、东南亚和太平洋许多岛屿在内的广大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泰国、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建立殖民统治。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与美国在太平洋的作战相配合，最终打败日本法西斯，使大东亚共荣圈彻底崩溃。

(杨宁一)

太平洋战争

(Taipingyang zhanzheng) 反法西斯盟国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战争。日本为独霸亚洲太平洋地区，排挤美、英、荷在该地区的势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英、中、澳等国相继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7日至1942年6月4日中途岛战役前为日本战略进攻阶段。日军以40万兵力，采取多路同时突袭的方法，向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各岛屿发起进攻，进展顺利，损失较小，在半年之内侵占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香港、关岛、威克岛等广大地区，总面积达380万平方公里，人口1.5亿，达到其侵略扩张的顶峰。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战役至1943年2月7日日军在瓜岛惨败、撤出该岛为战略转折阶段。从此日本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转入防御。美国及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盟国军队在北部太平洋、中部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兵分三路开始有限反攻，展开岛屿争夺战，并由逐岛进攻战术改为越岛进攻战术，攻占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阿留申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等地。1944年6月，盟军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突破日军的“绝对国防圈”开始全面战略进攻，先后攻占塞班岛(1944. 7)、菲律宾(1945.3)、硫磺岛(1945. 3)、冲绳岛(1945. 6)等地，并对日本本土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朝鲜、越南、缅甸等国人民开展的抗日武装斗争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日本陷入孤立。美、中、英7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被日本拒绝后，8月6日和9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中国各解放区军民在毛泽东“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下，展开大反攻。亚洲各国人民纷纷举行起义，打击日本侵略者。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太平洋战争结束。

(杨宁一)

珍珠港事件

(Zhenzhugang shijian)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未经宣战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的事件。珍珠港位于夏威夷群岛中心的瓦胡岛南端，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和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太平洋舰队停泊于此。1940年，日本为摆脱侵华战争的困境，掠夺东南亚的资源，打击英美势力，独占东亚，确定南进方针，引起美日矛盾加剧。日本一面与美国进行谈判，一面完成对美战争的准备，由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制定了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企图一举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解除南进的海空威胁。1941年12月当地时间7日晨（星期日，东京时间8日），南云忠一中将率领日本特遣舰队秘密开抵珍珠港以北230英里处，于7时55分发动突袭。第一批183架飞机攻击历时30分钟，随后第二批171架飞机扩大战果，攻击历时约50分钟。战斗进行期间，日本使节在华盛顿向美国政府递交了宣战的备忘录。美军麻痹大意，毫无戒备，反击无力，以致出现应战美机被己方炮火击落的情况，损失惨重，被击毁击沉大型舰只19艘，飞机300架左右，死伤3600余人，除不在港内的航空母舰等舰只外，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只损失20余架飞机和少量小型潜艇。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向东南亚和中南太平洋地区发动进攻。8日，美、英、中等国对日宣战，德、意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杨宁一）

联合国家宣言

(Lianheguojia xuanyan) 1942 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签署的宣言。德意日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断扩大侵略，促进了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向德、意、日宣战，正式加入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进一步壮大。在美国倡议下，1942 年 1 月 1 日，美、苏、英、中等 26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该宣言。签字国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宣言中宣布：保证运用军事和经济的全部资源同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轴心国及其仆从国家作战；相互合作，不与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和和约。宣言的签署标志着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形成。

(杨宁一)

中途岛战役

(Zhongtudaο zhanyi) 太平洋战争的转折性战役。中途岛位于珍珠港西北 1000 余哩处，为珍珠港的重要屏障和前哨。1942 年 5 月，经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提议，日本决定占领该岛作为前进基地，并诱出美国已遭重创的太平洋舰队进行决战，一举全歼。为此，日军调集 200 余艘舰只，700 架舰载飞机，由山本亲自指挥作战。处于劣势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破译了日本的无线电密码，对敌行动了如指掌。舰队司令官尼米兹将军将舰队隐蔽于中途岛东北 200 哩处，伺机出击制胜。6 月 4 日凌晨，日主力舰队飞机向中途岛发起攻击。因美军早有准备，未取得预期效果，又发现美国舰队，陷入既需再次轰炸中途岛，又要攻击美舰的处境，仓促为飞机改装鱼雷，将大批炸弹堆放在甲板上。10 时左右，美舰载飞机 100 余架，分批连续攻击日舰，3 艘航空母舰中弹，引爆甲板上的炸弹，当即相继沉没。傍晚又 1 艘航空母舰被击沉。坐镇于 300 哩外的山本集中所有舰只企图与美舰决战，而美军却很快撤出战斗。5 日凌晨，山本被迫下令取消此项行动。这次战役美国海军以少胜多，仅损失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各 1 艘，飞机 147 架，而日本损失大型航空母舰 4 艘，巡洋舰一艘，飞机 300 余架，兵员 3500 人，其中包括数百名有经验的飞行员。从此，日本丧失了海上制空权，无力在太平洋战场上进行战略进攻。

(杨宁一)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Sidalingle baoweizhan)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决定性战役。1942年春，德军在莫斯科战役失败后，军事上仍占有一定优势，决定再次对苏联发动进攻。因无力全面进攻，遂集中兵力于南线，企图一举攻占南方重镇斯大林格勒，夺取高加索油田，北上包抄莫斯科。7月17日，德军攻入顿河大河湾地区，逼近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面对优势敌人，苏军寸土不让，顽强抵抗，阻滞敌军进攻。经过近两个月的激战，德军突破苏军的外围和近郊防御，于9月13日攻入市区。苏军决心“誓死保卫城市，绝不后退一步”，与不断得到增援的德军逐街逐楼地展开市区争夺战，一些重要防御点几经易手，争夺拖拉机厂、“街垒”厂和“红十月”厂的战斗尤为激烈。英勇顽强的苏军最终坚守住了部分市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70万人。在保卫战进行之时，苏联调集110万兵力和大批飞机、坦克、大炮，于11月19—20日从南北两翼发动反攻，迅即突破敌军防御，将第六集团军等部30万德军包围并挫败敌军解围计划。1943年1月10日苏军开始总攻。至2月2日，被围德军全部被歼，其指挥官鲍罗斯元帅被俘。此次战役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历时200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德军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损失150万人，约占苏德战场兵力的1/4，希特勒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此役是苏德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杨宁一)

瓜岛战役

(Guaduaozhanyi)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美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役。瓜岛位于西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南部。1942年6月，日军开始在该岛修建机场，威胁美国在太平洋的反攻基地澳大利亚以及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为赶走日军，8月6日美军向该岛发动进攻，8日将其占领。日军大本营判断失误，认为美军是侦察性进攻，企图轻而易举地夺回该岛。日美军队展开长达半年的争夺战。日军屡遭失败，陆续派兵增援。双方在岛上的兵力经常保持在2—3万人左右，海空军也多次交战。日军战线过长，补给困难，死于饥饿和疾病者甚多，战斗力大减，舰只和飞机损失过大，无法弥补，暴露出脆弱的战争经济难以经受消耗战的弱点。日军败局已定，于1943年2月7日被迫将残余部队全部撤离瓜岛。此役日军死亡和被俘2.5万人，完全丧失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而转入防御。

(杨宁一)

阿拉曼战役

(Alaman zhanyi)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战场的决定性战役。1942年1月，素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指挥的德、意联军在北非东部发动攻势，大败英军，攻陷要塞托卜鲁克，逼近位于埃及亚力山大港60余公里的重要防线阿拉曼，威胁英国的生命线苏伊士运河。丘吉尔政府增派兵力，任命亚力山大上将接任中东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中将为主力第八集团军司令。经过充分准备，占优势英军在蒙哥马利指挥下于10月23日发起反攻。在战役第一阶段，英军兵分三路，以北翼为主攻方向，打通布雷区，击毁德军大量坦克，楔入敌人阵地。德军主力北移后，11月2日，英军实行“增压作战计划”，再次发起攻势。11月3日，南翼英军发起猛攻，突破敌人防线，掉头向北推进，迫使德军全线撤退。经过12天激战，盟军损失1万余人，收复了马特鲁港，毙伤和俘虏敌人近6万。英军乘胜西进，连克托卜鲁克、阿盖拉和的黎波里，1943年2月，攻抵突尼斯东部边界。此役是北非战场的根本转折，盟军从此转入战略反攻。此后，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与1942年11月在西北非登陆的英美盟军相配合，形成东西夹击，彻底肃清了北非的轴心国军队。

(杨宁一)

西西里战役

(Xixili zhanyi) 美英盟军攻占轴心国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战役。美、英军队在北非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3年1月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决定进攻西西里岛,以保卫地中海的交通线,减轻德军对苏联的压力,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1943年7月10日凌晨,16万美英军队在1000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乘3200艘各种舰只,向西西里岛东南部发起进攻。守卫西西里岛的德意军队共27万人,其中23万意军编制不足,士气低落。由于9日下午狂风大作,海浪汹涌,疲惫不堪的意海防部队毫无戒备。美英军队出奇制胜,顺利登陆。此后,德意军队抵抗加强,以掩护主力撤回意大利本土,迟滞了盟军的进攻。盟军后继部队相继投入,由南向北推进,至8月17日占领全岛。盟军和德意军队的损失分别是3.1万和16.5万人。此役是盟军第一次在轴心国的本土上作战,对促使意大利投降起到重要作用。

(杨宁一)

开罗宣言

(Kai luo xuanyan) 1943 年中、美、英三国在埃及首都开罗签署的宣言。 1943 年 11 月 22—26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举行开罗会议，讨论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会后 12 月 1 日发表此宣言，宣布三大盟国将坚持长期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对日作战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于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将日本逐出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使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使朝鲜自由独立。此次会议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在远东问题上的一次积极合作，对鼓舞人心，威慑敌人和加强盟国团结，加速打败日本起到积极作用。

(杨宁一)

德黑兰会议

(Deheilan huiyi)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会议。1943年反法西斯各主要战场形势发生根本转折，盟国已经取得战略进攻的主动权。为商讨加速战争进程和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德黑兰举行会晤。会议的主要内容有：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决定于1944年5月在法国南部开辟第二战场；就战后成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问题交换了意见；就战后如何处置德国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三国提出不同的分割方案；波兰问题，三国一致赞成战后重建独立的波兰，其边界西移，将德国东部的部分地区并入波兰；苏联对日作战问题，苏联表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并提出归还整个库页岛等条件。会议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和《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协定》，表示三国今后将“共同协作”，“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全心全意抱着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的真忱”。此次会议是反法西斯三大盟国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首次直接会晤，对维护和加强盟国间的团结与合作，协调军事战略行动，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三国在会议期间为自身利益达成一些损害他国利益的妥协和默契，给战后国际关系造成不良影响。

(杨宁一)

苏军的十次打击

(sujun de shici daji) 1944年苏军在苏德战场上连续发动的对法西斯军队的十次大规模战略性战役。1943年苏军转入反攻阶段后，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军队的数量和装备占有压倒优势。为彻底解放被占国土，援助欧洲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打通进攻德国本土的道路，集中兵力连续实施了十次战略进攻。1944年1—2月的第一次打击摧毁了德军的“永久性”防线，解除了德军对列宁格勒市900天的封锁，解放了列宁格勒州。1月底至3月，苏军在南部战场第聂伯河以西发起第二次打击，收复了该河西岸的全部乌克兰地区。3月底至5月的第三次打击，将敌军驱逐出敖德萨和克里米亚半岛。6月的第四次打击，击溃了芬兰法西斯军队并使芬兰当局被迫停战求和。在第四次打击接近尾声时，苏军又在中部地区广阔的战线上发起强大攻势，至7月解放了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大部分领土，进入波兰。是为第五次打击，即白俄罗斯战役。为了在战略上支援和配合该战役，7—8月苏军进行第六次打击，占领了西乌克兰地区。8—9月的第七次打击中，苏军解放了摩尔达维亚，攻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与当地人民的武装起义相配合，推翻法西斯政权，肃清境内德军。9、10月间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实施的第八次打击，解放了爱沙尼亚全部和拉脱维亚大部领土。10月，苏军以匈牙利为主战场，展开第九次打击，歼灭大批德军并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境内。第十次打击是10月在芬兰最北部进行的，把德军驱逐至挪威境内。在1944年的战略攻势中，苏军在一个战役的中后期即发动下一次战役，使敌人没有喘息机会，无法全线调遣兵力互相支援。十次打击取得了巨大的战果，共消灭德军约200万人，解放了苏联的全部领土，苏军进入东南欧各国，迫使德国的仆从国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退出战争，在北部战线逼近德国领土，加速了法西斯德国的覆灭。

(杨宁一)

诺曼底登陆

(Nuomandi denglu)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盟军反攻西欧大陆在法国诺曼底进行的登陆战役。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根本转折。英美在8月召开的魁北克会议上决定于1944年5月实施从法国打进欧洲大陆的“霸王”作战计划，开辟长期拖延未开辟的欧洲第二战场。苏、美、英三国德黑兰会议对此最后加以确认。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执行“霸王”计划的盟军最高统帅。盟军计划由英国本土出发，横渡英吉利海峡，以法国西北部诺曼底为主攻方向。为此，盟军集结了86个师288万人，6000余艘各类舰艇，1.37万架飞机，并大布疑兵之计，制造在加来登陆的假相。德军防守力量不足，判断失误，防御重点放在加来附近。1944年6月6日凌晨，气候恶劣。盟军3个空降师在登陆地域着陆，大批飞机和军舰轰击德军海岸防御工事，随后由船只运输的进攻部队登陆，突破希特勒吹嘘的“大西洋壁垒”，当晚即牢固地建立了5个滩头阵地。德军试图反击未能奏效。6月12日，5个滩头阵地连成一条阵线。盟军在海面上建成两个人造港，后继部队和各种装备源源不断运来。至7月24日，盟军阵地已扩展到正面宽100公里、纵深30~50公里的范围，登陆部队超过100万人，歼灭德军10余万人，登陆任务胜利完成。此后，盟军大举进攻，解放了法国，攻入德国本土，与苏军配合，彻底打败法西斯德国。

(杨宁一)

欧洲人民大起义

(ouzhou renmin daqi yi)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处于法西斯统治下的欧洲各国人民举行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1944年苏军全面反攻，挺进东南欧，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起义相继爆发。1944年8月1日，波兰流亡政府及其领导的国内武装力量国家军在首都华沙发动起义，华沙市民纷纷参加。德国军队按照希特勒“消灭华沙”的命令疯狂镇压。经过63天的激战，起义失败，20万人牺牲。8月2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起义，推翻安东内斯库反动政权，击溃德国法西斯的反扑，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全国大部分领土。8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中部地区爆发起义，与德军激战两个月，后被镇压下去。捷人民继续战斗，于1945年5月5日在首都布拉格再次举行起义，筑起街垒，与优势的敌人展开搏斗，坚持至5月9日苏军开进布拉格。1944年9月8日，保加利亚人民举行起义，推翻保皇法西斯政府，于次日建立人民政权。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在此期间大举反攻，解放了本国国土。在西欧，各国抵抗运动空前活跃。自6月起，法国掀起全民起义浪潮。8月19日，首都巴黎起义，至25日解放该城。9月3日，当盟军进抵比利时安特卫普时，市内人民起义，配合盟军一起解放该市。1945年4月，德国占领下的意大利北部各地纷纷起义，解放200余座城市，处决了企图潜逃的意大利法西斯魁首墨索里尼。欧洲人民大起义有力地配合了苏联和英、美军队的反攻，为解放本国和彻底消灭法西斯作出巨大贡献。

(杨宁一)

雅尔塔会议

(Yaerta huiyi)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又称克里米亚会议。1945年初，德国法西斯临近灭亡，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美、英、苏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暴露。为加强相互信赖，协调战略计划，尽快结束战争，安排战后国际事务，维护战后和平，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5年2月4—11日在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战后处置德国问题，决定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和德国必须交付战争赔偿以及彻底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一般原则。波兰问题，三国决定波兰东部边界大体上以寇松线为准，在若干区域作出对波兰有利的5—8公里的逸出，同意波兰在北部和西部应获得新的领土，其最后定界留待和会解决；关于波兰政府的组成经过激烈争论，同意以卢布林的波兰临时政府为基础进行改组，容纳国内外其他民主人士。远东问题，苏联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2—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交予苏联；联合国问题，同意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决定美、英、法、苏、中五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规定实质性问题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原则。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有关问题。会议签署了《雅尔塔协定》，通过了《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和《克里米亚宣言》等文件。此次会议巩固和维护了三国战时联盟，对协调盟国对德、日作战，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和促进战后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起到重要积极作用，为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会议的某些协议未经有关国家同意，具有明显的大国强权政治的倾向，严重损害中国等国的主权和利益。三大国在会议上作出的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被称为雅尔塔体系，对战后世界影响巨大。

(杨宁一)

攻克柏林

(gongke boling)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军攻占法西斯德国首都柏林的战役。1945年春，反法西斯盟国军队从东西两线攻入德国本土。希特勒企图死守柏林，调集了100万防卫兵力，建成城市以东的3道防线和环城的3层防御圈，市区划为9个防御区，分兵固守。实施柏林战役的苏军共约250万人，占有显著优势。4月16日，苏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进攻，很快突破外围防线和防御圈，完成对柏林市区的包围并与西线美军在易北河会师。26日合围苏军采用多路向心突击的战术，开始强攻。在坦克和重炮的支援下，战役进展顺利，各防御点接连被攻克。27日苏军突入到市区中心，29日将德军分割成孤立的三部分，30日占领德国最高权力机构的象征国会大厦。同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室自杀身死。5月2日，防守柏林的德军停止抵抗，战役结束。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

(杨宁一)

波茨坦会议

(Bocitan huiyi) 1945年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会议。1945年5月欧洲战争结束后，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美、英、苏三国赖以结盟的基础逐渐削弱，矛盾日益尖锐。但日本尚未打败，三国仍需协调行动继续保持合作。三国首脑杜鲁门、丘吉尔（后期为艾德礼）和斯大林遂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晤。会上斗争激烈，杜鲁门将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告之斯大林以向苏联示威。经过妥协，会议取得如下成果：讨论了占领德国的基本原则，规定解除德国武装，解散纳粹组织，分散德国经济，消灭德国作战潜力，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并确定了赔偿办法；承认波兰临时统一政府，初步确定波兰西部边界为奥得—尼斯河，但泽和东普鲁士南部划归波兰；东普鲁士北部和哥尼斯堡划入苏联；苏联重申对日作战的承诺。此外，会议还就成立外长会议，准备对意、匈、保、罗、芬的和约达成一致协议。会议最后通过了《苏、美、英三国柏林会议议定书》和《柏林会议公报》。此次会议及时调整了三大盟国的关系，维持了英、美、苏的同盟，解决了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一系列迫切问题，巩固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有利于加速对日战争的结束。为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奠定了基础。会后美、英与苏联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杨宁一）

波茨坦公告

(Bocitan gonggao)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会议期间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关于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战后处置日本方针的文件。全称为《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亦称《波茨坦宣言》。公告共13条，宣告盟国将继续对日作战至其停止抵抗为止的决心，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提出日本投降后盟国将实施的对日原则：永久剔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的威权及势力；盟国占领日本；《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指定的岛屿内；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审判战犯；消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不准日本保存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在上述目的达到和成立依据日本人民意志的倾向和平及负责的政府后，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同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正式在公告上签字。

(杨宁一)

日本无条件投降

(riben wutiaojian touxiang) 1945年8月轴心国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事件。194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军在盟军战略进攻和占领区抗日斗争的打击下节节败退，国内战争经济开始破产。7月26日，美、中、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被日本政府拒绝。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巨大伤亡和破坏。8月8日苏联履行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正式对日宣战，150万苏军向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中国各解放区武装展开大反攻。亚洲各国人民纷纷起义，打击日本侵略者。日本法西斯陷入全面崩溃的绝境，被迫于8月10日通知盟国，在“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2日盟国答复日本，投降后天皇及政府的统治权须服从于盟军最高统帅，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决定。经过争论，8月14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15日中午，天皇向全国广播投降诏书。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美、中、英、苏等盟国和日本代表举行签署投降书的仪式。日本无条件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国家的彻底失败、世界人民的最终胜利而结束。

(杨宁一)

历史教学法

中学历史教学法

(zhongxue lishi jiaoxuefa)以中学历史教学为对象,研究、阐述中学历史教学规律及其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的学科。属教育学分科教学论范畴。亦为高等师范院校、专科历史系学生必修课程。

历史教学产生后,即有了历史教学法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近代。在旧中国,中学历史教学法主要体现在历次颁布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里,同时,各套中学历史教科书亦大多配有相应的中学历史教学指导书。19世纪30、40年代后,个别中学历史教学法的论文、著作和译著也有问世。新中国成立后,中学历史教学法有了很大发展。现在,已有一大批专著、论文和译著发表、出版,形成专职的教学、研究人员队伍,亦有了专门的期刊、杂志和学术研究团体,以及硕士研究生的学位授予点。

中学历史教学法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学历史教学的全过程,其学科体系基本上依据于教学论,一般包括:历史课程的设置、任务、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教学过程、教学原则、课堂教学、教学方法、课外活动、乡土教学、教师的备课和进修等。

中学历史教学法的研究既要注意理论,又要联系教学实践;既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又要借鉴国外有益的成果;既要的现实为主,又要批判地吸收我国古代遗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学历史教学法,是学科的今后目标。

(孙恭恂)

中学历史学科教学论

(zhongxue lishi xueke jiaoxuelun)以中学历史教学为对象,研究、阐述中学历史教学规律及其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的学科。属教育学分科教学论范畴。中学历史学科教学论与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区别: 中学历史学科教学论的属性更为肯定; 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属性尚有分歧。 中学历史学科教学论较之中学历史教学法, 更强调有关中学历史教学的原理、规律部分。在我国, 中学历史学科教学论尚属创建, 尚未有专著问世。

(孙恭恂)

历史教育学

(lishi jiaoyuxue)以人类社会的历史教育现象为对象,研究、阐述历史教育的规律及其组织形式和教育方法的学科。属教育学范畴。其内容包括人类各个年龄段的历史教育,如幼儿、少年、青年、老年等。由于少年、青年的历史教育,主要途径是通过中小学的历史课程,因此,中小学的历史教育学与中小学的历史教学法内容上颇多重叠,唯应增加教学活动以外的历史教育部分。现在,我国问世的历史教育学著作,亦主要是关于中小学的,实为中学历史教学法的扩大、加深。

(孙恭恂)

中学历史教学大纲

(zhongxue lishi jiaoxue dagang) 亦称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根据国家关于中等学校教学计划的规定，对历史课程任务、目的、内容及其进程总体规划的指导性文件。

内容包括总论部分和分科部分。总论部分说明：中学历史教学在中学教育中的地位、任务、目的；中学历史教学的原则和指导思想；中学历史教学的进度及课时分配；中学历史乡土教学的安排；中学历史教学应注意的问题。分科部分规定了中外各段历史的教学任务、目的、指导思想、基本线索和知识要点。有的国家还写有关于各段历史内容的教学建议、教学手段和参考书目。

世界各国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作用不尽相同。我国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带有指导性，归国家教委统一制订，并颁布实行。它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主要依据，亦是检查、评定学生学习历史学业成绩和评估教师教学质量的主要标准。

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具有很高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在国家教委领导下，由历史专业、历史教育专业、历史教科书编写的专家和历史教师共同制订，并在历史教学实践中经过检验、修改，由专家组审定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1956年、1962年、1978年和1987年制订颁布了四个历史教学大纲；现正在制订九年义务教育制的历史教学大纲。

(孙恭恂)

中学历史教材

(Zhongxue lishijiaocai) 在中学历史教学工作中,教师指导学生学
习历史所用的一切材料的总称。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学乡土历史课本、
中学生的历史填图册、历史练习册、历史辅助阅读材料和历史教学片、教学
录像带等。中学历史教科书居于中学历史教材的核心地位,是中学历史教材
的主要部分。

(孙恭恂)

中学历史教科书

(zhongxue lishi jiaokeshu) 亦称中学历史课本。根据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编写的、具体系统地反映中学历史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中学历史课的主要教材。

世界各国各地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的体制主要有：统编，由国家组织编写审定，全国统一使用。如，中国、苏联。 审定，由单位、集团或个人编写，经国家审定使用。如，日本。 选定，由单位、集团或个人编写，各地区各学校可自由选用。如，香港地区。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制中学历史教科书将实行“一纲多本”，采用审定制。多套教科书审定后，由各地区自行选用。

中学历史教科书要具体地落实、贯彻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所规定的中学历史教学目的、指导思想和教学原则，按照其制订的历史学科的逻辑体系和知识要点，遵循学生的年龄特征，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结合。在文字上，应该准确、明确、生动、规范化，经得住推敲。

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体裁一般采用章节体，其结构有目录、正文、插图、注释、习题和大事年表、朝代顺序表等。亦有将正文分成大小字体，以示对学生记忆掌握程度的不同要求。

中学历史教科书是中学历史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是赖以实现中学历史教学任务、目的的重要工具，是中学历史学科教与学的主要教材，亦是检查学生学习历史成绩和评估历史教师教学质量的主要标准。

随着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变更和历史科学的发展，中学历史教科书应在相对稳定的同时，不断地更新。新中国成立后，在 1956 年、1962 年、1978 年和 1987 年先后编写出版了四套中学历史教科书，其间亦经常对其作些小的修订。现在，九年义务教育制“一纲多本”的各套中学历史教科书，正在编写。

(孙恭恂)

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指导书

(zhongxue lishi jiaoxue dagangzhidaoshu)为阐明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指导思想,并解释、说明其内容而编写的教师用书。是历史教师学习、掌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重要工具。指导书一般地按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体例和内容顺序编写,由主要参与制订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工作的专业人员执笔完成。新中国的第一本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指导书由苏寿桐、孙恭恂和臧嵘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孙恭恂)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书

(zhongxue lishi jiaoxue cankaoshu) 一切为中学历史教师备课、教学需要所编写的用书。包括中学历史教学手册(有的叫“中学历史教师手册”)、中学历史教学辞典、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学历史教材分析、中学历史教科书插图说明和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教案选等。由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单位、个人或各地区历史教研工作者编写的中学历史教师备课、教学用书。这种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书紧密配合各册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出版,内容有本册教科书各教学课时的教学目的、重点、难点、授课提纲、教材分析、习题解答、参考资料和教学建议。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书是中学历史教师备课、教学的重点辅助工具,同时对提高中学历史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亦有一定的作用。

(孙恭恂)

中学历史辅助读物

(zhongxue lishi fuzhu duwu) 为中学生学习历史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乡土历史教材以外的历史读物的总称。有的中学历史辅助读物作为历史教科书的直接补充，如，配合中学历史教科书内容编辑的一些历史原始资料，编写的历史故事、历史事实片段等；有的供学生课外历史学习阅读使用。

中学历史辅助读物应该观点正确，史实无误，适合学生年龄特征，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可读性；其体裁可以多样灵活，如，史话、问答、常识、故事等。

中学历史辅助读物对学生掌握中学历史教科书内容，扩大历史视野，提高能力，受到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意义，是中学生学习历史的重要工具，亦是中学历史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

(孙恭恂)

中学历史教学目的

(zhongxue lishi jiaoxue mudi) 亦称中学历史教学任务。通过中学历史教学活动对学生培养所要达到的总要求。它的确定，依据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状况，国家的教育总目标和教育方针、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发展现状，以及学生的年龄特征。世界各国和各个时代由于社会制度、历史学科状况和教育科学发展的不同，中学历史教学的目的不会相同。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的目的是：传授科学的历史基础知识，发展和培养学生能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三项目的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传授科学的历史基础知识是发展、培养学生能力，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中学历史教学目的是历史教学的方向，贯穿于中学历史教学过程的始终。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对中学历史教学目的有明确的规定。 中学一节历史课所要完成的培养学生的具体要求。包含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三个方面。制订一节历史课的教学目的，依据于中学历史教学的总目的，分科历史教学目的和本节课历史教科书的具体内容，以及学生的知识水平、年龄特征。教学目的是中学一节历史课的教学方向。

(孙恭恂)

中学历史基础知识

(zhongxue lishi jichu zhishi)亦称中学历史基本知识。围绕中学历史教学目的,根据中学教学计划关于历史学科课时安排和学生的知识水平、年龄特征,选择确定的中学历史学科知识内容的总称。中学历史基础知识包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制度和历史现象;既有规律性的认识,也有具体史实,是史论结合的。组成中学历史基础知识的要素有:时间、地点、人和事。向学生传授历史基础知识是中学历史教学的基本内容,亦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目的。中学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社会要求和历史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更新。中学历史基础知识的要点,在中学历史教学大纲里有明确规定。

(孙恭恂)

历史知识特点

(lishi zhishi tedian)由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特殊性所产生的历史知识有别于其他学科知识的特点。历史是人类已经消逝了的社会生活，其知识具有过去性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其一，认识历史，掌握历史知识，不能依赖于实验、观察等手段，而要通过人类历史遗留下的痕迹——史料。其二，历史与现实不能截然分开，认识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实，但是，现实不等于历史，不能用现实知识代替历史知识。人类历史发展有共同的统一规律，但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道路却千差万别，纷繁复杂，呈现出多样性和特殊性。历史知识具有具体性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认识历史，掌握历史知识，不能追求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以论代史，而是要认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体生动的历史进程，并从中掌握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

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内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所呈现出的辩证运动。历史知识具有丰富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认识历史，掌握历史知识，要视野开阔，着眼于历史的各个方面，并从其相互联系中把握历史发展的总体。

历史知识的特点决定了中学历史教学有别于其他学科教学的特殊性，认识这些特点，对于保障和提高中学历史教学质量，有重要作用。

(孙恭恂)

历史知识结构

(lishi zhishi jiegou) 历史知识的内容及其组成。由于角度不同,历史知识的结构亦有不同: 从组成历史知识的基本要素看,历史知识都包含着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个基本要素; 从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历史阶段的历史知识组成看,它应有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 就历史知识的某一方面看,它又是由一系列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制度和历史现象组成; 按照历史知识的具体表现形式,无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制度,历史现象,都有具体的经过、活动、内容、表现,还有产生的背景和历史影响及意义。 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看,历史知识都包含着观点和史实,既有感性的知识,亦有理性的知识。

明确历史知识的结构,对于制订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编写中学历史教材,教师进行历史教学和学生掌握历史知识,都有重要作用。

(孙恭恂)

中学历史教学过程

(zhongxue lishi jiaoxue guocheng) 中学历史教学的实施过程。其本质是人类认识历史过程的特殊阶段和特殊形式。“特殊阶段”，指学生一生认识历史的中学学习阶段。其一，这个阶段的认识有其特殊的学生年龄特征问题；其二，这个阶段的认识，主要是接受人类已有的历史知识，而不是去探索人类尚未认识的历史。“特殊形式”，是说中学历史教学不同于历史研究，学生是在教师的领导下，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以及复习、考试等形式，认识历史，获得历史知识，并发展、培养能力，受到思想政治教育。

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中学历史教学过程的理论基础。

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统一于中学历史教学过程里，实现完成。传授历史基础知识，是学生在认识客观历史中，主观认识能力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在认识历史中自己主观上思想感情的变化。认识是基础，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思想感情变化都要建立在认识的前提下；与此一致，能力的培养、发展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建立在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之上，寓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

中学历史教学既是认识历史的过程，学生是认识的主体，教师则是领导学生认识的重要因素。在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要认真地备课、教学，指导学生，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使师生融为一体，完成中学历史教学任务。

中学历史教学过程的模式，即步骤：引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感知历史知识；引导学生理解历史知识；帮助学生巩固历史知识；诱发学生运用历史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同时注意提高学生认识历史的能力，使之学会学习历史的方法，也使学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

认识中学历史教学过程的本质和模式，有利于认识遵循历史教学规律，对于提高中学历史教学的水平和质量有重要意义。

(孙恭恂)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

(zhongxue lishi ketang jiaoxue) 中学历史学科班级上课制的重要组织形式。在世界上，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而出现的旨在扩大受教育对象和增加教学内容的教学组织形式。形成于 17 世纪。我国，班级上课制的课堂教学正式开始于 1904 年 1 月清政府颁布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现在，仍为中学历史教学的主要组织形式。中学历史教学的任务主要通过课堂教学完成。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按照其完成的教学任务不同，可以划分为单一课（导言课、讲授新知识课、复习课、考查课等）和综合课两种类型。综合课由组织教学，复习旧课，导入新课，讲授新知识，总结巩固新知识，布置作业等几个环节组成，是历史课堂教学的基本类型。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必须有正确的教学目的，科学的教学内容，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年龄特征，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要保持其完整性和连贯性。

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水平，是保障中学历史教学质量的关键。

（孙恭恂）

中学历史单一课

(zhongxue lishi danyike)指在一节课内完成一个具体教学任务的课型。根据不同的教学任务,历史单一课又分为: 导言课; 讲授新知识课; 复习课; 考查课; 评讲课。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课,也属于中学历史单一课的范围,如讨论课、观看教学录像或电影的课,等等。中学历史单一课的主要特点,是集中课堂时间完成一个教学任务,因而与历史综合课相比,其课堂教学的环节较为集中和简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单一课的类型不宜长期连续使用,应依据学期工作计划合理安排。

(张赢)

中学历史导言课

(zhongxue lishi daoyanke) 中学历史单一课的一种类型，在新学年、新学期开始上历史课时采用，有时亦在开始讲授某一阶段历史时采用。导言课的目的，主要是指导学生了解为什么学习历史、学习什么历史和怎样学习历史等问题，从而使学生调动起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明确学习历史的目的，了解今后历史课学习的方向和步骤，并与历史教师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中学历史导言课的一般结构是：组织教学。讲述学习历史（特别是针对将要学习的某一段历史）的目的和意义，说明学习的重要性。介绍将要学习的主要内容，指出要学习的篇章，历史时期的断限和基本线索等问题。提出学习的安排、方法和要求，包括听课、记课堂笔记、完成作业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以及其他教学活动的安排和要求等。中学历史教师在上导言课前，应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思想特点，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导言课的教学。

(孙恭恂)

中学历史复习课

(zhongxue lishi fuxike) 中学历史单一课的一种类型。中学历史复习课是把一节课的时间，主要用于复习巩固旧的历史知识，其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已学过的历史知识，进而把所学的历史知识系统化，弥补平时教学中的不足，同时进一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各种历史学习能力和技巧。中学历史复习课根据不同的目的，又可分为：阶段复习；期末复习；总复习，等等。中学历史教师在上复习课时，要依据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要求和内容，制订出复习提纲或复习计划，然后根据复习提纲或复习计划，全面、系统地进行教学，并在教学过程中，总结、深化一些专题性的历史问题，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和运用历史知识的能力，掌握各种作业和考题的类型、答题方法及要求。中学历史复习课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有讲述法、讲解法、讲读法、谈话法、图示法等。复习时，教师不应只是自己讲授，要注意加强学生的多方面练习，并及时地指出学生在学习中的问题和缺陷。

(孙恭恂)

中学历史综合课

(Zhongxue lishi zongheke)是要在一节课内同时完成两个以上的教学任务的中学历史课堂类型。在中学历史综合课里，一般要包括复习、讲授、巩固、检查等环节。其基本的结构是：组织教学：教师通过与学生互致问候，检查学生出席情况，集中学生的注意力，组织并创造良好的教学气氛和环境。复习旧知识：教师通过概述或提问、检查作业等方式，对过去特别是上节历史课已学过的内容进行复习，检查学生对旧知识的掌握情况。导入新课：在复习旧课的基础上，引导出旧知识与新的教学内容的联系，自然地过渡到新的课题。讲授新知识：教师通过恰当的教学方法，把历史新教材的内容传授给学生。这是该课型教学的中心环节，所有时间应较其他环节为多。巩固新课：通过对新课内容的总结和巩固，检查学生接受、掌握新知识的情况，使学生对学习的新教材进一步消化和加强。巩固新课的方式可由教师复述、提问学生、指导学生阅读教科书等。布置作业：教师向学生布置有关新学的知识的作业练习，促使学生在课下及时复习课上所学的内容，同时亦为下节课的学习打好基础。中学历史综合课的基本结构及其所用的时间，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之教师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给予灵活掌握。由于历史学科的特点和中学生的年龄特征，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综合课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主要、基本类型。

(孙恭恂)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方法

(Zhongxue lishi ketang jiaoxuefangfa) 为了完成历史教学任务,教师和学生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采用的共同活动方式和手段。基本有: 讲述法。 讲解法。 谈话法。 讲读法。 直观教具演示法。“教无常法”,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方法不应该是千篇一律和一成不变的。但是,教师选择教学方法却又不能随心所欲。它主要遵循如下原则: 有利于更好地完成、达到中学历史教学任务、目的; 符合历史教学规律; 从教学内容出发,不同历史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适合学生的具体情况(知识水准、年龄特点和其他); 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注重教学的实际效果。选择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方法,切忌为方法而方法,为花样翻新而花样翻新,搞形式主义。

(孙恭恂)

历史课讲述法

(lishike jiangshufa) 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运用口头语言具体形象地讲授历史知识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有利于向学生介绍历史的具体进程、线索和重点问题,因而在中学课堂教学中广泛采用。讲述法又可分为:

叙述:指历史教师对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人物的活动,进行有头有尾的具体讲授。对历史现象的表述和历史制度的内容,亦可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叙述的安排要有前因后果,有具体情节和内容,要生动、形象、完整。

描述:指历史教师对某些典型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形象和特定历史场面,情景的突出特征,进行细致的描绘和详细介绍,给学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概述:指历史教师以简洁的语言对历史做扼要概括的讲述。概述的特点是不必有具体的情节,也不强调形象化,但要注重条理性。概述的目的在于勾勒出历史的线索和全貌。叙述、描述、概述这三种方式,构成讲述法。在运用时,须密切结合,依据所要讲述的历史内容恰当地选用。讲述法是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传授具体历史知识时最常用的方法。

(孙恭恂)

历史课讲解法

(lishike jiangjiefa) 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和科学论证，借以使 学生形成历史概念和掌握历史规律的教学方法。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基本方法之一。它主要应用于对规律性的历史知识如概念、规律、原理、性质、原因、意义、作用等的讲授中。讲解法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分析、认识历史问题有重要作用。讲解法在运用时，主要方式是：分析综合。分析，是对历史问题的各个部门加以分别考察；综合，是把历史问题的各个部分合成一个整体，加以全面认识。分析与综合是彼此统一、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在实际运用时，要做具体事实、实例与得出的概念、结论相统一，史和论相统一，要注意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注重学生的反应和活动。比较和对比。比较，是按一定的标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借以认识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关系，从而掌握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共同性；对比，是指彼此相反，不同性质的事物加以对照，以便更深刻地认识历史发展的本质区别。比较和对比都是确定历史问题同异关系的思维方法。它有利于揭示历史问题的本质和特征，并能防止历史概念的混淆。运用分析、综合和比较、对比的方法，必须建立在学生对史实有一定的了解、认识的基础上，因此，运用讲解法时，一定要与其他方法，特别是讲述法、谈话法结合起来，防止出现“以论代史”的偏差。

(孙恭恂)

历史课谈话法

(lishike tanhuafa) 又称历史课问答法。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提出问题,启发学生积极思维,通过师生之间对话,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的教学方法。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基本方法之一。历史课谈话法易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促使学生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对于学生巩固、运用历史知识亦有很大帮助。历史课谈话法适用于课堂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如复习旧知识、进行新知识的教学,总结和巩固新知识等。教师运用历史课谈话时,应体现下列基本要求:谈话的中心要围绕教学目的和教学要点;要在学生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提出的问题要具体明确,具有启发性;要适合学生的程度;要面向全班学生提问;同时,教师要注意听取学生回答,并对谈话的问题适当作出结论。历史教师运用谈话法进行教学,要注意与其他教学方法配合使用,特别是在讲授新知识的过程时,如完全采用谈话法,放弃讲述、讲解,可能流于形式,影响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效果。

(孙恭恂)

历史课讲读法

(lishike jiangdufa) 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指导学生阅读历史教材，并结合给予讲解的教学方法。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基本方法之一。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加强历史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历史课讲读法的方式，可以“先读后讲”，“先讲后读”，也可以“只读不讲”。教师应该根据教材内容，灵活掌握。对于讲读法，教师要在备课时预先作好计划，在课堂上有目的地进行；要做到讲和读有机地配合，不能通堂只让学生读书，放弃教师讲授。

(孙恭恂)

历史课直观教具演示法

(lishike zhiguan jiaoju yanshifa)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由教师演示历史直观教具或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使学生理解、掌握历史知识的教学方法。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基本方法之一。演示的历史直观教具有历史的实物、模型、图片、地图、图表和表解等;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有历史的幻灯片、影片和录像带等。中学历史课的“图文示意法”即是以演示历史的图表、表解和图画进行教学的一种方法,属于历史课直观教具演示法。历史课直观教具演示法可以增强历史教学的直观性,使学生形象生动地感知和理解历史知识,提高认识历史的能力,并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但是,这种方法应该与讲述、讲解、谈话等教学方法相配合,不宜于单独地使用。

(孙恭恂)

中学历史直观教学

(zhongxue lishi zhiguan jiaoxue) 中学历史课中，运用各种直观手段，以增强教学直观性、形象性的教学活动。包括：教师语言讲授的直观，运用各种直观教具，现代化教学手段和组织教学参观等。加强中学历史课的直观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感知历史知识，再现历史形象，加深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发展思维能力；对感染学生，向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亦有重要的作用。

(马卫东)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语言

(zhongxue lishi ketang jiaoxueyuyan)指历史教师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在组织和进行教学时，所使用的语言。其基本要求是：要有历史时代感，能够根据教学中的不同历史内容特点，运用可以反映历史时代特征的语言。可以适当地引用历史文献材料，同时注意准确地使用历史概念和专门术语。要准确规范，符合科学性；清楚明白，有逻辑性，没有语病。

要通俗易懂，采用口语，浅显、贴切，深入浅出。要生动形象，符合教学的直观性原则，有利于再现历史形象。爱憎分明，富有情感。正确把握语气、语调和语速，与手势相配合。中学历史课堂语言的提高，依赖于教师有意识地不断提高自己的语文修养和语言表达艺术，备讲、写教案时精雕细刻，精益求精。

(孙恭恂)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板书

(zhongxue lishi ketang jiaoxuebanshu)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在教室黑板上所书写的文字和绘制图示、图表、板画等的总称。板书是教师口头讲授的重要辅助手段。中学历史课堂的板书，从形式上分为：正板书。包括本课讲授的章节标题和内容提纲，是板书的主体。正板书根据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进行排列，应能完整、系统地体现本课教学的主要内容；既是教师的讲授提纲，也是学生课堂学习和课后复习的提纲；应要求学生在历史笔记本上记录。正板书通常写在教室黑板的左侧。副板书，正板书的补充。内容有重要的人名、地名、年代、数字、概念以及生僻难字。副板书一般写在黑板的右侧；可根据情况，随写随擦。图示、图表、板画（如历史地图）。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板书，在设计和安排时，要能体现出该课的教学中心，提纲挈领，重点突出，条理分明，逻辑性强，详略得当，布局合理，有利于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板书的书写应该工整，字体规范，标号统一，行距匀称，文字、线条清晰，注意粉笔色彩的搭配。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板书，要与教师语言讲授紧密配合。

（孙恭恂）

中学历史考查

(zhongxue lishi kaocha) 又称中学历史测验、中学历史考试。中学历史学科用以检查学生学业成绩和教学效果的方法。是督促学生学习、评定学生学习情况、了解教学效果，并据此不断地改革历史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

中学历史考查的方式有：检查书面作业。对一节课或几节课学生所做书面历史作业进行普查或抽查。随堂提问和随堂测验。前者为口头的，后者为书面的。主要检查学生对于前节课和本节的历史学习情况。一般不得占用整节课或大半节课的时间。期中、期末考试。在学期正中和学期结束时，以书面形式对学生学习历史情况进行测验、检查。常常使用一节课的时间。

统考。对期末的历史考试，由区、县、市、省等级教育行政机关或教研部门统一命题并监督执行。目的是检查各学校历史课程的学习成绩和教学效果，对全区、县、市、省历史教学情况做出评估、总结。中考。学生初中毕业的历史统考。其成绩计入学生的毕业总分和升学考试分数中。高考。报考高等院校、专科学校的历史考试。其成绩计入高考分数中。

中学历史书面考查试题，应该既注意检查学生的史实记忆情况，又注意检查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两者并重。试题类型一般有：填空、判断、列举、名词解释、识图、填图、问答等。

历史教师对考查结果，应该及时地作出评定、总结，从中认识历史教学的成绩，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必要时，考查结果要向学生公布并做出分析，指明学生今后学习的努力方向。

(孙恭恂)

历史直观教具

(lishi zhiguan jiaoju)能够增强历史教学直观性、形象性,有助于学生感知、理解历史知识的教学用具总称。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可分为两类: 常规教具:历史实物、模型,历史图片,历史地图,历史图表,历史板画等; 电化教具(又称现代化教学手段):历史幻灯,历史电影片,历史录像带等。历史直观教具,可以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配合教师讲述、讲解,进行演示,亦可以作为历史作业、历史考试和历史课外活动的内容。

(马卫东)

历史课现代化教学手段

(lishike xiandaihua jiaoxueshouduan) 亦称历史课电化教学手段。指在历史教学中,为提高教学效果,所使用的现代教育设备和先进科学技术。中学历史教学中常用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有: 幻灯。我国使用幻灯教学手段始于 50 年代。目前,经常使用的有白昼幻灯机(又称“投影仪”)、实物反射幻灯机和自动幻灯机。历史幻灯片的种类,按规格分,有大插片(5 厘米×7 厘米)、小插片(35 毫米)和卷片;按色彩分,有彩色和黑白;按制作方法分,有绘制、摄影和印刷;按制作方面分,有由有关单位制作发行的和教师自制的。 电影。使用电影手段教学,可以表现出教学内容的动态,有更好的形声效果。目前,使用的电影放映机有 8 毫米、16 毫米和 35 毫米的几种。历史电影片,按内容分,有历史文献片、历史科教片和历史题材的故事片。 录像。包括录像机、电视机、摄像机(硬件)和录像带(软件)。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是中学历史教学方法的重要改革,对于全面提高中学历史教学质量,有重要作用。

(马卫东)

中学历史课本插图

(zhongxue lishi keben chatu)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图片、历史地图和历史图表的总称。既是中学历史教学直观教具之一，亦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使用插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感知、理解教科书内容，加强历史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有重要作用。

(马卫东)

历史地图

(lishi ditu) 反映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历史现象空间位置和地理环境的手段。中学历史教学直观教具之一。历史地图种类：按制作分，有由出版社专门制作发行的和历史教师自制的；按内容分，有综合性历史地图，如《三国鼎立形势图》；有专题历史地图，如《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有局部明细性附图，如《淝水战争形势图》中关于淝水之战的战场明细图；按教学使用方式分，有历史教科书插图、黑板地图、历史挂图。历史挂图，又可分为一般挂图、添加式地图、翻页式地图、卡片式地图、抽插式地图等。按色彩分，有彩色的和黑白的。历史地图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经常用于配合教师讲授进行演示，亦可作为历史作业、历史考查和历史课外活动的内容，如，填图练习、考试；绘制历史地图课外活动等。历史地图，对于形成学生的时、空观念和地理概念，加强历史课的直观性、形象性，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效果，有重要作用。

(马卫东)

历史模型

(lishi moxing) 按照人类历史遗迹、遗址、遗物或历史文献而复制的模拟实物的总称。中学历史教学直观教具之一。遗址模型，如半坡氏族的村落、房屋复原模型，唐代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复原模型；遗迹模型，如河南安阳小屯武官村商王大墓模型；遗物模型，如原始人类使用的工具模型、青铜器模型；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制作的模型，如东汉张衡发明制造的地动仪模型。制作精良的历史模型，外表与实物一模一样，可以代替实物，配合教师讲授，在教学中演示，亦可以作为历史课外活动的内容（如，指导学生动手制作历史模型）。历史模型，对于加强历史课的直观性、形象性，提高学生历史学习效果，有重要作用。

（马卫东）

历史挂图

(lishi guatu) 配合历史教科书内容和历史课堂教学需要专门绘制的可挂的大幅图画总称。中学历史教学直观教具的一种。历史挂图，按制作分，有由出版社专门制作发行的和历史教师自制的；按内容分，有历史图片、历史地图、历史图表；按色彩分，有彩色的和黑白的。历史教学挂图，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能够配合教师讲授，加强历史课的直观性、形象性，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效果，形成学生时、空观念，是被经常使用的教学手段。

(马卫东)

历史图片

(lishi tupian) 描绘、反映人类历史面貌形象的图片、绘画总称。中学历史教学直观教具的一种。历史图片，按制作方法分，有照片（包括历史人物、事件、现象，历史遗址、遗迹、实物、模型和历史图画的照片）、绘画（包括临摹画和想象画）；按制作时间分，有当时人的作品和后人依据历史文献绘制的作品；按教学使用方式分，有历史教科书插图和历史挂图；按色彩分，有彩色的和黑白的。历史图片，可用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配合教师讲授，进行演示；亦可以作为历史课外活动内容（如历史图片展览等）。历史图片对于加强中学历史课的直观性、形象性，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效果，有重要作用。

（马卫东）

历史图表

(lishi tubiao) 能够把复杂的历史现象或概念简单化、条理化和一定程度上形象化的表格总称。中学历史教学直观教具的一种。历史图表的种类很多，有表解(如，王安石变法内容表解)、图解(如，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比较表)等。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先绘好图表，配合课堂讲述使用，亦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边讲授边绘制。历史图表还可以作为历史作业、历史考试和历史课外活动的内容(如编制历史图表或填写历史图表各项内容)等。运用历史图表教学，有助于学生记忆和理解历史基础知识。

(马卫东)

历史年表

(lishi nianbiao) 依照历史时间顺序、反映历史发展纵横联系的表格总称。中学历史教学直观教具的一种。有历史大事年表(如,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朝代顺序表(如,中国历史朝代顺序表)和帝系表等。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先行绘好年表,配合课堂讲授使用,也可以边讲授边绘制。历史年表亦可以作为历史作业、历史考试和历史课外活动的内容,如编制年表或填写年表的某些内容等。使用历史年表教学,对学生形成时间观念、记忆历史年代,有重要作用。

(马卫东)

中学历史课外活动

(zhongxue lishi kewai huodong)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以外，由教师有计划、有目的组织学生对历史的学习活动。中学历史教学组织形式之一。开展历史课外活动的目的是补充、扩大学生的历史知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个别爱好历史学生的求知欲望，做到因材施教。历史课外活动是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必要辅助手段。其主要形式有：历史参观。在教师指导、组织下，参观历史遗址、遗迹和历史博物馆。访问。组织学生走访革命前辈、重大历史事件的参加者、目击者。历史报告会和历史故事会。结合教材具体内容或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纪念日，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组织专题报告和讲历史故事。课外阅读。指导学生阅读课外历史书籍和历史小说。

历史墙报。组织学生编辑、出刊历史内容的壁报或黑板报。其形式有“历史园地”、“历史之窗”、“历史之角”等；内容可以有历史专题、历史常识、历史图片、历史资料、历史小故事等。历史课外活动小组。把喜欢历史的学生，以小组形式组织起来，在教师指导下，开展各种形式有关历史学习的活动。小组成员既是历史学习的积极分子，又可以是教师开展历史课外活动的得力助手。中学历史课外活动的形式，还有历史知识竞赛，历史文艺活动，组织观看历史电影、电视和历史戏剧等。开展历史课外活动，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增强历史教学效果和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都有重要作用。

(马卫东)

中学历史乡土教学

(zhongxue lishi xiangtu jiaoxue) 中学校以本地方、本民族的历史为内容的教学活动。开展历史乡土教学，能够适应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历史基础知识，发展能力，受到爱国主义和国情等思想政治教育。它是中国通史教学的必要补充。

中学历史乡土教学的方式有：结合中国通史教学，在相应章节补充本地方史或本民族史的内容。在中国通史课外，开设本地方或本民族史专题讲座。结合历史课外活动，开展历史乡土教学。

中学历史乡土教学，应该依据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精神，按照有关乡土教材内容进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尊重史实的科学性；教学中要反对大汉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孙恭恂)

中学历史乡土教材

(zhongxue lishi xiangtu jiaocai)以本地方或本民族历史为内容编写的中学历史教材。各地方、各民族中学进行历史乡土教学的主要工具。一般由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编写，并经本地或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审定使用。现在，我国许多省、市、自治区都有中学历史乡土教材问世。中学历史乡土教材的体裁、体例灵活多样，有章节体、纪事本末体、史话体等。编写中学历史乡土教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做到史论统一，坚持思想性、科学性和可读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历史教学任务、目的和历史教学指导思想、原则，同样适用于历史乡土教材，是编写中学历史乡土教材工作的主要依据。

(孙恭恂)

中学历史教师备课

(zhongxue lishi jiaoshi beike) 中学历史教师上课前的准备工作。有学期(或学年)前的备课和课时前的备课两种。

学期(或学年)前的备课,一般包括下列工作: 学习中学历史教学大纲,通读本学期(或学年)所用历史教科书,明确本学期(或学年)的教学总任务、目的、教学内容的基本线索和知识要点; 了解授课班级学生的思想情况、知识水准和年龄特征; 制订学期(或学年)教学计划(包括课程名称、教学的总任务、目的,课时计划、课外活动和乡土教学的安排,做哪些教学改进或试验,使用的历史直观教具或现代化教学手段)。

课时前的备课,一般包括下列工作: 钻研教材。包括钻研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历史教科书,阅读参考书(有关的历史理论、教育理论、历史专业论著和论文、考古报告、历史文献、历史地图、历史工具书以及专为中学历史教师备课使用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书》、《中学历史教师手册》等),从中掌握本课时教材内容的内在联系,与前后课的关系,以及知识要点、知识结构,发展能力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因素,拟定出本课时的教学目的。

组织教材。根据本课时的教材内容和学生情况,考虑课型、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按照课堂教学实际情况组织本课时的教材。一般地在不打乱中学历史教科书体系的前提下,突出重点,解决难点,补充史实,给予讲解,组织学生谈话、阅读,使本课时教材内容能够为学生充分地接受、掌握。 编写教案。

中学历史教师的备课是保障历史课堂教学质量的前提,亦是教师自身业务水平提高的重要途径。

(孙恭恂)

中学历史教案

(zhongxue lishi jiaoan)亦称中学历史课时计划。教师经过备课，以课时为单位设计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方案。历史教师充分地钻研教材和组织教材，是编写历史教案的前提、基础；历史教案又是历史教师备课工作的最终落实和上课的重要依据。

中学历史教案通常包括以下项目、内容：学科， 班级， 课题， 上课时间， 教学目的，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授课提纲， 课型、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教学内容和实施进程（又称“教学过程”）， 课时分配，（11）课后自我分析和小结。一般说，有经验的教师编写历史教案，可以简略一些；新教师要编写详细些。平行班同一课题的历史教案，可以是一个，但是应随各班的不同情况，在使用时做出适当的调整、修改。原定历史教案，在讲授过程中，亦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变通、修改。在新班级上课，原则上应依据自己对教材新的认识和新班级学生的情况，重新编写历史教案或对原历史教案做出适当修正。

（孙恭恂）

中学历史教师进修

(zhongxue lishi jiaoshi jinxiu)指在职中学教师通过各种途径接受继续教育或自学,对个人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再提高的工作。中学历史教师进修的内容,可根据个人具体情况确定,一般包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提高理论修养。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历史方面的论断和研究方法等。学习时,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把理论学习与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同自己的思想实际和教学工作实际联系起来。学习历史科学的专业知识,提高历史教学的专业水平。有通史、断代史、专史著作和有关的历史文献、史学研究论文等。还有史学理论、考古、文物、历史地理和古代汉语的相关知识。学习历史专业知识,要与自己的教学工作结合起来。学习教育和教学的理论,提高教学的能力和水平。有教育学、心理学、历史教学法,以及与教育、教学有关的其他学科,如逻辑学、语言学、美学等。学习先进的历史教学经验,了解和掌握历史教学实践领域中的成果、动态。

中学历史教师的进修,其途径和方法多种多样,有脱产进修、半脱产进修、在职进修和个人自修等。就大多数教师而言,在职进修和个人自修是主要途径。中学历史教师进修应有计划地进行。进修计划要切合实际,依具体情况分为近期(如,年)计划和长期(如,3年至5年)计划。近期计划可先对自己教学工作时所急需的知识进行学习;长期计划可照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的继续教育计划,系统地进行学习。在进修时,要注意收集、积累和整理学习资料,总结和积累个人的教学工作经验。

中学历史教师进修,对于稳定地保障、提高中学历史教学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孙恭恂)

中学历史教学手册

(zhongxue lishi jiaoxue shouce) 亦称中学历史教师手册。为中学历史教师进行备课、教学编写的带有工具书性质的参考读物。内容一般有：各段历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知识要点介绍； 中学历史教科书插图说明； 中学历史教学法； 历史大事年表、中外王朝世系表；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书目、文章索引。中学历史教学手册应该观点正确，史料翔实，有可信性；应该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可靠工具和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基本读物。

(孙恭恂)

中学历史教研组

(zhongxue lishi jiaoyanzu) 领导、组织中学历史学科教学研究活动的机构。 学校历史教研组。由学校历史课任课教师组成，有组长一人负责，领导、组织本组教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研究中学历史课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方法，组织观摩课、研究课和教学经验交流，帮助新历史教师提高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 区、县、市、省历史教研组。由专职和兼职教研员若干人组成，有组长一人负责，研究本地区历史教学的改进、提高工作；领导、组织本地区历史教师的培训、进修和观摩课、研究课、教学经验交流；负责组织本地区历史教学的统考和中考命题、评卷以及对教师教学的评比、评估工作。历史教研组在各学校和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是各级教育行政机关领导历史教学工作的重要助手。

(孙恭恂)

